

目录

[譯者的話 2](#_Toc58922308)

[總編輯序 3](#_Toc58922309)

[第一章 導論：近代中國歷史的透視 4](#_Toc58922310)

[變革與連續性：分期 7](#_Toc58922311)

[1800—1864年 7](#_Toc58922312)

[1865—1911年 9](#_Toc58922313)

[1912—1930年 10](#_Toc58922314)

[1931—1949年 11](#_Toc58922315)

[中國經濟的增長和變革 11](#_Toc58922316)

[中華帝國末期的前資本主義商品化 12](#_Toc58922317)

[經濟停滯 13](#_Toc58922318)

[外部因素：對外貿易與帝國主義 16](#_Toc58922319)

[1911年以后的連續性 19](#_Toc58922320)

[社會結構與社會行為的變化 20](#_Toc58922321)

[水平社會結構與垂直社會結構 20](#_Toc58922322)

[社會不穩定的加劇 21](#_Toc58922323)

[傳統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23](#_Toc58922324)

[農村組織與民眾運動 25](#_Toc58922325)

[工人運動及其農村紐帶 28](#_Toc58922326)

[革命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 29](#_Toc58922327)

[清代權力機構的失去平衡 30](#_Toc58922328)

[名流積極精神的興起 31](#_Toc58922329)

[清末的新政與革命 34](#_Toc58922330)

[民國政治的動向 36](#_Toc58922331)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國的國際關系 54](#_Toc58922332)

[溯源：作為東亞地區秩序的清帝國的衰落和滅亡 54](#_Toc58922333)

[日本在滿洲勢力的崛起 58](#_Toc58922334)

[日本的二十一條 63](#_Toc58922335)

[日本的影響和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69](#_Toc58922336)

[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70](#_Toc58922337)

[莫斯科與中國的雙重接近 72](#_Toc58922338)

[中國的國民革命和列強 74](#_Toc58922339)

[第三章 南京十年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27—1937年 80](#_Toc58922340)

[權力初步鞏固 80](#_Toc58922341)

[各省的斗爭 83](#_Toc58922342)

[有助于蔣介石政治統治的諸因素 86](#_Toc58922343)

[南京政權的意識形態、結構和職能的行使 88](#_Toc58922344)

[國民黨諸派系 92](#_Toc58922345)

[國民黨政權的成就 95](#_Toc58922346)

[中國的新心態，1936—1937年 101](#_Toc58922347)

[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估 102](#_Toc58922348)

[第四章 1927—1937年的共產主義運動 110](#_Toc58922349)

[黨的重建和領導 110](#_Toc58922350)

[階級成分 111](#_Toc58922351)

[群眾路線 113](#_Toc58922352)

[宗派主義和叛變 115](#_Toc58922353)

[農村蘇維埃的創建 117](#_Toc58922354)

[1927年的起義 117](#_Toc58922355)

[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 121](#_Toc58922356)

[富農問題 122](#_Toc58922357)

[查田運動 123](#_Toc58922358)

[紅軍 124](#_Toc58922359)

[尋找一種戰略 125](#_Toc58922360)

[李立三路線 125](#_Toc58922361)

[王明的“兩條路線” 127](#_Toc58922362)

[蘇區的毀滅 128](#_Toc58922363)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 129](#_Toc58922364)

[長征 130](#_Toc58922365)

[張國燾的分裂活動 132](#_Toc58922366)

[“白區”的地下工作 134](#_Toc58922367)

[劉少奇 135](#_Toc58922368)

[第二次統一戰線的準備 136](#_Toc58922369)

[西安事變 138](#_Toc58922370)

[第五章 土地制度 152](#_Toc58922371)

[土地制度的狀況 153](#_Toc58922372)

[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 153](#_Toc58922373)

[土地和勞力 155](#_Toc58922374)

[村莊和農戶 156](#_Toc58922375)

[農村的上層人物 156](#_Toc58922376)

[分割繼承 158](#_Toc58922377)

[家及其收入 159](#_Toc58922378)

[家的合作形式 161](#_Toc58922379)

[農業的商業化 162](#_Toc58922380)

[增強的資源專業化 162](#_Toc58922381)

[新出現的農村經濟 164](#_Toc58922382)

[農業危機 165](#_Toc58922383)

[危機的確定與敘述 165](#_Toc58922384)

[20世紀20年代 168](#_Toc58922385)

[南京十年 169](#_Toc58922386)

[戰爭年代 171](#_Toc58922387)

[第六章 農民運動 178](#_Toc58922388)

[自發的抗租抗稅 179](#_Toc58922389)

[佃農與地主之間的糾紛 179](#_Toc58922390)

[抗稅騷動 182](#_Toc58922391)

[抵制鴉片稅 184](#_Toc58922392)

[自發的農民騷動：類型和特征 185](#_Toc58922393)

[與租、稅無關的騷亂及其類型 185](#_Toc58922394)

[特征 191](#_Toc58922395)

[農民與共產黨人：不相稱的聯盟 194](#_Toc58922396)

[彭湃與海陸豐農民（1922—1928年） 194](#_Toc58922397)

[外地和以后 202](#_Toc58922398)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發展 214](#_Toc58922399)

[社會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214](#_Toc58922400)

[議事會和“新政” 217](#_Toc58922401)

[區域政體 219](#_Toc58922402)

[山西計劃 219](#_Toc58922403)

[南京政府關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 221](#_Toc58922404)

[地方政府的官僚主義化 221](#_Toc58922405)

[鄉村建設運動 225](#_Toc58922406)

[參與與官僚政治：歷史的進程 228](#_Toc58922407)

[第八章 學術界的成長，1912—1949年 232](#_Toc58922408)

[現代教育機構的出現，1898—1928年 233](#_Toc58922409)

[人員：海外培訓的精英 233](#_Toc58922410)

[大學：機構的建立 235](#_Toc58922411)

[科學與研究的開端 241](#_Toc58922412)

[提供基金與美國的影響：清華 242](#_Toc58922413)

[南京十年期間的高等教育和國家建設 244](#_Toc58922414)

[中央政府的領導 244](#_Toc58922415)

[高級研究 248](#_Toc58922416)

[研究的資助 250](#_Toc58922417)

[戰時和戰后的變化，1937—1949年 258](#_Toc58922418)

[戰時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258](#_Toc58922419)

[戰后的變化 260](#_Toc58922420)

[第九章 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272](#_Toc58922421)

[30年代文學，1927—1937年 272](#_Toc58922422)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272](#_Toc58922423)

[左翼作家聯盟與關于文學的論戰 275](#_Toc58922424)

[序幕：魯迅與新月派的較量 276](#_Toc58922425)

[“民族主義文學”問題 278](#_Toc58922426)

[“自由人”以及“第三種人”問題 278](#_Toc58922427)

[關于“大眾話”和“拉丁化”的論爭 280](#_Toc58922428)

[關于“兩個口號”之爭 281](#_Toc58922429)

[文學創作與社會危機 284](#_Toc58922430)

[雜文 285](#_Toc58922431)

[小說 286](#_Toc58922432)

[詩歌 290](#_Toc58922433)

[戲劇 294](#_Toc58922434)

[戰爭與革命，1937—1949年 296](#_Toc58922435)

[“民族抗戰”的英雄傳奇 296](#_Toc58922436)

[“愛國鐵血”文學 298](#_Toc58922437)

[延安座談會 301](#_Toc58922438)

[延安文學 304](#_Toc58922439)

[革命前夕，1945—1949年 307](#_Toc58922440)

[第十章 日本入侵與中國的國際地位，1931—1949年 318](#_Toc58922441)

[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的邊緣地位 318](#_Toc58922442)

[滿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軍國主義，1931—1932年 321](#_Toc58922443)

[國際主義的瓦解 324](#_Toc58922444)

[日本企圖獲得區域合作，1933—1937年 326](#_Toc58922445)

[中日戰爭期間的強國形象，1937—1941年 331](#_Toc58922446)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與日本，1941—1945年 337](#_Toc58922447)

[中國戰后的衰落，1945—1949年 339](#_Toc58922448)

[第十一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339](#_Toc58922449)

[最初的戰役和戰略，1937—1939年 339](#_Toc58922450)

[中國的戰爭動員 339](#_Toc58922451)

[1939—1945年的惡化：軍事 339](#_Toc58922452)

[外國軍事援助 339](#_Toc58922453)

[1944年日本的一號作戰 339](#_Toc58922454)

[通貨膨脹災難 339](#_Toc58922455)

[工業部門 339](#_Toc58922456)

[政治上的虛弱 339](#_Toc58922457)

[第十二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5年 339](#_Toc58922458)

[Ⅰ戰爭初期，1937—1938年 339](#_Toc58922459)

[對國民黨的態度：統一戰線 339](#_Toc58922460)

[軍事戰略與戰術 339](#_Toc58922461)

[領袖與領導權 339](#_Toc58922462)

[組織機構與活動 339](#_Toc58922463)

[日本的入侵和中國的最初反應 339](#_Toc58922464)

[根據地的建立 339](#_Toc58922465)

[根據地建設過程 339](#_Toc58922466)

[Ⅱ戰爭中期，1939—1943年 339](#_Toc58922467)

[與國民黨的“摩擦” 339](#_Toc58922468)

[日本的強化治安 339](#_Toc58922469)

[華北的強化治安 339](#_Toc58922470)

[百團大戰 339](#_Toc58922471)

[百團大戰后的掃蕩戰，1941—1943年 339](#_Toc58922472)

[日軍在華中的強化治安 339](#_Toc58922473)

[中共的對策：生存與新政 339](#_Toc58922474)

[陜甘寧的新政策 339](#_Toc58922475)

[敵后根據地的新政策 339](#_Toc58922476)

[Ⅲ戰爭的最后兩年，1944—1945年 339](#_Toc58922477)

[一號作戰及其后果 339](#_Toc58922478)

[政治和軍事的發展 339](#_Toc58922479)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人 339](#_Toc58922480)

[第七次代表大會 339](#_Toc58922481)

[中國共產黨與蘇聯 339](#_Toc58922482)

[瞻望 339](#_Toc58922483)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國共沖突 339](#_Toc58922484)

[談判與美國的卷入 339](#_Toc58922485)

[赫爾利使團，1944—1945年 339](#_Toc58922486)

[馬歇爾使團，1946年 339](#_Toc58922487)

[馬歇爾使團的失敗和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牽連 339](#_Toc58922488)

[國民黨統治的衰落 339](#_Toc58922489)

[接管日占區 339](#_Toc58922490)

[經濟上的無能：通貨膨脹的金融政策 339](#_Toc58922491)

[1947年到1948年的應急改革 339](#_Toc58922492)

[政治上的無能：對和平運動處置失當 339](#_Toc58922493)

[共產黨力量的壯大 339](#_Toc58922494)

[1946—1949年的內戰 339](#_Toc58922495)

[第一年，1946—1947年：退卻 339](#_Toc58922496)

[第二年，1947—1948年：反攻 339](#_Toc58922497)

[第三年，1948—1949年：勝利 339](#_Toc58922498)

[國民黨政府的倒臺和美國政策的失敗 339](#_Toc58922499)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339](#_Toc58922500)

[從學生運動到農民運動，1917—1927年 339](#_Toc58922501)

[黨、軍人和群眾，1927—1937年 339](#_Toc58922502)

[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1937—1940年 339](#_Toc58922503)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941—1949年 339](#_Toc58922504)

[結論：走向人民民主的現代化的獨裁國家？ 339](#_Toc58922505)

[參考文獻介紹[1] 339](#_Toc58922506)

[第一章 導論 339](#_Toc58922507)

[研究工具書 339](#_Toc58922508)

[經濟社會史 339](#_Toc58922509)

[最近的社會史研究 339](#_Toc58922510)

[蘇聯關于晚清及中華民國的研究 339](#_Toc58922511)

[第二章和第十章 中國的對外關系，1911—1949年 339](#_Toc58922512)

[第三章 南京十年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27—1937年 339](#_Toc58922513)

[第四章 共產主義運動 339](#_Toc58922514)

[第五章 土地制度 339](#_Toc58922515)

[第六章 農民運動 339](#_Toc58922516)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發展 339](#_Toc58922517)

[第八章 學術界的成長，1912—1949年 339](#_Toc58922518)

[第九章 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339](#_Toc58922519)

[第十一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339](#_Toc58922520)

[第十二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5年 339](#_Toc58922521)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國共沖突 339](#_Toc58922522)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339](#_Toc58922523)

[參考書目 339](#_Toc58922524)

# 譯者的話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是《劍橋中國史》第13卷的中譯本。為保持原貌，我們未作刪改。有關觀點、材料取舍等方面的問題，請讀者自行鑒別。原書地圖所用地名有與當時所用地名不同者，內容也有與當時實際情況不符者，我們也未予改動。書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們盡可能查出原文；少數查不到原文的，從英文回譯，刪除了引號。有些地方我們加了譯者注。全書由劉敬坤統一文字體例；譯者注亦主要為劉敬坤所加。全書中文專門詞語的復原以及英文注釋的翻譯、書目提要和書目的翻譯整理由李寶鴻負責；中文名稱的查對，由劉敬坤負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鐵健、王學莊、韓信夫也對中文名稱作了不少訂正。葉宗敭初校了全書（除去第2章）；南京農業大學農業工程學院的潘君拯教授審閱了除第1、第3、第7、第14章以外的全部譯稿；謝亮生負責全書的校訂工作。

本書各章的譯者如下：

第1章 劉敬坤

第2章 高士華

第3章 李寶鴻

第4章 劉敬坤、趙麗江

第5章 趙麗江、李啟家

第6章 李啟家、趙麗江

第7章 丁于廉

第8章 高士華、董卉

第9章 范磊

第10章 周祖羲

第11章 曾景忠

第12章 第Ⅰ部分 汪朝光；第Ⅱ、Ⅲ部分 李學通

第13章 馬曉光

第14章 葉宗敭

地 圖 張言

# 總編輯序

由于現代的世界漸漸變得更加相互地聯系在一起，歷史地認識它不斷變得更加必要，歷史學家的工作也不斷變得更加復雜。原始資料激增和知識增加，論據和理論也相互影響。盡管單單總結已知的東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認識的事實基礎對于歷史的思考卻越來越重要。

從20世紀初起，劍橋史書已在英語世界中為多卷的叢書樹立了一種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專家在每卷編輯的指導下撰寫。由阿克頓爵士規劃的《劍橋近代史》，在1902到1912年間以16卷本問世。接著出版了《劍橋古代史》、《劍橋中世紀史》、《劍橋英國文學史》和關于印度、波蘭以及英帝國的劍橋史。原來的《劍橋近代史》現在已為12卷的《新編劍橋近代史》代替，《劍橋歐洲經濟史》也即將完成。其他劍橋史包括伊斯蘭教史、阿拉伯文學史、伊朗史、猶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國史。

就中國而言，西方的歷史學家面臨一個特殊問題。中國的文明史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史都更為廣泛和復雜，只是比作為整體的歐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錯而已。中國的歷史記載極為詳盡、廣泛，中國有關歷史的學術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高度發達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幾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國研究盡管有歐洲中國學家重要的開創工作，其進展卻幾乎沒有超過少數史學典籍的翻譯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歷史。

近來，西方學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國和日本豐富的有關歷史的傳統學術，不但大大地促進了我們對過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細的了解，而且還大大地促進了我們對傳統歷史編纂學的批判性的認識。此外，當前一代西方的中國史學者在繼續依靠正在迅速發展的歐洲、日本和中國的研究的扎實基礎的同時，還能利用近代西方有關歷史的學術的新觀點、新方法以及社會科學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關歷史的事件在使許多較舊的看法成為疑問的同時，又突出了一些新問題。在這眾多方面的影響下，西方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劇烈變革正在不斷增強勢頭。

1966年最初規劃《劍橋中國史》時，目的是為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規范的有價值的著作：由于當時的知識狀況，定為6卷。從那時起，公認的研究成果的涌現、新方法的應用以及學術向新領域的擴展，已經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史的研究。這一發展為以下的事實所表明：《劍橋中國史》現在已經變為計劃出15卷，但還必須舍棄諸如藝術史和文學史等題目、經濟和工藝的許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豐富材料。

近十年來我們對中國過去的認識的顯著進展將會繼續和加快。西方歷史學家對這一重要而復雜的學科所作的努力證明是得當的，因為他們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國。中國的歷史屬于全人類，不但由于正當而且必要，還由于它是一門使人不由發生興趣的學科。

費正清

崔瑞德

（謝亮生 譯）

# 第一章 導論：近代中國歷史的透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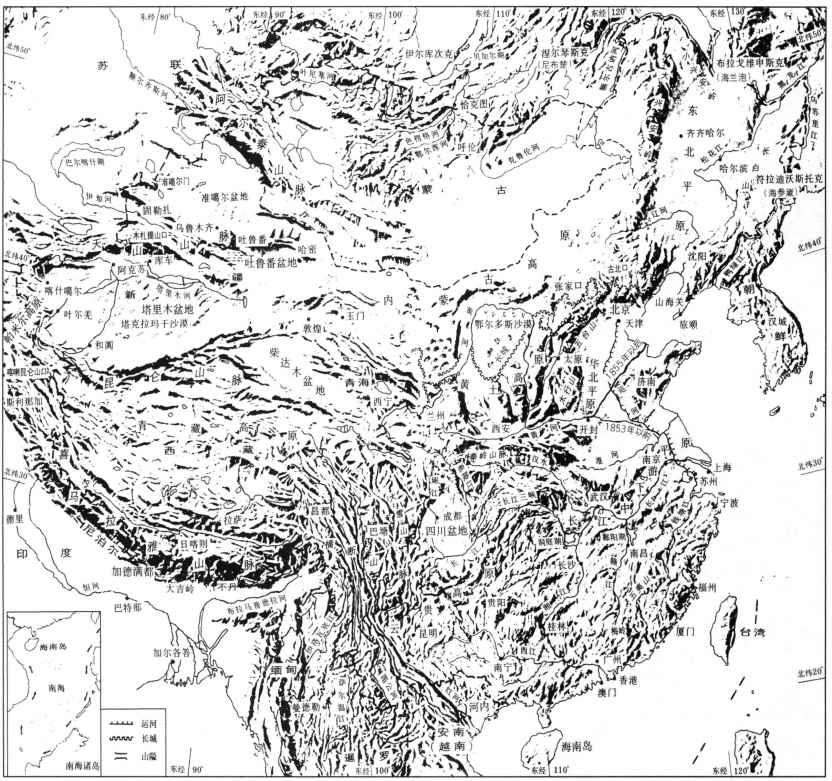
文字是劃分和分析過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無論怎樣精心推敲，近代中國歷史的特點，不可能用寥寥數語來描述。用得過濫的“革命”一詞，有時還不如“復興”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義無非就是“貫穿近時的變化”，讓我們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時間”。不過撰寫這套書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過于簡單化的水準，提供中國從1800年到1949年這一個半世紀的事件和趨勢的概況。就一些范圍不那么廣的概括作出范圍更廣的概括，無疑是歷史學家的主要職責，但這四卷的大多數作者都會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概括的范圍廣一些，很可能離事件具體的事實就遠一些。根據這種觀點，以包羅萬象的各個過程（如進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各個階段（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前提，一般地說是屬于超歷史的信仰領域。盡管我們無須讓那些喜愛這類名詞的人放棄它們，我們還是可以認定這類名詞是超越理性的信仰問題。[[1]](#_1_Wo_Men_Ge_Wai_Gan_Ji_Ma_Li_An)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層次上，社會科學的概念能幫助我們闡明歷史事件。歷史學本身雖不是社會科學，但它的任務是陳述過去發生的事情，并綜合我們今天對這些事情的認識，使我們的認識成為一個整體。為此目的，隱喻長期成為闡述歷史的主要文學手段。城市陷落，戰爭結束，希望飛騰，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進步的前景越來越暗淡，等等，等等，我們主要使用來自感官的隱喻描述社會事件。同樣，社會科學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寫出結構、水平、下降趨勢、加速或平衡。然而，來自社會科學分析的中間層次的概念，卻越來越多地被用來闡述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把一個事件同另一個事件聯系起來。例如，第12卷第1章提出“海洋中國”——一個與“大陸中國”不同的生態、經濟、政治和文化地區的——概念，可以用來描述外國影響進入中國社會的渠道。在這個框架中，本章首先論及大陸中國。而且，由于第10、11和12卷主要論述政治史、經濟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圖闡述迅速發展的社會史領域的新近成果。

讀者會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國”作為單一實體來對待的嘗試，正在為詳細研究所揭示的諸多情況所減弱。區別于外部世界的“中國文化的差異性”，雖仍在打動旅行者的心，但這一陳舊觀念卻正被中國國內所發現的各種亞文化群所打破。“中國文化”作為（中國獨特的經濟、政體、社會結構、思想以及價值觀交互影響所創造的）可視為同一的構成模式，在近代國際接觸的進程中，變得不是那么獨特的和可以視為同一的了。隨著我們知識的增長，概括變得更加困難，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們敢以高度的概括來開始，斷言20世紀的中國革命在兩方面有別于所有別國的革命——人口規模更大，面臨的變革更廣泛。中國的人口規模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廣泛的變革也往往延長了革命。

讓我們首先研究連續不斷的事件。中國在19世紀經歷了一系列的叛亂（白蓮教，1796—1804年；太平天國，1850—1864年；捻軍，1853—1868年；回民，1855—1873年）和一系列的對外戰爭（英國，1839—1842年；英法，1856—1860年；法國，1883—1885年；日本，1894—1895年；1900年的義和團國際戰爭）。在20世紀接踵而來的是一系列革命：結束古代君主制度的1911年的共和革命[[2]](#_2_Ji_Xin_Hai_Ge_Ming_______Yi_Z)，建立國民黨獨裁的1923—1928年的國民革命，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黨革命和1966—1976年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地圖1 中國地形圖

這些里程碑表明，在滿族的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舊秩序結構極為牢固，自我維護極為巧妙，能夠經受住一個世紀的民眾叛亂和外國入侵。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對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近代運動的適應，對科學和民主的適應是如此緩慢，以致最終必然讓位。

規模宏大促成了這種緩慢。例如，在19世紀80年代架設電報線路之前，北京與省會福州和廣州間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騷站，一趟至少需要兩個星期。清帝國無法作出迅速反應。19世紀帝國主義的多次戰爭，主要取決于中國周圍的外國海軍力量。例如，四川的5000萬人（現在為1億人）甚至在1937—1945年也未受到日軍的侵襲。中國的“四萬萬”人口（現在為10億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沒有通過掃盲、報紙、電信，或乘輪船、火車、汽車旅行的方便而成為一個整體。在這塊土地上，農民生活的變化只能是緩慢的。

對近代中國變革的理解，是線性模式解釋和循環模式解釋兩個歷史學派之間爭論的問題。線性觀點，強調近代增長的影響不僅在人口和經濟方面，而且特別在生產技術、政治民族主義和科學思想方面；所有這一切，都有助于一些人想象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則愿意稱之為全面革命。循環觀點，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復：中央政權的衰落，內戰和外國入侵，普遍的混亂和貧困，中央政權的軍事復興，謀生之道的恢復與發展。我們傾向于認為這兩個模式在不同結合中相互交叉。革新與復興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國采用外來的經驗，但更多的還是采用自身過去的經驗。

從1800年到1949年，中國文化的差異性盡管已在減弱，仍頑強地繼續存在。包括在漢字書寫系統（日本、朝鮮和越南靠增加它們自己表示語音的系統而擺脫出來）之內的中國偉大傳統的種種載體，像清朝保持它的統治權一樣，頑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獨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實上，中國的古老國家與古老文化的共生現象，是它們共同長久存在的一個秘密。

假如我們看一看中國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領域，就會發現儒家學說的信條曾使北京的帝國統治和農村的家庭家長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體只是在儒家學說被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條破壞之后才解體。[[3]](#_3_Jian_Zhan_Mu_Si__Li_Fu__Pu_Xi)國家間適者生存的觀念，意味著滿族統治者和極其莊嚴的儒家學說都缺乏領導中國的能力。情況很像法國革命，不是依靠啟蒙思想，而是必須往回走得更遠，從拋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以及圣母瑪利亞開始。正如一個政治學家所評論的，“總體革命，如法國在1789年開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紀曾改造中國的革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價值結構與改造全部分工。法國在1789年與1797年之間，人民使用暴力來改變土地占有、征稅、職業選擇、教育、聲望象征、軍事組織，實際上還改變社會制度的其他每一個特征”[[4]](#_4_Cha_Mo_Si__Yue_Han_Xun____Ge)。

在中國，這種表述甚至還可以更進一步。中國革命的廣泛性，在其對中國全部歷史的重新評價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引導中國走向工業化和現代軍事裝備的現代科學和技術來自外國，實際上來自帝國主義的西方。這一事實把中國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歐洲革命者（更不要說美國了）所曾面臨的更大的窘境。美國政治領導人可以引用英國權威的言論，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法國革命者能夠在他們的歐洲傳統中找到支持。對于20世紀初的中國政治領導人來說，相比之下，證明他們革命有理的思想權威卻大多來自國外——而這個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給自足聞名的國土上！這種條件下的革命不管是盧梭的，洛克的，穆勒的，馬克思的，或者是克魯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義上說，都是顛覆舊中國的革命。在實現民族主義要求的同時，革命還對中國歷史成就的價值提出異議。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難為許多愛國人士所接受。事實上，要求科學和民主，甚至對孫逸仙那一代的許多人來說，也具有過激的含義。這樣的轉移離傳統太遠了。對懷戀中國過去富強的愛國人士來說，談論復興要好受一些。舊瓶裝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發生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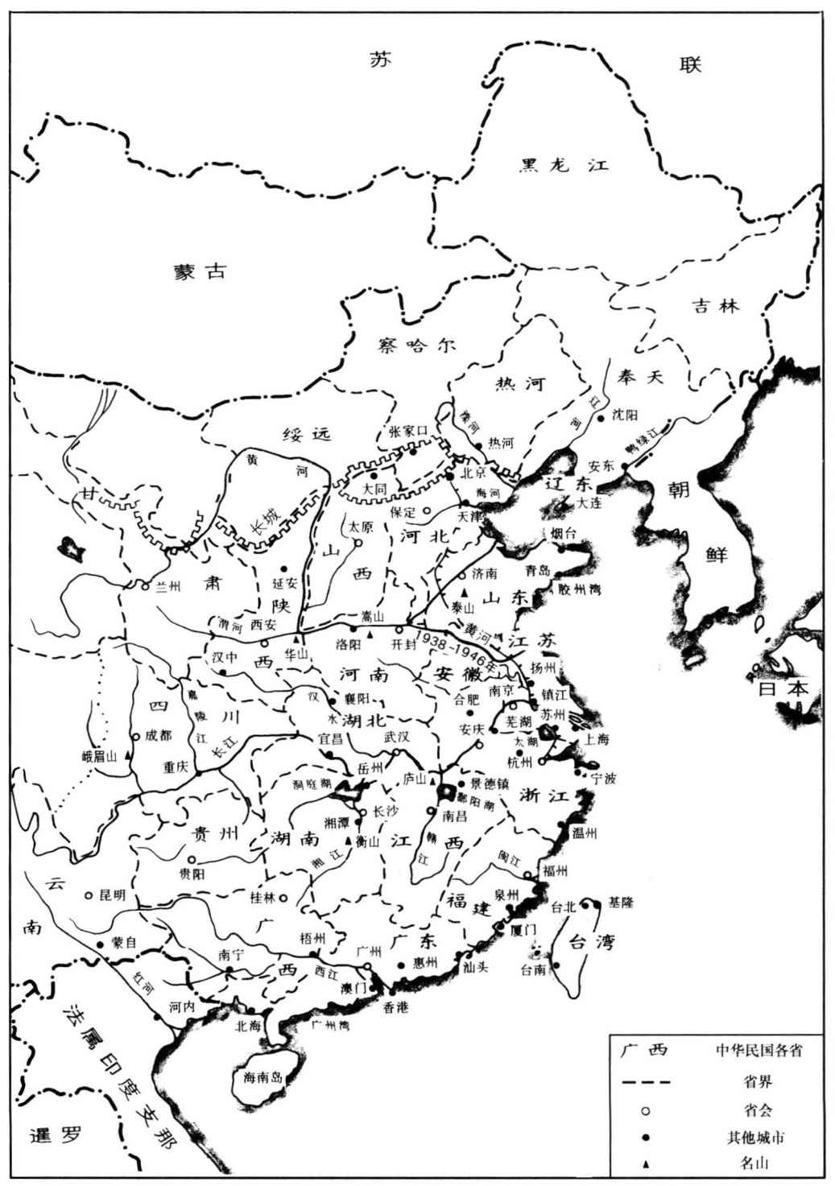
我們今天關于中國革命的歷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來自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文學等等的分析概念。我們發現在各有關學科中，許多中間層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種渠道上似乎有支撐作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沒有確切對應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們之間還可能出現某些不一致。鑒于每條分析線索都分階段，我們先研究分期。

## 變革與連續性：分期

盡管連續性很多，中國自1800年至1949年還是經歷了種種巨大的變化。政治制度，特別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決定性地改變了。古老儒家的社會結構削弱了，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經濟的某些部分納入了世界貿易；工業化在城市開始。知識研究擴大了范圍；這種研究通過對外國觀念的選擇和適應，再次得到調整。農村生活盡管以大體相同的模式繼續，卻不時為自然災害、騷動、叛亂和戰爭所打亂，終于導致革命。

面對這個國家的規模和地理差異、地方社會組織的不同以及不同領域內發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這整個變革動態的單一進程或關鍵，難免要失敗。不過，把這一個半世紀分為幾個較短的時期，以便揭示某些趨勢或主題，并且揭示一些重要的連續性的中斷，還是可能的。根據鴉片戰爭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西方沖擊時期，而把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定在1840年，這可能過分強調了與變革的國內原因相對立的國外的原因。我們寧愿以1800年作為18世紀繁榮、擴張、自信的中華帝國與19世紀分裂和混亂的中國之間的分界線。我們分辨出四個時期，分別由這套書中的一卷討論：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949年。

### 1800—1864年



地圖2 中國民國各省

第一個時期，以19世紀中期的主要叛亂在60年代中期被平定為止，顯示出許多可視為王朝沒落的傳統征兆：例如水運系統和河防系統開始毀壞失修，部分地由于無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過分擴張。18世紀在湖南中部圍湖，修建了過多的堤垸，以便為不斷增長的人口造出更多的農田，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導致洪水長期淹沒這個富庶的農業區。沿長江各地，官吏與鄉紳的利益沖突，阻礙了堤壩的修復。其他地方的河防系統，也同樣遭受利害沖突和舊設施損壞之苦。一場最大的災害，是1853年的黃河改道，此后事實上從未恢復控制。[[5]](#_5_Jian_Pi_Ai_Er__Ai_Di_An__Wei)

大城市官吏的腐敗在18世紀末已達到頂點。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騷動中結束的：暴亂、抗租、抗稅、由信仰太平盛世異端邪說的教派和社會經濟脫節所激發的叛亂。1813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動攻入皇宮[[6]](#_6_Ji_Lin_Qing___Li_Wen_Cheng_Li)，使朝臣和京城的官吏為之震驚。[[7]](#_7_Han_Shu_Rui____Zhong_Guo_De_T)到50年代末，叛亂嚴重地顯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預兆。邊疆少數民族發動叛亂。[[8]](#_8_Jian_S_M_Qiong_Si_He_Kong_Fei)海盜在沿海出沒；西方國家開始襲擊沿海城市，并強索政治與經濟的特權。

面臨這些問題，政府表現得軟弱無能。政府軍隊鎮壓不了叛亂，稅收不夠支付鎮壓叛亂的費用。大運河漕運的困難，威脅著北京的糧食供應。19世紀的幾位皇帝，與他們才氣煥發而堅強的前輩相比，表現得怯懦和無能。官吏的貪污腐敗和玩忽職守普遍存在。用新組建的地方軍隊鎮壓大規模的叛亂，表明權力分散正在發展，而通貨緊縮促成了政府的財政困難以及更普遍的經濟萎縮。

然而，朝代循環走下坡路的趨勢的慣例，包括不了這個歷史時期的兩個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長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國在1750年有2億—2.5億人，而在1850年為4.1億—4.3億人。[[9]](#_9_Po_Jin_Si____1368__1968Nian_Z)這種增長的經濟、社會、政治及行政影響，性質上已不可能是簡單的循環。其次，得力于工業技術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帝國主義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國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帶有根本性的挑戰。僅僅這兩個因素，就意味著變化會超越循環模式。19世紀中期，接連不斷威脅舊秩序的叛亂失敗了。重新組建起來的擁有優勢火力的政府軍隊，在19世紀余下的歲月里，限制住了民眾動亂的范圍。然而促進變化的推動力并未因此被切斷，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現。

### 1865—1911年

在第二個時期，發展和革新比衰敗和沒落變得更為突出。當然，衰敗和沒落并沒有消失。例如19世紀70年代末，在華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饑荒；在20世紀的頭10年間，洪水又出現在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19世紀中期的幾次叛亂結束之后，農村的騷動減少了，但是1890年以后再度增加；與此同時，反清的秘密會社也發展起來。

然而，王朝衰敗的這類現象，又伴有延續到20世紀的新的發展。使人震驚的帝國主義軍事威脅，激起了中國人想通過西方式的工業化和建立現代軍隊以求自衛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業家和受過教育的軍官出現了。在條約口岸出現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產生了買辦、商業資本家、專業人員和產業工人。與城市里這些新的社會階級出現的同時，在19世紀80年代，愛國精神所激發的由條約口岸報紙傳播的真正輿論，變成了一個政治因素。在19世紀90年代的改良運動中，學者名流中間創立了行動主義的政治組織。這時，各類上流人士與政治當權者發生沖突，并與之疏遠。有些人轉向外國的榜樣和思想，既謀求增強國力之道，也為了追求政治的或個人的目的。結果是知識研究的范圍和性質大為擴大，從而對儒家世界觀及社會秩序的基本信條提出了質疑。[[10]](#_10_Jian_M_Ba_Si_Di__Bu_Lu_Ji_Ai)

19世紀中期的主要叛亂，起源于邊緣或貧困地區：客家人聚居的廣西丘陵地帶，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與西北的回民區。然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主要的政治活動出現在富庶的經濟中心地區：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長江下游，擁有富庶的農業區與新出現的工業中心的長江中游。主要活動家也包括業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會集團。

清朝的最后10年間，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領與有地方根基的社會名流的競爭，在中國的政治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改良與改革風行一時，均為雙方所接受。問題是國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經濟潛力，應如往日一樣繼續集中在官僚君主政體中，還是應該讓這種潛力擴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人士集團的主動精神。這個問題預示了國家對社會的關系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保證辛亥革命不會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 1912—1930年

許多人斷言，辛亥革命幾乎沒有改變農村的社會關系；有些人甚至懷疑它到底是不是一場革命。的確許多社會連續性經過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業繼續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圍、南滿以及長江中下游和華南沿海——增長。盡管中央權力解體，軍閥之間征戰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較穩定，得以免于戰禍。甚至有的地方，如廣西雖時有戰爭，卻常能不誤農時。政治活動與政治組織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隨著新趨向的延續，程度上的不同逐漸變為性質上的不同。近代經濟部門比農業經濟部門發展得更快。新的社會階級借助于青年和婦女的解放，繼續改造舊的社會結構。同時，鄉土文學與民間報紙，思想爭論與動員群眾的思想，越來越有影響。皇帝與舊政權結構的消失，改變了法統，而且深刻地改變了政治的性質。漢族的民族主義——對中國的明顯的關切——代替了對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沒有王朝制度，軍權變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過了太平天國叛亂結束之后所曾起過的政治作用，而且運用起來不受文官的控制。這樣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軍權太分散，難于贏得對全國的控制，于是出現了這個時期的第三個主要變化，即不當權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動員下層階級投身于政治。這種政治參與的擴展，是力圖鼓勵并控制這種動員的新的超黨派組織所企求的。與之相伴隨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政治思想體系和孫逸仙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目標與激進主義的性質都有改變。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場上流人士反對中央集權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亂。政治激進主義從支持反對清朝政治結構的民族主義和種族的主題開始。社會激進主義也起而反對儒家權力主義的家庭束縛。這一傾向終于發展到個人主義，要求進一步解放青年和婦女，熱衷于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和民主。接著，在“五四”運動期間，激進主義被用階級的說法，重新解釋為推動工人和農民反對軍閥、資本家和地主的要求。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擺脫“帝國主義”束縛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對“封建主義”的階級斗爭——激進分子力圖把這兩個目標結合起來，而保守分子則力圖使之分離。

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通過把軍事和政黨組織與反帝的愛國精神結合起來，又和在城市知識分子領導下被動員起來的工農結合起來，革命擴大了范圍。國共兩黨的聯合與北伐，無疑是這一時期的最高潮。1927年中國共產黨及其同盟者國民黨左派和國民黨右派的決裂，揭示了兩者目標上的矛盾；這個矛盾曾因兩者共有的民族主義和共同反對軍閥而暫時掩蓋起來。僅僅控制大約兩個省份的南京政府當局對下述問題懸而未決，即由新的官僚體制的現代化國家完成變革，還是在更平等和不那么集權的基礎上，繼續動員更廣泛的政治參與去完成變革。[[11]](#_11_Jian_Wei_Mu_Ting____Guo_Min)

### 1931—1949年

20世紀30年代初，有三個事件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第一，在1931年，世界經濟蕭條對中國的打擊。英國和日本放棄金本位，迫使中國的銀本位貨幣驚人貶值，而美國政府的收購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生絲及其他出口貨物的國外市場價格暴跌，日貨的傾銷使中國搖搖欲墜的棉紡織業受到打擊。農產品價格在商業化的中心地區，比普通商品價格下跌得更快，跌到1929—1931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損害了農民，也損害了地主。[[12]](#_12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資本缺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業，政府稅收遇到各種問題。1931年長江流域的嚴重洪水，1934年同樣引起災難的旱災使國民黨處境更加困難。盡管在1936年有些復蘇的跡象，但經濟的改善又為日本的進犯所阻止。在20世紀40年代，惡性通貨膨脹破壞城市中層階級的生活，而且使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陷于大混亂。農業地區趨于經濟自給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1931年9月占領沈陽，侵占滿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河北，并于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占領的是沿海最發達地區，而不是全中國；這種狀況完全改變了國共兩黨政治斗爭的條件。問題變成了哪個黨能在這個國家的農業比較重要而現代化程度較差的地區，最充分地動員民眾，建立軍事力量。戰爭使這種競爭從官僚政治的現代化轉向社會革命。

第三，中國共產黨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府，而經長征逃到陜西后，在毛澤東領導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權。盡管存在政策搖擺不定和黨內權力斗爭的長期歷史，中共建立了以農業地區為基地的革命運動。在抗日戰爭時期，農民在許多根據地參加了革命過程，重新組織農村社會秩序，改組政府，使政府進一步參與社會。這種革命最后于1949年從農村中脫穎而出。

## 中國經濟的增長和變革

中國經濟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情況如何，一直是個主要的討論焦點。這類問題之所以復雜，因為當時的經濟既反映了諸多原因造成的種種短期的不穩定性和并非與過去全然無關的進展很慢的內部變革；也反映了西方貿易和帝國主義的外部沖擊。討論19世紀的經濟，有一種方法是回溯幾百年去考慮商品化、城市化和貨幣化的過程，或是考慮農村的社會關系與土地的占有的變化；這些至少可追蹤到16、17世紀的明代。[[13]](#_13_Guan_Yu_Zhe_Fang_Mian_Wen_Xi)盡管有些歷史學家甚至仍在爭論，晚期帝國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的輪廓是不是在宋代固定下來的，可是，其他學者則把注意力集中在19世紀西方國家的入侵上。

20世紀以前的資料貧乏和較近期數字的不完備可靠，妨礙了分析工作。區域的多樣性與缺乏國內的統一市場，意味著總數字有可能掩蓋重要的區域差異，而局部的研究又難免失之于描述非典型狀況。情況如此，歷史學家無法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我們確實需要考慮這些問題的爭論，如帝國晚期經濟的性質，帝國主義的沖擊，20世紀經濟在何處并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以及農村生活水平是否并以何種方式處于惡化之中，等等。對如此廣泛的經濟問題作出的答案，也已影響社會和政治史的解釋。因此，這些經濟問題構成了邏輯上的出發點。

### 中華帝國末期的前資本主義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滲入了農業經濟。絕大多數從事耕作的民眾，可以自由遷居和聚集在相互聯結并通過市場結構與更大的貿易中心聯結的小村莊里。農民很可能既生產基本糧食作物，也生產商品、手工業品來補充他們的收入和購買一些家庭必需品。地區間長途販運基本商品，補充了地方商業。例如，到18世紀，江蘇和浙江已不再生產足夠的稻米來養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長江中游肥沃的農業區來供應。[[14]](#_14_Quan_Han_Sheng_He_Li_Cha_De)在條約口岸開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長江流域的區間大宗貿易就已存在。在上海和寧波地區，在清代，特別是從18世紀后半期起，集鎮數量大為增加。原野上逐漸布滿一些集鎮，表明鄉村經濟與大城市中心逐漸成為一個整體。[[15]](#_15_Si_Bo_Yi_Xin____Ning_Bo_Yu_Q)

當然，商品化及與之相關的城市化，沒有均衡地在全國各地發生。人口密度與城市的發展，以在長江下游為最高。某些估計提出，這一地區盡管太平天國叛亂時期人口大量死亡，但仍然保持了它的領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與最慢的區域之間的差距，在19世紀擴大了。[[16]](#_16_Shi_Jian_Ya_Bian____Zhong_Hu)長江下游持續不變的經濟中心地位表明，這是個發展的核心區域；先是從國內其他地方運進糧食，后來又從國外輸入糧食，并把該地的貨物分散到其他區域的市場。

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各種配合的組織，這些組織到19世紀已很復雜精細。專門化的商行與經紀人，經營不同方面的商品生產。同業公會及同鄉會的會館制定商業的常規，并為商人提供幫助。金融機構隨之發展起來，滿足不同范圍的需要。最早的金融機構之一，是山西商人發展的網狀組織，以便用票號匯票給地區間的交易提供資金。在19世紀，另外一種通過錢莊的信用延長制度也發展起來，以便為成長中的沿海貿易提供資金。這類重要的機構，在整個民國時期繼續與規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銀行一道繼續發揮作用。較小額的交易，則可通過當鋪和押行通融。同時，大量的商業習慣法也被制定出來，用以規范商業業務。[[17]](#_17_Guan_Yu_Qian_Zhuang__Jian)

在18世紀大部分時間內，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總產量顯著地增長。這種增長得力于人口的增長、可耕土地的利用、“最佳”農業技術從先進地區向落后地區擴散，和對勞動力一般沒有人身限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進一步提出，在19世紀從國外引進現代工業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經濟是否開始了有本土“資本主義”發展傾向的性質上的改革。他們的研究著重“生產關系”的改變。從以下方面舉出了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勞動者分離的證據：采礦中有商業投資和使用雇傭勞動；在華北和長江下游，地主和富農使用雇工經營農業；在絲織業的生產組織過程中，有類似歐洲原始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跡象。[[18]](#_18___Ming_Qing_Zi_Ben_Zhu_Yi_Me)

然而，這類跡象合乎“近代”以前經濟增長的典型模式：人口與總產量均在增加，但人均產量沒有持續增加。我們不能說糧食與手工紡織品生產的增長，或貿易及市場范圍的擴大快于人口的增長。“資本主義”——或者不妨說，以人均及總產量增加為特點的“現代經濟增長”——未在近代歐洲早期（或兩世紀后明治天皇時的日本）出現，是由于僅僅在財產所有制的形式上有了改變。同樣重要的是科學技術——包括金融、投資及管理方面的“技術”——的發展，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也就是“生產力”的改變。正是在連續運用投資及再投資新方法的基礎上，歐洲才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可以舉出一個強有力的實例——既是歐洲的也是日本的——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性的起點是“農業革命”，也就是切斷了人口規模和糧食生產間古老聯系的技術和組織上的重大進展。

18世紀中國土生土長科學技術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對宋代發明的完善。[[19]](#_19_Zhe_Zai_Zui_Zhong_Yao_De_Non)在有顯著發展的地方，這些發明顯然都未能加以擴散或應用。限制中國“近代”以前科學技術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當大的成就一樣地突出。要對這個重要問題作出解釋，怕已超過我們現在的能力。但是，即使技術的改進增加了生產，例如谷物的大量增產，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土地的比例已經很高，很難使人均產量輕易地增加。這正像17世紀歐洲的低地國家[[20]](#_20_Di_Di_Guo_Jia__Ni_De_Lan__Da)的情況一樣，由于人口密度過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國促成農業革命的新技術在那里并非有利可圖。中國歷史學者所發現的農業和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的例子，或者說就全國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說這些例子接近于沿著資本主義方向啟動社會—經濟大改組，似乎都是可疑的。中國19世紀的經濟可以更恰當地描述為相當商業化的農業經濟，這種經濟在“近代”以前的技術范圍內，是高度“發展的”。它經歷的變革是很有限的，卻照樣能在原有的框架內調節社會和政治的結構。

### 經濟停滯

由于中國經濟自身未曾經歷過制度的大改組或技術的突破，由此導致可與近代歐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經濟長期持續的增長，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礙這種變革的因素上。眾多的解釋一般可分為技術論和分配論兩類。后者關切剩余產品在民眾中的消費，并較重視各種政治、文化和歷史的阻礙作用。[[21]](#_21_Ruo_Gan_Zheng_Zai_Zheng_Lun)

分配論者和技術論者均認識到人口增長的重要性，雖然他們對影響的估計各不相同。似乎很明顯，伴隨17世紀和18世紀產量增長的是單位面積農業生產率的顯著上升，這是采用了良種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收獲面積的結果（后者是推廣雙季耕作的結果）。但是，采用傳統方法增產的可能性終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時間點上（大致估計在18世紀末和20世紀初之間），農業單位面積的產量開始停滯，并落后于人口的增長。[[22]](#_22_Yi_Mao_Ke____Zhong_Guo_Xi_Ri)這種停滯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壓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壞生態平衡（如在湖南修筑堤垸過多，造成洪水泛濫），[[23]](#_23_Bi_De__Po_Du____Guan_Fang_Mu)或導致土地占有的不經濟的分散，降低農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產生流動的農村貧民的社會邊緣階層。豐富的廉價勞力，還降低了創造發明和花錢改進技術的積極性。

技術論對于停滯的最復雜解釋，被系統地闡述為“高水平平衡閥”[[24]](#_24_Yi_Mao_Ke____Zhong_Guo_Xi_Ri)。這種論點斷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農業、水運技術與人口的增長和未利用土地的消失結合在一起，減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余產品總量。即使這種剩余從未完全消失，人均剩余的下降也減少了需求。生產與消費進入僅可維持生存的循環運動，再沒有什么剩余留下供投資之用了。同時，由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現有技術的復雜性，也難于以機械動力來取得降低成本所需的巨大進展，并且也難以大量提高人均產量。因此，這種“平衡閥”引起“近代”以前的生產技術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滯。

批評這種理論的學者斷言，事實上在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經濟內部頗有剩余。[[25]](#_25_Qia_Er__Li_Si_Jin____Xian_Da)他們不僅是指擺闊氣的揮霍浪費，而且指商業投資、地方日常管理的開支以及類似的跡象，它們表明不是缺少金錢，而是未能用來發展經濟。持這種見解的學者，超越技術問題去尋求阻礙發展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因素。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由日本人領頭，已對農村階級結構及土地占有的性質進行了大量研究；它們都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實地調查的題目。[[26]](#_26_Guan_Yu_Ri_Ben_Xue_Zhe_Yan_J)雖然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證據——事實上，由于詳盡說明一個普遍的“地主社會”模式，支持了分配論派的觀點；由于通過文獻證明持續缺少投資，也支持了技術論派的分析——但它至少就20世紀來說還是給中國以外的學者，提供了足資利用的以經驗為根據的最佳數據資料。對剩余如何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成功的工業化在歷史上不是與早期農業現代化聯系在一起，就是與同時出現的榨取農業的做法有關；不管剩余的規模如何，或是否有剩余，中國在1949年以后所經歷的經濟增長，似乎主要來自向農業部門的榨取。

佃農—地主的關系是復雜的，因此，用剝削來解釋為什么剩余未用于投資以促進經濟的發展，這一簡單的論斷通常都要加以限定。在華中和華南（那里租佃率最高），佃農已獲得各種各樣的永佃權，從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租佃本身的確不是促進農村繁榮的好辦法。在經濟邊緣地區農業過于無利可圖，不足以吸引對土地的投資，那里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而另一種情況，像在四川或長江下游那樣的中心地區，佃農可能很富有，他們租到大片土地以后，或轉租出去，或自己經營。[[27]](#_27_Ge_Luo_Fu_He_Zhou_Xi_Rui)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為產量的50%左右，雖然地租實收多少并無定額。江蘇蘇州周圍的非鄉居地主，在19世紀中期設立了專門收租的租棧，收租時得到官方的幫助。不過，一些租棧的管事顯然謹慎從事，不違犯公平收租的原則。太平軍叛亂以后，長江中下游各省人口銳減，地主一度相對地較弱，收租有困難。[[28]](#_28_Guan_Yu_Shou_Zu_Zhang_Fang)

一些20世紀的觀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長江下游直到20世紀20年代或更晚些時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圖的投資。盡管地區間不盡相同（特別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國大約有40%的農業土地出租。而且所有權分配不均，大約10%的人口劃分為地主或富農，占有50%以上的土地。[[29]](#_29_Guan_Yu_Tu_Di_Fen_Pei_He_Zu)若干地區的詳細研究表明，在民國時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幫助較多，而租佃契約給佃戶的保障則較少。地租的負擔常常很沉重，但很難說租佃具有任何一種經濟影響。

在清代和民國的大部分時間里，農業經濟為相互勾結的地主上層人物（在清代常為有功名的鄉紳）、商人和高利貸者所把持，這種論點更有說服力。[[30]](#_30_He_Di_Zhong_Zao_Dui_Zhe_Ge_L)這一階層通過地租、利息和價格機制，吸取了農民的全部剩余。同時，通過借貸和購買土地不公平地為農民的生計通融金錢，并通過購買商品作物，通過向家庭手工業銷售原材料和購買其產品，把農戶與市場聯系起來。這種經濟循環關系雖然靈活，很可能已經阻礙一個新的階級，即富裕的農民，或其他既有資本又有積極性引進技術改革的人的發展。人口的壓力和繼承人之間均分土地的社會慣例，造成了占有土地的分散，又進一步阻礙了農業財富的集中。一般說來，農村的人要求穩定的安排，各個方面從中能夠保護而不是擴大他們的利益。這樣一些模式很難打破。在市場結構的城市一端，有種種類似的循環體制的模式。

中國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時，是很有企業才能的。寧波的方氏、李氏及葉氏家族開創沿海貿易，而且在上海參與開辦對外貿易。江南絲商能很快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機會。在19世紀末，有一個有進取精神的市場行為的突出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對外商控制蠶絲出口價格的不成功的挑戰，他有兩年收購杭嘉湖地區大量蠶絲，不讓其進入出口市場，終致破產。中國商人很善于用利潤再投資，如方氏家族能維持商業利潤數代不衰。據日本社會學家根岸佶描述，上海商人秦祖澤為人正直、儉樸、忠于職守，比得上最虔誠的日本武士或有道德的新教徒。[[31]](#_31_Guan_Yu_Fang_Shi___Ye_Shi_Ji)

然而，從事經紀業務仍然是清代商業活動的主要模式，并延續至民國時期。商人們頗喜劃分市場和銷售階段，把他們的資產分散在若干個企業中，或一種以上的商業行業上，并在遠離家鄉的中心城市營業。不用于商業再投資的利潤，或不用于維持高生活水平的利潤，被投資于土地、家庭成員教育、宗族機構和鄉里公益事業。這類支出，既表現了生產性的有利可圖的經濟利益多種經營，又體現了士紳的價值觀。然而，在這種經濟行為中，固有的風險和責任的擴散妨礙了財富的組合集中，并且阻止了廣大資本家的企業家精神。[[32]](#_32_Ye_Shi_Jia_Zu_He_Li_Shi_Jia)調動財富的公私金融機構，如歐洲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場或長期公債，在中國均告闕如。

在循環而長存的經濟和社會組織的情況下，國家的作用怎樣呢？不少經濟的發展似乎是發生在國家控制之外。國家抽取相對少量的剩余。清代的田賦比日本明治時期為輕。[[33]](#_33_Wang_Ye_Jian____Zhong_Hua_Di)清末的厘金及其他商業稅，并未根本改變這種狀況。清政府力圖控制重要的專賣事業，維持糧食北運供應京城，并由于其利益在于穩定糧價而監督糧食市場。然而，官倉制度在18世紀以后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壞。[[34]](#_34_Wei_Er____18Shi_Ji_De_Zhong)專賣事業也不起多大作用；不斷增加的市場和萌發出來的商業組織，大多不受清政府的控制，或所受控制極松。在民國時期，不論是眾多的軍閥政府還是國民黨，都向商人勒索金錢，商人經常抱怨稅收的頻繁和過重。但是，這些政府都不對經濟進行全面控制。有一種估計提出，1931年全部政府支出，尚低于1880年日本明治政府支出的水平。[[35]](#_35_Tuo_Ma_Si__Luo_Si_Ji____Zhon)

不論是在帝國晚期還是在民國時期，商人一同政府接觸就要受到勒索。但是，他們并未受清政府的壓迫，不然他們就不可能享有19世紀時所擁有的財富和地位。詳細研究表明，清代官吏愿意大力鼓勵商人在鹽業等專賣事業中合作。[[36]](#_36_Mo_Zi_Ke____Qing_Zheng_Fu_Za)滿足官方索款要求的商人，常能得到合同、存款或其他間接報酬的益處。

官僚和商人的關系，可以在緩慢增長的穩定局面下達到相互有利。然而，總的來說，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長期生產性投資。沒有法律保護，是商人寧愿分散他們資產的一個原因。而且，高利率把資本轉為短期消費導向的貸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級官吏放債得利，不堅持實施反對高利貸的法律。[[37]](#_37_Wei_Qing_Yuan_He_Wu_Qi_Yan)然而，當政府試圖對此作更積極的或促成的作用時，問題就產生了。官僚政治要實行控制的愿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營利方面的利益發生沖突。雙方行賄受賄會相互影響而破壞企業的基礎。在19世紀末，清朝官吏創立圖謀自強的公司，顯示非經濟的政治及社會行為可能阻礙工商業的發展。商人很快學會避免卷入其中。在1904年以后，同樣的問題妨礙了新政府部門與工商業領袖的合作。在清末數十年間，政府缺乏財力提供發展現代工業所必需的資本。政府往往會扼制已參加合伙經營的商人和士紳，而且不能創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財政及其他條件。[[38]](#_38_Chen_Jin_Jiang____Jian_Qiao)與之相類似的缺陷，也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南京政府實行的“官僚資本主義”中表現出來，甚至殃及一些無利害關系的改革工作。例如，改良蠶種和蠶絲生產方法的嘗試受到阻礙，就是因為政府既沒有貫徹政策的手段，也沒有獲得地方民眾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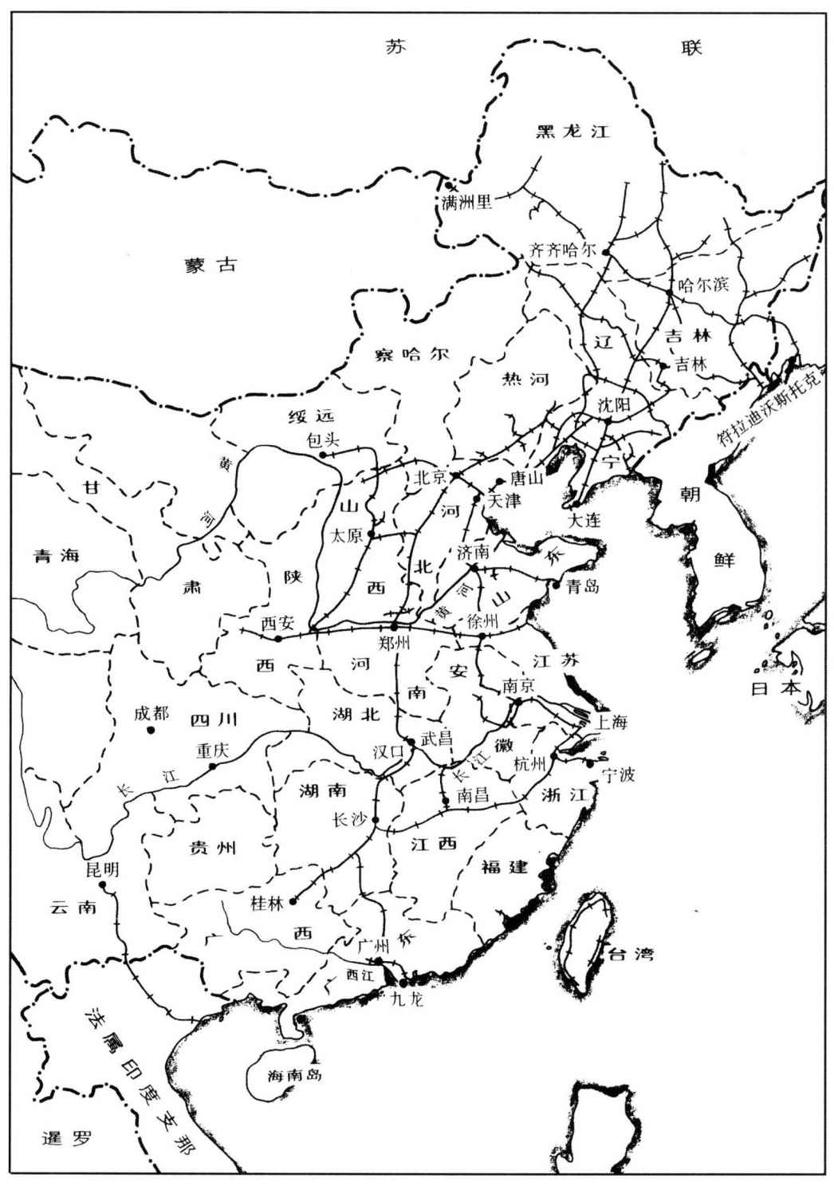
總之，技術因素與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強，使經濟變革保持在有節制的限度內，不能突破現有的平衡。變革正在發生，但是，由于缺少對農業成分的重大改變（中國式的“農業革命”），那么，持續的商業化、資本在長江下游的進一步集中，或與東南亞可觀的貿易（即使在技術上非法）的增長會很快導致經濟的徹底改組，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事實上，主要的推動力來自海外。

### 外部因素：對外貿易與帝國主義

幾乎所有歷史學者都認為，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了作用，但是，他們對這種作用的分量和時限，以及它的影響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認識并不一致。一類分析認為，外國人的活動在促進19世紀末和20世紀工業持續發展上起了關鍵作用。外國工業在條約口岸提供了大型設備，起了刺激中國企業的作用。貸款為交通、通訊、運輸的現代化和建立重工業提供了資本。外國人是新技術知識的來源。總之，中國需要外來的沖擊以克服它的經濟的惰性，并集中必需的財力。[[39]](#_39_Guan_Yu_Zhe_Lei_Guan_Dian__J)

反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和另一些歷史學者則爭辯說，帝國主義從鴉片戰爭時候起，就阻礙了有利于經濟增長和資本主義的內部力量：進口商品摧殘了中國手工業，因而使農民陷于貧困，同時限制了國內市場。中國商人被引入與洋行的外圍的和依賴的關系；不平等的競爭阻礙了中國工業發展。外國貸款和投資把贏利抽到國外，并導致對政府財政管理上的干涉。雖然中國除在條約口岸外，從未被西方外國人統治，但中國政府因畏懼外國的武力侵占，不敢振興現代工業。最明顯的是，外國控制了中國關稅，無法用關稅排除外國的競爭來保護本國工業。[[40]](#_40_Hu_Sheng____Di_Guo_Zhu_Yi_Yu)這種觀點的一個重要的變異看法，認為擴張的資本主義國家為尋求市場與資源，迫使弱小的未工業化國家陷入依附關系，以保證輸出它們的資源供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使用。這種做法使弱小國家的經濟永遠處于不發達狀態，既加重了社會階級之間的不平等，也加重了世界區域之間的不平衡，并且在某種程度上使不發達國家的農民更加貧困。[[41]](#_41_Guan_Yu_Bu_Fa_Da_De_Yi_Ban_L)

所有這些理論，特別是后者，似乎低估了先前中國本國商業發展的水平。這些理論并沒有說明，當對外貿易和整個中國經濟相比還很不重要時，外部因素怎么能有這樣大的決定性作用。而且，甚至在20世紀，國內市場仍然沒有完全成為一體，許多農村經濟仍然主要為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消費進行生產，雖然這個地域連接別處的市場。合乎常識的結論是，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交互作用，它們相對的重要性因時間、地點和環境而異。外國企業往往既阻礙又促進中國工業，如在煙草工業中，促進了某些方面，卻又阻礙了其他方面。在清末和民國時期，主要依靠外資進行的鐵路建設都有益于中國的經濟，盡管這些鐵路都是在帝國主義的各種條件下修建的。[[42]](#_42_Xie_Er_Man__Ke_Ke_Lun____Zai)在農業產品仍在本地消費的地區，對外貿易只有很小的影響。然而，要認識日益卷入世界貿易可能產生重要的反響，這并不需要以一般的經濟依賴為前提。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第二個十年，出口貿易造成的對韓江流域商業的刺激，或者19世紀80年代末期至19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世界蔗糖的暫時短缺所引起的廣東海豐縣甘蔗生產的短暫興旺，[[43]](#_43_Liu_Cui_Rong____Han_Jiang_Ya)表明世界貿易的影響并不限于大城市。隨著工業化的繼續進行和對外貿易的日益增長，世界經濟狀況對中國重要地區的經濟影響越來越大，對于這種貿易和帝國主義沖擊的矛盾心理，可以在研究得比較充分的棉織業和生絲業中看出。



地圖3 1949年的鐵路

19世紀中國本國紡紗業的衰落，被學者再三引用來說明帝國主義對中國開始發展的資本主義和對農民生活的不利影響。然而，一概斷言紡織品進口及其后外國在中國的設廠破壞了農村手工業之說，并不能成立。詳細的研究表明，雖然家庭紡紗大多消失，但是，起而代之的是使用洋紗的手工織布。而且，由進口供應緯紗之后，織機用的經紗仍由農民紡紗者生產。事實上，手工紡紗在不同地區是在不同時間衰落的，農民家庭能有相當長的時期進行調整。[[44]](#_44_Zhao_Gang____Zhong_Guo_Mian)手工織布能繼續成功地同20世紀在中國設立的工廠進行競爭，因為即使價格已經下跌，農民家庭仍能利用他們的剩余勞動獲利。而且手工織布推廣到新區——例如清末推廣到浙江省中部和民國時期推廣到中國的西北及西部地區——表明國內需求的擴大和機制紗的滲透。總的說來，織布大概比紡紗更能獲利，所以從長遠來看，這種轉變可以大大提高許多農民的生活水平，盡管它或許降低了更多農戶的家庭收入。

這種總的長期景象，掩蓋了地方短期衰落和混亂的情況。紡織品的進口，最初損害了城市化的珠江三角洲高度發展的紡織手工業。在19世紀30年代，中國手工織布（南京大布）出口大減，進口洋紗的市場成長起來。織布工和紡紗工都受到損害，1831年洋紗進口驟增，激起了紡紗工帶頭的抵制。結果紡織工人從紡紗轉向織布，但失業助長了對洋人的敵意，社會的分裂助長了太平天國的叛亂。[[45]](#_45_Zhao_Gang____Zhong_Guo_Mian)在廣東沿海偏北的海豐縣，手工紡紗一直繼續存在到清末。手工紡紗于19世紀90年代至1910年之間絕跡以后，手工織布仍繼續處于生產狀態。但在1918年之后，現代織布廠在海豐代替了家庭織布。地方總的紡織品生產或許擴大了，但農民家庭生產者轉變為工廠的工資勞動者，卻產生了使人不安的社會—政治后果。[[46]](#_46_Ma_Ke_Si____Hua_Nan_Nong_Min)連在20世紀家庭織布最興盛的地區，家庭織布也不是穩定的職業。在華北，織布業趨向集中于相互競爭的中心點，經歷了20世紀最初10年到30年代的繁榮和縮減的階段。直到30年代世界經濟不景氣之前，織布業的波動，更多的是由這種地方競爭和本國市場狀況，而不是由直接的外國因素引起的。后來日本占領滿洲，限制了織布業市場，并加速了華北織布業中心的衰落。[[47]](#_47_Zhao_Gang____Zhong_Guo_Mian)于是，紡織工業的擴大導致各種各樣由增長、競爭和國際市場運動引起的經濟波動。這樣的變化可能瓦解農村自給自足的模式，使得手工生產成為農戶更加難于預計的收入來源，而農戶必須彌補其農業收入之不足。[[48]](#_48_Lin_Da__Ge_Luo_Fu____Chuang)

清朝最后70年長江下游絲綢生產的歷史，更清楚地說明了對外貿易不斷擴大的沖擊。[[49]](#_49_Guan_Yu_Si_Chou_Mao_Yi_De_Zh)19世紀40年代末期，生絲出口從廣州轉移到上海，使那里的生絲出口在50年代太平天國叛亂期間迅速擴大。國內市場的阻塞，以及內務府織造局生產的降低，可能使更多的生絲用于出口。在60年代初期，太平天國叛亂破壞了長江下游絲產區，造成1863—1864年生絲出口大減，并導致這10年剩余年份的生絲出口恢復頗為緩慢。19世紀余下的年代，外國經濟對江南經濟的沖擊，反映了太平天國叛亂的破壞和國外對生絲需求堅挺之間的這種關系。大約到1870年，桑樹已重新栽植，蠶絲生產恢復。但舊的絲織中心，由于蠶絲生產大量地面向對外貿易而沒有完全重建起來。對外貿易使蠶絲生產較其他農產品增長更為迅速，并說明了這一地區從太平天國叛亂中迅速恢復和清代最后幾十年繁榮的主要原因。它調整了生絲業，開辟了新的絲產區，并有助于收購生絲的集鎮比人口減少的大城市恢復得更快。雖然努力改進手工繅絲，以適應洋商的統一要求，但是，主要的技術改革來自大多在上海的蒸汽繅絲機。繅絲機在19世紀90年代末影響很大，此后超過了手工繅絲的生產。到1911年，繅絲機促成了農民專門從事蠶繭生產，也促成了一批新經紀人把蠶繭迅速從農戶運往工廠。

絲綢貿易有助于新的有活力的商—紳家族和商界團體的興起。農民生產者受益多少尚不得而知。民國時期絲綢貿易的記錄更不清楚，但是看來在19世紀末，這種對外貿易擴大了絲綢生產，促進了現代工業，并在上流社會內產生了重要的社會—政治結果。假如中國當時能夠控制出口價格，這種貿易必會更加有利可圖；假如中國政府曾一致努力改進生產方法，這種貿易從長遠看就會更好地存在下去，不過它暫時還是江南繁榮的關鍵所在。

### 1911年以后的連續性

在民國時期，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基本上與晚清并無不同。首先，高度集約的傳統農業部門，僅能在“正常”年景供養數量巨大的人口。因此，它通常無法提供農產品來供應大量城市勞動力的合理消費，或作為發展工業的原料，或作為出口商品而為迫切需要的資本和技術的進口籌措資金。無論是袁世凱還是繼袁氏之后任總統的北京官員，也無論是孫逸仙還是蔣介石的南京和重慶的政權，當然還有日本侵略者（滿洲在一定程度上除外），甚至連在江西或延安的毛澤東——無一能在20世紀前半葉顯著地影響和改善中國農業的狀況。

其次，從20世紀第三個10年開始，時局難得“正常”。內戰和日本入侵，然后又是內戰，充滿了隨后30年的大部分年月。戰爭給中國造成的物質上，特別是生命上的損失難以描述。然而不管中國人生活得多么貧乏，他們仍然生存下來了，而在這可悲的動亂的最后幾年以前，經濟并沒有解體。在偶爾相對和平的時期，它確實表現出驚人的恢復力。我們把這一點當作中國經濟的“現代”發展處于低水平的確切標志，也當作傳統技術和地方化了的組織擁有壓倒一切的頑強性的確切標志；它不像更發達的經濟那樣，易于受到入侵者的摧殘。

第三，同樣地，中國經濟的現代部門事實上是最不那么重要的。雖然中國受到世界——締約的列強及其他國家——的沖擊，中國經濟在20世紀前半期同世界經濟的聯系仍然極不完善。獨特的條約口岸和內地經濟部門的二元模式也許太粗糙，不足以描述上海、廣州或漢口的經濟作用的實際復雜性。然而，過多地注意白銀外流、海關統計、貿易條件或外國貸款和投資，只能引起誤解。中國只是沒有有效的計劃來推動農業方面必不可少的技術和組織（再分布）的變革；而沒有這樣的計劃，就不可能有隨之而來的真正的現代經濟的增長。20世紀擴大的國際貿易，在一些地區促進了農業的商業化。在華北一些地方，這個過程又加強了鄉村經濟和社會的分化，在某些情況下，導致更貧窮的農民“半無產階級化”[[50]](#_50_Huang_Zong_Zhi____Hua_Bei_No)。但這一點既不是資本主義農業在現代中國出現的標志，也不足以作為外國經濟罪惡的證據。

第四點意見涉及有時受到忽視的復合增長。19世紀末創辦的小規模的現代工業，變成了真正的、不斷成長的現代工業部門。在20世紀前50年，這些現代工業企業的增長率，估計大約為每年7%或8%。[[51]](#_51_Yue_Han__K_Zhang____Gong_Cha)這個年增長率，近似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以來所達到的增長率。當然，這個發展賴以開始的基礎初始時是極小的，生產能力的實際年增長量也同樣小。但過了這幾十年，由于增長綜合在一起，中國的經濟結構也開始變化，最初很慢，以后更加迅速。直到70年代，中國國內的生產總值近50%屬于工業（工廠和手工業）、礦業、公用事業和交通運輸業——確實不全是“現代”的，但顯然是從農業分化出來的；農業所占的比重已從20世紀初的大約2/3下降到1971年的1/3。

然而，國民黨南京政府和以前的北京政府對這一有驚人活力的——盡管仍然在部門和地理上受到限制——現代經濟發展，并沒有出什么力。像在18世紀發生過的那樣，近代之前的增長——總人口和總產量的增加，但沒有持續的人均增長——可能不需要國家起很大作用；甚至很可能還因沒有國家的作用而得到好處。但是，后來要努力達到現代經濟的增長，較大的政治投入大概是需要的。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不夠強大，或者在智力上不能充分適應，難于控制和發展中國私人經濟的潛力，而同時又保證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個人平等和區域平等。[[52]](#_52_Su_Shan__Man__Qiong_Si____Wu)

結果，1949年以前關內18省和東北規模不大的現代工業部門，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這些骨干可以訓練大量擴充的人員，以配備50年代投入生產的許多新工廠。這當然大半不是有意的，但是，即使1949年以前的外國勢力有時曾抑制過中國工業的獨立發展，它最有效的遺產，看來也是最初的技術轉移使中國的早期工業化成為可能。

所以民國并非僅僅是個經濟處處停滯、政治體系四分五裂的維持時期。相反，現代城市經濟成分的總增長，為1949年以后進一步向前推進鋪平了道路。然而，大多數的農業地區沒有同時取得城市一樣的增長。失調、不穩定、地方災害、戰爭和不時的通貨膨脹，都拉下了生產水平，抑制了商業，阻礙了農業投資。這些困擾，雖然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損害最大，但是在整個晚清和民國時期已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上存在。社會后果令人不安。

## 社會結構與社會行為的變化

我們首先假定中國社會—文化高度的同一性，作為判斷現代趨向的基線。不同地區和不同社會等級層次的漢民族，都具有同一性和歷史延續性的共有意識。他們擁有廣泛的共同的價值觀，直到近代，上流社會人士仍力圖維持一個接近于自然狀態的農村基礎。在鄉村，小傳統并沒有使價值觀和城市上流社會的大傳統明顯分離。相反，這兩個階層具有共同的民俗和宇宙觀，包括對祖先、學問、財產和合法權威的尊重。

纏足顯示了上流社會領導下的文化同一性。這種習俗開始于唐代。它得到宋代理學家的支持，并在明、清兩代遍及農民。使婦女的足發育不良，蹣跚而行，先是作為上流社會男子變態性滿足的戀物，接著成為城市富足的一種夸示，并普及于鄉村，從而嚴重損害了半數農民的勞動能力。為模仿上流社會而以如此不經濟的方式摧殘女子，這表明農民高度從屬于上流社會的規范。同樣，把灶君、土地爺和城隍老爺結合在一起的鄉村眾多神祗的等級制，使人想起清廷的官僚統治，也表明農民普遍接受上流社會所操縱的權力結構。

這種同質文化的某些特點變化得很慢——如敬重尊長、男女不平等、維護父系宗族和兄弟間平等繼承。地方性的改變不會破壞這些普遍的習俗，即使關于它們的哲學的或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可能改變。[[53]](#_53_A_Se__Wo_Er_Fu____Shen___Gui)盡管儒家思想在20世紀受到猛烈的攻擊，但是，它的行為方式和作為其基礎的假定，仍然繼續存在。

### 水平社會結構與垂直社會結構

晚清的水平社會等級結構，在理論上按中國經典分成四個職業等級，即士（士紳）、農、工、商。實際上，它更接近于靈活的兩個等級的結構：少數受過教育的富有的上流階層，即統治階級（約占人口的5%），和主要在土地上或城市里從事體力勞動的廣大多數。這種兩個等級的劃分，給上下流動留有余地，也為溝通上流身份和非上流身份的兩可地位留有余地。非上流身份的人包括窮教師和其他未充分任職的低級功名的人、富有的農民或小店主。分界線很靈活，在斷定上流地位的標準上頗有出入。軍事干才或對地方組織——包括非法團體的領導能力，在有些地方，在確定上流地位時，可能比教育程度更為重要。

底層是處于有相當地位的非上流類別之下的兩個階層。一個是生活條件一直很差，被排除在大多數體面活動之外的私家奴仆和賤民階層。另一個則由流浪漢、乞丐、土匪、走私者和其他活動于有組織社會結構之外的人所組成。上述這些人主要（但不是全部）來自很窮的人家，但是和那些處于上流地位分界線上的人一樣，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并非全然不可改變。因為，他們如果未曾割斷家族或地緣聯系，還有可能回到有相當地位的較低等級中去。對這一多變化的社會階層的規模，并沒有可靠的估量；但是我們相信，19世紀和20世紀逐漸形成的社會動亂和自然災害，使這個階層擴大起來。而且，這個階層男多女少，在動亂和自然災害期間，遺棄女嬰的風氣又加重了這一狀況。

這種財富差別懸殊的水平階級結構，與以家族關系和地緣為基礎的垂直組織原則相交錯。特別在華中和華南，擴大的宗族世系是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宗族世系增強了名門望族的安全性和連續性，并為較窮的宗族成員提供照顧和機會，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有可能同樣取決于他屬于哪一宗族和他的經濟、職業地位。在貧富之間，宗族紐帶往往較階級對抗為強。在宗族世系不發達的地方，比較簡單的親屬關系的組織可以起到類似的作用。[[54]](#_54_Zhan_Mu_Si__Wo_Sen____Zhong)

效忠鄉土幾乎具有同樣的影響。宗族紐帶與鄉村紐帶常常互相增強，村民們在自我保護和維持村社資源方面有共同的利益。村際合作或沖突，很可能既遵循市場關系，也遵循親屬關系網。下層階級的家庭，有可能被納入與有錢有勢家庭的庇護人與依附人之間的關系中去。除去這些親屬關系、村社和庇護結構的保護，便產生社會邊緣的流浪者，不只是貧窮而已。

地方性和親屬關系的相互作用，可用20世紀前半期香港新界鄧姓家族的結婚習俗來說明。[[55]](#_55_Lu_Bi__Wo_Sen____Hua_Nan_De)在這個有凝聚力的家族中，富人和窮人婚姻儀式相同，但富有的成員擇妻，是為了增強有助于維持上層社會地位的商務與政治上的接觸。這樣的聯姻是在相當大的地域范圍內尋求的。新娘有陪嫁，為經濟上的獨立提供某種條件；兩家繼續通好。相反，農民男子娶鄰村女子，付給女方一筆財禮，婚后與妻方家庭很少來往。他們遠離其他村社，這樣就增強了他們作為佃戶對富有的、占有村里大部分土地的本族人的依賴。這樣的例子表明，雖然向上移動并非不可能，但是，大多數窮人不能指望改變他們的階級地位。

不平等的垂直關系證明對雙方都有利，部分地是因為——如在中國其他等級制中一樣——這種關系把相互依存和互利原則結合起來。例如，在19世紀，標準的做法似乎是地主在壞年景豁免地租，有時多次同意部分支付，正像政府豁免田賦一樣。儒家的教導鼓勵“道德經濟”，即上層階級的消費和營利應受到約束，而農民則應接受社會的不平等關系以及對地主和國家的義務，在這個價值體系內，農民會接受似乎體現“正義”的安排。因此，民眾對非正義的理解變得重要起來。[[56]](#_56_Guan_Yu__Dao_De_Jing_Ji___Ji)

### 社會不穩定的加劇

1800年至1949年之間，在從內外兩個方面打擊中國的變化中，我們看出了某些一般的特點。其中最顯著的是民眾中的好斗精神、尤其是始于貧困邊遠地區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增加了，政府對那里新去的移民鞭長莫及，無法加以管理和控制。廣東中部和東部連續不斷的村際械斗，華北平原地區的長期匪患都是例子。[[57]](#_57_Guan_Yu_Guang_Dong__Ha_Li__L)再如在江西丘陵地帶，居住山上的棚民與平壩里境遇較好而受家族統治的稻農相處不和。[[58]](#_58_Dui_Zhe_Ge_Duo_Shan_She_Hui)在這些管理不到的邊緣地區，非法會社蓬勃發展，發生叛亂，其中有些地方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成為共產黨的根據地。

為對付19世紀中期叛亂而實行的地方和省級的軍事化提高了軍隊的水平，也產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軍隊的難題。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軍事統治結束，任憑地方保安部隊激增。不久，甚至當它們還未破壞農業之時，軍閥內戰破壞了城市和商路。[[59]](#_59_Zhan_Mu_Si__Xie_Li_Deng____J)

另一個不穩定的特點，是人口的流動。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許移民遷入明末叛亂造成人口減少的四川等省和邊境地區，包括非法進入滿洲。這些出路（除滿洲外）到18世紀末漸漸堵塞。福建和廣東多數男人移居東南亞，到1850年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當契約勞工。在太平天國叛亂之后，人口減少的長江下游，暫時是一個人口遷移的匯集區。然而，到20世紀，只剩下滿洲這唯一的一塊地區，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開墾的土地。這些移民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后結果，是長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這些永久的遷徙之外，還有兩種暫時的人口遷移：為了就業和逃避戰禍、饑饉和貧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已永久定居下來，仍往往按原籍組織為“會館”，希望最終仍回到他們的故鄉。大規模的人流每年出現。例如，浙江北部青鎮[[60]](#_60_Qing_Zhen_Jiu_Shi_Shu_Tong_X)傳統鑄鐵作坊的鐵匠，或杭州的錫箔匠，每年大部分時間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卻分別回到江蘇無錫和寧波府各地，幫助家庭夏收。貧困的邊緣地區，常有他們自己的遷徙模式。例如蘇北的窮人到上海尋找季節性工作，充當勞工、挑夫和黃包車夫，但常常到頭來因沒有工作而淪為乞丐。在較富裕的城鎮乞討，成為公認的農閑時尋找生計的路子，正如家鄉遭受自然災害時，到處乞討是一條生路一樣。搶劫和走私，作為一種更大膽的、不法的謀生之道，有時被人季節性地采用，常從外地撈錢。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販加上，晚清人口的職業性移動量是很可觀的。[[61]](#_61_Chu_Wai_Mou_Sheng_De_Yi_Ban)

此外，自然災害，叛亂與戰爭引起難民的浪潮。難民群在他們經過的城鎮引起恐懼，那里的小家族集團或個人很容易受到搶劫。

如此種種的民眾流動是沒法計算的，但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無疑是有增無減。對外貿易的增長、城市職業的增加和交通運輸的改進，都促成新的暫時遷移。例如，1882年有7萬中國旅客從寧波乘輪船到上海，有7.3萬人購買船票從上海到寧波。20年以后，這些數字約增加一倍；而到1910年，有寧波旅客46.7萬人到上海，47萬人從上海回寧波。即使考慮到原乘帆船的旅客改乘輪船，這些上升的數字也能說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動。[[62]](#_62_Da_Qing_Hai_Guan_Zong_Shui_W)

這種種人口流動，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響了全國各地。與世隔絕的村莊越來越少。到城市尋找工作，不一定通過逐步上升的城鎮等級制的市場結構；農村剩余勞動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聯系渠道，而城市商人則與農村關系更為密切——為農村手工業供給原料，購買農產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樣購買農業土地。第三，這些人口流動影響了社會結構。城市工資勞動者，不論男女，在他們的鄉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為他們增加了家庭收入。與此同時，逃避農村貧困而外出，意味著始料所不及的流離失所、家庭破裂、賣妻鬻兒和受人擺布。我們無法描繪他們趨向貧困的簡單過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高的地區，租約每每對租佃人不利。例如，19世紀90年代在廣東東部，農民在壞年景要承擔更多的風險，也很少有減租的權利。到了20世紀20年代，一些農民僅按照一年的口頭協議租地耕種，毫無保障可言。在長江下游，租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漸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一，有可能增加關系緊張，如在浙江，1927年通過減租條例，然后又宣告無效。[[63]](#_63_Guan_Yu_Guang_Dong__Jian_Ma)同時，暴力活動增加和民眾流動，兩者都削弱了從前由庇護人—依附人關系和村社網絡所提供的保護。

不穩定不宜于數量比較。然而，我們注意到，19世紀中葉的社會動亂是在人口激增、通貨緊縮、政府資助的主要水路運輸和河防以及抗災系統毀壞失修的時期出現的。在清代最后10年和民國初期，經濟膨脹和改革又進一步誘發了社會的不穩定。在民國的后半期，因經濟困難和戰爭而導致的不穩定越來越頻繁。人民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 傳統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業化導致商人與有功名的士紳之間的正式區別最終消失時，名流群體也開始變化。這兩個群體的融合，以清末出賣功名為標志。富有的廣州行商老板、江蘇與直隸的鹽商和山西的票號主人，在18世紀買得功名而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19世紀，任何一個城市的許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和本地士紳截然不同，但是，這兩個群體在家鄉卻融為一體。做生意從來得不到一流學者或高官的聲望，但它至少同樣是一條生財之道。把商人吸收進統治階級的證據不容置疑。

子孫繁衍的大家庭成員，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長，或做學問，或經商，或管理產業。如在管理活動中的合作一樣，宗族紐帶模糊了紳商之間的區別。這種結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購買功名或官吏投資商業。到19世紀中葉，一些人開始顯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紳的特點，把學術和商務結合起來，擁有較高的功名，而積極從事商務管理，并顯示出愿意離開升遷無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實業上更廣闊的發展機會。在像浙江和江蘇絲產區那樣的經濟發達的地方，學者們不能抗拒被引誘進生產或貿易活動中去。[[64]](#_64_Guan_Yu_Ming_Liu_Rong_He_De)這種紳商的融合現象因1905年科舉考試制度的結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舉考試的結束使教育對有錢交付學費的人更為開放。這一變化造就了界限更廣、更開放的上流社會——它隨時可以接受社會流動，但是又能很好地作為一個階級來維護自己，因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資力。

名流的社會范圍放寬，他們指導的社會組織也隨之增加。最明顯的是行會和同鄉會館。雖然這類組織的歷史可追溯到幾個世紀以前，但是，它們在清末大大地發展起來，以適應在外鄉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廣大群體的需要。[[65]](#_65_Jian_He_Bing_Di____Zhong_Guo)做生意賺得的錢，常常用來資助其他的社會組織。新致富的家庭繼續為慈善事業提供資財，直到20世紀。士紳們負責管理修堤、義葬和其他社區團體。由商人、士紳和寺廟管理的公益會社，在19世紀后半期顯著增加。當出現叛亂之時，或在長期動蕩不安的邊緣地區，民團和自衛隊超過了士紳管理民事組織的影響。士紳的這些多方面的組織能力，不僅幫助他們保持其在農村社會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場的地位。[[66]](#_66_Guan_Yu_Zhe_Zhong_Qing_Xiang)

當商人和士紳正結合成更廣泛的單一上流階層時，出現沿著不同方向分裂的跡象，終致產生新的階級結構。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越來越多的學者—士紳已轉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幾十年間，教育的普及加速了這一過程。有資格的人實在太多，無法盡數授以政府職位。有些富有的青年人變得懶散或耽于文學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與衙門小吏中的貪污分子勾結營生。但是，也有不謀仕途，嚴肅而值得尊敬的人。一個早期的例子，是18世紀在長江下游發展起來的學術界——這些人專心致志于嚴謹的學術，從事研究和書院教學，靠民間的贊助人或封疆大吏給予的薪俸為生。新建立的以高學術水平為目標的書院，使他們有了一個穩固的基地。職位由督撫任命。這樣的職位，有抱負的學者極為珍視，刻意求之。藏書家擴大了藏書規模，推動了書籍印刷，從而促進了印刷業。這一學術階層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舉考試為目的，也不追求官職。[[67]](#_67_Ben_Jie_Ming__Ai_Er_Man____X)

在19世紀，特別在后半期，士紳董事會也成為一種可供選擇的主要謀生之道。和知縣的活動一樣，董事的活動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專門擔任管理水利之類的職責。管理宗族財產成為又一種相當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機會。富商或投資者常常雇用執事來管理私人商號。

在官府范圍內出現了專門化，如有些人受訓練當屬員，其他的人成為高級官員隨從人員中的刑名或錢糧幕友。例如李鴻章的幕府中保持許多額外的專家。這類專門化常有地方基礎。這樣，來自浙江紹興的學有所長的人，以當刑名師爺的本領和在京城獲得書辦職位而成功，尤其著名。[[68]](#_68_Ken_Ni_Si__Fu_Er_Song____Mu)也有一些紹興家族管理寧波商人擁有的錢莊而致富。

更帶根本性的職責的改變始于條約口岸，在那里洋務專家、買辦、條約口岸創業者和西方式專門人才形成小規模的城市資產階級；作為民國時期軍事家的先驅，受過教育的軍官出現了；教會學校和中國的新學堂開始培養儒家框架之外的城市知識分子。舊的各種名流階層的分裂和再確定，民國時期仍在繼續。其實晚清的各種名流從來不是同質的，他們如今不僅按地區，而且按職業而更加分裂了。新的差別漸次在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的名流之間出現，一如城市名流和鄉紳之間的差別一樣。武裝力量常常是農村名流地位的更重要的支柱。的確，在某些軍事化的農村地區，地方名流幾乎限于控制民團的人物；[[69]](#_69_Jian_Ai_Kai____Zhuan_Bian_Zh)而在中心區域，財富多半仍與武裝分離。已不再有可以用功名或財富的單純標準限定的大體上一致的名流階層。

名流分化，伴有組織上的多樣化。隨著中國與現代國際社會更多的接觸，中國的城市生活也經歷了名流管理的不遜于國外的事業的發展——以蒸汽和（或）電力為動力的制造業、運輸和通訊，流通資本、勞動力和意見的更開放的市場，社會管理事業（教育、公共衛生、警察、災害控制、司法行政），乃至政治活動。中國城市名流吸收他們認為有用的西方辦法，以革新和加強中國類似的、可能是歷史悠久的事業。

這些趨勢是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攻擊儒家社會價值觀的背景下出現的。這一攻擊由城市知識分子領導，是對家庭專制全面挑戰的一部分，而以解放婦女和青年發難。

婦女已慢慢獲得較高的地位，并能參加比正統道學家所允許的廣闊得多的活動。16世紀以來，名流家庭里受過教育的婦女數量不斷上升。19世紀和20世紀的浙江地方志記載了婦女的公益捐獻；某些名人傳記表明，她們在家庭事務和地方事務上都起強有力的作用。比較貧窮的人家的婦女比名流婦女起著更有決定性的經濟作用，在家庭以外也更為活躍。19世紀初，婦女在海盜船上戰斗，有時還指揮海盜船。她們在異端教派中占有領導地位，并參加暴亂。珠江三角洲經濟獨立的女織工建立了她們自己的組織，甚至終身不嫁。

到19世紀末葉，對婦女的限制甚至在富裕家庭也慢慢松弛下來，但是，婦女在戶內而不是在戶外從事適當活動的社會習俗，仍然是阻止她們擔任公職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沖破這一種障礙的動力來自國外。傳教士提倡開辦女校，反對纏足。外國的觀念和事例提供了婦女社會地位的新形象，民族主義和自由的理想提供了理論基礎。梁啟超在1896年著文譴責這一窒息中國婦女的罪行，是最早的這類文章中的一篇。反纏足運動聲勢浩大，廣為傳播，盡管對其歷史幾乎沒有研究。在19世紀最后10年和20世紀最初10年間，提倡婦女解放是激進主義的標志，反對纏足則是社會進步的基本組成部分。有些婦女能方便地在家庭以外活動，而另一些則面臨艱難而痛苦地掙扎。[[70]](#_70_Le_Jie_Wan_Qing_He_Min_Guo_F)

青年男子宣布不受家庭束縛而自主，比較容易，但也決不簡單。學生們一旦出洋留學或就讀于新式學堂，就成為新的政治圖景的一部分。廢除科舉制度使教育費時較少。青年人率先要求政治和社會的改革。主張青年人不依賴長輩而自主，應很快承擔責任，這是很激進的一步。學生們與知識分子在辛亥革命以前形成了革命政黨的骨干，在民國時期將繼續成為激進政黨的領導人物。[[71]](#_71_Zhong_Guo_Qing_Nian_Bei_Pan)

### 農村組織與民眾運動

農民當中的結社群體包括合法的機構，諸如由有聲望名流領導的宗族和村社；合法與否不明確的機構，如聯莊會和民團（它可能經政府許可而建立，但可能有拒絕官方控制的潛在可能性）；以至明顯非法的（但有時是被容忍的）群體，如教派、秘密幫會或走私、盜匪和海盜幫伙。即使是非法的教派、秘密幫會和幫伙，也嵌入了地方的社會和商業結構之中。其中許多是具有連續性的組織，幫助其成員合法或非法地謀生，向他們提供保護、伙伴關系和（就教派而言）宗教生活。事實上，它們彌補了官方組織和上層名流組織的不足，但是原來并沒有從社會階級方面來看待它們。人們可以發現，教派和秘密幫會的首領中有各種各樣的低層名流和受過不完全教育的人物，看來其成員具有滲透體面社會的同樣的價值觀。因此，這些組織不能看作具有其自身的獨立價值觀的農民小傳統的體現。那些包括進正統的和官方認可的組織，與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組織之間的差別更大。因此，只要非法組織是由那些感到遭受不公平的排斥，或感到不能適當地維持生計的人群組成，它們就有了對抗政府和上層社會的競爭能力。[[72]](#_72_Han_Shu_Rui____Shan_Dong_Pan)因違法的犯罪行為而加重的這種緊張局面，周期性地在叛亂中，或在官府鎮壓直到此時以前仍然安定的團體中顯露出來。

在晚清，非法的或合法與否不明確的組織，它們的擴張是否可以與士紳管理的自主組織的增加相比呢？關于宗教的派別，現在可以斷言它們是很多的；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相當多的起義表明，這是一個活動的浪潮；教派直到民國時期仍很活躍。[[73]](#_73_18Shi_Ji_Mo_19Shi_Ji_Chu_Jia)關于秘密幫會，有稍微好一些的證據。最初建立于清初的三合會，把活動伸展到華南和西南內地，并與19世紀初的鴉片買賣和其他走私活動有關。鴉片戰爭時，三合會在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區進一步擴大。哥老會大概在19世紀50年代或60年代出現，成為長江流域最有勢力的幫會。還有幾個新的會黨在19世紀后半期建立于浙江。[[74]](#_74_Guan_Yu_Ge_Lao_Hui__Jian_Cha)對地方上的研究也表明，到民國晚期自然災害與社會動亂在淮北引起了大量的幫會、教派、幫伙、聯莊會的建立。

因此，人口增長和商業化看來可能促進了下層社會和上層社會內的組織活動。社會動亂起了產生新組織的催化劑作用。這樣的激增很重要，因為雖然暴亂和對抗可能自發地出現，但是，社會動亂當先已存在的組織卷入時，就可能更為頻繁而持久。無論幫會還是教派的卷入，固然會增加動亂的可能性，但也能起到使動亂保持在限度以內的作用，因為兩者既為政府及其追隨者補臺，同時它們之間又存在緊張關系。在形勢不穩定時，這些組織的常規以及它們經常的非法活動的內在邏輯，往往會把它們從邊緣地位推到反叛官府，而不是與官府共處。然而，它們的成員與現存秩序有著太多的聯系，或追求這種聯系，并且與它共有過多的價值觀，以致不能完全拋棄或長期脫離現存秩序。

所以我們認為農村的動蕩是多方面的，直到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它們的目的很少在于政府和社會的革命性重建。提出來闡明民眾運動的理論，已經強調了許多不同的方面。[[75]](#_75_Guan_Yu_Zhe_Fang_Mian_Zhu_Zu)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支配中國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強調農民反叛者的階級覺悟，指出貧窮、經濟不公平與社會壓迫是反叛的原因。直截了當的經濟解釋可以說明一連串抗租、抗稅的反叛，諸如與19世紀40年代道光朝緊縮通貨相關的造反，清末通貨膨脹和征收新稅觸發的城鄉風潮，或30年代經濟蕭條時的抗稅活動。然而，集中注意力于階級覺悟和壓迫，忽視了相反的史料和農村動蕩的復雜性。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國歷史學者提出了更廣泛的解釋。[[76]](#_76_Zhong_Guo_Ma_Ke_Si_Zhu_Yi_Li)

另一條解釋路線，著眼于純樸農民（但常常是有組織的）對地主、官吏和城市資本家的社會反抗。農民反對特定的不公正行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特定的錯誤，而不是要推翻舊的社會秩序以利于建立新秩序。這種最初被精心發揮為南歐“社會盜匪活動”的觀點，通過研究糧食風潮和早期英國工人運動而拓寬，并被修改，以便于分析自給農村經濟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所破壞時農民的反應。雖然別國的詳細論述不一定能照搬到中國的環境中來，但是，關于非革命的、由道德觀念鼓動起來的抵抗，其一般概念則適用于一系列中國農村的騷亂。[[77]](#_77_She_Hui_Dao_Fei_Huo_Dong_Gai)

社會盜匪活動的概念，可見于同情被蹂躪者的綠林好漢的中國傳統，和民眾對真正土匪造反者如20世紀前10年對白狼的感性認識。[[78]](#_78_Guan_Yu_Bai_Lang_De_Jie_Shi)《香港電訊報》報道的1907年廣東東部一次叛亂的一個首領的自白，頗能說明當農民認定官吏或富人不會幫助他們時，地方上的騷動和叛亂可能如何開始。“這次叛亂的原因，是由于當地米貴和缺米長達一年之久。官府自一開始就知道這點，但不愿采取任何措施降低米價。他們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和職責要求他們怎么辦。他們就是不顧老百姓，讓老百姓挨餓。”[[79]](#_79_Ma_Ke_Si____Hua_Nan_Nong_Min)

農民對容易做到的“公正”的要求的一種可供選擇的形式，是群聚的市民和村民強迫以“公平”的低價售米，包括為寺廟主辦節日而儲存的糧食。一次這樣的事件是失業的采茶工——他們都參加了“道教神人”領導的組織——結伙擁入江西的一個集鎮。當事先得到警告的集鎮頭面人物宣告停止集市時，采茶工強迫一個囤積糧食出名的富商向他們“出售”鎮上義倉里儲存的糧食。他們然后結伙去一所廟宇大吃大喝；他們享用過度，竟留在那里數天之久，直到后來民團開來把他們驅散。[[80]](#_80_Zhan_Mu_Si__Bo_La_Qie_Ke)

在教派叛亂中，宗教的重要性有助于使到處都有的隨意傳播的民間宗教和其經文和教義一致起來。這些教派源出于大乘教，到清代末期，把佛教、道教和儒家的一些方面結合為供奉無生老母和彌勒佛的太平盛世的信仰。[[81]](#_81_Ou_Da_Nian____Min_Jian_Fo_Ji)這一教派的信仰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并與任何特定的組織無關；它在三次較大的起義（白蓮教、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以及眾多的小起義中起了作用。這種宗教的作用是雙重的。它的各個派別在人生的苦難中給人以希望，并長期成為名流和政府支配的信仰和禮儀體系的替代物——通常是和平的。[[82]](#_82_Guan_Yu_Wei_Ren_Qi_Qiu_Chang)但是，這種宗教相信新的公正時代的到來，強調自我解救并吸收民間武術，在適當的情況下有可能促進叛亂從當地爆發開來——如1813年八卦教很快從其他社會和市場結構動員徒眾，或如太平軍和義和團迅速從原來基地向外蔓延。[[83]](#_83_Ou_Da_Nian____Jue_Ze__Zhong)

對淮河以北蘇、豫、皖三省水患頻仍的貧困地區加以研究，發現叛亂出自家族及社區網絡制定的掠奪性或保護性的策略，目的在于使它們的成員能在那毫無指望的居住地區繼續生存下去。掠奪性的策略利用搶劫、求乞、走私和械斗；保護性的策略則建立民團和聯莊會，構筑設防的村寨。這兩種策略互相作用，并都要建立武裝力量；地方的平衡一旦遭到破壞，兩者都能擴大成為叛亂。[[84]](#_84_Pei_Yi_Li____Hua_Bei_De_Pan)這種觀點強調農村動蕩的連續性及其非革命的特性適用于某些地區常有的動蕩狀況，如廣東的宗族械斗。

正如19世紀太平天國叛亂和義和團叛亂所表明的那樣，非法的社會組織的各個方面和社會動蕩的不同原因，有時可能合在一起成為超越其根源的運動。這樣的主要事件，十分清楚地提出了革命潛力的問題，以及傳統的太平盛世觀念和經濟反抗的局限性。

有些人認為流產的革命太平天國叛亂的原因包括窮困和社會分裂、外國經濟的有害沖擊、對侵略的愛國憤慨、蔑視軍事上虛弱的政府——這些原因聽起來很像提出來說明20世紀革命的那些原因。由基督教變通而來的太平盛世的使命與烏托邦式的憧憬，鼓舞一支熱誠的隊伍快速地進軍，并對儒家的倫理和信仰規范提出了強烈的挑戰。社會平等主義和重新分配土地的綱領，是就農民的不滿提出的，這一反應顯示了對地主的敵視，若是在20世紀，它會把農民吸引到共產主義的綱領上來。太平天國領袖們所擬定的理想主義的社會政治結構，本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當時的政府制度。既然太平神示的先驗的普濟主義所提出的一些主張似乎有點夸張，同時它不只是一場農民革命，它實在是20世紀中葉以前對農村困苦做出的規模最為巨大的嘗試。[[85]](#_85_Kong_Fei_Li____Tai_Ping_Jun)

然而，由于領導及組織上的內部弱點和名流領導的反對派的強大力量，太平軍失敗了。他們由于中國社會頑固的地方主義而告失敗。他們一旦放棄原先在廣西的根據地，在長江流域建立政府就不能深入到社區中去。太平軍沒有充分發動農民，沒有贏得名流的支持，秘密幫會也保持自身的獨立。最后，太平軍來到長江下游，已不是革命者，而成了入侵者，同樣殺害窮人和富人。[[86]](#_86_Kou_Er____Min_Zhong_Dui_Tai)這次叛亂未能變更社會秩序，其主要歷史遺產是有助于發動50年后推翻清朝的其他社會政治力量。

義和團絕非革命團體，但是，它短暫的叛亂把農村動蕩的許多方面結合在一起，并且引發了與義和團起源毫不相干的諸多事件。[[87]](#_87_Zhe_Zhong_Shuo_Fa_Yi_Ju_Zhou)義和團同白蓮教有直接組織聯系的史料很分散，也不足為憑。然而，義和團確實實行教派禮儀，并吸收了某些教派的信仰，與山東西部的天主教社區抗衡。義和團的地方團體以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發展。在山東省相對繁榮的西南部，地主勢力強，租佃率高，義和團開始是名流領導的防御土匪搶劫的地方自衛團體。在比較貧困的西北部，土地產量不高，不足以吸引地主投資，租佃率也相對較低。在這里，由普通村民領導的義和神拳實行平等主義的儀式，通過這樣的儀式，任何神靈附體的人都可被奉為神。山東巡撫支持拳民組織起來保衛村寨，卻沒有認識到西北部的義和拳根本不同。就是這些不受勢弱的名流約束的神拳成員，無所顧忌地擴張到直隸東部，有轉而反對官吏的危險，但是他們最為敵視的是基督教徒和外國人。

一旦運動開始擴大到失去控制，它就災難性地變得與朝政有了牽連。朝廷的保守派試圖利用義和團來加強他們的地位，同時擺脫外國人對國家的干擾，如此高層的支持，使運動得以更加迅速地發展，這種運動政府通常都會設法加以鎮壓。它立即激起了外國干預。運動的不同階段因而涉及各種社會力量不同的配合。最后出現的政治后果，包括南方名流疏遠政府和對庚子賠款附加稅的憤恨，和這一事件開始時可預見的任何結果相去甚遠。

這兩次叛亂均顯示出極端分子的潛在勢力，不過都未能改變當時的社會結構就終止了。它們失敗了，不僅因為反對的力量更強大，而且因為叛亂的領袖們（徒眾就更談不上）沒有新秩序的明確規劃。農村強烈不滿所孕育的政治可能性，尚待在不同類型的領導下變為現實。

### 工人運動及其農村紐帶

在20世紀，工業化開始產生明顯的城市無產階級。不過城市工人既不是新現象，離開其農民出身也不甚遠。工匠和勞工久已是城市景象的一部分。他們常常是特定農村地區的移居者，暫時住在城市。他們的幫伙組織、秘密幫會、同鄉會、行會，同農村社會組織不是截然分開的。實際上，在高度商業化的珠江三角洲，19世紀的行會可以橫跨城鎮作坊和鄉村家庭生產者的統一體，并與地方宗族和教派組織互相影響。[[88]](#_88_Xie_Wen_Sun____Zhong_Guo_Non)

使用蒸汽動力工廠的引進，開始改變了這種狀況。因為它把數量更多的工人集結在主要由客觀市場力量支配其活動的、性質不同的城市環境中，然而，并沒有同過去截然中斷關系。一方面，介乎老式手工作坊和大工廠之間，有許多由動力驅動機器的小工場。另一方面，工廠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長，加速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民國時期，城市不斷從鄉村吸收農民，他們隨身帶來了舊的行為方式。[[89]](#_89_Ai_Lin__Tuo_Yi_Bo____Ri_Ben)

這些工人常常來自某些特定的地區，和家庭并沒有斷絕聯系。例如，上海的紡織女工主要來自江蘇南部。特別是無錫和常州，或來自江蘇北部。雇傭反映出私人關系，車間常由同村的姑娘組成。同樣，天津鐵工廠的徒工是從河北某些有鍛鐵傳統的縣招來的，并很可能因原來在鄉間的親戚關系、同鄉關系或其他個人關系而同工廠主有聯系。[[90]](#_90_Guan_Yu_Shang_Hai_Fang_Zhi_N)

這類別國早期工業化共有的典型模式，從一種觀點看，意味著無產階級是高度流動的農村平民在城市的投影。工人不一定長期留在城市，姑娘們回家鄉結婚。老工人常常把家留在鄉下，而且有史料證明，30年代經濟蕭條時期，長江下游城市的失業工人回到了鄉下。工資也補充了農民家庭的收入。童工的部分所得可能直接送交父母。境遇較好的家庭可用城市工人所得的工資購置土地；較貧困的家庭則用來維持生活。[[91]](#_91_Cheng_Xiang_Lao_Li_Jiao_Huan)城市工人的社會觀點，很可能取決于在農村的家是否要他（她）以工資彌補家庭農業收入之不足，或他（她）是否來自（通常）沒有親戚網扶持的邊際農村階層。

在城市里，新來勞工的農村出身大概會妨礙勞工的團結。處境較好的、有技術的江南擋車工，和蘇北來的更窮、更粗魯的女工——她們做最臟的活，提升的機會最少——之間的敵對狀態，掩蓋了她們對工廠主的怨恨。甚至如1929年北平電車工人罷工的重大事件與傳統風潮的相似之處，和歐洲資本主義工業化晚期階段出現的以階級為基礎的經濟斗爭相比，也要多一些。[[92]](#_92_Dai_Wei__Si_Te_Lan_De_He_Li)

此外，許多城市工人的討價還價的地位是非常可憐的。早期的現代工業實際上是由剩余的農業勞動資助的。離家出外做工的工人只能得到很低的工資；年輕的男女童工在有些工業部門中是勞動力的主要部分，甚至比成年工人更不能控制他們的境遇。長期形成的招工和訓練的方法，在這些過渡性的境況中可能變得被歪曲了。例如包身工招工制度反映了以地方為基礎的與勞動有關的遷移模式；但是上海幫會的控制，使紗廠女工面臨被誘拐和被強奸的厄運，并且降低她們的生活條件，因為工頭為她們的工棚付錢，控制著工棚。同樣，天津鐵工廠的徒工制度為廠主提供不熟練但非常便宜、無需付工資的徒工，以供廠主輪換工人；徒工三年學徒期滿常被解雇，需另找工作。[[93]](#_93_Chen_Ming_Qiu____Lao_Gong_Yu)

盡管客觀情況如此不利，在20世紀20年代，工人們還是開始在擁有大量工廠工人的城市里組織起來。在像廣州這樣的地方，老式行會已有高度發展，它們為動員工人提供了組織基礎，但是新建的組織卻仿效西方工會的模式。起開辟作用的是較有技能、有魄力的壯年男工，如機械工人和海員，而組織的推動力則主要來自新知識分子。

在廣州地區，工會在五四運動以后迅速代替了行會和同業公會。在1920—1922年，適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后繁榮期，形成了第一個組織工會的浪潮，它反映了在需要勞工的經濟擴張時期，工人對自身力量增長的正確認識。這些年的罷工提出了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的自發要求。1923年初，京漢鐵路工人受到血腥鎮壓，其后工潮中斷兩年，這與經濟衰退期和全國性的勞工運動政治上的退卻同時發生。先前罷工所得再度為通貨膨脹所銷蝕，這是造成1925—1927年第二次罷工浪潮的部分原因。但是，在這些年里工人運動與政治問題和民族主義問題的關系更為密切——如省港大罷工和抵制洋貨便是例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聯合助長了激進主義，廣州新的國民黨政府又鼓動建立群眾組織。到1927年，香港有200個工會，廣州有300個工會，在整個珠江三角洲估計有70萬至75萬工會會員。

然而，勞工運動并沒有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知識分子鼓動者，特別是共產黨員，同工會的一般會員關系有限，后者仍主要關心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工人們把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政治斗爭看作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而左翼知識分子則以推動工人的經濟斗爭作為走向革命的一個步驟。隨著工會參與政治，它們變得更加依賴于政府的容忍程度。工會在廣州的政治作用，以參與共產黨1927年末不成功的暴動而告終。保守一些的政府仍允許殘存的工會提出有限的經濟要求，但工會已不再參加較大規模的運動。[[94]](#_94_Chen_Ming_Qiu____Lao_Gong_Yu)

勞工運動的細節和時間的選擇因地而異，但是，在另外兩個活動中心上海和湖南，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發展。[[95]](#_95_Guan_Yu_Shang_Hai__Jian_Rang)城市工人仍然太少，太弱，多為自身的困難所困擾，以致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在20世紀20年代，即使包括現代工廠工人以外的作坊和做服務工作的人，無產階級可能也不過幾百萬人。他們集中在擁有相當數量現代工業或礦業的幾個地方：上海、廣州、湖南、湖北、山東東部、天津周圍的河北東北部以及南滿等處。當經濟狀況有利于工業發展時，城市工人的這些集中點就發展，如從20世紀第二個10年末開始到2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情況就是這樣。直到1927年止，華中和華南的政治狀況允許工會組織存在，在某些地方還支持工會組織。然而，一旦被引向政治，在工會發展的最初階段，工人就被推向與更強大的敵人對抗。他們幾乎沒有時間來發展和組織自己。某些國民黨官員和資本家認識到工人的生活狀況需要改進，但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經濟蕭條和戰爭，對城市工人階級無論什么樣的擴展都造成十分不利的條件，更不必說有助于勞工運動了。

## 革命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

社會與政府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也許可以比作細胞與細胞核。中國從政治上有創造性的時代——如秦和西漢以及隋和初唐——繼承了一個以經過時間檢驗的結構、常規和思想為基礎的非常強大的政府。它實行聯合政治和分散管理的能力，對這個國家力量之所在，并非無足輕重，而外部世界對此才開始研究。

晚清和民國的政治史，常常以下述三種方式之一加以概括：一、按照循環說，注意王朝晚期的衰亡，這是社會動亂和軍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權國家的時期；二、按照政府權力向社會緩慢而不平衡地擴張的說法，政府謀求把行政機構擴展到村級；三、按照革命過程的說法，通過革命過程，舊的政治神話和社會結構被摧毀，新的階級被引入政治，新政權在一個根本不同的觀念形態和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96]](#_96_19Shi_Ji_Wang_Zhao_Shuai_Wan)所有這些觀點都提供了深入的見識。有政權衰亡、政權空白期和重新統一。歷屆政府確曾試圖擴大其權力，集中控制，改組金融和行政。但是，總的說來，我們認為，這150年的歷史可以更適當地詳細解釋為：脫出從舊政權控制的社會革命運動、新社會階級的出現、政治關系的重新確定，以及新的國家結構與觀念形態的創立。這是一個不平衡的、陣發性的和常常流血的過程。

同更年輕、更小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現代變革過程是緩慢而曲折的。隨著政府開始在社會中顯得更加重要，滲透和參與的相互關聯的現象，以及國家建設和動員民眾的相互關聯的現象，形成了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但兩者都發展緩慢。在中國，如同19世紀在別處一樣，現代火器，蒸汽機車和輪船、電報通信開始使用，但是清政府應用這些東西以滲透到社會，直至鄉村和家庭，卻遲緩不前。推廣識字、辦報紙和郵政同樣緩慢，抑制了民眾對政治的參與。關于無所作為和只能逐漸地、勉強地實現的潛在可能性的資料，無疑反映了晚清政體所固有的力量。盡管在1800—1948年間出現了變化，杰出人物統治論和權力主義的基本特點依然頑強地存在。

### 清代權力機構的失去平衡

滿族統治的清政府和中國社會之間的基本關系，是在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規劃的。一旦完成了征服，就為異族統治很好地樹立了種種范例，以致反滿情緒主要表現在對明朝的儒家式的忠誠上，而不是表現在漢民族的民族主義上。基本上沿襲明朝的科舉考試制度，把上層階級的利益與君主國家聯結在一起，構成了地方和京城之間的橋梁，有助于維系正統的意識形態。[[97]](#_97_Jian_Ba_Lin_Dun__Mu_Er____Du)其他幾種基本安排進一步規定了國家和社會的種種關系。

第一，在征服之時，上層名流在很大程度上把接受滿族的統治作為恢復秩序和穩定的合理代價。作為回報，他們可以保留大部分地方上的社會地位和利益。[[98]](#_98_Xi_La_Li__Bei_Di__Dai_Ti_Fan)第二，政府接著采用的田賦及其他政策，促使華北大莊園解體和抑制了南方地主的勢力。這兩種政策意外的結果是，由于名流不控制大量集中的經濟（和潛在的軍事）力量，政府愿意讓他們有相當大的自由；他們也愿意支持一個一般能照顧他們利益的政府，而晚明時期逐漸形成的貧富之間的緊張關系得以緩和。[[99]](#_99_Jian_Ma_Ke_Si____Hua_Nan_Non)第三，初期的滿族統治者保持低稅，供養的官僚比較少，所需經費不多，并且未深入到縣以下。這項從明朝繼承下來的政策，為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們所支持，既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也因為這項政策符合他們擁有土地的家庭的利益。在清初，官僚機構規模小，部分地得到有效的騷站系統的彌補，官僚的報告由集中到皇帝的個人情報收集網加以補充。[[100]](#_100_Fei_Zheng_Qing_He_Deng_Si_Y)

但是這些措施只是繞過了、而不是直接面對越來越發展的行政不深入的問題。18世紀初，雍正皇帝作了一次認真的嘗試，為地方政府和官吏薪俸提供適當的經費，但遇到相當大的阻力，不得不緩慢推行。[[101]](#_101_Ma_De_Lin__Ze_Lin____Huo_Ha)到18世紀末，人口現狀使官府和社會之間的平衡陷入大混亂。人口的增長、商業和城市的擴張，超過了官府監督民眾或提供必需服務的能力。倉廩制度的崩潰是一個征兆。在這些情況下，官府不能總是不變，正式文官的數量相當穩定，大約為2萬名，其中一半在京城供職，但是為人數多得多的低級的胥吏、聽差和有公務的私人仆役與較高級的私人秘書所補充。胥吏的數量因縣的大小而異。[[102]](#_102_Zhang_Zhong_Li____Zhong_Guo)政府為控制這類次官府人員和秘書的數量和活動所作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為人口增加需要更多的低級職能人員去執行必要的公務。在整個19世紀，捐納增加了虛擁功名者的隊伍。在19世紀后期，由于增加了專辦外交、商務、工業或軍事的官吏，由于經常雇用辦理官方事務的委員，由于增加了新的專務公署，文職官僚進一步增加。增加的速度因20世紀第一個10年實行新政而急遽提高。

特別在19世紀的后半期，政府努力用征收田賦附加稅來調整財政，并且顯著提高了包括對外貿易關稅在內的商業稅在稅收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種估計表明，政府的歲入按流通的銀兩計算，在1753年和1908年之間約增加了三倍（如按物價變動調整，實際增加一倍）。[[103]](#_103_Wang_Ye_Jian____Zhong_Hua_D)然而，這是不夠的。清朝政府無法從由于經濟增長而增加的國民生產額中，提取足夠的份額。只是在19世紀中期鎮壓叛亂的軍費使財政非常緊張以后，國家才認真嘗試改革。此后，中央政府似乎從未能控制它的財政狀況。地方政府同樣一直經費不足。在清朝末年，大宗賠款嚴重地損傷了財政已經困難的政府，政府正試圖急劇地擴大其職能。1900年以后，為籌措地方改革的費用而增加附加費和新稅種，與其說有利于財政的穩定，還不如說更促使政治和社會動蕩不安。

除去困擾清朝財政政策的各種結構問題之外，還有大批文獻表明，在19世紀，官僚政治受到官吏腐敗的損害，君主政體由于皇帝的腐化而削弱。盡管考慮到有一些夸張，但看來官吏賴以為生的包稅制固有的腐敗，已經牢牢地扎根于地方政府稅收及其他許多方面，以致不采取最激烈的改組手段，就不能肅清腐敗。然而，在較高的級別上，除乾隆朝晚期以外，腐敗并沒有嚴重地威脅到要吞沒整個官僚政治。行政的控制和規章遏制了官吏的主動精神，但使政府機關保持運行。在18世紀期間，軍機處已逐漸從皇帝能借以避開正規官僚機構的非正式的工具，變成一個主要的、本身有權制定政策的機構；甚至在清末皇帝很軟弱時，它也能使政府保持運轉。[[104]](#_104_Bai_Bin_Ju____Zhu_Bi__Qing)在19世紀初，由于官員們決心防止大規模貪污腐敗在朝廷重現，改組了內閣，確實改進了公文流通，使高級官員對朝廷有了更大的影響。此外，在19世紀大部分期間，皇帝得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官吏（從阮元到張之洞）在政府供職。能做到這一點，與其說是由于他們為之供職的皇帝的能力，不如說是由于19世紀的嚴重危機。即使如此，19世紀的幾個滿族統治者也并不都是十惡不赦的；而朝廷上的其他成員，也只是在滿族統治的最后二三十年，才似乎對政策施加了真正災難性的影響。

清政府的結構充滿著缺點，但崩潰主要不是由官僚制度內部的不當，或朝廷的墮落引起的，而是未能與社會發展相協調。19世紀中期大規模的叛亂表明了問題的存在，但未能瓦解政治和社會的結構。要了解帝國制度的覆滅，人們必須著眼于來自名流階層的政治挑戰。

### 名流積極精神的興起

上面已經談到，這個運動很自然地起源于傳統名流階層的融合和分裂。到19世紀初，日益擴大的社會積極性，在經濟、社會和管理的非官方活動的增長中明顯地表現出來，而專制政府卻阻撓政治表現或政治權力再分配的任何相應發展。這一形勢在整個19世紀期間加劇起來，因為社會的團體在進一步擴展，而下層的官府職能人員也在增加。對權力再分配的要求并沒有仿效歐洲模式。在這個一體化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沒有可與歐洲封建貴族相比的軍事上強大的群體，也沒有如歐洲市民那樣的處于邊緣、但在經濟上卻是最重要的階級，能夠要求政府作出讓步。滿族朝廷一直對國內軍事挑戰的危險非常敏感。盡管舊軍事勢力衰落，但它尚能維持對新的區域/地方軍隊的指揮將帥的控制，這些軍隊是為鎮壓19世紀中期的叛亂而建立的。最初挑戰的出現并不是由于直接政治對抗，相反，是由于身處邊緣位置的人發揮主動精神和表達意見，這些人接受現制度，但擔負了更主動的對付時常發生的危機的職責。在政局內外的人們之間，在當時國家結構的三個領域——官府以外的士紳界、都會的低級官吏層和條約口岸——之內，緊張關系發展了。他們迫切要求權力再分配，即向外從政府到社會領袖人物，向下在行政結構內部的權力再分配。在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第一個10年中，這種逐漸成熟的反對力量結合起來，并向當時的當局發動了正面攻擊。

士紳管理公用事業的興起，是因為官僚統治機構沒有能力在水利、公共秩序與公共福利等方面，為地方提供必要的服務。例如，堤防管理在明代是行政部門的責任，但里甲制度崩潰之后，必須制定一種新制度。[[105]](#_105_Yi_Mao_Ke____Ji_Zhen_Yu_Shu)由衙役管理，充滿了因腐敗和經費不足這兩方面而產生的問題。士紳的管理和捐助提供了一種替代的解決辦法。現存一些17世紀上海和寧波等地區士紳參與公共工程管理的相互無聯系的資料。在18世紀下半期，地方士紳看來更頻繁地參與了公共事業管理；而到19世紀初，人們開始發現有關紳董、董事的專門資料。[[106]](#_106_Tong_Shang_Shu__Di_462__463)“紳董管理”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速度發展，視地方的需要和當地名流的活動能力和財富而定。但是，到19世紀中期，看來這已是普遍的現象。商人和士紳一樣，也管理公共機構。像漢口等城市的行會把向會員提供的服務擴大到整個社區。[[107]](#_107_Guan_Yu_Zhen_Ya_Feng_Chao_D)

自治管理在19世紀下半期，分三個階段迅速發展起來。最初的推動出現于19世紀中期的叛亂期間，當時地方名流組織了民團，并承擔稅收和其他通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權力。第二個推動出自叛亂后重建的需要。承擔救濟與重建的主要責任的地方人士，把他們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動擴大到官府外的管理中屬于地方民政結構主要部分的領域。這些活動的經費，主要來自捐贈，即名流和企業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業稅款。擴展的最后階段開始于90年代中期，當時有功名者和紳董開始在教育和工業方面從事自強活動。1902年以后，紳董管理的職能已以協會、商會和事業局的形式而正式化了，這些會、局作為清政府新政的一部分而由詔令設立。[[108]](#_108_Guan_Yu_Tai_Ping_Tian_Guo_S)

19世紀管理工作的激增，打亂了地方名流和官僚制國家之間的平衡。士紳往往被描繪為官吏（特別是知縣）和地方社會之間的中間人，與雙方分享某些利益，有時聯合一方，有時聯合另一方，有時在兩方之間斡旋。[[109]](#_109_Ai_De_Wen__O_Lai_Xiao_Er_He)新的從事管理的名流沒有放棄19世紀的這一作用，但是，在知縣變得不太得力的時候，他們會日益取代地方政府之中的官僚。[[110]](#_110_Fu_Er____Zhong_Guo_Jiang_Su)雖然名流只是在1909年選舉出的諮議局成立時，才被給予地方政府中的正式規定的任務，但是，由名流社會合意挑選出的紳董，實際上在前50年已成為一些地方行政機關的一個重要部分。

這個現象已被看作既與地方軍事化有關，也與權力的分散和權力的地方化有關。然而，只要清朝存在，就不可能表現為簡單的趨勢。有些地區在叛亂之后繼續實行軍事化，槍支分散在民團和土匪相對抗的鄉村。但有些官吏在努力解散民團和控制鄉紳取得警察或軍事權力方面是堅決而成功的。與此同時，地方名流的權力又在與學術、商業和社區的利益有關的非軍事事務方面，有了新的可觀的增長。

這個趨勢最有力地出現在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地區，而以長江下游最為突出。在那個區域，農村的動蕩不安不只是引起名流向城市遷移，也激起了管理活動，目的不僅在于地方治安管理，也在于緩解某些釀成麻煩的根由。這既不完全是鄉村的活動，也不完全是城市的活動，因為富裕的、受過教育的“鄉村”名流在城市有商業利益，并與高級官僚有聯系。他們設想，民間倡辦的事為上層采納，或許能改變國家政策，并把他們帶到家鄉之外的公共服務中去。這種演變有若干特點。

第一，與官吏階層抗衡。名流階層深信自己的自治管理優于官辦活動。他們的主要怨恨指向低層官吏。大多數較高層的官吏贊成有利于公共組織和公共秩序的管理活動，但是，當有魄力、有維新思想的官吏與同樣有魄力、積極從事公共活動的紳董——他們確信自己是地方各種需要的最佳裁判者——接觸時，爭論就有可能爆發。像丁日昌這樣的巡撫，他力圖限制地方名流階層，并加強知縣實力作為行政維新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對官府之外倡辦的事存有戒心。例如，當商人反對厘金稅，或地主士紳力圖取代衙門胥吏和差役管理田賦征收時，同官吏的緊張關系就可能加劇。[[111]](#_111_Guan_Yu_Zhe_Ge_Guo_Cheng__J)

第二，愛國主義。許多紳董把他們的活動力看作管理國家事務的才能，是對時代需要的反應，涉及到更廣闊的問題。那些經歷叛亂而感到震驚的、所受教育（常常還有他們的前途）是以公共職責為目標的人士，完全能夠按照民族的框架考慮他們的活動。這一普遍化的傾向，在19世紀末期又因對外國威脅的愛國的反應而得以加強。

第三，社會凝聚力。紳董屬于非正式的、貫穿市場結構和區域界限的士—商和官—紳社會網絡。在長江下游，分崩離析的舊學術界的殘存學者，如丁丙，重新致力于管理事務；官員們致仕后致力于家鄉的各種問題；富商管理地方的事業機構，并為它們設置基金。名流管理的事業機構，在城市等級的各個層次——下至集鎮——建立起來，但常與高級官吏有聯系。總之，地方管理不是孤立發展起來的。[[112]](#_112_Li_Ru____Nan_Xun_Zhi____Di)

第四，擴散。管理活動勢將擴展開來，不為所在地域或城市等級的層次所限制。有些個人在他們事業或學術生涯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地方管理自治的事業機構。縣城里的其他紳董，遍歷縣境監督村、鎮的附屬機構。在一地學得的管理技能可用于他地，地方的機構可用來作為在其他地區活動的基礎。

這些特點，在動員長江下游的福利機構向70年代末華北嚴重水災和大饑荒的災民提供救濟中得到感人的說明。在上海和其他三個浙江、江蘇的主要城市，士紳和商人們為外國的例子所激勵，建立了救濟委員會。福利事業機構和公開積極活動的個人，在小城鎮募捐，并把捐款轉送到這些中心。捐款然后送交救濟委員會的代表，由他們在災區分發救濟款。概略的收支清算賬目和救濟活動的報告公布在上海《申報》上。通過這一募捐運動，地方事業機構為國內不同地區進行的自主活動籌集資金，從而對長江下游紳董認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危機作出了回答。組織工作完全在官府結構之外（雖然有密切合作），由名流管理的這些團體，在籌集資金方面比官吏更為有效。最后，報紙在促使公眾注意災情、在通過登載捐款人姓名、為救濟委員會提供專欄等方法以鼓勵捐款方面，都起到關鍵的作用。參加者十分清楚他們活動的自主性質，《申報》把這些活動說成是“民眾捐獻，民眾管理”——這一說法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動。。[[113]](#_113_Jian___Shen_Bao____1878Nian)

這種非政治性的參與公共事務，由于名流們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并認為應當考慮他們的意見，終于助長了他們的政治要求。然而，直到1900年，除了個人接觸和庇護網絡以外，仍然沒有任何機制能把公眾要求傳達給政府。

在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異化和要求更廣泛地參與決策，也在官僚內部蔓延開來，但起源應追溯到18世紀末。嘉慶皇帝雖然設法重新得到乾隆末期因朝政腐敗而感到幻滅的官吏的效忠，但是，19世紀連續不斷的危機一直使人懷疑這個制度的生命力，并導致要求更廣泛的咨詢以謀求問題的解決。這類要求是京城較低級官吏提出的許多建議和批評中原來就有的，未得到重用的官吏苦于無發表政見以影響政策的有效途徑。甚至在19世紀初期仍不可能就政府應如何運轉達成意見一致，而到30年代，愛國主義助長了引起分裂的積極精神，如許多官吏要求終止鴉片貿易，并批評那些不能打敗英國人的領袖人物。[[114]](#_114_Zhan_Mu_Si__Bo_La_Qie_Ke)

效忠皇帝的省的漢族首腦，把清王朝從19世紀中期的叛亂中拯救出來之后，中央統治各省的權力不得不在較少專制的基礎上重建。新的地方軍隊使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17世紀中葉那樣，再次面臨在利害關系的結合中謀求省的高級官員合作的必要性。[[115]](#_115_Guan_Yu_Di_Fang_Jun_Dui__Ji)對外政策的討論在與俄國的伊犁危機、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期間達到高潮，朝廷的虛弱使得對外政策的討論較易突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見的束縛。在這些危機中發表的“清議”，標志著政府內部開始有反對的輿論。不管某些批評多么不公正，某些攻擊多么判斷失當，它們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確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賴，清朝政府不能保衛國家，而解決的辦法在于擴大政治參與，以便上層階級的輿論能夠上達。京城里斗志昂揚的愛國精神就這樣與名流領導的社會動員和制度上的維新觀念結合起來。[[116]](#_116_Guan_Yu_Qing_Yi_De_Zheng_Zh)

促進對立的輿論和更廣泛的政治參與的第三種主要力量，來自居住在條約口岸城市的人們，以及為數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們是最早把西方的方法、觀念和價值觀介紹到中國人士當中的一些人。條約口岸不僅吸引了社會邊際的買辦，也吸引了那些在這些城市中心頗有建樹而與家族和故鄉未切斷聯系的學者和商人。這些人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錢和組織上的推動力，有時還直接領導。他們帶頭對政府專橫的措施提出質問，而外國租界則使他們得以免遭其害。[[117]](#_117_Guan_Yu_Tiao_Yue_Kou_An_De)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條約港口的報紙加速了他們的異化傾向以及國家和名流社會之間的對抗，并且部分地使之明朗化。王韜受到外國報紙的深刻影響，當時在香港開始主編《循環日報》。同樣有重大意義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創辦了第一家日報《申報》。從此以后，報紙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動的消息，并為這種活動提供理論基礎。報紙是介紹外國各種可取辦法的知識源泉，是批評官吏的論壇，也是愛國情緒的有力的催化劑，助長了對清朝官吏的不信任，并通過表達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現的反對力量結合起來。

### 清末的新政與革命

戊戌變法是這種輿論和政治要求增長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戰爭之后紛紛建立以政治為目的的學會和其他社團，這是一個全新的轉折，宣告清代關于公開的公共政策活動的禁令的結束。維新運動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意，特別是戊戌百日維新；當時維新黨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維新運動和聚集在康有為、梁啟超周圍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動。事實上，維新運動傳布更廣，并得到更眾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為例，地方志和報紙的報道說明，有相當大的壓力來自士紳和商界，盡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維新活動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樣，在維新派領袖從地方上流社會頂層出現的一些省份，對于維新并沒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問題不在于維新本身，而在于追求什么樣的維新，以及這個官僚政治的君主國能否接受來自其結構以外的政治上的創新活動。在最極端的維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城和湖南——他們因奮力爭取急速的變革，攻擊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則而與溫和派不和。處于中樞地位的政府，等待溫和派漸漸疑懼，然后拒絕擴大通往政治權力的途徑。盤踞在官府與朝中的重臣過于強大，不動用軍事力量是不能把他們除去的。1898年策劃北京反維新政變的人，不僅保守，而且主要考慮滿族或王朝的統治，關心保持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對社會的專制統治。結果是，他們拒絕了最后的機會，未能在當時的政治結構內協調社會的首創活動。[[118]](#_118_Guan_Yu_Wu_Xu_Bian_Fa__Jian)反維新政變的沖擊波沖擊了名流社會中公開積極活動的那一部分人，加重了他們對朝廷的不信任，與朝廷益發疏遠。起初，不清楚逮捕牽連多廣——名流廣泛從事維新活動的地方，如長江下游，許多人有理由感到不安。進一步的對立，是由任用滿人取代各省漢族高級官吏的政策引起的。此后不久，朝廷支持義和團，支持處決反對義和團的官吏，1900年非理性的種族主義引起的災難性的國際后果，疏遠了范圍更廣泛的名流人士，他們對助長社會動亂的危險非常敏感，并厭惡再次挑起外國入侵的政府。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京城官吏懷著幻滅的心情紛紛辭職還鄉，京外的學者堅信他們不能為清政府服務。排滿在整個19世紀原是潛伏的、躲躲閃閃的態度，如今與反對專制壓迫結合起來成了公開的政治態度。也許第一次公開發表的對滿族統治的攻擊是1900年夏在《申報》上出現的。[[119]](#_119___Yi_He_Tuan____Di_4Juan__D)有些人認為，政府一旦在1901年后開始了新政的進程，只要它能維持控制更久一些，它就能成功。這樣的論點低估了這樣大的國家的變革問題，但卻正確地表明了清政府官辦維新運動的活力與在短短幾年中取得的迅速進展。這種論點的缺點，在于它低估了在官僚政治的國家和名流社會之間出現的政治隔閡。

參與和控制，而不是維新，繼續處于清朝最后10年沖突的核心地位。北京政府把維新與集權和延續官僚控制的目的結合起來，這一做法激起了反對。[[120]](#_120_Guan_Yu_Qing_Zheng_Fu_De_We)一位最堅定地主張維新的總督張之洞，在由誰控制鐵路發展的問題上和名流人士意見相左，盡管兩者共有強國和實現工業現代化的信念。只要領導的名流被賦予他們認為有意義的任務，他們就可能參加政府，或與政府合作；但當官吏再三設法限制外界的積極活動時，他們就拒絕給予支持。

發動辛亥革命的反對派是由與官僚政府的基本沖突形成的。[[121]](#_121_Guan_Yu_Xin_Hai_Ge_Ming__Ji)反對派是從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對政府和社會具有不同觀念的名流社會群體中發展起來的。然而，就自由民主的意義而言，這些群體并不是作為利益集團而發揮作用。中國社會的總體性過強，名流階級內部的差別太不顯著，社會—政治觀念對于急劇地采取西歐的特別是美國的模式的政策來說，是過于強調整體性了。不同的名流階層——不論是老的還是新的——成員繼續由家族、地域或其他紐帶互相聯系在一起。反對派的成員也共同具有一些基本觀點，他們是民族主義的，相信某種程度的民眾動員，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權力以提供范圍更大的社會參政，并且易于感到被清政府官吏所出賣，易于不信任他們。19世紀最后10年的主要政治運動，如1905年的抵制美國貨、省辦鐵路風潮和立憲運動，都廣泛地表現并動員了反對集團的聯合，還牢固地把民族主義的感情同他們爭取代議制政府的要求聯系在一起。[[122]](#_122_Li_Xian_Yun_Dong_De_Zhu_Yao)同盟會和康有為領導的立憲保皇派之間的激烈競爭，在海外的流亡者中發展，但是，他們在東京、東南亞和美國的斗爭，并沒有在國內重演。

在國內，反對派不同成分之間的分歧，沒有反對派全體和中央集權的官僚政府之間的分歧那樣大。他們的作用是互為補充，而不是競爭的。革命黨人提出的共和抉擇終于被接受，認為比有害的、欽定的立憲政體更可取，后者旨在謀求控制，而不是擴大官府外的參政范圍。激進的知識分子提出的前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會基礎上建立強國；他們在必要時的英雄行為，贏得了公眾的同情。他們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個頑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境地。革命黨人打入的一些新軍部隊所提供的軍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會社同盟者所無法提供的。商人與士紳、企業與專業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會支持；沒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19世紀中葉，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鎮壓叛亂以保全他們的地位。在1911年，他們通過支持革命反對他們已經疏遠的政治制度，以保衛他們的利益。商會、教育會和省諮議局都充當了上層社會的動員工具，推動了反對派前進。經濟狀況緊張，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10年的動亂。通貨膨脹、銅錢貶值、田賦附加費、長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濫，尤其是為地方新政籌集經費的各種新征雜稅，促成了反政府的社會動蕩。在有些地方，這些緊張狀況使下層階級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發生沖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傾向的河南農村社會，同盟會竟在土匪的隊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與民團或者與政府支持的士紳領導的鄉村自衛武裝對抗。[[123]](#_123_Bi_Lin_Si_Li____Tu_Fei___Da)1911年，以村為基礎的農民軍，從受市場絲價暴跌和受廣九鐵路通車后洋米進口競爭打擊的地區，會集于廣州，并在這座城市住了幾周。[[124]](#_124_Xie_Wen_Sun____1911Nian_Zhu)城市民眾也在廣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參加了革命。

然而總的說來，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區的經濟增長，因中國卷入世界貿易，從上層而不是下層社會的社會組織中出現的。它不是嚴格的資產階級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確實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的地區，并由這種增長產生和加強的集團領導。它成功地阻止了一個過時的官僚君主國家，將自身轉變成現代專制國家這種早就注定要失敗的努力。它并沒有解決缺少強大軍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眾運動，怎樣得以創建一個新的全國性政府的問題。

### 民國政治的動向

因為中華帝國晚期政體的主要特點，與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特點同樣根深蒂固，20世紀前半期經歷了新與舊、創新與反動之間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搖擺。有現代意識的愛國者希望中國復興，常以早熟的見識探索和討論大量來自國外的當代政治思想。[[125]](#_125_Xian_Qu_Zhe_Zheng_Zhi_Tao_L)然而，盡管他們的思想豐富，范圍寬廣，但是中國政治的主要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漸漸形成的形勢。

首先，自唐代以來，崇尚儒家思想的君主帝國借以統治中國的大量學說上的信條與制度上的慣例，繼續解體。[[126]](#_126_Guan_Yu_Zhong_Guo_Zhuan_Zhi)要把這一切重新予以調整并非易事，因為所有的組成部分都在不斷變動，迅速變化。最后，一致的信仰體系和世界觀，遴選自學成才的官僚的官方考試，專橫而戀棧不去的中央領導地位，對司法、教育、監察和軍事權力的壟斷——所有這些舊中國政權的因素，直到1949年以前都不能充分地再起作用。而1949年以后，不論它們的內容，還是它們的總的結構都完全不同了。

在辛亥革命的四年內，顯然，無論是遵循清末原始自由民主動員的道路，還是中央統制經濟的現代化道路，都不會取得真正的進展。在1912—1913年，當新組成的國民黨在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國會選舉中獲勝時，城市名流參政的趨向仍在繼續。但是，無論國民黨還是它的競爭對手進步黨都不過是“名流聯盟”，即使在受到限制的大約4000萬全部選民中，兩黨的支持者也是少而分散。[[127]](#_127_Zhang_Peng_Yuan____Min_Guo)雖然宋教仁希望他在紳商名流中的追隨者能控制新的中華民國政府，但是，多黨政府也受到孫逸仙這樣的政黨領袖懷疑，以為它會造成分裂。[[128]](#_128_Fu_Li_De_Man____Tui_Xiang_G)1913年，袁世凱鎮壓革命黨人，解散國會和省議會，結束民國初年興旺一時的數千個地方議會，從而結束了中國的議會民主實驗。[[129]](#_129_Ou_Nei_Si_Te__Yang____Jian)袁世凱建立他的獨裁統治，包括恢復考試和加強文官以控制軍人，以及對被擊敗的革命黨人采取檢查、監視和恐怖活動。他成功地鏟除了廣泛參與地方政府的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贏得那些新進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凱的事業因恢復君主政體而招致毀滅，他于1916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權威等同于恢復帝制，這進一步損害了中央權威的信譽。

接著出現軍閥割據，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合理化的中央行政機構的解體（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這種“政治權威總崩潰”。[[130]](#_130_Wang_Geng_Wu_Yu__Yin_Zi_Li)這種趨勢由共和政治的三個方面顯露出來：黷武主義、尋求合法性的思想、政黨獨裁的興起。

軍事勢力在19世紀已開始增長，并改變其性質。19世紀中期，總督個人組織的軍隊開始了這一轉變。但這些軍隊仍然是儒家道德領導原則和部隊對軍官相互忠誠的例子。[[131]](#_131_M_Ba_Si_Di__Bu_Lu_Ji_Ai)然而，在19世紀后半期，軍事勢力的發展漸漸與工業的變化聯結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馬尾船政局的造艦業就是例子——成為自強運動的中心內容。[[132]](#_132_Tuo_Ma_Si__Ken_Ni_Di____Jia)袁世凱在清朝的事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足以說明，到19世紀末，現代軍隊的創建者怎樣能夠成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勢力。

隨著清朝的滅亡，不再有吸收軍事領袖人物的長期穩定的合法政府。袁世凱及其下屬北洋軍的將領——在袁氏死后，他們成了軍閥——面對一支具有新的地位和傾向性的軍隊，處于軍事力量對現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環境中。[[133]](#_133_Si_Di_Fen__Mai_Jin_Nong)首先，引進的現代工業化的戰爭技術，產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訊兵等專門兵種。必要的訓練需要辦軍事學校，軍校學生成為有軍事學識的人，是國家新學生群中的一部分。其次，同別的學生一樣，這些新軍人可能受愛國精神，而不是師生間忠誠的感召。軍人愛國者像黃興、蔣介石出現于他們各自的時代。總之，民族主義使這樣的軍人變得崇高，作為其必需的第一線領導人。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種新的奉獻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順從。新的軍事技術使得軍官團像法規、政黨或銀行家一樣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層次上，從儒家思想灰燼中產生的尚武精神，既改變了國家的結構，也改變了國家的觀念形態。孫逸仙作為大元帥，再度加入廣州的軍閥沖突，而他最終的繼承者實際上就是一個軍閥。[[134]](#_134_Wei_Mu_Ting____Sun_Yi_Xian)從另一意義上說，黷武主義使政府保持統治更加困難。擁有自己軍隊的部屬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實力大致相當的軍閥部隊進行私人戰爭；破壞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僅反對軍閥，而且反對不能控制軍閥的政府。這支新軍從此以后成為國家的結構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非軍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個部分，它也不能單獨打敗對手和重建中央政府。清朝直到它統治的最后幾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認為是合法的。它的繼承者也必須在新的基礎上贏得類似的承認。

主要對日本的侵犯（1915年的二十一條；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1928年的濟南慘案；1931年的東三省“九·一八”事變）作出回答，愛國精神繼續在城市民眾中擴展，思想騷動由于民族主義的感情而加劇了。[[135]](#_135_Jian_Ben_Shu_Di_2Zhang)與此同時，政府權力的分裂也暫時為思想自由與學術自主打開了窗口。于是，在英、美、法三國影響下，中國自由教育經歷的新時期開始了。“科學”是現代化關鍵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學、職業專門化、大學自主等，使國家在現代世界上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學術團體之興起成為可能。[[136]](#_136_Jian_Ben_Shu_Di_8Zhang)同時，知識分子為無數自由主義的、浪漫主義的、新傳統主義的等等學說所吸引；他們組織學會，出版刊物來發表他們的意見。

與這種開明的多元論脆弱的發展平行的——特別是在高等學校——是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思想體系，一種普遍的“關于社會的科學”的傾向。[[137]](#_137___Jian_Qiao_Zhong_Guo_Shi)從一開始，中國革命者就傾向于把俄國看作“全世界革命進步的范例”。人們在中國可以觀察到的許多社會問題所引起的憂慮，因帝國時期的儒家思想遺產連同其對“人治”的信仰而加強了。[[138]](#_138_Jia_Shi_Jie____E_Guo_Yu_Zho)簡單的民族主義的確是不夠的。人們已經不是僅僅抽象地研究理論，因為國際危機和國內危機把名流和城市居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滿足人們復雜的，有時是矛盾的對經濟進步、國家強盛公平原則和代議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動的、獨立的諸多城市集團就不會給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這種形勢的背后，國家權力合法化的神話有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威嚴的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帝王的統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維持社會秩序的適當行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類的有機整體宇宙的中心點發揮作用。禮天生地深深植根于這一有機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統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樣，是由一個超驗的神或法從人類舞臺之外強加的。[[139]](#_139_Zhong_Guo_Ren__Ren_Wei_Shi)中國統治者憑借在國內維持統一，更容易在與國外交往中維護其對其他統治者的絕對優勢。但是在19世紀，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邊緣的擴張，破壞了中國與毗鄰國家的宗主—納貢關系，隨之也毀滅了天子所要求的絕對優勢。[[140]](#_140_Jian_Fei_Zheng_Qing_Bian)清朝在國際上的軟弱，連同西學的流入，破壞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權威性。

在20世紀，它為最高國家權力歸于漢族的民族主義神話所取代。《孟子》“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釋為一種中國形式的民眾主權。這一西方的觀念早有擁護者。梁啟超是它最早的推廣者之一。這一觀念又為孫逸仙所采納，并早在1905年就鄭重地載于三民主義之中。民眾主權的神話表示了政治覺悟的提高、參與和動員，但它很少講到如何把民眾政治聯結到國家的權力結構上去。

政黨是在新的共和制下真正實行民眾主權的工具。政治制度上的大革新是在1912年以后的10年內開始出現的，作為君主制政府的后繼者的政黨專政。一個單一的政黨作為動員、灌輸和控制的工具的出現，意味著作為多元的、代議制度的結黨活動在中國的失敗，也是議會政治的失敗——一種在20世紀發展較遲的工業國家廣泛遇到的現象。

同盟會在1912年擴大，組成一個議會的政黨——國民黨之后，它在多黨政府中發揮的作用因袁世凱的獨裁而夭折。然而，名流政黨是一個社會組織，比小派別更有原則性，比陰謀活動更為公開，這種看法已經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尚未建立起來的是立法和行政兩權分立的理論，而這正是正直的西方式反對派有實效的政治斗爭的先決條件。可是，舊式的對個人的忠誠，繼續產生宗派主義，并且在沒有合法政府的情況下產生分裂。孫逸仙不愿采取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而是加上了考試權和監察權，創立了五權憲法，為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所采用。[[141]](#_141_Bo_Te__E_Bei_De_Si_Ji____Xi)中國的這種五權分立，工作起來并不比西方的三權分立為優。當蔣介石成為國民黨領袖時，他把權力建立在黨、軍隊和政府的三元基礎上，每一系統都由他親任首腦。同樣，法律為滿足商業的需要雖然有所發展，實則仍只是行政的工具，憲法幾乎像美國政黨的黨綱一樣易于更改。

在如此不利于多黨制的情況下，中華民國的政黨沿著兩條交叉的路線發展——一是作為灌輸和控制的手段，一是作為革命動員的工具。孫逸仙早年發展了訓政概念，認為政黨的使命在于動員民眾參與政治，同時指導民眾的政治行為。在這個觀念的背后，存在歷史悠久的孔孟信條，即倫理教導和楷模的力量導致美德和善行。隨著民族主義的興起，維新派與革命派已經一致認為，中國的領導人物必須訓練迄今在政治上缺乏活力的民眾作為公民積極地參與新形式的國家政治。到了1914年，在孫逸仙的觀念中，訓政任務必須由擁有專政權力的政黨來承擔。[[142]](#_142_Fu_Li_De_Man____Tui_Xiang_G)這樣，甚至在列寧主義政黨的專政尚未在俄國實現并移植到中國之前，就已為它的專政準備了條件。

由政黨壟斷灌輸和動員民眾的主張，如果同政府權力結合起來，就具有空前的控制潛力。如果官吏除去通常考慮的利害和忠誠之外，不受任何檢查，那么，現代運輸、通訊和火力的技術與現代灌輸、操縱和控制的技術結合在一起，就開辟了20世紀干涉主義的政府幾乎不受約束地滲透進社會的可能性。在王朝統治下，儒家仁政的神話和實際的技術限制，保持了帝王的威望和國家高壓統制之間的平衡。維持公共秩序和適當的行政，不僅依靠監視與高壓，也依靠廣泛地、持續不斷地灌輸儒家的等級制原則和相互依賴的原則。科舉制意味著思想合適的人向上流動。儒家關于不同等級的義務與責任的說教在鄉村得到了執行，并且滲透到家族體系中。政府靠道德權威的程度，幾乎和靠高壓手段相同。

皇帝的消失也結束了他的道德權威，其后袁世凱與軍閥政府由于缺乏合法性，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軍事實力。在20年代，當國民黨和共產黨按列寧主義的模式組織起來時，兩黨以各不相同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為基礎，都對合法性提出新要求。然而，兩黨不久都不承認對方的道德合法性，并力圖消滅對方。

列寧主義政黨的第二種作用——也是它出現在20世紀中國的原因——是作為革命的一股力量。革命政黨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急切地關心普通老百姓的平等；要求承認科學的威力并為行動提出戰略戰術的世界觀；愛國的和人道主義的社會理想；在規定排他性同志關系的同時，能夠滿足最堅持是非之心的大膽反叛等等。對正在成為中國救星的化身的黨的忠誠，是一條前進之路。[[143]](#_143_Jian_Chen_Zhi_Rang____Dui_M)

然而在民國時期，這些吸引力，是以黨繼續起政治和社會變革工具的作用為基礎的。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是作為革命政黨而建立的。這些共同的起點，再加上他們的民族主義和共同反對軍閥統治的態度，使得他們早期有可能合作。但是，毫無疑問，在兩黨獲得支持的那些名流當中，支持革命的意見并不一致。此外，1923年至1924年期間，國民黨的列寧主義的改組，對原已成堆的地方派系和個人派系——它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同盟會的合并之前——又是一種新的增加。在1927年至1928年間，贊成社會暴力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和要么贊成非暴力變革，要么贊成維持社會現狀的國民黨右派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又增加了舊有的派系活動。這時，集中了大權的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和政治會議，很快為軍事領袖蔣介石所支配。對左派黨員的清洗削弱了信念，而且，由于國民黨變得更像一個維持現狀的黨，孫逸仙的思想只是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口號上，已不能吸引多少知識分子。國民黨雖然有每周小組例會以及上級組織對下級組織的集中制控制，但它一直充滿了嚴重的派系斗爭。

中國共產黨將蘇聯的經驗同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在維護黨的團結方面做得更有成效。當他們被迫在城市轉入地下，被擠到國民黨和軍閥統治薄弱的邊遠農村地區時，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靈活地適應環境。但是，他們更加旗幟鮮明地獻身于原先的革命事業。

本卷的后面幾章，將從不同角度對不同時期中國政府的問題進行評價。總的來講，民國時期的幾屆政府在清政府曾行使權力的不太需要雄心的領域內，不如清政府有效。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官員進行干涉的雄心超出了他們的能力。這樣，當他們不愿和那些本可支持和參與他們政權的城市名流分享權力時，政府官僚們的負擔就增大了，當他們的合法性有賴于統一的中國時，尤其如此。對下述論題，可以大加議論，即國民黨政府聲稱要包攬——至少是潛在的——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所有地區，這就產生了如此巨大的控制問題，以致政府的大部分精力消耗于自我維系之中。這像經濟上“高級平衡閥”的一個對應物，在政體上可以稱為“安全維系綜合征”。國家稅收不得不流向與競爭者作戰。官吏們不可信賴，特別是在下層。[[144]](#_144_Du_A_La_Zhu___Xiang_Cun_She)官僚間彼此監視，注視著永遠可疑的群眾，其程度之嚴重使得變通和革新變得困難重重，特別是在1927年國、共分裂加劇了政治上的緊張關系以后。

在重新鞏固國家權力方面，另一部分困難在于19世紀即已開始的名流階層的積極精神和從事政治活動。面對已經組織起來增進其自身利益，或對國家政策已有自己議程的名流，民國時期自封的法定政府不得不擴大自己的權力。基礎牢固的農村名流、城市商人和專業人員以及知識分子，都給國民政府提供某種支持，但是許多人從來就沒有完全效忠過。[[145]](#_145_Guo_Min_Dang_Yu_She_Hui_Min)對不同政見的壓制，由于疏遠了越來越多的觀望者，恰恰導致了令人擔憂的不信任和反抗。國民黨政府專心致志地擴大和保護他們的權力，仍未能有效地掌管地方事務，也不可能制定一些能擴大群眾參與政府工作的制度。許多暴力和反暴力的循環相互助長；而那些既不寬容政府，又不愿冒險去反對它的人，則退而從事個人的追求或地方事務。

在這一時期，至少有三個政治活動領域。首先，是在一個范圍狹小的圈子里，政府內或政黨內的派系爭奪權力，而外界那些可為這種政權接受的人，則同官員建立聯系，以保護或增進自身的利益。[[146]](#_146_Bu_Shi____Guo_Min_Dang_Zhon)第二，是城市里反對派的政治活動，包括群眾游行示威和其他通過組織活動和報刊表達的異議。有時采取暴力方式的名流人士（和工人運動的某些同盟軍）的動員，逐漸與在城市里的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人士的秘密組織活動融合在一起。第三，是農村中的政治活動，包括這樣一些不同的組成部分，如懷有自治野心的地方軍事首領的爭斗，政府致力于收稅和納稅人盡力逃稅，以及地主對農民非政治性的社會反抗的壓制。[[147]](#_147_Jian_Ben_Shu_Di_6Zhang__Bi)這些政治關系遵循庇護和掮客的模式，當這些運轉機制崩潰時，暴力活動便隨處可見。

共產黨被趕出了由國民黨控制的城市后，在農村推行其革命綱領，并在邊遠的農村根據地同當地的當權者在戰時環境下展開了競爭。[[148]](#_148_Jian_Ben_Shu_Di_12Zhang__Fa)共產黨人還沒有國民黨政府所擔負的種種行政問題的負擔，得以采取各種靈活政策，在他們試圖建立根據地的任何地方，發動群眾傾訴最為緊迫的社會苦難，以推動他們的革命事業。例如，在山東和河北，使農民的不滿政治化的“階級斗爭”，指向“土豪劣紳”和稅吏，農民們認為這些人比地主更暴虐。[[149]](#_149_Su_Shan_Nuo__Pei_Po____Zhon)溫和的再分配政策和給非黨名流以某種政治發言權的范圍很廣的集會，足以促進更廣泛的村民參與共產黨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共產黨給予對社會不滿的人以政治引導，開始從社會基層建立政權。[[150]](#_150_Pei_Yi_Li____Hua_Bei_De_Pan)不過直到1949年以后，充分擴大政府權力的可能性才得以實現。

20世紀的這些變化，再次引出了個人對于國家的關系問題。綜觀整個歷史，中國作家一般只強調個人對統治者、對農民或其他人的責任和義務，很少關心關于人權的任何學說。[[151]](#_151_Jian_Tang_Na_De__J_Mang_Luo)另一方面，正義的概念和對非正義的憂慮，在中國則隨處可見。西方對法治和公民自由權的更加特殊的關注，激勵19世紀的西方人堅持要求治外法權（即駐華使節有權審理在華犯罪的外國人），這是1842年至1943年的不平等條約的中心內容，并且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于是人權——現在正是這樣稱呼的——就成了帝國主義的重要部分。關于在中國新政府框架之內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權的前景，近時仍有不斷的探詢。

在何種程度上將公民個人置于首位，在何種程度上將個人所屬的集體置于首位，一直是以中國和西方價值體系之間的公認的文化差異為基礎的一種選擇。這或許可以看作一個需要強調的關系重大的問題，可是它仍然未超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即中國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種普通人——的作用問題。就這樣的廣義而言，“民主”問題，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國革命日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同類的傾向，即在政治活動中，政府滲透到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中去的傾向，是從晚清繼承下來的。中華民國面臨重建強大國家和擴大民眾參政之間的久而未決的關系問題。[[152]](#_152_Ke_Yi_Ba_Zhe_Ge_Wen_Ti_Kan)這種緊張狀態又因年輕的共和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而加劇了。

[[1]](#_1)我們格外感激瑪麗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邁克爾·加斯特、孔斐力和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意見。

[[2]](#_2)即辛亥革命。——譯者

[[3]](#_3)見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國與達爾文》； 又見《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7章（費俠莉著）。

[[4]](#_4)查默斯·約翰遜：《革命的變革》，第2版，第126頁。

[[5]](#_5)見皮埃爾-艾蒂安·維爾：《18世紀的中國官吏與饑荒》；王國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國的饑荒大敵》，《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43卷第1期（1983年6月），第291—332頁。

[[6]](#_6)即林清、李文成領導的八卦教起義。——譯者

[[7]](#_7)韓書瑞：《中國的太平盛世叛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

[[8]](#_8)見S.M.瓊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劍橋中國史》第10卷，特別是第3章。

[[9]](#_9)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第207—214頁。

[[10]](#_10)見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會變化的潮流》，《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10章。

[[11]](#_11)見韋慕庭：《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年》，《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11章。

[[12]](#_12)見《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2章中的《運輸》一節。

[[13]](#_13)關于這方面文獻的綜合評述，見馬若孟：《中國經濟和社會史中的變革與連續性》，《亞洲研究雜志》第33卷第2期（1974年2月），第265—277頁。19世紀80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解釋傾向，在威廉·T.羅：《述評：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清初經濟史的最近論著》，《清史問題》第4卷第7期（1982年6月），第73—90頁有綜述。又見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居蜜：《地主與農民：16世紀至18世紀》，《現代中國》第6卷第1期（1980年1月），第3—40頁；羅伯特·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海豐縣的社會變遷，1630—1930年》（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8年）第6章；阿里夫·德里克：《中國歷史學家與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觀念：批判研究》，《現代中國》第8卷第1期（1982年1月），第105—132頁。關于中國早期近代經濟和社會方面的中美最近成果的概要，見費維愷編：《宋代至1900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美國代表團在中美學術報告會上的報告》。

[[14]](#_14)全漢昇和理查德·A.克勞斯：《清代中葉的米市場和貿易：物價史論》，第59—65頁；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89—291頁。

[[15]](#_15)斯波義信：《寧波與其腹地》，收入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397—405頁；伊懋可：《集鎮與水道：1480年到1910年的上海縣》，收入同書，第470—471頁。

[[16]](#_16)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13、226、229頁的表表明，太平軍叛亂后，長江下游人口密度比其他任何大區下降得更多，但是，在1843—1893年期間，和城市化較差的區域相比，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卻提高了。華北人口密度在民國時期顯著增加，但到1953年尚未達到長江下游的水平。關于中國的大區，見同書第214—215頁。關于太平天國造成人口減少，見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第236—247頁；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第210—211頁。

[[17]](#_17)關于錢莊，見《上海錢莊史料》；安德里亞·麥克爾德里：《上海老式銀行（錢莊），1800—1935年》；蘇珊·曼·瓊斯：《寧波的金融：“錢莊”，1750—1880年》，收入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關于押當，見斯波義信：《寧波與其腹地》，第405頁。中國習慣法的例子的英譯文，載陳張富美和馬若孟：《習慣法與中國清代的經濟增長》，《清史問題》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頁；第3卷第10期（1978年12月），第4—27頁。

[[18]](#_18)《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收入了中國經濟史學者關于這個問題的最佳近著。

[[19]](#_19)這在最重要的農業技術部門是明顯的，天野元之助的《中國農業史研究》一書中有詳細的研究；例如，關于農具和農械見第697—978頁，關于種稻技術見第389—423頁。

[[20]](#_20)低地國家（尼德蘭）大致包括今日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以及法國北部阿圖瓦地區的一小部分。——譯者

[[21]](#_21)若干正在爭論的問題見維克托·利皮特等：《中國經濟史專題論集》，《現代中國》第9卷第3期（1978年7月）和W.E.威爾莫特：《評〈中國不發達狀態的發展〉》，《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1期（1981年11月），第113—115頁。兩類見解均見于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其中卡爾·里斯金的論文最強烈地提出分配論觀點，而伊懋可、托馬斯·羅斯基及羅伯特·德恩伯格支持技術論觀點。有關問題的討論見于蘇珊·曼·瓊斯：《誤解中國經濟——一篇評論》，《亞洲研究雜志》第40卷第3期（1981年5月），第539—558頁。分配論者一般認為經濟增長受到社會經濟不平等以及分配不當、社會政治結構和外國帝國主義等因素的阻礙，而技術論者強調技術水平、人口和對私人資本投資和積累的障礙。以生產關系立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分析早于這兩派論點，而且已被分配論派歷史學者引用。事實上，兩類論點不必相互排斥，而綜合的解釋把兩者結合起來。

[[22]](#_22)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308頁；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第188頁。

[[23]](#_23)彼得·珀杜：《官方目標與地方利益：明清時期洞庭湖區域的治水》，《亞洲研究雜志》第4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45—747頁。

[[24]](#_24)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第298—318頁；伊懋可：《評論》，載于維克托·利皮特等：《中國經濟史專題論集》，第329—330頁。

[[25]](#_25)卡爾·里斯金：《現代中國的剩余與停滯》，收入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第64—81頁；里斯金：《討論與評論》，載于利皮特等：《中國經濟史專題論集》，第359—375頁。

[[26]](#_26)關于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最佳綜合評述，是琳達·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者關于中國農村社會變化的學術成果》，《現代中國》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第397—438頁；民國時期的研究有卜凱：《中國土地的利用》；陳正謨：《各省農工雇傭習慣及需供狀況》。見本書第5章（馬若孟著）。

[[27]](#_27)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408、412—413頁；陳張富美和邁爾斯：《習慣法與中國清代的經濟增長》，第16—20頁；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76—90頁；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第25—33頁。

[[28]](#_28)關于收租賬房（租棧），見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證研究》，《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第566—599頁；弗蘭克·A.洛耶夫斯基：《蘇州租棧：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問題》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第43—65頁。關于佃租的減免，見洛耶夫斯基著作，第53—55頁；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338、362—363頁；趙岡：《中國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資料——研究筆記》，《亞洲研究雜志》第40卷第4期（1981年8月），第733頁。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后果，見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417—418頁和同時期的新聞報道，如《申報》1878年3月5日第3版。

[[29]](#_29)關于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計數字，見周錫瑞：《數字游戲，革命前中國土地分配的一篇筆記》，《現代中國》第7卷第4期（1981年10月），第387—411頁。

[[30]](#_30)河地重造對這個理論的解釋在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422—424頁有摘要。

[[31]](#_31)關于方氏、葉氏及李氏家族，見《鎮海縣志》第26卷，第31—32頁；第27卷，第12—13、40—41頁；《上海錢莊史料》，第730—734、743—744頁；蘇珊·曼·瓊斯：《上海的寧波幫與金融勢力》，載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84—85頁；根岸佶：《上海之行會》，第142—146頁。關于胡光墉，見羅伯特·恩格：《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廣州和上海的絲綢業，1861—1932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8年），第112頁。關于秦祖澤，見根岸佶：《上海之行會》，第118—119頁。

[[32]](#_32)葉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的投資是分散經營的例證。關于絲織業，見莉蓮·李：《中國絲綢貿易：現代世界中的傳統工業，1842—1937年》，第61頁。關于在外地經商，見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流動戰略》，載卡羅爾·史密斯編：《區域分析》第一卷《經濟制度》，第343—348頁。

[[33]](#_33)王業鍵：《中華帝國的田賦，1750—1911年》，第128頁；第6章各處。田賦負擔波動很大，在19世紀中期，負擔較重；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隨著通貨膨脹負擔不斷減輕。

[[34]](#_34)維爾：《18世紀的中國官吏與饑荒》，第97—100頁；莉蓮·李：《糧食、饑荒與中國政府——專題論集》的《導言》，《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694—699頁。

[[35]](#_35)托馬斯·羅斯基：《中華民國經濟概論》；托馬斯·墨子刻：《論中國經濟現代化地歷史根源：明末清初經濟與行政日益分化》，載侯繼明和于宗先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第3—14頁。

[[36]](#_36)墨子刻：《清政府在商業方面的組織能力：兩淮鹽專賣，1740—1840年》，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23—27頁。

[[37]](#_37)韋慶遠和吳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興衰》，《歷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27—144頁。

[[38]](#_38)陳錦江：《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8章；汪熙：《論晚清的官督商辦》，《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95—124頁。有學者對清政府所起的經濟作用作出積極得多的評價，見馬若孟：《中國經濟：過去和現在》。

[[39]](#_39)關于這類觀點，見羅伯特·德恩伯格：《外國人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載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第19—48頁。

[[40]](#_40)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1840—1925年》是這類觀點的許多實例之一。

[[41]](#_41)關于不發達的一般理論，見C.K.威爾伯編：《發達和不發達政治經濟學》。一種廣義的理論出自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統治世界經濟體系概念（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農業與16世紀歐洲世界經濟的根源》及后來發表的專著）。關于如何把這個理論應用于中國的簡短意見，見小安格斯·麥克唐納：《沃勒斯坦的世界經濟：我們應如何認真看待它？》，《亞洲研究雜志》第38卷第3期（1979年5月），第535—540頁。有顯著的跡象表明16世紀以來世界對中國經濟各部門的影響 [例如，威廉·阿特韋爾：《關于銀兩，對外貿易及晚明經濟的筆記》，《清史問題》第3卷第8期（1977年12月），第1—33頁]，但至今詳細研究專著不多。

[[42]](#_42)謝爾曼·科克倫：《在中國大買賣：卷煙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年》，第202—220頁。拉爾夫·威廉，許內曼：《龍和鐵馬：1876—1937年的中國鐵路經濟》系統地研究鐵路的經濟影響問題。

[[43]](#_43)劉翠溶：《韓江沿岸貿易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1800—1911年》；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205—226頁。

[[44]](#_44)趙岡：《中國棉織品生產的發展》，第174—186頁；布魯斯·雷諾茲：《緯紗：中國手紡紗的技術禁區》，《清史問題》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4—13頁。

[[45]](#_45)趙岡：《中國棉織品生產的發展》，第82、87—88頁；陳明銶：《勞工與帝國：1895—1927年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勞工運動》（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5年），第11—12、367頁。

[[46]](#_46)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231—241頁。見本書第6章（比昂科著）。

[[47]](#_47)趙岡：《中國棉織品生產的發展》，第188—189、192—201頁。

[[48]](#_48)琳達·格羅夫：《創建北方蘇維埃》，《現代中國》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59頁；馬若孟：《中國經濟》，參閱由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導致失業、暴力和經濟危機的市場波動。

[[49]](#_49)關于絲綢貿易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莉蓮·李：《中國絲綢貿易》。又見羅伯特·恩格：《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和孫任以都：《清代的養蠶業和絲綢生產》，載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79—108頁。關于絲綢生產的相對擴大，見戴維·富爾：《江蘇省的農村經濟，1870—1911年》，《中國研究所集刊》（香港中文大學）第9卷第2期（1978年），第380—426頁。

[[50]](#_50)黃宗智：《華北農民經濟與社會變遷》是一部研究占優勢的小農經濟變化的主要專著。

[[51]](#_51)約翰·K.張：《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第70—103頁。又見費維愷：《論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危機》，載蔡尚思編：《論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第129—133頁。

[[52]](#_52)蘇珊·曼·瓊斯：《誤解中國經濟》一文巧妙地引證文獻評論了一些這類問題。關于蘇聯學者所持的國民黨的經濟政策是經濟成就和政治失敗的結合的修正主義觀點，見A.V.梅利克謝托夫：《中國國民黨的社會經濟政策，1927—1949年》。國民黨政權與上海商界的關系在約瑟夫·富史密斯：《中華民國的政黨、國家和地方名流》一書中有研究。

[[53]](#_53)阿瑟·沃爾夫：《神、鬼和祖先》，載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第133—145頁。斯特萬·哈勒爾：《犁頭鄉村：臺灣文化與環境》第9—15頁討論一般文化原則、表現這類原則的習慣行為的變異和這類行為發生時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諸如階級、地理和科學技術之類因素）三者的交互影響。又見莫里斯·弗里曼：《關于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研究》，載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第19—42頁。

[[54]](#_54)詹姆斯·沃森：《中國親屬關系再探討：歷史研究的人類學觀點》，《中國季刊》第92期（1982年12月），第589—627頁，全面研究了關于宗族的文獻，界定了“宗族”一詞。又見杰克·波特：《傳統中國的土地和宗族》，載莫里斯·弗里曼編：《中國社會的家庭與親屬關系》。關于華北鄉村中的其他牢固的親屬關系紐帶，見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60、75—78、80頁；關于河北和山東的宗族史料，見普拉森吉特·杜阿拉：《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華北農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3年）第2章。關于紹興宗族，見寇爾：《紹興：清代社會史研究》（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5年）第3章。

[[55]](#_55)魯比·沃森：《華南的階級差別與姻親關系》，《人》第16卷第4期（1981年12月），第593—615頁。

[[56]](#_56)關于“道德經濟”，見后本章《農村組織與農民運動》第6條腳注。

[[57]](#_57)關于廣東：哈里·拉姆利：《械斗：中國東南部的暴力病態》，《清史問題》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40頁；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135—151頁。關于華北平原，見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59—94頁。對于民國時期土匪為患和軍閥割據的社會影響的解釋，見菲利普·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華民國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層下》，《現代中國》第7卷第3期（1981 年7月），第235—288頁；R.G.蒂德曼：《盜匪活動的持續：華北平原邊緣區的事件》，《現代中國》第8卷第4期，第395—433頁。

[[58]](#_58)對這個多山社會的分析，見斯蒂芬·艾夫里爾：《棚民與長江多山地帶的開拓》，《現代中國》第9卷第1期（1983年1月），第84—126頁。

[[59]](#_59)詹姆斯·謝里登：《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6章。關于軍閥政治的發展，見本章。

[[60]](#_60)青鎮舊時屬桐鄉縣，隔河為吳興縣的烏鎮；二鎮今合稱烏鎮，屬桐鄉縣。——譯者

[[61]](#_61)出外謀生的一般理論載史堅雅《中華帝國的晚期流動戰略》一書。關于青鎮鐵匠見瑪麗·蘭金《城鄉連續性：浙江兩個集鎮的望族》一文，載《清史問題》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67—104頁。關于杭州錫箔匠見《申報》1874年9月17日第3版。關于作為季節性出外謀生手段的搶劫活動，見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55、60—70頁；又見寇爾：《紹興》，第167頁。詹姆斯·李：《中國西南部的糧食供應與人口增長，1250—1850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11—746頁，分析了不斷向云南移民對城市化和農業的影響。

[[62]](#_62)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貿易報告》，1882年，第270頁；1900年，第374頁；1910年，第525頁。

[[63]](#_63)關于廣東，見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338頁。關于長江下游，見布雷德利·蓋澤特：《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弗吉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9年），第94—95、101、189—193、213—215頁。關于浙江農村改革，見諾埃爾·邁因納：《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關于除戰時非正常狀況下的農民生活水平沒有下降的看法，見馬若孟：《中國的農民經濟：1890—1949年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第292—295頁和各處；又見本書第5章（邁爾斯著）。

[[64]](#_64)關于名流融合的一般情況，見巴斯蒂-布律吉埃：《社會變化的潮流》，莉蓮·李：《中國絲綢貿易》第106頁引用了（浙江）石門地方志的評論。商紳融合的情況反復被提出，如，肖邦齊：《四川地方名流的構成和作用》，《清史問題》第2卷第10期（1973年第10期），第11頁和各處；蘭金：《城鄉連續性》，第83—84頁。路康樂：《中國的共和革命：廣東個案，1895—1913年》，第82、93、174頁強調了繼續存在的差異。

[[65]](#_65)見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

[[66]](#_66)關于這種傾向的更多論述，見本書第7章《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67]](#_67)本杰明·埃爾曼：《新儒學闡釋：中華帝國晚期長江下游的學術界》（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0年），第166—261頁；埃爾曼：《從哲學到語言學：中華帝國晚期的思想和社會方面的變化》。

[[68]](#_68)肯尼思·福爾松：《幕友、幕賓和幕僚》；寇爾：《紹興派系：清代末葉的一個垂直行政派系》，《現代中國》第6卷第3期（1980年7月），第317—326頁。

[[69]](#_69)見艾愷：《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頁。

[[70]](#_70)了解晚清和民國婦女狀況的最佳起點是馬杰里·沃爾夫和羅克珊·威特克編：《中國社會的婦女》。關于中國婦女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見羅克珊·威特克：《現代中國五四時期對婦女態度的轉變》（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學位論文，1970年）。關于女子在地方事務和家庭事務中發揮作用的事例，見寇爾：《紹興》，第94—96頁。關于女暴徒的事例見羅克珊·普拉茲尼阿克：《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議：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稅與縣鄉政治》（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1年），第127—131、142—149頁。關于女海盜見迪安·默里：《清代中葉的海上搶劫：組織特點的分析》，《清史問題》第4卷第8期（1982年12月），第7頁。又見《劍橋中國史》第10、11和12卷索引中的“婦女”條目。

[[71]](#_71)中國青年背叛家庭制度，文學作品中提到的比學術專著要多。見李歐梵：《浪漫主義與個性解放》，《劍橋中國史》第12卷。

[[72]](#_72)韓書瑞：《山東叛亂：1774年的王倫起義》，第161頁指出了這種共同價值框架內的競爭方面。

[[73]](#_73)18世紀末19世紀初教派叛亂一覽表載于韓書瑞：《山東叛亂》第154—157頁。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96—152頁指出了清代末期和民國時期，教派是如何在華北變得與地方社會結構結合起來的，而以前教派徒眾都是作為個人而被吸收。韓書瑞：《叛亂之間的關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網》，《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40—349頁。

[[74]](#_74)關于哥老會，見查爾頓·劉易斯：《關于晚清哥老會的筆記》，載讓·謝諾編：《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關于19世紀末葉浙江的會社，見瑪麗·蘭金：《早期的中國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1902—1911年》，第128—139頁；又見王思治：《宗族制度淺論》，《清史論叢》第4集，第152—178頁。

[[75]](#_75)關于這方面著作的綜合評述，見魏菲德：《造反與革命：中國歷史中的民眾運動研究》，《亞洲研究雜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238頁。周錫瑞：《農民造反專題論集：若干介紹性評論》，《現代中國》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說明了造反的若干主要方面。

[[76]](#_76)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學的兩種主要書目研究專著是詹姆斯·哈里森：《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重寫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劉廣京：《世界觀與農民造反：對毛澤東以后的編史學的看法》，《亞洲研究雜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295—306頁。拉爾夫·撒克斯頓：《中國揭示正確面：農民社會中的革命合法性》（第1、8章）提出的關于有階級意識的革命農民的對立文化的理論需要證實。晚清動亂、糧價和銅元貶值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可信史料發表在戴維·富爾：《中國江蘇省的地方政治動亂，1870—1911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6年），第270—392頁。關于這整個問題，見本書第6章（比昂科著）。

[[77]](#_77)社會盜匪活動概念來源于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原始的造反者》。雖然有人持所有盜匪并無社會意識，而且很多同有權勢者而不是同窮人聯合的理由而予以批判[安東·布洛克：《農民與土匪：社會盜匪活動再研究》，《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第14卷第4期（1972年9月），第495—504頁]，但是，霍布斯鮑姆關于一定區域的、特定的、受到道德灌輸的農村抗議行為的概述似乎是站得住的。“道德經濟”一詞來源于E.P.湯普森：《18世紀英國民眾的道德經濟》，《過去與現在》第50期（1971年2月），第76—136頁。埃里克·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和詹姆斯·斯科特：《農民的道德經濟》把這個概念應用于拉丁美洲和印度支那的農民社會，注意到農民渴望重新獲得在封閉的鄉村被資本主義市場力量侵入時失去的社會安全和社會內聚力，村民和共產黨革命者這時有了聯合的基礎。塞繆爾·波普金：《有理性的農民：越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認為權力和利益而不是道德，決定農村中的各種關系。斯科特和沃爾夫的理論不能直接應用于中國，在中國，鄉村已經農業化，國際資本主義的直接影響受到地區因素限制，而且傳統的農村社會有時是分裂的和相互競爭的。然而，關于正義標準和抗議侵害的一般概念可以應用于中國。《亞洲社會中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志》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868頁，提出了若干問題。

[[78]](#_78)關于白狼的解釋，見愛德華·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華革命黨》，第124—125頁，第6章和裴宜理：《社會盜匪活動再探：中國土匪白朗個案》，《現代中國》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第355—382頁。

[[79]](#_79)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186頁分析和引用《香港電訊報》1907 年9月14日報道。關于糧食風潮的簡略論述，見王國斌：《清代糧食風潮》，《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第767—788頁。

[[80]](#_80)詹姆斯·波拉切克：《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

[[81]](#_81)歐大年：《民間佛教：傳統中國晚期的反政府教派》第5、7章；韓書瑞：《中國的太平盛世叛亂》，第9—31頁。

[[82]](#_82)關于為人祈求長壽的和平教派，見戴維·凱利：《寺廟和貢舶：18世紀羅漢教派與疍民結社》，《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61—391頁和理查德·石：《沒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說：華北的黃天道》，《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305—337頁。肯尼思·利伯索爾：《天津的革命與傳統，1949—1952年》，第14—15頁提到1950年天津的許多和平教派。

[[83]](#_83)歐大年：《抉擇：中國社會中的民間教派》，《現代中國》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59—161、167—168頁；斯特萬·哈勒爾和裴宜理：《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導論》，《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288—293頁。關于太平天國基督教的太平盛世方面，見孔斐力：《太平天國幻想的溯源：中國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第19卷第3期（1977年7月），第350—366頁；魯道夫·瓦格納：《重新制定天國的美景》。

[[84]](#_84)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3章。

[[85]](#_85)孔斐力：《太平軍叛亂》，《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6章。

[[86]](#_86)寇爾：《民眾對太平軍：包立生的東安義軍》，第7—21頁。

[[87]](#_87)這種說法依據周錫瑞：《論義和拳運動的社會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第22—31頁。

[[88]](#_88)謝文孫：《中國農村的行會資本主義：珠江三角洲鄉村企業家創業的傳統，1875—1925年》（1982年11月在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討論會上提出的論文），第1—4頁。

[[89]](#_89)艾琳·托伊伯：《日本、臺灣和中國東北的移民和城市》，載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374頁；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清代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第78頁。

[[90]](#_90)關于上海紡織女工的情況，來自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紗廠女工，1912—1949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2年）；關于天津鐵匠的情況，來自蓋爾·赫沙特：《飛錘走鑿：三條石工人》，《現代中國》第9卷第4期（1983年10月），第387—420頁；關于合同工制度，見霍尼格：《包身工制度與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紗廠》，《現代中國》第9卷第4期（1983年10月），第421—454頁。

[[91]](#_91)城鄉勞力交換諸方面的論述，見蘭德爾·斯特羅斯：《困難的工作：中國江蘇西部農業的政治經濟，1911—1937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2年），第44—50頁有論述。

[[92]](#_92)戴維·斯特蘭德和理查德·韋納：《20年代北京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言論：1929年10月22日電車風潮的分析》，《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第137—180頁。

[[93]](#_93)陳明銶：《勞工與帝國》，第140—141、150頁提出的一些論點，與霍尼格關于上海所提的和赫沙特關于天津所提的論點相似。

[[94]](#_94)陳明銶：《勞工與帝國》，第163—166、208—228頁和各處；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1923年》，第109—112頁。

[[95]](#_95)關于上海，見讓·謝諾：《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關于湖南勞工動態的稍微對立的看法，見小安格斯·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142—206、241—250頁；謝弗：《毛澤東與工人》。謝諾著作（第407—412頁）認為勞工運動是20世紀20年代主要的革命力量。關于這方面更多的書目，見陳明銶：《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編纂學，1895—1949年》。

[[96]](#_96)19世紀王朝衰亡的循環理論，或以朝廷失控及由此而引起腐敗和混亂立論，或以伴隨地方軍隊興起而來的權力分散立論，見于梅谷：《19世紀中國的地方主義》（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鴻章和淮軍》一書和序言）和蕭公權：《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第501—518頁。以傳統的分裂和近代的再統一立論而對20世紀中國政治所作的解釋，見于詹姆斯·謝里登：《分裂的中國：中國史的民國時代，1912—1949年》第1章。易勞逸提出了從政治文化理論引出的類似的框架，見《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第ⅶ—ⅹⅳ、283—313頁（又見本書第3章）。19世紀名流侵犯地方政府權力和20世紀政府竭力把行政控制伸到村級的關系密切的理論，見孔斐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和本書第7章。

[[97]](#_97)見巴林頓·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根源：現代世界發展因素中的土地和農民》；孔斐力和蘇珊·曼·瓊斯在《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第ⅹⅳ頁上的《導論》，論述了“中央政府官僚（國家）和地方政制（社會）的關系”。

[[98]](#_98)希拉里·貝蒂：代替反抗的抉擇：安徽桐城個案》，載史景遷和小約翰·E.威爾斯編：《從明到清：17世紀中國的征服、區域和延續性》，第242—243、256頁；李成珪：《順治朝的山東：地方控制的建立與士紳的反應》，《清史問題》第4卷第4期（1980年12月），第19—27頁，第4卷第5期（1981年6月），第13—23頁。

[[99]](#_99)見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2章，及格羅夫和周錫瑞編：《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412頁所述河地重造的理論。其他作者從不同方面強調農民造反或很少注意國家、士紳和農民三者利益的平衡。見格羅夫和周錫瑞書中（第404—412頁）關于土地所有和田賦改革的其他引文。

[[100]](#_100)費正清和鄧嗣禹：《清代行政：三項研究》，第23—28、44—48頁；史景遷：《曹寅與康熙皇帝：奴才與主子》第6章；吳秀良：《中國的下情上達和朝廷控制：上奏制度的演進，1693—1735年》。

[[101]](#_101)馬德琳·澤林：《豁耗歸公：18世紀中國實行財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9年），第90—132、348—467頁。

[[102]](#_102)張仲禮：《中國紳士》，第110頁；瞿同祖：《中國清代地方政府》，第39、59—60頁。

[[103]](#_103)王業鍵：《中華帝國的田賦，1750—1911年》，第80、131頁。

[[104]](#_104)白彬菊：《朱筆：清代中葉的軍機處上奏制度與中央政府決策》（耶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0年），第296—308頁。

[[105]](#_105)伊懋可：《集鎮與水道》，第457頁。

[[106]](#_106)同上書，第462—463、472頁；斯波義信：《寧波與其腹地》，第442頁。

[[107]](#_107)關于鎮壓風潮的一個事例，見威廉·T.羅：《晚清一城市的造反及其敵人：1883年漢口密謀》，《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4集（1979年），第71—111頁。更概括的著作見威廉·T.羅：《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年》。

[[108]](#_108)關于太平天國時期，見孔斐力：《太平軍叛亂》。關于第二和第三階段，見瑪麗·蘭金：《中國名流的積極精神和政治變革：浙江省，1865—1911年》。關于在長江中游的類似過程，見羅：《漢口》。

[[109]](#_109)埃德溫·O.賴肖爾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第311—313頁。關于強調士紳破壞性的和謀私的行為的地方官紳關系的資料，見蕭公權：《農業中國》。士紳的地方政治一社會作用的構成因素的概要，載魏菲德：《中華帝國的衰亡》。關于中國學者對地方控制和自治問題的見解，見孔斐力：《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載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257—298頁。

[[110]](#_110)富爾：《中國江蘇省的地方政治動亂》第7章，第251—259頁；羅伯特·韋斯：《太平軍造反前夕地方政府的靈活性》，《清史問題》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第17頁。

[[111]](#_111)關于這個過程，見蘭金：《中國名流的積極精神和政治變革》第2、6章。關于丁日昌，見喬納森·奧科：《中國地方官僚政治改革：丁日昌在中興時期的江蘇，1867—1870年》，第143—144頁。奧科提到同治中興時期名流改良主義和官僚改良主義在地方層次上的競爭。士紳干預征稅和在征稅上的斗爭，見詹姆斯·波拉切克：《士紳霸權：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載魏菲德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244—245頁；宗源瀚：《頤情館聞過錄》第3卷，第6—11頁；《桐鄉縣志》第6章。

[[112]](#_112)例如，《南潯志》第21卷，第10—11、18—20、22頁；第34卷，第2、4、8、10頁和第21、24章各處；《桐鄉縣志》第4卷：《書院》，第1頁；《山塘》，第1—2、5、13頁；《烏青鎮志》第29卷，第25—25頁；經元善：《居易初集》第2卷，第41—42、48—63頁；第3卷，第66—69頁和《上虞縣志》第35卷，第18頁。

[[113]](#_113)見《申報》1878年6月8日第4版；1878年7月20日第1版；1878年12月4日第3版；1879年2月21日第3版；1879年8月10日第3版；1879年8月14 H第3版。

[[114]](#_114)詹姆斯·波拉切克：《內部的鴉片戰爭》第2章。

[[115]](#_115)關于地方軍隊，見劉廣京：《對中興的透視》，《劍橋中國史》（英文版）第10卷，第477—490頁；劉廣京和R.J.史密斯：《太平軍戰爭以后時期的清朝軍隊》，《劍橋中國史》（英文版）第11卷，第202—211頁。

[[116]](#_116)關于清議的政治意義，見瑪麗·蘭金：《“輿論”和政治勢力：19世紀末葉中國的清議》，《亞洲研究雜志》第51卷第3期（1982年5月），第463—477頁。清議對決策的影響，見易勞逸：《清議與19世紀中國政策的形成》，《亞洲研究雜志》第24卷第4期（1965年8月），第609—611頁。

[[117]](#_117)關于條約口岸的設立和與此有關系的人，見費正清：《中國沿海通商與外交：開放通商口岸，1842—1854年》，各處，第394—398頁；柯文：《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及晚清中國的改革》；又蔡榮芳（音）：《買辦思想家的處境：何啟（1859—1914年）和胡禮垣（1847—1916年）》，《現代中國》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第191—225頁。

[[118]](#_118)關于戊戌變法，見張灝：《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5章；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這種解釋采自蘭金：《“輿論”和政治勢力》，第470—472頁。

[[119]](#_119)《義和團》第4卷，第171—172頁。

[[120]](#_120)關于清政府的維新方案，見市古宙三：《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7章。

[[121]](#_121)關于辛亥革命，見M.加斯特：《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9章。

[[122]](#_122)立憲運動的主要著作是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和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又見張朋園：《省諮議局：1909—1914年政治參與的出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第273—299頁。對清代最后10年名流作用的解釋，有周錫瑞關于“城市維新派名流”的理論（周錫瑞：《中國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3章）和芬徹關于自治和民主的重大運動的敘述，這一運動是通過省諮議局表現出來的，以舊的社會經濟變革為基礎而由清政府的維新措施引發（約翰·芬徹：《中國的民主：地方、省和國家政治中的自治運動，1905—1914年》）。關于在國家、省、縣級擴大政治權力，為官員和名流提供擴大政治作用的余地，麥金農提出了不那么具有競爭性的描述（斯蒂芬·麥金農：《中華帝國末年的權力和政治》，第10—11頁，結束語）；而市古宙三認為士紳以保守方式適應政府或革命者提出的動議，只是維持自己的權力（市古宙三：《士紳的作用：一種假說》，載芮瑪麗編：《革命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308頁）。作為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的名流團體在浙江內核地區激增的現象，在肖邦齊：《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20世紀初期的浙江省》，第59—74頁有詳細論述。關于中國對地方政府一般看法的基本歷史觀點，見孔斐力：《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載魏菲德和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和控制》，第257—298頁；又孔斐力：《中華帝國晚期關于政體的種種見解》，《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4集（1979—1980），第1—18頁。

[[123]](#_123)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及光棍》，第261頁。

[[124]](#_124)謝文孫：《1911年珠江三角洲的農民暴動和市場等級制度》，載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138—141頁。

[[125]](#_125)先驅者政治討論的廣度和多樣性，羅伯特·斯卡拉皮諾和喬治·于：《近代中國及其革命過程》第1卷《對傳統秩序的反復挑戰，1850—1920年》中有論述。

[[126]](#_126)關于中國專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學者—官僚統治社會）的分析，見白樂日：《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個主題的種種變奏》，第6頁；也見芮沃壽的序。關于晚清，基本專著是蕭公權：《農業中國》；又見何炳棣：《中國遺產的顯著方面》，載何炳棣和鄒讜編：《中國的遺產與共產黨的政治制度》，第1—37頁，特別是第15—25頁。關于長期展望，見顧立雅：《中國國家管理的起源》第1卷，《西周》。

[[127]](#_127)張朋園：《民國初期的政治參與及政界名流：1913—1914年國會》，《亞洲研究雜志》第37卷第2期（1978年2月），第293—313頁；見第301頁。代議機關增多的趨向受到芬徹更抱希望的評價，見所著《中國的民主》。為免“地方自治”被錯誤地以為是市鎮會議式的平民代表制，我們應記住，地方自治毋寧說是把地方士紳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職能正式移交給他們，見孔斐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216—219頁。

[[128]](#_128)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2章，關于1912年末“建立包羅一切的單一政黨的種種嘗試”（第30頁）。

[[129]](#_129)歐內斯特·揚：《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4章。

[[130]](#_130)王賡武語，引自李友華：《軍閥研究》，《現代中國》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第439—470頁，見第448頁。

[[131]](#_131)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軍》，《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10章。比較孔斐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47—148、183—185頁。

[[132]](#_132)托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年中國軍械工業的現代化》。關于炮艦作為發展手段的論題在赫德長期協辦清帝國海軍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說明。見費正清、K.F.布魯納和E.M.馬西森編：《總稅務司在北京：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致金登干書簡，1868—1907年》，各處。

[[133]](#_133)斯蒂芬·麥金農：《北洋軍、袁世凱和中國現代軍閥政治的起源》，《亞洲研究雜志》第32期（1972年5月），第405—423頁；又麥金農：《中華帝國末年的權力和政治》；埃德蒙·S.K.馮：《中國革命的軍事方面：新軍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愛德華· A.麥科德：《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閥研究的最近進展》，《中華民國史》第9卷第2期（1984年2月），第40—47頁。

[[134]](#_134)韋慕庭：《孫逸仙：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135]](#_135)見本書第2章。

[[136]](#_136)見本書第8章。

[[137]](#_137)《劍橋中國史》（英文版）第12卷，第446—450頁（史華慈著）、505—514頁（陳志讓著）。

[[138]](#_138)賈士杰：《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狄百瑞提出“人權政治”（與神權政治相對）概念，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第131頁。

[[139]](#_139)中國人“認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點是沒有外在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終極原因或意志”。牟復禮：《中國的思想基礎》，第18頁。天命，“清帝國的基礎”（顧立雅：《中國國家管理的起源》，第93頁），必須被看作是在這個自然的內在的框架內起作用；孔斐力也在《晚清關于政體的種種見解》，第5—9頁同歐洲人的看法對比，討論這個問題。

[[140]](#_140)見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41]](#_141)伯特·E.貝德斯基：《現代中國的建國：戰前時期的國民黨》，又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

[[142]](#_142)弗里德曼：《退向革命》，又喬治·T.于：《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國民黨，1912—1924年》。

[[143]](#_143)見陳志讓：《對馬克思主義的皈依》，《劍橋中國史》第12卷。

[[144]](#_144)杜阿拉著《鄉村社會中的權力》，第327—336頁認為，雖然官僚機構在河北省下伸到了區一級，但是，區以下的官員仍沒有被上級有效地控制。蓋澤特著《權力與社會》，第260—261頁斷定，在江蘇，南京政府的官僚機構是添加在既有的名流控制的結構之上，而沒有清除地方名流的權力。

[[145]](#_145)國民黨與社會名流關系的理論分為三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各種各樣當代作家，稱國民黨為城市資產階級和鄉村地主的政黨（例如，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第31、182頁）。其他作家著重指出蔣介石個人獨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23、132、137頁）；或提出南京政府是獨裁政權，追求其自身利益而不顧任何社會階級愿望（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240、286頁）；或把南京政府的特點描述為軍事獨裁政權，靠控制、鎮壓和在弱小社會力量間進行仲裁來實行統治（小帕克斯·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第341—342頁）。一些史學家認為國民黨和名流兩者都不是統一的，他們提出了更為復雜的實況。國民黨和政府的成員以及許許多多城鄉名流，通過復雜而狡詐的政治相互作用謀求增進他們的權力和利益。因此，國民黨政權是獨裁政權之前的獨裁政權，因為它在軍事上和財政上太過分擴張，以至于不能有效地控制社會團體。見布雷德利·蓋澤特：《走向國民黨統治的多元模式》，《中華民國史研究通訊》第7卷第2期（1982年2月），第1—10頁；蓋澤特：《權力與社會》，第1—10頁和各處；理查德·布什：《國民黨中國的工業與政治：國民黨政權與長江下游中國紡織廠主，1927—1937年》，第18—24、307—308、332—334頁。

[[146]](#_146)布什：《國民黨中國的工業與政治》，第308—313頁。

[[147]](#_147)見本書第6章（比昂科著）。

[[148]](#_148)見本書第12章（范斯萊克著）和第13章（佩珀著）。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撰寫共產黨根據地的詳細歷史研究專著，提供了關于共產黨的組織工作、與地方實權派的關系和對農民自發要求的領導等方面的情況。見戴維·保爾森：《領導和自發：最近的研究共產黨根據地的方法》，《中華民國史研究通訊》第7卷第1期（1981年10月），第13—18頁。主要根據地的研究專著有：斯蒂芬·艾夫里爾：《多山地帶的革命：江西省共產黨運動的興起》；凱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晉察冀邊區的改革、抗戰和革命，1937—1945年》；戴維·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山東根據地，1937—1945年》；琳達·格羅夫：《革命中的農村社會：高陽地方，1910—1947年》。陳永發：《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華東和華中的共產黨運動》是研究共產黨戰略的內容最充實的專著。

[[149]](#_149)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第282、286—289頁；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243頁和第3章各處。

[[150]](#_150)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6—7章，把共產黨的社會政治改組同并不重新整頓地方社會的造反暴力行動進行了對比。關于共產黨根據地政策的表征方面、抗戰時期根據地國共重新合作的共同一致和共產黨政府在建立國家權力和控制方面的潛力，見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351—353、412—414、541、795—803頁。

[[151]](#_151)見唐納德·J.芒羅：《中國古代的人的概念》和《中國現代的人的概念》。

[[152]](#_152)可以把這個問題看作現代化過程的一部分。于是，物質技術——道路、無線電、飛機、槍炮和圖書——的發展，使最偏遠的鄉村也受到中國政府的影響。而非物質的信仰、習慣和價值觀又往往決定國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間、官方獨裁政治和非官方積極行動精神之間以及獨裁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間的平衡。即使這些包括于現代化這一名目下的過程正在明確地發生，但是，我們發現這個概念不足以評估和區別各種各樣的結果。關于這個概念起促進思想作用的應用，見吉爾伯特·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又見蘇珊曼：《評G.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146—153頁。

#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國的國際關系

近代中國的命運曾經與列強的外交政策糾纏在一起，特別是日本。雖然今天的歷史學家可以回避有關中國的戰爭和條約的詳細編年史（像H.B.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那樣），但追溯中國歷史的這個方面正變得更加重要起來。如芮瑪麗在《革命中的中國》中所指出的那樣，外國人的存在及其在中國土地上的各種活動，畢竟提供了20世紀中國政治賴以展開的部分背景。此外，不只是本叢書第12卷所描述的沿海和“外國的存在”，還有列強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影響了中華民國內部的發展。所以，本章和下面的第10章旨在探索20世紀中國歷史外部關系的來龍去脈，這自然要從舊秩序的崩潰開始。[[1]](#_1_Ben_Zhang_Zhu_Zhe_Fei_Chang_G)

## 溯源：作為東亞地區秩序的清帝國的衰落和滅亡

清代的皇帝在維護其中央政權方面曾經很有成效，這個政權統治著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這樣一些邊緣地帶，以及漢人密集的中心地區。軍事力量、封建制度、宗教和商業都曾為清帝國的政治服務，混合使用，因地區和民族而異。在所有這些亞洲腹地，清朝曾經用戰爭建立統治，并用駐軍維持統治。在滿洲和蒙古，皇帝把部族首領變為他個人的附庸。在西藏和蒙古，他庇護喇嘛教的領袖。在喀什噶爾（南疆），他任命當地的伊斯蘭教首領（“伯克”）為官員，并認可穆斯林的教規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機構。滿族統治亞洲腹地時，對喇嘛教和伊斯蘭教的利用，像統治中國對儒教的利用一樣，顯示了高超的技巧。[[2]](#_2_Jian_Yue_Se_Fu__Fu_Lai_Che)

對外貿易同樣要服從帝國的需要。北京未能保護蒙古的王公和寺院免于欠下當地漢族商人的災難性債務。但經由琉球與日本的貿易，與俄國在恰克圖的貿易，與中亞（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以及與英國人、美國人和歐洲人在廣州的貿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19世紀以前，只有從東南亞到廣州和廈門的貿易，由于掌握在中國人而不是掌握在外國人手里這樣一個簡單的原因，被排除在朝貢體系之外。

像清朝對中國的統治一樣，清帝國由復雜和熟練的制衡系統維持。例如，以當地的酋長、僧侶和部落王公為一方，與以中央政府的將軍和官員為另一方之間，地方政壇內部的僧俗名流之間，清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員之間，以及地方貿易歲入與軍費之間，都存在這種制衡系統。只有當以外國軍事力量為后盾的國際貿易在邊境上增加時，帝國才開始土崩瓦解。沙俄在中國北部和西部，法國和美國在中國南部和東南的商業、政治和軍事的推進，是最著名的19世紀帝國主義的傳奇之一。[[3]](#_3_W_L_Lan_Ge____Di_Guo_Zhu_Yi_W)不久日本蠶食了東部和東北。

清朝對蠶食的反應的某些模式，或許可被視為一切圍繞帝國邊界。首先，清朝的邊境貿易從屬于戰略利益，因為在歷史上中央政府對亞洲腹地邊界的控制，對中國中心地區的安全曾經是必要的。外國商人盡可能地被限制在邊境的商業中心里。因而17世紀90年代俄國人被趕出滿洲，1727年后被限定在恰克圖貿易，偶爾才有商隊被允許前往北京。[[4]](#_4_Ma_Ke__Man_Kao_Er____E_Guo_Yu)同時，因為19世紀早期英國與廣州的貿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亞行之有效的各種辦法進行干預。一個外邦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曾引起外國商人的要求和一場由宗教反對派領袖領導的圣戰。結果是清朝在擊退了浩罕對喀什噶爾的入侵后，謀求穩定；他們向外國商人支付賠償，并接受浩罕代表們的一種治外法權，這些代表監督他們的商人在喀什噶爾的活動，因此貿易在穩定的基礎上繼續進行。1835年的這種中亞解決方式，與19世紀40年代廣州最后解決方式的相似太令人驚訝了，不可能是純粹的巧合。[[5]](#_5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h)

其次，當清朝沿亞洲腹地和東部沿海兩段邊界的政權結構開始瓦解時，它發現它的軍事防衛能力遠遠不夠，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擴大貿易來羈縻外國人。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懷柔蠻夷的各種方法。鴉片戰爭以后，清朝沿襲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認一切與中國交往的國家；第二，對這些國家一視同仁。[[6]](#_6_Wang_Geng_Wu____Ming_Chu_Yu_D)當中央政權衰弱時，中國確曾習慣于平等主義的對外關系。[[7]](#_7_Mo_Li_Si__Luo_Sa_Bi_Bian____Z)這種長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1843年英國附約中的最惠國條款后付諸實施。清帝對禮儀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貢制度，依然懸而未決；由于1860年后新皇帝尚在沖齡，外國公使在他面前行叩頭禮的問題只能推遲到1873年去解決了。

這當然不是中國第一次被迫從軟弱的地位實施對外政策。在這種形勢下，長期形成的戰略是嗾使一個侵略者去反對另一個侵略者。幾乎在美國和法國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廣州管理蠻夷的官員就尋求他們的幫助來制止英國的侵略。后來，例如李鴻章在制止日本、俄國和法國蠶食的各種努力中，一再試圖得到美國的調停和外交幫助。在1894年英國未能幫助反對日本后，李鴻章轉向俄國。“以夷制夷”是貫穿近代的主要戰略。[[8]](#_8_Han_De____Te_Shu_Guan_Xi_De_X)雖然中國人認為有必要放棄中國中心主義，但利用一種外國勢力去反對另一種外國勢力的思想是容易沿襲的。它與西方的均勢觀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1860年后中外關系過渡時期的特點，簡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說明，這是非中國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國人共同治理中國的一種方法。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個例子，是中國人利用外國統率的洋槍隊保衛上海和寧波，然后是赫德領導下的帝國海關的發展，但赫德只是19世紀中期后眾多外國雇員和顧問中最為杰出的一位。畢竟借用外國技術理所當然地一起帶來了外國專家。這一切都是通過與英國達成某種協議而取得的。但是這種在北京的共同治理的權力機構和條約口岸中靠把英國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穩定的趨勢，只有按照中國中心主義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樣，滿人熟練地利用西方人幫助統治中國，延長了他們的異族統治；但在19世紀90年代，一旦中國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這種辦法就失去了效用。[[9]](#_9_Li_Cha_De__J_Shi_Mi_Si____Gu)

滿族統治者不能領導一場漢人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事實，成了一個主要障礙，延緩了中國對國際社會的適應。清朝領導下的東亞的中國中心帝國，已經確立了中國的優越中心文化和物質力量與圍繞其陸上邊界的較小民族之間的關系。但當中華民國繼承前帝國時，它面臨極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義原則上的民國總統，幾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經擁有對亞洲腹地民族中地方統治者的宗主權。只有當人們接受了中國愛國者最反對的西方式殖民帝國主義，民族和帝國的觀念才能相容。一個新的政權必須統一中國領土的傳統使命，使中華民國背上了一個包袱，她必須保持一個統治以前曾構成清帝國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權。然而，從帝國主義解放民族的思想對此很少支持。事實上，在1912年2月清朝君主政體的消亡粉碎了它曾創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國前，民族主義的新原則已經削弱了它的基礎。

簡言之，民族主義存在于正在使舊的大陸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響之中。[[10]](#_10_Ben_Shu_Shang_Juan_Di_1Zhang)晚清的政權已經很難控制漢人經濟的不斷擴張。越來越多的蒙古王公和喇嘛已經淪為中國商人掌握之中的債務人。中國移民也已擠入內蒙古、西藏東部和滿洲。用拉鐵摩爾的話說，[[11]](#_11_Jian_La_Tie_Mo_Er____Zhong_G)這種中國“次帝國主義”向亞洲腹地的滲透，在商業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對手，它們從俄國向蒙古和中亞以及從英屬印度向西藏進發。清帝國偏遠的非漢族地區，于是發現它們自己處于擴張中的俄、英大陸帝國和人口不斷增長的中國漢族的夾縫之中。結果是亞洲腹地的民族開始兩面提防并培養它們自己的民族個性，同時嗾使歐洲人反對中國人。1911年前的10年中，在當地晚清改良主義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藏兩地的反清獨立運動已經興起。[[12]](#_12_Guan_Yu_Zhe_Xie_Qu_Shi__Jian)

在蒙古，擴張中的中國的蠶食已經結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層的回避和間接統治政策。隨著畜牧經濟被引入商業之中，統治階級和普通百姓都變得窮困起來，并向中國放債者借債，而清朝卻減少了補貼和增加了稅收。[[13]](#_13_Guan_Yu_Zhe_Ge_Guo_Cheng__Ji)清末10年（1901—1911年）的新政向中國殖民和農業移民開放了蒙古，允許通婚和蒙古人講漢語，這種中國化對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園形成威脅。地方政府的項目、兵役、鐵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稅收要求，疏遠了蒙古上層，并激起了民族主義情緒。1911年7月，一群首領決定謀求獨立并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俄國尋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亞有1700英里的邊界，在19世紀中葉沙俄就已確定了對蒙古的目標。俄國從北京獲得越來越多的商業利益，并追求像對保護國那樣的優勢；但是為了這一目的，圣彼得堡贊成蒙古繼續在清朝宗主權下自治，不贊成獨立。原因是簡單的，獨立將使蒙古開放，與所有其他列強接觸，這些列強的遠期商業權利將與俄國的既得權利競爭。一個獨立國家不可能被作為保護國接管而不與日本等其他列強發生外交沖突；而俄國以中國名義上的宗主權為托詞，卻能獲得事實上的優勢。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極力宣稱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1911年俄國的貿易比中國少，在那個地區大約只有800名俄國人。因此俄國做出雙重姿態——反對獨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兩個連的哥薩克去加強在庫倫的領事館的警衛。

1911年10月中國革命的爆發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獨立。12月29日，庫倫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以一種頗為中國化的方式被立為一個新國家的神權統治者，而對中國的債務則被拒付。然而俄國并未承認外蒙是一個向國際社會開放的主權國家，繼續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俄國在開始裝備和訓練蒙古軍隊的同時，于1912年1月發布了一個放棄任何領土野心的聲明，并要求北京放棄直接統治、殖民或駐軍。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條約承認外蒙的自治并確認俄國的貿易特權。但是俄國拒絕承認蒙古獨立和庫倫領導的包括仍在中國統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內的泛蒙古運動。只有1913年11月5日的俄中條約承認蒙古在中國宗主權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圖經過漫長而激烈的談判后，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三方協定再次確認了這個模式以及俄國的經濟權利。俄國實際上已經建立了一個中華民國無力反對的非正式保護國。

然而庫倫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王公和喇嘛寺廟之間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權力，寺廟“在牧民、牲畜和牧場等方面增加到與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開始將資源轉用于純宗教的目的。這種神權政治的保守主義在北京遇到對抗，那里的中華民國試圖保留古代朝貢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義上維護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革命黨在10年內，在蘇聯的鼓勵和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的先后領導下，于1921年建立了一個新政府，并于1924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為一個不再在中國宗主權之下的共和國。[[14]](#_14_Tuo_Ma_Si__E_You_Yin____Chu)[[15]](#_15_Zhong_Hua_Min_Guo_San_Shi_Wu)

在西藏發生了類似的過程，但結局不同。英印對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拉達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和阿薩姆等山國的貿易和戰略安全的關注促使英國決心不讓俄國勢力波及西藏，這些山國在文化上，有時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屬。清朝在18世紀曾用武力確立對西藏以及尼泊爾的宗主權，而在1886年中英《緬藏條約》里得到英國承認。然而在1904年，英國感到有必要搶在俄國前頭，它派遣榮赫鵬探險隊開辟通往拉薩的道路，并就英國對西藏的保護進行談判。但倫敦對這個難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擔的義務逐漸減少；1906年英國在中英條約里再次承認北京對西藏的宗主權，作為保護英國在那里的利益的最佳方式。英國的目標是將俄國的勢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它并不注意西藏人對脫離中國獨立的關心。

這就為1908年清朝再次強硬主張對西藏東部的統治提供了舞臺；1910年現代化裝備的中國軍隊終于開進拉薩，一個中國行政當局試圖在那里統治。這破壞了北京和拉薩統治者之間古老的保護人與依附者的關系。這個神權國家傳統的統治者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潰導致了中國駐軍和官員被逐。年輕的中華民國難于再次主張對西藏有統治權，而達賴喇嘛于1913年1月宣布西藏獨立，據說還和庫倫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級中名列第三）簽訂了一項條約，互相承認獨立。這導致了1914年英國、中國、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長的談判，英印試圖承認西藏的獨立，但中國拒絕。雖然西藏與印度的貿易和文化交往是獨立進行的，但英國從未要求對西藏的保護權或宗主權。中華民國堅持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主張，而英國則認定中國有宗主權（不是主權）和西藏有自治權（不是獨立）的方案。這意味著中國不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與西藏關系的加強，但只有英國留在印度以及中國依然軟弱和不穩定時才會如此。[[16]](#_16_H_E_Li_Cha_Sen____Xi_Cang_Ji)

新疆和西藏一樣，缺少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鐵路，在民國初期也處在國際政治的邊緣。1890年的進士楊增新曾在甘肅和新疆供職20年，從1908年起成為阿克蘇兵備道員，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為新疆都督，并保持這個職位直到1928年死去。他用胡蘿卜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辦法安撫中國的革命者、維吾爾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義者和哈薩克部落，禁止官員腐化和鼓勵貿易。他使新疆事實上處于半自治狀態，非常成功地隔離了中國和俄國雙方動亂的破壞性影響。1924年楊與蘇聯訂立的貿易協議規定重新開放領事館，在尊重對方法律和司法權方面建立平等的關系。隨著這項貿易協議新疆與蘇聯之間的貿易急劇增長。從1923—1924年度的340萬盧布猛增到1926—1927年度的2200萬盧布。在政治分裂、民族眾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義運動都未能掌權，楊督辦\*設法保持政權的統一和與蘇聯的貿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干涉。[[18]](#_18_Ru_Jiang_Qi_Si_Lang____Zhong)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種方式擺脫了北京的控制，而對中華民國只保留邊際的重要性。滿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為那是中華民國在一個漢族地區與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直接對抗，而中國的國家主權危在旦夕。

日本的蠶食引起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位置的總體問題。已被迫放棄對外來者禮儀至尊傳統要求的中國，怎樣才能擺脫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為此目的，它怎樣才能以平等主權國家的國際秩序的新觀念，來代替以北京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舊觀念？在這中間，在中國和圍繞中國而發生的戰爭——不管中國是否直接卷入——是怎樣影響它的政治和經濟的呢？中國衡量東亞和平和秩序的標準是什么？當與另一個國家——大多是日本——發生沖突時，中國的領導人和輿論是怎樣面對斗爭的？簡言之，他們怎樣看待他們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這些問題的努力是一個有教育意義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現代的中國人確立了對他們自己和對現代國際社會的觀念。

## 日本在滿洲勢力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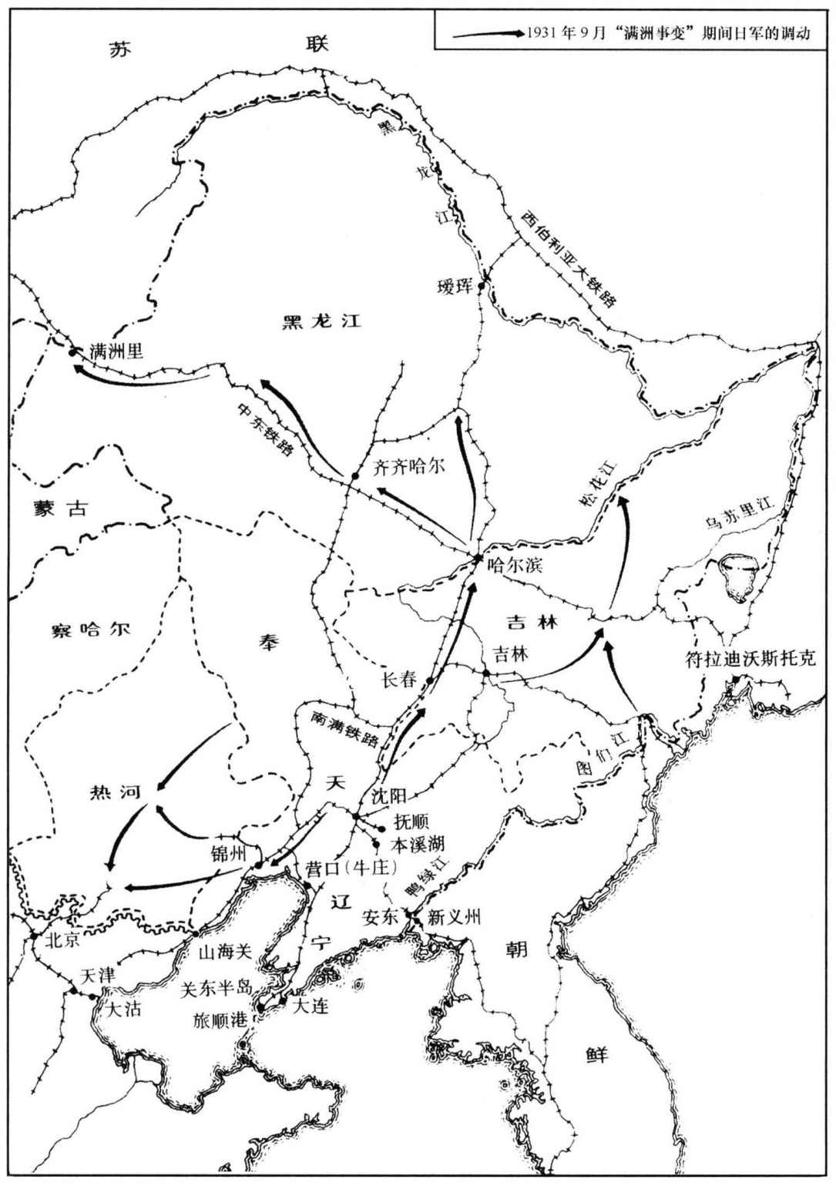
共和革命前夜中國的國際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個強國的地位和西方列強在東亞的作用相對下降的影響。[[19]](#_19_Suo_Yi_Li_Cha_De__Si_Tuo_Li)1901年后，西方列強已經加強了自我約束以保持現狀，并追求它們自己既得的經濟利益——俄國和德國除外。甚至隨著1917年的革命放棄了原來在中國本部的不平等條約權利后，俄國也繼續滲入蒙古和北滿；而德國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從東亞舞臺上消失，直到20世紀30年代東山再起。相反，日本不僅追求擴大它的經濟利益，而且在外交和軍事行動中運用它的政治力量。在吞并朝鮮之后，滿洲成了她的主要活動中心。

滿族部落的家鄉（現稱中國東北），在中國所有人口稀少的地區中最為引人注目。舊中國沈陽以下地區稱為遼東，自漢代以來就是有人定居的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北滿仍處于部落狀態，在滿族征服中國后，清朝把它作為民族禁區保留，并作為軍事邊疆治理。19世紀中葉，中國人入境已不再能被遏制，而北京也認識到甚至必須對此加以鼓勵，否則俄國將從黑龍江向南擴張以填補真空。而吉林和黑龍江對移民的進一步開放導致了經濟的開發，特別是鴉片和人參，伴隨著走私和搶劫，由此引起管理和稅收問題，比未充分擴展的清朝軍事管理所能應付的更快。在滿洲的蒙古人，像在蒙古一樣，易受中國商人剝削，也產生了忠誠問題。

到19世紀90年代，清朝為了自衛，已經開始計劃修建從長城向北的鐵路，以抵御俄國籌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威脅，但中國的努力太晚，工作也太少。1895年日本對中國的勝利，直接導致了1896年的中俄聯盟和俄國修建穿越滿洲的中東鐵路。俄國在1900年義和團期間對滿洲的軍事占領在災難之上更加上了災難。日本誘使其他列強要求俄國撤出滿洲，而沙皇政府卻竭盡全力壓迫北京政府簽訂符合它的利益的秘密協定。昔日滿族的家園，當今成為大國特別是俄日之間競爭的焦點。[[20]](#_20_Jian_Yue_Se_Fu__Fu_Lai_Che)與其他主要從海上到達中國的列強不同，這兩個國家正從陸上蠶食。在下一個五年內，日本已經在遼東半島取代了俄國，并沿鐵路干線向北推進。

這是1904年2月8日爆發的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遭受多次失敗，但到1905年夏日本的信心和資力已喪失殆盡，難以再戰。例如，在1905年2月23日至3月10日的沈陽大會戰中，日軍24萬人和992門大炮與數量上占優勢的俄軍37萬人和1219門大炮對抗。毫不奇怪，俄軍發射了54萬發炮彈，超過了日軍的35萬發。當3月9日日軍開始對建有城墻的沈陽發動總攻并于次日占領該城時，俄軍主力只是由鐵路撤至沈陽以北鐵嶺的新陣地。日本已經用極大的代價包圍了俄軍，但因缺乏彈藥，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俄軍有秩序地撤退。日本人的后援儲備已經動員起來，他們發現事實上已不可能運送另外的軍隊和彈藥到前線。

至少在5月27日以前，情況似乎有利于俄國人，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已經駛過好望角，穿過印度洋，并在法屬印度支那金蘭灣停泊作最后補給。5月27日，這支艦隊在對馬海峽被日本的聯合艦隊殲滅。這使俄國難于繼續作戰。同時，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開始的俄國革命，給沙皇體制帶來了進一步的困難。6月，戰艦“波將金”號上的水手在奧德薩起義。雖然人員和物資繼續沿西伯利亞大鐵路運往前線，但是軍隊士氣低落。伴隨著國內的騷動，這使俄國政府喪失了戰斗的決心。



地圖4 滿洲（東三省）

5月31日，日本人秘密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作調解人安排和平會議，這次會議于8月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舉行。在此以前，羅斯福尋求有關日本意向的保證，并同意東京堅持滿洲門戶開放以及有意將滿洲交還中國的答復。在談判進行時，俄國代表謝爾蓋·維特伯爵拒絕承認戰敗，隱瞞了俄國國內形勢，并宣稱俄國準備繼續戰斗。在俄國這種強硬路線的壓力下，日本政府認識到它已無力繼續作戰，放棄了財政賠償的要求；了解到對庫頁全島的要求是不會成功的，而決心獲得南半部。俄國在遼東半島的權益，還有在長春附近一個地點與旅順之間的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

了解日本真正戰爭形勢的外相小村壽太郎，與維特伯爵進行了一波三折的談判，他受到許多人的指責，因為這似乎是一場外交上的失敗。不了解真正形勢的日本公眾被條約的條款所激怒。報紙譴責政府，而以東京的心臟地區日比谷公園為中心的反政府騷亂，花了三天時間才鎮壓下去。[[21]](#_21_Guan_Yu_Ying_Ri_Tong_Meng_He)然而政府領導人明白，樸次茅斯條約提供了他們所能得到的最佳結果，他們試圖獲得中國和列強對條約的認可，以促進東亞的穩定，并減少俄國復仇戰爭的可能性。

他們首先接近中國。小村經過與維特伯爵的令人筋疲力盡的談判后于9月回國，11月前往北京。他與慶親王（奕劻）和袁世凱進行談判，得到了北京對俄國讓與日本的各項權益的承認。日本也就一個秘密草案與中國談判，以增加日本的經濟收獲，并包括中國對不修建任何有損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利益的鐵路的承諾。1905年12月12日《中日北京條約》簽字。[[22]](#_22_Mi_Mi_Cao_Yue_Shou_Ru_Yue_Ha)[[23]](#_23_Gai_Tiao_Yue_De_Qian_Zi_Ri_Q)但在兩年內，為美、英參加滿洲交通建設而進行的多次討論發現中國反對這種安排。

日本同時尋求加強與英國的聯盟。因為最初在1902年簽約時，英、日同盟僅適用于中國和朝鮮，但當日俄戰爭期間英俄間的對抗遍及整個歐亞大陸時，英國想加強這個聯盟，同時日本也需要一個更強的同盟來幫助它制止俄國的復仇戰爭。因此，英日同盟于1905年8 月12日進行了修改，其范圍擴大到印度。1907年英俄關系突然好轉后，為了對德國勢力的迅速增長作出反應，英日同盟的性質再次發生變化。到1911年，在第三次修訂稿中，焦點是對德國和俄國，這份修訂本執行了10年。與英、日一方簽訂仲裁條約（如英美之間）的各個國家被排除在外，減輕了英國對與美國發生沖突的擔心。[[24]](#_24_Guan_Yu_Tiao_Yue_Zhong_Xin_D)

法國同時也認為有必要為其在亞洲的地位尋求另外的保證。1907年，日本和法國達成協議，開始確認尊重中國主權和機會均等，并繼續避免干涉對方的特殊利益和勢力范圍。以未公布的附加條款為基礎，協議指出法國愿意就日本在大陸的新地位達成妥協，也希望東亞政治穩定，使俄國可以再次自由地在發展中的歐洲反德聯盟方面，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作為這次新的熱誠的一部分，同年法國允許日本在巴黎發行三億法郎債券。在業已加強的在滿洲的作用以及在福建省的經濟優先地位方面，日本現已得到英法的支持。

為了減少俄國復仇戰爭的危險，外相林董也準備就懸而未決的問題與俄國談判。俄國起初似乎不愿妥協，但當俄國尋求德國支持的前景變得暗淡時，圣彼得堡被迫在亞洲尋求和解。俄國與英國的關系改進了，而它的法國盟友希望穩定與日本的關系。俄國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轉向東歐。談判以第一個日俄協議結束，于1907年7月30日簽字。協議再次保證尊重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在中國機會均等的原則，但在秘密條款中，日俄互相承認各自在北滿和南滿的勢力范圍。此外，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先地位；而日本則承認俄國在外蒙的特殊利益。[[25]](#_25_Ri_Ben_Wai_Wu_Sheng____Ri_Be)到1909年，當美國國務卿菲蘭德·C.諾克斯提出南滿鐵路中立化的建議時，日本和俄國的共同反對使它們更為接近。1910年7月的第二個日俄條約，認為兩個國家有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保護各自在滿洲的特殊范圍。1911年4月，美、英、法、德組成一個財團向清政府提供貸款時，日本和俄國聯合聲明表示反對。結果組成了六國銀行團。兩國間的關系變得更親密了。1912年7 月8日簽訂的第三個日俄協議把內蒙分成兩部，并承認日本和俄國各自在東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這樣，英、法、俄、日以損害它們曾莊嚴保證要保護和支持的中國為代價，達成了相互間的協議。

同時，日本與美國的關系由于西海岸對日本人的排外運動而緊張起來。美國加利福尼亞對華工門戶開放的關閉，已經在1882年至1895年間由美國勞工組織者領導的種族主義的煽動而完成。[[26]](#_26_Han_De____Te_Shu_Guan_Xi_De)此后，同樣的種族主義對準了日本人。1906年，加利福尼亞加緊實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趕出公立學校的法規。

為抗議中國人在美國所受的待遇，中國雖在1905年第一次發動了大規模的抵制美貨愛國運動，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們卻從美日對抗中看到一個獲利的機會。袁世凱首先抓住了這個機遇，他從1901年到1907年占據了李鴻章在天津的原職，然后成為北京的顯要人物，直到1909年下臺。袁世凱和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后的臣仆們，設法在晚清發展鐵路、電報、礦山、新軍和警察力量，包括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關系。[[27]](#_27_Si_Di_Fen__R_Mai_Jin_Nong)他們在滿洲仿效20年前李鴻章在朝鮮的戰略——開放該地區的對外貿易，這樣給貿易大國以既得利益，以保持中國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對日本或俄國的蠶食，這是一種門戶開放戰略。

不幸的是貿易大國的商業趕不上俄日對滿洲的軍事和經濟侵入，所以袁世凱不得不回到競爭的戰略上來，在中國主辦下推動那里的鐵路和其他事業。因此，他希望得到美國的財政援助。許多方案都在未定之中。1905年，美國鐵路大王E.H.哈里曼曾在東京向首相桂太郎建議一個統一的環球的運輸系統，包括日美共同管理南滿鐵路，但外相小村壽太郎從樸次茅斯歸來，反對這項計劃，因而計劃遭到擱置。同時，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開始發展民事管理的改革。他和受過美國教育的部下、遼東巡撫[[28]](#_28_Govermor_of_Liaotung_Ying_We)唐紹儀建議哈里曼投資鐵路，與日本接管的俄國修建的南滿鐵路競爭。為了吸引資本，他們建議仿效帝國主義者，建立一個開發銀行以獲取美國和英國的貸款。他們的計劃在年輕的國務院官員中迅速引起反響，這些官員懷疑日本對中國以及日本對美國貿易的意向。1907—1908年，中國官員積極推動中美聯盟的設想，一個仲裁條約事實上已在談判，而唐紹儀前往華盛頓企圖解決中國開發滿洲計劃的美方投資問題。然而，在他1908年11月30日到達華盛頓時，他的希望已因現實政治而成為泡影。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意識到中國的軟弱，現實地對待日本。作為對日本限制向美國移民的“君子協定”的回報，1908年11月30日的羅脫—高平協定試圖緩和美日之間的緊張關系。兩國認可太平洋地區的現狀，同意相互尊重對方的領土主權，堅持中國的門戶開放，以及以和平手段支持“中國的獨立和完整”。如果其中任何一項受到威脅，雙方同意交換意見。在將條約通知北京時，東京表明它完善了此前日本與英、法、俄簽訂的條約。[[29]](#_29_He_Bo_Te__Ke_Luo_Li_De___Si)

雖然羅斯福總統對日本的強盛持有現實的看法，而且美國艦隊在1908年訪日時受到熱情款待，但是美國對日本在滿洲擴張的擔心并沒有結束，而且每個國家的海軍領導人都把對方的艦隊作為潛在的敵人。1907年日本海軍的國防計劃的中心，就是把美國作為日本的假想敵。[[30]](#_30_Jiao_Tian_Shun____Man_Zhou_W)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管理根據樸次茅斯條約由俄國轉讓的鐵路線，達到了向中國有效滲透的新水平。公司的首任總裁后藤新平以前曾擔任臺灣民政長官，他對滿鐵有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把計劃看作包括礦山、農業和工業的開發和運作以及鐵路附近土地的管理在內的經濟計劃的中心。后藤認為用這種方法，日本將能協調其對滿洲實行殖民化的努力，并抵消由徐世昌和唐紹儀組織的中國開發事業的成果。滿鐵是按照日本商業法建立的一個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額出售給日本和中國的投資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結束前，沒有任何中國人購買股份。由于中國人缺席，公司就這樣全部歸日本人所有。中國政府事后提出抗議，但已為時過晚。[[31]](#_31_Ri_Ben_Wai_Wu_Sheng____Ri_Be)

在日俄戰爭之后轉讓給日本的關東租借地的管理機關，設在位于遼東半島南端的小城旅順。旅順的阿瑟港在俄國占領下已發展成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海軍基地；乃木將軍的部隊圍攻該港，是日俄戰爭中代價最為高昂的事件。然而它的港灣淺，日本海軍在那里只保持有限的設施。關東租借地總督的權力僅僅涉及這一有限的地區。直到1919年，總督個人指揮那里的軍隊；當這個職位變成文職時，軍隊控制權傳給統率關東軍的將軍。

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基地在大連。大連是深水港；在滿鐵管理下，該城迅速發展成東亞主要商港之一和滿洲的門戶。從那個基地出發，公司幾乎像一個獨立政府那樣運作。最初管理鐵路的授權不久就擴大了。俄國時代的寬軌距鋼軌被標準軌距替換，一個野心勃勃的發展計劃開始運轉；而最新鐵路技術，甚至連鐵路枕木在內都是從美國進口的。由于與俄關系改善，沿南滿鐵路經哈爾濱，以及沿西伯利亞大鐵路經伊爾庫茨克的旅程，成為連接東亞和歐洲的最短路線。滿鐵從其土地征收的稅款被增添到它的運營利潤上，而大筆款項被用于從城市規劃及道路、水和煤氣管道建設到教育和研究活動的一切事業。滿鐵的中、小學的設備經常優于那些日本國內的學校，而滿鐵的滿洲醫學院成為全中國最先進的醫學院之一。滿鐵的中國研究是另一項杰出成就；它集中于現狀的研究，當時很少有學者這樣做，從而為后來大量的日本研究現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著作奠定了真實的基礎。[[32]](#_32_Yue_Han__Yang____Nan_Man_Zho)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為保護它在關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權益，建立了關東軍。它的司令部設在旅順，它的各分遣隊駐在租借地以外。根據樸次茅斯條約，每公里鐵路線最多允許駐兵15名。這允許日本在和平時期有一個整陸軍師團駐在滿洲。這些部隊很快成為日本滲入中國的先頭部隊。

這一系列的活動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大量摩擦的根源，對此樸次茅斯條約的條款沒有解決辦法。中日關系在日俄戰爭前還算是友好的，但在日本取勝并殖民后，這種關系隨圍繞下列四個主要問題引起的沖突而迅速惡化。

第一，間島地區：這個邊境地區曾形成傳統的、沒有標記的中朝邊界。到1905年11月，當日本把朝鮮變為保護國時，它派軍隊進入間島地區，宣稱擁有領土主權。然而后來日本把該地區讓給中國，而這一地區朝鮮居民的權利則得到1909年9月關于間島的中日條約承認。但隨著日本在朝鮮推行殖民化，許多反對日本統治的朝鮮人遷到間島，因而這一地區變成朝鮮反日運動的基地。

第二，安奉鐵路問題：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曾從鴨綠江邊的安東到沈陽修建一條窄軌鐵路，作為通往北部前線的輔助線。1905年中日北京條約把這條鐵路的管理權委托給日本。這條鐵路與釜山—新義州鐵路連接將使它成為日本與歐洲間的最快路線，也是一條從朝鮮到滿洲的軍事供應線。為此，滿鐵試圖把這條鐵路換成標準軌距。中國強烈反對，因為條約中沒有規定這種變換。日本最后在1909年夏發出最后通牒，強迫北京屈服后自行其是。

第三，煤礦：俄國已經開始開發南滿鐵路線附近的礦藏。日本接著開發沈陽以東40公里處的撫順露天富礦。日本也經營鞍山以北的煙臺[[33]](#_33_Ci_Chu_De_Yan_Tai__Bu_Shi_Sh)高質量無煙煤礦。因為所有這些煤礦離條約中提到的鐵路地區很遠，所以它們的經營沒有條約基礎或中國的允許；最后中國政府承認這種狀態為既成事實。

第四，營口—大石橋鐵路：俄國原來曾經同意允許修建這條鐵路作為臨時措施，從營口港為中東鐵路建設運送物資，并承諾在后者完工后拆除。因此中國要求日本拆除這條鐵路。中國的真正目的是接收這條鐵路，但日本拒絕了中國的要求，并保留此路作為南滿鐵路的支線。

所有這些沖突刺激了中日關系，而日本國力的上升激發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成長。在東京的中國學生學習日本國家生活現代化進程中的榜樣，同時清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員被喚起反對日本的擴張。[[34]](#_34_Ma_Li_Wu_Si__Zhan_Sen____Ri)這反過來又使日本堅定其走向帝國的道路。同時，與美國達成妥協的努力正在導致1908年11月的《羅脫—高平協定》。1908年9月25日，桂太郎內閣正式通過的外交政策計劃，透露了日本堅持其在滿洲權利的決心，并正式決定使關東租借地成為日本的永久財產。[[35]](#_35_Ri_Ben_Wai_Wu_Sheng____Ri_Be)

## 日本的二十一條

1911年10月中國革命爆發時，日本政府主要關心的是保持1905年戰勝俄國后在滿洲得到的權益。由于與清政府訂有協議，而革命黨是未知因素，外相內田康哉和駐北京的公使伊集院彥吉兩人傾向于向清政府提供援助。甚至在革命遍及長江以南后，他們仍堅持這種主張；許多保守的日本人爭辯說，甚至一個由清朝統治北方的分裂的中國，也比一個由民國統治的統一的中國好。一種遍及全中國的共和制度，將成為日本君主制度的反面榜樣，也將危及日本的利益。[[36]](#_36_Ri_Ben_Wai_Wu_Sheng____Ri_Be)所以日本政府建議英國政府組成聯合軍事遠征隊。它也同意滿足清政府購買軍火的請求。英國拒絕了日本的建議。英國的大部分利益在革命軍控制的地域內，而援助清政府將危及這些利益。因此倫敦答復說，雖然它贊成中國的君主立憲，但它并不認為外部干涉是可行的。當11 月13日袁世凱終于回到北京時，英國人已在扮演他與革命者之間的秘密調停人。因此甚至在袁正對日本外相伊集院宣布他支持君主立憲時，他已開始與革命黨人和談。甚至北京與革命黨人的談判代表唐紹儀也贊成共和。形勢向著袁世凱為總統的共和制方向穩步發展。于是袁世凱的熟練的政治手腕贏得了英國的支持。日本覺得在所有列強中它在中國利害關系最大，但沒有英國盟友的支持，它不能派遣軍隊，也不能要求保持清朝的君主立憲。干涉失敗后，日本政府開始與英國協力并轉向不干涉。

不少日本民間人士堅定地支持孫逸仙的革命運動。據說有600多人曾到中國參加革命。有些人曾活躍于日本的民權運動，并認為中國革命符合中國的民主化利益。多數人相信，一個強大的中國對于從西方統治下解放亞洲是必要的。然而其他許多人，是以他們自己的利益至上作為“革命者”去中國的。最初這些日本人受到中國革命黨人熱烈歡迎，但不久他們被當作麻煩的肇事者而受到冷落。有影響的右翼分子頭山滿等知名日人跑到上海，試圖控制冒險家們的活動和行為。[[37]](#_37_Hei_Long_Hui_Bian____Dong_Ya)

中國的革命力量部分由于財政原因，終止了與袁世凱議和。例如，孫逸仙抵達上海后，立即與三井公司上海辦事處接觸請求武器。它的負責人同意幾筆大的貸款；日本的目標是把漢冶萍公司置于中日共管之下。[[38]](#_38_Zhong_Dao_Zheng_Lang_Bian)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作為臨時總統在北京上任后不久，日、美、英、德、法、俄組成了銀行團，簽字同意貸款給中國。

日本已經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外務省試圖通過在北京的談判穩定中日關系。這種努力，被未來幾十年將會損及日本對華政策的那種獨立軍事行動所削弱。戰場上的軍人比外務省的代表更具侵略性，而日本對侵略分子的專擅行為普遍接受，并縱容了他們。政府以外的日本人對政府政策的第一次挑戰，是滿蒙獨立運動。一個曾參與清朝警察改革計劃名叫川島浪速的活動分子，已經與滿族貴族成員發展了親密的私人關系。1911年革命期間，川島和一群日本軍人密謀使滿洲和蒙古獨立，并勸說滿族肅親王（善耆）領導這次行動。根據計劃，肅親王離開北京前往關東租借地的旅順，于1912年2月2日到達。但由于日本外務省一再向軍隊提出抗議，肅親王被迫脫離這次運動，并隱居旅順。（他的女兒與川島結婚。[[39]](#_39_Shan_Qi_De_Nu_Er_Jin_Bi_Hui)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作為日本人的合作者而被處死。）

川島小組成功地從日軍獲得了一大批武器和彈藥。仇視漢人的強烈情緒在蒙古人中間流行，而且很少有人歡迎將來接受袁和他的政權統治的想法。兩個蒙古王公受到川島的誘惑，參加了滿蒙獨立運動。然后，武器在日本人護送下運進內蒙，用馬車從南滿鐵路的公主嶺站西運。然而，這支護送隊受到中國政府軍隊的攻擊，13名日本護衛人員和9名蒙古人喪生，這次周密的冒險就這樣結束了。但是，直到1931年滿洲事變，日本人繼續卷入滿洲和蒙古的獨立運動。[[40]](#_40_Li_Yuan_Jian_Bian_Zhu____Dui)

非官方干涉的另一端，是日本人幫助革命黨人反袁。當1913年7月稱為第二次革命的反袁運動爆發時，它在7周內就被鎮壓了；而孫逸仙、黃興和軍事領導人李烈鈞不得不逃命。袁世凱政府請求英國和日本不要接納中國的政治避難者進入其領土。盡管外務省作了最大努力，日本民間人士和軍官還是幫助了革命黨領導人逃跑。黃興乘日本軍艦“龍田丸”從南京到上海。從那里他乘日本私人輪船逃到香港，然后轉到另一艘開往日本門司的日本輪船。孫逸仙從上海到福州，日本輪船“撫順丸”在那里把他接走，經臺灣把他帶到神戶。李烈鈞在戰斗失敗后，于1913年9月1日獲準在長沙的日本領事館避難，然后乘日本輪船前往漢口，從那里他乘軍艦“伏見丸”逃脫。[[41]](#_41_Guan_Yu_Di_Er_Ci_Ge_Ming__Ji)

二次革命因三次意外事件而受到損害，這三次事件影響日本輿論反對他們政府的謹慎政策：扣壓一名日本陸軍上尉，逮捕一名陸軍少尉，以及袁軍進入南京時的暴力行為導致三名日本人死亡。東京外務省尋求以溫和外交來解決這些問題，但被這些“侮辱”激怒了的日軍要求懲罰那些責任者。當壓力升級時，外務省政治事務局局長阿部守太郎被一名強硬派青年殺害。幾千名憤怒的東京市民示威反對外務省的政策。這些壓力迫使外務省向袁世凱政府交涉。[[42]](#_42_Li_Yuan_Jian_Bian_Zhu____Dui)東京政府最后占了上風，但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革命黨人在內，廣泛顯示了反日的猜疑和敵意。

當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中國馬上提出了一項二十四點聲明，表示不介入戰爭。聲明的要點是交戰國不能占據中國領土或領海，或在中國領土或領海上交戰；以及不能利用中國領土作為發動進攻的地區。交戰國的軍隊和武器如經過中國領土，將依法扣留或沒收。

至于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穩定其帝國主義利益的機會。日本從俄國獲得的滿洲的利益只要短時間去經管，而對德國曾于1895年組織三國干涉的有意侮辱現在能夠予以反擊。然而，英國試圖勸阻日本方面對德國采取軍事行動，而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等自治領甚至更反對日本卷入。英國以保護太平洋上英國商業航運免受德國武裝商船襲擊的方式，試圖限制日本參加海上行動。然而日本不愿接受這樣一個受限制的角色，并于8月15日向德國發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國不遲于9月15日“無條件并無償地將膠州租借地全部交給日本帝國政府，以便最后將其歸還中國”[[43]](#_43_Ri_Ben_Wai_Wu_Sheng____Ri_Be)。外相加藤高明的看法是，如果無償得到膠州租借地，可以在相當時間內歸還中國；另一方面，如果以鮮血和金錢的高昂代價獲得，日本不會輕易將其放棄。

由于德國沒有對最后通牒作出答復，日本宣戰，并封鎖了德國租借地內的青島。為了盡量減少損失，日軍決定從背后進攻德國防區，但這樣做需要通過中國領土，違犯了中國的中立。東京向北京施加很大壓力，要求把山東省排除在中立區之外，但被外交部總長孫寶琦堅決拒絕。相反，中國在山東集結了大量軍隊。盡管中國懷疑日本在以武力占領后會信守諾言將膠州歸還中國，但中國最后屈服了。

1914年9月2日，日軍在山東半島北部登陸。然而日軍不是全力進攻德國在膠州灣的防區，而是以部分兵力占領濰縣，然后西向，占領通往濟南的山東鐵路全線。日軍隨后又攻占青島。然而，甚至在德國投降后，日本仍沿鐵路全線留駐軍隊。

在整個過程中，中國處境孤立。英、法、德全神貫注于歐洲的戰爭，沒有時間和資源關心亞洲。英國也感到日本的利益集中在華北，可能有助于穩定英國在華中和華南的利益。此外，因為協約國在歐洲受到很大的壓力，英國愈來愈感到需要日本的幫助，所以默許日本向中國施加壓力。俄國自己正在策劃向中國的滲透，也不反對日本的行動。只有尚未卷入歐洲戰爭的美國，給中國一些同情。但即使是美國，主要關心的仍是歐洲的戰爭，不希望為中國而與日本對抗。由于不能指望外部的幫助，最后外交部次長曹汝霖向日本人轉達了袁世凱就日本的經濟要求進行談判的意愿；作為回報，希望日本嚴格控制在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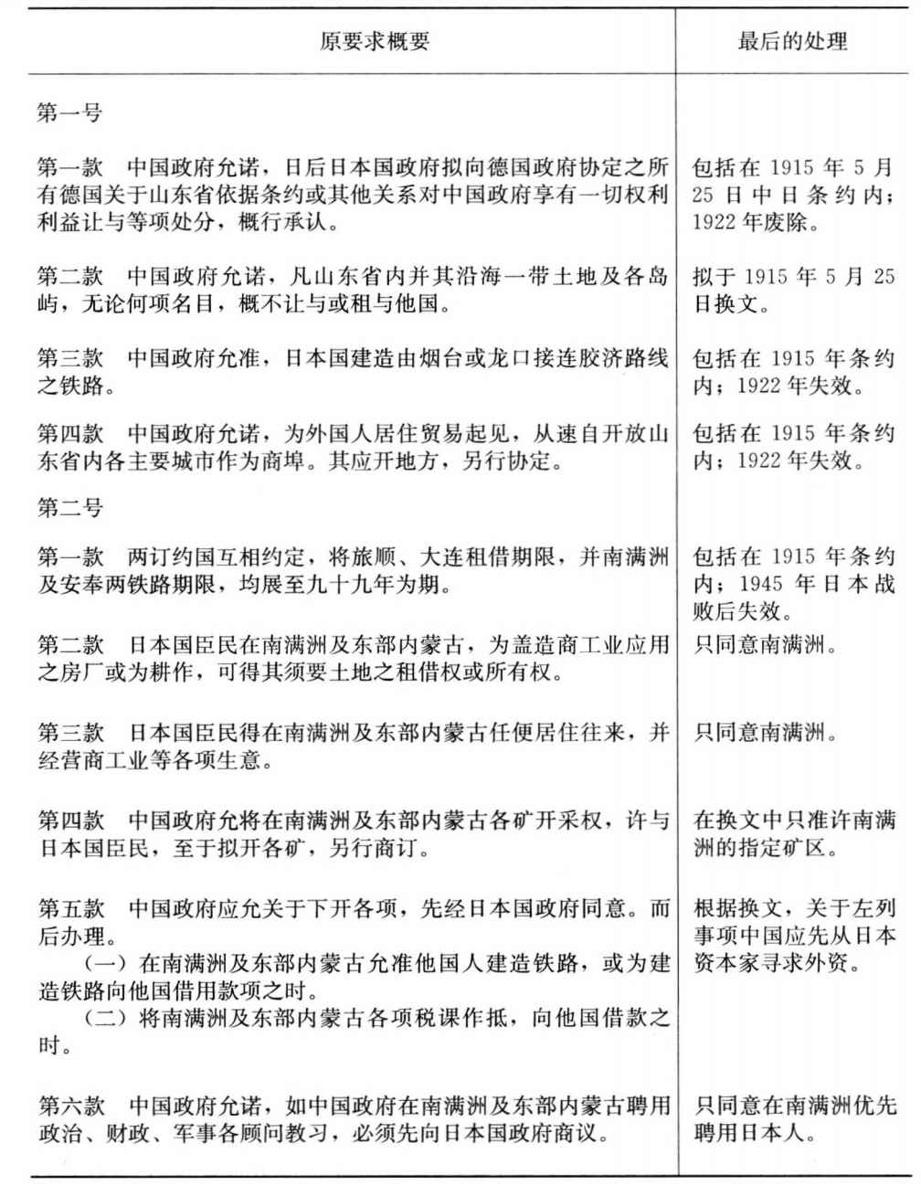
于是戰爭年代為日本提供了一個穩定其與中國關系的良機。由于用武力攻占的山東需要重新談判，似乎這是重新談判滿洲租借地的適當時機，不需很長時間去進行。歐洲不可能干涉。許多日本團體煽動與中國全面解決；老政治家們認為，鑒于歐洲自相殘殺，意見一致是重要的，同時，各種各樣的激進團體提出了全面推翻中國政權的理由。甚至再度在日本避難的孫逸仙，也認為他看到了幫助反對袁世凱的機會。不消說，軍隊領導人態度特別堅決。

外務省及時制定了十四條要求表，列為四號和七點“希望”（第五號），大隈政府在11月11日的內閣會議上正式通過。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直接把它們交給袁總統，并以一種傲慢的方式對它們進行解釋；他向袁保證，如果它們被接受，日本將控制在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和留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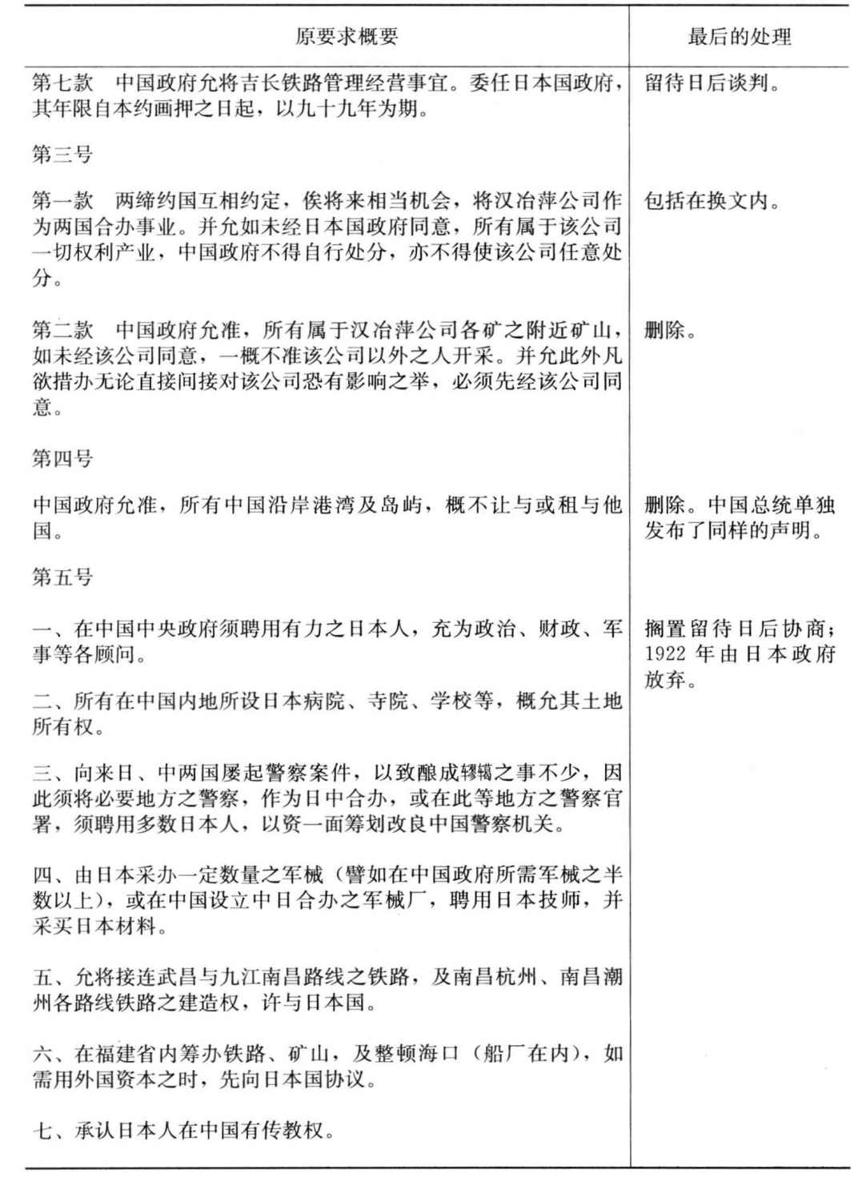
日置益要求袁對要求內容和談判過程保密，但北京政府通過年輕的外交官顧維鈞很快把要求的內容泄露給美國公使保羅·芮恩施。孫寶琦辭去外交部總長，由陸征祥接替。然后開始了緩慢的談判過程，其間袁耗盡了日本人的耐心。在84天中，進行了25次正式談判和20次非正式談判，作了許多修改。[[44]](#_44_Ma_De_Lin__Chi____Zhong_Guo)在談判過程中，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要求以及談判的方式越來越不安，而美國輿論則轉向反對日本。國務卿威廉姆·詹寧斯·布賴安最初準備接受日本大體上不談“第五號”的保證，但當明白日本人并未對他坦誠相告，以及芮恩施公使應中國的警告從北京發回日本人侵略的緊急預告時，威爾遜總統接過來指導美國的反應。[[45]](#_45_Rui_En_Shi_De_Ji_Shi__Zai_Ta)最后東京放棄了“第五號”，并于1915年5月7日發出最后通牒。于是中國屈服了。5月9日晨一時，新任外交部總長陸征祥和次長曹汝霖來到日本使館，并按他們的最后修訂文本接受了要求。最初要求與最后要求之間的區別，包括它們的長期效應，可以用下表概括。

按帝國主義的先例來看，二十一條并不包含什么新東西；除滿洲租借地的擴張外，它們也不意味日本在中國更有地位。它們符合列強在華所獲特權的順序，也沒有直接威脅美國的經濟利益，或直接與貿易方面“門戶開放”的總原則對抗。[[46]](#_46_Zhan_Mu_Si__Li_De____Chuan_D)日本人把第五號“希望”，看作是給予他們的同胞以西方傳教士已經享受的權利；中國大多數派系都已尋求日本的顧問和武器。日本外交的遲鈍和愚笨是要求的特色。全世界特別是美國注意到一個詭計多端的日本在西方列強全神貫注其他地區時欺負虛弱的鄰邦。由于要求保密，日本外交官使中國政治家因泄露假定并不存在的要求內容而惶恐不安。1915年5月，日本人向袁世凱提出的最后通牒，使其感覺遲鈍到了頂點。在中國人原來不同意的各個方面，這份最后通牒并沒有使日本有多少收獲，但為每年5月25日成為國恥紀念日提供了象征。日本企圖阻止中國的共和民族主義保衛自己的地位，而這種企圖以推進民族主義并使其集中為反對日本而告終。二十一條使中國和美國大眾如此激憤的原因是它們的不合時宜。它們是按照19世紀90年代帝國主義的掠奪精神炮制的，但晚了20年，在中華民國和美國的進步運動興起之后。從任何意義上說，它對日本是一次得不償失的勝利。

二十一條



續表



## 日本的影響和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從世界大戰一開始，英國就希望中國加入協約國一方。日本政府不贊成這樣做，認為中國參戰將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從而降低日本作為中國的領導者和代言人的地位。與日本磋商后，英國決定在沒有日本預先同意前不就中國參戰進行談判。

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就是這種諒解的結果，而且日本政府繼續欺騙袁政府。同時，日本在野人士繼續利用滿、蒙少數民族反對中國人的情緒，陰謀把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而另一些日本人則繼續公開同情孫逸仙周圍的南方反袁革命力量。于是，當1915年末袁世凱企圖建立一個以自己為君主的新王朝時，日本政府和在野人士同樣強烈反對。日本尋求英國支持，然后尋求美國、俄國和法國支持，逼迫袁推遲實行君主制的計劃。除美國外，所有國家都贊成。

1915年12月反袁運動在華南發動，而且勢力增強以后，日本政府于1916年3月決定承認南方革命力量為與北方平等的交戰團體，并暗中支持那些幫助南方革命力量的日本活動分子。同時，在中國北部，日本活動分子得到日本軍方秘密提供的軍火，再度策劃圍繞當時隱居旅順的肅親王的一次滿蒙獨立運動。日本外務省本身暗中支持這些做法，向袁政府施加壓力。但袁世凱于1916年6月逝世。日本軍方認為這次運動成功希望微乎其微，因而撤回了它的支持。獨立軍瓦解，結束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隨著袁世凱去世，控制軍隊的段祺瑞迅速加強了內閣的行政權，但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不僅與黎元洪總統，而且也與國會發生沖突。為了增強他的政治影響以及鞏固他個人的權力基礎，段計劃與政情也在變動之中的日本發展更為緊密的關系。1916年10月，大隈重信首相由寺內正毅取代，而加藤高明外相由本野一郎取代。寺內計劃通過他任朝鮮總督時代以來的密友西原龜三接近段內閣。

在這一時期，美國與德國之間的關系繼續惡化。1916年4月，美國抗議德國的潛艇攻擊后，德國保證限制潛艇。然而1917年1月31日它改變了立場，宣布準備恢復無限制的潛艇戰。威爾遜總統立即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系，美國于2月3日號召中國和其他中立國也這樣做。北京政府要求美國提供一筆貸款作為酬勞。

隨著戰爭進行，歐洲協約國面臨法國勞工短缺，于是從中國招募了14萬勞工。1917年2月，一艘載有900名華工的法國船在地中海被德國潛艇擊沉，542名華工喪生。為了對付德國的潛艇活動，協約國求助于日本海軍。英國在上月已請求日本派驅逐艦進入地中海，而日本則乘機要求英國支持日本獲得以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領地。日本政府向俄、法、意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所有四國都私下保證，在將來任何和平會議上支持日本的要求。此外，中國的段政府目前正準備改善與日本的關系，而戰爭突然加強了日本的經濟實力，也恰好使歐洲特別是英、法在東亞的勢力突然削弱。基于這種新的原因，日本政府現在改變了政策，同意中國參戰。[[47]](#_47_Jiu_Jing_Sheng_Mei____Ri_Ben)

1917年1月，西原安排了500萬日元的貸款給段政府。于是開始了“西原借款”。在短期返日后，西原于2月回到北京，并通知中國政府如向德國宣戰，可望得到充分得多的援助。西原多次會見段總理，強烈要求他參戰。段不顧副總統馮國璋的反對以及黎總統更強烈的反對，最后同意了。1917年8月14日，段政府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馮最后在這個問題上與段取得一致，但黎元洪仍堅決反對，促成一場激烈的內部權力斗爭。作為中國參戰的交換條件，段希望從列強得到財政援助，以增強他本人在國內的領導地位，并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段的政策得到中國內部三種勢力的支持：第一，段本人領導的北洋軍閥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圍的集團，西原借款的主要渠道；最后，議會中梁啟超周圍保守的共和黨人。后者反對革命黨和孫逸仙的國民黨。積極反對中國參戰的是那些有商業利益的人，他們希望從中立中保持繁榮，而國民黨則擔心參戰會使段政權得到加強。

在日本駐北京公使林權助的推動下，日本政府決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先通過增加西原借款，并禁止一切給南方國民黨的借款、軍火和民間幫助。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間的沖突加劇了。到1917年8月末，134名反段國會議員在廣州開會，選舉孫逸仙為新的軍政府的大元帥。

隨著段政府宣戰，日本對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年和1918年兩年間，向段政權提供了約14500萬日元，相當于約7250萬美元的共八筆西原借款（其中只有500萬日元得到償還）。這些借款受到以國民黨為首的反段分子的猛烈攻擊，因為這使國內的不和升級，而且支持了反動政權。于是這項借款成了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成長的催化劑。[[48]](#_48_Jian_Ling_Mu_Wu_Xiong_Bian)

段與寺內政府之間的勾結并未就此結束。當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新的蘇維埃政府通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中止了與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沖突時，日本懷疑蘇維埃與德國結盟。出于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擔心，它尋求阻擋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浪潮，并為此建議與段政權結成軍事同盟。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東京同意合作以對抗俄國境內敵對勢力的增長。5月16日，兩國簽訂了一項秘密的軍事互助協定，接著又分別簽訂了一系列詳細敘述陸軍和海軍合作的協定。這些協定的條款中日雙方都秘而不宣，兩國只聲明談判在進行中。這種神秘狀態加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擔心，他們擔心中國軍隊基本上正被置于日軍控制之下，也擔心這些協定只是日本滲透的另一種表現。全中國爆發了反對協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國留日學生在抗議聲中回國。[[49]](#_49_Jiu_Jing_Sheng_Mei____Ri_Ben)

日本政府積極維護段祺瑞的立場，事實上從財政和軍事兩方面加強了段政權，并對華南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響。因此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一開始就面臨難以逾越的障礙，歸于失敗。無論如何，日本和段政權之間簽訂的軍事協定，隨20年代中期段政權的倒臺而失去所有影響。1921年1月28日，中國通知日本全部廢除這些協定。

與上海的南北和會幾乎同時召開的是巴黎的凡爾賽和會。當和會拒絕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的要求時，中國代表團退席，1919 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游行示威。外交事務對國內政治的沖擊再清楚不過地得到了證明。[[50]](#_50_Jian_Ben_Shu_Shang_Juan__Di)

## 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英國、法國和荷蘭盡管被戰爭所耗竭，但仍想維護在太平洋和遠東的利益。但這樣做需要美、日兩國的合作，這兩個國家不只沒有受到歐戰損害，而且也從那里獲得了經濟利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正警惕日本近期的擴張，英國也感到有必要獲得美國的好感以遏制日本。然而，英國同時需要它的同盟者日本的友誼，來保護自己在中國的利益。為此種種，英國人希望召開一次廣泛的會議，一攬子調整與自治領、美國和日本的關系。[[51]](#_51_Jian_Luo_Jie__Ding_Man____Ta)

自從日俄戰爭以來，美國與日本經常因中國而發生爭執。然而，雖然兩國政府作了最大努力，移民問題仍使緊張加劇。當戰爭削弱了歐洲經濟時，這兩個經濟繁榮的國家在太平洋上進行激烈的海軍競賽。日本雖然缺乏美國那樣的自然資源、資本積累和生產能力，但仍實施軍備擴張計劃以對抗美國的海軍建設，把沉重的負擔強加給它的人民。1920年，軍費占日本政府全部經費的48%，1921年占49%。為了減輕這種負擔，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系是絕對必要的。

美國也覺得海軍競賽是個經濟負擔。它更進一步看到需要以某種方式回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的突然推進。1917年11月2日，國務卿羅伯特·藍辛企圖于《藍辛—石井協定》的換文里，以同意承認日本某些特殊權利的方式來保持中國的門戶開放。在華盛頓進行的藍辛與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之間的幾輪談判，其結果有兩個基本點。第一，承認有相鄰邊界的國家之間存在特殊的關系。在此基礎上，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第二，保證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并信守工商業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原則。然而，戰爭一旦結束，美國就修改了它的調和立場，并開始試探各種選擇，認為舊的帝國主義外交現在應當由東亞國際新秩序取代。1918年，美國曾建議應設立一個美、英、法、日銀行團向中國提供借款。1920年華盛頓又要求廢除英日同盟，因為這是保護日本向中國滲透的手段。

作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華盛頓會議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召開。軍備和遠東關系在平行的小組會上討論。中國代表施肇基致力于廢除不平等條約體系。他保證各條約國在中國工商業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但要求所有有關中國的協定必須公布，簽約時必須有中國參加，有指定的期限，并作出有利于授予者的嚴格解釋。[[52]](#_52___Hua_Sheng_Dun_Xian_Zhi_Jun)

這時日本自己正在經歷一場民主運動（例如，男子普選權在1925年成為法律），同時蒙受1918年以來在西伯利亞的反共干涉的負擔。由此日本需要與美、英協調關系，并尋求與美英的中國政策步調一致。日本就最終恢復中國的全部主權采取合作態度，同時擁護在中國的無限制、無條件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同意將來談判廢除治外法權。

最后，通過審議關稅、勢力范圍、門戶開放和禁止向中國提供軍火等16項個別的條款，產生了有關中國的兩個條約和九項決議。英日同盟結束，四國條約（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沒有任何軍事條款，只承諾進行磋商。海軍限制條約同意英、美、日艦隊的比率為5∶5∶3，這會把日本封閉在它的領海里。關于中國，列強最后同意單獨召開一個目的在于廢除治外法權的會議。關于關稅事務，鑒于中國政府嚴重的財政困難，主要目標是增加中國政府的歲入。同時有一個條約準備修改關稅稅率，倡議將來召開會議修改整個關稅體制。最重要的是1922年2月6日關于中國的九國公約，它把嚴格的和具體的關于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條款結合起來，并反對關于中國鐵路的不公正待遇。從1921年11月1日到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國通過直接談判解決了山東問題，兩國簽訂了一個條約，把以前德國的膠州租借地歸還中國。日本從山東撤回所有軍隊。青島海關并入中國海關，膠濟鐵路及所有財產移交中國。

華盛頓會議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沒有提供實現的方法。中國的主權仍受不平等條約體系損害，部分是因為中國在1922年分裂為北京和廣州兩個政權，沒有一個單獨的政府能行使主權。同時，蘇聯和德國被排除在新體系之外。初看起來，主要的實際結果是消極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擴張已被壓回1905年的邊界。列強的擴張已被放棄，但只是由九個簽字國而且只是在紙上被放棄的。

另一方面，一些歷史學家爭論說“華盛頓列強”——特別是美、英、日——成功地結束了敵對和互相猜疑的年代，并終于正在嚴肅地采納在遠東合作行動，把動蕩減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在這一點上，英—美—日外交可以被看作與戰后歐洲的發展相仿佛，近來的歷史學家已在其中發現了一種在表面仇恨下的國際主義合作的模式。“非正式協定”一詞適用于戰后英、美中東關系的模式，也許也適用于華盛頓會議后的東亞事務。的確，沒有固定的機構來推行集體行動；但三國選擇了以協定代替敵視，并以合作的競爭代替單方面的或個別的行動。[[53]](#_53_Jian_Ru_Jiang_Zhao____Di_Guo)

人們對華盛頓會議時期的說明，大概最后以其對20年代的看法為轉移，或者看作短視和失敗，為以后10年帶來災害的10年，或者看作一個認真致力于重建國際秩序的時代，這種努力一直持續到今天。按照后一觀點，這次會議代表了對遠東新秩序的一種探索，與在歐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類似探索是平行的。于是，中國外交事務的歷史作為爭取規定全球體制以保證國際安全和國內穩定的一章而呈現其意義。

華盛頓會議體系應當成為這樣一種體制。不幸的是，它從來不可能穩定。首先，中國的政治和財政動蕩威脅著它。甚至當1922年會議閉幕時，西方和日本宣布中國正處于政治崩潰的邊緣；北京政府不再能發全薪給它的官員；教師的薪水已欠了幾個月；不能開課；北京市場狀況急劇惡化。政府財政看來無法修補，內閣五次更迭。

然后在1923年5月6日，津浦鐵路的藍鋼皮快車在臨城受到了一千多名土匪攻擊，[[54]](#_54_Chen_Liu_Jie_Qing__Yin_____L)土匪殺死了一些中國旅客，并帶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約16名外國人，其中一名婦女屬洛克菲勒家族。北京政府驚慌失措，命令釋放外國人質。最后土匪在12日釋放了人質，但這使每一個人想起北京政府軟弱無能。外國政府共管中國的爭論又被認真地提出來了。如果一個政府不是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為列強愿意承認它這樣。因為列強需要一個中央政府來償還中國的借款，就外國的新利益進行談判，并按照國際法處理各種事務。如果沒有一個溝通它們利益的主渠道，列強將不得不與大量地方軍閥分別談判。因此，北京政府作為中央政府是一種嘲弄——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虛構——但它是由列強扶持的。盡管政治動蕩，它們還是在1925年召開了一次特別關稅會議，按照華盛頓會議協定來討論修訂關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國民黨及其共產主義同盟者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北伐恰好同時，他們譴責華盛頓會議是帝國主義的共謀，并要求把全部主權無條件歸還中國。同時軍閥與外國的勾結正一浪高過一浪，張作霖和段祺瑞與日本的關系，吳佩孚和陳炯明與英國的關系，以及馮玉祥和國民黨與蘇聯的關系就是例證。

## 莫斯科與中國的雙重接近

在華盛頓會議列強已籌劃逐步改革，在將來某一時間廢除條約體系的時候，蘇維埃革命更加積極地接近中國的國內問題和國外問題。列寧很早就陳述了落后國家可以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后備軍的觀念。1913年5月18日，《真理報》刊登了一篇題為《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的短文。列寧的主要觀點可做如下概括：（1）垂死的歐洲資產階級仍然通過它的政府控制著一切。而且，歐洲資產階級是唯一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死敵。（2）這些資產階級政府聯合亞洲中世紀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統治亞洲殖民地。其結果是殖民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聯合反殖民運動推進了這些亞洲殖民地的民主運動。因此，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是進步的，而控制歐洲的資產階級則是落后的。

因此，列寧相信歐洲的無產階級與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可能結成同盟。同樣的觀念鼓舞約瑟夫·斯大林在1918年寫下了《不要忘記東方》。這一思想在1920年莫斯科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被具體采納。落后的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這就是說，他們被看作是民族主義的旗手。但在某一階段，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會走向反面，成為無產階級的壓迫者。大會同意只有在資產階級是真正的革命者時，落后的殖民地無產階級運動才能支持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馬爾帕夏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并積極支持它。下一個是中國。大約在辛亥革命時，列寧就認為孫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莫斯科的主要中國政策就這樣形成了，中國的無產階級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共同奮斗，莫斯科援助這項事業。由共產國際負責執行計劃。

莫斯科的第二個計劃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個軍閥政權的工作。[[55]](#_55_Guan_Yu_Su_Lian_Yu_Zhong_Yan)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則就是把敵人減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列寧在1920年的文章《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解釋了他的思想，即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沖突，尋求與群眾聯盟的一切可能。（斯大林在1924年的著作《列寧主義基礎》里作了類似的論述。）因此，在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掌權后，盡管他們的權力基礎還不穩固，并受到內部反革命勢力和外部干涉的擾亂，但他們有責任以某種方式與鄰國結盟，或者撇開這點，至少同那些國家建立友好關系，使它們與莫斯科的敵人，即反對革命的俄國軍隊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國斷絕關系。此外，甚至北京政府和軍閥也能在受民族主義感情驅使他們與日英帝國主義對抗的范圍內，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減少敵人的說法，與北京政府改善關系的主意看來確有希望。蘇聯政府本身對此承擔了責任。

簡言之，莫斯科試圖以雙重接觸的政策來支持和擴大中國的社會主義勢力：通過第三國際幫助中國的革命力量，同時通過蘇聯政府促進與中國革命力量的國內敵人（如北京政府和軍閥們）的友好關系。

十月革命后，蘇俄立即主動接近北京政府，并呼吁恢復外交關系。然后在1919年7月，蘇俄通過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終止對庚子賠款的權利，并準備放棄舊沙俄在中國的一切其他權益；接著在1920年9月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兩個聲明放在一起稱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緊接著“五四運動”來臨，當時收回權利運動在中國正接近高潮，這項宣言在中國朝野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東鐵路問題沒有解決，蘇聯干脆地拒絕放棄它。1922年，一位蘇聯高級外交官越飛開始在北京討論恢復外交關系。（當時他在北京從后藤新平那里接到訪問日本的邀請，他在日本恢復蘇日外交關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后來他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1937年自殺[[56]](#_56_Yue_Fei_Zi_Sha_Shi_Jian_Ying)。）接著在1923—1924年間，加拉罕在北京主要與中國外交部總長顧維鈞進行了漫長的談判，于1924年最后完成了以下列三條準則為基礎的恢復外交關系的協議：（一）廢除不平等條約；（二）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三）中蘇共管中東鐵路。

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先后努力接近國民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考慮組織中國的革命力量。[[57]](#_57_Guan_Yu_Gong_Chan_Guo_Ji_Yu)1920年春，格利高里·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遠東部負責人的身份出現在北京，并會見了李大釗。由于李的熱情介紹，維經斯基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按照共產國際的形勢分析，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政黨。由于它是革命的，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必須與它合作。問題是應采取怎樣的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在杭州對此進行了討論。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馬林（亨德里克斯·斯內夫利特）[[58]](#_58_Dao_Fu__Bin____Si_Nei_Fu_Li)主張合作應在國民黨內部進行，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內部跨黨”戰略）。陳獨秀表示反對，他主張與國民黨的合作在黨外進行。經過激烈的爭論，馬林宣布黨應當嚴格遵守共產國際的指示，于是他的觀點占了上風。[[59]](#_59_Zhe_Xie_Fa_Zhan_Zai_Ben_Shu)

然后，越飛拜訪了當時從軍閥陳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孫逸仙；結果于1923年1月26日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布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中國條件的條目表現了越飛的一個主要讓步。孫于2月再次被邀請到廣州領導一個新政府，這個政府與莫斯科的交往變得出乎意外地主動。8月，蔣介石和張太雷被派往蘇聯幾個月，學習蘇維埃的軍事組織及政治代表制度。政治顧問鮑羅廷大約于11月啟程來到廣州，軍事顧問瓦西里·勃魯徹將軍（在中國稱為加倫）隨后于1924年抵達。與他們同來的是援助和軍火。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在1924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按照國民黨新的“聯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規定，李大釗和另外兩名共產黨員被選為由24人組成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委員。毛澤東的名字出現在17名候補委員的名單上。

隨后的共產國際—國民黨聯盟的變遷，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戲劇之中。這次中蘇合作進行革命的社會政治內容，已在本書上卷中詳細論述。這里我們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的開始，這種影響以不同方式延續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種國際秩序結構；這種結構的基礎，是保證莫斯科牌的共產主義將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由于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北伐，華盛頓會議列強處于守勢并進行各種調整。

## 中國的國民革命和列強

蔣介石總司令領導的國民黨國民革命軍以統一全國為目標，于1926年7月經湖南北上。長沙于8月12日，岳州于18日，漢陽于9 月6日，漢口于7日，武昌于10月10日，九江于12月4日，南昌于12月7日相繼陷落。潛伏在這種攻無不克的軍事掃蕩背后的，是國民黨左派與蔣介石周圍的反共新右派之間不斷增長的不和。共產國際認為奪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它發出指示，實行徹底革命的方針。

在此以前，英國曾采取反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硬路線，1926年12月改變方針，并且宣布了溫和的對華新政策。然而，隨著民族主義潮流更加洶涌澎湃，英國尋求緩和的希望破滅了。1927年1月4日和9日，大量的示威者分別沖進了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英國無法派出援兵，最后通過一個歸還租界的協議，放棄了這些租界。[[60]](#_60_Guan_Yu_Zhe_Xie_Fa_Zhan_De_X)

南京于3月24日陷落時，六名外國人在革命軍士兵的暴行中被殺。長江上的英、美炮艇從江中轟擊這座城市，幫助他們的同胞撤退。集合在南京領事館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軍軍官和部隊的搜查。一些人受到粗暴對待，另一些人受到槍托的敲打，財物被毀，但未作任何抵抗。碰巧在領事館建立通訊聯系的海軍官兵拆掉他們的機槍，并應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們的武器藏在一間后房里，以免他們的武器刺激中國士兵。其結果是雖然發生了暴行，但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無事。

這次南京事件的后果是，英國加強了在上海的防衛，并要求日本和美國也這樣做。美國派遣了援軍，但試圖避免刺激中國的民族感情。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貫徹他的不干涉中國的原則。由反對黨政友會領導的對幣原溫和對外政策的批評，在一段時間里曾有所加強。此外，軍部和參謀本部雙方都支持與英國采取聯合軍事行動，認為英國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天的困境。

幣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認為，第一，日本真正的在華利益不在領土而在市場。第二，如果國民政府確實想把全中國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看來這是可能的——日本應該避免摩擦。第三，正在出現分裂的跡象，因為國民政府內部親共分子與反共分之子之間的沖突加劇了。最后，如果中國不答復日本的最后通牒，并拒絕日本的要求，怎么辦？外國支持蔣介石會使之像一個叛徒。除了讓蔣介石自己把共產黨清除出國民政府外，別無其他有效的辦法。當然這是他在1927年4月的流血政變以及隨后的剿共行動中所做的事。

由于蔣的反急進政變，華盛頓會議體系可望最后到位。中國終于有了一個有希望保持穩定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反對蘇聯——一個留在華盛頓框架之外的強國。華盛頓列強雖有分歧，但它們并沒有完全放棄在中國互相協商和合作的原則。不幸的是，1927年后的歲月表明，在國內動亂不僅席卷中國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國家的時代，在遠東創造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是多么艱難。

這段無休止的動蕩歷史，將在下一章中論述。在這里，1927年后中日關系的梗概應足以說明，實現一個被國內勢力所接受并為其所支持的國際秩序模式是極端困難的。

蔣介石采取反共行動，展現了條約國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在同一個月里，日本內閣易手。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陸軍大將田中義一。作為反對黨的領導人，田中從來沒有放棄過批評其前任幣原對華政策軟弱的機會。現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強硬對華政策的職位。[[61]](#_61_Wei_Lian__F_Mo_Dun____Tian_Z)

在北伐的1927年階段，當革命軍于5月迫近山東省時，田中以保護日本僑民為名派軍隊到山東。中國軍隊撤回魯南，避免了一場沖突。1928年4月北伐重新開始，田中再次派兵進入山東。較早占領濟南的中國軍隊與那里的日本軍隊遭遇，經過一些小事件之后，雙方于5月3日發生沖突。受反帝情緒驅使，有些中國士兵出來殺了11名日本平民。日本軍隊對中國軍隊發動大規模的行動，并把他們逐出濟南近郊。中國軍隊繞開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進軍。雖然未與日軍發生進一步沖突，但是濟南的戰斗，甚至在蔣的政治上溫和的部隊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緒。

張作霖大元帥被這些中國軍隊打敗，于6月3日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他的沈陽大本營。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陽這一邊的一場大爆炸中喪了命。他的被暗殺是由一小撮日本軍官策劃的。他們的想法是，張作霖的死將使滿洲群龍無首，并陷于混亂。然后日軍將以恢復秩序而干預，并占領滿洲。[[62]](#_62_Jia_Wan__Mai_Kao_Mi_Ke____Zh)但與此相反，滿洲并未陷入混亂。當時在北京的張學良趕回沈陽，他對父喪一直秘而不宣，直到7月21日年輕的張學良繼位。暗殺不久就被確認是關東軍干的，但張學良認識到發布這條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擺布，所以保持了沉默。

在提防日本搗亂的同時，這位滿洲的新統治者也發現他被中國民族主義收回主權的要求所吸引。首先他與他父親的宿敵國民黨拉上了關系，然后他在滿洲升起了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與南京政府的秘密談判結束后，滿洲于1928年12月29日易幟。張加入國民黨，并被任命為東北邊防軍總司令。此后，張逐漸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國人在滿洲的反日運動趨于公開化。日本商人受到損害，甚至實力雄厚的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也出現赤字。接著1929年末的大蕭條時期來臨了。

一系列的事件標志著滿洲的形勢正在惡化。在滿洲的朝鮮農民據說一度曾達到200萬人，主要從事水稻種植。但是1931年中國的反日運動更廣泛組織起來了，來自朝鮮的農民在1910年是日本的臣民，他們生活在日本政權難以到達的邊遠地區，忍受著無數事件的沖擊。滿洲的朝鮮族人下降到大約80萬。

1931年，大約400名朝鮮農民租佃了長春以北萬寶山的土地，并開始以艱苦的勞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國當局禁止他們定居，并命令他們離開。由于日本領事的抗議，命令暫時撤銷了。但是在7 月1日，大約800名中國農民襲擊了這片土地，并開始破壞新的灌渠。侵入者與從長春附近趕到出事地點的日本警察之間爆發了一場沖突。這成了日本報紙的頭條新聞，而在一段時間里，朝鮮各地的朝鮮人對當地的華僑采取了激烈的報復行動。

這時日軍的頭號假想敵是蘇聯。萬寶山事件期間，日軍參謀本部派遣軍官中村震太郎上尉進入西部滿洲測量地形，為對蘇戰爭作準備。張學良部下狂熱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槍殺了他。被指控的兇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帶到沈陽，而且日本領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為9月18日是沈陽事變之夜。一小撮關東軍軍官炸毀了一段南滿鐵路；并以此為借口，向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不到半年，全滿洲已落入日軍之手，并被從中國分離出去。日本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焦點。在僅僅20年內，清朝的東亞地區秩序、華盛頓會議條約國所設想的國際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夢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為中華民國的國際模型，都已證明是徒勞的。

[[1]](#_1_1)本章著者非常感激道格拉斯·雷諾茲、馬里烏斯·詹森和入江昭協助完成本章的英文譯本。

[[2]](#_2_1)見約瑟夫·弗萊徹：《1800年前后清代的亞洲腹地》，《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2章。

[[3]](#_3_1)W.L.蘭格：《帝國主義外交：1890—1902年》仍是這方面的名著。

[[4]](#_4_1)馬克·曼考爾：《俄國與中國：1728年以前的兩國外交關系》。

[[5]](#_5_1)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7章（約瑟夫·弗萊徹文）。

[[6]](#_6_1)王賡武：《明初與東南亞的關系》，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的中國對外關系》，第50—60頁。

[[7]](#_7_1)莫里斯·羅薩比編：《中國在對手之中：中央王國及其鄰國，10—14世紀》。

[[8]](#_8_1)韓德：《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見該書第4章《李鴻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國，1879—1895年》。

[[9]](#_9_1)理查德·J.史密斯：《雇傭兵與官吏：常勝軍在19世紀的中國》；費正清：《依靠條約的共同統治》，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0]](#_10_1)本書上卷第1章。

[[11]](#_11_1)見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第143—145頁。

[[12]](#_12_1)關于這些趨勢，見莫里斯·羅薩比：《1368年迄今的中國與亞洲腹地》。

[[13]](#_13_1)關于這個過程，見約瑟夫·弗萊徹：《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會》，《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8章。

[[14]](#_14_1)托馬斯·E.尤因：《處于兩大國夾縫中？中國和俄國在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39頁和各處。見彼得·S.H.唐：《俄國和蘇聯在滿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第7—13章的全面敘述；又見羅薩比：《中國與亞洲腹地》第9章更近的概述。1917年以后的事件在B.希倫德夫和M.桑吉道爾吉編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第3卷《現代時期》中有敘述。

[[15]](#_15_1)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承認蒙古獨立。——譯者

[[16]](#_16_1)H.E.理查森：《西藏簡史》第7章《1914年西姆拉條約》；克萊夫·克里斯蒂：《英國、中國與西藏的地位，1914—1921年》，《現代亞洲研究》季刊第10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481—508頁；阿拉斯泰爾·拉姆：《中印邊界：邊界爭端的起源》。

[[18]](#_18_1)入江啟四郎：《中國邊 疆與英俄角逐》和羅薩比：《中國與亞洲腹地》，第220—229頁。又《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4卷，第11—13頁。楊增新在新疆保持的中國統治，在國民黨政府的控制于1943年得到重申以前，由1933年奪取權力的盛世才繼續，盛世才是蔣介石下面的一個日本 訓練的軍官，他處決了許多反對者，并與俄國人交往。關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評價，見陳福霖：《盛世才在新疆的改革計劃：理想主義還是機會主義？》。

[[19]](#_19_1)所以理查德·斯托里為他1979年的著作選用書名為《日本與西方在亞洲的衰落，1894—1943年》。關于這一節的一般環境，見馬里烏斯·B.詹森：《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年》，又見喬舒亞·福格爾：《政治與漢學：內藤湖南（1866—1934年）個案》。

[[20]](#_20_1)見約瑟夫·弗萊徹：《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7章，《東北滿洲的喪失》。又見羅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滿洲邊疆》和韓德：《邊防與門戶開放》第1章。

[[21]](#_21_1)關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戰爭，見伊恩·尼什：《英日同盟：兩個島嶼帝國的外交，1894—1907年》；岡本俊平：《日本寡頭政治集團與日俄戰爭》；約翰·A.懷特：《日俄戰爭的外交》；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第2卷《英日同盟與日俄戰爭》。

[[22]](#_22_1)秘密草約收入約翰·馮·A.麥克默里編：《1894—1919年與中國締結或涉及中國的條約和協定》第1卷，第554頁；懷特：《日俄戰爭的外交》第341頁和韓德：《邊防與門戶開放》第159—161頁討論到這個草約，但對草約的效力表示懷疑。

[[23]](#_23_1)該條約的簽字日期應是12月22日。——譯者

[[24]](#_24_1)關于條約中心點和措辭的含糊，見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關系研究》第70頁，尼什斷言“1911年條約基本上是消極的”。

[[25]](#_25_1)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280—281頁。

[[26]](#_26_1)韓德：《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第3章《排外政治和外交，1879—1895年》。

[[27]](#_27_1)斯蒂芬·R.麥金農：《清帝國末年的權力與政治：袁世凱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

[[28]](#_28_1)Govermor of Liaotung，應為奉天巡撫。——譯者

[[29]](#_29_1)赫伯特·克羅利的《司戴德》和芮恩施的《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的敘述已為韓德的《邊防與門戶開放》的敘述所取代。又見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奧多·羅斯福與日本》；查爾斯·E.諾伊：《不可靠的友誼》；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遠》。條約文本收入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12—313頁；美國國務院：《美國對外關系，1908年》，第511—512頁。

[[30]](#_30_1)角田順：《滿洲問題與國防方針》，第705頁以下。

[[31]](#_31_1)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9集第1冊，第650頁以下；鶴見祐輔：《后藤新平》第2卷，第732—809頁，載有后藤新平關于滿鐵的專題報告和10年計劃。這個地域的管理引起軍部領袖和文官領袖之間爭奪最高權力的尖銳沖突。

[[32]](#_32_1)約翰·揚：《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1945年：歷史和書目》。

[[33]](#_33_1)此處的煙臺，不是山東省的煙臺。——譯者

[[34]](#_34_1)馬里烏斯·詹森：《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6章。

[[35]](#_35_1)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05—309頁。同一報告強調指導將來日本移民到大陸以加強日本在大陸的地位之重要性。

[[36]](#_36_1)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中國事件》特卷，第382頁以下。又見馬里烏斯·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和池井優：《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亞洲研究雜志》第25卷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27頁。

[[37]](#_37_1)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第2卷，第476頁。又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關于孫逸仙的親密合作者宮崎滔天的情況，見宮崎滔天：《我三十年的愿望》。

[[38]](#_38_1)中島正郎編：《續對華回顧錄》第2卷，第153頁以下。然而，孫逸仙先往英國力請英國政府反對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幫助清政府的建議。關于這個建議和其他借款建議的討論，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第146頁；艾伯特·A.奧爾特曼和史扶鄰：《孫逸仙與日本人：1914—1916年》，《現代亞洲研究》第6卷第4期（1972年10月），第385—400頁；韋慕庭：《孫逸仙：壯志未酬的愛國者》，第78頁以下。

[[39]](#_39_1)善耆的女兒金碧輝（日本名川島芳子）為川島浪速的養女，曾遭川島強奸，但并未與川島結婚。——譯者

[[40]](#_40_1)栗原健編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日俄戰后起至大正期止》，第139頁以下。又見緒方貞子：《在滿洲的挑戰：日本對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年》。

[[41]](#_41_1)關于第二次革命，見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第159頁以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第154頁以下。

[[42]](#_42_1)栗原健編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第87頁以下。

[[43]](#_43_1)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81頁。

[[44]](#_44_1)馬德琳·池：《中國外交：1914—1918年》；馬德琳·池：《曹汝霖》，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崛川武夫：《遠東國際政治史概論》；朱葆瑨：《顧維鈞：中國外交官與民族主義外交個案研究，1912—1966年》，第10頁；詹森：《日本與中國》，第209—223頁。

[[45]](#_45_1)芮恩施的記事，在他所著《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華盛頓的反應在阿瑟·S.林克：《威爾遜》第3卷《為中立而斗爭，1914—1915年》中得到可靠的論述。

[[46]](#_46_1)詹姆斯·里德：《傳道精神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年》第5章。

[[47]](#_47_1)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第104頁以下。

[[48]](#_48_1)見鈴木武雄編：《西原借款資料研究》。

[[49]](#_49_1)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第127頁以下。

[[50]](#_50_1)見本書上卷，第8章（史華慈著）。

[[51]](#_51_1)見羅杰·丁曼：《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托馬斯·巴克利：《美國與華盛頓會議》；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后：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年》。

[[52]](#_52_1)《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第866—868頁；田村幸策：《大東亞外交史研究》第2卷。

[[53]](#_53_1)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后》第1章；喬恩·雅各布森：《有20世紀20年代的新國際史嗎？》，《美國歷史評論》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頁；邁克爾·霍根：《非正式協約》；伊恩·尼什：《英日疏遠，1919—1952年》。

[[54]](#_54_1)陳劉潔清（音）：《臨城事件》，《東方研究雜志》第10卷第2期（1972年7月）。

[[55]](#_55_1)關于蘇聯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參考王聿鈞：《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1917—1926年》。

[[56]](#_56_1)越飛自殺時間應是1927年。——譯者

[[57]](#_57_1)關于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派打交道的詳情，見韋慕庭和夏連蔭編：《有關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的文件，1918—1927年》；理查德·C.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1—1931年》；艾倫·S.惠廷：《蘇聯在中國的政策，1917—1924年》；羅伯特·C.諾思：《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員》。

[[58]](#_58_1)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頁。

[[59]](#_59_1)這些發展在本書上卷第10章（陳志讓著）和第11章（韋慕庭著）得到更充分的論述。

[[60]](#_60_1)關于這些發展的詳細情況，見本書上卷韋慕庭著：《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年》。

[[61]](#_61_1)威廉·F.莫頓：《田中義一與日本對華政策》。

[[62]](#_62_1)加萬·麥考密克：《中國東北的張作霖，1911—1928年》；馬場伸也：《進退維谷的日本外交：關于日本對華政策的新見解，1924—1929年》。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27—1937年

南京政權是在派系斗爭和流血中誕生的。1927年4月12日清晨，黑手黨[[1]](#_1_Hei_Shou_Dang_____20Shi_Ji_Ch)似的青幫歹徒沖上上海街頭，捉拿共產黨人和共產黨嫌疑分子，把他們就地槍決或用大刀砍死。當時和以后的一個月內，被屠殺者達數千人。蔣介石已同共產黨分裂；第一次統一戰線就此結束。六天后，在4月18日，國民黨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臨的挑戰極為嚴酷——不亞于要力挽百余年來遍及全國的國家分裂的浪潮。全國性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早已不復存在。政治權力久已落入地方軍閥之手，他們同樣也是常常不關心民眾的福利，只求依靠軍事實力來增加個人的財富和權力。道德社會的意識——即有關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價值觀和適當關系的廣泛而深入的共識，它對傳統中國的穩定曾作出過重大貢獻——已經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混亂和爭斗。甚至傳統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也已遭侵蝕。

## 權力初步鞏固

因為中國人對國家的凄慘情景、軍閥紛爭造成的破壞和外國侵略帶來的屈辱非常敏感，國民革命軍北伐，從南方的廣州（始于1926 年7月）到北方的北京（1928年6月占領），沿途受到民眾熱烈的歡迎（見第12卷）。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國民黨統治表明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新時代里，中國將重新統一和強盛，全民經濟富足，民眾不再以做中國人為恥。然而，早在1929年，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為國民黨人在把注意力轉移到新時代的建設任務之前，首先必須決定黨內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權力。

自孫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后，為爭奪國民黨運動的領導權，國民黨內一直存在殘酷的、甚至流血的斗爭。這些權力的爭斗在北伐時曾被掩蓋起來。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國政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黨內斗爭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動恢復。所以，在南京政權十年統治開始之時，國民黨運動便已混亂不堪。事實上在1927年春，中國有兩個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及“中間派”的南京國民政府和仍與共產黨人聯合的左派國民黨的武漢國民政府）和三個要求國民黨領導權的總部（除漢口和南京的總部外，極右翼西山會議派要求它們在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唯一的合法性）。使這種局面復雜化的是，這些權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個或幾個省的軍閥的支持。這些軍閥只是新近才宣布擁護革命；他們很少，或完全不受國民黨運動的意識形態目的的約束；他們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擴大，也可保全他們個人和地方的權力。

在這些斗爭之初，蔣介石幾乎被排除在競爭之外。僅僅在南京政府成立三個月之后，蔣介石的軍隊當其正著手北伐進軍北京時，為軍閥孫傳芳的軍隊所擊敗；在他們潰退中，孫傳芳的軍隊甚至威脅要占領南京。結果蔣介石的威望大損，南京政府內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為首的新聯盟，在1927年8月逼蔣介石下野。

與此同時，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左派國民黨，效法蔣介石也清洗自己隊伍里的共產黨人。隨著蔣介石的下野和對共產黨人的清除，黨內爭吵的兩個主要原因已經排除，敵對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開。1927年9月，南京政府、武漢政府及西山會議派的代表組成了“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統一的國民黨政府。

這個新政府并不比前兩個政府更穩定。國民黨運動的兩個最有實力的領袖——蔣介石和汪精衛——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財政上一籌莫展。到1928年1月，特別委員會的政府垮臺。蔣介石在下野五個月（這期間他同美麗的宋美齡結婚）后復職，權力比以前更大。2月，他被提名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0月，他又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于是成為國家的首腦）。他如今控制了國民黨三位一體政權的全部三條腿——黨、政、軍。

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南京政府變成了軍事獨裁政府。在蔣介石掌握領導權以前，國民黨運動（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其前身）從來不是個團結的、思想統一的，或有嚴格組織紀律的政黨。孫逸仙最初在1894年組織興中會，他的追隨者包括具有各種不同意向和動機的人。事實上，孫逸仙似乎未曾拒絕過任何申請人入黨。至少有一個例子，孫逸仙甚至接納軍閥陳炯明的全體軍人加入國民黨。因此，國民黨員湯良禮寫道，1924年改組前的國民黨不是一個政黨，只不過是個“各種各樣政客組成的集團，他們大多數很少關心孫逸仙所擁護的主義，只是為達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孫逸仙在民眾中的崇高威望”[[2]](#_2_Tang_Liang_Li____Zhong_Guo_Ge)。國民黨的凝聚傾向，隨著革命運動走向奪取全國權力的關頭而變壞了。由于當時各種政治派別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風使舵，國民黨黨員數量從1926年的僅15萬人增至1929年的63萬人。從未受到嚴格控制的黨組織，完全不顧新申請人的背景、品質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標，就接納他們入黨。蔣介石部隊的參謀長何應欽在1928年1月抱怨說，“各級黨部只關心（新黨員）數量，不注意（新黨員）質量。因此，黨的精神日益衰敗”[[3]](#_3___Chen_Bao____1928Nian_1Yue_1)。這樣，國民黨黨員的構成狀況在1927年已混亂不堪，蔣介石因而開始把許多不符合他需要的黨員清洗出黨。在審查黨員過程中，他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黨運動的性質。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產黨人。如果沒有孫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國共產黨人和蘇聯組成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國的政權。國民黨借助于共產黨人的建議、物資支援和組織技巧，按照俄國共產黨的模式改組；一支由黨領導和受過政治灌輸的軍隊得以建立起來；青年革命干部到軍閥割據地區的農民和工人中去，鼓動和組織農工支持革命。有意義的是，那些曾從事困難而又危險的組織群眾工作的人，被認為更接近共產黨人而非國民黨人。何應欽承認“國民黨員不愿做實際的下層工作，結果共產黨人很自然地把這項工作擔負起來，使我們的黨同農工分離”[[4]](#_4_He_Ying_Qin____Jin_Hou_Zhi_Zh)。那些較少承擔革命義務的人避免在群眾中工作，從而避免了共產主義的感染。所以，清洗共產黨人具有過濾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響；而從革命運動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間向國民黨灌輸活力、紀律和獻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產黨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張采取比蔣介石所贊成的更為激進的解決全國問題辦法的廣大的國民黨員階層。國民黨左派在1928年和1929年間，是蔣介石最難對付的政治對手；只是在經過近兩年的殘酷斗爭之后，蔣介石才把他們鎮壓下去。左派分子大聲指責蔣介石正在建立的“個人軍事獨裁”，要求國民黨恢復1924年孫逸仙領導革命時期激勵革命運動的政策和精神。他們主張應由黨而不是由軍隊來控制和提供政權的方向。左派分子同共產黨人不同，他們拒絕接受階級斗爭的觀念和政策；但是他們認為黨必須通過農、工及其他群眾團體以保持和加強同民眾的關系。他們堅持，只有有了這樣的群眾基礎，他們才能阻止革命成為官僚和軍閥的玩物。[[5]](#_5_Si_Ma_Xian_Dao____Bei_Fa_Hou)

許多國民黨員，也許是大多數黨員，支持這些激進觀點。但是，身為國民黨左派的湯良禮的估計，即這個時期80%的黨員屬左派，確實是夸大了。[[6]](#_6_Tang_Liang_Li____Zhong_Guo_Ge)然而，很清楚，許多下層和青年黨員（1929年1/3國民黨員年齡在25歲以下）是同情左派觀點的。

汪精衛是左派公認的領袖，但是他1928年和1929年寄居歐洲，并且至少在表面上與反蔣運動無關。所以，左派組織的幕后策動者是陳公博，汪精衛的忠實伙伴，一度曾是共產黨人；1928年5月他創辦《革命評論》周刊作為左派喉舌。雖然該刊發行量從未超過1.5萬份，但聲望和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南京政府在該刊創刊僅四個半月以后，就在9月勒令其停刊。

面對政府鎮壓的前景，陳公博決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無組織的汪精衛的支持者——應當組織起來。雖然，汪精衛把自己視為國民黨全黨的領袖，而不只是派系領袖，他本人對這項計劃搖擺不定，但是，陳公博在1928年末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這個名稱象征該會擁護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時通過的革命原則。改組派正如它的名稱所示，是一個有書面黨章的正式組織，在上海設有總部，在全國許多地方設有分部。1928年，陳公博又在上海組織大陸大學，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輸左派的政治觀點，并為改組派培訓干部。

左派分子雖然都承認汪精衛是他們的領袖，但并不團結一致。在改組派內，顧孟馀派顯然不如陳公博派激進。顧孟馀在他本人主辦的刊物《前進》上發表他的觀點，不贊成陳公博強調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為國民革命的核心。顧孟馀還對群眾運動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賢，不喜歡陳公博，而置身于改組派之外，雖然他們仍忠實于汪精衛。這樣，國民黨左派也一如蔣介石所領導的右派，同樣受到內部分裂之苦。[[7]](#_7_Jiang_Shang_Qing____Zheng_Hai)

國民黨左派反蔣和反南京當局，不限于意識形態的理論討論和宣傳，因為這些往往在地方黨部和省黨部占主導地位的激進分子，狂熱地工作以求實現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組織抵制洋貨，領導民眾游行示威反對外國教會和醫院。他們組織特別法庭審判和懲辦反革命分子。他們也開始實行減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階級的敵視，從而損害了南京當局從那一群體籌款的工作。同樣，在江蘇，激進分子組織民眾，并沒收寺廟，改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當局的不滿。[[8]](#_8_Nuo_Ai_Er__Lei__Mai_Na____Zhe)

激進分子的活動及汪精衛含蓄的政治挑戰，使國民黨右派深為不安。所以，緊接著蔣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掌權之后，南京當局開始大力鎮壓國民黨左派，盡管一般沒有流血。例如，在2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所有“不為黨帶來榮譽的”省黨部都奉命解散，命令黨員重新進行登記；要求全體黨員必須按黨的領導“精神”行事。重新登記黨員的措施，顯然是為了清除有激進思想表現的分子，保證黨員能順從地接受當權者的命令。民眾運動事實上也已中止。此后，民眾團體將充當南京當局進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達民意或創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對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極為兇殘，至少有一個左派領袖被暗殺，另一些被打傷和刺傷。地主可能對這種暴行負有責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蔣介石的親密支持者張人杰（張靜江）的主持下，通過逮捕不服從的左派分子，并勒令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黨報《民國日報》停刊，[[9]](#_9_Xiao_Zheng____Tu_Di_Gai_Ge_Wu)以此來袒護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影響，他們明確地受到告誡要遠離政治。四中全會宣言（1928年2月）稱：“最不幸的事實是，如今未成熟的學生參加我們的政治社會斗爭。準許這些尚未成熟和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的少男少女自由參加國家事務，不僅會犧牲我們民族未來的生命，而且也會使他們視整個國家和人類社會為兒戲。”[[10]](#_10___Zhong_Hua_Nian_Jian__1929)

國民黨右派的最高權力的地位，終于在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確立。蔣介石派注意到黨的下層組織充滿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別措施保證右派對大會的控制。以黨員重新登記尚未完成和地方黨組織尚處于混亂狀態為由，大會代表只有1/4是由黨員選舉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黨部指定。[[11]](#_11_Yu_Er_Gen__Duo_Mei_Si____Tui)左派分子強烈譴責這一破壞黨內民主原則的行為，宣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非法。然而，這些指責終歸徒然，因為蔣介石已經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國民黨，把他本人的革命觀念強加給黨和政府。左派領袖因不服從而受到處分，陳公博和甘乃光被“永遠開除”出黨；顧孟馀被停止黨籍三年；汪精衛因“跨黨”錯誤受到警告。[[12]](#_12___Yi_Shi_Bao____1929Nian_3Yu)其后，左派的論點，革命建設時期政府應該只是黨的行政部門，黨應該是最高的機關，最后被拒絕。相反，在1929—1931年間，黨被剝奪了大多數權力，不論在制定政策上，還是在充當監督機關上，都不再有所作為。更早一些時候，蔣介石已廢止了軍隊內的黨代表制度。[[13]](#_13_Zheng_Zhi_Wei_Yuan_Zhi_Du_Za)無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壓制，而黨的地位也相應降低。

正當蔣介石把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分子清洗出國民黨運動時，他也越來越依賴舊式官僚和軍隊。革命一旦成功在望，過去各個軍閥政權的官僚紛紛南下南京，謀求有利可圖的新職。蔣介石面臨管理一個全國性政府的挑戰，歡迎他們投入他的陣營。到1929年，十個部中至少有四個部長由這些新歸順革命事業的舊官僚擔任。他們還塞滿了官僚政治的許多其他職位，以致國民黨老黨員郭泰祺憤怒地辭去外交部次長職務，指責說，“黨在去年被共產黨人篡奪，現在差不多被舊官僚勢力所篡奪，實無二致”[[14]](#_14___Bei_Hua_Jie_Bao____1928Nia)。舊官僚勢力對新政權的影響深遠。這些舊官僚帶來在他們先前職位中表現出來的同樣的人生觀，同樣的權力貪欲而不顧公益。官僚政治變得程序化了；官僚寫出數不清的公文，倒騰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實際貫徹；貪污腐敗迅速浸透了行政機關。這樣，舊軍閥政權的價值觀、態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國民黨的黨員調查了他們政府的腐敗，并把腐敗歸因于當時涌進國民黨的政治投機分子和舊官僚。[[15]](#_15_Li_Ru__Jian_Cheng_Yuan_Zhen)

或許，確定國民黨運動未來方向的更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軍人的普遍影響。孫逸仙在世時，軍人在國民黨運動中比較受到輕視。然而，在蔣介石領導下，孫逸仙的排列順序——首先是黨，其次是政府，最后是軍隊——已被顛倒了過來，軍隊如今成為首要的組成部分。在下列事實中可以看出這種狀況：1929年，在國內國民黨一半以上的黨員是軍人，而不是平民。在黨的領導人——中央執行委員——中，在1935年有43%是軍官。在1927到1937年間，國民黨人控制的33個省份的省主席，有25個是將軍。[[16]](#_16_Luo_Bo_Te__C_Nuo_Si____Guo_M)在這10年間，政府支出的大約2/3撥充軍費和償還債務（大部分債款是根據契約應付的軍事費用）。[[17]](#_17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然而，軍人統治的真正程度，還不完全表現在這些統計數字上，它更表現在蔣介石這個軍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隨著南京政權10年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

## 各省的斗爭

隨著對付左派取得了勝利，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員會內的權力也穩固起來。然而，這時互相沖突的主要舞臺轉移到了各省。

時至1929年，國民政府的旗幟已在中國本土全境和滿洲飄揚。國民黨軍已于1928年6月占領北京，北京改名為北平。1928年12月29日，滿洲四省軍閥張學良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隨著國家這時自1916年以來第一次名義上實現統一，南京當局可以為和平建國謀劃了。

然而，一個主要障礙依然存在。革命的軍事階段獲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許多省的軍閥在戰場上戰敗，而是因為他們歸附了革命運動。雖然這些軍閥獲得了國民黨黨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級制中的顯赫職位，但是他們不相信蔣介石，妒忌他日益擴大的權力，而且大多對國民黨運動的思想意識漠不關心。致力于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的蔣介石及南京當局，在北伐期間，有必要容忍地方軍閥的自主權力。他們事實上甚至設立了一些當地的政治分會，使各省軍閥的地位合法化。這些在1928年設立的政治分會，名義上隸屬南京中央政治會議；然而，事實上它們是自治的行政機關，至少是暫時使大軍閥集團的地方統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肅、陜西和河南三省的馮玉祥，主持開封的政治分會；閻錫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會而得以合法化；所謂的桂系控制著漢口、北平和廣州的政治分會，分別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濟深主持。張學良在東北易幟之后，第六個政治分會在沈陽成立。[[18]](#_18_Li_You_Hua____Di_Qu_He_Guo_J)

蔣介石把在各地設立政治分會看作權宜之計，因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軍隊的權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軍閥的自治權力挑戰。首先，在1928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會將在1929年3月撤銷。然后，在1929年1月，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中央政府當局在會議上提出裁減中國軍隊的方案。

編遣軍隊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認。自清朝覆亡以來，中國軍隊已經驚人地膨脹。1929年，大約為200萬人（而清朝約為40萬人；1922年約為120萬人）。如今革命的軍事階段已經結束，龐大的軍隊已無必要，并且也是國家財力無法支持的負擔。例如，在1928年，南京嫡系軍隊約為24萬人，年需軍費約3.6億元。而南京政府年財政收入（清償債務后）僅為3億元。[[19]](#_19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此外，雖然地方軍閥的軍隊不構成南京的直接財政負擔，但是，他們卻截留本來可以納人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稅款。人們因此認為，除非裁減軍隊，政府將無法進行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重建工作。

在編遣會議上，中國大軍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同意全國軍隊裁減至80萬人，限制軍事支出占政府財政收入的41%，并設立統一指揮機構。然而，編遣會議是一個失敗的會議，因為軍閥們對蔣介石的疑慮在會議期間加劇了。蔣介石的黃埔系軍隊事實上是中國訓練和指揮得最好的軍隊，蔣介石利用戰斗力差的軍隊應予首先復員的原則，要求地方軍閥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犧牲。因為軍隊是地方軍閥政治權力的主要泉源，地方軍閥認為蔣介石不過是利用軍隊編遣問題來建立對他們的政治優勢。不管地方軍閥多么可能愿為國家的利益作出貢獻——這當然是可爭辯的——他們可不想放棄自己的野心，而讓蔣介石增強他的實力。因為他們并不覺得蔣介石比他們更有權利來要求掌握國家權力和充當領導。所以，他們在1929年1月末鼓掌贊成軍隊編遣原則之后，離開了編遣會議，卻決心為保持他們的軍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進行反蔣。至于蔣介石，他同樣決心建立中央政府對各省的統治。結果是連續不斷、損失慘重的內戰。

編遣會議閉幕僅兩個月后，第一次內戰即在1929年3月爆發，當時桂系——危機表面上是蔣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這是一次很難對付的挑戰，因為桂系領袖是很有才能的戰術家，指揮軍隊約23萬人。馮玉祥——他指揮22萬人，大概是蔣介石最有能量的軍事對手——也有可能加入叛軍一方。這次挑戰可能毀滅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卻適合蔣介石發揮他的天才。因為蔣介石收買了馮玉祥，據說花了200萬元和答應他控制山東省。然后，蔣介石以他的優勢部隊在不到兩個月內擊敗桂系軍隊。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湖北的絕對統治隨即瓦解。他們倉皇退回廣西省老家，懷著屈辱，以待來日。

1929年5月，僅一個月后，蔣介石違背把山東交給馮玉祥控制的諾言，激起了馮玉祥的反叛。在這次較量中，馮玉祥一半的軍隊——全部最精銳的部隊10萬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這又是一次由大宗賄賂引起的突然變節。在這場角逐中，馮玉祥殘部被逐出山東和河南，閻錫山在山西消極觀望。

隨著馮玉祥軍隊受到中央軍的重創，華北的力量均勢顯然轉向有利于南京政府。閻錫山因此感到威脅，于1930年2月和3月，與大為削弱的馮玉祥共同組成新的反蔣運動。這就是北方聯盟，對蔣介石權力迄今最嚴重的一次挑戰。因為閻錫山和馮玉祥如今已形成一個廣泛的反蔣力量聯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諾從華南配合他們的進攻。蔣介石的許多文職對手——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團諸如汪精衛及其改組派和極右的西山會議派——為反蔣運動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識方面的力量。不久，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開始創立一個獨立而永久的政權所需要的組織機構。“國民黨擴大會議”——在職能上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于1930年7月在北平召開。同年9月，一個新國民政府成立，閻錫山任國民政府主席。新政權頒布約法，包含保證各項人身自由的條款，也吸引了相當普遍的支持，特別是開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壓制刺痛的全國知識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月，蔣介石就命令他的軍隊對付北方聯盟。在這次內戰中，作戰不同于軍閥老一套的戰斗方式。南京軍隊和北方軍隊戰斗十分激烈。物資損失巨大；在四個月的戰斗中，雙方傷亡約25萬人。截至同年9月，正當北方聯盟宣告組成新政府時，南京方面即將在內戰中取得優勢，反叛政府從北平逃到太原。然而，最后，北方聯盟和南京政府的領袖都認識到奉系軍閥張學良能夠轉變戰爭形勢，于是雙方都討好張學良。最后，南京政府賄賂張學良1000萬元并許以管理黃河以北全境，把他爭取過去。張學良在9月中旬發表宣言擁護中央政府。北方聯盟從而失敗。可是南京政府從此次戰役的勝利中得益甚少。原因是張學良迅速率領10萬東北軍開入北平、天津地區，控制了主要鐵路及天津海關的巨額關稅收入。因此，華北依然處于南京政府行政統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斷發生。在逼蔣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實際上成功了——共六個星期。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與前幾次相同，妒忌蔣介石日益擴大的實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權的要求。然而，總是有些次要問題給反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蔣介石扣留胡漢民。蔣介石痛感北方聯盟因頒布約法而得民心，他決定于1931年2月宣布頒布同樣的文件。他堅定地說：“沒有約法，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就沒有保障……沒有對人身和財產的保障，就沒有國家的真正統一和內戰的結束。”[[20]](#_20___Zhong_Hua_Nian_Jian__1931)

然而，胡漢民激烈反對這一提案。他公開宣稱頒布約法是違反孫逸仙的意圖——雖然他反對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蔣介石意在根據新約法出任總統以擴大權力。為反對蔣介石單方面決定頒布約法，胡漢民辭去立法院長職務。于是蔣介石扣留了胡漢民，因為——據蔣介石解釋——“只有采取這種辦法他的光榮的過去才可以保全無損”[[21]](#_21_Tong_Shang_Shu__Di_530Ye__Le)。

表面上為抗議蔣介石扣留胡漢民，兩廣軍閥和蔣介石的各類文官對手（如汪精衛、西山會議派和孫逸仙之子孫科），于1931年5月在廣州建立了一個分裂主義者的新政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會議”組成，由此進而在1931年6月1日創建了新的國民政府。[[22]](#_22_Duo_Mei_Si____Tui_Chi_De_Ge)實權則握于地方軍閥之手，特別是廣東省主席陳濟棠之手。

新廣州政權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責和非難。廣州政權聲稱只有獨裁者蔣介石在南京辭職，它才放棄反對立場。

若不是日本軍隊在1931年9月18日進犯滿洲，這場沖突可能像前幾次一樣要兵戎相見。由于中國民眾，特別是學生的抗日激昂情緒，要求停止黨內紛爭和組織聯合政府共御外侮的壓力變得不可抗拒。經過非常秘密的談判和復雜的會議——包括在南京和廣州分別召開的兩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在上海舉行的寧粵和平統一會議——之后，兩個對立政權達成協議。12月15日，蔣介石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只保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引退”回到他的故鄉浙江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組成。德高望重但無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出任行政院長，成為新政府的實際首腦。

孫科政府在1932年1月1日就職，僅存在25天。國民黨三大人物——汪精衛、胡漢民和蔣介石——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絕與新政府合作。新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財政職責。中央軍依然效忠蔣介石。新政府的領導人被面臨的種種緊急問題壓得一籌莫展——甚至早在1月2日就懇求（但未成功）蔣介石和汪精衛回南京，以便政府聽取他們的建議。

孫科政府的境況日益惡化，蔣介石看準這種困境是他重新掌權的機會。然而，反對他的“獨裁”一直如此強烈，他知道不可能恢復引退前所擁有的職位。蔣介石、汪精衛和孫科在杭州經過三天緊張的談判后，研究出解決困境的方案。1932年1月21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不久談判紀要公布。1月25日，孫科及行政院各部會官員辭職。三天后，汪精衛宣誓就任行政院長；1月29日，[[23]](#_23_Ci_Ri_Qi_You_Wu__Ying_Wei_3Y)蔣介石出任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作為“總理”的汪精衛，形式上是這個政權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長。然而，漸漸變得很明顯，實權掌握在蔣介石的手中。從1932年直到1949年，蔣介石是國民黨政權中統治一切的領袖。

## 有助于蔣介石政治統治的諸因素

人們對蔣介石的評價，在他漫長的生涯中變化很大。有些中國人尊崇他為完美的民族領袖；另有些中國人辱罵他是封建軍閥。有些外國人稱贊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衛者；另有些外國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殘忍的獨裁者。然而，不論敵友，都承認蔣介石是個非凡的人。

由蔣介石來繼承孫逸仙的衣缽，比如說，在1925年孫逸仙逝世時，是無從預見的。那時，國民黨領導權似乎注定要給汪精衛、胡漢民或廖仲愷；他們三人都比蔣介石有豐富得多的革命經歷，與孫逸仙的關系也更為親密。然而，蔣介石對于政敵有三大優勢，他之所以能當權多歸因于此。首先，他是軍人，而軍隊當時已成為主要的政治工具。他上臺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923年受孫逸仙指派指揮國民黨在黃埔的軍校。作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監督千萬名軍校學生的訓練（在1924—1926年間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學生畢業），他與許多學生之間形成了中國師生之間的強有力的聯系。畢業后，這些青年軍官取得黨軍的指揮權，而黨軍一般比軍閥部隊訓練有素，裝備精良。這支軍隊成為效忠蔣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運用。例如，蔣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后，他繼續得到黨軍的效忠，從而有效地控制了黨軍。所以，沒有蔣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別委員會實際上無力對華北進行北伐。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個將領由何應欽領銜聯名打電報給特別委員會，要求重新任命蔣介石為最高軍事司令官。[[24]](#_24_Luo_Jia_Lun_Bian____Ge_Ming)利用軍隊的支持——連同各種政治和金融勢力的支持——蔣介石迫使特別委員會辭職，并在1928年1月恢復了他在黨政軍中的統治地位。

蔣介石又在1928年開始聘用德國軍官，如馬克斯·鮑爾陸軍上校為軍事顧問和教官。鮑爾及其他德國軍官給予蔣介石軍隊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知識（雖然按照西方標準通常只是初步的），連同軍隊對蔣介石效忠的結合力，使這支軍隊無疑比他的任何政敵的軍隊在軍事上更有戰斗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賴。例如，汪精衛1927年夏在武漢主持對立的國民黨政府，他的最有力的軍事支持者是湖南軍閥唐生智。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標。結果，汪精衛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剝奪權力，被迫謀求同他的主要政敵蔣介石聯盟。同樣，胡漢民在1932年以后把他的命運寄托在廣東軍閥陳濟棠身上。陳濟棠覺得胡漢民有用，因為胡漢民是國民黨主要理論家，能給陳濟棠的純軍閥政府涂上合法的色彩。然而，胡漢民決不能把他的意志強加給陳濟棠，也不能有效地影響廣州的政策。

蔣介石在政治斗爭中享有的第二個優勢，是優越的財政基礎。北伐期間，一些革命領導人向蔣介石建議，繞過重兵據守的上海去占領華北。他們認為到那時上海將會不戰而落入革命軍手中。然而，蔣介石像1913年以后的孫逸仙一樣，把這座長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軍事目標。

蔣介石比國民黨大多數其他領導人更加認識到上海在財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稅款收入勝過指揮許多個師的軍隊。在1912年和1922年間，蔣介石有很多時間在上海。他和那里的金融界領袖人物有密切關系，據說同青幫——這是個控制上海下層社會的秘密團體——頭子也有密切關系。當然，上海的財源必須加以發掘。這點起初不會遇到困難，因為上海的資本家在1927年春被共產主義日益逼近的幽靈弄得驚慌失措，他們聯名上書，要求蔣介石防止過激的革命行為發生。這正合蔣介石之意。雖然蔣介石過去有時唱過左派過激的高調，但是，他也被越來越激進的共產黨人所困擾。或許，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寧的，是由鮑羅廷和中國左派分子在武漢謀劃的對他領導權的政治威脅。

由此可見蔣介石和資本家互相需要。上海資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預付款300萬元。作為回報，他答應制止上海勞工騷動，并從革命運動中清除共產黨勢力。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蔣介石以大舉鎮壓上海共產黨領導的工會，來忠實地履行這宗交易規定的義務。數以百計，或許是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和工人，在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殺害。可是資本家卻如愿以償；共產黨人不再成為上海的威脅。

然而，上海商人和銀行家還須酬勞蔣介石。4月25日，他們再給蔣介石700萬元。但是，這筆款項僅僅提起了蔣介石的財政胃口，因為他的軍費每月約達2000萬元。他派出專人逐店逐廠要求捐款。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捐款50萬元；華商電氣公司捐款30萬元；先施公司捐款25萬元。當資本家回避時，蔣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嚇、敲詐，甚至綁架的手段。歐文·查普曼報道，“富有的中國人會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蹤于街頭……百萬富翁以‘共產黨’的罪名被逮捕。在近代，上海從沒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權之下，經歷過如此恐怖的統治”[[25]](#_25_H_Ou_Wen__Cha_Pu_Man____Zhon)。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后公開承認，“戰時，我們或許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籌款”[[26]](#_26___Zhong_Hua_Nian_Jian__1929)。

雖然國民黨在1928年中期以后已不再采用這種手段籌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圍地區繼續承擔政府歲入的主要來源。在南京的10年時期，政府從全國經濟的貿易和制造部門——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區——取得政府稅收的近85%。政府在財政上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發行公債來彌補赤字。這樣，又是上海的資本家認購公債的大部分。由于能夠發掘中國這個最大、最現代的城市的財富，蔣介石比他的政敵享有一種值得羨慕的優勢。例如，馮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與蔣介石競爭，是因為國民黨軍隊的薪餉、給養和裝備都比他的軍隊優越。他聲稱，蔣介石還非常富有，足以用錢收買對方軍隊歸附以挫敗對手。[[27]](#_27_Feng_Yu_Xiang____Wo_Suo_Ren)

第三個為蔣介石在國民黨運動中取得優勢的因素，是他對派系和軍閥政治的權術運用自如。蔣介石很少對一種思想意識的立場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只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適應任何派系，而不成為該派系的一員。例如，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他與左派國民黨和元老（一批以前的無政府主義者和老政治家，以張人杰、吳稚暉、蔡元培和李石曾為代表）合作；到1928年8月，他又與元老和右派結盟反對左派；而到了1929年3月，他又與右派聯合既反對元老又反對左派了。于是在一年半之內，他聯合過國民黨政治派系的各個集團。他又有使相互敵對的派系都為之效忠的才能。例如，在30年代中期，CC系與藍衣社[[28]](#_28_Fu_Xing_She_Zhong_Yao_Fa_Qi)準備火并——可是兩派都尊他為領袖。而CC系和藍衣社都蔑視政學系——可是蔣介石最親密的顧問和受到信任的官員，有許多是政學系成員。

這種政治操縱技巧，也可在蔣介石同地方軍閥的關系中看出。這些以前的軍閥妒忌和不信任蔣介石，并且幾乎都不時舉起過叛蔣的旗幟。情況總是，反蔣軍閥希望其他地方軍閥與他們聯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蔣介石的敵人行動一致，蔣氏是會被打垮的。可是他能把對手們孤立起來逐個消滅。他勝過任何其他軍閥，是使用“銀彈”——用賄賂誘使對方軍隊叛變——的能手；在不使用銀彈時，他以欺騙、許諾和恐嚇來取得地方上的對手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直到他準備好轉過頭來對付他們。

雖然蔣介石的思想意識靈活多變，但是，他對權力的追求卻堅定不移。不過，他的權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個人的滿足促成的，他深以謀求中華民族的幸福為己任。不管怎樣，他深信他的無私和道德純正，認為他的權力利益就是國家的權力利益。所以，什么對蔣介石有利，就是對國家有利。而且，在蔣介石看來，反對他就是反對國家的最高利益。他聲稱，這類人“剛愎自用”、“投機”和缺乏“固有美德”[[29]](#_29___Zi_Shu_Yan_Jiu_Ge_Ming_Zhe)。在蔣介石的世界里，沒有忠誠的反對派的余地；反對他，僅根據這一事實就是不忠于國家。這種自視正直的特點是蔣介石的一大長處，使他面臨批評和逆境時充滿信心。然而，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劇因素，因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敗。

## 南京政權的意識形態、結構和職能的行使

1927年以后，在蔣介石手中形成的這個政權，既不是極權主義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領域中不穩定地處于二者之間。它的結構建立于1928年10月政府的改組中，即使1949年以后，在臺灣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點。新政府的藍圖是由孫逸仙在三民主義的講演和在《建國大綱》中草擬的。政府整個結構的基礎，是孫逸仙的訓政概念。孫逸仙矢志于民權目標，但他也深信中國民眾尚未準備好擔負起自治的責任。所以，他曾論斷國民革命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軍政時期，這時革命黨人要依靠軍事力量鞏固政權。1928年6月占領北京后，國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階段完成，此時已進入第二階段，即訓政時期。在這個階段，革命黨，即國民黨，代表民眾行使國家主權；同時，要在各地訓練民眾實行自治。通過選舉縣長、召開縣代表大會和制定法律，以便縣一級能充分實行自治，這樣民眾才能受到教育，準備進入革命的第三階段，即民主的憲政時期。

訓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國民黨代表民眾實行“以黨治國”。黨治在制度上表現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會議被授予的權力。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短暫的會期除外；在南京的10年，只召開了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是其常務委員會，負責制定黨治的指導原則和全面指導黨務。

中央政治會議是聯結黨和政府機構的橋梁。雖然它只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下屬委員會，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導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兼有立法和行政職能。作為立法機構，它能創制法規或傳達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給政府。作為行政機構，它有權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導和監督政府。于是，從理論上說，中央政治會議對政府的文職部門實際上行使無限的權力。事實上，中央政治會議也是政府權力之所在，因為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是蔣介石。[[30]](#_30_Qian_Duan_Sheng____Zhong_Guo)

按照孫逸仙的具體規定，在中央政治會議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五院制與孟德斯鳩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說相似。然而，除政府的上述三個分立部門外，孫逸仙又加上兩個顯然來自傳統制度的部門。這兩個部門是考試院（通過文官考試決定政府雇員資格）和監察院（類似舊王朝監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御史制度）。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行政院院長充當總理，指導所屬各部，如外交部、財政部、教育部、商業部[[31]](#_31_Xing_Zheng_Yuan_Xia_Mian_Wei)等等的工作。

然而，只注意國民黨政府的結構，或者比如說，只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表面關系，將是錯誤的。因為無論蔣介石在黨、政、軍中擁有何種正式職位，他都對整個政體行使最高權力。他執行這一權力極少顧及正式的指揮系統。何廉曾任蔣介石顧問，[[32]](#_32_He_Lian_Ceng_Ren_Xing_Zheng)他回憶說：“委員長走到哪里，政府的真正權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職權而言，他領導一切。”[[33]](#_33_He_Lian____He_Lian_Hui_Yi_Lu)或者，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在1934年觀察到的，“蔣介石的影子遍布各個角落。[如果沒有來過南京]我將不愿相信他控制政府達到如此明顯的程度。他的利益觸及哪里，哪里就有政府的活動；而在別的地方，如果不是癱瘓，至少是聽任政策放任自流”[[34]](#_34_Mei_Guo__Guo_Wu_Yuan_Wen_Jia)。

由于蔣介石對政權實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揮系統于不顧，政府——作為制定政策和進行管理的機構，日漸失去活力。官員們確實制定了很多社會的和經濟的重建計劃，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憲法草案，然而，許多這類政府活動都與政治現實關系不大。因為民事機關既無經費支付其各種計劃，也無權實施其各種決定。例如，在30年代，只有全部預算的8%到13%撥充民事官僚機構的管理維持費——而軍費支出卻大得多。[[35]](#_35_Yi_Lao_Yi____Yao_Zhe_De_Ge_M)宋子文——任財政部長直到1933年——竭盡全力限制蔣介石的軍費開支，以便政府能把和平時期重建的任務進行下去，但是，蔣介石不予理會。這樣，文職政府仍始終從屬于蔣介石和軍隊的利益，從未發揮自己的作用。

由于蔣介石把革命運動改造成軍事獨裁政權，黨——國民黨——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機關更萎縮。孫逸仙把黨看作權力的根本所在，看作憲政以前兩階段管理民權的受托者，而蔣介石卻使黨軟弱無力。1929年以后，由于黨的左翼受鎮壓，國民黨沒有起到獨立的作用。它只不過成為南京政權的宣傳、新聞和歷史研究的機構。

黨的削弱，連同舊式官僚和軍閥在南京政權里的地位顯赫，使先前理想主義的黨員士氣低落。一位以前的國民黨員回憶，他“和許多……同學一樣，原來參加國民黨，是相信國民黨是唯一能在中國摧毀地方軍閥，長期掌握權力的力量”。然而，由于蔣介石對國民黨運動的非激進化，他和像他的許多人一樣，“可以理解地對國民黨感到幻滅，我們中許多人事實上退了黨”[[36]](#_36_Wang_Cheng__Yin_____Guo_Min)。黨員資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員的必要條件，但是，在30年代，黨成了空殼；它的作用——正如楊格所說——正在變得“幾乎有名無實”[[37]](#_37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

然而，國民黨繼續存在，因為該黨的委員會和全國代表大會為蔣介石作出的決定提供合法的圖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識破，黨也提供了一點實質性的東西，使這個政權能夠聲稱它不是軍事的和個人的獨裁政權，而是——依照孫逸仙的教導——代表民眾的一黨獨裁政權，直到民眾能擔負起自治的責任為止。

國民黨政權在性質上是矛盾的：有時它專橫暴虐；有時它又屈從軟弱。國民黨政權以集權主義為借口，它的權力主要來自控制了一支優勢的軍隊。因此，只要為國民黨軍警力量所能及，不論個人或團體向它的權力挑戰，或批評它的政策，往往會受到它強有力的壓制。例如，工會在20年代中期力量強大，組織嚴密，高度政治化；1927年以后，這些工會的領導人就被撤職，而由這個政權的代理人接替。工會的指導原則已不是階級斗爭，而是與雇主和政府合作。獨立工會活動受到禁止，工會變成了這個政權的軟弱順從的工具。

自五四運動（1919年）以來，學生運動是全國政治中的一個有力的因素，如今也受到壓制——雖然不如對待工會有效和持久。[[38]](#_38_Yue_Han__Yi_Si_Lei_Er____Zho)例如，1930年，國民黨的訓練部取締一切非學術性的學生團體，除非受到黨的嚴格管理。同時，學生被要求專心讀書，避免參加政治活動。然而，學生依然是這個國家最熱心的愛國群體之一。在1931—1932年和以后在1935—1936年，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上升，而南京當局看上去是躲在綏靖政策之后時，學生的愛國熱情迸發為游行示威，抵制日貨，甚至毆打政府官員。南京政權對學生的這些抗議，最終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發動和控制的政治運動，而對學生鼓動者中有少數共產黨人的事實又過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幾千學生被投入監獄。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現，出其不意地搜查學生宿舍和同學突然失蹤，使學生感到恐怖。這樣，南京政權在控制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學生運動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為取得這種成功，南京政權同學生疏遠了，在政治上把學生推向左傾，其中許多人終于變成了共產黨員。

政治鎮壓是國民黨統治的一個主要手段。早在1929年和1930年，當時貪污腐化、派系傾軋和管理無能再也掩飾不了，南京政權就不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北華捷報》在1930年5月寫道，“與不到18個月前的熱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國人中的絕望感，也許是最糟的一點”[[39]](#_39___Bei_Hua_Jie_Bao____1930Nia)。三年后，頗有聲望的《國聞周報》評論說，“民眾厭棄國民黨之心理，為不可諱言之事實”[[40]](#_40_Liu_Zhen_Dong____Zhong_Guo_C)。

南京政權決心鎮壓這股正在興起的不滿浪潮，加劇對批評政府者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對者遭暗殺；愛報道缺點的新聞記者被逮捕；報紙刊物受檢查。因為政府對領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評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國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蔣介石的政敵控制的省份，如張學良的湖北省或陳濟棠的廣東省，以求相對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時期，中國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華中地區，對蔣介石政策的反對卻是沉默的。任何組織和群體，若要對該政權的權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該政權強加控制，使之無害。

然而，正如陰陽之間的關系一樣，南京政權獨裁主義的性質，也由它本質上的虛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動和貪污腐化，腐蝕了國民黨運動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風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積極性。所以，甚至這個政權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實現孫逸仙綱領目標的動力、獻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京政權之虛弱，還因為它在社會上缺乏穩固的基礎。所有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特點是，人口相當大的部分被動員起來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標。而國民黨人在重視政治控制和社會秩序的同時，不信任民眾運動和個人的首創精神；所以他們不能創造出那類基礎廣泛的民眾擁護，在20世紀，民眾擁護才能導致真正的政治權力。

由于存在這些固有的弱點，南京政權有時不得不勉強地遷就現存社會秩序的領袖，最顯著的是地主和資本家。確實，這種自我適應引起了許多——也許大多數——非國民黨作家斷定，國民黨政權是那些階級的階級工具。[[41]](#_41_Li_Ru__Jian_He_Gan_Zhi____Zh)而且，事實上，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時的確與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頗為一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對，南京政權甚至對溫和的減租法令也不予執行。而且，南京的領導人有時竭盡全力維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復了共產黨人曾實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國民黨人的慣常做法是剝奪耕種者，把土地歸還原地主。這種政策有時格外難以實施，因為共產黨人在一些地區掌握土地已達六年以上，界標和地契在許多情況下早已被毀。

南京政權也與國內更有實力的銀行家關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稅征收權交給各省之后，中央政府從未設計出一種以稅收或國營企業支持財政的辦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歲入約有1/5來自公債或銀行貸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權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銀行和銀行家。而銀行則從這種關系中獲得巨大的利益，特別是因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價——往往僅為面值的60%至75%——把公債出售給他們。這樣，銀行給政府貸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潤。[[42]](#_42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許多同時代人，從而斷定國民黨政權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的確，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南京政權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們都反對社會革命，都害怕共產黨，都對動員農工表示懷疑。但是，它們的利益有時也相互沖突。1927—1928年，當南京政權采取恐嚇、敲詐和綁架的手段為北伐最后階段籌款時，資本家第一次知道了這一實情。1935年，政府又剝奪銀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憑借發行新政府債券，迫使私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接受這些債券充當資本，孔祥熙一舉使政府成為兩家銀行的大股東。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幾家規模較小的私人金融機構；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國銀行資產總額的近70%。[[43]](#_43_Xiao_Pa_Ke_Si__M_Ke_Bu_Er)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結束了銀行家作為政治壓力集團所起的作用，并且確定無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權控制了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權。

地主的長遠利益也常常與南京政權的長遠利益相沖突。這些地主通常希望維持乃至增強對地方的控制。他們組織民團，開辦學校，經辦工程等地方項目。他們也收稅，表面上用于支持這些事業，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稅收落入了地方士紳的腰包。形成對照的是，南京政權竭力擴大其控制，繼續不斷地把它的行政、財政和軍事權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稅制改革預示要恢復對地主擁有的土地的稅收，而多年以來，甚至幾十年以來，這些土地是不為稅收官員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試圖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職位上，同樣預示著要把地方士紳逐出能帶給他們權力、晉升和財富的位置。[[44]](#_44_Gai_Ze_Te____Quan_Li_Yu_She)因此，在南京政權和這些地主之間，在利益及目標上有著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這些矛盾引起的沖突常常被緩和下來，要么也僅限于局部，因為當時南京政權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產黨和日本的問題上，而不在地方行政問題上。因此，在這10年當中，政府和地方士紳的關系，可以說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徑直把階級性質歸于國民黨政權，而不提它與地主及資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蓋了它的根本性質。因為它首先依賴的是軍隊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這一事實產生的。國民黨政權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對這個或那個社會—經濟的階級負有責任，或者對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負有責任。在許多方面，國民黨政權就是它本身。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因，說明為什么國民黨政權的現代化和發展的沖力那么微弱；為什么國民黨的官僚政治，盡管貪污腐化和行政上無生氣，卻能維持那么久；為什么國民黨政權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卻能維持二十余年。當然，國民黨政權的有些成員是開明、能干、具有獻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數成員卻利用這個政權的制度性質，來盡量擴大自己的權力、聲譽和財富，而不是為國家的幸福奮斗。

## 國民黨諸派系

一個政權習慣上不受輿論的約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義的政治活動，那么在這種政權里，為掌握政治權力的競爭就不會在整個社會進行，而是在這個政權本身的各委員會內進行。此外，由于政治權力的分配更多地不是由正式的指揮系統決定，而是由蔣介石本人或他寵信的助手個人決定，權力分配必定過分地取決于個人的影響。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長或局長解除原有人員的職務，而代之以自己的親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關鍵更多地不在于掌握專門技術知識，而是在于與政權的領導人維持個人的關系。換言之，派別活動是政治斗爭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國民黨內有汪精衛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應欽系、朱家驊系、孫科系——這個單子還可以一直開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一般最具有影響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學系和黃埔系。

CC系在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周圍結合在一起。他們二人因極親密的私人感情聯系而與蔣介石關系密切——他們是陳其美的侄子，而陳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凱暗殺以前，一直是蔣介石的良師，蔣對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年以后，二陳兄弟領導蔣介石統治的國民黨的組織工作。1927年6月，他們首先建立以CC系聞名的秘密團體——據認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樂部”，就是代表“二陳”。這個團體的實際名稱也許是青白團或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盡管有關CC系的名稱、結構和活動的詳情知之甚少。[[45]](#_45_Chen_Dun_Zheng____Dong_Luan)

陳氏兄弟利用國民黨的組織部作為他們的組織基礎，把他們的追隨者安置在遍及全黨和政府的機關，特別是在那些組織的中下層。這樣，CC系成了該政權民事部門的統治勢力，控制多數官僚政治的行政機構、教育部門、青年團體和工會。CC系也控制各種出版物，如《時事月報》和《文化建設》，主持中央調查統計局，該局是蔣介石兩大秘密警察組織之一。

與面向文職人員的CC系相對照，黃埔系則主要由軍官組成，但是，它對政治的關心也極為廣泛，至少是潛在地觸及國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嚴格地說，黃埔系概指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他們保持著對蔣介石效忠的強烈結合力。然而，如此稱謂的黃埔系并無組織，其中一些成員——如何應欽、陳誠及青年軍官——相互嚴重對立。因此，黃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間，是一個有嚴格紀律的秘密團體，一般稱為藍衣社。[[46]](#_46_Jian_Qian_Yi_Zhe_Zhu__Kang_Z)

藍衣社在1932年初由為數不多的青年軍官組成，他們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學生，對國家及國民黨運動的現狀感到擔憂。日本軍隊正在侵犯中國領土；共產黨軍隊雖歷經幾次圍剿依然在內地生存下來；而且，也許最令人驚恐不安的是，國民黨運動成員已變得腐敗，更多關心擴大自己的權力，而不是關心實現革命的目標。根據藍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經失敗，國家處于危險之中。

這些青年軍官——以胡宗南、戴笠、鄧文儀和康澤為代表——在得到蔣介石的同意、財務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領導的情況下，組織起一個有三個基本層次的金字塔式團體。在高層，由主要領導層組織成力行社；中層命名為革命青年同志會；運動的普通成員來自軍隊的下層、學生和政府機關，組織成中華復興社。鑒于國民黨組織混亂和紀律松弛，藍衣社強調有必要無條件地絕對服從團體領導人；同時還強調儉樸、廉潔和嚴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國的力量日益增長，法西斯理論漸漸引起藍衣社領導人物的注意。蔣介石也大力了解納粹的組織及活動方法。據報道，大約在1935年，他在藍衣社的一次集會上宣稱，“法西斯主義……是衰退中社會的一服興奮劑”。“法西斯主義能救中國嗎？我們回答：能。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47]](#_47___Lan_Yi_She_Zhi_Zu_Zhi_Ji_F)由于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獲得明顯的成功所產生的魅力，藍衣社同樣地提出極端民族主義、領袖崇拜、清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及社會“軍事化”。

藍衣社在30年代成為頗有影響的團體。他們控制軍隊內的政治訓練，從而有助于保證蔣介石得到這政治權力最終泉源的持續的支持。藍衣社也涉足于民事活動，如學校、童子軍[[48]](#_48_Zhong_Hua_Fu_Xing_She_Jin_Za)和警察。他們提供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新生活運動的干部。他們手中也掌握著隸屬于蔣介石軍事委員會的令人生畏的軍事調查統計局[[49]](#_49_Mei_You_Jun_Shi_Diao_Cha_Ton)。這個以戴笠為首的秘密警察組織，對蔣介石判定的敵人（從日本人和共產黨人到貪官污吏，甚至國民黨內的政治對手）進行情報活動。它參與新聞檢查；還要對這10年間許多最聲名狼藉的暗殺活動負責，如1934年對史量才——上海的主要報紙《申報》的編輯[[50]](#_50_Shi_Liang_Cai_Wei___Shen_Bao)的暗殺。

和CC系及黃埔系的形成相對照，政學系全是首腦而非小卒；它的成員個個都是顯赫人物，在政權的基層沒有追隨者。它沒有組織，或明確的領導層，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見解。政學系的兩個最重要的代表黃郭和張群，是蔣介石的結拜弟兄——這種關系在中國標志著家庭之外可能最為密切的忠誠紐帶。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這種關系，政學系在蔣介石顧問小集團及主要行政官員中影響巨大。例如由黃郭和張群推薦，蔣介石在1932年任命楊永泰為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在那個職位上，楊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殺——是全國兩三個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之一。政學系的其他成員有王寵惠、熊式輝、吳鼎昌、張嘉璈、翁文灝和黃紹竑。提到這些以及其他政學系成員，意在列出這個國家及政權的許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義的是，這些成員與國民黨的關系充其量也不過是微弱的。例如，黃郭甚至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他們不是政客而是專家——經濟學家、實業家、銀行家、出版家、知識分子——他們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識的教義，而是支持專門技術知識和官僚政治的專業主義。

這幾個派系間的關系很復雜。每個派系都公開解釋孫逸仙的三民主義，都擁護蔣介石為這個政權的領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時卻非常緊張，因為他們是黨內權力斗爭的主要工具。例如，陳果夫和陳立夫非常妒忌政學系在行政機構中的地位，并同他們競爭政府職位。藍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敗的文官政客；尤其敵視CC系，因為這兩個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報方面的工作重疊，不時產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義的是，思想意識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雖然這兩個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確定上表現出來，但是，根本問題是權力和地位。例如，藍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現為如何執行孫逸仙的民生主義。然而，一個前藍衣社領導人承認，“任何[派系]斗爭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爭，而是為了飯碗的斗爭”[[51]](#_51_Liu_Jian_Qun_Fang_Wen_Ji__Ta)。

蔣介石知道這些黨內沖突，但是只要它們不爆發為暴力行為——如1934年藍衣社和CC系之間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預。的確，蔣介石實際上鼓勵派系之間的競爭。因為派系間的斗爭使任何一個派系不致過于強大，蔣介石從而得以確保他對所有派系的至高權力。

國民黨統治通常被認為是“保守的”。然而，這易于使人誤解，因為這個政權的領導人事實上強烈不滿足于現狀，他們期望驟然地，甚至“徹底地”與中國當前的民族衰老狀況分手。例如，他們贊美西方科學及工業的進步，熱切期望運用西方技術來改善中國民眾的經濟福利。他們也希望重建中國的社會、政治秩序。蔣介石理想的社會模式不在中國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國獨特的軍國主義。他回想起他在日本軍校的學生時代，聲稱那里嚴格的兵營紀律，大體上恰恰體現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理想。[[52]](#_52_Jiang_Jie_Shi____Xin_Sheng_H)他認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國實現了那種理想。他羨慕地聲稱，“按照法西斯主義，組織、精神和活動都須軍事化……在家庭、工廠和政府機關，每個人的活動必須和在軍隊中一樣……換句話說，必須有服從、犧牲、嚴格、清潔、準確、勤奮、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須堅定地、勇敢地為團體和國家做出犧牲”[[53]](#_53__Ri__Yan_Jing_Ying_Yi____Lan)。

蔣介石熱切希望在中國創造的，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嚴格紀律和無條件服從領袖意志的軍事化的社會形象。他在1934年發起了新生活運動，并自吹自擂地說它能為醫治中國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從他下面的言論可以看出新生活運動的目標。“什么是我現在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問道。“簡單地說，就是把全國公民的生活徹底軍事化，以便他們能培養勇敢敏捷，吃苦耐勞，特別是一致行動的習慣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時候為國家做出犧牲。”[[54]](#_54_Jiang_Jie_Shi____Jiang_Zong)顯然，他的法西斯主義形象實際上完整無缺地轉變成了新生活運動。

然而，蔣介石及國民黨領導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標準；正是這一點使得許多觀察家確信，國民黨政權實際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勢力。例如，蔣介石通常宣稱新生活運動的目標是儒家的道德禮、義、廉、恥。蔣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國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復了尊孔，宣布孔子誕辰為國定節日，鼓勵學生和軍官學習儒家經典著作。

國民黨政權的傳統主義，可以與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提倡的古典主義相比。也就是說，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標，而是以之作為中國民眾向新社會前進時有助于增強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個成員所說，儒家思想提供一個“中心信念”，沒有這個信念，中國民眾在政治上就會陷于無政府狀態，道德上就會陷于混亂。[[55]](#_55_Fang_Zhi____Min_Zu_Wen_Hua_Y)于是，蔣介石常常以中國傳統的慣用語講話。事實上蔣介石的許多方法和觀點——如強調傳統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觀念和杰出人物統治論——確實顯示出他的現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標，即一個徹底管轄起來的社會的目標，與中國儒家的往昔并無相似之處。他要成為一個極權主義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權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服從這個政權，達到清朝歷代皇帝甚至未曾夢想到的程度。這絕不是一個保守的理想，因為它從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實際。

## 國民黨政權的成就

對南京10年國民黨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歷史學者斷定國民黨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統治制度，并為建設一個強大、民主和繁榮的國家奠定了基礎——雖然這個充滿希望的開端由于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而夭折。另有一些歷史學者則堅決認為國民黨人建立的政府腐敗無能，國民黨領導人不理解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他們對可供抉擇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戰略一無所知。因此，根據這種看法，即使日本人不發動侵略戰爭，這個政權也注定要失敗。[[56]](#_56_Kan_Fa_Dui_Guo_Min_Dang_Ren)

這些都是熱烈辯論的問題；也許永遠也解決不了，因為如果日本當時不進攻中國，可能會出現什么情況，這一點就其實質來說是無法證明的。然而，有兩個事實很明顯。第一，國民黨人面臨的任務——即扭轉國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第二，他們試圖完成這項任務所處的環境，對成功或迅速地解決這項任務極不相宜。經濟不景氣、外國侵略和內訌——這些狀況大多是國民黨人無法控制的——妨礙執行有意義的改革。此外，因為南京10年的頭四年主要致力于鞏固政權，他們只有大約六年的時間去完成這些改革。

國民黨人顯著的成就是扭轉了領土走向分裂的趨勢。他們在1927年取得權力時，僅控制了江蘇、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內戰，中央政府的勢力威震各省軍閥，從而保證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華中的幾省或其一部分（最顯著的是在浙江、江蘇、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57]](#_57_Duo_Mei_Si____Tui_Chi_De_Ge)

然而，在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進行第五次圍剿之后，南京的有效權力擴展得很快。蔣介石戰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內。他喜歡說，“日本人如皮膚之疾，共產黨人是心腹之患”。為治心腹之患，蔣介石在1930年10月，緊接著平定閻錫山和馮玉祥的反叛之后，在江西對共產黨人發動了第一次圍剿。然而，共產黨人運用游擊戰的機動戰術，在1931年1月1日擊退了國民黨進攻者。其他各次圍剿接連進行。但是，直到1933—1934年第五次圍剿——這次蔣介石動用了大約80萬軍隊，由德國及日本軍官擔任顧問，并對共產黨區域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來加強軍事進攻壓力——才對共產黨人取得幾近決定性的勝利。共產黨人在軍事上失敗，特別是糧食、鹽極為匱乏，最后集合他們的后備力量，鼓起勇氣，突破了國民黨軍的包圍，并于1934年10月開始了長征。

成為共產黨革命史傳奇的長征，給蔣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把他的軍事力量和政治權力打入華南及華西各省。蔣介石裝備精良的軍隊尾追撤退的共產黨人，進入湖南、貴州、云南及四川。地方軍閥感受到共產黨軍到來的危險，歡迎國民黨軍——并非全心全意，因為國民黨軍也威脅到他們的地方自治，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蔣介石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因為蔣介石剿匪軍一旦進入一個省，他的人員就開始強行實施旨在打破該省隔離狀態的“改革”。例如，在四川，曾作為幾個軍閥活動的軍事及經濟基地的防區被廢除，開始實行更中央集權化的地方行政制度。一個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把四川與全國結合起來的大規模的公路建設計劃已開始實施。由于廣泛使用國民黨的法幣以取代四川幾家銀行發行的鈔票，四川也納入了南京的經濟軌道。[[58]](#_58_Luo_Bo_Te__A_Qia_Pu____Si_Ch)中日戰爭以前，這類改革已經減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習以為常的獨立，地方當局繼續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斷加強的觸手。例如，1937年春，蔣介石與四川大軍閥劉湘的關系非常緊張，一場新的內戰僅得幸免。然而，由于蔣介石1934—1935年反共戰役的結果，湖南、云南、貴州及四川四省地方軍閥的自治和政治機動性都大為減弱；而南京政府的權力和威望則大為增強。

反共戰役之果，直到1936年廣東最后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時才算成熟。雖然北伐以前廣東曾是國民黨的革命根據地，但是，它從未有效地合并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財政的體系中去。特別是自1931年軍閥陳濟棠成為廣東省主席以來，廣東實際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會中央政府。陳濟棠與桂系領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這些黨、政機關構成了強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聯盟的基礎，把廣東富裕的經濟資源與廣西的軍事技術和戰斗素質結合起來。這一反南京聯盟的政治挑戰，又由于國民黨大理論家和革命老前輩胡漢民（雖然在1932年僅52歲）的加入而大為加強；他賦予所謂的西南分離運動以合法性，而這是其他反蔣運動所缺乏的。五年來，蔣介石忍受著廣東和廣西的痛罵和批評，因為兩廣是一股難以對付的政治、軍事力量，尤其是因為兩廣有福建、湖南及貴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緩沖地帶保護。然而，由于蔣介石尾追共產黨的長征，到1935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緩沖地帶。蔣介石還在兩廣邊境集結軍隊，在相鄰的湖南修建機場，并加速粵漢鐵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年5月，胡漢民突然去世，蔣介石抓住胡漢民治喪的機會，向兩廣領袖挑戰，要求他們服從中央政府。最后通牒遭到拒絕，西南當局在6月初開始調動軍隊向北進入湖南省。他們公開宣布的目的是與華北的日本侵略者作戰。然而，蔣介石推斷陳濟棠及桂系領袖在計劃進攻，企圖推翻南京政府。這個推斷或許是實情。

蔣介石政治操縱的天才，在這種局勢中大顯身手。他一方面收買廣東空軍，使之在7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后又對反叛的領袖兼施軍事威脅和許以高官，終于使反叛在9月歸于失敗。結果，在南京政權時期廣東第一次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廣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跡，但已被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戰。

因此，到1936年末，蔣介石已經鞏固對全國較大地區的政治控制——中國本土18個省中，僅有7個保持基本自治——從而為一個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然而，他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他堅決依靠武裝力量，不僅使國家受到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而且把這個政權的注意力從迫切需要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改革轉移開去。蔣介石的顧問有時告誡他，不要過分依靠武力來達到政治目的。他在反省時甚至也承認這一缺點。然而，他是一個軍人，達到國家統一的其他戰略似乎從沒有引起他的興趣。例如，他本可滿足于各種地方軍閥只是名義上的擁護，然后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區建立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的樣板。這樣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價很大的內戰，就可以建立經濟及財政的穩定，并且可以發揮行政及技術的專門知識。這樣的專門知識，在其他省份漸漸納入南京政府的經濟及政治軌道時，肯定會有助于蔣介石。也許在長江下游省份建立模范區的這一方案——事實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經濟顧問楊格在當時設想的，[[59]](#_59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實干家的現實精神。然而，這10年的歷史使人想到，這種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會小于蔣介石奉行的政策。因為蔣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致什么也未控制好。這一點在經濟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

壓倒一切的中國經濟，是農業的和傳統的經濟。例如，在1933年，現代制造業、采礦業及公用事業部門僅占國內生產凈值的3.4%左右。而在另一方面，每五個中國人中就有四個從事農業，生產占國內生產凈值的65%左右。農民生活的貧困駭人聽聞，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氣惡劣的年份，他們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貧困的程度難于測度，但是，從下列事實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國民眾的悲慘境地，1930年中國死亡率大約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國死亡率2.5倍，甚至顯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60]](#_60_Liu_Da_Zhong___Ye_Kong_Jia)

許多當代中外觀察家認為，中國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他們強調說，少數地主擁有多得太不相稱的耕地，把它們以過高的租率租給佃戶。正如國際聯盟駐中國首席農業專家路德維希·賴赫曼在1934年說的，“在[造成農村危機的]經濟及社會因素中，也許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61]](#_61_Guo_Ji_Lian_Meng__Guo_Ji_Lia)。

在胡漢民的領導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來解決這一問題。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獲量的37.5%）。土地法還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規定不在鄉地主的佃戶，若已耕種該土地10年以上，有權購買他們的耕地。1930年的土地法始終不過是一份極好的表達意向的文件，因為南京政府從未執行過。佃戶繼續繳納主要收獲量50%至70%的地租；中國大約一半的農民繼續租種其全部或部分土地。國民黨人害怕搞亂農村的社會經濟關系。正如楊格所暗示的，他們可能為地主階級設身處地地考慮，所以不希望通過重新分配土地剝奪或疏遠地主。[[62]](#_62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樣，他們害怕解決租佃制度會引起社會革命，其結果他們既不能控制，也無法預見。[[63]](#_63_Yi_Lao_Yi____Yao_Zhe_De_Ge_M)不論是什么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實上一直未變。

然而，租佃制只是中國農村社會和政治不公平的一個直接原因。農村貧窮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糧食生產間的不適宜的比例，而這是國民黨人首先要著手解決的問題。

主要通過全國經濟委員會——得到國際聯盟著名專家賴赫曼和阿瑟·索爾特爵士的幫助——和實業部的有關農業的主管局，南京政府著手推行一項提高農民的生產率的廣泛計劃。這項計劃倡議進行種子新品種、殺蟲劑及肥料的研究。為防止水災，在長江、黃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建設灌溉系統，并通過采用抗病植物和改進銷售技術，努力使絲、棉及茶的生產恢復生機。

這些改革計劃對農業地區影響輕微。例如，1934—1936年政府開支總額不到4%用于經濟發展。[[64]](#_64_Cong_Zai_Zai_Yang_Ge___Zhong)而且，連這筆微薄的款項也大多亂花在官僚政治的無價值的項目中，積極成就微不足道。正如一個國民黨支持者在1937年所寫：“前年，工作是調查某某地區；去年，工作也是調查某某地區；今年，工作依然只是調查、收集統計數字，畫地圖和召開會議。然而，由于撥款已用完，實際工程卻無法進行。”[[65]](#_65_Gao_Ting_Zi____Zhong_Guo_Jin)

有跡象表明，南京的農業專家在研究領域確實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那些研究成果沒有有效地交給農民。何廉寫道：“從1927到1937年這一時期，在農業發展上，就全國而言沒有超出過計劃階段。”[[66]](#_66_He_Lian____Gai_Zao_Zhong_Guo)灌溉工程項目與中國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積總共只有大約6000平方英里。1937年，一位政府的辯護士承認，“[政府建設措施]給民眾的直接利益很小”，因為“政府并不謀求通過徹底的變革給民眾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幫助，而是寧愿遵循緩慢的、漸進的政策，以避免國家動亂太大”[[67]](#_67_W_L_Huo_Lan_De___Kai_Te__L_M)。他的話概述了國民黨農村建設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權害怕引起社會革命。

可見國民黨人在南京的10年為改善農村的貧窮狀況做得很少。然而，農村問題那么嚴重，而給南京政權的時間又那么短，以致期望在1937年以前農村經濟能得到改造是荒謬的。而且，經濟因素和氣候因素結合起來，使中國農民在1932—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造成這個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隨著世界經濟蕭條而來的給中國以打擊的通貨緊縮趨勢。農產品價格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的最低點。通貨緊縮使得農民特別艱難，他們必須以現金還債、納稅或付租。在這同一時期，全國大部分地區又遇到記憶所及的最壞天氣。特別是在1934—1935年，金融蕭條處于低谷，旱災、水災、風災和雹災造成大范圍的破壞。據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農業專家測算，1934年稻米收獲量低于1931年收獲量的34%；大豆幾乎下降36%，小麥下降7%。棉花是當年唯一超過1931年水平的主要農作物。[[68]](#_68_Zhang_Pei_Gang____Min_Guo_Er)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產值從1931年的244.3億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億元（時價）。[[69]](#_69_Liu_Da_Zhong____Zhong_Guo_Gu)這些數據在細節上不完全可靠，但是，當時目擊者的報道證實了農村嚴重貧困，特別是在1934年和1935年。[[70]](#_70_Yi_Lao_Yi____Yao_Zhe_De_Ge_M)

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個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動，都不是造成這種農業危機的原因。不過，政府的政策及行動在許多情況下，通過增加新的負擔加重了農民的困境。由于國民黨人竭力把他們的控制擴展到鄉村，縣級或區級的機關規模增大。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員及稅務員；警察及民團的規模也擴大了。這些新的地方當局很少提供明顯的使農民受益的服務，可卻要給這些人支付薪金。這樣，就在農村正陷于不景氣的時候，農村的稅款負擔卻增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稅之上又增了附加稅。攤派金額不斷增加。還有間接稅——鹽稅、煙草稅、酒稅及火柴稅；豬鬃、皮革銷售稅；豬、雞屠宰稅；發票和合法協議的印花稅——名目繁多，騷擾村民。這些間接稅中有些不是新稅。無法概括在30年代農民的稅款負擔增加了多少，因為各地的差異往往很大。然而，蔣介石在1935年的評估卻能反映一般狀況：

政府開支日見增高。每當計劃出籠，新稅又起。附加稅常隨需要加于正稅之上，又創各項雜稅。有時，[地方當局]隨意逐戶征集不明之稅。稅目繁多。民眾稅負沉重大受其苦。[[71]](#_71_Tian_Hong_Mao____Guo_Min_Dan)

農民不僅得承受稅務員越來越多的要求，還常要應付政府及軍隊隨時提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補給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軍特別是在行軍或作戰時，往往給養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糧食。軍隊所到之處，往往像一場瘟疫降臨到這片原野，強征民房、糧食、大車及夫役。一位作家聲稱（也許帶有情有可原的夸張），這樣的一些征用，使農民遭受“四十倍于地丁正稅”[[72]](#_72_Chen_Zhen_Han____Zheng_Fu)的負擔。

試圖制作國民黨記錄中農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真是困難重重。國家那么大，地方狀況如此不相同，可用數據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確，以致明確的結論都令人難于捉摸。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農業的危機結束。這兩年風調雨順，中國獲得了20年來最好的收成（廣東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1935年末開始出現通貨膨脹的趨勢，農產品價格同時提高。由于這些偶然的境況，中國農民10年來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榮。不過束縛農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并未改變，所以，1936—1937年的相對繁榮，只是暫時現象。

南京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對農民的問題漠不關心。就關心經濟問題的程度來說，他們主要了解現代經濟部門。他們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業基礎，提出許多計劃，發出無數的指示來實現這種熱望。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在南京的10年，工業的增長速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據一個可靠的估計，從1931年到1936年，中國的工業（滿洲除外）以年率6.7 %增長。經濟發展的其他數字一般也支持這個估計。例如，發電量在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9.4%；棉布增加16.5%；銀行存款（按1928年物價）增加15.9%等等。這些數字與世界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國，1936年生產僅高于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國和法國，1936年的生產尚分別低于1929年水平的12%和21%。[[73]](#_73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

然而，為評估這些數字的意義，必須指出計算生產增長所根據的基數非常小。例如，1928年中國發電量僅為88萬兆瓦小時——而同年俄國為500萬兆瓦小時，美國為8800萬兆瓦小時。[[74]](#_74_Yue_Han__K_Zhang____Gong_Cha)因此，相對增長顯得大，而絕對增加量與更先進的工業國家相比，以及與中國的實際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不過，鑒于30年代影響中國經濟的各種不利因素——世界經濟蕭條、內戰及日本侵略等的影響——南京的10年居然出現了工業增長，實出意外。

國民政府在30年代對中國工業發展的影響，是引起熱烈爭論的話題。例如，經濟學家約翰·K.張堅決認為增長是政府采取“誘導增長的措施”的結果。[[75]](#_75_Yue_Han__K_Zhang____Da_Lu_Zh)與之相比，道格拉斯·帕烏夫則說中國經濟在南京的10年停滯不前，“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無能力促進經濟的發展”[[76]](#_76_Dao_Ge_La_Si__S_Pa_Wu_Fu)。

帕烏夫所持中國經濟工業部門停滯的論點不再能支撐下去，但是約翰·K.張所持工業增長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結論也令人懷疑。的確，政府曾進行若干改革，有助于奠定統一的、現代的經濟制度的基礎。例如，在1929年，政府擺脫了列強依靠不平等條約強加在關稅率上的限制。1931年，政府廢除了19世紀中葉以來阻礙地區間貿易發展的厘金（通過稅）。政府通過禁止使用銀兩，在1935年宣布法幣為唯一法定貨幣，開始整頓貨幣制度上的混亂——凱默勒委員會在1928年把當時中國的貨幣制度，描繪為“無疑是最糟的通貨，為任何重要國家所僅見”[[77]](#_77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政府禁止對口岸間的貿易課稅，并公布統一的度量衡制度。政府還明顯地改進了全國各種交通網絡，拓展郵電業務，開辟定期航線和修建鐵路2300英里——比1927年軌長增加47%。[[78]](#_78_Tong_Shang_Shu__Di_317Ye)

可惜的是，這些改革僅部分奏效，因為——如國民黨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樣——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間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廢除了厘金，但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種消費稅”或某種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稱取代厘金。統一度量衡僅在政府部門執行。而各省地方銀行，如云南、廣東及山西的地方銀行，仍繼續發行本省的鈔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來與工業增長的要求背道而馳。例如，政府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過付給政府債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國投資資本足有70%流向政府，從而流出了工商企業。私營工業為與政府競爭獲得貸款，不得不付高達一分八厘至兩分的年利率。弗蘭克·M.塔馬格納評論說，像這樣高的利率是“中國大多數工業無法支付的；結果工業活動轉入商業投機”[[79]](#_79_Fu_Lan_Ke__M_Ta_Ma_Ge_Na)。

納稅也使工業遭受困難。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稅的收入下放給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稅收收入幾乎要完全依靠制造業及貿易部門。南京政權稅收政策的全部影響還有待研究，但是，像統稅（對卷煙、棉紗、面粉、火柴等課征貨物稅）和營業稅（對商業企業資產課征，部分代替厘金）之類，顯然給國民黨控制區的企業家造成嚴重困難。例如，1927年上海182家華商煙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業——業主一般認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權的稅收過重。棉紡廠家也感受到棉紗統稅的沉重負擔；并于1934年再三懇求減低稅率。棉紡廠家的稅款負擔至今不明；但是，1936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納稅額足占總收入的38.7%——這樣的負擔是這個家庭的業主們不堪承受的。除法定稅收外，各公司還不時受到給政府或官員以報償或“送禮”要求的折磨。[[80]](#_80_Xie_Er_Man__Ke_Ke_Lun____Zai)

所有這些事實引起人們大為懷疑稱之為南京的“誘導增長措施”的功效。從1912到1936年整個期間，工業生產通常以一個不變的速度增長，[[81]](#_81_Yue_Han__K_Zhang____Da_Lu_Zh)這一事實也讓人認為南京政權的政策不可能顯著地促成工業的增長。它表明，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力量正在朝著工業發展的方向起作用，而與政權或政府的政策無關。

在南京的10年，國民黨政府在管理經濟企業方面越來越起著直接的作用。這種趨勢的經濟影響還不清楚，但是政治含義卻很明顯。最初在1927年以后，政府很少參與經濟企業。然而，1935年對銀行業漂亮的一擊之后，政府迅速插足經濟的其他領域，截至1936年底，在全國至少取得了中國人擁有的工業的12%的所有權。政府甚至更廣泛地插手商業企業，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幾個月，政府在現代經濟部門所占份額正在迅速增長。

政府參與工業經濟的主要工具，是中國建設銀公司。該公司是宋子文在1933年組織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籌集中外投資，支援中國的經濟發展。該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資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銀行業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銀行向該公司大量投資。該公司資產從1934年末的1260萬元躍至1936年6月的1.15億元，政府控制的銀行提供了所增資產的約9000萬元。[[82]](#_82_Ke_Bu_Er____Shang_Hai_Zi_Ben)擁有這筆資金，該公司向電力、采礦、水利及其他企業提供貸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該公司資金大部分來自政府，多數大股東不是政府官員（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銀行主管人員（如宋子文），政府從而直接地、積極地插手經濟。

政府參與工商業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國銀行和實業部。中國銀行當時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年政府控制了銀行業之后，該行是政府控制的銀行集團的主要成員。1937年戰爭爆發時，中國銀行經營紗廠15家，占華商紗廠紗錠總量的13%。此外，該行還在面粉、肉類加工、電話、造紙及植物油等公司擁有投資。

孫逸仙在他的有關經濟建設的演講中曾教導說，只有重工業、運輸及通訊系統應國有化。但是孫逸仙的規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壞多于執行，因為政府直接間接插手經濟，大多不是在輕工業就是在銷售和投機方面。例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間接控制的中國棉花公司，在1936年和1937年是中國最大的商品貿易公司之一。實業部也在上海設立了中央漁業市場。這一政府與私人合營的企業，實際上完全壟斷了華中的魚類貿易，為實業部及獲準投資該企業的私人獲得巨額利潤。實業部還經營植物油、紙張、茶葉及各種土產。[[83]](#_83_Ke_Bu_Er____Shang_Hai_Zi_Ben)

南京政府追求總收入——加上官員個人謀求致富——顯然是這些冒險企業插手輕工業及商業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經濟企業中，只有蔣介石的國家資源委員會似乎既與孫逸仙的經濟模式一致，著重發展重工業，又嚴格受國家經濟發展的利益推動。資源委員會創立于1935年，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隸屬機構，宗旨是建立支持國家武裝力量的工業基礎。為完成這個目標，資源委員會在1936年擬定了工業化的五年計劃，計劃投資2.7億元。資源委員會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認為是安全的內地建立工業區，遠離易受敵方攻擊的沿海中心城市。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兩年，資源委員會最有雄心的項目定在湖南，并開始建廠，生產鋼鐵、重型機器及無線電和電氣設備。生產煤、鐵、鋅、錫及銅的礦山，也計劃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從一開始資源委員會就深感財力不足；計劃投資2.7億元，該委員會僅收到3000萬元。由于資金短缺，該委員會僅建成三個新工廠，15個設計項目仍處于計劃階段。值得注意的是，該委員會最明顯的發展要歸因于幾家原有的私營企業——幾處煤礦、一處銅礦、一處油田及一家電氣公司——這些企業，部分地通過沒收由該委員會接管，然后經營。不然的話，該委員會的工作在戰爭爆發時就仍基本上處于籌備階段。[[84]](#_84_Ke_Bu_Er____Shang_Hai_Zi_Ben)

由國民政府參與這些經濟企業，在中國歷史上并非沒有先例。在整個清朝時期，很多時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嚇。在19世紀末自強運動時期，官吏深深插手經營若干受西方啟發創辦的經濟企業，即使有些企業表面上為私人所有和管理。在這些企業中，政府的利益和錢款與領導官員的私人利益和錢款混在一起，無法區分。然而，在軍閥時期，政府和經濟的這種密切關系已經松散。由于政府權能的削弱，私人企業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干預和控制。但是，在國民黨人至少部分地恢復了政府權力的時候，政府又開始參與經濟。像宋子文和孔祥熙這樣的官員，既在職務上又在私下開始插手經濟企業，與李鴻章在19世紀90年代的作為并無二致。所以，國民政府作為企業家的作用日益增長，實際上是再次堅持傳統的政治行為方式。[[85]](#_85_Ke_Bu_Er____Shang_Hai_Zi_Ben)

## 中國的新心態，1936—1937年

從1936年秋開始，一種新的樂觀情緒及國家統一感彌漫全國。轉折點是南京政權在同年6月至9月平定了兩廣反叛。兩廣是公然宣告反對南京統治的最后兩個省；隨著兩廣的失敗，中國自1916年以來第一次出現了統一。而且，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許多中國人——這時深深厭倦內訌——相信南京當局并非只是一些軍人，并且相信蔣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干的政治家。

形成這種新的國家心態的第二個原因，是蔣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與當時盛行的抗日情緒一致。而在此之前，蔣介石一貫強調中國太弱和四分五裂，無法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并且還利用所能調動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察和檢查官員，鎮壓批評他的綏靖政策的人。然而，兩廣反叛者的抗日姿態迫使蔣介石在7月13日宣稱，中國不會在領土上對日本再度讓步，準備作出“最大犧牲”，全面抗戰。雖然蔣介石無疑安排好時機發表這一宣言，以便解除民眾對反叛者的潛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實上來自蔣介石堅定了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犯的決心。例如，1936年日本企圖在綏遠省建立附庸國，傅作義將軍指揮的國民黨軍堅決抵抗，未讓其得逞。同年11月和12月，中國外交部長張群又毫不畏懼地拒絕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從而顯示出國民黨在南京時期從未有過的對抗日本的姿態。無疑，蔣介石仍然希望推遲一般認為不可避免的對日戰爭。然而，在民眾間，也許還特別在他的軍隊內，強烈的愛國情緒促使蔣介石采取從未有過的堅決抗日的姿態。

第三個促成中國新的國民心態的因素，是中國從1931—1932年冬季以來的經濟蕭條困擾中解脫了出來。1935年11月，由于白銀為外國人收買而大量外流——從而嚴重損害公眾對法幣的信賴——南京政權放棄銀本位，改為管理通貨。這一措施使南京政權得以增加鈔票發行量以滿足財政上的需要；僅在一年半之內，法幣流通增加了兩倍以上。其影響是助長了通貨膨脹趨勢，從而到1937年中期使農產品價格恢復到了1931年的水平。農場信貸如今也更容易獲得并且利率下降。這樣，雖然幣制改革引起的通貨膨脹是南京財政專家沒有預見到的，并且事實上也不是他們所需要的，但是，這一改革卻啟動了整個經濟走上復蘇之路。

與1936年和1937年農產品價格上升同時出現的，是幾乎20年以來最大的豐收。由于豐收和高價雙喜并臨，1936年中國農產品收獲值高于1933—1935年的平均值達45%。隨著農村的相對繁榮，農民開始購買1931年以來從不敢企望的工業品。這對城市經濟也是一個新的刺激。

1936年秋的經濟好轉，連同國家統一的加強和政府的決心抗日，這些都對國民精神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納撒尼爾·佩弗在1936年10月報道：“這時，中國人處于自信和愛國的熱情之中。”[[86]](#_86___Niu_Yue_Shi_Bao____1936Nia)同樣，中國一家持獨立立場的大報《大公報》社論，也在同年12月說：“在最近幾個月內，國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復蘇了。”[[87]](#_87___Da_Gong_Bao____1936Nian_12)

蔣介石是這種新國民心態的主要政治受益者。在這10年之初，蔣介石被普遍視為缺乏教養、只追求個人權力的軍人。如今他被譽為有遠見的領袖，只要國家因內亂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與日本對抗。蔣介石第一次成為一名頗孚眾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領袖。

然而，南京政權在處于這種新的聲望之巔的時候，卻因蔣介石于西安被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場雖為時短暫但從未有過的危機之中。蔣介石雖曾表示決心抵抗日本的進一步侵犯，但他所懼怕的仍然是共產黨人。他確信只要再進行一次戰役，共產黨人——在完成長征后駐在陜北，武裝人員減到3萬——可被最終消滅。但是，他派往去進行這一戰役的西北剿匪部隊拒不執行他的進軍命令。張學良統率的這支部隊主要由東北當地人組成，對反共戰役缺乏熱情。他們深信，真正的敵人不是他們敬重的真正的愛國者共產黨人，而是侵占他們家鄉的日本人。

蔣介石無法從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12月4日乘飛機前往西安，規勸張學良發動進攻。然而，東北軍堅定不移，認為他們應同共產黨人一致抗日。當懇求失敗時，東北軍在12月12日黎明前制服了蔣介石的衛隊，扣留了自己的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

蔣介石在西安被軟禁兩星期。激進的東北軍青年軍官要求處死蔣介石，但是，張學良較冷靜的意見占上風，他并不謀求除掉蔣介石，而只求改變他的政策。張學良已達到這一目的的說法從未得到正式承認，雖然現在已很清楚，蔣介石確曾口頭答應停止進攻共產黨，并抵抗日本的侵略。最后，在12月25日，在參與不斷商議的共產黨代表的同意下，蔣介石獲釋，乘飛機返回南京。[[88]](#_88_Wu_Tian_Wei____Xi_An_Shi_Bia)

西安事變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創傷性的插曲。公眾的反應——表現在蔣介石被扣時極為痛苦和關心，獲釋時則是無比的寬慰和高興——證實了蔣介石享有廣泛的聲望，同時也加強了他在政權內部日益增強的獨裁權力。雖然他聲言未對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讓步，但是，已不再進一步進攻共產黨人。事實上南京與共產黨之間導致統一戰線形成的談判不久開始進行。中國人似乎是10年中的第一次為抵御外侮而把內部爭吵放置一邊。

## 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估

國民黨人從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國陷入漫長的毀滅性的戰爭，僅被給予10年時間。為建立一個全新的全國性政府，為扭轉一個半世紀以來殃及國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恥辱的逆流，10年時間委實太短暫了。即使條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過只是著手政治、社會及經濟改革而已。

盡管有種種對國家不利的條件，在這10年中還是有進步的。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穩操政權，從而出現了自1915年以來政治上從未有過的穩定。經濟正在好轉；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種種運輸及工業計劃；貨幣比以前更統一了。許多中外觀察家認為，國民黨人僅用10年就扭轉了分裂的浪潮。例如，美國大使內爾森·T.約翰遜在1937年4月寫道：“觀察家……不會不為中國政府在農業、工業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經濟建設計劃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89]](#_89_Yin_Zi_Yang_Ge____Zhong_Guo)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在大約同一時間，特別提到“中國人自己及全世界對中國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漸增長，這種信心的基礎是最近幾年取得的顯著的穩定發展，以及關于政府和私人事務的政治、財政及經濟行為都有改進”[[90]](#_90_Yin_Zi_Yang_Ge____Zhong_Guo)。

然而，產生這一漸增的樂觀情緒的條件，很具有近期收獲的性質——戰爭爆發前出現還不到一年——歷史學者若武斷地堅持那些條件必然預示該政權的長期成功和穩定，那將是愚蠢的。例如，經濟形勢的改善與中國天氣難以預測的變化有直接關系，也與建立管理通貨引起的通貨膨脹的趨勢所固有的不穩定性有直接關系。國家的政治統一和軍事統一也極脆弱，這一點后來在戰爭的年代變得非常明顯而令人痛心。此外，蔣介石的聲望來自他公開聲明的抗日決心，而不是由于這個政權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換句話說，中國的新心態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暫的現象造成的。透過那些表面特點去觀察，人們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這個政權依然是國家復興的一個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機構仍然腐敗無能。政府機關充滿因裙帶關系而任命的人，他們很少有任職資格，不過讓政府機構充滿冗員和謀求私利的人員而已。政府雇員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貪污盛行。遲至1936年9月，蔣介石還悲嘆官僚機構無能，他說：“如果我們不清除當前機構的腐敗、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潔、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會很快起來反對我們，像我們過去反對滿清一樣。”[[91]](#_91___Bei_Hua_Jie_Bao____1936Nia)

官僚機構中的一些文職領導人是受過教育、有新思想的人。特別是1935年以來，蔣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銀行家、記者和知識分子如張嘉璈、翁文灝、吳鼎昌、蔣廷黻招攬到政府中來，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較進步。然而，這批新人對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響很小。而那些事實上控制政權的人，卻很少了解如何妥善處理社會及經濟復興的任務。何廉在1936年成為蔣介石的一名親近的政治和經濟顧問，他回憶說：“發現位居高層的人物對正在進行的事多么無知，對國家的實情知道得多么少，而對那些實情的理論上的基礎甚至知道得更少，人們只能感到驚訝。”[[92]](#_92_He_Lian____He_Lian_Hui_Yi_Lu)這些位居高層的人們有些是訓練有素的技術專家，但是，他們往往幾乎只面向城市社會的現代化部分。因此，他們對農業地區的問題或潛力了解得很少，而農業地區構成了國家的靈魂。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訓練有素的金融家和預算專家，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正視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要在運輸及工業發展的方案中發掘出任何動力，該如何動員農業部門的資源——它提供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3。

軍方繼續在國民黨政權中握有最大權力，并且決定政權優先考慮的事。因此，無論文職行政官員多么開明，他們也只是軍方的工具。軍人往往遠不如文職官員世故，而且過問社會及經濟重建的問題更要少得多。他們主要以專制主義和政治鎮壓來解決國家問題。楊格說道，這些軍人“很無能、反動和/或腐敗，這種情況實在太平常了”[[93]](#_93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Jian)。有這類人盤踞在政權的上層，很難期望政府對國家的迫切問題作出創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楊格指出的，國民黨領導層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是，“政府不能與民眾同一認識，而是高高站在他們之上”[[94]](#_94_Tong_Shang)。這個政權是個獨裁政權，建立在軍事實力之上，并靠軍事實力來維持。這個政權的領導人唯恐失掉他們的權力，不愿與他人分享權力和隨之而來的額外所得；對于政敵和批評者則采取壓制的態度。在一個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愈益增強的政治形態中，公民必然變得更有政治覺悟，這種大權獨攬的做法，一般地說是自我毀滅。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為這些東西當時的確不適合中國國情。然而，國民黨本應允許，甚至應該鼓勵，政治上已動員起來的人士參與政事。例如，它本來可以準許工會、學生團體、職業協會和地方自治議會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或者它還可以通過把國民黨變成監督政府的工具，將活力注入黨內，而不是讓它充當這個政權的萎縮的肢體。

在極度政治危機時期，國民黨政權確曾作過擴大政治參與的姿態。例如，由于政府對日本進攻東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輿論已轉向強烈反對政府的時候，政府召開過全國緊急會議，[[95]](#_95_1932Nian_Chu__Shang_Hai__Yi)旨在讓政權外的知名人士向當局提出意見。然而，危機一過，國民黨政權故態復萌，又采取極權的、排他的統治方法。有些政權，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薩拉查的葡萄牙，獨裁主義的統治非常穩定。然而，中國比那些歐洲國家大許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難得多，無法相比。

加劇國民黨政權固有的不穩定性的因素，是中國農村的種種未解決的問題。一些學者目前正在辯論，民國時期農民的生活水準是在下降，還是保持著大約相同的水平。然而，認為農民的生活一般說來很貧窮，有時甚至和牲畜一般，卻沒有什么爭論。結果，農民造反、盜匪橫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會病態，已成為農業地區特有的流行病。然而，這些持異議者的活動缺乏政治覺悟，也缺乏把這些活動轉變為革命運動所需要的組織。不過，到20世紀30年代，既給農民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組織。由于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越來越快，農民正在學會與他們原來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通過商業流通，農民知道了他們村莊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業到30年代也已急劇擴大。例如，在1935年，中國約54%的家庭購買火油；香煙和香煙廣告甚至深入到最偏遠的省份。此外，農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廠做工，由于受城市及來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響，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智力范圍——而且，他們也定期回鄉，把他們知道的東西傳播給同村人。[[96]](#_96_Po_Jin_Si____Zhong_Guo_Nong)收音機和報紙也在進入偏僻地區，傳播著各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塞繆爾·亨廷頓說：“沒有什么比這種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質。”[[97]](#_97_Sai_Mou_Er__Heng_Ting_Dun)雖然尚未就現代中國變化中的農民態度和看法問題進行研究，但是，農民正在不僅認識到他們在蒙受苦難，而且認識到這些苦難并非不可避免；這種可能獲得的認識表明，農村里有一個潛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產黨已經開始提供組織工作，可使農民的不滿情緒變成政治力量。若沒有日本的侵略，國民黨本可繼續運用鎮壓手段對付共產黨。但是，國民黨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農民不滿的社會經濟原因，而共產黨又已經顯示出很強的生存能力，這樣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沒有中日戰爭，國民黨中國的農業地區也注定仍是個易著火的地方。

這幾個因素——國民黨人施政無成效，他們不了解國家重建的任務，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覺醒的廣大階層的民眾納入自己的政治過程，以及農村問題持續存在——凡此種種并不意味著國民黨政權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卻無疑預示著持續的不穩定。

[[1]](#_1_2)黑手黨——20世紀初，一些在美國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組織。——譯者

[[2]](#_2_2)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0頁。

[[3]](#_3_2)《晨報》1928年1月11日。

[[4]](#_4_2)何應欽：《今后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102頁。

[[5]](#_5_2)司馬仙島：《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頁；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1—333頁；阿里夫·德里克：《群眾運動與國民黨左派》，《現代中國》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頁。

[[6]](#_6_2)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4頁。這時這個主要左派組織（改組派）的實際成員約1萬人。見江上清：《政海秘聞》，第72頁。

[[7]](#_7_2)江上清：《政海秘聞》，第68—73頁；司馬仙島：《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40—152頁；陳公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第178—190頁。

[[8]](#_8_2)諾埃爾·雷·邁納：《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第64—79頁；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國民黨的“新中國”》，載杰克·格雷編：《現代中國對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頁；布拉德利·肯特·蓋澤特：《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頁。

[[9]](#_9_2)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第27—29頁；《中華年鑒，1929—1930年》，伍德海編，第1163—1173頁；邁納：《浙江》，第64—79頁；卡文迪什：《國民黨的“新中國”》，第158—159頁；蓋澤特：《權力與社會》，第144—166頁。

[[10]](#_10_2)《中華年鑒，1929—1930年》，第1170頁。

[[11]](#_11_2)于爾根·多梅斯：《推遲的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頁。大多數選舉的代表是海外華僑。所以，事實上只有1/10的選出的代表是代表國內各地黨部的。

[[12]](#_12_2)《益世報》1929年3月21日；《反蔣運動史》，第46—47頁。

[[13]](#_13_2)政治委員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設立。見小約瑟夫·H.海因萊恩：《政治戰：中國國民黨模式》，第268—330頁。

[[14]](#_14_2)《北華捷報》1928年4月14日，第48頁。

[[15]](#_15_2)例如，見程元斟：《革新運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24日），第3—5頁；李達（音）：《革新運動的偉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頁。

[[16]](#_16_2)羅伯特·C.諾思：《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精英》，第53頁；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572頁；田弘茂：《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第140頁。

[[17]](#_17_1)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第75、147頁。

[[18]](#_18_2)李友華：《地區和國家：中國政治斗爭中的桂系，1925—1937年》，第117頁。

[[19]](#_19_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15頁。

[[20]](#_20_2)《中華年鑒，1931—1932年》，第529頁。

[[21]](#_21_2)同上書，第530頁；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第205頁。

[[22]](#_22_2)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439—444頁。

[[23]](#_23_2)此日期有誤，應為3月7日。——譯者

[[24]](#_24_2)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18卷，第10—11頁；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295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96頁。

[[25]](#_25_2)H.歐文·查普曼：《中國革命，1926—1927年》，第232頁。

[[26]](#_26_2)《中華年鑒，1929—1930年》，第629頁。

[[27]](#_27_2)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第17—18頁。

[[28]](#_28_2)復興社重要發起人之一的康澤，在《復興社的緣起》一文中說：“復興社自始至終就是復興社，并無其他名稱。后來社會上有藍衣社的傳說，它的由來是這樣的：  
“南昌行營……主任秘書是劉健群……于1932年3月間到南京來……由我和桂永清兩人介紹他參加復興社。……蔣介石……任命劉為軍委會政訓處長……籌辦了軍委會政訓班……開課以后不久，我發現他個人野心特別突出，有自成一個系統的傾向。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我對黨的一點意見》，主要的內容是要把國民黨起死回生，挑選一批優秀黨員組織 ‘藍衣社’，一律著藍色制服，以區別于普通黨員……對于他這本小冊子，蔣介石和復興社南京總社看過之后，未加可否。他沒有取得蔣介石和南京總社的同意，就擅自印發給學生。（復興社總社）訓育組知道后，報告總社，才制止他發。  
“1932年10月……蔣介石決定成立華北宣傳總隊，命劉為總隊長，率隊北上。劉到北平后，又大量印發他所寫的那本小冊子。原來華北方面已經風聞有個法西斯組織，但不知究竟，看到這本小冊子之后，就傳說是 ‘藍衣社’，并有人認為 ‘藍衣社’的頭子就是劉健群。他也樂得以此作為自我宣傳而出名。不久，先在廣州，后在全國各大城市都傳開了 ‘藍衣社’。南京總社知道這種情況后，曾下命令給他，要他收回這本小冊子，但已收不回來了。”見臺灣《傳記文學》第59卷第4期。——譯者

[[29]](#_29_2)《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蔣總統言論匯編》第10卷，第50頁。

[[30]](#_30_2)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39—145頁。由于政府形式上隸屬國民黨，由于實際權力常常在黨、政府和軍隊的不確定的關系之中，本章常常宜于使用國民黨政權而不使用國民黨政府。使用政權一詞并無貶義。

[[31]](#_31_2)行政院下面未設過商業部，曾設工商部和實業部。——譯者

[[32]](#_32_2)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務處長。——譯者

[[33]](#_33_2)何廉：《何廉回憶錄》，第160頁。

[[34]](#_34_2)美國，國務院文件893.00/12824，高斯致約翰遜，1934年9月16日，第1頁。

[[35]](#_35_2)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第221頁。

[[36]](#_36_2)王成（音）：《國民黨：道德墮落的社會學研究》（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53年），第150頁。

[[37]](#_37_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4頁。

[[38]](#_38_2)約翰·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

[[39]](#_39_2)《北華捷報》1930年5月20日，第297頁。

[[40]](#_40_2)劉振東：《中國出路問題》，《國聞周報》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第2頁。

[[41]](#_41_2)例如，見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123頁；小巴林頓·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根源：現代世界發展因素中的土地和農民》，第187—201頁。

[[42]](#_42_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98、507—508頁。

[[43]](#_43_2)小帕克斯·M.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第161—207頁。（譯者按，此書有中譯本，題為《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蔡靜儀譯，李臻校，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一項最近的研究詳細地表明，上海地區紡織廠主對于國民政府絕非無能為力，但是他們也不控制政府。見里查德·布什第三：《國民黨中國的工業和政治：國民黨政權與長江下游的中國紡織廠主，1927—1937年》。

[[44]](#_44_2)蓋澤特：《權力與社會》，第167—242頁；孔斐力：《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動員諸問題》，轉載于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284—298頁。

[[45]](#_45_2)陳敦正：《動亂的回憶》，第29頁；陳少校：《黑網錄》，第290—291頁。然而，陳立夫否認這樣一個團體的存在。見淑文：《陳立夫談CC》，《新聞天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頁。

[[46]](#_46_2)見前譯者注：康澤：《復興社的緣起》。

[[47]](#_47_2)《藍衣社之組織及反滿抗日之實例》，載《藍衣社資料》，第11頁。

[[48]](#_48_2)中華復興社僅在1935年后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及大學學生中發展成員；童子軍限于初中和小學學生參加，中華復興社未在初中和小學學生中發展成員。——譯者

[[49]](#_49_2)沒有軍事調查統計局，應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按：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前后成立過兩次。第一次成立于1935年，下設三個處：第一處由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改組而成，第二處由戴笠所控制的中華復興社特務處改組而成，第三處為丁默村控制的郵檢處改組而成。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武漢進行改組；該局所屬第一處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通稱的“中統”），該局所屬的第二處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通稱的“軍統”）。——譯者

[[50]](#_50_2)史量才為《申報》總經理，不是編輯。——譯者

[[51]](#_51_2)劉健群訪問記，臺北，1969年5月27日。

[[52]](#_52_2)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第12卷，第110頁。

[[53]](#_53_2)[日]巖井英一：《藍衣社調查》（日文），第37—38頁。

[[54]](#_54_2)蔣介石：《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第12卷，第111頁。關于新生活運動，見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運動的思想意識基礎：反革命研究》，《亞洲研究雜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980頁；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66—70頁。

[[55]](#_55_2)方治：《民族文化與民族思想》，《文化建設》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日），第20頁。

[[56]](#_56_2)看法對國民黨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楊格的著作；對國民黨人不甚有利的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勞逸的著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57]](#_57_2)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486頁。

[[58]](#_58_2)羅伯特·A.卡普：《四川與中華民國：地方軍閥與中央政權，1911—1938年》，第99—120頁。

[[59]](#_59_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5頁。

[[60]](#_60_2)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1933—1959年》，第66、69頁；卜凱：《中國土地的利用》，第387頁。

[[61]](#_61_2)國際聯盟，國際聯盟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理事會：《理事會技術人員關于從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為止在中國使命的報告》，第18頁。

[[62]](#_62_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389頁。

[[63]](#_63_1)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頁。

[[64]](#_64_1)從載在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37、439頁上的數字計算出來。（“建設”是用來表示經濟發展的術語，見楊格著作第77頁。）

[[65]](#_65_1)高廷梓：《中國經濟建設》，第122—123頁。

[[66]](#_66_1)何廉：《改造中國農業的最初嘗試，1927—1937年：評論》，載薛光前編：《緊張的10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1937年》，第235頁。

[[67]](#_67_1)W.L.霍蘭德、凱特·L.米切爾編：《太平洋諸問題，1936年：太平洋國家社會經濟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166頁。

[[68]](#_68_1)張培剛：《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農業經濟》，《東方雜志》第32卷第13期（1935年7月1日），第134頁。

[[69]](#_69_1)劉大中：《中國國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頁。

[[70]](#_70_1)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190—194頁。

[[71]](#_71_1)田弘茂：《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第168頁。

[[72]](#_72_1)陳振漢：《政府、銀行、學術機關與復興農村》，《國聞周報》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20日）文章，第4頁。

[[73]](#_73_1)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310、396—399頁。

[[74]](#_74_1)約翰·K.張：《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第119頁；艾布拉姆·伯格森：《蘇聯計劃經濟》，第84頁；《美國統計摘要，1929年》，第367頁。

[[75]](#_75_1)約翰·K.張：《大陸中國的工業發展，1912—1949年》，《經濟史雜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3月），第73—81頁。

[[76]](#_76_1)道格拉斯·S.帕烏夫：《國民黨與經濟停滯，1928—1937年》，《亞洲研究雜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第220頁。

[[77]](#_77_1)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163頁。

[[78]](#_78_1)同上書，第317頁。

[[79]](#_79_1)弗蘭克·M.塔馬格納：《中國的銀行業與財政》，第211—212頁。

[[80]](#_80_1)謝爾曼·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卷煙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年》，第188—190頁；布什：《國民黨中國的工業與政治》，第250頁；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155頁。

[[81]](#_81_1)約翰·K.張：《大陸中國的工業發展》，第66—67頁。

[[82]](#_82_1)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20頁。

[[83]](#_83_1)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45—246頁。

[[84]](#_84_1)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35—240頁。關于（地質學家翁文灝領導的）資源委員會的秘密來歷及國民黨利用德國軍事及工業支持的計劃，見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中的全面研究。

[[85]](#_85_1)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59—260頁。

[[86]](#_86_1)《紐約時報》1936年10月4日，第25頁。

[[87]](#_87_1)《大公報》1936年12月13日，第1張第2版。

[[88]](#_88_1)吳天威：《西安事變：現代中國史的支點》，第142—148頁及各處。

[[89]](#_89_1)引自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19頁。

[[90]](#_90_1)引自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19頁。

[[91]](#_91_1)《北華捷報》1936年9月16日，第482頁。

[[92]](#_92_1)何廉：《何廉回憶錄》，第144頁。

[[93]](#_93_1)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3頁。

[[94]](#_94_1)同上。

[[95]](#_95_1)1932年初，上海“一·二八事件”發生后，國民政府曾臨時遷都洛陽，召開過“國難會議”。——譯者

[[96]](#_96_1)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第111—112、126—127頁；讓·謝諾：《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第48—49、66—70頁；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第18—22頁；費維愷：《外國在中國的存在》，見本書上卷，第3章；楊懋春：《中國的社會結構：歷史研究》，第339頁。

[[97]](#_97_1)塞繆爾·亨廷頓：《變化中的各種社會的政治秩序》，第298頁。

# 第四章 1927—1937年的共產主義運動

第一次統一戰線與第二次統一戰線之間的10年，即從1927年中期國共分裂到1937年中期，對于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充滿災禍、痛苦和磨難的時代，它使共產主義運動瀕于毀滅。然而從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個經驗豐富并經受過考驗的領導層，他們不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獲得權力。我們先查看一下黨員和組織的危機，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這些年中國共產黨所遇到和解決的問題是何等嚴峻。

## 黨的重建和領導

簡言之，中共從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會起，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盡管中國領導人偶爾發表不同觀點，但在整個1923—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共產國際能隨心所欲地行事。但是，在1927年以后，共產國際的威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氣來恢復這種威信。這意味著要罷黜和批判陳獨秀，撤換和譴責瞿秋白，審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這還意味著要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并在帕維爾·米夫主持下重新建黨。從1927年秋到1931年1月，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事務的干預實際上使中國黨降低到“殖民地”的地位。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會以后，由于各種復雜的因素，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影響實際上下降了，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來越專注俄國和歐洲的事務，1934年夏季國民黨警察破壞了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組織，以及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產國際已不可能傳達他的政策。

在這段時期內，陳獨秀對中共的領導已于1927年年中結束。接替他的是一些比較年輕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國際派（即28個布爾什維克，二十八宿）。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他們著手重建被破壞的黨，并制定一種新的實際可行的革命戰略。黨員數量由1927 年4月高峰時期的近6萬人下降到同年年底可能不足1萬人。或許應歸功于陳獨秀，才使中共在1927年的災難中沒有被完全破壞。有些人把共產黨的復蘇歸因于不斷灌輸“共同心態”，換句話說，歸因于黨的機關刊物——主要是《向導周刊》和理論性雜志《新青年》[[1]](#_1_Ben_Zhang_Shi_Tong_Yi_Zuo_Zhe)——所傳布的意識形態的力量。由于這種意識形態已深深扎根于知識分子的頭腦之中，他們面對反共高潮堅定不移，繼續高舉革命火炬。用一位1927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話說：“失掉了與黨或[共青]團的聯系，就像失去了親愛的母親。”[[2]](#_2___Hong_Qi_Piao_Piao____Di_6Ji)正是這種情懷，使政治上彼此疏遠的人轉變成兄弟般的同志，并使他們毫不留情地與黨內外的敵人作斗爭。

當1927年風暴突然襲來時，黨的注意力已經轉向一個年僅28歲的年輕人，在行動上他可能沒有陳獨秀那樣果斷，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寧主義和有冒險精神，并且頗精于理論。在陳獨秀離開領導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在幾個問題上反對陳獨秀的領導。作為他所編輯的黨的機關刊物的一位多產的評論家，他俄語熟練，因而能讀列寧的《怎么辦》、《兩個策略》之類的關于黨的組織和黨的戰略的著作。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書記職務后，著手使中共布爾什維克化。此后，在1928年，他認為黨是優秀分子的組織，完全不同于它領導下的任何群眾組織。它的先鋒隊地位來自它能通過黨內斗爭揭露自己的錯誤，并從中吸取教訓。[[3]](#_3_Dang_Nei_Fen_Qi_Yi_Qian_Cong)在這些方面，瞿秋白重復列寧和斯大林1925年給布爾什維克化下的定義。[[4]](#_4_Kan_Zai_Zai_1925Nian_2Yue_3Ri)1927年9月在汕頭及12月在廣州（“廣州公社”）舉行的暴動都失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被大批殺害。在現存的黨組織被來自外界的打擊所破壞和黨內的派別活動所分裂的時刻，瞿秋白只能在環境許可的情況下盡力而為。他企圖至少在上層采用民主協商的程序，但當時政治局往往很少能達到法定人數，他的嘗試反而加劇了派別紛爭。[[5]](#_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_3)但是由于瞿強調土地革命，黨從城市的地下活動逐漸伸向萌芽狀態的農村根據地，大約有15塊根據地當時正在形成。

### 階級成分

被稱為秋收起義的一系列冒險行動失敗后，1928年4月瞿辭去黨的書記的職務，讓位給一位無傾向性的無產者向忠發。在白色恐怖和戰爭條件下，隨時隨地要關心安全及叛變，黨中央面臨一系列的組織問題。第一，黨員的階級成分已從城市工人和知識分子轉變為農民占優勢。[[6]](#_6_San_Jian_Ge_Chu_De_Zhong_Gong)這種變化有改變黨的階級基礎、工作方式和黨的政策的危險。因此，1928年7月“六大”的決議和1929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的信都強烈要求增加城市黨員。第二，為了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中央不得不與那些曾經與黨組織失去關系的黨員重建聯系。黨必須為那些1927年6月前公開活動時期暴露了自己而當前靠黨的菲薄的財力為生的積極分子找工作，并將他們安置到非黨的群眾中去。首先它必須統一對激進工會的控制，這些工會掌握在何孟雄、羅章龍等工會領袖領導下的“實干”派之手。第三，農村支部長期與省委和中央失去聯系。例如，地處長沙東南偏僻山區、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處的井岡山的前敵委員會，曾用五個月時間才恢復與湖南省委的聯系。1928年6月4日中央送交當時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的信六個月后才到達。湘鄂西的賀龍直到1929年春才獲悉“六大”的決議！第四，在中央領導層內，宗派主義特別是陳獨秀“右”的影響依然存在。隨著1927年下半年多次失敗后，形勢惡化，鞏固黨組織的希望益發渺茫。[[7]](#_7_1929Nian_2Yue_8Ri_Gong_Chan_G)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舉行，大會責成新的領導（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過法國和俄國）恢復黨的下列路線：黨必須通過吸收大量工人入黨并進入領導層來實現無產階級化。這樣做不應以犧牲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為代價，如允許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繼續存在，上述情況就會發生。要抑制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必須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和培訓，同時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黨和黨員的安全。在很分散的農村根據地，應盡一切努力喚起廣大群眾投身于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群眾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風的正確性的主要標準；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容易失去群眾支持，被認為是錯誤的。在根據地，共產黨人本身只應作為思想上的領導者從事活動，不應作為蘇維埃的行政人員，以便給群眾以權力來監督他們自己的政府，雖然不是監督黨本身。[[8]](#_8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_Di)

遵照這些決議，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驟加強了中央的領導。雖然六大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黨內工人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隔閡，但是他似乎沒有形成敵視知識分子的立場。李維漢、鄧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堅定的支持者，人們很難說他們不是知識分子。[[9]](#_9_Wang_Ming_____Liang_Tiao_Lu_X)起初，對李立三領導地位的威脅主要來自工會領導人，對他來說疏遠其知識分子同事將是不明智的。[[10]](#_10_Li_Cha_De__C_Sang_Dun____Gon)

在李立三領導的最初幾個月，當小塊的農村蘇維埃仍在為其生存而斗爭時，影響黨的統一和穩固的主要問題不在于農村根據地。問題在于幸存下來的黨領導的工會及其領導人，李譴責這些領導人的極端民主化、平均主義、官僚主義和無原則的宗派主義。[[11]](#_11_Kang_La_De__Bu_Lan_Te_Deng)為保證黨在“白色恐怖”下的安全，他努力抑制黨內民主，這可能導致了更大的集權。黨內抱怨他與陳獨秀一樣搞家長制。[[12]](#_12_Jin_Yi_Ping__Yin_____Zhong_G)他本質上是一個活動家而不是學者，主要靠加強紀律來達到統一。既然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李就借共產國際的權威以推行這一行動路線。他常常用撤職的方法清除反對派。有時甚至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個省委。[[13]](#_13___Zhong_Gong__Liu_Jie__Er_Zh)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線失敗后，他才企圖制定一些限制黨內過火斗爭的規定。[[14]](#_14_Xiao_Zuo_Liang____Zhong_Guo)甚至這時他仍以生硬和權威的態度明確地強調紀律。他為了實現黨的統一，還利用了黨的機關報。《布爾什維克》是瞿秋白于1927年10月創刊的，仍在繼續發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創辦了《紅旗》周刊，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兩期。最后他還成立了由黨團、工會負責人組成的總行動委員會。[[15]](#_15_Kao_Lu_Le_Suo_You_De_Shi_Qin)

李立三與毛澤東之間討論得最多的分歧較多涉及他們對革命形勢的估計及相應的戰略，較少涉及黨的組織。許多人擔心農民黨員增加可能造成農民意識彌漫黨內，但在毛看來這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擔心。毛和蘇維埃其他領導人在偏遠的農村根據地工作，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發展小規模的工業來增加蘇維埃黨的無產階級成分。毛尤其不得不憑借政治教育使農民無產階級化。農民是處于黨的影響下的唯一的群眾，也是新黨員的唯一的重要來源。然而憂慮依然沒有消除——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開展黨的工作。在1928—1930年前后，李在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李立三領導下的中共在地區上極度分散，并遭受到嚴重的破壞，要實現統一與其說是組織上的工作，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是一個大理論家。隨著莫斯科先發生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決裂，后來又發生斯大林與布哈林的決裂，李必須或者逐漸形成自己的路線，或者像共產國際那樣游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誰的指導，他必須說服他的追隨者。當說服工作遭到失敗時，未被說服的人離開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離開黨。但是向忠發、李維漢、賀昌、鄧中夏和其他幾個人支持他，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黨中央。[[16]](#_16_Wang_Ming____Liang_Tiao_Lu_X)

盡管王明苛刻地抨擊李立三的組織路線，[[17]](#_17_Wang_Ming____Liang_Tiao_Lu_X)但是共產國際撤換李并不是基于這個原因，而是因為他在戰略上的錯誤（參見下面的注釋）。在短時間的混亂后，經過共產國際的許可，中央轉到“28個布爾什維克”——王明是他們的領袖——之手。于是在中央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共產國際的權威被用來反對“實干”派的工會領導人。這些人堅持反對李立三，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基礎由于蔣介石的迫害而損失嚴重。[[18]](#_18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_1)在農村，共產國際的權威被用來反對蘇維埃領導人，自六大以來，他們控制的幅員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長。

在所有嚴酷的黨內斗爭中，引起28個布爾什維克與何孟雄和羅章龍領導的“實干”派之間爭論的問題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當這些爭論爆發時，何孟雄與李立三原有的爭論已經解決。兩次爭論之間僅有的聯系似乎是黨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誰來重建黨。從查閱現存的文件——大多傾向于反對“實干”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點是何孟雄、羅章龍和他們的支持者建議召開緊急會議，其代表性比28個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顧問帕維爾·米夫建議召開的四中全會更為廣泛。緊急會議建議從基層重建黨，而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四中全會——實際上于1931年1月召開——只有狹窄的代表性，他們則寧愿從上層來重建黨。根據“實干”派的判斷，后一條道路對黨以及對整個革命運動將產生極為可怕的后果。[[19]](#_19___Zhong_Gong_Zhong_Yang_Zhen)還有一些個人的因素，例如爭奪領導地位，不信任缺少經驗的年輕“布爾什維克”，也肯定進入爭論；然而它們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當這些爭端匯集到一起時，結果是何孟雄和羅章龍兩人過高地估計了工會反對派的力量和團結，這種估計錯誤導致他們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會上完全失敗。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輕的左翼作家，顯然被出賣給警方，接著在1931年2月7日被槍殺。

28個布爾什維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領導權之后，可能曾企圖實現黨組織的“布爾什維克化”——一方面要求絕對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實行“民主集中制”。[[20]](#_20_Wang_Ming____Zhong_Guo_Xian)由于他們是一批雄辯者，[[21]](#_21_1939Nian_Wo_You_Ji_Hui_Zai_C)有理由假定他們寧愿通過委員會進行討論，而不是采用家長式的命令主義或他們似乎不喜歡的懲罰制度。然而事實上緊接四中全會之后國民黨與中共特工人員之間的秘密斗爭在1931年加劇，而黨在“白區”的工作遭到災難性的挫折時，委員會會議能否召開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實行是很令人懷疑的。[[22]](#_22_Guo_Hua_Lun____Zhong_Gong_Sh)

然而，28個布爾什維克比李立三更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個左右的農村蘇維埃。四中全會后不久，曾管轄蘇維埃的“前敵委員會”由政治局直接領導的蘇區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轄六個蘇區。這六個蘇維埃中至少有四個各設分局——位于江西東部與福建邊界處的中央蘇區（1928年底毛澤東和朱德從井岡山轉移到此），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和湘贛蘇區。[[23]](#_23_Xiao_Zuo_Liang____Zhong_Guo)另外兩個蘇區可能曾由一個特別委員會領導。[[24]](#_24_Wang_Jian_Min____Zhong_Guo_G)新機構可能削弱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日益增長的權力；28個布爾什維克當然可能利用這個機構來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蘇區的殘余影響，以陳昌浩、沈澤民和張國燾接替許繼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蘇區夏曦取代了鄧中夏。[[25]](#_25___Hong_Qi____Di_29Qi__1932Ni)

當“白區”活動幾乎無法開展時，黨中央逐步轉移到中央蘇區，黨員也隨之遷徙。中央的轉移于1933年初完成，只在上海留下基干聯絡人員，他們不久被國民黨警察逮捕。這次轉移不僅加劇了論點和權力之爭，而且引進了許多城市黨員在開闊的農村從事日常的管理工作，這項工作與秘密的城市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他們現在與廣大農民有密切的聯系，他們舊的生活、工作和寫作的方式都必須經歷適當的調整。雖然他們面臨類似的困難，但他們與按回避原則必須是外地人的舊王朝官員不同，因為他們并不想有意識地養成官僚主義。但他們也不同于蘇區的老干部，這些新來的人既沒有參加過根據地的創建工作，也沒有學會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當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話。而一旦他們掌握了政權，他們并不消除對農民的蔑視，也不防止官僚主義的滋長。[[26]](#_26_Cao_Bo_Yi____Jiang_Xi_Su_Wei)

### 群眾路線

各地的游擊戰士，從阿爾及利亞到古巴，都曾依靠他們為之而戰的群眾的支持。但是通過宣傳和行動以贏得群眾支持的實踐，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群眾路線”。誠然，自中共六大以來，黨中央和蘇維埃領導人都優先考慮動員群眾。事實上，六大的政治決議甚至提出，黨在蘇區應把自己擴大為一個群眾組織，[[27]](#_27___Hong_Se_Wen_Xian_____Di_19)而毛澤東在1927年《湖南報告》中評論道：“嘴里天天說 ‘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28]](#_28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當1927年中共第一次轉移到農村遇著中國農村的人民時，動員群眾就成為一件緊迫的事情。這時黨員必須明確：誰是農民？他們支持革命的積極性如何？如果失去紅軍保護因而面臨反動派的報復，他們驚恐到什么程度？通過組織和技巧，或者通過政策和宣傳，如何更有效地把群眾動員起來？

一旦28個布爾什維克與農民群眾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他們的觀點也開始轉變。他們現在在黨內已不再形成鐵板一塊的集團，并且他們也沒有全部遷入中央蘇區。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眾路線的全部內涵。雖然1931年9月1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蘇區竭盡全力動員群眾以鞏固根據地，[[29]](#_29_Guo_Hua_Lun____Zhong_Gong_Sh)但是它的要旨明確地在于通過激烈的階級斗爭來動員群眾。它對用反對“壞人”代替專門反對地主、富農、商人的那種措辭含糊的軍隊口號的批評，它對富農分壞田的堅決主張，以及它對忽視反帝工作的不滿，全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央以為，只需激勵階級特性和階級斗爭，蘇維埃就能喚起廣大的被壓迫群眾。這些批評和建議反映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黨代會的決議里，這次大會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于1931 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30]](#_30_Xiao_Zuo_Liang____Zhong_Guo)在這些早期的指示中沒有跡象表明這些運動可能是一種動員群眾的方式，沒有提到關心人民和愛護人民，也沒有允許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和黨的工作。

甚至在1934年1月28個布爾什維克路線鼎盛時期召開的五中全會上以及在1934年的決戰前，關于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還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首先直接依靠共產黨，依靠黨的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依靠黨的行動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黨員的布爾什維克的紀律，依靠黨領導群眾斗爭的能力。只有堅決地奮斗，反對一切離開和曲解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才能勝利的領導爭取蘇維埃中國的斗爭。”[[31]](#_31___Dou_Zheng____Di_47Qi__1930)只是在當年初次遭受嚴重的軍事挫折后，甚至在當權的28個布爾什維克的言行中也出現了分歧和動搖。例如一般被認為是長征前28人中最接近毛澤東的張聞天一方面說：

我們都要采取發動群眾、經過群眾、依靠群眾的路線。因為在這里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捉幾個人或殺幾個人，或沒收征發一些地主和富農的東西，而是一個怎樣在執行我們的明確的階級路線中發揚群眾的積極性、提高群眾的覺悟程度、團結與組織群眾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的問題]。[[32]](#_32___Hong_Se_Zhong_Hua____1934N)

另一方面，他加緊了“赤色恐怖”。“赤色恐怖應該是我們對于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別在戰區邊區，我們對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動，必須立刻采取最迅速的處置。”[[33]](#_33___Hong_Se_Zhong_Hua____1934N)

毛澤東對這一類問題的看法和解決辦法顯然尚處于發展階段，它們表現出極大不同。他作為那塊根據地的創建者，曾與群眾一起工作、戰斗和生活，時間比28個布爾什維克中任何一個都長。雖然他可能還沒有將他的經驗概括成一條政策路線，但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強調了兩個基本點——群眾有批評紅軍的錯誤、幫助紅軍改正錯誤的權利，以及黨的決議應當通過群眾來貫徹實施。[[34]](#_34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n)當然，當時紅軍是由黨的政委們控制的。[[35]](#_35_1931Nian_9Yue_1Ri_Zhong_Yang)批評紅軍的錯誤等于批評黨。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說明了黨的正確領導的智慧和能力的源泉：“上級組織必須清楚地了解下級組織的情況和群眾的生活情況。這就是正確領導的社會根源。”[[36]](#_36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n)在1932年，這樣的思想導致了以下結論：“所有脫離群眾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義。”[[37]](#_37___Mao_Ze_Dong_Ji____Di_3Juan)

反對官僚主義（即命令主義和自命一貫正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的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要求的態度是心甘情愿地做群眾的小學生，而不只是他們的領導者，并且不能把群眾視為愚蠢笨拙的鄉巴佬，而應當信任他們，讓他們參加行政管理和政治運動。只有采用這種方法才能發動群眾而不損害他們的意愿。根據毛在1933年清楚形成的群眾路線的概念，不論是先鋒隊還是階級，沒有誰是完美無缺的，因此，每個人都有必要接受教育。每個人，包括干部和群眾，通過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壞的習慣和作風，使正確而可靠的情況能從基層反映上來，成為正確的決策的基礎，并使決策得以貫徹。

在實踐上，這意味著一旦蘇維埃制度由軍隊建立，在這一制度下要盡可能地關心人民生活和社會公正。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財產、懲辦反革命和反動派，以及提供救濟時，軍隊本身為建立政權要擔負起宣傳和組織群眾的任務。[[38]](#_38___Gu_Tian_Jue_Yi_______Mao_Z)政權鞏固后，它的經濟和政治措施都應以增加生產、促進貿易和合理分擔賦稅為目的。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需要經濟結構的改革，如合作社和互助組。[[39]](#_39_Wang_Guan_Lan_Xiang_Si_Nuo_T)它有時還可能需要生產運動和“勞動模范”的慣常做法。有時甚至紅軍戰士也參加農業勞動。[[40]](#_40___Hong_Se_Zhong_Hua____1934N)為了動員婦女，蘇維埃共和國引進并通過了1931年12月的《婚姻法》，而婦女的活動從鍋臺擴大到田間和戰場。[[41]](#_4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1934年紅軍從中央蘇區撤離提高了婦女在殘存的游擊區中的作用。婦女活動分子并不那么害怕國民黨軍隊和還鄉團，她們搜集情報，為游擊隊運送糧食和其他必需品，護理傷員，并且參加戰斗。[[42]](#_42___Hong_Qi_Piao_Piao____Di_1J)

在執行法律方面，群眾必須與他們的敵人劃清界限，并使法律能為他們所理解。《婚姻法》和《勞動法》顯然是為保護他們而設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動的法律和法規則是為了捍衛蘇維埃政權。[[43]](#_43_Su_Wei_Ai_Fa_Dian_Zai_1933Ni)在運用群眾路線方面，蘇維埃政府不那么關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關心看起來是否公正。因此審訊是在群眾監督下公開進行的，同時教育并告誡群眾。[[44]](#_44_Cao_Bo_Yi____Jiang_Xi_Su_Wei)不管蘇維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點，它恰給中共的主要敵人陳誠將軍以深刻的印象：“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慮排除個人感情。它的好處表現在很少出現貪污腐化的案件。”[[45]](#_45_Wang_Jian_Min____Zhong_Guo_G)

假定毛提出的群眾路線已贏得黨的領導人的贊同，那么其他蘇區接著也會接受它，連同它的一切組織和機構。的確，在鄂豫皖蘇維埃，動員群眾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與中央蘇區相比，或許不那么注意經濟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婦女。[[46]](#_46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_2)但是那里的領導人張國燾不那么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為喚起群眾的一種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紅軍保護群眾工作的力量。所以他或許更多依靠強制，而較少依靠細致的說服；以致軍事上的挫折常導致他的群眾工作的崩潰。[[47]](#_47___Jiao_Fei_Zhan_Shi____Di_4J)張國燾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眾路線就不同于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根據極有限的材料判斷，湘鄂西蘇區在魯莽而頑強的賀龍領導下，在1930—1931年間似乎曾建立起一個比較周密的群眾組織的網絡。他的蘇區通過開展生產和墾荒運動及反對迷信、吸毒和賭博的運動來解決生產和社會福利問題。但是夏曦，28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似乎曾反對這種方法。[[48]](#_48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_2)在別的更小的蘇區，材料更為缺乏。人們所知的只是在東北的工廠里日本人對中國婦女的歧視，驅使她們投身游擊隊。而在海南島，20世紀30年代早期有一支由馮增敏指揮的120名婦女的紅色分遣隊[[49]](#_49_Chen_Xue_Zhao____Man_Zou_Jie)[[50]](#_50_Gen_Ju_1991Nian_7Yue_31Ri)——這一英雄事跡后來被改編為一個革命歌劇中的情節。

### 宗派主義和叛變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表明有過多次派別斗爭，目的是試圖控制革命進程的領導權。[[51]](#_51_Guan_Yu_Li_Lun_Shang_De_Chu)從一開始黨就建立在主要是師徒式的追隨關系上，有李大釗和陳獨秀這兩個受人尊敬的人物。雖然未經小心考證和分析，但他們之間缺少合作是明顯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論上的差異和個人間的不和。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人都堅信馬克思主義，都在嚴酷的受迫害的情況下工作，但他們卻并沒有像其他一些早期黨員那樣干脆脫離黨。從1927年起，整個革命形勢出現了逆轉。持不同意見的人得不到法律保護；他們只需經過一個屈辱而痛苦的過程，向國民黨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黨，他們常常需要出賣以前的同志，但又難保自身的安全。如果他們拒絕這樣做，可能危及他們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下，持反對意見的黨員只要不脫黨或叛變，往往采取宗派斗爭的方式。

但是，如果認為只是出于怕報復才使黨盡管有宗派主義仍能維持統一，那就低估了意識形態的力量。這些宗派主義者，無論意見多么分歧，仍然是共產主義者，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戰斗。他們之間的決裂主要與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有關；個人的特性和追求權力是第二位的。除意識形態外，還有黨的“鐵的紀律”。的確，滿懷階級仇恨的共產主義者具有好斗的性格。然而，這只是其個性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超過了追隨關系的同志式的愛。那種認為冷酷無情引起了中國共產黨內宗派主義的觀點不足以令人信服。[[52]](#_52_Ha_Li_Sen____Tong_Wang_Quan)

極端的宗派主義通常是分裂或叛變的前兆，兩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分裂者可能從黨內居主導地位的思想轉變到另一種思想，如陳獨秀和彭述之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而叛徒則看到了信仰和現實之間的不一致，如李昂、龔楚和張國燾。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后，組織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因為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他認為1927年的潰敗主要是共產國際的責任，而他贊同托洛茨基對共產國際的批評。[[53]](#_53_Chen_Du_Xiu____Gao_Quan_Dang)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兩篇文章：《中國革命的過去和未來》和《六大以后的中國革命》，他毫無保留地表示贊同。加上他早些時候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這導致他和陳獨秀兩人走向托洛茨基主義并反對中國共產黨。[[54]](#_54_Peng_Shu_Zhi____Rang_Li_Shi)他們信仰的轉變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誠實。[[55]](#_55_Zheng_Shi_Zhe_Ge_Yuan_Yin__Z)李昂卻迥然不同。他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辭為其叛變行為辯解——他要始終站在真理一邊，他要揭露共產主義運動的黑暗面和陰謀。他強烈反對“毛澤東的獨裁”，說他“比希特勒更暴虐”[[56]](#_56_Li_Ang____Hong_Se_Wu_Tai)。龔楚是廣西根據地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在黨處于革命最低潮時離開了黨。除去他個人的不滿以外，他的行動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11年來從未為國家的獨立、民主和繁榮而奮斗。與此相反，黨卻一直讓人民遭受極大的苦難，遠遠背離了革命的宗旨。它只不過是蘇聯的“爪牙”，“大騙子”。1971年在香港《明報》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復了他叛變的理由。[[57]](#_57_Gong_Chu____Wo_Yu_Hong_Jun)

分裂和叛變的過程未必拖得很長，通常從意見分歧開始。當這些分歧增強時，行動者的信仰體系本身瓦解，導致逐漸背離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則經歷一個否定并與同志疏遠的過程。在這個階段，分裂主義者需要一種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則必須找到一個生存的機會。如果這種轉變是從比較連貫的邏輯上的思想轉向不那么嚴謹的思想（如從共產主義轉變為孫逸仙的“三民主義”），那么這種轉變的理論基礎可能是不恰當的，令人想到機會主義和十足的背信棄義。龔楚的例子很好說明了這一過程。他似乎難以讓國民黨確信他的真誠，因此國民黨派他去破壞贛粵邊界的一些紅色游擊隊，甚至試圖搜尋贛南的項英和陳毅。[[58]](#_58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_4)其他的叛徒，如顧順章、孔荷寵等，或者被國民黨捕獲，或者向國民黨投降，幾乎與思想無關。

張國燾既是一個分裂主義者，又是一個叛徒（關于他的分裂主義，見本章《蘇區的毀滅》一節）。他于1936年12月2日，即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達延安，當時他在1935年毛兒蓋會議上提出的政策路線已徹底失敗，他感到被疏遠了，情緒消極。然后是1937 年2月和11月對他斗爭（即“對張國燾的清算”）的公開羞辱。在這場斗爭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種可怕的反黨罪行。在王明從莫斯科回國以前，張有一線希望與王明結盟反對毛澤東，但當王明回國并指控他“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時，他對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完全失望了。這個黨已不是他曾經幫助建立起來的黨，也不是他所需要的黨。

張國燾早期就對農村蘇維埃運動的可行性持懷疑態度。他認為蘇維埃沒有無產階級基礎，在性質上只是小資產階級，所以蘇維埃只不過是要求權力和占有地盤的一種借口，對國家的富強無益。[[59]](#_59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7Q)張從一種思想跳躍到另一種思想，他發現了民族主義和蔣介石。他贊同毛澤東的關于抗日統一戰線的十大綱領，但指責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奪取政權和地域的原則。他認為毛只不過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叛徒”，而蔣在抗日戰爭中所作的努力應當無保留地得到支持，因為這場戰爭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蔣的統一中國的工作也應得到支持，因為它是反封建的。當張國燾從“左派白日夢”中猛醒過來，看到蔣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模式時，他對自己的轉向問心無愧。根據黨章，黨員是可以自愿離黨的；因此張認為既不存在出賣，也不存在變節的問題。在個人對黨疏遠和意識形態上的考慮之下，他對毛的敵視也不容否認。在他離開中國共產黨整整30年之后，他仍懷著強烈的感情描繪他的這位老對手——“專橫跋扈”、“不講理達到野蠻的程度”、“狹隘”、“自私”、“目光短淺”、“冷酷”、“詭計多端”、“虛偽”，甚至“渴望成為中國的帝王”[[60]](#_60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6Q)。

## 農村蘇維埃的創建

自第一次統一戰線在1927年7月崩潰以后，中國共產黨的首要任務一直是在中國農村建立避難所，在那里有可能繼續進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導革命走向最后勝利。對一個被查禁和受迫害的黨來說，似乎沒有其他途徑可供選擇。這些避難所實際上是國中之國。它們的創建需要一支軍隊，這就是1927年4月在漢口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兒戲般地提出三點意見的原因。這三點意見是：從華中向東推進，擊敗蔣介石；向南進軍，奪取廣州；或者加強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沒有武裝力量，這些目標都無法實現。[[61]](#_61_Ha_Li_Sen____Tong_Wang_Quan)后來，到1927年5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才指示中國共產黨為武裝革命而策動兵變和組織工農武裝。[[62]](#_62_Jian__De_Ge_La_Si____Gong_Ch)這一思路發展成為共產國際7月舉行起義的號召。

### 1927年的起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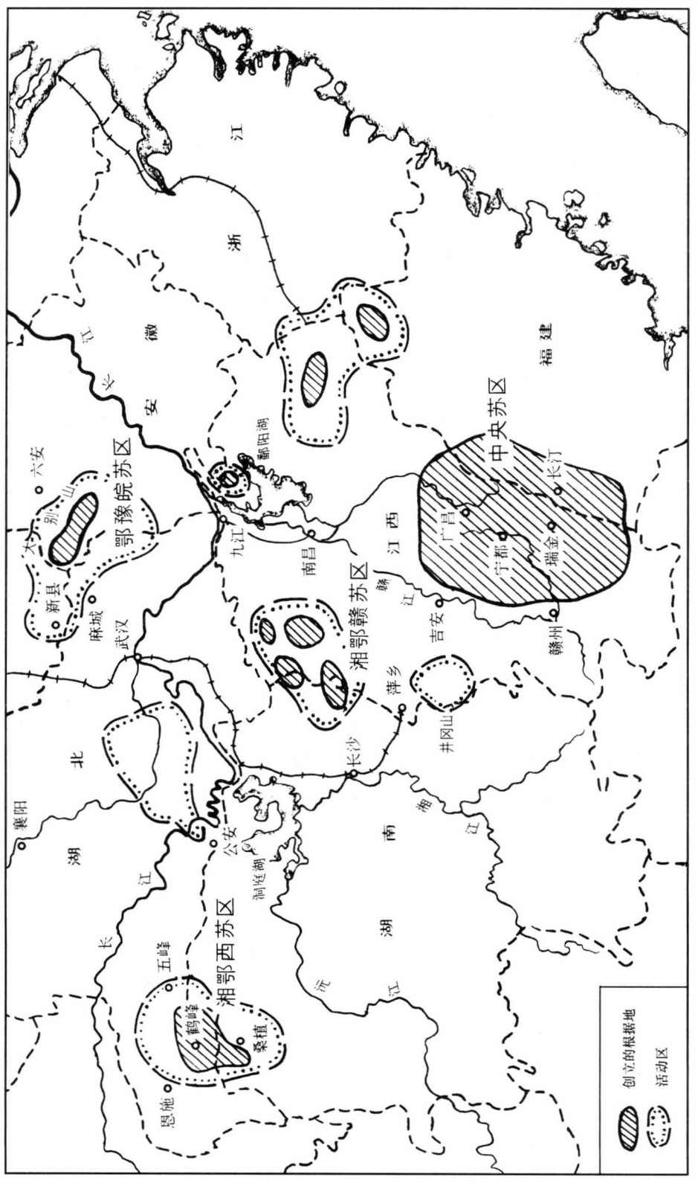
在這一年余下的時間里，為響應共產國際的號召，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一系列的起義：8月1日江西南昌起義，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動，12月廣州公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起義都是第五次代表大會首次提出的三點意見的繼續，是根據城市必須領導農村，決戰必須在城市展開以及革命高潮正在來臨等設想提出的。

為什么選擇南昌？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在左派張發奎的軍隊中）的優勢，可以說明中國共產黨所組織的第一次武裝起義的地點選在南昌的原因。當時寧、漢分裂，南昌地處寧、漢之間，共產黨人可能希望奪取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63]](#_63_Chen_Zhi_Rang____Mao_Ze_Dong)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業城市，不能提供無產階級的基礎，也沒有農民參加。在周恩來的指揮下，參加起義的人大部分是受共產黨影響的國民黨軍隊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64]](#_64_Su_Yu_Wen____Xing_Huo_Liao_Y)

盡管有人指責軍隊的訓練和組織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眾支持，導致了起義的失敗，然而在葉挺、賀龍和朱德領導下從南昌撤退的這支軍隊，卻表現出后來成為紅軍特征的最初跡象。朱德的第25軍由大量革命青年擔任下級軍官，[[65]](#_65_Jing_Cha_He__Can_Jia_Nan_Cha)以連和排為單位分散開展政治宣傳和沒收土地。[[66]](#_66_Yang_Cheng_Wu_Wen____Xing_Hu)葉挺和賀龍則在廣東的潮汕地區實施他們的土地綱領，沒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并將地租減少到不超過30%。[[67]](#_67___Hua_Zi_Ri_Bao____1927Nian)即使在這初期階段，這些軍隊已不同于中國的其他軍隊。

南昌起義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8月7日召開了有歷史意義的緊急會議——這種會議形式后來在1931年1月被“實干”派追究過。不能肯定黨是否在理論上為共產國際的代表B.羅明納茲及其繼任者H.紐曼所說服。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與其說是封建的，還不如說是以小型、分散的生產單位為主要特征的亞細亞方式的。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也是軟弱和不團結的，完全沒有能力領導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國無產階級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間斷地被直接推入社會主義階段。[[68]](#_68_Sang_Dun____Gong_Chan_Guo_Ji)緊急會議后發布的《告全黨同志書》，一方面拒絕承認土地革命是一種反封建的起義，但另一方面又斷言中國革命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69]](#_69___Hong_Se_Wen_Xian_____Di_93)從現階段向下一階段的過渡被視為可能是不間斷的。會議還強調了國家革命與社會革命之間的相互關系；反帝和反封建的斗爭互相聯結，使農民的參加成為絕對必要。按照這種觀點，在沒有有計劃城市起義支持的情況下，1927年的秋收起義從農村向城市發動進攻，這與一星期前的南昌起義有很大的區別，而且它還提供了反抗國民黨鎮壓的唯一可行的手段。[[70]](#_70_Bu_Lan_Te_Deng____Zhong_Guo)

“利用當年的收獲季節強化階級斗爭”的秋收起義，旨在推翻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以創建一個國中之國，使中國共產黨得以生存并繼續進行革命。這次起義計劃包括湘贛邊界、鄂南、湘鄂邊界、贛南、贛西北以及從海南到山東的其他地區。[[71]](#_71_Bu_Lan_Te_Deng____Zhong_Guo)戰略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利用各種武裝力量充當盾牌來保護并武裝農民，奪取地方政權，將它轉變為農民協會或改建為蘇維埃，分配土地。這一戰略成功的關鍵在于期望農民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戰斗力量，使起義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擴大，以奪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由于這種設想被證明是無效的，起義注定要失敗。



地圖5 30 年代初中國共產黨的地區

然而，這并不是說農民，特別是山區的農民不準備起義。如果他們沒有準備，其余的土地革命就無法解釋，除非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巧合。起義失敗也不是由于領導者有意輕視農民。例如，黨中央和毛澤東都把工人和農民看作起義的主要力量。[[72]](#_72_Bu_Lan_Te_Deng____Zhong_Guo)這里有許多戰略錯誤。黨設想從農村進攻城市只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軍隊從縣城開始奪取大城市，然后推翻武漢政府只是幾個月或幾周的事。當黨發現即使縣城也在嚴密防守或頑強抵抗，難以被毛澤東和其他起義領導人下面混雜的隊伍攻克時，它隨即把它的目標向下調整到在井岡山這樣的偏遠農村地區，開展較為謹慎的和長期的游擊戰爭。[[73]](#_73_Shen_Zhi_Xiang_Hu_Bei_Huang)毛澤東從失敗的余燼上把他的部隊整編為一個團（與鄂豫邊區和湘西的同志們所能召集的相比，這部分兵力是龐大的），并重整旗鼓。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擁有包括一兩座縣城在內的比較穩固的根據地，但仍依托山區地形以求安全。未來的鄂豫皖根據地直到1929年冬才奪取并保有第一座縣城——商城，并且遲至李立三推行冒險主義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據地。[[74]](#_74_Xu_Xiang_Qian_Wen__Tong_Shan)賀龍在1927年底只帶著8枝槍和20個黨員返回他的故鄉，直到1929年5月才集結到足夠的追隨者攻克兩座縣城。雖然政治局的11月會議承認這些戰略錯誤，但它體會不到戰斗在山區和丘陵的游擊隊領導人的孤獨感和革命低潮感。在革命的這一階段，如毛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你們 [指黨中央]要求我們不要管軍事，可同時又想要群眾武裝”[[75]](#_75_He_Long_Wen__Zai___Xing_Huo)。這似乎表明當時黨既缺乏軍事行動經驗，又過于猶豫不決，證實了毛在1938年所說的話，“黨的工作重心還沒有放在戰爭上面”[[76]](#_76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在群眾工作方面也缺乏經驗。關于應當在何時以及如何建立蘇維埃式政府的討論，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準則上，如1927年的中國是否能與1905年的俄國（即為資產階級革命作準備），或1917年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相比。湖南醴陵在秋收起義開始時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77]](#_77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_1)這個蘇維埃以及以后的蘇維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紳階層——例如宗社、農村學校和民團——為中心的舊的社會關系建立起來的。有時甚至利用秘密會社。激進的受過教育的青年人從受壓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們滲透到這些組織中去，既是為避難，也是為了進行鼓動。他們從這些組織得到了創建蘇維埃根據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錢財。他們犯錯誤，并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國明顯地出現了兩股共產主義之流，即農村蘇維埃和城市領導；前者必須接受后者領導，否則整個運動就會陷入中國農民起義的傳統模式。由于農村蘇維埃仍然弱小而不穩定，建立中央權威并不特別艱難。

瞿秋白和城市領導人一直認為革命高潮正在興起，他們繼續在江蘇的宜興和無錫、湖北的武漢、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發動起義，結果都遭到慘敗。[[78]](#_78_Ju_Qiu_Bai____Zhong_Guo_Xian)接著在1927年12月11日出現了廣州公社。這次起義的背景是斯大林——通過共產國際表達——面對托洛茨基的批評，想用中國的勝利來證明他在那里的政策是正確的。葉劍英回憶說：“一個革命者必須找到前進的方向。”南昌起義失敗后，廣州似乎是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不為敵人所嚇倒，以及仍能在一個省取得勝利的唯一希望。[[79]](#_79_Ye_Jian_Ying_Wen____Xing_Huo)發動這樣一次起義的決定實際上是在黨中央的11月會議上作出的，但行動是由處于負責地位的人指揮的，這些人再次對張發奎的合作抱有幾乎無法實現的希望。[[80]](#_80_Xiao_Zuo_Liang____Zhong_Guo)廣州起義失敗后，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圖被擱置起來，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動。革命顯然處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動。

### 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時，只采取了一些小規模的行動，包括在人跡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據地，如井岡山、大別山、洪湖地區、川北和廣西的左右江，在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堅持斗爭。[[81]](#_81_Guan_Yu_Zhong_Guo_Gong_Chan)但是，革命者卻不得不問：有建立根據地的必要嗎？他們能得到農民的支持嗎？從偏僻山區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么？

在井岡山蘇維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訴他的戰士們：

我們鬧革命，光是跑來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個家，不然就很困難。有了這個家，就可以作為同敵人進行革命斗爭的根據地。敵人不來，我們就在這里練兵，發動群眾，敵人來了，我們就靠這個家和敵人作戰。我們以家為依托，不斷向外發展，把我們四周的敵人一點點地吃掉、趕走，我們的日子慢慢地就好過了。[[82]](#_82_Huang_Yong_Sheng_Ji_Lu_De_Ji)

事實上，從事建立根據地的紅軍戰士和他們的黨需要人和錢，這只能靠沒收富人財產并分一些給窮人來取得。貧苦農民由于害怕報復，不愿參與土地和財產的沒收和分配，除非紅軍的防衛強大到足以保護他們，并對新的財產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一旦新制度建立，紅色政權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像軍閥的轄區，但軍閥保護豪紳而不保護貧苦農民。黨希望通過建立一支能維護新財產制度和紅色政權的足夠強大的軍隊，進行社會和經濟上的變革，以收到激發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忠誠的效果。毛澤東和其他少數像方志敏這樣的人是相信這一戰略的，而張國燾卻認為農民是觀潮派，而且只關心自身的生存；只有當紅軍取得勝利時，他們才會支持紅軍。按照張國燾的觀點，發動農民完全取決于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力量；與土地政策無關。[[83]](#_83_Zhang_Guo_Dao_Wen__Zai___Min)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農民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這來自另一消息和評論來源——掌握華中共產黨人第一手情況的傳教士和外國記者。早在1931年，《教務雜志》（一份首要傳教士雜志）上一篇文章承認，這些共產黨人“盡管不信神，卻得到成百萬農民和工人的支持”[[84]](#_84___Jiao_Wu_Za_Zhi____Di_13Qi)。像《密勒氏評論報》（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國雜志）那樣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報道過農民對共產黨人的支持。[[85]](#_85_Li_Ru__Jian___Mi_Le_Shi_Ping)當共產黨出發長征時，亞朋德和A.J.比林漢考察了共產黨原先統治過的地區。在那里他們發現農民們喜歡的是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86]](#_86_Ya_Peng_De_Deng____Zhong_Guo)正是這種支持使紅色政權在長征前得以生存，并使游擊區在長征后得以保持。令人不解的是，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學者們普遍忽視了來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蘇維埃運動影響的其他省份的外國傳教士的報告。

建立根據地的基礎工作一旦就緒，革命者必須在兩個長期戰略之間作出選擇。第一個是放棄山區的小根據地，代之以在農村打游擊，因為小根據地的經濟資源難以滿足大規模作戰的需要。這一戰略是通過宣傳和經濟混亂來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直到游擊隊得以在全國范圍起義中奪取政權。第二個戰略是在根據地堅持下去，并在組織和武裝群眾的同時，波浪式地向外擴大根據地。這一戰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強紅色政權的勢力，同時施惠于農民，并促進革命高潮的來臨。[[87]](#_87_Mao_Ze_Dong_Gei_Lin_Biao_De)

按照類似井岡山的模式，沿中國南部和西部高原與北部和東部平原之間的丘陵地帶，出現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數幾個蘇維埃。這些地區有蘇維埃存在，內戰頻繁，因此是軍隊的集結地，這意味著蘇維埃的建立與農民的悲慘境遇之間的關聯，對此應作細致而系統的研究。1910年至1920年間，這一地區的內戰和軍隊集結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混亂，可能比中國的平原等地區更為嚴重。研究平原地區而不研究這一地區就得出結論說農民的悲慘境遇與造反的關系不大，無異于品嘗白堊而把它當作奶酪。到1930年，13個左右蘇維埃約有300個縣在共產黨不同程度控制或影響之下。那些沒有建立蘇維埃的游擊隊，如1929年7月至10月間在四川由鄺繼勛所領導的游擊隊，則銷聲匿跡，被人遺忘了。[[88]](#_88_Hu_Hua____Zhong_Guo_Xin_Min)

### 富農問題

蘇維埃著手沒收土地并動員貧苦農民，這項任務通常由革命委員會或村和區蘇維埃承擔，這些組織最初都為來自城鎮的知識分子所支配。[[89]](#_89_Guan_Yu_Su_Qu_Zheng_Fu_De_Ji)這一事實意味著缺乏政治經驗的農民只起被動的作用，而黨的基層組織有超越行政機構的傾向。[[90]](#_90_1928Nian_11Yue_25Ri_Mao_Ze_D)要農民打消他們的被動和懷疑態度，在正常情況下需要6個月的時間，首先他們涉足缺糧和征稅等經濟問題，然后才涉足諸如階級斗爭等政治活動。[[91]](#_91_Bo_Gu__Qin_Bang_Xian__Xiang)一旦被動的障礙消除，土地革命就會幫助窮人把長期深藏的對富人的仇恨發泄出來，并激發他們更積極地參加軍事和政治活動。調動農民的這種積極性是土地革命的實質所在。當時中共的理性思考對貧農的政治化和行動化重視不夠，這不能不說是個嘲弄。黨始終把它的注意力和熱情貫注于城市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卻陷入經濟斗爭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而這兩種利益的政治意義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權力之爭的犧牲品。根據列寧對待富農的態度，根據俄國的經驗，即富農對群眾的剝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殘酷和野蠻，共產國際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對富農采取更為激烈的政策。因此，江西蘇維埃于1930年2月通過了一部《土地法》，規定沒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而1930 年5月召開的蘇區代表大會（毛澤東未參加）提出沒收富農出租給他人耕種的那部分土地。[[92]](#_92_Guan_Yu_Gong_Chan_Guo_Ji_Zhi)

下到蘇維埃一級，富農問題成為一個棘手的實際問題。當富農的至關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便阻撓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據地與鄰近城鎮之間的貿易在他們手中，他們可能停業，給共產黨人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方面的經驗在1928年12月井岡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93]](#_93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n)后來在1929年4月興國《土地法》中，對富農采取了較為溫和的態度。[[94]](#_94_Tong_Shang_Shu__Di_73__75__1)可能出于同樣的考慮，鄂豫皖蘇區的富農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們的土地。不論湘鄂西或湘贛蘇維埃都沒有對富農實行嚴厲的政策。[[95]](#_95_Wang_Jian_Min____Zhong_Guo_G)

當28個布爾什維克取得黨中央的權力時，富農問題變得尖銳起來。毛澤東所采取的遏制富農權勢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時拿走富農的“剩余土地”（抽多補少），然后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時再拿走富農的“好地”（抽肥補瘦），[[96]](#_96_He_Gan_Zhi____Zhong_Guo_Xian)而不違背平等的原則。但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會上受到嚴厲的批評。[[97]](#_97___Hong_Se_Wen_Xian_____Di_23)1931年9月1日黨中央的信指示他改變政策。誠然，富農問題在中央的階級路線中構成了重要的一環。這條路線對動員貧苦大眾是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只給富農分壞地，而不考慮給地主以補償。從理論上講，毛并不認為所有的富農都是剝削者。他們可能是半個地主或半個資本家，但他們也可能僅僅是潛在的剝削者。[[98]](#_98_Qian_Wei_Min_Xi_Te_Wei_Lian)在另一方面，28個布爾什維克把富農定義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貸和經常雇工”者。因此，很清楚他們是剝削者。[[99]](#_99_1932Nian_1Yue_10Ri_Zhong_Yan)如果寬厚地對待他們，就模糊了階級路線，或完全放棄了階級斗爭。[[100]](#_100_Xiao_Zuo_Liang____Zhong_Guo)

拿走富農的部分“好地”與只給富農“壞地”之間的差別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有些事實卻應引起注意。首先，蘇區已擴大到包括市鎮，蘇維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貿易體制的成長，使富農在貿易中的作用急劇下降，他們的利益可能因動員群眾而受到損害。第二，富農利用宗族關系來掩蓋他們實際擁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徹底實施。這在1933年查田運動期間很明顯。第三，他們從孤兒、寡婦、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里租到土地，因為他們家中有較多的強勞力，較多的耕畜、農具和流動資金。第四，通過謊報階級成分，他們可能混入并控制貧農團、合作社和其他群眾組織，使土地革命和動員群眾在某些地方成為鬧劇。[[101]](#_101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因此從1931年起新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接受了28個布爾什維克的階級路線，只給富農分壞地，而沒收他們多余的農具、牲畜和房屋。[[102]](#_102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這一新的反富農路線貫徹到何種程度無從查考。在鄂豫皖，張國燾接受了這一路線，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931年11月舉行）的政策。在他的蘇維埃于1933年轉移到四川北部以后，他和他的同志們加強了反對富農的運動。[[103]](#_103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40)在其他地方，這條新的路線只是半心半意地執行。[[104]](#_104_Guan_Yu_Xiang_E_Xi_Su_Qu_He)正是為了加速反對富農的斗爭，發動了查田運動。

### 查田運動

確切地講，很難說誰應對發動這場運動負責。對于這么一件重大的工作，說黨中央未參與決策是不可思議的，而沒有整個蘇維埃政府機構的卷入，也難以相信這項決議能夠執行。1933年黨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個布爾什維克手中，但沒有人能肯定中央對基層的影響達到何種程度。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毛澤東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很可能，這場運動的開始是黨的權力和毛澤東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結果，是階級路線與群眾路線的結合。[[105]](#_105_Guo_Hua_Lun____Zhong_Gong_S)在1933年6月至9月間運動的第一階段，顯然毛澤東在負責。接著，在10月，黨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運動中斷并擱置了一段時間，直到1934年1月至2月召開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此后，張聞天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接管了這一運動。[[106]](#_106_Li_Ru__Suo_You_Guan_Yu_Cha)

這一運動開始時，正值國民黨第四次圍剿末期，軍事形勢對中國共產黨有利，盡管缺糧已成為嚴重問題。自從1933年3月以來，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例如建立糧食調劑處，調查各縣的糧食供應情況和禁止商人囤積谷物。[[107]](#_107_Zhong_Hua_Su_Wei_Ai_Gong_He)由于官員和干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蘇維埃政府還鼓勵群眾幫助他們耕種他們的那份土地。[[108]](#_108_Zhong_Hua_Su_Wei_Ai_Gong_He)最后，政府發布了開展查田運動的命令。這一運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109]](#_109_Zhong_Hua_Su_Wei_Ai_Gong_He)除非群眾要求這樣做；更確切地說，它是為了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查清盡可能多的人的階級出身。[[110]](#_110___Mao_Ze_Dong_Ji____Di_3Jua)政府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時提高群眾的熱情以加強蘇區對即將來臨的第五次圍剿的防御能力。以貧農團為例，在某些地區貧農團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區，在開展這一運動前，甚至未組織過貧農團。[[111]](#_111___Mao_Ze_Dong_Ji____Di_3Jua)

階級成分的劃分顯然是個重要而又復雜的問題，特別在確定誰是富農，誰是富裕中農的時候。按照毛澤東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義：

富農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農一般都占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營工商業。富農多半還管公堂。有的占有相當多的優良土地，除自己勞動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債利等方式剝削農民，此種情況也應以富農看待。富農的剝削是經常的，許多富農的剝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112]](#_112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人們可以想象，如此復雜的定義是難以運用的。事實上1933年8月8日黨中央的第二個決議指出了該定義造成的混亂。[[113]](#_113_Cao_Bo_Yi____Jiang_Xi_Su_We)隨后，人民委員部承擔責任討論土地斗爭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富農被重新定為其剝削收入超過總收入的15%。依據這一新定義，有必要重新調查和重新劃分階級。僅勝利一縣，[[114]](#_114_Zhong_Hua_Su_Wei_Ai_Gong_He)3125戶中就有1512戶從地主或富農改為中農或貧農；這樣，調查階級出身蛻化為計算階級出身。形勢極為混亂。[[115]](#_115___Dou_Zheng____1934Nian_5Yu)

如果毛澤東的統計是可信的，這一運動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產307539擔糧食的土地[[116]](#_116_Jing_Cha_He_Zi_Liao__Gai_Sh)（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過糧食產量來計量土地的），并沒收價值606916元的財產。他還報告說，某些縣1932年到1933年的糧食產量增加了15%—20%。[[117]](#_117___Hong_Se_Zhong_Hua_____Zho)為了對這些數字有適當的認識，請注意蘇維埃政府在1933年7月發行了300萬元公債，在1933—1934年間發行了1000萬元貨幣，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萬擔。[[118]](#_118_Cao_Bo_Yi____Jiang_Xi_Su_We)查田運動作為一種經濟措施，不能被描繪成一項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開始查田運動時，目的已不再以經濟為主了，甚至也不是為了紅軍的糧食供應，而是政治性的。它成為一場反對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一場反對地主和富農的紅色恐怖。[[119]](#_119_Zhang_Wen_Tian_Wen____Hong)直到中央蘇區崩潰，運動就是這樣進行的。

### 紅軍

如毛澤東所說，邊區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120]](#_120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但自秋收起義失敗，隨后于赴井岡山途中在三灣改編了他的部隊后，毛澤東同其他的邊區創建者一樣，統率著由激進的知識分子擔任政治軍官的前國民黨官兵。在井岡山，這些雇傭兵中又混進了地痞流氓（或游民分子），他們都是出色的戰士，但完全不守紀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貧苦農民則持觀望態度，不愿參與他們正在做的事。[[121]](#_121_3_1928Nian_11Yue_25Ri_Mao_Z)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隨者來到；他們也是以前國民黨的部隊。事實上，在1928年和1929年，國民黨軍隊的叛兵似乎成了紅軍補充新兵的一個重要來源。首先，國民黨軍隊薪餉少并受到軍官的虐待；其次，國民黨軍官間的妒忌和傾軋常常被共產黨人利用。[[122]](#_122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1928年7月，兩個國民黨軍官，彭德懷和黃公略，帶著他們的部隊投奔毛澤東。一年后，羅炳輝的部隊在吉安，鄺繼勛的部隊在四川，相繼發動兵變。[[123]](#_123_Fang_Qiang_Wen____Xing_Huo)然而到1930年，農民們表現出愿意參軍，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為軍官。[[124]](#_124___Hong_Qi_Piao_Piao____Di_1)可能這是第四方面軍中級軍官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讀書寫字的原因。[[125]](#_125_Chen_Xi_Lian_Wen____Hong_Qi)1934年春第一方面軍的階級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農民，后者的大多數（不少于77%）來自中央蘇區本身，而國民黨的逃兵和叛兵不超過4%。[[126]](#_126___Di_Er_Ci_Guo_Nei_Ge_Ming)

紅軍與軍閥和國民黨軍隊的不同之處在于優先考慮政治訓練。由毛澤東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中列舉的許多錯誤傾向能被概括為：缺乏紀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紅軍的任務——作戰、籌款和動員群眾。政治訓練要求紅軍建立一種雙重的組織體制，分別負責戰略指揮和政治工作。就在紅軍提出成立士兵委員會的同時，蔣介石廢除了他軍隊中的政治代表，這真是一種巧合。士兵委員會在紅軍中是保證實行民主的一項措施，使士兵不致受到上級像牲口一般地對待。[[127]](#_127_Luo_Rong_Huan_Wen____Xing_H)紅軍也有政治軍官，但他們的職責沒有明確規定過，因此直到古田會議時他們的職責還沒有得到確切的敘述。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紅軍發動群眾和建立新政權。[[128]](#_128___Gu_Tian_Jue_Yi_______Mao)除此之外，黨代表還在每個班建立黨小組并在每個連建立黨支部，因為毛堅持在軍隊中黨員和非黨員的最佳比率必須是1∶3。事實上，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對70%。[[129]](#_129_Luo_Rong_Huan_Wen____Xing_H)指揮系統和政治系統是分開的，有獨立的經費和相似的等級制度；他們之間有完善的聯絡渠道。在政治系統內部，1931年2月建立的總政治部既控制各級政治軍官，也控制各級黨代表（當時稱為政治委員），但政治委員地位常在同級政治軍官之上。[[130]](#_130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在兩個系統中，規定的薪水并沒有區別。軍隊中的每一個人，不論其級別如何，都領取相同的薪金，并過著相同的生活。[[131]](#_13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在戰斗和維持治安時，軍隊得到赤衛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支援。[[132]](#_132_Tong_Shang_Shu__Di_68__69Ye)經過如此訓練的軍隊自然與同時期內其他中國軍隊大不相同。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紅軍嘩變并受到鎮壓，幾百人被處死——外，紅軍從未自相殘殺；也極少感到需要平息農民對它的敵意。由于黨掌握一切意識形態上的職權，而政治軍官掌握財權，紅軍常常受黨的控制。它是一支得到群眾支持的政治化的軍隊。

群眾路線滲透于紅軍之中，這支軍隊被反復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們一起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因此士兵們不會背離他們為之戰斗的群眾。他們對人民進行宣傳并保護人民，還幫助生產性勞動。他們通過這種方式鞏固了同人民的關系，因此他們能得到敵人活動的可靠情報；而在戰敗時他們能依靠群眾安全地隱蔽起來。1934年10月第一方面軍出發長征后，這種相互依存關系顯得尤為重要，當時只有小規模游擊隊被留下來騷擾國民黨軍隊。[[133]](#_133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

根據各種估計，紅軍在李立三領導下組織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約有5萬人。1931年增加到10萬人以上，1932年增至20萬人，1933年增至50萬人。在1930年李立三冒險路線前后，紅軍曾進行兩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整編。那年夏天前，軍隊被改編為軍團；此后，又建立了方面軍。雖然在1935年7—8月重新整編，方面軍一直延續到改編為1937年轄3個師的八路軍以及1938年的新四軍。[[134]](#_134_Tang_Liang_Li____Zhong_Guo)

## 尋找一種戰略

紅軍創建于1927年革命處于低潮之時，被看成是中共奪取政權，甚至促使革命“高潮”在不遠的將來到來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決議中，沒有地方提到軍事斗爭當時已成為斗爭的中心形式，也沒有提到軍隊是勝利的決定性因素。認為下一次高潮的到來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內部的因素，也許這些因素比軍人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詞語“革命高潮”盡管含糊不清，但有“左”的傾向。承認革命進入低潮，而不同時宣稱它會再次上升，在強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情況下相當于“取消主義”。根據六大決議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來之時，即工人運動擴大其規模、增加其強度，帝國主義威脅太平洋和平，中國統治集團內部斗爭更加殘酷，以及紅軍進行的游擊戰進一步發展之日。[[135]](#_135___Hong_Se_Wen_Xian_____Di_1)決議反復強調中國革命形勢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區、社會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只要革命形勢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國范圍的革命形勢就不存在。至于高潮何時升起，淹沒部分地區還是全國，誰也不能準確預料。

### 李立三路線

1929年下半年頻繁的內戰使國民黨內派系糾紛惡化，而美國華爾街金融市場的崩潰給共產國際提供理由，認為中國的民族危機正在“加深”，并指責中共“比起群眾不滿情緒底增長還是落后”[[136]](#_136_Gong_Chan_Guo_Ji_Zhi_Xing_W)。若把這一點解釋為共產國際號召采取行動，那就錯了；[[137]](#_137_Bu_Lan_Te_Deng____Zhong_Guo)然而，這確實鼓勵了李立三擺脫他早期的悲觀主義，過于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他繼續制定他的軍事戰略，形成了所謂李立三路線的核心。到1930年初夏，共產國際斷定中國的革命高潮是“不可爭辯的事實”，盡管仍然是不平衡的，“事變發展的趨向是：最近將來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夠包括整個中國，但至少也要包括幾個有決定意義的省份”。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應該為迫在眉睫的解放戰爭作準備，而最致命的錯誤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138]](#_138_Gong_Chan_Guo_Ji_Zhi_Xing_W)

受到共產國際模棱兩可指示的激勵，李立三開始利用國外日益惡化的經濟蕭條和國內的軍事混亂。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遠，斷言革命的成果并不決定于有關的政治力量，而決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務。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可以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一旦奪取了政權并實行領導之后，革命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就可以開始。“在過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奪取全國的勝利。如果這樣做，就是犯了右傾錯誤。”[[139]](#_139_Li_Li_San____Fan_Tuo_____Di)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項至關重要的決議，即關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號召首先的勝利并不意味保衛中共占領的一省或數省的長期戰爭。除東北和西南外，奪取一個或數個“重要省份”，包括關鍵的行政和工業城市，將不可避免地威脅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與造反者之間的一場殊死決斗，直到交戰雙方中的一方被消滅為止。[[140]](#_140_Wang_Jian_Min____Zhong_Guo)因此，長期的地方割據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勢上的不平衡很快就會平衡起來。當時李立三的問題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對他來說，問題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變為平衡。畢竟1930年6月或7月共產國際的信確實提到最近將來的一場決定性的戰爭，并且提到中國從資產階級革命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會比當年俄國快。[[141]](#_141___Hong_Se_Wen_Xian_____Di_3)共產國際對形勢的估計和它的政策建議的含混，這一方面反映了共產國際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許李立三有自行解釋的充分余地。[[142]](#_142_Li_Ru__Jian_Ku_Xi_Ning_Zai)

確實，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當權以后的最初幾個月中，曾約束自己沒有給蘇區領導人發出軍事方面的指示。[[143]](#_143_Jiang_Su_Sheng_Wei_Guan_Yu)這或許是因為剛開始領導時他仍對革命前途抱有悲觀情緒。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開始制定自己的軍事戰略。[[144]](#_14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他堅持城市的領導權，而把單獨依賴紅軍奪取勝利的觀點斥為“嚴重錯誤”[[145]](#_145___Hong_Qi____1930Nian_3Yue)，他認為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這一目標是在六大通過的）的關鍵在于大城市工人的斗爭，同時由紅軍、農民起義和國民黨軍隊的兵變來支持。工人斗爭的爆發標志著革命形勢趨于成熟。換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將開始罷工和武裝起義，同時紅軍向城市進軍給他們以支持。[[146]](#_146___Zhong_Yang_Tong_Xin____Di)一旦取得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不平衡的形勢很快會變成足以使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平衡。在李的這一階段的戰略計劃中，目標城市是武漢，這一計劃表現為1930年4月3日給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一封信，這封信指示紅四軍沿贛江向沿江城市九江進發，并奪取它。[[147]](#_147_Xiao_Zuo_Liang____Zhong_Guo)

紅軍的支持作用不是通過開展游擊戰，而是通過進攻大城市和破壞國民黨軍隊的運輸線來實現。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決議，紅軍要占領長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黃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漢。[[148]](#_148___Hong_Qi____1930Nian_8Yue)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給中共的指示中，從沒有講清楚自己的戰略計劃，更不必說行動綱領了。或許被1930年春李立三的報告和政治局的決議中的不安情緒所驅使，共產國際在同年6月或7月給中國黨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說：“必須集中注意去編成和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149]](#_149_Shi_Hua_Ci____Zhong_Guo_Gon)就奪取中心城市而言，共產國際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無不同；至于如何奪取這些城市，共產國際沒有提出任何戰略；關于促使革命形勢成熟，共產國際的指示含混不清；“將來”一詞的含義可以任意猜測。這些疑問看來只能讓當地的領導人、戰場上的指揮員自己去弄清。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這些疑問，就制定出他的行動綱領。這也是共產國際的官方刊物《國際時事通信》在1930年8月7日一期上對李立三占領長沙的短暫勝利感到高興并加以贊賞的原因。

按黨中央一位領導人的看法，城市斗爭和奪取城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比分散在偏遠山區的游擊活動意義更大、更具有決定性。但在游擊隊的領導人看來，保住他們的根據地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統一戰線崩潰前，毛澤東就已得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結論。[[150]](#_150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1928年他和他的同志們在井岡山根據地周圍的進展，恢復了他們對革命前途的信心。毛并不擔心農民斗爭超過工人斗爭。[[151]](#_151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然而他認識到這種斗爭是漫長而艱苦的，因為地主和軍閥的統治不同于一小撮資本家在少數中心城市的統治，前者滲透到中國農村的廣大區域。[[152]](#_152_Tong_Shang_Shu__Di_59__128Y)這種斗爭的矛頭指向“封建”政體的心臟和大腦，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據1928年到1929年初的成就，在1929年5 月18日的瑞金會議上樂觀地預言，他指揮的紅軍一年內可能占領江西全省。

1930年初，當毛澤東寫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時，[[153]](#_153_Tong_Shang_Shu__Di_135__139)他不僅糾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確了他的戰略：集中兵力占領縣城，擴大紅色地區，以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加速革命高潮的到來。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標，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這種勝利能給中共一個穩固的地方政權，作為今后發展的基礎。至于城市斗爭，這是將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的時候，還不是武裝起義的時候。毛在分析形勢時，幾乎沒有注意世界經濟蕭條，也沒有注意中國軍事派系間的較大規模的沖突。不管情況如何，他都反對解散他的部隊，也反對派遣他們去攻打像長沙那樣的城市。[[154]](#_15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毛澤東勉強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這是李的計劃的一部分。1930 年7月底毛試圖奪取南昌，當時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攻陷長沙，但又被守軍擊退。在不到10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會。隨后從9月1日到13日，毛和彭的聯軍第二次攻打長沙。當毛看到這場斗爭沒有希望時，他勸說他的同志們撤退，并把他們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擴大蘇維埃根據地。[[155]](#_15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在毛澤東看來，1930年夏李立三的戰略指示[[156]](#_156___Wang_Ming_Xuan_Ji____Di_3)就像是虛構的小說。

### 王明的“兩條路線”

隨李立三路線失敗而來的是蔣介石對蘇區的一系列圍剿。但中共的想法卻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1931年7月的著名的小冊子《兩條路線》中設計出這一時期中共戰略的理論框架，這本小冊子大肆宣傳戰后的資本主義危機正處于第三個發展階段，這時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正日益尖銳。[[157]](#_157_Tong_Shang_Shu__Di_246__269)似乎為支持這種論點，1931年9月18日后日本關東軍占領了滿洲。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突然領先于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1932年1月日本對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無產階級卷了進去，雖然卷入的程度難以確定，卻給28個布爾什維克帶來了讓革命重新回到成市的一線希望。反對帝國主義的論點和城市革命的戰略一直是28個布爾什維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貫徹始終的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統一戰線形成為止。

在他們的領導下，戰略依然是奪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但此時以農村蘇維埃的紅軍為唯一武器。這一戰略的第一階段是鞏固和協調現存的和新建的蘇區。只有完成了這一階段，中共才能為第二階段奪取全國政權而戰斗。[[158]](#_158_Tong_Shang_Shu__Di_50__74Ye)1931年9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給28個布爾什維克以新的希望，他們在1932年1月9日的戰略計劃《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再次考慮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159]](#_159___Shi_Hua____Di_3Qi__1932Ni)長江以南所有蘇區都應爭取與中央蘇區連接，而長江以北也應這樣，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經過這樣調整和協調，紅軍能在不久的將來向南昌、福州和吉安進軍，而長江以北的紅軍將威脅武漢、平漢鐵路和長江航運的安全。要做到這一點，紅軍不能只等待敵人進攻，要誘敵進入蘇區，然后消滅他們。這種戰術被批評為出自“農村學究”之手，不是由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策劃的。[[160]](#_160_Liu_Bo_Cheng_Wen____Ge_Ming)周恩來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年少山報告中，對這種戰術表示強烈的不信任。1931年9月1日黨對蘇區領導人的指示，也認為游擊戰術的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輔助的。紅軍必須在統一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下受不同的訓練，使之能適應陣地戰，以贏得在一省或數省的勝利。[[161]](#_161_Zhou_En_Lai_Wen____Hong_Xin)

新的戰略需要新的軍事領導。在1932年8月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上，周恩來接替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后來又成為整個紅軍的政治委員。[[162]](#_162_Guo_Hua_Lun____Zhong_Gong_S)

## 蘇區的毀滅

蔣介石發動前三次圍剿時（1931年底和1932年），毛澤東依然牢固地掌握著軍事領導權。蔣介石很輕視紅軍的力量和技術，又不了解群眾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圖用軍閥的雜牌部隊對付共產黨，在消耗戰中達到一石兩鳥的目的。這些“被流放的”雜牌軍不熟悉當地的情況，他們容易被誘入蘇區并被打敗。[[163]](#_163___Jiao_Fei_Zhan_Shi____Chen)另一方面，紅軍則依靠快速運動和群眾支持，“通常是夜晚行動”并“突然出現，迅速消失”，國民黨官方的《剿匪戰史》對這種情況作了很好的描繪：

當國軍進入一個地區，那兒幾乎沒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殘被共匪的地下組織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軍隊談話。有時他們甚至幫助共匪阻礙軍隊前進……國軍對共匪的情況知道得太少了。[[164]](#_164___Jiao_Fei_Zhan_Shi____Di_1)

第二次圍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現的情況大致相似，在這期間共產黨的群眾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國民黨的官方記載抱怨說：“共匪把糧食和人都帶走了”；老百姓破壞政府軍后面的橋梁，不向他們提供消息，甚至伏擊他們；老百姓還騷擾政府軍的供應線，以致需用整團的兵力來保護政府的傳令兵和軍需官。[[165]](#_165_Tong_Shang_Shu__Di_28__44Ye)

蔣介石現在認識到他正在對付一個棘手的敵人。在第三次圍剿時（1932年7月—10月），他把總司令部設在南昌，并調集他自己的精銳部隊，而把“雜牌”軍降到后備地位。在陳誠將軍（甚至毛澤東也承認他的素質）[[166]](#_166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的有效指揮下，政府軍長驅直入蘇區，使共產黨人感到懊喪。與此同時，蔣意識到縣以下沒有政府機構，他無法搜集到關于共產黨人的可靠情報。他也開始了他的群眾工作，禁止強拉挑夫和勤雜工。[[167]](#_167___Jiao_Fei_Zhan_Shi____Di_1)但1931年9月18日“沈陽事變”后，正在加劇的對日關系中的危機終于迫使蔣介石很突然地結束第三次圍剿。在暫時的喘息中中共回顧了戰爭形勢，并對毛在消滅敵人前誘敵深入蘇區的戰略提出疑問。結果，在賀龍的洪湖地區蘇維埃遭到國民黨軍隊蹂躪后，周恩來于1932年夏代替了毛澤東。[[168]](#_168_He_Long_Ren_Wei_Zhe_Ge_Sun)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機平息后，蔣介石重新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于1933年發動第四次圍剿。但是紅軍繼續采取躲避戰術，速度之快使“政府軍在追擊中精疲力竭”。紅軍的群眾工作現在已使政府軍“無人可用，讓我們成為既聾且瞎”[[169]](#_169___Jiao_Fei_Zhan_Shi____Di_2)。這是中央蘇區周圍的戰爭形勢。在鄂豫皖，群眾工作雖然做得很好，但每當紅四方面軍受挫撤退時，卻往往變得沒有活力而消失了。[[170]](#_170_Guan_Yu_Di_Si_Fang_Mian_Jun)從1932年5月起蔣親自指揮圍剿；9月，鄂豫皖蘇區被破壞，迫使張國燾和徐向前進行可說是他們的第一次長征，前往四川北部。在那里，本省第24軍和第29軍之間的戰斗為紅四方面軍提供了一個建立新蘇區的機會。[[171]](#_171_Guan_Yu_Di_Si_Fang_Mian_Jun)

###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

1933年底第五次圍剿開始時，中央蘇區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雖然賀龍正在湖南西北部開辟另一個蘇區，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邊界及蕭克在老井岡山根據地仍有較為弱小的蘇區。現在蔣學對手的樣子，比較重視政治工作，并改變了他的戰略。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組織軍官訓練團作為基礎；大約有7000名軍隊干部接受了訓練。然后他在中央蘇區各處實施行政、經濟、社會和教育等工作的軍事化，使國民黨政府、黨和軍隊通力合作，全力擊敗共產黨人。在基層，他對1934年的春播給予幫助，恢復被稱為保甲的聯保制度。[[172]](#_172_Zhe_Li_Cai_Yong_De_Qing_Kua)生活在蘇區各處的老百姓被迫搬進標準的“戰略村”，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無人地帶，意在封鎖和餓死共產黨人。[[173]](#_173_Liu_Pei_Shan_Wen____Zhong_G)他們開始實施一項筑路計劃，雇傭了2萬名工人修筑700英里公路，以增加蔣介石軍隊的機動能力。同時廣泛采用了無線電設備、電話和飛機來改善部隊之間的協作。在執行這一切的同時，蔣介石的軍隊穩固而緩慢地向前推進，沿入侵的路線構筑碉堡。換句話說，這是戰略上的進攻伴以戰術上的防御，它使毛的誘敵進入蘇區的老戰略過時。“沒有必要去尋找共匪的主力部隊，我們只要去占領共匪一定會出來作戰的戰略要地。”這就是蔣在1933年10月17日下達的指令。在這種情況下，紅軍被迫把進攻性的運動戰轉變為防御性的陣地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把他的這一戰略描繪為愚公移山。的確，紅軍并不愿意打一場單純的防御戰，雖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就此指責當時的軍事領導人。但是，根據周恩來的看法，防御性的陣地戰已不可避免。

這[堡壘戰，陣地戰和夜戰]在當時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們就這樣做了。但是我們主要的作戰形式當然仍是運動戰。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勢下，我們常常看到一次運動戰的遭遇戰很快轉變成為陣地戰。[[174]](#_174___Hong_Xing____Di_29Qi__193)

國民黨的堡壘戰術經歷了兩個重要的階段。起初只有少數碉堡，每個碉堡由一個連或者一個排的正規軍守備。在1933年11月，修筑了較多的碉堡，碉堡之間僅相距2/3英里，通常由一個班或者最多一個排守衛。在這種情況下，堡壘形成一個支持網，而一個團的兵力能防護13或14英里長的戰線。第二個變化發生在1934年初，當時民團受命守備堡壘，而正規軍則轉向承擔進攻的任務。在這一階段，紅軍的火力已大為削弱，以致國民黨軍隊構筑的土碉堡比磚碉堡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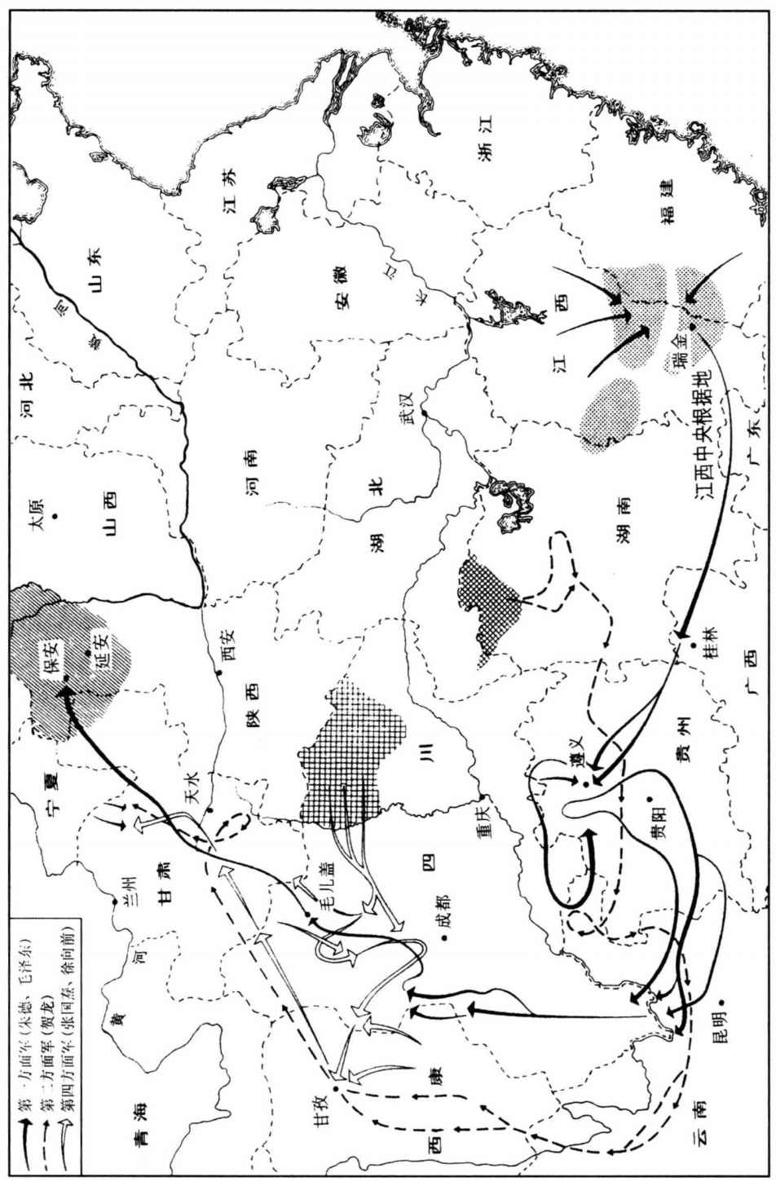
當碉堡線收緊時，紅軍把他們的陣地戰轉變成聞名的“短促突擊”，這一戰術是林彪發明的。[[175]](#_175_Guo_Min_Dang_Zheng_Fu_Chu_B)紅軍依靠構筑“支撐點”——這是共產黨人的碉堡——在距國民黨幾英里的范圍內運動。紅軍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組織在敵人構筑碉堡時進行攻擊。在支撐點周圍協調作戰的部隊需要電話，但紅軍幾乎沒有電話。支撐點本身很難經受國民黨重炮的轟擊。總之，這種戰術行動沒有達到紅軍的戰略要求。1934年4月廣昌決戰后，看來是最后手段的游擊戰重新引起黨中央和軍隊的注意。[[176]](#_176___Hong_Xing____Di_55Qi__193)但在這一斗爭階段恢復游擊戰，主要是為牽制敵人，意在贏得時間最終從中央蘇區撤退，并再次動員群眾在紅軍撤退后重建游擊根據地。1934年8月20日，周恩來在軍隊的機關報《紅星》上發表文章指出：共產黨戰略的最薄弱的環節在于游擊戰沒有深入敵后；在撤離后二年，毛評論說：

當“圍剿” 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即敵之內線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為經常的作戰手段。[[177]](#_177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可能出于這種考慮，1934年7月方志敏的紅十軍團奉命從江西東部轉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對日作戰，但事實上是轉移蔣對中央蘇區的注意力。[[178]](#_178_Wang_Jian_Min____Zhong_Guo)8月，蕭克的紅六軍團奉命突破封鎖線，與賀龍在湖南西北部會師。[[179]](#_179_Xiao_Ke_Tan_Hua__Zai_Yu_Wei)最后，當時已大為縮小的中央蘇區于1934年10月被放棄，留下項英、陳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游擊“飛地”孤軍作戰數年，直到1938年新四軍成立。在華中，只留下賀龍和任弼時領導下的小塊蘇區。更北方有張國燾在川北的蘇區以及劉志丹和高崗在陜北的蘇區。在蔣介石的壓倒優勢下，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時，1927年以來艱苦開創的局面現在已被摧毀。

### 長征

這一史詩般的逃亡，行程約6000英里，在大約一年的時間里翻越十幾座大山，跨過了二十幾條河流。歷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環境的偉績能與之相比，歷史也不能提供一個更好的不間斷的即時行動的例子。幾乎沒有疑問，長征的第一個目標是與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會合——這一意圖沒有逃脫蔣介石的估計。[[180]](#_180_Li_Tian_You_Wen____Xing_Huo)蔣似乎已經意識到在蘇區西南角上的包圍圈有缺口，這可能給紅一方面軍潛入粵北和廣西提供機會。當收緊包圍圈為時過晚時，蔣希望利用紅軍入侵的新形勢，解決由軍事反對派領導的西南政治分會的棘手問題。[[181]](#_181_He_Guo_Guang_Tan_Hua__Zai_Y)但廣東和廣西的領導人沒有進行多少戰斗就讓紅軍通過了。他們僅實行焦土政策為即將到來的紅軍制造困難。因此他們不需要蔣用來誘使他們聽命的軍事援助。[[182]](#_182_Zhang_Guo_Ping____Bai_Chong)在確信紅一方面軍的意圖后，蔣在紅一方面軍與賀龍之間布置了四道防線，[[183]](#_183_Jin_Fan____Zai_Hong_Jun_Cha)使兩支紅軍決無可能會合。紅一方面軍渡過湘江，10萬戰斗員和非戰斗員損失近2/3后，政治局領導人在貴州邊境附近的黎平（現屬貴州）舉行了長征中的第一次會議；與紅二方面軍會合的計劃被放棄，而采納了進入貴州的決定。[[184]](#_184_Liu_Bo_Cheng_Wen____Xing_Hu)這是1934年12月的事。四川北部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和徐向前，接到了關于這一決定以及中央擬在川西北某地與他們會師的計劃的通知。[[185]](#_185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48)計劃中的路線將在宜賓（敘府）渡過長江。



地圖6 到陜西的長征

紅軍于1935年1月到達遵義后，突然出現從北面、南面和東面威脅四川的態勢。[[186]](#_186___Jiao_Fei_Zhan_Shi____Di_5)這種令人驚恐的形勢，給蔣一個機會把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勢力插入這個省；而紅一方面軍自10月以來才得以第一次喘息。紅軍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的，并于19日離開這個小城，[[187]](#_187_Liu_Bo_Cheng_Wen____Xing_Hu)在這段時間，軍隊得到整編，而黨的領導人召開了歷史性的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決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計劃進入四川并在宜賓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當這個計劃因敵人加強防守而受挫時，紅一方面軍不得不選擇另一條路線。據政治安全局局長鄧發說，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目的是逼近日軍，并在沒有蔣和他的聯盟者參加的情況下進行一場民族解放戰爭。另一個目的可能是尋找“與俄國聯系的可能性，這樣也就不會[再]被包圍了”[[188]](#_188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_Xi)。

在戰略上，遵義會議標志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這以前，紅一方面軍不得不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對敵作戰，因而遭致巨大傷亡和離隊。[[189]](#_189_Liu_Bo_Cheng_Wen____Xing_Hu)經過11天休整后，紅軍主要擔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擊的黔軍，而是后面尾隨不舍的國民黨軍。整編隊伍和拋棄輜重使軍隊能夠重新進行運動戰，并運用快速和佯攻擺脫了尾隨在后的薛岳將軍和周渾元將軍統率的部隊。[[190]](#_190_Tong_Shang_Shu__Di_6Ye____H)

### 張國燾的分裂活動

在這個時候，張國燾雖然沒有受到來自中央和地方軍隊的不尋常的重大軍事壓力，卻放棄了他的蘇區。他自己對這一行動的辯解是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紅一方面軍，而毛澤東主義的歷史學家們則指責他犯“逃跑主義”。[[191]](#_191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49)張采取的路線引導他的部隊渡過嘉陵江，取道Nan—t’ung、[[192]](#_192_Nan__t_ung_Wei_Xiang_He_Di)劍門、劍閣、梓潼，然后渡涪江經江油，最后渡過岷江到達理番和懋功。[[193]](#_193_Xu_Xiang_Qian_Tan_Hua__Zai)張面臨另一種選擇，北上與劉志丹和高崗會師。如果他真這樣做，并聽任毛澤東和賀龍在南方受命運的擺布，那么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在政治上可能會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張的實際行動削弱了紅一方面軍又保存了它，然而這給了他一種軍事上的優越條件，從而有可能導致他贏得黨的最高政治權力。以后的事件足以證實，1935年2月張的明顯的狡計原來是他在長征路上所犯的第一個主要錯誤。然而，哪一種選擇都意味著他是一定要放棄他的蘇區的。

就已知的情況而言，遵義會議避免了政治上的爭論，集中批判了導致喪失蘇區和長征開始階段嚴重失敗的軍事路線。在毛起草的決議中，他無情地抨擊了“單純防御”戰術：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變中，不愿利用蔣介石集團中的矛盾，拒絕作戰略撤退，并為擊破包圍而將主力轉移到敵方堡壘線后面，以及長征準備不足。[[194]](#_194_Chen_Zhi_Rang____Zun_Yi_Hui)由于王稼樣負重傷、周恩來承認錯誤、張聞天向毛靠攏，以及德國顧問奧托·布萊恩受貶，黨的領導陷入極度混亂。在回憶1927年8月7日會議往事的氣氛中，遵義擴大會議——包括對領導層不滿的軍方代表——選舉毛澤東為三人領導小組的第一把手，這個小組還包括周恩來和王稼祥，以代替黨的軍事委員會，而蘇維埃政府軍事事務委員會仍由朱德領導。此外，毛再次進入政治局，可能是張聞天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一名書記。[[195]](#_195_Di_Te_Er__Hai_Yin_Qi_Ge_Wen)

當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會師時，有兩個要點引起了爭論——第一點，是遵義會議的合法性，因為那時有幾名政治局委員甚至不是1928年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他們包括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關系到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前途，但在遵義會議上回避了。在懋功，形勢有所不同。張國燾想向包括毛在內的新領導的合法性挑戰，并改變革命的進程。

一般認為在兩軍會合時，與毛澤東的精疲力竭的紅一方面軍相比，紅四方面軍兵員多，裝備好，只是訓練較差。張國燾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過委員會討論解決黨內爭端的民主傳統，但他同意召開1935年6月24日的兩河口會議。由于他的軍事優勢和確信蘇維埃運動注定要失敗，他或許希望他能使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支持他，因為這些人，也只有這些人，處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議合法化的地位。這時張依然和黨一起工作；他還不是一個分裂主義者。他的親密同事陳昌浩曾問他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如果你弄清并批評中央的錯誤以促使領導垮臺，結果會是什么樣呢？”[[196]](#_196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1)張沒有記下他的回答；他也沒有批評領導。他寧愿在會上爭論蘇維埃運動過去是否成功，討論如果他們全部北上與高崗、劉志丹會師，前途將如何。[[197]](#_197_Liu_Ning____Yi_Ge_Gong_Ren)換句話說，他在會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要中央領導做檢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從小處著手，在一次高級干部會議上決定以少數民族聯合為基礎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蘇維埃政府。據推測高干會議將包括較多的紅四方面軍代表。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議被采納，他將獲得他所覬覦的黨的最高領導權。

但張國燾的建議將會抹去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階級基礎。盡管這個政府有一個溫和的社會綱領，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廢除苛捐雜稅，但它將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府。[[198]](#_198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49)因此他的政策建議無異于把中共改變為一個少數民族黨。毛獲勝并不令人驚奇。但為了團結，采取了一個折中辦法，改組了軍事委員會，毛繼續擔任主席，張國燾和朱德擔任副主席。張愉快地接受了這一折中方案。[[199]](#_199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0)

為了彌合其他分歧，8月5日召開了毛兒蓋會議。當時在那里沒有人知道徐海東的紅25軍團的行蹤，也沒有人聽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統一戰線戰略的傳聞。會議沒有再次考慮張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議；它集中研究北上問題。張國燾要求召開高級干部會議的建議當場被否決，因為涉及黨的事務不應只由兩個方面軍的代表討論，代表的正當權限在于軍務，如指揮系統和北上本身。[[200]](#_200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1)關于指揮系統，朱德任命自己為總司令，以張為總政治委員。一切戰略問題都由總司令部決定，最后由以毛為首的黨的三人軍事小組批準。[[201]](#_201_Tong_Shang_Yue_Kan__Di_79)因此，作為握有最后決定權的軍委主席的毛澤東位居朱和張二人之上。不存在毛不服從張的問題，只是張蔑視毛。

這一蔑視表現在張國燾對“北上”的不同解釋上。毛澤東的目的地是陜北蘇維埃，但是張在會上爭辯說，在決定長征下一步之前，部隊至多只應到達甘肅的岷山和甘南。[[202]](#_202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2)張最為惱怒的是，毛開始與東路軍[[203]](#_203_Ji_You_Lu_Jun___Xia_Wen_Xi)一起前進，張認為這是毛輕視他的權威。在毛看來，張要求返回阿壩完全是不服從命令。[[204]](#_204_Liu_Bo_Cheng_Wen____Xing_Hu)這場爭執后面隱藏著關于蘇維埃運動前途的爭論。如果這場運動被評定為成功的，而且繼續下去會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陜北。如果蘇維埃運動被判定是一次失敗，那么最好重視張的勸告，把自己封閉在偏遠的西康一甘肅的群山之中，以待來日。從個人的角度考慮，接受張的判斷和建議將導致接受張的領導以及所包含的一切。毛不能這樣做。

由于毛澤東拒絕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此后不久，張國燾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謀已久的高干會議，成立了臨時黨中央，以張為書記。[[205]](#_205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2)部隊由臨時中央指揮。三個月后，張的西路軍遭到厄運——天氣開始轉冷，而四川軍閥劉湘一再擊敗張的部隊，迫使他們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206]](#_206_Liu_Bo_Cheng_Wen____Xing_Hu)同時陳昌浩進軍甘南的企圖遭到蔣軍阻撓。[[207]](#_207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4)使張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軍閥楊虎城提議訂立一個互不侵犯協定，但受到冷遇。[[208]](#_208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48)

同時，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于1935年11月12日開始長征。如果沒有國民黨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賀龍可能一路向北與毛澤東會師，不必跋涉半個中國。[[209]](#_209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另一方面，廣東和廣西的混亂狀況給賀龍入侵南方提供了機會。[[210]](#_210___Jiao_Fei_Zhan_Shi____Di_6)他大致尾隨紅一方面軍的足跡，到達西康與張國燾會師，當時受挫的張國燾被迫與毛的中央再度聯合。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從莫斯科帶回重新統一的折中方案。新到的領導人任弼時、關向應和賀龍利用這個機會聯合朱德和劉伯承，催促張北上。[[211]](#_211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3)張解釋說，他長時間推遲重新開始長征是因為要訓練他的部隊，使他們能在甘肅走廊對付回族將軍們的騎兵。[[212]](#_212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0)當然他并沒有這樣做。直到他被說服重新長征以前，他并未著手制定一項準備渡過黃河與回族騎兵作戰的訓練計劃。[[213]](#_213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4)但是現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勸說者們所期望的陜北，而是黃河以北甘肅走廊某個地方。這個狡猾的計劃是把毛的陜北根據地作為他的抗日前線，同時利用新疆或蘇聯作為他的后方。如果擬議中的統一戰線形成，抗日戰爭爆發，毛的軍事力量將消耗在作戰上，而張在毛后面保留自己的部隊，又有俄國人支持，將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唯一的強人。從另一方面考慮，渡過黃河對西路軍也是必要的。如果要避免與蔣介石的軍隊進行艱苦的戰斗，并避免冒被趕回毛兒蓋陷入絕境的危險，西路軍決不能留在黃河南岸。渡河后發生的事情出乎張的意料之外。西路軍被國民黨的回族騎兵殲滅。張向毛的領導地位挑戰的希望也隨之破滅。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個有分量的人了。隨著他的分裂主義破產，他的背叛開始了。[[214]](#_214_Guan_Yu_Hong_Jun_Zai_Chang)

## “白區”的地下工作

自創建農村蘇維埃之日起，“白區”工作與土地革命之間的緊張和合作都在發展。前者在理論上領導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長得快。然而，如1945年《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15]](#_21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中所總結的那樣，黨中央固執地拒絕“白區”工作服從農村工作。黨中央繼續堅持一種關于無產階級領導的機械的解釋，完全漠視這樣一個事實：無論無產階級的理論還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都不是無產階級的領域。

不可否認，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時期，城市工人運動已成為狹隘的經濟運動；而農民，特別是武裝的農民，卻正在開展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斗爭，以破壞他們稱之為“封建中國”的堡壘。在文學藝術方面——許多年輕人通過它變得激進起來——中共的影響較大。1925年五卅運動以后，中國的文藝創作開始了本身的激進化過程，這種趨勢清楚地表現在魯迅的著作和“創造社”等文學團體的改組方面。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學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不同派別聯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它影響下的雜志對學院式的評論家，對“為藝術而藝術”的辯護者和民族主義作家提出了挑戰。左聯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上海的電影業，把它的注意力從古裝武打戲轉向當代社會問題。在抗戰之前，無論在文學界還是在電影界，這都是最值得贊美的時期。在殘酷的迫害下，藝術家和作家創作了值得稱道的作品。他們的許多作品被國民黨查禁，許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殺，就是逃往蘇區。[[216]](#_216_Cheng_Ji_Hua____Zhong_Guo_D)（參見第九章。）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產國際對“白區”工作的指示，幾乎沒有注意到文學和藝術，也很少注意學生運動，但十分注意工會和反帝。執行這一指示的一個結果是1932年1月日軍入侵時，黨努力組織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進行鼓動，并企圖把戰火引入外國租界。這一切都沒有效果。[[217]](#_217___Hong_Se_Wen_Xian_____Di_3)中國共產黨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導致了與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改組派、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和陳獨秀領導的托洛茨基派的斗爭。在與“黃色”工會的關系上，中共有意無意地覺得幾乎沒有合作的共同點。[[218]](#_218___Wang_Ming_Xuan_Ji____Di_3)

1931年至1933年黨員向蘇區遷移，進一步削弱了“白區”工作。黨于是有意識地開始努力扭轉這種趨勢，并使城市與農村之間達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據記載，大約有150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從整體上看，劉少奇指責“左派”（28個布爾什維克）開展城市工作失敗是有充分理由的。[[219]](#_219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58)

當然，中共開拓城市工作的障礙之一是國民黨的反諜報活動。為了對付它，中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別安全機構。它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負責。在這些秘密人員之間的地下斗爭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發現并被破壞不下14次。國民黨的調查科[[220]](#_220_Guo_Min_Dang_Zhong_Yang_Zu)對中共的地方組織、青年團、上海總工會、共濟會、反帝團體、文化組織采取的恐怖行動，使它們的活動減少或停頓。由于顧順章和向忠發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后被捕，黨中央幾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動，因此遷往中央蘇區。至少共有2.4萬中共黨員被捕或被殺，另有3萬人不得不向國民黨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續。[[221]](#_221_Guo_Hua_Lun____Zhong_Gong_S)然而由于國民黨的特務人員腐敗無能，用錢收買以擺脫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寧只花60元錢就使一箱文件銷毀，而本人也從監獄獲釋。[[222]](#_222_Liu_Ning____Yi_Ge_Gong_Ren)

在蘇區，康生組織了約2.4萬人的五支別動隊來搜集逃兵，封鎖貿易，檢查旅行者和郵件，并訓練和組織群眾。[[223]](#_223_Dong_Xian_Guang____Jiang_Zo)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蘇維埃加強了政治安全制度。他們有肅反委員會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營救被捕的同志，幫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報，建立從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報網，并對國民黨特務采取報復行動。[[224]](#_224_Guo_Hua_Lun____Zhong_Gong_S)

### 劉少奇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劉少奇收拾“白區”工作殘局的任務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說豐富的勞工運動經驗，劉曾收拾瞿秋白盲動主義后城市工作的爛攤子，并接替羅章龍擔任上海總工會負責人，然后撤往中央蘇區。在1935年到1936年，他當時把注意力集中在學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氣沉沉的工會。由于城市里的黨支部力量單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極端的激進主義，劉對“一二·九”運動——由北平學生于1935年12月9日組織的抗日示威（見第八章）——中表現的冒險主義持批評態度。他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明確區分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并緩和政治口號，以改善黨及其外圍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系。他希望黨員能在合法的組織中工作，從而能與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而在實際上不觸犯法律規定的馬克思主義罪。[[225]](#_225_Liu_Shao_Qi____Lun_Gong_Kai)劉的作風是嚴格的統一戰線作風，他組織學生學習小組和藝術團體，建立學生的民族救亡協會，并聲援駐在北平地區的第29軍。“一二·九”運動后組織的有400至500名學生的農村宣傳隊（南下宣傳團）在劉看來似乎是太激進了，只會起暴露左翼青年運動的核心的作用。因此他鼓勵組織半公開的民族救亡先鋒隊（“民先”）——在1936年 2月創立時只有300人，但到7月已發展到1300人。[[226]](#_226_Li_Chang____Hui_Yi_Min_Xian)在學生聯合會中，左翼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陳伯達和黃鎮在幕后工作。黃甚至設法使自己被推選為清華學生會主席。[[227]](#_227_Tong_Shang_Shu__Di_187__189)劉少奇用這種方法保存了他的寶貴的干部，并將學生和河北駐軍置于他們的影響之下。這批人就是聞名的“一二·九”干部，戰爭爆發后他們轉移到河北和山西農村地區做農民工作，幫助八路軍建立根據地。1927年的經歷就這樣重演了。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農村的公開工作中，劉為今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帶著這樣的成就，他于1937年勝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夠的聲望批評28個布爾什維克，并獲得政治局一個席位。劉和毛的聯盟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然而，劉在“白區”工作時沒有日常的行政事務要處理，沒有官僚主義要應付。他在理論上的追求表現為研究一種道德哲學，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馬克思主義守護神害怕踏入的哲學禁區的第一個重要共產黨人。

## 第二次統一戰線的準備

1935年9月，當徐海東的部隊最終到達陜北根據地時，那里的蘇維埃才重建兩年。這個蘇維埃聲稱有六個縣，首府在瓦窯堡，曾一度被蔣破壞，這主要由于有中國華洋義賑會修筑的公路。這也曾阻止它和張國燾在川北的蘇維埃連成一片。[[228]](#_228___Kang_Ri_Zhan_Zheng_Shi_Qi)當10月毛澤東和他的東路軍到達時，他們增強了蘇區的力量，并給它一個發展的機會。1936年中它的首府遷到保安，接著于1937年1月遷到延安。到第二次統一戰線建立時，它大約管轄3.5萬平方英里面積和150萬人口。[[229]](#_229_Wei_Er_Si____Hong_Se_Chen_T)張學良的東北軍恰巧也在1935年10月調往西安與共產黨人作戰。在國民黨計劃的最后的殲滅戰中，只有8000名健壯的紅軍與17個國民黨師對抗。[[230]](#_230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_Xi)

主要由于長征中28個布爾什維克和張國燾本人的錯誤和笨拙的策略，他們在長征中衰落，終于給了黨自陳獨秀領導結束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定程度的統一。中共處于窮鄉僻壤的時期快要結束了。在對方，蔣以鎮壓“共匪”為由，設法把他的軍隊、政治機構和經濟制度滲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年袁世凱去世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定程度的國家統一。西南各種地方勢力在鞏固其地位的過程中，不得不在國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擇——要么與中共談判以阻擋蔣的勢力，要么屈服于蔣的壓力不讓共產黨進入他們的地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鞏固的過程對中國是有利的，或許幫助中國經受住了八年抗戰的緊張和壓力。

1931年9月后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加劇，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應，這就是1932年10月發表的關于建立統一戰線的號召。在這個決議中，黨想象蔣介石的政權在日本的壓力下可能分崩離析，所以沒有考慮與蔣介石的聯合。但是這次號召在蘇區以外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因為國內一般認為這主要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一次行動，而不是保衛中國。決不能讓這次號召成功地使中共分享國民黨對民族獨立斗爭的領導。在許多人看來，中共依然只是俄國的工具。

1934年4月蔣介石最后一次圍剿期間廣昌陷落后，中共的統一戰線的建議有了新的意義，這次建議成為扭轉日益惡化的內戰形勢和拯救中共走出困境的一種嘗試。1934年4月10日中央委員會致國民的信，故意對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作用含糊其詞。國民黨沒有明顯地被排除在聯盟之外；推翻國民黨的目的也沒有被放棄。[[231]](#_231_Xiao_Zuo_Liang____Zhong_Guo)戰爭形勢惡化使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變得溫和起來，這表現在1934年7月20日周恩來的六點建議中，[[232]](#_232___Hong_Xing____1934Nian_7Yu)它提出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甚至蔣介石的軍隊——的統一戰線。盡管這個新建議全然是實用主義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機會主義的。它在萌芽狀態就包含了指導革命從衰敗的蘇維埃走上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論定則。舊的列寧關于民族統一戰線的論點顯然值得重提。在列寧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沒有終極的價值；但在處于日本侵略壓力下的中國，中華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換句話說，民族的解放斗爭（反對帝國主義）會逐漸掩蓋社會的解放斗爭（反封建）。在重提這種思想時，中共還記得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的痛苦經驗，特別是據信由蔣介石代表的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叛變”。如果中共為了反帝斗爭要緩和他們的土地革命，那么必須回答下列問題（用當時的話說）：這是一種民族政治水準的包括一切與蔣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統一戰線呢？還是一種以動員工農兵為基礎的某種社會革命的統一戰線，他們有很高的政治覺悟足以監督領導人物以確保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成功？這兩種途徑的矛盾是明顯的。那么中共在策略上應該在動員和武裝群眾之前建立統一戰線呢，還是相反？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沒有獨立的中共武裝力量。在1935年至1936年，中共確有一支軍隊和一塊地盤。為了團結抗日，黨應當放棄它們，還是應當讓抗戰去鞏固民族團結，不使兩個主要政黨中的任何一個犧牲它的自主權？與這后一問題緊密相關的是這個統一戰線的性質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如果它只是暫時的，那么這兩個對立的政黨為民族的生存建立聯盟無需同時放棄各自的長遠目標，而完成這些目標需要雙方繼續進行軍事和地盤的擴張。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國必須經歷一次基本的政治變革，以容許各政黨用和平的方式為他們的長遠目標競爭。這一變革需要全部軍隊的國家化，建立民主的議會，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首先，在1935年到1936年，最困難的問題是：考慮到蔣的敵意和反復無常，與蔣搞統一戰線是不是有意義和有效？這些問題在1935年夏季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會議上被認真地考慮過，當時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和東方日本的侵略。根據這次號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233]](#_233_Hu_Hua____Zhong_Guo_Xin_Min)

宣言中設想的統一戰線的范圍是很廣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而，宣言依然攻擊蔣介石是民族的敵人，應被排除在聯盟之外。但宣言在重點上有一個變化——最可怕的敵人已不是蔣介石，而是日本。[[234]](#_234_Guan_Yu_Di_Er_Ci_Tong_Yi_Zh)把蔣排除在擬議中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之外，帶來了進一步的問題：蔣會不會站在一旁，注視聯軍與日本作戰而不采取任何行動？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他會不會繼續與中共和別的反對派作戰？無論他采取行動或不采取行動，他有什么正當的理由？他是否會在抗日戰爭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個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邏輯性不久就被意識到了，并由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講話中作了糾正。“如果蔣放棄他的反共圍剿并參加對日作戰，道路對國民黨是敞開的。”又過一些時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勢和新政策》中稱蔣為“蔣先生”，他說：“如果蔣先生愿意改變他的態度，中國共產黨能夠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觀點，民族矛盾遠遠超過了階級矛盾，“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沒有別的利益”[[235]](#_235___Wang_Ming_Xuan_Ji____Di_1)。

在黨的真正權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權威——所在地陜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1935年11月13日紅軍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確，既抗日也反蔣。[[236]](#_236_He_Gan_Zhi____Zhong_Guo_Xia)兩天以后毛澤東起草了十點建議，在1935年12月25日經瓦窯堡政治局會議討論，未作多少修改就通過了。毛把蔣介石描繪成為中共所反對的日本“走狗”。[[237]](#_237___Mao_Ze_Dong_Ji____Di_5Jua)

瓦窯堡會議設想建立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領導的賣國集團的所有革命階級的廣泛聯盟。為了喚醒和動員這些階級的人，必須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識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這樣他們的革命熱情才能持久。這需要沒收包括蔣在內的賣國賊的財產并重新分配；廢除苛捐雜稅；增加工資和薪金；并組織救濟工作。就這場民族戰爭的戰略而論，紅軍和紅區無論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軍和國民黨軍隊占領區應建立革命根據地，應當從這些根據地開展反對國內壓迫者和外國敵人的兩條戰線的斗爭。依據瓦窯堡會議的設想，抗日戰爭同時也將是一場社會革命戰爭，否則它決不可能成為確保勝利的群眾戰爭。從組織上講，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這與王明提出來的國防政府相似。但組織的發展并不到此為止。在根據地，革命委員會將作為通向建立蘇維埃政府的一種過渡形式。創立根據地的先決條件是擴大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和游擊隊。如果形勢按照這種方式演變，蔣介石的中國將受到來自日本的外部壓力和來自反對者的內部壓力；它將變得虛弱并分崩離析。這時中共將與蔣介石集團中的反對派結成新的聯盟。[[238]](#_238___Wa_Yao_Bao_Hui_Yi_Jue_Yi)

在瓦窯堡決議中，有兩點是清楚的——陜北還沒有與蔣談判的愿望；而農民戰爭依然是斗爭的主導形式，并以城市無產階級斗爭作為最緊密的同盟。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將繼續執行，幾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場民族戰爭中，這個戰略的應用回避了一個理論問題和一個實際問題：怎樣才能喚起農民進行反帝斗爭？沒有蔣介石參加的抗日統一戰線是否可行？

當時國民普遍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已處于窮途末路，它的宏偉計劃已不值得認真對待。中共為加強其建議的分量于1936年2月至4月“東征”，渡過黃河進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熱河對日軍作戰。當劉志丹的部隊向太原推進時，那里的老省主席閻錫山向蔣介石求援。隨后劉在戰斗中去世，紅軍撤退，但這并不意味這次冒險完全失敗。除了表明中共對日作戰的決心外，這次行動征集了8000名新兵，并從背后打破了蔣介石部署的由雜牌軍組成的圍剿。[[239]](#_239_Xie_Er_Deng____Ge_Ming_Zhon)（參見下面第十二章。）

“東征”另一有意義的結果是西北的地方軍事領導人，包括張學良在內，開始相信中共的愛國主義的諾言；隨后他們不想與紅軍作戰。張和中共的關系開始改善。[[240]](#_240_Si_Nuo____Xi_Xing_Man_Ji)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林毓英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新的政策建議。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國民黨宣布，如果政府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紅軍準備與他們締結停戰協定。[[241]](#_241_Fan_Si_Lai_Ke____Di_Yu_You)黨的政策從而發生了急劇的轉變，從既抗日又反蔣的兩條戰線斗爭轉變為逼蔣參加統一戰線。逼蔣的方法是挑起對日軍的戰斗，以斗爭求團結。這是十足的毛澤東主義。[[242]](#_242_He_Gan_Zhi____Zhong_Guo_Xia)

現在兩大政黨之間至少有了一個商討的基礎。他們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為有利的地位以確保抗日的勝利，并在抗戰結束后取得統轄和治理中國的領導權。蔣介石在1936年4月用進攻蘇區作為回答，毛澤東和朱德則以激烈的言詞還擊。一旦蔣放棄了進攻，紅軍的軍事委員會就建議為了團結停止內戰。[[243]](#_243_Tong_Shang_Shu__Di_194Ye)同時周恩來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與國民黨領導人如張群和陳立夫進行接觸，商討合作的條件。[[244]](#_244_Jiang_Jie_Shi____Su_E_Zai_Z)

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開始，蔣介石在對日關系中尋求緩和的努力已進入死胡同。[[245]](#_245_Dong_Xian_Guang____Jiang_Zo)張群和日本駐中國大使川越茂的談判陷入僵局，同時關東軍唆使偽蒙軍入侵綏遠。北平的學生、上海知識界名流和兩廣的軍事領袖，都用更加嚴厲而刺耳的聲調批評蔣對日本的遷就態度。蔣不可能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又不可能消滅中共，這一困境使他準備最終向外國侵略者攤牌。這種可能需要蘇聯——唯一愿意幫助中國的大國——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根據蔣自己的話，[[246]](#_246_Dong_Xian_Guang____Jiang_Zo)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維也納，試探俄國人的援助意向，而兩國政府之間關于互不侵犯條約和軍事援助的各種談判，在1936年整整進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緒、日益惡化的中日關系、不斷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對蔣態度較為緩和的環境下，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西安事變。[[247]](#_247_Cha_Er_Si__Mai_Ke_Lai_En)

### 西安事變

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密謀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事變的發生震驚了世界，震驚了全國，也震驚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據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應表現出恐慌的跡象。從有關的一切抗日力量——蘇聯、中共和扣留蔣的人——看，蔣如在事變的任一階段死去，都將使他們建立統一戰線的目的遭受失敗。蔣在被扣的最初幾個小時（在12月12日晨的混亂之中）幾乎喪生，此后，在羈留西安期間，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蔣的張學良沒有下令殺蔣，不妨說他從沒有想過要暗殺蔣。莫斯科給中共的指示明確要保護蔣。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和中共的隊伍中，可能有強烈的仇恨，要求殺蔣，但是這幾乎不反映領導人的明智。實際上，據說毛見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248]](#_248_Si_Nuo____Hong_Se_Zhong_Guo)這也可能是他安撫追隨者的一種方式，或者是對莫斯科干涉中共內部事務的憤慨的一種表示。隨著蔣被扣押，統一戰線的建立顯然已為期不遠了。談判的問題涉及戰略、組織和思想體系，這將長期影響蔣和共產黨人的革命前途（參見第三章）。

在南京，以何應欽將軍為代表的親日派主張對西安事變作出強硬反應，討伐叛亂者和紅軍，并請回汪精衛以加強與日本和睦相處的可能性。[[249]](#_249_Zhong_Guang_Kui____Ri_Ben_J)但是有影響的報刊如《大公報》則要求釋放蔣介石，用和平手段解決南京和叛亂者之間的分歧。[[250]](#_250_1936Nian_12Yue_14Ri___Da_Go)在事變發生地，周恩來、葉劍英等與蔣會談，堅決主張建立一個統一戰線。[[251]](#_251_Bei_Te_Lan____Zhong_Guo_De)雙方最棘手的問題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敵視和將來的友好、團結和斗爭、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取得調和。

直到這時為止，蔣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對付中日之間的緊張關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張的階級斗爭——這個解決辦法與19世紀60年代恭親王和曾國藩對付太平天國叛亂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階級斗爭服從于民族斗爭，以達到國家的團結，因為沒有團結中國將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澤東認為團結只有通過斗爭才能達到，不可能輕易獲得。如果團結來得太容易，它不會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場民眾抗日戰爭。西安事變使蔣介石放棄了原來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內部開展了一場辯論，王明主張為了斗爭以廣泛的合作達到團結，而毛則主張通過斗爭以有限的合作達到團結。

由于王明抱有農民缺乏政治覺悟這樣一種較為傳統的觀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帶回國民黨統轄的城市。他最初計劃建立民族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讓它容納其他政黨和群眾團體的代表。后來他甚至進一步倡導抗日聯軍統一指揮，統一訓練，統一供給，統一裝備和統一計劃。[[252]](#_252___Wang_Ming_Xuan_Ji____Di_1)按照他的觀點，沒有真誠合作的團結不能確保抗日的成功。[[253]](#_253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61)所以對他來說，一切必須為了抗日，為了團結。的確，在他的黨內，他仍然有相當多的追隨者，還有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權威的支持。中國需要俄國的幫助，這有助于增強王明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此外，在華中和華南，游擊隊不久集合在一起組成新四軍，由王明的追隨者項英領導。王明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的個人聲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實權，使他成為能向毛澤東領導地位挑戰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幾乎不相信蔣是一個同盟者。戰爭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會和平解決并迅速轉變成日蔣聯合反對中共的斗爭。在這次意外事件中，放棄紅軍和蘇區完全是蠢事。中共不僅應保持它的自主權和自衛能力以防不測，還應促進毛所稱的民主和進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發動群眾投入戰爭，把它轉變為真正的人民戰爭。為民主和進步的斗爭本身就是民族團結的保證。在群眾戰爭中，即使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放棄抗日，中共依然能單獨堅持下去，不會重演1927年的歷史悲劇。

動員群眾進行人民戰爭的關鍵在于適當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改革。黨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農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勢和新戰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為溫和：只沒收地主的土地，而富農可以保留他們的農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壞地。[[254]](#_254___Wang_Ming_Xuan_Ji____Di_1)的確，在這一階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敗而沮喪，但他認為土地革命僅僅是一種武裝斗爭，極少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255]](#_255_Tong_Shang_Shu__Di_81Ye)在瓦窯堡會議上這種更溫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農、中農和貧農都能得到數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觸動富農對工商業的投資。他們的牲畜、動產和農具無需重新分配。[[256]](#_256_He_Gan_Zhi____Zhong_Guo_Xia)到1936年夏，中共調整了他們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觀點，以促進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合作。[[257]](#_257___Mao_Ze_Dong_Ji____Di_5Jua)

中共土地政策的緩和，也有實際原因。陜北的基本土地問題不是高地租和渴望獲得土地，而是缺少勞動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組織勞動力以達到高產，整個華北都是如此。早些時候在那里推行的極“左”土地政策已證明是不利于農業生產的。[[258]](#_258_Mao_Ze_Dong____Jing_Ji_Wen)5 1935年12月土地政策發生了變化，它只沒收富農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極端不平等，并激發了中農和貧農對群眾工作的熱情。他們的積極性在于結束地主和富農對地方權力的壟斷。當時強調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糧食。[[259]](#_259_Mao_Ze_Dong____Jing_Ji_Wen)

毛澤東的另一種戰略并不是一種未經深思熟慮的“既打敗日本又打敗蔣”的政策，像張國燾所描繪的那樣。[[260]](#_260___Ming_Bao_Yue_Kan____Di_60)他的要點是如何使蔣繼續抗戰，以及假如蔣介石與日本媾和，中共將如何獨立戰斗下去并贏得這場革命。由于軍事力量處于劣勢，只有動員群眾建立并保衛和擴大根據地，才能確保勝利，從而加速全國范圍革命形勢的到來。抗日戰爭的總戰略，與以前內戰的總戰略一樣，必須是農村包圍城市，以切斷城市賴以生存的基礎，從而把革命引向城市。與此同時，農村的社會革命仍由共產黨的軍隊加以保護，并由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加以指引，不斷地取得進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當時毛澤東與斯諾正在進行系統的談話——一樣，他的戰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觀點都已經有了。毛澤東的許多同志，特別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觀點，黨內仍在繼續辯論。同時，有關民族陣線的事態急劇發展，迫使兩個主要政黨在1937年4月締結了正式的聯盟，距抗日戰爭爆發還不到三個月。

[[1]](#_1_3)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劍橋中國史》第12卷（即本書上卷）第10章的續篇。又見同書第8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入》（史華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國所起的作用》（韋慕庭）。關于概述，見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爾馬：《中國共產黨史，1921—1949年》。

[[2]](#_2_3)《紅旗飄飄》第6集，第15頁。

[[3]](#_3_3)黨內分歧以前從未達到這個方面。見《告全黨黨員書》，《紅色文獻》，第96頁。關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學愛好，見史景遷：《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第145—148頁和各處；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3—54頁；和本書第9章。

[[4]](#_4_3)刊載在1925年2月3日《真理報》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整風文獻，1942—1944年》，第269—271頁。

[[5]](#_5_3)《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80頁和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24頁。

[[6]](#_6_3)散見各處的中共黨員數字都是有疑問的。我引用官方統計數字作為粗略導向。例如，《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2頁上的黨員數字。一般認為，在所有這些報告中，城市黨員的數量是夸大的。反之，許多中共黨員離開城市去到農村，也可能夸大了農村黨員的數量。許多在農村蘇維埃工作的人員顯然是城市出身的。

[[7]](#_7_3)1929年2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的報告，《毛澤東集》（竹內實編）第2卷，第25、28頁；《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03—614頁。

[[8]](#_8_3)《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紅色文獻》，第169—191頁。

[[9]](#_9_3)王明：《〈兩條路線〉跋》，《王明選集》第3卷，第140—141頁。

[[10]](#_10_3)理查德·C.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第34頁。

[[11]](#_11_3)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172—173頁。

[[12]](#_12_3)金一平（音）：《中國共產主義政治：蘇維埃統治下的江西》，第183—184頁。

[[13]](#_13_3)《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議案》，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43—44頁。這種趨勢在1929年11月開除陳獨秀、彭述之及其他許多人黨籍時達到頂點。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

[[14]](#_14_3)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1930—1934年》，第55—56頁。

[[15]](#_15_3)考慮了所有的事情后，可以認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李立三的組織成就的贊揚表現出普遍的樂觀，但不是真實的記述。常注明日期為1930年7月23日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秘書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見《紅色文獻》第354頁）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過的。

[[16]](#_16_3)王明：《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70、100、108、140—141和143—144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34頁。我舉出這些人名是為了糾正一種認為李立三在1929—1930年幾乎完全沒有支持者的印象。

[[17]](#_17_2)王明：《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68—71頁。

[[18]](#_18_3)《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6頁；北平社會調查所：《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鑒·前言》，第2頁。

[[19]](#_19_3)《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何孟雄同志問題決議案》（1930年12月16日），載于《黨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見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95頁。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1931年1月20日），載于《黨的改造》第3期（1931年2月15日）。全文收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18—221頁。又見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135頁。

[[20]](#_20_3)王明：《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第78頁。關于中央集權主義，見王明著名的《兩條路線》小冊子的末尾，載《王明選集》第3卷，第111頁。

[[21]](#_21_3)1939年我有機會在成都基督教青年會網球場聽王明的公開講演，當時王明同吳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國民參政會的會議后首途回延安。我以前和以后從未聽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國人講演。

[[22]](#_22_3)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50—259頁。

[[23]](#_23_3)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151頁；《社會新聞》第6卷第19—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183—184頁。

[[24]](#_24_3)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503頁。

[[25]](#_25_3)《紅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35和367—368頁。

[[26]](#_26_3)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64頁。

[[27]](#_27_3)《紅色文獻》，第194頁。

[[28]](#_28_3)《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4頁。

[[29]](#_29_3)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12頁。

[[30]](#_30_3)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165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06頁。

[[31]](#_31_3)《斗爭》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32]](#_32_3)《紅色中華》1934年6月28日。

[[33]](#_33_3)《紅色中華》1934年5月25日。

[[34]](#_34_3)《毛澤東集》第2卷，第82頁。

[[35]](#_35_3)1931年9月1日中央給蘇區的指示，收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02—304頁。

[[36]](#_36_3)《毛澤東集》第2卷，第82頁。

[[37]](#_37_3)《毛澤東集》第3卷，第168頁。

[[38]](#_38_3)《古田決議》，《毛澤東集》第2卷，第123頁。

[[39]](#_39_3)王觀瀾向斯諾提供的情況，見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38頁；《紅色中華》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52—154頁；斯諾：《西行漫記》，第183、253頁。

[[40]](#_40_3)《紅色中華》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52—154頁；《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頁；《紅旗飄飄》第13集，第65頁。

[[41]](#_41_3)《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3頁；錢塘：《革命的女性》，第13—15頁；《紅旗飄飄》第11集，第166、171、210頁。

[[42]](#_42_3)《紅旗飄飄》第1集，第74頁；第7集，第79—108頁；第9集，第176—178頁；第11集，第151、200—208頁。《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268頁。

[[43]](#_43_3)蘇維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頒布。見陳誠檔案第16卷；特呂格弗·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民政經驗》第5章B節；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04—406頁。

[[44]](#_44_3)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13—414頁。

[[45]](#_45_3)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353頁。

[[46]](#_46_3)《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頁和第6集，第379—380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192頁。

[[47]](#_47_3)《剿匪戰史》第4卷，第685頁。

[[48]](#_48_3)《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102頁；賀龍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17頁。

[[49]](#_49_3)陳學昭：《漫走解放區》，第94—95頁；《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522頁。

[[50]](#_50_3)根據1991年7月31日《文匯報》，馮增敏為紅色分遣隊第二任連長。——譯者

[[51]](#_51_3)關于理論上的處理，見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義模式》，《中國季刊》第53期（1973年1—3月），第59頁；又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49—151頁。

[[52]](#_52_3)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49頁；埃茲拉·沃格爾：《從朋友關系到同志關系》，《中國季刊》第21期（1965年1—3月），第46—59頁。

[[53]](#_53_3)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第7—8頁。關于陳獨秀分裂主義的其他原因，見林進的文章：《社會新聞》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11日），第296—300頁；托馬斯·C.郭：《陳獨秀（1879—1942年）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第8章。

[[54]](#_54_3)彭述之：《讓歷史的文件作證》，《明報月刊》第30期，第18—19頁。

[[55]](#_55_3)正是這個原因，中國分裂主義文獻應當受到與中國叛徒文獻不同的看待。在這方面中共的學者沒有分享他們的俄國同事所擁有的方便，后者可利用大批翔實的叛徒文獻。

[[56]](#_56_3)李昂：《紅色舞臺》，第189、192頁。李昂甚至自稱是中共一大的參加者：同上書，第75—76頁。李昂這部書大概是這類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57]](#_57_3)龔楚：《我與紅軍》，第2—10、445頁。

[[58]](#_58_3)《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118頁；《紅旗飄飄》第3集，第229—233頁。

[[59]](#_59_3)《明報月刊》第57期，第95頁；第61期，第83—84頁。見載在《明報月刊》第62期上的《張國燾敬告國人書》（1938年5月20日）；一種較早的版本發表在張國燾、柳寧等：《一個工人的供狀及其他》，第4頁。

[[60]](#_60_3)《明報月刊》第56期，第86、93頁；第59期，第85—86頁；第60期，第85頁；第61期，第93—94頁；第62期，第85—88頁。又見張國燾為龔楚《我與紅軍》所作的序（第ⅲ、ⅳ頁）。

[[61]](#_61_3)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05頁。

[[62]](#_62_3)簡·德格拉斯：《共產國際，1919—1943年：文獻選編》第2卷，第390頁。關于南昌起義的敘述，我主要依據韋慕庭：《戰敗的廢墟》，《中國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3—54頁。

[[63]](#_63_2)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129頁；參看雅克·吉耶爾馬：《中國共產黨史，1921—1949年》第12章。

[[64]](#_64_2)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9頁；金帆：《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第10—11頁；《南昌大事記》，《近代史資料》第4期（1957年），第130頁。這些青年大多是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

[[65]](#_65_2)經查核，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中并無第25軍的番號，朱德所指揮的是第9軍；在葉挺所指揮的參加起義的第11軍中有第25師，但該師由周士第指揮。——譯者

[[66]](#_66_2)楊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01頁。

[[67]](#_67_2)《華字日報》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68]](#_68_2)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第5、15—16頁。

[[69]](#_69_2)《紅色文獻》，第93—135頁。

[[70]](#_70_2)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118頁；向忠發曾在武漢發動一次中途夭折的罷工以支援起義，見《華字日報》1927年8月5日。

[[71]](#_71_2)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122頁；關于這個地域的暴動計劃，參看羅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中國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頁。

[[72]](#_72_2)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122頁；《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9月20日），收入《毛澤東集》第2卷，第13頁。

[[73]](#_73_2)甚至像湖北黃安這樣的縣城也受猛烈攻擊，以致共產黨人不能長期占據。見徐向前和鄭維山文，載《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377頁和第1集下冊，第743—755頁。又見羅榮桓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140頁和黃永勝文，載《紅旗飄飄》第13集，第7頁。

[[74]](#_74_2)徐向前文，同上；陳伯祿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795—799頁。

[[75]](#_75_2)賀龍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03—614頁；蕭作梁：《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城市與鄉村的對抗》，第110頁。《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日），收入《毛澤東集》第2卷，第13頁。

[[76]](#_76_2)《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6頁。

[[77]](#_77_2)《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64頁；關于激進知識分子的作用，見J.M.波拉切克：《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805—829頁。

[[78]](#_78_2)瞿秋白：《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在十一月會議上的報告，收入胡華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00—222頁。

[[79]](#_79_2)葉劍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96—197頁。

[[80]](#_80_2)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147—148頁。

[[81]](#_81_2)關于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環境適應學”，見羅伊·霍夫海因茨以此為題的論文，該文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在霍夫海因茨的這篇論文和較早的論文《秋收起義》（《中國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岡山農民協會的存在。毛澤東在1928 年11月25日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61頁）中，提到在他到井岡山前一年多時間里黨在當地群眾中的基礎工作。關于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見陳志讓以《意識形態與歷史》為題報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與井岡山博物館館員的詳細討論（靜電復印供交流用）。

[[82]](#_82_2)黃永勝記錄的講話，《紅旗飄飄》第13集，第8頁。見毛澤東1928年11月25日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28、47—48頁。

[[83]](#_83_2)張國燾文，載《明報月刊》第46期，第99頁。

[[84]](#_84_2)《教務雜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頁。

[[85]](#_85_2)例如，見《密勒氏評論報》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日。

[[86]](#_86_2)亞朋德等：《中國能生存下去嗎？》，第238—239頁。

[[87]](#_87_2)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集》第2卷，第128—129頁。

[[88]](#_88_2)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30頁。規模、人口和紅軍實力的估計出入很大。確實，如霍夫海因茨已經指出的那樣（見本書[此處注釋](#_81_Guan_Yu_Zhong_Guo_Gong_Chan)），甚至“共產黨占據”的概念也需要嚴格界定。雖然鄺繼勛失去四川蘇區，但據上海《時報》時常報道，他在川鄂湘邊區繼續進行游擊活動。

[[89]](#_89_2)關于蘇區政府的結構和職能，見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民政經驗》和金一平（音）：《中國共產主義政治》。

[[90]](#_90_2)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51—52頁。

[[91]](#_91_2)博古（秦邦憲）向斯諾談到這一經歷，見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9頁。

[[92]](#_92_2)關于共產國際指示，見《紅色文獻》第324—327頁和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第87—91頁。與桑頓的印象相反，共產國際的這個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辭含糊不清。這個指示說，在反對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的戰爭變得激烈時，可把富農問題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這種限制下李立三在1930年夏改變了他的土地政策。關于這些法律的全文，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357—361頁。但如認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體現了向反對富農的激進政策的急劇轉變則是錯誤的。因為這部土地法不堅持消滅富農，是符合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

[[93]](#_93_2)《毛澤東集》第2卷，第67—69頁和第47、56頁。

[[94]](#_94_2)同上書，第73—75、179—184頁。

[[95]](#_95_2)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191—192、245—248頁；《星火燎原》第2集，第99—100頁。

[[96]](#_96_2)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頁。該書中文版比該書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好得多。

[[97]](#_97_2)《紅色文獻》，第236頁。

[[98]](#_98_1)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第二號（1930年6月），收入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獻研究》，第153—155頁。

[[99]](#_99_1)1932年1月10日中央來信，收入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508頁。

[[100]](#_100_1)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49頁。

[[101]](#_101_1)《毛澤東集》第2卷，第166—167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508頁。

[[102]](#_102_1)《毛澤東集》第2卷，第259—262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92—193、495頁。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53頁。然而，在王明的《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61頁）中，土地交易是準許的。按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的土地政策，地主和富農是不許購買土地的。不久以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的第2號通告，規定富農有買賣土地的權利，但不得以壟斷方式買賣土地。問題是：在蘇區什么人確實在買賣土地？什么人有錢購買土地？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262頁。

[[103]](#_103_1)《明報月刊》第40期，第98頁；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262頁。

[[104]](#_104_1)關于湘鄂西蘇區和湘贛蘇區的經驗，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245、249—251頁；《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頁。

[[105]](#_105_1)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409—412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203—205頁；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第154—184頁。

[[106]](#_106_1)例如，所有關于查田的指示當時由張聞天發布。

[[107]](#_107_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195—196頁。

[[108]](#_108_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207—208頁。

[[109]](#_109_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223頁以下。

[[110]](#_110_1)《毛澤東集》第3卷，第254頁。

[[111]](#_111_1)《毛澤東集》第3卷，第223、257頁；《斗爭》1934年5月24日；王觀瀾文，載《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頁。

[[112]](#_112_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22頁。

[[113]](#_113_1)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211—212頁。

[[114]](#_114_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劃江西省雩都縣西北部與興國縣一部為勝利縣，治銀坑圩。——譯者

[[115]](#_115_1)《斗爭》1934年5月26日；張聞天指示，《紅色中華》1934年3月15日。

[[116]](#_116_1)經查核資料，該數字有誤，應為317539擔。三擔合地一畝。——譯者

[[117]](#_117_1)《紅色中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特刊，1934年1月26日。

[[118]](#_118_1)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360、368頁。

[[119]](#_119_1)張聞天文，《紅色中華》1934年6月25日；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第285頁。

[[120]](#_120_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頁。

[[121]](#_121_1)3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37頁；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140頁；《紅旗飄飄》第1集，第57—59頁。

[[122]](#_122_1)《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465—470頁。

[[123]](#_123_1)方強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431—436頁；《紅旗飄飄》第10集，第186頁；斯諾：《西行漫記》，第273頁；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270頁。

[[124]](#_124_1)《紅旗飄飄》第1集，第57—59頁。

[[125]](#_125_1)陳錫聯文，《紅旗飄飄》第3集，第90頁。

[[126]](#_126_1)《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史事論叢》，第63—64頁。

[[127]](#_127_1)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140頁。

[[128]](#_128_1)《古田決議》，《毛澤東集》第2卷，第123—124頁。

[[129]](#_129_1)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40頁。

[[130]](#_130_1)《毛澤東集》第2卷，第124、253—254頁。

[[131]](#_131_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7頁。

[[132]](#_132_1)同上書，第68—69頁。

[[133]](#_133_1)《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309—310和第2集，第145—148頁；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237頁。

[[134]](#_134_1)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第99—100頁；董顯光：《蔣總統傳》第1卷，第203頁。

[[135]](#_135_1)《紅色文獻》，第152—153、166頁。

[[136]](#_136_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關于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1929年10 月26日（《紅色文獻》，第334、340頁）或1929年12月末。

[[137]](#_137_1)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引證史》，第180頁。

[[138]](#_138_1)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紅色文獻》，第346—355頁。

[[139]](#_139_1)李立三：《反托》，第9頁；又見毛澤東關于這個問題的評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82頁。

[[140]](#_140_1)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42—51頁；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22頁以下。

[[141]](#_141_1)《紅色文獻》，第335、358頁。這封信的日期籠統地寫成1930年6月（見A.M.格里戈里耶夫文，L.P.杰柳辛編：《共產國際與東方》，第334—335頁）。日期的差異無助于斷定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前還是以后對中共戰略計劃的反應。

[[142]](#_142_1)例如，見庫西寧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上的報告和L.毛焦爾文[《國際時事通信》第5期，第40頁（1929年8月20日）和《國際時事通信》第10期，第18頁（1930年4月10日）]。

[[143]](#_143_1)江蘇省委關于中央工作的意見，《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167頁。

[[144]](#_144_1)《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8頁。

[[145]](#_145_1)《紅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146]](#_146_1)《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147]](#_147_1)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15頁。

[[148]](#_148_1)《紅旗》1930年8月16日。

[[149]](#_149_1)史華慈：《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43頁。著重點是我加的。

[[150]](#_150_1)《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頁。

[[151]](#_151_1)《毛澤東集》第2卷，第133頁。

[[152]](#_152_1)同上書，第59、128頁。

[[153]](#_153)同上書，第135、139頁。

[[154]](#_154)《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4和61頁。

[[155]](#_15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99頁，注四；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278—279頁；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156—159頁。第二次進攻長沙不是由共產國際下令的。見哈里森論李立三文，《中國季刊》第14期，第187頁和《王明選集》第3卷，第75頁。

[[156]](#_156)《王明選集》第3卷，第56頁。

[[157]](#_157)同上書，第246—269頁。

[[158]](#_158)同上書，第50、74頁。

[[159]](#_159)《實話》第3期（1932年4月20日）。

[[160]](#_160)劉伯承文，《革命與戰爭》第1期（1932年8月1日）。

[[161]](#_161)周恩來文，《紅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選集》第3卷，第74頁。

[[162]](#_162)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45—348頁。學者一般認為毛澤東與有周恩來支持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進行了一場權力斗爭，而金一平（音）（《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卻提出“分工”理論，說毛澤東專門負責政府，秦邦憲專門負責黨的工作，周恩來專門負責軍隊工作，形成集體領導。金一平的基本假設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沒有實際權力基礎，只有理論言論，不敢向軍隊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挑戰。幾乎沒有文獻證據支持這種說法，金一平的論點看來是不能接受的。見勒維菲特著《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第86—97頁中的關于中共人員及其職分的分析。

[[163]](#_163)《剿匪戰史》承認這點不妥當，該書第1卷第93—94頁；唐生智和孫科也批評蔣介石的意圖，見孫科等：《討蔣言論集》，第41、133頁；又見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第42頁。

[[164]](#_164)《剿匪戰史》第1卷，第107—114頁。

[[165]](#_165)同上書，第28—44頁。

[[166]](#_166)《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2頁。

[[167]](#_167)《剿匪戰史》第1卷，第54—67頁。

[[168]](#_168)賀龍認為這個損失是夏曦的“山頭主義”造成的；見繆楚黃：《中國共產黨簡要歷史》，第90頁。

[[169]](#_169)《剿匪戰史》第2卷，第170和239頁；蔡廷鍇在《蔡廷鍇自傳》第1卷第375頁上說，人民一轉向共產主義，就團結而高興。

[[170]](#_170)關于第四方面軍的群眾工作，見《剿匪戰史》第3卷，第467頁和第4卷，第683—685頁。

[[171]](#_171)關于第四方面軍創建新蘇區，見《剿匪戰史》第4卷，第519頁和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207—211頁。

[[172]](#_172)這里采用的情況大多來自《剿匪戰史》第2卷和第3卷各處；以及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各處。

[[173]](#_173)劉培善文，《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資料》第1卷，第188頁。

[[174]](#_174)《紅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175]](#_175)國民黨政府出版的官方戰史（《剿匪戰史》）談到“逐漸收緊碉堡圈”（第2卷第266頁），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也支持這種說法。按照第五次圍剿的總戰略計劃，國民黨軍把由碉堡守護的道路修進蘇區。關于李德的戰術，見胡繼喜（音）文，《中國季刊》第43期，第34頁。斯諾關于這種戰術是林彪的貢獻的說法近由《紅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證實。又見李德（奧托·布魯恩）：《中國紀事，1932—1939年》，第68頁。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看到一本林彪關于這個問題的小冊子。

[[176]](#_176)《紅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177]](#_177)《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0頁。

[[178]](#_178)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258—259頁；繆楚黃：《中國共產黨簡要歷史》，第92—93頁；盛里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史話》，第16—18頁。

[[179]](#_179)蕭克談話，載于韋爾斯：《紅色塵土》，第139頁；王震談話，同上書，第101頁；繆楚黃：《中國共產黨簡要歷史》，第93頁。

[[180]](#_180)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9頁；劉伯承文，同上書，第4頁；繆楚黃：《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88頁。長征的經過在迪克·威爾遜著《長征，1935年：中國共產主義幸存的史詩》中有詳細的敘述。

[[181]](#_181)賀國光談話，載于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624頁。賀國光當時為蔣介石的行營主任。

[[182]](#_182)張國平：《白崇禧將軍傳》，第62—64頁；《春秋》第49期，第14頁。

[[183]](#_183)金帆：《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第45頁。

[[184]](#_184)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5頁。

[[185]](#_185)《明報月刊》第48期，第85頁。

[[186]](#_186)《剿匪戰史》第5卷，第883頁；薛岳：《剿匪紀實》第3冊，第13—14頁。

[[187]](#_187)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5頁；薛岳：《剿匪紀實》第3冊，第7—9頁。

[[188]](#_188)《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48、50頁；蕭華文，《紅旗飄飄》第13集，第87頁；安德烈·馬爾羅：《反回憶錄》，第533頁。

[[189]](#_189)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4頁。

[[190]](#_190)同上書，第6頁；《紅旗飄飄》第14集，第102—103頁。

[[191]](#_191)《明報月刊》第49期，第78頁；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9頁。

[[192]](#_192)Nan—t’ung，未詳何地。——譯者

[[193]](#_193)徐向前談話，載于韋爾斯：《紅色塵土》，第161頁。

[[194]](#_194)陳志讓：《遵義會議決議》，《中國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鍇指揮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戰而馳名的十九路軍，于1933年10月26日與共產黨簽訂協定（見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49頁）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稱為“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譯者）這次行動嚴重削弱了蔣介石在東北角的包圍。由于許多政治問題錯綜復雜，這個形勢并未導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軍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蔣介石擊破。

[[195]](#_195)迪特爾·海因齊格文，《中國季刊》第46期，第287頁。毛澤東的“三人軍事小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現在被中國各大博物館館長和中國人民大學胡華教授這樣的權威視為毛澤東在黨的軍事等級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見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第1卷，第363頁。

[[196]](#_196)《明報月刊》第51期，第79、82頁。

[[197]](#_197)柳寧：《一個工人的供狀》，第12頁。

[[198]](#_198)《明報月刊》第49期，第80頁。

[[199]](#_199)《明報月刊》第50期，第88頁。

[[200]](#_200)《明報月刊》第51期，第81—82頁。

[[201]](#_201)同上月刊，第79、82頁。

[[202]](#_202)《明報月刊》第52期，第83頁。

[[203]](#_203)即右路軍。下文西路軍即左路軍。——譯者

[[204]](#_204)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頁。

[[205]](#_205)《明報月刊》第52期，第96頁。

[[206]](#_206)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頁。

[[207]](#_207)《明報月刊》第54期，第88頁。

[[208]](#_208)《明報月刊》第48期，第85頁。

[[209]](#_209)《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頁。

[[210]](#_210)《剿匪戰史》第6卷，第997頁。

[[211]](#_211)《明報月刊》第53期，第91頁和第54期，第88頁。關于這個方案，根據未經證實的情況，林毓英提議把毛澤東的中央改為西北局，張國燾的中央改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當兩局之間的調解者，以達到重新統一。見《明報月刊》第53期，第89頁。

[[212]](#_212)《明報月刊》第50期，第86頁。

[[213]](#_213)《明報月刊》第54期，第88頁。

[[214]](#_214)關于紅軍在長征中的給養問題，只有片斷的資料。學者似乎有把握認為向地主和富農征糧是通常的來源（《星火燎原》第4集，第179—180頁），這是一種與秋收暴動后游擊隊征糧相似的形式。  
　　劉伯承與彝族酋長結為盟兄弟的著名故事（韋爾斯：《紅色塵土》，第71頁）不是典型的。紅軍在廣西龍坪鎮苗區逗留10天左右，軍營附近每晚起火（《紅旗飄飄》第11集，第32頁）。在草地，賀龍和羅炳輝沿途進行后衛作戰，受到藏人的騷擾（韋爾斯：《紅塵》第130頁）。有部落時，紅軍千方百計從它那里獲取糧食（《星火燎原》第4集，第128  
—130頁）。自然，紅軍宣傳國民黨施行惡政，幫助窮人和交不起租稅而被關進監獄的人來討好彝族和其他部族（《星火燎原》第4集，第118—121頁）。

[[215]](#_21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8頁。

[[216]](#_216)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杰伊·萊達：《電影：中國電影和電影觀眾記事》；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2卷，第137頁；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217]](#_217)《紅色文獻》，第386—392頁；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7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26頁。

[[218]](#_218)《王明選集》第3卷，第51—52頁。

[[219]](#_219)《明報月刊》第58期，第87頁。

[[220]](#_220)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擴大為黨務調查處，該處同時對外用特工總部名義。同年，中華復興社特務處成立。1935年，黨務調查處與復興社特務處合并組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原黨務調查處為該局一處，原復興社特務處為該局二處。1938年，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進行改組，該局一處改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通稱“中統”），該局二處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通稱“軍統”）。——譯者

[[221]](#_221)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28—261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  
潰》，第408—414頁。

[[222]](#_222)柳寧：《一個工人的供狀》，第66頁。

[[223]](#_223)董顯光：《蔣總統傳》第1卷，第208—209頁；易勞逸：《國民黨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藍衣社》，《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1—31頁。

[[224]](#_224)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28—238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08—414頁。這里的資料未經證實，只應極小心地采取。我已謹慎地不采用龔楚和李昂文章中提供的情況，因為我認為應盡量避開這兩個作者。

[[225]](#_225)劉少奇：《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共產黨人》第1期。胡佛研究所有這篇論文的手抄本。

[[226]](#_226)李昌：《回憶民先隊》，《一二·九回憶錄》，第16頁。

[[227]](#_227)同上書，第187—189頁。

[[228]](#_228)《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概況》，第6頁；《紅旗飄飄》第3集，第168—180頁。

[[229]](#_229)韋爾斯：《紅色塵土》，第75頁；美國陸軍部軍事情報處：《中國共產黨運動》，第2355頁。

[[230]](#_230)《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11頁；《中華年鑒，1936年》，第425—426頁。

[[231]](#_231)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第226頁。

[[232]](#_232)《紅星》1934年7月20日，第1頁。

[[233]](#_233)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63—269頁。在毛兒蓋會議上，甚至無人提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可能性；無人知道《八一宣言》的發表。張國燾文，《明報月刊》第50期，第85頁。

[[234]](#_234)關于第二次統一戰線各個方面的討論，見L.P.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

[[235]](#_235)《王明選集》第1卷，第9—10、11—13、25、53頁；范斯萊克：《敵與友》，第53—54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3頁以下。

[[236]](#_236)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頁。

[[237]](#_237)《毛澤東集》第5卷，第10、13—14頁。

[[238]](#_238)《瓦窯堡會議決議》，《毛澤東集》第5卷各處。

[[239]](#_239)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0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35—37頁。

[[240]](#_240)斯諾：《西行漫記》，第370—378頁。

[[241]](#_241)范斯萊克：《敵與友》，第60頁。

[[242]](#_242)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頁。

[[243]](#_243)同上書，第194頁；《紅色中華》1936年5月26日。

[[244]](#_244)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七十概述》，第72—73頁。

[[245]](#_245)董顯光：《蔣總統傳》第2卷，第225頁。

[[246]](#_246)董顯光：《蔣總統傳》第2卷，第245頁。

[[247]](#_247)查爾斯·麥克萊恩：《蘇聯政策與中國共產黨，1931—1946年》，第79—91頁；蔣廷黻教授應蔣介石之請于1934年末訪問莫斯科；見查爾斯·利利：《蔣廷黻：在兩個世界之間，1895—1935年》。

[[248]](#_248)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頁以下。

[[249]](#_249)重光葵：《日本及其命運》，第222—223頁。

[[250]](#_250)1936年12月14日《大公報》社論，收入張熾章：《季鸞文存》（1962年臺北版），第222—223頁。

[[251]](#_251)貝特蘭：《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又名《中國的第一幕》），第170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46頁。

[[252]](#_252)《王明選集》第1卷，第168—169頁。

[[253]](#_253)《明報月刊》第61期，第91頁。

[[254]](#_254)《王明選集》第1卷，第97—98頁。

[[255]](#_255)同上書，第81頁。

[[256]](#_256)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91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指示（1935年12月15日）》，《毛澤東集》第5卷，第13頁。

[[257]](#_257)《毛澤東集》第5卷，第63—65頁。

[[258]](#_258)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第8—9、12頁。

[[259]](#_259)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第12—15頁。

[[260]](#_260)《明報月刊》第60期，第88頁。

# 第五章 土地制度

前面幾章記述了到1931年為止的中國國際關系，以及直到1937年在南京掌權的國民黨政府和其對手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但是，正如本叢書前幾卷已闡明的那樣，中國的近代史很難只通過敘事來把握；太多的特殊情況（雖然往往鮮為人知）影響了事件的進程，如體制運行、經濟和社會條件、領導人及其追隨者的思想和抱負等。所以下面幾章將討論農業經濟、農民運動、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學傾向——這些是影響1937年到1949年的戲劇性事件的相關因素。我們從估價這一國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計入手。

到1912年舊制度結束，中國的農業供養著龐大的農業人口，他們辛勤勞動，必須用精耕細作的方法才得以靠為數不足的土地維持生計。由于缺乏綜合統計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說明，以勾畫出不為大多數歐美人士所熟悉的情景。

費迪南德·馮·列區荷芬于1869年1月旅行到南京時記錄了以下情景：

像蜜蜂一樣辛勤地耕作，是中國人特有的品質。我了解到一件極令人驚訝的事例……在一座礦井后面，礦工曾把大塊的煤矸石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階梯，直達石山頂部，并背來泥土和肥料……用這樣的方法，在那塊土地上開墾了小塊土地。這些地塊大小只有幾平方米。從下面往上看，只能見到鋸齒狀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從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構成復雜圖案的綠色田野。冬季，農民在上面種小麥，夏季種稻谷。[[1]](#_1_Fei_Di_Nan_De__Bao_Luo__Wei_L)

中國農民掌握了補充土地養分的秘訣，甚至一些地區一年兩熟，而另一些地區兩年三熟。用美國農學家金在1909年的話說，他們的復種技術使“最充分地利用生長期的每一分鐘，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員的時間來照料莊稼”成為可能。[[2]](#_2_F_H_Jin____Si_Qian_Nian_De_No)

但是種植技術和勤勞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溫飽。有些家庭——不知他們占農業人口的幾分之一——生活困難，甚至難以忍受。下面的報告記述了19世紀70年代江蘇、浙江兩省一些農民的困境：

昔日男耕女織，一個農業勞力可種地百畝（6.6公頃），八口之家無虞饑餓。一家有地五畝（0.3公頃），由一位婦女養蠶；七十老嫗不難自食其力。今日農家男耕女織，家庭人口一如往昔，擁有土地亦然，卻難令一家大小溫飽。昔者，鰥、寡、孤、獨之人因無家庭供養，誠難免不期而卒；而今日雖父母猶存，亦處于死亡邊緣，實無以為生也。今之情景比之昨日何如？[[3]](#_3_Li_Wen_Zhi_Bian____Zhong_Guo)

敘述者沒有說明糧食產量是否下降，稅收是否增加，或者商品的售價和勞務費用與收入的市價相比是否下降。農村的貧富狀況在地區之間，甚至在區域之間有很大不同，隨收成的好壞而波動。

然而放在一起看，外國觀察者，甚至本國專家關于清朝最后幾年農村情況的著作，既未表達產量下降的意見，也沒有一次表達糧食或布匹短缺的情況。日本的來訪者可能是農業的最為嚴厲的批評家，他們經常把中國的農業與他們自己國家的農業加以比較。1911年在華中和東南部旅行過的益子呈輔的下列評論堪稱典型：

在中國的各個產業部門中，農業生產占國家財富的50%，雇傭了大約70%的人口。此外，各種農業技術已長期發展。盡管在這些方面有廣泛的知識，但是在山岡之間有不少地塊未加開墾，大量的荒地未加種植。這些改進的可能性完全被忽略了。由于沒有結余，農民不能逃脫赤貧的水平。一遇壞年景，他們就陷于饑饉。[[4]](#_4_Yi_Zi_Cheng_Fu____Zhong_Guo_Z)

為什么農民沒有結余，逃脫不了靠天吃飯的不安定的命運，從未得到說明。這一困難是否起源于土地貧瘠、人口過多，或者農民是否無力縮小潛在產量與實際產量之間的距離，從對這一時期農業的描述看，也從不清楚。

但是有一點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有些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他們因喪失優先使農業現代化的機會而蒙受越來越多的損失。所謂農業現代化，就是采用有效的現代技術以增加土地和勞動的生產率。葛敬中在1921年為上海主要的報紙《申報》創刊50周年撰文，評價了半個世紀以來國家的糧食狀況，發現成績很差。

稻、麥和其他五種雜糧是我國農業的基本產品。但因為人口持續增長，沒有開拓耕地，農業技術未能改進，收成一直不夠豐裕。有荒地，人們卻不知道怎樣去開發。有河流，我們卻不知道怎樣去治理。多年來生產的糧食不敷國家之需。多年來，我們面對洪水和干旱而束手無策。讀者會注意到海關關于糧食進出口的統計資料，會看到出口量僅占進口量的三分之一。我只能說農業史上的近五十年，是令人極其失望的五十年。[[5]](#_5_Ge_Jing_Zhong____Wu_Shi_Nian)

農業現代化方面的失敗也不是絕對的。在鐵路和新的條約口岸城市中心出現之后，農業逐漸更加商品化。這一過程在北方比南方更快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當許多地區的農村市場體系受到來自外界的供需急劇變化的干擾時，農業狀況隨之改變。在人口稠密地區這種供求關系的變化，要求重新分配資源，以避免大規模的失業和農村收入的下降。由于國家和地方管理部門未能維護法律和秩序，或提供經濟資助，這種市場再調節付出很高的社會代價。但在描述這些農業危機狀況之前，概述和闡明這一時期的土地制度是必要的。

## 土地制度的狀況

到1887年中國大約有87%的土地歸私人所有。其余的屬于滿族朝廷、滿洲八旗、學校和軍事組織，不然就是村里的公地。[[6]](#_6_Li_Wen_Zhi_Bian____Zhong_Guo)在私有土地上，典型的農村家庭并不僅僅務農，它的成員有的修繕房屋和農具，紡線織布，用草緶編織裝飾品或日用品，販運貨物，或兜售小商品。20世紀30年代的農村調查表明，每10戶中可能只有6戶——常常更少一些——的收入有50%以上來自農業。根據這一定義——我將采用這個定義——例如，在泰安縣（山東）的老王莊，4戶中僅有3戶能被稱為農民。[[7]](#_7_Man_Tie_Bei_Zhi_Jing_Ji_Diao)同樣，在彰德（河南）[[8]](#_8_Yuan_Wen_P_eng__teYi_Yin_Wei)的宋莊，10戶中有6戶是農民。[[9]](#_9_Man_Tie_Bei_Zhi_Jing_Ji_Diao)在華南真正的農民甚至更少一些。哪一種土地制度起了作用而使農村農戶的這種變化成為可能呢？

### 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

我們從設想農村家庭或農戶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從事經濟活動開始。產品市場是農戶為取得現金而出售自己的貨物，或是用它們換別的貨物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場所。它們的位置散布于從大城市，通過小城鎮，直到沿方便道路的村莊或居民點。從農村上市的絕大部分貨物進入定期集市或正規市場，通常這類集市或市場為周圍20到30個村服務。[[10]](#_10_Shi_Jian_Ya____Nong_Ye_Zhong)也有例外，但是這種格局直到19世紀后期是普遍的，因為當時城鎮人口較少集中于少數大的中心城市，較多在于有定期集市的地方。[[11]](#_11_Ji_Er_Bo_Te__Luo_Zi_Man____Z)

大多數農戶居住在離集市半天路程的范圍之內，在陰歷規定的日子里，大批商人、珀客和小販輪流到這些集市上來。眾多的買主和賣主為價格爭執不休，這表明價格競爭是激烈的。一個外國觀察者評論說：“沒有別的國家依然完全如此依賴自由競爭和供求法則去進行價格調整。”[[12]](#_12_Ai_Bo_Te__Ma_Xie____Zhong_Gu)在有些市場上，有勢力的商業行會可能對交易起抑制作用，但是“為了避免不測和減少風險，大多數商人都把自己的買賣委托給掮客”，這些掮客在集市上不得不互相競爭。[[13]](#_13_Dong_Ya_Tong_Wen_Hui_Bian_Zu)

同樣重要的是，每一個縣有許多商人在競爭，以致沒有哪一個買主能壟斷市場。例如在浙江建德縣（位于桐江畔，在杭州以南100公里），1930年有大約190家大商號，他們全用掮客，并“對他們的生意保密，以致我們對他們的情況知之甚少”。[[14]](#_14_Diao_Cha_Zhe_Jiang_Jing_Ji_S)最后，考慮一下1913年至1914年漢口稻米的上市情況：

漢口的稻米交易與上海無異，是通過稻米經紀人的商號進行的。漢口的主要稻米市場在陳家嘴碼頭。有20家稻米經紀人商號，都與同一個稻米商會有聯系，它控制著漢口稻米交易的利潤。但是這些商號無一例在某個固定時間買進大宗稻米，或派出代理人去產地以便壟斷稻米供應，也無一例說明他們采用狡猾的手段與購進稻米的各種商店勾結。不妨說此等現象每年均不曾出現；就中國商人而言，這一特點十分顯著。[[15]](#_15_Dong_Ze_Zheng_Bian____Hua_Zh)

一般說來，這些競爭的產品市場似乎讓農村家庭得到公平的價格，因為買方和賣方都不掌握足夠的經濟實力長期固定價格。此外，這些競爭的市場還鼓勵每個家庭參與某種市場活動。

“生產要素市場”這一用語，是指農村農戶之間就勞力、土地和可貸出的資金，在經過協商達成契約的基礎上，進行交換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種種安排，其支付方式可以用現金，也可以用實物。擬租出或租入土地的家庭通過中間人找到顧主。擬雇用勞動力的農戶去城鎮市場的特定地區，在那里每天很早就有一些年輕人和老年人聚集著，等待受雇去干一天工作。需要貸款的家庭去店鋪找商人，或找親戚朋友商討貸款。需要現金的家庭，用土地來借錢。對于小筆貸款，幾個月內償還本息的，可抵押土地作為擔保。對于數額較大的貸款，一年左右無息償還的，可能實際上是把產權轉讓給了債權人。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可以使用這塊土地，也可以出租給借款人或別的家庭，以收取地租。貸款償還時，產權又轉歸原先的所有者。

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在一起，通過對某些家庭表示收入而對另一些家庭表示支出的交換行為，把村與城鎮聯系起來，把農戶與農戶聯系起來。當農民收獲并出賣部分糧食時，那些有倉儲設備又不急需現金的家庭，將糧食貯存起來以后再賣。首先賣糧的農民獲得現金來還債和購物。所以，在收獲季節，現金已正在流回城鎮，有些現金則在農村家庭之間周轉。在以后的幾個月中，農產品價格上漲刺激一些農民出售他們的存糧。另一些農民開始播種下一季莊稼，而缺少現金的農戶則要舉債。同時，隨著存糧的減少，現金繼續流向農村，而農村家庭之間的借貸也在繼續。

所有流向市場的現金，通過掮客和商人成為城鎮家庭和供應者的收入，因為售貨給農民的掮客和商人，用他們的部分收入貯存從城鎮生產者和進口商那里得到的貨物。使用農業原料的城鎮生產者，已經付錢給直接從農民那里購買農產品的掮客和商人；而這樣的開支，最終成為農民出賣他們的貨物時所收到的現金。就是這樣，產品市場把村與集鎮聯系起來，從而完成了現金流通的一個環節。

對于許多家庭來說，直到他們能收獲自己的莊稼以前，工資所得或借款是生存所不可少的收入。在交換關系中聯系農戶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合同，使農民有可能共享匱乏的資源，并在某種程度上把經濟活動的風險和不測降低到最低限度。在生產要素市場里，農戶之間的這些活動完成了流通的最后一個環節。

### 土地和勞力

全中國耕作的特點，是勞動有一定程序和節奏。在東北、北方和西北，農民在2月末和3月輕松地犁地和耙地。[[16]](#_16_Ma_Ruo_Meng____Zhong_Guo_De)從4月和5月開始，直到晚秋，他們播種、灌溉、除草和收獲莊稼。1926年的一份關于陜西中部涇陽縣云羅店鎮周圍24戶農家情況的研究報告說：“根據勞動力在一年中的分配情況來看，5月到9月是最繁忙的月份。”[[17]](#_17_Wu_Hua_Bao____Xia_Xi_Yong_Le)另一份1924年對山東省濰縣農民的研究報告的結論是，“農事開始于3月末，到12月1日結束”[[18]](#_18_W_Y_Shen____Zhong_Guo_Shan_D)。在中國中部、東南部和西南部，那里的氣候和土壤適合于一年種兩季，而不是像北方那樣兩年種三季。稻谷在4月栽種，在7月末和8月收獲。[[19]](#_19___Zhong_Guo_Jing_Ji_Za_Zhi)然后農民在秋末播種小麥、大麥和綠肥作物（蠶豆等），并在春末收獲。這就是1939年上海周圍富饒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普遍情況：

在上海附近農民種兩季莊稼，主要是棉花和稻谷。關于夏季作物，他們種植棉花、稻谷、大豆和蔬菜，時間是在4月末到夏末之間。關于冬季作物，他們種植小麥、大麥和蠶豆，從晚秋到初春之間。他們消費全部稻谷、大麥和大豆，而把小麥和蔬菜賣給中間商和其他買主。[[20]](#_20_Man_Tie_Shang_Hai_Shi_Wu_Suo)

在東南地區，農民從同一塊地里收獲兩季稻谷，春末播種第一季水稻，晚秋播種第二季。[[21]](#_21_Yuan_Wen_Ru_Ci_______Yi_Zhe)

生產每一種莊稼需要一定數量的家庭勞力。在濰縣，W.Y.申發現每畝地上每年耗費的男勞力工時，隨不同作物有很大變化：每畝黃豆28.2小時；小麥36.6小時；高粱72.5小時；谷子79.0小時；甘薯91.6小時；煙草241.1小時。[[22]](#_22_W_Y_Shen____Zhong_Guo_Shan_D)而且，所需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灌溉量。日本研究人員報告1940年在彰德縣[[23]](#_23_Jian_Qian_You_Guan_Zhang_De)宋莊觀察到的情況如下：

這個縣甚至農業也極端依賴人力。在灌溉條件好的農業地區，這種趨勢更為明顯。在宋莊種植主要作物所需的勞動投入是不同的，如有灌溉，所需勞力甚至更多一些……種植棉花，僅僅灌溉就要占總勞力投入的1/3；種植谷子，灌溉要占總勞力投入的1/4。[[24]](#_24_Nan_Man_Zhou_Tie_Dao_Zhu_Shi)

農戶耕種較多土地，超出一定農田規模時，他們對每單位土地的勞力投入下降，每單位土地的產值和產量也下降。在滿洲，日本人在1933年發現，230個村莊的10047戶農民中，當農田達到150畝后，單位土地所用的役畜數開始下降；而達到1000畝后，勞動量就減少。[[25]](#_25_Shi_Ye_Bu____Nong_Ye_Jing_Yi)卜凱也在報告中提出；當農田規模擴大時，人力等價勞動單位量就上升，但是在很多情況下，農田到達一定規模后，每公頃農作物的產量和勞力投入均有所下降。[[26]](#_26_Bu_Kai____Zhong_Guo_Tu_Di_De)1939年，一個日本人在江蘇松江縣四個村的調查也發現，在華中勞力投入與農田規模之間也有同樣的逆向關系：

我們觀察到農田不足4.9畝時，每畝要用50.4個工；農田在15畝到19.9畝之間時，每畝用31.5個工；農田超過20畝時，每畝用工不多于21.1個。所以，隨著農田規模擴大，單位土地的勞動量有下降的趨勢。規模最小的農田使用超出農戶需要量的勞力，并且雇工，即使它們的勞動能力比大農田為少。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27]](#_27_Man_Tie_Shang_Hai_Shi_Wu_Suo)

這個日本人沒有說明為什么這種逆向關系是顯著的，但這是表征前現代化農業，甚至現代化農業的一種關系，近年來已成為一項大力研究和理論探討的課題。

這種土地制度有明顯的局限性。農業生產的特點是連續不斷的活動，在土地與勞力之間要求保持一定的關系。如果這一關系出了偏差，例如在整地、灌溉或除草的過程中抽走了勞力，就一定會降低產出的水平。1869年馮·列區荷芬在浙江杭州附近旅行時，就注意到這一重要事實。

這片休耕（太平天國之亂以后）的地區，曾是一片沃土，供養過大量的人口；至今大部分還沒有耕種。原因似乎在于中國利用土地的方法取決于一定規模的有效人口；如果規模太小，甚至不能耕種一小塊土地。此外，中國人的有限勞力補充和落后的農具，似乎是勞動組織十分緊密，工作如此辛苦的主要原因。在這個國家，耕地的規模，似乎與一定數量的人所能提供的肥料的數量之間，有一個固定的關系。如果這些人中有一部分由于疾病或戰爭死去，所提供的肥料也就下降。于是潛在的耕地規模就要減少。因此如果有一半人口死亡，就有一半土地不能耕種。[[28]](#_28_Feng__Lie_Qu_He_Fen____Zhong)

然而，這就是家庭農田得以供養中國眾多人口的土地與勞力之間的關系。

### 村莊和農戶

農村家庭的組成，少的為4至6人，多的可達30人，居住在大小不等的村莊里。在氣候惡劣的東北，由于有大量肥沃的土地，自19世紀80年代以后，新的村落迅速出現。這些擁有20到50農戶的新村落，接納了來自北方各省的移民，并向他們提供了種植大豆和糧食的機會。往南在南滿和遼東半島丘陵起伏的鄉村和貧瘠的沙土地上，村莊就更多了，有些相距僅半英里。這些村莊也較大，有時多達100戶，是在一個世紀以前形成的。旅行者向南走去，穿過華北平原——這是一片廣袤而肥沃的地區，盡管有嚴寒酷暑，在夏季旱魔不時肆虐——看到的是大量的村落。在19世紀90年代，美國傳教士阿瑟·H.史密斯估計，這一地區典型的村莊有80戶。但是在河北一個方圓三英里的地方，他發現有“64個村莊，最小的有30戶，最大的超過1000戶而平均則是188戶”[[29]](#_29_Ming_En_Pu____Zhong_Guo_Nong)。幾十年后，中國學者研究平漢鐵路線上北平以南的定縣時發現，一個村莊平均有150戶，大約有7萬人居住在453個村里。[[30]](#_30_Gan_Bo____Ding_Xian__Yi_Ge_H)

在華中東部稻麥區，氣候較暖，雨量變化不大，土壤略帶酸性——這些條件對較高的作物產量有利。到1933—1934年，這里能看到成千上萬個村莊麇集在一塊塊的河灣處，或在一條溪河邊的高地上。村落的規模比淮河以北的要小。在江蘇4個縣，27個村平均每村31戶；在浙江4個縣，31個村平均每村39戶。[[31]](#_31_Xing_Zheng_Yuan_Nong_Cun_Fu)在最東南端的廣東省，地處熱帶，農民能種植水果，從事養魚業，除栽培水稻外，還有大量不同種類的作物；而水稻在許多地區可一年兩熟。在很偏僻的地區，如毗鄰今日香港的新界以南的島嶼上，有些村莊僅有20到40戶；大多數不及20戶。[[32]](#_32_Zhan_Mu_Si__W_Hai_Si____Jiu)在人口較為稠密的地區例如高要，20世紀30年代早期一次調查說，有許多村莊超過了200戶。然而，農戶數的變化幅度是很大的：對5000個村莊抽樣調查表明，有的社區只有22家，而最大的村社則有927戶。這個變化幅度與華北平原上的村社相當。[[33]](#_33_Gen_An_Mian_Zhi____Hua_Nan_N)在江西、湖南、四川和云南各省，村莊規模的差異和無規則大致類似。在華中和西南的一些新的居住區，村的規模與中國傳統農業區——珠江三角洲、福建的閩江流域、長江三角洲和華北平原——的中心地帶較為古老的、較大的村社相比，看來要小一些。在村社建立超過一個世紀的地方，盡管村的規模不盡相同，但大多數都很小，彼此相距僅一投石之遙。很多村社十分緊湊，各戶密集在一起；只是在四川的部分地區，農戶之間才有一定的距離。

### 農村的上層人物

每個村莊都有出身于富裕家庭的上層人物，他們擁有土地，在村莊事務中起著領導作用。有些村莊，實際上所有的土地可能屬于一個或兩個這樣的家庭。在河北密云縣的小營村，王家和周家擁有該村83%的土地。在山東曹縣的高魏莊，魏家擁有村里6000畝土地中的5700畝。陜西米脂縣楊家溝的馬家，擁有該村90%的土地。江蘇蕭縣的長安村由六個小村子組成，其中之一由一家控制了所有的土地。[[34]](#_34_Tian_Ye_Yuan_Zhi_Zhu____Zhon)

在其他的村莊里，大多數土地可能屬于地主的代理人（租棧），或者是屬于住在別村的一個富裕家庭，更典型的是住在市鎮上。1935年在安徽旅行的一位中國學者，報告了一個非在鄉地主的實例：

距縣城（阜陽）幾公里遠的一個村莊住的主要是佃戶，他們的稻田被細分為小塊。如果再往前走，就會發現自耕農的數量在增加。據這些佃戶說，離縣城最近的土地是屬于住在那里的商人的，他們每人擁有幾百畝土地。當我們進一步考察時，發現沿泉河有一條長墻。我們了解到墻周圍的土地屬于一個大地主，他擁有700畝土地，出租670畝，其余的自己經營。他還是一個酒商。遠離這條長墻是其他幾個村莊，筑有堤壩，屬于河肥西村的周家、劉家、唐家和張家。[[35]](#_35_A_Bu_Liang_Zhong____An_Hui_T)

從部分農民自營的農田到完全由佃戶經營的農田，與大多數擁有自己土地的農戶這種混合狀態，使簡單的分類成為不可能，因為地區性的變化太復雜了。[[36]](#_36_Yan_Jiu_Hua_Bei_Zhe_Zhong_Fu)國民政府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收集的農村統計資料表明，多達46%的農戶擁有自己的土地，以務農為生；另有24%的農戶是半自耕農和自耕農，他們靠其他收入來源彌補農業收入；其余30%是勞動—佃農家庭，他們靠工資收入彌補從租種的土地上獲得的農業收入。[[37]](#_37_Yan_Zhong_Ping_Deng____Zhong)

大地主構成了村莊和集鎮的地方上層勢力的骨干。然而，他們不是永久性的特權集團；他們的大家庭在村社中的地位很少能維持一兩代人以上，然后就被別的家庭所替代。即使在中國東南部單世系統治的村子里，某一姓的富戶最后也被同姓的其他家庭所代替。支持上層輪換的說法的實證不多，但也的確存在。譬如當37個滿洲村莊根據定居時間分等，而把每一等農戶按他們到達該村時的社會地位和土地占有狀況，與后來1934—1936年進行比較時，結果如下：對于最老的村莊，資料清楚地表明，到1934—1936年，地主的總百分率下降了，自耕農的百分率上升了，而佃戶的百分率也下降了。[[38]](#_38_Ma_Ruo_Meng____Qing_Dai_He_M)

居住在農村社區的家庭僅有少數幾戶曾積累起相當多的土地；其余的或向他們租地，或成為雇工在他們的土地上勞動。當然土地最終轉手了，新的家庭積累起土地，但是同樣的租地和勞動繼續著，只是由不同的農戶承擔而已。有些家庭怎樣能積累起土地，以后又失掉呢？

一個10到12人的大戶，能夠開墾和耕種40到60畝（接近3至4公頃）的大片土地。但是要擁有土地超過幾百畝（大約為15公頃），甚至更多，只有巨富之家才能做到。關于這類家庭的幾個實例表明，最初大多是通過貿易、放債或者做官而致富的。他們于是購進土地，開發新地，或者從那些典當或抵押土地以獲貸款的家庭得到土地。由兩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搜集并分析的研究報告表明，19世紀在山東的135戶原地主中，有近60%以前曾經是官員或城鎮商人。[[39]](#_39_Jing_Su_He_Luo_Lun____Qing_D)這些地主家庭住在臨近大運河的主要商業中心，在城市里積累起財富，而后購買鄉村的土地。他們把一些土地出租給同村的農家；其余的他們用從周圍農戶雇來的勞工隊耕種。這一事例大概也代表了同一時期其他省份的情況。

富裕的城鎮家庭也購買成片的土地，雇用勞力去開發，然后招徠一些家庭定居，并作為佃戶去耕種。在陜北米脂縣，距縣城東南8公里，距綏德縣以南16公里處，有271個農戶的6個小村子坐落在楊家溝渠旁，渠水引自無定河。其中51戶出租土地，并且都屬于馬氏家族。他們一起住在一座山旁的圍墻后面。[[40]](#_40_He_Di_Zhong_Zao____Zhong_Guo)馬家的發跡人馬家駱，最初于19世紀20年代末在綏德縣城經營一爿商店。他積蓄了錢，于1833年在米脂縣城開了自己的商店。他的四個兒子協助他，而第五個兒子當了官，并向家中匯錢。馬家駱就用這些積蓄放貸買地，并在糧食市場上做投機生意。最后他投資一大筆錢買下楊家溝附近的土地，雇來工人加以清理，又招徠一些家庭定居，并作為佃戶耕種土地。以后馬氏家族出售了他們的商店，遷到楊家溝居住。在以后的70年里，馬氏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兒孫放債、收租，并在糧食市場上投機。從第四代地主馬衛新的賬本可以看出，馬家收的谷租和索回的貸款，每年遠遠超出他們家庭所消費的糧食。他們把多余的糧食貯存起來，當市場糧價上漲到最高時出售。1910年以后，這個家族擁有的土地規模不變，直到20世紀30年代后期，那時許多家庭因害怕被征用，開始出售他們的土地。

另有一些例子講到富有的個人聯合起來開發土地。在湖南洞庭湖以南的一個城市湘陰縣，附近有10個人在1917年組成了一個公司，雇用了8000名工人筑堤，并招徠一些農戶來租種土地。[[41]](#_41___Xin_Hu_Nan_Bao_______Hu_Na)一種更為普通的辦法，是城里人通過放貸獲得土地然后出租，從而樂得一直充當非在鄉地主。農民們被介紹給有錢的人家，以抵押或典當田地借錢。如果不能償還，他們的土地就成了債主的財產。從日本研究人員所作的下列報道可以判斷，袁世凱曾在1909—1911年用這種大規模放貸的形式，成為河南最大的地主之一。

袁世凱在失掉權勢后退隱河南，在此期間，他獲得了他的土地。他用來獲取大片耕地的辦法，不是從不同賣主那里以公平的價格購買，而是接受把土地作為擔保貸款的附屬品（入佃）。他的土地占彰德縣的1/10，多數是用這種方法聚集的。大家也知道他的親屬和代理人也用同樣的方法獲得土地。抵押給袁（出佃）土地，也就是遇到困難而需要錢的農民收到了現金，也收到了一份簽好字的契約。把土地抵押給袁的期限為三年，后來延長為八年。在這八年期間，許多地區遭受水旱災害，結果幾乎沒有農民能夠償還貸款和贖回抵押出去的土地。如果袁世凱的親戚和代理人接受抵押，袁氏本人，這個地主兼軍閥，就用現金貸款和契約作為誘餌。他爾后允許貸款延期，直到雙方同意的土地抵押期限屆滿為止，這時借貸人一般都無力償還。他通過取得這些抵押的土地，積聚了大片耕地。[[42]](#_42_Man_Tie_Bei_Zhi_Jing_Ji_Diao)

富裕家庭，特別是在家族之內，為了保持他們土地的完整和收到可靠的地租，通常組成一個聯合會，并把他們的一些土地交由聯合會安排出租。聯合會則用歲入興建村學、廟宇或其他公共設施。有時這些地主型的聯合會在一個地方掌握的土地，比任何單個的地主還要多，正如這份1933—1934年的報告所證實的那樣：

在廣東，地主個人的勢力遠沒有地主協會的勢力大。除去許多縣政府和大量慈善機構擁有的公共財產外，廣東省耕地中非常大的一部分為地主協會占有。這些協會的土地包括學校（學田）、廟宇（廟田）、各種私人聯合會（會田）和宗族（大公田）[[43]](#_43_Da_Gong_Tian__ta__kung_tien)的土地。[[44]](#_44_Chen_Han_Sheng____Guang_Dong)

在另一些地區，通過放貸或其他活動獲得相當多土地的城鎮家庭，把他們的土地委托給代理人去管理。這些代理人又把土地租給各村的農家收租，向國家交稅，把部分田租收入交給城鎮地主，留下他們服務所得的報酬。[[45]](#_45_Cun_Song_You_Ci____Jin_Dai_J)

### 分割繼承

在如此眾多的農村社區里，有權勢的地主階級，也就是統治的人物，很少能完整地保持其土地超過一兩代人，除非把土地轉讓給家族協會。這是因為有分割繼承的習慣，即把土地和家庭財產分給兒子，盡管也為年邁的父母提供一些養老的保證。這一習慣實行于所有的家庭，不論大小及貧富，也不論在北方還是在南方。[[46]](#_46_Man_Tie_Shang_Hai_Shi_Wu_Suo)這種習慣使有巨大財富的不斷繁衍的大家族最終讓位，產生出接替的新家族，雖是同姓，但親屬紐帶較弱。一位日本學者分析了華北農村有關分割繼承的資料后說：

中國人的家，在經濟、社會甚至精神上，基礎都是很脆弱的——這樣的基礎似乎在逐漸瓦解。它的根本原因，看來在于家庭不和的事例很多，以及生活條件惡化，正是這些原因通常引起分家。然而……家庭不和和生活條件惡化，實際上被用來作為分家的機會……平分家產的動機十分強烈，足以引起和制造兄弟、妯妯之間的爭執，而后導致分家。[[47]](#_47_Nei_Tian_Zhi_Xiong____Zhong)

如果農民和地主都堅信平分財產的原則，加上強調敬祖和孝順的其他準則，那么會出現什么情況呢？顯然，如引文所表明的那樣，受到支持的權利，或認為分割家庭財產是正當的規范，必然為許多家庭成員提供制造家庭分裂的理由。這必然引起分家。但是即使分割繼承為家庭內部紛爭提供理由，那么多紛爭為什么會開始呢？雖然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學術上應有的注意，但基于最近對臺灣農村婦女的研究，已有幾種可能的解釋，其中之一指出紛爭的有力根源。瑪杰里·沃爾夫證實，臺灣的女子當進入夫家時，就為建立她們自己的母系家庭感情需要所驅使。實質上這個母系家庭將是“她自己的孩子和孫子”。年輕的新娘一旦感到她與所愛的、最依戀的人被分開后，必須為在一個新的家庭中生存下去而斗爭；這個家庭經常是由婆母支配甚至控制的。沃爾夫進一步斷言，“在很多情況下，到她這位年輕的新娘添加孫輩時，這個母系家庭和這一戶人家將幾乎完全重合起來，接著將有另一個兒媳與孤獨作斗爭，并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母系家庭”。[[48]](#_48_Ma_Jie_Li__Wo_Er_Fu____Tai_W)

當年輕的新娘在一個由婆母支配的家庭里為建立自己的地位而斗爭時，她唯一的有效斗爭手段就是依靠丈夫以建立她自己緊密結合的家庭。在有兩個或更多兄弟的家庭里，他們的妻子在這個大的父系家庭里，建立她們各自母系家庭的努力必將導致兄弟之間的紛爭。最終，總有一個或幾個兄弟要堅持分土地和財產。

無論分家的理由是什么，這一普遍長期沿用的習俗，使得大塊的甚至小塊的土地占有分解。有些事例足以表明，為什么向下的社會流動總是出現，并且最終削弱了富人。1930年，滿洲綏化縣一戶富有的農家，把1000多 坰（667公頃）的地產分給11個兒子。[[49]](#_49_Yan_Zuo_She_Yi____Bei_Man_No)七年以后，這11個家庭已經售出土地45 坰。這就意味著從父母轉到兒子手中的土地減少了5%。在河北的徐水縣，一個有地210畝（15公頃）的地主，1882年把地分給三個兒子，兒子們又將財產分給他們的后代。[[50]](#_50_Xiong_Dai_Xing_Xiong____Hua)到1940年，他們中間共有15個新家庭，種地324畝（大約21公頃），而在60年前，一戶曾種地210畝（15公頃）。

### 家及其收入

在擁有土地的上層人物之下，是規模不同和貧富不同的其他家庭，他們的成員也生活在一起，分享一切。[[51]](#_51_Mu_Ye_Xun____Zhong_Guo_Jia_Z)家庭或者說“家”，是中國農村任何地方的最小、最緊密的社會單位。就此而言，在中國城鎮也是如此。費孝通曾生動地描繪：

在農村基本的社會組織是家，一個擴大的家庭。這個組織的成員擁有一份共有的財產，共有的預算，通過分工合作謀生。也就是在這個組織里，孩子們出生、長大，物質享受、知識、社會地位都繼承下來。[[52]](#_52_Fei_Xiao_Tong____Zhong_Guo_N)

家猶如一個合作單位而起作用。它的成員完成分配給他的任務，把收入交給家長，平等分享處置報酬之權。主要的決定都在家長和別的成員討論之后作出。下面是對河北沙清村農民的訪問記錄，描繪出這樣的家庭的功能。

“家庭的主要活動是什么？”

“種地。”

“家長、家長的妻子、長子、次子在勞動分工上是不是不同？”

“不是，他們共同勞動。”

“家長的責任是什么？”

“他管理家庭成員的勞動。男人種地，女人做家務，繡花。”

“是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員都進行田間勞動？”

“不，絕大部分僅由男子來干，但是如果人手不夠，女人也來幫忙。”

“這時家長也參加勞動嗎？”

“他像家里其他人一樣勞動。”

“日常的勞動計劃是怎樣決定的？”

“家長把所有人找到一起，在吃早飯時討論。”[[53]](#_53_Zhong_Guo_Nong_Cun_Guan_Xing)

每個家都由尊崇祖先和祭祀儀式維系的無窮鏈條和在它之前的另一個家聯系。[[54]](#_54_Xu_Lang_Guang____Zai_Zu_Zong)雖然當一個家系終止時，這鏈條有時也會中斷，但父母仍教育子女崇敬這個家的某些祖先，并教導他們勤勉節約，尊重老人，履行先人未竟之責。他們也鼓勵孩子們繼承祖先之遺緒，努力“擴大財富，光耀門楣，看風水尋墓地，修建更大的宗祠，講究禮儀的排場，以及采取許多其他措施，期以增加生者和死者的福祉與聲譽”[[55]](#_55_Xu_Lang_Guang____Zai_Zu_Zong)。當家長把財產傳給他們的兒輩時，兒輩們要用適當的儀式表示對家長和祖宗的尊敬。積累財富，特別是不動產，能夠確保舉行這種儀式。它還能夠保證在兒輩把財產傳給他們的孩子們以后，他們也能受到他們的孩子們的尊重。

于是從許多方面來說，這個合作單位——家，有著強烈的動機要積累財富。毫不奇怪，一切務農的家庭都力圖培養善于理家，艱苦勞動及節儉、勤奮等美德。每個家和家長都渴望發財致富和人丁興旺，盡管事實上只有很少的農戶能實現這個目標。所有農民都持有的這些價值觀念，是農村社會賴以建立的基礎。仁井田陞不無調侃地著重談到，不論大小和貧富的農村家庭莫不如此：

總而言之，從遠古中國就存在產生小家庭的條件……近年來，到中國，特別是到小家庭占優勢的地區旅行過的人，看到中國農村大多數的家庭是小家庭，而人們曾設想存在的大家庭很少。有一段時間，人們曾企圖說明中國大家庭制的衰落。但是這樣的理論忽略了小家庭的繼續存在，而且也未注意到小家庭和大家庭本質上都有同樣的特征。這樣，如果我們說，今天小家庭是很久以前的家庭制度衰落的結果，那么，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的家庭制度，兩千多年以來一直在衰落。[[56]](#_56_Ren_Jing_Tian_Sheng____Zhong)

為了使這種合作單位獲得收入，家多方面地運用它的資源，而務農僅僅是諸多可能之一。

家獲得收入的來源，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組合。統一體的一端是地位低下的打散工，這種工作臟而且煩，要離家，甚至要離村。其次是當小販、伙計和掮客，做這些事要有一點技術，地位高一些，也比較干凈。他們的收入往往并不比一個出賣勞動力的人為多，但是較高的社會地位還是有吸引力的。統一體的中間是務農，不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還是租種別人的土地。統一體的另一端是經營土地、放債、開店、做官，或是當軍官。每個家長在分配家庭的人力資源時，必須從這些不同的收入來源中作出選擇。雖然某些工作收益比別的工作多，但每項工作的社會代價——工作的遠近、地位、清潔狀況、艱苦程度和風險——也必須仔細考慮。

到20世紀第二個25年，農民家庭為他們的孩子選擇職業時，似乎已有了很清楚的順序。最高是當官，甚至從軍；其次是從事企業；而后是務農；接下來是當勞工，從按月計算或逐日計算干農活到做家庭仆役。費孝通在報告中提到，家長通常試圖至少培養一個兒子成為官員或軍官。[[57]](#_57_Fei_Xiao_Tong____Zhong_Guo_S)林耀華研究了福建省的兩個家庭，記述了黃東林要與他的姻兄弟合作開店，而不是在田里幫工。商店終于興旺起來，他得以為他的家庭建一幢新屋。[[58]](#_58_Lin_Yao_Hua____Jin_Yi__Zhong)一些家庭積累了相當多的土地后，開始出租部分土地、放貸和從事商業活動。[[59]](#_59_Fei_Xiao_Tong_He_Zhang_Zhi_Y)如果我們根據農村家庭的財產來劃分它們的等級，我們發現在較窮、較小家庭的收入中，從低下的、風險大而報酬少的收入來源——它們全然與務農無關，或彌補他們很低的農業收入——之所得，總是占有很高的比例。[[60]](#_60_Ma_Ruo_Meng____Zhong_Guo_De)擁有的土地多于維持家庭生活的家庭，把他們的資源較多地用于農業，而很富有的家庭通常從事商業活動，不是去耕種自己的土地。[[61]](#_61_Zhang_You_Yi_Bian____Zhong_G)

只是當個別的家庭能從其他家庭得到某種不足的資源時，它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分配其資源。這就需要家庭之間的安排——通常是在親戚關系的基礎上。我們已經看到怎樣通過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協議——有關出租或佃入土地，借貸農業資本，借出和貸入現金，以及雇用或提供不同期限的勞力等等的書面合同或口頭同意——達成的安排。在臺灣的家庭之間的契約，經初步考察，與晚清和民國初年大陸家庭間的抵押和典當土地以及出租和佃入土地的契約，看來十分相似。[[62]](#_62_Chen_Zhang_Fu_Mei_He_Ma_Ruo)家庭總是在廢除舊的契約，又和不同的家庭訂立新的契約。總之，農村家庭間的私人契約安排，是為獲得不足資源所優先采用的辦法。

### 家的合作形式

農村家庭在村里謀生并不單靠契約，他們還互相合作。這類合作名稱各不相同，在某些村社很普遍，但在另一些村社則否。合作采取兩種不同的形式。[[63]](#_63_Ma_Ruo_Meng____Chuan_Tong_No)第一種只包括少數農戶，他們在季節性需要最緊迫時，短期共用他們的土地、勞力或農田資本。這種形式的合作出現在朋友和親戚之間，時間短，通過相互同意而終止；在鄉間每個地方都有這種形式存在。第二種形式包括一個村子——有時是幾個村子——的許多農戶，他們組織起來，并承擔某項事業的費用。例如看守莊稼——這在中國北方很普遍——或者組織村防團。后者對所有的村來說，在法律和秩序崩潰時，是共同的活動。還有合作加工農作物，例如甘蔗，特別是在廣東和臺灣南部。但是，需要大規模合作的最重要的活動可能是抗旱治水，包括防洪蓄水和灌溉。

農村治水的組織有兩種類型。有些并入規模巨大的系統，由負責維護大河堤壩的公職官員管理。第二種類型由一個或幾個村級組織構成，只為自己村社的農戶服務。這兩種類型的組織有某些共同特征。參加者都是有土地的農戶；他們分配費用和利益的原則，是根據每個農戶擁有的土地量（土地少的家庭貢獻少一些，收益也少一些）；他們由一個包括有經驗的農民治水人員體系管理，輪流履行自己的職責。[[64]](#_64_Ma_Ruo_Meng____Jin_Dai_Zhong)森田明在對清代治水情況的權威性研究中，總結了六個以上省份的治水經驗，這些經驗也沿用到民國時期。

在河北邢臺縣，為了利用河流，在這個地區建立了兩個治水組織。這兩個組織以水閘作為治水的標準單位。每座水閘的職員都是擁有土地的農戶；他們被稱為連戶。因為這些農戶支付了修理水閘和供水渠道的費用，交稅，還提供了無償勞動，所以他們參加治水的管理，他們也得到用水的利益。即使在綏遠和山西也有由水澆地主人組成的治水組織，這些農戶和上面提到的農戶一樣，也是土地的所有者。這些有土地的農戶提供建設和維修治水設施所需要的勞務。他們灌溉土地的用水量，按各戶擁有土地的多少來分配（按地畝澆水）。管理這些治水組織的基本原則——諸如職員是擁有土地的農戶，他們根據擁有土地的量分擔費用和分享利益——與華中、華南的治水組織并無二致。[[65]](#_65_Sen_Tian_Ming____Qing_Dai_Sh)

當然，在農民能被引導到把他們的資源用于這類事業之前，他們必須了解利益會超過費用。局外人對農村合作的潛在利益所做的估價可能與居民十分不同，后者習慣地忽視某些費用。但是不管怎么說，合作在農村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它使農戶得以共享不足的資源。在這方面，它所起的作用與家庭間的私人契約是一樣的，即它能使他們用其資源得到比其他辦法更高的收入。

## 農業的商業化

到20世紀初，鐵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擴大了。這些發展對農民來說，意味著新的機會。但是在20年代早期，正當農業資源的新供應（美國棉花種子及化肥等）出現，農民的觀念開始變化時，農業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機。結果，這些新的投入在內地依然很少，并且難以看見，沒有真正影響到大多數農村。

然而，在這個短暫時期里，貿易的增長和作物的專業化造成了上市剩余農產品的增長。二者是運輸的急劇改進促成的。在1894年至1911年間，鐵路路線增加了26倍。與此相對照，1911年至1927年間僅增加35%。[[66]](#_66_Yan_Zhong_Ping_Deng_Bian)鐵路加速了遠距離交貨，侵害了水路和陸路運輸，在某些地點的許多定期集市消失了。[[67]](#_67_Shi_Jian_Ya____Nong_Ye_Zhong)鐵路不僅使經傳統運輸到口岸城市的貿易路線改道，而且還把新的貨物帶進內地，并為海運收集農產品。

對上市剩余農產品的新的需要，首先來自對外貿易。農產品的出口在1890年到1910年間，比別的時期增長更快。在1876年到1890年間，糧食和經濟作物出口總值僅分別增長26%和38%。[[68]](#_68_Huang_Yan_Pei_He_Pang_Song_B)但在1890—1905年期間，相應的數字為300%和600%。到1911—1915年，糧食作物出口年增長率為12%，而經濟作物出口年增長率為11%。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30年間，所有出口總值的增長率每年僅為4.8% 。[[69]](#_69_Zheng_Yu_Gui__Yin_____Zhong)

新的需求，其次來自大、中城市的擴大。在世紀之交，多數大城市的人口仍不足25萬。在1900—1938年間，住在超過10萬人的城市里的城鎮人口年增長率約2%，而中、小城市增長率更快一些。[[70]](#_70_Po_Jin_Si____1368__1968Nian)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除了作為省會的一些城市以外，在1895年至20世紀第二個10年末期，中心城市在其開始擴張階段，增長速度超過了任何別的時期。在這最初階段，城里新來的人主要是農民，特別是18歲至45歲的男性，他們是來找工作的。[[71]](#_71_Lin_Song_He____Tong_Ji_Shu_Z)由于這些家庭的食品消費模式仍與他們住在農村時相似，在此期間城鎮對糧食的需求一直很大。[[72]](#_72_Guan_Yu_Zai_Zhan_Hou_Fei_Lu)

### 增強的資源專業化

如果說由鐵路和外貿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農民通過出售農產品而獲利，那么，在供應方面有了哪些發展使得上市的剩余農產品得以增加呢？答案在于農民資源的專業化提高了，相關的勞動報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設的例子可用來闡明這樣的發展。設想一種主要是農業而沒有外貿的經濟，其中城鎮與農村人口的增長率相同，而糧食和經濟作物以一定的組合由農村銷往城市。這種經濟很像鐵路革命之前的中國。再設想運輸改進了，外貿發展了。這些新的市場需求使某些農作物價格上漲。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種，而開墾貧瘠的土地費用又過高，農村已不能增加它們的耕種面積。因此，農民開始專門生產某種能帶來較高收入的農作物，而運輸和銷售的改進，又使他們能以買得起的價格得到某些他們需要的貨物。有些地區專門生產糧食，另一些地方專門生產經濟作物。在這種專業化增強的情況下，農民勞動獲得的產品數量增加了。這種經濟出口初級的或經過加工的經濟作物。因為新的就業機會吸引了農民到城市來，城市人口開始比農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鎮對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當鄉村不能供應足夠的糧食時，可以從國外進口少量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農戶增加了他們農田的總產量，同時也增加了上市的余糧的比例。甚至在生產糧食的勞力得到恒定報酬的假定下，這樣的發展依然是可能的。[[73]](#_73_R_T_Xiang_De____Zai_Yuan_Shi)

在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第二個10年的末期之間，中國的狀況就是這樣。但是在1920年以后，這個過程不斷地受到破壞。19世紀70年代后，作物專業化的證據是什么？大豆的種植很快越過滿洲中部；膠濟鐵路沿線農民種植了更多的煙草；在山東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蘇和安徽，農民們種植花生。[[74]](#_74_Tian_Ye_Yuan_Zhi_Zhu____Zhon)在1900年至1937年間，油菜的種植面積大約擴大了五倍，特別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產了更多的桐油，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河北、山東和江西生產了更多的芝麻。[[75]](#_75_Man_Tie_Shang_Hai_Shi_Wu_Suo)棉花的種植也遍及華北，特別是在山東、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場需求，使許多地區的農民轉種新的作物有利可圖。弗里德里希·奧特觀察到20世紀第二個10年里農村的這些發展：

中國農民如果不受干擾，并且確信自己勞動的果實將屬于他自己，就能相當快地注意到他們自己的利益。即使華北農民消極，也決非由于感覺遲鈍。要了解這一點，人們只需提出下列事實：在膠濟鐵路線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種植，或者沿滿洲鐵路全線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麥的種植；還可以提出上海周圍農業種植的變化：他們種植小麥和棉花替代水稻。[[76]](#_76_Fu_Li_De_Li_Xi__Ao_Te____Zho)

然而有些地區農民似乎對新的市場信息沒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沒有什么變化。一個日本人調查了沈陽郊外的三個村莊，雖是在1939年進行的，但涉及的時間超過25年。他發現甚至在已大規模發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子忽視了新的商業影響。

我們考查了土地占有關系，以及伴隨的非農業勞動和農田作業的狀況，把民國初期與1939年——這時農村處于城鎮迅速擴大的沖擊之下——之間農村的變化作了比較。與民國初期相比，近年（在沈陽周圍）運輸、商業和工業已有相當大的發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農業并沒有發生什么變化：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所運用的同樣耕作技術繼續沿用到現在。我們調查的蘇家屯鎮附近的村，離沈陽很近，農民們本可以把農田經營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這里的黏土非常不適合種植蔬菜。目前這些農民自已還要購買蔬菜。如果農民反過來為蘇家屯和沈陽供應蔬菜，我們知道他們就能夠極大地增加他們的農田收入。但是，他們既不努力改進土壤的質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農作物的產量。

幸運的是，離村僅僅幾公里有一條河，農閑時節河里的船運沙。農民們不是可以用這種辦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們的黏土地上，從而改良他們的土地嗎？但是農民們說他們不能這樣做。“錢從哪里來？我們的勞力不夠。”

情況就是這樣，沒有人有任何改進村社的計劃。單從這個實例來看，難道就沒有機會逐步改進耕作方法了嗎？相反，農民繼續依靠傳統的耕作方法，并不積極進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是沒有進步的希望的。[[77]](#_77_Nan_Man_Zhou_Tie_Dao_Zhu_Shi)

許多農民，像沈陽城外的村民一樣，對新的市場擴大毫無反應，因為他們對生產更多供出售的剩余農產品費用和利益的認識——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們的資源——與局外人（像這些日本研究人員）完全不同。有些農民像沈陽周圍的農民那樣，寧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種蔬菜。在城市，他們的報酬可能會高一些，在那里他們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會機會。一般地說，農民的認識不一，意味著某些地區能從市場對糧食和特種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區則否。更有一些地區趨于衰落，因為新城鎮的成長和鐵路的發展全都繞過了它們，或者破壞了它們傳統的市場銷路。

新的市場發展，也影響到農村的手工業生產、就業和收入。例如，從日本、印度和英國進口機紡細紗，只是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增加，此后下降了。[[78]](#_78_Ma_Ruo_Meng____Mian_Fang_Zhi)情況是進口棉紗便宜，比農家紡的本國棉紗拉力大。村民織布（土布），開始用更多外國棉紗替代國產棉紗，特別是用作緯線。[[79]](#_79_Bu_Lu_Si__L_Lei_Nuo_Zi____We)許多商人開始向農村和集鎮上的農民織工提供外國棉紗和現金，以交換他們的布。這一新的農村投資體系，第一次出現在濰縣（山東）、高陽（河北）、郁林（廣西）、興寧（廣東）和常州（江蘇）等縣。19世紀70年代之后，發生了一次復雜的農村資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區家庭紡紗衰退了，而在另一些地區家庭織布卻有所增加。[[80]](#_80_Ma_Ruo_Meng____Mian_Fang_Zhi)茶葉、絲綢和陶瓷產地的經歷也有相似的過程，因為擴大的貿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業生產逐漸改造。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第二個10年期間，這些變化對各種類型的農村手工業的凈效應是極端復雜的。總的印象是，并且也僅僅是，擴展大于收縮，但是這一課題仍需更多的研究。

### 新出現的農村經濟

盡管各村之間供應市場的剩余農產品在數量上差別很大，但是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農村調查表明，平均說來，家庭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比例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滿的一次調查（1922—1924年）發現，農民出售他們48%的農產品。[[81]](#_81_Man_Tie_Tai_Ping_Yang_Wen_Ti)同樣，卜凱在1921年至1925年間搜集華北和華東的農田資料，也發現大約50%的家庭收入來自市場銷售，不論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部分擁有，抑或全部擁有耕地。[[82]](#_82_Bu_Kai____Zhong_Guo_Nong_Jia)

但是，把這些家庭加以分類，并按耕地規模和財力對它們加以比較時，可以明顯看出大農戶賺的錢是小農戶的二至五倍，同時他們從市場銷售賺得的錢也高得多。事實上，一些對豐潤縣（河北）典型的華北農村的調查表明，富有農民的總收入中，非農業收入來源所占的份額是很小的。[[83]](#_83_Man_Tie_Bei_Zhi_Jing_Ji_Diao)扣除包括消費支出、賦稅、折舊和意外費用在內的全部農本后，最富有農戶的剩余部分要遠遠超過其他的農戶。雖然這些農戶提供該村上市剩余農產品的最大部分，但是與擁有部分耕地的農戶和佃農相比，他們對每單位谷物產量的投入也少一些。由一小群富有農戶提供全村上市余糧多達一半或更多，這種模式絕非罕見。[[84]](#_84_Ma_Ruo_Meng____Jin_Dai_Zhong)

另有幾個其他市場特性與農戶的規模有關。農戶調查資料表明，小農戶為上市農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勞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時，這樣的專業化——專門生產經濟作物或特種糧食——要求農戶投入更多的勞動。[[85]](#_85_Tong_Shang_Shu__Di_184__185Y)另一方面，大農戶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勞力比例比小農戶要小一些。看來，這一時期農戶的數量成倍增加，農戶的平均規模繼續下降。同時，更多的小農戶利用農地價格的上漲，開始從事專業化生產。勞動報酬的提高使小農戶能從市場購買糧食，因為他們生產規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產糧食。由于專業化生產和交換的增加，無論大、小農戶，單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勞力都比過去多。但是，這樣的發展使小農戶僅能支持下去，不妨說，僅免于遭沒頂之災。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債務或市場交換價格不利，他們的生活立即就變得悲慘而無保障了。

總之，從19世紀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在興建鐵路之后，農業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數村民能夠供養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城鎮逐步發展。這種土地制度針對新的市場壓力，作了許多調整，沒有造成農村的嚴重失業，沒有從國外進口大量糧食，也沒有產生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是這是一種脆弱、復雜和相互嚴重依賴的農村經濟，一旦面臨外界的嚴重打擊，就會迅速波及整個農業，從而成為生產和交換嚴重脫節的犧牲品。

## 農業危機

在1920年以前，觀察農村情況的人，幾乎沒有誰對農業即將發生的災難發出過警報。不論是查閱中國知識界的非官方的印象，還是查閱海關特派員——他們每年都熱心地記錄下他們供職的周圍地區的情況——的官方報告，農業情況都在逐步向前發展，只是有時因歉收而減慢下來。就是在地方這一級上——偶有農村長期情況的僅有記錄——也看不到農業生產或收入持續地有過較大下降。江蘇省以租佃關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戶與地主間暴力沖突頻繁而聞名，該省為財務管理做的土地記錄表明，只是在1920年以后才發生收租和交納土地稅的大幅度波動，而在1890年到1920年期間一直是相對穩定的。[[86]](#_86_Cun_Song_You_Ci____Jin_Dai_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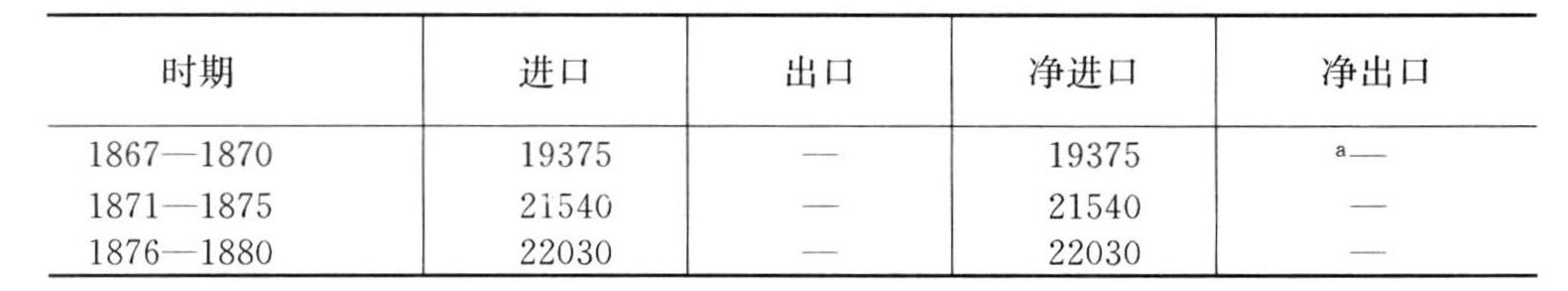
可是在1920年以后，文字記錄普遍顯示，實際的困難困擾著農業。海關官員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壞，運輸和市場銷售混亂，以及遍及全國廣泛失控的水旱災害。W.R.邁爾斯1931年從山東膠州報道：“回顧這10年（20世紀20年代），山東省經歷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災難；多數鄉紳逃往城市尋找臨時的避難處，而較窮苦的階級則遷徙到滿洲。”[[87]](#_87_Hai_Guan_Zong_Shui_Wu_Si)到1931年，農業形勢已變得十分嚴峻。一項關于14個省，包括大約2.8億人口和全國主要農業區的糧食問題的研究報告說，就需求而言，供應短缺5%。3[[88]](#_88_Zhang_Xin_Yi____Zhong_Guo_Li)

### 危機的確定與敘述

這不僅僅是個農村人口暫時性的生存危機，而是一系列持續發生的混亂，結果產生了兩種新現象。一方面，城市與農村發生了周期性的經濟分離，因而城市得不到從農村來的糧食和纖維時，更加依賴對外貿易。另一方面，農村的苦難急速加重。大批人群從一個省遷徙到另一個省；饑荒，農民逃入城鎮乞討，婦女淪落，父母被逼賣兒鬻女，大量農村人口失業，農村普遍欠債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上述論斷。這些事從前是很少的，現在則是司空見慣。的確，糧食和棉麻的供應中斷波及市場，進而波及城市和別的地區，在清朝也時有發生，但并非持續不斷，不像1920年至1949年期間那樣。盡管統計材料貧乏，謹提供我們現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間，中國變得更加依賴進口糧食。事實上，在這20年間進口糧食之多是空前的，因為農業生產和農村集市銷售均遭到破壞，使大城市的糧價相對于其他物價上漲了，從而使得外國糧食第一次變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間，每年凈進口糧食在20萬公噸至35萬公噸之間。1906—1910年間進口糧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過80萬公噸這一極高的進口量。在1880年以前，糧食進口有波動，但一直較低，可能每年在2.5萬公噸以下。1886年以后糧食進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條約口岸城市的成長，以及華北鐵路沿線內地新城市的建設。糧食逐漸從外國購買，直到農民能把更多的資源用于專業化生產為止。1920年以后，糧食進口急劇增加，在那10年里，每年進口接近100萬公噸；然后，在1931—1935年間跳到200萬公噸。抗日戰爭開始以后，糧食進口再一次跳躍；但1941年后下降，當時中國被封鎖于國際貿易之外，國內的農業資源也由纖維和特種作物轉到糧食生產。在飽受戰爭創傷的20世紀40年代，中國僅能自給。總之，我們的外貿統計表明，1920年以后，中國比先前任何時期更加依賴外國的糧食。

表1 中國年平均糧食進口和出口（公噸）1867—1949年a



續表



a糧食進口包括稻谷、小麥和面粉；糧食出口包括高粱、小米、小麥和面粉。1867年到1949年之間資料單位為擔，以20擔＝1公噸的比率換算為公噸。  
資料來源：1867年至1949年間的資料來自蕭亮林（音）：《中國外貿統計，1864—1949年》，第32—33、83頁。

雖然中國在1920年到1930年間的出口，比1890年到1920年間有更快的增長率，但這卻不是農業出口的情況。在出口總額中，農產品和主要由農業原料制成的手工藝品的價值份額，在1920年、1925年和1930年，與1913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89]](#_89_Peng_Ze_Yi_Bian____Zhong_Guo)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出口貿易中手工藝品、糧食和纖維的數量與前20年相比，是停滯和下降的。

與前10年相比，20世紀20年代價格結構上也開始變化。在1913年至1920年間，南開大學44種糧食商品的價格指數上升了，但是與同期綜合物價指數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糧食與纖維、金屬、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間的相對價格沒有變化。然而在1925年至1930年間，糧食的價格比綜合物價指數上升得更為迅速。[[90]](#_90_Nan_Kai_Da_Xue_Jing_Ji_Yan_J)在20世紀20年代，相對價格的類似變化在上海和廣州也能看到。[[91]](#_91_Zhong_Guo_Ke_Xue_Yuan_Shang)價格變化的這種趨勢，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主要城市糧食短缺的狀況，比前幾十年更為嚴重，這也證實在這10年間從農村運往大城市的糧食和纖維下降了。

眾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農作物統計不可靠，因為作物播種面積明顯少報，而產量測算來自很小的樣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國。假定在20世紀20年代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轉向出口貿易，可以想象糧食和纖維的綜合農業產量，在這10年里圍繞固定的趨向線波動，但是除了貿易趨勢以外，確證是不存在的。然而在1929年至1937年期間，情況更為清楚，糧食和纖維的產量是停滯的，僅圍繞穩定增長的趨向線波動。[[92]](#_92_Zhang_You_Yi_Bian____Zhong_G)在1937年至1949年間，農業總產量，包括牲畜和特種作物下降了，但是在這期間糧食的產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穩定。[[93]](#_93_Zhe_Lei_Qu_Shi_Zai_Guo_Min_Z)原因在于農民把他們的資源從生產特種產品和牲畜，轉向維持生活必需的糧食產量。

盡管我們掌握的資料不完整，看來似乎有一個明確的趨向，1920年以后供應外貿和大城市的糧食和纖維，與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年以后糧食的生產全然停滯不前。有大量的資料記述了農村經濟狀況長期內普遍惡化，短暫地恢復后又進一步惡化，據推測總的模式是大多數人的社會經濟福利下降了。在這30年間造成農村市場更為不穩定有四個主要原因。

第一，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需求結構的變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轉的，能迫使經濟組織把土地和勞力資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資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變化前那樣充分利用這些資源，農戶的收入就會下降，土地和勞力就會閑置，資金就會從農業抽走。

第二，農戶的資源或收入無償地或以低于現行交換價值的價格被占用，使得農民不得不減少其開銷和積蓄，因而影響到下一輪的生產和交換。這種情況發生在國家或軍閥的軍隊征收新稅、沒收農民資財，或征集農民勞力從事非農業活動的時候。

第三，是市場對農村經濟組織的產品總需求的突然下降。這種總的市場需求下降可能來源自白銀出口，和隨之而來的貨幣供應短缺。通常這會很快地伴隨貨幣周轉率下降，而后者又對所有商品和勞務的支出產生不利影響。市場需求下降也由于因軍事行動而喪失重要市場，或破壞了貿易和運輸。經濟組織于是被迫舉債或出賣財產，以支付生產費用。清理財產常常帶來對財富重新分配的要求，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權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個原因，是市場活動因經濟組織對自然災害不能預防，或無法自衛而遭到破壞。洪水和干旱，迫使農民降低銷售，使下一季莊稼的種子退化，驅使許多人到別處尋找工作，甚至引起饑饉。一個地區余糧的最終下降，嚴重影響與正常貿易地區的交換，以致農產品的價格以及糧食和纖維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響。

造成市場不穩定的這四個因素發生在1920年后的不同時期，強度也不盡相同。使它們的沖擊不同于前幾十年的原因，是國家和私人的經濟組織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充足的時間，從前一次爆發的市場不穩定中擺脫出來，就被另一次市場不穩定所壓倒。正是由于農村市場的不穩定更加頻繁，農民在這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們不妨查閱這一時期的歷史資料，對造成市場不穩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簡要的考查。

### 20世紀20年代

1924年以后，至少有七種主要的出口手工產品開始在數量和價值上下降了；另外六種既沒有增長，也沒有下降。[[94]](#_94_Peng_Ze_Yi_Bian____Zhong_Guo)最重要的手工業——養蠶業和織布業——在這10年中下降了；其他農村工業如刺繡、地毯編織、草編、高檔花邊、榨油、造紙、茶和糖生產，也下降或停滯。影響養蠶業和織布業需求的變化，有必要評論一下。首先，合成纖維開始取代中國絲，而中國絲曾長期用于生產在西方主要市場出售的服裝。1923年至1930年間，中國絲在紐約的價格下降了67%。[[95]](#_95_Peng_Ze_Yi_Bian____Zhong_Guo)這一更替迅速減少了浙江、福建、廣東外貿公司對絲線和綢緞的需求。[[96]](#_96_Tong_Shang_Shu__Di_7Ye__Dong)此外，合成纖維大量輸入中國，以致逐漸把國產絲從杭州這樣的市場排擠出去。[[97]](#_97_Tong_Shang_Shu__Di_5Ye)西田伯太郎，一個絲織業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世紀20年代后期，增長的合成纖維對中國的出口，是“最近期間”對蕭條的中國絲織業的又一個嚴重打擊。依他看來，這已使日本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絲生產國。[[98]](#_98_Tong_Shang)

中國的棉紡業也未能逃脫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棉布價格上升給新的農村織布中心帶來了繁榮，商人們提供了更多的織機和棉紗以擴大布匹的生產。但是1920年以后，外國棉織品重新開始與手工布（土布）競爭。[[99]](#_99_Tong_Shang_Shu__Di_17Ye)在天津和青島的日本紗廠，以前把他們的大部分棉紗賣給中國商人，由他們提供給織布中心。但在1920年至1924年間，這些紗廠里的機械化織布機增加了三倍多。到1924—1925年，這些紗廠已開始生產優于土布的機制布。當日本紗廠在口岸城市擴大生產時，中國紗廠僅能維持，受困于工人罷工、經營困難和缺少周轉資金。少數像濰縣（山東）那樣的織布中心，設法獲得了便宜的機紡棉紗供手工織布的需要，還能繼續經營下去。但是這損害了別的像高陽（河北）那樣的織布中心，它們廉價銷售。[[100]](#_100_Tong_Shang_Shu__Di_18Ye)1926年高陽僅生產了544125匹布，而1921年卻超過100萬匹。[[101]](#_101_Tong_Shang)其他織布中心也受到同樣的影響。[[102]](#_102_Tong_Shang_Shu__Di_19__25Ye)

這一時期引起市場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內戰。1924年至1927年發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萬農民遭難。明爭暗斗的軍閥們向農民征收各種新稅和派款——這一負擔又由于鐵路阻塞和貯藏設備減少造成銷售下降而加重。[[103]](#_103_Zhang_You_Yi____Zhong_Guo_J)就是在1916年，22省中也只有9個省斷斷續續地爆發戰爭，但是在1925年至1928年間，暴力看來嚴重影響了大約15個省。[[104]](#_104_Tong_Shang_Shu__Di_609Ye)山東遭到特別沉重的打擊，每年有幾十萬農民由于害怕喪命而逃往別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對這一時期軍事活動和農民自衛組織的研究報告，描繪出一幅各階層遭受恐怖和苦難的情景。

不僅到處有縱火、偷竊、強奸，猶如野獸在肆虐，而且謀殺和綁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此外，征集的軍糧被匪幫們搶走之后，各種軍閥部隊又強奪更多的糧食。就這樣，同一個地方的農民遭到外來者接二連三搶劫。土匪和軍閥的隊伍逃走時雞犬不留。人民流離失所，無以果腹，處境極為悲慘。他們離棄自己的家園；老人、青年和婦女都在向滿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時光怎樣流逝，同樣的情況仍在繼續。[[105]](#_105__Man_Tie__Xiao_Ze_Mao_Yi)

頻仍的自然災害襲擊各個省份，其嚴重與頻繁即使在古時的中國也是不平常的。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個省，50萬人喪生，317個縣的莊稼嚴重受損。同年2月，陜西和甘肅發生大地震。1921年，六個省遭受大水侵襲。[[106]](#_106_Zhang_You_Yi____Zhong_Guo_J)次年，臺風襲擊汕頭；第三年，12個省份經受水旱兩種災害。到1924年和1925年，自然災害的范圍更大，沖擊加重，因為大量勞力被投入戰爭，不能動員起來準備自救。云南在遭受嚴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個省的莊稼遭受蟲災，洪水在黃河流域泛濫。[[107]](#_107_Wo_Er_Te__H_Ma_Luo_Li____Zh)

這些災害，加上暴力與戰亂，造成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大的逃亡運動，幾百萬人從北方各省逃往滿洲。[[108]](#_108_Zhang_You_Yi____Zhong_Guo_J)國內的許多地方農田荒蕪。災難的受益者是軍閥的軍隊，他們的隊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輕人和老年人而膨脹起來。這些軍隊里的烏合之眾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蟲一樣麇集在一起，掠過鄉村，破壞沿途的一切。這個國家的主要糧倉之一的湖南，實際上停止了向長江下游的城市運送糧食。[[109]](#_109_Tong_Shang_Shu__Di_632Ye)

所有這些發展造成了普遍的農村失業。糧食進口突然增加，以供養大口岸城市。盡管政府的就業統計是極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災難的一些征兆。據報道，1925年失業人口超過1.68億，估計其中8700萬是農民和鄉村勞動者。[[110]](#_110_Peng_Ze_Yi____Zhong_Guo_Jin)稻米、小麥、面粉、煙葉和原棉的進口自19世紀70年代即有增加，但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年以后，它們的進口量達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年和1922年間，稻米的進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間幾乎又增加一倍。更令人吃驚的是，1923年至1924年間小麥進口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間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進口也出現類似的猛增。[[111]](#_111_Zhang_You_Yi____Zhong_Guo_J)

### 南京十年

正當農業危機看起來似乎沒有盡頭的時候，國民黨和它的軍隊打敗了北方軍閥。1928年和平降臨到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方。與此同時，氣候也變好了，帶來了豐收。但是新的困難又擺在前面。雖然零星的戰爭還在一些省份繼續進行，農民交納的稅收也較重，但是這些對農業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年間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從1921年到1931年，當西方國家在世界范圍的經濟蕭條的打擊下而步履維艱時，中國卻受益于它的銀元貶值，從而在出口的數量上和總值上都有提高。[[112]](#_112_Wu_Da_Ye____Shi_Jie_Jing_Ji)第一次打擊隨1932年失去滿洲市場而來。第二次打擊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來，因為美國提高銀價之后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銀根激烈緊縮，商品價格暴跌。結果農村經濟大規模蕭條。

絲織和棉紡手工業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間又遭到特別嚴重的打擊。“失掉東北市場對于紹興（浙江）絲綢的銷售有極大的影響：1931年絲綢的產量是15.6萬匹，每匹價32元，總值為507.52萬元。這與1929年相比減少了4.3萬多匹，損失超過200萬元。”[[113]](#_113_Peng_Ze_Yi____Zhong_Guo_Jin)日本人占領滿洲后，他們提高了進口稅。這一行動，根據同一資料來源，“有效地阻斷了從煙臺（山東）進口絲綢”[[114]](#_114_Tong_Shang_Shu__Di_393Ye)。大連和整個南滿的棉布進口商不再從中國市場購進棉布。對河北的饒陽、定縣、玉田、靈壽縣和江蘇的通州、常德[[115]](#_115_Cha_Peng_Ze_Yi___Zhong_Guo)縣，后果極為嚴重，足以使整個棉紡織業受到很不利的影響。[[116]](#_116_Tong_Shang_Shu__Di_396Ye)村民對紗廠的棉紗需求銳減。

在1931年和1932年，當世界貿易開始緊縮時，中國手工制品出口也是如此，其中包括絲、特種絲織品、棉布、草編、紙、瓷器、毛竹、油料和麻布；這些品種一起構成了出口總額的大約50%。農村勞力大量用于提供這些產品，手工業品收入下降使農戶不得不改變他們的消費。至1936—1937年，這些手工業品的出口，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總值上，仍遠低于1930—1931年的歷史最高水平。事實上，它們的價格比糧食價格下降得更快。[[117]](#_117_Zhang_You_Yi____Zhong_Guo_J)在1931年至1934年間，天津和上海的茶、煙、酒、牲畜、糧食、棉制品和油料的價格指數持續下降。不久產地的價格也下降了，農民們很快發現較低的銷售價格不敷他們的單位生產成本。1934年陳翰笙的報告說，廣東農民毀掉桑園，以致桑園面積下降30%以上。[[118]](#_118_Zhang_You_Yi____Zhong_Guo_J)一項研究茶業的報告表明，該作物面積的下降相似。[[119]](#_119_Tong_Shang_Shu__Di_629__630)棉花生產的經濟狀況對農業人口來說，也同樣令人沮喪。

近來，（1932年左右）世界經濟崩潰更為廣泛，已導致農產品價格下降。中國主要的棉花市場遭到世界棉花市場狀況的嚴重打擊，以致在我國各個棉花市場上生產成本都得不到補償，因為在市場上買方已經下降。[[120]](#_120_Tong_Shang_Shu__Di_678Ye)

同一資料來源，繼續描述了陜西的棉花生產成本如何超過了市場價格的三倍。湖北和浙江棉花價格暴跌，也榨干了處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場銷售下降之中的農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貿易的收縮摧毀了農村經濟。1932年大量的銀元開始從內地流向沿海城市，這是一個由美國銀價上漲引起的金融資本流出農業的前所未有的動向。這正好發生在農村經濟亟需貸款的時候。伴隨著白銀的外流，農業投資利潤率急劇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銀行存款增加了一倍多。[[121]](#_121_Tong_Shang)

農民們還得忍受另一個打擊。過去中國不同地區因為旱澇災害而遭受周期性的歉收時，地方官員有責任開倉放糧，或從外省購進糧食。但在這一時期，行政權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成功地采取這樣的措施。有些地區甚至開始出現饑饉。1933年一個中國農村調查團來到陜西，在日志中描繪了鄉村的悲慘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們調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澆地，水來自一條小河。當干旱發生時，小河干涸，水澆地變成了旱地。在這片水澆地上常種植鴉片，縣政府從這塊地上收稅。今年三月農民不得不吃樹皮草根。五月以來，他們除了草以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吃。他們還吃油料的渣滓和麩糠等等。現在正在收割小麥，他們才見到面粉。他們將面粉與麥糠混在一起，加上水做成湯，稱為“盆湯”。一個人一頓吃不到兩塊面餅，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頓。餓死、病死、逃荒、賣身為奴，是為常事……7月15日。小唐村比別的村莊更窮得多。在1928年秋，這個村就有農民餓死。這個縣小麥的價錢，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錢的人才能買得起。縣城的城門緊閉，以防農民進入。城里人擔心一旦農民進得城來，他們就會偷走一切。[[122]](#_122_Xing_Zheng_Yuan_Nong_Cun_Fu)

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這種情況在許多農村地區是常事，這與列區荷芬和金所描繪的鄉村多么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間，富人和窮人一樣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土地。引起的土地所有權的再分配極其復雜；許多人家把有錢人的地位讓給了別人。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在陜西、江蘇、浙江、云南和廣西的17個地區，抽樣調查了15.5萬戶。抽樣涉及的時期是從1928年至1933年。委員會發現，在八個地區內地主戶數增加了，在四個地區內地主戶數減少了，有五個地區沒有變化。[[123]](#_123_Gu_Dao_He_Xiong____Jiu_Zhon)抽樣還發現，富裕人家在14個地區減少了，僅在三個地區有增加。擁有一些土地但還獲得工資收入的中等人家數，在13個地區下降了，在三個地區有增加，另一地區保持不變。貧窮的戶數——指的是收入主要來自工資的人家——在17個地區的14個中有增加。許多富裕家庭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經濟地位。對獲得土地的較深入調查也表明，江蘇許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這一水平的人家總數下降的情況下，擴大了他們所有的土地。[[124]](#_124_Xing_Zheng_Yuan_Nong_Cun_Fu)在1928年至1933年間，土地分配究竟變得怎樣不平等，也許永遠無法確定。但是這些變化的基本原因顯然是席卷農村的市場不穩，而不是地位牢固的地主階級上層人士控制了農村經濟。

### 戰爭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在以后八年里，中國人與強大的對手進行了殊死的戰斗。其后，在和平終于到來之前，他們又不得不經歷了四年自相殘殺的內戰。一個戰爭中的國家不僅損失許多正常生產的貨物和勞務，也要冒喪失將來生產能力所依靠的資本的風險。戰爭的時間越長，要求人民為填補損失或消耗掉的資本作出的犧牲也就越大。生產和經濟組織的破壞，伴隨著社會的變化，使人們逐漸無視道德和習俗，并趨向以強凌弱。

1937年，日本人對華北的入侵，嚇壞了商人和放債者，他們關閉店鋪相率逃命。如此眾多的軍隊沿大路和鐵路運動——中國人逃跑，日本人推進——很快引起征募農村勞力和征用他們的大車和役畜。在以后幾年里，除了幾次大的戰斗外，中國北方的形勢很快就穩定了。但是1941年以后，中國的游擊戰加劇，而日本人以大掃蕩報復。戰爭對華北農村總的影響很難確定，因為對破壞從未進行綜合調查。一位中國學者根據1938年至1943年間的地方性調查，試圖就戰爭對農業生產的廣泛影響做一個總的估計。

至于作物區的變化，我們可以說由商品作物轉向主要的糧食作物。棉花種植面積是下降得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種植面積擴大了。高粱是農家的主要口糧，日本軍隊阻止大規模地種植這種作物，以消除游擊隊利用莊稼地作為保護屏障。所以高粱的種植面積下降了。但是耕作總面積下降得很少。[[125]](#_125_Ma_Li_Yuan____Zhan_Shi_Hua)

1939年收成特別差，主要是因為氣候惡劣。但是到1941—1942年總產量和單產量又恢復到1937年的水平。然后，從1942年開始，農業生產呈現嚴重下降。

在1943年以后，日本人強化他們的戰爭，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失去農時、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農民大力轉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質量惡化，并使產量降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可能從1940年到1942年的這三年是整個戰爭期間北方農業最穩定、最好的時期。[[126]](#_126_Ma_Li_Yuan____Zhan_Shi_Hua)

改變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勞力和役畜愈來愈缺少，也出現在中國的其他部分。1938年和193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結果，像重慶這樣的城市一夜之間擴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產階級，喜愛豬肉、雞、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圍的地區生產不了足夠的產品以滿足需求。價格上漲了，農民于是把他們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勞力投向這些產品，而不是糧食，從而糧食又供應不足。[[127]](#_127_Dong_Shi_Jin____Kang_Zhan_Y)到1941—1942年，稻米、小麥和其他糧食的價格開始比照特種農產品的價格上升。于是農民開始把更多的土地轉用于生產這些糧食。與此同時，戰時對勞動力的需求使許多青年脫離務農，而去工廠和到運輸業做工，更不要說在前線服務了。到1943年，許多跡象表明，西南的農業經濟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極限。農業生產在下降，盡管是逐漸下降。發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農業勞動力。[[128]](#_128_Tong_Shang_Shu__Di_51Ye)

在和平、穩定時期，農業生產可能會短暫下降，但會很快恢復。而在戰時的條件下，當勞動力在播種、田間管理或收獲時被抽走，生產就會持續下降。當然勞動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擊最重。作物的種類和種植周期有很大的地區差異，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樣多的勞動力對生產的影響很不一樣。

供應最大部分上市余糧的農戶，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勞動力。雖然對農作物的需求引起了農產品價格上揚，但是在農忙季節雇用農業勞動力的費用比許多作物的價格上漲得更快。我們知道，在1941年以后，這種情況在四川是非常嚴重的。[[129]](#_129_Wang_Yin_Yuan____Si_Chuan_Z)可能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情況也是一樣。到1943—1944年，許多農戶受困于價格和費用的嚴峻壓力，不得不削減他們的播種面積。大的、富裕的農戶仍有足夠的土地養活他們自己。然而，削減播種面積造成了總產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變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下降得最厲害。甚至向城市銷售的糧食也下降了。

戰爭的負擔主要仍落在農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陜西南部和河南北部進行了廣泛的旅行，他報告說，軍隊到處征用農民的大車，甚至農民的家庭成員。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發現“農民真正關注的一個緊急問題就是國民黨征用大車”[[130]](#_130_Ge_Lei_E_Mu__Pei_Ke____Lian)。沒有大車，秋收的莊稼不能運走；沒有大車，冬季就不能為土地上肥；沒有大車，農民就不能把糧食運到市場，也不能買回他們需要的東西。另一個沉重的負擔就是周期性的征糧，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數量。幾乎沒有一個村能免除。雖然像鄭州、洛陽這樣的城市被日軍占領了，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農民那樣艱難。佩克描繪了40年代早期華中北部農村普遍的殘酷景象。

賦稅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農民都知道，如果天氣不如人意，或者如犁頭折了，牛死掉，他就要陷入嚴重困境。大批體格健全的年輕人被征走了——有些村莊約占他們的3/4——只有老人、孩子和孕婦在地里正常勞動，大多數家庭才能夠維持下去。[[131]](#_131_Ge_Lei_E_Mu__Pei_Ke____Lian)

在1949年和1950年，共產黨的土改隊來到北方農村，實地檢查土改的進程。他們報告說，他們到達的每一個村莊，在1937年至1949年間，牲畜、農具、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都出現大幅度的下降。在平原縣（河北）[[132]](#_132_Ying_Wei_Shan_Dong_Sheng)，1949年糧食產量仍低于1937年。[[133]](#_133_Zhong_Yang_Nong_Ye_Bu_Ji_Hu)對山東省49個村的一次調查，發現1949—1950年每戶的平均耕地面積低于1931—1936年的平均水平。農具供應量也下降了，糧食產量也低一些。[[134]](#_134_Tong_Shang_Shu__Di_224__236)

這些年的歷史記錄呈現出的農村貧困的慘淡情景，已被許多評論者加以說明——與我們在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觀點相左——作為情況從來沒有什么不同，鄉村從來沒有過過好日子的證據。顯然，農業中國為這30年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災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_1_4)費迪南德·保羅·威廉·馮·列區荷芬：《中國旅行日記》，老原正雄譯，第1卷，第139頁。

[[2]](#_2_4)F.H.金：《四千年的農人：中國、朝鮮和日本的不變的農業》，第233—234頁。

[[3]](#_3_4)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910頁。

[[4]](#_4_4)益子呈輔：《中國中部》，第29頁。

[[5]](#_5_4)葛敬中：《五十年來中國農業史》，載梁啟超等：《晚清五十年來之中國》，第210頁。

[[6]](#_6_4)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22頁。

[[7]](#_7_4)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調查部：《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第2卷，第68頁。

[[8]](#_8_4)原文P’eng—te譯音為彭德，河南省無彭德其地。據后文稱袁世凱在Peng—te購買土地。根據中國文獻記載，袁世凱所購土地系在河南彰德。疑原文作者以字形近似，誤彰德為彭德。——譯者

[[9]](#_9_4)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調查部：《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第3卷，第22頁。

[[10]](#_10_4)史堅雅：《農業中國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第2部分》，《亞洲研究雜志》第26卷第2期（1965年2月），第18—19頁。

[[11]](#_11_4)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清代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第103—104頁。

[[12]](#_12_4)艾伯特·馬謝：《中國的貿易組織和貿易管理》，《美國經濟評論》第6卷第2期（1916 年6月），第309—323頁，見第309頁。

[[13]](#_13_4)東亞同文會編纂局：《中國經濟全書》第7卷，第225頁。

[[14]](#_14_4)調查浙江經濟所統計課：《浙江建德縣經濟調查》第1卷，第6頁。

[[15]](#_15_4)東則正編：《華中經濟調查》第1卷第1冊，第361頁。

[[16]](#_16_4)馬若孟：《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第177—178頁。

[[17]](#_17_3)吳華寶：《陜西永樂店的農業經濟》，《南開社會經濟季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第171頁。

[[18]](#_18_4)W.Y.申：《中國山東濰縣的農業類型，生產費用和年勞動分配》，《中國經濟雜志》第3卷第2期（1928年8月），第653頁。

[[19]](#_19_4)《中國經濟雜志》（1927年11月），第921頁；《中國經濟全書》第8卷，第31—32頁；《中國經濟月刊》（1926年8月），第295—299頁。

[[20]](#_20_4)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華中農村的社會狀況》，第2頁。

[[21]](#_21_4)原文如此。——譯者

[[22]](#_22_4)W.Y.申：《中國山東濰縣的農業類型，生產費用和年勞動分配》，第667頁。

[[23]](#_23_4)見前有關彰德的譯者注。——譯者

[[24]](#_24_4)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第118頁。

[[25]](#_25_4)實業部：《農業經營續篇》，第88—89頁。

[[26]](#_26_4)卜凱：《中國土地的利用》，第293—294、291、306、297、295頁。

[[27]](#_27_4)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江蘇省松江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第158頁。

[[28]](#_28_4)馮·列區荷芬：《中國旅行日記》，老原正雄譯，第2卷，第79—80頁。

[[29]](#_29_4)明恩溥：《中國農村生活：社會學研究》，第18—19頁。

[[30]](#_30_4)甘博：《定縣：一個華北農村社區》，第22頁。

[[31]](#_31_4)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五種，江蘇省農村調查》，見第1、2卷附錄。

[[32]](#_32_4)詹姆斯·W.海斯：《九龍的古老生活方式：鄭沙灣村》，《東方研究雜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月），第154—188頁，見第154、157頁。

[[33]](#_33_4)根岸勉治：《華南農業經濟論》，第196—197頁。

[[34]](#_34_4)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經濟論》第1卷，第28—31頁。

[[35]](#_35_4)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調查日記》，《滿鐵調查月報》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第2部分，第129頁。

[[36]](#_36_4)研究華北這種復雜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最佳成果是東亞研究所：《有關經濟的中國習慣調查報告書：華北的租佃制度》。關于華中，見孫文裕等編：《豫鄂皖贛四省之租佃制度》。關于四川，見孟光宇和郭漢鳴：《四川租佃問題》。

[[37]](#_37_4)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62頁。

[[38]](#_38_4)馬若孟：《清代和民國時期滿洲農村的社會經濟變化：若干初步結論》，《現代亞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年），第591—620頁，見第614—615頁。

[[39]](#_39_4)景甦和羅侖：《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見附錄。

[[40]](#_40_4)河地重造：《中國地主經濟》，《經濟年報》第18期（1965年），第48—124頁。

[[41]](#_41_4)《新湖南報》：《湖南農村情況調查》，第48頁。

[[42]](#_42_4)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調查部：《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惠民縣第一區和平鄉孫家廟》，第62—63頁。

[[43]](#_43_4)大公田（ta—kung tien），即族田。——譯者

[[44]](#_44_4)陳翰笙：《廣東農村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滿鐵調查月報》第15卷第6期（1935年6月），第175頁。

[[45]](#_45_4)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棧》，見第5章。

[[46]](#_46_4)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華中農村的社會狀況》，第17—21頁。

[[47]](#_47_4)內田智雄：《中國農村之分家制度》，第413—414頁。

[[48]](#_48_4)馬杰里·沃爾夫：《臺灣鄉村的婦女和家庭》，第36頁。

[[49]](#_49_4)巖佐舍一：《北滿農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滿鐵調查月報》第20卷第12期（1940 年12月），第66—95頁。

[[50]](#_50_4)熊代幸雄：《華北農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轉移》，《農研報告長編》，第167—266頁。

[[51]](#_51_4)牧野巽：《中國家族研究》，第10—11頁。

[[52]](#_52_4)費孝通：《中國農民生活》，第27頁。

[[53]](#_53_4)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習慣調查》第1卷，第236頁。

[[54]](#_54_4)許烺光：《在祖宗蔭庇下：中國農村的親屬關系、人格和社會流動》，第9—10頁。

[[55]](#_55_4)許烺光：《在祖宗蔭庇下：中國農村的親屬關系、人格和社會流動》，第249頁。

[[56]](#_56_4)仁井田陞：《中國之農村家族》，第151頁。

[[57]](#_57_4)費孝通：《中國士紳：城鄉關系論集》第4、5章。

[[58]](#_58_4)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主義的社會學研究》，第25—35頁。

[[59]](#_59_4)費孝通和張之毅：《鄉土中國：云南農村經濟研究》第27章。

[[60]](#_60_4)馬若孟：《中國的農民經濟》，第153—158頁；本書第5章。

[[61]](#_61_4)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319—332、333—336、343—367頁。

[[62]](#_62_4)陳張富美和馬若孟：《習慣法與中國清代的經濟增長》，《清史問題》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32頁。

[[63]](#_63_3)馬若孟：《傳統農業中的合作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力耕作中的含意》，載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第261—278頁。

[[64]](#_64_3)馬若孟：《近代中國的經濟組織和合作：河北省邢臺縣的水利管理》，載《中國之政治與經濟：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論文集》，第189—212頁。

[[65]](#_65_3)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99頁。

[[66]](#_66_3)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90頁。

[[67]](#_67_3)史堅雅：《農業中國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第2部分》，第211—228頁。

[[68]](#_68_3)黃炎培和龐淞編：《中國商戰失敗史》，后以《中國四十年海關商務統計圖表1876—1915》為書名再版發行。

[[69]](#_69_3)鄭毓貴（音）：《中國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948年的歷史綜合分析》，第258—259頁。

[[70]](#_70_3)珀金斯：《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第155頁。

[[71]](#_71_3)林頌河：《統計數字下的北平》，《社會科學雜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第385頁。

[[72]](#_72_3)關于在戰后菲律賓進行類似的城鎮人口構成模式觀察，見艾倫·C.凱利：《需求模式、人口變化和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2月），第110—126頁。

[[73]](#_73_3)R.T.香德：《在原始經濟中的買賣和專門化的發展》，《經濟紀錄》第41期（1965年6月），第193—206頁，見第200頁。

[[74]](#_74_3)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村之諸問題》第1卷，第103頁。

[[75]](#_75_3)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華中農村的社會狀況》，第2頁。

[[76]](#_76_3)弗里德里希·奧特：《中國谷物產量與谷物進口的相互關系》，《中國經濟雜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338—414頁。

[[77]](#_77_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室：《都市發展影響下的一個農村的變化》，第44—45頁。

[[78]](#_78_3)馬若孟：《棉紡織手工業與中國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經濟史評論》第18卷第3期（1965年），第614—632頁；見第619頁。

[[79]](#_79_3)布魯斯·L.雷諾茲：《緯線：中國手紡紗線的技術禁區》，《清史問題》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1—19頁，見第1頁。

[[80]](#_80_3)馬若孟：《棉紡織手工業與中國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第621—624頁。

[[81]](#_81_3)滿鐵太平洋問題調查準備會：《從農家之經營和經濟狀態所見滿洲農家和華中農家的比較》，第60頁。

[[82]](#_82_3)卜凱：《中國農家經濟》，第65—80頁。

[[83]](#_83_3)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昭和十二年度農家經濟調查報告：豐潤縣宣莊鎮，米廠村》，見附錄。

[[84]](#_84_3)馬若孟：《近代中國農業的商業化》，載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173—191頁，見第186頁。

[[85]](#_85_3)同上書，第184—185頁。

[[86]](#_86_3)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棧》，第723、725—727、732、734—737頁。

[[87]](#_87_3)海關總稅務司：《十年報告，1922—1931年》，第442頁。

[[88]](#_88_3)張心一：《中國糧食問題》，第33頁。

[[89]](#_89_3)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3卷，第63頁。

[[90]](#_90_3)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南開指數資料匯編》，第14—15頁。

[[91]](#_91_3)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解放前后物價資料匯編（1921—1957年）》，第126、184頁。

[[92]](#_92_3)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922頁。我已從該書列舉的生產數據編出出產指數，并利用1935—1937年價格權數算出糧食出產價值以證實這一說法。

[[93]](#_93_3)這類趨勢在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的《中華民國統計提要》第15—16頁列舉的九省農產品收成報告中是明顯的。

[[94]](#_94_3)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3卷，第64—65頁，貿易統計數字取自海關報告。

[[95]](#_95_3)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3卷，第4頁。

[[96]](#_96_3)同上書，第7頁；東亞研究所：《中國繅絲的世界地位》，第63頁。

[[97]](#_97_3)同上書，第5頁。

[[98]](#_98_2)同上。

[[99]](#_99_2)同上書，第17頁。

[[100]](#_100_2)同上書，第18頁。

[[101]](#_101_2)同上。

[[102]](#_102_2)同上書，第19—25頁。

[[103]](#_103_2)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559—589頁。

[[104]](#_104_2)同上書，第609頁。

[[105]](#_105_2)（滿鐵）小澤茂一：《中國的動亂與山東農村》，第3頁。

[[106]](#_106_2)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619頁。

[[107]](#_107_2)沃爾特·H.馬洛里：《中國：饑荒的國家》第1、2章。

[[108]](#_108_2)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659—660頁。

[[109]](#_109_2)同上書，第632頁。

[[110]](#_110_2)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3卷，第66頁。

[[111]](#_111_2)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674頁。

[[112]](#_112_2)吳大業：《世界經濟衰落中之中國》，載方顯庭編：《中國經濟研究》第1卷，第45—56頁。

[[113]](#_113_2)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一1949》第3卷，第392頁。

[[114]](#_114_2)同上書，第393頁。

[[115]](#_115_2)查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3卷，第396頁無江蘇棉織業，亦無常德棉織業；第397頁有常熟棉織業，第398頁有南通（即通州）棉織業。據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為常熟之誤。——譯者

[[116]](#_116_2)同上書，第396頁。

[[117]](#_117_2)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615頁。

[[118]](#_118_2)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627頁。

[[119]](#_119_2)同上書，第629—630頁。

[[120]](#_120_2)同上書，第678頁。

[[121]](#_121_2)同上。

[[122]](#_122_2)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陜西省農村調查》，第164頁。

[[123]](#_123_2)古島和雄：《舊中國土地所有制及其特點》，載山本秀夫和野間清編：《中國農村革命的發展》，第41頁。

[[124]](#_124_2)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五種：江蘇省農村調查》第1卷，第25、28、30頁。

[[125]](#_125_2)馬黎元：《戰時華北農作物生產及敵偽對糧食之掠奪》，《社會科學雜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65頁。

[[126]](#_126_2)馬黎元：《戰時華北農作物生產及敵偽對糧食之掠奪》，《社會科學雜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71—72頁。

[[127]](#_127_2)董時進：《抗戰以來四川之農業》，《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2月15日），第48頁。

[[128]](#_128_2)同上書，第51頁。

[[129]](#_129_2)王銀元：《四川戰時農工問題》，《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月），第107—108頁。

[[130]](#_130_2)格雷厄姆·佩克：《兩種局勢：關于中國投入革命的親身經歷》，第260頁。

[[131]](#_131_2)格雷厄姆·佩克：《兩種局勢：關于中國投入革命的親身經歷》，第312—313頁。

[[132]](#_132_2)應為山東省。——譯者

[[133]](#_133_2)中央農業部計劃司編：《兩年來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匯編》，第149—150、160—161頁。

[[134]](#_134_2)同上書，第224—236頁。

# 第六章 農民運動

中國革命通常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農民革命，甚至被認為是農民革命的原型。的確，如果沒有農民武裝和如此眾多農民的支持，中國共產黨人就不可能取得政權。然而，很簡單，如果沒有共產黨人，農民也決不可能孕育出革命思想。

為證實這一論斷，這章將首先論述農民的騷動；它是自發的，與共產主義運動同時發生，而又獨立于共產主義運動之外，并由汲干農民收入的三種主要渠道，即地租、利息和賦稅所激起。[[1]](#_1_Jian_Qiao_Er__S_Mi_Ge_Dai_Er)第2節在概述那些不是由地租、高利貸和稅收引發的騷動后，將概述民國時期農村騷動的類型。不論第1節中所分析的騷動，還是第2節中所涉及的騷動，顯然都是農民發泄憤怒的傳統方式，突然爆發又迅即消失，對現行秩序極少形成威脅。簡單地說，在農民能自發地做到的，與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農民所能做到的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第3節將考察共產黨所面臨的一些困難，及其克服這些困難所采用的方法。利用農民作為基本力量推動革命的勝利，這既是難得的機會，又是巨大的挑戰！中國革命的鼓動者們變成了奪取政權的行家里手，他們忠實于列寧的教導和榜樣（不必考慮是農民，而不是工人構成了基本力量）接受了這一挑戰，克制與狡黠并用——不僅激發起熱情，還引起怨恨——克服了這些困難。

關于農村各類騷動和風潮發生的相對頻率的統計，有必要預先警告，由于來源的多樣和細目的多變，這些統計表和百分率只對準確性提供一種迷惑人的保證。例如，在南京統治的10年間，記錄或僅僅提及的近千起事件中，只有100起根據有用的資料能以準確的細節敘述，這些資料有的只有幾行，有的卻有幾頁或多至幾十頁。這1000起事件中其余的那些，我們只能從不過一、兩行的概述[[2]](#_2_Can_Kan_Zhang_You_Yi_Bian)中極粗略地看到；更糟的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只是一般地提到，完全沒有提供細節。[[3]](#_3_Li_Ru__1932Nian_5Yue_11Ri_Zhi)此外，某些被分別記錄于這種或那種記載中的事件，卻可能與同一事情有關。1936年上半年，在蘇州專區（江蘇）記載下來的20個抗稅案例中，大部分就是這種情況。是不是每一案例都應單獨對待？[[4]](#_4_Zhang_You_Yi_Bian____Zhong_Gu)再者，在哪一點上（持續時間、涉及人數、暴力程度），農民的憤怒表示能被視作一起風潮？而且，一起風潮在什么時候就成了一場起義？換言之，我們必須認識到所記載事件的重要性是不一致的。

由于這些原因，在任何事件中，任何統計評價的可信性都可能為資料所提供信息的無法比較的性質所損害，而一種統計評價若把不能進行比較的事情（種類、持續時間或重要性迥異的騷動）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恰恰足以證明這種統計評價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關于方法論的最后一點是，我們所了解的農村騷動的樣本，對那類持續時間較長的騷動的頻率并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間分布。例如，我們是否應當把從20年代到30年代記載下來的抗稅風潮次數的增加歸因于土地稅的增加，同時農作物的價格下跌（從而納稅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者我們是否更應當把抗稅風潮次數的增加歸因于目擊者（新聞記者及其他知識分子）對農民處境更加關心？（可能兩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當許多目擊者在上海的報紙上寫文章時，我們所知道的占壓倒多數的事件也發生在江南（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5]](#_5_Yi_Wei_Zi_Liao_Bian_Ji_Zhe_He)內地，特別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報道；而在這些省份，專區和縣遠離省會，情況更是如此了。

楊慶堃曾進行一次統計分析，不是對民國時期，而是對19世紀（1796—1911）。[[6]](#_6_Yang_Qing_Kun____Guan_Yu_19Sh)對那一相對長的時期，他的研究范圍非常廣泛（不僅包括農村的騷動，也包括數量更多的城鎮風潮和沖突，土匪活動，以及為幫助政府滿足軍費開支而籌款，更不用說與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有關的1600起事件）。對于民國時期的史學家來說，把可與楊慶堃所分析的6643起事件和群眾行動（也就是說每年平均58起）相比的每年的總數加以比較考慮，并非不可能。然而，如果不確定的結論少一些，在某些情況下重復的結論少一些那就好了。一方面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課題[[7]](#_7__Ta_Qi_Tu_Yong_Ji_Suan_Ji_Chu)謹慎而有爭議的結果，另一方面是他的關于家庭、鄉村和宗教的名著的非常有價值的發現，這二者之間存在鮮明的對比。[[8]](#_8_Yang_Qing_Kun____Gong_Chan_Zh)羅伊·霍夫海因茨所作的“生態學”研究的令人失望的結果，與這位歷史學家用傳統方式研究[[9]](#_9_Xiao_Luo_Yi__Huo_Fu_Hai_Yin_C)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儲存這兩者之間的對比，同樣有說服力。當然，本章所用的定性方法本身也會有主觀主義之類的明顯弊端，但這樣的方法至少不會顯示出一種名為用科學方法確定的，而實際有可能導致錯誤的貌似真理的外表。

## 自發的抗租抗稅

### 佃農與地主之間的糾紛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記載的非共產黨的農民活動中，抗租是個受到重視的范疇，因為它最能表現被剝削者反對剝削者的斗爭。抗租有時被單獨提及，有時領先于文獻根據更充分，但在社會性上卻較不純的抗稅范疇，在檔案館和匯編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這一事實導向夸大佃農的反抗。在民國時期這種反抗增多了，但仍限于少數，它引起的爭端和對抗，多于真正的風潮。

在真正的風潮中，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冬至1936年春騷擾蘇州附近鄉村的那一次。那里為數眾多的非在鄉地主——其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土地位于何處——以及一些在鄉地主有委托催甲收租的習慣，由于催甲的腐敗和勒索，他們為人們所痛恨。[[10]](#_10_Guan_Yu_Su_Zhou_De_Cui_Jia)然而，古老的催甲制度并不是引起暴亂的唯一原因。它是由連續兩季歉收引發的。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地主們決定1935年不向派來評估災情的現場“災情視察員”報災，特別因為佃農們上一年曾同那些上報災的人進行過斗爭。縣政府曾因此要求所有的佃戶自行“申報災情”，但地主們懷疑災情被夸大，于是他們以他們計算的容許的減租額，自行削減了佃戶申報的損失總數。引起佃農不滿的另一個原因與用實物折合現金交租有關：恰在地租被固定前，蘇州一擔稻谷的價格從8元跌至7.5元，結果佃戶們被迫多交1/16的稻谷，而表面上地租并未改變。引起佃戶們憤怒的第三個原因是度量衡的改變（一老擔如今等于1.6新擔），這引起佃戶們誤解，他們誤認為增加了地租。

風潮始于1935年11月，當時在歉收最為嚴重的一些村和區，官員們開始試圖收租和逮捕欠租的佃戶。在要求減租的請愿失敗后，數千名農民要求釋放被捕的佃戶，包圍并搗毀了當地的警察所（警察開槍打傷了幾名示威者），還焚燒催甲的住宅。在1936年的頭幾個月中，沖突和糾紛（持續的時間都沒有超過2天）再次在吳縣（蘇州的縣）[[11]](#_11_An_Min_Guo_Zheng_Qu_Jian_Zhi)的幾個區發生。其中最為嚴重的一次發生在4月底，在官員們試圖沒收種子來抵地租幾天之后。這些造成雙方都有死亡的事件的結果是，縣長試圖恢復平靜，宣布延遲交租并作了有限的讓步：在最嚴重的歉收地區減租20%，取消對未及時交租的佃戶的罰款等。但是，農民同警察的沖突，仍持續至5月和6月。[[12]](#_12_Jian_Hong_Rui_Jian____Su_Zho)

蘇州這些風潮的第一個特征是缺乏準備。反抗者似乎沒有戰略，反抗形式（始終是抗議，請愿和宣傳與暴力沖突交替進行）也沒有任何可識別的進程。確實，我們在這里所了解到的，只是一次次的爆發蔓延開去，并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在收租時節，然后是播種時節）。第二個特征是，一次次爆發的怒潮，是由特殊的原因甚至是偶然事件引起的：“災害”（歉收）或地主拒絕無條件接受災情申報，當地的糧食價格下跌以及度量衡制改變。在租佃的原則方面并無異議，只是反對突然改變現狀。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特征是，在佃戶與地主之間的這次沖突中，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抗稅風潮一樣，人們攻擊了官員或其下屬和公共建筑。村長或保甲長和當地的公安局，和催甲一樣，是暴力行為最經常的目標——遠超過地主本身，而這些地主并不都是非在鄉地主。佃戶們對士兵下鄉催租感到憤怒。軍隊的干預是地主們求助、抱怨、有時是要挾（“如果我們收不到租子，我們就交不了稅”）的結果。但是，剝削者與當局之間的勾結在佃戶中所激起的憤怒幾乎完全轉向了后者。于是，抗租騷動——被認為是典型的社會性反抗——更多指向當局，較少指向富人。

至少在一個省，即浙江省，當局和地主之間的緊密關系出現了短暫的動搖。在浙江，在國民黨政權最初幾年的短時期里，當地的國民黨代表曾試圖保護佃農的利益，這項政策使佃農同地主之間的糾紛增加了。由于這一不幸的插曲（在這唯一由當局進行土地改革的省份，這項改革失敗了），我們獲得了闡述有關佃農問題第二點的重要證據：雖然風潮和叛亂是罕見的，但糾紛和訴訟卻并非如此。盡管糾紛和訴訟很少惡化為暴力行為，它們卻闡明了地主與佃戶之間關系的性質。很少有例外，只有地主表達他們的觀點，然而，從他們常常是冗長的反訴中，我們卻得以抓住雙方爭執的原因。

政府決定減少地租25%，引起地主多次抱怨和請愿。他們一般不愿說出自己的身份，而常署名為“國民”，甚至直截了當地自稱“野農”，或“縣農民代表”。[[13]](#_13_Guan_Yu_Yi_Xia_Ji_Duan__Can)有一些請愿書聲稱有幾百人簽名，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地主的代理人、親戚和狗腿子，因為在這個區，地主的人數可能少于請愿者的人數。另一方面，另一些申請書只有當地鄉紳的例行代言人（區長、副區長和民團團總等）的簽名。但是，幾乎毫無變化的是請愿書的內容：用相同的詞匯表達完全相同的觀點，并且使用相同的陳詞濫調，如同循環傳遞的模型一樣（就像1789年春法國三級會議開幕前用來炮制“發牢騷的筆記本”或不滿的清單的那些東西）。我們在這里所接觸到的顯然是預謀的進攻，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反擊。

浙江的地主們在他們的抱怨之中，小心翼翼地不對二五減租的原則提出疑問。他們只是聲稱這一措施與地主和佃戶之間關系的惡化有關；佃戶中的壞人——“奸佃”和“惡農”——正利用這一法律，施行遠高出25%的減租，或者甚至干脆完全拒絕交租。不良佃戶經常為“痞徒”或無業游民所操縱，并得到傳統的或（更為經常）新設立的官方領導人和組織——村長和村委員會，農民團體和當地國民黨分部——的支持。

地主們特別對負責仲裁因實施這一法律引起的訴訟的佃業仲裁會不滿：他們指責該會一貫偏袒佃戶，對地主粗暴并加以恫嚇。他們暗指這些仲裁會（也就是“調解會”）鼓動佃戶拒絕收成調查，而提出他們自己的估產，甚至在豐收的1930年使用歉收的1929年和1928年的糧食收成數字；仲裁會鼓勵佃農以糧食交租時使用小斗；并在地主不給他們簽訂新的租約前不交地租，等等。被這樣剝奪了合法利益的地主們，在這個曾經富足但現已受到破壞的省份已不再可能履行交稅的義務了：在結束他們的訴苦和悲嘆的請愿時，他們常常向官方暗示這種威脅。

南京檔案館保存的來自國民黨地方組織，甚至省政府的某些官方文件，逐一駁斥了不少地主們的請愿書中的陳述。然而，地主們的反訴并非全然毫無根據。相當多的并不完全理解新法律條款的佃戶，和另一些只是為了充分運用有利的政治形勢的人，采取了完全不交租的做法。有些地主受到威脅、劫掠或毆打，少數被殺死。但是，這些行為，一般似乎是針對那些拒絕實行減租，或把土地收回自種或轉租給比較順從的佃戶（這是一種只有在佃戶嚴重違約的情況下，才為當地習俗認可的行為）的地主。確實，許多地主的阻撓策略導致了有關實施新的租約的命令：舊租約被宣布無效，只有遵守二五減租的租約才是有效的。關于計量單位“太小”的抱怨，同佃戶或行政方面的關于地主使用的計量單位“太大”的抱怨一樣多。正是為了防止欺詐行為，調解委員會被迫推行他們自己的計量單位。他們也以類似的方式禁止佃戶在以實物交租時，為增加重量而把谷子弄濕。

從減租引起摩擦和糾紛的恢復，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第一，特權階級的抵制證明是成功的。罷稅的威脅促使省政府放棄了土地改革計劃，因為省政府需要地主的金錢和合作，以便推行其他計劃。從浙江的地租改革所引起的騷動中得到的第二點啟示是，這種騷動是長期積累的失望的發泄。佃戶們并沒有主動對地主的契約提出疑問，但是，一旦當局采取一項新的措施，它就成為騷動的催化劑。

浙江佃戶與地主之間糾紛的大部分原因，也很自然地能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發現。最為頻繁發生的沖突與地租的數額或地租的押金有關；歉收時，地主不是增加地租（例如，因為地主自己的賦稅增加了），就是拒絕降低地租（或者是拒絕降低到佃戶所要求的數額）。然而，還有許多關于利益上的抵觸，很難將其羅列：農民被抽佃，有關收成的核算或所用計量單位引起爭執，催甲過分苛刻或粗暴，等等。有時，佃戶指責非在鄉地主的代理人，除為地主索取一大筆押金外，還為他們自己索取“小押金”。佃戶們還指責代理人當土地未被租用時，因介紹承佃而索取傭金或賄賂。至于地主方面，他們的抱怨首先涉及拖延交租或拒絕交租（實際上往往是無力交租），但是，有時也涉及偷水或盜伐竹林。[[14]](#_14_Xiao_Xin_Yi__Yin_____Cong_19)

許多爭執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天。絕大多數減租請求是在荒年提出的。一次關于上海腹地的調查列舉了220起與地租有關的事件的起因。除15起是拒絕在荒年減租外，有39起事件是因天氣反常引起的（洪澇24起；風災造成的破壞8起；干旱7起），23起是因蝗災引起的。[[15]](#_15_Cai_Shu_Bang____Jin_Shi_Nian)這里，我們要強調兩點：（1）“偶然的”（即使是周期性的）因素在激發與地租有關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2）在這些對個別地點的爭執糾紛中普遍的突出問題。交租的原則幾乎從未產生過問題。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這些沖突確實似乎稍稍頻繁和強烈一些。上面提到的調查，在1922—1931年這10年間，從上海的兩家報紙（《申報》和《新聞報》）上，總共記錄下197起與地租有關的事件。[[16]](#_16_Tong_Shang_Shu__Di_26__38Ye)在前3年（1922—1924），所記錄的事件次數每年是9—11起。在第二個3年，即動蕩不安的1925—1927年，每年的次數在17—19起之間徘徊。從1928年起，每年的次數從未低于20起。因而，騷動似乎稍有加劇。此外，暴力行為（如侵入地主的住宅和宰殺、分食地主的豬）和風潮及騷亂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趨勢：從前5年（1922—1926）占有記錄的事件的33%，上升到后5年（1927—1931）的39%。

同樣，這還不是驚人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所呈現的年度波動，1929年發生的事件總數為46起（23.35%），這是個大災之年（在季初是蝗災和旱災，后來又是水災），而豐收的1930年則不超過20起。僅就風潮來看，天災與騷動之間的關系甚至更為明顯：1929年發生了18起風潮（整個10年總數為73起，幾達1/4），而1930年僅4起。至于不是風潮的事件——許多仍沿襲傳統的形式：示威、請愿、起訴，以及佃戶潛逃以躲避交租的案件——超過了記錄在案的事件的半數。總的來說，與地租有關事件的傳統的特征以及歉收與騷動之間的同樣傳統的關系，似乎比事件次數略有增加更有意義。在所有事件中，暴動仍是非常少的。

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道德規范仍屈從于地主。[[17]](#_17_Zhu_Yi_Si_Chuan_Yi_Ge_Da_Di)他們受到尊敬，并在具有濃烈的儒家家長制氣氛中繼續利用相互關系。在受剝削的佃戶中間，階級意識和團結不如希望承佃的人之間的競爭那樣普遍，那樣充滿感情。土地稀少和人口增加對地主有利。對農民來說，上策是得到一個不惹麻煩的佃戶的好名聲，以免遭受抽佃的風險。即使佃戶們起來造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的破壞目標常常是公共建筑和辦公處所，而不是“老爺們”的住宅，他們經常把狂怒向支持催甲的警察發泄，而不是向請求警察這樣做的地主們。

地方上的放債人看來也從同樣的環境中獲益，因為總的來說他不會受到他壓榨的債務人損害。一旦人們因其他原因而起義時，他們肯定有被殺的危險；但是，除某些戰斗性強的文學作品外，人們幾乎沒有發現過專門指向貪婪放債人的協力一致的運動。[[18]](#_18_Li_Ru__Fei_Tu_Yu_Zhai_Wu_Ren)確實，當雇員或其他債權人到村里索債時，偶然性的風潮通常也會發生：[[19]](#_19_Ru_1934Nian_Zai_Shan_Xi___Ji)這類風潮與因收租或征稅引起的風潮類似。然而，一般說來，情況是兩個個人或兩個家庭之間的簡單的雙邊關系，即一個債務人與一個債權人之間的關系；即使這個債權人是一個高利貸者，在將來的某個時候，肯定還有必要再次求助于他。問題在于借貸的需求壓倒了其他的任何考慮。幾乎沒有風潮是針對難以對付的債權人的，然而卻有這樣的例子，在極度貧困或收獲前急需貸款時，擁有存款卻拒絕借出的鄰居受到攻擊或甚至被殺死。[[20]](#_20_Zhe_Shi_Fa_Sheng_Zai_Yi_Ge_J)較為經常發生的事情是逼迫富人先拿出二、三擔谷子，以便度過收獲前的難關。[[21]](#_21_Zhe_Shi_Feng_He_Fa_Bian___Zh)借貸的需求有時導致暴力行為，同時也迫使借款人謹慎地對待貸款人。有一種行為足以象征對這種人物所感到的依賴（同時也幾乎不存在任何債務人運動，更不用說任何破產者的暴動）：對冷酷無情的債權人所采取的最為流行的報復方法之一是在他的門前自殺。夏洛克丟了面子，他的檢察官丟了性命。

### 抗稅騷動

“引起風潮的最豐富、最重要的源泉，是與官方征稅連在一起的勒索。”[[22]](#_22_Xiao_Gong_Quan____Nong_Ye_Zh)這個晚清中國及17世紀法國傳統的農民騷動的特征，在中華民國的南京10年期間依然存在。[[23]](#_23_Zhe_Ge_Te_Dian_Bei_Suo_You_Y)

作為例證，讓我們引用在同一個月（1932年10月）同一個地區發生的兩起抗稅風潮，盡管難以證實二者之間有蛛絲馬跡的聯系。江蘇省政府財政廳發布清查田賦的命令，在揚州城附近的江都縣西鄉引起了嚴重的騷動。這一清查揭露了許多耕地的面積比地契上所申報的數量大。政府讓有關農民以較低的價格購買超出的面積，或將這些土地上交國家，任他們選擇。農民們對不得不出錢買下這些他們視為己有的土地，否則將被沒收而感到憤怒，他們焚燒測量員的帳篷，搗毀他們的器具；接著他們又到揚州街上游行（1932年10月19日）。大約有50名示威者被捕（在10月21日），從而引起了一場暴亂。次日，幾千農民涌進縣城，侵入縣政府辦公室，接著奪得田賦和地籍的圖冊，將它們燒毀或拿走。他們在道路上和運河中設置交通障礙，就像近日法國的朗格多克的釀酒人所做的那樣。軍隊驅散了憤怒的農民，又逮捕了200人。為了要求釋放前兩天被捕的示威者，數萬武裝農民（有些人攜帶步槍，但大多數人拿著棍棒和農具），在10月23日返回，再次包圍了縣城。根據由省政府指派的兩個負責調查的官員的正式報告，他們從駐軍手中奪取不那么原始的武器后，至少毆打了12名軍官和士兵。該報告指出，軍隊只是朝天鳴槍驅散農民，但這一說法與參加風潮者的傷亡不符：8人死亡，至少有同樣多的人受傷。

在10月23日的流血事件之后，騷動繼續了幾天：出現了武裝農民的聚會和搶劫；拒絕參與這一運動的農民以及村長、鎮長和富裕地主（“大戶”）的住宅被燒毀。六名據信為運動的領導者被處死（10月29日拂曉）后，這場運動才結束。根據行之有效的辦法，無情地懲罰領導者（或那些被指控為領導者的人）與寬恕一般的參與者，兼施并用（10月24日，250名被捕的示威者被釋放），并同意作出讓步：即停止測量計劃和田賦調查。[[24]](#_24_Guan_Yu_Yang_Zhou_Feng_Chao)測量或修訂地籍測量常是引起風潮的原因，特別是在測量員發現地籍登記與有關耕地不符的時候。[[25]](#_25_Li_Ru__1935Nian_Chun__An_Hui)揚州的農民，不論是否正確，把這種不符歸咎于測量員使用較小的計量單位。

揚中（距揚州東南幾十公里的一個縣）的一次風潮是由另一個常常引起騷動的原因激發的：增加賦稅，特別是增加土地附加稅。此外，在這起風潮中，可能有上層社會階級的比較成熟的主張。揚中的抗稅運動最初是由兩個地方士紳組織起來的，他們是該縣兩個區的代表。他們曾進行將揚中這個小縣與鄰縣合并的活動，希望通過合并來減少行政費用從而減少稅收，但這一努力未能成功，他們兩人在1932年夏反對縣長作出的進一步增加附加稅的決定。一位縣政府的官員被派去視察這兩個不順從的區，以安撫代表和當地士紳；當他一眼看到正在等待的人群時，感到驚恐萬分，遂化裝成一個老婦人逃走。眼見要求兩縣合并的請愿不成，但聚集的人群卻成功地嚇走了縣政府的代表（同時也迫使縣長卸職），當地的納稅人決定抵制。這兩個鄉紳取得了運動的領導權，直到運動在農民中涌現出來的領導人的影響下變得激進起來。農民領導人領導上萬農民進攻縣衙門（1932年10月4日），但未能做到縱火將其燒毀；相反，主要的領導人被捕，一名農民被殺。但是，他們已經搗毀了稅務局長、國民黨的地方代表、民團首領和該縣最大的地主等人的住宅。受害者包括富有而無官職的地主，給這次風潮蒙上一層社會性的色彩。在事件發生后1/4世紀，當共產黨已奪取政權時，對它的說明不免有所渲染。[[26]](#_26_Dai_Wen____Jiang_Zhou_Huo_An)由更為堅決的真正的農民取代鄉紳領導人，是一種有教育意義的特征，但不是常見的。通常農民構成抗稅運動的普通成員，這樣的運動常常是由當地的名流領導的。

紅槍會領導的抗稅活動情況更是如此，紅槍會是20年代活躍在山東和河南的一個秘密組織。[[27]](#_27_Pei_Yi_Li____Hua_Bei_De_Pan)在他們的反征稅騷亂中，控制著紅槍會或像“聯莊會”這樣的合法組織的士紳絕無顛覆政府或向政府挑戰的意圖。首先他們的對手近在眼前：縣政府或半自治性的軍閥，以至貪婪、腐敗的地方稅吏。總之，他們當務之急是保護自己的財產和人身。多年來，他們已習慣于互相保護，以防備土匪或士兵的侵擾，因為分裂成多少有些合法性的敵對的權力集團的政府當局，[[28]](#_28_Ai_Kai____Zhuan_Bian_Zhong_D)難于維持治安。他們是社區里有影響的、富有的成員，因此很自然地代表社區，將保護延伸到受稅收威脅的祖產。

因此，這些抗稅風潮——其數量大大超過其他類型的農村風潮——并沒有反映農村人口中最貧困階層的要求。這些風潮也不是由蓄意地唐突要求在村內重新分配財產激起的。它們看中的目標并不是這些富有的村民，而是文官，特別是地方政府下屬的代理人、稅吏或負責催稅的仆從。這些抗稅風潮并不指向使現行秩序，甚至傳統征稅形式成為問題。確切地說，這些風潮力圖通過保護現有權利甚至個人或地方社區的特權來維護它們。這些權利，可能千差萬別，從習俗認可的新年殺豬不交屠宰稅的“權利”，到為祖祖輩輩從不上稅的“黑田”免稅。[[29]](#_29___Zhong_Guo_Jin_Dai_Nong_Ye)

有時，納稅人起而反抗的壞事純屬臆測。他們先入為主地懷疑任何稅收的改革計劃，哪怕其用意是極好的。在修訂地籍測量（或不得人心的“土地申報”）的罕見的案件中，進行修訂可能大量減少多數納稅人的稅額負擔，同時使國庫增收；唯一受損者只是那些擁有大量“黑地”迄今免于納稅的地主們。[[30]](#_30_Jian_Zai_Dang_Tu_Xian___Xiao)所以，我們看到政府當局咒罵他們是“愚民”，任憑一小撮大量逃稅的大地主煽動發起動亂，而這恰恰損害了他們自身的利益。

直到1933年底，稅賦負擔持續惡化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31]](#_31_Zhe_Zhong_E_Hua_Zai_40Nian_D)然而，引起納稅人憤怒的只是個別的改革（簡言之，是這一總趨勢的細節）。納稅人總的說來并不反對這一趨勢，而是特別反對強征某種新的附加稅，或不許在歉收后按慣例減稅，或在一年內多次強征新稅，非法勒索，特別明顯的欺詐或濫用職權等等。總之，他們反抗據信是無法忍受的新的措施，卻不對稅賦原則本身提出疑問。

這些零星的反抗是極易被制服的，盡管并非注定必然要完全失敗。就每一起企圖持續幾個月的反抗來說，都有多次風潮在當天或一周之內便被平定下去。兩次風潮之間很少有什么協作。幾乎全都準備不足——如果有什么準備的話——組織極差和引導不善：即使動亂者的武器很原始，又缺乏訓練和紀律，這些也不足以毀滅他們的事業，他們的失敗可能是起事倉促造成的。[[32]](#_32_1932Nian_10Yue__Yang_Zhong_D)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場動亂迅速被摧毀，接踵而來的是同樣迅速的鎮壓。如在揚州，鎮壓通常是嚴酷無情的，但也是有選擇的；領導者（或者，如果不能確定，則是那些被宣布為領導者的人）會被處死，其余的全部釋放。通常縣長會被調離，而引起事件爆發的措施會被廢止。在這種情況下，戰敗并不意味失敗。

### 抵制鴉片稅

土地稅，首先是土地附加稅，是大多數抗稅風潮的根源，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征收燒酒稅、屠宰稅、鹽稅以及鴉片稅等等，也會引起反抗。我們只限于討論最后提到的稅種。極高的鴉片稅率并不是造成有關騷亂的唯一原因。時而強迫種植罌粟時而又禁止，也激起過農民與警察或軍隊的多次沖突。

種植罌粟不僅面臨政府政策的反復，也面臨鎮壓的威脅。它還受氣候變化的影響，[[33]](#_33___Shou_Huo_Shi_Chao_Shi_Duo)這使它比谷物更難侍弄，同時，它還要冒產品過剩和價格下跌的市場風險。然而，種植罌粟卻又能提供厚利：中日戰爭爆發初，在貴州，同一塊土地種罌粟的利潤是種小麥的4—6倍；而早幾年在云南，一季罌粟的收成可掙得種植罌粟的土地的價值的1/4。[[34]](#_34___Shou_Huo_Shi_Chao_Shi_Duo)

罌粟稅是比例稅率。按官方說法，高稅率是為了抑制種植罌粟，甚至是對于種植罌粟的制裁，這可從它的最普通的稅名看出：畝罰（每畝的罰金）。有時，連續增稅——首先它是很嚴厲的——確使農民不敢種植罌粟，如在1925—1926年種植季節許多地方所發生的那樣。于是，為了刺激罌粟生產，有關當局（碰巧是軍方）匆忙降低鴉片土地稅。[[35]](#_35_Wu_De_Hai_Bian____Zhong_Hua)然而，在其余時間里，這種“禁”煙稅確實達到了它的真正目的（與公開宣布的相反），也就是擴大罌粟種植。沒有其他作物能帶來足夠的利益，使高稅成為可行，而在許多地區，無論農民是否種植罌粟，都征收鴉片稅。[[36]](#_36_Gan_Su_Shi_Li____Zhong_Hua_N)四川因其土地肥沃，有良好的灌溉系統和眾多河流，特別適宜于生產和運輸鴉片，而對那些拒種罌粟的農民，當局強征一種“懶惰稅”。盡管懶惰稅被認為與種植罌粟者所納的稅款相等，但實際上有時要高出一倍。[[37]](#_37___Zhong_Hua_Nian_Jian__1926N)

許多農民為賦稅嚴苛所激——如果不說為其所迫——而擴大罌粟的種植量，損害了糧食生產（造成多次局部饑荒）；在此之前，他們首先為軍閥所迫，也為財政上的原因，而種植罌粟。[[38]](#_38_Qi_Ge_Sheng__Xia_Xi___Gan_Su)國民政府忠實于孫逸仙的愿望，并急于在財政上削弱并控制半獨立的西南政權（這一地區是主要的鴉片生產地），在多次努力失敗后，終于強制禁煙，同一些農民又被迫拔去他們的罌粟，鴉片的生產和消費并非在一個晚上消失，但從1934年起，兩者都略有下降，盡管省或地方當局都盡力避免放棄這筆收入。鴉片為敵對的四川軍閥提供軍費，也是云南和貴州兩者預算的最大收入來源。甚至幾乎沒有罌粟的廣西，也對從云南經廣西運往長江的鴉片抽稅。同樣，閻錫山統治下的山西省禁種罌粟，卻從自陜西偷運過黃河的鴉片的違禁稅獲益。

禁種鴉片使罌粟種植者立刻陷入貧困，有時甚至傾家蕩產，他們的地價一夜之間下跌。如果他們試圖繼續秘密種植這種作物，這是很難隱瞞的，他們至少要冒重罰的風險，有時風險還要大得多。1932年底，在江蘇最北部，對罌粟進行官方檢查，同時威脅要把兩周內不拔除這種作物的人處死。[[39]](#_39_Mei_Guo_Guo_Wu_Yuan_Dang_An)所以，政策的反復并未改變一種基本的連續性，即農民遭到死亡的威脅，起初是如果他們不種罌粟，然后是如果他們種了罌粟。[[40]](#_40_Can_Kan___Zhong_Hua_Nian_Jia)

面對因時因地而變的政策（在西部省份和福建種植罌粟可能是強制的，同時在其他沿海省份卻是禁止的），農民們以其慣常的方式作出反應：當他們對這種濫用權力忍無可忍時，通常并不訴諸暴力，而是突然爆發出憤怒或絕望。在四川萬縣，農民自1909年以來就不種罌粟了，1925年當軍事當局命令他們重種罌粟時，每個甲的首領都拒絕照辦。[[41]](#_41___Zhong_Hua_Nian_Jian__1926N)同年在長江上游的涪陵，所有居民在地方士紳和商人的領導下聚集起來，聲援反對增加60萬元鴉片稅的抗議。[[42]](#_42___Zhong_Hua_Nian_Jian__1926N)還有另一些慣常的非暴力反抗，包括請愿，要求縣政府批準限制鴉片生產；當稅吏即將到來時，欠稅人逃匿；以及最終荒廢征稅過重的土地。[[43]](#_43___Zhong_Hua_Nian_Jian__1926N)

福建是一個生產鴉片很少的省份，該省陸軍和海軍組織了大規模的走私。對生產者的剝削托付給了個人或公司，他們可以指望軍方保護以便順利地結束收稅。這使士兵與福建農民之間一再發生沖突。[[44]](#_44_Li_Ru__1925Nian____Zhong_Hua)無論是在福建，還是在其他地方，這種沖突照例都既是經常的，也是短暫的。一個例外是1932年2月和夏季安徽北部四個縣和江蘇北部一個縣的農民對征收鴉片稅的軍隊和當局進行了一次長期的抵抗，并取得了勝利。[[45]](#_45_Pei_Yi_Li____Hua_Bei_De_Pan)

## 自發的農民騷動：類型和特征

于是出現了第一個明顯的悖論：無論地租多么沉重，高利貸的后果多么惹人注目，它們卻很少激起激情的反抗和騷動，就是激起了，也不如土地稅所激起的那么頻繁，而土地稅相對來說較輕，盡管在增加。我們還注意到，土地稅引起的騷動是與反抗其他稅種（如鴉片稅）相伴隨的，同時更進一步加強了抗稅騷動的突出地位。

### 與租、稅無關的騷亂及其類型

我們現在將簡要地考慮其他類型的騷亂，并概述一種既包括這些騷亂，也包括在前一節中已較詳細論述過的那些騷亂的一般類型。

我們將首先考慮的騷亂的共同之處是騷亂指向政府當局（文職的或軍人的）的地方代表，而不是——很少例外——指向富人本身。因而這些騷亂更接近于傳統形式的抗稅騷動，而不是共產黨人所要求和鼓動的社會斗爭（反對地主和放債人）；后者一般說來分布不廣，也就是說，在共產黨人自己插手以前是這樣。

反對行政當局、強制勞役和軍隊的斗爭 有一些指向行政當局的風潮是由于各種濫用權力（地方官員的專橫、殘暴或腐敗）引起的，另一些則由出自善意但被誤解（常被解釋得很糟）的創舉引起。1930年在廣東北部的東陂，一項要求在地方市場交易中采用陽歷的法規導致一起造成五人死亡的風潮。鬧風潮的人認為“陽歷”中的陽字是“洋人”的洋。[[46]](#_46_Mei_Guo_Guo_Wu_Yuan_Dang_An)三年后，在云南，農民們變得難于控制，他們把持續干旱歸咎于反對迷信的宣傳，他們相信這種宣傳得罪了龍王。[[47]](#_47_Mei_Guo_Guo_Wu_Yuan_Dang_An)有時激起農民憤怒的改革本意在于改善他們的命運。1933年4月在浙江北部余杭縣有1萬名（按另一資料為2萬名）蠶農參與了一起動亂，因為省鄉村建設機關要他們購買一種特殊的蠶種，以對抗日本人的競爭。一個來自省機關的官員被打傷，另一個被殺，鄉村建設機構的設備和帳篷被放火燒毀，蠶房也同政府的許多建筑物一樣被搗毀。應該提及的是，要求農民購買政府所贊許的蠶種（這種蠶種比其他蠶種貴）的命令沒有附加任何解釋。當省政府最后決定派一名科長到這一地區與農民談判時，他們跪倒在他的面前，就像1905年1月流血的星期日圣彼得堡沙皇的臣民那樣。據說，那位驚恐的科長曾駕車直向農民駛去，傷了許多跪著的農民，顯然這又給當時的局勢火上澆油。[[48]](#_48_Guan_Yu_Yu_Hang_Shi_Jian__Ca)

上面提到農民對政府不得人心的濫用職權進行報復，對現代化努力作出錯誤的反應，余杭的例子突出表明，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對農民的精神世界多么陌生。官員的笨拙和在某些情況下驕橫地推行某種改革，很可能使早已厭惡所謂改革的農民感到忍無可忍；而改革無論怎么說最終只對很少的一部分人（那些在蠶種方面有投資能力的人，或在其他例子中，在種子或較昂貴的設備方面有投資能力的人）有利。反對革新和進步的怒火可能會被描繪為反動的，但未必就是無理的。面對企圖從上面強行推動革新的現代化機構的突然出現，農民——先驗地——沒有理由作出與過去有所不同的反應；這就是他們對極為熟悉的腐敗（也由建在他們上面的那些機構表現出來）所作出的反應。[[49]](#_49_Ye_Shi_Zai_1933Nian___Yun_Na)

沒有什么東西比強迫勞役制度更能說明農民社會與以命令主義（盡管并非總是有效的）方式指導的現代化之間的沖突。1934年12 月3日公布的蔣介石給各省政府的一份指示授權省政府利用強迫勞動完成公益工程：挖灌渠，加固河堤，清理土地，造林，筑路等，該命令聲稱上述工程全部由直接受益的勞工（從當地村民中征募）實施。但這并沒有防止強迫勞動在被強迫者中極端不得人心。一般地說，服勞役者與最主要的獲益者并不一致，也就是富有的地主們能更多地利用現代道路，有更多能灌溉和防洪的田地，但他們卻可以暗中賄賂官員，從而不必在勞工隊伍中服勞役，也就是說，他們首先并不是必然被豁免的。只是最貧窮的農民參加了川湘路的建設（這項工程從1935年11月延續到1937年1月，但征集到的勞工只在最靠近他們家的路段勞動）。待遇很差，伙食極壞，報酬極低——甚至根本沒有——勞工們終于造反了（在公路經過的七個縣中的兩個縣黔江和涪陵，至少有少數勞工這樣做了）。[[50]](#_50___Zhong_Guo_Nong_Cun____Di_3)

有時僅僅抽簽確定被征集農民的過程都足以引起一場風潮：1935年，在河南泌陽，1000名老婦搗毀了有全部壯丁（她們的丈夫和兒子）名單的保甲登記處，并且打傷了一個官員。[[51]](#_51___Zhong_Guo_Jin_Dai_Nong_Ye)然而，如在黔江和涪陵一樣，騷動更經常是由惡劣地對待勞工，他們的生活和勞動條件惡化（這是未恰當遵守法規的結果），或監督他們的官員腐敗引起的。對勞工既不付給報酬，又不供應伙食的情況是很少有的；許多人得到基本的或最低的工資，幾乎全供應伙食，盡管通常并不充足。但是，例如有時會發生雨天拒絕給他們開伙的情況（因為他們不勞動），盡管他們不可能回家；或者一個腐敗的保甲長可能會從每個人身上敲詐幾枚銅板——支付“點名費”；不然就是監工加快勞動進度或毫無理由地毆打、傷害（甚至打死）勞工。照例引起“抗力役”騷動的正是這類濫用權力。

“抗力役”可能是非暴力的（罷工），或者相反，也可能是流血的，如當一兩萬勞工用鎬頭襲擊防止他們逃跑的護路隊時。不論是哪種情況，很明顯勞工們的王牌是他們的人數：盡管不是本意，他們卻代表大量集中的勞工，這些勞工在常態下是廣為分散的。但是，在第一種情況下，這些轉變為勞工的農民可能會嘗試一種他們并不熟悉的反抗方式（農業工人自己幾乎從不罷工）。與此相反，在第二種情況下，他們會搶先采用（或重演）農民與士兵（或“匪兵”）之間的那種慣常的戰斗形式。[[52]](#_52_Xu_Duo_Kang_Ju_Qiang_Po_Lao)

1926年春，河南西部的紅槍會（一個被認為是保護農村居民的秘密組織）據說曾殘殺多達5萬——意謂數量極多——的敗兵。[[53]](#_53_Dai_Xuan_Zhi____Hong_Qiang_H)在軍閥統治年代，抵抗士兵的農民自衛一度特別必要，并且很廣泛。在南京政府統治的10年中，無論是在半自治的軍閥們爭奪的邊遠省份，還是為了抵抗“匪兵”部隊，情況仍是這樣：據信那些土匪如果被收編為正規軍，他們可能會馴化；但由于他們的薪餉很難按時發放，對他們來說回到老路的誘惑是非常強烈的。[[54]](#_54_Lu_Xi_An__Bi_Ang_Ke____Zhong)

龍田事件（1931年12月27—28日）正是這種例證。由于駐在福建福清縣龍田半島的軍隊勒索和殘暴超出常情，幾萬農民攻擊了2500名士兵，這些士兵——包括他們的司令官——原先全是土匪。他們綁架村民勒索贖金，拍賣搶來的貨物并嚴刑拷打抵抗他們的農民。最后，當一個士兵試圖砍斷一個沒有迅速取下他索要的戒指的婦女的手指，接著又發生集體輪奸后，農民們終于較好地武裝起來（不僅有必不可少的棍棒、短刀和長矛，還有手槍和步槍），根除了這些士兵。據說2500名士兵中有一大半被消滅。農民們也損失嚴重，但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其實只要正式允諾將這支部隊（或者說這支部隊的殘部）移駐他地，農民們就會同意停止戰斗。1932年1月27日，從福州開來的援軍才真正克服了敗兵首領的固執（這個首領堅持索要一筆賄賂，以換取同意換防）。[[55]](#_55_Guan_Yu_Long_Tian_Shi_J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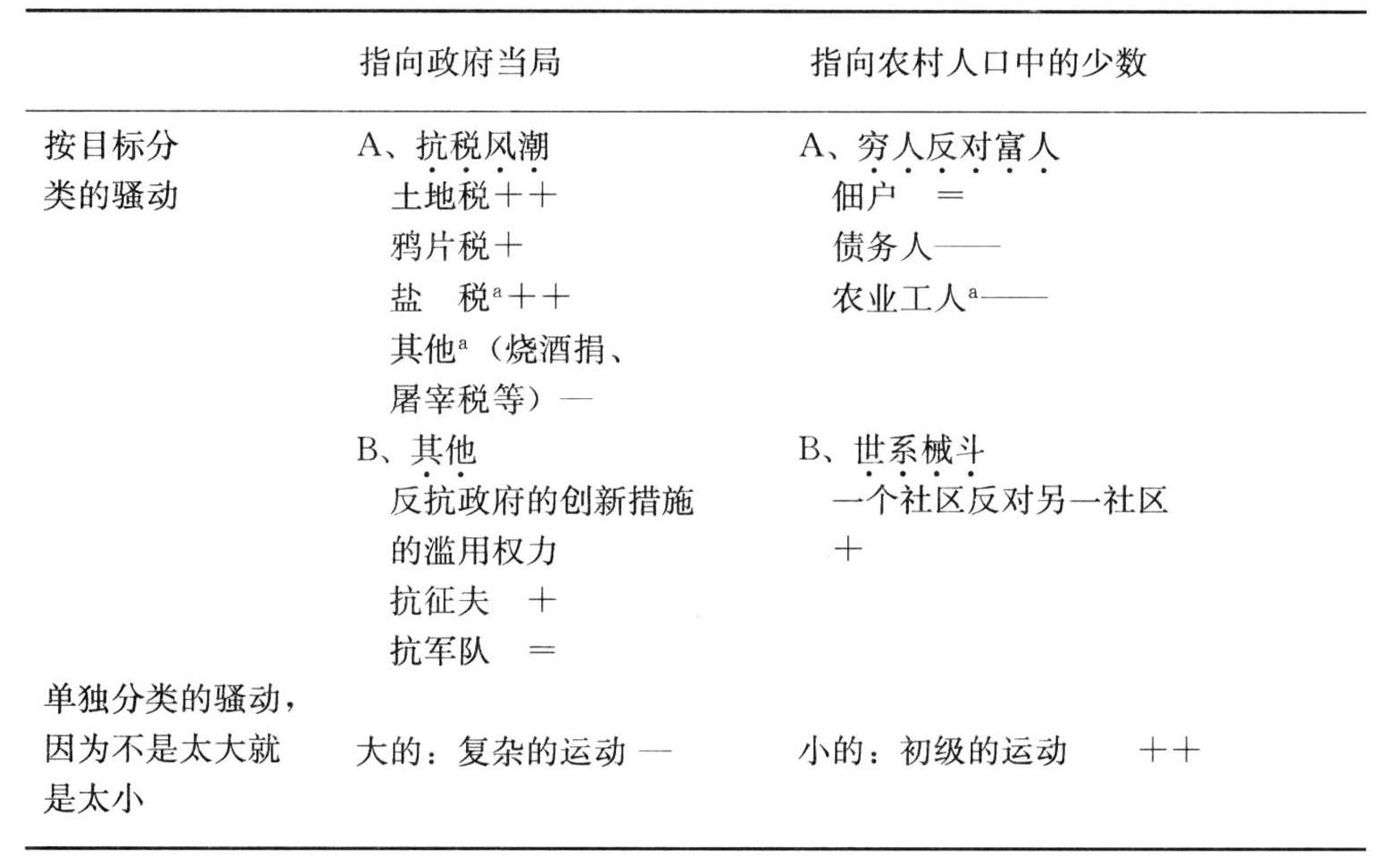
正規軍不時大肆勒索，雖然其次數少于那些被并入軍隊的原土匪，卻也同樣令人懼怕，有時甚至甚于軍隊派往進剿的土匪。對土匪進行的討伐很少起作用（軍隊有時會向土匪出售武器和彈藥）。有些討伐甚至比土匪襲擊本身造成更多農舍和村莊被燒，更多農民被殺。[[56]](#_56__Qi_Ta_Shu_Shi_Shi_Li_Zhong)福建的一個地區1932年受到土匪侵擾，當地居民在斷定“糾正比原罪更糟”后，一次接一次地發出請愿書，請求撤回維持治安的軍隊（無效），“以便他們只與土匪作戰”[[57]](#_57_Mei_Guo_Guo_Wu_Yuan_Dang_An)。

中日戰爭期間，不僅國民黨統治薄弱的省份，而且它所牢固控制的省份，首先是四川，都成為農民與掠奪成性的軍隊之間的對抗舞臺。于是敘府地區（位于長江與岷江的匯合處）的農民向大刀會求助，他們立即在1943年的一個晴朗的夏日早晨，干預正在盜墓的一群76軍的士兵。接著，發生了10天的戰斗，從7月16日至27日（被稱為“骨戰”）。結果是，得到增援的76軍趕跑了大刀會——并且以搜尋大刀會會員為借口，繼續劫掠，比過去更厲害。[[58]](#_58_Mei_Guo_Guo_Wu_Yuan_Dang_An)

盜竊和勒索所引起的暴亂少于征兵制的弊害和軍隊拉夫所引起的暴亂。魏德邁將軍在一份致蔣介石的著名的備忘錄中，提醒蔣氏注意因征兵激起的骯臟交易和恐怖：“對中國農民來說，征兵就像災荒或洪水，只是更有規律——每年兩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59]](#_59_Yin_Zi_Cha_Er_Si__F_Luo_Man)除只打擊最窮的人的征兵制的不公正之外，還定期征集成千上萬的苦力，他們像牲口一樣被驅趕著。在壯丁和苦力（常受虐待，經常得不到照顧）中，死亡率都很高，而八年抗戰期間軍隊對平民的暴行和騷擾更加深了農民對軍隊的傳統仇恨。到40年代初期，征兵的不公正和軍隊的勒索甚至已成為可與征稅相提并論的引起農民騷動的因素。似乎當時這兩種因素結合在一起盛行一時：有些暴亂既是由對田賦征實不滿引起的，也是由對征兵隊長的憎恨引起的。征兵隊長是對突然撲向在地里耕作的農民并迅速把他們的雙手捆在背后的那伙人的委婉的稱呼。在不到一年里（1942年秋至1943年夏），規模和時間不等的農民暴亂（有些卷入的人數多達5萬，持續時間長達數月）實際上影響了中國的每一個省。[[60]](#_60_Xiang_Xi_Nei_Rong__Gui_Zhou)在這些暴亂之后，1944年又出現了另一次浪潮，當時中國士兵在日軍于河南發動的新的攻勢面前潰逃，受到1942—1943年嚴重饑荒的幸存者的多次攻擊。[[61]](#_61_Mei_Guo_Guo_Wu_Yuan_Dang_An)當士兵處于孤立，掉隊或受傷時，厄運便會降到他們的頭上。關于農民已不再同情士兵的境況的說法大多是虛構的（畢竟這些士兵都是同他們一樣的農民）。他們最初的沖動是讓士兵緩慢地、痛苦地死去。[[62]](#_62_Zhang_Tian_Yi____Chou_Hen)

一份綱要性的圖表（表2）列出了自發的農民騷動的各種類型。單獨加以分類的事件（在表的下端）一方面包括持續時間比一般騷動長的極少數復雜的運動；另一方面也包括頻仍發生但持續時間短的大量初級的運動。按照我們第一個準則（目標）的觀點，復雜的運動按定義是混合的。它們即使在開始時并不指向幾個不同的目標，但是由于其持續時間長，隨時間的推移它們趨向于獲取新的目標。不過，它們與第一類騷動，即指向政府當局的騷動（位于表的上方），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初級運動（簡單的搶劫事件，有或沒有有限的暴力活動）置于表的右邊一欄：饑餓的人群到可以找到糧食的地方去搶劫或吃大戶，也就是說，一般是在富人的家中或糧商的店鋪里。

表2 農民騷動的類型



a 因篇幅所限本章未討論的項目。頻度（主觀的估計）：  
——極少—少  
＝ 一般頻度，或變化不定，如軍隊的案例  
＋ 比較頻繁  
＋十 很頻繁

按目標分類的騷動中，我們了解到指向政府當局的騷動最為頻繁。不僅置于該表右邊一欄的騷動發生次數較少，而且我們劃分的這兩類子目的社會意義也非常不同。“ A”類騷動（這是到目前為止我們考察到的唯一的一些）是窮人反對富人。“B” 類騷動（世系械斗）使龐雜的社區對立，每個社區均由多數窮人和少數富人構成，富人或者保護窮人，或者操縱窮人，不論怎樣，都是他們組織窮人。

縱向運動 如在清朝一樣，縱向的社會沖突（世仇族間長期爭斗）會使兩個宗族、兩個村莊或兩群村落為某一爭議——諸如用水（或防洪），一塊清理過的土地，森林的開發，墳地或控制當地市場等而相互對立。[[63]](#_63_Xiao_Gong_Quan____Nong_Ye_Zh)在易發洪水的安徽與江蘇北部邊界，四年內曾四次成為與管水有關的沖突的舞臺。1932年6月，蕭縣（江蘇，現屬安徽）居民所進行的排澇作業和疏浚工程給宿縣（安徽）造成淹沒土地的威脅。因此，宿縣2000多名武裝的農民開始填平那些不久前才挖好的水渠。一場使用了火炮的沖突導致蕭縣幾個村莊被毀（1932年7月1日）。次年，只是由于軍隊的干預，才阻止了豐縣和沛縣（江蘇）農民毀壞河堤把威脅性的洪水導向鄰縣。1935年3月，又重現了1932年的騷動模式：蕭縣村民疏浚淮河一條支流被宿縣居民蠻橫地阻止，接著發生械斗，造成多人死亡。1936年5月，另一場沖突再次把蕭縣和宿縣的老對手投入對抗。[[64]](#_64___Da_Wan_Bao____1932Nian_6Yu)

相鄰社區間的反復沖突造成了敵對和爭斗的傳統。利益的沖突會使這種傳統保持活力，但渴望復仇也能刺激這一傳統，以致極為平常的事件也會引起新的敵對行為。村民們為了自衛和保衛社區的利益，在必要時會向秘密組織求助，或自己組成敵對的組織，如廣東海豐和陸豐的紅旗會和烏旗會（詳見本節后文和下節）。受到威脅的社區重新復活其秘密社會的一個例子是1927—1928年出現在鄰近鎮江（江蘇）的四個縣的小刀會。小刀會的成員都是從江北來的移民。同時本地人組織了一個敵對的社會：大刀會。1928年9月，小刀會2000名農民會員在丹徒縣殘殺了200人，并燒毀了六個村，他們被認為因建立了大刀會的地方分部而有罪過。[[65]](#_65_Lu_Xi_An__Bi_Ang_Ke____Mi_Mi)

小刀會與大刀會之間的敵對把每個村一分為二，而廣東東部的紅旗會與烏旗會卻體現真正的村際聯盟，這種聯盟是在19世紀當新的集鎮建立時形成的。在兩個集市之間的無人地帶建立起來的新村落，和處于集市邊緣的弱小氏族——他們尋求逃避牢固地盤踞市鎮的氏族的控制——傾向于同他們強大鄰居所屬組織的對手結盟：如果最近的市鎮被紅旗會控制，就與烏旗會結盟，反之亦然。于是，到19世紀末，海豐和陸豐兩縣已被敵對組織的真正的（紅、黑）棋盤所覆蓋，它們極化成兩大對抗陣營。這些組織有點像布列克的圓頭會和長頭會，在20世紀20年代依然非常活躍。[[66]](#_66_Luo_Bo_Te__B_Ma_Ke_Si____Hai)

這樣廣東東部的紅旗會和烏旗會比江南受威脅社區重建的小刀會以更大的規模組織起來，并具有更大的潛在破壞性。但是規模的不同不應掩蓋這些不同的組織所參與的縱向沖突的共同性。盡管小刀會與大刀會之間的分界線分裂了每個村莊，它卻沒有把富裕家庭與貧困家庭分開。兩個秘密社會間的對立所表征的真正分立，是在當地人與外來人（少數與北方結盟）和當地出生但尚未同化的新近到達家庭的后代之間的分立；這一伙外來人經過一、兩代后仍未被同化。[[67]](#_67_Ruo_Gan_Yi_Min_Que_Shi_Shi_W)同樣，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廣東東部特有的地區性沖突也沒有把富有的地主與他們的佃戶或其他少地的農民分隔開來，而是使敵對的社區對立，每一社區都有自己慣常的貧富剖面。紅旗會或烏旗會的領導人通常是一個富人，他能用他的財富和影響去賄賂或恫嚇官員，并保護他的追隨者們抗稅和反抗敵對的旗會。實際上，正是這種保護保證了農民對其所屬旗會的忠誠——由于敵對旗會的活動助長了不安全，這種保護在這里甚至比中國其他農村更為必要。

佃戶與地主間的沖突可以用正統的說法稱之為社會性沖突，而縱向沖突只表明地方上的狹隘性：敵手不是富人，而是“其他的人”。有時，外人是來自其他地方的勞工（也是農民）；在這種情況下，競爭不是為了土地和水，而是為了就業。1921年，中國國際救災委員會在建造北京至天津的公路時（為把糧食運到需糧的地方），從山東招募了2800名工人，這就出了麻煩。在開工的那天早上，河北的農民在流氓的協助下，襲擊了這些外來人，并將他們趕走，接著幾百名當地人要求取代那些被他們驅散的人。[[68]](#_68_Bei_Ke____Yu_Zhong_Guo_De_Ji)在19世紀早期的法國，工匠和工人行會常煽動地方性和專業性的對抗。這樣的對抗阻礙了階級覺悟的提高，并且破壞了現代社會運動的開端。一個世紀以后紅旗會與烏旗會，小刀會與大刀會等等之間的斗爭，在某種程度上，是法國加伏特人與德沃朗特人之間的對抗的（中國式的農村的）翻版。

復雜的運動：長樂的例子 1931年11月在長樂（在福建，是福州南面的一個縣）爆發的騷亂，從一開始就是雙重性的抵抗：既反抗軍隊，又抗稅。1932年1—2月，這場指向政府當局的運動被縱向沖突擴大，從而加速了這場運動的最終崩潰。騷亂的起因是在湖清鄉（長樂縣）征收土地附加稅。征收這一附加稅的目的是資助一支深為村民不滿的海軍分遣隊（他們為了向煙民征稅，強迫村民播種罌粟）執行改進水利的計劃。當湖清村民拒交這一附加稅時，兩個營的海軍被派赴該地，強迫村民交付。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海軍于11月4日到達；5日，農民向他們宣戰。

這場運動不僅復雜，而且也比多數農民風潮和暴動組織得好（這或許足以說明為什么它能持續如此長久）。湖清的村民從1922年開始就被迫在當地民團服役，與其他地方的村民相比，訓練和裝備較好——至少不更差。暴動的領導人林克祖正是湖清鄉民團的指揮官。林聘請了幾個保定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來訓練民團，并且招納了一群土匪，預付了兩個月的餉，以換取他們許諾在前線效力。12月21日晚，湖清的農民已有準備并得到增援，以10∶1的數量優勢進攻了長樂縣衙門。負責守備縣衙的海軍部隊迅速逃竄，丟棄了武器彈藥，也拋棄了縣長。

初步的成功使造反者過于自信。他們搗毀了海軍安裝的兩座泵站，并要求海軍從此離去。林克祖宣布地方自治，并干脆接管了整個長樂縣的政府機構。他掌握了全部稅收以滿足他的軍事開支；保留并征收兩個月前他曾譴責的鴉片稅，并解除了開設鴉片館和賭場的限制。長樂縣其他鄉的居民，原先并不交附加稅，對被迫為與他們無關的斗爭提供資金不滿。此外，被雇用的土匪釋放了刑事犯，并攔路搶劫難民。沖突隨之發生，而在當局派兵增援的關鍵時刻很快又演變為鄉際戰爭。1932年2月，一個敵對的鄉——后山鄉俘獲了林克祖并把他交給當局，遂被處死。28日，海軍進攻湖清，并給來焚毀湖清村莊的后山居民以有力的支援。到3月底恢復平靜時，有40個村被夷為平地，7000多人無處安身。1932年農事季節，在湖清與后山之間有一個寬闊的未耕地帶；但沒有人敢冒險去耕種那些沿敵方領域的土地。

長樂騷動的復雜性和組織是罕見的，但結果卻因一些毫不罕見的弱點而招致失敗，這些弱點是：未能保持對土匪的控制，而他們的幫助起初是很有價值的；為對付當局的反攻（盡管這一反攻來得很遲）而采用征收新稅的辦法不得人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鄰村之間缺乏團結，它們的利益相悖，從而使他們在鎮壓到來時相互對立。[[69]](#_69_Chang_Le_Shi_Jian_Zai_Xia_Li)

初級運動 與復雜運動相比，初級運動指向農村中的少數人（最富有的）。但是，除少數情況外，劫掠者們并不找富人本人，只是要他們的財產，特別是他們的糧食。在發生饑荒時，他們常常只不過去富人家消除饑餓的痛楚。諸如“吃大戶”或“向富民坐吃”的說法，在幾乎涉及每個省的調查和報告中都不時出現，從受養蠶危機影響的浙江和江南，到像安徽和河南這樣較為貧窮的省份莫不如此。

一些極不完整的資料顯示出頻率極高的搶劫事件（“搶米風潮”）的一些概念。一個經濟情報機構記載1934年64起劫案如下：浙江，28起；江蘇，19起；四川，5起；安徽，4起；河南，3起；陜西，3起；廣東，2起。[[70]](#_70___Zhong_Guo_Jin_Dai_Nong_Ye)這些案件約3/4（六十四分之四十七）發生在號稱富省的浙江和江蘇，因為這項調查主要是根據上海和南京報紙所提供的資料。另一份報告提到僅在1934年夏季就發生了26起搶劫（7月1日—9月11日），[[71]](#_71___Zhong_Hua_Ri_Bao____1934Ni)但只提到四個省（浙江，14起；江蘇，5起；安徽，4起；河南，3起），它們都極易為南京的報紙所報道。僅僅鄰近上海的一個縣（浙江嘉興），就是所記載的26起事件中的6起的發生地。一個最后的例子不僅表明了我們所使用的統計數據的非典型性，而且也表明劫案極為頻繁：僅無錫一縣（江蘇），在一個月中（1932年5月11日—6月10日），就記載了25起案件；此外，資料的編者指出：他的資料所依據的當地報紙僅提到實際發生的劫案的十分之二三。[[72]](#_72___Zhong_Guo_Nong_Cun_Jing_Ji)

另一種相對嚴重又不很短暫的事件是流動性搶劫。多達幾百甚至上千的饑民，每人帶一個布袋，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奪取糧食。[[73]](#_73_She_Ji_He_Nan_He_Hu_Nan_De_S)有時他們自己組成窮人的團體：“窮光蛋會”、“饑民團”或“吃大戶”。[[74]](#_74_She_Ji_He_Nan___Hu_Bei___An)

但是，就大部分而言，搶米和鬧風潮是典型的初級運動，范圍和持續時間都有限。春天，在兩次收獲之間的過渡期，幾百或甚至只有幾十人（有時只是一群婦女、老人和孩子），會外出搶劫一個地主、一家商店、一座倉庫或一條舢板，以獲致幾天的口糧。警察或當局干預時，有時把口糧分給他們，好讓他們更快散去。[[75]](#_75_Fa_Guo_Lu_Yi_Shi_Si_Shi_Qi)

偶爾治安力量也會開槍，但這不是通常的方式。原則上只有當饑餓的農民被迫“鋌而走險”（為求生而當土匪）時，才進行鎮壓。[[76]](#_76_Guan_Yu_Si_Chuan_Dong_Bu_Shi)

這些偶然性的搶劫者們盡力使自己與職業性土匪區分開來。有時他們因處于極為困難的境地，竟向縣長請愿，要求允許他們搶劫；或者他們會跪在被他們搶奪的地主面前，乞求原諒他們一時被迫采取的過激行為。許多搶劫者小心地把他們的盜竊限于食品，而有些人切望給地主及其家人留下足夠的食品，使他們不致因此挨餓。[[77]](#_77_Can_Kan_1932Nian_6Yue_Wu_Xi)

### 特征

上面所分析的自發的農民運動表現了三個主要的特征。[[78]](#_78_Wo_Bao_Liu_Wo_Zai_Yi_Qian_De)第一，在農民中，階級意識淡薄，這一弱點可由指向富人的社會運動較少及其傳統性來說明。佃戶們通常單獨對地主采取面對面的行動，而實際上他們在相互競爭時才這樣做。佃戶們可以完全不因小事依靠留在村里的地主，但他們卻因土地而有賴于地主。佃戶之間為獲得或保持一塊使他們的家庭得以生存的土地而進行的競爭，似乎比被剝削者之間的任何團結的感情更能敏銳地被感覺到。拒交地租極少是一個或幾個地主的佃戶們集體決定的結果。較常見的是他們是按需要而采取的個人行動。在地主或政府當局譴責這種拒付地租的情況下，無力交租的說法通常更為準確——佃戶在交租期限逼近時逃跑的許多例子說明無力交租。[[79]](#_79_Qiao_Qi_Ming_Zai_1925Nian_Qi)兩家上海報紙在1922—1931年間所記載的197起涉及佃戶的案件中（見前），7起是佃戶在無力交租的絕望中自殺。[[80]](#_80_Cai_Shu_Bang____Jin_Shi_Nian)在這7個自殺者中有的人就像債務人在債權人的門前自殺那樣，可能為讓無憐憫心的地主或代理人丟失面子的愿望所驅使。但是，說得婉轉些，這種行為事實上仍是對剝削者表示敵意的一種間接方式。

在上流社會的代表中，最普通的目標是官員而不是地主。農民憤怒的自發的取向使人領會到，中華民國的農民意識到政府的壓迫甚于階級剝削。在這一方面，他們可能只是簡單地繼續帝國時代已有的、后又進一步被軍閥們的胡作非為所加強的傳統。[[81]](#_81_Can_Kan_Liu_Guang_Jing____Sh)政府體現了村外的世界，對這個世界村民們有個印象，要撫養而無回報，這并非遠離事實。

自發的農民運動的第二個主要特征是他們的地方主義。由于缺乏階級意識，有一種從屬于某一地方社區的觀念，這種觀念超越了階級的差別。村民們想要保衛的正是這種社會地位上不純的社區，以抵御外來的進攻和威脅。不用多說，農民行動的地方主義已為縱向運動頻繁發生所證實。由于當地人所表現的對鄰人或陌生人的敵意的準一致性，這些活動更像不同的民族之間的戰爭，甚于社會戰爭。正如在一場民族戰爭（相對于內戰）中，當然的敵人不是該社區里的特權成員而是外國人，換言之，是不同社區的成員——或者，甚至是整個那個社區。

即使沒有縱向運動，農民為保護嚴格的地方利益，也會拿起武器。當一個鄉起來反抗軍隊的沉重壓迫時，最迅速的平息辦法是把這些士兵換防到鄰鄉；在那里他們仍能胡作非為，對另一些村民造成損害。同樣是這種不可侵犯的利己主義支配著一個村的態度，在災年它設法儲存了足夠的糧食，但拒絕賣一點給鄰村，哪怕那里的居民將會餓死。[[82]](#_82___Xin_Wu_Xi____1932Nian_6Yue)在1931年長江大水后建立起來的難民營中，農民憤怒地與那些仁慈的人發生爭論，因為后者決定給已經太虛弱而難以存活的人喂食：為什么要浪費寶貴的糧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貧困支配這些態度，也說明了農民騷動的第三個特征，即幾乎不變的自衛性。鋌而走險只是最后的手段。1937年春荒期間，一位官員對一個四川農民變成了土匪而不繼續種地表示驚訝，這個農民告訴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會明白。”確實是這樣，在對他執行死刑后進行尸體解剖時，發現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沒有其他東西。[[83]](#_83_Fan_Chang_Jiang____Ji_E_Xian)另有些人僅限于犯輕微的偷竊，希望被捕并在監獄里得到飯吃。[[84]](#_84_Tong_Shang_Shu__Di_131Ye)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樣的原因，警察來逮捕欠稅的人時，鄰居們懇求警察把他們也帶到監獄里去。[[85]](#_85___Zhong_Guo_Nong_Cun_Jing_Ji)更多的是農民乞求地區官員沒收他們的土地，以解除繳納超過他們財力的稅款的義務（如1931年春湖北羅田縣兩三個村四五十個農民的案件）。[[86]](#_86_Chen_Deng_Yuan____Zhong_Guo)

農民可能對一種新的形勢或一次外來的攻擊作出強有力的反應，但他們從不采取主動。可以這么說，他們任憑對手作主。這些外來的侵犯者在某個時候，或者同時，就是當局（增加稅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收后堅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爺（歉收或其他自然災害），鄰居（縱向運動），土匪——或派去鎮壓土匪的士兵。基本點是農民自己很少為了改善他們的命運，或更有理由，為了結束他們所受的剝削而主動拿起武器。只有當形勢惡化，[[87]](#_87_Zhi_Ti_Liang_Ge_Shi_Li__Qing)或他們受某種新措施威脅時（即使這種措施實際上是一種改革），農民們才會起來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復原先的形勢。

在每一次農民風潮或動亂的根源里，幾乎總有一種被認為是不能容忍的特殊的革新。農民絕不會攻擊現行秩序，盡管他們自己是現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他們會發動武裝起義，只是為了重建現行秩序，為了糾正某些錯誤，或者為了恢復先前的規范——他們很容易將其理想化。與那些參加諸如太平天國那樣大規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組織的“頭子”不同，中華民國的農民和那些組織的一般風潮和動亂（也就是說除共產主義革命以外）的領導人似乎沒有被宏觀的社會洞察力所激勵，也沒有對這一社會的組織基礎產生過疑問。

農民騷動的狹隘性和自衛性是互補的。大多數農民風潮和動亂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地方集團（它的組成往往是龐雜的多，單純的少）和維護其不穩定的存在。這種保衛大體上與保護收成免遭搶劫或保衛自己免遭土匪襲擊并無不同。假使當局常常缺乏效能，為了抵抗土匪，村民們（更確切地說，村里的地主們）被迫建立自衛團，或在面對大股土匪時，建立名副其實的連莊會、連村會。自衛與騷動之間的聯系，從廣東東部的紅旗會和烏旗會的情況（見上文）也能看出，當情況屬于“不安全的動亂”[[88]](#_88_Wo_Cong_Fen_Xi_17Shi_Ji_Fa_G)時——這時對土匪的抵抗領先于（并發展成為）騷亂或者暴動——甚至更為明顯。一般講來，組織暴動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組織自衛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頭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個具有否定意義的結論：

1.組織大多數“農民動亂”的人并不是農民本身。盡管這些運動很不相同，但大多數都是由村、鄉甚至是區的頭面人物鼓動并組織的。嚴格說來，一般所指的農民騷動應該稱為農村騷動：它們往往涉及整個農村社區，而不只是農民。被卷入的農民構成了“軍隊”的大多數，換句話說，群眾被組織者操縱，至于組織者自己，他們很少親自種田。同1789年的法國第四等級一樣，參與騷亂的中華民國的農民們，只是跟在一個不同的階級后面被拖著走的。

2.無論是“農民”騷動還是“農村”騷動，它們都不構成一場運動。我們只能說，那是一系列沒有配合、大多組織得很差和沒有什么準備的地方性行為，是憤怒的突然爆發，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過的措詞，是“狂怒”的例證。[[89]](#_89_Luo_Lan__Mu_Ni_Ye____Nong_Mi)這些騷動對當局并不構成多大的威脅。20世紀的中國農民的行動和武器與他們17世紀的先輩們相近，而中央政府卻掌握20世紀的武器、運輸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說造反的農民與治安力量無法相比。所以，如此迅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風潮不能與“農民運動”等量齊觀。風潮之多和反復發生表明了既廣泛又持久的不滿，不過那往往是假定的，幾乎沒有資料可以證實。正是這種不滿情緒，共產黨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予以表達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們提出的關于這些農民斗爭的目標的分類，對那些參加斗爭的人們來說，可能沒有多大意義。無論農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稅吏斗爭，他們覺得是在自衛，抵抗攻擊者，抵抗像寄生蟲一樣侵害鄉村的社會機體的外來分子。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政府往往象征這樣的寄生蟲。

當共產黨人著手把農民的某種革命潛力引向革命的時候，如果中國農民確實蘊藏著這種潛力，那么這種潛力幾乎完全在于鄉村居民疏遠政府（以及由城鎮統治的整個社會）這一事實。這種潛力在于一種混亂但根深蒂固的、頑強的感情，對農民來說政府是外人，政府所體現的，確切地說，是剝削和壓迫鄉村這個封閉世界的外部世界。[[90]](#_90_Qiao_Er__S_Mi_Ge_Dai_Er_Yi_Y)共產黨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來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難的過程中，完成了把這種潛力轉變為行動的杰作（只是許多可能性中的一種）。

農民們的行為方式（如果聽任他們自行其是，他們本會繼續按這種方式行事），同共產黨最終要使他們達到的行為方式之間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講到的困難與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換另一種說法，是地方自衛與革命行動之間的差距，后者含有一個全面的抱負和一個進攻性的戰略。說實在的，共產黨人無需讓他們的農民軍隊超越整個差距。進攻性的戰略一直是他們唯一關心的。他們利用農民人才締造了革命大軍：不多，也不少；但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 農民與共產黨人：不相稱的聯盟

“完全是空想”，這是一位學者對毛于1926—1927年冬在家鄉進行的一次考察后所寫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評論。[[91]](#_91_Xiao_Luo_Yi__Huo_Fu_Hai_Yin)正當中國共產黨準備進行他們的農村變革運動時，毛根據愿望的想法使他傾向于北伐軍抵達湖南引起騷動的能動的觀點。他對現實的描述是與他那種創造者能用農民人才造就干練革命領袖的想象分不開的。事實上1926—1927年湖南農民的行動（或者，更為確切地說，少數農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們傳統的主人所操縱——的各種分散活動）既沒有在事后證實毛在《報告》中所說的那種熱情，也沒有證實毛事先所抱的那種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畢業生們在北伐軍到達前發動群眾并不成功。相反，農民協會的數量、成員和活動的增加，是軍事力量的進展和勝利的直接結果。盡管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編纂學所充分贊頌，農民實際參加戰斗的罕見事例，除少數例外，完全沒有戰略上的重要性：“這些戰斗只是主力戰的外圍戰。”[[92]](#_92_Xiao_An_Ge_Si__W_Mai_Ke_Tang)隨后，1927年秋收暴動的可悲的失敗證實了農民武裝沒有準備的狀況和缺乏戰斗力。[[93]](#_93_Luo_Yi__Huo_Fu_Hai_Yin_Ci)1928年3月，20多萬造反的農民未能攻下湖南東部的平江縣城。[[94]](#_94___Xing_Huo_Liao_Yuan____Di_1)再后一些（1928年8月），在紅四軍第二十九團于一次戰斗中完全潰散后，毛在井岡山遭受了一次失敗。組成這個團的農民思念家鄉，決定返回他們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95]](#_95_Hu_Ji_Xi__Yin_____Hong_Jun_Y)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農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們極少能信賴農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這些士兵，20年后，他們征服了整個中國。

### 彭湃與海陸豐農民（1922—192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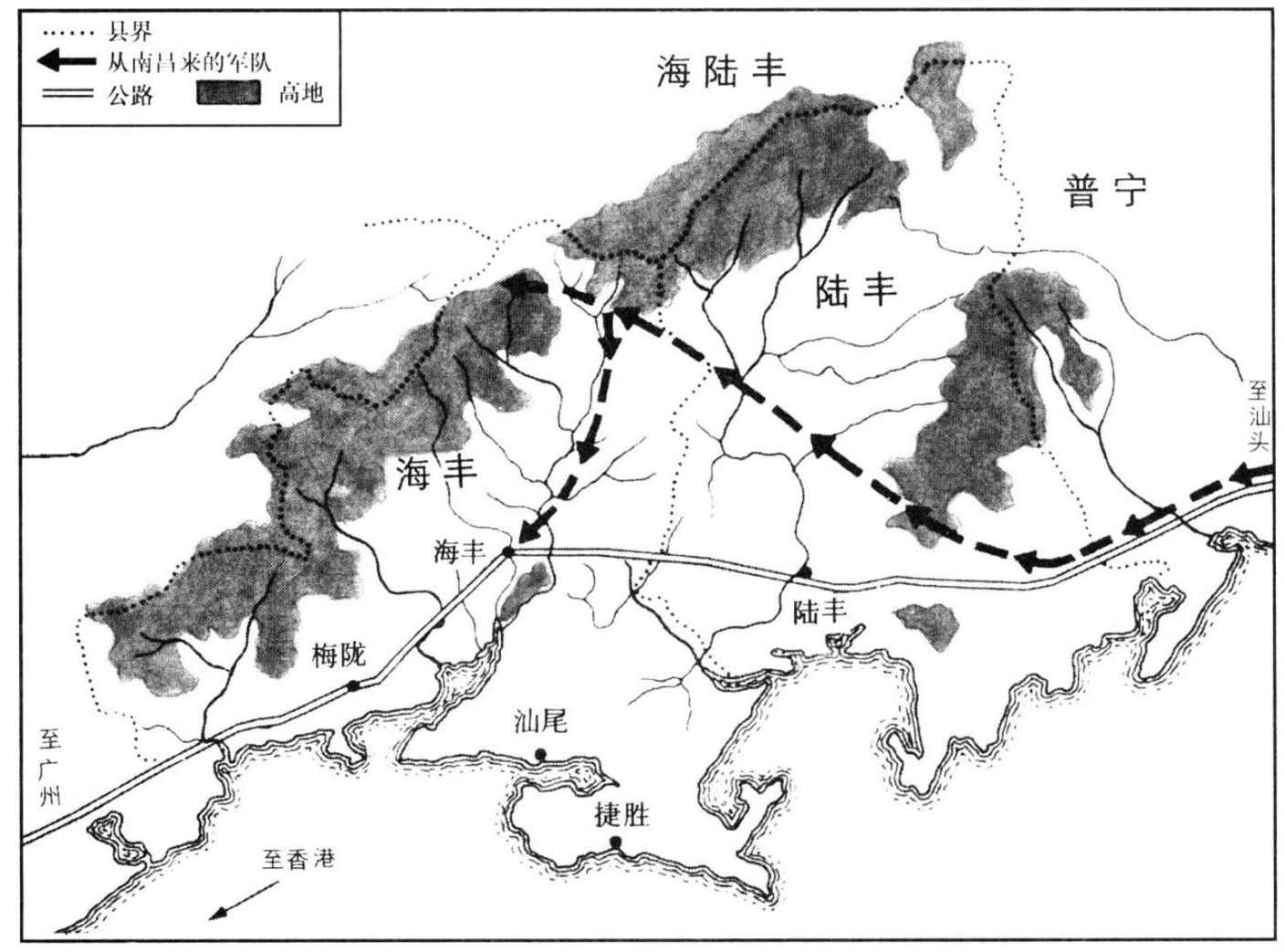
職業革命家與村民在廣東東部兩個縣初次相遇，是由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先驅彭湃領導的。[[96]](#_96_Peng_Pai_Zai_Fa_Dong_Hai_Fen)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矚目的。他早在1922年創建的農民協會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幾年以后，他在海豐和陸豐（合在一起稱海陸豐）這兩個人口稠密的縣保持了蘇維埃統治達數月之久（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這時毛澤東仍在嘗試在人口稀少的井岡山立住腳跟。但是共產主義者發動海陸豐農民所面臨的困難預示著他們以后還將繼續碰到這些困難。而他們所采取的方法預示著以后從江西到陜北他們將繼續完善這些方法。為了把海陸豐的嘗試與隨后20年的“農民”革命聯系起來，我們現在總結一下這第一次的實驗，它有10個顯著的（中國式的）特點：

1.最初的懷疑。

彭湃最初的嘗試是令人沮喪的，它顯示出把村民與革命家隔開的一條鴻溝——農民們十分正確地把他看成上層社會的一員。[[97]](#_97_Peng_Pai____Hai_Feng_Nong_Mi)家家戶戶當著他的面關上了門，狗對著這個闖入者狂吠，而村民們驚恐地離去。他們懷疑這個從城里來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來收稅的，或是來討債的。當彭湃回答，現在是地主向受剝削的佃戶還債的時候了，開始沒有人相信（“不欠別人什么已經夠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著向他提問的人表現出驚恐，匆匆辯解了一下就離去了。村民們根據長期的經驗，對這個陌生人最初的反應是害怕和懷疑。這個陌生人正在力勸農民們把自己從鎖鏈中解放出來，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運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來誰應種田，誰來收租！如果彭建議的事不可能實現，他準是瘋了，事實上他的家庭散布的謠言就是這么說的，而許多農民也相信。

2.適應和實際利益。

彭很快適應了這種形勢。[[98]](#_98_Tong_Shang_Shu__Di_56__67Ye)在開始對農民演講之前他換了裝束和說話方式，通過一個村民介紹，一直等到傍晚（這時田里工作已結束），他還注意不冒犯他們的神靈。他像一個變戲法的人和魔術師那樣去誘導他們，使他們開心，教孩子們唱他自己譜寫的歌，讓他們聽他帶去的留聲機和演木偶戲。[[99]](#_99_Hao_Bi_Jia_Fu_Lie_Er__Jia_Xi)成年人也開始喜歡這些娛樂了，與此同時，也服下了彭湃為他們準備的政治藥劑。在早期建立農民協會是困難的。但一旦起步，成員們便紛至沓來，從協會提供的服務中得到好處：免費醫療，實際指導，以及進行仲裁以調解他們的糾紛。由協會管理的藥房和小診所很快受到歡迎，以至必須檢驗會員證——它們從一個人手里傳到另一個人手里。農民們學會了寫農具和農產品的名稱，學會了檢查簡單的計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糧商們計算，無從監督。協會不滿足于單純地調解婚姻、債務和土地所有權方面的糾紛，也對它的成員提供人身保護，就像秘密會社那樣。一個童養媳——按照習慣住在她未來的公公家，后者是農會會員——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別的會員成功地脅迫多名為淹死者報仇的尋釁者（女孩的家屬）折回，從而增強了協會的權威。



地圖7 海陸豐地區

對第二段的總結：這位革命家使自己適應農民社會，有時要以讓步為代價，如對他們的迷信妥協，給一群受惠者（協會的會員們）某些適合他們日常需要和急需的實際利益，以贏得支持者參加他的組織——且不說他的事業。發動大多數被爭取過去的人參加的實際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給兩個最初追隨者的三塊銀元。這兩個人的父母看到他們不在地里干活，卻跟著一個說漂亮話的人跑很是生氣，于是他們就在父母耳邊把這三塊銀元敲得丁當作響。

3.激起階級斗爭。

看到這銀元使最早的一位戰士的母親怒氣平息，甚至高興起來。但事實上這個戰士和少數別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隨他的，不是出于個人的利益。他們團結在彭湃周圍，要保衛和增進的是他們的階級利益（不僅是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對于彭湃來說，他認識到這一點，并立刻稱這些由于社會原因第一批改變信仰的人為“同志”。至于別的群眾，彭湃努力以他們自己不能自發地想到的目標來動員他們，從而吸引農民投入名副其實的社會革命。

農民協會首先向頭面人物對商務的控制挑戰。在上面提到的實際利益方面，農會在公共集市上設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們在稱收獲物時進行欺騙。協會還幫助一個拒絕交納增租的佃戶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判無罪。另有五個農民曾聲稱與這個佃戶一致行動，也獲得釋放。這種團結是階級覺悟的第一個里程碑，受到農會的積極鼓勵——若不說是由農會激發的。農會終于得以禁止其成員租種被地主奪佃的任何土地。這一紀律性的措施扭轉了佃戶之間為租種一塊土地相互競爭的通常情況。

這樣的團結首先是執行進攻戰略的一種手段，目的在于把農民卷入新的沖突。為了這一目的，階級關系的實際狀態被故意抹黑。協會散布一種過分簡單的圖表，夸大地主對農民的剝削。[[100]](#_100_Peng_Pai____Hai_Feng_Nong_M)最微小的沖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意加劇，以導致少數剝削者與被剝削的農民群眾的對抗。農民的貧困和痛苦用啟示錄式的詞匯加以描繪。1926年7月一場臺風造成的破壞被夸大，要求減少地租70%。大多數佃農本可滿足于接受傳統的做法：減租與所受損失和減產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樣準備協商，但是控制農會的極少數知識分子和農民故意制造對抗。[[101]](#_101_Zai_Nong_Hui_Nei_De_Ruo_Gan)地主中的一個強硬分子也斷定農民協會的過分要求已無法容忍。彭湃可以慶賀自己已經把海豐縣的整個民眾分成兩個階級了：一邊是農民，另一邊是地主。

農民協會失敗后，由1925年2月和10月的兩次東征引起的戰爭風云維持著緊張狀態，并最后把這兩個階級轉變成兩個敵對的陣營。每一次反復都要處決一些人，有時是必然會遭報復的屠殺。在1927這一年，4月和9月的兩次起義為11月建立蘇維埃政府鋪平了道路。很清楚，在這個政府的統治下——實際上是專政——農民對共產主義事業的信仰的問題，已不再用同樣的措詞。即使我們考慮到有強迫的成分，考慮到有超過5萬的居民從這兩個縣逃到香港、汕頭和廣州（并非全是有錢人，遠非如此），也考慮到有許多農民確實主要出于狹隘的原因參加了叛亂，[[102]](#_102_He_1928Nian_1Yue_Chu_Lu_Fen)事實依然是，大量的農民支持這個取消了他們的債務，廢除了他們的地租的政權（雖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從積極到被動的同路）。即使他們并非有意識地尋求革命，他們發現自己登上了革命之舟，并且與其說他們是集體化的支持者，還不如說他們是恢復舊秩序的支持者，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這一變革中獲益匪淺，而害怕地主統治復辟。

4.由恐怖而極化。

還有更緊迫的理由害怕復辟：許多人可能已沒有逃避報復的希望，因為他們曾卷入搶劫、放火和殺人，總之，他們實施了“紅色恐怖”。[[103]](#_103_Guan_Yu_Hai_Lu_Feng_De_Kong)蘇維埃當局曾有計劃地采取恐怖活動——像往常一樣，著眼于動員農民。農民既需要鼓勵，從心理上擺脫屈從的枷鎖（通過變得確信舊秩序已經被摧毀，決不可能恢復），也需要使之參加破壞和屠殺的行動，使他們不可能后退或開小差。總之，這個計劃是從海陸豐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見的人中，出現了公開的、甚至戲劇性的處決反革命的場面：“這些罪犯該不該殺？”甚至被邀積極參加屠殺。從而也有了組織“人頭會”的習慣，它預示著（通常這是從相反的方向）詩人普雷韋爾所描繪的“人頭宴”。[[104]](#_104_Ya_Ke__Pu_Lei_Wei_Er____Tan)但是在海豐沒有宴會；只是把新近砍下的頭穿在講壇上方的一根繩上，為演說者激烈的言詞提供一個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過，在海陸豐實際上也有宴會。有時（例如在捷勝）甚至出現拒絕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為“假兄弟”。但首創這種人肉宴的是農民自己，而不是蘇維埃當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義（不可能有憐憫和饒恕的問題，因為那意味著對革命者的冷漠和殘忍）使人聯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105]](#_105_Peng_Pai___Jie_Ji_Zheng_Yi)但這與農民恐怖主義的虐待狂式的歡床、豐富和巧妙發揮無關。公開行刑嗎？公開行刑比示眾好；是許多農民參加，不應錯過的節日，由于高喊“殺，殺，殺”而嗓音嘶啞。至于（更大量的）不公開示眾的處決，到兩星期過了以后，蘇維埃政府也無需給行刑者以報酬：赤衛隊員（大多是青年農民）非常樂于執行這種令人羨慕的光榮任務。對一個反革命來說，沒有受拷問就被殺死是一種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親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殺死的人是幸運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塊，另一些人（例如捷勝地區的一個地方官）被關在一個板箱里，被慢條斯理地鋸成一塊塊，而行刑者們還不時停下來喝茶休息，以延長其痛苦。折磨這些受害者的農民們感到是在報仇。那個捷勝的官員曾處決100多位農民，并在處決捷勝農會主席時強迫他的父親和兄弟親臨刑場。一不做二不休，有時親兄弟被迫處死親兄弟，偶爾還要讓親兄弟和兒子吃一塊父親的肉，讓還沒有死的父親看著。

5.地方主義的動機。

復仇者們就這樣對官員和地主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共產主義同志們煽起的行動不可否認成功地激起了階級仇恨。但是，正如1927年至1928年冬在海陸豐所表現的那樣，這種復仇需要被壓迫階級報復的氣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莊血仇的氣味。它使曾挑起紅旗會和烏旗會之間沖突的敵對和報復的傳統永遠存在下去。精心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復這些沖突的記錄所一再證明的做法。[[106]](#_106_Guan_Yu_Qi_Pai___Shi_Zu_He)這樣的記錄決沒有被“現代的”農民運動所打斷；恰恰相反。宗族和社區的領導人通過恢復他們傳統的組織，作為對共產主義者到來的反應。他們甚至利用這個機會來和對手或可恨的鄰居算舊賬。但是這些自覺的反應和蓄意的考慮，與自發的對共產主義斗爭的評價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他們所熟悉的唯一沖突（或者說最熟悉的沖突之一）——紅旗會和烏旗會之間的地方戰爭——的一段新的插曲。1928年1月當革命軍打著它的紅旗從海豐出發，經過陸豐的一些村莊時，受到包括地主在內的所有人的熱情歡迎。這些村莊是屬于紅旗會的，他們款待自己的伙伴，確信這是來幫助他們反對依靠烏旗會的敵對的村莊的。

在這種環境下社會斗爭的情況怎樣呢？的確，有時地方上的沖突和相鄰社區間長期的對立實際上掩蓋了社會的對抗。讓我們考慮一下1926年1月發生在廣東東部普寧的戰斗，它使一邊為強大的方氏家族與另一邊為鄰村農民相互對立。兩個陣營的地方主義動機都是強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縣里這個主要市鎮2萬居民中的半數，他們控制了全縣大部分經濟活動。[[107]](#_107_Pu_Ning_Xian_Shi_Tong_Hai_F)當地方主義使城鎮與農村對立時（上面提到的捷勝的情況也是這樣），它自然帶有一種社會性色彩。當整個村莊，不論貧富反對其他村莊時，上述說法就是不真實的。堅持當地的地方主義實際上從傳統上由烏旗會控制的陸豐縣某些村莊排除了共產主義農民運動，只能被農民協會和當地積極分子的地方主義所強化，甚至當他們實際上在發泄私憤時，還聲稱他們是以蘇維埃政權的名義在行動。兩個強大的宗族（侯姓在捷勝，林姓在梅隴）特別為他們所剝削和虐待的農民所痛恨。對他們的報仇沒有什么可挑選的：不管他或她的社會地位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這個地方，或姓林，在另一個地方，必然會被殺害。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國基督徒在1927年圣誕節被害，也是地方主義的犧牲品，或者——換一種說法——是排斥“異類”的犧牲品，宛如麻風病人逃跑時會像兔子一樣被射殺，或者他們不想逃跑時就在麻風院里被活活燒死。

總的來看，農民們的殘忍行為有利于革命知識分子的計劃，而不是打亂他們的計劃。另一方面，后者極有理由擔心地方性的團結或敵對會產生不利于動員的作用。因此，彭湃選擇一面紅黑兩色的旗作為海豐的第一個農會的標志，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它象征農會所進行的社會斗爭超越紅旗會與烏旗會間“縱向沖突”的觀念。后來，在蘇維埃政權時期，無論是誰，只要保護一個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處死刑。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員財產的農民家庭；這些富人很可能在幾周前就受到他們從農會內部加以的攻擊。

6.農民的崇拜。

依共產黨人的看法，當地的地方主義和宗族權力是封建主義的殘余，與農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習慣無異。如果說在開始發動農民的英雄時代，彭湃曾小心地遷就鄉村的神靈，那么到了蘇維埃專政已建立時，這樣的謹慎已不再適宜了。但是，從勝利的歡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項措施，十分自然地會引出對“封建”思想和行為的攻擊，現在還很難對彭湃個人對這種攻擊負多少責任作出評價。城鎮的名稱被改變了（這些名稱大多數都變成“赤”或“紅”）；街道的名稱也是如此（這時海豐有以馬克思、列寧、羅莎·盧森堡，或卡爾·李卜克內西命名的街）；孔廟被更名為紅宮（而且海豐也以紅場、紅橋和紅旗自豪）。這只是從這兒向偶像進攻的一小步。這是赤衛隊、先鋒隊和共青團的支隊很快對偶像采取的一步，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40年發動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毀了廟堂里的神像，燒毀了宗教建筑物，并向依賴農民的輕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師或風水先生進攻。[[108]](#_108_Guan_Yu_Nong_Min_De_Chuan_T)赤衛隊員們自己是青年農民，但是他們的長輩卻拼命反對破壞已用紅漆小心涂過的——以表示對蘇維埃有好感——神像。他們把地主家的神像涂成白色，以表明這些是應該受到懲罰和破壞的，但是他們卻努力保護由大多數道教和佛教寺廟所代表的民間宗教的中心。他們甚至崇拜一個新神，對這個新神幾乎像對佛一樣地崇拜和順從，這個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選來建立新秩序的，一旦他成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對這些農民來說，參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追隨一個領袖（正如他們過去在彭之前追隨陳炯明一樣）；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們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們的神圣的領袖的事業。正當國民黨的軍隊、民團和警察即將粉碎海豐蘇維埃建立（在1927年9月25日）前的第二次暴動的關鍵時刻，成群結隊的農民帶著供品來到廟里，祈求增援部隊盡快到達；的確，這可能代表了他們最后的希望，即葉挺和賀龍的部隊。這是南昌起義的紅軍殘部，在經歷一次小型長征（另一英雄史詩的另一預示）后，已經抵達汕頭。

7.依賴軍事力量。

在第二次暴動被粉碎整整三個星期后，南昌起義的逃亡者的一部終于到達海陸豐山區，他們必須改變態度：依靠這些由于一連串的失敗，也由于未能獲得來自農民的合作而疲憊和沮喪的逃亡者，肯定不可能發動一次新的攻勢，而據這些農民的領導人說，他們已準備武裝起義。[[109]](#_109_Wei_Mu_Ting____Zhan_Bai_De)然而，不到兩周以后，海豐再次落入共產黨人之手（1927年11月1日），并維持了四個月之久。這次輕而易舉地占領不像早先幾次那樣短暫，主要是由于兩個將軍（李濟琛和張發奎）之間的對抗，而他們本可以很輕易地防止或粉碎這次暴動。對于這兩個對抗者而言，甚至無需聯合用兵，就能趕跑紅軍：他們兩人不論哪一方，只要對遠離廣州的海豐和陸豐給予對廣東中心地區同樣的戰略重視就足夠了。簡言之，他們雙方把跟蘇維埃算賬推遲到不再為更嚴重的事情纏身時再說。當這一時刻來到時，蘇維埃就像用紙牌搭成的房子一樣坍塌了（1928年2月29日）。[[110]](#_110_Jia_Er_Wei_Ya_Di____Peng_Pa)

蘇維埃的誕生、生存和覆滅于是說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圍的權力（或軍事力量）的人之間的關系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一般地說，共產黨的農民運動能夠扎下根來并存在下去，不是由于有權勢的人之間的對抗（1927—1928年在廣東，除李濟琛和張發奎之間的斗爭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對抗），就是由于他們之間所采用的復雜的策略（如1924年以前，鼓勵陳炯明長期容忍海豐農會活動的策略）。還有一種補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區或省一級掌握較大權力的人斷定威脅已過于嚴重而無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他們的對手，[[111]](#_111_1924Nian_3Yue__Chen_Jiong_M)那么力量如此懸殊的事實事先就決定了革命者的命運。

在1924年3月官方解散海豐農會至1927年11月建立蘇維埃之間的這段時期，彭湃在廣東省其他地方的活動不僅證實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最初的“農民”事業的不穩定性，以及地區或地方政治形勢的決定作用，它們還說明了所謂的“依賴性政治”是怎么回事，它就是許多“農民”事業所固有的缺乏自主性，這些事業只是由于省當局的庇護，才得以一再免于失敗。如1924年廣寧（位于該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為同盟者甚或是保護者出現的正是世俗的當局。這次出來說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廣州掌權的國民黨的農民部書記。正是他說服了省長把敵視農民運動的廣寧縣長撤職，這甚至發生在后一任省長之前，更為合作的后一任省長廖仲愷派去一支突擊隊，幫助廣寧的革命新手們的農民事業。[[112]](#_112_Huo_Fu_Hai_Yin_Ci____Da_Lan)

對外部支持的依賴性自然使農民運動極為脆弱；在廣東的革命軍啟程北伐后，廣寧的農民運動并沒有維持多久。

8.非農民的領導層。

廣寧農民運動的倡導者是一些在廣州接受過中等教育的當地人；[[113]](#_113_Huo_Fu_Hai_Yin_Ci____Da_Lan)簡言之，是“留學生”彭湃——他屬于海豐巨富家族之一——的樸實的復制品。這些從該省東部到西部發動和組織廣東農民運動（這一官方標記在大多數情況下掩蓋了共產黨的控制）的人，無論其智能、地位和社會等級如何，都共有社會精英的身份，這就把他們與農民分開了。這固然會使他們與農民的初次接觸較為微妙，卻大大地方便了他們滲透到當地政界中去。

毋庸置疑，海豐的地主們本會立即鎮壓一次純粹的農民運動，但是他們在回擊農會在彭湃的指導下越來越放肆的積極活動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長一段時間，無疑，這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不能依靠陳炯明所體現的地方當權者的堅定的支持，而且顯而易見，也因為彭湃和他的同伴們都出身于當地最好的家庭并且都曾受過教育。人們不能把彭湃這位海豐縣的前教育局長（年僅26歲！）當作粗俗的農民領袖來對待。如果彭不是上層社會的一員的話，這位海豐農會領導人與陳炯明之間的關系簡直就不可思議，彭曾在陳的司令部拜訪過他，為農會的事業辯護。誠然，陳本人曾是一個革命者（從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開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傾向，而不是一般的軍閥。但是，在那些地方，即使地方當權者出身于更為傳統的官宦階層，而革命者來自比彭低的知識階層，革命者依然會從有影響的家庭之間的關系網中（從這些家庭的受過教育的后代之間的友誼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處。這些家庭的大門對他們是打開的，而對農民卻是關閉的，并且這些家庭還保障他們，至少在起初，相對地不受損害。

有時，城市化的知識分子從外部操縱的已作準備的農民運動在學校假日或學生返鄉時發動。[[114]](#_114_Guan_Yu_Guang_Dong__Jian_Ka)然而，無論這些知識分子對農民群眾的贊助是多么真誠和深切，它幾乎總是尾隨并源出于一種更為普遍的反抗。1921年秋，由彭湃和海豐激進青年知識分子創辦的刊物在名稱上（《新海豐》）或內容上都與他們在其他地方的同仁們所寫的文章或提出的主張，沒有顯著差別。只是他們寫的可能更熱烈，他們的調門更激動，以及他們的緊迫感和對折中措施的反對更為絕對而已。但是，《新海豐》衍生于《新青年》及其與五四運動激進的后繼者同出一源，卻是不容否認的。[[115]](#_115_Jia_Er_Wei_Ya_Di____Peng_Pa)彭湃和他的朋友們的革命傾向，與和他們同輩的其他革命者一樣，都是由同一源泉（民族的和意識形態的，而不是社會的，更不是農民的）激勵起來的。后者也和彭湃他們一樣，幾乎全出身于最優越的社會階級。中國的革命以一種非常典型的方式開始于使處于危機狀況的上層社會的成員之間（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是這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對立。這些背叛自己階級的家庭后嗣，在接受動員農民群眾的戰略以前，已脫離了自己的家庭。

9.組織。

實際上，動員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這一事實直截了當地為羅綺園所承認。羅與彭湃在一起，是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也是彭湃的主要廣東伙伴之一。羅非常直率地說到“利用他們[指農民]作為基本力量”，并且同樣直率地說，給他們一些好處，讓他們團結起來。[[116]](#_116_Jie_La_Er_De__W_Bo_Ke_Li)在20年代，在海豐和廣東其他地方建立起一種聯盟，這是共產主義農民運動最出色的成果，但是，這是一個不明確和不平等的聯盟，農民之所以參加聯盟是著眼于得到經濟性質的具體要求的滿足，而不清楚他們的領路人要把他們領到多遠。

這些來自農民外部的領路人給農民帶來了有效的組織，沒有它，農民運動注定會失敗。但是，憑借的正是這種組織，這些領路人才得以保證運動的方向。應予強調的是：共產黨人所提供的組織給了農民運動它一直所缺乏的有效性，但是這種有效性也削弱了它的獨立性。于是農民運動從屬于革命運動（1927年以前是國民黨，以后是共產黨）的利益和總戰略。

在海陸豐，彭湃像一個獨裁者一樣集各種權力于一身。但是，他是以協調其他所有機構的活動的一個組織的書記的資格，正式行使這些權力，這個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東江地區（是廣東的一部分，包括海豐和陸豐）特委。農民們無法把他們的政府（“海豐蘇維埃人民政府”，只是在蘇維埃存在的最后一個月，即1928年2月才正式成立）與已以“東特”委的簡稱滲透到他們中小社會的真正政權分清。在蘇維埃專政的幾個月中，海豐的農民（和陸豐的少部分農民）成群地集體加入中國共產黨。據說他們最終曾占當地黨員的85%。但是，這85%的決定權比2.5%的知識分子黨員的決定權少，就這些知識分子黨員而言，他們則受“東特”指示嚴格控制。[[117]](#_117_Jia_Er_Wei_Ya_Di____Peng_Pa)

10.地方的素質。

這最后一項是疑問多于斷言，但卻不可回避，因為它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海陸豐地區（或東江地區甚至廣東全省）是否具有某種特殊的性質，使這些地區傾向于起它們在共產主義農民運動史上曾起過的先鋒作用？或者說，使海豐贏得“小莫斯科”聲譽的大膽嘗試是出自偶然的歷史形勢嗎？它也能在中國的任何地方發生嗎？

很難把瀕海的海豐縣說成是中國內地的代表，但在許多方面，它真實地反映了內地，是傳統中國的一個縮影。海豐和它的汕尾港，比內地省份一般的縣更易于接受外界的影響，鄰近香港（這里許多來自有“小莫斯科”之稱的海豐的逃亡者出身于該縣歷史上偶然的傳教士居留地）增加了與外國人接觸的機會。這同樣適用于廣東全省，該省比中國的其他地方更外向。縱觀第一次全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1925年）前的一個世紀，歷史就已經突出并加強了該省與其他各省絕不相同的創造力。廣東的沿海位置與其特殊的歷史傳統的結合，可能有利于在這個地區發展革命的農民運動，同盟會也曾發現這是一個進行顛覆活動的優越地帶。

因此，廣東注定要開創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素質”強烈地取決于它的聯系（因而也是傳統）；它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當地人孫逸仙的革命繼承人，孫逸仙出生的南部地區比其他地方更能強烈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感染力和影響力。海豐第一批農民協會本身與在廣州的國民黨的灌輸無關，但是由于沒有任何革命遺產，總能讓人指出當地人的尚武傳統——由于持續不斷的世仇和私斗而保持了活力。海豐的居民有著好戰的名聲；他們比大多數其他中國人更重視搏斗中的勇敢，并且多年來他們一直隨意支配一種爭斗的工具：交錯于整個地區的紅旗會和烏旗會的準軍事組織。經常推動他們進攻鄰居的強烈的地方主義偶爾也會使他們起來反對當局及其外來的代理人；在海豐，文化大革命表現為當地居民與外來戶之間的斗爭，并且特別殘酷。[[118]](#_118_Jia_Er_Wei_Ya_Di____Peng_Pa)

簡言之，記錄下有利于彭湃事業的當地居民的經歷和傾向是很容易的；同樣，指出西部的山脈屏障把海豐與該省其他地方隔開，并給該縣一種戰略優勢（并不單是進一步加強了地方主義），也很容易。強調客家和福佬（原籍福建的人）的特殊風俗和習性等等，也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所有這一切都只在一點上具有說服力。從戰略的眼光看也同樣容易反駁，海豐的山無論如何并沒有提供能與井岡山或更北方的山脈——它在中日戰爭期間為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提供了避難所——相比的藏身所。地方主義和向外看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用語：如果外來的影響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海豐，那么它們肯定也削弱了地方主義。首先，我們提出的各點都沒有影響彭湃試圖喚起的群眾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

那樣的狀況是很容易引起憤怒和動亂的。但它們與中國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狀況并沒有根本不同。它們確實也有不同之處（例如，家庭擁有的土地分散較廣，地租稍低），但窮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非典型因素（如兩縣居民中漁民和鹽民比例高）可能有利于動員群眾，但沒有特別的證據可以證實。更重要的事實是：用全部時間耕種的人中，擁有自耕土地的人所占的比例比中國其他地方低（雖然并不比廣東其他地方或東江地區其他地方低）。在1923年，海豐大約有20%自耕農，而有部分土地者占25%，佃農占55%。私人擁有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于也不低于中國其他地區；土地短缺與人口最密集的中國東部和東南部一樣嚴重。總而言之，在20年代早期，海陸豐農民和漁民的生活條件與同一時期這個國家其他地方大多數農民相似，差別并不明顯。[[119]](#_119_Jin_Guan_Fei_Er_Nan_Duo__Ji)說得更扼要些，這個國家東南沿海的這兩個縣的特征不能解釋為什么現代農民運動產生在這里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彭湃1922年以后的行動（似乎與列寧導致十月革命勝利的行動，甚或更引人興趣的是，1917年初列寧藏在一節密閉的火車車廂里從瑞士回國）一樣，是決定性的因素。

然而，列寧不會不把彭湃的創造性成就判斷為具有共產主義“幼稚病”的特征。用更為通俗的話說，彭被批評為“冒險主義”，特別是關于他為海陸豐蘇維埃制定的方針。這一方針是與中共的官方路線完全一致的（這時由瞿秋白統治），而這條路線又由1927年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重新確認，并于次月由廣州公社說明。人們可能得出結論認為上述的一致只不過肯定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每一發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所確定的總戰略的依賴程度。但是，彭湃在海陸豐執行極端主義的政策無需來自黨中央的鼓勵，上面提到的恐怖主義只是極端主義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現而已。這些政策使蘇維埃樹立了許多敵人，遠遠地超過了地主的隊伍：他們包括從資產階級到商號和店鋪被沒收的零售商，甚至到喪失了老主顧的手工業工人。蘇維埃不滿足于樹立不必要的內部敵人，它還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敵人的軍事實力。它對人民的數量和力量（大多數是農民，他們的革命熱情被估計過高）的迷信意味著對必不可少的軍事準備的忽視。突然到來的失敗使它的領導人（首先是彭湃）大吃一驚。在激烈的戰斗中，由于付出了代價，他們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長矛和土槍去擊退機關槍和大炮是多么困難。[[120]](#_120_Jia_Er_Wei_Ya_Di____Peng_Pa)

彭湃的過分的樂觀主義和“冒險主義”象征著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幼年期。經驗就是逐步排除共產黨人的幻想，并激勵（或強迫）他們改進對目標的選擇，必要時接納某個社會階級（即使只是達到暫時結盟的程度），在農民的各個階層之間少做概括，更好地做有根據的劃分，并最終完善他們的著名的“群眾路線”的方法。簡言之，黨要根據在海陸豐早期開創性實驗過程中實際上已全部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學習，并加以改進。

### 外地和以后

這里我們不想重復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夠讀到的在海陸豐蘇維埃瓦解后20年中有關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資料。[[121]](#_121_Jian_Ben_Shu_Di_4Zhang__Che)一般說來，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經驗是海陸豐模式的復制品，盡管其環境和規模有明顯的不同。現在，讓我們來觀察它們的某些連續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義的作用。共產主義農民運動最有決定性的進展是在中日戰爭期間取得的，也是中日戰爭的一個結果。[[122]](#_122_Cha_Mo_Si__A_Yue_Han_Xun)但是，共產黨抓住了外國入侵帶來的天賜良機這一事實，并沒有改變農村蘇維埃、中日戰爭和內戰這三個時期之間的基本連續性。無論是戰爭期間還是和平時代，共產黨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地方問題上，并試圖滿足農民最緊迫的要求。在30年代后期，當中國農民集結于抗日領導人（他們正好是共產黨人）的旗幟下時，農民們對國家本身的解放并不像對保衛地方安全那么看重。在戰爭開始時普遍存在的形勢下，這種要求已成為他們最緊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時，不安全也遠非普遍的：農村中國的廣大地區仍然未受到戰爭影響，而那里的農民不很關心抗戰。然而，在與侵略者直接接觸的地區，緊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當地民眾聚集起來支持第一個到來的斗士，只要他是堅決的。而共產黨人無疑是堅決的。他們還在整個戰爭期間繼續用上述確認具體苦情和目標的重實效的觀點，保護農村窮人的社會利益。[[123]](#_123_Jian_Ben_Shu_Di_13Zhang_Di)

如果保護農民反對當地剝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運動過程的第一步，那么這一步本身則從屬于軍事控制這一更基本的先決條件。1923年在岳北（湖南衡山縣）建立的農會是最早的農會之一，像一年前海豐的農會那樣，它起初能“在統治和權力的空隙中”成長。但它并未持續多久；當互相抗衡的軍閥之間的地方戰爭以更敵視農民運動的一方獲勝而告終時，“空隙消失了——農會也消失了”[[124]](#_124_Mai_Ke_Tang_Na____Nong_Cun)。大約10年以后，“川北蘇維埃的命運……隨著四川軍事政治的波動而盛衰”[[125]](#_125_Luo_Bo_Te__A_Qia_Pu____Si_C)。共產黨人有意識地參與了軍閥的政治游戲，一種每個追逐權力的人必玩的游戲。他們非常正確地把軍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權力和執行改革計劃的先決條件。[[126]](#_126_Pian_Gang_Tie_Zai____Zhong)無論到了什么地區，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了能夠站穩腳跟和扎下根來，不得不依靠暴力。那么，這就難怪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地區，主要不在那些剝削最嚴重和社會關系最緊張的地方，而在政治或戰略條件有利的地方。[[127]](#_127_Fan_Si_Lai_Ke_Zhu_Ben_Shu_D)誠然，這些地方（像井岡山或陜北）大多也特別貧困。然而，山區或邊遠地區（簡言之，是不容易到達的地區）可能比處于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為貧困。人們絕對不能假定，生活在華北和西北的共產黨根據地的農民——他們大多擁有自己的耕地——比如說，比富饒的四川紅色盆地的佃農更傾向革命。四川的地租和租佃率要高得多，而且擁有土地的少數人所負擔的苛捐雜稅也遠遠多于北方。策略壓倒了各種社會因素的網——這就是說，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只要國民政府的戰時首都位于附近的重慶，紅色盆地便極不可能成為發展和維持紅色農民根據地的地方。

不僅江西和以后華北或西北的農民并不比中國其他農民更適宜于共產主義運動，而且在任何個別的蘇區或戰時根據地內，貧農也不像是首先集合起來的。在江西農民（無論貧農還是中農）不愿投身參加紅軍的早期，紅軍大部分是由雇傭兵、嘩變的士兵（如平江[[128]](#_128_Yuan_Wen_Wei_ping__hsiang_P)起義后由彭德懷領導的士兵）、從敵軍來的俘虜和完全與土地沒有任何聯系的落魄者組成的。[[129]](#_129_Hu_Ji_Xi__Yin_____Hong_Jun)農民也傾向于對蘇維埃的民事機構敬而遠之。據遠峰區（江西興國縣）的例子判斷，這些機構起先主要由其他村民所畏懼或鄙視的農村二流子（私鹽販子、職業賭徒、幫會成員）組成。這些邊緣人物，加上城市的或城市化的知識分子——由于缺乏其他的“更好的”支持者，這些知識分子非常樂意征募他們——形成了一個奇怪而混雜的人群，從而使農民運動得以開始。[[130]](#_130_Huang_Zong_Zhi____Gong_Chan)運動一旦起步，由于開展了土地改革，共產黨人就能開始招募真正的農民。以后，他們便把那些不能克服其掠奪成性的二流子驅逐出他們的隊伍。一旦共產黨人有了足夠的力量，他們也清洗了許多富農和小地主出身的地方干部和黨員。[[131]](#_131_Xiao_Zuo_Liang____Zhong_Guo)他們有計劃地從中農，更樂意從貧農和農業工人中吸收新的積極分子。共產黨人有充分理由防止富農和地主滲入新的政權機構以恢復他們的長期統治，因為他們可能試圖影響或破壞其政策。共產黨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過使窮人反對富人的方法來發動窮人。然而，人們不應把農村人口的各個階層在經過共產黨上層周密的政策加以改變后的行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簡單表現。

被發動起來的農民一旦參加了共產主義革命，他們也就發現自己是一部行政機器的零件。在短暫的海陸豐模型和后來的發展之間，只有一個真正重要的區別：毛主義的建設很持久，從而能達到一個羽毛豐滿的國家形態的新階段。毛成功地組織并維持了一個持不同意見的政權。著名的群眾路線說明了革命精英轉變為統治精英的問題，這樣的精英必須同時既建立國家，又進行革命。在江西時期一旦感覺到最初的政治緊張狀態，這種兩難的困境便立刻出現了。像1949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干部那樣，已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地方領導人的江西農民受到兩面夾攻。他們不得不執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指示，盡管以后會被指責為專橫過度，例如，強迫他們不情愿的同村人購買過多的公債券，甚至“自愿地”無償交回他們已購的債券。[[132]](#_132_Xu_Jing_Yi__Yin_____Zhong_H)15年后，在中日戰爭末期和內戰期間，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這次是右傾而不是“左”傾）被認為應對土地改革軟弱和發動群眾遲緩承擔責任。對干部們就是這樣，但是，1949年以前的共產黨的革命運動與以后共產黨的控制之間的連續性，就農民群眾的行動來說也保持下來了。1946年豫魯邊區剛宣布紅軍的征兵運動，當地的農民便“送他們的年輕人去外鄉投親”[[133]](#_133_Pei_Po____Zhong_Guo_De_Nei)。（在1/3世紀后，被送到別的村子里投親的是年輕婦女；當時正值1979年加強計劃生育運動，這次不是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為了躲避強制流產。）

總而言之，我們并沒有在自發的農民騷動與共產黨的農民運動的中斷處架起一座橋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繼續。自發的農民騷動具有與傳統歐洲的“農民憤怒”共同的特征。對上述許多事件，我們可以采用一個研究路易十三時期諾曼底“赤腳人”暴亂的法國歷史學家所做的判斷：“異常的不滿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獲取共同結果的商定的起義準備。”[[134]](#_134_Di_Wa_Er__Qia_Ya_Er_Suo_Shu)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寧式的革命準備——有計劃的奪取政權。即使因戰略或組織問題而延緩時，列寧主義的革命家決不會喪失他的終極目標。相反，農民騷動并不以奪取政權為目標。我們歸類為“自發騷動”的各種根本不同的創舉的唯一共同目標，埃里克·沃爾夫評述為：“農民為保持傳統而戰。”[[135]](#_135_Guan_Yu_Zhong_Nong__Ai_Li_K)留戀過去，只記得過去好的方面，或者，因過去不能回來而維護一種農民有各種理由抱怨、但其巨大優點是為人們所熟悉的既定秩序——這種渴望蘊藏在許多表面上是分散的防御性回擊之中：例如，反抗外來侵略的自衛，但也包括對任何不熟悉的、新的事物，總之，實際上對蓄意的或偶然的沖擊現狀的任何事物的懷疑和抵制。這種渴望不能認為是心理失常。確實，它們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我們同意米格代爾：威脅或破壞傳統地保持在“內向的村莊”中的穩定性的革新，隨后給該村帶來壓力和危機，即使不是絕望。[[136]](#_136_Qiao_Er__S_Mi_Ge_Dai_Er)

極少數知識分子在發動這些陷于懷舊或地方主義的農民進行革命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動員的技巧并不代表全貌。更為普遍的狀況才是前提。沒有農民所遭受的貧困和剝削，就不會有中國革命。關于農民運動的這一章能有效地與專述農民狀況及其發展的一章加以比較。[[137]](#_137_You_Yu_Que_Fa_Zheng_Zhang_L)人們不必與當代的許多評論家和現代的歷史學家們有共同的觀點，即在民國時期農民狀況普遍地惡化了，就可以贊同下列說法：任何一地一時的惡化，不可避免地是悲慘的，并且對大多數農民來說，有時會引起動亂——這一部分農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也僅能免遭滅頂而已。[[138]](#_138_Yong_R_H_Tuo_Ni_De_Hua_Shuo)在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農民的狀況即使沒有任何惡化，也迫切地需要根本的改變。我們不認為未來的“解放區”的居民是比其他地方居民遭受剝削更為嚴重的受害者，目的在于反駁過分簡單化的社會—地理決定論。但是，應當明確的是，在中國各地都有足夠的貧困和壓迫，不滿和疏遠，使共產黨的組織者們一開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許多農民接受他們的宣傳（即使沒有達到冒險支持他們的程度，因為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最后會有許多農民充分了解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而冒險行事，甚至作出終極的犧牲。他們在為革命服務中，做出了許多無價的英雄之舉，但本章主要注意的是農民的利己主義而不是利他主義。當然，他們不一定是同一些農民，然而只要有適宜環境，英雄主義的種子在任何地方都會開花，即使在一般認為專心于腳踏實地的打算和斤斤計較的村民們中也是如此。不僅是共產黨人的宣傳，也是他們的政策和榜樣，鼓舞了少數（但已可說是許多）農民超越自我和犧牲自己，這絕非偶然。一種非常特殊的聯系已逐漸在共產黨人和農民之間建立起來。在國民黨人與農民之間沒有發生這種情況。但是，從下述事實得出了嚴重的兩可的解釋：盡管共產黨上層對農民處境的關心是真誠的，并決心改善他們的處境，但他們把動員農民和盼望解放當作為一個目的服務的手段，這些農民對這一目的——國家的獨立，權力和威力——興趣卻要小得多。共產黨的上層一旦贏得了權力，就以一種新的形式繼續運用農民階級所體現的工具：他們為了推翻舊政權曾成功地加以調動的蘊藏著不滿情緒的巨大貯存庫以后變成一個人力資源的巨大貯存庫，他們為了使一個農業國工業化試圖加以調動它，但遠不夠成功。如果種地的人與掌權的革命家之間的關系變得很不和諧，那是因為，除別的因素之外，農民的解放不是，也從來不曾是中國革命的基本目的。

[[1]](#_1_5)見喬爾·S.米格代爾：《農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對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壓力》，第89頁上的圖表。

[[2]](#_2_5)參看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1927—1937》，抗稅抗租26起（第3輯，第1021—1023頁），與鹽稅有關或鹽工造成的風潮24起（同上書，第1023—1025頁），與水和水利工程有關的糾紛21起（同上書，第1026—1028頁），與土地有關的糾紛6起（同上書，第1026頁）以及搶劫27起（同上書，第1031—1032頁）。又參看全在1934年發生的與鹽有關的風潮43起（《中華日報》1935年4月4日），以及同年發生的分屬其他六類的事件一百余起（《中華日報》1935年2月27日；3月6、13、20、27日；4月18和25日）。這些表的另一缺點是，盡管它們所含信息稀少，卻有時提醒人們是否應當懷疑甚至拒絕某一特定事件或風潮的分類。

[[3]](#_3_5)例如，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江蘇無錫縣搶劫25起，兩周內（1934年7月25日至8月8日）浙江東北部嘉興縣王店鎮一地搶劫40余起。分別見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423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B/1070，附件5；又僅在1932年夏陜西省田賦風潮70起（《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2卷，第413頁）；牽涉佃農的事件197起，大多是1923—1932年間在江蘇和浙江發生的，也就是說在跨南京10年和以前10年時期，見蔡樹邦：《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東方雜志》第30卷第10期（1933年5月16日），第26—38頁。也應注意搶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為資料只提到搶劫和小事件在某時某地（如1932年5月和6月在浙江和江蘇的蠶繭產區）“很多”乃至“幾乎每日發生”，幾乎無法估計其次數（《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30頁）。上面提到的王店的40起搶劫和無錫的25起搶劫證實搶劫具有“幾乎每日發生”的性質；而后一資料只表示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間在縣里發生的少數劫案；大多數劫案在報紙上沒有報道，所以沒有記錄（《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423頁）。

[[4]](#_4_5)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1—1022頁。關于蘇州抗稅，見本書第6章第1節。

[[5]](#_5_5)一位資料編集者很公正地提到，素有中國“天堂”美稱的江、浙兩省的劫案記錄數只不過表明江蘇和浙江的新聞界優于其他省的新聞界。（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32頁。）

[[6]](#_6_5)楊慶堃：《關于19世紀中國民眾活動的若干初步統計模式》，載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174—210頁。

[[7]](#_7_5)“它企圖用計算機處理過的歷史數據作為一種探索手段來辨識民眾活動事件的量值和構形……”楊慶堃：《關于19世紀中國民眾活動的若干初步統計模式》，第174頁和注①。

[[8]](#_8_5)楊慶堃：《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一個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村莊》；《中國社會的宗教》。

[[9]](#_9_5)小羅伊·霍夫海因茨：《中國共產主義勝利的社會生態學：農村影響模式，1923—1945年》，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第3—77頁；《大浪潮：中國共產主義農民運動，1922—1928年》；《農民運動和農村革命：在農村的中國共產黨人，1923—1927年》（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66年）。

[[10]](#_10_5)關于蘇州的催甲，見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證研究》，《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第569、587—589頁；弗蘭克·A.洛耶夫斯基：《蘇州租棧：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問題》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第44—45頁。但是特別提一下，受到蘇州農民責難的催甲勒索事件在南京10年時期比在清末更時常發生；而且，村松祐次及后來洛耶夫斯基所研究的催甲是地主租棧的雇員，在南京10年時期不一定是這種情況。

[[11]](#_11_5)按民國政區建制，蘇州府已廢，不應夾注“蘇州的縣”。——譯者

[[12]](#_12_5)見洪瑞堅：《蘇州抗租風潮的前因后果》，《地政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年10月），第1547—1562頁；《蘇州的農潮》，《中國農村》第2卷第6期（1936年6月），第6—8頁；《晨報》1935年12月29日，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0頁。關于1934年10月風潮，當時佃農放火燒毀催甲所有的房屋40多所，見吳大琨：《最近蘇州的農民鬧荒風潮》，《東方雜志》第32卷第2期（1935年1月16日），第83—84頁。

[[13]](#_13_5)關于以下幾段，參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的三個檔卷：1—2—1001和1—2—1002，題為《浙江各地農民抗租斗爭》（1927—1930年）；2—2—1129，《浙江各縣呈請取消施行二五減租以免糾紛》（1931年11月—1934年6月）；諾埃爾·R.邁因納：《國民黨中國的農村改革：浙江減租個案，1927—1937年》，載陳福霖編：《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1927—1949年》，第69—89頁。我對孫修福先生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員給我的幫助表示感激。

[[14]](#_14_5)蕭信誼（音）：《從1927到1945年的四川農村經濟和社會》（高級研究實驗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72年），第96—97頁。

[[15]](#_15_5)蔡樹邦：《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第36頁。

[[16]](#_16_5)同上書，第26—38頁。這一匯編只特別提到220種起因的197起風潮，因為有些風潮同時由幾個原因引起。

[[17]](#_17_4)注意四川一個大地主的日本寡婦的有趣的證明。見文森特·S.P.布蘭特：《中華民國的地主和佃農的關系》，《中國論文集》第17期（1963年），第225—226頁。

[[18]](#_18_5)例如，匪徒與債務人共謀，搶劫放債人，焚燒借條，并把其財富分給窮人。見《文季月刊》第2卷第1期（1936年12月），引用于張秋兒（音）：《中國當代文學中的農民生活狀況》（巴黎社會科學高級研究學校，博士學位論文，1976年）。

[[19]](#_19_5)如1934年在山西。見唐納德·吉林：《軍閥：在山西省的閻錫山，1911—1949年》，第198頁。

[[20]](#_20_5)這是發生在一個江西靖安農民身上的事，他被族人殺死。（《申報》，1930年5月30日，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9頁。）

[[21]](#_21_5)這是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427頁所說的硬借。

[[22]](#_22_5)蕭公權：《農業中國：19世紀帝國的控制》，第441頁。

[[23]](#_23_5)這個特點被所有研究17世紀法國農民造反的學者強調，見讓·雅卡爾：《經受苦難的農民》，載皮埃爾·戴翁和讓·雅卡爾編：《發展的停頓，1580—1730年》（《世界經濟社會史》第2卷），第489頁。

[[24]](#_24_5)關于揚州風潮，見《江蘇江都縣農民反對清查田賦運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卷2/ 2/973。這檔卷有四件檔案：最后一件（16712號）最詳細但不很客觀。又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2198（駐南京總領事裴克），1932年10月25日；893.00PR南京/57（1932 年11月5日）和/58（1932年12月21日），裴克的月報。最后，《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534—535頁和《中央日報》1932年10月23、24、25日。

[[25]](#_25_5)例如，1935年春，安徽東部和縣村民抗拒丈量陳報土地。和揚州農民一樣，和縣村民害怕丈量單位差異（當地的畝大于他地）會造成田賦增加。[《中央日報》（1935年4月15日）第7版。]

[[26]](#_26_5)戴聞：《江洲火案》。

[[27]](#_27_5)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第163、166、205頁和各處。羅曼·斯拉文斯基：《紅槍會與1926—1927年中國的農民運動》，第92—93、99、142頁。

[[28]](#_28_5)艾愷：《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75頁。

[[29]](#_29_5)《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0—1021頁。在17世紀的歐洲，規模頗不相同的加泰羅尼亞叛亂（1640年）的目的在于保留受到卡斯蒂利亞中央集權威脅的租稅特權和軍事特權。與1662年布洛內地方的呂斯蒂克律的戰爭一樣，法國的許多農民叛亂（雖然在1660年和1675年間它們越來越多地表現出重要的社會面貌）目的在于反對路易十四和柯爾貝爾破壞租稅豁免和特權。見皮埃爾·維拉爾：《近代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方：民族結構的經濟基礎研究》第1卷，第627、629—632頁；P.埃利約：《呂斯蒂克律的戰爭與布洛內地方的特權》，《北方評論》（里爾）第21期（1935年），第265—318頁；萊昂·貝爾納：《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社會和民眾起義》，《法國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64年），第457—459頁。

[[30]](#_30_5)見在當涂縣、蕭縣和江都縣實行的三個實例，財政部整理地方捐稅委員會：《土地陳報調查報告之一：安徽省當涂縣土地陳報概略》；《土地陳報調查報告之二：江蘇省蕭縣土地陳報概略》；《土地陳報調查報告之三：江蘇省江都縣土地陳報概略》。江都縣是前面提到的揚州風潮發生地。土地陳報引起蕭縣一起迅速被鎮壓的風潮。

[[31]](#_31_5)這種惡化在40年代重新開始并走向高潮，見易勞逸：《農民、捐稅和國民黨統治，1937—1945年》，第6—16頁。

[[32]](#_32_5)1932年10月，揚中的示威者在用10小時放火焚燒相隔很遠的私家房屋（共7處）后才攻擊縣衙門；當局有充分時間防范（戴聞：《江洲火案》，第22頁）。在揚州，暴動者也讓當局有充分時間在10月23日的決定性對抗前，調動援軍和關閉城門。

[[33]](#_33_5)《收獲時潮濕多雨容易毀滅農作物》，載J.C.S.霍爾：《云南地方派，1927—1937年》，第109頁。

[[34]](#_34_5)《收獲時潮濕多雨容易毀滅農作物》，載J.C.S.霍爾：《云南地方派，1927—1937年》，第105頁；太平洋學會編：《農業中國》，第119頁。

[[35]](#_35_5)伍德海編：《中華年鑒，1928年》，第524頁。

[[36]](#_36_5)甘肅事例（《中華年鑒，1925年》，第579頁），云南事例（《中華年鑒，1926年》，第642頁），貴州事例（同上書，第637頁），福建事例（同上書，第627頁）。

[[37]](#_37_5)《中華年鑒，1926年》，第620頁和《中華年鑒，1925年》，第586頁。

[[38]](#_38_5)七個省（陜西、甘肅、四川、云南、河南、湖北、福建）有直接抑制谷物生產的事例，見《中華年鑒，1921—1922年》，第791頁；《中華年鑒，1925年》，第575、578、583頁；《中華年鑒，1926年》，第626、641—642頁；《中華年鑒，1928年》，第531頁；《中華年鑒，1931年》，第591、599—600頁。

[[39]](#_39_5)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PR南京/59（1938年1月14日），第21頁。在國民黨政府直接控制區域，禁煙運動早在1932年生效。雖然罌粟種植逐漸遍布中國多數省份，但仍以包括西北（陜西、甘肅、寧夏、綏遠）和西南的西部鴉片地帶最為密集。

[[40]](#_40_5)參看《中華年鑒，1926年》，第620頁和《中華年鑒，1928年》，第534頁。但在初期，在國民黨禁令下達前，有時偶爾也有農民因種植罌粟被處決（《中華年鑒，1925年》，第575頁），這全取決于地方當局。

[[41]](#_41_5)《中華年鑒，1926年》，第641頁。在四川省西南部四個縣（《中華年鑒，1931年》，第600頁）和四川省外其他地方（《中華年鑒，1926年》，第626頁；《中華年鑒，1928年》，第524、531頁）也有拒絕重新種植罌粟的情況。

[[42]](#_42_5)《中華年鑒，1926年》，第641頁。

[[43]](#_43_5)《中華年鑒，1926年》，第626、628頁；《農業中國》，第129—130頁。

[[44]](#_44_5)例如，1925年（《中華年鑒，1925年》，第571和574頁），1928年（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PR福州/4，1928年4月4日第6—7頁），1931年（同上書，PR福州/37，1931年2月）和1933年（同上書，PR福州/51，1932年4月4日，第14頁）。這類沖突主要造成農民中的死亡，但有時如1934年春在惠安，農民也殺死士兵、稅吏乃至縣長（同上書，893.00PR廈門/80，1934年5月8日，第8—9頁）。

[[45]](#_45_5)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第181頁；《中國經濟》第1卷第1期（1933年4月），第16—17頁，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16頁。

[[46]](#_46_5)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0916，精琦士電報（廣州，1930年5月14日）。

[[47]](#_47_5)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PR云南/54（副領事查爾斯·S.里德每月報告），1933年4 月3日。

[[48]](#_48_5)關于余杭事件，參看三件有時說法不一的資料：《浙江二萬農民暴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PR上海/57（每月報告，1933年4月）和893.00/12371（克寧翰電報，1933 年5月20日）；諾埃爾·雷·邁因納：《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3年），第221—228頁。

[[49]](#_49_5)也是在1933年，（云南）昆陽小地主們在計劃穿過他們的土地筑路時騷動。原始路線并不穿過他們的土地，但土地將被公路穿過的其他地主收買了負責官員。周榮德：《中國的社會流動》，第151頁。

[[50]](#_50_5)《中國農村》第3卷第7期（1937年7月），第72—74頁。

[[51]](#_51_5)《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5頁。

[[52]](#_52_5)許多抗拒強迫勞動的事例載于《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5—1028頁。

[[53]](#_53_5)戴玄之：《紅槍會》，第192頁。關于紅槍會，參看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第4章。

[[54]](#_54_5)呂西安·比昂科：《中國省政的敗壞（安徽1931年）》，《近代史和現代史雜志》第16期（1969年4—6月），第306—307頁。

[[55]](#_55_5)關于龍田事件，參看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1815（1932年1月25日），893.00/ 11837（1932年2月12日），893.00PR福州/48（1932年1月13日）和/49（1932年2月10日）中美國駐福州領事（伯克）的官方通信。

[[56]](#_56_5)（其他數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東）平度以東地區，在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 8841，韋伯（芝罘），1927年4月2日中有敘述。

[[57]](#_57_5)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PR福州/57，1932年10月4日。

[[58]](#_58_5)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141（高思，重慶，1943年9月29日）。

[[59]](#_59_5)引自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369頁。關于被征當兵農民的苦難和兵給老百姓造成的苦難，見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謝偉思文電稿匯編》，第35—37頁；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32—140、143—144頁；呂西安·比昂科：《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年》，第155—157頁。關于后期，見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第163—168頁。

[[60]](#_60_5)詳細內容：貴州東部和西部（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991；15095），四川北部（同上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997；15022；15026；15055），特別是甘肅南部臨洮地方（同上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15112，刊載于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第20—22頁）。

[[61]](#_61_5)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6.1044（高思，重慶，1944年6月10日），第13頁和注26。

[[62]](#_62_5)張天翼：《仇恨》。

[[63]](#_63_4)蕭公權：《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第361—366、419—429頁；哈里·J.拉姆利：《械斗：中國東南部的暴力病態》，《清史問題》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第1—39頁；羅伯特·B.馬克斯：《海豐縣在海豐農民運動前夕的社會變遷，1870—1920年》，第17—29頁。

[[64]](#_64_4)《大晚報》1932年6月22日和《時事新報》1935年7月5日，引自《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535頁；美國國務院檔案PR南京/68（1933年10月11日）第9頁和PR南京/86（1935年4月8日）第11頁；《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7頁。

[[65]](#_65_4)呂西安·比昂科：《秘密會社與農民自衛，1921—1933年》，載J.謝諾編：《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第221—222頁。

[[66]](#_66_4)羅伯特·B.馬克斯：《海豐縣在海豐農民運動前夕的社會變遷，1870—1920年》，第18—19、24—29頁。

[[67]](#_67_4)若干移民確實是外國人：在遼寧東部萬寶山，500名中國農民在1931年7月破壞朝鮮移民建造的壩和灌渠。日本人在沈陽事變前兩個月把這件事制造成外交事件。

[[68]](#_68_4)貝克：《與中國的饑荒斗爭》（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頁。

[[69]](#_69_4)長樂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詳細敘述：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年5月4日）。與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責的長樂放債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騷動：《東方雜志》，第33卷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頁。

[[70]](#_70_4)《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32頁。

[[71]](#_71_4)《中華日報》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31—1032頁。

[[72]](#_72_4)《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423頁。

[[73]](#_73_4)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載《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30頁。

[[74]](#_74_4)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蘇的事例載《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33頁；涉及四川的事例載《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9頁。

[[75]](#_75_4)法國路易十四時期“面包貴風潮”中也采用同樣的做法，參看伊夫-瑪麗·貝爾塞：《起義農民史：17世紀法國西南部民眾起義研究》，第548頁。

[[76]](#_76_4)關于四川東部事例，見《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1029—1030頁（軍閥楊森的軍隊派去鎮壓淪為土匪的饑餓農民）。

[[77]](#_77_4)參看1932年6月無錫的一個事例。[《新創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月），引自《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428頁。]

[[78]](#_78_4)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項研究中識別出來的六個特點中的三個，呂西安·比昂科：《農民與革命：中國，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第124—129頁。

[[79]](#_79_4)喬啟明在1925年前后參觀過的一個關押佃農的監牢有15個犯人，其中5個是女人，她們因丈夫出逃而被逮捕。每個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元，喬啟明：《江蘇昆山南通安徽宿縣農佃制度之比較以及改良農佃問題之建議》，引自《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109頁。

[[80]](#_80_4)蔡樹邦：《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第31頁。

[[81]](#_81_4)參看劉廣京：《世界觀與農民造反：對毛澤東以后的編史學的看法》，《亞洲研究雜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第311頁。

[[82]](#_82_4)《新無錫》1932年6月4日，引自《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425頁。

[[83]](#_83_4)范長江：《饑餓線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第125頁。

[[84]](#_84_4)同上書，第131頁。

[[85]](#_85_4)《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第1卷，第426頁。

[[86]](#_86_4)陳登原：《中國田賦史》，第17頁和《東方雜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7月16日），第110頁。

[[87]](#_87_4)只提兩個事例，請回憶農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氣候狀況）和佃農風潮多的時期的一致性（本章《佃農與地主之間糾紛》節最后三條注文）；很像18世紀新西班牙農業危機與農民運動的一致性（參看皮埃爾·維拉爾：《拉丁美洲的農民運動》，載第13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當代世界農民運動謂查，總報告》，第82—83頁）。第二個事例：反抗軍隊的次數，在中日戰爭期間比1937年以前多得多（見前《與租稅無關的騷亂及其類型》）。引起風潮的是當時的問題或災害（而不是要求進步的欲望和希望）。

[[88]](#_88_4)我從分析17世紀法國類似過程的法國歷史學家伊夫-瑪麗·貝爾塞借用這種說法：“在敵人、搶掠的士兵或盜匪面前聯合起來的低地民眾的任務能輕而易舉地變為向國王的軍人造反。”（《起義農民與赤腳農民》，第84—85頁。）關于中國，參看呂西安·比昂科：《秘密會社與農民自衛》，第215—218頁（和第222—224頁，后者涉及群眾防衛），尤其是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第5章，這一章題為《保護者變成叛亂者》。

[[89]](#_89_4)羅蘭·穆尼耶：《農民的暴烈行動：17世紀造反中的農民（法國、俄國和中國）》。

[[90]](#_90_4)喬爾·S.米格代爾已一般地對這種與傳統的農民階級有關系的看法作出很好的分析：《農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對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壓力》，第47頁。

[[91]](#_91_4)小羅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國共產主義農民運動，1922—1928年》，第35頁。

[[92]](#_92_4)小安格斯·W.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8頁，又見第269—270頁，更廣泛地見第264—280頁；霍夫海因茨：《農民運動和農村革命》第6章；周丹：《北伐》，第194—198、203、227—228頁。

[[93]](#_93_4)羅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中國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第37—87頁；《農民運動和農村革命》第7章。

[[94]](#_94_4)《星火燎原》第1集，第431—433頁，胡繼喜（音）著的：《紅軍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26頁注16引用。

[[95]](#_95_4)胡繼喜（音）：《紅軍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2頁。

[[96]](#_96_4)澎湃在發動海豐農民運動和建立最早的農會時很可能還未參加中國共產黨；盡管如此，他還是一個認真對待動員農民群眾問題的知識分子革命家。而且，他在參加中國共產黨很久以前就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關于彭湃入黨時間，見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中國第一個蘇維埃領袖彭湃（1896—1929年）：中國廣東海陸豐》（牛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1年），第203—204頁。這篇論文是許多研究彭湃論著中最可靠和最詳細的論著。

[[97]](#_97_4)澎湃：《海豐農民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52—55頁。

[[98]](#_98_3)同上書，第56—67頁。

[[99]](#_99_3)好比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所著《百年孤寂》第9—16頁上馬孔多小城的“術士”吉普賽人梅爾基亞德斯的威勢。

[[100]](#_100_3)彭湃：《海豐農民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93—94頁。

[[101]](#_101_3)在農會內的若干反對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張采取更靈活的策略。臺風事件（見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1—314頁和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61—164頁）說明利用環境以達到群眾動員的新階段的策略。

[[102]](#_102_3)和1928年1月初陸豐白旗派的情況一樣（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779頁）。

[[103]](#_103_3)關于海陸豐的恐怖，見加爾維亞蒂：《澎湃（1896—1929年）》，第704—784頁各處和第825—849頁。

[[104]](#_104_3)雅克·普雷韋爾：《談話集》，第7—18頁。

[[105]](#_105_3)彭湃：“階級正義與受審判的人無關；這是內戰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國民公會上說：“你們在這里不是給一個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過一項國家緊急措施。”

[[106]](#_106_3)關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義，見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518—521、777—783、827—828、848頁和各處。

[[107]](#_107_3)普寧縣是同海豐、陸豐兩縣相鄰但無關系的縣，也引起彭湃注意，因為他領導（廣東）農民運動的職責是領導全省農民運動。彭湃創建普寧農會，造反農民靠農會集中保衛他們反對當地主要市鎮的方氏集團的事業。

[[108]](#_108_3)關于農民的傳統心理及在這段和以下幾段提到的事實，見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頁和附錄，第204頁（注32）。

[[109]](#_109_3)韋慕庭：《戰敗的廢墟》，《中國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20頁。

[[110]](#_110_3)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697、701、703—704、744—745、902、905—906頁。與海陸豐蘇維埃維持幾個月相比，廣州公社只維持幾天（1927年12月11—13日），廣州公社的短暫特征提供了一個相反的證明。在廣州，當局不能容忍這種挑戰。

[[111]](#_111_3)1924年3月，陳炯明終于下令解散海陸豐農會，這顯然是在當地名流使他確信農會與廣州他的敵手（共產黨和國民黨）密切合作之后。（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539—540頁；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77頁。）

[[112]](#_112_3)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8章（特別是第189和197頁）。

[[113]](#_113_3)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81—183頁；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414頁。

[[114]](#_114_3)關于廣東，見康拉德·布蘭特：《斯大林在中國的失敗，1924—1927年》，第48頁。

[[115]](#_115_3)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205—212頁。

[[116]](#_116_3)杰拉爾德·W.伯克利：《中國的農民動員，1924—1926年》（未刊論文，華盛頓及東南區域中國史討論會，1979年3月），第17頁。

[[117]](#_117_3)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738、787頁和附錄第217頁注87。

[[118]](#_118_3)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1004頁和第1000—1014頁各處。關于這段所余部分和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豐），見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ⅵ、img、 1、8—9、35—36、39、50、56—66、96—104、144、275、789頁和各處。

[[119]](#_119_3)盡管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在博士學位論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陸豐社會》）（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1—146頁）提供海豐有時不典型有時典型的矛盾的資料，我還是對我所說的“海陸豐大體上和農村中國的其余地方一樣”負責任。我本人所認為海豐到底是農村中國縮影的感覺，也是以我在彭湃從日本回家鄉60年后的一次短期訪問為依據的。

[[120]](#_120_3)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年）》，第793、904頁。

[[121]](#_121_3)見本書第4章（陳志讓著）、第12章（萊曼·范斯萊克著）和第13章（蘇珊娜·佩珀著）。

[[122]](#_122_3)查默斯·A.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革命中國的出現，1937—1945年》。雖然我在這段中說明我不同意約翰遜片面強調共產黨農民運動的民族主義因素（與社會因素相對立），我認為《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是我們領域內發表的最引人興趣的著作之一。

[[123]](#_123_3)見本書第13章第3節《共產黨力量的增長》（蘇珊娜·佩珀著）。

[[124]](#_124_3)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18—223頁。

[[125]](#_125_3)羅伯特·A.卡普：《四川與中華民國：地主軍閥主義與中央政權，1911—1938年》，第88頁。又見第90—93、103—104頁。

[[126]](#_126_3)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265頁以下。又佩珀：《中國的內戰》，第329頁和本書第12章《新四軍事件》一節（萊曼·范斯萊克著）。

[[127]](#_127_3)范斯萊克著本書第12章《新四軍事件》一節。又呂西安·比昂科：《農民與革命：中國個案》，《農民研究雜志》第2卷第3期（1975年4月），第332頁。

[[128]](#_128_3)原文為ping—hsiang（萍鄉），應為平江。——譯者

[[129]](#_129_3)胡繼喜（音）：《紅軍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3、20—24頁。

[[130]](#_130_3)黃宗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流氓無產者、工人和農民：1927—1934年興國縣個案，1927—1934年》，載黃宗智等編：《中國共產黨與農村社會，1927—1934年》，第7—13頁。

[[131]](#_131_3)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獻研究》，第169頁。

[[132]](#_132_3)許經義（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政策，1931—1934年》（印第安納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1年），第449、450頁。

[[133]](#_133_3)佩珀：《中國的內戰》，第294頁。

[[134]](#_134_3)迪瓦爾·卡亞爾所說，見迪瓦爾·卡亞爾和格里庫爾·吉耶：《17世紀和18世紀諾曼底研究》，第55頁。

[[135]](#_135_2)關于中農，埃里克·沃爾夫更正確地寫道：中農“百般設法……保留傳統的……使他成為革命者”。（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第292頁。）我本人要用“造反者”一詞代替“革命者”。

[[136]](#_136_2)喬爾·S.米格代爾：《農民、政治和革命》第5章。

[[137]](#_137_2)由于缺乏整章論述，可參看費維愷（本書上卷第1章《農業》一節）和馬若孟（本卷第5章《農業危機》一節）說明的情況和不一致的解釋。

[[138]](#_138_2)用R.H.托尼的話說：“沒頸。”（R.H.托尼：《中國的土地與勞動》，第77頁。）

#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發展

從最早時期開始，中國政治制度的質量，大體上被認為并不比最低層政府的質量好。晚清政治的理論繼承了一個長期以來的爭論，即現存官僚政治制度對地方社會的影響的利和弊。各縣若由本地人，而不是由中央選派的外地人管理，其得失將如何？讓地方人士參與政治，官僚政治的國家要承受多大風險？1860年以后國家現代化的需要，又把這些老問題以尖銳的形式提了出來。如果國家的強盛需要動員民眾的力量，通過什么樣的地方上渠道才能最好地得到這種力量？如果國家需要更多的錢，通過什么樣的地方機構才能最順利地得到錢？在20世紀，軍事現代化、擴大的和西化的學校系統、新型的警察力量，所在這一切都需要國家設法更好地控制地方社會，并從中汲取更多的財源。

就在國家被迫以新的和更有效的方式滲透進地方社會的時候，民眾運動的各種思想也把注意力投向地方政府。民族主義是巨大的動員力量，因為中國的命運越來越被看作是每個人的事，新的群體要求過問政治。這些群體主要是那些正在現代化的城市里的商業階級和新式學校的畢業生，但也包括內地的一些地主和有科舉功名的人士。立憲政府需要一種自下而上的政治發展模式，合法的國民議會成立以前，必須調查和確認選民資格的合法性。建立一些地方名流能正規地參與政治的機構，確實背離了清代的舊體制；在舊體制中，地方名流也參政，雖然也有勢力，但一般是非正式的。

這樣，來自上面的壓力，又加上了來自下面的要求，它們的目的是要改造中國的地方政治體制。大部分中國近代的政治結構的特征，都產生于這兩種力量的相互作用。哪一種將最后占上風？中國的地方政治是否會因此而變得更有參與性，或者，這個官僚政治的國家是否會比以前更成功、更細致和更嚴厲地控制中國社會？

## 社會名流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

早在現代部門成為19世紀末期重要的力量以前，晚清社會名流的積極參與精神，就已從社會及經濟的內部條件中產生了。政府谷物貢賦體制的弊政，引發19世紀20年代下層士紳的抗拒運動，他們以特別聯盟的形式向北京提出上訴；聯盟有章程、執事人及非官方的集資，堪稱完善。聯盟從未得到官方的認可，成員也容易受到指控。在太平天國叛亂期間，地主名流卷入類似的團體，但這次采取官方支持的地方團練形式。團練具有社會名流積極參與的傳統特征，但它在職能上并不是嚴格專門化的。同一地方領導層可以使用團練于各種用途，如教育和慈善救濟工作，很像宗族團體可使用其財源于各種各樣的需要。政府在叛亂年代依靠地方名流的領導，形成了一種新的模式，即他們帶頭組織團體和籌款，可以得到官方的保護并取得合法地位。

到18世紀后期，水道管理已經成為地方管理人才的一個重要的用武之地。例如，在上海縣，地方名流負責疏浚河道，并向地主和商人征集款項。這種辦法超出了特定的社區自愿捐助的原則，主事人具有紳董之類的準官銜，以表示他們在官府邊緣的地位。這種辦法稱為“官督商辦”，這是一種彌補縣級官府統治薄弱的混合制度。[[1]](#_1_Yi_Mao_Ke____Ji_Zhen_Yu_Shui)

社會名流的積極參與和官方的支持相結合，也表現在慈善救濟方面。例如，江蘇嘉定縣以下的行政機構，即由救濟站的網狀組織發展而來。31個這樣的施粥廠原建于1805年，以救濟饑荒。在整個19世紀中，施粥廠的董事逐漸成為在地方行政中輔助知縣的近乎常任的官吏。在他們之下輪換任職的是村長。隨著集鎮網絡的交錯發展和市場地域的分化，地方行政區劃也相應改變。市場社區的政治功能從而正規化，而由地方名流充任準官吏性質的管理人員。在這些富庶的商業化地區，地方名流的管理功能已漸超越非正式的調解和特定的社區服務工作——而我們的“士紳社會”的概念常常就是與這兩點聯系在一起的。[[2]](#_2___Jia_Ding_Xian_Xu_Zhi____Jua)

城市化使古老簡陋的城市服務過時；城市士紳和商人也發現他們自己正在取得一種新的綜合性的行政管理身份。19世紀后期，士紳管理的善堂和商業公會，正在負起一般城市服務的責任。這是利用傳統的社會事業機構發揮新的作用。到19世紀后期，也就是說，在現代型商會出現之前，地方官府授權傳統城市組織擔負起市政的某些職能。此外，綜合職能模式是由專門職能模式發展來的，而不是相反；救火會擔負慈善和民團工作；善堂擔負民團、救火、街道清掃和道路保養。當然，做所有這類工作，都是為了給商業和士紳宅院創造一個有益的、安全的環境，深合老式的士紳服務的精神。這些社團的準政府權力，包括征收商業稅款。隨著這類社會事業機構在20世紀頭十年的發展，它們的職權也擴大了。上海市政工程局議董在1905年創立，部分地是受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成功的啟發。在官方直接贊助下，地方紳商受權選舉董事管理城市服務，如道路、電燈和警務。議董具有城市政府職能的更明顯的標志是，議董擁有征稅和司法權能。[[3]](#_3_Yi_Mao_Ke____Shang_Hai_De_Xin)

由社會名流管理的新公共事業，其財政基礎必須是在土地正稅之外。清政府已經盡其所能防止地方名流介入土地正稅系統，雖然到了19世紀，某些土地附加稅已由士紳參與的機構征收。然而，一般地說，這類附加稅是雜捐，給地方名流提供了一條介入地方財政系統的合法渠道。和更有名的厘金一樣，這類雜捐可以很容易地擴展為新稅源，官府很難監督。20世紀第一個10年的“地方自治”活動，包括舉辦新式學校和警察，就是利用這類捐稅。它們的征收大多由地方名流管理，他們急切地不讓縣的辦稅人員插手這些新稅源。

產生于這類地方活動的一項制度變化，是官方明確規定“地方”征稅范圍。在此以前，縣政府僅有正稅收入的合法“保留”部分，外加非正規的“例定費”以補知縣和下屬官吏薪俸之不足。直到1908年才建立起地方計稅基準，劃定縣里名流可以用來作為地方政府新事業經費的稅款。在1908年的縣治所在地、集鎮和村鎮的自治章程中，規定土地特別稅和附加稅為這類新單位的合法稅收。

1909年，在新組建的度支部的一套大型出版物中，對國家、省和地方財政范圍有詳細的規定。[[4]](#_4___Cai_Zheng_Shuo_Ming_Shu)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出，地方士紳已經多么深地卷入征集與動用地方稅款的工作。他們向地方商業與服務業征收各種雜稅，并把所收稅款用在新組建的縣警察部隊和新式學校。社會名流參與新教育制度特別重要，新教育制度迫切需要新稅源。現代化的學校在數量上迅速地增加（例如，在山東，從1903年的140所增至1907年的3424所），成為吸引社會名流參與的新天地。地方取自商業的捐稅大多避開縣衙，“由士紳管理和不經官吏之手”。[[5]](#_5_Zhang_Yu_Fa____Zhong_Guo_Xian)

地方名流的管理工作，伴隨有大量的理論著作的出現。關注地方政府曾經是19世紀60年代“中興”的一個重要部分，當時中國面臨隨19世紀中期叛亂而來的混亂與破壞。[[6]](#_6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h)省當局所作的努力，是采用加強傳統的控制和宣教機構以鞏固地方稅務和秩序的基礎：整飭縣政，振興儒家教育，重建地方經濟。與此同時，有的人在尋求新的途徑，認為只有找到一種新辦法控制社會名流的能量，帝國體制才能存在下去。爭辯者（最有名的是馮桂芬）認為地方名流多年來非正式的政治勢力不是帝國控制的合適基礎，需要進一步加強縣級及其以下的行政管理。清代末期的幾十年，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認為，中國政治體制的復興有賴于對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新辦法。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問題是，是否要通過吸收社會名流到地方自治機構中來，從而達到把他們的力量用于國家的目的，或者，一個向下延伸到村級的更官僚化的控制系統，是否更適合中國的政治傳統。

19世紀90年代末，由國際壓力突然引起的危機，使解決這個問題有了新的緊迫感。社會名流對外國壓迫者的義憤（和暗地里對不能保衛國家的滿族人統治政權的不滿），導致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范圍。戊戌維新運動包含一股值得注意的地方積極精神的潮流，它預示著利用好地方名流的力量將是建成強大國家的唯一途徑。像黃遵憲這樣的改良派人士，在呼吁以地方自治作為強國基礎之時，心目中顯然以日本作為榜樣。黃遵憲斷言，官方的控制只能導致依賴和被動，而這正與全然覺醒的民眾的素質背道而馳。[[7]](#_7_Huang_Zun_Xian____Zai_Nan_Xue)

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以及義和團運動的災難，加強了要求立憲的呼聲；人們認為立憲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要求在地方政治方面實行改革。康有為在1902年寫到，地方自治對國家復興來說是必須的。關鍵是動員民眾的力量，特別是動員地方名流的力量。只有在管理自己地方社區的策略方面長期研究，才能使中國人適于在競爭的世界中生存。康有為在文章中吸收了顧炎武在17世紀信奉的舊“封建”思想，地方人士對他們社會福利的關心遠遠超過按照回避原則從別處調來的官吏。康有為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動員民眾的力量，完全是那些國家的地方自治長期實踐的結果。經濟發展和國家強盛必然會跟隨地方政治力量的動員而來。可通過立憲制度把這些力量用于國家，地方主義決不會減損國家的凝聚力。相反，康有為認為兩者是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8]](#_8_Min_Dou_Ji____Qing_Dai_Feng_J)

在立憲派中間，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是地方自治這一新思想的最主要的推動者。他認為自治將主要有益于中國的民氣。自治絕不是一種分配權力的方案，而是一條加強內部紀律、充實整個國家的途徑。雖然沒有官吏從“外部”統治他們，但是民眾會最終為一系列的社會法則激勵，朝向他們共同的目標邁進；這個目標就是國家的團結和強盛。和康有為一樣，梁啟超相信自治對個人性格并最終對群體起到改造作用。立憲派的主要對手章炳麟，作為同盟會的發言人，帶頭抨擊“封建”思想。中國數千年以前就脫離了封建時代，它不同于西方國家——更不必說日本了。他認為，那種以為中國適合于實行西方變體的代議制政府的觀點是荒謬的；它只會在從政者中導致追求自我利益和相互競爭，并在地方社會中導致無政府狀態。（可能是作為革命的后果）所需要的是一個肅清腐化、紀律嚴明的適應統一的民族國家各種需要的官僚政體。[[9]](#_9_Kong_Fei_Li____Wan_Qing_Guan)

晚清官方關于地方自治的觀點，大部分是由袁世凱的活動和提議形成的。袁世凱在1902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后不久，即開始在天津建立現代化的警察和教育制度。天津被列強視為它們通向京城的路線上的一個樞紐；在義和團事件后，有效率的市政管理被認為是避免中外沖突一再爆發所必需的。袁世凱的計劃不僅包括現代的警察和學校，而且包括吸收和利用地方名流的措施。這要通過在天津府屬各縣實行代議制去做到。新的警察局首先在天津縣示范，進行居民普查，作為制定選民名單的基礎。天津縣議事會在1907年選舉產生，成為清政府建立名流代議機構的樣板；清政府認為，這種代議機構在對待地方自治權限范圍的問題上，應恪守基本保守的觀點。在采取這一步驟走向以名流為基礎的立憲制度的同時，袁世凱開始把新式警察系統擴展至直隸的其他地區，從而把地方治安系統牢固地置于官府的控制下，加強了知縣的權力。[[10]](#_10_Si_Di_Fen__R_Mai_Jin_Nong)

義和團事件以后列強撤出，華北地區處于無政府狀態，袁世凱以名流為基礎的民主制和官府控制結合起來的試驗，可看成是他對所接管的這一混亂局面作出的反應。在日本人的影響下，較為嚴厲的政府控制，將會在地方名流的合作下建立起來。

這種觀點也體現在清廷自己對地方行政的看法上，1908年頒布的法令授權逐步設置地方諮議局作為全國立憲制度的基礎。朝廷認為地方自治只是傳統的紳—官關系的延伸；在自治中，地方名流能夠做那些縣政府不能執行的工作：主要是在教育、公共救濟和公共工程等固有士紳管理領域內。在官府密切監督下，自治團體在地方政府中起純粹的補充作用。當然，這里沒有我們先前在維新派分子的著作中見到的動員民眾的熱切呼喚。[[11]](#_11_Di_Fang_Zhi_Zhong_You_Hen_Du)中國地方政府的改革將在以后的30年中搖擺于這兩種概念之間：追求動員和追求控制。

### 議事會和“新政”

政府支持的憲政，盡管有種種局限性，但對地方政治的沖擊還是巨大的。一旦清廷本身開始承擔起有限的制度改革，建立合法的機構加以實施，地方名流固有的積極精神便大規模地發揚出來，這正是國家機構壓倒之勢的威信的標志。庚子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羞辱震撼了全國，導致朝廷支持的措施出臺，從而開創了地方名流參政的許多渠道。其中首要的是1901—1905年的教育改革，首先是授權創立一套仿照日本的新式學校體制，采用西式課程。當1905年傳統的科舉考試制度廢除，新式學校成為社會流動的標準渠道的時候，隨之而來的是名流大量參與新體制的管理。地方政府經費與人員的不足，使得新式學校系統主要成為地方名流的事業。1906年根據敕令在各縣設立“勸學所”通常安排地方名流任董事，他們立即埋頭于全縣范圍的基金籌集和管理工作。正如教育是為了地方的文人學士，官方新委辦的商業公所是為了商人和廠主。和新的學校系統一樣，商業公所是一種非官方負責的系統，名流活動家可借以在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12]](#_12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_1)

然而，采取市議事會和縣議事會形式的地方自治，是縣名流進入政界的最重要的渠道。它的機構的聲望接近于官府，引人注目，而它介入政府事務的能力，似乎就是對地方精英議程上的一些長期忌諱的問題發言。其中一個主要的議題是采取控制公共財政的某種措施，因為公共財政被看作地方官吏和幕僚過高收益之源，對社會并沒有什么益處。自19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地方自治一直是維新派的戰斗口號，現在已是清廷1908年明令宣布的新憲政綱領的正式組成部分。省諮議局代表選舉法頒布后不久，清廷（在1908年8月27日）宣布可以制定設治的城和非設治的鎮鄉的自治章程。1909年1月18日，北京頒布了這些自治章程。[[13]](#_13_Fen_Che____Zhong_Guo_De_Min)各級行政單位的自治也隨之登臺：1910 年2月6日，北京頒布府、廳、州、縣的議事會章程。

建立議事會的過程首先是舉行選區（1909年詔書規定的城和鄉）的選民普查，并向民眾宣傳地方自治。這些工作委托給縣名流組成的新的自治事務所和自治研究所。像公民權本身一樣，兩所管理人員限由有財產的或受過教育的名流擔任。考慮到這是嶄新的事業，議事會的選舉和召開如此之快是非常驚人的。例如，在比較先進的東部省份，地方議事會在1911年秋開會。無論對選舉和議事會實質的理解多么模糊，很顯然有一股參與地方政治的強大動力。除上述行政單位建立議事會以外，縣議會的選舉也在1913年初舉行，這就是說，縣選舉與縣城選舉是不同的。是由20人組成的每一議會，選舉出參議會，由縣知事任議長。此舉看來為名流參與正式的地方政府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礎，它標志著與過去體制的根本決裂。[[14]](#_14_Xiao_Bang_Qi_Suo_Zuo_De_Zhe)

不管地方士紳和商人多么熱心自治，最初階段的進展速度看來很可能取決于官方的態度。江蘇雖然以有積極參與和高度商業化的名流而聞名，但在進程中由于南京兩江總督遲疑不決，而明顯地受到阻礙。

清廷“地方自治”綱領的理論基礎，仍然是保護官方特權。正如立憲籌備局指出，名流管理的地方性活動的范圍，從未很清楚地與官方統治范圍劃分開來。所以官方的軟弱必然導致名流的越權，反之則處于無休止的爭議之中。明確劃分“地方人士管理地方事務”的范圍，有可能使地方名流的積極參與和官方的壓制都不至過分。地方自治必須限于“官方政府”不能執行的職能，即官方系統無力提供的公共服務方面。這純粹是為官僚制國家——它把地方權力委托出去——認為合法的一種輔助職能。[[15]](#_15___Da_Qing_Guang_Xu_Xin_Fa_Li)教育、公共衛生、道路維修、公共救濟，加上像電氣化和供水系統之類的“改善”，均屬“士紳”傳統關切的范圍。如今這些職能由明確的授權劃定了范圍，并由選舉出來的地方社區代表來管理；在朝廷看來，對于國家官僚體制的權力是一種安全和有用的附屬物。很明顯，這種辦法保證公共服務職能得以執行而不冒官僚政治受到太大的政治挑戰的危險。

實際上，地方議會和議事會的事務范圍與傳統的名流事務范圍相比，并沒有很大的區別。諸如供水系統的維修、教育和公共救濟之類傳統的項目，都列在它們的議事日程上。為這些組織的活動籌措基金，常為它們討論的問題。自治組織沒有既定的地方收入基礎，只有在正稅邊沿上籌集基金。特定的商業課稅（類似厘金），土地正稅之上的附加稅和有限的政府接濟，它們簡直不能為充滿活力的地方政治提供充足的物質基礎。

名流參與地方政治的潛力，由登記條件放寬、選民數量迅速增多的現象表現出來。1909年選民約170萬人（其中約100萬人實際投票），只構成全國人口的0.42%。在1912年君主政體瓦解后，登記章程更為開明（根據居住地而不是傳統的“出生地”，要求財產和教育的條件也較寬松），選民可能達到了4000萬人。[[16]](#_16_Fen_Che____Zhong_Guo_De_Min)雖然我們對早期地方和省議會選舉中投票者的興趣和行為所知甚少，但是由縣級關切的政治事務范圍可以看出，對地方發展普遍關切，對縣財政問題普遍有爭議。鎮議事會和縣議事會逐漸從傳統名流關切的事務擴展開去，創辦了諸如電燈公司和現代診療所之類的現代企事業。

縱觀民國時期代議制的議會存在的近20年，可以看出它的發展過程呈現兩種對抗的趨向。其一是在較為先進的縣，名流擴張和部分政治化。議會和議事會，作為表達政治利益的一條渠道，對于名流權力的傳統機制不適應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和經濟體系的一些縣，尤其重要。（在較落后的地區，設立新的公共機構顯然不太有用；傳統的親屬關系和經濟聯系仍是地方名流所需要的。）

另一種趨向是官僚政治的權威通過強制的方式重新逐步地樹立起來。面對難以駕馭的地方議會運動，袁世凱下令廢除地方自治，代之以一種更適合官方控制的形式。袁世凱的體制在縣以下保留了區，其轄區大小為每縣只設區4—6個，區長實際上是縣政府的官吏，不是社區選舉的代表。[[17]](#_17_Can_Yue___Jian_Qiao_Zhong_Gu)袁世凱去世及其帝制失敗之后，地方議會從1921年到1927年有過第二次短暫的繁榮；但環境已經改變。專門的行政部門已經出現，掌管諸如教育之類職能，所以議會如今只是開會為這類機構籌資，而不是管理它們。而且縣知事通過參事會——成員僅有一小部分由議會選出——收回了大部分控制縣事務之權。這樣，袁世凱對議會制的攻擊，可以看作只是重新強力推行官府控制的總趨向的一個極端例子，羽毛未豐的地方名流政治機構敵不過這種趨勢。[[18]](#_18_Xiao_Bang_Qi____Zhong_Guo_Mi)

名流領導的議會運動在農民中也不受歡迎。從一開始，地方自治在縣一級顯然不可能在民眾中組織起支持者。相反，在許多地區，還偶爾發生民眾的暴力事件，以之作為對那種被視為僅僅是名流另一種投機活動的反應。尤其是民眾對新式學校泄憤。這些新式學校比傳統學塾花費超出甚多；其經費必須以日常零售商品消費稅和土地附加稅的形式從平民中籌集。由于新式學校和傳統學塾相比，農民更難進入，所授科目對他們又不太有用，新式學校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征稅于民而無利于民。民眾憤怒的另一個目標是地方自治機關本身；有的項目，如為造選民名冊而進行人口調查，使民眾害怕是征收人頭稅的前奏。普遍以地方寺廟充當學校或自治機關之用，觸犯了民眾的宗教情感。自治運動早期接二連三地引起騷動，導致縱火焚燒新式學校和自治運動領袖的住宅。地方名流使自己陷入一種境地，即看來是最進步的改良與發展計劃，卻被視為經濟上的剝削和文化上的觸犯。[[19]](#_19_Can_Yue_Ben_Shu_Di_6Zhang__B)自治正迫使改良派的名流與保守的農民進一步分開，而不是創造出一種由名流領導和民眾支持的充滿活力的地方政治。縣級名流上下都無同盟者，既不大可能從下而上地改革中國的政治制度，也不大可能成功地與復蘇的官僚政治國家競爭。[[20]](#_20_Wang_Shu_Huai____Qing_Mo_Jia)

## 區域政體

從構成憲政運動的提議、章程及地方權力競爭的一片混亂中，出現了一些改組地方政府的具體活動。由于中央政府失去在地方貫徹其意志的能力，這類活動首先在省的保護下扎下根來。這一情況實不足為怪。活動是從山西省的軍閥領袖閻錫山的計劃開始，他打算通過把新的重點放在村級組織，以便更好地控制山西。省里的這種創議由于是從軍事掌權者開始的，所以不大可能很重視民眾動員或參與。盡管這種計劃無不冠以“自治”的美名，但是實際重點卻完全在另外的方面。

### 山西計劃

由山西督軍閻錫山在1917年創始的“村制”，是能說明下面過程的例子，官僚政治的解決辦法是從自愿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綱領中產生出來的，并最終成為民國時期地方政府的主要統治形式。閻錫山的村制是兩種趨向的產物，兩者的意圖都是保守的：第一，袁世凱（在1913—1914年）取消縣和省的自治，接著推行區的地方行政“實驗”制度，區是縣以下大體上與傳統的鄉規模相同的單位。根據袁世凱1914年的計劃，這些區由任命的區長管理，區長實質上是縣政府的助手。區被閻錫山采納作為縣與村的橋梁；每縣三至六個區，主要作為警務與稅務的行政當局而發揮作用。第二，閻錫山利用鄉紳想通過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得鄉村復興的積極參與的傳統。

山西村制的起源可追溯到鄉紳領導的模范城鎮河北省翟城；翟城實驗后來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作為定縣計劃的基礎而很有名（見下）。翟城米氏家族積極參與地方教育和自治，甚為成功，縣知事孫純齋宣布該鎮為模范鎮，后來該縣本身又為模范縣。孫純齋于1914年任定縣知事。兩年后他被閻錫山選為山西省省長。不管他的提升是否歸因于他在村級行政管理上的獨特經驗，他抓住這個機會力促他的恩主閻錫山推行他振興地方政府的方法。孫純齋任職不到一年去職，但這種新的行政體制仍然是閻錫山實行地方控制的基本戰略。[[21]](#_21_Yin_Zhong_Cai_Bian____Di_Che)

閻錫山的新村制正像它的發展所顯示的，與袁世凱政府1914年頒布的地方自治章程相當一致。這些章程的目的在于馴服民國初期生氣勃勃的縣和省的政治活動，因為在縣、省的政治活動中，地方名流與官府爭奪對寺院財源的控制權。袁世凱廢除省、縣議會，目的在于地方政府中有更多的官府色彩；基本單位區的行政轄境太大，難與任何縣以下的自然單位一致（例如太大，難與標準的集市鄉鎮一致）。它的含義是清楚的，縣以下的自治在經過一系列的規定階段以后終于出現時，對官吏的監督比對地方社區的政治組織更易作出反應。[[22]](#_22_Guan_Yu_Yuan_Shi_Kai_De_Fa_G)新“村”制所增加的單位就是村，類似清代的“編村”，在村內，小社區一般在村長領導下相互聯系起來。村制隨著在山西的發展，變成了一個傳達政府指令的次官府結構。村長一般不識字，依靠縣當局指派，幾乎不能獨立地主動行事。一份1922年的督察報告斷定，他們甚至不能有效地貫徹官方的命令。區長能力較強，雖然全是山西人，但都不派在本縣任職，這等于把前清“回避規定”擴展到縣級以下的行政單位。作為低級行政官吏，他們不可能鼓動“自治”之類的有生氣的地方政治運動。然而，省政府的直接任命使他們在官僚政治體系中有較高的地位。

山西村制的官府氣味，在劃定行政村界的活動中得到加強。劃定村界是以已知的行政管轄權代替慣常的人際關系。更重要的是它對土地稅的管理有用。行政村起的作用相當于清代催征稅糧的里甲，可是如今有了根據閻錫山當政初期進行的地籍測量所劃定的更準確的村界。[[23]](#_23_Li_Jia_Dan_Wei_De_Yan_Bian_J)

就行政史而論，閻錫山大受吹捧的“村制”，只不過相當于實質上的舊時帝國稅政體制，加上自愿主義的自治外表，附以十進制戶口單位的舊保甲監視系統的翻版而已。

在這方面，閻錫山的村制是20世紀把整個征稅責任確定在村，從而加強村作為政治行政單位做法的一個例子。成問題的特別稅以“攤款”聞名，這是為滿足政府不斷擴大的需要而向地方社區特別征收的。攤款最初是一種支付巨額的庚子賠款的方法，但后來成了為省及地方政府的現代需要，特別是軍事需要而籌款的通行方法。閻錫山在建設軍隊方面的成功，多歸因于他卓有成效地由村經辦攤款向地方社區征稅。這顯然是他的“村制”的預期結果，不管如何用改良主義的綱領加以粉飾。

然而，改良主義綱領還是為山西取得了名聞全國的聲譽。舊保甲和里甲的規模被用來推行禁止纏足、禁吸鴉片、公共治安和識字運動，取得明顯效果。梁漱溟強烈批評閻錫山計劃的官府色彩，卻覺得它在社會改良方面頗有值得稱道之處。總之，我們可以這樣評價山西計劃，它是一個積極行動的省政府堅決把官府權力向下推行到村級所做的努力。把它歸功于米氏家族的翟城實驗，大多為虛浮之詞，但是，當時有一共識：密切注意縣以下的政府是20世紀議程上的重要問題。[[24]](#_24_Di_Cheng_Di_Fang_De_Gu_Chui)

山西不是推行地方政府改革的唯一省份。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努力是，“桂系”通過實施全省民團制度來加強地方政府。通過訓練村鎮領導人員，并把他們列入民團干部，希望把軍事紀律的精神灌輸給他們，以便省當局的命令能有效地傳達到下層。這些首領還在“基干學校”體系里擔任教師，促進識字運動，培養公共精神，和鼓勵經濟自足。從嚴格的軍事觀點看，民團可作為全省征兵的基礎。其理想是古老的“兵民合一”思想，不僅是為了建立豐富的兵源，而且要把高度的紀律意識灌輸給全體民眾。這種制度在1933年開始實行，但是沒能擊退六年后日軍的進犯。和山西制度一樣，廣西模式旨在通過加強省官僚政治的權力，使之滲透到鄉村社會，來實現地方的管理和發展。[[25]](#_25_Qiu_Chang_Wei____Guang_Xi_Xi)也有人認為省辦民團能排斥有勢力的“土豪劣紳”控制下的固有的地方民團。

省里的這類主動精神，往往能反映其軍閥靠山們的興趣和氣質。山西制度強調保守的社會目標和道德的提高；廣西則在社區建設的詞藻以外，強調尚武的民族主義。兩者都贊頌地方自治，但它們的實質是官府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兩者都決心使官府在組織的最低層做到有效的控制，實際上是把官僚政治擴展到它晚清的層次，也就是縣以下。在這方面，山西制度尤其重要，因為它影響了1928年以后南京政府的地方制度。

## 南京政府關于地方行政的早期政策

作為保證社會改造和國家統一的運動，20世紀20年代的國民黨人取得政權，承擔著實現孫逸仙的民主中國理想的責任。這個理想體現在《建國大綱》中，表達了他在憲政問題上成熟的觀點。《建國大綱》發表在1924年，當時國民黨與蘇聯的聯盟正在積極進行，值得注意的是它反映國民黨左派的觀點甚少。實際上它是孫逸仙長期堅持的如何實行民眾主權觀點的重述與完成。

孫逸仙認為不習慣于立憲政府和政治參與的形式和觀念的國家，建國必須遵循自下而上，從縣到省，到中央的順序。公民必須在國民黨的監督下，根據縣的模式，在“自治”的形式和實踐方面接受訓導。在政治發展的這個“訓政”階段，黨的領導目的在于使一個省內所有的縣實現“自治”，然后在省本身實現“自治”。當大多數的省份能夠如此自治時，國民大會即可頒布一部以五權分立為基礎的憲法。

這種從下而上的政治發展模式，無非是孫逸仙由康有為、梁啟超及其門徒在20世紀頭十年中，大肆宣傳的“自治”理論中引申而來的。孫逸仙顯然早在1912年就信奉地方自治的思想。他認為，地方自治是一個強盛、統一的國家的當然基礎。他的理論基礎，不論在論調上還是在實質上，與我們討論過的梁啟超的理論基礎幾乎沒有什么不同。至1916年，孫逸仙已經把地方自治與他的含糊但令人深刻感覺到的平民主義聯系起來；為避免舊時的專制政權更迭不已（它曾是大部分中國歷史的特點，而今又在民國重演），需要使民眾成為政府的基礎。要做到這一點，政府的機構必須從下而上地重建。國家最高層的結構就如同是房屋基礎上的屋頂橫梁。

然而，孫逸仙有關國家政治發展的理想實質，不能單從平民主義的自治的基礎上去理解。雖然他對同時代的美國的諸如創制、復決、罷免之類進步措施的印象很深，但是，他也深信需要名流領導來訓練中國民眾去使用這些權利。“有識之士”是現代化的名流中最開明的人士，將引導民眾走向民主。中國民眾天性溫順馴服，因而是這種名流訓導的極為適當的對象。[[26]](#_26_Sun_Yi_Xian____Jian_Guo_Da_G)真誠希望有一個民主的中國出現，同時深信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堅定的引導，這樣的混合體從一開始就浸染著孫逸仙的政治思想。國民黨執政者在1928年以后鞏固他們權力的過程中，發現這兩種因素難以相容；在后來的年月里，這對他們來說，證明是一個難解的問題。在新的國民黨政府采用孫逸仙的《建國大綱》作為指導文件的時候，這個政府在地方行政上幾乎沒有經驗。這個理論的歷史根源混亂，加上表達含糊不清，毫不奇怪，很難在中國的地方社區產生一種可行的立憲民主形式。

### 地方政府的官僚主義化

國民黨政府對待地方行政的政策演變，表現出一種偏離孫逸仙的地方自治概念，并向著更有力的官府控制體制發展的總趨向。在這個過程中，地方名流參與社區事務管理殘存的一些方面，成了反復攻擊的目標。許多這樣的行為發生在國民黨內保守思想復蘇的環境里，也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標志國民黨政府對待民政的態度的特點，即狂熱追求國內治安的環境里。

1928年9月，南京政府頒布了《縣組織法》的最初文本，它試圖既規定地方政府的行政結構，也規定代議制的民主職能。縣的行政機關本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在縣長直接領導下的職能科，另一部分是由省政府同名的廳控制的專門局。例如，縣政府的財政科有省財政廳控制的財政局與之平行。這種奇特的職權劃分，實際目的是把（委托給局的）純地方的職能與（由縣政府的科處理的）省及國家的職能分開。縣長不控制局長的任命，意味著地方行政相當大的部分（以及為它提供的經費）留在縣長控制之外。例如，地方教育由教育局管理，教育局長直接由省教育廳任命。[[27]](#_27_Xie_Zhen_Min____Zhong_Hua_Mi)

縣組織法也試圖規定縣級以下的政府單位及其在代議制政府體系中的作用。以山西為榜樣（山西省長閻錫山被任命為新的南京政府內政部長），建立起一個多級行政單位體制。直接在縣下的是區，自民國初期以來就是一個重要的行政次級單位。區的范圍未作明確規定，根據地方條件從10個鄉到50個鄉不等。然而，和它的山西榜樣一樣，區顯然是比任何自然社區所能界定的要大得多的單位，它適合官府的行政管理或劃分選區，但不適合地方自治。[[28]](#_28_Zhao_Ru_Heng____Di_Fang_Zi_Z)區以下為自然社區。在鄉村，100戶或更多為村，在城鎮，同樣大小為里。在村或里以下為一種互相監視和共負地方責任的單位，即研究中國史學者所熟悉的保甲。但在《縣組織法》中稱為間和鄰（25戶為間，5戶為鄰）。除區以外，每個自然社區最后須有選出的首領和議事會。然而，在舉行地方選舉以前，首領要由縣長任命。

不論《縣組織法》付諸實施的前景如何，若根據國民黨政府明確承擔義務要執行的孫逸仙《建國大綱》的規定，原來的《縣組織法》中有關地方民主的條款，是人們所能期望的最少的。縣既須是行政單位，又須是自治單位；縣長是由科長和局長組成的縣政會議的主席，與之平行的有選舉出的縣參議會——擁有審查預算和政績的廣泛權力。在縣以下，所有單位都被整個看作“自治”機關，有選舉產生的區長及下級參議會。自然，在選舉程序制定出來和民眾受過自治實踐教育之前，這些級別的人員仍由縣長任命。[[29]](#_29_Xie_Zhen_Min____Zhong_Hua_Mi)

然而，實施這樣一個地方民主化計劃的環境，有可能導致要求更大的控制，而不是要求更大的地方自治。為內戰的頻仍和外國的侵略以及世界經濟大蕭條的社會影響所困擾，政府視國內治安為當時大家最關心的事。結果是加強了國民黨內部，與民眾參政相比，更注重官府和軍隊效率的分子的力量。從1928年末開始，南京政府完成了《縣組織法》的修訂，它具有加強官府行政的作用，同時推遲實施地方自治的日期。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民政廳的代表的會議認為，縣組織法在推行縣參議會方面過于倉促，民眾對此沒有準備。召集參議會要推遲到區長民選出來以后。接著把召集參議會規定為不遲于1933年。[[30]](#_30_Qian_Duan_Sheng____Min_Guo_Z)（對召集縣參議會的猶豫不決，使人想起30年前袁世凱對于這類組織的懷疑態度，當時地方自治運動幾乎被摧毀。）根據民政廳代表會議的精神，立法院通過一項法律（1929年5月11日），確認縣長在有關地方自治所有事務方面的“訓導”職責。這項法律還通過把區長的任命直接置于省民政廳權限之內，以加強省政府在地方行政方面的作用。縣長負責提出所在縣專門職能局的局長人選，由省政府任命，從而擁有控制這些局的較大權力。[[31]](#_31_Xie_Zhen_Min____Zhong_Hua_Mi)

同時，發現縣以下行政的原有模式不適于普遍采用。經南京政府修改的山西“行政村”制，接近于舊保甲的用數字表示的聚合體原則：一個行政村應有100戶左右，把幾個小自然村連接起來，由政府任命的首領管理。南京政府現在發現它與自然聚落單位太不一致，遂頒令恢復更習用的民國初期的“鄉”、“鎮”的名稱。[[32]](#_32_Tong_Shang_Shu__Di_830__831Y)這也是放棄單一的國家地方行政制度，同時承認南京控制華東和華中以外的省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

就自治和行政改革而論，省長們越來越發現《縣組織法》的宗旨不實用。內政部主辦的兩次省民政官員會議，作出了旨在沖淡原來宗旨的決議。1931年舉行的第一次“內政會議”，決定放松對地方單位規模的嚴格的數字限制；限制鄉和鎮的行政聚合體不超過1000戶，在稠密居住區是不現實的，因為這會造成地方控制網絡過細，在經費或人員配備上都不能做到。而且，限制區長只能由經過訓練的地方政府人員擔任也不現實，因為訓練所需人員的設施不足。最后，要求在1929年底以前全面實施《縣組織法》，由于各省條件參差不齊，也發現是不現實的。

第二次會議在1932年12月召開，這次會議進一步抨擊了《縣組織法》。由于地方傳統和社會條件千差萬別，實行全國統一的制度已不再認為可行。今后，無論縣以下地方單位的規模，還是其組織原則和命名方法，都無須聽命于南京的內政部。更值得注意的是對自治作為地方組織的原則加以攻擊。縣以下單位，從區開始向下，原為《縣組織法》指定的純自治體；而今地方自治只是那些單位職能的一部分——它們也應是縣官員領導的低級行政單位。縣本身如今主要是行政單位，作為自治單位只是次要的。在所有層次，自治職能受到的約束更緊，例如，警察只是國家行政機關的事，而不是任何自治體的代理。根據推薦的行事方式，縣長對自治體的預算和活動有更大的監督權，包括對自治議會通過的任何決議有實際的否決權。由各省民政廳長提出的這些建議，目的在于監督和控制自治體，甚至要把它們變成縣政的輔助的分支機構。同時，這些建議等于承認南京政府以改組地方行政體制的標準化形式，來貫徹其法令的權力非常有限。[[33]](#_33___Nei_Zheng_Bu_Nian_Jian)

第二次民政會議建議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裁撤縣政中的專門局，把它們的職能歸入縣政府的相應科中。這種意見的意義超出了單純簡化的范圍。它具有通過加強縣長對公共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力，使縣政恢復更為習用的模式的作用。然而，加強縣長的權力本可以不那么依靠傳統的辦法，而更多地依靠“CC系”擴大它的影響，即通過把中央政治學校受過現代化訓練的畢業生安插到國民黨控制的省份當縣長。如果是這樣，那么清代以來縣長權力的減弱真正是一個嚴重問題。例如，蔣介石在1932年抱怨增設專門局分去了縣長的很多權力；他說，實際上是省政府類似的廳擁有任命和監督縣里局長的權力。[[34]](#_34_Cheng_Fang____Zhong_Guo_Xian)

新政策下受損失的是省級的專門人員，以及民國初期以來即參加專門局工作的地方名流。而今這兩部分人都不能對縣的財源有多大的控制。只是截至20世紀30年代，地方名流介入縣專門局有多深仍是個有待研究的問題。看起來他們的介入從民國初期就有所減弱，當時地方文人學士對諸如教育和經濟發展之類的專門局頗能控制。如果是這樣，那么20世紀30年代成為政府改革口號的裁局改科，就是使縣政府恢復到更為司空見慣的官府模式的最后一個步驟。削弱地方的這類參與，同國民黨統治初期發生的實際放棄地方自治的計劃如出一轍。[[35]](#_35_Qian_Duan_Sheng____Min_Guo_Z)

到1937年，這類政策大都已被采納，它們十分切合當時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指揮的“剿匪”（反共）戰役的精神。我們在接觸到作戰文書檔案以前，只有依靠推理來判斷這種官府化的努力來自何方。[[36]](#_36_Zhong_Guo_Guo_Min_Zheng_Fu_J)但是，有跡象表明蔣介石和他的親密顧問支持這些政策。

例如，裁局的計劃似乎于1932—1933年出自湖北，可能得到了蔣介石手下張群的支持，作為減少行政開支運動的一部分。這項計劃為鄂豫皖共產黨根據地“剿匪”方面采納，成為縣級的官方政策。1934年3月，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召開省主席會議，研究新的民政措施，作為其在江西及其他“剿匪省份”軍事圍剿的補充。“裁局改科”的思想在蔣介石的秘書長楊永泰的報告中，被宣布為普遍的政策。正式條例于1934年12月頒布，供所有剿匪省份實施。不論這項改革是否達到了加強縣長權力的目的，必須承認它所取代的制度是浪費的和混亂的。讓公文在縣專門局與省會的對口廳之間往來，不經過縣長辦公室，是削弱縣政府，又是向地方政治注入另一種保護制度的做法。

30年代中期另一個官僚政治的進展，是重新設立區為縣以下的公安單位。人們當能想起區原是從山西樣板借用來的，最終應擔負自治的權力。以后只是暫時放棄區，贊同民國初期以來的三級自然單位制。但是，30年代的反共作戰又使得區的地位突出起來。這項措施由鄂豫皖剿匪總部首倡（和裁撤廳的措施一樣），于1932年具體化，成為一種能夠引入監督重建的保甲制度的公安機構的方法。這項措施也在1934年南昌會議上得到蔣介石認可。問題是只加強縣一級政府是不夠的。楊永泰抱怨說，區以下仍然是“土豪劣紳”的世界。這些人大概更可能引起叛亂而不是平息叛亂。[[37]](#_37___Ge_Sheng_Gao_Ji_Xing_Zheng)無論如何，這樣的地方名流沒有被看作是改革后的縣政的有效工具。五個剿匪省份（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及福建）如今（1934年12月）奉令在每縣設立三至六個區，區長經縣長推薦由省政府任命。借自山西制度的官僚政治的特征，是區長不能在其家鄉縣內服務；回避的規定傳統上是正規官僚政治的約束手段，如今用來控制縣下一級的人事安排。[[38]](#_38_Cheng_Mao_Xing____Jiao_Fei_D)

在縣、省之間，加緊官府控制也留下了痕跡。雖然南京政府已裁撤民國初期沿用清代的中間一級的道，但是，30年代地方行政的特殊困難，導致若干省政府重新實行這一級的監督。稱為行政督察專員的官員，于1932年首先在剿匪省份任命，但漸漸更廣泛地設立此職。治安，特別是反共作戰，是他們的主要事務。這種新設的機構是由這樣一些組織，如江西為反共而設立的“黨政分會”發展而來的。頒布這一制度最初并未通過中央政府的正常程序，而是（和剛才討論過的縣級措施一樣）通過剿匪總部。由于按照憲法綱要其合法性可疑（憲法綱要正式規定省縣兩級制），行政督察專員在最后出現的行政院指示中被看作“臨時措施”。實際上，“道級”督察專員（往往由縣長兼任）的職務，必然引起源自南京政府和剿匪總部的民政與軍事條例混淆不清的混合狀態。[[39]](#_39_Qian_Duan_Sheng____Min_Guo_Z)這種監督層次的重疊，違背國民黨理論上繼承的精神，即強調民眾動員而非官僚政治的機器。給人深刻印象的地方行政中層單位的繼續存在，也表明在一個交通不便、行政手續繁瑣的國家里，省—縣間的聯系長期不暢。

人們很可能想知道，國民黨本身是否對促進地方政府與社會之間新關系的發展作出過什么貢獻。雖然孫逸仙設想國民黨為“訓政”的監督者，實際上，縣級國民黨黨部卻發現它們幾乎無法影響地方官府的所作所為。縣黨部在經費上靠政府撥給，在威信上（和在接近省高級官員上）低于官僚政府，充其量不過是使縣長感到掣肘而已，幾乎不大可能充當擴大民眾參與地方政府的核心。在這一點上，如在其他方面一樣，這個官僚政治國家的影響力嚴重依賴作為整體的政治制度。[[40]](#_40_Cai_Wu_Xiong____Jiang_Su_She)

國民黨政府在遷都重慶期間，企圖調整官僚政治與參與之間的平衡，并在此過程中使地方政府恢復活力。這就是蔣介石在1939年6月首次提出，并被大肆吹捧的“新縣制”。這個新制度設想的縣政府有可靠的地方稅基礎，并且有自治的機構，但是可惜，除在戰時陪都重慶附近的地區外，它基本上仍是一紙計劃。縣財政收入應包括土地稅和某些雜稅等的指定留成，全部由縣政府自行征收，而不是由省的或中央的代理機構征收。上級政府不再能迫使縣在地方籌款用于省或國家的項目。有了這個可靠的收稅基礎，縣應該能實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制度，縣議會也就能擁有一些可供調撥的經費。縣議會由鎮和鄉的代表組成，而鎮鄉代表不外乎從保甲單位產生，而今保甲則被宣布為既是“自衛”，也是“自治”的單位。雖然在戰時沒有希望適當地檢驗這個制度，但它卻表明，蔣介石很清楚地方政府效能不斷下降及其未能博得民眾的支持。[[41]](#_41_Qian_Duan_Sheng____Min_Guo_Z)

## 鄉村建設運動

在政府盡其所能利用20世紀的觀念努力控制中國鄉村的同時，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以不同方式從事鄉村工作。1927年風行一時的“農民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并不是新東西，鄉村進步是晚清維新派關心的一個焦點。新的因素是某些城市知識分子強烈關注鄉村發展。這些知識分子大多受過西式教育，但對中國鄉村生活卻沒有多少親身體驗。他們研究鄉村問題的方法包括一些政治實驗，但是更為典型的是以鄉村的教育工作為目標。在這個意義上，“鄉村建設”也具有自由主義的信念，即認為政治制度的變革若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識變革的基礎上，就毫無意義。鄉村建設派也往往認為，在農民學會了解決他們可怕的經濟問題以前，鄉村生活的政治結構決不會是健全的。

鄉村建設和幾個基本概念有聯系。“建設”實際上看起來近似于我們的“發展”概念，可以認為是傳統中國政府的舊“公共工程”陳例的一種現代化延伸。與此有關聯的是“調查”和“實驗”的概念；“調查”講的是有關城市知識分子通過實地觀察，接觸鄉村情況的越來越流行的做法（《東方雜志》1927年8月號全部篇幅刊載這類鄉村調查報告），“實驗”包括教育及農業推廣工作的實地項目，其中有些蜚聲于國內外；“示范”大概是對這些項目的更為適合的說法，因為它們是打算用來作為全國仿效的樣板的。

名流連續不斷地關心鄉村問題，可以在河北定縣的歷史中看到，定縣是這類最有名的示范點之一。在1900年以后的“新政”改革熱情中，翟城鎮的一個望族力圖通過教育，改造地方社會——談不上是鄉村名流的新活動，而是受到愛國心和對通常的新儒家觀點徹底懷疑的推動。翟城改革的創始人米鑒三認為，孔孟之道由于過分強調自我修養，對實際管理強調不足而受到歪曲。他重新闡述清代初期的某些批判，發現隱藏在朱熹的四書集注——科舉考試的準則中的佛教影響。米鑒三本人鄉試不中，遂不許兒子米迪剛參加科舉考試，一家人在家鄉致力于經世之學。[[42]](#_42___Di_Cheng_Cun_Zhi_____Di_44)

1902—1903年，米鑒三應知縣之請，在定縣創立新式學校體系。這一體系超出標準學校模式之外，著重民眾識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年后宣傳地方自治運動時，米家自然起了主導作用。翟城不久成為地方改良的有力樣板，重點在于教育、社會習俗（禁吸鴉片，禁止纏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鑒三的兒子米迪剛留學日本回國后，把加強鄉村機構看作是全國復興的基礎。村級社區的機構（特別在強迫教育和農業信貸方面）足以形成一個鄉村社會的新的基礎。[[43]](#_43_Mi_Di_Gang____Yu_Zhi_Zhong_G)從1924年開始，米迪剛與山東改良派王鴻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個非正式的會社以推行他們的想法。這個“村治派”終于引起梁漱溟的注意，梁漱溟接著成為儒家思想導向的鄉村建設派的最有影響的人物。（我們已經看到，米家思想已被閻錫山接收過去作為山西“村治制度”的理論基礎。）[[44]](#_44_Ai_Kai____Zui_Hou_Yi_Wei_Ru)

在定縣20多年的成功之后，晏陽初選擇該縣作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鄉村試點所在地是適當的。晏陽初是個受過美國教育的基督教徒，自1922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躍。1926年，定縣被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選為其全國事業的中心；1930年，晏陽初本人從北平遷至定縣。該會生氣勃勃的識字教育以及晏陽初的國際聯系，使翟城和定縣成為吸引中外研究鄉村社會的人員的地方。定縣的工作主要是在一個擁有約60個村莊和集市鎮的“實驗區”。截至1932年，在定縣開辦的440所“平民學校”中，該會直接管理的僅為20所（其余的是縣政府開辦的，或純粹是地方創辦的）。[[45]](#_45_Kong_Xue_Xiong____Zhong_Guo)

晏陽初對中國鄉村的觀點，集中在發展鄉村人的潛力，而不是改造鄉村的組織。在國際權力斗爭中，文盲是令人絕望的不利因素，因為“盲人怎能與有正常視力的人競爭呢”？教育要超出識字范圍，救治中國的愚昧、貧窮、體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學校的計劃，因此把實際訓練與社會道德課和公民課結合起來。雖然該會對社會不公正的具體問題沒有直接批判，它的言辭的論調是平民主義的。最文明的國家是為培養杰出人物興辦教育，訓練資產階級的子弟；該會的宗旨則是為“廢除階級教育”而辦教育。其含義是，國家的強盛、民主和經濟進步，有賴于公眾意識的轉變。這一任務只有通過教育，并從社會的底層向上發展才能辦到。這樣，晏陽初的計劃與定縣原先的士紳式的事業精神并無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樣，晏陽初的工作也得到官府的贊助和保護。[[46]](#_46_Tong_Shang_Shu__Di_67__69Ye)

平民主義和官府贊助的結合，也能從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事業中看到。陶行知是作為約翰·杜威的再傳弟子投身于鄉村事業的。他于1915年到1917年在哥倫比亞師范學院學習杜威教育理論，為之傾倒，這正好與他具有的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對“旁觀者”的知識論，王陽明堅持正確的思想與正確的行動同時產生，而不是這一種來自另一種，兩者共同給陶行知愛行動的天性以推動力。在20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僅學校范圍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國民眾，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適于解決中國的鄉村問題。陶行知在積極參與以城市為基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工作之后，于1927年同時放棄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一個村莊開辦了一所師范學校。這所設在曉莊的學校，力圖通過使年輕的未來教師深入農民生活來改造他們。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成為有所作為的鄉村中小學教師。陶行知以學校作為鄉村社會原動力的觀點，與翟城鄉紳改良派的思想相去并不甚遠。未來的教師作為積極行動者，活躍于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改造倫理，改進農業和組織地方治安。自衛團在當地240個村莊中組織起來，農民受到基本軍事技術訓練。和晏陽初不同，陶行知是不會臉紅的鄉土主義者：西方既不是中國改革靈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別吸引人。

陶行知與政治當局的關系是矛盾的，他的鄉村實驗終于不能獲得任何當權者的有效保護。陶行知和馮玉祥之間有一種隱秘的關系，這位“基督徒將軍”是蔣介石的對手，欽佩并可能幫助曉莊學校的事業。蔣介石本人曾短暫地對曉莊學校的進展感興趣，但在1930年下令關閉該校，可能是因為他認為該校有社會方面激進的可能性。[[47]](#_47_Jian_Zui_Jin_Chu_Ban_De___Ta)

梁漱溟在山東的鄉村建設實驗，至少得到政治當局的暫時保護，他的實驗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義。在山東省主席韓復集（以前是馮玉祥手下的一位將軍）的頗大的授權之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于1931年在鄒平縣開辦。不僅最終有許多縣被指定為該院指導下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到1937年超過70個縣），而且有兩個縣的行政實際上交由該院管理。這樣的特殊授權，在1933年被國民黨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國民黨政府此舉顯然是既謀求控制，也想從當時正在進行的各種鄉村建設項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導山東項目的天才人物，是鄉村建設派的最明顯的鄉土主義者和社會激進分子。他的激進主義是自覺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為基礎。中國必須開拓自己的通向現代化之路。這條道路可能與接觸西方文化所滋長的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全然無關，而是要利用中國文明所固有的集體主義的和無私的精神。

和陶行知在曉莊辦的學校（該校為梁漱溟所景仰）一樣，梁漱溟辦的研究院也力圖訓練一種特殊類型的鄉村干部：受過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農民的窮困，并能與他們無隔閡地交往。這種類型的人與受過西方教育的晏陽初截然不同。晏陽初的定縣實驗中心，無疑是不崇拜中國傳統方式的。梁漱溟的干部—學員主要來自富農或地主家庭，大概對農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適應能力。在道德灌輸和個人自我修養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響非常顯著，這顯示出這所學校日常工作的特點。

鄒平的地方組織也與梁漱溟的新傳統傾向一致。縣以下的行政區劃符合以前存在的“自然”區域，以自然村和明顯的集市區域（鄉）為模式；廢棄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較大的、更屬人為的區和鄉。鄉和村級行政實體稱為“學校”，與他們對農民進行教育和推動的途徑一致。鄒平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民眾參與地方政治，至今不明。不過，鄉土主義者強調的重點至少是設想鄉村習慣的改變會很慢，并且認為把外來的新制度，或強制的官僚政治的形式，強加給農村社會將一事無成。梁漱溟認為，從下層開始的建設要求政府通過教育和推動農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認為“過多的限制，過多的主動 ‘幫助’”，只會有損于社會，實于事無補。民眾中如果沒有相應的積極精神，政府機關忙碌而進取，影響所至，對民眾只能是額外的負擔。[[48]](#_48_Liang_Shu_Ming____Bei_You_Su)

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使彭禹庭——曾任馮玉祥秘書——在豫西管理的地方組織很有生氣。梁漱溟強調回到本土的價值觀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義，而彭禹庭卻把他的組織建立在鄉村社會長期需要的自衛上。他的組織基本上是個轉變為地方政府的民團網絡。彭禹庭可能曾在馮玉祥司令部里吸取了他的某些鄉村建設思想，因為馮玉祥本人顯然對這一課題有過強烈的興趣（大概還記得他是陶行知的親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對鄉村組織的態度卻建立在更為傳統的基礎上：華北農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衛傳統。按照地方聯防協議把村莊聯系起來，由下層鄉紳領導，是對地方匪患的自然反應，并且根據情況表現出親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這可說是它的特點。然而，盡管它的地方主義色彩很濃，彭禹庭在鎮平縣的組織卻有其現代化的和愛國的一面。彭禹庭通過馮玉祥與村治派聯系起來。馮玉祥在1929年促成他與王鴻一（梁漱溟的山東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創辦河南村治學院。在意識形態上，彭禹庭在鎮平實行的地方政體有民族主義的特點，這顯然（用彭禹庭本人的話說）來自孫逸仙自下而上實行憲政建設的概念。對彭禹庭來說，不幸的是為環境所迫，他的運動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稱參加中國國民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進“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區實行“地方自治”的必要前奏，因為社會需要保護自身防備政府軍隊（“土匪兵”）的搶劫和地方官員的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鎮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幾個合伙人在鄰近的幾個縣也這樣做了）。在蔣介石的追隨者于1930年掌握了河南的權力后，彭禹庭始終拒不遵從政府的稅收要求，使他成了一個受人注意的人。他在1933年被“土匪”暗殺。在南京政府決心實行地方社會官府化，并要徹底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殘余的情況下，像彭禹庭所從事的事業很難存在下去。[[49]](#_49___Zhen_Ping_Xian_Zi_Zhi_Gai)

可以預料，南京當局也逐漸卷進鄉村建設中來。在南京當局的支持下，“實驗縣”在蘭溪（浙江）和江寧（江蘇）建立起來，作為官僚政治的地方改革的公開樣板。江寧與南京相鄰，被指定為江蘇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的樣板。江寧實驗縣由中央政治學校——一個CC系的學校——的師生充任工作干部，公開宣稱是一個實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項目，也是一個供外界參觀的鄉村建設縣。縣管理委員會監督縣長辦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匯報。該縣稅制由受過訓練的、領薪水的職員管理（自20世紀初以來即提出的一項改革措施）。全部稅收留縣，并在縣內支配——很難說是個可行的現實示范。低層單位的邊界經重劃，以便與自然村和集市一致。鄉和鎮經過適當的訓政期之后應該自治。遺憾的是，似乎沒有取得什么成績。根據前江蘇省主席陳果夫的證言，實驗重名不重實。實驗之陷入絕境在于縣長級的領導薄弱，以及很少或完全沒有對地方社區的訓導。到了1936年，實驗宣告失敗。該縣的“實驗”地位旋即撤銷。[[50]](#_50_Chen_Guo_Fu____Su_Zheng_Hui)

由上可見，鄉村建設的類型眾多：西方影響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和軍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類型的共同點是，都與政治密切關聯。通過教育及經濟改革復興農村，意味著與政治當局建立起支持和保護的關系。這當然是因為在一個組織起來的計劃中，任何同農民打交道的企圖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問題和合法性的問題，而不管該計劃是否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動。定縣計劃和鄒平計劃從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當局的同意或默許。可以說，南京實施的實驗，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方蒼白無力的反應。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獨立計劃不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持，而且引起國家政權的懷疑和反對：陶行知因有平民主義傾向和自主的作風；彭禹庭因公開反抗國家機關。這兩項非正統的實驗都被扼殺。總的來說，鄉村建設實驗最終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們全部清除干凈。留下的一份遺產是人們廣泛關心把中國建國工作的基礎放在農村社會，并且體會到鄉村改革在充滿敵意的政治環境中無法生存。共產黨人發展而成的根據地概念，是把一種新的鄉村體系納入其政治和軍事保護之中的嘗試。

### 參與與官僚政治：歷史的進程

從這里提供的材料看，本章開頭提出的兩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現一個真實的矛盾。事實上，地方自治的發展并不是在參與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多一些這兩者之間的一連串的選擇。毋寧說，它是以一種交替更迭的方式進行的，表現為民眾要求參與地方政治，卻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的格局。清廷決定制定憲法，是出自一種心態，認為參與最終將導致增強官府的特權。縣議會的歷史表明，起初是充滿熱情，地方名流廣泛卷入，但卻以縣知事操縱的參事會增選議會的領導人，從而極大地加強縣知事的行政權力而告終。

縣以下區劃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于鄉紳的積極精神和鼓吹社區者的熱忱，卻促進了一種嚴厲的官僚政治的和極權主義的地方管理制度（閻錫山的“村制”）。孫逸仙自底層向上的政治發展模式，不乏響亮的平民主義的論調和“自治”的指示，確實產生過一些有創見的計劃，本可以引導民眾更多地參與地方政治。然而，南京政權在30年代修改這些計劃的做法，意味著那些原應是“自治”載體的單位變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滲透進地方社會的單位。

參與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歷史關系中相互聯系起來。名流（和一定程度上的更廣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參與政治，確實曾激起體制改革的洶涌波濤。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國家的機構。波濤退卻以后，留下來的是它們。

[[1]](#_1_6)伊懋可：《集鎮與水道：從1480年至1910年的上海縣》，載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441—473頁。關于地方名流積極參與的興起，見本書第1章《清代權力機構的失衡》與《名流積極精神的興起》兩節。

[[2]](#_2_6)《嘉定縣續志》卷1，第4—5頁。

[[3]](#_3_6)伊懋可：《上海的行政，1905—1914年》，載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第240—250頁；雪莉·S.加勒特：《商會與基督教青年會》，載同書，第218頁；今堀 誠二：《北平市民的自治機構》，第23—24頁。

[[4]](#_4_6)《財政說明書》20卷。劉善述：《自治財政論》，第25頁。孔斐力：《中華民國的地方稅收與財政》，《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第100—136頁。

[[5]](#_5_6)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第458—459頁關于士紳卷入地方稅收，見孔斐力：《中華民國的地方稅收與財政》。

[[6]](#_6_6)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9章中的《長江下游的戰后問題》一節，劉廣京著。

[[7]](#_7_6)黃遵憲：《在南學會上的講話》，載《湘報類纂》，第307頁以下。對地方行政的評論追溯到清初顧炎武和黃宗羲的論著，在19世紀末，日本和中國學者都研究這些論著。見喬舒亞·A.福格爾：《政治與漢學：內藤湖南（1866—1934年）個案》，第182—190頁。

[[8]](#_8_6)閔斗基：《清代封建論之近代變形》，見《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28—273頁。孔斐力：《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動員問題》，載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272—276頁。

[[9]](#_9_6)孔斐力：《晚清關于政體的種種見解》，《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4集（1979—1980年），第10—16頁。

[[10]](#_10_6)斯蒂芬·R.麥金農：《中華帝國末年的權力與政治：袁世凱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第137—179頁。約翰·H.芬徹：《中國的民主：地方、省和國家政治中的自治運動，1905—1914年》，第30—42頁。

[[11]](#_11_6)地方志中有很多資料談到地方名流進入縣教育系統的情況。例如，見《完縣新志》，1933年版，第3卷，第8—9頁，第4卷，第37頁以下。另見路康樂：《中國的共和革命：廣東個案，1895—1913年》，特別是第4章。關于直隸，見理查德·A.奧布：《晚清時的直隸書院及其他學堂：制度調查》，載柯文和石約翰編：《19世紀中國之改革》，第231—240頁。

[[12]](#_12_6)見《劍橋中國史》（英文版）第11卷，第563頁，M.巴斯蒂-布律吉埃所著；《劍橋中國史》（英文版）第12卷，第721—825頁，白吉爾所著。

[[13]](#_13_6)芬徹：《中國的民主》，第104頁。憲法起草局有關地方自治的工作紀要，刊載《大清光緒新法令·憲政》第2卷，第44—62頁。又見孔斐力：《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見注8）。比較《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7章，市古宙三著。

[[14]](#_14_6)肖邦齊所作的浙江個案研究，指出這類機構的發展在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差距：《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20世紀初期的浙江省》，第31—33頁。關于山東和江蘇自治機構的詳細情況，見張玉法和王樹槐的論文，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1977年6月），第159—184、313—328頁。

[[15]](#_15_6)《大清光緒新法令》，第45頁。

[[16]](#_16_6)芬徹：《中國的民主》，第112、223頁。

[[17]](#_17_5)參閱《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4章，P.E.揚所著論袁世凱獨裁的段落。

[[18]](#_18_6)肖邦齊：《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第31—34、186—190頁和各處。

[[19]](#_19_6)參閱本書第6章（比昂科著）。

[[20]](#_20_6)王樹槐：《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1977 年6月），第319—327頁。馬飛文：《川沙的地方自治與當地民眾，1911年》，《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1集（1975—1976年），第47—84頁。羅克珊·普拉茲尼阿克：《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議：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稅與縣鄉政治》（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學位論文，1981年）。

[[21]](#_21_6)尹仲材編：《翟城村志》（1925年；臺北重印，1986年），第211頁。艾愷：《最后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于現代性的困境》，第146頁。

[[22]](#_22_6)關于袁世凱的法規，見陳伯心：《中國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第58頁以下。

[[23]](#_23_6)里甲單位的演變及其與行政村的關系可見于《潞城縣志》第2卷，第7—10頁。又見《鄉寧縣志》第5卷，第7頁；《太谷縣志》第3章。又見蕭公權：《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

[[24]](#_24_6)翟城地方的鼓吹者自然急于顯示他們的創造在全國多么有影響。見《翟城村志》，第165—231頁。山西制度的全面論述見周成：《山西地方自治綱要》，載《地方自治講義》。關于攤款及其影響，見普拉森吉特·杜阿拉：《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華北農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3年），第326—336頁。

[[25]](#_25_6)邱昌渭：《廣西縣政》，第222—241頁；《廣西民團概要》。李友華：《地區與國家：中國政治斗爭中的桂系，1925—1937年》，第170—193頁。

[[26]](#_26_6)孫逸仙：《建國大綱》，第126—149頁。

[[27]](#_27_6)謝振民：《中華民國立法史》，第826頁。

[[28]](#_28_6)趙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實際》，第77頁。

[[29]](#_29_6)謝振民：《中華民國立法史》，第825—829頁。

[[30]](#_30_6)錢端升：《民國政制史》，第553頁。

[[31]](#_31_6)謝振民：《中華民國立法史》，第829—832頁。

[[32]](#_32_6)同上書，第830—831頁；趙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實際》，第350頁以下。

[[33]](#_33_6)《內政部年鑒》1936年B篇，第639—642頁。

[[34]](#_34_6)程方：《中國縣政概論》，第39頁。

[[35]](#_35_6)錢端升：《民國政制史》，第551頁以下。

[[36]](#_36_6)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編：《各省高級行政人員奉召南昌集會紀錄》，1934年6月。關于縣政府，見《工作檢討》，第52—55頁。又見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錢端升：《民國政制史》，第556—557頁；陳之邁：《中國政府》第3卷，第83—87頁。

[[37]](#_37_6)《各省高級行政人員奉召南昌集會紀錄》，《工作檢討》，第56頁。

[[38]](#_38_6)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第111—128頁。

[[39]](#_39_6)錢端升：《民國政制史》，第526頁以下。

[[40]](#_40_6)蔡武雄：《江蘇省的黨政關系，1927—1932年》，《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1集（1975—1976年），第85—118頁。

[[41]](#_41_6)錢端升：《民國政制史》，第176頁以下。

[[42]](#_42_6)《翟城村志》，第44—47頁。甘博：《定縣：一個華北農村社區》，第146—165頁。查爾斯·海福德：《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

[[43]](#_43_6)米迪剛：《余之中國社會改良主義》，轉載于《翟城村志》，第314—328頁。

[[44]](#_44_6)艾愷：《最后一位儒家學者》，第145—147頁，有關于村治派的可信的介紹。

[[45]](#_45_6)孔雪雄：《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第112頁。

[[46]](#_46_6)同上書，第67—69頁。晏陽初的主要外國援助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

[[47]](#_47_6)見最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文選》；也見載于陶行知《行知書信集》的320封信。

[[48]](#_48_6)梁漱溟：《北游所見紀略》，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第287—288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湖北地方政務研究會調查團編：《調查鄉村建設紀要》，第75—76頁。上述關于鄒平的說明得益于艾愷《最后一位儒家學者》，特別是第238—278頁。

[[49]](#_49_6)《鎮平縣自治概況》；艾愷：《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載《遠東研究中心文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第218—286頁。

[[50]](#_50_6)陳果夫：《蘇政回憶》，第14頁；許瑩連等：《全國鄉村建設運動概況》，第530—648頁。

# 第八章 學術界的成長，1912—1949年

學術機構不僅教育后代，而且創造、引進和傳播技術與文化。現代國家的學校和學院、圖書館和實驗室，通常通過履行這些重要的職能，對國家以及一般對社會起著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國，從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直是政府所關心的一個主要問題，所以它注定要成為1949年以后中國革命的一個中心問題。同時，在20世紀上半葉，教育在多種國外的影響和參與下，以各種形式在中國急劇發展起來。大量的資料散落在各處，人們剛剛開始進行研究。[[1]](#_1_Jiang_Yong_Zhen___Ke_Wen___Mo)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當中的職務性學識比過去設想的要普遍得多。20世紀中國教育的許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從在晚清發揮作用的成千個書院那里繼承下來的社會時尚和教育方法，現代學校制度和通過報刊的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長，婦女的正規教育，出版社的興起（如商務印書館，1896年創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機構，出版刊物和教科書），以及建立教育協會和作為改良與革命溫床的新學校。[[2]](#_2_Guan_Yu_Shi_Zi_Jiao_Yu__Jian)在如此廣闊的領域中，本章的中心限于高等教育。這一事實本身證明了民國時期對重要的初級和中級教育史在學術上過于忽視。它也反映了中國的教育革新者對創立能造就新的上層領袖的高等學術機構所做的努力更為引人注目。

1911年后，中國政府長期軟弱無能，為中國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們是熱情的愛國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學者聲譽的一個階層，得以率先創立了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學術機構。他們的新作用既有知識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在知識方面，他們面臨的是必須把中、西文化傳統調和起來——就其廣度而言，大多數思想家從來沒有面臨過如此艱巨的任務。這一知識問題的巨大規模以及它被如何對待曾經在本叢書的其他卷中加以評估。[[3]](#_3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h)所以本章只集中討論20世紀上半葉學術界及其機構所取得的成就。

我們在這里面臨一個極為復雜而大半未探討過的問題，包括三個主要方面。首先，中國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學術機構史，相比之下，我們對新儒家思想的晚清學派——宋學和漢學，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的了解超過對學院、圖書館、印書館網絡以及孔學研究的贊助人的了解。第二，在中國對日本的關系上，政治大大地掩蓋了學術情況。幾千名到東京去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數回國服務，他們并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無疑在晚清繁育起來的新式法政學堂任教，但教授的內容和范圍，同日本對中華民國在其他方面的影響一樣，大量仍是未知的。第三，從歐洲和美國流入中國的教育影響構成了種類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討的廣大領域。幾乎所有國家和所有學科都被卷入這場規模最大的文化移動之中。例如，各種各樣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使團是中國教會學校的后臺，但它們只是一方掛氈里的若干細線而已。現代西方處于不斷的變化中，而中國本身也開始了多方面的變革。來自日本、歐洲和美國的教學方法、課程設置、教科書和教育制度都為教育的旋渦添加了刺激因素，在這個旋渦里中國舊式文人學士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功能都經歷了逐漸適應現代需要的過程。鑒于需要發現的領域超過了已知的領域，本章僅試圖對新領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個特點是清楚的——面對日本的擴張，包括治外法權在內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體制結構保持下來了；盡管中國的民族主義迅速高漲，外國尤其是美國，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達到了很高的地步。20年代尤其是中美兩國在科學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顯得生氣勃勃的時期。

## 現代教育機構的出現，1898—1928年

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將依次考察人員培訓，某些主要教育機構的形成，以及研究和財政資助。對每一情況，我們的探討都試圖從尚未充分考察的領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證提供出來。省辦和市辦的教育機構以及技術、職業教育機構大都處于我們的視界之外。[[4]](#_4_1922Nian_Zhong_Hua_Jiao_Yu_Ga)

### 人員：海外培訓的精英

高等教育建設的領導者們是真正杰出的一群，他們對非常時代的需要作出了反應。當中國的現代變革需要創立一個可以與出現在其他國家的新制度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時，這意味著培養學貫中西的新的學者階層——一種對悠久傳統的真正革命性的決裂。中國人能夠而且確實必須向外國人學習，這一觀點極富革命性，但與日本和印度等國相比，1860年后中國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卻顯得比較少而收效不大。清政府無法在國內提供現代學校，也無力控制派往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事實上這成為清朝覆滅的一個主要原因。新的教育精英從而在這個變革的時代里成熟起來。在建立新學校的過程中，他們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創造者，決不是現有機構的維護者。當纏足作為保持婦女順從的一種古老方法，仍在中國廣泛流行時，不難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的中國婦女的冒險精神和決心。

多種因素塑造了這些教育家。首先，他們一般都是在外國受教育的男子和婦女。以梁啟超（1873—1929年）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尋求西學，以胡適（1891—1962年）為代表的一代則到西歐和美國。這次留學的規模有多大還不完全知道，因為，舉例來說，在日本院校注冊的中國學生大大超過畢業生。據估計，1900—1937年的注冊生為13.6萬人，而1901—1939年從日本各類學校畢業的中國學生的最適當數字是1.2萬人。[[5]](#_5_Jian___Jian_Qiao_Zhong_Guo_Sh_1)留日學生所作的政治貢獻在1911年的革命史中極為突出；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卻普遍受到忽視。1915年后日本的擴張政策導致反日運動日益高漲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日益上升，都掩蓋了中國在學術上受惠于日本；今后的研究無疑會發掘這一問題并予以評價。[[6]](#_6_Wang_Yi_Ju_Zhu____Zhong_Guo_Z)

中日對抗有助于共和中國的學者轉向西歐和美國。中國學生長途跋涉來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經費，因此選拔得更加仔細，具有更明確的義務，也更有可能完成學業。有一個估計數字是1854—1953年一個世紀內中國留美學生達2.1萬人。[[7]](#_7_You_Duo_Shao_Ren_Bi_Ye_Bu_Min)

然而，這些數字可能需要進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顯，20世紀從西方回國的兩萬左右中國留學生是一個人數甚少但頗有能量的群體。他們在大約四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與舊政權的進士一樣少。他們的前輩三年一次在北京考試，習慣地接受對皇帝——他名義上主持殿試——效忠的人身約束，而這些民國的學者們則覺得，他們的國外經驗堅定了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忠誠。這些新的“留學生”精英更加銘記宋代改革家范仲淹的格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8]](#_8_Liu_Zi_Jian____Song_Chu_Gai_G)留學生涉足政府、工業、自由職業、藝術和教育等領域的比例尚不清楚，但顯然他們都享有從舊習俗和現代革命得來的特殊地位。他們在廣泛的人際關系網中發揮作用。那些選擇從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堅持傳統，認為學者并非僅僅是技術專家，他必須像政治家那樣代表整個社會——亦官亦民——去思考。這種社會責任感有助于從歐美回來的新的領導者建立起來早期共和國的學術機構——一個20世紀的國家所需的學院、大學、圖書館、實驗室和研究所。

他們是遴選出來的（或自我選拔出來的）少數在學術上達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們的這種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他們的國外經歷——為了獲得博士學位，通常需要幾年時間——導致了這些自由化的知識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狀態。[[9]](#_9_Zhe_Zhong_Mao_Dun_Xin_Li_Yi_Y)同所有在國外學習的人一樣，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雙重文化，既熟悉中國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他們作為學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異國方式，使他們與鄉村中國愈加格格不入。他們建立了與西方人文學科傳統的共同紐帶，這一事實保證了新文化運動在教育方面不僅促進傳播技術，而且它尖銳地引出了一些問題，即在事實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國的軍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們在外國受到的訓練發揮作用，并切合中國的實際。正是這些要人被要求給予教育家們以不斷的支持。[[10]](#_10_Wei_Huo_De_Min_Guo_Ge_Ming_Y)同時，有些學者感到他們的外國傾向有使他們脫離自己背景的危險，即一種游離于祖國社會的失落感，簡言之，即精神上的頹廢和情感上的疏遠。雙重文化的經歷能攪亂一個人的個性。這一問題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它對于許多“五四”運動的一代人可能更為突出，他們事實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國的（傳統的和早期現代的），日本的和歐美的。

因此，引進外國知識（技術方面的和價值觀方面的）的任務無論在內還是在外都很復雜。在內，他是受過外國訓練的教育家，必須設計出如何作出最大貢獻的自我形象。同時，處于他的環境，他可能面對他應該如何作為的十分不同的期望。[[11]](#_11_Wei_Huo_De_1912__1949Nian_Xu)現代教育的一個新特點是行政負擔。住宿學校和不久出現的男女同校是一種新現象，有一種能誘發導致罷課和政治運動的學生輿論和組織的無限能量。共和國的新學生與教師一樣關心民族命運并負有責任感。他們時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動。教育精英們從事的活動從注表可略見一斑。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潛心追求純學術。維持學校運轉始終是個問題。

教育家作為一個群體遲早也會面臨他們與政府當局的關系問題。持續了1200年的政府考試制度到1905年才被廢除，受西方訓練的教育家在它的陰影下勞動，他們繼承了多少代以來困擾著中國舊學者的價值觀和問題，同時他們又有在國外遇到的新的價值觀和新模式。到30年代，他們成功地創造了較為自主的和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統觀念的控制。然而這只是軍閥混戰年代既無中央政府也無正統觀念的暫時情況。由于學者一政府的傳統，中國的教育一直與政治糾纏在一起。高等教育過去一直是為統治階層的，不是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從國家的正統觀念解脫出來是不容易的。這就不難理解脫離政治的較為獨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長為什么時斷時續，游移不定了。

此外，民國初年教育不僅得益于中央政權的軟弱，也得益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多元化影響。外國人在華利益包括通過基督教教會院校以及設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來扶植現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權保護。1912年至1949年中國的學術發展可以被看作世界范圍的現代知識興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國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遲或早全轉向西歐尋求啟蒙。然而受過教育的中國精英們涉足國際世界的一個副作用是他們易遭排外者的攻擊，被指責為受外國指揮。這些在外國受過教育的接受雙重文化、能講兩種語言的精英所付出的代價是，在祖國有時感到或顯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國的人。

歸國留學生在中國和國外的經歷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識上的壓力，使他們一代中某些有政治頭腦的一翼轉向馬克思主義。傾向于學術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體系、新的指導原則。許多教育家強烈地信仰科學的功效。確實，19世紀90年代和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這種真理成為中國趕上外部世界的法寶。中國的教育家尋求通過運用“科學方法”解救祖國，這種方法不僅存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學和中國歷史研究之中。對某些人來說，它是幾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條。一位教育家王風喈教授，表達了20年代頗為流行的態度，聲稱：

舊的教育體系和舊的民族習慣被破壞了，新的教育——根據科學的教育——已經開始……我們必須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過模仿得來，必須從思考與實踐中得來。西洋教育不能整個的搬到中國來；必須斟酌中國國情，作出適當的選擇。所以我的結論是，新的教育必須以科學為指導，理論要有科學的依據和證明，實踐要遵循科學的方法，結果要有科學的統計。[[12]](#_12_Wang_Feng_Jie____Zhong_Guo_J)

民國初年作為教育現代化基礎的主要命題是：隨著帝制的崩潰，舊秩序已經無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國必須著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科學”和“科學方法”將證明是新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堅固的基礎。[[13]](#_13_Guan_Yu_Xin_Wen_Hua_Yun_Dong)

### 大學：機構的建立

讓男女青年進入由系里職員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亞于工業中出現工廠制度。同樣，這在中國漫長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雖然其連貫性還缺乏研究。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識地要模仿外國模式。然而選擇哪種模式恐怕要受制于外國模式能否與中國的傳統或需要共鳴。遺憾的是，傳記材料雖很豐富，但校史卻至今不多。下面我們將先看北京大學，然后是私立學校、技術學校和教會學校，最后是外國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學 1912年新共和國從退位的清王朝繼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規模小而且頗不穩定的稱為京師大學堂的機構。京師大學堂誕生于1898年的改良運動。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現代化的日本模式，試圖滿足創辦者們所察覺的中國的迫切需要：讓清朝的某些學者—官吏進修，使他們對現代世界的事務和狀況有適當的了解。在1898年慈禧政變中，京師大學堂得以幸免。1902年這所學堂經改組增加了師資培訓部，同時合并了同文館，并在原有的課程中又增加了基礎科學和五門外語。[[14]](#_14_Qiu_Yu_Lin__Yin_____Jing_Shi)

20世紀初，北京大學的學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極為有限的現代課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對他們的成就評價極低。[[15]](#_15_Qiu_Yu_Lin__Yin_____Jing_Shi)學生質量參差不齊。有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扎根在舊式文官考試制度中，他們把在新學堂的學歷當作通向另一種資格的臺階，從而使學堂以頹廢聞名。另一些人則在觀點上較為進步和大膽，雖在輕薄和放蕩的環境里，他們真正關心當前的問題，并在校園內展開生動活潑的討論。[[16]](#_16_Yu_Tong_Kui____Si_Shi_Nian_Q)然而政府這一層次仍缺乏一致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立教育體系的各級相應機構方面沒取得進展。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后，他召開了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作為“國家教育改革的起點”。各省代表于7月在北京開會，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相應的法規。[[17]](#_17_Wo_Yi____Lin_Shi_Jiao_Yu_Hui)他們得出結論，中國教育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有待解決：需將它建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擴展到全國各個角落，以及提高到現代水平。高等教育第一次成為完整的國家體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紙上）。

在以后的20年內，在中國普遍出現了一批國立、省立和原來私立的各種學院和大學，目標各不相同。然而，這些學校呈現的經歷顯示它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點。一般認為高等教育構成了國家建設這一重大任務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它是未來領導者的訓練基地；同時，那些積極參加發展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強的知識分子，他們曾在晚清現代學校讀過書，并曾與政治運動有聯系。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一般都出身于書香門第。許多人為共和革命工作過。他們開始相互視為不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標的同志。因此，沒有人反對1912年正式發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學令》中的第一款：“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18]](#_18_Jiao_Yu_Bu_Zai_1912Nian_10Yu)

1912年的《大學令》規定，大學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學院和理學院實施，另設商、法、醫、農、工等職業學科。一個機構要取得大學資格，必須有文、理兩學院，或文學院和法學院和/或商學院，或理學院和/或醫學院、農學院或工學院。京師大學堂在嚴復任校長時改名國立北京大學，從1912年至1916年底是教育部直屬的唯一的國立大學。[[19]](#_19_Jiao_Yu_Bu_Zai_1912Nian_10Yu)

處于新的地位的國立北京大學——簡稱北大——并非一帆風順。事實上，五年間學潮迭起，校長頻繁更換，而校園生活普遍不安定。所有這些反映了整個國家政治環境的不穩定。[[20]](#_20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i)蔡元培就任校長是北大的轉折點。蔡身為清末進士和翰林院編修，出于堅定的信念，在20世紀初與革命黨人共命運，由于他學貫中西，并堅定地獻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廣泛的尊敬。1916年末蔡元培應召從法國輟學回國，1917年1月就職。在50歲時，他得以實施早年在歐洲學習和參加革命活動時期即已設想的藍圖。[[21]](#_21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i)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總長范源濂——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當時大學校長有相當大的行政權。[[22]](#_22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i)他首先提高教學人員的質量，聘請教師只根據學術能力，不論其政治觀點或學術傾向；結果許多蔡元培時代的青年教師在以后若干年內成為學術和職業圈內的知名人士，同時他們也提高了北大的學術水平。

蔡元培其次處理的問題是學生的態度和生活方式。他在就職演說中激勵學生接受“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觀點”。在校期間他們應當“把致力于學習當做不容推卸的責任，不應把學校當做升官發財的墊腳石”。[[23]](#_23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i)他還支持娛樂和學術社團以及校園刊物，認為這些都是可取的課外活動。第三，北大結構合理化。到1923年北大完全擺脫了從過去時代承襲下來的“預科學校”的基調。它的三個主要部分現在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語言文學。1919年開始采用選修課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準在全國推廣。1920年北大還率先準許女生來到一向是清一色男生的校園。[[24]](#_24_Tong_Shang_Shu__Di_291__296)公立小學曾于1911年錄取女生，到1920年已成為全國性潮流。據中國國立大學報告，截至1922年，在10535名學生中有405名女生。[[25]](#_25_Jie_Xi__Ge_Lei_Ge_Li__Lu_Zi)

其他革新還包括1918年起草的幾項計劃，這些計劃旨在制定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學計劃。蔡元培不得不使這些新的教學計劃與有效的方法相適應。例如，組建法律系時，當時中國的司法制度正在著手修訂，高質量的教師非常難得，蔡決定以“比較法律”為起點。首先應聘的兩位講師是王亮疇和羅文干，他們都是司法部的成員，不能受聘為專職教授。如蔡元培后來所講的那樣，所有這些因素使開設每一門法學課都極為困難。只是好幾年后，出現了王世杰和周鯁生這樣的法學家，一個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26]](#_26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i)在注意研究生的學習和研究時，蔡元培深受他在德國的經歷的影響，在那里他受到柏林大學和它的創始人威爾海姆·馮·洪堡的鼓舞。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熱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師質量高，部分也由于師生有討論學術問題的傳統，這種傳統可追溯到京師大學堂時代，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有一定學識的成年人。[[27]](#_27_Luo_Jia_Lun____Shi_Zhe_Ru_Si)

北大在“五四”運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學者和國家命運之間的聯系。20年代初，北大作為一所大學，可以代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大方向：課程是按照現代西方普遍實施的訓練方針設置的，教師隊伍具有學貫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課程繼續進行學習和研究。北大作為第一所國立大學的地位，明顯地標志著高等教育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更全面地進行研究時，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后改名中央大學）等其他主要大學的發展應能提供有啟發性的比較和對照。

私立學校：南開 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學都與政府有關系。各種類型和性質的私立學校紛紛成立，特別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動例子是南開，這是張伯苓（1876—1951）領導下在天津成長起來的中等學校和高等教育的聯合體。與晚清的許多現代教育先驅者相比，張伯苓不是古典學者，而是一所現代學校——北洋水師學堂的優秀畢業生，當時他只有18歲。然而1898年中國海軍基地威海衛成為英國的租借地，張目睹中國國旗降落和英國國旗升起，斷然結束了他的海軍生涯。極度的羞辱給予他以創傷性的打擊。離開海軍時，他發誓要獻身于教育這條“自強之路”。[[28]](#_28_Zhang_Bo_Ling____Si_Shi_Nian)如他在回憶錄中談到的那樣：“南開學校誕生于災難深重的中國，所以它的目標就是要改變舊的生活習慣，培養救國青年。”教育家的任務就是清除中國衰敗的五大弊端：體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學知識，經濟貧困，由缺乏集體生活和活動而出現的渙散，自私自利。張后來在南開制度中所訂的綜合教育計劃，就是為適應中國在這五個方面的需要而設計的。[[29]](#_29_Hu_Shi____Jiao_Yu_Jia_Zhang)

張伯苓漫長的教育歷程，開始于謙遜地擔任嚴修——一位杰出的天津紳士，與蔡元培一樣也是一位思想進步的翰林——孩子的家庭教師。張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紳士王益孫家任教。在這兩個關系的基礎上，張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學校。1904年，嚴、王二人聯合資助建立一所中學和一所師范學校。第一屆師范學校學生畢業于1906年，第一屆中學學生畢業于1908年。雖然當地士紳子弟大量出現在第一批學生中——韓、嚴、陶、卞和鄭等姓在最初的學生名冊中都很突出——但學校的新課程很快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來注冊。1908年當地第三個捐助人鄭菊如慷慨地捐獻了土地，而嚴修又再度捐款，學校得以遷入“南開洼”的永久校舍，南開學校因此得名。[[30]](#_30_Wang_Wen_Tian_Deng____Zhang)

清末政治動蕩，然而張伯苓思想專一，不允許他和他的學校卷入革命活動。他集中精力進一步發展學校。1917—1918年張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習一年后，得到嚴修和范源濂的贊助，他們支持他辦大學的計劃。通過發動他與天津上層社會（如嚴家和鄭家）和國內知識界（范源濂是前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密友）的關系，還有與國際教育團體（張于1909年皈依基督教，并與基督教青年會建立聯系）的關系，他籌集了足夠的資金，得以建造南開大學的第一座校舍。第一批四十余名新生于1919年秋入學。[[31]](#_31_Tong_Shang_Shu__Di_8__10__13)南開大學開設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第一屆學生于1923年畢業后，南開大學遷入八里臺的更為寬敞的校園直至今日。當南開大學遷到這處郊外的校園時，一座新的科學大樓同時啟用，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禮物。[[32]](#_32_Tong_Shang_Shu__Di_14__15Ye)

張伯苓曾幾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籌集資金。1928—1929年出訪歸來后，他將南開大學改組為三個學院：文學院由政治、歷電和經濟三系組成；理學院設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四系；而商學院包括財務管理、銀行、統計和商業四系。[[33]](#_33_Wang_Wen_Tian_Deng____Zhang)

張伯苓的雙重文化的業績是來自天津上層社會、留學歸國教育家的國內知識界和國際（特別是英美）教育團體的支持的結合。其他教育活動家的成就盡管不那么著稱，但可相提并論。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學——上海復旦大學，是由一所天主教學校的退學生于1905年建立的一所學校發展起來的；這所天主教學校便是震旦大學。在這些發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馬良（馬相伯，1840—1939年，見后）。還有另一所私立學校廈門大學是華僑實業家和慈善家陳嘉庚于1921年建立的，他已經成為新加坡橡膠、菠蘿和海運業的百萬富翁。從1921年到1937年，廈門大學在第一任校長林文慶的主持下發展起來。林文慶是一位頗具天賦的新加坡醫生，在愛丁堡獲得醫學學位，并且也成為一位古典學者和記者。[[34]](#_34_Jian___Lin_Wen_Qing_Chuan)中國私人贊助教育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值得進一步研究，更不用說近代海外華人對教育的影響了。廈門確實曾經是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一個主要貨物集散地，“海上中國”的一個焦點。這在第12卷中討論過。

技術學校 教育在應用科學和工程方面的發展是緩慢的，這在早期大學的課程中可以看出。長期以來考生是憑書本知識鑒別的，鐵路建筑之類的實用技能，無論多么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獲得書本知識那樣的聲譽。然而清代末年，隨著現代教育運動的興起，一些專門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確實出現了，其中許多學校達到學院或大學水平。下面幾個例子可以表明現代中國一些最著名的技術學校有不同的起源。1895年盛宣懷贊助建立天津中西學堂（亦稱北洋西學堂），課程偏重于電氣、礦業和機械工程等領域的專業。八年后重新評價國家教育制度時，這所學堂被改組為北洋大學堂，并遷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園。[[35]](#_35_Cai_Yuan_Pei_Deng____Wan_Qin)另一所盛宣懷贊助建立的學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學，開始時偏重政治學，但最終發展成聲譽卓著的交通大學，[[36]](#_36___Wan_Qing_San_Shi_Wu_Nian_L)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視為天津北洋大學堂在南方的對手。

除公立技術學校外，現代教育的倡導者們在私人資助下，偶爾也能建立這樣的機構。工業和社區的開發者張謇順應時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蘇建立了南通大學，試圖將課堂教學與實際經驗結合起來。該校提供的課程包括農業、紡織技術、工程和醫學，并與一個紡織廠、一所醫院以及供農業實驗用的1.6萬畝土地掛鉤。[[37]](#_37_Zhu_Chang_Jun____Jin_Dai_Zho)技術學校的另一資金來源是外國在華現代工業部門內獲得的商業利潤：1909年一英國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這一正在發展的現代煤炭工業所在地開辦了焦作路礦學堂。在1912年政治動蕩中短期關閉后，于1914年恢復，改名福中礦務學堂。1928年后在國民政府管轄下學校又改組為焦作工學院，[[38]](#_38_An_Dong_Ni__C_Li____Zhong_Hu)聲譽日隆，直到1937年中國的學術進展因戰爭再次中斷。上述例證只是加速走向技術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國時期這類教育將受到進一步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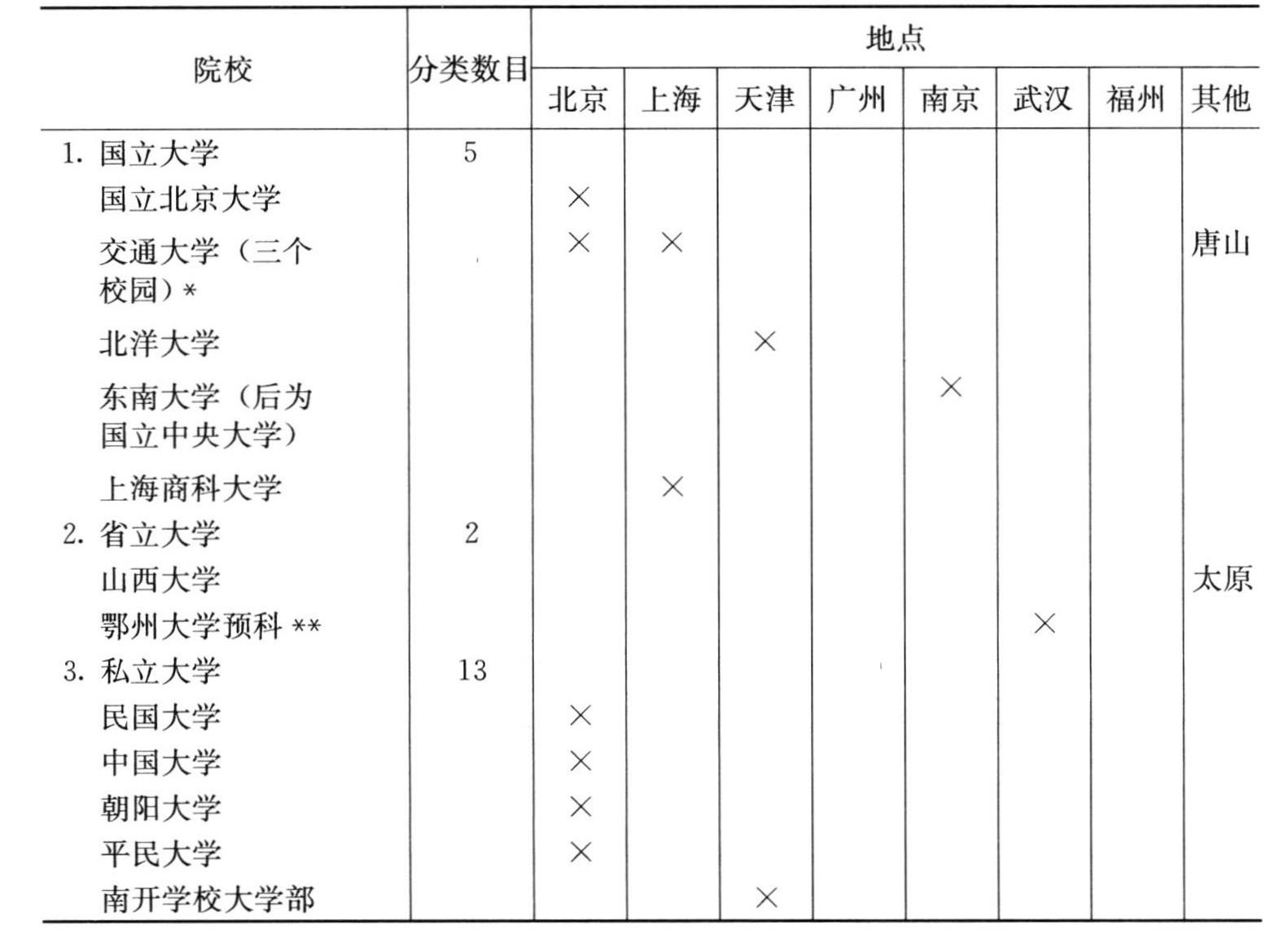
教會學校 它們大多數是從中學水平開始的，原來的目的是幫助傳播基督教。然而，后來它們在人文科學方面作出主要貢獻。有記載的最早一所中國境內的教會學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強運動中，又出現了幾所教會學校。19世紀末舊秩序在中國的崩潰不可避免地給教會學校一個機會，在科學和外語等幾個非傳統教學領域采取主動。這些學校從而展示了新型的學識。1900年后，由于對現代教育的需求增長，一些教會學校通過擴設課程和合并這一復雜過程逐步演變成具有學院水平的學校。1906年新教傳教士擁有2000多所小學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學校，而到20世紀20年代已有12所（最后是16所）學院或大學逐漸從其中出現。[[39]](#_39_Lu_Ci____Zhong_Guo_He_Ji_Du)然而，在中國擴大和深化基督教事業仍一直居優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認為：學校應保持小規模，這不僅為了保持教員與學生接觸的質量，而且因為“不信教學生成分過大會沖淡學校的基督教氣氛”。他還把宗教課程和禮拜定為必修，并辯解說，如果學生不想信教，他不必進這所學校。[[40]](#_40_Ma_Li__Lan_Bo_Dun____Shang_H)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區徐家匯（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啟的老家）特別設立的耶穌會獎學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氣同時不乏權力的人物馬良長期任耶穌會傳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員，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年建立震旦學院，這所學校后來成為一所天主教大學。1905年他建立復旦公學，這所學校后來成為一所私立大學。這在前面已經提到。[[41]](#_41_Jian_Zhang_Ruo_Gu_Bian____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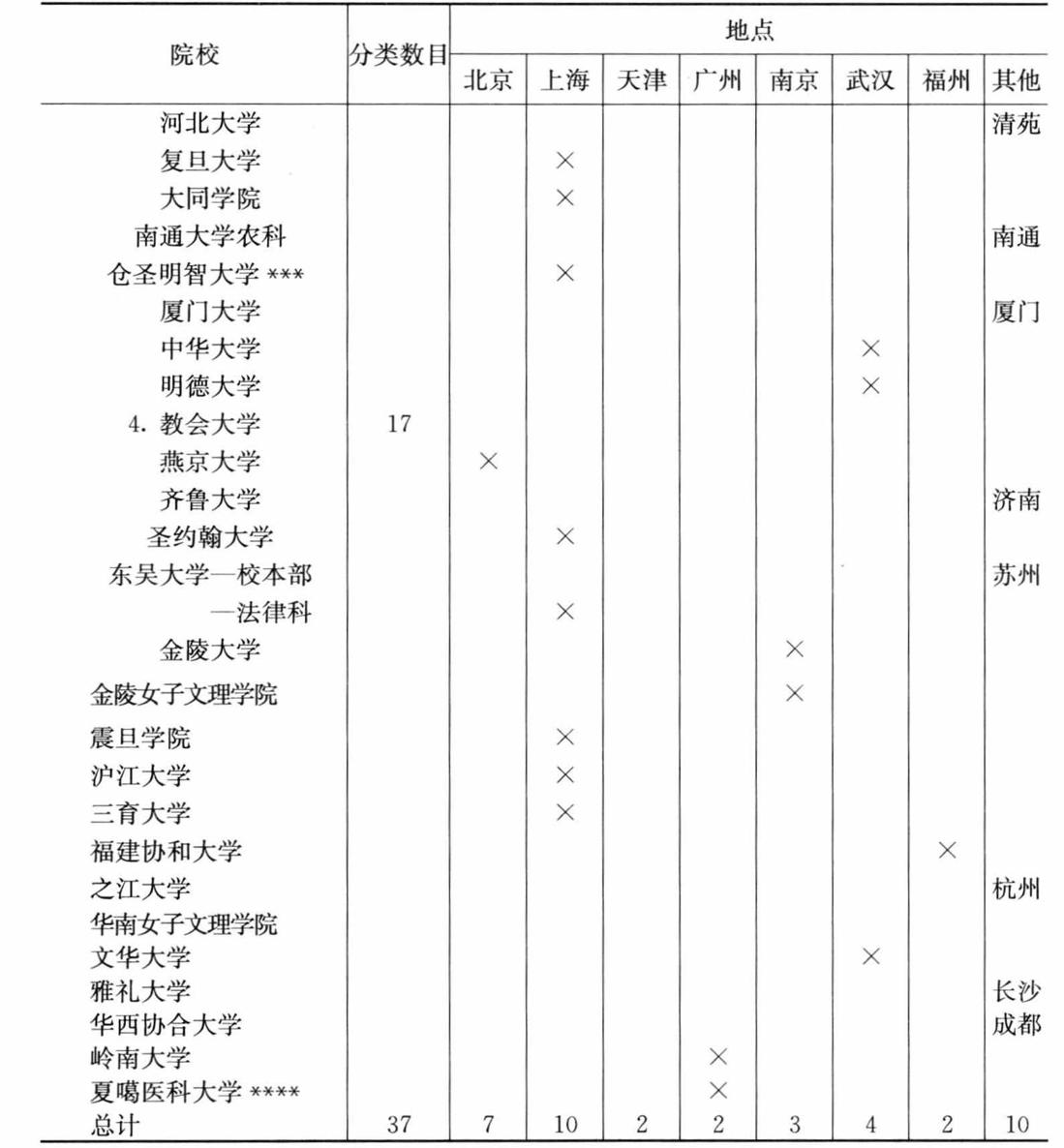
教會學校學術質量參差不齊。[[42]](#_42_Li_Ru__Zhong_Guo_Guan_Fang)有些大學在教學、計劃改革和教員業務成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員是國內或國際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學有個新聞系，它從全國各地招生，而這個系的教員包括下列著名學者，如中國史方面的洪業（威廉·洪），顧頡剛（民俗學），徐淑希（政治學），吳文藻（社會學），文學方面的許地山、謝婉瑩（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趙紫宸。燕京由于地處北京，知名度高。當然同時還有其他教會學校，如金陵大學和嶺南大學（前身為廣州格致書院），也取得許多真實成就。

然而，無論這些教會學校的學術成就如何，它們都會發現自己處于矛盾狀態。雖然傳教士的最初目的是傳教，但有些傳教士很早就發現傳播世俗學識也是可取的。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使他們的學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們逐漸致力于有利國家發展的一般世俗計劃。對于大多數在教會院校注冊的學生來說，這些學校僅僅是現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學生們改信基督教的為數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43]](#_43_Ke_La_Lun_Si__Bo_Dun__Dai_De)他們也不會讓自己脫離橫掃全國的“新潮流”。事實上，其中有些人，特別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44]](#_44_Shu_30Nian_Dai_Chu_Qi_Zui_Zh)常常站在學生運動的前沿。[[45]](#_45_Guan_Yu_1935Nian_Yan_Jing_Da)

表3 中國主要學院與大學及其分布，1922年



續表



注：37所大學有40個校園。   
資料來源：《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99—100頁；盧茨：《基督教院校》，第531—533頁；中國基督教院校一覽表。  
\*交通大學屬交通部，向不列入國立大學。——譯者  
\*\*原文如此，疑為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譯者  
\*\*\*系哈同設在愛儷園內規模很小的大學。——譯者  
\*\*\*\*30年代并入嶺南大學醫學院。——譯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學院和大學曾達到頂峰。如表3所示，1922年它們建成了將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學府。這正是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因此甚至在教會學校數目增長時，它們也不得不面臨來自中國社會的新的挑戰。“五四”運動使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改宗發生沖突。1922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學生聯合會，在全中國青年學生中觸發了一場反宗教和反基督教運動。如胡適于1925年在燕京講話時指出的那樣，基督教在華教育面臨三種新的困難。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中國人的新的民族主義精神，“對列強的恐懼消失了，而自我意識已逐漸增強”，因此出現了恢復主權的運動，同時相信“帝國主義列強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傳播宗教和開辦學校”。第二，青年知識分子的“新認識的理性主義”會向基督教信條本身提出挑戰，要求“拿證據來！”[[46]](#_46_Hu_Shi____Jin_Ri_Jiao_Hui_Ji)最后，胡適認為整個傳教事業充滿內在弱點。（中國的愛國者們注意到，從學院的歷史發展中看，它們是由一批有時主要資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學術方面的人員創辦的。）因此胡適極力主張教會的教育家要有辦法回答兩個問題：他們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發展少數真正優秀的高質量的院校，而不是發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認為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一個杰出的范例。其次，教會學校能否放棄傳道，用全力辦好教育？胡適認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47]](#_47_Hu_Shi____Jin_Ri_Jiao_Hui_Ji)

胡適和與他氣味相投的其他學者直言不諱地反對傳統的教會教育，他們認為宗教宣傳危險地缺乏理性，并為之困擾。在這方面，他們與西方理性主義以科學的名義對天啟教的攻擊相一致，并且也與儒家不可知論的學術傳統相一致。然而，與此同時，那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視之為新“社會科學”的中國人，也參加了愛國反基督教運動，把它作為一般反對帝國主義活動的一部分。到1920年，在某些教會的圈子里仍將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緒的增長歸咎于孫逸仙和他在廣東的“激進分子的溫床”[[48]](#_48_1927Nian_Bei_Fa_Qi_Jian__Qin)。

### 科學與研究的開端

1900年前后的幾十年，中國開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多種現代科學機構的發展在世界范圍內也大步前進。參與發展中國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參加到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中去，這個過程需要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較。1916年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建立，無疑是一個里程碑（見后）。開始強調科學知識則是另一個里程碑。1918年12月蔡元培宣稱：“我們所說的‘大學’并非僅僅是個按照課程表授課，培養出大學畢業生的地方；它實際上是在共同關心的知識領域里從事研究……從而創造出新知識，以便提供給國內外學者的地方。”[[49]](#_49_Shu_Xin_Cheng_Bian____Zhong)

一般都同意，新知識要通過科學方法取得。到20年代這已成為一種信仰，即視科學觀點為粉碎傳統秩序，并為中國達到現代國家開辟道路的利器。青年知識分子有感于中國在國際上缺乏成就，開始相信科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廣泛，以致幾十年后他們仍然真誠地說：“科學是西方文明的源泉。”[[50]](#_50_Ren_Hong_Jun____Wu_Shi_Zi_Sh)“如果我們真地希望發展新文化，我們就應該特別注意發展科學。”[[51]](#_51_Cai_Yuan_Pei____San_Shi_Wu_N)

民國初年科學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認為是由于許多教師在日本接受的訓練不充分。除了少數例外，總體條件直至2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進。[[52]](#_52_Luo_Jie__S_Ge_Lin____Ke_Xue)20年代中期，有幾個因素導致了比較大的進步：一些大學，如南開、清華和交通，開設了較有分量的科學課程，由歐美留學生任教；其他組織形式也促進了科學，并隨之建立起高級的研究機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外的中國學生中出現了許多組織，其中最積極或最有影響的莫過于科學社。它是由為數不多的中國學生于1914年在康奈爾建立的。[[53]](#_53_Zhong_Guo_Ke_Xue_She_9Ming_C)它的英文全稱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cience”，以便與類似的美國組織相應，但其中文名稱為“中國科學社”。“社”是一種志愿的組合，一種由活動家、精英分子領導的團體。過去士紳們常常組織這樣的團體以建立地方學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軍或廣州的美國侵略軍，后來著手“自治政府”的各項計劃。科學社的目標不僅在于“促進科學，鼓勵工業，統一翻譯術語，傳播知識”，而且它希望用十字軍的熱情通過科學最終再造中國的整個社會和文化。[[54]](#_54_Bi_De__Ba_Ke____Mei_Guo_Ke_X)科學社在美國草創時期有成員55人，1918年隨主要創建人回國而遷至上海，到1930年成員曾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員包括留學歐美和日本的歸國學生和在中國培養的青年科學家。科學社的活動范圍也擴大了：除1915年創辦刊物《科學》外，科學社還召開會議宣讀研究論文，出版科學譯著，并建立科學圖書館；1931年這家圖書館從初址南京遷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財富。同時在1922年，科學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實驗室。

促進科學在中國面臨著兩線作戰：既要復制和擴大從國外獲得的知識，又要讓它適合中國的現狀。中國青年科學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國際學術界，他們也試圖對國際學術界作出貢獻。同時。他們又面臨將科學思想與實踐引入中國人民生活的任務，以減輕中國的落后程度。依賴和落后二者后來都有可能被污蔑為殖民地的癥狀。[[55]](#_55_Tong_Shang_Shu__Di_216__226Y)

### 提供基金與美國的影響：清華

考慮到中國古代強調高等教育要為國家服務，1916—1928年軍閥混戰時期對中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影響來自美國，當時聯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還微不足道（農學例外，它受到撥土地給各州立農學院的補助），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美國高等教育當時仍由私立大學而不是由州立大學領導，實際上新英格蘭和中西部的教派學院曾經是在華傳教士主辦的教會學校的樣本。但美國的影響是通過一些不尋常事件的結合而形成的，遠遠超過了基督教會的努力。

1901年自清政府強索的庚子賠款中，美國要求從中分到2500萬美元，當時美國負責官員私下認為數量過大，可能比正當數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個賠款33000萬美元的一小部分。[[56]](#_56_Mai_Ke_Er__Heng_Te____Mei_Gu)這是一個使中國政府一蹶不振的過高的數目，而且幾乎從任何角度看，這個數目都可以被視為帝國主義掠奪頂峰的可恥標志。1908年美國國會對中國減免了賠款中超出實際損失的那一部分，計11961121.76美元。這筆款子將被用于在美國教育中國人，而且它創造了一個支持中國高等教育的有效機制。1909年中國政府向美國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賠款學生47名，1910年70名。到1929年總數達1268名。[[57]](#_57_Jian_Jia_Zu_Lin____Zhong_Guo)領取庚子賠款獎學金的學生名單中不乏才華洋溢的青年。

同時，政府也擬訂了訓練計劃，為學生赴美學習作準備。1909年一個配備外國人員的大學預科被建立起來，1910年舉行了入學考試，后來成為清華大學的清華學堂于1911年正式開學。[[58]](#_58_Wang_Yi_Ju____Zhong_Guo_Zhi)它成功的秘訣在于每年的預算有保證，當時其他院校則依賴軍閥政權，毫無保障，此外，直至1929年它一直強調要為在美國大學學習做好專門的準備。一個通過入學考試的11—13歲的小學生必須學習五年初級部課程和三年高級部課程，以后才會被送往美國院校學習。第一批學生是1912年入校的，經學習八年標準現代中學課程（如英語、法語、德語、歷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學以及一些音樂、美術和體育課）后于1920年畢業。[[59]](#_59_Liu_Shi_Shun____Yi_Jiu_Er__J)1926年清華的預科地位結束，改組為達到學士學位的四年制的清華大學。

至此美國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已達到頂峰，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渠道實現的。許多有能力的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人曾經在那里與約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華講學的兩年（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恰與英國數學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羅素的訪問（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重合。杜威在11個省講演大約70場，由胡適翻譯，但是他提倡的實驗主義對狂熱的中國愛國者來說并不是政治上的靈丹妙藥。后來他的同事孟祿教授也訪問了中國，而主要大學的校長們——北大的蔣夢麟，國立東南大學（后為中央大學）的郭秉文——都自稱是杜威的信徒。然而杜威的通過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國式的教諭，很少提供在尋找中國教育道路的過程中能立竿見影的東西。留美歸國學者從1919年到1924年領導了一場教育改革運動，他們既利用最初由蔣夢麟主編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國國家教育促進會；但這些計劃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動蕩中煙消云散。郭秉文被夾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義浪潮與國民黨在江蘇與軍閥的對抗之間，他被迫于1925年1月辭職。獨立于執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難預見。在軍閥時代，高等教育只能在當地軍閥的支配下發揮作用。[[60]](#_60_Ba_Li__Ji_Nan____Zhong_Guo_D)

然而，就清華而言，這株美國移植的植物生了根。1928年北伐勝利結束后，國民政府將清華定名為“國立清華大學”[[61]](#_61_Chen_Zhi_Mai____Qiu_Xue_Yu_Z)，羅家倫——北大校友，曾留學英國和美國——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1928 年9月他在就職演說中，贊揚清華取得國立大學地位是國民政府“在華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結果。[[62]](#_62_Luo_Jia_Lun____Xue_Shu_Du_Li)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學院，并加強研究生學習和高等研究。他還建議從國外邀請有成績的學者擔任較長時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時轟動，而要教學”；不要“像前幾年那樣，將國外著名學者（顯然是指杜威和羅素）請來只講課幾個月或一年”，因為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63]](#_63___Shi_Zhe_Ru_Si_Ji_____Di_9)在羅家倫和他的繼任者梅貽琦的管理下，清華在規模和實質上都穩步發展，成為以后十年中杰出的高等學校之一。

美國影響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華基金會）的出現為序幕的，這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1924年美國國會根據聯合決議，將庚子賠款余額歸還在中國使用。于是兩國政府達成協議，將這筆大約12545000美元的款項交給一個基金會掌管，用于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幾個月內中國政府任命了由10 名\*中國人和5名美國人組成的第一任董事會，中華基金會于1925年6月正式成立。[[65]](#_65_Ren_Hong_Jun____Zhong_Guo_Ji)10名中國董事中有3人是高級外交官（顏惠慶、顧維鈞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學家或現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靜生），黃炎培（江蘇省教育界領袖），蔣夢麟（北大校長），張伯苓（南開校長），周貽春（清華校長）和丁文江（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主任）。5個美國董事是與中國教育界有關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祿（兩人都是哥倫比亞的），顧臨（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代理院長），貝克（中國華洋義賑會）和貝納德（花旗銀行）。[[66]](#_66_Ren_Hong_Jun____Zhong_Guo_Ji)董事會任命范源濂為基金會第一任干事長，他邀請中國科學的熱情倡導者任鴻雋擔任行政秘書。[[67]](#_67_Ren_Hong_Jun_Hou_Lai_Hui_Yi)

中華基金會執掌的不僅有1924年歸還的庚子賠款，還有1908年歸還的供獎學金和清華大學使用的款項。它又被授權掌管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學術捐款。它的主要任務第一是資助學術機構的高質量活動，如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機構的新項目，如合作事業；第三，基金會本身開發新項目，[[68]](#_68___Zhong_Hua_Jiao_Yu_Wen_Hua)所有申請項目必須按現代方式得到董事會或專門委員會的批準。[[69]](#_69_1981Nian_8Yue_15Ri_Ye_Liang)范源濂和任鴻雋意識到中華基金會的革新任務，認為它不應僅僅是基金管理辦公室，也應是現代科學的強有力的推動者。[[70]](#_70_Ren_Hong_Jun____Wu_Shi_Zi_Sh)基金會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親王府內，1926—1927年批準把研究補助金給予13所院校、3所研究所、5個文化教育組織以及一個未歸類的領款單位，總金額達419906元。[[71]](#_71___Zhong_Hua_Jiao_Yu_Wen_Hua)當有人責備基金會不通過政府當局而由少數幾個人處理大宗款項時，任回答說，這正是中華基金會的力量所在：它杜絕了政府濫用基金去打內戰。[[72]](#_72___Zhong_Hua_Min_Guo_Chuan_Ji)總有一天，當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國家在華教育活動經過較為充分的研究時，[[73]](#_73_Li_Ru__1922__1923Nian_De_Guo)人們可能在較為寬闊的范圍內評價美國的影響，這種影響將包括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中國醫學和其他科學的支持。英、法、意退還的庚子賠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 南京十年期間的高等教育和國家建設

盡管20年代國民革命處于危機之中，所有這些非政府事業的成長已經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出現了。外國人為發展中國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見的活動程度，被馬克思主義者譴責為文化帝國主義，并不可避免地成為渴望建立完全主權國家的一切愛國者關心的根源。國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74]](#_74_Guo_Min_Zheng_Fu_Cheng_Li_Yu)時，這個國家經歷了一個相對和平的難得的間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統治下，名義上的和平和統一給了青年知識分子較大的機會，他們曾經作為新文化的開路先鋒開始其生涯，而現在已經臻于成熟。許多人覺得國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場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從30年代中期開始，明顯地有一個補缺的過程，學者正在進入政界。多年來這些知識分子保持著密切聯系。在他們奮斗的一切領域——不管是促進科學和現代醫學，社會改革，研究中國經濟，或發展新思想和新文學——他們感到現在終于抵達真正的國家發展的門口。他們認為，軍閥時代的結束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更大的歷史過程的積極成果，他們自己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這個過程。

### 中央政府的領導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績至今還沒有得到評價。這當然涉及識字、學校、師資培訓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問題。從1928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標是表現新上升的中國民族主義，并開展“恢復教育權”運動，即要求一切外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在教育部登記，以及所有這些院校中的領導人都必須是中國國民。一個結果是維護國家在教會學校中反對強制性宗教教育的權威——這一目標既體現了自由主義西方的科學理性主義，也表現了現在掌權的國民黨獨裁制唯恐喪失的民族主義。對教會院校這一世俗性的挑戰是在1925年首次提出的。1927年后這一政策延續下來，而且執行得更加嚴格。它不僅涉及外國對中國的政治控制問題，而且在更深層次上涉及世俗的價值觀或宗教福音的價值觀究竟誰應居于支配地位的問題。在中國比較有遠見的西方教育家們，如在燕京大學，能預見這一政策所涉及的實際問題，因為

如果大學在可能的時候不向政府登記，它的畢業生就會被關在公共事業的門外，而且他們不會得到允許在登記過的學校或學院里任教。因此教師和學生雙方都有被孤立于國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險，從而失去影響。[[75]](#_75_Ai_De_Fu____Yan_Jing_Da_Xue)

結果，燕京于1927年2月第一批服從登記。政府對教會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課程列為必修課，因而燕京將所有宗教課程改為選修。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順利解決。例如，上海的圣約翰大學把國民政府要求變宗教課程為“自由”選修視為登記的主要障礙，學校領導并且強烈抵制政府和國民黨在校園活動的前景。圣約翰大學持拖延態度——無疑在上海這樣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為在上海外國利益處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國院校與中國環境較為協調。例如東吳大學是在中國校友的壓力下向教育部登記的。到1933年，所有主要教會大學和學院都完成了向國民政府登記。[[76]](#_76_Lan_Bo_Dun____Shang_Hai_Shen)不久，國民黨有關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政治教育進入院校，并要求開設有關課程和訓練。

國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會學校應有中國理事占有優勢的理事會和中國校長，這些要求導致燕京大學有一個二元系統：在紐約美國理事們在校長司徒雷登領導下，掌握預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國教員，而在中國的管理委員會（1928年后中國人占多數）在中國校長領導下負責其他政策事務。吳雷川于1929年就任后一職務，因政策分歧于1934年辭職；1934年后校長職務主要由陸志韋擔任。[[77]](#_77_Wei_Si_Te____Yan_Jing_Da_Xue)因此，盡管還有一些局部問題，學校的傳道意向被削弱了，它們都被納入中國教育體系的正式結構之中。

另一項政策是在全國加強或建立國立大學，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監督。例如，1928年清華被指定為國立大學后，校長羅家倫立即著手重大改組和改革，如終止清華作為美國院校預科的功能，并將它改為能提供四年正規大學課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學。他還使清華脫離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狀態，將它置于教育部單獨管轄之下；一個新的建設計劃也在開始了。[[78]](#_78___Zhong_Hua_Min_Guo_Chuan_Ji)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擴張權力的一個渠道。1931年，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和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合并為國立四川大學，便說明了這一點；國民政府還進一步下令該省的鹽稅歲入應當撥歸該校。[[79]](#_79_Ding_Zhi_Pin____Zhong_Guo_Ji)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滿洲后五個星期采取的，并成為所謂“大后方建設”長期計劃的各種步驟之一。這項計劃要在幾年之內把政府的國家建設功能與全面戰爭所要求的活動結合起來。國立四川大學的校長不僅應當有專業才能，在學術界有影響并能與新知識界共事，他還應當理解作為南京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的橋梁的附加作用。1935年政府請任鴻雋（當時任中華基金會干事長）擔任四川大學校長。[[80]](#_80_Shou_Nan_Jing_Zheng_Fu_Ren_M)考慮到西南不發達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極端緊迫，任鴻雋接受了任命，并立即著手數項工作，在兩年中進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設置課程，并使它趕上時代；撥款300萬元開始一項建設計劃；改進師生的教學態度；而最重要的是從全國各地聘請著名學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學的教學質量。[[81]](#_81_Ren_Hong_Jun____Wu_Shi_Zi_Sh)雖然任鴻雋任期不長，但他首倡的改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為國立四川大學的今后發展奠定了基礎；而這所大學所處的地區在未來的戰爭年代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所大學里發生的事情，標志著當時在中國內地發生的雙重過程：高等教育作為國家復興的一個方面，有了進步；而在不斷努力實現國家統一方面，中央權力得以向內地擴張。這種努力包括推廣華語的標準華北（主要是北京）發音作為“國語”。政府還推廣國家的羅馬字化系統，以拉丁字母書寫華語。同時，國立編譯館多年來已在編纂與外國技術詞匯對應的中文標準詞匯，以利吸收現代技術。

國民政府的一個主要教育目標，是使各大學的教學計劃標準化。從1933年開始，政府發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課、選修課和大學入學考試程序等事宜。最后，還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數，以鼓勵更多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科。[[82]](#_82_Ke_Shu_Ping____Wang_Xue_Ting)雖然到1937年戰爭爆發時教學計劃的調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見成效：根據教育部的統計，1930年文科畢業生總數為1.7萬人，而農、工、醫、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點，[[83]](#_83_Wang_Yu_Jun_He_Sun_Bin_Bian)但到1937年，文科的人數為15227人，而理、工科則為1.52萬人。[[84]](#_84_Ke_Shu_Ping____Wang_Xue_Ting)

至于學士學位以上的學習，1933年教育部頒布了關于研究院的組織和實施臨時條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碩士學位能力的現有大學內建立研究院。有資格在教育部注冊為適合建立研究院的機構必須在以下范圍內至少有三個系：文學、科學、法律、農學、教育、工程、醫學或商學。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長的領導之下，該職務可由該大學校長兼任。[[85]](#_85_Ke_Shu_Ping____Wang_Xue_Ting)然而在事實上，中國大學的研究生訓練停留在相對落后的水平上。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批評家已經意識到國家的高等教育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缺陷。[[86]](#_86___Zhu_Jia_Hua_Xian_Sheng_Yan)對大學教育的共同批評是它的發展未能適應國家的需要，大學的規劃存在著不平衡，文學和法律等科目發展過快，與落后的理、工科“不相稱”，以及高等教育的撥款總的說來遠遠不足。事實上，在整個南京時期，學院和大學從各種來源籌措資金始終處于困難狀態。20年代初國立大學的經費有90%依賴中央政府預算，學費、雜費和捐贈合計不足10%。1934年，中央政府預算規定年支出的15%應當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業，但這只是一個實際上從未達到過的目標。例如，1936年教育文化預算總額曾達到4.5%的高度，而同年軍事撥款占32.5%，公債還本付息占24.1% 。[[87]](#_87_Chen_Neng_Zhi____Zhan_Qian_S)

使國立大學成為問題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權的慣例，常指定用省稅歲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內國立大學。不論由于何種原因，一旦省財政陷入混亂，支付分配給大學的經費會變得極不可靠。[[88]](#_88_Chen_Neng_Zhi____Zhan_Qian_S)此外，早期缺乏撥款的統一標準，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預算總數內，政府的公正可能成為問題。請看1929年北平幾所大學的請愿：“廣東的中山大學和南京的中央大學每個學校只有學生1000至2000人，月撥款為15萬至16萬元；而北京大學共有七所學院，注冊學生為3500人，可是月撥款僅約為9萬元……”[[89]](#_89_Chen_Neng_Zhi____Zhan_Qian_S)

省級大學和學院在獲得公家撥款方面還遇到其他障礙。1929年后，國民政府集中國家財政的努力，是一個時間拖得過長的過程。在稅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間必須解決手續問題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關系問題。這導致了幾個省有臨時撥款的必要，而自然災害之類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稅歲入。[[90]](#_90_Tong_Shang_Shu__Di_183__190Y)

私立大學（包括教會學校）的資助來源十分廣泛，從中央政府撥款到私人捐贈和學費、雜費，而以后者最為重要。依賴政府資助的私立學校面臨困擾公立大學的同樣問題，而那些主要依賴私人來源的學校則受國內外經濟狀況的影響。[[91]](#_91_Tong_Shang_Shu__Di_191__201Y)于是財政上缺乏保障對學術界構成了持續不斷的挑戰。

學生們在特有的經濟危機中煩躁不安，他們還被指責為“過分熱衷于政治爭端”，他們常以鬧風潮和罷課發泄不滿，校園里的行政危機此伏彼起。[[92]](#_92_Xu_Duo_Shi_Li_Zhong_De_Yi_Ge)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1932年接著在上海不宣而戰，而國共關系則進一步惡化，發展為30年代初期長期的反共軍事圍剿。在這樣一個時期，這種“熱衷于政治爭端”反映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基本的失落感。他們的騷動為愛國熱情所激勵，勢必在1935年和1936年的學生運動中得到表現。[[93]](#_93_Jian_Yi_Si_Lei_Er____Zhong_G)

1934—1935年高等教育機構的分布和類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年以來有了大幅度增長（表3），但也顯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國立部分的增長，1928年后從5所增加到23所；增長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術專科學校，以及私立專科學校。然而這種發展大都出現在少數地區，集中在東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1934年，上海在全國110所高校中占24所（21%），北平次之，占17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學校數量最多，以9所（8.2%）居首位；廣東以8所（7.2%）居第二。在地理分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陜西、甘肅和云南等邊緣省份，1934年各省只有各類高等學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學或技術專科學校，而貴州竟一所也沒有。顯然，這些地區只是剛開始計劃建立高等教育。但是安徽，一個總是積極從事進步運動的長江下游省份，表現之差令人驚訝。它的落后向我們表明了30年代早期中國許多地區高等教育的一些問題。首先，該省資源貧乏，與更東面的太湖區域完全不同。太湖區域許多世紀以來就是中國物產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而安徽則是長江下游的一個窮姐妹，境內丘陵起伏，淮河橫貫其間，自然災害頻仍。安徽的邊際經濟妨礙了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第二個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內派系之間的權力斗爭，以及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與地方勢力之間的權力斗爭而引起政治不穩定。安徽省內反復無常的政治斗爭造成了極度的動蕩，在1929—1930年間省主席換了六任，外加一次軍事暴動，這些事件導致了省立大學的人事變動；此外因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94]](#_94_Yang_Liang_Gong____Zao_Qi_Sa)大學僅領到預算的一半左右。同時，中央政府企圖實現在安徽的真正權威，開始通過國民黨機構和政治教育計劃把省立安徽大學與國家的權力結構結合起來，使形勢更為復雜。

表4[[97]](#_97_Zhu___1__Si_Li__Lei_Bao_Kuo) 中國大學院校分布，1934—1935年



\* 中央政府直轄市。（1928年6月，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譯者）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圖1和統計表9。

有助于解釋安徽高等教育窘況的一個深層次因素，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大量地區性流動。學生們往來于各地，如果認為當地的學校不合適，較有抱負的學生就赴外地就讀于知名度較高的大學。資金不足的地區經常會看到他們的青年學生投向較大的中心城市。1934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國大專院校學生省籍的報表表明，有945名安徽學生在全國各地注冊，44%在省外國立大學就讀，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學和教會院校。[[95]](#_95_Jiao_Yu_Bu_Tong_Ji_Shi_Bian)最后，還有全國范圍的教師流動。例如，聞一多在1926—1930年間流動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島的著名大學。最后于1931年在清華大學安頓下來。他如此遷動的原因，主要是學校的經費困難和學生的騷動。[[96]](#_96_Liang_Shi_Qiu____Tan_Wen_Yi)

在民國成立后的1/4世紀里，中國的教育仍然規模甚小。1932—1933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注冊人數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98]](#_98_Ke_Shu_Ping____Wang_Xue_Ting)3 1933年大學畢業生總數是7311名，1934年為7552名，難以與政府的發展保持同步。就國家的規模而言，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1935年編制的26個國家高等教育對比一覽表里，中國排在最后，1934年每萬人中只有0.88名大學程度的學生。[[99]](#_99_Jiao_Yu_Bu_Tong_Ji_Shi_Bian)正在中國前面排在第25位的土耳其，1928年（凱末爾政權的第5年）每萬人中有3名大學生。總之，居于共和中國之巔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依然構成頂上的薄薄一層現代精英，其人數幾乎不超過往昔士紳階級中的高功名獲得者。同時，現代高等教育的詳細資料、課程內容以及教學質量迄今知之甚少。學校的記錄幾乎全部來自教授和行政人員，而不是來自學生。我們至今對實際進行的講授，它對中國當時需要的適合程度，甚至達到的數字，幾乎沒有概念。

### 高級研究

隨著國民政府的來臨，學術界為創辦中央研究院即中國科學院的希望所鼓舞。建立國家研究院的計劃在1927年，最初由蔡元培、張人杰（張靜江）和李石曾討論過，他們都是在現代教育界服務有年的國民黨元老。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在中國創立多年前蔡在德國受到如此強烈印象的政府資助的高水平研究模式。隨后一些較年輕的科學家和學者，包括胡剛復、王琎、王世杰和周覽（周鯁生）被邀請參與籌劃。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為院長。[[100]](#_100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設三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組成；管理部，由總干事負責；以及一個稱為評議會的顧問機構，由當然評議員和特邀評議員兩部分組成。[[101]](#_101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研究所一成立，學者和科學家在中國現代化的前景和對世界知識積累做貢獻的鼓舞下開始了他們的研究項目。[[102]](#_102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有兩個特征很突出：大多數研究所屬于自然科學，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領導人曾積極投身中國科學社的工作以及興辦各種專業協會。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獨攬最高水平的科學家和學者。由于蔡元培和李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國接受高級訓練）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結構上分歧擴大，李離開了原來的中央研究院，并于1929年建立了國立北平研究院。這是一個獨立實體，在它的領導下，后來20年中，有六所科學研究所從事高級研究和出版。后來李書華作為副院長加入了這個機構。[[103]](#_103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的一個重要新發展，是年輕的歸國學者堅持實地調查與實驗室分析和資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但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進行的實地研究，必須向只受過文獻訓練的中國老派學者展示其價值。這種展示開始于精通史前青銅器銘文的中國古文獻專家于19世紀90年代發現安陽地區出土的“卜骨”上刻有史前漢字。這些學者從商人那里收集了成千上萬的卜骨，開始破譯史前文字并著手進一步發掘。實地考察的另一促進因素來自工商部[[104]](#_104_Ying_Wei_Nong_Shang_Bu)于1916年建立中國地質調查所，以繪制全國地圖并調查國家的自然資源。[[105]](#_105_Ren_Hong_Jun____Wu_Shi_Nian)在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人（他們主要在英國受過訓練）的強有力領導下，繪制地圖和勘探設立了新的標準。該所還贊助古生物研究，終于發現了“北京人”。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一個新生代實驗室，它在20年代顯示了從紐約州（葛利普，地質調查所古生物顧問）、加拿大（步達生）、瑞典（安特生）、德國（魏登瑞）和法國（德日進）來的考察者和科學家如何能幫助訓練新一代中國考古學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領導了北京西南周口店的發掘，并于1929年發現“北京人”。

繼“北京人”之后最著名的發現是對以前僅出現在傳說中的河南安陽商代都城的發掘。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在他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增加考古學于其歷史和語言工作。傅邀請李濟——1923年曾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領導安陽項目。從1928年到1937年在那里進行的發掘，李濟的杰出著作《安陽》一書作了描述。該書詳敘了一個英勇的傳奇——他們如何在十多年戰爭和混亂之中圓滿地進行了實地工作、實驗分析以及對成果的科學研究。這是一項偉大的學術成就。[[106]](#_106_Li_Ji____An_Yang_____Zhang)

北京協和醫學院樹立了醫學教育的最高標準，它經傳教士在醫學方面一個世紀的努力之后，從1915年至1947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成為一個從事研究兼培訓的醫院。它的三百多名畢業生，在1924年后幫助國家公共健康機構配備了人員，同時該學院的研究工作，特別在寄生蟲學以及治療血吸蟲病、鉤蟲和黑熱病等傳染病方面做出了貢獻。[[107]](#_107_Jian_Ma_Li__Bu_Lang__Bu_Luo)

大學也有助于拓寬知識領域。第一個是1921年在沈尹默領導下建立的北大國學研究所。雖然它在北大的計劃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訊研究員，但該所事實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與個別教授一起獨立工作完成所給課題。[[108]](#_108_Tao_Ying_Hui____Cai_Yuan_Pe)進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學位，而是由提交以前的專業出版物決定的。

撇開理想、熱情和專家計劃不談，20年代學術界的工作仍遇到一個經常性的障礙，即財政支持不足。當時的記載不止一次實事求是地談道：“中國正處于內戰之中，公立院校的經費時有拖欠……”[[109]](#_109_Fang_Xian_Ting____Yi_Ge_Zho)一些教授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同時在兩所以上院校授課。在這種情況下，要得到研究撥款是困難的，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資助至關重要。

有關知識的社會學可望從推動中國現代學識的私人組合、群體、小集團和派系的詳細研究中得到好處。首先，留學國外的為數不多的精英，按照傳統組織了學生互助會互相支持。這些互助會的目標和方式與唐人街商人之間的秘密會社（堂）全然不同，它們挑選新會員，向他們提出建議，在避暑地開會并建立以后在國內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誼的個人聯系。在幾個這樣的組織中最有名的是“成志會”（也稱“十字架與劍”）。[[110]](#_110__Cheng_Zhi_Hui__Chu_Ban_Le)

年輕的博士回國后成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樣，他們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少數幸運者能在大學研究所里繼續從事他們的專業，給他們當助手的比較年輕的學生同時接受了訓練。例如，北平地區的北大，清華和燕京以及廣州的中山和嶺南等大學都建立了專門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質量的，刊登在他們自己的學術刊物上。

這類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開經濟研究所，它在何廉領導下建立于1931年。何作為南開大學財政和統計學教授，開拓了南開對華北工業的系統研究。這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學指出了新的方向；這種對中國經濟生活的研究根據從國內收集的數據，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經驗和實例。何利用他在美國作研究生時建立的個人聯系，包括成志會的成員（張伯苓也是其中一員），并能吸引其他受過良好訓練的年輕的經濟學者。例如，方顯廷是1928年的耶魯博士，他在1929年加入了南開的教師隊伍，并成為由經濟研究所演變而成的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委員。[[111]](#_111_Fang_Xian_Ting____Yi_Ge_Zho)吳大業、李卓敏、林同濟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行列，他們都成為知名的經濟學研究員。

南開是一所私立大學，它具有財政獨立和行政穩定的優點，然而它的財力仍不足以適應何仿照倫敦經濟學院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計劃。為了辦成研究所，何個人捐贈500元和自己的藏書，而1929年太平洋學會的2000元贈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這也標志著南開研究所圖書館的開始，這個圖書館后來以中國經濟方面的藏品豐富而聞名。[[112]](#_112_Tong_Shang_Shu__Di_41__42)這時倫敦的托尼教授來到南開大學從事研究，并在1929—1930年間的冬天講學。[[113]](#_113_Tong_Shang_Shu__Di_45Ye___T)這樣獲得的國際知名度以及中國經濟學家中有高學術水平的證據，導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32年給予一筆為期五年的資助。研究所得到這些幫助后，在1937年戰爭爆發及南開校園被破壞前，出版了大約20種頗有見地的專著（包括大量的實地數據）。[[114]](#_114_Fang_Xian_Ting____Yi_Ge_Zho)

康乃爾大學開創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年代由卜凱等人在金陵大學繼續進行，他們關于中國農業經濟的抽樣數據展示了農藝技術的全部領域。從1934年起，這項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國中央農業實驗所繼續進行。[[115]](#_115_Jian_Bu_Kai____Zhong_Guo_Tu)

社會學在燕京大學得到發展，從社會調查開始，起初這是受基督教青年會一位干事的啟發，這位干事在1912年組織了北京學生社會服務俱樂部，使會員更多接觸中國生活的現實。到1915年，這個團體已對北京320名人力車夫進行了首創性研究，這是對人類生活的第一手資料，后來小說家老舍使之永垂后世（參看第9章）。1928年燕京社會學系的“社會調查之翼”，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學新校址以北三英里的清河農村建立了農村研究站。[[116]](#_116_Zai_Zhe_Xiang_Diao_Cha_Zhon)受西方訓練的中國社會學家以這次社會調查為起點，在燕京繼續為中國的這門科學奠定基礎。它在燕京的成長是由1929年從哥倫比亞大學歸來的吳文藻領導的。吳在該校遇到步濟時，并研究社會學。吳文藻的領導和規劃以及派遣學生出國培養了一批發展本專業的主要人物。美國和英國著名社會學家訪問燕京，并在那里授課也刺激了它的成長。[[117]](#_117_Wu_Wen_Zao_De_Xue_Sheng_You)

社會研究往往需要歷史知識和制度知識的基礎。陶孟和（1912年獲倫敦大學文學士學位）于1928年負責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資助的北平社會調查所。[[118]](#_118_Jian___Zhong_Guo_Jin_Dai_Ji)該所研究人員除其他事務外，開始為社會和經濟制度史查閱新開放的清朝檔案。1934年該所與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合并。

中國營造學社也從事實地考察。該社于1928年由一位杰出的前官員（朱啟鈴）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從事圖書資料研究，此后才由兩位賓夕法尼亞大學培養的建筑學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養的同事劉敦楨領導該社的實地調查，以發現古跡——廟宇、塔、橋。在這里，得到了引進的方法幫助的新的科學興趣又一次導致了歷史性的發現。[[119]](#_119_Jian_Wei_Er_Ma__Fei_Er_B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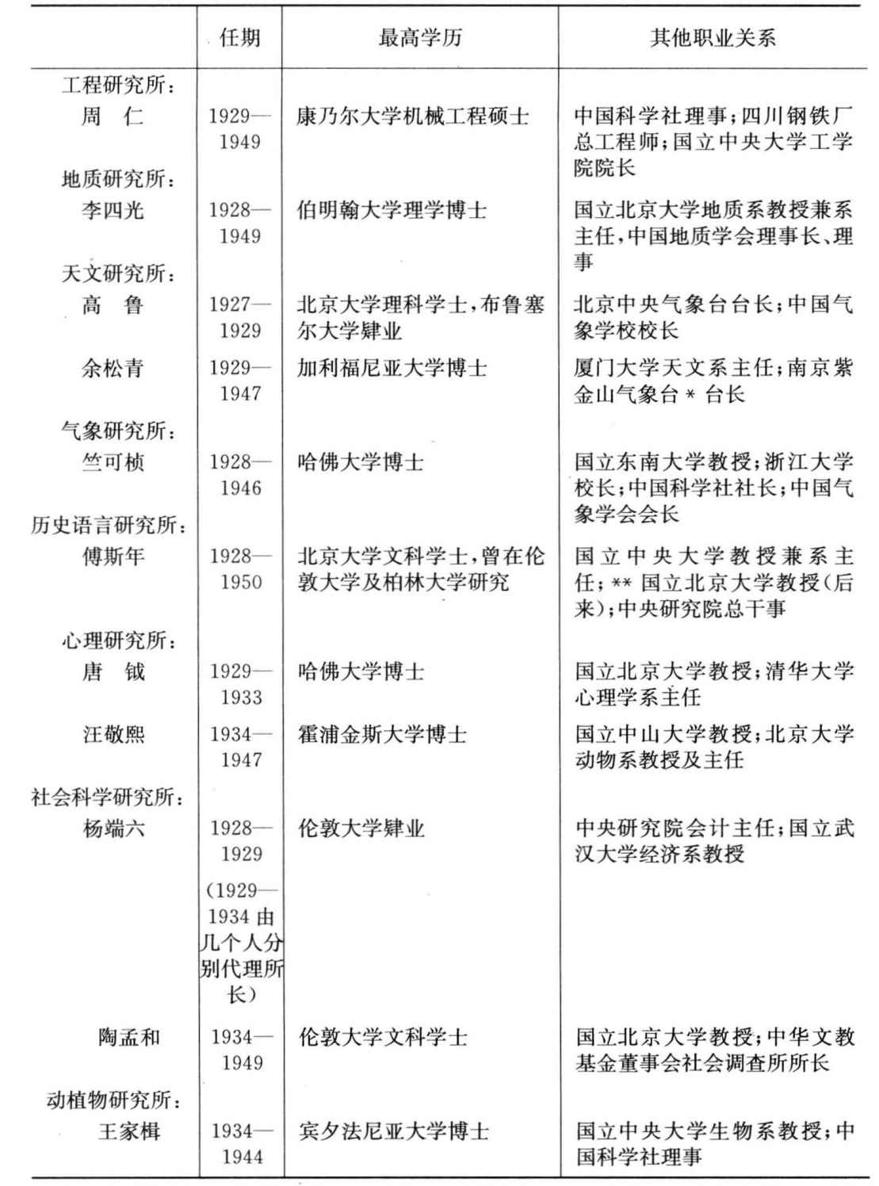
### 研究的資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業迅速擴大。中央研究院的10個研究所的所長（見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非常嚴肅地肩負起了他們的責任。由不同的研究和專業機構主辦的科學雜志及其他出版物（見表6）增加了好幾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種屬地質學和古生物學，6種屬生物學，兩種屬氣象學，兩種屬化學和化工，還有一種屬物理學。[[120]](#_120_Ren_Hong_Jun____Wu_Shi_Nian)這些科學家的終極目標是把中國科學放在與其他現代國家平等的基礎上，并對科學界作出創造性的貢獻。同時在地質學、有機和無機化學以及營養學等先進領域中，其進步受到工業化目標的直接鼓舞。[[121]](#_121_Ren_Hong_Jun____Zhong_Guo_J)在傅斯年的領導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樹立了中國歷史和文化學術研究的高標準。

表5 1928—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間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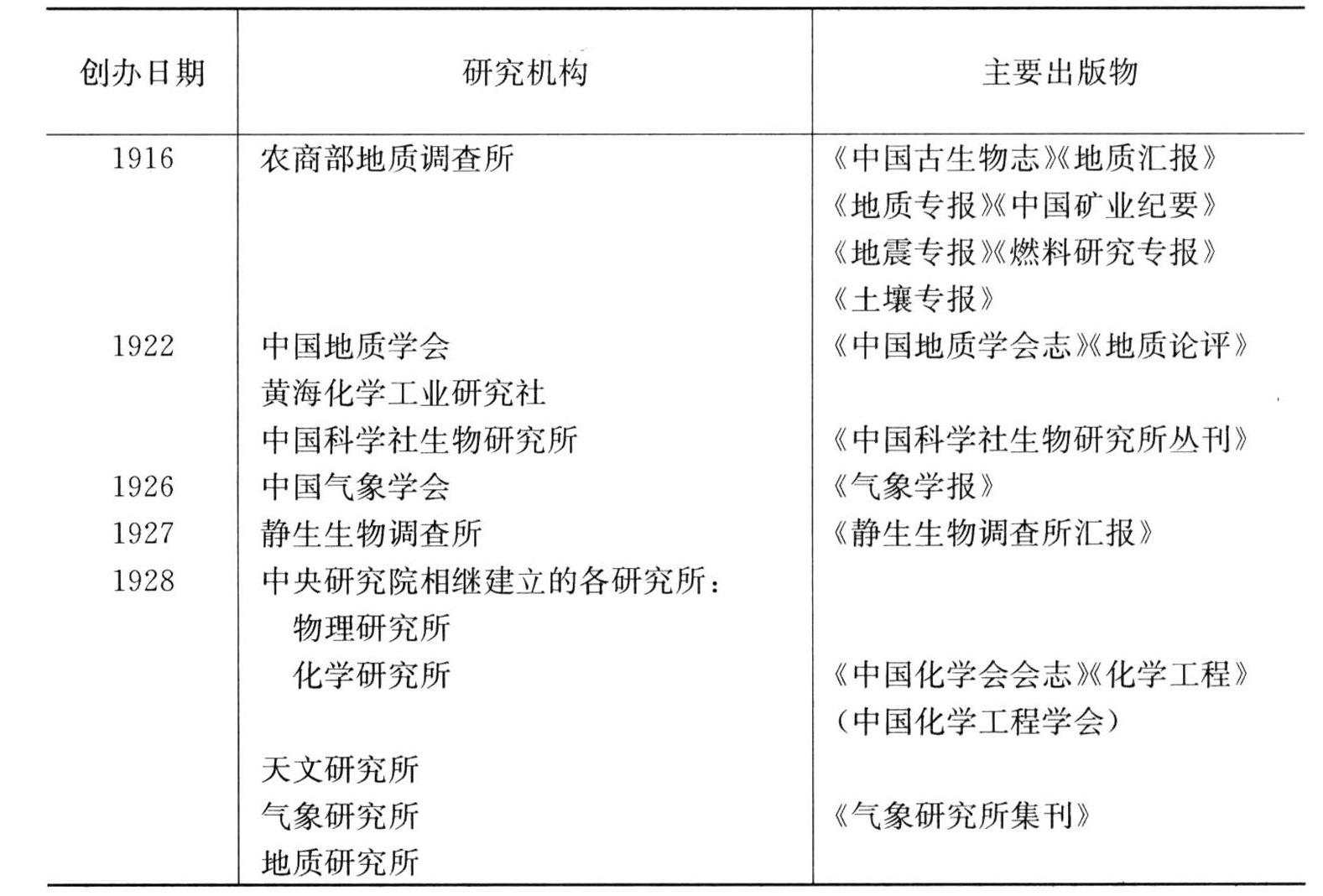


續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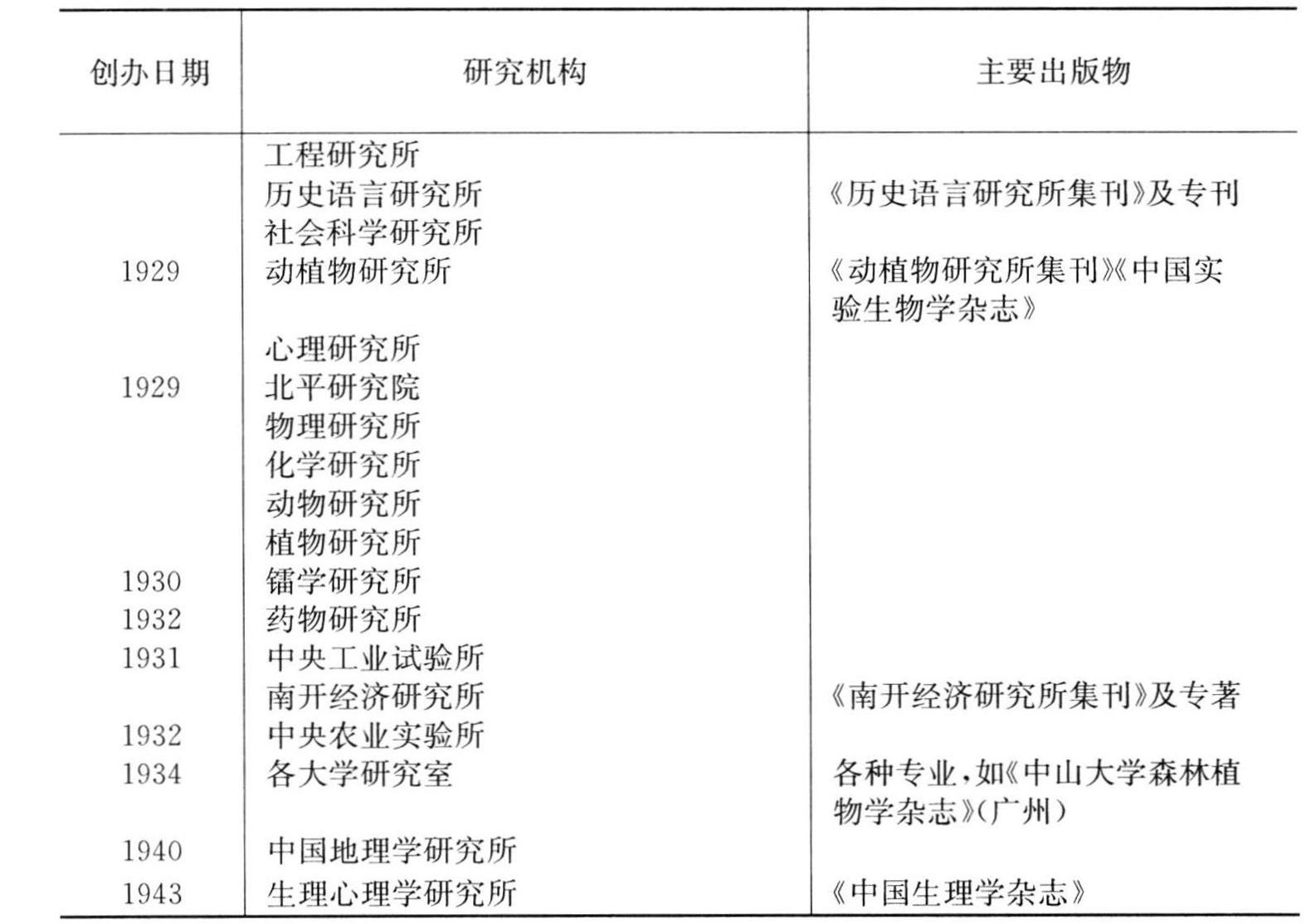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第33—36頁。  
\* 紫金山天文臺，不是氣象臺。——譯者  
\* \* 傅斯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學。——譯者

表6 主要研究機構和專業刊物，1916—1944年



續表



資料來源：根據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88—189頁；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第7頁。

這里不可能評價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廣泛的工作（前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在1933—1937年間曾任教育部長）。該部負責推行全國學校體制，開展識字運動，以及制定中學畢業和大學入學的標準。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與教育部無關，在不平等條約體系的保護下得以從中央政府獲得穩定的資金，負責資助高級訓練和研究。由于基金會的發展是獨立的，它的活動不斷擴大并滲透到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基金會的資助計劃涉及廣泛的學術領域。基金會在1926—1945年的20年間撥款一覽表顯示，有96個機構，包括大學和學院、研究機構和文教組織，得到總數達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資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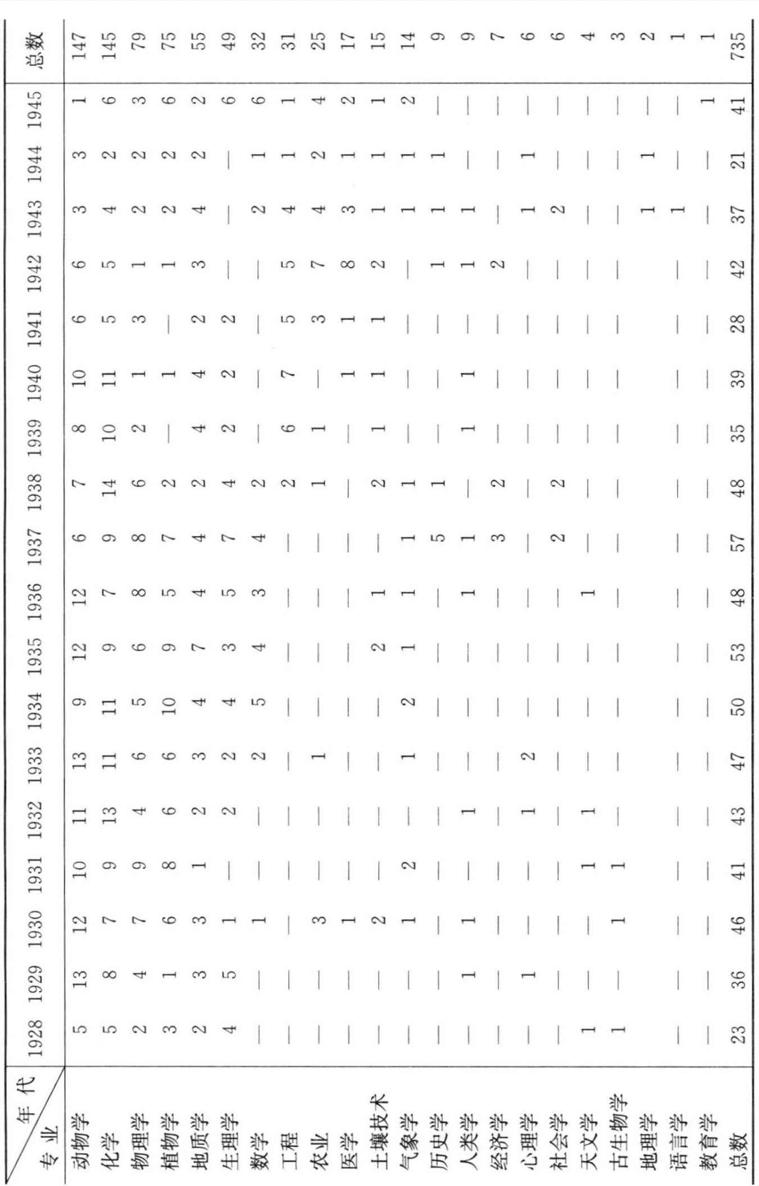
由該基金會發起或資助的項目有下列數類。[[122]](#_122_Zhe_Yi_Shuo_Ming_Gen_Ju_Ren)（1）從1931年到1937年與國立北京大學直接合作，每個項目每年由此捐贈20萬元以補助教職員薪金并支持他們騰出時間從事研究。基金會的資助大幅度減少了在其他學校兼職的教授人數；而教授們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北大的精神狀態大有改進，有多位杰出的學者被吸引來任教。（2）按照地理差異在沈陽、南京、武昌、廣州和成都選定6所主要高等師范學校，并設立理科教授職位。（3）向高級科學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資深造；這些資助（表7）是長期的，給予專業成就已得到廣泛承認的數量有限的個人。（4）向年輕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提供科學研究基金，以便在國內或國外接受高級培訓。在1928—1945年共撥研究基金723筆，特殊獎金3筆（表8），其中327名研究人員在國內從事高級研究；在出國的研究人員中，208名去美國，64名去法國，56名去德國，39名去英國。他們的專業分布甚廣，從農業和考古學，經植物學、化學，以及數十種其他領域，到動物學。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術，這在中國是一個比較新的專業，在這期間收到15筆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沒有一個領域超過10筆。戰爭開始后，工程學作為頒獎領域嶄露頭角。（5）在中華基金會贊助下建立了一些機構和組織，其中有幾個逐漸演變為科學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為紀念基金會首任干事長范源濂 而建立的靜生生物調查所，1934年與中央研究院一個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會調查所，以及在美國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華美協進社。

表7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科學研究基金，1930—1945年



資料來源：根據《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8頁。

表8 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研究基金的專業分配，1928—1945 年



資料來源：《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10頁，表1。

教會院校的教師根據特長可獲得該基金會的支持，而另一個基金會，即哈佛燕京學社，則特別支持教會學校中的漢學研究。這個以哈佛為基礎的機構于1928年由燕京大學負責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學院負責人（沃利斯·B.多納姆）發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學洪業領導下的漢學經典文史方面的學術培訓和研究計劃。目的是按照歐洲漢學采用的方法運用現代標準和裝備（如索引）以促進在中國的研究。撥款還幫助其他教會學校研究漢學；基金還提供給中國學者在哈佛接受訓練。

1931—1949年間為大眾所知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起初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一個特別項目，后來發展為一項中國文化的主要財富。[[123]](#_123_Dao_1926Nian__Ju_Bao_Zhong)

1928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出資建立北京圖書館，作為建立國家圖書館的第一步，把臨時館址設在北海公園，并任命袁同禮（1923年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畢業）為館長。三年后該基金會提供137.4萬元建造了一棟寬闊的新圖書館大樓，同時教育部建議北海圖書館與原國立圖書館合并；后一機構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國翰林院和軍機處大庫轉來的珍貴圖書。這樣，1931年新樓落成時，國立北平圖書館也成立了。[[124]](#_124_Ren_Hong_Jun____Zhong_Hua_J)袁同禮使北平圖書館成為中國圖書館活動中心，帶頭引進新技術，如編輯聯合目錄、聯合期刊表、館間互借、影印服務，與其他國家的機構交換資料以及交換館員。[[125]](#_125___Yuan_Tong_Li__Zan_Song)此外，國立北平圖書館還發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圖書季刊》、文獻匯編，以及漢學、文學和歷史地理學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評價。袁在1925年協助建立中華圖書館協會后，在出版兩種圖書館學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126]](#_126_Tong_Shang_Shu__Di_56__57Ye)袁和30年代其他有遠見的圖書館員大力參與中國現代化，認為他們的作用對發展科學和現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1933年國民政府建立了國立中央圖書館，它最終成為接受別國政府交換資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開了“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科學會議。這次會議由科學社和中國數學、動物學、物理學、化學和植物學等學會聯合發起，在分組會上提出了250篇論文，其中大約60%反映了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財政資助的機構所做的工作。[[127]](#_127___Yuan_Tong_Li__Zan_Song)

到1937年，學術界領導人物通過積極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教育政策，并在發展現代研究機構方面取得重大進步。[[128]](#_128_Hu_Shi____Hu_Shi_Liu_Xue_Ri)從表面看，中國似乎已經到達起飛點，新一代知識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學和研究所里忙于學習和研究，并把他們的活動擴展到新的研究領域。30年代中期大多數領導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響。他們作為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多層含義的名詞——堅信進步是可能的。他們也是有意或無意仍保留儒家社會倫理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同樣相信他們有義務承擔國家建設的責任。在中國建立堪與西方國家一流學校相比的學術機構，是大多數這些學術帶頭人共有的理想。例如，胡適在康乃爾大學學習時，形成一個終生不渝的理想：為發展成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應當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學術機構，如達到哈佛、牛津、劍橋、巴黎大學水平的大的國立大學，以及地區、省和國家級的公共圖書館，后者可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媲美。羅家倫在1927年負責中央政治學校時表示，他想把這個學校變為四年制的學校，兼具倫敦經濟學院和法國政治學院的特色。[[129]](#_129_Jian___Shi_Zhe_Ru_Si_Ji)有幾年，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認為，他們為現代中國所做的設計是頗見成效的。

然而，這個互相聯系并緊密結合的學術帶頭人的世界的消極面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現實，因為全部學術機構是建立在一個自相矛盾的形勢之上的。盡管這些科學家和學者竭盡全力從事機構建設，但把他們的目標轉變成現實的機會卻取決于他們左右政權的能力，1928年后，這是指國民黨。許多學術領導人參加過孫逸仙領導的共和革命，他們能依靠這種聯系來幫助他們的教育工作；民族主義是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共同語言和普遍情緒，它也能緩和自由主義的個人與政府當局之間潛在的破壞性對抗。然而矛盾卻時有表面化的危險，例如在國民政府和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董事之間，關于控制基金會基金卻有低度的然而接連不斷的緊張現象出現。[[130]](#_130_Bi_De__Ba_Ke____Mei_Guo_Ke)

1933年，自由主義的危機在中國突然出現。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國的效法者（見第3章），獨裁主義的學說正在涌現，而五四運動的學術派雖然避開了革命政治，但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們。這兩種黨派專政的持續對抗，使國民黨動員和鎮壓的力量增強了。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楊銓（楊杏佛，1898—1933年），他曾一度擔任孫逸仙的秘書，畢業于康乃爾和哈佛大學，1919—1922年任科學社干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總干事。在楊的眾多活動中，他曾與宋慶齡一起投身人權事業，并曾幫助建立短暫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義者和左派的支持。1933年6月楊銓在中央研究院他的辦公室外公然遇刺，兇手隨即被南京的警察殺死。與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不同，這次行動的指使者從未受到追查。蔡元培雖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1933年后他選擇了保持低的公開形象。[[131]](#_131_Jian_Fei_Zheng_Qing____Zhua)謀殺楊銓后，國民政府開始了消滅江西的共產黨的最后戰役，并于1937年最終發動了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當時國民黨的主要組織者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

總之，自由主義教育家在共和中國的成就，是在來自國內外的暴力尚未占優勢的短暫時期取得的。學術界的領導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間工作，他們的相對成就足以助長他們的信心，這種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為現實所支持。然而這種自信和共通的意識，在這些領導人與他們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間樹起了一道屏障。除少數專家外，中國廣大民眾的生活和問題依然未被學術工作觸及。黃炎培昔日是張騫的信徒，他致力于把職業教育辦成一種向需要職業訓練者開放的自由選擇；然而，因為與農村社會的聯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來，這個運動的影響主要限于部分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后職業學校變得越來越像普通學校了。[[132]](#_132_Ma_Ge__S_Ge_Wu_Er_Ci____She)30年代中期，鄉村建設運動在陶行知、晏陽初（在河北省定縣）、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和南京附近的一個模范縣）等人領導下剛剛開始。[[133]](#_133_Jian_Kong_Fei_Li_Zai_Ben_Sh)蔣廷黻，一位在清華任教的中國對外關系史的開拓者，在1935年向倫敦聽眾說，“我們有過失，在生活上脫離人民……我們不能使自己被中國的鄉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為農民領袖”[[134]](#_134_Jiang_Ting_Fu____Zhong_Guo)。

就學術界的領導人而言，使中國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現代化，是一項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識更新和機構建設的任務。他們按照傳統，相信學者有責任過問政府的政策。30年代有關輿論的雜志中，《獨立評論》是著名的。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編輯的。包括許多學術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適、胡先骕、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蔣夢麟、蔣廷黻和陳之邁。編輯部會議每月輪流在一名成員家召開，討論可能持續到深夜。編輯們對當前的政府政策或適合于中國的發展模式的不同意見，適足以增強《獨立評論》作為30年代早期中國自由主義改革家觀點的發言人的作用。[[135]](#_135___Du_Li_Ping_Lun____De_Zhu)

對日戰爭的威脅形成了愛國的大團結。以前避免為南京國民黨政權服務的知識分子現在接受了蔣介石下面的職位。翁文灝和蔣廷黻成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書[[136]](#_136_Weng_Wen_Hao_Yu_1935Nian_12)（蔣夢麟戰后也擔任同樣職務）。胡適出任戰時駐華盛頓的大使，而其他人則在重慶任職。

同時，平津地區的學生帶頭喚起國人反抗日本侵略。1935年12 月9日和16日反對成立由日本授意設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137]](#_137_Que_Qie_Ming_Cheng_Wei_Ji_D)的示威，再次使清華、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學校學生與警察和憲兵發生沖突。[[138]](#_138_Fu_Lei_En____Zhan_Zheng_Xu)日本人發現大學生和培養大學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緒的根源，他們召喚北大校長蔣夢麟到使館區的日本兵營，并指責他進行“廣泛宣傳”反對日本。蔣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緒自然會消除；蔣被迫表示個人意見時，他回答說，“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139]](#_139_Jiang_Meng_Lin____Lai_Zi_Xi)恐嚇的努力失敗了，但它預示了1937年7月戰爭爆發后日本對中國大學校園的野蠻破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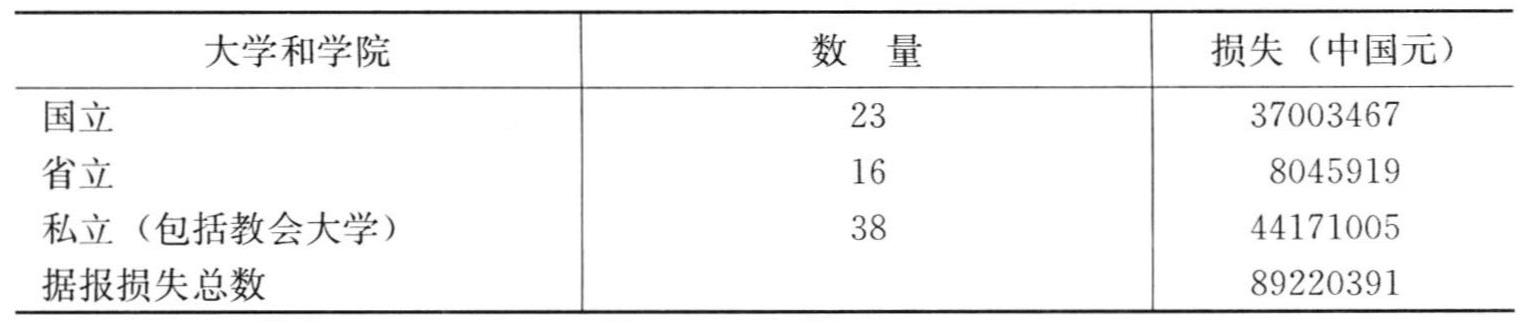
## 戰時和戰后的變化，1937—1949年

### 戰時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戰爭迫使就高等教育應否給軍事工作讓路，或應否繼續追求它的學術目標展開爭論。但是到1938年學術界已經接受了繼續從事教育工作的任務，認為這對中國的未來是必要的。在大范圍的軍事動亂和人民流離中，主要大專院校選擇了遷往內地較為安全地區的戰略。幾十所高等教育機構的遷徙——包括遷移計劃，為目的地校址談判，為運送教師、學生、職工、圖書設備籌措資金和后勤以及沿途必要的準備等各個階段——本身就是一部激動人心的傳奇。它的實施需要決心、組織技巧、協調和適應。在戰爭的第一年內學術界就完成了這一任務，并在這個過程中把現代教育帶進比較不發達的內地。

東部各省的遷移路線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幾年前張伯苓已在重慶獲得一塊校址，以建立南開系統內的第二所中學；因此天津的南開中學毫無困難地遷到了它的重慶新校園。另一方面，南開大學由教育部命令與北大和清華合并，起初在湖南長沙組成臨時大學，然后從1938年的晚些時候開始在云南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其他北方大學，包括北洋工學院，遷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組成戰時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成都華西協合大學的校園成為其他七所教會大學的家園。還有一些其他學校單獨遷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國立浙江大學在貴州山城遵義單獨辦學，國立中央大學則在重慶郊區。[[140]](#_140_Zhuang_Ze_Xuan____Kang_Zhan)

表9 戰時教育機構的損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隨他們的學校遷移，教師也是如此；戰爭的破壞使1937—1938年成為受挫和損失之年。1938年全國學生注冊總數比1936年減少約2萬人，而教師數量減少約2000人，分別降低約50%和30%，當時高等院校的數量則減少到91所。[[141]](#_141_Zhuang_Ze_Xuan____Kang_Zhan)從物質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毀滅性的是被損害或破壞的校產的損失并非由于戰爭的機運，而主要由于日本軍人的蓄意行為。戰爭開始時以南開大學為目標的轟炸使它淪為一片廢墟，這一破壞已廣為人知，但幾乎所有的其他學校在日本占領期間也因轟炸或破壞性使用，而蒙受財產損失。據教育部匯編，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機構在建筑和設備方面的損失示于表9。[[142]](#_142_Chen_Li_Fu____Si_Nian_Lai_D)

相比之下，官方報告的1940年國家直接稅收入僅為92441020元。[[143]](#_143___Zhan_Shi_Zhong_Hua_Zhi)然而面對如此重大的破壞，學校生存下來了，并努力繼續發展。恰在數量增加之時，嚴酷的戰時條件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學術活動的質量下降。院校總數從1937—1938年的低點91所開始上升，超過了1936—1937年的水平，在1940年達到113所。1945年戰爭結束時，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冊學生增加到73669名，[[144]](#_144_Chen_Li_Fu____Si_Nian_Lai_D)再次達到戰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為了弄清所遷學校在八年戰爭期間的作用，讓我們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整個學術界頑強堅持是支撐戰時教育的關鍵因素。1937年秋，即當戰爭擴大到中國更多地方時，聯大的課堂教育恢復了：長沙臨時大學以其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師生之眾，于11月1日開課。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計劃中的未來清華大學農學院的校舍，恰在長沙城外，是戰前不久獲得的。然而，在秋季學期結束時，日本人更迫近長江中游地區，學校決定遷往西南邊陲省份云南。沒有人提問如此遠距離、大規模搬遷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適當：高等教育機構顯然是國家最有價值的資源，所以只要形勢允許，當然必須搶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師生在云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納不下，文學院和法學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幾個月）。大約300名學生，由幾個教授隨同，從長沙步行兩個月，行程近1000英里，而更大的隊伍則乘車船繞道香港和滇越鐵路到達。人員會齊之時，聯大隨之誕生。[[145]](#_145_Jian_Yue_Han__Yi_Si_Lei_Er)同時，還舉行了入學考試，招收一年級新生，以擴充來自華北的現有學生隊伍。

聯大教員包括中國一些最有名望的學者。到1940年，注冊學生增加到3000多人。學生的增加迫使聯大于1940年開始在四川敘永建立新生分校。昆明的設施負擔過重，既有借自當地學校的舊建筑，也有在1938—1939年倉促建起的廉價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學校、理學院、法商學院和工學院等四個學院之外，增了師范學院，課程的范圍擴大了。[[146]](#_146_Zhang_Qi_Jun____Xi_Nan_Lian)蔣夢麟、梅貽琦和張伯苓，他們分別是戰前北大、清華和南開的校長，顯示了政治家風度的分工合作才能。蔣和張在重慶度過了大部分時間，與政府保持經常聯系以照顧聯大的利益，而梅則在昆明負責學校的日常管理。教師努力從教，同時使自己的學術工作適應極不相同的地理環境和知識環境。例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已重新就職于省立云南大學，雖然有時也被邀在聯大講課，但他把對長江下游農村的研究轉移到考察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南開經濟研究所切斷了與華北基地的聯系，轉而發掘不發達的內陸的經濟。

隨著戰爭的延續，嚴重的實際困難加劇了。一個長期的難題是怎樣獲得圖書和設備。經搶救并運到云南的遠遠不夠，而新的供應品又難以獲得，特別在1940年滇越鐵路中斷之后。1939—1940年國民政府提供了100萬美元為各大學購買圖書和設備，但到1945年“仍未全部到達”。政府下令中學的自然科學課程應只用國產品作實驗以便把進口貨留給大學實驗室，但是這些措施遠遠不夠。[[147]](#_147___Zhu_Jia_Hua_Xian_Sheng_Ya)這類物資匱乏使科學和技術科目的課程作業質量下降。同時，圖書館書本不足使大多數大學課程嚴重依賴課堂筆記和基本教科書，結果教學雙方都受到嚴重的限制。

另一個問題是師生生活水平持續下降。由于通貨膨脹惡化，教授的創造力常被轉向維持生計。政府特許教育和公務人員每月以固定的低價購買定量的大米。[[148]](#_148_Tu_Chu_De_Li_Zi_Shi_Shi_Ren)許多大學生處境更為困難。戰爭初期政府開始向與家庭切斷聯系而確實貧窮的學生提供貸金，到1941年1.6萬多名學生接受過這種幫助。[[149]](#_149_Chen_Li_Fu____Si_Nian_Lai_D)補貼僅能使接受者勉強維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更不用說書籍和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聯大有一種說法，抵押冬衣買春季用書，然后在秋季抵押書本贖冬衣。

第三個問題雖然不那么迫在眉睫，卻是最根本性的困難，那就是現政權與自由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后者把自己視為現代中國建設者之一。建設國家的努力現在不得不用戰時極為珍貴的資源來實現，這一事實加劇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國民黨專政之間的目標分歧。教育部長陳立夫渴望擴大自由中國的學生隊伍，并使他們信奉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希望借以阻止心懷不滿的青年轉向共產黨。由此產生的國民黨對師生思想的控制，在聯大導致了尖銳的沖突。由于昆明物價的上漲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給在聯大益顯不足。反對國民黨獨裁的聯大教授得到地方軍閥云南省主席龍云的支持，他阻礙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學校園政治思想的措施。在這種形勢下，表面上對實際問題的分歧有可能導致觀點上的分化。例如，1940年政治學教授錢端升表達了對政府以損害人文學科為代價過分強調大學課程的功利主義部分的不滿，他說：“大學的基本目標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如果大學能同時生產一些有用的東西，那是一種附屬功能而不是它原來的目標。”[[150]](#_150_Qian_Duan_Sheng_Shi_Lian_Da)這個聲明顯示新文化運動固有的兩重性：哪一個更重要，是通過知識的追求發展個人的心智，還是為了民族的集體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識？

高級研究的困難與高等教育類似。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數處，包括昆明、重慶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里科學家和學者盡其所能進行研究。1941年9月中國的天文學家組織了一次遠征，到西北觀察日全食。為適應戰爭的需要，某些新的技術領域得到了發展，如工業化學和運輸的木—油燃料的利用。[[151]](#_151_Ren_Hong_Jun____Wu_Shi_Nian)但總的說來，戰時的學術和科學工作是一種維持活動。

### 戰后的變化

戰爭早已把中國高等教育驅出了具有外國色彩的象牙之塔。戰后的歲月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亂之中。當1945年11月昆明學生領導反內戰示威時，云南的政治氣候已在變化；云南省長龍云雖然在戰時與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護了學術界。戰爭一結束，對該省的權力之爭接踵而至。龍被斗敗，重慶政府以盧漢取而代之，盧同意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更多的權力。所以學生的反內戰運動使他們與國民黨當局發生正面沖突，當局采取迅速行動，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見。在學術界和自由職業界有廣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學生的堅定立場，并要求建立聯合政府。11月末，陣線已經分明。聯大學生于11月25日領導了一次大會，抗議國共重開內戰，但被武裝軍隊驅散。當時政府仍在重慶與中共領導人談判，它斷然聲稱反戰情緒是共產黨煽動的。然而，學生們堅持斗爭，12月1日，一幫武裝分子，其中一些身穿軍服，侵入了幾個校園，這時幾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學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計劃。戰斗爆發了，石塊對抗槍械和手榴彈。戰斗結束時有三個學生和一名音樂教師被殺，十幾名學生受傷。[[152]](#_152_Su_Shan_Nuo__Pei_Po____Zhon)

如果政府開始謹慎地疏遠知識分子，它不會取得像1945年12月1日那樣強烈的結果。疏遠已是一個公開的事實，同盟國勝利后不到一年，昆明正在變成知識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謠傳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單”，然后發生了兩起對兩位教授的暗殺：李公樸于1946年7 月11日被害，而聞一多于7月15日在一次公開悼念李的大會上發表一篇激動人心的講演后被害。[[153]](#_153___Guan_Cha____Di_1Juan_Di_1)10名民盟其他領導成員，包括潘光旦教授（清華教務長），費孝通（人類學家，云南大學）和張奚若（政治學家，聯大）立即前往美國駐昆明領事館避難，直到他們的安全得到一個來自重慶的特使保證為止。[[154]](#_154_Tong_Shang_Shu__Di_24Ye___G)

在這種變化莫測、憂慮和對現權力結構越來越不抱幻想的境況中，學術界的主要任務是收拾行裝，把學校遷回原來的校園。搬遷工作完成得極其迅速。例如，1946年秋季學期，南開大學在天津郊外的八里臺校園重新開學。八百多名學生在原址恢復學習，那里70%的建筑已被毀壞，但一年后恢復工作就完成了大約30%，而管理人員為重建學校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政府繼續執行其統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學，包括南開在內，變為國立。增設和改組也在進行。例如，北洋工學院戰后從陜西遷回，1946年重新命名為北洋大學，人員被配置在兩個部分，即一個理學院和一個工學院。幾所教會大學從四川遷回后聯合組成華東大學，設在上海前圣約翰大學的校園里。[[155]](#_155___Zhong_Hua_Jiao_Yu_Jie)

1944年，撥給高等教育的經費總數已達180億元（1937年為3000萬元），但它的真正購買力只相當于1937年期間的180萬元。40年代末期學生人數較多，學校也較多，這意味著質量急劇下降。[[156]](#_156_Ou_Yuan_Huai____Kang_Zhan_S)從總體看，在戰爭年代數量的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質量的提高，雖然在某些學校某些專業領域的大學教學仍設法保持世界標準的高水平。從1941—1942年開始教育部對大學員工進行個別正式登記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爭議。[[157]](#_157_Guan_Yu_Zhan_Hou_Liang_Nian)

1946年9月一份新周刊《觀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20世紀中期中國自由主義分子的最后抵抗。主編儲安平得到來自像十幾年前曾向《獨立評論》投稿的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積極支持。為第一期《觀察》寫作的名單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現代專門職業界領袖的部分點名冊：王蕓生，《大公報》總主筆，該報當時是一份最受重視并廣泛傳播的日報；伍啟元，清華經濟學教授；蔡維藩，南開歷史學教授；馮友蘭，清華哲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張東蓀，燕京大學政治學教授；陳之邁，政治學家，當時是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參事；卞之琳，詩人，南開大學文學教授。[[158]](#_158___Guan_Cha____Di_1Juan_Di_1)

儲安平宣布《觀察》是“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而不是政治斗爭的工具”，這份雜志“除大體上代表著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廣大人民群眾說話以外，我們背后另無任何組織”。儲提出了可以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墓志銘的四個信條：首先，在中國發揚民主。“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權進退必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第二，支持各種基本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工業化，以及科學精神和現代思想的成長。最后，推動用理性解決各種紛爭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抗戰雖然勝利，大局愈見混亂。政治激蕩，經濟凋敝，整個社會已步近崩潰的邊緣……”[[159]](#_159_Tong_Shang_Shu__Di_3__4Ye)在這樣的逆境中，戰后年代的學術界只能試圖保留過去10年軍事、政治和經濟動蕩中幸存下來的東西。到1949年，中國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學者和政治當局的關系長期以來就是共和國辯論和斗爭的主題，今后也不會松弛或放任。然而新中國的建立，包括國家權力的重建，不會減少對學術創造力的需要。

[[1]](#_1_7)江勇振、柯文、默爾·戈德曼、賈祖麟、威廉·J.哈斯、約翰·伊斯雷爾和蘇珊·佩珀等人對本章提出寶貴的意見，我們深表謝意。教育這一課題的文獻資料十分豐富。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獻匯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4卷，1928年；《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3卷，1962年）以及多賀秋五郎編的最近文獻匯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第3卷，1976年），都將在下面參考書目中提到。

[[2]](#_2_7)關于識字教育，見伊夫林·S.羅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眾識字》。關于書院，見蒂爾曼·格林：《廣東的書院與城市制度》，載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475—498頁。關于1911年前的新學校制度，見薩利·博恩威克：《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現代時期的開端》。關于商務印書館在教育方面的業績，見王云五的《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它包括了1897—1972年該館的大事、出版物和報告書等。關于一個省份（山東）的教育變遷，見戴維·D.巴克：《濟南教育的現代化，1899—1937年》，載伊懋可和史堅雅編的《兩種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第171—212頁。現代中國教育的綜合問題將由蘇珊·佩珀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4章論述。

[[3]](#_3_7)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5章和《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7章和第8章。關于更近的新成果，見賈祖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敘事史》。

[[4]](#_4_7)1922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會的調查報告全國有職業學校1553所。到1925年中華職業教育社由一百余個教育團體組成。《中華年鑒，1926年》，第423頁。

[[5]](#_5_7)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M.詹森著第6章，引用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這是這位研究中日教育關系的日本第一號專家的主要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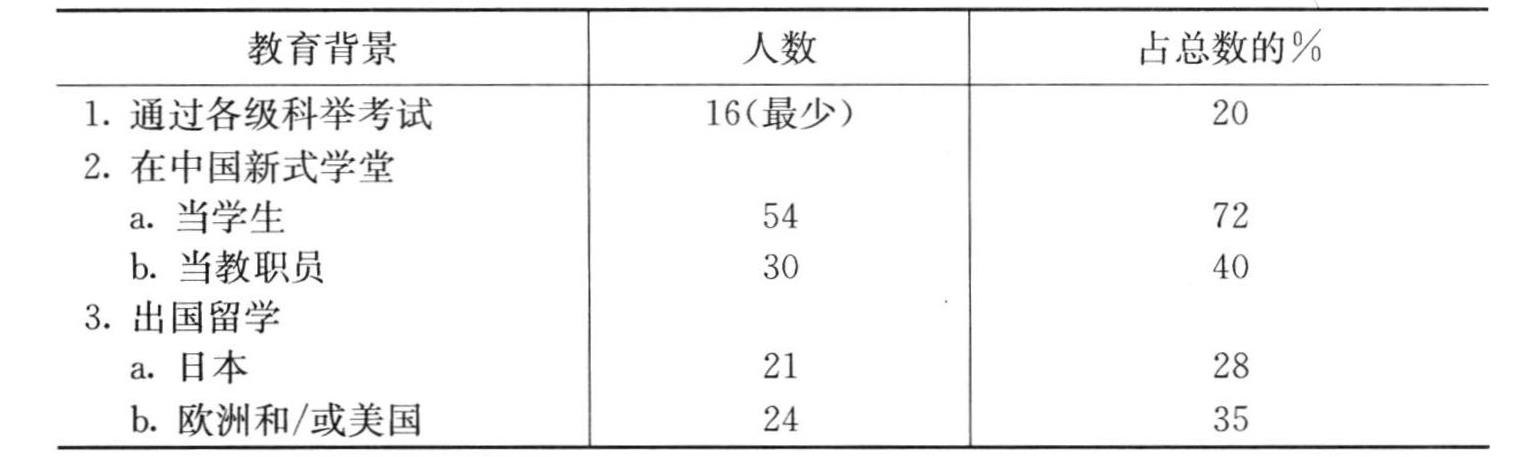
[[6]](#_6_7)汪一駒著：《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綜述的主要內容，實際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學習以及關于這個題目的以后許多方面的大量資料。中日學術關系各個方面在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7]](#_7_7)有多少人畢業不明。見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19—120、167、185頁引用華美協進社的資料。

[[8]](#_8_7)劉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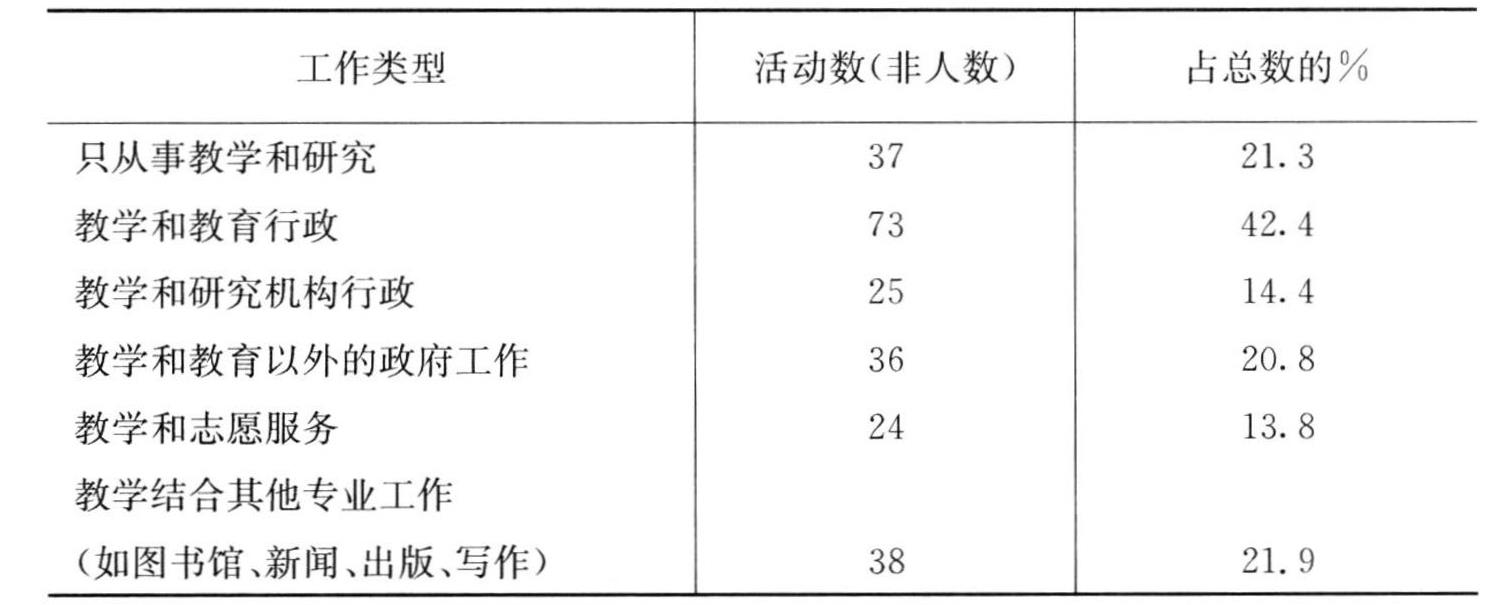
[[9]](#_9_7)這種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別加以說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與世界主義：西方階段和中國階段》。

[[10]](#_10_7)為獲得民國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訓練的形式的印象，我們考察了75人的經歷如下：



上述資料根據包華德和理查德·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詞典》和《辛亥革命回憶錄》（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樣。不可避免在分類時有重復。對《中華民國傳記詞典》中參加過各種自由維新運動的全部名人的社會背景的進一步調查，表明1/3以上是學者官僚階級出身。弗吉尼亞·E.雷諾茲：《社會運動：中國領導階層分析，1895—1927年》（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3年，部分VB：數量綜合。

[[11]](#_11_7)為獲得1912—1949年學術界名人事業活動的印象，我們統計了173人所從事的工作的類型。大約1/3的人從事一種以上的活動。



此表根據《中華民國傳記詞典》中173人的傳略，他們的專業活動范圍從部分從事（如僅短期從事高等院校教學）到畢生從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諸方面工作。人們公認這群人是有選擇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積極地影響近代教育界發展的人物。

[[12]](#_12_7)王風喈：《中國教育史大綱》，第5頁。王是時在長沙晨光大學任教。

[[13]](#_13_7)關于新文化運動中對“科學”的各種見解，見史華慈在《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8章中的概括；又見郭穎頤：《1900—1950年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14]](#_14_7)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載《清代軼聞》卷5，第1—2頁；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略》，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59—160頁。關于同文館，見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在1901年簽訂《辛丑各國和約》后清政府試圖在各省設立大學堂，如谷如墉領導下的山西大學堂：見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傳略》第1部，第295頁。然而，H.S.布倫納特和V.V.哈格爾斯特羅姆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國政治組織》一書中記載，只有一所新大學設在北京（第223頁）。在20世紀20年代，年鑒列舉6所省立農科大學或工科大學。例如伍德海編：《中華年鑒，1926年》列舉這些大學設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蘇和山東（第434b頁）。

[[15]](#_15_7)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第2頁；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略》，第160頁。

[[16]](#_16_7)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載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頁。

[[17]](#_17_6)我一：《臨時教育會日記》，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296—297頁。

[[18]](#_18_7)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頒布的《大學令》，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647頁。在《大學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訂時只抹去一個逗號，所以新版本為“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同上，第671頁。

[[19]](#_19_7)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頒布的《大學令》，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647頁；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71頁。

[[20]](#_20_7)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70—271頁。中國共產黨對北京大學校史的看法見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年》。

[[21]](#_21_7)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上），第473—474頁。蔡元培擔任校長時，與一些友人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國統一的歷史。他相信普魯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養出優秀的小學教師，這些小學教師又以使他們成為現代愛國公民的品質教導學生，終于導致在普法戰爭中打敗法國。據說孫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學校長任命的人之列；見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載《逝者如斯集》，第55頁。

[[22]](#_22_7)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76—279頁。1920年北京大學成為中國第一所聘請女教師擔任教授的大學，當時陳衡哲出任歷史系教授。當時北京大學著名學者中，有哲學教授胡適和沈尹默，語言學教授錢玄同，英國文學教授辜鴻銘，以及經濟學教授馬寅初，王寵惠講授憲法，而俞同奎講授化學。

[[23]](#_23_7)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80頁。

[[24]](#_24_7)同上書，第291—296、297—298頁。

[[25]](#_25_7)杰西·格雷戈里·盧茲：《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年》，第136—137頁。

[[26]](#_26_7)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296—297頁，和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自述，同上書，第276頁。

[[27]](#_27_7)羅家倫：《逝者如斯集》，第57、64—65頁。

[[28]](#_28_7)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載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83頁。《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1卷，第101頁。

[[29]](#_29_7)胡適：《教育家張伯苓》，載卜凱等：《有另一個中國》，第10頁。

[[30]](#_30_7)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7—9頁。南開學校師范班在1906年停辦，所以只有一屆師范畢業生。然而在這屆十個畢業生中，有幾個后來成為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貽琦。

[[31]](#_31_7)同上書，第8—10、13—14頁。

[[32]](#_32_7)同上書，第14—15頁。私人對南開財政贊助的重要意義與當時其他主要大學形成鮮明的對照。

[[33]](#_33_7)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17頁。

[[34]](#_34_7)見《林文慶傳》；又見王增炳和余綱：《陳嘉庚興學記》。

[[35]](#_35_7)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66—67頁。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比較《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5章。

[[36]](#_36_7)《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68頁。

[[37]](#_37_7)朱昌峻：《近代中國的維新人物：張謇，1853—1926年》。

[[38]](#_38_7)安東尼·C.李：《中華民國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12頁。

[[39]](#_39_7)盧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531—533頁，從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16所教會高等院校發展順序圖。關于深一層概括，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3章（費維愷著）；又見威廉·珀維安斯·芬恩：《變化中的中國的教會高等教育，1880—1950年》；和一部發人深思的研究專著，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轉換時的中國》。

[[40]](#_40_7)瑪麗·蘭伯頓：《上海圣約翰大學，1879—1951年》，第65頁。

[[41]](#_41_7)見張若谷編：《馬相伯先生年譜》。

[[42]](#_42_7)例如，中國官方《教育公報》第8卷第1—2期（1921年1—2月）譯載一篇日本報道，把上海震旦學院列為學術質量很低的大學；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103頁。

[[43]](#_43_7)克拉倫斯·伯頓·戴的《之江大學：簡史》記載，1930年的調查顯示學生對宗教集會和課程不感興趣，只有25%左右的大學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44]](#_44_7)屬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學生運動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學、滬江大學和之江大學；見盧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30—333頁。

[[45]](#_45_7)關于1935年燕京大學學生運動的第一手報道，見參加過抗日示威宣傳的燕京大學美國學生休伯特·弗雷恩所著的《戰爭序幕：1935—1936年中國學生的反抗》；又見約翰·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

[[46]](#_46_7)胡適：《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1925年在燕京大學的講話），《胡適文存》第3輯第4卷，第728—733頁；關于有用的述評，見杰西·G.盧茨：《中國民族主義與20世紀20年代的反基督教運動》，《現代亞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第395—416頁；又見山本澄子：《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關于詳細情況，見葉家哲：《宗教、愛國心和中國學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運動》。關于反教會運動與收回教育權之間的聯系，見杰西·格雷戈里·盧茨：《民族主義、中國政治和差會》（未刊文稿，1984年）。

[[47]](#_47_7)胡適：《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48]](#_48_7)1927年北伐期間，青年軍官們告訴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師，一打完仗，中國將“注意收回教育權”。戴：《之江大學：簡史》，第56、59—60頁。參閱盧茨：《基督教院校》，第225頁。

[[49]](#_49_7)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049頁，《北京大學月刊》創刊號（1918 年12月）上蔡元培的發刊詞。

[[50]](#_50_7)任鴻雋：《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51]](#_51_6)蔡元培：《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第297頁。

[[52]](#_52_6)羅杰·S.格林：《科學教育諸方面》，載卜凱等：《有另一個中國》，第101頁。

[[53]](#_53_6)中國科學社9名創辦人中有4人（包括胡適）起初曾在農學院學習。9人內有任鴻雋（1908年曾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在美國攻讀化學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協助孫逸仙）和楊銓（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學堂時曾經是胡適的學生，以后在美國攻讀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孫逸仙的秘書）。

[[54]](#_54_6)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第94—95、169頁。

[[55]](#_55_6)同上書，第216—226頁。

[[56]](#_56_6)邁克爾·亨特：《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再評價》，《亞洲研究雜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559頁。

[[57]](#_57_6)見賈祖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第210—212頁上的數據。

[[58]](#_58_6)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關于該校1949年前多達500頁的校史，見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

[[59]](#_59_6)劉師舜：《一九二○級在校時代之清華》，第3—4頁。

[[60]](#_60_6)巴里·基南：《中國的杜威實驗在中國》第5章，指出教師之間以及教師與軍事當局之間派系糾紛的極端復雜性。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師欠薪數月后，學生和教師示威游行到總統府請愿，被開槍驅散，多人死傷。《教育雜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 月20日）第2—4頁報道了這一事件。  
在運用美國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國的道路上的困難，可從一系列著名的傳記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國的教育家》；勞倫斯·A.施奈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賈祖麟：《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艾愷：《最后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于現代性的困境》；斯蒂芬· N.海：《亞洲東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爾與他在日本、中國和印度的批評者》；又見R.W.克洛普頓和歐俊臣（音）編譯：《杜威在華講演集，1919—1920年》和孟祿：《中國：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61]](#_61_6)陳之邁：《求學與治學》，載《蔣廷黻的治事與生平》，第19頁。

[[62]](#_62_6)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1928年9月接任校長時的講話），載《逝者如斯集》，第7頁。

[[63]](#_63_5)《逝者如斯集》，第9—12頁。

[[65]](#_65_5)任鴻雋：《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1—2頁。

[[66]](#_66_5)任鴻雋：《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以后增補進董事會的有在近代中國教育及文化發展中同樣知名的人物，其中有趙元任、傅斯年、胡適、司徒雷登、蔣廷黻和翁文灝。

[[67]](#_67_5)任鴻雋后來回憶，自1918年從美國歸來后，“我堅持使同胞知道科學的重要性……如今有了這個有贈款維持的機構，每年有大約一百萬美元的預算用于促進科學事業；……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鴻雋：《五十自述》中“1925年”項下）。1929年他接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執行董事。

[[68]](#_68_5)《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4頁。馬戈·S.格武爾茨：《社會現實與教育革新：中華職業教育社個案，1917—1927年》，載《現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頁。

[[69]](#_69_5)1981年8月15日葉良材（音）私人通信。葉良材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財務秘書（1932—1978年），助理司庫（1935—1978年）和理事（1962—1978年）。

[[70]](#_70_5)任鴻雋：《五十自述》，“1925年”。

[[71]](#_71_5)《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報告（1925—1945年）》，第5頁。

[[72]](#_72_5)《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2卷，第221頁。

[[73]](#_73_5)例如，1922—1923年德國生物學家兼哲學家漢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講演形而上學，而主持人張君勱挑起關于“生命的科學與哲學”的學術論戰，見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第94—135頁；郭穎頤：《1900—1950年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第135—160頁；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第190—196頁。

[[74]](#_74_5)國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譯者

[[75]](#_75_5)艾德敷：《燕京大學》，第129頁，又130、149—151、155頁。又見菲利普·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1952年》第3章。

[[76]](#_76_5)蘭伯頓：《上海圣約翰大學，1879—1951年》，第106—109頁；又見下列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史：羅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協和大學》；文乃史：《東吳大學》；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L .埃塞爾·華萊士：《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劉易斯·C.沃姆斯利：《華西協合大學》。

[[77]](#_77_5)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第91—109、129—135頁；艾德敷：《燕京大學》，第130、209、120—211頁。作為世俗國家政權在“使燕京大學中國化”方面取得進展的進一步證據，燕京大學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宗教哲學和宗教史等課程可分別在哲學系和歷史系講授。

[[78]](#_78_5)《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2卷，第430頁。

[[79]](#_79_5)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第254頁。

[[80]](#_80_5)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職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為“中央人”。

[[81]](#_81_5)任鴻雋：《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節。

[[82]](#_82_5)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傳記文學》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頁。

[[83]](#_83_5)王聿鈞和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139頁。

[[84]](#_84_5)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第126頁。

[[85]](#_85_5)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第125頁。

[[86]](#_86_5)《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125、138頁；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130頁；黃建中：《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載《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503頁。

[[87]](#_87_5)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3—176頁。

[[88]](#_88_5)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5—177頁。這種狀況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國立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和四川大學的事件中看到。

[[89]](#_89_5)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頁。

[[90]](#_90_5)同上書，第183—190頁。

[[91]](#_91_5)同上書，第191—201頁。

[[92]](#_92_5)許多事例中的一個：1932年6月27日國立青島大學學生罷考期終考試，導致該校校長楊振聲辭職；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第263頁。

[[93]](#_93_5)見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第5章；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關于社會背景，又見葉家哲（音）：《愛國精神與革命：20世紀20年代學生積極行動的性質和原因》，載陳福霖和托馬斯·H.埃特佐爾德編：《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革命》，第94—170頁。

[[94]](#_94_5)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第73—75頁。楊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1929—1931年），該校學生注冊人數約為400人。

[[95]](#_95_5)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表60，第100—101頁。可惜，該表未單獨列出省立安徽大學的學生注冊人數。

[[96]](#_96_5)梁實秋：《談聞一多》，第73—101頁。

[[97]](#_97_5)注：（1）“私立”類包括教會大學院校；（2）數字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冊并得到教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當時日本占領下的東北的數據在官方數字中缺；（4）黃建中：《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第504—514頁給出稍微不同的一組數字。在黃建中的表中，院校總數達108所，未給出確切年份；然而，各類的相對規模與教育部的1934—1935年數字相同，因此：國立，24所；公立技術，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這些總數可同1928—1931年院校86所的官方數字比較，該數字包括大學59所，其中國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27所；技術學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全國高等教育統計（1928年8月至1931 年7月）》，表1。

[[98]](#_98_4)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第4頁。

[[99]](#_99_4)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第2部分“表”，第2—3頁，其中表1《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的高等教育》所列年份從1928年到1934年；與中國和土耳其對比，美國（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萬人有大學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萬人有大學生9人。

[[100]](#_100_4)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頁。

[[101]](#_101_4)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7頁。全國科學評議會在1935年完全設立起來時有當然評議員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長及該院10個研究所的所長，同上，第9—11頁。

[[102]](#_102_4)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載《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集（1978年），第33—36頁。例如楊銓、丁文江、任鴻雋、王琎、周仁、竺可楨和王家楫，全是中國科學社矢志不渝的成員。

[[103]](#_103_4)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17頁。

[[104]](#_104_4)應為農商部。——譯者

[[105]](#_105_4)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載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第190頁；《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3卷，第67頁；李濟：《安陽》，第34—48頁。

[[106]](#_106_4)李濟：《安陽》；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第3版，1977年，第3—18頁綜述中國考古調查的發展。

[[107]](#_107_4)見瑪麗·布朗·布洛克：《美國移植》（英文）；瑪麗·E.弗格森：《中國醫學理事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約翰·Z.鮑爾斯：《中國一座殿堂里的西方醫學》。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檔案表明，除大量醫學事業外，該基金會還扶助平民教育、農業研究、圖書館及其他方面的事業，特別是在30年代。

[[108]](#_108_4)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第397頁。

[[109]](#_109_4)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31頁。

[[110]](#_110_4)“成志會”出版了會史和會員名錄，現在已不再是秘密。會員有冀朝鼎、蔣廷黻、蔣夢麟、方顯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鄒秉文、翁萬戈、晏陽初。據1979年8月翁萬戈私人通信。

[[111]](#_111_4)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36、39—40頁。方顯廷指出，張伯苓為南開大學聘請了許多有能力的教職員，“特別從他自己的團體成志會的會員中聘請”。同上書，第38頁。

[[112]](#_112_4)同上書，第41—42、45頁。

[[113]](#_113_4)同上書，第45頁。托尼的研究寫成了《中國的土地與勞動》（1932年）一書。托尼又同C.H.貝克爾 [柏林]、M.法爾斯基 [波蘭]和P.郎之萬 [巴黎]一起寫了一份國際聯盟報告，題為《中國的教育改革》，報告提出許多問題，包括美國教育模式對中國的適應性。

[[114]](#_114_4)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45—47頁。贈款使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剛從美國回來的研究人員，其中有吳大業、李卓敏、林同濟和丁佶。

[[115]](#_115_4)見卜凱：《中國土地的利用》； 又見沈宗瀚：《沈宗瀚自述》，這是一個在康奈爾大學受過訓練的本領域的帶頭人的著作。

[[116]](#_116_4)在這項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中國項目代表步濟時同許世連（音）一起工作。步濟時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會調查》一書。見江勇振：《燕京大學社會系：從社會服務到社會工程，1919—1945年》（未刊論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意引用）。又見戴維·阿庫什：《費孝通與革命的中國的社會學》。

[[117]](#_117_4)吳文藻的學生有費孝通（《中國農民生活》的著者）、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主義的社會學研究》的著者）和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的著者）、又見許烺光：《在祖宗蔭庇下：中國的文化與人格》。

[[118]](#_118_4)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中的檔案。

[[119]](#_119_4)見威爾馬·費爾班克為梁思成著：《中國建筑畫史：其結構方式的發展和其形式演變之研究》寫的序。

[[120]](#_120_4)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91—198頁。

[[121]](#_121_4)任鴻雋：《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5頁。

[[122]](#_122_4)這一說明根據任鴻雋：《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6—16頁；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16—1936年》，第221、224頁。

[[123]](#_123_4)到1926年，據報中國最大的圖書館是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176000冊），清華第二（87000冊），嶺南第三（68000冊），金陵第四（61000冊），以下是交通、南開及其他。《中華年鑒，1926年》，第430頁。

[[124]](#_124_4)任鴻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1945年）》，第12—13頁。袁成（音）：《袁同禮：贊頌》，第53—54頁。

[[125]](#_125_4)《袁同禮：贊頌》，第55頁。

[[126]](#_126_4)同上書，第56—57頁。

[[127]](#_127_4)《袁同禮：贊頌》，第234頁。

[[128]](#_128_4)胡適：《胡適留學日記》第3卷，第583頁。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載《逝者如斯集》，第146頁。

[[129]](#_129_4)見《逝者如斯集》，第146頁。

[[130]](#_130_4)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第223—224頁。

[[131]](#_131_4)見費正清：《專心研究中國：50年回憶錄》，第71—76頁。艾倫·B.林登：《國民黨中國的政治和教育：大學院個案，1927—1928年》，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776頁提到蔡元培與陳果夫間的不和。

[[132]](#_132_4)馬戈·S.格武爾茨：《社會現實與教育革新：中華職業教育社個案，1917—1927年》，第157—174頁。

[[133]](#_133_4)見孔斐力在本書第7章關于鄉村建設運動的論述；又見吳相湘：《晏陽初傳》，第3、5、6章；和查爾斯·海福：《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3年）。

[[134]](#_134_4)蔣廷黻：《中國之現狀》，《國際事務》（1935年7月14日）；關于蔣廷黻在清華大學培養研究近代中國對外關系史專門人才，見查理斯·R.利利：《蔣廷黻：在兩個世界之間，1895—1935年》（馬里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9年）第8、9章。

[[135]](#_135_3)《獨立評論》的主張的傾向在尤金·盧博特《不自由時代的自由主義：中華民國的新文化自由主義者，1919—1937年》中有分析。

[[136]](#_136_3)翁文灝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譯者。

[[137]](#_137_3)確切名稱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譯者

[[138]](#_138_3)弗雷恩：《戰爭序幕：1935—1936年中國學生的反抗》；伊斯雷爾和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

[[139]](#_139_2)蔣夢麟：《來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頁。這個情節羅家倫在《蔣夢麟先生傳略》中也提到，見《逝者如斯集》，第98—102頁。

[[140]](#_140_2)莊澤宣：《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頁；又見《教育雜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特輯。

[[141]](#_141_2)莊澤宣：《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第3頁。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第3頁。陳立夫接著又說，在校學生減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學生參加軍隊或與戰爭有關的工作，見第29頁。

[[142]](#_142_2)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第22—26頁。因為得不到10所院校的數據，而且有些數字只報告設備損失，此表不完全。

[[143]](#_143_2)《戰時中華志》，第189頁。根據另一計算，1936年全國高等院校校產總值為國幣39275386元，不及估計損失之半；見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頁。

[[144]](#_144_2)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第3頁。朱家驊：《抗戰第八年之教育》，載《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172頁。

[[145]](#_145_2)見約翰·伊斯雷爾的西南聯大校史原稿。

[[146]](#_146_2)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載《西南聯合大學》（學府紀聞叢書之一），第25—39頁。

[[147]](#_147_2)《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173頁。

[[148]](#_148_2)突出的例子是詩人和聯大文學教授聞一多被迫在當地中學兼課并刻、賣印章養家。見梁實秋：《談聞一多》，第109頁，引自西南聯大歷史教授吳晗：《悼亡友聞一多》。關于戰時中國學術界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和身體虛弱見費正清：《專心研究中國》。

[[149]](#_149_2)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第30頁。

[[150]](#_150_2)錢端升是聯大政治學教授；引自約翰·伊斯雷爾的手稿。錢端升后來的一部研究專著《中國的政府與政治》，分析了國民黨軍國主義的成長。

[[151]](#_151_2)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97—198頁。

[[152]](#_152_2)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第44—50頁。又見本書第13章。

[[153]](#_153_1)《觀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24頁。

[[154]](#_154_1)同上書，第24頁。關于全情，見葉文心：《異化了的高等學府：中華民國的高等教育》。

[[155]](#_155_1)《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頁。

[[156]](#_156_1)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

[[157]](#_157_1)關于戰后兩年來的中國教育狀況，見《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12—13頁；又《中華教育界》新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和新2卷第2期（1948年2月15日）的特輯。關于高等院校的損失、人員、現狀和1947年可望實施的補救措施之詳情，見威爾馬·費爾班克：《中國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國的機構為滿足這些需求的計劃：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同一作者的《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實驗，1942—1949年》是一部官方的40年代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計劃史，顧臨任國務院顧問，是計劃的設計者之一。

[[158]](#_158_1)《觀察》第1卷第1期，第3頁。68個知識分子的姓名作為“投稿人”出現在《觀察》創刊號的扉頁上，其中有些是學術界最著名的人士。

[[159]](#_159_1)同上書，第3—4頁。

# 第九章 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 30年代文學，1927—1937年

“五四文學”一詞就其最廣的含義而言，至少包括20年，即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大多數西方學者采用了這個含糊的定義，并且實際上將五四時代與中國文學的現代階段等同起來，接下去則為延安階段（1942—1949年）和共產黨階段（自1949年迄今）。如此信手拈來的劃分方法，明顯地將五四文學的個人主義鋒芒與共產黨文學的集體取向之間的基本差別相提并論，似乎掩蓋了其他方面。絕大多數中國和日本的學者都同意下述說法，即五四時期文學創作的爆發力到20年代末已逐漸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30年代初文學創作的更為“成熟”的階段。因此，“三十年代文學”這一用語，基本上指從1927年到1937年這10年里的作品。

從這個角度看，30年代代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關鍵階段。30年代的作家們繼承了五四遺產，他們能達到五四新文學的早期實踐者們未能達到的觀察深度和高超技巧（魯迅當然是個主要的例外）。與此藝術深度共生的，是一種因社會和政治危機日深而出現的強烈憂患意識，當時日本侵略的幽靈出現在華北大地，而共產主義革命則在其江西的農村總部集結新的力量。因此，正是在這重要的10年里，藝術同政治交織在一起，而20年代早期的浪漫主義色彩也讓位于作家社會意識的某些陰暗的再評價。到30年代早期，一種新的左的取向已經在文學舞臺上形成了。

###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五卅事件對于中國現代作家的政治感情沖擊很大。[[1]](#_1_Guan_Yu_Wu_Sa_Shi_Jian__Jian)這一次事件使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猛省，使他們看到了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存在，也使他們看到了與之并存于商業都會上海的工人們的悲慘狀況。隨著大多數作家的同情逐漸左傾，一個政治化的過程被調動起來。大多數文學史專家都認為，五卅事件標志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用成仿吾的值得記憶的話來說，中國現代文學從“文學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學”。

在五卅事件發生的前幾年，已有少數人摸索著試圖將文學與政治和革命聯系起來。1923年，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黨員，著名的有鄧中夏和惲代英，在他們的期刊《中國青年》上，主張應當把文學作為喚醒民眾革命意識的武器。[[2]](#_2_Zhang_Bi_Lai____Yi_Jiu_Er_San)在1924年和1925年，一個剛從俄國回來的年輕共產黨作家蔣光慈發表了兩篇文章——《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和《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郭沫若和郁達夫兩人在1923年發表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普羅精神”和“階級斗爭”這樣的名詞。1925年，魯迅主持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的題為《蘇俄文藝論戰》的譯文，而且此后即熱情追隨蘇維埃文學政策的迅速變革。

然而，這些孤立的探索沒有引起多大騷動，只有五卅事件的沖擊才把文學和革命的爭論帶到前沿。創造社成員，尤其是郭沫若，再次倡導左的傾向。郭自稱是在1924年讀到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的一本書后，改信馬克思主義的。1926年，他撰寫了現在被認作革命文學運動宣言的作品：一篇帶有傾向性的，論證不周并富有感情色彩的題為《革命與文學》的文章。郭概括地把革命說成是被壓迫階級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對壓迫者的反抗。他得出了一個武斷的結論，“凡是新的總就是好的，凡是革命的總就是合乎人類的要求，并合乎社會構成的基調的”。他由此認為好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真正的文學只由革命的文學組成，而且“文學的內容跟從革命的變化”。郭相信革命激發人類最強烈的情感，而它的失敗成為崇高的悲劇，于個人和集體莫不如此。因此，一個革命的時期必然是“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文學和革命從不對立；相反，它們常常匯合在一起。事實上，文學可以成為“革命的先鋒”[[3]](#_3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e)。

郭撰寫該文于國共統一戰線的“革命”司令部廣州，北伐即將從這里出師。郭即將參加北伐，這標志著文人首次介入政治活動。那篇文章的夸張言辭清楚地顯示了他的滿腔熱忱。郭沒有提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他似乎急于表明他扮演轉向革命的文藝知識分子的新角色是勝任的。郭的奔放也為他的創造社同人所共有。例如，成仿吾在他著名的文章《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對郭的情緒產生共鳴，并且大量運用新學到的術語進一步論證說，甚至創造社成員早期的浪漫主義，也表達了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反對“布爾喬亞”的特征。成急忙補充說，但是時代變了，他們的階級即將被“奧伏赫變”（揚棄），他們的“意德沃羅基”（意識形態）已不再有用。成的結論是，“我們如果還挑起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即知識分子——譯者）的責任起來，我們還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我們要使我們的[文學]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4]](#_4_Tong_Shang_Shu__Di_222__224Ye)。成所賣弄的口號大概是他的同事們完全不能理解的，更不用說其他作家和大眾了。但是，成卻以其竭力造作的方式，想到了不久以后發生的左翼論戰中的某些核心問題。

在1927年，這類空洞的口號只能引起魯迅的憤怒。他對廣州局勢的現實估計，使他確信以前這些浪漫主義者的革命樂觀主義是早熟的。魯迅評論說，與俄國相比，中國并不在革命的陣痛之中；而且他借用托洛茨基的話論證說，在真正的革命時期不會有文學。當前急需的與其說是“革命文學”，不如說是“革命的人”——急需的是槍炮的威力，而不是軟弱的筆。但在1927年4月，國民黨的“革命的人”使魯迅感到幻滅。他們在上海和廣州屠殺共產黨人和其他同情者，這粉碎了魯迅對可能的“革命”所抱的任何殘余希望。

從1928年到1930年，魯迅卷入了與創造社和太陽社一群年輕革命作家的幾次激烈論戰，后者已取代老的創造社成員，成為左翼的主要理論家。魯迅首先針對其論敵的純宣傳，為文學的內在價值辯護。“好的文藝作品”，他在1927年論述說，“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于八股？”[[5]](#_5___Lu_Xun_Quan_Ji____Di_3Juan)他來到上海，就譏諷那些在“革命咖啡館”里的左傾反對者們的空洞“廣告”。他指責雜亂無章的術語——他們對自己的革命口號如此陶醉，以致“視野迷蒙”，他的反對者們反駁說他的批評本身才是“迷蒙的”，他像上了年紀的唐·吉訶德笨拙地在同風車搏斗。他的年輕的反對者們，除稱他為一個“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的老人（影射他的一本雜文集的標題《三閑集》）外，還因此給他貼上“Don魯迅”的標簽。

這一大堆辛辣的隱喻和謾罵在論戰中形成大吵大鬧，而論戰也觸及比較本質的論點。這些革命作家的基本信條可以總結如下：（1）—切文學都以階級為基礎，并取決于階級；（2）一切文學都是宣傳的武器（引自厄普頓·辛克萊的一句被人濫用的警句）；（3）文學批評必須根據唯物主義（后者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加以闡釋）；（4）革命文學應當是普羅文學；即應當為工人階級而寫，為工人階級所寫。但在目前，它只能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去寫。決定因素是“立場”或“觀點”。如果一個作家采取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事實上他還是能夠創作出普羅文學的。[[6]](#_6_Li_He_Lin_Deng____Zhong_Guo_X)

中共史學家們后來承認這些戒律只不過是教條主義的公式。這些信條盡管粗陋和簡單，卻代表了錢杏邨（阿英）、李初梨和朱鏡我等自封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年輕一代的魯莽激進主義的企圖，他們想把盤踞文壇的老一代作家擠出去。他們既試圖確定新的文學取向，也想為五四文學從政治上重新定向，并為日后指導和發展文學創作提供理論框架。可以理解，這種將激進的正統觀念強加于人的做法，對這樣一個桀驁不馴而且本身就是青年領袖的魯迅來說，是不能忍受的。

魯迅的反駁圍繞他的論敵的百談不厭的自我陶醉的主題。這些革命作家并未大膽抨擊1927年后國民黨反動的現實，魯迅辯論道，他們依然心滿意足地被套在空洞的“革命”理論之中。他們自以為是的姿態，只不過顯示了“一副兇狠丑陋的極左觀點的面孔”，這掩蓋了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無知。魯迅首先批評了他們的信條過于簡單。他把辛克萊的話倒轉過來，他在1928年辯論說，雖然所有文學都是宣傳，但并非所有宣傳都是文學，當然這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也不是文學。魯迅并不否定文學的階級屬性，但他對其論敵以無產階級代言人自居深表懷疑。他認為少數幾個坐在上海咖啡館里的安樂椅哲學家創造的那種“普羅文學”，肯定不能反映工人階級的要求。魯迅不無譏諷地說：

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無產階級文學使者，沸沸揚揚，說是要來了。問問黃包車夫，車夫說并未派遣。……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尋，在客店里尋，在洋人家里尋，在書鋪子里尋，在咖啡館里尋……[[7]](#_7___Lu_Xun_Quan_Ji____Di_4Juan)

魯迅的看法是清楚的，城市知識分子處于無憂無慮的資產階級生活環境之中，同工人階級的生活沒有聯系，要他們采取無產階級的立場是荒謬的。

茅盾也持有這種看法。他的三部曲《蝕》受到激進的左派批評，認為他從錯誤立場展示了一幅錯誤的階級的“病態”畫像。茅盾描寫的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理想主義的追求，他們后來的彷徨，在北伐的“革命”歷程中最終的幻滅。茅盾在《讀〈倪煥之〉》一文中，維護葉紹鈞的這部現實主義的小說和他自己的作品，認為一部反映小資產階級“落后”分子生活中陰暗面的文學作品，依然能夠對左派的事業做出積極的貢獻。茅盾補充說：“這一類的黑暗描寫，就感動或教育而言，可能要比那些非真實的、空想的、樂觀的描寫要深刻得多哩！”[[8]](#_8_Li_He_Lin_Bian____Zhong_Guo_W)

魯迅的論述中含蓄的但在茅盾筆下顯露的論點，是至關重要的對象問題。誰是新文學的讀者？茅盾在1928年寫的《從牯嶺到東京》的長文中，承認過去六七年間的中國現代文學，僅為受過教育的青年提供了閱讀的材料，并且指出近來“革命文學”的讀者面甚至更為狹窄。至于勞動大眾，他們不可能理解“革命文學”，即使給他們講，他們也不愿意聽。茅盾希望與其保護無產階級，還不如去擴大既作為讀者，又作為題材的小資產階級的范圍。

所以現在為“新文藝”——或是勇敢點說，“革命文藝”的前途計，第一要務在使它從青年學生中間出來走入小資產階級群眾，在這小資產階級群眾中植立了腳跟。而要達到此點，應該先把題材轉移到小商人，中小農，等等的生活。不要太多的新名詞，不要歐化的句法，不要新思想的說教似的宣傳，只要質樸有力的抓住了小資產階級生活的核心的描寫！[[9]](#_9_Tong_Shang_Shu__Di_379Ye___Zh)

茅盾在30年代早期的長篇小說《子夜》以及短篇三部曲——《春蠶》《秋收》和《殘冬》中，確實奉行了這個信條。在他的小說的畫面上，出現了城市和鄉村的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人物。相反，革命作家們只拿出了一部貧乏粗糙的“普羅文學”集，主要是蔣光慈的作品。

茅盾和魯迅深刻揭露了年輕激進派膚淺的論點。茅盾的小說和魯迅的雜文，顯示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活力。但是他們并沒有提出另外一種與激進派的革命文學準則針鋒相對的理論。茅盾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他與他的同志們的差異，僅在于他對革命前途的估計比較陰郁。魯迅在廣州的經歷打消了他對國民黨革命潛力的幻想。南京新政府統治下的環境，進一步加強了他的對立情緒，特別是在包括柔石在內的他的追隨者五名青年左翼作家，被當作22名共產黨領導人中的一部分，于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郊外的龍華遭到處決之后（參見本書有關章節）。魯迅對于這場慘劇深感震驚，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這樣促使他與左派的論敵找到了共同點。

此外，為看準激進派論點的弱點，魯迅覺得有必要鉆研馬克思主義的美學原理。從1928年到1930年，他開始閱讀和翻譯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漸改變先前關于文學本質上與政治無關的觀點。他現在相信對現狀表示不滿的文學，能對現政權起破壞作用，而且確實可以被稱為“革命的”[[10]](#_10_Guan_Yu_Lu_Xun_Wen_Xue_Guan)。

到1930年，魯迅實際上已接受了青年激進派的基本信條，盡管在表達上自有其精微之處。他總結說，恰恰由于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創作革命文學；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難”中聯合起來。遭受壓迫的同樣經歷形成了共同的紐帶，使這種文學“屬于革命的勞苦大眾”，因此是無產階級的文學。[[11]](#_11_Dai_Nai_Die_Bian_Yi____Wu_Sh)魯迅與他的激進派論敵的和解，并不一定意味他在辯論中被爭取過來；因為像他那樣一個性格倔強和有遠見卓識的人，是絕不會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他必然已經意識到這些革命作家盡管一心追趕時髦，卻已捕獲了城市知識分子變化了的心態。

1926—1927年間的北伐，使人們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這一短暫的政治樂觀時期過去后，大多數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變得與國家疏遠起來。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通過適應或者勸說去爭取文藝界的知識分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隨后是30年代初期的檢查制度與迫害。同情國民黨的自由派人士蔣夢麟后來說，政府已經“同廣大的群眾失去了聯系，它對于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沒有一個深刻或者清楚的認識”。[[12]](#_12_Liu_Xin_Huang____Xian_Dai_Zh)另一方面，共產黨利用了這種不斷增長的情緒，并以高超的組織才能，努力將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集合到它的旗幟之下；這就為30年代主宰文壇的左派統一戰線提供了舞臺。

## 左翼作家聯盟與關于文學的論戰

1930年3月2日，大約40名作家（最初參加的盟員有50余名）在上海集會創立了左翼作家聯盟。2月16日，在這次有重要意義的集會兩周前，由魯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請進行了初步討論，以組織負責創立左聯的籌備委員會。雖然魯迅一直被認為起了領導作用，但真正的倡議可能來自中國共產黨，通過被專門指派擔任此項任務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13]](#_13_Gen_Ju_Guan_Fang_Shi_Liao__Z)在李立三的領導下，中共曾于1929年底和1930年初開始執行一項總體規劃，在大城市創建一系列文化“陣線組織”，以吸引像魯迅這樣同情革命的同路人。[[14]](#_14_Ha_Li_Te__C_Mi_Er_Si____Lu_X)除左翼作家聯盟外，還成立了若干類似的團體——囊括了從戲劇、電影、美術、詩歌到社會科學、教育、新聞和世界語等各個領域。這些團體都歸附在“左翼文化總同盟”的大旗之下，雖然活動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聯盟。[[15]](#_15_Ding_Yi____Zhong_Guo_Zuo_Yi)

左聯的領導名義上是有七名常務委員的執行委員會，這七名常委是夏衍、洪靈菲（兩人都是負責文化工作的黨員）、馮乃超、錢杏邨（太陽社成員，昔日魯迅的論敵）、田漢（著名的劇作家）、鄭伯奇（創造社的創立人之一）和魯迅。雖然魯迅有幸致開幕詞，但在左聯的權力機構中，他顯然被昔日的論敵和黨的活動家孤立了。左聯的書記職務先后由馮乃超、陽翰笙和周揚三位黨員擔任（后兩人與夏衍和田漢后來成為“四條漢子”惡毒幫派）。在1936年“兩個口號”之爭中，魯迅曾著意攻擊他們。可以推斷，初期的欣喜過后，魯迅只當了一個有名無實的領袖，既無權力，與黨的活動分子的關系也不友好。

左聯的兩份正式文件——在成立大會上通過的《文學的理論綱領》，由左聯執委會起草的題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長篇文告，同魯迅含糊不清的開幕詞一樣，都沒有切中要害。《綱領》號召左聯成員“站在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的戰線上”，“援助和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但它對無產階級文學既沒有確定其含義，也沒有確定其范圍。文告中提出了三條關于寫作的指令：第一，左聯作家必須“注意中國現實社會生活中廣大的題材”，尤其是那些直接與革命目標有關的題材；第二，左聯作家必須“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觀察，來描寫”；第三，他們的文學形式“必須簡明易解，必須用工人農民聽得懂以及他們接近的語言文字；在必要時容許使用方言”[[16]](#_16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e)。除第三條指令外，這個文件再次沒有把無產階級文學，或革命文學，完全限定在工農兵的框架內，像毛后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做的那樣。它提倡文學的“大眾化”——大概反映了瞿秋白的意見，但爭論限于語言。如共產黨學者劉綬松曾指出的那樣，這兩份文件未能給左翼文學提供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推力。[[17]](#_17_Liu_Shou_Song____Zhong_Guo_X)文件將左聯的立場、組織和任務，解釋為首先是文學先鋒和宣傳機器，振興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居于次要地位。這樣，在左聯屢遭政府查禁的為數眾多的出版物中，出現了教條主義的批評有余，而有新意的好作品不足的現象。

左聯強調思想正確，組織嚴密，但并不強調文學的創新；就這點而言，它與蘇俄的拉普相似。它試圖確定一個與所有其他思想信仰的“他們”相對立的“我們”群體。[[18]](#_18_Guan_Yu_La_Pu__E_Luo_Si_Wu_C)而且像拉普一樣——有些左聯成員與它有直接的理智上的聯系，左聯十分活躍，但不是在提拔新的無產階級人才上，而是在挑起意識形態的論戰上。左聯七年的歷史，充滿了針對各種各樣“敵人”的連續不斷的論爭。從魯迅與自由派新月社的論戰開始，左聯接連與“民族主義文學”的保守派倡導者們，與傾向左派的“第三種人”作家們，最后又在關于“大眾語”的爭論以及與1936年左聯突然解散有關的著名的“兩個口號”的爭論中，與自己的某些成員展開了斗爭。

### 序幕：魯迅與新月派的較量

左翼聯盟最難對付的敵人起初不是來自右翼——國民黨政府從未把力量集中在文學領域，而是來自中間派。甚至在左聯建立前，組成創造社和太陽社多數的留學日本的文人，一直與新月社周圍的英、美派不和。由于新月社的一些成員與陳源以及在20年代早期與魯迅筆戰的《現代評論》派過從甚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論家梁實秋向無產階級文學首次發難前，這些“紳士”學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視。個性和個人背景，就這樣對意識形態上的重大分歧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1928年3月《新月》雜志創刊時，特載了一篇據推斷是徐志摩執筆的長達八頁的宣言，提出該雜志的兩條指導原則是“健康”與“尊嚴”。徐用這兩個無定向的口號，以其熱情洋溢的文風向文壇所有的“細菌”宣戰，他把細菌分為13種之多：感傷派、頹廢派、唯美派、功利派、訓世派、攻擊派、偏激派、纖巧派、淫穢派、熱狂派、稗販派、標語派和“主義派”。顯然，這些“派”或明或暗地指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作家。他們立即起來反擊，稱徐志摩為“小丑”，胡適為“妥協的唯心論者”，新月派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一伙虛偽的買辦“紳士”[[19]](#_19_Ge_Zhong_Lun_Zhan_Wen_Zhang)。

劃分兩個陣營的本質上的爭論點，比單純的謾罵更加根深蒂固。《新月》成立伊始，就推出另一套構成威脅的文學理論。如其主要發言人梁實秋所說的那樣（盡管梁后來宣稱他沒有得到同事們的支持）；[[20]](#_20_Hou_Jian____Cong_Wen_Xue_Ge)這一理論提出了人們熟悉的英美的文學自律的觀念——文學刻畫的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有創造性的作品總是個體（用梁的話說，是“貴族式的士紳”）的產物，并且只能以自身的內在價值對它作出評判，而無需考慮歷史時期、環境或者階級。此外，梁實秋顯然以他最崇拜的西方文學的“教師”歐文·白璧德[[21]](#_21_Ou_Wen__Bai_Bi_De__Irving_Ba)（梁留學哈佛時曾師從他）為榜樣。他從白璧德那里學到了對盧梭的不信任，對混亂的鄙棄和對理性與紀律的偏愛，梁追溯這種思想到馬修·阿諾德；[[22]](#_22_Ma_Xiu__A_Nuo_De__Matthew_Ar)梁認為在中國文壇充滿混亂的這段時間里，最急需的莫過于執著追求廣泛的情趣和崇高的標準。從梁這段時間發表的各種文章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地想成為中國的薩繆爾·約翰遜[[23]](#_23_Sa_Mou_Er__Yue_Han_Xun__Samu)博士——一個文學情趣的仲裁者和阿諾德所稱的評論家。當然，在現代中國，將文學批評當作學術規范的做法是不存在的，而任何模仿F.R.利維斯[[24]](#_24_F_Li_Wei_Si__F_Leavis_1895)或者埃德蒙德·威爾遜[[25]](#_25_Ai_De_Meng_De__Wei_Er_Xun__E)（大致是梁的同時代人）之類人物的企圖注定要失敗。

在魯迅眼里，梁實秋也確實是一棵特別棘手的荊棘，也許因為這位上海文壇的老前輩，感到梁的雄心是對其地位的挑戰，而且他在某種程度上還對梁在西方文學上的造詣有點妒嫉。左聯組建以前，魯迅已經同梁打過幾次筆墨官司。誘因是1929年梁刊登在《新月》上的兩篇應時文章，《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梁在其中發揮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學與革命》（1928年）中提出的論點，并堅持認為無論革命還是階級——兩者皆非文學所固有，都不能作為文學批評的準則。關于無產階級文學問題，梁斷言“大眾文學”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因為文學從來就是少數有才能的人的創造。梁辯駁說，真正的文學是超階級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本人性”——愛、憎、憐憫、恐懼、死亡，它們不局限于任何階級。梁實秋進一步從魯迅翻譯的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魯迅有意識地按日文轉譯本直譯，他的翻譯是“硬”譯，而梁則覺得難以理解。最后，梁認為不論魯迅在譯文上花費了多大氣力，文學創作的意識形態對于質量而言仍是次要的，“我們不要看廣告，我們要看貨色”[[26]](#_26_Hou_Jian____Cong_Wen_Xue_Ge)。

魯迅的題為《“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反駁文章，是他所寫過的最長的文章之一。顯而易見，梁擊中了痛處，因為公然詆毀他煞費苦心努力介紹蘇聯馬克思主義美學經典作品，這是魯迅難以忍受的。這篇長文的語氣大體上是相當合理的，有幾個段落還帶有強烈的人道主義的情感。他不同意梁關于文學無階級性的觀點，這不僅基于他剛從普列漢諾夫那里獲得的理論，而且出自對下層階級的同情心。魯迅辯駁說，梁不明白他的文學自律立場本身，恰恰就是其資產階級背景的反映。至于文學作品中刻畫的“人性”，一個貧窮饑餓的農民會有足夠的閑暇為愛美去種花嗎？“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欣賞文學是一種特權，但是窮人的身體狀況和沒有文化使他們無法享受這種特權。魯迅也承認，遺憾的是無產階級文學迄今還沒有許多高質量的“貨色”。但是要求無產階級立即拿出產品，是一種帶有“布爾喬亞的惡意”的舉動。

魯迅可能已經顯示出他對馬克思主義美學掌握不夠深透的弱點（他維護階級觀點還停留在初級階段——是一種篤信的舉動，而非學術上的論證），但他的誠實和仁厚彌補了這一不足而有余。他就翻譯所作的辯解尤其如此。他解釋說，“硬”譯是由于他自己語言上的欠缺，因為他必須忠實于自己和讀者。此外，由于翻譯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工作對左傾的批評者們和他自己是一種檢驗，看他們是否犯了理論錯誤，所以魯迅不得不忠實于原文。“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痛，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27]](#_27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e)

魯迅的文章寫于1930年的早些時候（大概在左聯組建之前不久），那時他已打算與他左傾論敵結為同盟了。由這篇文章可以看出，當時魯迅的筆鋒既不像往昔，也不像后來那樣尖刻。它也很不像1931年和1932年的著作那樣武斷，因為他同意梁的觀點：宣傳不是文學，而過去的左派口號也不成其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但是，這篇文章畢竟表明了他對左派事業在感情上的認同。他同梁實秋及新月派的論爭，并不代表馬克思主義者對自由派文學理論無可爭議的一場勝利。然而，他在其他方面確實獲勝了。危機和奉獻的時期，大肆鼓吹文學的中立性可能被看作——尤其在左派眼里，既不合時宜，又是“象牙塔式”的。因此，在共產黨的文學史中，新月派被視為一伙大壞蛋，他們“敗”在魯迅面前被當作左聯的一大勝利。

### “民族主義文學”問題

與新月社的自由主義批評家們相比，左聯創建僅三個月后，出現于1930年6月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倡導者們，王平陵、黃震遐等，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力量方面都要軟弱一些。顯然，是一伙與國民黨有緊密聯系的文人，作為一種反左聯的手段而策劃的。但是他們的口號帶有泰納[[28]](#_28_Tai_Na__H_A_Taine_1828__1893)的“民族、環境和時間”理論的味道，這些口號十分模糊，因為它倡導一種反映“民族精神和意識”的文學來代替左派的階級觀點。來自臺灣的學者承認，這個派別對左派的批評主要是人身攻擊，而且它的成員沒有一位在文壇上博得聲望或尊敬。[[29]](#_29_Liu_Xin_Huang____Xian_Dai_Zh)他們的創作甚至比左派還要少。但是這個派別的主要弱點，在于他們的親國民黨立場，與文學界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格背道而馳。30年代早期，一個有良心的文人去做政府的傳聲筒，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民族主義文學”的提倡者們，自其開始之時起就注定要失敗。但是這場小小的論爭，恰好誘發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引人入勝的一場大論戰——文學上關于“自由人”或“第三種人”的爭端。

### “自由人”以及“第三種人”問題

1931年9月，一位年輕的學者胡秋原，發表了一篇抨擊“民族主義文學”的文章。他的中心論點之一，是文學決不應墮落為政治的“留聲機”。胡的論斷恰恰觸動了左派立場的核心，而且立刻被認作是對左聯的攻擊。胡與左聯的主要理論家之間，旋即發生了一系列的論爭。

胡秋原曾留學日本，在那里學得相當多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而且撰寫了一本大部頭的關于普列漢諾夫及其文藝理論的書，于1932年出版。左聯的作家們大概不了解胡的背景，而將其觀點作為新月派自由主義的又一變種來對待。令他們吃驚的是，胡證明自己是一個自由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掌握超過他的左聯論敵。胡根據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沃隆斯基[[30]](#_30_Wo_Long_Si_Ji___Aleksandr_Ko)以及其他蘇聯理論家的著作論證說，盡管文學有階級基礎，但不能讓文學創作服從于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或政治論述中找到的同樣規律。在胡看來，文學是通過美學的角度來反映生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的。針對那些左派論敵，尤其是錢杏邨和太陽社其他成員的機械觀點，胡秋原強烈地做出了反應：他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引述了一連串的根據，來顯示文學批評的功能是“客觀地”理解文學，而不是對文學創作指手畫腳。換句話說，文學有其自身的價值，它能有益于革命，特別是好的文學（從而胡承認可能有好的無產階級文學）。但他覺得，文學創作絕不能被當作政治“之下”的某種東西。依照胡的意思，作為一個“自由人”并不一定意味反馬克思主義，或者如梁實秋所想象的那樣，與政治無關；它僅僅指多少有些書卷氣的學者的“一種態度”。這樣的人以十分嚴肅的態度來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反對那種“遵照現行政策或者黨的領導的迫切需要來判斷一切”[[31]](#_31_Su_Wen_Bian____Wen_Yi_Zi_You)的傾向。

胡秋原對左聯壟斷左翼文學的指責，在1932年得到對左翼事業不無同情的蘇汶（戴克崇）的共鳴；他對政治需要過分“侵略”文學表達了類似的關注。依照蘇汶的原意，“第三種人”指被馬克思主義的兩種倡導者——胡秋原的“自由人”與“不自由的、有黨派的”左聯——在中間或者拋在后面的那些作家。一個好的作家，無論多么同情革命，不能只按左聯理論家們的指令去寫作。在蘇汶看來，文學不只是一種政治武器，盡管他承認需要這樣的武器。蘇汶聲明說，“我當然不反對文學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對因這政治目的而犧牲真實”。一個作家必須誠實地反映他看到的生活。“我們要求真實的文學，更甚于那種只在目前對某種政治目的有利的文學”[[32]](#_32_Su_Wen_Bian____Wen_Yi_Zi_You)。于是，蘇汶爭辯說，在國民黨對文學的壓制與左聯對文學的指令之間，多數作家幾乎不由自主地淪為“第三種人”。

在左聯的反駁中，最有說服力的論證是由瞿秋白提出的。他（用筆名易嘉）在一篇長文中，批評胡秋原與蘇汶沒有認識到文學的階級基礎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依照瞿的判斷，胡秋原過分強調了文學作為形象的美學探索與生活的消極反映的功能。他認為胡的弱點源出于普列漢諾夫。后者曾因其“唯心論”傾向在蘇聯遭到批判。在瞿看來，文學創作絕不能脫離作者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必須發揮其政治功能。對身臨殊死斗爭的中國無產階級來說，文學只能是反抗壓迫者的武器。瞿斷言說，“當無產階級公開地要求文藝的斗爭工具的時候，誰要出來大叫‘勿侵略文藝’，誰就無意之中做了偽善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派的‘留聲機’”[[33]](#_33_Su_Wen_Bian____Wen_Yi_Zi_You)。在階級斗爭的時期里，不可能有“中間地帶”。

當肯定階級決定論和投入斗爭的必要性時，無論魯迅還是瞿秋白都沒有打算把左聯說成一貫正確。他們坦率地承認在左聯的少數成員中間，尤其是錢杏邨，幼稚的左派觀點和機械論的解釋是愚蠢的。但是瞿申辯說，盡管他們有缺點，這些充滿激情的成員是真誠地朝著革命理論和實踐摸索前進的。而胡與蘇則相反，他們無視政治現實，只是騎墻觀望。

與指向其他論敵的猛烈反擊相比，這是溫和的回答。這種“軟”姿態應當如何解釋呢？在常常是連篇累牘的交換理論差異點的文章背后，也許可以找到線索。胡秋原和蘇汶兩人顯然不屬任何文學或政治團體的論述，提出了中國左翼文學中兩個重要的新問題（雖然胡顯然熟悉它們在蘇聯的先例），即“黨性”原則或黨對文學的指導原則，以及“同路人”——那些同情左派事業，但未加入左聯或中共的作家們的問題。這兩個問題被左聯自身功能的定義混合了。

一方面，左聯的建立意味著為革命文學提供一個統一的方向。因為它的領導層主要由共產黨員構成，這就為黨對文學的支配和控制鋪平了道路。然而，30年代初的中共在組織上軟弱，而且為派系斗爭所困擾；它無法推行某種始終如一的黨性。另一方面，左聯是為左翼作家及其同情者提供一個廣泛的陣線而創立的。這樣，從黨的活動立場看，左聯是一個吸引“同路人”的陣線組織，吸引那些既非國民黨的追隨者，也非共產黨的追隨者的“第三種人”作家；但無論如何，他們同情“無產階級文學”甚于“民族主義文學”。無論胡秋原還是蘇汶，同以前的魯迅一樣，都可以羅致為同路人。而且據胡說，確實有人試圖引誘他加入左翼陣營。[[34]](#_34_Liu_Xin_Huang____Xian_Dai_Zh)

看瞿秋白和馮雪峰（用筆名洛揚和何丹林）在這場論爭的總結性文章中（這些文章顯然代表左聯多數成員的意見）如何解決這兩個論點，是饒有趣味的。瞿在文章里提到的黨性原則，是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首次提出的。列寧寫道，黨性“自然地應當貫徹在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文學的創作，尤其是文學批評上”。但瞿做了一個重要的限定，他覺得問題在于黨性“是否能正確”地得到貫徹。瞿補充說，即使把它應用于左聯的作家們身上，也不應“強加于人，而應加以討論、研究和學習”。至于非左聯作家，只要求他們“承認”這個原則。瞿還進一步為左聯內部的創作自由辯護。他解釋說，“指導路線”只提出某些“總的方向”，并不構成“命令”[[35]](#_35_Li_He_Lin____Jin_Er_Shi_Nian)。事實上，貫穿左聯的歷史，無產階級文學的正確形式和內容曾經反復討論和爭辯，但從未強制推行。

關于對同路人的政策問題，瞿秋白摒棄了那種過激的觀點（“如果你不是我們同行，你就是個反革命”），認為它是武斷的和感情用事——也許間接指激進的青年左派分子和周揚。最后，馮雪峰發表罷戰言和的聲明。馮雪峰在其長文的結尾用有高度傾向性的語言，表達了他對“第三種人”所做的如下新定義：

第三種文學，如果是“反對舊時代，反對舊社會”，雖不是取著無產階級的立場，但決非反革命的文學，那么，這種文學也早已對于革命有利，早已并非中立，不必立著第三種文學的名稱了。[[36]](#_36_Su_Wen_Bian____Wen_Yi_Zi_You)

馮雪峰的和解聲明，在這場客客氣氣的辯論的末尾顯然滿足了兩位挑戰者——他們后來認為，他們的戰斗取得了勝利，左聯被迫承認有一定的失誤，并且降低了意識形態方面的刺耳的調門。[[37]](#_37_Liu_Xin_Huang____Xian_Dai_Zh)但是論力量和影響，“第三種人”顯然不是左聯的對手。胡秋原與蘇汶都不是多產作家，此后不久他們就從文壇銷聲匿跡了。

1932年以后，左聯在意識形態上的支配地位沒有遇到重大挑戰。有相當數量的文人環繞在林語堂的三種流行的雜志周圍——《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而且有意“不談政治”，強調幽默和諷刺，當然他們對左聯在意識形態上的權威不構成威脅。魯迅對他們的攻擊是有節制的，也許由于他對“分道揚鑣的兄弟”周作人，甚至對往日的友人和以前的雇主林語堂心腸有點軟。其他非左聯的作家，如《現代》雜志派保持中立的立場，雖然他們仍接受左派的稿件和建議。接著發生的關于“大眾語”和“國防文學”的論爭，基本上是從左翼陣線內部發生的，而且后者幾乎以意識形態上的統一而告終。

### 關于“大眾話”和“拉丁化”的論爭

“大眾話”或者“大眾語”的問題，首先是30年代最杰出的左翼理論家瞿秋白于1932年提出的。[[38]](#_38_Guan_Yu_Zhe_Ge_Wen_Ti_De_Xia)瞿對于語言的關心，與他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的信念是分不開的；由于無產階級文學是為大眾的文學，瞿順理成章地認為它必須為大眾所理解。按照瞿的觀點，新文學中所用的“五四”式白話，已經成為充滿外國名詞、歐化句法、日文詞組和文言殘余為特征的新的上流社會用語。簡言之，它是一種被脫離大眾的城市知識分子壟斷的語言。瞿因此號召進行一場新的“文學革命”，這次由正在崛起的無產階級領導，對準三個靶子，即殘留的文言，“五四”式的白話（瞿稱之為新文言）以及傳統的民間小說之中的舊白話。從這次二次革命中出現的，會是一種反映民眾活語言的新的大眾話。瞿憑著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偏好，自然地將這種新的大眾語言的原型想象為一種“普通話”的集合體，很像那些來自中國各地，并設法在現代工廠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講的語言。[[39]](#_39_Li_He_Lin____Jin_Er_Shi_Nian)

茅盾針對瞿的想法寫了一篇批評文章。他指出城市工人的語言并不一致，例如，上海大眾的語言自然是以上海方言為基礎的，其他城市里的“普通話”則因地區而迥異。在茅盾看來，不存在全國性的“普通話”這種事物。茅盾進一步為“五四”式的白話辯護，認為它仍有生命力，盡管需要簡化和非歐化。茅盾認為緊迫的任務是革新現代白話，并利用方言使它豐富起來。[[40]](#_40_Tong_Shang_Shu__Di_362__363Y)于是，在茅盾為維護現代白話的現實主義觀點，與瞿秋白關于普通話的激進觀點之間，爭論于1934年再度開始，使左翼陣營根據瞿的總前提分成兩種不同的、但并非相互排斥的立場。有的人主張為了確立一種新的大眾的共同語言，必須完全摒棄上流社會的白話；另一些人對通行的語言持肯定態度，但仍然希望對白話進行挽救。在達成摒棄白話中的糟粕并保留其精華的妥協解決辦法后，這場論爭很快轉移到是否需要拉丁化的討論上。

瞿秋白承認，他想象中的那種普通話仍然處于形成過程之中，然而他堅持這種普通話絕對不能被禁錮在文字形式之中。漢字復雜難學，而且也不足以將擁有豐富多彩、生動的通行口頭語記錄下來。另一些評論家指出，書面的白話是北京方言的表達手段，如同先前的國語羅馬字一樣。魯迅和其他一些人認為，新的語音體系應當更為簡單，而且不要四聲的標記。這種新的拉丁化漢語的體系，大概曾由兩位俄國漢學家兼語言學家對蘇聯遠東濱海省的中國居民試驗過。這種體系將是普通話的字母文本，它將完全取代許多世紀以來的書面表意文字。[[41]](#_41_Ta_Ge_Lei____Xian_Dai_Zhong)瞿秋白和魯迅兩人在承認地區性差異的同時，都相信掌握這種語音系統仍將比掌握書寫的漢字容易得多。

這種天真的烏托邦式的語言理論，在20世紀30年代顯然是無法實行的，而且也從未有效地實行過。拉丁化的文本充其量也只是閱讀漢字的語音手段，不能替代漢字。但是事實證明，這場語言論爭的其他部分卻對毛澤東極其有用。瞿秋白對五四文學的過激批評，為毛的延安講話打下了基礎。瞿與毛兩人都同意無產階級文學的語言必須接近大眾的用語。文學的“通俗化”就這樣成為1942年毛政策的一個標志；而由瞿開始的收效甚微的第二次“文學革命”，在延安經再次發動，效果大有可觀。

### 關于“兩個口號”之爭

瞿秋白和馮雪峰在1933年晚些時候離開上海前往瑞金，左聯失去了最有影響的兩位領導，進入了一個不穩定的階段。從1934年到1936年，左聯與中共中央機關聯系不多，由于敵人拘捕和迫害，黨的地下總部遭到破壞。內部的分歧在新的左聯組織領導層，尤其在周揚與魯迅之間，魯迅的追隨者與其他老資格作家之間加深了。[[42]](#_42_Guan_Yu_Zhe_Shi_Quan_Bu_Qing)1934年，胡風從日本來到上海，并于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就文學作品的原型和典型人物的解釋問題，兩次對周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威提出了挑戰。但是導致內部爭吵公開化的最大事件，是左聯在1936年春為響應中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宣言而突然解散。這一重大舉措竟沒有與魯迅商量。

由于缺乏足夠的文獻，至今尚不清楚解散左聯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但是可以推測，這個決定是周揚一派人實施的。他們希望組成一個更為廣泛的聯合體，用“中國文藝家協會”來取代左聯。這個團體是在1936年6月7日正式成立的，當時左聯解散至少已有兩三個月了。當愛國組織自發而迅速涌現時，這一明顯的拖延除表明左翼作家間的混亂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魯迅、巴金、胡風、黃源等人被邀請加入新協會，但是他們不是拒絕，就是置之不理。不久以后，在7月1日，魯迅等人簽署了一個《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但并未建立正式組織。左翼兩派之間的對立因此更加分明。

到1935年底，已開始出現議論反映新的政治形勢的口號的文章。“國防文學”與“民族自衛文學”和“民族革命文學運動”等詞語，同時被提到。“國防文學”作為統一戰線政策的正式文學口號和協會的指導原則，其決定可能是由周揚一派人作出的（不知是否得到中共領導的默許）。[[43]](#_43_Liu_Xin_Huang____Xian_Dai_Zh)它的確切性可由以下兩點證明：一是它源出于蘇聯，二是毛澤東號召建立一個“國防”政府。但是這個含義模糊的提法，立即遭到各種左翼作家的批評。

周揚認識到有必要明確定義和平息“托派分子”的反對，于1936年6月在成立協會的籌備工作結束后，代表“國防文學”作了他的第一次公開聲明。他申斥極左派論敵思想狹隘的抽象主義，以及對日本侵略引起的新的政治形勢視而不見。雖然他仍將城市革命文學看作1927年以來的主力，但是他又論證說“中間立場”的作家們確實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并且應當把他們吸引過來共同奮斗。這基本上是對中共新姿態的忠實附和，與他早先反對“第三種人”作家的立場大相徑庭。但是在急于將其口號標榜為“文學”的時候，周揚大概超出了中共的主要政治目標，“結成一個團結的知識界輿論的強大實體，迫使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人達成某種合作，從而抗擊日本人”[[44]](#_44_Ta_Ge_Lei____Xian_Dai_Zhong)。他進而規定了“國防文學”的主題和方法：他斷言，國防應當成為除漢奸以外的所有作家作品的中心主題，而且由于“主題的問題是和方法的問題不可分離的，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須采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在隨后的一篇文章里，他甚至說（他1958年關于“革命浪漫主義”的表白的先聲），國防文學“不但要描繪民族革命斗爭的現狀，同時也要畫出民族進展的前面的遠景……國防文學就同時應當以浪漫主義為它的創作方法的一面”[[45]](#_45_Zhou_Yang____Guan_Yu_Guo_Fan)。

周揚的“專橫的”傾向，立即遭到包括魯迅在內的文壇耆宿的反對。郭沫若覺察到這個口號的政治聯系，從日本撰文努力為其辯護，同時降低周的文學主張的調門。他聲稱，“國防文學應該是作家關系間的標志，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志”。茅盾同意這種理解，但是進一步警告說，將這個口號應用于創作，就有面臨“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險——直接駁斥周揚的指令。與周揚想控制文學并“以一個口號去規約別人”的欲望相悖，茅盾堅持作家在其政治信仰范圍內有創作自由的特權。[[46]](#_46_Lin_Cong_Bian____Xian_Jie_Du)

魯迅對周揚的厭惡，甚至比茅盾對周揚的厭惡更為強烈。如已故的夏濟安生動地概述魯迅晚年時所說，左聯的解散“引發了他生活中最后一場可怕的危機。不但要他重新闡明自己的立場，就連馬克思主義，這么多年來他精神生活的支柱也岌岌可危了”[[47]](#_47_Xia_Ji_An____Hei_An_Zhi_Men)。左聯的解散，突然結束了反對右翼和中間勢力的七年艱苦斗爭，魯迅現在被迫要與從前的論敵結盟。更有甚者，“國防文學”這個口號以其妥協性和專橫性沉重地向他襲來，既表示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受挫，又表示他個人形象受辱。他強壓怒火不肯屈服，設法提出一個新口號與之抗衡，“它表示的將不是左翼文學的終結，而是它的延續，并且它將把共產黨的新政策納入無產階級的傳統之中”[[48]](#_48_Tong_Shang)。他與茅盾等人商討之后，最后確定下來的口號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1936年5月，胡風（顯然在魯迅的授意下）在一篇題為《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的文章中使用了這個新口號。“兩個口號”的斗爭就這樣開始了。對于胡風和魯迅，“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清楚地說明了把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與抗日的民族斗爭聯系起來的“共同利益”；兩者的公分母是反帝。這個口號還可用來指明大眾是抗日戰爭的主力。然而，對于周揚和徐懋庸，胡風的文章露骨地置“國防文學”于不顧，贊同一個冗長的、難記的用語，其主旨在于縮小和貶低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按照周揚的觀點，革命作家們“不但要創造自己最尖銳的革命作品，同時也要聯合那些在思想和藝術上原和我們有著不小的距離……的那些作家，而且把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擴大到革命文學還沒有侵入的讀者層去”。[[49]](#_49_Lin_Cong_Bian____Xian_Jie_Du)

雙方的表述似乎給人一種印象，即就文學政策而言，專橫的周揚主張較多的自由，而反權威主義的反對派反而贊成較為嚴格。但就文學實踐而言，情況恰恰相反。魯迅和茅盾堅持革命作家應有創作自由，而周揚則把它看作“一個危險的假象”。因此，隱藏在他們互相抵觸的口號后面的，是文學的政治委員與有創造力的作家之間觀點上的基本分歧。對周揚這個出類拔萃的文學政治委員來說，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凌駕于包括藝術創造在內的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作為作家，魯迅和茅盾更加看重為革命目標而寫創造性的作品；他們堅定地相信，有良心的藝術家不應當放棄他們的人格完整，或失去他們的創作特權。他們對一個自封為黨的代言人強制推行這種新的“黨性”深感怨恨。周揚的所作所為尤其令魯迅生厭，因為周不是致力于進一步鞏固左聯，而是將其解散，并命令堅定的左翼作家向右轉！

最后，魯迅被徐懋庸的一封來信所激怒，采取了行動。徐在信中彬彬有禮地提醒魯迅注意，他的兩個追隨者胡風和黃源的“詐”與“諂”。徐還直言不諱地指責魯迅，煞費苦心地把一個左翼口號引入聯合戰線，“是錯誤的，是危害統一戰線的”。魯迅遭到一位昔日追隨者的年輕作家申斥責問：此人對人物和時局的判斷是否公正，這對自負的魯迅來說是一種極大的侮辱。魯迅收到徐懋庸的信后幾乎立即回了長信，將積憤毫不客氣和毫無掩飾地傾瀉出來。他坦率地揭露了反對者們的“詐”；“中國文藝家協會”的宗派主義，徐懋庸的狡猾，尤其是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四條漢子”陰險幫派的詭計，他們是真正躲在徐懋庸的問罪信后面的人。[[50]](#_50_Tong_Shang_Shu__Di_334__349Y)

顯然，魯迅的怒氣直指周揚在文學上的“獨斷專行”及其“行幫習氣”的行徑。“國防文學”這一口號遭到批評，更多是由于其“宗派主義”的含義（特別是按照周揚的權力主義的解釋），而不是由于理論上的錯誤。魯迅表示他從來不認為這兩個口號是相互對立的；他的看法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說法“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它能夠補充和糾正“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的含混之處。在一篇訪問記中，他宣布“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可以作為一個“總口號”，在這個口號之下，也可以允許“國防文學”等其他策略性口號存在。茅盾復述了魯迅的論點，但給它一個更加穩定的焦點。他解釋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當是左翼作家創作的口號，而“國防文學”可以作為表征所有作家之間關系的一面旗幟。[[51]](#_51_Lin_Cong_Bian____Xian_Jie_Du)

魯迅的新口號當然是中共的領導者們始料不及的。但對這樣一位顯赫的“同路人”的徹底表白又不得不予以尊重，否則更多的指責將意味著公開承認統一戰線的失敗。這顯然是除周揚以外的黨的其他領導人所得到的結論。早些時候，在1936年4月，馮雪峰作為來自延安的中共的聯絡員已回到上海。他沒有與周揚聯合，被舊日師長的論點所說服，并選擇了魯迅的立場。魯迅發表反駁徐懋庸的長文以后不久，馮寫了一篇最猛烈的批評周揚的文章。他在文中重復了茅盾和魯迅率先提出的指責，即周揚的高壓獨斷傾向導致了對其他作家“關門”的有害宗派主義。馮指責說，周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他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間，強制推行一種先聲奪人的二分法；這與三年前他在“第三種人”的論爭中，機械地將所有“非無產階級文學”排斥為“資產階級文學”的做法如出一轍。依照馮的判斷，周最嚴重的錯誤是他拒不關心要求“創作自由”的呼聲。“在三年前，……沒有積極地聯合各派為創作自由而斗爭，沒有最大限度地在批評上承認 ‘創作自由’，當然是錯誤，即在三年后也應當承認的”。馮總結說，在這個迫切需要動員所有作家投入抗戰的時刻，周揚強加規約性“條件”的做法“大大縮小了抗日的戰線”；而他無視創作自由的論點，清楚地顯示他已經習慣充當“土皇帝”的角色了。[[52]](#_52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e)

然而，馮雪峰在這場對周揚最喧鬧的指責中流露出來的個人怨恨，在黨代表的處理權上反映并不良好。據夏濟安說，馮在上海處理不當使他受到中共的審查（他最終于1957年遭到他的老對手周揚的清洗）。但是中共的領導人之一陳伯達，感到文學界兩個口號的爭斗應該休戰。他仍肯定“國防文學”的有效性，但同時承認“對于這個口號的態度并不一定要大家一致”（這給周揚一個輕微的挫折）。出于對魯迅觀點的尊重，陳對另一口號給以同等的頌詞。陳在一篇圓通的綜述中宣稱，“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當屬于國防文學的“左翼”，因為它是“國防文學主要的一種，一個本質部分，同時也是國防文學的主力”[[53]](#_53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e)。

可以說，兩個口號之爭是在10月初（魯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前不久）正式告終的。當時包括茅盾、魯迅、郭沫若、巴金和林語堂在內的20名作家（周揚派缺席引人注目）簽署了一份聯合宣言，號召所有作家——不分新舊、左右，為了“救國的目的”組成統一戰線。兩個口號都未被提及，但是由魯迅、茅盾、胡風和馮雪峰大力倡導的創作自由的原則最終得到確認。

## 文學創作與社會危機

一系列思想上的爭論使30年代早期的文壇風波迭起，但這些爭論未能激發出大量的文學創造力。似乎在思想領域里叫得最響的作家往往最缺乏創造力。瞿秋白、周揚、馮雪峰、梁實秋、胡秋原和其他理論家，并沒有足以使他們增光的創作。其他高談闊論的作家，寫出的是些質量低劣的貧乏的作品。舉例來說，蔣光慈靠一本暢銷的小說《沖出云圍的月亮》贏得了讀者的歡迎，這本小說在藝術上堪稱是當時最糟糕的作品之一。[[54]](#_54_Zhe_Bu_Xiao_Shuo_Chu_Ban_Hou)甚至精力旺盛的魯迅，有時也因未能寫出更多與早期短篇和散文詩一脈相承的抒情作品而引為憾事。[[55]](#_55_Feng_Xue_Feng____Hui_Yi_Lu_X)

雖然左翼的思想家們常常左右視聽，少談意識形態但絕非沒有信仰的作家們，卻為新文學遺產做出了重要得多的貢獻。30年代一些最具創造力的作家——茅盾、老舍、吳組湘、張天翼、巴金、曹禺和聞一多都是左傾的。但他們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會政治環境影響的個人良知與藝術敏感的一種表達。另有一小部分人——李金發、戴望舒、馮至，大多是詩人，不太關心政治。他們的作品盡管影響不大，但往往在藝術上較左翼作家更有新意。主要由于這些有創造力的作家們的努力，30年代的小說（主要是長篇小說）、詩歌與戲劇才出現了繁榮的局面。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們作為執著的藝術家日臻成熟，中國現代文學已處于真正文學“復興”的邊緣。但是這種正在興起的創作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戰爭使現代派詩歌的眾多試作突然夭折；戰爭為小說家們的精力另辟途徑，離開其主要的文學課題。只有戲劇作為戰時宣傳的一種手段，在重慶和日本占領下的上海，作為逃避主義的娛樂而繁榮起來。扼殺這個時期藝術創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國民黨（其高壓措施培養了非常有助于創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共產黨（由周揚執行的黨的文學控制政策，對有創造力的作家幾乎沒有明顯的影響），而是日本人。1937年侵略者的炸彈和炮火，幾乎在一夜之間毀滅了文學環境。

我們稍后將討論戰爭給文學造成的創傷，但首先我們必須注意文學創作的四種萌發模式：雜文、小說、現代詩與話劇。

### 雜文

“雜文”——“多種多樣的小品文”，或者用瞿秋白的外國名詞來說，“feuilleton”的流行，受到文學領域中意識形態論戰的直接影響。就學說爭論以及社會批判和文化評論說，雜文是一種最有效的形式。在這種體裁上，魯迅是無可爭辯的大師。

魯迅寫短篇小說伊始，就同時著手試寫雜文。他的雜感首先發表在《新青年》，而后發表在《語絲》上，將自由流暢的散文（用白話寫成，但夾雜文言詞句）與靈活的內容結合在一起。雖然他的雜文如大多數研究魯迅的學者所注意到的那樣，[[56]](#_56_Guan_Yu_Lu_Xun_Za_Wen_Yi_Shu)大多針砭時弊，語含譏刺，但他的方法卻絕不是狹隘的功利主義的。尤其在他1930年前寫的雜文中，社會評論家的批判睿智，常與自成一家的隨筆作家的熾烈敏感融為一體。在他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罪惡的教誨式的攻擊背后，潛藏著對中國人集體精神的陰影的高度主觀探求。散文與詩歌，教誨與激情，尖刻的憤世嫉俗的才智與熾烈的富有感情的心靈的交互作用，表征了魯迅的最佳創作，包括他的雜文。隨筆、散文、詩歌與短篇小說形式上的區別，在魯迅頭腦中，不像西方學者可能期望的那樣界線分明。魯迅畢生的著作卷帙浩繁，除譯作外，每篇的共同特性是簡練。他的頭腦中也許塞滿了從未理出頭緒的、不成系統的、紛亂雜陳的思想和情感。于是雜文既是魯迅創作模式的直言的載體，又是文學副產品。

隨著魯迅在30年代早期變得更加政治化，他的雜文寫作的內在個性，也逐漸淹沒在公開的攻訐呼號的表層之下了。對魯迅本人來說，從抒情風格轉到爭論，是由政治信仰的需要造成的。但他的追隨者和敵人都把他的雜文風格奉為主要準則，因而大量仿制品在出版界泛濫。這些次等的雜文作家，完全忽視了魯迅散文的內在深度，一味模仿他那諷刺筆法的表面光彩，結果是一堆缺乏文學價值的粗陋、刺耳而又淺薄的文章。于是魯迅的難以仿效的雜文，留下了一種諷刺傳統。它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較晚時期中，繁殖出一種過分的憤世嫉俗，多余的譏諷，思想內涵不深的雜文\寫作風格。

如果說左派人士把雜文界定為20世紀30年代的主要思想武器，那么，一些非左派的作家聚集在小品文周圍，把它作為另一種散文寫作形式。主要的發言人是魯迅的胞弟周作人，以及為林語堂的三種雜志撰文的一群作家。周的小品文風格顯然受惠于古典文學的傳統，尤其是17世紀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作品，它們強調寫文章是抒發個性。[[57]](#_57_Guan_Yu_Zhou_Zuo_Ren_Xiao_Pi)周將這種“個性格調”幾乎發揮到完美的程度。他的散文簡練而悠閑，典雅無華，反映一種平穩舒緩的精神境界，與魯迅大相徑庭。朱自清和俞平伯的風格與周作人相似，創作的散文富有個人的格調，有時幾近感傷，如朱寫他父親的那篇著名的散文《背影》中表現的那樣。周作人和俞平伯兩人都是林語堂的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林的刊物繼承小品文的傳統，倡導用文雅的筆調表現非政治性的幽默。林主張有意識地保持非政治的立場，也許以此作為抗議文學過分政治化的一種形態。某些小品文的最佳范文是一些風格獨特的精品，遠比好斗的雜文有味。但是，盡管它在30年代中期流行一時（在出版界1934年被稱作“小品文”年），周作人和林語堂為之奮斗的目標日益落后于時代。正是針對“小品文”風行一時的影響，魯迅在1933年寫下了他著名的文章《小品文的危機》。他攻擊其胞弟和往昔朋友的“閑適”和“幽默”為“小擺設”、“清玩”和“達官富翁家的陳設”。魯迅認為，在一個危機的年代，不僅作家自身的生存，而且其藝術的生存都兇吉未卜，小品文這種形式也到達危機點。“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58]](#_58___Lu_Xun_Quan_Ji____Di_4Juan)

30年代的隨筆，在雜文的粗制濫造與小品文的輕佻之間，幾乎喪失了它的創造潛力。那種將成熟的風格與社會意義結為一體，最有生命力的散文寫作形式是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

### 小說

1928年至1937年這段時間，明顯的是中國現代小說成長的十年。夏志清教授在其精辟的概論《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為這個時期的六位杰出的作家——茅盾、老舍、沈從文、張天翼、巴金和吳組湘每人辟了一章；相比之下，前一時期（1917—1927年）只有一人（魯迅）。這樣的重視，顯然表明中國現代小說在20世紀30年代達到了成熟期。魯迅以其短篇小說雄踞五四文學之巔，而在第二個十年里，這六位小說作家中有五位發表了長篇小說，而且全都繼續創作短篇小說。

這六位作家中，茅盾在使長篇小說成為主要體裁方面發揮了有力作用。當茅盾提出葉紹鈞的《倪煥之》（1928年），將其譽為五四時期少數優秀長篇小說之一時，他自己已經完成一部長篇小說三部曲《蝕》。如夏志清評論的那樣，“這部作品的廣度和真實性，使第一時期少量的長篇小說完全變得微不足道了”[[59]](#_59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i)。繼《蝕》之后，茅盾發表了另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虹》，并于1933年發表他的杰作《子夜》。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地位，成為兩位或三位第一流的長篇小說家之一。在這些開拓性的作品中，茅盾運用歐洲自然主義的技巧，使晚清的社會小說現代化，成功地描繪出一幅場面恢弘的社會畫卷。[[60]](#_60_Guan_Yu_Mao_Dun_Zao_Qi_Xiao)

茅盾細心搜集和運用素材，采用客觀的大視角，把人物描繪為社會經濟勢力的犧牲品。就這方面講，他是一位最有學問，而且最認真的“自然主義”的實踐者。但他不是自然主義技巧的大師。確切地說，自然主義是他用來如實表現他對現代中國社會不朽的洞察的一種藝術手段。雖然茅盾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成員，但他小說的觀點從本質上講卻是悲劇性的，因為他的觀點主要關系到在一個注定要衰亡的階級社會里人生的無所成就。《蝕》反映了茅盾的個人經歷，刻畫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事革命”幻想的破滅，然而仍在尋求實現自我。在《虹》里，茅盾通過對女主角精到的描寫，繼續淋漓盡致地描繪城市知識分子。女主角的生活經歷是“對當時中國思想史的有意的諷喻”，因為這段經歷，通過“20年代早期個人主義的破產及其墮入放浪形骸和不負責任”，到左派排斥浪漫的理想主義而贊成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記錄了五四文化革命的最初階段。[[61]](#_61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i)然而，這部長篇小說的最后部分比前兩部分遜色，這正是因為茅盾未能把思想信仰與藝術真實性融合起來。茅盾在其論戰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熟悉資產階級甚于無產階級，而且有意以某種對“革命文學”有意義的方式，維護自己對這個衰敗的階級的現實而悲觀的看法。確實，《子夜》一書無比有力地體現了這種看法。在這部長達五百多頁的長篇小說中，茅盾構筑了一座上海城市資產階級社會的大廈，剖析了它的許多成分——銀行家、地主、證券經紀人、學生、社會名流，并且詳盡刻畫了其不可避免的崩潰過程。工人并未得到突出的描繪。

從《蝕》到《子夜》，茅盾似乎勾畫了處于充滿無名惆悵的“黎明前的長夜”中的城市環境。當他把筆鋒轉向30年代的中國鄉村時，如在他那著名的短篇小說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和《殘冬》）中那樣，他同樣陷入兩難境地——試圖在絕望的景色中看到更多的希望。如人們可能預料到的那樣，這三部曲的首篇《春蠶》，是它的兩個續篇無法與之媲美的藝術杰作；在后兩篇中，政治教訓相當明顯地插入了農村苦難的自然主義描繪之中。

像茅盾一樣，沈從文和老舍也在他們的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城市悲觀主義情調。沈從文在一篇辛辣的幻想作品《阿麗思中國游記》中諷刺了城市的虛偽；而老舍寫下的題為《貓城記》的諷刺作品則不甚成功。顯然，不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的背景中，兩位小說家都寄同情于農村人物。沈從文的筆法更具田園牧歌風味；他在他所愛的南方農村同鄉身上看到了一種強悍、質樸，近乎“高貴的野性”的品格，以及一種“易動感情的正直的和與生俱來的誠實匯成的生命的溪流”[[62]](#_62_Tong_Shang)。與城市的喧鬧和腐朽相對比，這種田園色彩帶有一種特殊的精神上的崇高感。與魯迅和茅盾著作的暗淡色調不同，沈從文的作品總是閃耀著抒情色彩。盡管其主題中含有苦難，沈的鄉村圖畫——如短篇小說《靜》和《蕭蕭》、中篇小說《邊城》和《長河》等令人難忘的作品，使人感到由他的生活經歷迸發出來的引人傾心的對生活的愛。他的《從文自傳》，回顧了他成為作家前的豐富多彩的早年生活，讀起來如同一部生動的傳奇小說。

同沈從文一樣，老舍對“古老的中國”的鄉土價值觀——樸素，正派，誠實，具有很深的個人歸屬感，并對體力勞動者高度尊重。北京城作為概括傳統中國最佳因素的一個獨立世界，在老舍的生活和藝術中占據了中心位置。但是如他最著名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63]](#_63_Ai_Wen__Jin__Luo_Bo_Te__Wo_D)所描述的那樣，甚至這個備受珍視的世界也處于可悲的墮落過程之中。駱駝祥子是一個來自鄉村的人物，他的夢想是擁有自己的人力車，而這個夢想被周圍的邪惡勢力逐步地粉碎了。推而廣之，祥子的悲劇也體現了卷入飛速社會變革湍流之中的古老的北京的悲劇。老舍摯愛的城市的聲色，為《祥子》提供了所需內容的源泉，但是讀者也可以從文字中認識到，它也被“現代化”勢力的罪惡污染了。老舍懷著痛苦的順從感，把生活的無情化過程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像祥子那樣的“小人物”應當成為北京的真正“靈魂”，他們卻被一個日益無法忍受的環境殘害和腐蝕。這種環境不僅是由社會經濟的變化，而且是由中上層階級道德素質衰減造成的。這個主題反復出現于老舍的幾篇早期作品《趙子曰》、《牛天賜傳》和《離婚》中。

老舍是一位感情豐富、舉止高雅的人，具有廣闊的人道主義的同情心（祥子曾受雇于一位待他很好、抱有羅伯特·歐文式的理想的教授，他可能是老舍簡略的自畫像），而不是一個狹隘的政治作家。他的左的傾向限于悲哀地論述個人努力的無效，這使集體行動愈來愈迫切。但如老舍自己的悲慘命運證實的那樣，解放以后的社會主義現實也使他難以承受；他于1966年混亂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自殺或被殺。老舍有一次寫道，他“是個善于說故事的，而不是個第一流的小說家”。“我的溫情主義多于積極的斗爭，我的幽默沖淡了正義感。”[[64]](#_64_Yin_Zi_Wang_Yao____Zhong_Guo)然而恰恰由于他的悲劇式的觀點，寬厚、仁愛和帶有機智和幽默的色彩，才受到政治信仰不同的所有中國讀者的熱烈歡迎。盡管老舍出身滿族并曾短期旅居倫敦，他卻一直被當作最受歡迎的“人民”作家之一而為人們懷念。[[65]](#_65_Guan_Yu_Lao_She_De_Yan_Jiu)

30年代最受歡迎的小說家，尤其是在年輕讀者當中，毫無疑問是巴金。他的《家》曾被譽為“現代中國青年的圣經”[[66]](#_66_Guan_Yu_Ba_Jin_De_Yan_Jiu__J)。《家》和巴金的聲望是一種只有從歷史角度才能分析的現象，因為盡管其著述豐富，但巴金并不是一位完美的作家。他用迸發的激情彌補了藝術技巧的不足。《家》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屬于自傳式的敘述，基本上是“新青年”的故事。高氏兄弟三人，顯然代表五四時期反抗“封建”社會的年輕知識分子的三種突出類型。該書出版于1933年，是在狂熱追求五四運動目標的十年之后，所以幾乎注定會迅即名噪文壇。巴金在某一點上謳歌了整整一代人的苦悶和狂喜，這一代人經歷了五四時期的歡快。這一時期巴金的大多數長篇小說——《愛情》三部曲以及由《家》組成第一部分的《激流》三部曲，沐浴著五四的余暉，盡管流行，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過時了。反傳統以及個性解放的戰斗已經獲勝，而30年代早期的左派運動則要求一套不同的政治信仰。雖然城市知識分子中形形色色的愛情和革命，繼續出現在巴金、蔣光慈以及許多次等作家們的筆下，但到30年代中期，創作的重心逐漸轉移到城市激進青年以外的題材上。與同時代人的主要作品相比，巴金熱情奔放的小說讀起來幼稚得令人頗覺困惑，在思想和藝術深度上都有欠缺。到1947年巴金出版《寒夜》，說明他作為小說家已充分成熟時，個人創作的全部傳統——20年代與30年代的遺產，幾乎已走到盡頭。

在這個時期眾多的短篇小說家中，最杰出的兩位當推張天翼和吳組湘。他們兩人都投身于共產主義事業，然而沒有屈從于思想體系的誘惑。

夏志清認為，張天翼在他最佳的小說里，“往往保留了人性真象的一種廣度，這在一般作家教誨人道主義的時代，實在難能可貴”。夏又說，“同期作家當中，很少人像他那樣，對于人性心理上的偏拗乖誤，以及邪惡的傾向，有如此清楚的掌握；不僅如此，還進一步的具備一種諷刺性和悲劇性的 ‘視景’”[[67]](#_67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i)。為了以“嚴格的現實主義”傳達這一人類真理，張熟練地運用樸實的口語，并巧妙地調動矛盾沖突，作為一種刻畫階級不平等的藝術手段。例如，在他的短篇小說《二十一個》中，他準確地抓住了士兵與軍官之間的矛盾沖突。張在他著名的長篇小說《春風》[[68]](#_68_Zhang_Tian_Yi_De_Zhe_Bu_Xiao)中，將一所小學作為階級壓迫的縮影加以刻畫。這種諷刺顯得愈加強烈，因為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斷片的教育機構，應當是最少腐敗的。然而在張的故事里，教師們兇狠而狹隘，而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成了教師壓迫窮苦學生的幫兇。

這樣，張天翼在這篇小說以及其他小說中，得心應手地描繪了仗勢欺人和緊張的人際關系，展示了他對人類惡行的真知灼見，而這些行為最終歸咎于社會的大環境。在這一點上，他與另一位堅定的左翼作家吳組湘有共同之處。吳的筆法很少帶有張的滑稽或者諷刺色彩，但是它具有“大膽的象征”與“猛烈的挖苦”的內在力量。[[69]](#_69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i)例如，在《官宦的補品》中，一個地主的孱弱的兒子確確實實依靠農民們的血液和乳汁而活了下來。在《樊家鋪》里，作者大膽地把貧與富、勢利與苦難之間的明顯差別，表現為母親與女兒之間一場生死沖突。[[70]](#_70_Guan_Yu_1919__1949Nian_Wu_Zu)他把那位母親刻畫為一個長期生活在城市，并吸收了雇主的剝削思想的守財奴，從而發出了即使在血親之間，也存在階級對抗這樣最強烈的富于戲劇性的宣言。為了強調其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吳設置了弒母的悲劇性高潮，并讓讀者作出自己的判斷，這位農家婦女謀殺生身母親是無罪的嗎？吳就這樣通過迫使讀者作出肯定的裁決，點出了迫切的經濟需要這個關鍵問題。

吳組湘采用聳人聽聞的手法，當然不是為了這種手法本身。在這個“左翼作家當中農民小說的最初實踐者”[[71]](#_71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i)的作品中，悲劇的強度突出了他對革命事業的強烈的政治使命感。然而，像茅盾和張天翼一樣，吳組湘與其說是熱心于革命的前途，不如說是革命前的痛苦與磨難的現實，尤其是在鄉村群眾之中，使他苦悶。吳組湘的作品是小說界一個新趨向的代表。比較有良心的左翼作家，已不再能躺在上海咖啡館的安樂椅中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哲學家了。雖然他們大多數仍住在城里，但他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鄉村；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表現鄉村題材。根據來自臺灣的一個國民黨學者的表格，在30年代小說的三個主題——鄉村的狀況、知識分子以及抗日愛國主義之中，鄉村主題支配了大多數作品。[[72]](#_72_Li_Mu____San_Shi_Nian_Dai_We)這些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五四的主觀個人主義——集中于城市知識分子個人思想情感——的直接遺產被賦予一個社會取向，這是隨小說的范圍擴展到農村，以及“現實主義”獲得真正的鄉村韻味而出現的。

一種新的文學流派正在逐漸呈現——“地區文學”，作者力圖攝取一個特定的農村地區——常常是作者家鄉的泥土氣息和地方色彩（鄉土）。一大批創作可以歸入這一范疇。除吳組湘的小說、張天翼的某些作品和茅盾的農村三部曲（都以長江下游的鄉村為背景）外，我們還發現這樣一些突出范例，如沈從文關于中國南部和西南部的作品（《邊城》以及他關于苗族人的故事），老舍以北京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一種以鄉土用語描繪的城市環境），以及沙汀（關于四川西北部）、艾蕪（關于云南）、葉紫（湖南西南部的村寨）和其他許多作家的短篇小說。在所有這些作品中，對“大地”的強烈的愛是與敏銳地意識到社會經濟危機結合在一起的。由于大多數作家確實來自他們在小說中所刻畫的農村地區，他們對自己生長環境根深蒂固的熱忱，使鄉村的艱辛和苦難變得愈加悲切。在有些情況下，例如沈從文對鄉土的懷戀，是由作者對城市居住環境感到強烈不安和生疏引起的。[[73]](#_73_Guan_Yu_Chen_Cong_Wen_Dui_Xi)在另一些情況，如茅盾和吳組湘，鄉村幾乎被有意識地描繪成為城市罪惡的犧牲品；西方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從沿海城市對中國農村的掠奪，令人們痛苦地想起革命行動的必要。但是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中國城鄉之間的顯著差距——這個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經濟危機的根源，被這些與國民黨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學界的知識分子痛苦地觀察到，并生動地表現出來。這樣，他們的鄉村文學無論是諷刺的，田園牧歌式的，現實主義的，或鼓動性的，事實上幾乎都成為對那個極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權，表示抗議和不滿的文學。

日本人在1931年侵占了東北三省（滿洲）。隨著一群流亡作家從東北抵達上海，這種新型的地區文學的政治重要性得到了有力推動。這些年輕作家處于迅速席卷全國的愛國主義旋渦之中，他們身為日本侵略的最早見證人，幾乎一夜之間便成了名人。他們的作品描繪了遭到異族霸王蹂躪的東北鄉村，為地區文學帶來了新鮮感和生命力，并且在流行性和知名度上幾乎取代了城市風格的“無產階級文學”。

這個東北作家群的領袖是蕭軍，他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除了是第一個戰爭小說的樣本以外，還以第一部被翻譯成英文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而聞名。[[74]](#_74_Tian_Jun__Xiao_Jun_____Ba_Yu)這部長篇小說在魯迅的支持下于1934年出版，它的簡潔的藝術結構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毀滅》。但是如魯迅在序言中評論的那樣，“[它]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75]](#_75_Yin_Zi_Li_Ou_Fan____Zhong_Gu)情感的真摯——蕭軍親身體驗的激情，是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但在26歲的年紀，蕭軍只是一個初學者，他的藝術在后來的作品中得到較好的發展，例如他的短篇小說《羊》和長篇小說《第三代》。

在東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資遠勝蕭軍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蕭紅。她的處女作是一部題為《生死場》的中篇小說，也是在1934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76]](#_76_Guan_Yu_Zhe_Bu_Xiao_Shuo_De)蕭紅憑著她對東北地區的方言和習語運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圍繞季節更迭與人類生命周期的主要階段——生、老、病、死——轉動的農民生活的可愛的畫卷。但是這一自然節律被日本兵打斷了，日本兵的出現殘酷地破壞了這個自然與人的和諧的世界。在蕭紅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蘭河傳》）中，農民的生命周期體現在一系列令人難忘的人物身上——學童、獵人、土匪、年邁的農婦、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羅斯人，在她看來，他們也都體現東北人民的原始活力。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憑著她對故土的氣息和聲音的敏感，給讀者帶來了生動的東北意識；失去東北既是對個人的打擊，也是國家的悲劇。

另一位東北作家端木蕻良是蕭氏夫婦的朋友，一個可能更有雄心的小說家。長期以來，他的作品既未能在商業上流行，也未引起學術上的注意，一直到最近。[[77]](#_77_Xia_Zhi_Qing_Jiao_Shou_Cong)端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科爾沁旗草原》寫于1933年，當時他才21歲。但是這部小說不同于立即得到魯迅支援的蕭氏夫婦的作品，它直到1939年才得以出版。如果說，蕭紅以素描畫家的精細描繪了東北的風物，那么，端木蕻良對故土的處理甚至更有雄心地將史詩般的恢弘灌注其中。這部長篇小說是一個地主家庭，從其最早定居東北，直至日本入侵前夕的愛國主義覺醒的編年史。這部散漫的小說，以其端莊的散文筆法并借鑒電影的技巧，加上對典型人物的刻畫，本來可以達到民族史詩的地位。但端木也許是一個過于急躁和雄心勃勃的年輕作家，未能磨煉好講述生動故事的技巧。這個明顯的缺點，損傷了一部否則堪稱輝煌的長篇小說——一部功虧一簣的偉大杰作，它本來可能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

繼《科爾沁旗草原》之后，端木蕻良創作了另外兩部主要的長篇小說，《大地的海》與《大江》，還有幾篇短篇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他進一步展示了他作為一個“有描寫力的抒情詩人”的才華——一種“以抒情詩式的嚴格描寫風景和肉體感覺的能力”。《大江》里的兩章，被夏志清贊為“現代中國散文的代表作”[[78]](#_78_Xia_Zhi_Qing____Duan_Mu_Hong)。如果沒有八年漫長的中日戰爭（這場戰爭耗盡了整個民族的精力，并剝奪了中國現代作家發展藝術的穩定環境），端木與其他人的才能會把中國現代小說推上一個新的高度。

### 詩歌

中國現代詩歌的早期階段，是以從傳統詩歌格律的桎梏中掙脫出來的不懈努力為特點的。新詩人急于試驗新的形式，經常自由表達，不顧詩歌的意境。胡適、康白情、冰心等早期的五四詩人，具有一個共同的弱點是構想簡單和想象貧乏。[[79]](#_79_Zhu_Li_Ya__C_Lin____Zhong_Gu)

直到徐志摩于1922年從英國回國，使用西方——主要是英國的——詩歌形式的實驗才認真地開始。[[80]](#_80_Guan_Yu_Xu_Zhi_Mo_Jie_Jian_Y)徐的早期小詩，如收在他的詩集（《志摩的詩》，1925年）里的那些，是“噴涌而出，無拘無束的激情”的迸發，套用從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借來的夸張做作的形式。他的詩歌技巧在后續的詩集——《翡冷翠的一夜》（1927年）和《猛虎集》（1928年）中變得較為精致。雖然他在詩歌的韻律與節奏上取得了更大的自由和創新，但他那種受華茲華斯[[81]](#_81_Hua_Zi_Hua_Si__William_Words)、雪萊[[82]](#_82_Xue_Lai__Percy_Bysshe_Shelle)和濟慈[[83]](#_83_Ji_Ci__John_Keats_1795__1821)感發的突出的“外國”情感，讀起來奇怪地使人覺得缺乏獨創精神，尤其對西方詩歌的習作者來說是這樣。當徐在《重別康橋》和《翡冷翠的一夜》等外國韻味濃重的詩中，傳達令人愉快的異國情調時，或者，當他將聽覺與視覺因素混合以造成一種怪誕的境界時，如在《海的韻律》（受濟慈的《無情的美婦人》啟發而作，后來由趙元任譜成曲）中，徐達到了他的頂峰。但是當他在后期的詩作中，試圖更富有哲理或者將外國的意象移植到中國的環境中時，結果并不那樣成功。即便在他最長的“哲理性”的表述《愛情的啟迪》（1930年）里，人們也能覺察到一種沸騰的詩的意境在掙扎，然而尚未能達到完全成熟。假若徐不是在1931年空難中突然喪生，他的成就無疑會更大。

徐在新月社的朋友和同事聞一多更傾向于視覺表現，這也許是由于他有繪畫方面的訓練。同徐一樣，聞也熱心于形式方面的實驗：他的早期作品有時刻意用觸目的暗喻和引喻使讀者震驚。但是他從第一個詩集《紅燭》（1923年）縱情于浪漫主義，到第二個詩集《死水》（1929年）達到藝術上的成熟，其進步比徐志摩更加引人注目，盡管聞的詩作遠少于徐。聞的《死水》一詩的出現，由于它對中國社會的獨到而富有詩意的看法，可以算得上是一個里程碑：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霉菌給他蒸出些云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里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丑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么世界。[[84]](#_84_Zhe_Shou_You_Xu_Jie_Yu_Yi_Ch)

朱莉婭·林曾就此詩“緊湊的詩節格式”以及格律整飭和詩行頓于末端作過評論，說它顯示了“聞著力追求的結構上的渾然一體”[[85]](#_85_Zhu_Li_Ya__C_Lin____Zhong_Gu)。但是比詩的形式更為重要的，是聞將眼前的現實壓縮成隱喻的視覺形象的能力。這首詩中陰郁的意象，與徐志摩的玫瑰色的田園短詩，和郭沫若的啟示錄般的讖語大相徑庭。腐朽和再生的象征手法，使人模糊地聯想到郭的《鳳凰涅槃》，但是聞對中國的看法——一潭死水，但可以發酵而化為神奇，具有郭的豐富想象中所缺乏的思想深度。就運用充滿模糊意味的視覺隱喻而言，《死水》也是更為大膽的“現代派”的詩作。[[86]](#_86_Guan_Yu_Wen_Yi_Duo_Sheng_Pin)

試圖創造一個與現實無清晰聯系的意象世界，用引發和暗示，而不用直接表述的手法，這是人們熟悉的西方象征主義詩歌的特點；這一特點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在傳統的中國詩歌中找到。盡管如此，它與五四初期的詩歌是大不相同的，那時的詩歌以簡單、自由和易懂為目標，如胡適所主張的那樣。中國現代詩歌是否如歐洲那樣，相應地從浪漫主義“進步”到象征主義，也許有待商榷；[[87]](#_87_Guan_Yu_Zhe_Ge_Wen_Ti_De_Xia)但是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更“象征主義的”傾向，在少數詩人的作品中已清晰可見。

這種傾向的主要貢獻者之一是李金發。當李作為勤工儉學的一員于20年代早期在法國學習時，他就開始寫詩。周作人注意到他的獨創性，并在1925和1927年安排出版了他的兩卷詩集。李于1925年回到中國后，被人稱作“古怪的詩人”，他的詩歌莫名其妙地“令人難以理解”。李遭到許多左翼與非左翼作家的批評，但得到少數人（其中有周作人和朱自清）的贊賞。李自然把自己視為一個先于時代的“先鋒派人物”[[88]](#_88_Jian_Shi_Ren_Ya_Xian_Fang_We)。

李金發的詩歌除了并不試圖闡釋的零散形象和象征以外，并不需要有任何“意思”。他顯然是受了波德萊爾[[89]](#_89_Bo_De_Lai_Er__Charles_BaudeI)魏爾蘭[[90]](#_90_Wei_Er_Lan__Paul_Verlaine_18)和馬拉梅[[91]](#_91_Ma_La_Mei__Stephene_Mallarme)的影響——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他們的作品，并將其介紹到中國，似乎醉心于“富有異國情調的”成分。按照共產黨的文學史家們的看法，這些突出的感官形象以及有時是怪誕的形象，不過是掩蓋李的頹廢、反動意識的徒勞的手段。[[92]](#_92_Wang_Yao____Zhong_Guo_Xin_We)但一位現代西方學者卻認為，李的詩是“中國現代詩歌發展中最富挑戰性的對傳統的背離，同時也是最為大膽的創新”[[93]](#_93_Zhu_Li_Ya__C_Lin____Zhong_Gu)。從較為公允的角度看，不妨把李看做對五四初期詩歌膚淺的浪漫主義，或現實主義反應強烈的少數“新叛逆者”之一。他進行了一場第二次“解放運動”，使中國現代詩歌暫時從對自然與社會的著迷般的關注中擺脫出來，并且暗示超現實主義的藝術象征世界的可能性。他接近于創造一種大膽新穎的美學視覺形象，像在歐洲超現實主義藝術中那樣，能充當反對庸俗現狀的藝術宣言。

在施蟄存編輯的一種新雜志——《現代》（1932—1935年）上，有人在繼續李金發的開拓性事業。《現代》派自稱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其中占主導地位的詩人是戴望舒。戴同樣對法國象征主義感興趣，他繼承了李金發對印象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愛好。他聲稱詩歌的目的是表達“詩情”，把“詩情”解釋為“自己跟隱藏的自己之間的某種東西的召喚”。[[94]](#_94_Yin_Zi_Wang_Yao____Zhong_Guo)但是戴的詩作沒有取得李的隱晦、怪異意象的不和諧效果。相反，他似乎堅持徐志摩詩的聽覺價值；他與新月派詩人——在徐志摩和朱湘過早逝去之后，尤其是陳夢家和方瑋德——都強調音樂美、結構美，和引發聯想的細妙之處。戴的“較柔和的”象征主義的一個例子，可以在《雨巷》（1927年）中找到，這首詩為他贏得了“雨巷詩人”的雅號。

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著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于著，

冷漠，凄清，又惆悵。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飄過這個女郎；

她靜靜地遠了，遠了，

到了頹圮的籬墻，

走盡這雨巷。

……

撐著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著愁怨的姑娘。[[95]](#_95_Zhe_Shou_Ying_Yi_Shi_Yin_Zi)

根據朱莉婭·林的分析，這首詩產生的“聯想”效果，造成了“一種可以與他在詩歌方面的導師保羅·魏爾蘭相媲美的彌漫著委婉嬌柔的魅力，憂郁倦慵的氣度，和流暢的樂音的氛圍”[[96]](#_96_Zhu_Li_Ya__C_Lin____Zhong_Gu)。

在中國現代文學左翼的學術研究中，李金發和戴望舒的作品被視為一股“逆流”；因為它們是與繼續專注生活和社會現實的30年代文學的主流相悖的。[[97]](#_97_Wang_Yao____Zhong_Guo_Xin_We)但是新的人才不斷出現。北京大學的三名學生——卞之琳、李廣田和何其芳，出版了一部名為《漢園集》的合集，其中收有那個時期一些最具獨創性的作品。這三人中，最有學識的大概是卞之琳。他翻譯了波德萊爾、馬拉梅的作品，后來崇拜葉芝、[[98]](#_98_Ye_Zhi__William_Butler_Yeats)奧登[[99]](#_99_Ao_Deng__W_H_Auden_1907__197)和T.S.艾略特；[[100]](#_100_Ai_Lue_Te__T_S_Eliot_1888)他使自己的作品充滿中國現代詩人罕有的冥想的，有時是形而上學的素養。由于這種“智慧的美”[[101]](#_101_Zhe_Ge_Ci_Shi_You_Liu_Xi_We)，卞的作品大多數中國批評家是不易理解的，他們傾向于偏愛較為光彩奪目和無產階級化的何其芳。何其芳的早期詩作，甚至比卞之琳更矯揉造作地富于浪漫主義色彩。何同樣受到法國象征主義的影響，相信在詩歌中“美主要是通過意象，或象征的運用來實現的”，并認為詩歌的最終目的是“發揮想象，逃離現實進入夢境和幻覺”[[102]](#_102_Bang_Ni__S_Mai_Ke_Du_Ge_Er)。但是如邦妮·麥克杜格爾指出的那樣，“迫使何其芳在1933年夏回鄉的那場政治危機，使他的作品發生了一個突然的轉變。他的詩句的豐富的意象減退了”[[103]](#_103_Tong_Shang_Shu__Di_228Ye)。在他寫于1936—1937年的一些小詩中，他告別了已不再能支撐他的西方浪漫主義作品；取而代之的是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現實——陷入貧困和流離失所的農民們。

我愛那云，那飄忽的云……

我自以為是波德萊爾散文詩中

那個憂郁地偏起頸子

望著天空的遠方人。

我走到鄉下。

農民們因為誠實而失掉了土地。

他們的家縮小為一束農具。

白天他們到田野間去尋找零活，

夜間以干燥的石橋為床榻。

……

從此我要嘰嘰喳喳發議論：

我情愿有一個茅草的屋頂，

不愛云，不愛月，

也不愛星星。[[104]](#_104_Bang_Ni__S_Mai_Ke_Du_Ge_Er)

何其芳寫道，“我總是帶著感謝，記起山東半島上的一個小縣，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樣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個誠實的個人主義者除了自殺，便只有放棄他的孤獨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爭。……從此我要以我所能運用的文字為武器去斗爭，如萊蒙托夫[[105]](#_105_Lai_Meng_Tuo_Fu__Mikhail_Le)的詩句所說的，讓我的歌唱變成鞭棰”[[106]](#_106_Bang_Ni__S_Mai_Ke_Du_Ge_Er)。

在詩歌方面，現代派的實驗于30年代中期突然中止，為一種簡單的、無產階級的風格所代替。臧克家是體現這種新潮流的一位年輕詩人，他的第一部詩集《烙印》在1934年被當作一件大事，受到聞一多、茅盾以及其他作家的贊揚。在他們看來，臧的詩作由于極其簡樸，“不肯”通過“美麗的字眼粉飾現實”，顯得更有力度。臧用兩行詩句解釋他的第一部詩集的標題，“痛苦在我心上打個烙印，刻刻驚醒我這是生活”[[107]](#_107_Wang_Yao____Zhong_Guo_Xin_W)。臧克家是農村無產階級詩歌的先驅者之一，這是一種戰爭年代在何其芳、艾青、田間以及后來郭沫若的作品中盛行的趨向。對經歷苦難生活的積極態度，對中國鄉村“有血有肉的”人物富有詩意的聚焦，以及為詩歌效果而更加靈巧地運用口語，這些成了他們的共同特點。到中日戰爭開始時，詩歌與小說都集中到當前現實的主題上。城市中的象征主義和現代派的傳統從中國大陸上消失了。[[108]](#_108_Ran_Er__Zhe_Zhong_Xian_Dai)

### 戲劇

中國現代戲劇的發展，與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有著許多相同之處。二者都是有意識的對傳統的反抗，從受西方啟發而產生的新形式開始。1907年，一小群中國學生在日本組織了春柳社，并且用清一色的男演員演出了翻譯的小仲馬的《茶花女》和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109]](#_109___Tang_Mu_Shu_Shu_De_Xiao_W)（《黑奴吁天錄》）等劇作。從此，這種新劇種的業余演員們稱其為“新劇”、“新戲”，后來又稱作“文明戲”或“現代戲”，以與傳統的戲劇相區別。1927年，早期的劇作家之一田漢采用了“話劇”這一名稱，以表明它與傳統的京戲——基本上是“唱的戲劇”的重大背離。[[110]](#_110_Hu_Yao_Heng____Cao_Yu_____D)

同新詩一樣，新劇構成了“文學革命”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事實上作為傳播新思想的媒介，它起了更為突出的作用。胡適在《新青年》上對易卜生[[111]](#_111_Yi_Bu_Sheng__Henrik_Ibsen_1)的介紹，繼之而來的《玩偶之家》中文譯本，以及胡適的易卜生式的戲劇《終身大事》，將這種新的戲劇媒介轉向社會改革。但在藝術質量方面，在20世紀20年代發展起來的新劇，甚至比詩歌還要粗糙，盡管被翻譯成中文的外國劇作的數量相當可觀。當時少數幾部劇作，不過是以社會叛逆或者個人挫折為主題的文學習作，如胡適的《終身大事》，郭沫若的三部曲《三個叛逆的女性》，洪深的《趙閻王》，以及田漢的《湖上的悲劇》、《咖啡店之一夜》和《名優之死》。

作為一種表演藝術，新劇較之詩歌和小說兩種書面文藝體裁遇到了更多的困難。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有一些劇社或劇團已經組成，尤其是“民眾劇社”（1921年）和“南國社”（1922年），但它們是“業余的”。從這一詞的雙重意義講，它們只是“愛好”戲劇的作家和學生的群體，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編演戲劇的專業知識。盡管有田漢、歐陽予倩，特別是洪深（他曾在哈佛大學隨貝克教授的47寫作實驗班接受實際訓練）的努力，在20年代根本沒有專業性的“戲劇”可言。一個劇目很少上演一、二次以上，通常作為慶典的一部分，在中學的禮堂或其他公共場所演出。非職業性的劇團缺乏資金和人才；有時他們的演出被認為對學生的道德產生不良影響，遭到學校或者地方當局禁止。遲至1930年，根據夏衍的一篇有趣的記述，他所屬的業余劇團在上海租用了一家日本人的帶有移動舞臺的劇院，舉行了一場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的“盛大演出”，但男女“演員”寥寥無幾，每人不得不充當幾個角色，還要與導演一起充當舞臺服務人員，在幕間更換布景和移動舞臺。[[112]](#_112_Tian_Han___Ou_Yang_Yu_Qian)

直到30年代早期，中國現代戲劇才最終在寫作和表演兩方面成熟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單獨歸功于一個人。

曹禺就讀于清華大學時寫出了他的第一部劇作《雷雨》，該劇出版于1934年，1935年由洪深和歐陽予倩執導，在復旦大學由學生們演出。1936年，“旅行劇團”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劇，并取得空前的成功。[[113]](#_113_Hu_Yao_Heng____Cao_Yu_____D)曹禺的第二部劇作《日出》（1936年）獲得了上海《大公報》頒發的一項文學獎。曹禺受到普遍歡迎后，逐漸發展他的藝術，多種劇作相繼問世——《原野》（1937年），《蛻變》（1940年），《北京人》（1940年），以及《橋》（1945年），這些作品奠定了曹禺作為現代中國最杰出的劇作家的地位。

在他的所有劇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歡迎的，雖然在藝術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雷雨》得到好評是容易理解的，因為它的主題涉及五四時期的關鍵論點，維護“在傳統的家長制社會的沉重壓力下的個人自由和幸福”[[114]](#_114_Liu_Shao_Ming____Cao_Yu__Qi)。在“解放”占統治地位的主題之外，增加了社會主義者初發的對資本主義剝削下工人悲慘境遇的關注。但曹禺不滿足于照五四初期“社會問題”劇的過分簡單化模型來鑄造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寧愿讓寓意按照希臘悲劇的傳統，在情欲和命運的復雜情節中得到表達。曹禺在這一方面顯示出他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劇作家，遠比他的所有的前輩更有天賦。這出戲的女主角周繁漪，是一個對繼子有亂倫情欲的鬼迷心竅的人物。如劉紹銘令人信服地論證的那樣，曹禺塑造人物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拉辛[[115]](#_115_La_Xin__Jean_Racine_1639__1)（《菲德拉》）、尤金·奧尼爾[[116]](#_116_Ao_Ni_Er__Eugene_O_Neill_18)（《榆樹下的欲望》中的艾比·普特南）和易卜生（《群鬼》中的艾爾溫夫人）。[[117]](#_117_Liu_Shao_Ming____Cao_Yu__Qi)曹禺有可能把這出戲設想為《玩偶之家》在中國的變種（與易卜生寫《群鬼》的手法相似，目的在于使觀眾相信如果娜拉選擇與她的丈夫待在一起，那么，最后發生在艾爾溫夫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她的命運）。但是曹禺試圖探索亂倫情欲這一主題，作為傳統的家庭倫理道德的悲劇性的抗議，這顯得更為大膽。曹禺由于這種對西方戲劇資料的創造性運用而享有盛譽，他是當之無愧的。

在《日出》中，曹禺的意圖更具社會學意義。像茅盾的《子夜》一樣，曹禺的劇作也被設計成資本主義秩序滅亡的尖刻描繪。為了突出這個主題，曹禺采取了另一個大膽的步驟。他回憶說，“在我寫《日出》的時候，我決心舍棄《雷雨》中所用的結構，不再集中于幾個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寫《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觀念”[[118]](#_118_Zhe_Ju_Hua_De_Ying_Yi_Wen_Y)。這出戲展示了一群不同的人物，而沒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為了表現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四幕之中既寫了上層階級，也寫了下層階級。發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喚起人們對墮落和苦難的強烈感受，這也許是中國現代戲劇中構思最為大膽的一幕。[[119]](#_119_You_Yu_Nei_Rong_Kuang_Fang)

曹禺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其敏銳的戲劇意識。他是把戲劇不僅視為文學，而且視為表演的兩位中國現代劇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臺提示是為達到極度緊張而精心設計的。《日出》中妓院一場，舞臺一分為二，兩組表演同時進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聲和沉默的幻影，像奧尼爾的《瓊斯皇》那樣用來制造一種心理上的恐怖氣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識地運用希臘悲劇的程式，則是曹禺熱情掌握編演技巧的又一例證。

雖然曹禺的劇作在技巧上明顯模仿西方模式，但在內容上全然是中國的。他的作品把同時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關注戲劇化。他的劇作的主題，以《雷雨》和《日出》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舊的婚姻制度的悲劇，封建的家庭結構，下層階級所受的壓迫，城市資本家們的腐敗，以及年輕知識分子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給這些主題以盡情宣泄的毀滅性的力量。在這方面，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說《家》改編成戲劇。曹禺同巴金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寫《雷雨》時，他寫道，我被如此強烈的一種突發的激情緊緊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尋求把它發泄出來。當他寫《日出》時，他同樣“自始至終被強烈感情”所主宰。[[120]](#_120_Liu_Shao_Ming____Cao_Yu__Qi)事實上，曹禺的大多數劇作可以視為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們也暴露了人們在巴金的小說里發現的同樣的缺陷，散漫的筆調，過分熱衷于運用夸張的語言，以及通俗劇和煽情主義的傾向。但是作為一名劇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個明顯的優勢，他能夠借助活的媒介來傳達他的真實情感。

盡管曹禺對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沒有狹隘的政治性。他無意用辛勞發展起來的媒介作為宣傳的工具。身為一個藝術家和社會批評家，他只關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彌漫的黑暗——戰爭與革命前夜可怕的現實的種種弊端。與魯迅和茅盾一樣，他既無法提出積極的治理措施，也無法提出對未來的具體展望。在《日出》的結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121]](#_121___Ri_Chu____Ju_Ben_Zhong_Du)（也是一個詩人）的小說中的話說：“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122]](#_122_Cao_Yu____Ri_Chu_____Di_236)。

這幾行有名的臺詞是預言。1936年，中國確實處在一場國家大變動的前夜，但新的“黎明”并沒有給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帶來多少光明；相反，它引來了一個曠日持久的戰爭與延續不斷的革命的時期。

## 戰爭與革命，1937—1949年

### “民族抗戰”的英雄傳奇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引發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也將文學活動推向高潮。文學界知識分子的空前團結，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義。曾使左翼文學隊伍嚴重分裂的“兩個口號”的論爭，幾乎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所有的口號，都被淹沒在“抗戰”這個響亮的號召之下。各種組織自發地建立起來，并且發表了抗日宣言。最終，在1938年3月，也就是日本人于1月侵入上海[[123]](#_123_Shang_Hai_Xi_1937Nian_11Yue)以后不久，一個廣泛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老舍擔任會長[[124]](#_124_Lao_She_Ceng_Ren__Wen_Xie)，不久在20個主要城市設立了分支機構。

這個協會發起了一系列的活動來推進抗戰工作。它組織作家們加入“戰地訪問團”，前往軍事防御陣地慰問部隊官兵，并撰寫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訊。協會還建立起一個“文藝通訊員”網，缺乏經驗的年輕作家們——其中有些人在農村地區，被組織成地方小組，接受協會分支機構指導。他們時常聚會，討論協會布置的主題，并撰寫有關當地文藝活動的通訊。這些通訊連同他們的創作樣本，被送交協會中的上級評論和修改。在廣東省，僅在數天之內就組織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藝通訊；上海地區數量不相上下。甚至在華北的農村地區，成員據稱達五六百名。這些通訊員大多是學生，但有些是店員、工人或地區政府中的小職員。[[125]](#_125_Lan_Hai____Zhong_Guo_Kang_Z)

除作家訪問團和文藝通訊員的活動外，協會起先還組織了5個宣傳隊（每隊包括16名成員）和10個演劇隊（每隊30名成員）。通俗劇團競相出現，據統計，到1939年有13萬人從事戲劇表演。[[126]](#_126_Tong_Shang_Shu__Di_47Ye___Y)

這些組織清楚地證明，由于戰爭，中國現代文學正喪失其城市精英的特點。城市的作家投身于抵抗侵略的全國性運動，情愿或不情愿地拋棄了有保障的生活，到鄉村和前線的自己同胞中去。有兩個主導性的口號足以顯示他們的愛國熱忱，“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宣傳第一，藝術第二！”有些狂熱的作家甚至主張“上前線”，完全放棄文學。

1938年，郭沫若被委任為新設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宣傳工作。這樣，作家的宣傳活動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認可，他們當中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官員的隊伍中。但是盡管有這個最初的姿態，國民黨顯然專注于軍事和行政事務，這樣，就將宣傳領域幾乎全部留給了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127]](#_127_Liu_Xin_Huang____Xian_Dai_Z)主要由作家和藝術家任職其中的各式各樣的宣傳機構，事實上成為中共的統戰組織，中共巧妙地利用了這個日益擴大的知識分子群體的精力和熱情。

日本對主要沿海城市的占領，迫使中國的作家們進入內地。1937年至1939年，武漢與廣州取代上海和北平成為文學活動的新的中心。在上海的一些主要報紙雜志停刊的同時，一些新的報紙雜志如雨后春筍般地在小城市里誕生，常常是倉促而草率地印刷在粗糙的紙張上。在戰爭期間，書籍出版和銷售的總量實際上增加了。根據一個被廣泛引用的資料來源，新書銷售從戰前每次印刷一二千冊翻到了三四千冊，有時甚至達到1萬冊。[[128]](#_128_Lan_Hai____Zhong_Guo_Kang_Z)

隨著1939年武漢和廣州的失陷，[[129]](#_129_Wu_Han_He_Guang_Zhou_Du_Shi)文學進一步地深入內地；在戰時首都重慶，“文學活動十分活躍，幾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學革命期間的北京一樣”[[130]](#_130_Wang_Ji_Zhen_Bian____Zhong)。但是，戰爭頭幾年的勢頭沒有持續下來。當第二次統一戰線[[131]](#_131_Ji_Di_Er_Ci_Guo_Gong_He_Zuo)破裂時，重慶國民黨政府通過審查和逮捕，重新對左翼作家采取了鎮壓政策。他們中有些人結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內成了文學活動的中心。在1941年圣誕節，香港被日本人占領，桂林取而代之成為作家云集的地方。1944年桂林失陷后，重慶成為“大后方”的最后一個堡壘。

曠日持久的戰爭迫使人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既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作家們的生活條件惡化了。在惡性通貨膨脹下，重慶的報紙能夠付給撰稿人每千字一至二元（當地貨幣）[[132]](#_132_Kang_Zhan_Shi_Qi__Chu_Yun_N)—大體上與印刷工人排版同樣字數的收入相同。[[133]](#_133_Liu_Yi_Chang____Cong_Kang_Z)有幾個年輕作家貧病而死。像臧克家和老舍這樣有名的人物都不得不以糙米為生，甚至丁玲也難以得到肉食。王際真特別提到，“當時的報紙不時登載為生病和營養不良的作家們請命的呼吁書”[[134]](#_134_Wang_Ji_Zhen_Bian____Zhong)。眼中看不到勝利，士氣低落，腐朽和麻痹便乘虛而入。戰爭初期文學的戰斗熱情減退了。在1942—1943年間，重慶大約上演了30出戲，只有1/3直接涉及戰爭主題；其余的是歷史劇和譯作。重印舊作和翻譯西方長篇小說越來越流行，戀愛和色情作品也是這樣在那些從無情的現實生活里尋找解脫的人中流行。[[135]](#_135_Lan_Hai____Zhong_Guo_Kang_Z)

用邵荃麟的話講，對于那些沒有去延安的有責任心的作家來說，就像“長夜漫漫何時旦”[[136]](#_136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在頭幾年里，全國上下曾經聯合起來與外來的入侵者斗爭。現在敵人主要在內部，因為這座山城成了一個令人沮喪和死氣沉沉的世界——一個幾乎每天為日本人的空襲所籠罩的幽閉恐怖的世界，在通風簡陋的防空洞里，數以千計的人窒息而死；發國難財猖獗一時。當地的四川人與外來的“下江”人之間，根深蒂固的敵意一再爆發。這座城市也日益成為戴笠的秘密警察的世界、政府為壓制不同政見實行逮捕和暗殺的世界。

1944年末桂林淪陷，一些知識分子終于行動起來。在1945年2 月22日，重慶文化界的一份宣言出現在報紙上，要求結束審查制度、秘密警察活動、軍事摩擦以及發國難財，并且呼吁保障人身安全以及言論、集會、研究、出版和廣泛的文化活動的自由。5月4日，“抗敵協會”在七周年紀念大會上宣布每年“五四”為“文藝節”，以發揚光大“五四”民主與科學的傳統。[[137]](#_137_Lan_Hai____Zhong_Guo_Kang_Z)但是政府回報以某些逮捕和暗殺。1946年，這個方興未艾的“民主浪潮”最杰出的發言人之一、詩人和學者聞一多，在昆明遭到暗殺。國民黨特務置聞于死地，激起了知識界的反政府情緒；中共再次利用知識界并大獲其利。中日戰爭曾使知識分子政治化，而中共再次成為他們的支持者。

### “愛國鐵血”文學

戰爭將所有作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國家的危亡上。為藝術而藝術的實驗立即成為不合時宜了。文學完全瞄準生活現實——不再是個人經歷的片段，而是全民族的集體經歷。在戰爭頭幾年，不同形式的短篇報告文學——通訊、速寫、海報、演說、為朗讀而寫的詩歌和故事，以及在街頭和集市表演的獨幕劇，作為最流行的文學模式，幾乎取代了篇幅較長的各種虛構的作品。[[138]](#_138_Lan_Hai____Zhong_Guo_Kang_Z)這些事實上浸漬在埃德蒙德·威爾遜稱作“愛國鐵血”中的大量報告文學，或原始報告文學，“與其說是用藝術技巧，不如說是用感情寫出來的；它們的話題的吸引力與感情的感召力，當離開環境去閱讀時，很快就喪失了”[[139]](#_139_Zhu_Li_Ya__Lin____Zhong_Guo)。

雖然它們缺乏藝術素質，但在流行程度方面卻領盡風騷。按照周揚的觀點，報告文學是“抗戰期文藝的主要的形式”，因為它最有效地為“教育群眾”認識這場“民族自衛斗爭”的現實的直接目標服務。[[140]](#_140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這場戰爭使文學——不管質量如何粗糙，離開上海的城市象牙之塔，走向小鎮和村莊，加速了大眾化的進程。這個時期目睹了作家“走向人民”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嘗試。為迎合鄉村大眾的口味，從前的城市作家們熱心地采用民間的題材、習語、曲調，以及社戲、說書和大鼓（邊擊鼓邊講故事）等傳統的大眾形式。忽然間運用“舊形式”表現“新內容”成為一種時尚；老舍是勁頭最足的實踐者之一。

有些作家從事集體創作。“盧溝橋事變”數天后，在上海約有16名劇作家，自己組織起來寫了一部三幕劇《保衛盧溝橋》，甚至在完成前就有幾家劇團爭演出權。[[141]](#_141_Lan_Hai____Zhong_Guo_Kang_Z)有時作家戰地訪問的通訊也是集體采寫的。

在1939年的《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一篇文章中，胡風披露戰爭文學的五個顯著的弱點：（1）公式化或概念化的傾向；（2）繁瑣的冷淡的傾向，在繁瑣化的作品里面，過多的生活枝葉和事實毛發，使作品不能博得真正的實感；（3）傳奇的傾向；（4）由于這些主觀上的弱點，既沒有產生偉大的史詩，也沒有產生生動的現實主義作品；（5）由于思想的貧弱所產生的藝術力量的貧弱，文藝的人民性還不能取得決定的勝利。[[142]](#_142_Hu_Feng____Min_Zu_Zhan_Zhen)胡風的批評，顯然道出了他對降低藝術的不滿。他與茅盾一起反對過分政治化的觀點，那種觀點認為戰時文學只應刻畫生活的“健康”和“光明”的一面。按茅盾的提法，一個正直的批評家應當號召作家們，不僅要描寫“新的光明”，而且要暴露“新的黑暗”[[143]](#_143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然而，重慶有些批評家反對宣傳對文學質量的侵蝕，恰恰相反，他們主張兩者應該完全分離。朱光潛強調“冷靜超脫的觀察”的重要性以及藝術的自律。沈從文認為作家與文化工作者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前者應當是藝術家，而后者是宣傳鼓動家。沈爭辯說，作家們不應該與政治任務攪混在一起。梁實秋，這位左派分子們從前的敵人，更進一步倡導“無關的”文學，“人生中有許多材料可以寫，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與抗戰有關’的”[[144]](#_144___Zhong_Guo_Xian_Dai_Wen_Xu)。

這些要求文學質量的呼吁沒有得到回答。夏志清下結論說，在“大后方”創作的小說，普遍缺乏“激情和特色”；好作品的數量比戰前十年少得多。“游擊戰爭和學生戀愛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及無處不在的愛國宣傳的調門，毀掉了大多數戰時的長篇小說”[[145]](#_145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

在成名的作家中，只有茅盾和巴金創作了有意義的作品。茅盾在1942年前的兩部長篇小說——《腐蝕》和《霜葉紅似二月花》，與戰時的關系并不明顯。《霜葉紅似二月花》講述一個小城鎮在1926年的情況。而《腐蝕》則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性的長篇小說，它刻畫了國民黨秘密警察的罪惡。這部長篇，以小說的形式闡明1941年臭名昭著的“皖南事變”，被共產黨的批評家譽為可與《子夜》媲美。[[146]](#_146_Wang_Yao____Zhong_Guo_Xin_W)

與茅盾相比，巴金在戰爭年代取得了穩定的進步。他的《家》的兩部續篇寫得較好；特別是《秋》，它表明巴金感情上的成熟。但他最好的作品，當然是寫于戰爭即將結束，而于1947年出版的《寒夜》，它確立了巴金作為“一個極富盛名的心理方面的現實主義作家”的地位。他刻畫戰時居住在重慶的同一屋檐下，并且卷入家庭愛與妒之網中的三個普通的人物——一個男人，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巴金成功地獻給人們的，“不僅是中國處于失敗和絕望的最黑暗時刻的一個寓言，而且是走慈善之路的普通人所面臨的難以克服的困難的道德劇”[[147]](#_147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

另一位老資格的作家老舍，用民間習語寫了不少宣傳劇和詩歌，但只寫了一部平平常常的長篇小說《火葬》，這是他為了糊口匆匆忙忙出版的。戰爭剛結束，他就開始一個雄心勃勃的創作規劃，寫一部題為《四世同堂》的三卷長篇小說，但未能全部實現，而1946年出版的頭兩卷，“當列為令人失望之作”[[148]](#_148_Tong_Shang_Shu__Di_369Ye)。

戰爭時期的詩歌同報告文學一樣，只是為一個目的——激發抗敵的愛國熱情，寫作它經常意在為大量聽眾朗誦或演唱。于是，簡單的散文式的語言、民間習語、現實主義的描寫，以及口號式的呼喊，成為一大批“愛國詩人”的共同特征。兩個勁頭最足的實踐者是臧克家與田間。臧在前線歷時五年，寫下十幾部詩集。他曾表白說，“我愛農民，我甚至對他們脊背上的傷疤都感覺親近”[[149]](#_149_Zhang_Man_Yi_Deng_Bian____X)。田間被聞一多以同樣熾烈的感情譽為“時代的鼓手”，他已經拋棄了早期的偶像馬雅科夫斯基，并開始寫作“鼓點詩句”。它的詩行簡短，節奏急促有力，據信更符合戰爭的節拍。下面是田間鼓點詩的質量低劣的范例，在聞一多看來，“爆炸著生命的熱與力”。

棕紅的土地

在亞細亞

這泥土上，

染污著

忿恨，

蒙上了

侮辱。

祖國底耕牧者呵，

離開卑污的溝壑，

和衰敗的

村莊，

去戰爭吧，

去驅逐

日本帝國主義者底

軍隊。

以我們頑強而廣大的意志，

開始播種——

人類底新生！[[150]](#_150_Zhe_Shou_Ying_Yi_Shi_Yin_Zi)

比詩歌和報告文學更加持久地受到歡迎的文學體裁是話劇。獨幕劇在戰爭頭幾年大量涌現，奠定了舞臺劇的新傳統，觀眾的反應和參與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上海的電影業在30年代早期培養了第一批男女演員，他們此時進入戲劇行業。各個地區眾多的業余劇團——主要由教師和學生組成——也隨時準備演出從重慶與桂林——戰時戲劇在大后方的兩個中心來的新作。柳無忌說：“有一次來自西南五省的90家劇團聚集起來，參加桂林的一個戲劇節”，而“在重慶有霧的兩個季節里，那時城市相對來說不會遭到空襲，推出了三十多出大型劇目，觀眾場場爆滿”[[151]](#_151_Liu_Wu_Ji____Xian_Dai_Shi_Q)。

在戰爭頭幾年后，隨著愛國理想主義的衰退，戲劇承擔了逃避現實的娛樂職能。但是，它也讓共產主義者控制的戲劇界的劇作家和演員，得以“逃避審查制度的規定，仍然轉彎抹角地對時事做出評論”[[152]](#_152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

宋之的的《霧重慶》集中表現發國難財的商人和知識分子機會主義者；陳白塵的《升官圖》諷刺官場的腐敗；最為突出的是曹禺的《蛻變》，它刻畫一所管理不善的軍醫院的原始狀態；這些作品都是成功的。[[153]](#_153_Liu_Wu_Ji____Xian_Dai_Shi_Q)在這些消極暴露的作品中，作家們回到了人們所熟悉的30年代的思想狀態。

戰時現代戲劇的繁榮，在日本占領的上海也能看得出來。禁演美國影片和日本對中國電影業的控制，導致了新劇在商業上的繁榮，足以與傳統戲曲競爭。歷史劇、喜劇以及浪漫的“肥皂劇”（指涉及家庭問題的節目——譯者）廣為流行，部分地由于它們主題安全，只是不惹麻煩的娛樂而已。姚克寫了一部關于晚清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歷史劇《清宮怨》。[[154]](#_154_Jian_Yao_Shen_Nong_Zhu__Jie)此劇構思精巧，曾被譽為里程碑。阿英（錢杏邨）這位從前的左派人物，變成了一位文學史學者，他寫了十幾部劇作，其中《明末遺恨》是他的杰作。錢鐘書夫人楊絳，也許是一位最為精湛的喜劇作家，以《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樹立了她的聲譽。

如愛德華·岡恩所說的那樣，這些劇作大都顯示出一種傳統的傾向，這也是保存中國文化反對日本統治的想法的一種微妙的表現。[[155]](#_155_Zhe_Fen_Guan_Yu_Bei_Ri_Ben)周作人按照傳統的隱士的風格居住在北京，在其散文中巧妙地提出，最能懂得他們自己傳統的文、史、哲學的仍舊是中國人，而不是他們的日本統治者。張愛玲被夏志清譽為現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她在《金鎖記》等故事中把家族制度作為一個中心焦點，來探究傳統對于現代精神的影響。[[156]](#_156_Zhe_Bu_Zhong_Pian_Xiao_Shuo)最后，錢鐘書在《圍城》中以流浪歷險題材的文體，用博學的妙語和尖刻的諷刺解剖了一系列人物。這些人物以“虛榮和欺詐的荒唐心境”，展示了既未掌握傳統文化內核，也未掌握現代文化內核的知識分子的群像。[[157]](#_157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可見有一些最佳的戲劇和小說是在“被占領的”中國創作的。

30年代有責任感的作家中，幾乎沒有人能在他們的創作觀與其所擁護的社會政治目標之間，預見到任何可能的差異。然而在戰爭期間，有幾位杰出的作家，特別是老舍，在為祖國服務的愛國熱忱之下，自愿放棄個人的觀點。結果是日益強調觀眾的重要性，從而戲劇自然地成為最強有力的文學媒介。當個人創作觀變得與指定的集體觀——對后者作者個人也是熱情擁護的——相抵觸時，當中國現代作家不再能像他們從五四時期以來一直做的那樣，聲稱他們對同胞更有感受性和同情——這使他們對社會有更深刻的觀察力——時，個人創作的爭論就成為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了。這種意義上的對個人創作的挑戰，在淪陷區從不存在，在大后方也未被作家們覺察。直至毛澤東于1942年在延安發表有關文藝的講話，這種挑戰才以毛掌握的全部思想力量和政治權勢擺在人們面前，其特定的目的是整頓文藝界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改變文學的定義本身。

## 延安座談會

毛澤東在1942年5月召開的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針對全體共產黨干部的新發動的整風運動的一部分。毛在意識形態上的意圖——改造延安知識分子的思想是明顯的。但毛本身是個知識分子，他對五四時期以來的新的文學趨向也很關心。如他《講話》所展示的那樣，他對30年代早期的文學論爭十分了解，而且可能一直在閱讀左翼文學界撰寫的某些創作，尤其是魯迅的作品。因此，《延安講話》可以理解為毛踏著瞿秋白的足跡，對五四至1942年的中國現代文學所作的新的評價。但在同時，毛對文壇上某些新近的論點當然是清楚的，這些論點需要澄清和解決。

1938年早些時候，在中共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一篇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演說中，毛澤東呼吁黨內同志“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廢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調頭”，并且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作出結論說：“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開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158]](#_158_Yin_Zi_Xia_Zhi_Qing____Zhon)

毛澤東的指示并未特別提到文學，但是它與文學領域的關聯不久即被延安文化委員們——特別是陳伯達、艾思奇和周揚找出。1939—1940年，接著發生關于“民族形式”的論爭擴展到重慶。由爭辯引起的文章充滿混亂的議論，因為沒有人確切知道毛所說的“民族形式”和“國際主義的內容”究何所指；因此激昂而猛烈的抨擊，實際上是在搜索那些關心找出“民族形式”真正源泉的作家們的意圖。主要由林冰代表的一派，認為“民族形式”與人們喜聞樂見的傳統的通俗文藝形式是一回事。繼瞿秋白之后，他們攻擊那種五四新文學是“洋八股”，是城市資產階級的產物，必須予以抵制。然而，敵對陣營中的作家們集合起來衛護“五四革命傳統”，他們認為新文學的主流事實上體現了“民族形式”，或者正在朝這個方面發展。用最能言善辯的發言人胡風的話講，“‘民族形式’本質上是五四的現實主義傳統，在新的情勢下面主動地爭取發展的道路”[[159]](#_159_Wang_Yao____Zhong_Guo_Xin_W)。此外，胡風認為這種新的傳統，是與封建的和倒退的舊傳統的徹底決裂。胡風用一種迂回的馬克思主義意向進行論述，他認為借用外國的東西事實上是可行的。就此而言，胡風向毛暗貶西方的影響，直接提出了挑戰。第三派，主要是黨的委員們和郭沫若，試圖使雙方和解。周揚爭辯說，人們應當吸收傳統藝術形式中的“優良成分”，同時新文學中產生的“新形式”，也應該保留并應進一步發展。然而，總的說來，周揚的論點更加接近于胡風，而不是林冰；因為他總結說，“民族新形式之建立，并不能單純地依靠于舊形式，而主要地還是依靠對于自己民族現實生活的各方面的綿密認真的研究”[[160]](#_160_Wang_Yao____Zhong_Guo_Xin_W)——換句話說，現實主義。

周揚在不偏不倚姿態的背后，含蓄地同意胡風，這證實了胡風作為魯迅的門徒和重慶首屈一指的左翼批評家的威望，周揚經受不起再次與他沖突（像在關于“兩個口號”之爭中所做的那樣）。也有可能，由毛的詞語所引起的爭端，甚至連這些委員自己也幾乎捉摸不透。周揚本人對于蘇聯文學理論頗有了解，他也許把毛的指令解釋為一個進一步大眾化的號召，而不是對五四文學的全力批評。該是毛自己來闡明一切模糊之處的時候了。

周揚表態中不明確的口氣，似乎也表明像他這樣的黨的官僚并不具有對作家發號施令的地位。在發動整風運動以前，延安知識分子們的自我英雄形象未曾遭到非議。有幾個已遷居這一原始的革命圣地的作家，感到那里的生活實際和他們先前的想法相差甚遠。1942年初，王實味率先發難，用魯迅雜文風格寫了一系列文章，并以《野百合花》為題發表在《解放日報》上。丁玲寫了一篇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文章和一個故事《在醫院中》，為延安婦女的命運悲嘆。蕭軍很快跟著對黨的高級干部提出尖銳的批評。[[161]](#_161_Guan_Yu_Yan_An_Chi_Bu_Tong)于是，延安文學界許多知識分子當中的混亂和不滿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爆炸性局面，毛不得不果斷地加以處理。由此導致了1942年5月2日延安座談會的召開。

毛在座談會上發表了兩次演說，引言（在5月2日）和長篇的結論（5月23日）。在引導性的發言中，毛面對大約200名作家和藝術家聽眾，毫不含糊地用下面的話闡明了座談會的宗旨：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 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162]](#_162_Mao_Ze_Dong____Zai_Yan_An_W)

帶著這個講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目的，毛在后面接著抨擊了延安作家所作所為中的一些錯誤傾向。他舉出四個問題，全部指向這些不服管束的作家，“階級立場”、“態度”、“對象”和“學習”。總的主題是十分清楚的。有些延安的“同志們”未能采取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當他們繼續熱衷于“暴露”，而不是“歌頌”新的革命現實的時候，他們沒意識到根據地的根本不同的形勢。他們堅持這一錯誤的道路，因為他們未能認識到他們的對象已經改變了；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換句話講，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在根據地的新接受者，是由“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組成的。為了改變他們的錯誤觀念和行為，作家和藝術家們必須認真投身“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當然，還有毛澤東的理論。

在結論中，毛又回到這些問題，詳細分析了它們的細節，并且在有些情況下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在說明他的觀點時，毛還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個重要遺產——五四的傳統及其在20世紀30年代的延續，進行了含蓄然而是破壞性的批評。

在整風運動中，五四文學的兩個特征——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由肯定的價值變成了否定的價值，因為從毛主義的觀點看來這些浪漫的特色已經走到了最糟糕的極端，自高自大、優越感和全然漠視群眾。愛和人道主義的觀念，是20世紀20年代浪漫氣質的中心，被毛挑出來加以具體地駁斥說：“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里，也只有階級的愛，但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么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徹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至于所謂 ‘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階級消滅后，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丑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么？”[[163]](#_163_Mao_Ze_Dong____Zai_Yan_An_W)

這一類對愛和人道主義的階級分析，曾由魯迅和其他左翼作家在批評梁實秋時提出過。毛澤東將其納入他的《講話》，并把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變為官方的信條。雖然他稱贊30年代左翼反對“資產階級”和“反動”作家的立場，但是他對其成就的評價并不慷慨。在毛看來，即使就其成就的頂點而言（如魯迅的諷刺性雜文和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小說），30年代的文學只不過表達了個別左翼作家的道德上的義憤。它在暴露舊社會的丑惡方面發揮了“批判”作用。在熱烈頌揚體現這種批判精神的魯迅時，毛還論證說——盡管是含蓄地——“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像魯迅這樣的作家們已經起了他們的作用。但是，“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延安新的革命環境中，“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一樣”[[164]](#_164_Tong_Shang_Shu__Di_873Ye)。

事實上，這等于指責魯迅的所有模仿者，不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風格上，并實際宣告魯迅的——以及批判現實主義的——時代已成過去。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開始，必須創造一種新的文學，它將體現與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學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徹底決裂。從本質上說，這種文學應該是屬于人民以及為人民的積極的文學；換句話講，它在內容上應該清楚地以工農兵為中心，而且在有資格教育群眾以前，必須滿足群眾的需要。五四時期以來的優先次序，現在顛倒過來了，原先是作者的個性和想象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并傳遞給逢迎的讀者；而現在是工農兵讀者提供革命文學的主題，并指導作者的創作。

毛澤東決意選一個實用主義的問題，文藝如何為群眾服務——延安座談會上“問題的關鍵”——來系統闡述以接受對象為取向的文藝觀點。毛敦促延安的作家們“采取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并且通過與工農兵大眾同住向他們學習，把他們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除提出這條適用于全體干部的實用主義的建議以外，毛還試圖進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王國。他的“理論上的”論點，是作為一系列相互關聯的矛盾辯證地提出的，普及之于提高、動機之于效果、政治標準之于藝術標準、政治內容之于藝術形式。在要求“政治和藝術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165]](#_165_Mao_Ze_Dong____Zai_Yan_An_W)——這是一個所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會衷心同意的目標——時，毛只講清了這些辯證的極性中政治上的一面，而對美學上的一面則未加說明，大概讓作家和藝術家自己去解決吧。

作為一種新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延安講話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留下更多的空白。可以想象，對如何解釋這個新的正統的準則，以及如何填補它的空白，有相當大的意見分歧。然而，裁決者的角色是由黨的文學方面的官僚們充當的，有創造力的作家對他們的觀點和批評抱反感。正是這些文學方面的官僚——陳伯達、艾思奇，特別是周揚，以執行毛的理論指示的名義實施“文學控制”，并且把“黨的路線”強加給有創造力的作家。這兩個派別之間的分歧，發展為大規模的思想運動和清洗；在運動和清洗中，許多作家——王實味、丁玲、蕭軍、胡風、馮雪峰——成為黨的紀律的受害者。[[166]](#_166_Zhe_Shi_Mo_Er__Ge_De_Man_Bi)

文學方面的官僚們正確地強調了毛澤東《講話》的政治勢頭，因為毛確實認定，在他提出的辯證的極性中政治因素最終支配藝術因素。例如，關于普及之于提高這個重要的問題，毛總結說，“在目前條件下”，前者的“任務更為迫切”。他還重申，“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并說一篇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效果，比作者原來的“動機”更為重要，但嚴格的美學方面的問題卻幾乎沒有觸及。例如，在“民族形式”之爭期間曾激烈辯論過的問題，即現有的傳統民間藝術是否含有過多的“封建”成分，毛對此采取了規避的方法。可能新的內容有待灌輸，但灌到什么樣的“通俗形式”中去呢？那種廣泛采用的“舊瓶裝新酒”的辦法也是成問題的，尤其是應用于京劇這樣的形式時。如何在更加復雜深刻的層次上，區分革命文學與革命宣傳品的文學技巧和文學質量的論點，在延安講話中幾乎沒有分析。也許出于對30年代著重暴露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反感，毛明白表示新的文藝作品，“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167]](#_167_Mao_Ze_Dong____Zai_Yan_An_W)。這個含糊的概括，有點像是蘇維埃“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初步重新陳述。毛事實上把他的這種新文學稱作“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這進一步顯示了他借鑒蘇聯的樣本。

在這方面，毛澤東的重點像蘇聯一樣，當然是放在“社會主義”上，而不是放在“現實主義”上——頌揚典型人物和理想人物，并在一個更高的思想層次上描寫現實。但是，毛似乎否定了他早些時候廢止“洋八股”和“空洞抽象的調頭”的指令。盡管他清楚地受到“黨性”、“意識形態”和“人民性”[[168]](#_168_Xia_Ji_An____Yan_An_Wen_Yi)等大家熟悉的蘇維埃概念的影響，但他并不公開承認這種借鑒，而且也不面對更為迫切的問題，蘇聯模式是否能夠有效地移植到中國的土壤上來。

顯然，毛澤東曾對文學的政治性大加辯護，但是他對較嚴格的文學要旨的探討——尤其是他想形成一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觀的意圖——卻暴露了一個外行者的淺薄。馬克思主義美學中最根本的論點——形式與內容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問題，從未得到深入的探究。毛回避各種文學形式的社會本源的一切討論，集中討論了內容的意義。他這樣做的時候，也把一定的限制強加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主題和題材上了。與工農兵結合規定了范圍有限的主題，如土地改革、與地主所有制斗爭、游擊戰以及工業建設。而毛澤東主義文學官僚們后來貫徹這類要求所采取的那種僵硬的態度，幾乎沒有給作家們留下重新解釋這條準則，或者填補其空白的余地，只是進一步地斫喪了創作的努力，即使是為了創作好的社會主義的文學。

### 延安文學

緊接《講話》之后，延安文學實踐最明顯的特點是當地民間形式和習語的實驗。據陸定一說，毛的《講話》推動了下列新型文藝的出現，按照普及程度排列：（1）民間舞蹈和民間戲曲；（2）“民族”風格的木刻；（3）傳統說書風格的小說和故事；（4）模仿民間歌謠節奏和習語的詩歌。[[169]](#_169___Hei_An_Zhi_Men_____Di_246)它們全都包含民間的成分，而且顯然直接或者間接地投合民眾“視聽”感覺之所好。

這種新的民間文化最好的例證——而且是最風行的——是“秧歌”，一種在“解放區”極其盛行的地方歌舞。這種原本是村民們在陰歷新年期間表演的一種儀式性的舞蹈，它的宣傳上的潛力于是被延安的干部們看中了。據說是一個名叫劉志仁的人通過灌注革命內容，并把它與其他形式的通俗劇結合起來，首先革新了這種民間形式。除秧歌舞以外，還發明了一種“秧歌劇”，它把秧歌的舞步與地方民歌、現代服裝，以及借自京劇的手勢和表情融合到一起。這兩種形式都為群眾的參加提供了機會，而且據報道延安所有的人不久都扭起了秧歌。1943年，發起了一場新的秧歌運動，結果產生了56部新的秧歌劇。[[170]](#_170_Lan_Hai____Zhong_Guo_Kang_Z)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毛女》，這是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的教職員們的集體作品，他們將一個顯然是真實的故事變成了一部“第一流的情節劇”——一個遭受地主家庭剝削和壓迫的婢女逃入荒野，變成了一位幽靈似的白毛仙女。[[171]](#_171_Zhe_Bu_Ju_Zuo_Shou_Bian_Ru)在本劇結尾，女主角被紅軍搭救，并在一個高潮性的群眾大會上向地主討還了血債。自從1944年首次演出以來，《白毛女》深受公眾的稱贊，后來被改編成了京劇、電影和革命芭蕾舞劇。

《白毛女》以及其他秧歌劇的流行，也導致了另一種通俗形式，京劇的改良。一出叫做《逼上梁山》的京劇，是一次成功的嘗試。該劇首演于1943年，取材于毛喜愛的小說《水滸》，情節是一名被官府差人追捕的軍官林沖，最終丟棄了他的前程和家庭，加入了梁山反叛者的行列。這出新京戲的現實意義——因為它顯然指加入延安共產黨部隊的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以及它對歷史上的“人民”的關注，贏得了一位不次于毛主席本人的權威人士的高度贊揚。[[172]](#_172_Dai_Yi_Jian__Yin_____Dang_D)

但是在舊形式中裝新內容的實驗，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京劇的情節充滿了帝王將相；除非編寫全新的劇目，把革命的內容注入這種“封建的”結構之中，往往是不可能的。新的情節配上舊的音樂和表演程式，會創造出一種全然不協調的效果，因而可能使觀眾興趣索然。[[173]](#_173_Zai_60Nian_Dai__Wu_Lun_Shi)民間文化的口頭傳說以書面的形式被采用時，問題還要復雜得多；用傳統的說書風格寫長短篇小說的情況就是如此。老舍在戰爭初期的實驗，在藝術上是災難性的。趙樹理也許是這個時期出現的最有名望的民間小說家了，他在延安以其短篇小說做了類似的嘗試，如《李有才板話》和《小二黑結婚》。前者運用口頭傳統作為故事的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主人公毫不費力地編出板話諷刺當地的事件，暴露腐敗現象和歌頌土地改革。后一故事在對白和敘述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間習語、片語和警句。在這兩個事例中，生動的口頭成分與干巴巴的平鋪直敘顯得很不相稱。在對話部分展示出來的質樸的幽默與健康的諧趣，如果能被演“活”或在舞臺上演出，當然會給觀眾提供很好的娛樂。但是禁錮在一個書面的故事中，它們反而起淡化緊張和懸念的作用，而這是可以通過恰當組織的構想，或仔細描寫的情節來實現的。趙似乎在其小說中搖擺于口頭和書面成分之間，但是他最終回到了后者。[[174]](#_174_Zai_1945Nian_Chu_Ban_De_Zha)

趙樹理的作品被周揚贊為“毛澤東思想在創作實踐上的一個勝利”。除這些作品以外，緊接延安講話之后，幾乎沒有出版什么值得注意的小說，這與秧歌劇和民間歌謠的盛行形成了強烈的對比。[[175]](#_175_Wang_Yao____Zhong_Guo_Xin_W)假如這種現象可以認為是毛澤東意圖的準確反映，那么，延安講話所開辟的新的道路，似乎將會引導中國現代文學擺脫書面程式的束縛，而與廣大接受者重新建立一種直接的“視聽”聯系。這種極端的措施，也許是毛對30年代早期左派關于漢語大眾化和拉丁化一系列爭論的回答。漢字作為唯一不朽的文學媒介（甚至在崇尚古典的舊中國，口頭傳說以后也改寫成文字），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這樣的一種文化中，毛澤東主義的這一趨向，的確會構成一場第二次文學革命。從這個角度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領導革命樣板戲的出現，無疑是毛的文學激進主義的合乎邏輯的延續。

但是毛澤東在廢除書面形式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小說寫作作為左翼一種主要的文學表現模式，是在30年代早期開始的。它的強勁勢頭在1945—1949年這段時期，被有創造力的作家們沿著更加無產階級化的方向向前推進，尤為突出的是丁玲、周立波和歐陽山，他們似乎已經轉向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的中文譯本尋求指導了。如夏志清所說的那樣，“他們以標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式，而不是以回到 ‘民族形式’的方式，歌頌在共產主義下的土地和人民的變化”[[176]](#_176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但是延安講話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因此，結果充其量是有利也有弊。丁玲事件是一個最有啟發性的例證。

丁玲大概是轉變為左派浪漫作家的最好例證了；同時她也是延安最有名望的作家。她的一些較好的故事，如《新的信念》（1939年）和《我在霞村的時候》（1940年），是延安座談會前創作的。[[177]](#_177_Hou_Yi_Pian_Xiao_Shuo_De_Yi)這兩篇故事都描寫了農民對日本侵略的反抗，而丁玲使她筆下的鄉村人物，尤其是后面一個故事的女主角，充滿了成熟的尊嚴和人性，具有30年代左翼小說的最佳傳統。在延安座談會——部分地是為了批判像丁玲這樣的作家才召開的——之后，據說她“卷入了從整風運動中吸取教訓的大潮”[[178]](#_178_Wang_Yao____Zhong_Guo_Xin_W)。她不再寫小說，只寫報道性的作品——她在農村群眾中實地工作的記錄。最后在1949年，她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得以出版，并在1951年贏得了“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

丁玲曾構想用一部三部曲小說來表現土地改革的過程，其中《桑干河上》只寫了最初階段的“斗爭”。第二和第三部分——關于重新分配土地與武裝農民——一直沒有寫出來。這個宏大的計劃，看來可能是丁玲對她獻身于中國共產黨和社會革命事業的最終陳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第一卷的成功導致了她最終遭到清洗，罪名之一是她是“一本書主義”的作者。

《桑干河上》作為一部小說，堪稱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試驗。它展示了一組描述優美的細工鑲嵌的人物群像，它們全都松散地聯系著，為丁玲所熟悉的農村現場帶來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感。在小說的中心位置，丁玲介紹了“正面的男主人公”模范共產黨干部章品，他從彼岸渡河而來，巧妙地使農民協會的機制逐漸運轉起來，最后在群眾斗爭大會上達到了頂點。顯而易見，丁玲打算把她的新長篇寫成一部紀錄體小說，一種在戰爭早期即已流行的新文學體裁。這部小說還打算按照蘇聯的樣子寫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集體地”和“積極地”圍繞現實，使預計的效果會像毛宣稱的那樣，“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然而這部小說的弱點，也恰恰從遵循毛澤東主義的公式中產生。她對農民角色的刻畫顯示了某種感情上的契合，相比之下，她對黨的干部的處理就顯得平淡。而將近結尾處的那個有寓意的群眾大會，少有地缺乏滌蕩心靈的力量。恰恰是小說較為“現實主義的”部分，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部分，再一次抓住了讀者的注意力。

丁玲小說中相對的優缺點，反映出作為延安講話的一個結果，創作的定義本身在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人們熟悉的西方的尺度——夏志清在其對延安遺產的切中要害的總結中，給予高度評價的“想象力，美學感受以及創造性的智力活動”[[179]](#_179_Xia_Ji_An____Hei_An_Zhi_Men)——從毛澤東主義的角度看，已不再那么有決定意義了。因為作家的職能不再是一個創造者或創始者，而是一個人的媒介，廣大對象的經歷通過這個媒介被記錄下來，然后傳回給他們。由于對象的參與在創作文學作品的過程本身中得到鼓勵，書面文本已不再具有權威性，不斷的修改非但不是例外，反而成了規律。首先，意識形態與普及的要求使個人的觀點——無論作為作者個性的伸延，還是作為一種藝術手段——都幾乎不可能存在。一部作品的“文學”性，除正確的政治內容外，按它吸引讀者的程度加以判斷。不同于戰時戲劇，政治與普及的結合對作家具有一種束縛手腳的效果；因為，為了找到正確的“政治內容”，他們必須追隨黨的政策的每一次更動和轉變。毛在將一篇文學作品與特定的政治爭論或運動聯系起來的時候，他也就奪去了這篇作品的一切永恒的藝術上或政治上的價值；使一篇文學作品一時成為話題的那些要素，一旦歷史形勢發生變化，恰恰會減少它的正確性。回過頭來看，丁玲在1949年以后的命運似乎是十分“典型”和不可避免的。伯寧豪森與赫特斯曾指出，“假如要求革命文學單純追隨政治辯證法的發展，它就失去了獨立批判的能力”[[180]](#_180_Yue_Han__Bo_Ning_Hao_Sen_He)。——而且，人們還可以補上一句，失去了其創作的源泉本身。

然而，毛的延安準則的不利影響，在短暫的1945—1949年戰后時期沒有立刻顯露，當時中共領導層十分關注在軍事上戰勝國民黨政權，未能嚴格推行其文學政策。正是在這段時期內，在共產黨統治區以及在新近收復的城市中心，文學創作都達到了另一高度。

## 革命前夕，1945—1949年

八年抗戰終于在1945年結束了，但人們的欣喜和寬慰卻是短暫的。對千百萬返回故土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所面臨的新的現實甚至更加混亂。國民黨政府對突如其來的抗日勝利倉皇失措。腐敗和通貨膨脹變得更為嚴重，取代了建設，這激起了日益增長的不滿。大家熟悉的重慶綜合征——上層的道德敗壞與下層的幻滅，現在擴展到全國。詩人和散文家朱自清總結了1946年人們的普遍心情：

勝利到來的當時，我們喘一口氣，情不自禁的在心頭描畫著三五年后可能實現的一個小康時代……但是勝利的歡呼閃電似的過去了，接著是一陣陣悶雷響著。這個變化太快了，幻滅得太快了。[[181]](#_181_Liu_Xin_Huang____Xian_Dai_Z)

當戰火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部隊之間再次燃起時，大、中學的學生和教師的示威與“絕食罷課”，最為清楚地表達了全國范圍內對和平的渴望。中共又一次巧妙地利用了這一和平愿望，將矛頭引向在遲緩的制憲過程中止步不前的國民黨。在戰爭后期滋長的反政府情緒變得更加強烈。數量日增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把中共看作唯一能夠為他們帶來自由、民主和新中國的政黨。于是，中共在1949年取得軍事勝利的前夕，實際上已掌握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

在這種混亂和騷動的不安氣氛中，文藝界日益落入共產黨的影響之下。當一批批作家和藝術家從內地返回，或者從日本占領下的半隱居狀態重新出現時，東部城市恢復了文藝活動的中心地位。重慶出版的雜志遷到了上海或者北平。新的報刊創刊，老的報刊復刊。書籍用質量較好的紙張重新印刷。“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它匆忙地主持了一系列活動，包括一次大張旗鼓的魯迅逝世十周年（1946年）紀念會，并再版他的全集。

這個重新組建的協會，盡管維持聯合陣線的外表，但顯然受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控制。左翼作家還控制了主要報紙的文藝副刊，有些成為左翼作家的專門論壇（如上海《文匯報》的副刊）；另一些由于左翼作家的名聲，不得不刊登一些左翼作品。“第三種力量”的思想開明的代言人聞一多于1946年7月15日被刺，進一步加強了共產黨的事業。因為人們普遍相信這是國民黨秘密警察的暴行。而少量值得注意的非共產黨小說作品——錢鐘書的《圍城》（1947年）、巴金的《寒夜》（1947年）以及師陀的《結婚》（1947年）的出現，對左翼文壇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它們只是創作整體中“孤立的例子”，完全無力抵擋正在高漲的新的共產黨文學的浪潮。[[182]](#_182_Xia_Zhi_Qing____Zhong_Guo_X)

甚至夏志清，一個公開自稱的反共分子，也特別提到1945—1949年時期是共產黨地區作家，尤其是小說家的高峰創作期。[[183]](#_183_Tong_Shang_Shu__Di_472Ye__J)除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還出現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1949年）、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1949年）和歐陽山的《高乾大》（1946年）等作品。在詩歌方面，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1945年）成功地采用陜北民歌的形式，講述了一個人們所熟悉的地主的暴虐和曲折的愛情故事。繼《白毛女》的成功，另一民間歌劇《劉胡蘭》獲得了好評。[[184]](#_184_Liu_Shou_Song____Zhong_Guo)

與共產黨控制區創作的勃發情況相反，城市文壇在這段時期相對說來較貧瘠。出版的大多數作品是重新發行和重新印刷的流行小說和詩歌。在翻譯領域，引人注目的一大批西方作家——福樓拜、左拉、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契訶夫、易卜生、羅曼·羅蘭、狄更斯和莎士比亞，以及許多其他作家，以多卷叢書的形式介紹給人們。根據報道，這個時期最為流行的西方小說是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隨風而去（Gone with the wind）》，由多才多藝的傅東華以簡潔貼切的《飄》為題譯成中文。[[185]](#_185_Cao_Ju_Ren____Wen_Tan_Wu_Sh)

城市里的主要創作媒介是電影，它在流行程度上取代了戲劇。這兩種體裁曾經有過相濡以沫的密切關系。中國電影業從一開始就使用戲劇界的人才。在戰爭年代，電影從業人員加入了大量的劇團為國家效力。隨著戰爭的結束，戲劇完成了宣傳鼓動的使命；大多數業余劇團都解散了。美國影片（日本占領期間禁映）的涌入，更加促進了電影業的發展。戰后的幾年是中國現代電影的黃金時期。[[186]](#_186_Shang_Wei_Ba_Xian_Dai_Zhong)

這一新體裁在藝術上成功的原因是不難發現的。電影業雇用了文藝界第一流的人才張愛玲、陽翰笙、田漢、歐陽予倩和曹禺，他們寫作原本的影片腳本；另一些戲劇家（如柯靈）是把文學作品改編為電影的專家。戰爭期間寫得最好的一些劇作——尤其是《正氣歌》（寫的是明朝著名的忠臣文天祥）[[187]](#_187_Yuan_Wen_Ru_Ci__Ying_Wei_Na)和《清宮怨》——都拍成了精彩的電影。小說作品是改編的另一豐富源泉。在有些情況下，如老舍的中篇小說《我這一輩子》，電影劇本甚至超過了原著。為了促進這一新的藝術形式的發展，田漢與洪深充當了上海兩家主要報紙《大公報》和《新聞報》的電影特刊的編輯；最后，劉瓊、石揮、白楊及胡蝶（他們當中大多數人最初在劇團里得到鍛煉）的演技，也達到了微妙老練的高超境地。

這一新的類型的文學性和戲劇性都優于純電影。一部影片的質量往往更多地取決于它的腳本和演技，而不是視覺技術（攝影技巧、燈光、剪輯、蒙太奇等等）。因此，電影可以看作戲劇文學的創造性的延伸。電影媒介不僅從文學借用一些人員，而且從文學借用其典型的“擺脫不了的情思”。其一是戰后的混亂。來自重慶的所謂“接收大員”們專橫和不正當的行徑——他們以國民黨政府的名義，沒收以前與日本人的合作者的財產以飽私囊——在袁俊（張駿祥）執導的《還鄉日記》中遭到了辛辣的批評。許多制片人專注于中國城市里的貧富懸殊。《假鳳虛凰》是這個時期最為流行的影片之一，它以一種輕快、調侃的筆調，講述了一個貧窮的理發匠如何裝扮成一個富家子弟，追求一個同樣貧窮卻假裝富有的女人的故事。另一部有名的影片《夜店》是根據高爾基的《底層》改編的，但是場景變成了上海的貧民窟。這個時期的影片中彌漫著一種不可抗拒的人道主義，它不僅深深地感動了觀眾，而且促使他們汲取政治信息；在一個為不平現象所折磨而沒有正義的社會中，殘余的人性內核沒有例外地總是體現在下層人民身上。

該做些什么呢？比較溫和的影片倡導教育（像在《哀樂中年》里那樣）。但是激進的影片大聲疾呼，號召采取集體行動；在一部這樣的影片結尾，全城的人力車夫行動起來搭救落難的主人公。如果電影能夠真實地顯示社會情緒，解決方法看來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過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進行改革，或者被壓迫者為“翻身”成為自己的主人而進行完全的革命。單純出于絕望，愈來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還有許許多多他們的觀眾——選擇了后者。簡短地講，這個時期較好的影片，在傳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藝術體裁。電影作為能接觸最多城市觀眾的普及媒介，證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結合了中國現代小說和戲劇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面，它比小說更“生動”，比戲劇更靈活。毛澤東從未對這一新媒介的政治潛力多加注意，顯然這是因為電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農村。但是作為最近的城市藝術形式，它向人們提供了一些歷史教益。

城市—鄉村兩叉分支現象，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突出特點。從晚清開始，中國現代文學就滋長在城市環境之中。當它在“五四”期間發展成為“新文學”的時候，它也隨之成為城市知識階層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對社會深感不滿的情緒，引導他們越過城墻注視著鄉村。鄉土文學與地區文學，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藝術產品，于是成為20世紀30年代的主要創作形式。但是這段時期寫作的最好的詩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堅定的左翼作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為城市頹廢的標志。

然而，左翼作家們自己就是城市的產物。20年代晚期與30年代早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也許是響應以城市為基地的中國共產黨，把他們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無產階級身上，他們思想立場的虛偽性，結果卻被魯迅所揭露。當魯迅參與政治并與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時，他們的活動和見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顯的。但是魯迅把城市環境視為黑暗勢力的真正堡壘——腐化、墮落以及由國民黨“白色恐怖”造成的壓抑氣氛。魯迅生活其中，他擔負起革命“后衛”的責任，向黑暗勢力作殊死搏斗，而對自己的勝利不抱幻想。

魯迅從未宣稱了解中國農村。盡管他對長征熱情，但由于不了解鄉村舞臺，他拒絕寫有關長征的小說。[[188]](#_188_Feng_Xue_Feng____Hui_Yi_Lu)甚至他早期的小說，也并未顯露他與筆下的鄉村人物多么親近（像大多數他的崇拜者曾爭辯的那樣）；相反，這些小說顯露了他對城市知識分子被疏遠的同情。此外，紹興的農村對魯迅來說是傳統世界的一部分——一座應該砸爛的文化落后的“監牢”（盡管他預見不到這樣的可能性）。

隨著1936年魯迅的逝世與1937年戰爭的爆發，中國現代文學進入了農村階段。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種農村氛圍，而愛國的時代精神引導大多數作家去親近鄉村的群眾。這種民粹主義，加上對文學大眾化的反復要求，為毛澤東在延安的文藝理論提供了合乎邏輯的背景。在這條新的準則的三個中心主體中，是農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從延安作家那里受到主要的一份創作注意，正如農民階級構成毛本人的革命戰略的支柱。

1942年延安座談會后，甚至在50年代蘇聯影響的高潮期，農民文學都遠比關于產業工人的小說輝煌。像張愛玲的小說、錢鐘書的《圍城》，或楊絳的老練的喜劇這樣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電影與共產黨文學的農村取向是背道而馳的。電影作為30年代文學的一種通俗形式，它表達不滿情緒，表達暴露社會現實而不是歌頌社會現實的難以抗拒的精神。現代中國的文學創作，是在最困難的時代繁榮起來的：清朝最后10年，軍閥混戰時期，將與日本開戰的年代，以及共產黨革命最終勝利的前夜。如魯迅曾經說過的那樣，文學從來不會滿足于現狀，而政治則總是尋求保持現狀。[[189]](#_189___Lu_Xun_Quan_Ji____Di_7Jua)但是毛對政治的重新定義（要求變革的革命意識形態）和對文學的重新定義（一種革命的武器），意味著在革命后的形勢下，只能有歌功頌德的作品，而不滿則不再是文學創作的動機。毛澤東主義的準則認定文學與政治的匯合，而不是它們之間本質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澤東主義式的新中國里，城鄉之間的矛盾——不論是作為事實還是作為觀念——從不存在。共產黨革命的勝利，剝奪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城市成分。隨著城市“心態”的喪失，中國現代文學也喪失了它那主觀的熱忱，它那個人主義的視角，它那有創造力的焦慮，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雖然它依靠農村的主流達到了名副其實普及的廣度，并取得了更加“積極”的特點。“擺脫不了的中國情”被頌揚祖國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集體主義道德觀中，夏志清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道義責任”[[190]](#_190_Xia_Zhi_Qing____Bai_Tuo_Bu)正在消失。

[[1]](#_1_8)關于五卅事件，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第11章。

[[2]](#_2_8)張畢來：《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幾個作者的文學主張》，載李何林等：《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第36—49頁。

[[3]](#_3_8)《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第214—216頁。

[[4]](#_4_8)同上書，第222—224頁。

[[5]](#_5_8)《魯迅全集》第3卷，第313頁。

[[6]](#_6_8)李何林等：《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第61—62頁；阿米滕拉納特·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年》，第86—94頁。

[[7]](#_7_8)《魯迅全集》第4卷，第70—71頁。

[[8]](#_8_8)李何林編：《中國文藝論戰》，第412頁。

[[9]](#_9_8)同上書，第379頁。這篇文章由陳雨石（音）譯成英文，見約翰·伯寧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編：《中國革命文學：選集》，第37—44頁。編者還提供一篇透徹的緒論。

[[10]](#_10_8)關于魯迅文學觀和革命觀的改變，見李歐梵：《革命前夕的文學：對魯迅左翼時期的看法，1927—1936年》，《現代中國》第2卷第3期（1976年6月），第277—291頁。

[[11]](#_11_8)戴乃迭編譯：《無聲的中國：魯迅著作選》，第176頁。

[[12]](#_12_8)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485頁。

[[13]](#_13_8)根據官方史料，早在1928年末，中共江蘇省委曾派夏衍、李初梨和馮乃超與魯迅聯系，計劃組織統一戰線。見《左聯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第353頁。參加左聯成立大會的盟員名單收入《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一輯，第155—157頁。

[[14]](#_14_8)哈里特·C.米爾斯：《魯迅：1927—1936年，在左翼的年代》，第139頁。

[[15]](#_15_8)丁易：《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動政治的斗爭》，載張靜廬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第2卷，第42頁。

[[16]](#_16_8)《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第290—291頁。

[[17]](#_17_7)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第1卷，第214—215頁。

[[18]](#_18_8)關于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的排他主義立場，見愛德華·J.布朗：《革命后的俄國文學》，第112—113頁。

[[19]](#_19_8)各種論戰文章收編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第359—412頁。

[[20]](#_20_8)侯建：《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第162頁。

[[21]](#_21_8)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年），美國評論家、教師、“新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運動的領袖。——譯者

[[22]](#_22_8)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年），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優秀詩人、評論家。——譯者

[[23]](#_23_8)薩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英國詩人、評論家、散文家和辭典編寫者。——譯者

[[24]](#_24_8)F.利維斯（F.Leavis，1895—1978年），英國文學和社會評論家。——譯者

[[25]](#_25_8)埃德蒙德·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1972年），美國文藝評論家和散文作家，生前被公認為當時美國第一流文學家。——譯者

[[26]](#_26_8)侯建：《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第167—168頁。

[[27]](#_27_8)《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第394頁。

[[28]](#_28_8)泰納（H.A.Taine，1828—1893年），19世紀法國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是一個有名的思想家、文藝評論家及歷史學家。——譯者

[[29]](#_29_8)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513—515頁。又見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第61頁。

[[30]](#_30_8)沃隆斯基：（Aleksandr Konstantinovich Voronsky，1884—1943年），俄羅斯文學評論家、作家。——譯者

[[31]](#_31_8)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20頁。關于胡秋原重申本人論辯要點，見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539—564頁。

[[32]](#_32_8)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189—191頁。

[[33]](#_33_8)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85頁。

[[34]](#_34_8)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550頁。

[[35]](#_35_8)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333—334頁。

[[36]](#_36_8)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第287頁。

[[37]](#_37_8)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549頁。

[[38]](#_38_8)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研究，見保羅·皮茨科維奇：《瞿秋白與中國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大眾文學藝術觀》，《中國季刊》第70期（1977年6月），第296—314頁。又見同作者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瞿秋白的影響》，第9章。

[[39]](#_39_8)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360—361頁。

[[40]](#_40_8)同上書，第362—363頁。

[[41]](#_41_8)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年》，第160頁。

[[42]](#_42_8)關于這事全部情節的卓越分析，見夏濟安：《魯迅與左聯的解散》，載其《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101—145頁。

[[43]](#_43_8)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463頁。

[[44]](#_44_8)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年》，第114頁。

[[45]](#_45_8)周揚：《關于國防文學》，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第36—37、81頁。

[[46]](#_46_8)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第311—312頁。

[[47]](#_47_8)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129頁。

[[48]](#_48_8)同上。

[[49]](#_49_8)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第74頁。

[[50]](#_50_8)同上書，第334—349頁。

[[51]](#_51_7)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第315、342頁。

[[52]](#_52_7)《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第567—575頁。

[[53]](#_53_7)《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第561—564頁。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125頁。

[[54]](#_54_7)這部小說出版后五個月內印刷六次。見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年》，第71—72頁。關于蔣光慈生平和著作的分析，見夏濟安：《蔣光慈現象》，載其《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55—100頁。

[[55]](#_55_7)馮雪峰：《回憶魯迅》，第23頁。

[[56]](#_56_7)關于魯迅雜文藝術的詳細分析，見戴維·E.波拉德：《魯迅的雜文》。

[[57]](#_57_7)關于周作人小品文的分析，見戴維·E.波拉德：《一種中國文學風格：與傳統有關的周作人的文學價值觀》。

[[58]](#_58_7)《魯迅全集》第4卷，第443頁。

[[59]](#_59_7)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版，第141頁。

[[60]](#_60_7)關于茅盾早期小說的分析，見默爾·戈德曼編：《五四時代中國現代文學》，第233—280、385—406頁；陳雨石（音）、約翰·伯寧豪森和西里爾·伯奇的文章。

[[61]](#_61_7)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153頁。

[[62]](#_62_7)同上。

[[63]](#_63_6)埃文·金（羅伯特·沃德）的《駱駝祥子》英譯本以《人力車夫》的書名出版，在美國成為暢銷書。但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劇結尾”塞進小說。最近的兩種英譯本保持原作的悲劇結尾，見讓·M.詹姆斯譯《人力車》和石小青（音）譯《駱駝祥子》。

[[64]](#_64_5)引自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1卷，第232—233頁。

[[65]](#_65_6)關于老舍的研究，見西里爾·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國季刊》第8期（1961年10一12月），第45—62頁；茲比格涅夫·斯盧普斯基：《一個中國現代作家的發展》；蘭比爾·沃赫拉：《老舍與中國革命》；胡金銓：《老舍和他的作品》。

[[66]](#_66_6)關于巴金的研究，見奧爾加·蘭：《巴金和他的作品：兩次革命之間的中國青年》。《家》出版以來曾印刷23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第202頁）。又見西德尼·夏皮羅譯的《家》的英譯本。

[[67]](#_67_6)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23頁。

[[68]](#_68_6)張天翼的這部小說，連同吳組湘的小說《樊家鋪》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編：《20世紀中國小說》。

[[69]](#_69_6)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82—283頁。

[[70]](#_70_6)關于1919—1949年吳組湘的小說和其他許多作品的英譯文，見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年》。

[[71]](#_71_6)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286頁。

[[72]](#_72_6)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第201頁。

[[73]](#_73_6)關于沈從文對湘西看法的詳細研究，見杰弗里·C.金克利：《沈從文對中華民國的幻想》（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7年）。

[[74]](#_74_6)田軍（蕭軍）：《八月的鄉村》，由埃文·金譯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諾的序言。關于蕭軍的研究，見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章。

[[75]](#_75_6)引自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8頁。

[[76]](#_76_6)關于這部小說的英譯本，見蕭紅著，葛浩文等譯：《中國東北的兩部小說：〈生死場〉和〈呼蘭河傳〉》。關于蕭紅的研究，見葛浩文：《蕭紅》。

[[77]](#_77_6)夏志清教授從事戰爭小說的全面研究，有兩篇論端木蕻良的論文已經完成。

[[78]](#_78_6)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說》，第56—61頁。

[[79]](#_79_6)朱莉亞·C.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第1章。

[[80]](#_80_6)關于徐志摩借鑒英詩的分析，見西里爾·伯奇：《徐志摩詩的英中韻律》，《大亞細亞》新8卷第2期（1961年），第258—293頁。

[[81]](#_81_6)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18、19世紀之交英國浪漫主義運動最偉大和最有影響的詩人。——譯者

[[82]](#_82_6)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英國詩人、哲學家、改革家和散文作家。——譯者

[[83]](#_83_6)濟慈（John Keats，1795—1821年），英國詩人、也是 19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譯者

[[84]](#_84_6)這首由許芥昱譯成英文的詩載他譯編的《20世紀中國詩集》，第65—66頁。

[[85]](#_85_6)朱莉婭·C.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第82頁。

[[86]](#_86_6)關于聞一多生平和詩的研究，見許芥昱：《聞一多》和《新詩的開路人 ——聞一多》。

[[87]](#_87_6)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分析，見本書上卷李歐梵著《文學潮流（一）：追求現代性（1895—1927年）》章“外國文學的影響”節。

[[88]](#_88_6)見詩人痖弦訪問李金發記《創世記》第30期（1975年1月），第5頁。又見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687—688頁。

[[89]](#_89_6)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Iaire，1821—1867年），法國現代派詩人。——譯者

[[90]](#_90_6)魏爾蘭（Paul Verlaine，1844—1896年），法國最純粹抒情詩人之一。——譯者

[[91]](#_91_6)馬拉梅（Stéphene Mallarmé，1842—1898年）法國象征派詩人。——譯者

[[92]](#_92_6)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1卷，第201頁。

[[93]](#_93_6)朱莉婭·C.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第153頁。

[[94]](#_94_6)引自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1卷，第200頁。

[[95]](#_95_6)這首英譯詩引自朱莉婭·C.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第165—166頁。關于戴望舒詩集，見痖弦編：《戴望舒卷》。

[[96]](#_96_6)朱莉婭·C.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第166頁。

[[97]](#_97_6)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1卷，第201頁。然而，自1981年以來，戴望舒的地位得到重新評價，他的作品在中國重新出版。

[[98]](#_98_5)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年），愛爾蘭詩人、劇作家。——譯者

[[99]](#_99_5)奧登（W.H.Auden，1907—1973年），美籍英國詩人。——譯者

[[100]](#_100_5)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年），英國詩人。——譯者

[[101]](#_101_5)這個詞是由劉西渭用英文造的，引自張曼儀等編：《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年》第1卷，第709頁。

[[102]](#_102_5)邦妮·S.麥克杜格爾譯編：《夢中的路：何其芳詩文選》，第223—224頁。

[[103]](#_103_5)同上書，第228頁。

[[104]](#_104_5)邦妮·S.麥克杜格爾譯編：《夢中的路：何其芳詩文選》，第126頁。

[[105]](#_105_5)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年），俄國第一流的浪漫派詩人、小說家。——譯者

[[106]](#_106_5)邦妮·S.麥克杜格爾譯編：《夢中的路：何其芳詩文選》，第169頁。

[[107]](#_107_5)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1卷，第208—209頁；許芥昱：《20世紀中國詩集》，第277頁。

[[108]](#_108_5)然而，這種現代派傳統已經重新流行，如今在臺灣和中國城市以“朦朧詩”面目興旺起來。

[[109]](#_109_5)《湯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長篇小說，林紓在1901年把它譯為中文。譯名為《黑奴吁天錄》，以后春柳社的歐陽予倩把它改編成話劇《黑奴恨》上演。——譯者

[[110]](#_110_5)胡耀恒：《曹禺》，第16頁。

[[111]](#_111_5)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挪威戲劇家。——譯者

[[112]](#_112_5)田漢、歐陽予倩等：《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第1集，第151頁。

[[113]](#_113_5)胡耀恒：《曹禹》，第21—22頁。

[[114]](#_114_5)劉紹銘：《曹禺：契訶夫和奧尼爾的不情愿的追隨者，文學影響研究》，第6頁。

[[115]](#_115_5)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年），法國唯一理解真正的悲劇色彩的劇作家。——譯者

[[116]](#_116_5)奧尼爾（Eugene O’Neill，1888—1953年），美國戲劇家。——譯者

[[117]](#_117_5)劉紹銘：《曹禺：契訶夫和奧尼爾的不情愿的追隨者，文學影響研究》，第10頁。

[[118]](#_118_5)這句話的英譯文引白胡耀恒：《曹禺》，第54頁。

[[119]](#_119_5)由于內容狂放，這一幕在演出時往往被刪去，很使曹禺懊惱。

[[120]](#_120_5)劉紹銘：《曹禺：契訶夫和奧尼爾的不情愿的追隨者，文學影響研究》，第6頁；胡耀恒：《曹禺》，第24頁。

[[121]](#_121_5)《日出》劇本中對陳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確的交代。——譯者

[[122]](#_122_5)曹禺：《日出》，第236頁。關于曹禺劇作的英譯本，見A.C.巴恩斯譯的《雷雨》和《日出》，克里斯托弗·C.蘭德和劉紹銘譯的《原野》。

[[123]](#_123_5)上海系1937年11月13日淪陷。——譯者

[[124]](#_124_5)老舍曾任“文協”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但無“會長”的頭銜。——譯者

[[125]](#_125_5)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51—52頁。

[[126]](#_126_5)同上書，第47頁。又見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748頁。

[[127]](#_127_5)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756頁。

[[128]](#_128_5)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40頁。

[[129]](#_129_5)武漢和廣州都是1938年10月淪陷的。——譯者

[[130]](#_130_5)王際真編：《中國戰時小說集》V。

[[131]](#_131_5)即第二次國共合作。——譯者

[[132]](#_132_5)抗戰時期，除云南省外，任何地方均不得發行地方貨幣，只有中央銀行發行貨幣流通全國。——譯者

[[133]](#_133_5)劉以鬯：《從抗戰時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會對作家的責任》，《明報月刊》第13卷第6期（1978年6月），第58—61頁。

[[134]](#_134_5)王際真編：《中國戰時小說集》Ⅵ。

[[135]](#_135_4)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60—61頁。

[[136]](#_136_4)《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2卷，第279頁。

[[137]](#_137_4)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62頁。

[[138]](#_138_4)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68—73頁。

[[139]](#_139_3)朱莉婭·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第171頁。

[[140]](#_140_3)《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第631、638頁。

[[141]](#_141_3)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43頁。

[[142]](#_142_3)胡風：《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第53—55頁。

[[143]](#_143_3)《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1卷，第670—671頁。

[[144]](#_144_3)《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691—695頁。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第2卷，第63—64頁。

[[145]](#_145_3)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17頁。

[[146]](#_146_3)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2卷，第87頁。日本學者尾坂德司也很稱贊這部小說的創作技巧；見尾坂德司：《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第2卷，第245—247頁。

[[147]](#_147_3)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86頁。

[[148]](#_148_3)同上書，第369頁。

[[149]](#_149_3)張曼儀等編：《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年》第2卷，第912頁。

[[150]](#_150_3)這首英譯詩引自朱莉婭·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第191—192頁。

[[151]](#_151_3)柳無忌：《現代時期》，翟理思編：《中國文學史》，第479—480頁。

[[152]](#_152_3)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20頁。

[[153]](#_153_2)柳無忌：《現代時期》，第481頁。

[[154]](#_154_2)見姚莘農著，杰里米·英戈爾斯譯：《清宮怨》。

[[155]](#_155_2)這份關于被日本占領的上海戰時戲劇的資料完全取自愛德華·岡恩的開拓性研究。見岡恩《不受歡迎的繆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和岡恩的研究論文《日本占領時期的中國作家（1937—1945年）》。

[[156]](#_156_2)這部中篇小說收入夏志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第138—191頁；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第530—559頁。

[[157]](#_157_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445頁。

[[158]](#_158_2)引自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301—302頁。

[[159]](#_159_2)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2卷，第26頁。

[[160]](#_160_1)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2卷，第23頁。又見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第104頁。

[[161]](#_161_1)關于延安持不同意見作家的分析，見默爾·戈德曼編：《共產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第2章。

[[162]](#_162_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0頁。

[[163]](#_163_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4、872頁。

[[164]](#_164_1)同上書，第873頁。

[[165]](#_165_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1頁。

[[166]](#_166_1)這是默爾·戈德曼編《共產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的主題，特別見第1—8章。

[[167]](#_167_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3頁。

[[168]](#_168_1)夏濟安：《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的20年》，載其《黑暗之門》，第255頁。

[[169]](#_169_1)《黑暗之門》，第246頁。關于延安文學各種形式的詳細分析，見菊地三郎：《中國現代文學史》第2卷，第2—5章。又見丁淼：《評中共文藝代表作》。

[[170]](#_170_1)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第77—78頁；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第2卷，第24頁。

[[171]](#_171_1)這部劇作收編入沃爾特·梅澤夫和魯思·梅澤夫編：《共產主義中國的現代戲劇》，第105—180頁。

[[172]](#_172_1)戴意堅（音）：《當代中國戲劇和蘇聯的影響》（南伊利諾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4年），第96—97頁。

[[173]](#_173_1)在60年代，無論什么形式或內容的京劇都被江青的“革命京劇”完全排斥。然而“文化大革命”后，舊劇種（包括京劇）得到恢復。

[[174]](#_174_1)在1945年出版的趙樹理短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中，口頭成分大多被刪去。然而，夏志清認為這部小說仍是“他的作品中最可讀的一部”。見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483頁。

[[175]](#_175_1)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2卷，第123頁。關于延安時期（文藝座談會以前和以后）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選集，見丁玲等：《解放區短篇創作》。在詩歌方面，除民歌外，創作量更少。何其芳停止寫詩去寫報告文學作品。見麥克杜格爾譯編：《夢中的路：何其芳詩文選》，第173頁。

[[176]](#_176_1)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472—473頁。

[[177]](#_177_1)后一篇小說的英譯文見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第268—278頁。

[[178]](#_178_1)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第2卷，第123頁，關于丁玲寫作的全面分析，見梅儀慈：《丁玲的小說——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和敘事》。

[[179]](#_179_1)夏濟安：《黑暗之門》，第168頁。

[[180]](#_180_1)約翰·伯寧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編：《中國革命文學：選集》，第10頁。

[[181]](#_181_1)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767頁所引。

[[182]](#_182_1)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第501頁。

[[183]](#_183_1)同上書，第472頁，菊地三郎論述南北極格局中共產黨文藝和非共產黨文藝的消長。因此戰后年代看到“北方文藝”（延安）的勝利和“南方文藝”（重慶和上海）的失敗。見菊地三郎：《中國現代文學史》第2卷，第3、4部分。

[[184]](#_184_1)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第2卷，第262—264頁。

[[185]](#_185_1)曹聚仁：《文壇五十年續集》，第126頁。

[[186]](#_186_1)尚未把現代中國電影作為藝術和作為社會史進行認真研究。只有過一部英文研究專著，杰伊·萊達：《電影：中國電影和電影觀眾記事》，特別見第6章。關于中文資料，見程季華等：《中國電影發展史》第2卷，第213—214頁。這部兩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國電影的內容包羅最廣的著作。1908—1949年中國電影目錄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羅威茨為舊金山中華文化基金會資助的中國電影項目編成。

[[187]](#_187_1)原文如此，應為南宋。——譯者

[[188]](#_188_1)馮雪峰：《回憶魯迅》，第93—94頁。

[[189]](#_189_1)《魯迅全集》第7卷，第470—471頁。又見李歐梵：《革命前夕的文學：對魯迅左翼時期的看法，1927—1936年》，第278—286頁。

[[190]](#_190_1)夏志清：《擺脫不了的中國情：中國現代文學道義上的責任》，載其《中國現代小說史》，第533—561頁。

# 第十章 日本入侵與中國的國際地位，1931—1949年

從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是一個無助的遭受侵略的國家，很少得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它作為戰勝的全球聯盟的一名成員國而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贏得了世界強國的地位。但由于內戰，它的地位受到了損害。要稍稍詳細地追溯這一發展，需要了解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之間的密切聯系、當時的中國與有可能出現的中國之間的密切關系。

## 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的邊緣地位

研究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事務，必須從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入手。這次危機主要殃及先進工業國家，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竭盡一切努力以重建貿易、投資及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戰前模式的國際秩序。20世紀20年代的重大歷史事件——美、英等國恢復與戰前等價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貨膨脹螺旋上升；協商解決債務和賠償問題——與中國幾乎沒有什么關系。中國貿易從來沒有超出國際貿易總額的一個很小份額，而外國在中國的投資，與在日本或在歐洲國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為戰后國際經濟體系主要支柱的美國，沒有擴大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美國商品和資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別在德國和日本。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20年代世界經濟舞臺上無足輕重的中國，卻安然度過了那場全球性經濟蕭條的災難。作為一個農業占壓倒優勢和以白銀作為法定貨幣經濟的國家，中國起初沒有受到工業國家間危機的影響。物價的急速波動、長期的失業以及低增長率在中國并不新鮮；然而像擠兌黃金、匯兌不穩定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工廠工人失業之類的資本主義困難所造成的具有破壞性的沖擊，并沒有在中國出現。當美、英和其他工業國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種補救辦法和應急措施以應付危機時，中國在1929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堅持下去。外貿量在1929—1930年之間保持穩定，而在1930—1931年之間則增長20%以上，1929年，新的關稅稅則[[1]](#_1_1929Nian_2Yue_1Ri__Shi_Xing)生效——這是國民政府采取斷然外交政策的產物——海關稅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30年后改以黃金代替白銀征收進口稅，使政府從國際市場銀價波動的影響中解救出來。盡管實際上銀價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應是減少了中國的長期逆差，并使中國對外國投資者更具吸引力。在工業國家正經歷嚴峻的苦難時，上述種種導致了相對的穩定感。[[2]](#_2_Guan_Yu_Shi_Jie_Jing_Ji_Wei_J)

對歐洲列強來說，國內穩定是由1925年洛迦諾公約[[3]](#_3___Luo_Jia_Nuo_Gong_Yue____Ji)產生的國際合作的框架維持的，1929年后開始瓦解。德國改革派[[4]](#_4_Di_Yi_Ci_Shi_Jie_Da_Zhan_De_G)從左右兩個方面重新對戰后條約結構進行攻擊，要求徹底與外部事務脫離。這些人聲稱現在德國必須大膽地設計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國際合作。在正常情況下，德國的這種傾向會引起英、法和其他國家竭盡全力維護戰后國際主義[[5]](#_5_Zhe_Li_De_Guo_Ji_Zhu_Yi__Shi)的框架，并通過密切磋商和國際聯盟處理出現的危機。非常不幸，國際合作曾被視為與1929年后面臨嚴重危機的經濟關系體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歐洲各改革派團體間喪失信用。國際主義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領導層的觀點。[[6]](#_6_Cha_Er_Si__Mei_Er____Gai_Zao)

日本的情形與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經濟的領導層也曾限定該國的外部事務按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之間的合作方式來處理。他們對這種方式的忠誠使政府遲至1930年才采取步驟——證明是不明智的——恢復與戰前等價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幾個采取這一步驟的國家之一，而在1930年正受全球性蕭條沖擊的事實，使政治領域對現狀不滿的兩個極端的團體都不喜歡政府。因為美國曾經是戰后日本經濟和外交關系的支柱，所以國內危機明顯受外交的牽連。遲至1929年，鶴見祐輔這位有頭腦的戰后日本國際主義的代言人還寫道，美國時代即將來臨，那時美國的價值觀，觀念以及商品將成為全世界的模式。[[7]](#_7_He_Jian_You_Fu____Tai_Ping_Ya)但正是這種觀點在經濟危機爆發后受到了攻擊。當美國正在經歷嚴重的經濟困難，它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正在動搖時，日本政府、商業和學術界的領導人似乎過于傾向美國。左右兩派的評論家不斷提高他們的調門，反對這一現狀。1930年11月首相濱口雄幸在東京火車站遇刺身亡，顯示出他們也會采用暴力。四個月后，下級陸軍官中的一個陰謀被揭露，這個陰謀籌劃一次政變，以摧毀政黨政府，代之以軍事獨裁。

正當德、日兩國國內力量如此反對戰后國際合作體系，并削弱那些支持該體系的人們的力量時，中國的政治卻正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十幾年里，至少在名義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國性的政府。因為有些集團和黨派不愿服從南京政府，所以反蔣情緒強烈。盡管如此，南京政府因在修改不平等條約方面贏得了列強明顯的讓步并奠定了國家建設的基礎，享有聲望和地位。盡管軍閥、國民黨反對派、共產黨人及其他人士繼續阻撓蔣介石及其政權，但是應當指出，并沒有嚴格界線區分這些人是當權者還是非當權者。蔣介石能達成臨時協議獲取一些潛在對手的合作，而不少曾為其他政權工作的官員和將軍愿意加入新政府。[[8]](#_8_Yi_Lao_Yi____Yao_Zhe_De_Ge_Mi)

上述兩種因素——中國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相對的無足輕重與其國內日益統一——提供了1931年后國家困擾的背景。在滿洲事件前夕，蔣介石的權威，在經歷了來自某些軍閥和國民黨反對派的嚴重挑戰后，穩步擴大。在經濟上，中國的財政比很多工業國家好得多。由于銀價下跌，貿易收入確實開始下降。但是這有在短時期內增強工商業活力的效果。毫無疑問，沒有什么能敵得上正在影響工業強國間國際貨幣和貿易的混亂。中國肯定需要海外貸款和投資，但可以預料，這場經濟危機將在長時期內使得從國外借款變得困難。不過，中國可以指望重新獲得對外國企業的控制，并通過對關稅、國內稅、貨幣以及管理系統的改革，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著手十分需要的建設項目。由于所有這些原因，中國的領導、官員和政論家在20世紀第四個十年初展望國際事務時，抱有樂觀和堅定的信念。

恰恰相反的感覺、期望和設想導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國的行動。按日本改革派——陸軍軍官、右翼反對派、某些知識分子以及通常對領導不滿的人——的觀點，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團結和強大，而日本卻在無望地摸索走出國內困境的道路。有了這樣的感覺，沈陽事件[[9]](#_9_Chen_Yang_Shi_Jian_Ji__Jiu_Yi)的設計師們——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得出的結論是簡單而直截了當的。他們應排斥國際主義作為國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礎。他們也應摒除中國以足以威脅日本權利和利益的統一強國出現的可能性。不論怎樣，國際主義似乎正在整個世界消失，而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努力維護它的主權。如果日本要繼續作為一個能生存下去的國家，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似乎就是大膽地將中國置于日本的徹底控制之下。

為建立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是否有一個系統的計劃——一個在1945年后審問戰犯時所說的“陰謀”——是難說的。的確，如果日本人——無論軍人還是老百姓——沒有把國家的命運與某種程度的控制中國聯系在一起，就不會出現滿洲危機。這一過程開始于19世紀末，而日本的幾代人逐漸認為這種控制是必要的。然而這種支配勢力有許多因素。一個是軍事和戰略的，與日本的實力與其他強國實力的對比有關。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自己有權利成為一個軍事強國，而在于它可能成為日本面臨的潛在敵人，特別是俄國的一個基地。第二個是地理和經濟的，反映了一個缺乏自然資源和完全依賴外貿的國家的生存條件。很簡單，中國曾經是大豆、鐵、棉花和其他貨物的主要供應者，同時還是占日本出口總量1/5到1/4的市場。第三個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認為，作為一個曾成功地進行自我變革并結束了西方支配的亞洲國家，日本有義務，甚至有權利，來領導其鄰國，特別是中國，走向類似的變革道路。最后，也許比上述因素更為重要，是國內因素：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國內與國外事務之間的聯系，要求強硬的外交政策只不過是重新調整國內社會和政治優先事項的運動的反映。

改革派的進攻采取要求國內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關系中推行新政策。在1931年9月的沈陽事件之前出現的陰謀、暗殺和武裝政變的企圖不是偶然的。這是將結束商業、官僚和“自由”知識分子統治的國內改造運動的對外對應物。然而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業化前的過去。除少數幾個“平均地權論”的鼓吹者外，那些陰謀家和他們的支持者認識到經濟增長的需要。事實上，他們的想法是利用滿洲的空間和資源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提高農業產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陽事件前夕，在滿洲的23萬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經濟衰敗的象征，也是日本經濟希望的象征。在陰謀家們的眼里，他們也體現了國家領導層的失誤，后者似乎忽視了在滿洲的同胞們的利益。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滿足，不關心他們的處境，只想到國內的穩定和秩序是國際秩序的前提。[[10]](#_10_Ru_Jiang_Zhao____Di_Guo_Zhu)

然而，當滿洲的日本人發現自己正在成為被喚醒的中國愛國主義的靶子時，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到1931年，滿洲的對外事務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東三省成立了新的運輸委員會，計劃建立一個統一的鐵路和電訊系統，并在滿洲各省會建立了國民黨分部。[[11]](#_11_Jiu_Jing_Sheng_Mei____Man_Zh)尤其明顯的是中國人熱心于建筑自己的鐵路來削弱南滿鐵路，開發葫蘆島港與大連抗衡，并通過拒絕延長租借地或阻止本國勞工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礦業和林業。在滿洲的高麗移民是數量最多的在中國的“日本人”，他們在從事農活時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正當間島的高麗農民為逃避日趨惡化的經濟狀況被迫遷越鴨綠江時，中國當局禁止當地居民出賣或出租土地給外國人。

于是，中日在滿洲的沖突是一場正經歷嚴重經濟困難的工業國與決心恢復并維護國家主權的農業為主的社會之間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國人襲擊在滿洲的高麗農民而引發的直接對抗是象征性的。高麗人是日本迅速工業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權使他們無家可歸，無地可種。在日本人看來，這些高麗人是最無足輕重的一部分人，但他們在滿洲的狀況，卻受到日本當局的關注，因為他們指望該地區能減輕國內的經濟困難。另一方面，在中國人眼中，為了國家的重建和國內的穩定，防止外國進一步的蠶食是至為重要的。日本的經濟困難是它自己的事，而解決這一困難不應以犧牲中國的主權為代價。中國人也許會說：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滿洲企業的收入下降，幾萬名日本人失業，南滿鐵路正經歷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但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結果，不應責備中國的收復主權運動。然而日本人卻相信，如果沒有中國對他們既得權利的攻擊，他們就不會這么痛苦。日本的旅館、餐館、建筑承包商以及娛樂場所的營業額都在急劇下降，而且他們確信，這都是中國造成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動并抵制中國的抗日運動，一切都會恢復正常，而日本的權利也會得到保障。

世界經濟危機就這樣為滿洲事件的爆發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對于被卷入這一事件的日本人來說，滿洲不是中國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應是日、韓、滿、漢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導下——共存共榮的一個區域。他們確信，日本有必要的軍事力量、資金和技術，足以使這個地區變為經濟發達、安全和穩定的樂土。引用1931年7月滿洲青年聯盟[[12]](#_12_Jiu_Jing_Sheng_Mei____Man_Zh)發表在小冊子上的話說，在日本的控制下，滿洲不僅會減輕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難，也會減輕中國“無產大眾”的苦難。首先果斷的行動會給日本帶來光榮、威望和擴展，現在就亟須采取這種行動，為人民提供目的意識和民族自豪感。

顯然，按照這種想法，國際性這種考慮就沒有多少余地了。滿洲的關東軍及其支持者把戰后國際體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華盛頓會議條約的框架內，通過和平談判，安撫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解決棘手的爭端。由于這些條約涉及與西方列強也有關系的問題，遵守華盛頓體系曾使日本愿意同這些強國合作以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穩定。因此，對外相幣原喜重郎來說，中國不是日本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最關鍵的問題是日本的國際主義外交：與美、英和其他先進工業國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執行這種政策才能保證日本成功地進行工業化和和平地發展經濟。當然，作為市場和原料基地，中國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關系本身不會是孤立的；它是國際關系總體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為一強對這一體系承擔責任。

這樣在滿洲的對抗就成為全球發展的一部分，國際秩序與國內秩序之間微妙而不穩定的平衡在全球發展中不斷遭到腐蝕。日本的“激進分子”和別處的激進分子一樣，不愿致力于維持國內和國際秩序。他們決心無視這一切考慮，并大膽地實施他們自己的國內政治事務的計劃和作為這個事業一個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滿洲統治的計劃。1931年9月18日的沈陽事件是第一個決定性的步驟。

## 滿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軍國主義，1931—1932年

滿洲事件由預謀的對沈陽站北約8公里處的南滿鐵路的攻擊組成。按幾天前詳細制定的計劃，限定由關東軍軍官用炸藥破壞二到三英尺路軌。這次爆炸用來作為鄰近各分遣隊行動的信號。夜間11時左右事變后僅40分鐘，關東軍高級參謀官板垣將軍發布了向該地區中國軍隊進攻的命令。在旅順口司令部的日本陸軍司令官本莊繁將軍近午夜時接到這些進展的報告并予以批準。其實，幾天前他就與板垣和其他共謀者商議過，所以這個消息不會使他感到驚訝。無論如何，他決心抓住這個機會采取更廣泛的軍事行動，并于9月19日打電報給參謀本部：關東軍“大膽行動并對全滿洲法律和秩序負責”的時機已成熟。[[13]](#_13_Jiu_Jing_Sheng_Mei____Man_Zh)盡管他沒有立刻行動，因為內閣和參謀本部起初對是否批準關東軍野心勃勃的計劃猶豫不決，但是沒有多久，關東軍完成了一個又一個軍事業績，幾周內南滿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滿洲事件對東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張的國內外政策明顯地是一次挑戰。盲目批準滿洲的既成事實不僅會破壞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礎，而且也會傷害其國內的政治結構。外相幣原清楚地了解這種挑戰的性質；他意識到，除非大陸的軍事行動受到抑制，它會損害日本同美、英的關系。他相信，由于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種關系現在變得比過去更重要。他還意識到，如果讓軍官們的片面行為合法化，大陸的軍事行動還會引起國內的激進運動。不幸的是，幣原的政界和軍界同僚幾乎都對保持國內與國外秩序之間的脆弱聯系不感興趣。他們沒有從國際主義外交和議會政治的聯系看待沈陽事件，而是傾向于在中日關系的雙邊框架內對它作出反應。由于關東軍嚴守其共謀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禮次郎在內的文官都傾向于把滿洲危機看作中國侵犯日本權利的必然結果。幣原終于無力說服別人把保持日本與國際聯盟和華盛頓會議列強之間的友好關系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內閣辭職，結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這一勢態。[[14]](#_14_Tong_Shang_Shu__Di_47__80__8)日本人無視華盛頓條約的框架，并企圖代之以用武力和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與中國的嚴重爭端，這就暴露了當國際合作準則不能為其目的服務時，日本人準備拋棄這一準則。

接下來，擺在其他列強面前的問題是：繼續把日本看作國際社會的一員，還是把它作為國際主義原則的一名冒瀆者而將其排斥在外。無論哪一種選擇都會帶來風險。如果把日本繼續看作華盛頓條約的列強之一，其他列強為了不疏遠日本，就不得不默認其在滿洲的行徑。否則其他列強就必須對日本施加足夠的壓力，使其恢復理智并保持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強國。不管采用哪種方法，這些強國都有必要正確運用規勸和強硬相結合的手段，以維護華盛頓框架作為最佳選擇。在上述策略中存在這樣一種危險：過分規勸可能會使日本大膽采取進一步侵略行動，而過分強硬又可能驅使日本放棄任何國際合作的意向。另外一種選擇，即在國際社會中對日本進行懲罰，最好，將失掉日本作為一個華盛頓強國；而最壞，則將對改變東亞事態進程幾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況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會在一起找出一條解決滿洲危機的合理途徑和一個以延續的國際主義為基礎的解決辦法。起初美國和英國確實試圖合作以便在國際框架內處理滿洲局勢，這是華盛頓會議體系的潛在力量的明證。美國在1931年末尤其極為活躍，人們有理由認為這是戰后美國國際主義的最好時光。英國遠不如美國主動，但它的確還是同意美國的倡議，盡管半途而廢。

美國對沈陽事件的初始反應是將其國際化。考慮到曾制約戰后東亞外交的概念框架，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應。然而總統赫伯特· C.胡佛、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和國務院里他們的助手們在多大程度上贊同國際合作這一觀點卻不那么容易預測。在他們心目中無疑日本是錯的；如史汀生所敘述，關東軍采取魯莽的行動正在公然違抗華盛頓會議條約的秩序。因此，必須呼吁日本政府譴責軍方的侵略行徑，并同意和平解決與中國的一切爭端。史汀生在9月18日后的三個月外交活動抱著這樣的目標。他果斷地與國際聯盟密切合作，當時中國政府已向該組織提出申訴。美國再沒有如此主動地與國際組織合作過。史汀生派了一名觀察員出席理事會，與國聯官員保持密切聯系，并主動促使國聯采取行動作為結束敵對行為的基礎。國際聯盟通過一項決議，要求中日雙方停止進一步戰斗并恢復戰前狀態，這與美國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11月，國聯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滿洲形勢并提出建議。美國支持這一步驟，并任命法蘭克·麥科伊將軍作為該委員會的美方代表。該委員會由英國的李頓勛爵領導。[[15]](#_15_Jia_Li__B_Ao_Si_Te_Luo_Er)

美國在滿洲危機時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沒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認為勞而無功。當然，最終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軍事行動。但華盛頓政府的主要目標是保持一個國際框架來解決地區性爭端。對政府內外的國際主義團體來說，這里是美國為國際主義而起作用的罕有機會，它強調先進國家的責任，如外交家兼學者埃勒里· S.斯托威爾1931年所寫的那樣，“充當維持人類治安和保護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國積極準備與國際聯盟合作當然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強社會中成員國的地位。簡言之，美國外交的主要關注不是中國，而是國際性的原則。[[16]](#_16_Luo_Bo_Te__D_Shu_Er_Qing_Ge)

英、法以及其他國家贊同美國的主張。英國作為一個亞洲主要強國，與美國基本一致，同意必須維護國際合作框架。然而，倫敦更愿意遷就日本在滿洲的權利作為這種合作的一個方面。在本土和東亞的英國官員傾向于同意日本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抱怨是正當的，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會中的合作伙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讓步比無情譴責它的做法更有利。[[17]](#_17_W_Luo_Jie__Lu_Yi_Si____Ying)于是到1931年末，美、英和國際聯盟都有意在國際合作的框架內解決滿洲危機，而不疏遠日本。后者仍將作為解決爭端的國際努力的一方。這當然不是中國人所要求的，中國人要求立即終止戰斗并直截了當譴責日本，迫使日本恢復戰前狀態。但是，中國人對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之間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斷地把它的權威擴張到中國其他地區，并開展各種經濟項目以實現現代化，而滿洲危機卻迫使蔣政府更關心外交爭端。可以想象，大膽反抗日本能激發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和鞏固它的權力。但當洪水泛濫餓殍遍野時，過分卷入滿洲軍事沖突會耗盡復興經濟的資源。最重要的是，蔣介石擔心對外戰爭會有助于共產主義者和其他反對派成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會削弱南京政權。只要主要強國，包括日本，遵守國際主義框架，那就符合中國人的意向，因為那樣南京政權就能繼續努力以恢復主權。按照這種方式，沈陽事件不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國利用國際主義這一手段。[[18]](#_18_Jiu_Jing_Sheng_Mei____Man_Zh)

日本蔑視為繼續保持其國際主義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議，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潛在的。1932年1月以后，當關東軍占領錦州而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登陸時，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經明白無誤了。與此同時，關東軍推動滿洲獨立，得到當地各種日本組織的支持，這些組織曾充當單方面解決各種懸案的急先鋒。對所有這些組織來說，滿洲獨立不僅具有戰略意義，而且還有象征意義。獨立將保留該地區的豐富資源和戰略地位供日軍使用。它還象征日本領導下的亞洲統一的理想。擴張論者接受石原的觀點，主張把滿洲變成一個中、日和其他民族——東亞的“五個民族”——和睦相處的和平而穩定的地區。這是作為一個比西方帝國主義、蘇聯共產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它們曾毒化中日關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響在東方長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來的。[[19]](#_19_Ma_Ke__R_Pi_Di____Shi_Yuan_G)

這樣，1932年3月宣布的滿洲獨立就成為戰后國際關系的一個界標。日本正采取單方面的步驟來照顧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個在它統治下的穩定的地區，據稱這是世界上沒有分裂和剝削勢力的地方。文官政府盡管不滿意，但實際上沒有阻止過這種擴張。[[20]](#_20_Jiu_Bing_Sheng_Mei____Man_Zh)在關東軍的推薦下，內田康哉繼幣原擔任新外相，他毫不猶豫地贊成承認滿洲國。這發生于1932年9月15日，在國際聯盟調查團提交報告兩周多以前。沒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對國際權威的蔑視了。李頓的報告包含很多安撫日本的章節，假如當時有一個愿意繼續與西方合作的強有力的領導，那么東京接受這份報告并不困難。但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報告的發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員和政論家。若遵守報告的建議，日本就得與列強合作以重新規定他們在中國的權利和利益，同意滿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獨立的存在，并同中國和其他國家協力推動滿洲的經濟發展。這樣一個解決方案將延續東亞外交的國際性框架，而這正是日本軍方當時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將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強有何反應。

列強的反應也開始變化。在同一個水平上，他們繼續在現有條約框架和國際聯盟內合作。但由于這條途徑開始顯得越來越無效，美國和英國不得不尋找其他替代辦法，美國主張把國際性和單邊行動結合起來，從而使日本就范。如史汀生1932年6月所說，“我相信，新的聯盟方法與‘老外交’的明智混合能獨自獲得我們正為之奮斗的實際效果”[[21]](#_21_Ke_Li_Si_Tuo_Fu__Suo_En____W)。“新的聯盟方法”將包括繼續與其他國家合作以維護和平。它的表現之一是史汀生在1月向英國建議，兩個大國共同譴責日本在上海的行動違反了1922年的九國公約，指望日本會在這種壓力下被迫退卻。所謂“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聯盟或戰爭計劃，而是指美國單邊行動以維持現狀。這種想法包含在1932年1月7日發表的史汀生原則里面，它宣布美國不會承認“通過使用與巴黎和約的條款和責任相悖的手段所產生的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這里巴黎和約是指1928年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這項沒有英國合作的單邊宣言表明了華盛頓與倫敦之間正在趨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國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勞無功的步驟，采取進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國際合作準則的措施。盡管沒有暗示美國有力的措施將被用來實現這個主義，但含義是明顯的。史汀生的聲明使美國這個現存國際體系的維護者與向這一體系挑戰的日本對立起來。顯然，兩個這樣的強國有可能發生激烈的沖突。

## 國際主義的瓦解

在國際性和單邊性這兩種方法中，第一種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關于日本將讓步并在國際社會中恢復其責任感及和平立場的假想，在沖擊下，一天天地維持著。更麻煩的是，英國不傾向堅持這個超出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盡管在滿洲及其他問題上與美國合作被認為是重要的，倫敦不愿與華盛頓聯合而過分強烈地譴責日本。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強調，英國將繼續通過國際聯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國的外交看作是傾向于針對他們的英美聯盟。作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如果所有的活動都在日內瓦進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經指責李頓調查團。因此，英國反對與美國的聯合行動等于拒絕加強現有的國際性框架。

華盛頓與倫敦之間的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經濟區域主義的傾向造成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已在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瓦解，而在1932年其崩潰的跡象已明白無誤。日本在1932年拋棄了僅在兩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滿洲，日本顯然打算將這一地區變為本土的經濟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滿洲經濟發展的最后方案還沒有形成以前，沈陽事件的設計師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已構想出許多有關鐵路建設，鹽、鐵礦開采，紡織品生產等項目。他們的想法是把滿洲作為日本經濟圈的一部分，幾十萬日本人將在那里定居并從事生產活動，與本土形成共生關系。[[22]](#_22_Man_Shi_Hui_Bian____Man_Zhou)

日本不是推行經濟區域主義的唯一國家。德國早在1933年納粹上臺前，就在實行專制的經濟政策，尋求與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結成關稅同盟，并采取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以促進出口貿易。英國正召開一次英聯邦國家會議，以求在它們之間建立一個貿易優惠體制。由此而來的渥太華協定（1932年8月）絲毫沒有減輕人們對英國贊同經濟國際主義時代已告結束的普遍憂慮。法國也將其關稅提高，致使美國采取報復性的貿易限制。總的說來，1932年標志著世界經濟明確地開始分化為國家主義的和地區主義的兩個子系制。[[23]](#_23_Lai_Fu_Le____Nan_Yi_Zhuo_Mo)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專制的趨勢，討論繼續國際合作就是一句空話。因此，倫敦對保持與美國的合作并不關心。盡管戰后國際性框架還沒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經濟基礎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強國果斷地做出努力，才能復興合作精神和維護世界和平。

1933年后，列強不得不面對這些重大問題，這一年標志著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華盛頓掌權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臺。應當強調的是，這兩位領導人都對某種合作感興趣，但已不再是國際主義舊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國要廢除凡爾賽和約體系的限制并洗雪戰敗和受不公正對待的恥辱。這個希特勒打算通過重新武裝及采用限制性貿易和貨幣政策的中歐地區經濟體系來實現上述目標。所有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創，但他通過公開反對凡爾賽體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為對象的聯盟體系，確實重新制定了德國的對外關系。通過與這些國家合作，德國要保衛它的安全，恢復在陽光下的地位，并鞏固其中歐經濟區。[[24]](#_24_Ke_Lao_Si__Xi_Er_De_Bu_Lan_T)

羅斯福的美國和希特勒的德國一樣，消極地看待通過各種條約安排建立起來的戰后和平框架。新總統與其前任不同，他不贊成以金本位和穩定兌換率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的國際性結構；盡管羅斯福表示支持國際合作，但他不與其他工業國家商議，通過單邊行動致力于國內的恢復。資本主義國家共享外貿和投資活動世界的觀念正在淡漠。美國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達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過與其他美洲共和國簽訂對等的雙邊貿易協定來加強泛美區域主義[[25]](#_25_Luo_Bo_Te__Da_Lai_Ke____Luo)。羅斯福的新政府對恢復20世紀20年代的國際主義不感興趣。1933年的現實似乎注定重建凡爾賽或華盛頓體系的任何努力都會失敗。作為替代，就1933年美國正在重新制定的對外政策所達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國際關系以防止戰爭。為此，美國愿意與亞洲的日本或歐洲的德國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國際聯盟和其他現存協議，也無不可。這一點在這兩個強國于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后變得尤為必要。

沒有什么比美國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的反應更能表明美國愿意為新的國際關系而放棄舊的國際主義了。1932年2月24日，由松岡洋右率領的日本代表團在全體會議投票通過李頓報告后，退出會場。當時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棄合作解決國際爭端的努力。這為其他強國提供了一個機會，把日本退出國際而引起的麻煩降到最低程度；美國政府特別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觸，以防止這場危機發展成嚴重的沖突。美外交官約瑟夫·格魯、納爾遜·約翰遜和休·威爾遜曾作出這樣一個結論：日本留在滿洲以及與日本的穩固關系必須以承認這一現實為基礎。國務院普遍同意這一論點，并強調避免同日本交戰是至關重要的。做到這點的最好方法是進一步同日本談判，以保護雙方在亞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現在重點是雙邊協議，以后還要擴大到其他國家，重點不是同國聯或者同英國密切合作。

英國仍把國聯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準備放棄同美國合作。如美國駐倫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頓在3月觀察到的那樣，英國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結論，盡管英美的目標在總的原則上可能一致，但鑒于利益上的沖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實際上是無法達成的”。[[26]](#_26_Suo_En____Wai_Jiao_Zheng_Ce)英國也在摸索一種新的安排以保護和平格局，在歐洲這種格局正開始采取與德國雙邊安排的形式。但在東亞，官員們分成兩派：一派贊成同日本建立類似的關系，以保護傳統的商業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則主張同中國建立更親密的關系，以確保英國在一個未來市場上的利益。總的來講，外交部傾向前者，而財政部傾向后者。這第二種觀點認為，當中國市場正成長時，與日本合作不可能為英國商業帶來長遠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處。英國支持中國比縱容日本好。[[27]](#_27_Si_Di_Fen__Lai_Ang__En_Di_Ke)在倫敦的這種爭論使英國的亞洲政策出現混亂。

上述種種使局勢向不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日本已安然占領滿洲，盡管遭到國聯譴責。1931年的國際主義已經消亡，兩個超級大國不再合作。與此同時，日本顯得滿足于它在滿洲的收獲。1933年5 月31日的塘沽停戰協定通過在長城以南建立一個非軍事區，將“東四省”[[28]](#_28_Dong_Si_Sheng__Ji_Hei_Long_J)從中國的其他部分分割開，國民政府出于緩兵之計的需要，同意這種停戰，并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存在。目前中國將致力于外交活動以恢復失去的權利，并致力于經濟建設作為國家抗戰的基礎。[[29]](#_29_Song_Ben_Zhong_Zhi____Shang)所以，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現實卻相當嚴峻。那些倡導繼續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國領導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寵惠，曾寄希望于國際聯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讓步。當兩者都不起作用時，他們不得不退而同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進行較具體的雙邊談判，以尋求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當宋子文出訪倫敦出席世界經濟大會時，他同英國財政部和外交部官員就向中國提供建設貸款進行會談。宋子文在華盛頓時并未舉行類似磋商，唯一實質性成果是以中國海關收入為擔保，商定一筆總計5000萬美元的小麥和棉花貸款。[[30]](#_30_En_Di_Ke_Te____Wai_Jiao_Yu_Q)這是僅有的一宗既與中國的需要有關，也與美國國內減少剩余產品的需要有關的事務。

其他歐洲強國并未同樣卷入亞洲事務。對于他們，1933年的最大憂慮是希特勒德國。因為希特勒的策略是與意大利和英國合作，法國和俄國也必然更加靠攏，希望恢復他們的傳統協商能遏制德國的興起。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對亞洲政策沒有什么興趣，只是一些個人，突出的是讓·蒙內，積極參與了國聯關于中國經濟發展和各項規劃。蘇聯當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時，它需要避免過早在滿洲與日本發生沖突。這種孤立曾來自20世紀20年代間旨在削弱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外交，也來自約瑟夫·斯大林的“在一個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正當資本主義國家經歷著從未有過的困難并轉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時，蘇聯并沒有幫助世界范圍內的革命力量來支持這種趨勢，而是以一個維持現狀的強國出現。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開始強調舊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建議擴大到美國，旨在同法國訂立防御協定的對話也開始了。在滿洲危機中蘇聯嘲笑國聯恢復和平的努力過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觸怒在北滿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討好日本，以致提出談判出售中東鐵路。這些行動的背景是蘇聯唯恐卷入對日作戰，而其他強國袖手旁觀。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國進攻蘇聯前重新調整國際事務，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31]](#_31_Ri_Ben_Guo_Ji_Zheng_Zhi_Xue)

德國還沒有深切地卷入亞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對亞洲人，首先是對日本人的蔑視，而沒有什么亞洲政策。他歡迎日本退出國聯，作為對戰后和平格局的進一步攻擊。在他看來，一個更強大的日本將是一種受歡迎的對蘇聯的抑制。同時，他發現在國民黨中國有許多合意的東西。蔣介石明顯地正試圖在獨裁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沿資產階級的自由路線，締造一個新中國。它將需要外國的資本、技術以及軍事顧問，而希特勒認為德國應當供應它們。如果中國最終處于德國影響之下，顯然這比日本稱霸亞洲有利得多，因為后者能威脅德國的經濟機遇。這種考慮導致德國在亞洲執行雙軌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諒解以反對蘇聯，另一方面謀求與中國密切聯系。然而，當英美的卷入正在減小，同時納粹德國穩步成為東亞事務中的一個要素時，德國將如何為中日危機提供新的解決方法是不清楚的。[[32]](#_32_Yi_Lao_Yi____Yao_Zhe_De_Ge_M)

## 日本企圖獲得區域合作，1933—1937年

沈陽事件發生兩年以后，人們已看清，當滿洲危機可能給列強一個良好時機來鞏固戰后國際體系時，他們沒有把握時機。日本在滿洲至高無上，它無視這個體系。盡管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正在尋找防止更大規模戰爭的辦法，但是沒有哪個西方強國有足夠的實力或膽量對日本挑戰。然而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相信，一個穩定的國際新秩序能在已發生變化的現實的基礎上確定下來。他在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試圖以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國的特殊權利和利益為基礎，在亞洲恢復列強間的合作精神。他所說的“日本、滿洲和中國間的合作”，指日本愿意不將其征服擴張到滿洲以外，以回報中國的承認。在這個基礎上，日本將促進中國本土的經濟發展，而中國將相應地停止反日政策。兩國間的貿易將得到增長；它們的經濟關系將越來越相互依賴。同時，如果美、英等國承認新的現實，日本將與這些國家“合作”，以維持亞洲和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換句話說，如果工業強國懂得世界和平取決于承認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特殊需要和利益，這些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是能夠恢復的。[[33]](#_33_Duo_Luo_Xi__Bo_Ge_He_Gang_Be)

對于新國際合作這一思想有很多話可說。它與德國當時在歐洲提出的美、英等國認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這些強國愿意支持德國的修正主義，以便將德國留在國際事務的某些限定的體系內。他們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觸，以防止一個偶然事件發展為一場大戰。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本身也有同樣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認新形勢，作為日本愿意維持大國合作框架的代價。這是一個脆弱的政策，它依賴于日本和其他強國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將依賴于日本軍方是否準備支持廣田的策略以及中國領導人是否愿意接受現狀。

1934年廣田不是沒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軍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來加強中日關系并增進日本在中國的利益。誠然，關東軍和辛丑和約天津駐軍（所謂天津駐屯軍）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劃入侵華北。南滿鐵路渴望在滿洲經濟發展中保持其壟斷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業界的日本擴張主義者日益增長的攻擊，它也對將其業務擴展到長城以南感興趣。然而此時，這些打算還沒有形成日本控制華北的龐大計劃。東京的軍政首腦一定對1931年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滿意。[[34]](#_34_Zhong_Cun_Long_Ying____Ri_Be)

就列強而言，他們一般默認了日本在滿洲的地位。他們甚至還表現出對在那里的經濟發展進行投資的某些興趣。隨著日本重新強調合作，日本與英美之間的對抗正在消失。誠然，還有令人惱怒的事，如1934年4月17日的天羽聲明。在該聲明中，外務省發言人強烈譴責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和技術援助。此項聲明措辭含糊，而當華盛頓和倫敦要求澄清時，外務省立刻讓步，重申它堅持國際合作。[[35]](#_35_Bo_Ge_He_Gang_Ben_Jun_Ping_B)當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語都不能掩蓋日本將自己視為東亞主要強國這一事實。然而，它準備在此基礎上重建國際合作的框架。畢竟這是這樣一個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爾正給美國外交官員講授“國際法是強國的法，用來保護強國的財產，也是為不妨礙與對手激烈競爭而詳細制定的”[[36]](#_36_Shu_Er_Qing_Ge_Er____Wai_Jia)。日本正試圖保持這種“強國”地位，并許諾不將它的對手擠出亞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廣田對重新談判海軍裁軍條約以保持大國合作精神感興趣。對他和對東京文職領導人來說，定于1935年舉行的海軍談判的成功將保證美、英和日本能面對新的現實繼續共處。不幸的是，日本海軍另有想法。他們接受以無限制海軍軍備為后盾的獨立外交概念，反對達成國際協定的任何措施，特別反對與美國達成裁軍協定。[[37]](#_37_Si_Di_Fen__E_Pei_Er_Zi____Be)然而，甚至海軍也沒看出即將到來的戰爭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優勢，政府正試圖通過外交途徑取得它。雖然與美國的海上沖突被看作特別可能，但日本海軍更有興趣同英國在東亞達成妥協。當然，這種妥協能否成功將取決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這里我們又回到海軍裁軍談判，以此來檢驗三國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當時這三個國家仍在尋求在亞洲和太平洋穩定他們關系的途徑，至少他們還準備會談。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變動，好像準備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同日本討論解決辦法。宋子文，這位直言不諱的反對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從倫敦回國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衛留任外交部長，而唐有壬，一個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為外交部次長。另一名日本大學的畢業生高宗武被新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代理司長。在這些官員下面，有許多人曾在日本受過訓練和教育。與施肇基和顧維鈞這樣一些幾乎完全親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這些官員與日本的外交官、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憶錄——1933年到1937年中日非正式關系的最佳資料——不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還有當時他接觸過的許多商人、軍官、知識分子和其他人士。他報道說，他們當中多數表示了與日本和解的認真愿望。他們的論證是多方面的。有些人認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分子是中國的主要威脅，而在根除這種威脅前，必須與日本維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國需要經濟復興和工業化。他們認為必須轉向西方強國尋求資本和技術，同時他們也相信，如果摒棄日本，這樣的事業決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這些中國人謀求通過兩國合作的對話來阻止日本進一步的侵略行動。他們感到，通過提出合作，他們將贏得足夠的日本人的支持，使軍方極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38]](#_38_Song_Ben_Zhong_Zhi____Shang)

這就是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長汪精衛在內的中國官員的會談的背景。氣氛很融洽，以致天羽聲明發表時，汪精衛只提出一個敷衍了事的抗議。接下來的一系列談判都很圓滿，包括滿洲同中國本土的通郵、接軌、修改稅則以及債務結算。到年底日本表示準備將其駐中國的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象征日本承認中國新獲得的大國地位，中日兩國領導人明顯地取得了共識，即兩國通過友好合作比通過互相指責更為有利。他們愿意結束1931年之后兩國極端敵視的關系。這至少會達成對現狀的默認，中國接受滿洲作為一個分離實體的存在，而日本則保證不謀求面向南方的進一步領土要求。中國還愿意承諾壓制學生、新聞記者、政治家和軍閥的反日運動，作為對日本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報答。

1934年中國愿意與日本妥協部分地反映了國際格局。中國曾指望的對日本的排斥并未實現。美國正按照白銀購買法執行一項自我中心的政策，開始以高出世界市場的價格收購白銀。直接結果是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導致白銀嚴重短缺和貨幣危機。銀行關閉，商店停業。[[39]](#_39_Yi_Lao_Yi____Yao_Zhe_De_Ge_M)憎恨美國的情緒上升，伴之以中國也許必須同日本共處的信念。英國準備幫助中國恢復財政秩序，但沒有日本的認可，就不可能承擔大規模的計劃。由于所有這些原因，有些中國人認為中日和解的時刻已經到來。

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歡引用孫逸仙1924年的泛亞細亞講話。引用講話的頻繁程度是中國同日本建立和平關系的興趣的標志。不會令人感到驚訝的是，1935年伊始汪精衛發表講話，及時引用孫逸仙強調中日合作的言論，并保證竭誠把兩國召到一起。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訂出嚴格法規，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貨，仿佛就要把這項政策付諸實施。不久以后，6月15日在南京精心舉行了將日本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的儀式。

不幸的是，對那些為穩定中日關系做出艱苦努力的人來說，那個慶典標志著這一短暫的企圖和解時期的結束。同年，即1935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轉，這是由陸軍決定侵入長城以南激起的。無論關東軍或天津駐屯軍都沒有放棄它們的陰謀，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將軍決定性地破壞了剛出現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來，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和解姿態是軟弱的表現，是權宜之計，不是真誠的合作。土肥原爭辯說，恰恰相反，中國領導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應被蔣介石或汪精衛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應在華北大膽采取主動，準備消滅這一地區的抗日分子，以鞏固既得利益。從這個觀點出發又得出下列推論：只有吞并了華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個有生命力的地區實體。但國民黨人旨在將這一地區更直接地置于他們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堅持與國民黨人妥協，則將永遠失去這一機遇。[[40]](#_40_Zuo_Teng_Xian_Le____Tai_Ping)

1935年至1937年初的兩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謀者成功地實現了他們的計劃。他們的目標是“華北自治”，即消除國民黨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并建立一個保證中立但受日軍嚴密控制的臨時政權。“華北”將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日本不僅將從行政上把它們同中國的其他地方分割開；它還將發展企業，使該地區與滿洲更緊密地結合。天津駐屯軍要求南滿鐵路派出一個調查組，對華北的礦產資源、市場狀況和財政制度進行一次詳細調查。結果產生了一份由151個研究人員寫成的長達72卷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成為日本制定華北經濟計劃的基礎。[[41]](#_41_Jian_Zhong_Cun_Long_Ying)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國民黨人協議的責任，它應當強迫制止這些活動。東京只有堅定地拒絕批準侵占華北的計劃，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譽并鞏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義者的這些活動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羅斯領導的英國經濟代表團來到東亞之際。該代表團得到財政部的大力支持，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和副大臣沃倫·菲舍正主張在亞洲推行強硬政策。他們確信，在中國的財政重建中，英國有必要也有可能發揮顯著作用，這既能得到中國人的好感，又能為英國的商品獲得市場。同時，英國愿意同日本合作，英日在中國（特別在長城以南）的合作是亞洲和平與穩定的關鍵，這很像通過海軍協定而貫徹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羅斯計劃得以實現，還可進一步將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國際框架內。[[42]](#_42_En_Di_Ke_Te____Wai_Jiao_Yu_Q)

日本政府拒絕了英國的合作倡議，表明它完全缺乏靈活性和遠見。現在這樣的合作應當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然而這正是軍方擴張主義者堅決反對的，恢復中國地位的國際安排不僅將限制日本行動的自由，而且將加強南京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這些原因使外相廣田下決心進行一次投機并與李滋·羅斯合作，但他完全沒有領會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沒有做任何事來促成它。他也沒有做很多事來反對在華日軍的分裂主義活動。他溫順地接受一個又一個既成事實：何梅協定（1935年6月），秦土協定（1935年6月），冀東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11月），以及導向成立冀察臨時政府的陰謀（1935年12月）。所有這些交涉旨在從華北清除國民黨的人員及其影響，這顯然違背日本同蔣、汪政權和解的官方政策。[[43]](#_43_Ri_Ben_Guo_Ji_Zheng_Zhi_Xue)但東京完全無視這一矛盾。由外務省、陸軍省和海軍省于10月份制定的“廣田三原則”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國際合作意圖。相反，他們要求中國“結束對歐洲和美國的依賴”，并承認日本在滿洲和華北的特殊地位，廣田領導的外務省溫順地接受了軍方分裂華北的陰謀和反對國際合作。11月，廣田竟讓有吉大使鼓勵宋哲元將軍的華北自治運動。[[44]](#_44_Song_Ben_Zhong_Zhi____Shang)

當日軍蠶食華北諸省時，中國的領導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激發了學生組織（1931年后被國民黨鎮壓）公開反抗不準示威游行的禁令。1935年12月9日，數千學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標語，并要求中國領導人停止內戰及團結全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一運動與中國共產黨新的統一戰線戰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從1935年11月算起。[[45]](#_45_Bo_Duo_Ye_Shan_Da____Guo_Gon)那些曾對日本保持友好態度的領導人——汪精衛、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喪失威信，這反映民族主義的浪潮在高漲。隨著中國人的輿論傾向，發生了行刺汪精衛，緊接著在1935年底暗殺唐有壬。

1936年2月26日東京發生軍事叛亂后，廣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繼續破產。他的外務大臣是有吉明。顯然，1934年有希望的開端已經消失。日本再一次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而英國在中國的財政改革卻贏得國民黨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現：1935年8月，共產國際號召建立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統一戰線，人民陣線也在法國誕生。1935年5月的法俄協定使人民陣線反對德國，這又轉而使意大利接近軸心國陣線。在西班牙內戰期間（1936年7月至1939年），這兩個集團走到一起，這四個國家聯合英國成立了一個不干涉委員會，這至少表明歐洲列強愿意保持一種協商框架。其間的強國英國尋求一種歐洲內部的合作，以取代國聯或英美合作，兩者當時都已喪失信譽。與此同時，蘇聯堅定地重新進入歐洲社會，這對日本來說尤其是一個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蘇聯第一次愿意同資本主義國家一起行動。這種建立在相互協商基礎之上的歐洲國家體系也許可使每一個強國自由地參與歐洲以外的事務。英國、蘇聯和德國都主動開始支持蔣介石，這絕非偶然。在李滋·羅斯的改革后，中國對外國投資有吸引力，而蔣介石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領袖。

日本未能對抗這些發展。它在1936年的一個成就是11月和德國締結了反對共產國際的協定。在竭盡全力查考與英國或美國這些在中國的傳統伙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復前就轉向德國尋求合作，這是日本缺少見識的典型表現。日本確實沒有同德國在亞洲合作的經驗。反蘇條約盡管對東京的軍政首腦有很大的吸引力，卻除了促使蘇聯加強中國的防御外毫無作用。蘇聯通過促進在中國建立統一戰線，希望結束國共內戰，并使統一的中國轉向反對日本的侵略野心。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證明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處失敗。在華北的日軍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滿洲國—中國經濟圈。但很難達到自給。1936年，亞洲只占日本進口總額的38.2%和出口總額的50.9%。日本購買的貨物30%以上來自美國，而美國購買20%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過4000萬日元，包括對美貿易凈逆差25300萬日元和對英貿易凈逆差2200萬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價它的對華政策。

這一努力的關鍵性文件是《實施對華政策綱要》和《華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務、大藏、陸軍、海軍）會議上通過的。這兩個文件強調用“文化和經濟”的手段以實現兩國的“共存共榮”，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努力。會議決定不再謀求華北自治或促進分裂運動。地方政權不再受到支持來鼓勵分裂，相反，日本將試圖在全中國造成一種互相信任的氣氛。最后，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東自治政權和終止走私貿易。對于冀察臨時政府，日本應采取一種公正的態度以安撫人民。發展華北經濟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政策的關鍵部分，應按新方針通過注入日本的私人資本和中國人的資金來實現。第三國的權利將受到尊重，而與英、美的合作將得到推進。[[46]](#_46___Xian_Dai_Shi_Zi_Liao__Ri_Z)

這是一個驚人的政策轉變，也是對軍方肆無忌憚的擴張戰術失敗的一次坦率的承認。不幸的是，它來得太遲了。中國人對日本的親善聲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變已使中國空前團結。現在蔣介石的權威有賴于對日本采取強硬立場。國際環境也正向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到1937年初，全球性蕭條的最嚴重階段已經過去。那年世界工業總產值首次超過1929年的水平，而貿易額也恢復到1929年以前的程度。對外經濟問題不再支配工業強國的外交。倫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關心防止戰爭。最重要的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愿意改變他在1933—1937年間的民族主義的、不合作的和不一致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史汀生地區爭端國際化的策略上來。他批評了中立法規，確信美國必須再一次在世界事務中居于領導地位。在內維爾·張伯倫6月出任首相后不久，羅斯福就邀請他來華盛頓共商世界問題。在羅斯福的支持下，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呼吁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以制定世界各國均須遵守的基本準則。盡管這些建議毫無結果，但它們表明了美國開始重返國際舞臺。[[47]](#_47_A_Nuo_De__A_Ao_Fu_Na____Mei)

在歐洲，國際主義的復蘇在1938年慕尼黑協定里達到了頂峰。像威爾斯所描述的那樣，“該協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礎上建立世界新秩序”。正如1931—1932年的東亞，1937—1938年是新國際主義——有時被稱作“綏靖”——的鼎盛時期。新國際主義表明主要強國避免戰爭的愿望，盡管是以犧牲小國為代價的。然而1937年在亞洲，西方強國并不太傾向安撫日本，也就是說不愿與日本合作來穩定政治關系。日本已變得比德國更置身其外，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侵略者。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說服其他強國相信它對它的對華新政策承擔義務，那么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驟才行。1937年6月4日近衛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標實際上是恢復在東亞的國際合作精神。廣田重新被任命為外務大臣，而結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經是他們的首要的目標。但在這一關鍵時刻，盧溝橋事變毀掉了亞洲和平和穩定的所有前景。

根據大多數報道，7月7日在北平郊外的開火不是預謀的。[[48]](#_48_Lu_Gou_Qiao_Shi_Jian_De_Zui)這次事變確實應當被抑制住，因為當時主要強國已有足夠的能力來干預這場戰爭。德、英、美、蘇很快即將從政治上或軍事上采取行動，以緩解日本的孤立情緒。當其中幾個強國于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會晤來討論這一事件時，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 中日戰爭期間的強國形象，1937—1941年

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雙重現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對中國重新產生興趣——在1937年7月戰爭爆發后變得更加清楚。與戰場上的勝利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戰爭目的問題。日本為對華戰爭正投入大量軍隊（士兵人數超過100萬），并于1938年4月在國內宣布全國動員，使整個國家為勝利而行動起來。但是，打這場戰爭究竟為了什么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軍政首腦打算把日本的亞洲政策通過與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轉向幫助恢復某些穩定意識的時刻，這場戰爭爆發了。現在所有這一切都不成為問題了，然而對為什么一定要打這場戰爭卻沒有清楚的認識，對這場戰爭將帶來什么后果，也沒有共同的預見。當時日本能想出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建設新秩序的漂亮措辭。對“新”的強調表明了他們不回到過去的意識。相反，這場戰爭將是改變日本、亞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實現“改變當前社會和經濟組織”的歷史使命。[[49]](#_49_Chang_Gu_Chuan_Zheng____Dui)對國內，這意味著減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響——黨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樂主義。著名社會學家高田保馬聲稱，日本人必須學會儉樸地生活，使個人的安康與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們必須讓個人利益服從社會監督。對國外，新秩序的概念使這場戰爭合理化，用高田的話說，“中國和日本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更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亞細亞主義或亞洲新秩序），以加強亞洲對西方的集體自衛。[[50]](#_50_Gao_Tian_Bao_Ma____Dong_Ya_F)

這樣的自我粉飾暴露出日本人對其未來的地位是多么的絕望。對中國呼吁泛亞細亞主義無異承認這場戰爭不能在戰場上贏得。如果中國人覺得他們被西方忽視，因此除遵從日本確定的東亞新秩序外別無選擇，那么這種呼吁可能不全是絕望的花言巧語。的確，有一些中國人以前就傾向以朋友對待日本人，著名的如汪精衛，他們仍抱著維持兩國密切關系的幻想。他們相信中國不可能從其他國家得到很多援助。這是他們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他們將會發現，遠不只是這兩個國家繼續進行戰爭，它越來越成為全球沖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國家卷進來。

根據中國的觀點，這種有利的發展完全不是預先注定的。1935年共產國際大會[[51]](#_51_1935Nian_7Yue_25Ri_Zhi_8Yue)提出的人民陣線，在1935—1937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是理想多于現實，主要是因為美、英不愿意把自己與蘇聯拴在一起，后者可能會把它們卷入對法西斯國家的過早沖突。此外，蘇聯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例如，就在盧溝橋事變前夕，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軍事指揮官，遭到槍決。帶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是德國比其他各國更有潛力援助中國。因為德國同中國和日本雙方的關系都好，所以在戰爭初期，中國人希望德國能施加壓力，以節制日本的軍事行動。[[52]](#_52_Fu_Ke_Si____De_Guo_Yu_Yuan_D)相比之下，一開始不可能依靠美、英。這兩國仍深受消極主義和孤立主義情感的影響。他們對中國的同情本身并不轉變為有效的政策。

所有這一切都戲劇般地突然發生了變化。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英、蘇三國合作采取重大步驟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國的德國卻轉而更靠攏日本，中日戰爭使世界主要強國重新組合。首先，它導致蘇聯與英美二強互相更關注對方，如果可能的話，聯合作出反應以抑制日本。蘇聯在許多方面都采取主動。盡管斯大林不愿與中國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純粹的雙邊關系，然而他卻同意向中國提供飛機和坦克，只要蔣介石保證不用它們反對蘇維埃（這是1937年8月兩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的大意）。但這只是援助中國總體計劃的一部分。蘇聯的外交官們渴望通過蘇聯1934年參加的國際聯盟進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國家靠攏，對日本實行聯合制裁。[[53]](#_53_Nei_Sen__Ha_Si_La_Mu____Su_L)蘇聯期待華盛頓會議簽約國聚會，并派一名代表參加1937年11月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這是蘇聯首次參加涉及遠東的國際會議。

盡管布魯塞爾會議并未產生蘇聯所期望的國際決議和承諾，但它清楚地標志一個要點，就是蘇聯同美、英一道尋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國，以“加強國際安全”，像莫斯科雜志所指出的那樣。布魯塞爾的微小成果——代表們僅僅反復闡述列強的愿望是找到一個與1922年的九國公約相容的解決辦法而沒有通過任何制裁日本的決議——并沒有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該會議清楚地將中日戰爭國際化。因此是與羅斯福總統1937年10月的檢疫講話[[54]](#_54_1937Nian_10Yue_5Ri__Luo_Si_F)一致的。在那次講話中，羅斯福號召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勢力。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國際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國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國決定承認滿洲國。到1937年底，希特勒已決定并吞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創造一個擴大的和經濟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國，為最終對蘇聯的“圣戰”做準備。但是有必要通過與日本締約使英國在亞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羅馬軸心會在歐洲遏制英國一樣。德國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須從中國撤走軍事顧問和承認滿洲國。希特勒愿意采取這些極端步驟，因為他預料要同英國攤牌，也因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對日本的援助，中國注定要輸掉那場戰爭。這場賭博將使德國付出巨大的代價。

1938年初，中國人能感到不那么孤立了。布魯塞爾會議至少已表明關心遠東局勢的多數國家一致同情中國。蘇聯正向中國提供數百架飛機和數百門大炮。俄國飛行員正到達重慶。更為重要的是，美、英盡管很謹慎，也有跡象要在亞洲事務上共同行動——正如美國海軍的羅亞爾·E.英格索爾艦長于1938年1月去倫敦就對日聯合戰略同英國交換信息時所顯示的那樣。[[55]](#_55_Bi_De__Luo____Ying_Guo_Yu_Ta)重慶現已得到美、英、蘇無可懷疑的支持。中日戰爭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與它們的全球政策相適應。滿洲危機曾動員列強維護它們被迫放棄的現行國際關系框架，而這一次西方列強決心反對日本，可能還有德國重新確定世界事務格局的企圖。在正在形成的組織反對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國將扮演主要角色。這個正在出現的同盟包含兩個組成部分。一是由蘇聯倡導的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延續。另一部分是閑置數年后復蘇的英美合作計劃。二者均計劃遏制法西斯國家，特別是日本。但它們有不同的內涵。人民陣線范圍較廣，英美聯盟較狹。從意識形態上講，前者盡管已大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內涵，而后者則以自由民主原則為宗旨。當時并不清楚這兩種有顯著差異的結盟是否真能結成一個強有力的集團。但無論怎樣，中國都能與這兩者很好地協調起來。中國是一個合格的反法西斯主義國家，同時，它能被英美民主聯盟接受為一名，不妨說，光榮的成員。至少在亞洲的環境中，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的中國表現出戰時所能期望的民主。當時盡管很少有人聲稱中國正在為民主而戰，但是十分明顯，中國人民正拒絕屈服于犯下像“南京暴行”那樣的搶劫和屠殺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整個1938年，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贏得了美國和英國的敬佩。

對中國不幸的是，由于歐洲形勢的發展，剛誕生的全球反日聯盟在1938年和1939年經歷了附加的變化。在這兩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與人民陣線和英美聯盟并存的，還有第三種旨在穩定國際事務特別是歐洲事務的方案。這就是綏靖政策，它是蘇聯倡導的人民陣線，和美、英的專求民主結合的代替品，盡管事實上三者同時都在進行。準確地說，綏靖是一種努力，要恢復某種既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國際主義，[[56]](#_56_Zhe_Li_Suo_Shuo_De_Guo_Ji_Zh)防止世界陷入無望的分裂之中。雖然人們清醒地認識到1919年后的國際主義框架根本不可能恢復，但對于這個方案的倡導者來說，努力結束20世紀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分裂，并重建一個全球相互依賴的機制，至少是可能的。正如經濟力量曾經是20世紀20年代國際主義的基礎一樣，它們同樣被看成這種新企圖的關鍵。國際緊張的根源表現為經濟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穩定，就必須重新建立對所有國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內的工業化、貿易和經濟增長都有利的形勢。這就是綏靖與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別。只有所有主要國家為了經濟重新統一而聯合在一起，綏靖才有意義。法西斯強國必須被納入這一方案；事實上這是對綏靖外交的辯護。當然，這假定德、日、意對沖突的經濟根源同樣感到憂慮，而且愿意同其他國家一道為建立更好的國際秩序而努力。

這種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有過，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國家也曾采取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現在，第一次在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時機似乎成熟了。在大多數國家中，工業總產值已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但世界貿易額仍不足蕭條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來，那么推動一個開放的世界市場以促進貿易和投資，看來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能說服德國和日本致力于這些活動；而不是軍國主義的擴張，那么它們也能成為這個新格局的一部分。綏靖的倡導者們把它看作比人民陣線或英美聯盟好得多的一種選擇，因為后二者有可能轉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國家的軍事聯盟，從而導致分裂而不是重新統一；而綏靖方案卻能避免這樣的對抗。它優先考慮把德、意、日這幾個發達國家重新團結起來，而不是同蘇聯或中國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國人對美、英在1938年推行的綏靖外交感到沮喪。的確，這種外交主要關注歐洲，而不是亞洲。英國政府由于懷疑與美國太親近是否明智，并仍信賴與希特勒共事，所以在9月的慕尼黑協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取悅希特勒。美國歡呼慕尼黑協定是將幫助重建國際主義的一個重大成就。沒有直接涉及亞洲，英國或美國都不愿對日本采取同樣的策略，因為日本遠比德國明顯地具有侵略性。與首相內維爾·張伯倫一起策劃慕尼黑綏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勛爵在5月發表評論：“中國正在為所有守法的國家打一場戰爭，它也附帶地為我們在遠東打一場戰爭，因為如果日本贏了，我們在那里的利益必將喪失殆盡。”[[57]](#_57_Bi_De__Luo____Ying_Guo_Yu_Ta)這絕不是對日本姑息的語言。盡管英國人謹防與日本開戰，但他們愿意支持中國遠遠超過愿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樣，美國人盡管歡呼慕尼黑協定，但他們在亞洲寧愿選擇的道路卻不容置疑。1938年秋開始了美國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貸款的談判，盡管數額不大，但卻是美國的首次正式承諾。這筆貸款宣布前不久，當日本政府發表“亞洲新秩序”的聲明時，華盛頓和倫敦立即對它進行譴責。雖然英、美沒有聯合行動，但英國決心使它的立場與美國的立場接近，并讓日本知道這一點。[[58]](#_58_Tong_Shang_Shu__Di_50__53Ye)蘇聯盡管對日本很謹慎，但對其在遠東的地位信心不斷增強，部分地是由于中國持續對日抵抗，同時也由于蘇聯從東京的理查德·佐爾格[[59]](#_59_Zuo_Er_Ge_Wei_Gong_Chan_Guo)間諜網得到情報，日本不準備同蘇聯作戰。[[60]](#_60_Ha_Si_La_Mu____Su_Lian_Yuan)蘇聯領導覺察到，在這個時候給中國巨大的外援不會冒孤立的危險，并且出現了英美對日本逐漸增加國際壓力的良好時機，而蘇聯的力量將形成這種國際壓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是令人鼓舞的跡象，那么英美在歐洲的綏靖不能不影響亞洲。當斯大林把慕尼黑協定看作資本主義國家意圖彌合它們與納粹德國的分歧的明證，在1939年春夏不斷離開人民陣線以及與英美的合作以求與德國和解時，這一點就變得明顯了。這只是權宜之計，以應付西方政府明顯渴望重新聯合德、意，再次使蘇聯在世界上孤立。盡管這種恐懼被夸大了。但綏靖與人民陣線確實不能共容。當斯大林與希特勒在1939年8月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含義是明顯的；人民陣線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徹底失望了。什么將代替它呢？綏靖也必然受到傷害，因為德、蘇之間的條約當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動重新聯合時所設想的。同樣，反共產國際協定也受到打擊；當反對蘇維埃共產主義國家的法西斯聯盟中的一個成員公開與蘇聯結伙時，這個聯盟就沒有意義了。

對中國來說，這些是驚人的發展。德蘇和解打破了英、美、蘇在世界事務中合作的希望。此外，由于德國公然蔑視慕尼黑協定，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并打算下一步進攻波蘭，英美可能要優先考慮歐洲，但與歐洲各國相比，美國非常不愿意以武力抵制德國。對中國來說，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蘇條約能使蘇聯把大批部隊調至遠東；包括1939年夏沿滿蒙邊境蘇、日兩軍之間小規模戰斗的諾門坎事件，顯示了蘇聯在火力上的優勢。

因此，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美、蘇、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變幻莫測的形勢所代替。隨著德日關系的緊張，特別是看到對美商業條約的廢除，東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調整其政策。廢除該條約是華盛頓于7月宣布的，作為一項單邊行動對日本施加壓力。這種壓力產生了預期的效果，促使東京官員尋求改善日美關系的道路。1939年秋冬之際，在歐洲“假戰事”[[61]](#_61_1939Nian_9Yue_1Ri__Xi_Te_Le)期間，日本和美國進行對話以查考能否對時局取得共識。如果取得成功，他們可能在日本在華勢力實際存在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穩定。假如中國人知道倫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議會副議長R.A.巴特勒，正含糊其詞地談論恢復英日聯盟作為控制遠東危機的一種手段，他們會更加失望的。[[62]](#_62_Luo____Ying_Guo_Yu_Tai_Ping)

然而給自由中國以災難性打擊的遠東綏靖并沒有出現。英美兩國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納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堅持的條款。盡管需要改善關系時東京主動向華盛頓和倫敦提出倡議，但它不能放棄在中國的作為；因為它約束不了它的軍方。甚至在日本政府尋求同倫敦和華盛頓改善關系時，它不得不宣稱建立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傀儡政權，它肯定料到這一舉動會破壞與西方的任何談判。一位英國外交官寫道：“在我們采取某種態度對待中國的新政權以前，讓我們了解它能博得誠實的中國人的多少支持。而首先讓我們了解在即將到來的商業條約談判中，日本將如何使美國政府感到滿意，不讓楔子敲入我們與美國人之間。”[[63]](#_63_Tong_Shang_Shu__Di_124Ye)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歐洲戰爭把英國和美國拴在一起了。英國和美國再度結為伙伴，不包括蘇聯的參與，也不對法西斯國家讓步。這是一個真正為保衛民主的雙邊聯盟（羅斯福總統稱他的國家為民主的武庫）。力量與理想牢固地結合起來了；如萊因霍德·尼布爾在他的《基督教和強權政治》中所寫的那樣，沒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為袖手旁觀只會鼓勵進一步的侵略。和平不再是一種能生存下去的選擇，它當然不是那種不采取行動、裁軍、對法西斯國家妥協的和平。因此隨著人民陣線和綏靖的消亡，1940年的國際事務體現了英美聯盟的明顯興起。余下來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僅運用于歐洲，也運用于亞洲。

當1940年德國突然進攻法國，使歐洲戰爭和東亞戰爭融為一體時，英美聯盟的全球化完成了。它幾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領導人與德國結盟的興趣。德國在歐洲的勝利為日本攫取中國以南地區、切斷重慶外援并獲得這一地區的豐富資源，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時機。對柏林來說，與日本結盟會把美國困在亞洲，使它不能插手歐洲。這樣的邏輯不可避免地產生了1940年9月的軸心同盟。它也使兩場戰爭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專注于保護英國可能意味亞洲處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棄對德妥協，而日本和德國又緊密聯合，它們決不會犧牲中國以取悅日本。所有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國的重要性，像1938年以前那樣。當然，這次蘇聯不是親華聯盟的一部分。1940年末，當希特勒顯然將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并把矛頭指向蘇聯時，斯大林尋求與日本改善關系，以避免兩線作戰。蘇聯緩慢地但正確無誤地與日本實現了睦鄰關系，于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協定。至此蘇聯明確地放棄了歐洲和亞洲的人民陣線。與此同時，日益增長的美國和英國對中國的支持正被東印度的荷蘭人加強。盡管荷蘭已淪陷于納粹，荷蘭的殖民地政府仍維持其半獨立存在并頑強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荷蘭官員們與他們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對日本的共同綱領。這產生了所謂ABCD集團——美國、英國、中國和荷屬東印度——這盡管不是一個明確的實體，但它至少準備聯合行動，并對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壓力。日本人非常擔心在亞洲孤立，而這正在成為現實；他們同德、意的結盟卻于此無補。軸心同盟無助于日本對付“ABCD的包圍圈”。

于是中國發現自己再次成為防止軸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聯盟的一部分。中國的地位現在似乎更安全多了。她的命運與美、英聯結在一起。美國把中國納入其全球戰略，特別提供航空專家、“志愿”飛行員和飛機組成飛虎隊，同在中國的日本空軍作戰。當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時，華盛頓立即把援助計劃既運用于英國，也運用于中國。倫敦相信美國的支持，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政策。在1940—1941年之間的冬季，英美戰略會談（所謂“ABC”會議）重申歐洲戰場的首要地位，同時與會各方也同意協調太平洋的戰略行動。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領導人承諾要維護世界的民主，中國也成為他們為民主而戰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由于成為爭取主權的全球性戰斗的一部分，中國能得到保證從日本獲得最后解放。這就無怪1941年全年斷斷續續地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談判毫無結果。這些會談反映了日本的絕望以及通過請求華盛頓壓迫重慶結束戰爭以離間美國和中國的策略。美國官員雖然同意繼續會談，但主要是為了爭取時間作軍事準備，沒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國的想法。

當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軍隊攻擊斯大林的軍隊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納粹的侵略使蘇聯加入英、美、中聯盟。德蘇戰爭對美國來說意味著西部戰線的緩和。同時迫使蘇聯將其軍隊從亞洲調出以保衛歐洲蘇聯。當日本決定不從背后進攻蘇聯而繼續保持中立時，中國人意識到他們只能從蘇聯得到比過去少得多的援助。然而蘇聯重新參戰使人民陣線得以復蘇，并加入英美聯盟。中國現在是這個綜合性聯盟的一員，也將遲早成為取得勝利的盟國中的一員。如倫敦《泰晤士報》通訊員從重慶發回的報道提到的那樣，按照中國人的觀點，“德國對蘇聯的進攻終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ABC陣線的領導下，聯合起來反對侵略勢力”。相比之下，日本的處境據認為變得“更危險，經濟上困難重重，眾叛親離，并企圖從事某些行動，這些行動可能很容易使它與蘇聯、英國、東印度，可能還有美國發生公開對抗，這時候它有100多萬軍隊困在中國”[[64]](#_64_F10904_280_10_Jian_FO371_276)。這種觀點反映出中國確信終于成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為世界關鍵性強國之一。

德國襲擊蘇聯后，全球大戰的觀念變得更清楚了。現在英美聯盟和蘇聯共產黨人一道共同承擔著打敗軸心的任務。人民陣線與民主聯盟融為一體。一位美國作家稱這種新的聯盟為“世界民主陣線”，這一稱謂很妥帖地包含了先前的兩種概念。[[65]](#_65___Xin_Gong_He____Di_105Juan)美國的民主將不僅對本國而言，它將成為全球爭取自由運動的一部分。這種新的國際主義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會晤結束時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得到了詳盡的論述。這就是大西洋憲章。這兩位領導人保證，兩國不僅要協調它們的軍事資源和戰略，還要為創造一個更安全和公正的國際秩序而合作。大西洋憲章列舉了一系列準則，如自決、經濟上相互依存、國際合作、集體安全以及裁軍。中國贊成這些準則，愿加入英美民主聯盟，并使對日戰爭成為全球為民主而斗爭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如《朝日新聞》評論的那樣，大西洋憲章預示美國站在英、蘇一邊，準備參戰，它也表明要努力呼吁歐洲和亞洲人民，根據新的準則與美國和英國聯合起來，孤立德、意、日。[[66]](#_66___Zhao_Ri_Xin_Wen____1941Nia)

日本明顯地處于守勢，它被迫進行兩種選擇，要么努力與英美兩強和解，把它們與中國拆開，要么放棄所有這樣的打算，并鞏固它的亞洲帝國。事實上東京同時尋求這兩條途徑。一方面，華盛頓會談在大西洋會議后重新開始。甚至在首相近衛被代表軍隊好戰姿態的東條英機將軍接替時，還認為明智的做法是繼續談判，看美國是否愿意恢復與日本的貿易，減少其對中國的承諾，并避免在太平洋攤牌。當然任何一項這樣的協議對中國領導人都是一個打擊，所以他們對華盛頓會談極為敏感。倫敦也不希望美國以犧牲中國為代價對日本讓步；讓步只會壯日本的膽，并減少美國在太平洋上軍事卷入的可能性。因此在1941年9—12月期間，中、英兩國官員彼此保持密切接觸，焦急地等待華盛頓會談的結果。如英國大使從重慶報告的那樣，“普遍存在一種不斷增長的恐懼感，擔心美國政府出賣中國人，我們也跟隨他們”。英國尋求向中國人保證“美國有出賣中國的想法”是不可思議的。他們都“在進行同一場戰爭，無論在歐洲或者在太平洋”。[[67]](#_67_F8496_60_10He_F9109_60_10_Ji)11月底，當蔣介石和丘吉爾聽到在華盛頓已達成妥協風聲后，他們兩個通知羅斯福這樣一種意見：全球性的民主聯盟已經形成，絕不能因與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犧牲中國。總統接受了他們的論點，考慮到這個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絕了妥協的建議。他已別無選擇。可被重慶和倫敦接受的唯一與日本的協議可能是遵循11月26日的赫爾照會的路線，要求日軍從中國以及印度支那撤出，并勸說日本民族回到20年代的國際主義。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加入民主陣營，否則仍被擯棄。

日本人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除非他們向美國，因而也向中國，作出巨大讓步，他們將繼續面臨西方列強的強硬反對，并準備甚至冒戰爭風險來保衛他們的戰果。這就是他們在1941年秋，甚至在華盛頓會談期間制定的戰爭計劃背后的推論。日本軍政領導設想華盛頓協商不會取得結果，他們決定在不久的將來，除中國外又冒對美、英開戰的可能性。進行戰爭最有效的方法將是建立一個占有東南亞豐富資源的堅不可摧的亞洲帝國。與此同時，日本的軍事力量應打擊美、英的艦隊，以肅清對帝國構成潛在威脅的區域。9月初制定的計劃表明，日本決心同世界的主要強國進行較量。日本將建立亞洲霸權以防御其孤立地位。

在最后時刻，日本只需同意美國提出的條款，特別是認可大西洋憲章、赫爾照會以及表達美國國際主義的有關文件，戰爭就可以避免。這相當于接受這樣一種觀念：日本繼續作為英美二強界定的國際社會的一員，并受其準則的指導，包括承認中國的主權和獨立。盡管有少數日本領導人準備在這樣的基礎上尋求和平，但對東條內閣和軍方來說，這一方針意味著放棄1931年以來他們曾為之奮斗的一切。面對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強或向它們挑戰的選擇，日本選擇了挑戰。1941年12月戰爭開始。

太平洋戰爭將中日沖突和日美戰斗融為一體，使中國成為反軸心國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資格成員。自1931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能感到他們真正是全球性聯盟的一部分。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與日本，1941—1945年

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成功地占領了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緬甸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把中國從外部世界隔離開來。有兩年，僅存的供應線是飛越喜馬拉雅山東端的空運，或從蘇聯經新疆的西北陸路。就全球軍事形勢而言，這種隔離使中國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戰和空戰，或爭奪南海灘頭的殊死戰斗，都比中國的小規模戰斗更具決定意義。幾乎從太平洋戰爭一開始，形勢就引起了這樣的看法：中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聯盟手里，而中國人對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僅兩周后，一位英國上層官員評論道，“中國人將回去坐著，而讓美國和我們去打日本”。他接著說，即便如此，中國還將聲稱在打敗敵人的過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戰后和平磋商中堅持其發言權。[[68]](#_68_F14155_13469_10_Jian_FO371_2)

中國軍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強國地位這一反常現象，隨戰爭進展變得更加明顯。當然，這離中國的愿望還很遠。從一開始起國民黨領導層就堅持作為統一指揮下的老資格參戰國加入聯盟。蔣介石并不掩飾他的懊惱：有關戰略問題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說丘吉爾了。丘吉爾定期赴華盛頓與羅斯福討論軍事計劃。除了1942年1月成立聯合國——這是一個松散的機構，包括所有與軸心開戰的政府（它們發表聲明遵守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同盟內部在亞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緬印戰區。但即使在這里，中、英、美的軍隊有他們各自的指揮官，而且他們之間極少制度化的配合。美國將軍約瑟夫·史迪威作為羅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慶以負責統御該戰區的美軍，并任蔣介石名義上的參謀長，但他與蔣介石之間明顯缺乏聯系。中英關系除暴風雨外沒有別的。印度英軍司令部與國民黨領導層對在緬甸的軍事行動經常存在分歧。簡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亞洲國家之間沒有正式的抗日聯盟。

這種不盡如人意的局面沒有阻止中國人在戰爭期間和戰后提出將他們的國家作為國際聯盟中的一個關鍵成員。中國曾長期單獨對抗日本，對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中國帶頭建立這種聯盟，勝利后它應當繼續作為戰后國際秩序的構架。如1942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時《大公報》社論指出的那樣，當中國弱小又毫無準備時，蔣介石毅然決定抵抗日本侵略，因為他和他的同胞們知道他們的朋友們將及時加入他們的隊伍。1941年11月美國拒絕了日本的條款，這清楚地表明羅斯福和丘吉爾不會犧牲中國。因此，中、美、英是“天然可靠的盟友”，而且應永遠保持下去。聯盟合作將來應繼續下去，由一個強國——中國——受委托監督日本。1943年1月《大公報》社論聲稱，戰時聯盟注意到朝鮮獨立以及臺灣、琉球和滿洲回歸中國。中國人“全心全意”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體安全體系。[[69]](#_69___Da_Gong_Bao____She_Lun__19)一勞永逸地鏟除日本軍國主義是必要的。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中國領導人把日本人民和他們的軍方區分開來。關于摧毀天皇體制的可行性，中國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終將日本重建成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應當是可能的。當然，中國將密切注視這種轉變。因此，只有當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時，才可能有一個民主的日本。[[70]](#_70___Da_Gong_Bao____1943Nian_1Y)

要實現這種充滿自信的夢想，既依賴于中國人實現他們作為主要世界強國所提出的主張的能力，也依賴于其他國家接受這種觀念的愿望。1943年11月開羅會議前，蔣介石個人從未被邀與美國或英國領導人會晤。丘吉爾從不掩飾對把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的觀點的輕蔑。確實，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極力推動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貫相信中國牽制日軍的戰略重要性。但他并不歡迎在戰后世界聯盟中中國成為一名顯要成員的可能性。1943年3月羅斯福會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時堅持“在解決世界問題時，需要把中國和其他世界強國聯合在一起”，丘吉爾立即反駁，“說中國是一個與英、美或蘇聯平等的世界強國是非常錯誤的”。他否決了外交部的下列聲明：“在解決我們將面臨的廣泛的世界重建問題時……我們把中國視為將作出最大貢獻的四個領導強國之一。”戰后中國作為主要強國之一的地位將給它在世界各種事務中發言權。但丘吉爾寫道：

中國將對歐洲事務有“禮儀性以外”的發言權，或者為了歐洲的目的中國應被列在法國或波蘭或取代奧匈帝國的任何國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歷史悠久和光榮的國家，像荷蘭、比利時、希臘和南斯拉夫之上——這種想法只能說不予考慮。[[71]](#_71_PREM4_28_9He_30_1_Lun_Dun_Da)

盡管英國當局持這種否定的觀點，但它還是和美國一道于1943年初同國民政府簽署了新條約，正式地廢除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這是針對日本有關英美帝國主義宣傳的一個象征性姿態，但同時也是支持中國主權的一個重要步驟。更為重要的是，丘吉爾同意了美國關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開四國外長會議的提議。在美國看來，這次會議是保證四強聯合行動的開端，“為締造并維持和平與安全，確保戰爭徹底進行的聯合行動，將繼續下去”[[72]](#_72_Mei_Guo_Guo_Wu_Yuan____Zhan)。這一思想是戰時美國觀念的產物，上面引用的羅斯福的話最恰當地闡明了這種思想，因為美國官員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遲早會發展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化的軍事強國，與19世紀中葉以后日本的成長相匹敵。日本已開始成為國際社會中可信賴的一員，后來背離了。這種情況絕不應允許在中國重演。與中國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證是開始讓中國更充分地與其他強國聯系起來，使它不至于自行其是。盡管這種想法給大部分英國官員的印象是美國的浪漫主義，但美國成功地召開了莫斯科會議，美、英、蘇、中四國外長簽署了一份保證戰后繼續合作的宣言。此后兩個月內，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會晤，這確實是三位領導人戰時合作的高潮。盡管第四位領導人斯大林未到開羅，因為他對參加對日交戰國的首腦會議猶豫不決，但開羅會議剛結束，斯大林就與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德黑蘭會晤（1943年12月2—7日），因此實際上正式形成了四強合作的框架。在開羅，羅斯福和丘吉爾認可中國堅持的領土變更要求，即臺灣和滿洲回歸中國，以及朝鮮“在適當時候”獨立。12月1日的開羅宣言提到了上述的變化，但對琉球的未來地位未置一詞，這表明美、英不贊同中國認為該群島應歸還中國的立場（研究過這個問題的華盛頓官員曾作出結論，如實現徹底的非軍事化，該群島仍可歸屬日本）。中國人感到振奮，因為他們的領袖終于得到了他應有的世界偉大政治家的地位，他們的國家被確認在戰后國際伙伴關系中將起廣泛的作用。《大公報》社論宣稱，三強把日本降低到佩里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決遠東問題的基本辦法。現在四強將“把太平洋的命運抓在自己的手中”[[73]](#_73___Da_Gong_Bao____She_Lun__19)。不幸的是，開羅會議是英美中戰后合作協議的頂峰，接踵而來的是失望和幻滅。到1944年初，兩件重要的、彼此有關的事使平穩過渡到戰后秩序化為泡影。一件是蘇聯對日開戰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國國內形勢惡化。

蘇聯對日開戰是在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上確定的，經中國人同意，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時中國人要求保證它不致降低中國戰場的重要性。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向盟國，特別是向美國重新要求更多軍事援助。開羅會議后不久，中國請求美國提供10億美元貸款，用來增強中國的武裝力量，以保衛國家，抵抗預料的日本的攻勢，也是為了鞏固國民黨人領導的中國，準備迎接和平的來臨。由于當前必須接受蘇聯在亞洲組建武裝，如果中國將保持戰后國際合作的伙伴地位，那么中國與蘇聯勢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國拒絕了貸款申請。如克拉倫斯·E.高斯大使從重慶發回的海底電報所說，莫斯科會議和開羅會議已經表明盟國把中國視為一個大國的愿望，現在無需向中國提供巨額貸款來證實那一決定。[[74]](#_74_Ru_Jiang_Zhao____Shi_Li_Yu_W)對蔣介石更糟的是，開羅會議后，羅斯福總統和其他美國官員開始對他的領導地位懷有疑慮。在開羅，史迪威將軍和他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使館二等秘書約翰·派頓·戴維斯會見了羅斯福，并表達了對蔣的批評意見。12月31日，戴維斯寫信給哈利·霍普金斯（為引起羅斯福注意），說委員長“或許是使美國人普遍誤認為蔣介石就是中國的唯一中國人”。事實上他不是全國的領袖，而僅是一個派別的首領。“他的哲學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軍事教育、他以前與德國軍事顧問的密切接觸、他與放高利貸的銀行家—地主階級的聯盟，以及他對中國古典著作的陳腐倫理的繼承的不完整的產物。”戴維斯暗示，把這樣一個人作為聯盟支持的唯一對象是錯誤的。戴維斯斷言，真正的中國——更民主，有朝氣，并愿意同聯合國合作戰斗——只能在國民黨領導層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把注意力轉向西北的共產黨人。他們感到共產黨人更像生氣勃勃的“民主聯盟”中的組成部分，應得到盟國支持。如果中國勢將成為國際合作體系的一部分，那么較好的辦法是不僅同國民黨人打交道，而且要與共產黨人合作。高斯斷言，國民黨人“肯定正在漂離互利世界經濟的自由原則”。而另一名官員指出，與共產黨人一道工作，“我們將在他們中間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誠的支持”[[75]](#_75_Zong_Tong_Mi_Shu_Dang_Juan)。

對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的這些形成鮮明對比的認識經歷1944年而得到證實。那一年日本對國民政府控制區的一號攻勢（見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相反，華北共產黨人卻擴大了自己的地盤。1944 年7月，經蔣的勉強同意，美國派了一個觀察組去延安。他們被所發現的事物深深地打動。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報道，“我們已進入一個不同的國家，正會見不同的人民”。他和他的同僚發現延安充滿了活力，在那里領袖與群眾一樣，都在為打擊敵人和建設一個新社會而獻身。毛澤東告訴謝偉思，中國共產黨人愿意在戰時和戰后同美國合作。共產黨人必須用美國武器裝備并由美國軍官訓練，而且美國必須停止只同重慶打交道，而應向國民黨人施加壓力，使它同其他集團分享權力。[[76]](#_76_Mai_Ke_Er__Sha_Le____Mei_Guo)

這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同其他強國在戰時和戰后的合作中作為一個要素出現了。援助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將加劇中國社會內部的緊張并使這個國家保持分裂。但是，為了使權力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較少分裂，必須有一個各種派別的聯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裝力量的統一——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特別是在不發生內戰的情況下去實現。

兩種選擇都包含著風險，而且哪一種都不能保證有效。況且，兩種可能性都會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卷入中國國內政治。無論選定國民黨人為繼續支持的對象，還是施加壓力使之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美國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國和蘇聯將起決定作用。如果國際合作包括中國，這就是不可避免的。列強避免卷入中國政治的唯一辦法將是放棄合作方案，并回到較早的由列強處理事務的策略，把中國降至僅僅是一個消極的觀察員的地位。當然，這將使中國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國際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為烏有。

這些是嚴肅的兩難論，當時各強國并沒有去尋求明確的解決辦法，這并不奇怪。在1944—1945年期間，最有影響的外部因素美國實際上同時執行著三種方案。第一種也是華盛頓最希望的一種，是鼓勵中國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統一。1944年7月，羅斯福總統對這一企圖采取了戲劇性的方式。他請求蔣介石任命史迪威將軍為中國所有軍隊的司令官。他希望統一的指揮將為建立一個包括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鋪平道路，而聯合政府又將保證中國在戰后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伙伴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如重慶大使館強調的那樣，中美合作因此隨國民黨人實行國內改革和分配權力的愿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必要的第一步。[[77]](#_77_Ru_Jiang_Zhao____Shi_Li_Yu_W)

蔣介石開始有些猶豫，然后斷然拒絕了羅斯福的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的請求，從而使這一計劃夭折。這個想法受到共產黨的支持，但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才不為蔣所接受。他不愿順從地放棄他的權力，猜想美國不愿與它戰時盟友攤牌，決定孤注一擲。他是對的，羅斯福退讓了，史迪威計劃流產了。帕特里克·J.赫爾利將軍作為特使被派往重慶以緩和緊張關系，美國的政策當時在他的影響下轉而支持國民黨政權，作為中國的唯一政府。這是第二個方案。盡管赫爾利愿為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從未偏離對蔣的支持，從而逐漸使共產黨人與美國疏遠。

美國不會放棄推動中國用和平手段取得統一的想法，但不會再采取史迪威插曲時的戲劇性做法了。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邁將軍接替，這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中國同其他列強密切合作的觀念的消失。羅斯福認為蔣介石看不到加強中國軍事力量的極端重要性，而感到氣憤。在史迪威插曲后，美國新聞界開始反復評論這樣一個主題，中國不會團結戰斗而寧愿打內戰。這種發展的必然后果是第三個主題的出現：美國賦予中國的不僅在戰時，而且在勝利后作為伙伴的重要性降低了。這一點恰與丘吉爾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認為美國被中國作為一個強國的幻覺迷惑了。丘吉爾在1944年8月寫道，“把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僅一個月以后，隨著史迪威糾紛，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對中國的幻想正在消散”。他說這是因為中國內部不和以及“中國軍事上荒唐的失敗，盡管美國已做出努力”。[[78]](#_78_PREM4_30_11_Shou_Xiang_Wen_J)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里，艾賽亞·伯林大約在同時作出這樣的評論，“在官場上對中國的評價從沒有更低過……中國正在得到吐勃魯克后我們所受到的待遇。相比之下，我們自己的地位提高了”[[79]](#_79_Ai_Sai_Ya__Bo_Lin____Hua_She)。倫敦的戰時內閣同意這種看法，指出“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間的摩擦，英國的地位已得到改善”[[80]](#_80_FE_44__CAB96_5_Nei_Ge_Wen_Ji)。

在1944—1945年之間的冬季，美國把它同英國和蘇聯的關系加強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致自夸的四強合作正蛻變為三強聯盟。1945 年2月，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舉行會晤。如中國當時及以后正確判斷的那樣，這次會議結束了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正式伙伴關系的觀念。在雅爾塔，斯大林再一次保證打敗德國后大約三個月向日本開戰；他也重申了他的條款，而三位領導人同意戰后蘇聯將重新得到南庫頁和千島群島，租借旅順口海軍基地確立在大連——將國際化——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滿洲鐵路——將設置一個中蘇聯合機構來管理——上的優勢權益。沒有同中國磋商作出這些讓步使蘇聯在東北亞建立強大的勢力范圍合法化，同時使中國的地位相應降低。丘吉爾和羅斯福都是這樣看待形勢的；蘇聯在亞洲也像在歐洲那樣將獲得有影響的地位，蘇聯的這些勢力范圍，連同英美自己的勢力范圍，將決定戰后全球的狀況。包括中國在內的戰后四強合作前景已經消逝。而美、蘇、英——越來越明顯，前兩者將與眾不同地成為一對超級大國——將作為和平后世界的決定者和保證人。這樣的安排把中國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雅爾塔會議承認國民黨政權為中國的合法政府。斯大林同意羅斯福的觀點，在中國政治中，蔣介石應保留統治者的形象。[[81]](#_81_Sha_Le____Mei_Guo_Shi_Zi_Jun)

蘇聯的興趣是和蔣打交道，并使他承認雅爾塔會議在滿洲的讓步。當然斯大林不能忽視中國共產黨人，但顯然他不相信他們不久將成為政權的有力的競爭者。他也不堅持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他最關心的是占領東北亞戰略地區，而且他斷定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國協商，他向羅斯福保證，蘇聯將同國民黨人談判使滿洲協定合法化。而重慶所擔心的是犧牲中國主權和大國地位。唯一能表明三位戰時領袖愿意視中國為主要伙伴的是，他們依然保證中國作為將建立的新聯合國組織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也將增設法國為常任理事國，這意味著幾乎沒有考慮在滿洲的讓步和中國的分裂。這三個大國發表了一個關于解放后的歐洲的宣言，要求每一個被解放的國家建立代議制政府，而對中國卻沒有這樣的聲明。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愿意讓中國自行其是。沒有一個統一的代議制政府，中國要求作為一個大國可能是令人驚訝的，但這三個西方國家既不鼓勵產生這樣的政府，也不支持這些要求。

這就是1945年初一度強大的民主伙伴關系的情況。中國曾被完全結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國家的聯盟中去，但美、蘇在世界事務中日益增長的霸權主義卻使這個全球性民主陣線黯然失色。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既有賴于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也有賴于美蘇關系的發展。

此外，從雅爾塔會議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六個月里，美國的政策重新出現戰前的國際主義傾向。先前的國際主義曾采取向德、日妥協的形式，以誘導它們重新加入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國，成為開放的國際體系的一部分。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聯盟所取代，但是國際主義的想法從未完全消失；它保持著足夠的彈性，為諸如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宣言之類的戰時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礎。在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國際主義的構思再次影響著美國的政策，因為美國現在必須澄清它對戰后德國和日本的對策。盡管美國的官員們在對待德國方面存在分歧，但對日本的看法卻非常一致。他們認為，戰敗的日本應被剝奪它的戰爭機器，并徹底受到控制，使它不致對和平再次構成威脅；但同時也應鼓勵重建的日本作為開放的國際社會的一員，發展它同其他國家的和平商業交往。美國將同這樣的日本重建伙伴關系，像30年代日本開始尋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樣。

這些觀念雖然不是美國1945年亞洲政策的主調，但卻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至少對結束太平洋戰爭有點影響。這反映在美國愿意考慮終止敵對行動，只要日本無條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證，美國及其盟國不堅持征服日本。7月底哈里·S.杜魯門總統、克萊門特·艾德禮首相和斯大林會晤后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證，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裝，懲罰但不奴役或摧毀日本，日本終于將被允許參加世界貿易關系。并且，日本人民將得到鼓勵去建立一個他們自己的“愛好和平和負責任的政府”。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論法律上的細節怎樣，這意味著日本將再次被納入國際主義秩序，并在將來某時作為國際社會中一個盡責的成員出現。

## 中國戰后的衰落，1945—1949年

在戰爭結束時，中國的對外政策必須對付兩種傾向：一方面是重新結合主義的復蘇，即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蘇、美兩大強國的成長，世界范圍的民主聯盟在消失，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中國的相對地位都將受到損害。1945年春和初夏，形勢變得更加復雜了。隨著羅斯福總統在4月逝世和德國在5月投降，美蘇關系緊張已很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緊張關系出現在英美民主聯盟與蘇聯發起的人民陣線之間。二者在1941年后，曾合并為全球性的民主陣線，但從未完全統一。在雅爾塔，這兩個組織曾結成三強體制以解決戰后問題，但三者未能維持聯合行動的穩固框架。蘇聯一心想在東歐建立“友好的”政權，并將其勢力范圍擴展到那里，美國在下列二者之間莫衷一是：順應這種發展使大聯盟中人民陣線這一成分繼續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聯盟這一成分以保證被解放的歐洲的代議制政府。

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但是沒有一種把中國置于世界舞臺的中心。在戰爭結束時，中國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戰后經濟發展的戲劇性事件中處于次要地位。當然這種情況，主要應歸咎于中國內部的事件，因為中國人從未能通過和平手段建立統一的政府。日本剛一投降，內戰便爆發了。由于國民黨人作殊死戰以逃脫共產黨人的挑戰，中國陷入一片混亂。

在緊接的戰后幾年里，國民黨發言人和新聞界對國際合作和中國愿為世界秩序分擔責任這一主題反復闡述。這些話題極好地配合了國民黨人的內部計劃。強調國際團結與合作意味著其他強國將幫助國民黨政權進行戰后建設事業。這樣的合作將提高政府的聲望。保持國際合作的框架是絕對重要的，否則國內反對派可能轉向外國尋求幫助，或者外國政府可能對中國采取不一致的政策，以致損害國內的政治統一。[[82]](#_82___Zhong_Yang_Ri_Bao____1945N)

與此同時，共產黨人擔心大國的合作主要將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認的政府，它將利用這個機會撲滅反對派。為此，有必要如毛澤東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樣，強調國際合作應以促進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代議制政府為目的。他們奮力爭取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并歡迎喬治·C.馬歇爾將軍的調停。這次調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續了一年。然而共產黨人同時又擔心美國、英國，甚至蘇聯可能默許國民黨控制中國，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國際合作這個主題時，鞏固和擴大他們在滿洲和華北的根據地也是重要的。[[83]](#_83_Jian_Gang_Bian_He_Zhong_Dao)當馬歇爾將軍努力調停無效而內戰加劇時，共產黨終于公開指摘國際合作思想是掩蓋美國帝國主義野心的假面具，并譴責國民黨人犧牲國家利益以迎合這些野心。而國民黨人方面則越來越轉向美國，尋求支持以對付共產黨人。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作為世界舞臺伙伴地位的理想被兩個大國集團之一的成員地位所掩蔽，這兩個集團當時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國聯盟。

國際合作主題的消失，或者換個說法，美蘇冷戰的開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們回憶起戰時合作曾包括三個成分：人民陣線、民主聯盟以及重新結合主義。對德國和日本的勝利極大地削弱了人民陣線的理論，盡管國家領導人繼續空談它的反法西斯斗爭基本原則。現在要把這個構想用于戰后和平協商以保證根除軸心軍國主義。但它難以應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義之類戰后新問題。在這些問題以及有關問題上，出現了一種返回英美民主聯盟的傾向，它強調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在美國和英國兩國，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蘇合作，再現為最合理的戰后政策框架。與此同時，既然各國政府最為關心的是戰后廢墟的重建，重新結合這個主題的影響擴大了。恢復經濟需要戰時保持甚至增加了財富的美國的大力幫助；而美國官員勁頭十足地制定關于地區的統一和發展、全球貿易的恢復和擴大以及世界財政的重新穩定等原則。到1946年底，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話題：歐洲經濟的聯合，亞洲地區的發展，德國和日本的重新結合。這些話題強調德國和日本的恢復和重新結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綏靖政策同樣強調發展先進工業國家的全球性網絡，在它們之間自由交換商品和資金。

在這樣的背景下，冷戰意味著人民陣線的衰落及其因另外兩個話題——英美合作和重新結合（綏靖主義）——而顯得無足輕重。顯然，就人民陣線曾經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綏靖主義的重新出現就不是偶然的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冷戰意味著用美、英、德、日間的新的聯合取代美—蘇—英聯盟。

這種發展將中國置于何地是相當清楚的。誠然，在美—蘇對抗意義上的冷戰起初并未沖擊亞洲。中國的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怠于把這種框架用于他們的國家。至少到1947年，國民黨人仍強調全球合作的主題，他們顯然相信美、英、蘇、中之間的合作框架仍為亞洲的安全和國民黨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證。當然，這種合作的一個關鍵是蘇聯遵守1945年條約。[[84]](#_84___Zhong_Yang_Ri_Bao____1947N)就共產黨人而言，它從未甘心接受讓莫斯科承認國民黨政權為中國合法政府的這個條約。盡管他們并不掩飾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同蘇聯一致，但他們不能確定在多大程度上他們能指望蘇聯支持以反對國民黨人。因此，假定蘇聯將卷入中國作為與美國全球對抗的一部分，從而制定他們在中國內戰中的戰略，那是不現實的。如岡邊辰巳曾指出的那樣，共產黨領導層想出一個兩強之間中間地帶的理論，認為它正在為擺脫美帝國主義而斗爭。根據共產黨的看法，正是這種斗爭，而不是冷戰，提供了中國內戰的直接背景，并證明了全面進攻蔣介石軍隊在戰略上的正確性。[[85]](#_85_Gang_Bian_De_Lun_Wen__Zai_Yo)

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雙方的假定都是正確的，他們假定冷戰對中國或對整個亞洲都沒有直接關系。美蘇競爭和對抗在伊朗、希臘和土耳其等國表現最為明顯。在這些地區，美國正逐漸取代英國作為與蘇聯對抗的主要力量。此外，在1947年以后，西歐的恢復和集體防御成為美國政策的主要目標，而蘇聯則以鞏固它對東歐的控制對這些動向作出反應。在這種形勢下，亞洲大都處于附庸地位。戰后遍及世界不發達地區的國家主義浪潮使時局變得復雜，而這一浪潮在亞洲表現得最為顯著。但是亞洲的國家主義同蘇聯的戰略只有松散的聯系，而與英美的牽制戰略也不能適當配合。如倫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干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

我們面臨強烈的國家主義，它在國際關系中是棘手的。盡管原來由日本倡導的泛亞細亞思想產生東方與西方分裂的危險，但事實上亞洲國家間幾乎沒有凝聚力，或許可以這樣說，和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相比，亞洲鄰國之間的恐懼、不信任甚至厭惡更為強烈。然而，亞洲國家主義對有西方統治或指導氣味的任何事情都異常敏感……很不幸，東南亞及遠東各國正當蘇聯尋求控制整個歐亞大陸的時候，將經歷它們的這一發展階段。[[86]](#_86_F17397_1055_6109_Jian_FO371)

這種情況使美國和英國很難設計出一個與亞洲國家共同抑制蘇聯的有效策略。事實上，早在1947年英國允許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這是英國作為亞洲強國地位下降的征兆——減少了它在該地區的承諾。美國猶豫不決，因為它擔心會被看成是殖民主義的支持者。美國在東南亞除鼓勵歐洲國家讓給當地人民更多的權利外，沒有發揮什么作用。在這種環境下，英國和美國對待中國內戰的方針幾乎沒有結合。在那里這兩個國家從來沒有像它們在歐洲或中東那樣密切協調它們的行動；事實上美國在中國完全是單邊行動，常使英國官員感到煩惱。

到1949年，當共產黨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個中國的時候，美國的“徹底失敗”，像一位英國官員所說的，已很明顯。美國既不曾阻止共產黨取得政權，也沒有為接受既成事實而準備條件。事實上是沒有政策。相比之下，英國已經開始調整它的方針，并考慮承認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1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倫敦的官員以及他們在亞洲的代表同意，“英國在中國和香港的利益要求盡早從法律上承認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外交部通知美國：“國民政府是我們過去戰時的盟友，并且在聯合國中曾經是有益的朋友。今天他們只代表統治集團，而且他們對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英國必須接受事實，并通過承認新政權，為中國和蘇聯出現分裂的那天做好準備。[[87]](#_87_F16589_1023_10_Jian_FO371_75)在這里，英國的政策再次沒有像在歐洲那樣以英美合作反對蘇聯為轉移，而是以在同中國緊密聯結的可能框架中尋求自己利益的意向為轉移。與冷戰本身無直接關系。

馬歇爾的使命失敗以后，美國政府繼續對蔣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但這更多的是為應付國內的壓力。在美國，某些人民陣線往昔的倡導者（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錢伯斯，弗麗達·歐特利等）正以冷戰斗士的面貌出現，并指控其他人（阿爾杰·西斯，歐文·拉鐵摩爾等）曾受蘇維埃共產主義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蘇共的代理人。杜魯門政府為了使這種反共不力的指責無效，擴大了對國民黨政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共計35億美元。但是這一援助計劃并不意味美國站在國民黨人一邊大舉卷入的承諾。在人們認為集中力量保衛西歐和中東部分地區現狀最為重要的時候，無論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于1947年），都不愿意將國家資源分散。

蘇聯對中國局勢的發展也非常謹慎。似乎是為了避免給人以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人共謀的形象，蘇聯繼續把國民黨人作為中國政府對待，當國民黨人被逐出南京后，蘇聯大使與他們一道去廣東。為了怕激怒美國，斯大林不愿公開支持共產黨人。和杜魯門或艾德禮一樣，他不愿意把冷戰擴大到中國。如果說有區別，那就是蘇聯政府企圖與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建立聯系，以保護蘇聯在中國東北（滿洲）的利益。[[88]](#_88_Zhong_Dao_De_Lun_Wen__Zai_Yo)

上述事態的發展意味著1945年后本應在亞洲，甚至世界事務中起領導作用的中國進入了衰落期。從1945年到1949年，中國一直處在以美蘇冷戰為中心的國際政治主要舞臺之外。它不與任何一方結盟，而兩個超級大國也不希望把它們之間的爭斗擴大到這塊被內戰撕裂的土地上。與此同時，國民黨領導人未能利用抗戰勝利的時機。他們既未得到美蘇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結盟來反對另一方——這些可能性本可較好地保護其地位。

更確切地說，是由他們按照自己的計劃去對付日益自信的共產黨人，后者采取攻勢。1949年，蔣介石和他的追隨者帶著大國地位的夢想去了臺灣島。也許再過20年，中國在一個不同的領導下，會以“第三世界”領袖的角色重新出現在世界舞臺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敵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預料的更早地被帶回國際舞臺。如上所述，按照定義冷戰的意思是舍棄人民陣線以求重新結合，這等于恢復綏靖德、日的框架。事實上，由于戰后的美國外交政策，德國和日本與英國和西歐一起已成為國際穩定的基石，在此基礎上蘇聯及其伙伴將無法破壞現狀。到1949年，美日紐帶正在取代美、中聯系，成為亞太事務的關鍵。

1931年至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的歷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國家與其抗衡的對策，使中國從一個受侵略的弱小犧牲品逐漸轉變為一個世界強國，確定和平的穩定框架中的一個伙伴。但這段歷史也揭示，確定一個國家的地位，在和平時期比在戰爭時期困難。如克勞塞維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樣，在戰爭時期，知道誰是敵人就可制定國家的政略和政策。而在和平時期，就不容易說誰是潛在的敵人。國民黨人給其后繼者留下了一個提高了的國家地位，但也把確定和平時期國家外交政策目標的任務留給了共產黨人。20世紀是一個曾被戰爭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紀，在對它的長期觀察中，仍有待于發現在沒有戰爭時，國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確定和鞏固。國民黨人沒有機會回答這個問題。但這并不全是他們的過錯。

[[1]](#_1_9)1929年2月1日，實行《海關進口稅稅則》。以前進口的貨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稅則把進口貨物分為7類，稅率為7.5%—27.5%不等。1931年1月，把進口貨物分為12類，最高稅率提到50%。1933年5月，把最高稅率提到80%。另外，過去陸路關稅比海路關稅低1/3，新稅則廢止陸路優待稅率，統一海、陸關稅。——譯者

[[2]](#_2_9)關于世界經濟危機期間的中國經濟，見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謝爾曼·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卷煙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年》。

[[3]](#_3_9)《洛迦諾公約》即《洛迦諾保證條約》，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國代表在瑞士洛迦諾會議上通過，旨在相互保證邊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國際和平。希特勒上臺后，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廢除該公約，隨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譯者

[[4]](#_4_9)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1919年6月28日簽訂《凡爾賽和約》。德國人不滿，強烈要求修改條約，這部分人叫改革派。——譯者

[[5]](#_5_9)這里的國際主義，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國際聯盟說的。——譯者

[[6]](#_6_9)查爾斯·梅爾：《改造資產階級的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十年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穩定》；梅爾文·P.萊弗勒：《難以捉摸的追求：美國謀求歐洲穩定和法國安全，1919—1933年》；喬恩·雅各布森：《有20世紀20年代的新國際史嗎？》，《美國歷史評論》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645頁。

[[7]](#_7_9)鶴見祐輔：《太平洋時代》。

[[8]](#_8_9)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湯姆森：《當中國面向西方之時》第1、2章。

[[9]](#_9_9)沈陽事件即“九一八”事變。——譯者

[[10]](#_10_9)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后：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年》。

[[11]](#_11_9)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11—12、19—20頁。

[[12]](#_12_9)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24頁。

[[13]](#_13_9)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41—45頁。

[[14]](#_14_9)同上書，第47、80—86頁。

[[15]](#_15_9)加里·B.奧斯特羅爾：《集體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國與國際聯盟》。

[[16]](#_16_9)羅伯特·D.舒爾青格爾：《外交頭腦的形成：美國外事官員的訓練、觀點和作風，1908—1931年》。

[[17]](#_17_8)W.羅杰·路易斯：《英國的遠東戰略，1919—1939年》。

[[18]](#_18_9)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68—73頁。

[[19]](#_19_9)馬克·R.皮蒂：《石原莞爾與日本同西方的對抗》。

[[20]](#_20_9)臼并勝美：《滿洲事變》，第80—81頁。

[[21]](#_21_9)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國際聯盟和1931—1933年遠東危機》，第110頁。

[[22]](#_22_9)滿史會編：《滿洲開發四十年史》第1卷，第114—126頁。

[[23]](#_23_9)萊弗勒：《難以捉摸的追求：美國謀求歐洲穩定和法國安全，1919—1933年》第8章；戴維·E.凱澤：《經濟外交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

[[24]](#_24_9)克勞斯·希爾德布蘭特（安東尼·福瑟吉爾譯）：《第三帝國的對外政策》第3章。

[[25]](#_25_9)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5—60頁。

[[26]](#_26_9)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頁。

[[27]](#_27_9)斯蒂芬·萊昂·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英國對華政策，1933—1937年》第3章。

[[28]](#_28_9)東四省，即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譯者

[[29]](#_29_9)松本重治：《上海時代》第1卷，第167—191頁。

[[30]](#_30_9)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第34—36頁。

[[31]](#_31_9)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

[[32]](#_32_9)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約翰·P.福克斯：《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1938年》。關于1930年代初期德國通過顧問澤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過翁文灝主持的資源委員會培育國民黨的軍事實力和工業實力，見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希特勒的轉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斷。

[[33]](#_33_9)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1931—1941年的日美關系》，第135頁。

[[34]](#_34_9)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1938年》，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

[[35]](#_35_9)博格和岡本俊平編：《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第108—110頁。

[[36]](#_36_9)舒爾青格爾：《外交頭腦的形成》，第94頁。

[[37]](#_37_9)斯蒂芬·E.佩爾茲：《奔向珍珠港事變：倫敦海軍裁軍會議的失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第56—63頁。

[[38]](#_38_9)松本重治：《上海時代》第2卷，第104—126頁。

[[39]](#_39_9)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186—188頁。

[[40]](#_40_9)佐藤賢了：《太平洋戰爭回顧錄》，第45—52頁。

[[41]](#_41_9)見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1938年》。

[[42]](#_42_9)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第5章。

[[43]](#_43_9)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

[[44]](#_44_9)松本重治：《上海時代》。

[[45]](#_45_9)波多野善大：《國共合作》，第180—192頁。

[[46]](#_46_9)《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

[[47]](#_47_9)阿諾德·A.奧夫納：《美國的姑息政策：美國的對外政策與德國，1933—1938年》。

[[48]](#_48_9)盧溝橋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敘述是寺平忠輔的《盧溝橋事件》。

[[49]](#_49_9)長谷川正：《對立戰爭論》，第164頁。

[[50]](#_50_9)高田保馬：《東亞發族論》，第67—77頁。

[[51]](#_51_8)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共產國際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策略方針，提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譯者

[[52]](#_52_8)福克斯：《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1938年》，第232—233頁。

[[53]](#_53_8)內森·哈斯拉姆：《蘇聯援助中國和日本在莫斯科對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載伊恩·尼什編：《20世紀30年代蘇日關系的一些方面》，第39—40頁。

[[54]](#_54_8)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檢疫隔離”演說。他說：“愛好和平國家必須齊心協力，反對……制造國際無政府主義和不穩定局勢的那些國家。”他建議采取“檢疫隔離”的方法來對付主張孤立的政策，各國政府斷絕同侵略者的正常聯系，施加壓力，以維護世界和平。——譯者

[[55]](#_55_8)彼得·洛：《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英國遠東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34—35頁。

[[56]](#_56_8)這里所說的國際主義，主張和法西斯德國妥協，防止世界陷人戰爭。——譯者

[[57]](#_57_8)彼得·洛：《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英國遠東政策研究，1937—1941年》，第41—42頁。

[[58]](#_58_8)同上書，第50—53頁。

[[59]](#_59_8)佐爾格為共產國際和蘇聯特工人員，從日本近衛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實得到日本決定南進不北進的情報。——譯者

[[60]](#_60_8)哈斯拉姆：《蘇聯援助中國和日本在莫斯科對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第48—49頁。

[[61]](#_61_8)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襲擊波蘭，與波蘭締結有互助條約的英法，于9月3日對德國宣戰。英法與德國雖已宣戰，但一直沒有戰斗。也有人稱為“奇妙的戰爭”。——譯者

[[62]](#_62_8)洛：《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第106頁。

[[63]](#_63_7)同上書，第124頁。

[[64]](#_64_6)F10904/280/10，見FO371/27670，倫敦檔案局外交部檔案。

[[65]](#_65_7)《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頁。

[[66]](#_66_7)《朝日新聞》1941年8月16日（晚刊）。

[[67]](#_67_7)F8496/60/10和F9109/60/10，見FO371/27615，外交部檔案。

[[68]](#_68_7)F14155/13469/10，見FO371/27753，外交部檔案。

[[69]](#_69_7)《大公報》社論，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70]](#_70_7)《大公報》1943年1月29日。

[[71]](#_71_7)PREM4，28/9和30/1，倫敦檔案局首相文件。

[[72]](#_72_7)美國國務院：《戰后對外政策的制訂，1939—1945年》，第553頁。

[[73]](#_73_7)《大公報》社論，1943年12月3、7日。

[[74]](#_74_7)入江昭：《實力與文化：日美戰爭，1941—1945年》，第156頁。

[[75]](#_75_7)總統秘書檔卷：中國，富蘭克林·D.羅斯福文件（海德公園）。

[[76]](#_76_7)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第183—187頁。

[[77]](#_77_7)入江昭：《實力與文化》，第199頁。

[[78]](#_78_7)PREM4，30/11，首相文件。

[[79]](#_79_7)艾賽亞·伯林：《華盛頓通信，1941—1945年》，第448頁。

[[80]](#_80_7)FE（44），CAB96/5，內閣文件，倫敦檔案局。

[[81]](#_81_7)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第211頁。

[[82]](#_82_7)《中央日報》1945年9月12日，1945年11月21、25日。

[[83]](#_83_7)見岡邊和中島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84]](#_84_7)《中央日報》1947年9月6日。

[[85]](#_85_7)岡邊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86]](#_86_7)F17397/1055/6109，見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87]](#_87_7)F16589/1023/10，見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88]](#_88_7)中島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 第十一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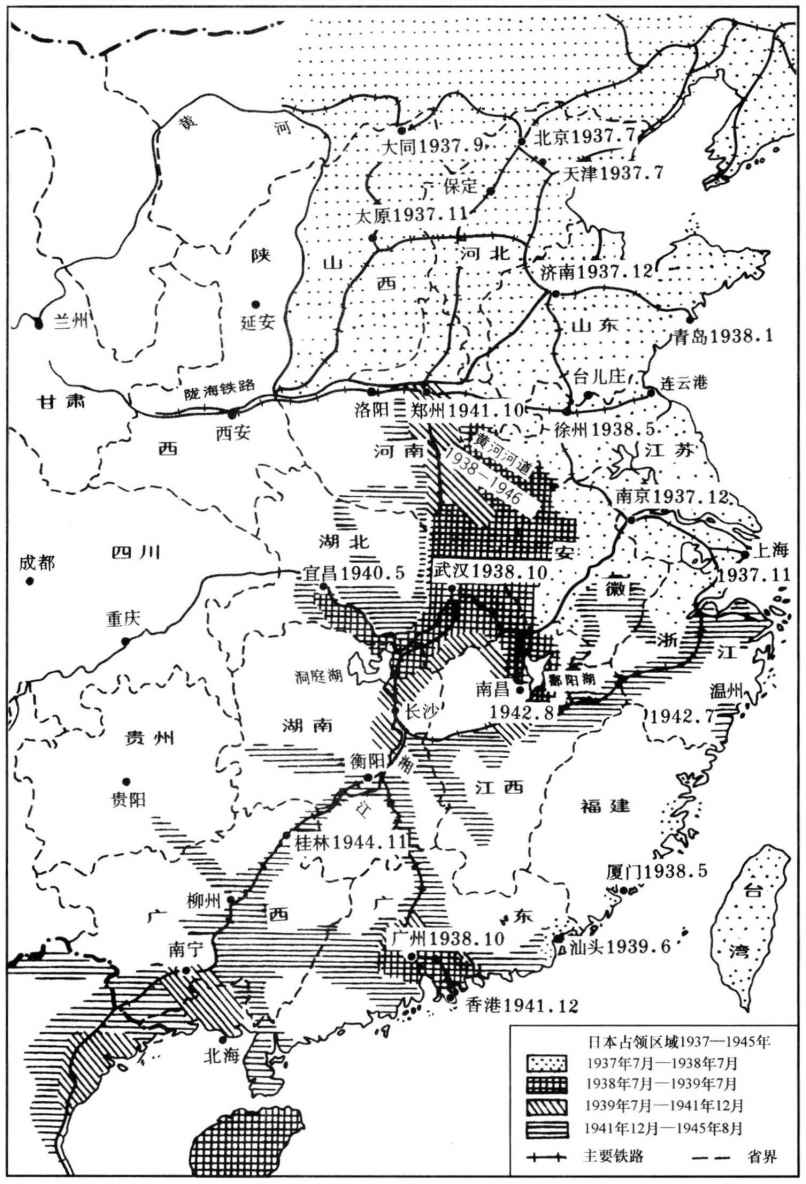
戰爭持續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間接結果是大約1500萬至2000萬中國人死亡。[[1]](#_1_Que_Zao_Ke_Kao_De_Shu_Zi_Bing)財產損失難以數計。而且戰爭結束后，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精神疲憊，風紀敗壞。因此這場戰爭對中國人民造成了驚人的損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同日本的這場戰爭，確實是中華民國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 最初的戰役和戰略，1937—1939年

戰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開始的。按照庚子協定，從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華北的北平和天津間屯駐了軍隊。而在那個和煦的夏夜，一中隊日本軍隊在距北平15公里的盧溝橋（馬哥孛羅橋）附近舉行野戰演習，那里是控制所有與中國南方交通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樞紐所在地。日本人突然宣稱，他們遭到中國士兵射擊。[[2]](#_2_Ju_Shuo__Zui_Chu_Kai_Qiang_De)緊急點名發現，他們的一名士兵失蹤了。于是，他們要求進入附近中國人駐防的宛平城搜尋。中國人拒絕后，他們妄圖猛攻這座城鎮，未能得逞。這就是戰爭的最初沖突。

日本終究必須對這場戰爭承擔責任，這是不成問題的。起碼從1915年“二十一條”要求起，特別是從1931年攫取滿洲起，他們侵略中國的記錄是聲名狼藉的。然而，在盧溝橋到底發生了什么事，以及為什么會發生，仍然是有爭議的。通常中國人爭辯說，日本人蓄意挑起戰端。據稱日本的目標是將華北從南京政府的管轄下分離出去；通過奪取對盧溝橋——宛平地區的控制，他們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從而迫使二十九軍軍長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將軍變成一個順從的傀儡。再則——接下去的論據是——日本人眼看中國人日益團結，打算趁國民黨人變得強大前建立起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支持這種論點的證據是不缺乏的。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類似的事件，占領了橫跨北平至天津鐵路的豐臺。同年晚些時候，他們曾枉費心機地試圖購買宛平附近約1000英畝土地以建造兵營和機場。1937年春，日本的軍事指揮官們也曾擔心宋哲元正進一步受南京影響，從而威脅他們在華北的地位。還有，事變前一個星期里，北平曾處于一種緊張狀態之中，謠傳日本人即將進攻；日本野戰演習在盧溝橋這樣敏感的地點持續了一周。這是異乎尋常，而且擾亂人心的；親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騷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國人，據認為失蹤的士兵已經返回，顯然他從未受到中國人的扣押或刁難。[[3]](#_3_Wu_Xiang_Xiang____Di_Er_Ci_Zh)



地圖8 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軍事占領

但是，這一時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盧溝橋發生事端。1937年，東京政府正在實施一項著重發展工業的政策，作為加強其軍事力量基礎的手段；而參謀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戰軍司令官避免發生可能惹起“國際糾紛”的事件。當然，華北的日軍軍官是以不買他們東京上司的賬著稱的。不過，7月7日日軍在華北的規模和部署說明，野戰軍司令官們并未對事變作過準備。他們僅有5000—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約為這一規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數顯然是在不準備應付盧溝橋沖突的地方從事演習。因此，日本軍隊僅約135人卷入了起初的戰斗。[[4]](#_4_Qin_Yu_Yan____Ri_Zhong_Zhan_Z)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盧溝橋戰端，事變本來無須導致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因為7月19日宋哲元簽署了一項從宛平撤軍的協議，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東京的決策者們發生了較大的原則性爭論，這些爭論把兩個國家推入全面戰爭。國民政府認為，任何僅由北平地方當局決定的解決辦法，都會支持日本提出華北脫離其管轄范圍的要求。因此，它堅持維護中國在華北的全部主權。它還把幾個（2—4個）師從華中推進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對華北日軍形成巨大威脅。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國民黨權力排除出華北的原則作為其政策的基礎。在中國人顯示力量面前，他們決心不向后退。因此，他們開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強他們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與宋哲元的軍隊再次沖突。三天以后，華北的日本司令長官宣布了“一場對采取行動損害日本帝國威信的中國軍隊進行的膺懲戰”[[5]](#_5_Bi_En_Lai____Ri_Ben_Zai_Zhong)。四天之內，數以千計的中國守軍陣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個平津地區。當時雙方政府的政策都變得強硬起來。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于7月27日聲稱，他決心取得“中日關系的根本解決”[[6]](#_6_Ke_Lao_Li____Ri_Ben_Tan_Qiu_Z)。而蔣介石也于7月30日聲明：“現在我們唯有領導全國民眾，舉國一致，斗爭到底。”[[7]](#_7_Tong_Shang_Shu__Di_339Ye)

8月7日，蔣介石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正式決定進行一場全力以赴的抗戰。[[8]](#_8_Xu_Lang_Xuan___Zhang_Ming_Kai)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爭議的一次風險。他決定把戰爭的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南京的戰略家們認為，比起華北的開闊地帶來，上海更適宜于與日本作戰，因為該市的阻塞地區將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后勤能力方面的優勢。對上海日租界[[9]](#_9_Shang_Hai_Mei_You_Ri_Zu_Jie)的攻擊，也會把日本的注意力從北方轉移過來，使那里的中國人有可能加強他們的防御，特別是關鍵省份山西的防御。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報償。中國輿論可能會像1932年一樣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堅定立場的話。再則，在靠近大的外國人社區的地方打仗，也會引起西方列強的關注和同情——還可能進行干涉。[[10]](#_10_Wu_Xiang_Xiang____1935__1945)雖然親國民黨的著述家們依然宣揚蔣的冒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損失可能遠遠超出了他最壞的預料。

蔣介石于8月11日即已命令首批三個精銳師——以德國武器裝備，并由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和他的德國參謀充當顧問——占領大上海界域以內（但在外國人地區以外）的陣地。該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區內（包括公共租界的楊樹浦區和虹口區），以及這個中國城市的北虹口區一個1.5英里長半英里寬的凸角，（見圖8）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倉促增援。但是，當8月13日作戰開始的時候（關于哪一方先射擊，至今仍無定論），中國軍隊約有8萬，日本軍隊只有1.2萬。德國訓練的中國軍隊，有一個星期幾乎把日本人趕進黃浦江。然而，后來日本的增援部隊在該市北面長江岸邊登陸；戰線擴展了；中國軍隊失去了他們起初的優勢。

戰斗是毀滅性的。停泊在附近長江和黃浦江中的日本戰艦上的大炮，猛擊直射射程內的中國陣地。南京政府決心不撤退，投入更多軍隊。在三個月的作戰中，大約27萬中國軍隊——整整60%的國民黨防衛力量和蔣介石現代化陸軍的核心——或死或傷。[[11]](#_11_Liu_Fu____Xian_Dai_Zhong_Guo)日本人的傷亡超過4萬。不計其數的成千上萬平民也遭屠殺。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該市大部地區遭到毀壞。

11月初，日本的一支兩棲部隊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灣登陸，一周內這支軍隊威脅該市守軍后方。中國軍隊向南京撤退。但是，他們的撤退如此慌亂，竟未在滬寧鐵路上無錫附近模仿德國興登堡防線精心構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南京于1937年12月12—13日淪于日本人之手。其后，日本的攻勢放慢了。同時，他們的軍隊干出了這場戰爭中最可恥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殺”。在7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12萬名[[12]](#_12_Nan_Jing_Da_Tu_Sha_Zhong_Bei)中國人被殘忍地殺害，其中許多人被活埋或者澆上火油燒死。約有兩萬婦女被強奸。[[13]](#_13_Liu_Fu____Xian_Dai_Zhong_Guo)中日戰爭已經開始了。

蔣介石曾經長期力圖避免敵對行動。自從1927年國民黨人執掌政權以來，盡管日本曾多次進行干涉和侵略，他卻始終奉行一種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強大的外國侵略者，中國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認日本侵占東北四省（滿洲），締結消除國民黨在華北影響的停戰協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壓力，鎮壓反日的學生運動。然而，從1935年晚些時候開始，反日情緒已經變得如此強烈，致使國民政府覺得對日反應非強硬不可。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逐步開始了戰爭的準備。他大概口頭許諾過他將抵抗外來侵略，換取了西安獲釋。因此，1937年2月他撤換了據說親日的外交部長張群，而且他開始與他長期的敵人——共產黨人談判和解。因此，當戰事在盧溝橋爆發的時候，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抗擊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舉國一致，異口同聲都支持他，在整個一代人中達到了空前的統一。

蔣介石的戰略基于“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則。他敏銳地感到他的軍隊劣于日本，甚至在戰前他即已構想了撤至中國西南偏遠內地的戰略。1935年8月他對一次政治干部集會說，“我們本部十八個省份哪怕丟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14]](#_14_Wu_Xiang_Xiang____1935__1945)。在蔣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仍然處于前現代、前工業階段這樣一種認識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戰能夠持續下去，不管有多少個城市和工廠淪于敵手。萬一入侵的軍隊竟然前進到中國幾乎無邊無際的內地，他們勢必要被截斷補給來源而精疲力竭。偶爾如在上海，他并不堅持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則，然而這個戰略畢竟如他所預期的那樣，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當容易地占領了中國北方和東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鐵路線持續攻擊，迅速推進。但這些交通干線并不穿過華西的山岳和峻嶺，而防守的中國人就隱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蔣介石，日本人沒有事先想好的戰略，甚至沒有要在中國追求的目標。1934—1936年，外務相廣田弘毅系統地提出了日本對華三項總的要求：（1）鎮壓反日活動；（2）事實上承認滿洲國，并建立滿洲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親善關系；（3）中、日間在鏟除共產主義方面合作。但是，廣田三原則的確切含義從來不是清晰的。盧溝橋事變后，日本決策者們關于他們的下一著棋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主要代表軍隊參謀本部的一種意見，反對在中國本部擴張。這幫人爭辯說，日本的戰爭潛力仍是有限的，而當前中國人越來越民族主義化并日趨統一，他們的反抗比前幾年難對付得多。然而，日本大多數領導人——文職的和軍方的——并不了解正在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潮流的重要性。他們記得1931—1932年他們曾輕而易舉地占領滿洲，對中國軍隊極度輕蔑。這些主戰派是如此樂觀，以致他們竟宣稱三個月內就能獲勝。[[15]](#_15_Ke_Lao_Li____Ri_Ben_Tan_Qiu)

在戰爭早期的幾個月里，日本擴張主義者們對中國本部仍只抱很有限的野心。這在1937年11月5日東京政府提議以類似廣田三原則的條款來解決中國“事變”時，變得更為明顯。然而，一直到12月2日，蔣政府也不同意進行談判。那時上海已經陷落，國民黨軍隊正向南京敗退，完全潰不成軍。這些輕易的勝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東京政府不再愿意在其11月建議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取而代之的，是它于12月22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認滿洲國；華北和內蒙非軍事化，償付賠款，以及——最為不祥的——在華北建立一個“特殊的政治機構”，它將促進日本、滿洲國和中國的“共榮”。蔣政府對這些要求不予答復，于是東京在1938年1月宣布它決心“消滅”國民政府。[[16]](#_16_Bo_Yi_Er____Zhong_Ri_Jiao_Zh)

無論這時還是后來的戰爭期間，日本擴張主義者在和平條件中也從未打算在中國本部承擔直接的行政管理責任。但是，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們確實提議實際征服中國，特別是北方五省，以滿足日本的政治愿望和經濟需要。在1937—1938年中國熱情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氛下，這些都是蔣所不能接受的條件，即使他愿意也不行。南京陷落后，中國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擴張主義者們曾經自鳴得意地預期的那樣瓦解。相反，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遷到了重慶，同時蔣介石宣布“焦土”政策，從武漢指揮抗戰。

于是日本人以武漢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標。然而他們首先竭力奪取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主要鐵路的控制權，以聯結他們分散的部隊。這一點他們最終成功了，雖然像在上海一樣，他們偶爾遇到英勇的指揮得極好的抵抗部隊。例如1938年4月初，日本軍隊集結在江蘇北部交通樞紐徐州時，李宗仁將軍的部隊把進攻者誘入四周有城墻的臺兒莊包圍圈。李的軍隊使日軍遭受慘重傷亡——中國人宣稱有三萬日本人被打死——迫使日軍殘部撤退。這是中國的第一次重大勝利，粉碎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但是，如同過去屢屢發生過的那樣，中國人不去追擊被打敗了的敵人，因而他們的勝利是短暫的。徐州于5月19日陷落。華北和南京地區的日本指揮官們，現在可以在即將來臨的武漢戰役中協同他們的行動了。[[17]](#_17_Liu_Fu____Xian_Dai_Zhong_Guo)

日本人1938年6月初在開封遭到另一次顯著的挫折。當他們沿隴海鐵路西進時，中國人突然炸開了黃河的堤壩。沖出河道的黃河漫過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繼而穿越河南平原，進入安徽省，從那里在山東半島的南面——而不是北面——入海。這項戰略卓越地發揮了作用。侵略者暫時被遏止住了，武漢戰役被延長了大約三個月。但是，改變黃河河道的決定曾遭到嚴厲的批評。確實，國民黨人多年否認他們曾有意決堤。因為洪水對中國老百姓的損害甚至超過對日本人的損害。大約四五千個村莊和11個大城鎮盡成澤國。據說有二百多萬人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莊里所能看到的，只是從幾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來的廟宇弧形屋頂，和光禿禿樹木頂端的枝椏。[[18]](#_18_Duo_En____Zhong_Ri_Zhan_Zhen)

然而，在上海、在臺兒莊和在黃河上表現出來的決心，在戰爭初期國民黨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許多中國指揮官猶豫而膽怯。[[19]](#_19_Duo_En____Zhong_Ri_Zhan_Zhen)他們多數享有地方自主權已經很長久了，不會僅僅為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權力的風險。例如，省主席韓復榘可恥地把山東省丟棄給日本人，雖然他與大多數人不同，因違抗蔣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價。他于1938年1月被處決。

雖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漢的曠日持久的戰役中蒙受了重大損失，但他們在大炮、坦克和飛機方面的優勢，使他們終于能在1938年10月25日奪取這座城市。僅僅四天以前，他們實際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廣州。日本戰略家們確實認為，中國人現在要投降了。

國民黨政府某些成員確實對戰爭可怕的破壞感到嫌惡。例如，蔣介石的焦土政策導致的1938年11月的長沙大火等災禍，就是明證。此外，在英國和法國為了與希特勒和平相處，于慕尼黑獻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靠外國干涉反對日本的希望也于1938年9月受挫。只有蘇俄向中國提供援助。有人認為，它之所以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延長戰爭，從而削弱國民政府。因此，有人爭辯說，戰爭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利用國民黨剿共戰役中斷的喘息機會來擴張地盤。

政府中對抗日政策抱有疑慮的人的首要發言人是汪精衛。作為國民黨的副總裁，他名義上是國民運動的第二號領袖人物。汪雖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國民黨內有相當多的追隨者，但他在蔣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權力是很小的。因此，也許是受過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對不能改變那強加于中國人民的抵抗戰略的絕望這雙重動機的驅使，他于1938年12月18日從重慶逃跑了。后來，在日本人的實際支配下，他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維新國民政府[[20]](#_20_Ji_Wang_Jing_Wei_Zai_Nan_Jin)來和重慶政府對抗。[[21]](#_21_Lun_Shu_Wang_Jing_Wei_Bian_J)

在蔣介石方面，他并不顯得垂頭喪氣。他樂觀地宣稱，放棄武漢“標志著我們的斗爭從防御到進攻的轉折點”。[[22]](#_22_Dong_Xian_Guang____Zhong_Guo)盡管這似乎是虛張聲勢，但連日本人也承認，由于未能在武漢把國民黨軍隊打垮，他們已失去速勝的機會。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經撤退到有利于日本軍隊前進的現代交通干線之外的崎嶇山區。日本高級指揮部預料勝利的時間已經不是三個月，也許是三年了。[[23]](#_23_Bu_Tuo____Dong_Tiao_Ying_Ji)

## 中國的戰爭動員

盡管日本反復挑釁，蔣介石還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戰爭推遲了好幾年，他認為他必須首先鎮壓共產黨人，并提高軍隊的素質。但是，到1937年7月，國民黨中國依然可悲地沒有準備好戰爭。因此，在以后的兩年里，他們倉皇失措地將國家置于戰時體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蔣曾特別注重武裝力量的現代化。一個德國顧問團——其中最著名的是漢斯·馮·賽克特和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開始訓練新式的軍官團。為中央軍的精選部隊進口了主要由德國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裝備。建立了空軍的核心，并籌劃用德國建造的潛艇、巡洋艦和魚雷艇裝備海軍。[[24]](#_24_Liu_Fu____Xian_Dai_Zhong_Guo)

馮·塞克特將軍曾特別向蔣強調，高度發達的國防工業對維持一支現代化軍隊是必不可少的。不過就這種工業基礎的明顯的重要性而論，實際成就是太少了。直到1935年，為了發展重工業，才建立國家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于1936年開始一項發展工業的三年計劃，但直到戰爭開始后資金仍嚴重不足。[[25]](#_25_Guan_Yu_Guo_Jia_Zi_Yuan_Wei)因此，1937年國家的國防工業仍停留在草創階段，而軍隊仍繼續大量依賴外國的武器和裝備來源。中國的兵工廠的確生產了大量的步槍和機槍，但幾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載重汽車、石油和無線電設備仍然不得不進口。大約30萬軍隊已經接受了德式訓練，但其中只有8萬全部用德國武器裝備。大約170萬國民黨軍隊的其余部分，以歐洲和日本的標準看，訓練很差，裝備窳劣，而且分屬于無數實際上各自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26]](#_26___Di_Er_Ci_Zhong_Ri_Zhan_Zhe)

政治上，中國也已開始為預期的與日抗爭進行動員，但是進展同樣很慢，令人憂慮。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第3章《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后，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開始談判第二次統一戰線。蔣介石同周恩來于次年頭六個月會談了五次，然而到7月戰爭爆發時仍未達成協議。[[27]](#_27_Jian_Ben_Shu_Di_12Zhang__Fan)

1937年春，蔣介石還曾采取不尋常的步驟，邀請全國400多位頭面人物到旅游勝地廬山出席談話會，共商國是。被邀出席會議的不僅有國民黨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黨派（如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和學術及職業團體的杰出非黨人士胡適、傅斯年和張伯苓）。談話會實際上是直到戰斗已經開始的7月16日才召開的。盡管政府早在戰前就試圖這樣做，以便與不斷高漲的抗日情緒保持一致，但它依然繼續監禁如陳獨秀等政治犯，并對抗日民族救亡運動的民眾領袖即所謂“七君子”起訴。

不過，戰事一開始，戰爭準備就加快了步伐。與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終于結成。政府的領導結構全部更新。同時，絕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眾和物資開始向中國西部內地省份大規模遷移。因此，國民黨統治的結構和環境都改變了，雖然它的基本特征——一種依恃武力的獨裁統治——依然沒有變更。

為了在政治上動員全國，政府試圖同時加強蔣介石中央集權的獨裁權力，并擴大其民眾支持的基礎。早在1937年8月，蔣被授予新的廣泛權力。難于控制的、曾負責對政府進行監督和指導的黨的機構——中央政治委員會被國防最高會議（1939年1月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所代替。蔣主持這個名義上的最高政府機構。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軍事委員會也由蔣主持；它不僅控制軍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職能。現在，按照軍事委員會新修改的組織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肩負全部國防責任，擁有對陸、海、空軍的最高指揮權，并指導全國民眾。”[[28]](#_28___Zhong_Hua_Zhi__1937__1943N)蔣介石根據這項授權在委員會內建立了八個部門，負責指導政策、重工業、輕工業和商業、國際關系、民防以及作戰。行政院和國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們的職責大量被軍事委員會接管。[[29]](#_29_Liu_Fu____Xian_Dai_Zhong_Guo)

然而，在五個月里，戰時狀態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亂。軍事委員會的司法權是如此廣泛，其行政權是如此復雜并難于控制，而它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致政府工作猶如一團亂麻。結果民事管理的責任，至少在形式上又還給政府和黨的相應機構。而軍事委員會再度單純負責指導戰爭的軍事方面。盡管作了這種調整，軍事委員會在整個戰爭期間仍然是政府的實際中心。蔣介石在各個時期還擔任了其他高級職務。例如，他是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即政府總理），國民參政會議長和國民黨的總裁。但是，他更喜歡通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辦公室[[30]](#_30_Jun_Shi_Wei_Yuan_Hui_Wu_Wei)行使他的職權。

因此，在軍事委員會內，他設立了參事室（由王世杰指導），它廣泛地關注經濟問題、財政問題和政府管理問題。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參事室講話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權威性。還有侍從室，可理解為委員長的私人秘書處。這個機構配備過像陳果夫和陳布雷這樣有影響的要人，它決定誰晉見蔣，什么情報上報給他，并就所有官職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議。軍事委員會還包含一個保密檢查室和一個軍事調查統計局，后者是一個由戴笠將軍指揮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組織。結果，軍事委員會處于一種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個戰爭期間凌駕于國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實上擁有無限的權威。[[31]](#_31_Guan_Yu_Zheng_Fu_Zu_Zhi__Jia)

在國民黨內，蔣介石的個人領導權也是得到公認的。他追求黨的總理職務已好些年了，在1924年黨改組后，孫逸仙曾通過這個職務對國民黨活動行使獨裁的控制權。然而，孫逝世后，那個頭銜永久為他保留著，而國民黨至少自此以后在形式上實行一種委員會體制。蔣介石希冀恢復原領導原則，認為他應當得到這份尊榮；認為孫逝世后缺少一位獨一無二的領袖，已經造成黨的嚴重分裂和不穩定。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廣東和廣西聚集于胡漢民周圍的黨內的強大派別，曾經對蔣的不斷增長的權力心懷妒忌。但在1938年3月于武漢舉行的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上，他終于被授予總裁的頭銜（在中文里，措詞是總裁，不是總理，一種并無不同的差異）。他對黨的控制實際上已經完成。他也洋洋自得，歡欣地說：“余為黨國奮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吾黨動搖已十有五載，至今日方得穩定。”[[32]](#_32_Zhang_Qi_Yun____Dang_Shi_Gai)隨著1943年8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蔣也擔任了主席的職務。因此，在戰爭期間，黨、政府和軍隊的所有最高職務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當蔣鞏固他的獨裁時，他也力圖擴大他的政治基礎。1938年初在武漢，民族團結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熱情激蕩著，并且絕未再現。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倡議設立國民參政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參政會是準備為民眾參與國民政府事務提供講臺的一個類似議會的機構。起初，它由從各方面遴選出來的200人組成，企圖保證非國民黨員的賢達參與政事。結果小黨派和共產黨得到大約50個席位；無黨派人士得到70席；國民黨員擁有的席位不超過80席。新的參議會是這樣一個明顯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機構，在戰爭的頭一年間它反映了民族團結的情緒。[[33]](#_33_Guan_Yu_Guo_Min_Can_Zheng_Hu)

然而，參政會不是一個羽毛豐滿的議會，因為它的權力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評，但是不能實施它的決議。它的權力僅僅是咨詢性的。但直到大約1939年，參政會充滿了合作氣氛，它是一個有影響的政府機構。

三民主義青年團則是一個迥然不同的組織，它企圖謀求全國青年的支持。當時所有非國民黨的青年團體概行取締（通過簡便的拒絕它們所需要的政府登記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勵群集于蔣介石領導之下。不過，組建青年團還有第二個目的，即恢復國民黨的生機。蔣介石1938年依舊對國民黨深感失望，他覺得國民黨腐敗無能。他宣稱：

多數的黨員，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興趣淡泊，工作懶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樣耽安逸，講享受，甚而至于爭權利，斗私見……于是黨員幾乎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民眾不但對黨冷淡，甚至要生反感。[[34]](#_34_Zhang_Qi_Yun____Dang_Shi_Gai)

蔣介石希望青年團能使國民黨運動充滿新的理想主義。他說：“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里的新血輪。”[[35]](#_35_Zhang_Qi_Yun____Dang_Shi_Gai)

國民黨中國幾次戰時動員行動中，最富戲劇性的是居民、政府、學校和工廠從沿海地區向內地遷移。在戰前，中國國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業中心，是華北以及華中和華南沿海和沿江地區的城市——而恰恰是這些地區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躪。在那些地方以外，是遼闊的內地省份四川、云南、貴州、廣西、湖南、陜西、西康和甘肅。[[36]](#_36_Yin_Wei_Yi_Ban_Di_Shuo__Ri_B)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來變化甚微，然而國民黨人卻在這里建造他們的戰時根據地。

預料到與日本的這場爭斗將是一場消耗戰，國民政府在盧溝橋事變后立即把關鍵性的工業企業遷往內地。軍事工業，如飛機裝配廠，特別是南京、武漢、廣東和山西的兵工廠，構成了1937年8月開始的重要的工業內遷的主體。私營實業家們也受到催促，把他們的工廠遷離日本人的進軍路線。8月10日，上海戰事爆發前三天，政府撥款給國家資源委員會，以幫助私人工廠從該市轉移出來。戰火迅速趕上這些準備工作。146家工廠重15000噸的設備，隨同2500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彈火紛飛下從上海遷移出來的。在戰爭的這個早期階段，大多數內遷工廠的目的地是武漢。但是，在許多機器還來不及拆箱和工廠恢復生產前，武漢自身也危在旦夕了。于是，向內地的遷徙再度開始。一些工廠橫越洞庭湖，船運到廣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廠則經鐵路運往陜西的西安和寶雞。許多設備放在木船上，拉纖溯長江而上。宜昌以西，江水穿過狹窄而陡峭的峽谷曲折回旋，這里船只時常由幾百個拼命用力而汗流浹背的纖夫拖曳逆流前進。總共有623家私營工廠搬遷到未被占領的地區（其中大約3/4最終恢復生產）。武漢兩家大型然而陳舊的鋼鐵廠，包括漢陽鋼廠，是這次轉運的主要部分（37000噸）。另外，還有119家紡織廠重32000噸的機器，以及320家機器制造廠重約19000噸的機器。隨同這些工廠遷移的有42000名技術工人，其中12000人是靠政府的財政資助來的。[[37]](#_37___Zhan_Shi_Hou_Fang_Gong_Ye)

國民黨人曾把這次工業內遷，描述為中國人民英勇獻身的證據。雖然成就是顯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夸大了。遷移機器的總數共約120000噸，相對于當時擁有的工業設備和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需要，實際上都是無足輕重的。更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籌劃了這次工業內遷（因為政府早已預料到要發生這場戰爭，它本可輕而易舉地做到），這項工作或許會更加安全和更加廣泛地完成。實際上，工業內遷非但不能作為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豐碑，反而適足暴露謀圖私利達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當兵工廠搬遷時，不僅機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們的家眷都裝船運送，而且工人們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門和窗戶都搬遷了。兵工廠的工人們為了有限的運輸工具互相進行激烈的爭奪，有時甚至互相射擊。[[38]](#_38___Zhan_Shi_Hou_Fang_Gong_Ye)私人實業家們受到來自政府保證賺錢的誘惑。他們得到保證，在5—7年的時間內獲得5%—10%的利潤，并獲準低息貸款和自擇廠址。[[39]](#_39___Zhong_Hua_Zhi__1937__1943N)未得到這種有吸引力的許諾的大部分私人實業家，寧愿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適，而不愿接受內地的艱苦和不安定。中國金融家們同樣不理會政府要求把他們的投資轉移到內地的呼吁。億萬元的法幣閑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國。于是，有些中國人表現了一種愛國獻身和民族團結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數實業家和金融家覺得，中國的抗戰事業與他們個人很少或者沒有關系，并且對政府的戰爭公債很少信任。他們不愿讓愛國主義使他們的商業本能變得遲鈍。[[40]](#_40_Shi_Xi_Min____Kang_Zhan_Yi_L)

大學也加入了向內地的遷移。由于它們曾經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策源地，日本軍隊對它們進行了特別的報復。1937年7月29日，日本飛機轟炸了天津南開大學。翌日，日本的大炮轟毀了殘存的校園。最后，他們用煤油縱火焚燒廢墟，以徹底毀滅這一抗日中心。北平的清華大學先被日本搶劫者有計劃地掠奪一空，然后它的建筑物被改成皇軍的一座座兵營、醫院、酒吧、妓院和馬廄。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漢和廣州的大學都屢遭轟炸。[[41]](#_41_Guan_Yu_Zhan_Shi_De_Jiao_Yu)

學生們和教授們成為涌往內地的難民潮的一部分。1939年后期，原來的大學、學院和職業學校只剩6所留在日本占領區，其余足足有52所教育機構已遷入內地，還有25所避入外國租界或香港。參加西行隊伍的那些人，有時不得不走上兩三千英里才找到一個戰時避難所。例如，中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清華、北大和南開起先避難到湖南長沙，他們在那里建立了一所聯合大學。[[42]](#_42_Cheng_Wei_Guo_Li_Chang_Sha_L)但是，到1938年2月，學生們和全體教員不得不再次遷移，這次是去云南的省會昆明。一批乘火車和輪船取道廣州和河內。第二批由257名學生和11位教授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里到達新校址。

戰爭使教育機構蒙受重大損失。17所學校被迫關閉；成千上萬青年輟學。當然，有的學生待在家里，但其余學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國民黨軍隊或共產黨的游擊隊，或者參加軍隊的文娛或護理隊。對于那些繼續學習的人來說，流亡大學的條件往往是極差的，課本、圖書資料和科學儀器設備均嚴重短缺。教授們往往丟失了他們的講稿和其他參考資料。學生們和教授們都覺得生活條件嚴酷。廟宇、祠堂或籬笆墻的棚屋變成了教室和宿舍。板條箱當課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揚至少部分地一度彌補了物資的匱乏。學生們感到，只要他們繼續學習，就是對他們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視。政府當局也認為他們是國家未來的棟梁，他們為戰后國家重建作準備比在軍中服務能更好為國效力。因此，除偶然的空襲和其他不便外，教育體制繼續照常運轉。再則，因為實際上所有學生都受政府貸金資助，并免予應征入伍，大學注冊人數從1936年42000名學生增長到1944年的79000名。

幾百萬難民的涌入，深深地影響中國西部的省份。[[43]](#_43_Chen_Da____Xian_Dai_Zhong_Gu)直到當時，內地省份是與世隔絕的，它們僅僅從沿海地區接觸到近代化的影響。相比之下，許多難民來自富有閱歷的中等和上流階級，習慣于財富、權力和現代舒適生活。他們常常屈尊俯就那些習慣古怪、語言難懂的比較土氣的本地人。他們也怨恨當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視性的價格和租金。另一方面，當地居民怨限下江人[[44]](#_44__Xia_Jiang_Ren___Shi_Si_Chua)的架子和傲慢。新來者確實試圖壟斷政府的主要職能，攫取對金融貿易和經濟的全面控制權。政府機關和工廠中令人歆羨的工作拒絕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認為他們懶惰和笨拙。幾年過去后，語言上的差異不再阻礙本地人與難民之間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來愈尋常，而且價格上的雙重標準也大量消失。然而本地人對工作和社會地位上的歧視的不滿，直到戰爭結束還沒有完全消除。[[45]](#_45_Chen_Da____Xian_Dai_Zhong_Gu)

## 1939—1945年的惡化：軍事

1938年10月下旬武漢和廣州失陷后，戰爭的特征和國民黨區域的狀況起了深刻的變化。戰事漸次進入一種僵持局面。尤其在1941 年12月7日[[46]](#_46_Yin_Guo_Ji_Shi_Cha__Zhong_Gu)日本攻擊珍珠港后，國民黨領導人預料西方盟國能夠打敗日本，無需中國作進一步的犧牲。畢竟他們已經單獨與日本打了四年半仗。因此，他們對與日本人作戰，不如對遏制共產黨人那么專心致志。共產黨人日益增強的勢力和地區性的控制，對戰后時期的國家統一和穩定呈現了不祥之兆。但是，最重要的是重慶國民黨政府發現，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轉的軍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惡化過程。這種惡化，到1945年使它處于虛弱和萎靡不振的狀態。

國民黨人于1938年10月在武漢戰敗后并未屈服。這時，日本的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抵抗能力估計錯了，日軍假如進入內地繼續追擊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只會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因此，他們采取了一種新戰略，著重以政治手段確保對中國的控制。首先，他們鞏固自1937年7月以來所占領的地區的控制。當時他們在華北和華中僅有效地控制大約10%的土地——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鐵路和公路沿線地區。他們需要消滅許多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領區的生產能力為本國經濟服務。[[47]](#_47_Liu_Fu____Xian_Dai_Zhong_Guo)

其次，日本人決心拖垮國民黨人，直到他們因“內部分裂”而崩潰。[[48]](#_48_Pian_Gang_Tie_Zai____Zhong_G)因而，他們在加緊對國民黨區經濟封鎖的同時，開始了一場破壞性的空中戰爭。1939年春，他們奪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斷了重要的浙江—湖南的鐵路。11月，他們以一支兩棲部隊在廣東西部的北海登陸，并挺進100英里攻取廣西省會南寧。這是對國民黨人的一次摧毀性的打擊，因為它切斷了通向河內的新鐵路線，而中國人當時正通過這條鐵路線取得足占他們極為需要的進口物資的1/3。其后，1940年9月，日本人占領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封閉了河內與昆明間的重要鐵路線。此后，國民黨人依靠新開辟的勉強可以通行的滇緬路、香港（日本人于1941年12月占領）的空運和通往俄國的漫長的隊商卡車路，從外部世界取得供給。

日本人不加區別地空襲軍事的和居民的目標。與破壞軍事設施和工廠相比，他們的目的更重在使民眾在精神上垮掉。實際上在國民黨區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襲。然而，重慶遭受空襲最為嚴重。1939—1941年轟炸了268次，城市大部毀壞，成千上萬的人死亡。僅1939年5月大轟炸的頭兩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49]](#_49_Wu_Xiang_Xiang____Di_Er_Ci_Z)

但是，中國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襲，亦非封鎖所能摧毀。確實，重慶民眾不屈不撓的意志，在轟炸持續期間一直是堅定的，只是到1941年晚些時候轟炸停止后才有所衰退。封鎖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為國民黨人在1939年7月已經使從日本占領區運來多數貨物的交易合法化，后來又對這種交易積極促進。日本人無法停止這種貿易。他們不可能在中國占領區與未占領區間二千多英里邊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里都加以監視。許多日本人也在這種貿易中主動勾結。因此，戰爭時期國民黨中國輸入品中，相當大而又無法確定的一部分是通過這種所謂走私交易進來的。[[50]](#_50_Cheng_Yu_Gui____Zhong_Guo_De)

1940年7月，日本內閣的一場重大爭論也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日本領導人發覺，除非他們獲得東南亞的豐富自然資源，在中國取勝將依然無望，而且他們確信西方列強全神貫注于歐洲的戰爭，他們商定把帝國擴張的范圍擴大到中國戰場以外去。他們希望——雖然不是確信——通過外交途徑，他們能夠在南方達到他們的目標。這一決定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對華戰爭的特征，也導致了在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內進攻珍珠港。[[51]](#_51_Bu_Tuo____Dong_Tiao_Ying_Ji)

在中國方面，戰略和政治上的考慮已經使國民黨領導人相信要打一場消耗戰。蔣介石宣稱，日本人在中國遼闊的地域推進，把他們的人力資源和裝備攤得太開了。“我們的敵人打的時間越長，它陷入的困難也就越多；我們打得越久，我們就更堅強，更有決心”[[52]](#_52_Jiang_Jie_Shi____Kang_Zhan_J)。像日本人一樣，蔣也希望避免決戰，因為他預料西方盟國最終會被拖入反對日本的斗爭。開始，他只期待盟國的物質援助和對日本的經濟制裁。但是，在珍珠港事件（這個消息在重慶受到興高采烈的歡迎）后，他期待英國，特別期待擁有巨大技術資源的美國，會承擔打敗日本的主要責任。到1943年，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E.高思評論說：“中國人使自己相信，他們太疲憊，過于精疲力竭；裝備也太差，不能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無需再如此努力的時候；而且他們可以保持他們所有的抗日的東西，坐下來歇口氣，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規劃中國戰后的政治和經濟問題。”[[53]](#_53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__1)

把國民黨的注意力從日本人那里引開的主要政治問題，是與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增長的摩擦。1941年1月新四軍事變[[54]](#_54_Ji_Wan_Nan_Shi_Bian_______Yi)（見第12章）后，統一戰線實際上已不復存在。有影響的國民黨領袖們——最著名的有軍政部長何應欽和黨務工作者陳立夫——多次刺耳地鼓吹發動一場根絕赤禍的運動。蔣介石頂住了這些壓力，主要是因為他害怕盟國將停止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如果它公開卷入內戰的話。然而，自1939年年中起，他就調動他的許多最精銳的部隊——不同的時候在15萬至50萬人之間——去封鎖共產黨人在西北的根據地。[[55]](#_55_Cha_Er_Si__F_Luo_Man_Nu_Si_H)

雖然國民黨人與日本人雙方從1938年后期起都甘愿打一場消耗戰，但這并不意味著戰斗已全面減少。日本人偶爾也發動一場攻勢以達到有限目標。例如，1940年6月，他們攫取了重要的長江口岸宜昌，以阻斷華中糧倉各省與重慶之間的貨物流通，以及取得一個更靠近國民黨地區的空軍基地。1942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將軍轟炸東京后，日本人以10萬軍隊攻入浙江和江西，搗毀可能在將來用以對其本土島嶼進行轟炸的空軍基地。他們也定期向國民黨戰線發起進攻，相比之下，他們較少占領新的土地，而較多蹂躪農村，掠奪或毀壞新近的收獲，阻止國民黨人集聚具有潛在危險的精選的部隊，或者在實戰中訓練新兵。[[56]](#_56_Shi_Mai_Shi_Zhi_Guo_Wu_Yuan)在所謂相持的這幾年內遭受的傷亡——特別是早期——是重大的。中國人承認死亡人數1940年為34萬，1941年為14.5萬，1942年為8.8萬，1943年為4.3萬。[[57]](#_57_Zhong_Guo_Guan_Fang_Guan_Yu)但是從1939年到1944年初，戰線并無重大變動。敵對雙方之間的戰略平衡，在將近六年中變化甚微。

在戰爭后半期，國民黨軍隊人數在350萬以上。[[58]](#_58_Chen_Cheng____Ba_Nian_Kang_Z)但是，它不是一支統一的國家軍隊，而是對中央政府忠誠程度不同，訓練、裝備和作戰能力各異的軍隊聯合體。這個參差不齊的集合體的中心是“中央軍”。1941年，在全部國民黨軍隊三百多個師的總數之中，中央軍約有30個師近50萬人。在戰爭進行過程中，蔣擴充了這支武裝，以致到戰爭結束時，中央軍約有65萬人。在1937年，中央軍的軍官是中央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是有代表性的。他們學習過現代軍事技術——30年代時常由德國教官傳授。政治灌輸在他們的訓練中顯得很重要；軍官們高度效忠于蔣介石。[[59]](#_59_Cha_Er_Si__F_Luo_Man_Nu_Si_H)

然而，大多數國民黨武裝是軍閥部隊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節制的名聲顯赫的人物指揮。因此，他們的忠誠是有條件的，淡薄的。他們妒忌和害怕蔣介石的日益增長的權力。例如，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抵制中央政府對他的省內權力的侵犯，并為批評重慶政府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避難所。華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像一位擁有自主權的總督那樣統治著他的故鄉山西。他阻止中央軍進入他的戰區，并保有自己的政黨（民主革命同志會[[60]](#_60_Ying_Wei__Min_Zu_Ge_Ming_Ton)）以對抗國民黨。確實，從1941年起，閻甚至與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關系。其他具有省籍淵源的將軍們，如李宗仁（廣西）、薛岳（廣東）、于學忠（滿洲）和傅作義（綏遠），均已失去他們特殊的地方性根據地，但仍對那些寧愿效忠他們，而不愿效忠蔣介石的軍隊保持著指揮權。[[61]](#_61_Yi_Lao_Yi____Di_Fang_Zheng_Z)

那些非中央軍的指揮官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因戰爭爆發而起了變化。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軍閥的權力已經衰微。蔣的權力日益增長，最關緊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實并且比較熟練的軍隊。但蔣的最好的軍隊，包括他那由德國教官訓練的精銳師大部在上海潰滅，造成了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軍事天平向非中央軍的指揮官們傾斜。蔣的政治權威相應減弱。

在整個戰爭期間，蔣通過在各省部隊中安插國民黨干部，用新近訓練的軍官和現代裝備重建中央武裝力量等手段，竭力矯正他本人與地區指揮官之間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平衡。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將軍們的猜疑和敵意。他們抱怨中央政府歧視他們，把他們的師送去與日本人進行毀滅性的戰斗，而蔣卻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隊。他們因補給品分配不公而憤怒，因為蔣把從美國得到的武器彈藥，包括根據租借法從美國得到的裝備，大部分分配給他自己的部隊，而不給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隊。[[62]](#_62_Luo_Man_Nu_Si_He_Sen_De_Lan)

簡言之，國內政治支撐著蔣對戰爭的指揮，而蔣則借此增強他的中央權力。當然，如蔣的支持者們所申辯的那樣，沒有哪個現代國家能夠輕易容忍它的軍事指揮官們起著破壞作用的獨立態度。不過，蔣所采用的增強其中央政府權力的手段，本來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不管怎么說，各省軍閥們的不滿隨著戰爭的進展而越來越激烈。在1944年，主要的地方軍閥結成了一個聯盟，實際上陰謀推翻蔣的政府。[[63]](#_63_Can_Kan_Ben_Zhang___Zheng_Zh)當時許多非中央軍的指揮官干脆叛逃到日本人那邊。這些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64]](#_64_Zhan_Zheng_Jie_Shu_Shi_Wei_J)

國民黨軍隊最嚴重的缺點之一是軍官團的素質差，這個缺點在戰爭期間加劇了。美國在華高級軍官艾伯特·C.魏德邁將軍，在1944 年10月后把國民黨的軍官們描述為“無能，愚蠢，缺乏訓練，褊狹……全然不稱職”。[[65]](#_65_Cha_Er_Si__F_Luo_Man_Nu_Si_H)這也是非中央軍高級指揮官們的特色。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獲得榮譽和地位，并不是由于他們軍事技能嫻熟，而是由于他們在派系斗爭中的機敏和及時轉輸忠誠。不過，即使是畢業于中央軍官學校的高級軍官們，也非常缺乏軍事領導所需要的素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20年代黃埔軍校前四期的畢業生，那時訓練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續幾個月。在他們因對蔣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師和軍的指揮官時，他們對軍事科學技術的理解往往是狹隘而過時的。在30年代，這些高級軍官本來可以趁機在參謀學院[[66]](#_66_Ji_Lu_Jun_Da_Xue_______Yi_Zh)里受先進的德式訓練。然而，那時他們已經有這樣高的軍階，以致他們認為再去當學生會有失尊嚴。[[67]](#_67_Liu_Fu____Xian_Dai_Zhong_Guo)

當然，也有些高級指揮官超越這種體制。例如，陳誠、白崇禧和孫立人，由于他們智慧，廉潔，具有軍事才能而出類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孫立人也好，都不是蔣介石核心集團成員。蔣使用他們的才干，但把他們緊緊地拴住，因為他們不是中央軍的人，并表現出了一種倔強的獨立精神。蔣的一個親信陳誠，由于在與自負而平庸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派系紛爭中的失敗，戰爭期間大都在政治風云之中度過。[[68]](#_68_Tang_Na_De__G_Ji_Lin____Zhon)

戰爭開始時，總的說來下級軍官比他們的上級更能勝任。1929—1937年間，中央軍官學校平均每年有3000名學員畢業，并且有大約2000名參謀接受過高等訓練。但是，戰爭深深地斫傷了下級軍官團。他們中有一萬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圍的戰斗中就犧牲了。這些損失絕不會完全得到補償，因為戰爭期間由于降低入學要求以及縮短學習課程。軍官訓練大大地退化了。確實，在一個正規的步兵營里，軍校畢業的軍官所占的百分比，從1937年的80%降到1945年的20%。[[69]](#_69_Liu_Fu____Xian_Dai_Zhong_Guo)由于好的軍隊莫過于有一批好的下級軍官，這些數字為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的退化提供了一個粗略的指標。

然而，退化在最下層，在應征入伍者中間最為明顯。戰時中國軍隊大部由征兵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歲之間——除去學生、獨生子和嚴重疾患者——均得服從征召。按照法令，他們以抽簽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選。事實上，有錢有勢的人逃避征召，而無錢無勢的國民被強征入伍。征兵的軍官們往往甚至連抽簽的手續都不顧。有些農民簡直是在田里勞作的時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則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買通路子出來的人于是就被編入軍隊。

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歷。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里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夜里，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就食物而言，他們只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克扣”給養。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里飲水——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應征新兵隊中流行開來。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70]](#_70_Mi_Er_Dun__E_Mai_Er_Si____Li)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71]](#_71_Xin_Bing_Zhong_Da_Liang_Si_W)

抵達部隊的新兵們經受住了也許是他們服兵役的最壞時期，但他們的前景往往仍是暗淡的。在中央軍里，食物和服裝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隊——諸如陜西和甘肅的部隊——的人命運極為悲慘，謝偉思報道說：“幾乎像乞丐一般。”[[72]](#_72_Xie_Wei_Si____Zai_Zhong_Guo)

造成國民黨軍隊戰斗效能減弱的首要問題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邁將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主要關心部隊的調動和部署問題。但是，不到一個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們是半饑餓的。按照部隊規章，每個士兵發給每天24盎司米，一份鹽；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個月可以買一磅豬肉。一個中國士兵靠這些配額可以很好地維持生活。可是，事實上他真正得到的僅僅是分配給他的食物和錢的一部分，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結果是大多數國民黨士兵營養不足。一位美國專家1944年廣泛地檢查了不同種類部隊的1200名士兵，他發現57%的人表現出營養不良。這顯著地影響了他們發揮士兵職能的能力。[[73]](#_73_Luo_Man_Nu_Si_He_Sen_De_Lan)

原始的衛生和醫療同樣削弱了國民黨軍隊，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經常的伴侶。瘧疾是一種最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戰爭期間，由于軍隊的體質狀況惡化，痢疾發生率大為增加，這種疾病常被忽視，終至無法醫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進食，不久死去。疥瘡、熱帶皮膚潰瘍、眼感染、結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74]](#_74_Bai_Xiu_De_He_Jia_An_Nuo)

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饑餓而瀕于死亡”。[[75]](#_75_Luo_Man_Nu_Si_He_Sen_De_Lan)另外一位美國軍官包瑞德上校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行軍不到一英里，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76]](#_76_Bao_Rui_De____Di_Ke_Xi_Shi_T)受到高度重視的《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軍隊開過以后，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著一個。”[[77]](#_77_Gao_Si_Zhi_Guo_Wu_Yuan____Yi)國民黨軍隊中受到特別照顧的，或由美國訓練的部隊——如青年軍和在印度訓練的中國遠征軍——不間斷地得到良好的給養和裝備；但他們是例外。

確有一個軍醫團，但它所提供的醫療被中國紅十字醫療濟難總會會長羅伯特·利姆（林可勝）形容為“前南丁格爾的”。[[78]](#_78_Gao_Si_Zhi_Guo_Wu_Yuan____Zh)醫療隊的正規機構——包括急救隊、包扎所、野戰醫院和后方醫院——是無懈可擊的，但因供不應求、人員不合格、設備和藥品不足、腐敗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發揮作用。

在全部軍隊中，大約只有2000名大體合格的醫生服務，其比率充其量大約為1700人有一名合格醫生，相比之下，美軍中大約每150人就有一名醫生。另有28000名軍醫在醫療部隊服務，但這些人大多沒有受過正規訓練，并且純粹是從擔架員到包扎員，到“醫生”這樣提升的。極少數真正勝任的醫生，集中在前線重傷士兵所不能到達的后方醫院服務。因為擔架隊常常人員不足，以及醫療運輸工具稀少，在戰斗中受傷——即便是輕傷——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傷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療，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轉到包扎所和后方醫院。1938年羅茲·法默看到過被運送到后方的傷員，他評論道：“遍體壞疽，蛆蟲在傷口上蠕動。”[[79]](#_79_Luo_Zi__Fa_Mo____Shang_Hai_C)經這樣的治療，即使是輕傷員也會迅速感染，而多數傷情，如胃部受傷或喪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戰時中國很少看到跛子。[[80]](#_80_Fa_Mo____Shang_Hai_Cheng_Guo)

中國士兵給養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氣。集體開小差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大多數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隊的行軍中幸存下來，除了逃跑，也別無想法。許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后方未參加戰斗，卻由于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高思大使評論道：這些統計數字并非例外，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銳部隊——因為他們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產黨軍隊，他們屬于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部隊——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1萬人的師每月600人。[[81]](#_81_Gao_Si_Zhi_Guo_Wu_Yuan____Yi)官方的統計導致這樣的結論：在八百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斗死亡。[[82]](#_82_Zhe_Yi_Jie_Lun_Ji_Yu_Zhe_Yan)

## 外國軍事援助

中國軍隊不完全是單獨作戰，朋友們的援助——或者缺乏這種援助——對國民黨人抗日斗爭的性質有重大影響。從戰爭一開始，蔣介石就對外國的援助和調停寄予巨大的希望。西方民主國家確實同情中國抗擊徹頭徹尾的侵略行徑，但它們的同情轉化為物質援助畢竟太慢。相反，倒是蘇維埃俄國成了國民黨人的第一個異常慷慨的朋友。盡管莫斯科與南京之間的關系緊張了10年，兩國政府對遏止日本在亞洲大陸擴張卻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甚至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俄國人對國民黨人的政策就已經變得溫和了。他們曾經鼓勵第二次統一戰線。西安事變期間，他們勸告安全釋放蔣介石。而且早在1937年9月——沒有等到締結一項正式的援助協議——他們就開始發送物資給國民黨人。1937—1939年期間，蘇聯供應總數大約為1000架飛機，2000名“志愿”飛行員，500名軍事顧問以及大量大炮、軍需品和石油。這些是根據總額為2.5億美元的三項中期低息（3%）貸款提供的。這些源源不斷的援助，到1939年9月歐洲戰爭開始以后才減少。但是，蘇聯的援助一直延續到1941年希特勒軍隊開進俄國。意味深長的是，實際上俄國援助沒有一項是輸送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按照中國駐俄國大使蔣廷黻的說法，“莫斯科對在中國激起反對日本比傳播共產主義更感興趣”。[[83]](#_83_Yang_Ge____Zhong_Guo_Yu_Yuan)

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請求援助反應比較遲鈍，并且態度曖昧。戰爭第一年，法國提供了一筆500萬美元的小額貸款，以建筑一條從印度支那邊境到廣西南寧的鐵路。美國用全部買進價值為1.57億美元的中國白銀的方法來支持中國的法幣儲備，從而支持其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但是，直到1938年12月，戰事爆發將近一年半之后，美國和英國才分別同意總數為2500萬美元和50萬英鎊（合200萬美元）兩筆為數不大的對華貸款。而且，美國和英國害怕疏遠日本，特別禁止中國人使用這些借款購買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從1940年開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長。美國允諾的貸款1940年為4500萬美元，1941年前期為1億美元。1941年后期，美國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條款，開始也向中國發送軍械和其他物資。美國志愿隊，一支在陳納德指揮下以“飛虎隊”著稱的空軍小分隊，1941年下半年在緬甸投入戰斗。在戰斗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總額才與俄國所提供的大約相等。[[84]](#_84_Yang_Ge____Zhong_Guo_Yu_Yuan)

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對中國戰爭的關注明顯增長。但是，當時成為盟友的兩國之間的關系充滿了煩惱。關系緊張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美國從未提供中國人認為應向他們提供的大量軍事支持和物資援助。1942年前期，日本人切斷滇緬公路后，通往中國的主要補給線是從印度出發，飛越喜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達云南昆明的危險的航程。關系緊張的部分原因，則是美國飛機不足，越過這條有名的“駝峰”的補給物資與重慶所表示的需要相比，僅僅是杯水車薪。盡管有運輸上的困難，假如西方盟國的政策不是先打敗德、意，然后集中力量對付日本，中國本來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例如，在1941年和1942年，美國僅僅分配給中國租借援助總額的大約1.5%，1943年和1944年只有0.5%——盡管這個數字在1945年上升到4%。[[85]](#_85_Biao_Ming_Fei_Yue_Tuo_Feng_H)國民黨人對“歐洲第一”的政策憤憤不平。

1942年后，困擾中美關系的許多抱怨和誤解，是圍繞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這個人物出現的。珍珠港事件時，被視為美國軍隊中最有才華的軍團指揮官史迪威將軍，起先被遴選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戰指揮官。但是，由于他對中國的出色了解和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對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擔任后來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所說的“在整個戰爭時期指派給任何美國人的最困難的工作”。[[86]](#_86_Ta_Qi_Man____Shi_Di_Wei_Yu_M)史迪威被選派為蔣介石的盟軍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和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后，他特別受到指示，要“為進行戰爭提高美國對中國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幫助中國軍隊提高戰斗力”。[[87]](#_87_Luo_Man_Nu_Si_He_Sen_De_Lan)作為在中國的美國戰區司令官，不可避免地在中國人對華盛頓的優先政策的不滿面前，史迪威首當其沖。他與蔣介石首次鬧翻，是在緬甸的盟軍敗績問題上。他們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且都不喜歡對方。在史迪威的許多品質之中，他對缺點直言不諱，不善外交，不能容忍裝腔作勢和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喜歡辛辣地諷刺。蔣介石正好相反，尚虛榮，不直截了當，含蓄，并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異。史迪威很快把蔣介石視為“一個無知、專橫、頑固不化的人”，他把國民政府與納粹德國的獨裁和強盜行徑等同起來。史迪威在朋友中間輕蔑地稱蔣為“花生米”，而在1944年中期，他私下反復這樣思索，“中國頑癥的治療在于除掉蔣介石”。他問：“為什么暴死這次就不能在適當的地方降臨呢？”[[88]](#_88_Shi_Di_Wei____Shi_Di_Wei_Wen)蔣介石知道史迪威對他的態度和輕蔑看法，反過來也厭惡這個美國人。至少早在1943 年10月，他就試圖把史迪威調離中國。但史迪威有馬歇爾將軍的信任，他保持其職務直到1944年10月。

與他們的個人不和攪在一起的，是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目標根本不同。史迪威只關心增進中國對抗日戰爭的軍事貢獻。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開始訓練飛越駝峰到達印度的中國軍隊，并建議國民黨軍隊應從根本上加以改編。他斷言根本的問題不是缺乏裝備，而是有用的裝備未被有效地使用。他爭辯道，這支軍隊“總的說來處在令人絕望的狀態，營養不良，不發薪餉，未經訓練，照管不周，而且貪污腐敗”。[[89]](#_89_Luo_Man_Nu_Si_He_Sen_De_Lan)作為一種補救辦法，他建議把軍隊的規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稱職的指揮官，并由美國來訓練和裝備首批30個師，最后達到100個師的精銳部隊。他還建議，由美國訓練的中國師發動一場攻勢來收復緬甸，因為只要日本控制那個國家，中國的外國補給物資就只有依賴飛越駝峰流入的有限貨物。史迪威認為，只有靠開辟一條經緬甸的陸路，才能輸入充足的物資來裝備中國軍隊，以大舉進攻在中國的日本人。

蔣介石把與日本打仗置于一個較低的優先地位。在他看來，在盟國參加戰爭以后，最終戰勝日本是肯定無疑的。但是，他與共產黨人的角逐尚屬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關心的是保存和增強他和國民政府的權力。史迪威關于改編軍隊和對日本人發動進攻的建議，對蔣是最討厭的事，因為這些建議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險。比如，他裝備最好的軍隊是忠誠于他的人所指揮的，縱令他們往往在軍事上是不夠格的。假若照史迪威極力主張的那樣去辦，軍官們都得任人唯才，那么軍權將落到他的潛在政敵們的手里。舉一個恰當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將軍，很想委派他擔任國民黨軍隊中具有實權的職務。史迪威所忽視的，而在蔣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現的，是白崇禧是一個有著長期反叛中央政府歷史的前廣西省軍閥。同樣在1943年，史迪威建議共產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在華北聯合發動一場對日本人的戰役。然而要勸導共產黨人參加這樣一場進攻，勢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資供應他們，蔣當然不能接受重新裝備或以其他方式加強他所憎惡的人的方案。

史迪威名義上的部下陳納德將軍，與蔣介石的意趣比較投合。珍珠港事件后，陳納德重被征調進美國軍隊，而他的“飛虎隊”改編為中國航空特遣隊（后來的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對空軍打擊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于1942年10月聲稱，他以105架戰斗機、30架中型的和12架重型的轟炸機，就能“使日本垮臺……很可能在6個月之內，頂多在一年之內”。[[90]](#_90_Chen_Na_De____Zhan_Shi_Feng)這個異想天開的計劃對蔣介石是有魅力的，因為它將使中國成為主戰場——從而使國民政府有資格要求更大份額的物資援助——而無需大量耗費自己的資源。那么，史迪威所要求的軍隊改革和積極參加地面戰爭將是不必要的。

在華盛頓有馬歇爾將軍和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做后盾的史迪威，強烈反對陳納德計劃。他爭辯說，這個計劃的關鍵性缺點是一旦空襲有效，日本人將攻擊和摧毀美國的空軍基地。鑒于中國軍隊當前處于無能狀態，那些空軍基地十分脆弱。但羅斯福卻站在陳納德和蔣介石的一邊，于是陳納德的空中攻勢開始了。到1943 年11月，在中國境內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國海岸的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損失。此外，日本當局擔心美國人將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軍基地發動對本土島嶼的襲擊，摧毀其軍事工業。于是，史迪威最擔心的壞事不久成為事實。因為日本于1944年4月發動一號作戰這是自1938年以來他們在中國發動的最大和破壞性最強的一次戰役。它切斷了國民黨人的防線，甚至形成對昆明——中國未被占領地區的一個戰略樞紐的威脅。這一軍事威脅，恰好與經濟蕭條和正在增長的政治不滿同時出現。

一號作戰戰役的成功，使中國在軍事上處于絕境。為尋求解決這場危機，羅斯福于1944年9月19日，要求蔣介石授權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揮您的全部軍隊”。[[91]](#_91_Luo_Man_Nu_Si_He_Sen_De_Lan)史迪威親自送達這份電報后，在他的日記里記載：“我把這包紅辣椒面交給花生米，然后嘆了口氣往后一靠坐了下來。投槍擊中了這個小人物的太陽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凈利索，他除了臉色發青，說不出一句話來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92]](#_92___Shi_Di_Wei_Wen_Jian_____Di)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暫的。蔣懂得由史迪威來指揮作戰，中國的政治權力也許將緩慢地然而卻確定無疑地從他的掌握中滑落。這種情況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不屈不撓地勸說羅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C.魏德邁將軍被任命為蔣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

## 1944年日本的一號作戰

日本的一號作戰，使國民黨人遭到一次毀滅性的挫敗。它向所有中國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此前的七年戰爭中，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已墮落到何等驚人的地步。日本這次作戰的目標是奪取或摧毀中國中南部的空軍基地，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正是從這些基地發動它的高效的空中攻擊的。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日本人于1944年4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對平漢鐵路的完全控制，以保衛他們的后方。到5月下旬，他們已準備就緒。日本人從漢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圍湖南省會長沙。中國人以前在長沙曾三次成功地抗擊了日本的進攻，但這次中國人防御不力，該城于6月18日失陷。

10天后，對衡陽的攻擊開始。在陳納德的戰斗機和轟炸機的支持下，薛岳的廣東部隊在這里頑強戰斗六個星期。在整個一號作戰期間，這是中國軍隊進行大規模持續抵抗的唯一例證。此后，中國的防線崩潰。日本人向南推進到廣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軍基地。1944年11月，他們摧毀了陳納德的空軍基地，形成了穿過中國中部連接沈陽到河內的一條通道，然后西進。他們似乎勢不可當。中國軍隊被驅趕上去抵擋，但是——按照魏德邁的說法——甚至裝備精良的師都“融掉了”，他們“看來缺乏士氣，完全不想守住陣地”。[[93]](#_93_Wei_De_Mai____Wei_De_Mai_Bao)通往重慶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開，蔣介石勇敢地宣布他決心留在重慶；在重慶保衛戰中，“必要時殺身成仁”——這種宣言已難以安定人心，因為他在放棄南京和漢口前也發出過類似的誓言。[[94]](#_94_Tong_Shang_Shu__Di_293Ye__Lu)

但是，12月上旬日本軍隊突然停止前進。這是什么緣故呢？當時，日本的攻勢顯得不可遏止，而造謠者指控蔣與日本人商訂了一項協議，讓出重慶。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然而一號作戰使國民黨中國遭到了可怕的損失。將近50萬士兵死傷；中國領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兩半；它足足喪失了1/4的工廠；政府稅收來源銳減，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巨大。[[95]](#_95_Li_Ru_Zai_Guang_Xi__Zhan_Zhe)

盡管到1944年國民黨軍隊已明顯衰敗，但對它在戰爭期間成就的評價卻有很大差異。例如，長期擔任軍政部長的何應欽宣稱，他的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計有22次會戰，1117次重要戰斗，38931次小戰斗。他宣稱，相反，共產黨人“未出動一兵一卒抗戰”。魏德邁將軍同樣力言，“中國國民黨政府遠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國記者朋友描述的那樣不愿打仗，他們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現出驚人的堅韌和耐性”，而“在中日戰爭的任何一次重大會戰中，都沒有共產黨的中國軍隊作戰”。[[96]](#_96_He_Ying_Qin____Ji_Nian_Qi_Qi)

千真萬確，國民黨軍隊曾多次英勇地與日本人作戰。薛岳將軍的部隊三次在長沙（一次在1939年，兩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規模進攻。1943年11—12月，中央軍第五十七師在湖南常德以極大的決心作戰，遭受了不下90%的傷亡。1943年在鄂西，抗擊日本人所稱的飯碗戰役，中國軍隊損失了大約7萬—8萬人，而日本軍隊的傷亡為3000—4000人。[[97]](#_97_Yi_Si_Lei_Er__Ai_Po_Si_Tan)

批評國民黨人的人，曾把這些英雄主義和勇猛善戰的實例說得一文不值。例如，他們宣稱1944年6—8月光輝的衡陽保衛戰，是由非中央軍的指揮官薛岳不顧重慶政府的阻攔而進行的；又說，在這些罕見的事例中，國民黨人之所以發起攻勢，是因為蔣介石需要宣傳，好使盟國領導人相信中國戰場值得給予更多的物質援助。此外，共產黨人曾嘲笑國民黨人關于對日作戰的主張，他們斷言直到一號作戰，日本軍隊足有84%集中于對付共產黨的軍隊，而只有16%對付國民黨人。[[98]](#_98_Wo_Lun__I_Ke_En____Shui_Zai)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時候調離之前，也曾指責國民黨高級指揮官們“異常無知和漠不關心”，并斷言現領導下的國民黨軍隊完全沒有能力對抗日作出積極的貢獻。[[99]](#_99___Shi_Di_Wei_Wen_Jian_____Di)

不管這一爭論的最終評判如何，國民黨軍隊堅持抗擊擁有巨大技術優勢的敵人長達八年之久，仍然是一個事實。這場抗戰的政治、經濟和人員的代價是巨大的。然而他們并未放棄同盟國的戰爭努力，他們迫使日本人在中國保持一支大約100萬人的軍隊，這對最后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在戰爭后期，大約從1942年起，大部分國民黨軍隊已喪失了戰斗意志，它實際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軍事行動了。這一概括也有例外。史迪威和魏德邁制定的建立一些高素質的中國師——由美國人訓練、指導和裝備——的規劃，于1945年最終開始結果。例如，1945年4—6月，其中的一些師勇敢而有效地擊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進攻。戰爭結束時，這些師中有8個已經完成了13周的預定訓練計劃，另有22個師已經開始。但是余下的300多個中國師仍然原封未動。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的普遍衰退具有嚴重的后果。因為這支軍隊是國民黨政治權力的基礎。它開始潰敗預示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傾覆。蔣似乎沒有能力扭轉這一崩壞的過程。改革軍隊的所有嘗試——如史迪威將軍沮喪地認識到的那樣——都很快在國內政治的淺灘上擱淺。例如，相對于可利用的資源，這支軍隊太龐大了，不會有戰斗力；但裁軍的建議也是不可行的，因為地方指揮官們反對，他們如果失去他們的軍隊，他們也將失去他們的權力。蔣對政府的行政控制也過于無力，以致不容許作必要的改革。舉例來說，他曾反復下令，征兵制度應更人道一些。然而，由于這個制度為地方士紳和腐敗官員所支配，政府對這些人控制不了，或無法對他們執行紀律，征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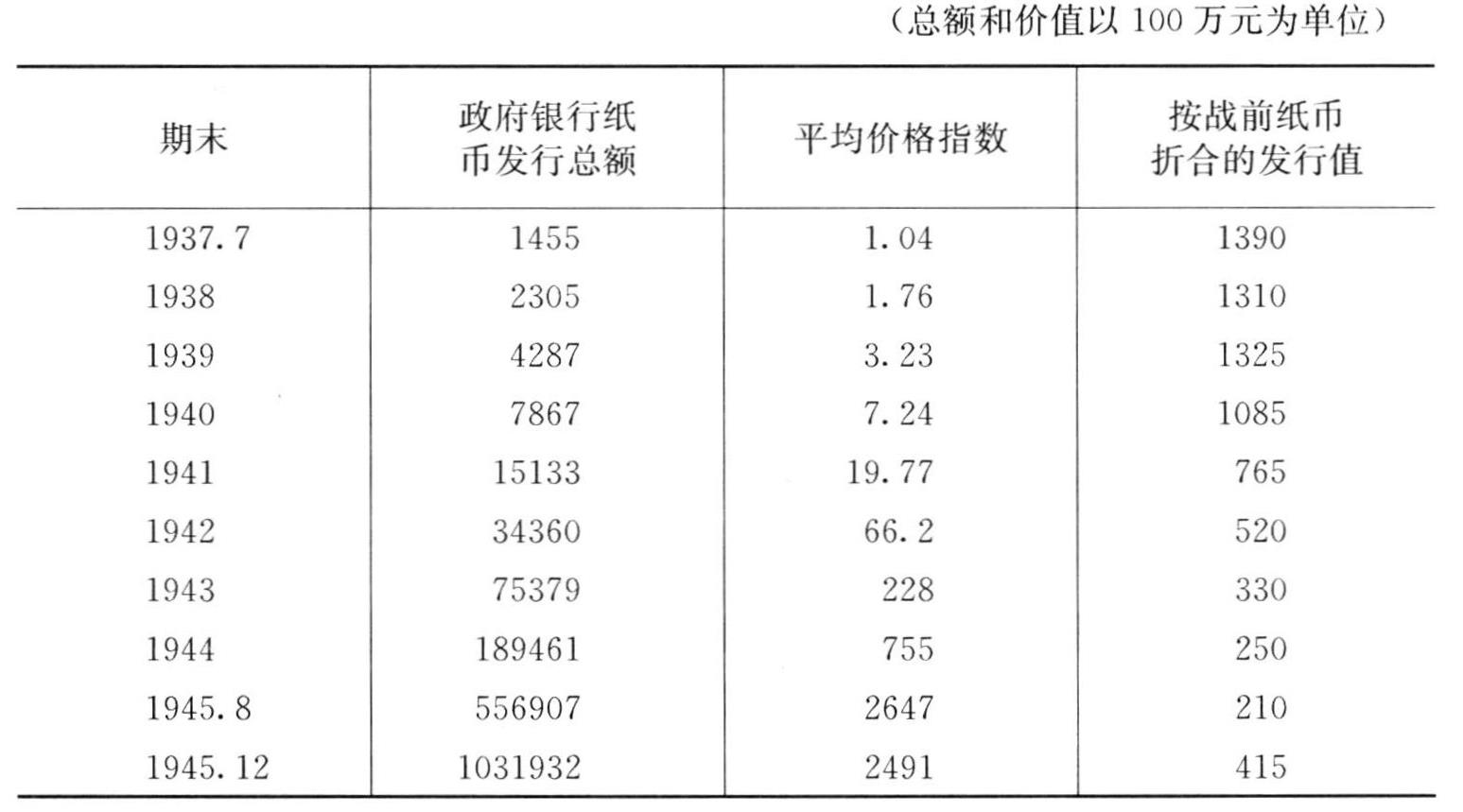
## 通貨膨脹災難

由一號作戰暴露出來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虛弱，是長期復雜的惡化過程的頂點。引起這一過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貨膨脹為最。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樣，國民政府的貶值通貨流遍全國，使整個機體——軍隊、政府、經濟和社會普遍虛弱。起初通貨膨脹率比較緩和。在戰爭的頭一年，價格上升約40%。從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物價每年翻一番以上。此后，增長率又急劇上升。[[100]](#_100_Ling_Shou_Jia_Ge_De_Nian_Sh)

通貨膨脹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銀行借款，這四家銀行大量印刷新鈔票以滿足這種需要，使通貨數量大為膨脹。開戰以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頭兩年，政府花費大量款項在內地重新安置和發展工業。龐大的款項被用于在中國西部建筑新的公路和鐵路，并修至印度支那和貫穿緬甸。在這兩年期間，政府的年支出增長33%，而它的歲入下降了63%。戰前，大宗歲入來自商業和都市的經濟部門——關稅、鹽稅和商品稅約占80%。當日本人蹂躪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時，這些稅收來源大量喪失。政府戰時支出的約75%靠印制新紙幣來彌補（見第10表）。

雖然法幣數量的增加曾經是，也許始終是助長通貨膨脹進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價格上漲。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貨幣信用跌落。對機器、金屬、電力設備、化學品和燃料等生產資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們的供應短缺，使它們處于價格上漲的前鋒地位。例如，金屬和金屬制品的價格在戰爭的頭兩年間上漲了6.8倍，而總物價指數僅翻了一番。大多數生產資料不得不進口，而日本對國民黨地區強制實行經濟封鎖加深了這種短缺。

表10 按戰前價格計算的紙幣發行值，1937—1945年\*



\* 此為每年12月份的數字，1937年和1945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資料來源：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第304頁。

日本人于1937年9月實施的封鎖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緊。1938年10月廣州和漢口陷落后，進口品價格猛漲72%；1939年下半年廣西南寧這一關鍵性的供應環節喪失后，進口品價格又翻了一番。從1941年12月起，日本對英美的戰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緬公路不再成為供應來源。進口品的涓涓細流繼續從蘇聯經過甘肅和新疆的漫長陸路流入，費用浩大；而飛越駝峰的空中補給線變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國進口品還是落到僅為戰前水平的6%。

在1937—1939年通貨膨脹的第一階段。普通中國人未受到其最壞的影響，因為消費品價格的增長與生產資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戰爭頭兩年食品價格上漲和緩——在重慶僅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國民黨地區受惠于大豐收——在當時未被占領的15個省中，收獲量高出戰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價格比食品上漲快——例如衣服的價格到1939年年中大約翻了一番。但大多數中國人可以推遲購買新衣服。而住房的費用，除難民群集的城市外，則上漲不大。其結果是在頭兩年里，大多數人能夠承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不過分困難。

但是，1940年食品價格開始暴漲，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了整個通貨膨脹的進程。這一變化最初起因于歉收。1940年農業產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開始田賦征實而不收現金。這意味著到達自由市場的糧食更少，這樣進一步攪亂了供需之間的平衡。

通貨膨脹還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國內工業生產普遍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布匹、藥品、紙張和電燈泡等貨品原來大多在沿海城市生產，現在這些城市已丟給日本人。戰爭期間，許多面向消費者的小型工廠在內地建立起來了，但它們只能滿足一小部分需求。來自日本占領區的輸入品，成了消費品的一宗重要來源。起初，國民黨人和日本人雙方都禁止這種貿易。然而，在1939年7月，隨著消費者需求無情地增長，除少數緊缺物資外，重慶政府讓所有其他物資的貿易合法化。確實，在1943年，它甚至設立了一個官方機構，由強有力的軍事秘密警察首腦戴笠將軍指揮，從事并增進與敵占區的貨物貿易；不過，無論這種貿易，還是本地的生產均不能滿足市場。就日本人而言，在整個戰爭期間，他們都宣布這種貿易為非法，但他們也企圖參與。[[101]](#_101_Yi_Lao_Yi____Mao_Dun_Guan_X)

從1940年起，通貨膨脹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眾對貨幣缺乏信任。1937—1939年，有一種強烈的儲存法幣的傾向，尤其是在農村民眾中間。這種儲存是鄉村中對貨幣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種反應，它緩沖了通貨膨脹的沖擊，因為它減少了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緩解了對難以得到的消費品的需求。但是，隨著1940年夏季稻谷歉收，農夫們開始儲存糧食，而不儲存貨幣。投機商預計將來價格上漲，也買進并囤積大量糧食。1940年和1941年，重慶的食品價格隨之暴漲了將近1400%。其結果是工業、運輸業和其他行業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資，并領到這些工資，這導致消費者開支激增，而它又導致進一步儲存貨物。于是，通貨膨脹螺旋上升開始了，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國民黨當局以出售公債和外匯儲備來避免印發大量新鈔票。不久那兩種替換物都枯竭了。與開辟新稅源或緊縮開支控制預算赤字相比，印制新幣畢竟容易得多。再則，當局不考慮經濟學家們有關通貨膨脹危險的警告，爭辯說在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它不會成為一種嚴重的危險。只是在1940年和1941年價格開始暴漲后，他們才逐步覺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貨幣貶值而斷送全部戰爭的努力，他們就必須增加歲入，削減支出。

1941—1942年，政府開始認真尋求新的稅收來源。所得稅擴大了；對運輸中的貨物征收一種所謂消費稅——其實就是恢復舊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鹽稅增加了，成為政府稅收中最有成效的稅種。另一項增稅計劃是1942年制定的，對鹽、糖、煙草和火柴的銷售實行國家專賣。這幾種措施僅僅是勉強有利。所得稅和超額利潤稅幾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稅。消費稅雖然有利，但對貿易造成許多障礙，于1945年被廢止。所有這些征稅計劃都不解決問題，這由下列明顯事實可以看出，稅收所得還不到政府戰時現金支出的17%。

最為深遠的財政改革是田賦征實。自1928年以來，農業土地稅曾由地方政府以貨幣征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開的市場上為其龐大的軍隊購買米谷。但是，隨著米價暴漲——1941年6月平均價格高出戰爭前夕20倍以上——維持軍隊的費用已變得難以支持。因此，自1941年7月開始，中央政府從各省接管了田賦的征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貨幣課稅（在非產米區按小麥和大麥等其他糧食；在罕見的情況下征收棉花）。然而，這樣征收的糧食仍然滿足不了軍隊和公務員的需要。因此在1942年7月政府著手實施糧食的“征購”（在1943年7月改為“征借”）。這就是說，納稅人現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輸送的不僅有土地稅，而且還有大體相當的糧食，納稅人對后者以后將得到補償。

通過這些措施，中央政府獲得了有保障的食糧來源。它不必再以法幣在公開的市場上購買昂貴的稻米。這減少了印制新鈔票的壓力之一。然而，這種糧食稅極易被侵吞。這種侵吞使農民深為不滿，也促成政府道德上敗壞。張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觀的政府高級官員，得出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田賦征實的）長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為軍隊獲取低價食品的眼前利益。”[[102]](#_102_Zhang_Jia_Ao____E_Xing_Tong)

盡管政府在開發新稅源方面并非明顯地成功，但它確實果斷地限制了開支。在1940年，政府認識到放手鼓勵經濟增長正在產生一種具有潛在危險的通貨膨脹傾向，它收縮了信貸政策，并削減工業和交通的發展。然而，最重大的節約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員的工薪。政府認識到只有印制巨額的追加貨幣，政府雇員的工薪才能保持與上漲的物價同步，因此直到1944年政府實質上未增加工薪。官員們工薪的票面購買力，在1937年與1944年間下降了約85%，而士兵們則下降了約94%。當然，官員們事實上部分通過食品和住房補貼得到資助；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從兼職獲取兼薪以維持生計。還必須承認，戰爭期間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地區和人口兩者都比戰前小得多。無論如何，按不變價格計算，每年政府的開支事實上在戰爭過程中是下降的。雖然不可能精確，1944年政府實際的現金支出已經下降到它戰前支出的1/4以下。政府是在挨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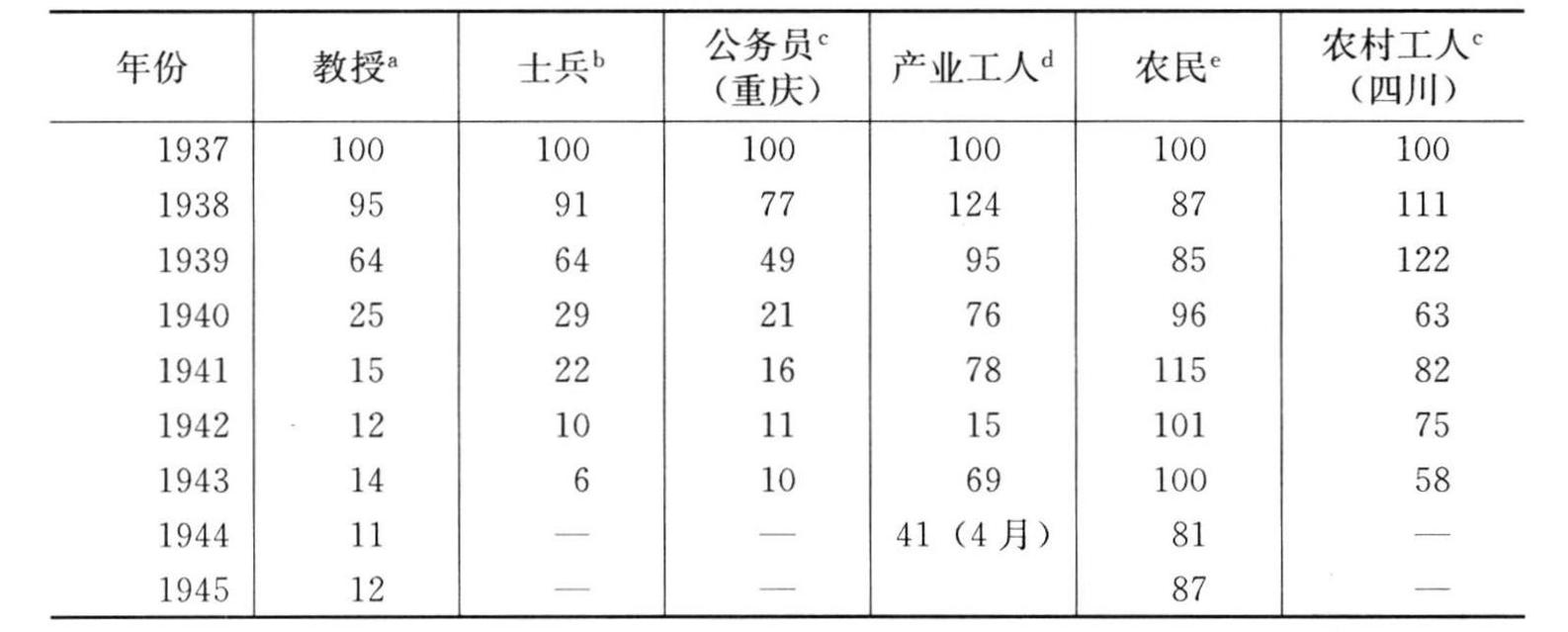
政府靠壓低其雇員的薪俸來節約開支，是否明智尚難斷言。低薪金迫使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政府官員和軍官參與侵吞，通過與占領區未經批準的貿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謀取損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職。反之，假使政府讓士兵們和官員們的工薪與正在上升的生活費用掛鉤，那么政府赤字必將大量增加，從而加重通貨膨脹的壓力。經濟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壓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減軍隊和官僚的規模。這將會緊縮開支，并可能增進效率。但是，出于政治原因，這種措施未能采納。

在1942—1944年，物價每年上漲約237%；1945年僅1月到8月，價格就上漲了251%。就金融方面而論，政府發行了空前數額的新鈔票，以滿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在1945年1月與8月之間，流通的法幣總額增至三倍。增加開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在中國的存在日增。它在中國的兵力，從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人。這些軍隊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經濟供應，并且是按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見過的消費水平。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在中國，你們的孩子們每天需要6只雞蛋，而現在減為4只。但是，你們每天吃1磅牛肉……為了供應肉食，我們把耕牛拿來給你們吃……很快將沒有任何牲畜留下來幫助農夫們耕種他們的田地了。”[[103]](#_103_Yang_Ge____Zhong_Guo_Yu_Yua)確實，在中國的一個美國士兵的費用，高達500個中國士兵的費用。此外，決定修建4個供遠程B29轟炸機使用的大型空軍基地和3個戰斗機的簡易機場，全部于1944年6月完成，這導致更龐大的開支。從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國人存在的月費用從10億元增加到200億元。回想起來，很清楚，從美國增加在中國的作用中取得的軍事利益——特別是B29的行動，它在戰爭期間發動了不過20次空襲——與加在中國虛弱經濟的財政損失相比，遠遠得不償失。[[104]](#_104_Yang_Ge____Zhong_Guo_De_Zha)

中國用于美國軍隊的開支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由以下事實可以看出：在戰爭的最后一年半里，這筆開支足足等于新發行貨幣的53%。然而，國民政府本身的開支也在急劇增長，這大部分是因美國人的建議而發起的改革的結果。例如中國軍隊的39個師，為了現代化、訓練、醫療和改善伙食被挑選了出來。政府官員和教員的薪俸在1944年晚些時候提高了——雖然這只能稍稍緩解他們的困難。同時新創辦的戰時生產局的開支和貸款，雖然只占政府總支出的約7%，但在1945年上半年也推動物價持續上升。到戰爭結束時，平均零售物價指數高出1937年7月2600倍。

并非社會的各個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一小撮囤積居奇者、投機商和貪官污吏獲得了大量財富。有些群體如地主和產業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時間內生活較好。但大多數民眾逐步降低到勉強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于這個水平。表11表明了國民黨中國幾個收入群體購買力的變化，雖然這并不精確反映他們的相對生活水準。例如，由于歉收、增稅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勞役的負擔，大多數農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貧困得多。[[105]](#_105_Yi_Lao_Yi____Shi_Bai_De_Gen)另一方面，士兵、官員和教授等政府雇員，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樣生活得那么壞，因為他們受到廉價的食物和住房這類形式的補助。

表11 幾個收入群體貨幣收入的購買力指數，1937—1945年



資料來源：a.1937—1942年的指數引自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第263頁；1943—1945年的指數是6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費用），《經濟史實》第22卷第177期（1943年7月），第34卷第479期（1944年7月），第46卷第701期（1945年7月）。  
b.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第263頁。  
c.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3頁。  
d.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3—64頁。e.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243頁。

通貨膨脹對官員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損害，影響了政府的活力。早在1940年，官員工資的購買力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大約1/5。到1943年，實際工資跌落到1937年的1/10。雖然他們的境況因為每個月有米、食油等津貼而有所緩解，但官員們經常生活在——用張嘉璈的話說—— “赤貧”之中。[[106]](#_106_Zhang_Jia_Ao____E_Xing_Tong)單身漢靠他們的薪俸幾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員困于個人處境，變得絕望起來。有些人從事第二職業；許多人貪污腐化。

貪污腐化非常明顯。高級官員們攜帶衣著華麗的女士，坐在由司機駕駛的汽車里，穿越燃料短缺的重慶的街道奔馳；他們購買了從國外走私來的香水、香煙、柑橘、黃油及其他奢侈品；他們在奢華、豐盛的宴會上用餐。當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腐化。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營養不良，并眼看家人健康下降。不過，許多人經不起誘惑，因為當他們的上司大肆揮霍時，文過飾非是容易的。

通貨膨脹同樣破壞了學生和知識分子們的安寧。書本很少，科學設備稀缺。學生們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里，他們的床就像船上的鋪位那樣擠在一起。教職員經常與他們同事的家庭擠在一起。肉類和油脂從他們的飲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難得一天吃兩餐。在學術團體里，營養不良幾乎成為普遍現象。在戰爭后期，據《大公報》報道，教員和學生雙方都生活在“餓死的邊緣”，“處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慘的境地”。[[107]](#_107___Da_Gong_Bao_____Zhong_Qin)健康水平下降，瘧疾和肺結核是常見的。為了補充他們菲薄的收入，許多教員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大學任教，出賣珍藏的書籍和藝術品，或鐫刻圖章和揮毫作書以供出售。他們的教學質量受損，而他們對政府的幻滅感上升了。[[108]](#_108_Dong_Xian_Guang_Bian____K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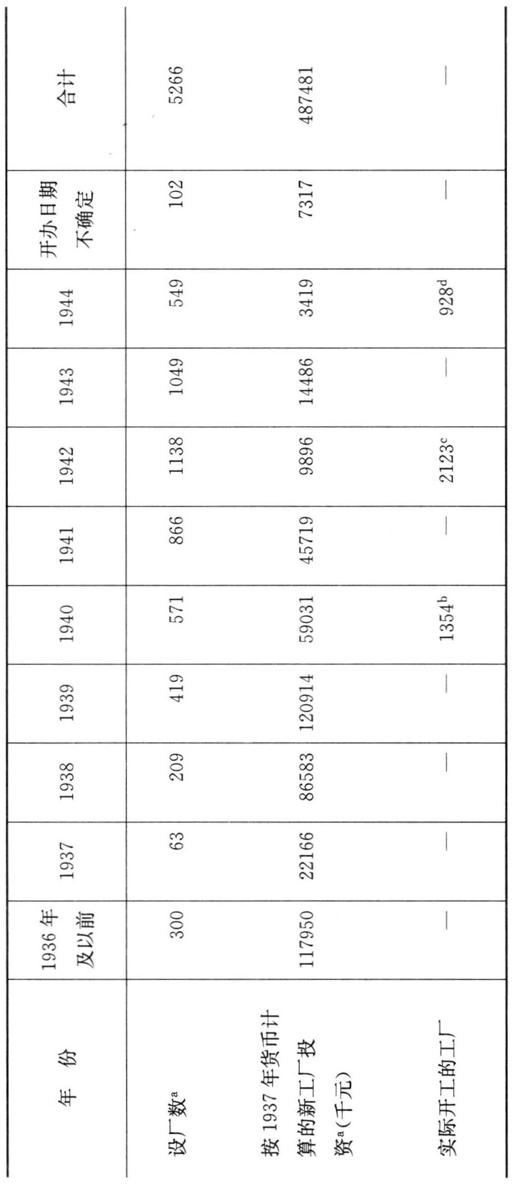
政府確實力圖緩解官員們和在公立大學授課的教授們的經濟窘境，為他們提供特殊的津貼、廉價的住房，和各種人為的低價供應的日用必需品。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給政府雇員，而在公開的市場上米價為5.00元。但是，政府遲遲不同意很有意義的工資增長，因為那樣將擴大預算。在1943年，如果官員們的實際工資提高到戰前水平，政府開支將增長約300%。到1944年，在官僚機構和軍隊內不滿情緒高漲，工資才得以激增——太少也太晚了，因為當時物價上漲正如脫韁之馬。官僚機構和軍隊的道德敗壞，一直延續到1949年。

## 工業部門

自由中國的戰時工業，是在很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爭爆發時，將成為中國非淪陷區的地域——約占國土的3/4——能夠自夸的僅有大約全國工廠的6%，產業工人的7%，工業總投資的4%，電力的4%。[[109]](#_109_Li_Zi_Xiang____Kang_Zhan_Yi)但是，在戰爭的前幾年，國民黨地區的工業發展迅速。消費需求，尤其是政府和軍隊的消費需求，已經增長的內地居民的消費需求，為工業產品開辟了一個幾乎不能滿足的市場。直到1940年，食品價格遠遠落在工業品后面，使工資保持低廉而利潤幅度高。在1942年3月滇緬公路被封閉前，購買急需的機器、備件和進口原料，盡管困難和奇貴，但仍是可能的。[[110]](#_110_Zhang_Sheng_Xuan____San_Shi)這些有利因素導致1943年以前新的工廠與日俱增（見第591頁表12），而工業生產量在1938年至1945年之間幾乎增長到四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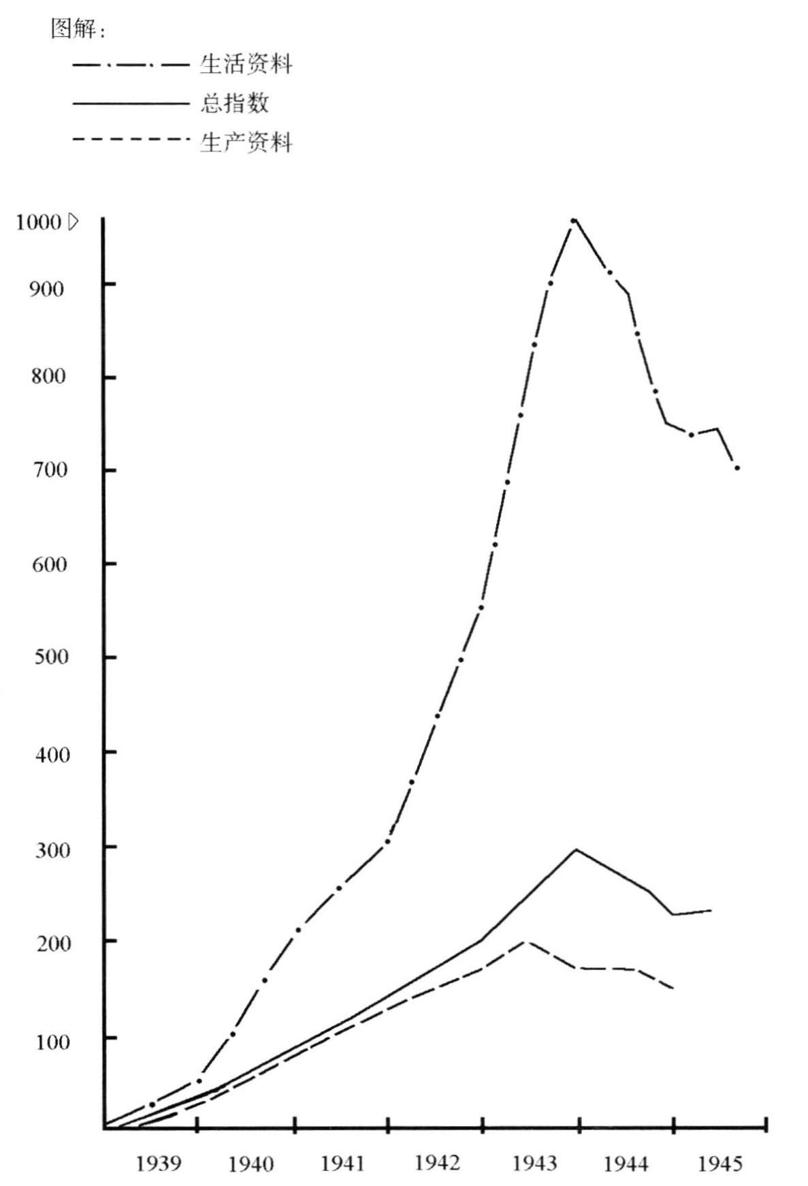
盡管有這樣的增長，工業生產遠不能滿足消費需求。雖然戰時國民黨中國的人口大致是戰前的一半，但主要工業品產量從未超出戰前水平的12%。1944年棉紗、棉布和面粉僅分別為戰前數字的5.3%、8.8%和5.3%。[[111]](#_111_Cheng_Yu_Gui____Zhong_Guo_D)更有甚者，1943—1944年工業部門陷入深刻的危機，1944年生產顯著下降。表13顯示了戰爭后半期工業的疲軟狀況。1939年新工廠的投資達到了最高峰。其后，盡管新廠數量增加，但投資總值陡然下降。大約在1940年，工業繁榮事實上已經終結，但牟取薄利的經營者們，以有限的經驗和少量的財源繼續開辦新廠，徒勞地期待著經濟復蘇。[[112]](#_112_Qin_Guo_Ping____Zhan_Shi_To)這些小規模的薄利經營多數迅即倒閉。1944年，在國民黨中國實際上僅有928家工廠開工。倒閉率達82%。

表12 中國非淪陷區的工廠



\* 按照官方的定義，此處指使用動務機器并至少雇用30 名工人的工廠。資料來源：  
a.李紫翔：《四川戰時工業統計》，《四川經濟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頁。b.畢范宇：《西方人士所見的戰時中國》，第47頁。據信，這個數字包括公營和私營工廠兩個方面。  
c《.中華志，1937—1945年》，第433、441頁。這個數字是大約數，系1942年5月現存的私營工廠、1936 年以來由國家資源委員會設立的工廠（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廠（110）的總和。d.《中華志，1937—1945 年》，第363頁。這個數字包括公營私營工廠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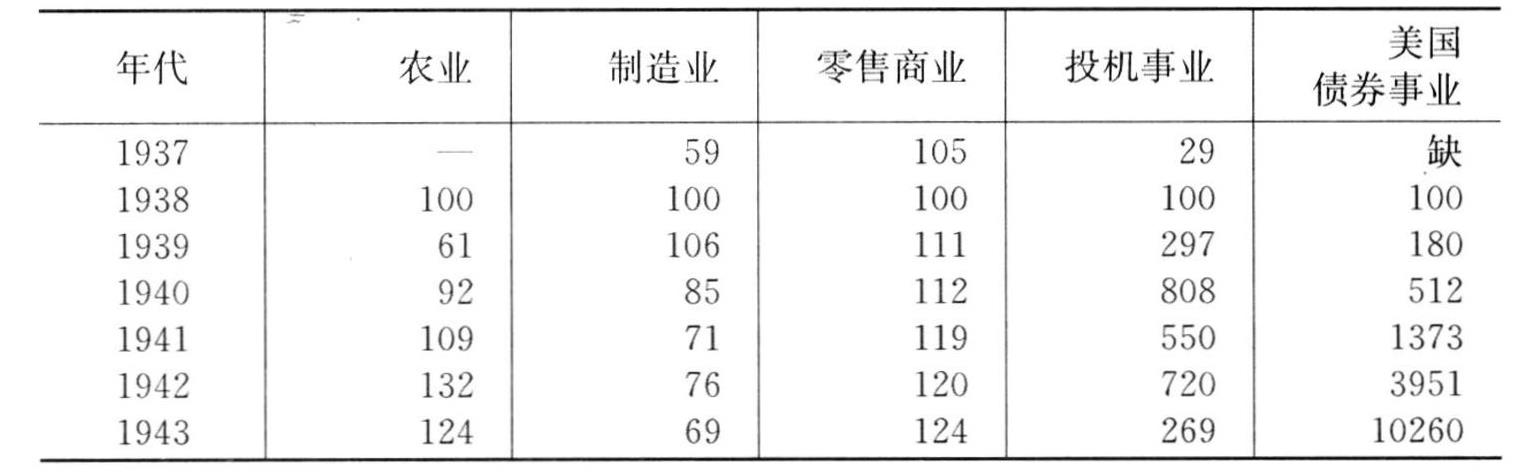
表13 1938—1945年國民黨中國的工業生產指數



資料來源：a.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產的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頁。  
b.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第110頁。  
c.侯繼明：《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財政，1937—1945年》，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第214頁。  
注：這些資料中有差異，雖然全都是以中國經濟部的資料為基礎的。最明顯的是，資料c并未描繪出生產資料生產中的絕對下降，但是資料a和b兩者確實表明有這種下降。這種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計算生產資料指數時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雖然1943年前產量一直增長，但1940年工業部門已經開始遇到障礙，首次引起增長率下降，然后產生了1943年9月以后的工業危機。[[113]](#_113_Liu_Ji_Bing____San_Shi_San)通貨膨脹的結果并不全是消極的。例如，在戰爭八年間，工人們的實際工資僅在1938年提高；其后，他們的實際工資下降，這使雇主獲利。[[114]](#_114_Zhou_Shun_Shen____Zhong_Guo)不過，通貨膨脹使商業投資，特別是投機事業投資比工業投資賺的錢多得多（見第593頁表14）。囤積稻米和其他農產品的現象廣為流行。不論來自占領區，還是來自國外的“走私”貨都能大賺其錢，從而使資本從生產性投資轉回。有時光是囤積商品就比花錢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間，原棉價格平均每月升高13%，投資者僅囤積棉花就比冒險長期投資于加工棉花的紡織廠有利得多。于是大部分流動資本——1944年占同類資本的86%——已流入商業和投機行業，而不是生產。新型的或舊式的私人銀行越來越多地撤回工業投資，它們寧愿發放短期商業貸款，或直接參與囤積及其他形式的投機。政府繼續向私營工業提供低息貸款，但是，按不變通貨計算，這些貸款的價值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貸款的一小部分。結果工業因缺乏周轉資金而挨餓，這是工業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實業家痛苦地抱怨貸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續太繁。但得到政府貸款的實業家們，則通常用這些錢去投機。[[115]](#_115_Liu_Min____San_Shi_San_Nian)

表14 各種類型活動中個人實際收益的變動（重慶）（1938年＝100）



資料來源：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0頁。

另有通貨膨脹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實業家們的困難。例如，日本收緊封鎖的繩索，切斷了中國工廠嚴重仰賴的機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輸入。內地的許多工業設備已經陳舊——例如紡織工業中的機器造于20年代以前——沒有備品和配件，因此損壞迅速。許多材料——如高合金鋼——在中國國內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業部門要繼續生產，這些材料又是至關緊要的。

熟練工人的缺乏也阻礙了中國的戰時工業。當地招收的工人新離開農村，往往對機器或者勞動紀律缺乏最起碼的了解，因此，熟練的產業工人不得不從沿海城市招募。但是，到1940年，只有大約42000名熟練工人隨國民黨政府進入內地。工廠的經理們為搜羅熟練的雇工，開始挖其他工廠的墻腳。這種競爭抬高了工資。它也助長了有破壞性的高速率的勞動力流動——1940年每月大約有10%的熟練工人，18%的非熟練工人流動。1943年5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動量為23%。這種驚人的不穩定與普遍缺乏技術和設備窳劣合到一起，導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紡織廠，效率被評定為戰前水平的大約60%—85%。一位電工估計，他的工廠的效率僅僅是在上海時的1/3。[[116]](#_116_Fu_Lei_En____Zi_You_Zhong_G)

荒謬的是有些工業陷入了缺乏消費需求的狀況。人民不斷貧困限制他們只在最緊迫的必需品上花錢，盡管人民極其需要新的衣服，紡織品市場也變得呆滯，因為他們的購買力已經衰竭。需求的減弱也打擊了生產資料制造商。例如在1942年以前，由于鐵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煉鐵業曾經繁榮過。當政府放棄這些項目時，煉鐵業就陷入蕭條，并損及煤炭和煉焦等有關部門。對工業機械和軍事裝備的需求仍居高不下。但是，中國的鋼鐵制造商通常不能滿足這一需求，因為他們缺乏所需要的設備、原料和熟練的勞動力。[[117]](#_117_Liu_Ji_Bing____San_Shi_San)

為了與通貨膨脹作斗爭，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試圖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價格。這很快證明是無效的。后來政府頒布了一連串的新規章，取締商品投機及壓低食品、工業原料和租金的價格。然而，到1941年10月，中國銀行宣布所有這些措施“完全失敗”。[[118]](#_118_Zhang_Jia_Ao____E_Xing_Tong)

國民黨對價格管制的興趣，在美國于1942年10月通過一項反通貨膨脹法后復蘇了。因為他們推斷：在戰爭時期，物價管制是現代國家的標記。何廉和楊格等財政和經濟專家建議重慶領導人不要管制物價，其理由是管制物價并不觸動造成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實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們警告，管制物價不會有人理睬，并將使公眾的信心受到損害。政府對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實行一種新的物價管制體制。黑市被禁止，違犯者受到恫嚇將被處以可怕的刑罰，直至判處死刑。也是為了管制物價——以及增加稅收——國家對經選定的商品實行專賣。從1942年起，它著手大量收購這類貨物，并以固定的低價賣出。這些措施影響日用必需品（米、鹽、食用油、糖、燃料等）、工業品（鐵、鋼材、棉紗等）、出口品（鎢、錫、茶、豬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煙草和火柴等各種貨物。[[119]](#_119_Zhang_Jia_Ao____E_Xing_Tong)

政府用管制物價與通貨膨脹作斗爭的幾次嘗試都未生效。中國缺乏這樣的前提，那就是對領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誠實的官員，和一個起作用的運輸和通信系統。除了少數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從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區。重慶有幾次面臨嚴重的米荒，因為別處米價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實際市場價格也超出官價，1943年平均為14%，1945年平均為67% 。[[120]](#_120_Zhang_Jia_Ao____E_Xing_Tong)

物價管制有時對工業具有災難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價定得如此之低，以致陜西許多農民——他們提供了中國非占領區原棉的大部分——不種棉花而種小麥，而國民黨地區的工廠據報道只有夠運轉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項產品的費用，超出它的法定價格的情況并不罕見。1943年，生產一噸鐵耗費35000元；政府的鐵價為30000元一噸。1944年，開采一噸煤的費用從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價為1200元一噸。一包棉花耗費15000元；但它只能以12000元出售。[[121]](#_121_Guan_Meng_Jue____Xia_Xi_She)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廣西和廣東的一號戰役，打擊了足占國民黨中國1/4的工廠，它們占整個工業資本的15%以上。它還切斷了國民黨中國余下的工廠的供應來源（如產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場銷路，并摧毀了投資者的信心。

所有這些因素——通貨膨脹，缺乏進口品，缺少熟練工人，消費需求萎縮，引起梗阻的價格控制政策和軍事災難——使國民黨中國的工業陷入深刻的危機。作為一種跡象，1944年秋兵工廠只有生產能力的55%開工。重慶80%—90%的鋼鐵廠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時候倒閉；1944年320家機械廠中有50家倒閉；主要的煤產地嘉陵江地區250家煤礦中，大約有185家在1943年至1945年間倒閉。[[122]](#_122_Yang_Ge____Zhong_Guo_Yu_Yua)

到1945年3月，失業已成為一個嚴重問題。1944年礦業生產只是1942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鉛，49%；鎢，27%；錫，27%；銅，24%；銻，6%）。甚至手工棉紡織生產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為原料短缺，運輸困難和令人煩惱的通行稅。工業危機確實大于官方的生產數據（見表13）。[[123]](#_123___Da_Gong_Bao_____Zhong_Qin)

1944年11月，戰時生產局的建立導致大量政府訂貨和投入新的款項，這明顯地刺激了某些工業。在1944年11月與1945年5月之間，鋼的生產增長50%；生鐵，46%；煤，35%；電力，8%。盡管有這些增長，1945年頭三個月工業生產總指數仍無變化。顯然，其他工業部門的下降被制止。壓倒一切的證據是在和平前夜，國民黨中國的經濟在總體上已處于崩潰邊緣，特別是工業。[[124]](#_124_Zhang_Jia_Ao____E_Xing_Tong)

戰爭使政府成為最主要的經濟企業家。先前它已經取得對銀行部門的控制，但它在中國人擁有的工業企業中只掌握11%左右的資本。然而，到1942年，經濟部報告，國家控制的企業已占國民黨地區工廠的17.5%，資本的70%，工人的32%和馬力的42 %。[[125]](#_125_Xiao_Pa_Ke_Si__Ke_Bu_Er)

在內地有三種政府機構發展工業：國家資源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和四家政府銀行。1935年創建的國家資源委員會，被授權“發展、經營和管理基礎工業”。到1944年12月，它經營92個工業單位——33家工廠，38個礦和21座電廠。它還與其他機構聯合辦了11個工業單位。資源委員會控制著重工業和高技術工業，與民營工廠形成對照，后者一般機械化程度較低，生產輕工業品。[[126]](#_126___Zhong_Hua_Zhi__1937__1943)

戰爭爆發后才建立的工礦調整委員會，起初是負責推動民營工廠向內地遷移。從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業企業投資，經常與民辦企業競爭生產消費品——酒精、紡織品、紙張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資超過它對民營工業貸款30%以上。孫逸仙曾主張，政府應當把它的經濟作用限定在基礎工業，但它現在也成為輕工業的一個主要參與者。[[127]](#_127___Zhong_Hua_Zhi__1937__1943)

四家政府銀行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政府”銀行，因為私人投資者握有其中三家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的大量股票。所有這三家銀行，像民營商業銀行一樣，特別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業和商業中的直接參與和所有權。它們這樣做是為取得有形資產，以保護它們資本的實際價值。如張嘉璈所評論的那樣，這變得“無異于投機”。[[128]](#_128_Zhang_Jia_Ao____E_Xing_Tong)無論其動機如何，政府銀行像工礦調整委員會一樣，深深地卷入了民營工商業部門。

有些評論家受政治上的激發，將政府在經濟上的作用定性為“官僚資本主義”，指責官員由此積累個人財富，排擠私人企業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貧困。然而，將國民政府不斷增長的經濟作用視為國家資本主義，視為對一個正在現代化的農業社會的要求，以及對戰時特殊經濟需要的反應，可能更合適一些。沒有政府的幫助，很少有企業能夠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們的工廠，或創建大規模的新廠。戰時中國，面臨一種合理化分配機器、原料和動力等稀缺資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評的不是國家資本主義政策本身，而是那種政策的實施情況。政府企業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門一樣，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義的和腐敗的。此外，與政府有關的工廠享有大量好處——如銀行貸款、原料或運輸用的卡車——這些好處是不會給予私營公司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紙廠，以自愿向政府獻股票來尋求與官方的聯系。由于沒有這種聯系，大量私營公司，在戰爭后期因缺少周轉資金、原料或有保證的市場而垮掉，[[129]](#_129_Chen_Zhen_Bian____Zhong_Guo)而腐敗的官員則大發橫財。到戰爭后期，政府的經濟企業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經變得不利了。1948年毛澤東把“官僚資本主義”提高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一層次，作為他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對象。[[130]](#_130___Guan_Yu_Min_Zu_Zi_Chan_Ji)

## 政治上的虛弱

一家成都報紙（《華西日報》）的一篇社論——未發表，因為被新聞檢查官撤下來了——犀利地表達了戰爭后期民眾的心情：“政府官員腐敗，法律任其濫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慘絕望。盡管國困民貧，一小撮貪污腐化分子卻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華。這種腐敗現象，加上其他許多反動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氣士氣低落，幾至于殆盡。”[[131]](#_131_Peng_Fei_Er_De_Zhi_Gao_Si)

士氣低落是一種多變的現象，因地而異。1939年2月，有報道說湖南軍人斗志低落，但是廣東和廣西士氣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極端冷淡，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重慶盡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為——對它轟炸了三年，卻“以全民抗戰的力量搏動”（用白修德的話來說）。[[132]](#_132_Pei_Ke_Zhi_Guo_Wu_Yuan_Dian)

國民黨中國士氣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貨膨脹的腐蝕作用，以及政府改變政治和軍事目標。在美國和英國的參戰以及共產主義運動成為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后，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變得較少關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來，更多關心自己政權的未來。政府變得保守而傾向于鎮壓。

舉例來說，國民參政會曾經是一個為贏得民眾支持而設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擁有大量非國民黨成員而成為民族團結精神的縮影。但是，1940年以后，許多參政員批評統一戰線的破裂和檢查與鎮壓的加劇。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它們的政治效能，參政會內小政黨的代表于1941年3月組織了民主政團同盟，這是六個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現的小型政黨和團體的聯盟。它們典型地由知識分子組成，這些知識分子往往受過外國教育，他們憎恨國民黨的獨裁。不管怎樣，有一種廣泛的思想意識在他們中間傳播。中國青年黨和國家社會黨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黨和救國會的成員比較激進。然而，因為這些小黨希望消除國民黨對政府的一黨控制，他們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語調講話。可能除了宣稱有大約三萬名黨員的中國青年黨以外，它們之中沒有一個具有大批的追隨者。它們本質上是觀點方面有高度優越感的知識分子的聚集體。[[133]](#_133___Zhong_Guo_Ge_Xiao_Dang_Pa)

同盟自我標榜為“第三種勢力”——既非國民黨，又非中國共產黨——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報》，在重慶出版了《民憲》雜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開設了辦事處。同盟為那些兩個主要政黨都未參加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說話。[[134]](#_134_Lai_Man__P_Fan_Si_Lai_Ke)

只要國民參政會無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慶就予以鼓勵。但是，當參政員們吹毛求疵，甚至組成一個政黨時，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氣的反應。同盟綱領的出版遭到了檢查官員的禁止，而它的活動不斷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騷擾。當1942年政府對國民參政會進行改組時，坦率的同盟成員喪失了他們的位置，而參政員名額的重新分配，保證了國民黨占壓倒多數。共產黨人在受挫的情況下停止出席會議。由于參政會喪失了它的民眾性和獨立性，其后它的評議對政府政策沒有多少沖擊。[[135]](#_135_Xu_Nai_Li____Guo_Min_Can_Zh)

在1938年3月12日孫逸仙逝世紀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風開始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得到證明，它的目標是激勵群眾支持政府，以及動員人民為戰爭出力。但是，運動的方法暴露出國民黨特有的對群眾的不信任。它動員群眾對一個“公民公約”宣誓，其中十二條全部都是消極的——“行動不違背三民主義”，“不違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參加漢奸組織”，等等。精神總動員，像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一樣，因官僚主義的惰性而迅速失敗。[[136]](#_136___Zhong_Guo_De_Jing_Shen_Do)

國民政府未能動員人民，并且不愿讓他們在政治上發揮有意義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種精英統治，民眾支持的基礎隨戰爭的拖延而消失。它越來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脅來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權力。特別從1939年起，當與共產黨人的統一戰線破裂及民眾的不滿尖銳時，國民黨人亮出了鎮壓的武器。1937—1938年，在武漢曾見到相當大的出版自由，但現在重新實施嚴格的檢查。中央通訊社一味夸大勝利，隱瞞失敗。對貪污腐化的報道被刪除，唯恐它們損害對戰爭的努力。出版社受到嚴厲的出版前檢查的威脅，中國戰時的報刊普遍沒有生氣。共產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作為統一戰線協議的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報紙敢于用“×××”等符號來表示審查者的藍鉛筆刪削過原稿。只有在國民黨權力薄弱的地區，特別是桂系（李濟深、黃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龍云統治的昆明，報刊才能公開表示對中央政府的批評。[[137]](#_137_Ding_Xu_Li_Xia__Yin_____Xia)

1941年1月新四軍事件后，共產黨在國民黨區域內的活動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慶尚有有限的活動），而知名的共產黨人被逮捕。但是，共產黨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個人自由主義者和小政黨成員，最感受到國民黨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馬寅初，一位國民黨員和中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批評了政府領導人大發國難財。他于1940 年12月被捕。雖然他在1942年獲釋，但仍被禁止發表非經濟主題的著作，甚至被禁止發表公開演說。薩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聞記者，1943年被監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許多加入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名義上以孔祥熙為首，但因其與普通人民關系密切，有激進主義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據稱有些人遭到槍殺。[[138]](#_138_Xiu__Di_En____Guo_Min_Dang)

重慶對大學的政治控制特別嚴厲。戰時大部分時間（1938—1944年），教育部長是陳立夫，CC系的首領和狂熱的反共分子。陳立夫借口從大學里清除討厭的外國影響（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蔑視國故）和提高學術水準，對大學實行嚴密控制。他的教育部出版強調中國傳統和國民黨正統的教科書；要求在課程中特別列入軍事訓練和三民主義；向教員提供教學大綱；并減少學生讀選修課的機會。[[139]](#_139_Ou_Jun_Chen____Zhan_Shi_Zho)陳立夫強使中國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證國民黨對全國知識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由北大、南開和清華大學組成），受惠于它非同尋常的高質量的教員和龍云的政治保護。不過，大多數大學屈從于陳立夫的壓力。陳控制的國民黨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學術團體，并威嚇大多數教授。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所有校園里都有基層組織，其熱心的成員充當了告密者。[[140]](#_140_Yi_Lao_Yi____Di_Fang_Zheng)

國民黨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國民黨秘密警察和三青團外，就是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蔣介石的一個最忠誠的支持者戴笠將軍為首的這個秘密機構，從1935年的1700名特務擴大到戰爭結束時的4萬—5萬人。戴笠的職責包括軍事情報，在日本占領區的地下工作和對軍隊的政治控制。[[141]](#_141___Dai_Yu_Nong_Xian_Sheng_Ni)不過他的特務們也保持對平民的監視，并管理國民黨中國的大多數政治監獄——至少10個——從那里傳出關于嚴刑拷打的可怕傳聞，無疑并非全是無稽之談。監獄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險思想”的人。積極響應思想灌輸的同獄犯人通常一年后獲釋，但有些則被處死。戴笠承認在1935年至1945年間有130次處決，盡管批評者暗示數字要大得多。[[142]](#_142_Li_Yi_Ye____Zhong_Guo_Ren_M)在國民黨中國，戴笠的組織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滿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都能看出。農村地區動亂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況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莊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麥因干旱而枯萎。雖然農民們極度需要食物，但官員們無情地要求交足田賦。有時農民的全部收獲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種子。有些農民不得不賣掉他們的耕畜、家具，甚至他們的農田，以滿足田賦征收者。結果，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于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后，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筑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后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于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憤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143]](#_143_Bai_Xiu_De_He_Jia_An_Nuo)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愿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144]](#_144_Gao_Si_Zhi_Guo_Wu_Yuan____Y)在國民黨區域，從福建、廣東到四川、甘肅，幾乎每一省都有農民暴動，常常是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雜稅。更如1943年春，大約有5萬人的一支農民造反武裝，奪取了甘肅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權。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對政府，那里一位美國官員報告說，“民心鼎沸”。[[145]](#_145___Hu_Bei_Sheng_Zheng_Fu_Bao)

甚至在政府內部也回蕩著政治上積極擺脫幻想的態度。孫逸仙之子，比較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立法院院長孫科，于1944年春嚴厲地批評政府的專制，無效能和鎮壓的傾向。他指責國民黨已經采取了“一種統治階層的態度和習慣”，不與人民接觸。對政府的批評受到徹底的壓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講話”。他警告說，國民黨中國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敵人——納粹德國。[[146]](#_146_Gao_Si_Zhi_Guo_Wu_Yuan____S)

1945年5月第六次黨代表大會——自1938年早期以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變成日積月累的怨恨發泄的講臺。黨內有廣泛基礎的成員，痛斥無所不在的貪污腐化、機會主義、無效能、不顧公眾福利，以及黨、政府和軍隊內的道德沉淪。[[147]](#_147___Fu_Xing_Zhong_Guo_Guo_Min)連共產黨的宣傳家也發不出比這更辛辣的譴責。

與民主政團同盟的激進領袖們相呼應，地方軍閥們也聯合起來向中央政府發起挑戰。這些軍閥們——像云南的龍云，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潘文華和劉文輝——是軍閥時代的殘余。他們在當地的地位已經合法化了，但他們確信，蔣介石正利用戰爭來取得對他們自己軍隊的軍事優勢。1943年4月，一位美國官員報告說，在國民黨政府與這些地方軍閥之間的“怨恨和對抗在表層下沸騰”。[[148]](#_148_De_Mu_Lu_Lai_Te_Zhi_Fan_Xua)

共同的利害關系把這些軍事指揮官和民主政團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經成為小黨派成員的避難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龍云聘請了幾個民盟領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羅隆基作“顧問”他在財政上幫助民盟成員；并且他以限制蔣的秘密警察的活動來掩護他們。民盟成員對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徹底破滅，他們確信重慶政權是“毫無希望的，并且……注定要滅亡”。他們哀嘆政府不斷增長的專制和鎮壓的傾向。[[149]](#_149_Zhang_Wen_Shi____Yun_Nan_Ne)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們已確信蔣介石本人是政府虛弱的根源。克拉倫斯·高思于1944年7月報告，甚至一年前還在堅決支持他的自由主義者，也“看不出在蔣的領導下中國還有什么希望”。[[150]](#_150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

民盟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地方軍閥們，在一項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計劃中結成伙伴，但并不協調。共謀者們深信重慶處于崩潰邊緣，他們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他們專注于建立一個繼任的國防政府作為替代。為了批準這些計劃，他們安排大約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舉行一次國民代表大會——包括國民黨（40%）、中國共產黨（20%）、民主政團同盟（20%）和其他團體（20%）的代表。與此同時，龍云、潘文華、余漢謀和其他軍事長官們商定，他們將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讓日本人消滅蔣介石的軍隊。[[151]](#_151_Yi_Lao_Yi____Di_Fang_Zheng)

這一策劃最終毫無結果。如美國駐昆明的領事所評論的那樣，“確實難以想象，還會有比封建政府貴胄與激進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實用主義的政客們結成的成分更為復雜的一伙”。[[152]](#_152_Lin_Wo_Er_Te_Zhi_Gao_Si)他們沒有考慮到蔣介石對其對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機智。龍云是全部密謀的關鍵，他卻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蔣運動，以換取足夠裝備他三個云南師的美國租借法案的補給品。后來，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蔣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劃的軍事行動中，剝奪了龍云在省內的職務，并把他帶到重慶，他在那里實際上被囚禁了。

雖然反蔣密謀考慮不周，但它是戰爭最后一年困擾國民黨中國的深刻危機的一個征兆。經濟生產已急劇下降，通貨膨脹失去控制，軍隊在日本人面前無所作為，政府腐敗，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彌漫社會所有階層。因此，當戰爭于1945年8月14日結束時，國民黨中國是士氣低落的和虛弱的。

[[1]](#_1_10)確鑿可靠的數字并不存在。有兩種官方的估算：（1）蔣介石1947年說軍隊和平民的“犧牲”是“一千萬”，明顯的是個粗略的近似數，見《國家總動員》，第4頁。（2）官方認可的《蔣總統秘錄》第13冊，第199頁記載，官兵“傷亡數”是3311419人（經查《蔣總統秘錄》原書記載為：官兵傷亡三二一一四一九人。——譯者），非戰斗人員傷亡數為842萬人以上。死于與戰爭相關的原因——饑饉、缺醫少藥、傳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勞工等——的人數無疑是很大的。何炳棣估計1500萬—2000萬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52頁）。陳啟天提出死亡總數為18546000人，但未指明出處（《我的回憶》，第235頁）。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最近提出“傷亡數”為戰斗人員320萬，平民“大約二千余萬”（《悼敬愛領袖》第2部分，載《中國郵報》，臺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2]](#_2_10)據說，最初開槍的不一定是宛平駐軍，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產黨人，他們希望由此使國民政府卷入與日本的戰爭。但是，這種指責得不到有力證據的支持。見秦郁彥：《日中戰爭史》，第181—18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和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54—55頁；阿爾文·D.庫克斯：《訴諸戰爭：中日沖突，1937—1945年》，載阿爾文·庫克斯與希拉里·康特羅伊編；《中國與日本：尋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平衡》，第299頁。

[[3]](#_3_10)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第359—380頁；李云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第179—212頁；李云漢：《戰爭的起源：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背景》，轉引自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第18—27頁；T.A.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1—39頁。

[[4]](#_4_10)秦郁彥：《日中戰爭史》，第162—183頁；庫克斯：《訴諸戰爭》，第297—300頁；詹姆斯·B.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1930—1938年》，第310—328頁；羅伯特·J.C.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第91—95頁。

[[5]](#_5_10)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28頁。

[[6]](#_6_10)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國家的安全與對外政策，1930—1938年》，第338頁。

[[7]](#_7_10)同上書，第339頁。

[[8]](#_8_10)許朗軒、張明凱編：《中日戰爭史，1937—1945年》第1卷，第357頁；吳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戰爭中中國采用的總戰略及若干大戰役》，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第52頁。

[[9]](#_9_10)上海沒有日租界，僅有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稱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區為日租界，這是沒有任何條約根據的，是不符合事實的。——譯者

[[10]](#_10_10)吳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戰爭中中國采用的總戰略及若干大戰役》，第52—54頁；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第9—10頁；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第41—49頁。

[[11]](#_11_10)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1924—1949年》，第198頁。

[[12]](#_12_10)南京大屠殺中被殘殺的中國人的人數，說法不盡一致，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30萬以上，被強奸婦女也遠遠超過兩萬。——譯者

[[13]](#_13_10)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01和199頁；易勞逸：《矛盾關系面面觀：戰爭期間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文集》，第293—296頁。

[[14]](#_14_10)吳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戰爭中中國采用的總戰略及若干大戰役》，第48頁。事實上，早在大約1932年，蔣介石就設想過在與日本作戰的情況下在四川建立國都的計劃。見張其昀：《黨史概要》第2冊，第914頁。關于國民黨人的總體戰略思想，見吳相湘：《總戰略》，第37—72頁，和蔣介石的演說集：《抗戰建國：1937—1943年六年抗戰文電集》。

[[15]](#_15_10)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頁；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53、75、124—125頁；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第109頁；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通敵政治》，第53頁。

[[16]](#_16_10)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第68—82頁；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第354—378頁。

[[17]](#_17_9)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0頁；弗蘭克·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變》，第146—168頁；《中華志，1937—1943年：六年抗戰中國重大發展綜述》，第354—356頁。

[[18]](#_18_10)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第177—178頁；柯樂博：《20世紀的中國》，第225頁；勞倫斯·蒂普頓：《中國的惡作劇》，第104頁。估計潰堤時被瀉出的水淹死的人數高達325000，甚至達440000，見鏡涵：《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觀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頁；《密勒氏評論報》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頁。但是，其他資料記載，中日雙方的生命損失是相當輕的，因為中國居民已經預先知道毀堤計劃，又因為洪水前進得慢，見歐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戰的戰爭》，第209—210頁；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檔案中國專檔119，2781函，《河南區辦事處：歷史，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頁。

[[19]](#_19_10)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第167、201、205頁；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第139頁。

[[20]](#_20_10)即汪精衛在南京建立的偽國民政府。也自稱國民政府，不是維新國民政府。——譯者

[[21]](#_21_10)論述汪精衛變節投靠日本人的權威記述有：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及杰拉爾德·E.邦克：《和平陰謀：汪精衛與中國戰爭，1937—1941年》。

[[22]](#_22_10)董顯光：《中國與世界新聞界》，第72頁。

[[23]](#_23_10)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第135—136頁。

[[24]](#_24_10)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97頁；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第217—223頁；于爾根·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580—585頁。

[[25]](#_25_10)關于國家資源委員會，見本書第3章，1932年創辦的被責成通盤研究軍事、工業、文化等國防需要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為該委員會之先導。見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292頁。

[[26]](#_26_10)《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第324—326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2、153—155頁；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第6—10頁；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第九表。

[[27]](#_27_10)見本書第12章（范斯萊克著）；關于蔣同周的會談，見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畢恩來致雷蒙德·萊斯利·比爾信。

[[28]](#_28_10)《中華志，1937—1943年》，第321頁，重點號是著者加的。

[[29]](#_29_10)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6—118頁；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152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85—187頁。

[[30]](#_30_10)軍事委員會無委員長辦公室，疑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譯者

[[31]](#_31_10)關于政府組織，見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6—117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85—187頁；《中華志，1937—1943年》，第86、322—323頁。

[[32]](#_32_10)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214頁。

[[33]](#_33_10)關于國民參政會，參見徐乃力：《國民參政會與中國戰時問題，1937—1943年》。

[[34]](#_34_10)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226—1227頁；關于青年團的政治作用，見易勞逸：《失敗的根源：國民黨中國在戰爭和革命中，1937—1949年》，第89—107頁。

[[35]](#_35_10)張其昀：《黨史概要》，第4冊，第1731頁。

[[36]](#_36_10)因為一般地說，日本僅僅占據了城市、鐵路沿線和沿海地區，其他省份，如廣東、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當大的地區或多或少仍在國民政府的管轄之下。

[[37]](#_37_10)《戰時后方工業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紀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13頁；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33頁；許滌新：《抗戰以來兩個階段的中國經濟》，《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44頁；《中華志，1937—1943年》，第436—439頁；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年》，第211—218頁；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1—42頁。

[[38]](#_38_10)《戰時后方工業是如何建立的》，第12頁。

[[39]](#_39_10)《中華志，1937—1943年》，第438頁。

[[40]](#_40_10)石西民：《抗戰以來的中國工業》，《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54頁；林繼鏞：《抗戰期中民營廠礦遷川簡述》，《四川文獻》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7頁；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2—43頁；斯諾：《爭奪亞洲的戰爭》，第149頁；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年》，第184頁。

[[41]](#_41_10)關于戰時的教育，見休伯特·弗雷恩：《戰時中國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約翰·伊斯雷爾：《西南聯合大學：作為首要價值的遺風》，歐俊臣（音）：《戰時中國的教育》，二文均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42]](#_42_10)稱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譯者

[[43]](#_43_10)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61頁。遷徙到中國西部的移民，其精確的人數不可能確定。陳估計，華北和華東主要城市有350萬居民從日本人手下逃離出來。這些人大概構成了國民黨區域永久性難民的主要部分。陳達估計另有1075萬人從城鎮化程度較低的地區逃出。這些人中間許多無疑是農民，他們在戰事發生時離鄉背井，但是隨后返回了。對逃往中國西部的難民數字，一些估計高達5000萬。見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4、25頁。不過，這確實是不準確的。白修德著：《尋找歷史》，第79頁談到難民數字的估計是如何變得嚴重夸張的。

[[44]](#_44_10)“下江人”，是四川人對長江下游省區的人的一種稱呼。——譯者

[[45]](#_45_10)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62—68頁；史國衡：《中國進入機器時代：中國軍事工業勞工研究》，第9—12頁及各處。

[[46]](#_46_10)因國際時差，中國記載珍珠港事件，日期為12月8日。——譯者

[[47]](#_47_10)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2—203頁；秦郁彥：《日中戰爭史》，第296—297頁；卡爾遜：《中國軍隊：其編制和軍事能力》，第73頁；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573—574頁。

[[48]](#_48_10)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152頁。

[[49]](#_49_10)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587—588頁。

[[50]](#_50_10)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948年的歷史綜合分析》，第148—149頁。

[[51]](#_51_9)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第153頁；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第300頁；藤原彰：《日本陸軍的作用》，載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合編：《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1931—1941年的日美關系》，第191頁。

[[52]](#_52_9)蔣介石：《抗戰建國》，第108頁。

[[53]](#_53_9)《美國對外關系：1943年，中國》，第142頁。

[[54]](#_54_9)即皖南事變。——譯者

[[55]](#_55_9)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303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5頁；L.P.范斯萊克編：《中國共產黨運動：美國陸軍部報告，1945年7月》，第71—72頁。

[[56]](#_56_9)史邁士致國務院：《1940年在中國的和有關中國的重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進展狀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3—204頁；白修德與賈安娜：《中國雷鳴》，第62頁；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第40—82頁。

[[57]](#_57_9)中國官方關于戰時傷亡的數字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華志，1950年》，第182頁。

[[58]](#_58_9)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9，不過可能沒有一個人知道國民黨軍隊的精確數字。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27頁記載，軍隊從1940年的250萬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萬人。《中華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個600萬的數字。

[[59]](#_59_9)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35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2—113頁。

[[60]](#_60_9)應為“民族革命同志會”。——譯者

[[61]](#_61_9)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云南與重慶》，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第329—355頁；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第83—131頁。

[[62]](#_62_9)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34頁。

[[63]](#_63_8)參看本章《政治上的虛弱》一節。

[[64]](#_64_7)戰爭結束時偽軍人數達到近100萬，因為有許多部隊是在占領區征募的。易勞逸：《矛盾關系面面觀》，第284—292頁。

[[65]](#_65_8)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33頁，引用材料時有刪節；并見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325頁。

[[66]](#_66_8)即陸軍大學。——譯者

[[67]](#_67_8)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55—58、81—89、145—152頁。

[[68]](#_68_8)唐納德·G.吉林：《中華民國的中央集權問題：陳誠與國民黨個案》，《亞洲研究雜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頁；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325頁；斯諾：《爭奪亞洲的戰爭》，第184—185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167頁。

[[69]](#_69_8)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49頁。

[[70]](#_70_8)米爾頓·E.邁爾斯：《另一種戰爭》，第348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369—370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第33—37頁；林沃爾特致艾奇遜：《這個中國兵》，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頁；蘭登致國務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與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37頁；蔣夢麟：《新潮》，《傳紀文學》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頁。

[[71]](#_71_8)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確數字絕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爭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徐復觀也提出了同等數額的新兵大量死亡數（《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民主評論》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頁。蔣夢麟：《新潮》，第90—91頁；蘭登致國務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頁。

[[72]](#_72_8)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36頁；又見《湖北省政府報告》（1942年4—10月），第113頁。

[[73]](#_73_8)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65、243頁；又見高思致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國務院檔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頁；和高斯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后鄂西湖區見聞》，美國國務院檔案740.0011，太平洋戰爭/3559，1943年11月5日，函內附件第4—5頁。

[[74]](#_74_8)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36—138頁；高思致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附件第2頁；林沃爾特致艾奇遜：《這個中國兵》，附件第3頁；賴斯致高思：《在蘭州觀察到的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頁。

[[75]](#_75_8)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45頁。

[[76]](#_76_8)包瑞德：《迪克西使團：美軍觀察組在延安，1944年》，第60頁。

[[77]](#_77_8)高思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后鄂西湖區見聞》，附件第5頁。

[[78]](#_78_8)高思致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附件第2頁；關于軍隊的醫藥條件，見萊爾·斯蒂芬森·鮑威爾：《戰時中國的一個軍醫》；羅伯特·吉倫·史密斯：《美國衛生部設法改進中國陸軍衛生署效能的史實，1941—1945年》；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39—140頁；斯思明（音）：《中國的衛生問題》，第44頁。

[[79]](#_79_8)羅茲·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國戰爭中的三年日記》，第236頁。

[[80]](#_80_8)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頁；多思在《中日戰爭，1937—1949年》第65頁中寫道：“中國人通常開槍打死他們自己的重傷員，作為一種仁慈行為，因為 ‘他們橫豎只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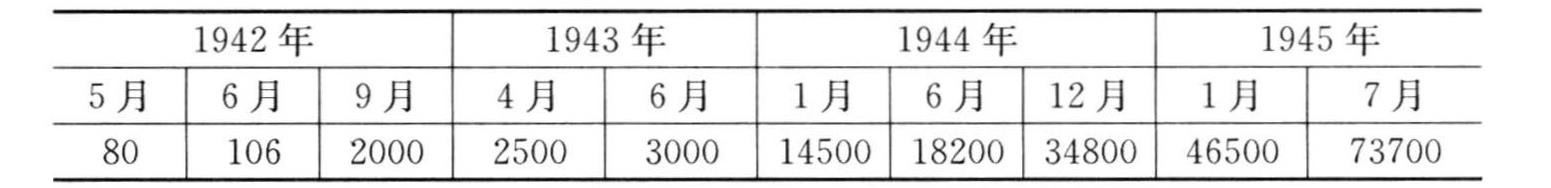
[[81]](#_81_8)高思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后鄂西湖區見聞》，第3頁，附件第5頁。

[[82]](#_82_8)這一結論基于這樣的事實：戰爭期間被軍隊放出來的士兵人數無足輕重，而除1937年7月軍隊中有將近180萬人外，1937—1945年間征募的有14053988人。但1945年8月國民黨軍隊僅有（據中國統計）大約350萬人或（據美國統計）270萬人。全部傷亡（包括1761335名傷員，其中一些無疑歸了隊）為3211419人。另外約有50萬人投向日本人。我沒有看到被日本人抓到的俘虜數，但數字肯定不超過另一個50萬。簡單計算就使人想到，至少有800萬，或許有900萬之多的人下落不明。（這個數字包括政府承認去向不明的1867283名新兵。見[此處注釋](#_48_Pian_Gang_Tie_Zai____Zhong_G)。）資料來源：《中華志，1950年》，第182、185頁。軍隊規模的數字，見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1和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382頁。以上結論是從國民黨自己的資料得出的，但這與他們公布的戰時逃亡（598007人）和因病死亡（422479人）的數字是不一致的。見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10。官方資料中的矛盾表明，國民黨關于軍隊的數字是不可靠的。事實上，在臺灣的一位前國民黨將軍在答復我的詢問時，斷言中國軍隊根本不重視關于傷亡數字的準確性。

[[83]](#_83_8)楊格：《中國與援助者，1937—1945年》，第18—21、18、26、54、125—130頁。

[[84]](#_84_8)楊格：《中國與援助者，1937—1945年》，第207頁及各處。

[[85]](#_85_8)表明飛越駝峰航線運抵中國的補給總數的一些數字（單位：噸）：



資料來源：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57頁；赫伯特·菲斯：《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命的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第42、67、203頁。關于租借法案，見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350、399、402頁。

[[86]](#_86_8)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第232頁。

[[87]](#_87_8)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74頁。

[[88]](#_88_8)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編，第115、124、213、320、321、322頁。

[[89]](#_89_7)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282頁。

[[90]](#_90_7)陳納德：《戰士風格》，第214頁。

[[91]](#_91_7)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443—446頁；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第492—493頁。

[[92]](#_92_7)《史迪威文件》，第333頁。

[[93]](#_93_7)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290、328頁。

[[94]](#_94_7)同上書，第293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166頁。

[[95]](#_95_7)例如在廣西，戰爭中的損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號作戰期間所遭受的損失），據報道，有11萬人被殺，16萬人受傷，30萬幢房屋被毀壞，8萬頭耕牛被殺死。《新民報》1946年3月20日。

[[96]](#_96_7)何應欽：《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的虛偽宣傳》，《自由鐘》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第26頁；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279、284頁。

[[97]](#_97_7)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頁；高思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后鄂西湖區見聞》，第1頁。

[[98]](#_98_6)沃倫·I.科恩：《誰在湖南與日軍作戰？關于中國作戰成就的若干看法》，《亞洲研究雜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115頁；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第321—322頁；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頁；李一葉：《中國人民怎樣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第66頁。

[[99]](#_99_6)《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319頁。

[[100]](#_100_6)零售價格的年上漲率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 %；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8月，251%。關于通貨膨脹的主要的第二手資料是：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年》。

[[101]](#_101_6)易勞逸：《矛盾關系面面觀》，第275—284頁。

[[102]](#_102_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44頁；又見楊格：《中國戰時的財政與通貨膨脹》，第25—26頁；關于田賦，見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45—70頁。

[[103]](#_103_6)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291、234—235頁。關于軍隊人數，見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267頁；《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58頁。

[[104]](#_104_6)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272—273頁；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290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115頁；《美國對外關系：1944年》第6卷，第906—907頁。

[[105]](#_105_6)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66—70頁。

[[106]](#_106_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4頁。

[[107]](#_107_6)《大公報》（重慶）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論；《大公報》（重慶），1945年4月13日第2版社論。

[[108]](#_108_6)董顯光編：《抗戰七年以后的中國》，第112—113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323頁。關于結核病的發生率，一份共產黨的資料報道說：1945年X光檢查表明，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一所最受優待的大學——教職員中足有43%的人染上這種疾病。13%的男學生和5.6%的女學生也染上這種疾病。《新華日報》1945年2月20日。這篇報道無疑需要核實。

[[109]](#_109_6)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第23頁；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第659頁；又見張圣軒：《三十二年四川工業之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頁；《中華志，1937年—1943年》，第437頁。

[[110]](#_110_6)張圣軒：《三十二年四川工業之回顧與前瞻》，第266頁。例如，進口新紡織設備使內地的錠數從戰前僅僅幾千枚增長到230000枚。秦國平：《戰時通貨膨脹下的中國棉紡工業》，《太平洋事務》第16卷第3期（1943年3月），第34、37、39頁。

[[111]](#_111_6)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第109頁；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94頁。

[[112]](#_112_6)秦國平：《戰時通貨膨脹下的中國棉紡工業》，第39頁。

[[113]](#_113_6)劉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79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產的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頁。

[[114]](#_114_6)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239—240頁。

[[115]](#_115_6)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5頁；勇龍桂：《救濟戰時工業的基本途徑》，《中國工業》第25期（1944年3月），第8—9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產的回顧與前瞻》，第36頁；關夢覺：《陜西省紡織業之危機及其出路》，《中國工業》第19期（1943年9月1日），第12頁；阮有秋：《今日后方民營工業的危機》，《中國農民》第3卷第1—2期合刊（1943年6月），第33頁；方治平等：《論官僚資本》，第36頁；潘祖永：《后方辦廠的困難和期望》，《新經濟》第6卷第11期（1942年3月1日），第237—239頁；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第52頁。

[[116]](#_116_6)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1頁；史國衡：《中國進入機器時代》，第60—61、134頁；《戰時中華志，1937—1945年》，第385頁；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55—56、112頁，表58；陳達：《中國勞工階級與當前經濟危機》，《社會建設》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頁；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第43頁；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國民黨中國的勞工問題札記》，第20—28頁。

[[117]](#_117_6)劉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業》，第79頁；勇龍桂：《救濟戰時工業的基本途徑》，第8頁；陶大鏞：《論當前的工業救濟》，《中國工業》第25期（1944年3月），第11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頁。

[[118]](#_118_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344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144頁；《財政評論》第5卷第1期（1941年1月），第25—37頁。

[[119]](#_119_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35—137、345—349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35—36、146—149頁。

[[120]](#_120_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345—346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149頁。

[[121]](#_121_6)關夢覺：《陜西省紡織業之危機及其出路》，第7—9頁；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217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第37頁；淦克超：《戰時四川工業概觀》，《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頁。

[[122]](#_122_6)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335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的回顧與前瞻》，第28—29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第28—29頁。

[[123]](#_123_6)《大公報》（重慶）1945年1月1日第3版；《戰時中華志，1937—1945年》，第369頁；《商務日報》1945年9月9日；張大琛：《三十三年的重慶土布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頁。

[[124]](#_124_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7頁；又見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第141、316頁；《商務日報》1945年1月18日；《商務時報》1945年8月7日。

[[125]](#_125_6)小帕克斯·科布爾：《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頁；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1422頁。

[[126]](#_126_6)《中華志，1937—1943年》，第431、365頁；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836—839、853頁。

[[127]](#_127_6)《中華志，1937—1943年》，第438、376頁。

[[128]](#_128_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89—190頁；又見《大公報》1941年12月13日社論，引自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第52頁。

[[129]](#_129_6)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1448—1449頁；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88—190頁；鐘安民（音）：《中國現代制造業的發展，1928—1949年》，第227頁；淦克超；《戰時四川工業概觀》，第72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的回顧與前瞻》，第34—37頁；彥悉達：《經濟危機與官僚資本》，《經濟學周報》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頁。

[[130]](#_130_6)《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85—1288頁。

[[131]](#_131_6)彭菲爾德致高思：《受到檢查的評國民參政會會議的社論》，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 9—1444，1944年9月14日，附件一，第1頁。

[[132]](#_132_6)佩克致國務院電報，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第1—9頁；高思致國務院：《川西康東之行的見聞報告》，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頁；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1、19頁，格雷厄姆·佩克：《兩種局勢》，第56頁。

[[133]](#_133_6)《中國各小黨派現況》，《民主政治對一黨統治：小黨派組織起來》，《亞美雜志》第7卷第3期（1943年4月23日），第97—117頁；小梅爾維爾·T.肯尼迪：《中國民主同盟》，《哈佛中國論文集》第7集（1953年），第136—175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351—362頁。

[[134]](#_134_6)萊曼·P.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第169、174—175頁。

[[135]](#_135_5)徐乃力：《國民參政會與中國戰時問題》，第38—55頁。

[[136]](#_136_5)《中國的精神動員：計劃綱領》； 美國國務院對范宣德致國務院電報的意見，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963，1943年3月13日；《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

[[137]](#_137_5)丁徐麗霞（音）：《現代中國的政府對于新聞的控制，1900—1949年》，第132—151頁。

[[138]](#_138_5)休·迪恩：《國民黨中國的政治反動》，《亞美雜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月），第210—213頁；丁徐麗霞（音）：《現代中國的政府對于新聞的控制》，第139—141頁；高思致國務院，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19（1944年3月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關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聯合起來的備忘錄，第6頁；薩空了：《兩年的政治犯生活》，各處；道格拉斯·羅伯遜·雷諾茲：《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和戰時中國政治上的兩極分化，1938—1945年》，第306—308頁及各處。

[[139]](#_139_4)歐俊臣：《戰時中國的教育》，第106—111頁；杰西·格雷戈里·蘆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第386頁。

[[140]](#_140_4)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第340—347頁；范宣德致國務院：《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代表會議》，美國國務院檔案893.408/1（1943年3月17日）；蘭登致高思：《昆明中國大學生中的活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42/8—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頁。

[[141]](#_141_4)《戴雨農先生年譜》，國防部情報局編，第25頁；陳少校：《黑網錄》，第102—106頁；董顯光：《中國與世界新聞界》，第180—181頁。

[[142]](#_142_4)李一葉：《中國人民怎樣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第51頁；高思致國務院：《中國的“勞工營，》，美國國務院檔案740.0011太平洋戰爭/3678（1943年12月24日）；薩空了：《兩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頁及各處；《上饒集中營》，第3、23頁。

[[143]](#_143_4)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66—178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9—19頁；江上清：《政海秘聞》，第157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251，附件1（《1943 年12月26日國務卿關于西安詳情的非正式報告節錄》），第1—2頁；哈爾致多諾萬：《中國最近的事件和動向》，戰略情報局檔案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2頁；賴斯致艾奇遜：《中央軍在魯蘇豫皖邊區的征募、待遇、訓練和行動》，戰略情報局檔案116311，第2頁。

[[144]](#_144_4)高思致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后鄂西湖區見聞》，附件第3頁。

[[145]](#_145_4)《湖北省政府報告，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第132頁；《胡上將宗南年譜》，第118—121頁；吳鼎昌：《花溪閑筆正續集》第二集，第194、199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21頁；范宣德致國務院：《四川彭縣騷亂的處理》，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遜致國務院：《貴州省狀況：自由中國的動亂》，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00（1943年7月27日），附件（約翰·C.考德威爾：《福建省情報告》），第2頁。

[[146]](#_146_4)高思致國務院：《孫科博士對于民主政治和計劃經濟的看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40（1944年4月14日），附件1，第3頁；高思致國務院：《孫科博士批評三民主義青年團現行目標和方法的講話》，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66（1944年4 月25日），附件，第2—4頁；高思致國務院：《孫科博士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講演》（1944年6月7日），載《亞美雜志論文集：中國災難的線索》，第1卷，第542頁。

[[147]](#_147_4)《復興中國國民黨建議》：戰略情報局檔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4頁，《新官場現形記》；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101—102，109—124頁。

[[148]](#_148_4)德姆魯賴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與警備司令部部隊之間可能發生沖突》，1943年4月26日，美國國務院檔案893.105/93，第2頁。

[[149]](#_149_4)張文實：《云南內幕》，第16、42頁；蘭登致國務院：《中國今后政治的發展：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昆明的活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7—1444（1944年7月14日），第2頁。

[[150]](#_150_4)《美國對外關系：1944年》，第492頁。

[[151]](#_151_4)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第346—347頁。

[[152]](#_152_4)林沃爾特致高思：《擬議中的國防政府》，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400（1944年5月8日），第3頁。

# 第十二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5年

筆者要對陳永發和格雷戈爾·本頓精心而有見識的建議表示感謝。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認為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因為他們的經驗與思想體系使他們深信，日本對中國的擴張是由無法改變的勢力推動的。中共反復申述，“目前形勢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國主義要將中國變成殖民地”。中共還認為不應回避這場戰爭，并在1935年年底以后就要求盡早共同抗敵。毛和他的追隨者知道，在一場中日戰爭中，他們可以作為愛國者要求得到一個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們確實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領導作用。除此之外，對他們只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們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這種和平可能以犧牲他們為代價。抗戰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國民黨贏得可以用來繼續進行剿共戰爭的時間。每一次拖延也使東京和南京有時間可能達成某種進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動，這正是日本外相廣田曾于1936年8月建議的。

人們無須指出，停止內戰、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和抵抗日本也都對中共有利，而責難中共的誠意。與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鎮壓號召相比，中共的政綱更符合中國城市人口的心態，其中包括學生、知識分子、很大一部分資產階級和許多工人。統一戰線政策在上述社會集團中，甚至在一些有影響的國民黨派別中，都很有說服力，以致蔣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兩周獲釋后所作的停止內戰及對日采取較強硬態度的決策中，統一戰線也占重要分量。

## Ⅰ戰爭初期，1937—1938年

西安事變后幾個月中國共雙方代表達成的協議，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開戰后于8、9月間公諸于眾。這些協議奠定了戰爭初期國共關系的基礎，并在整個戰爭期間名義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為實現孫逸仙的三民主義而奮斗；（2）停止武裝暴動、蘇維埃運動與強制沒收地主土地三項政策；（3）取消現存的蘇維埃政府；（4）取消紅軍稱號，并將軍隊交與中央政府指揮。作為回報，國民黨允許中共在幾個重要城市設立聯絡處，出版《新華日報》，并指定代表參加它的兩個主要咨詢機構。公民權利擴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釋放了，并給新近“統一起來”的地區與軍隊發放薪金，以補助其行政與軍事開支。[[1]](#_1_Dao_1940Nian_Wei_Zhi__Ju_Shuo)

戰爭的爆發改變了所有中國黨派的政治和軍事環境，并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從根本上重新考慮他們的一切重要政策、戰略和戰術。在戰爭頭一年半時間內——從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1月六中全會——黨中央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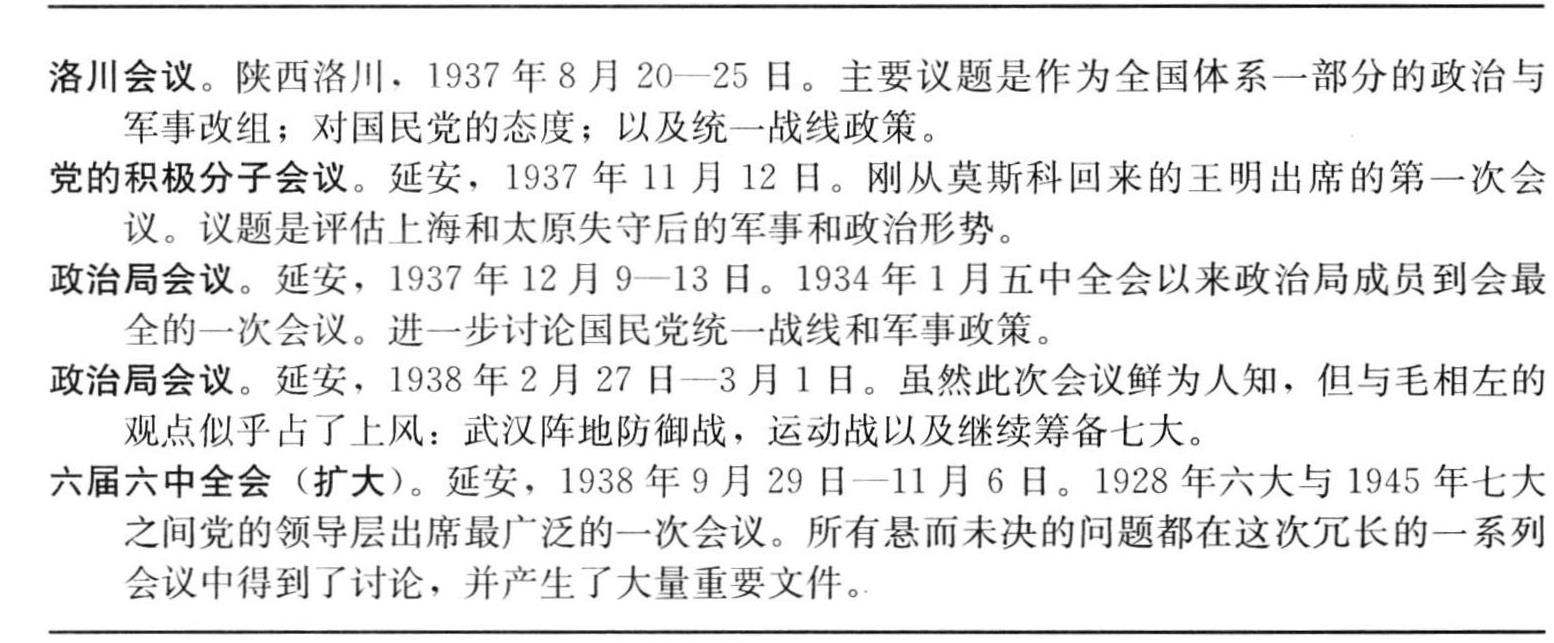
1.統一戰線，特別是中共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關系問題。

2.軍事戰略和戰術，包括與國民黨軍隊和其他軍隊協同作戰的問題。

3.領袖和領導權問題，特別是毛加強他對張國燾（1938年4月逃向國民黨）和王明（陳紹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這18個月中，決定政策和圍繞它們而展開的爭論在黨的幾次重要會議上公開化了（見表15）。到1939年初，這些問題已得到澄清，雖然并未完全解決，而在這些領域內以后的種種發展都可以回溯到這個基本點。此后這樣高層次的政策討論會的次數大大減少；甚至1942年的整風會議和1945年4—6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辯論政策。這種現象無疑反映了毛主義領導權的鞏固，但決不表明黨內已經達到一致和充分和諧了。

表15 主要的共產黨會議（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



## 對國民黨的態度：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過起，就被認為是對所有愿意注意并響應它的人的號召。對這樣做的人，中共不論在實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愿做出實質性的讓步，只要不損害黨的基本原則以及黨對這一運動的最終控制。在以后幾年中，統一戰線的范圍穩步擴大，而它的運用也更為復雜。早在1939年10月，毛澤東就認定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對它們的正確認識相當于從整體上正確領導這場革命。即使在宣布與國民黨聯合時，中共仍然要問：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只限于國共兩個黨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兩個黨僅是這個統一戰線中的一個小部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是工農商學兵一切愛國同胞的統一戰線。[[2]](#_2___Guo_Gong_Liang_Dang_Tong_Yi)

爭論集中在，或者說，圍繞著兩黨關系的精神，共產黨是否會遵從國民黨對它的限制以及它將如何全面服從這個名義上的上司的命令。在戰爭的頭幾年，這些爭論染上了派別斗爭和人際沖突的色彩，以致很難把事實與辯解分開。在公開場合，共產黨的聲明贊揚蔣介石與國民黨的領導，并保證全面的團結與合作，但這種保證含糊而不具體。他們提出種種建議而不是批評，這些建議大都與進一步政治民主化、群眾動員之類有關。

在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問題上，毛澤東早先的立場顯得頗為強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須使國民黨不脫離抗戰，他的態度有所緩和。對毛來說，統一戰線意味著中日間不會講和。毛在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始終不渝的態度是保持獨立和自主。有一段時間，他也愿意考慮共產黨加入一個徹底改組的政府（民主共和國），主要是為了在全國獲得合法地位和擴大影響。但在多數時間他力求使共產黨脫離國民黨，如有可能在物質上也脫離。黨的其他領導人，包括張國燾和近期回國的王明在內，顯然對這條路線表示懷疑。

有些資料表明，在1937年11月和12月的會議上，毛的路線未取得勝利。如果是這樣，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場，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強硬態度。1937年末，國民黨人處境危急，這不是推動他們前進的時候：11月12日上海失守，次月發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殺，更嚴重的是蔣介石正在認真考慮日本的一項和平建議。

但是，隨著新的一年來臨并日漸逝去，和平危機也過去了。南京慘案加強了中國人的決心，而在1938年1月，近衛內閣宣布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無論蔣有過什么樣的打算，現在他別無選擇，只有打下去，而全國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內，都宣布支持他。最遲到這年夏季，國民黨不打算死守臨時首都武漢的意圖已經明朗。早在頭年12月，政府機構已開始在重慶運轉，而更多的機構一直在向那里搬遷。當時士氣高漲，而且團結精神普遍，蔣發誓要繼續推行他的誘敵深入、焦土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

這些事態的發展加強了毛的地位。到1938年秋六中全會時，中共的官方立場是全力支持蔣介石和兩黨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贊許的口吻引用劉少奇的話說，如果王明的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意思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么這就不是聯合，而是投降了。作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國民黨業已贊同的協議，但有些事要“先斬后奏”，有些事則“斬而不奏”。他最后說，“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一定不要分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3]](#_3___Tong_Yi_Zhan_Xian_Zhong_De)

## 軍事戰略與戰術

戰爭開始時，中國共產黨指揮著大約3萬人，由長征各部隊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裝和新參軍的人員混合而成。1937年8、9兩月，他們被集體改編為八路軍，并被編為115、120和129三個師，分別由林彪、賀龍和劉伯承指揮。（詳情見下《組織機構與活動》一節。）

戰爭開始后不久，國民政府還授權成立第二支共產黨部隊新四軍，在華中作戰。新四軍是以1934年長征開始時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隊伍為核心組成的。從那時起，他們人員日漸減少，在以分散的隊伍對抗國民黨不斷掃蕩的危險情況下生存了下來。他們最初核準的人數為12000人，但幾個月后才達到這一水平。新四軍名義上的指揮官是葉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產黨軍事領導人，以后脫黨，但他以某種方式設法與國共兩黨都保持良好關系。實際的軍事和政治控制權被授予項英和陳毅。

由改組而引起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是否接受國民黨的兩項建議：第一，他們向八路軍指派參謀軍官；第二，共產黨與非共產黨部隊在國民黨人劃定的戰區內聯合行動。根據張國燾的說法，一批黨的高級干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懷）贊同這些建議。雖然沒有充分的文件根據，但他們可能爭論過：接受這樣的建議可以進一步鞏固統一戰線，也可以有理由要求與國民黨部隊分享他們的武器和其他裝備。有些軍事領導人，大概以彭德懷為代表，希望減少共產黨對游擊戰的依賴，贊成大部隊作戰并采用更常規的戰術。毛澤東和其他人則反對這些建議，認為這將使八路軍過于暴露在國民黨的監視之下，聯合行動將使共產黨軍隊從屬于非共產黨軍隊，而且在時間與地點上的主動性將因此喪失。

毛澤東預見到一場分為三個階段的持久戰：（1）日本的戰略進攻；（2）長期的相持（這就是毛在六中全會上確認的“新階段”）；（3）戰略反攻，導致最后勝利。關于第三階段，他說得相當含糊，只是預期這將與“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的國際形勢”相配合。[[4]](#_4___Mao_Ze_Dong_Wen_Ji____Di_6J)同時毛敏銳地察覺到中共的戰略弱點。他相信這種形勢要求進行游擊戰以及保存并擴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話說，如果中共不僅要“保持已有的陣地”；而且要“擴大已有的陣地”，那么僅有的辦法是，要么損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領的地區擴張；要么在敵后占領區擴張，并讓敵人付出代價。而當毛說到“陣地”時，他是指共產黨穩固領導下的根據地。[[5]](#_5_Mao_Ze_Dong_Xuan_Yong_De_Ci_S)作出選擇并不難。前一種辦法導致分散力量，易受責難，還可能發生沖突——在中共與山西閻錫山的關系中所有這些實際上都發生了。而后一種辦法顯然對抗戰有利，而且，只要國民黨的力量已被趕出這些被占領區，中共就可以避免與它的盟友發生沖突。

這些原則在毛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作了簡明的歸納，然后又加以詳盡的解釋。[[6]](#_6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_2)當然，現實世界的復雜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樣簡單明了。無論在前線還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與其他中國軍隊接觸：在陜甘寧邊區周圍，在山西以及在長江下游地區，莫不如此。即使在敵占區，也不是完全沒有國民黨軍隊；尤其在戰爭初期，不少國民黨軍隊還留在日本戰線的后方。但是毛澤東的戰略的含義是不會受到誤解的。

## 領袖與領導權

戰爭爆發時，毛澤東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在同輩中居于首位。老同志們準備與他爭論基本政策問題，并且至少有兩個對手直接向他挑戰。他們是張國燾和王明。到1938年晚些時候六中全會結束時，毛在建立聯盟方面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到1942年或1943年他登上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

張國 燾的權力在長征中及長征剛結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擊。1935 年8月，他的當時較強的部隊在川西北與毛澤東的部隊會合，兩人在很多問題，包括領導權、軍隊的指揮和長征的目的地等問題上發生了沖突（參見第4章《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的第一條注）。張對毛在技術上不合常規的遵義會議（1935年1月）取得的領導地位提出異議，張及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未能參加那次會議。結果，張率領他的經過改編的部隊向西進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則向西北進軍陜西和保安/延安地區，于1935年10月到達。但是張無法在那個不友好的地區立腳，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兇狠的親國民黨的穆斯林武裝的攻擊，在一系列進軍與反進軍的過程中，喪失了很多部隊。最后于1936年10月——比他的對手晚了整整一年——張和他的余部到達保安，而毛在該地已做了不少工作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張在名義上被賦予高位，具體地說，是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成員（七大后來延期了，直到1945年才召開）。但張知道他的命運之星已經隕落，而他于1938年春利用一次對西安的禮儀性訪問[[7]](#_7_Zhong_Gong_Pai_Zhang_Guo_Dao)逃到武漢，并在那里譴責毛澤東的統一戰線路線是在戰爭中謀求“所有的人都失敗”（即國民黨和日本人）。在武漢張與中共駐那里的辦事處之間有過幾次無成果的會晤，但到1938年秋召開六中全會時，他被當作叛徒開除出黨。

王明是一個更有力的對手。1937年10月他帶著斯大林的祝福或許還有共產國際的授權回到中國，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黨內上升時期與他有密切聯系的人的支持（參見第4章），這些人有點被嘲弄地稱為“洋學生”。王受過高等教育，表達能力強，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蘇聯度過的。他的隨和的世界主義與毛的地方主義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對比，而且他遠比毛更精通正統的馬克思理論，在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態度對待他的這位年長的湖南同志。1937年末，他確實傳達了指示，說毛由于狹隘的經驗主義和“不懂馬列主義”，應在“思想體系上”加以提高。[[8]](#_8_Ge_Lei_Ge_Er__Ben_Dun_____Di)這兩個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反感，他們的氣質和風格是如此不同。

無論王以前的同事們的傾向如何，現在他背后并沒有一個明顯的派別。黨的總書記張聞天（洛甫）在戰爭初期調和了不少黨內爭論，以便讓毛的政策大體得以實施。秦邦憲（博古）似乎受周恩來的指導，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伙伴，但現在已和毛及其集團共命運了。無論在黨的武裝力量中還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沒有任何值得重視的基礎。王回到了在他離開期間發生了很大變化的中國，他主要保有他的國際聲望、政治局成員的職務以及他的辯才。但是這些值得重視的資本并不足以發動一次公開的挑戰——的確，王顯然也未試圖與毛攤牌。

有人將王明描繪成一個在戰略上與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們在兩個基本問題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許多其他有關的爭論。[[9]](#_9_Tong_Shang___You_Jian_Pian_Ga)第一個問題[[10]](#_10___Zhong_Guo_De_Kang_Zhan_Yu)涉及中共與國民黨和中央政府的關系。第二個問題包含以工人、知識分子、學生和部分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城市革命戰略與以農民為基礎的農村革命之爭。當然，對領導權的爭奪和個人之間的厭惡為這兩個問題的爭論增添了熱度。除了在蘇聯，毛主義的說法到處都占上風：王明實際上是要犧牲中共的獨立而向國民黨投降，而且他對農村革命冷漠無情。

這種簡單化的陳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果他的觀點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樣，王明怎么能在中共內部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很難想象他會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很少關心農民的投降派。當王明回到中國嘗試重建其地位時，我們可以設想他乞靈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權威。斯大林長期以來一直想使中國的抗戰集中在蔣和國民黨周圍，這一政策只是在1936年年中，斯大林的地位明確以后6個月，毛和中共才勉強不完全地接受。雖然中共更多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動，在1936年下半年向這樣的統一戰線靠近了（在12月12—25日西安事變中達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產國際的權威仍是可畏的。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開蔑視莫斯科的意愿。因此王明有了雙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權和免遭清洗的保護，因為任何這樣的行動都會招致斯大林的憤怒。王還可以進一步爭辯說，正是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才終止了內戰，而且，面對日本入侵，統一戰線已經使中共在國家事務中有了一種受尊敬的合法地位。現在正是將這種地位擴張到全國并使之合法化的時候，不應僅在落后地區保持一種地區性的游擊運動。王顯然相信，通過中央政府與軍事機構的改組，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為了團結和全民抗戰的需要，共產黨人將整體地作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內。當然這需要得到蔣介石的合作和同意。談判將是困難的，但王的說法很籠統——或者說很含糊——這就為策略留下很大余地。王也暗示，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可能使中共分享財政與軍事資源——或許還可以分到一些蘇聯援助——現在實際上都被國民黨人壟斷了。這些可能性對黨的許多高級干部和軍事指揮官都具有誘惑力，他們曾長期遭受資源的極度匱乏。[[11]](#_11_Zhang_Guo_Dao_Hui_Yi__Zai_Sh)王明顯然認為，日本的入侵、國內激發的愛國主義，以及國際支持（尤其是來自蘇聯的支持）最終將推動蔣作出進一步的讓步，就像西安事變后它們曾推動他走向統一戰線那樣。如果這樣，王明的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不含有向蔣投降的意思，而是繼續向他施加壓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漢，在1938年的頭6個月中，那里充滿了對這場戰爭的奉獻精神。統一戰線的精神滲透到所有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團體，國共兩黨間顯而易見的真誠合作使許多人感到意外。王可能覺得這種情況加強了他的力量。總之，整個春天他都在繼續號召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12]](#_12___Jie_Fang_Bao____Di_36Qi__1)此后，王明意識到蔣介石不會接受對其控制的政府和黨作出如此徹底的改變，他退一步說：“國民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它需要加強而不是改組。”[[13]](#_13___Kang_Zhan_De_Xian_Zhuang_H)他也號召，組建“國防師”，這也比他原先建議成立一個統一的全國軍事機構后退了一步。在武漢，王明顯然能爭取到周恩來對他的計劃的部分支持。

王明為統一戰線所作努力的致命弱點在于它們依賴可疑的國民黨政府的同意。而他僅有的力量只是國民黨自己選區內的輿論。[[14]](#_14_Pian_Gang_Tie_Zai____Zhong_G)王明不是投降派，但他已將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澤東卻保持著大得多的行動自由。

至于第二個問題，即革命應以農村為基礎還是應以城市為基礎，王明從未在農民中生活或工作過。雖然他生長在安徽一個富裕的農村家庭里，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論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1937年底回到中國后，王明很少提到農民，而他的著作，就人們所知道的而言，沒有一本涉及這個與毛澤東的心緊密相連的主題。王明并不要求放棄農民運動，但他顯然認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義力量（如學生、民族資產階級）當中沒有堅強的立足點，這個運動最終將失去它的馬列主義動力，而去追求落后的、狹隘的、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農民所關切的事物。因此，占有城市對王明比對毛澤東要重要得多，毛寧愿以空間換取時間，就像南京陷落后的蔣介石一樣，他不愿看到國民黨的抵抗力在無結果的陣地戰中被摧毀。而王明則號召像保衛馬德里那樣保衛武漢，這可以動員民眾。在這里，王明的統一戰線概念與他對城市的偏愛自然就結合在一起了，因為只有國民黨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現這樣的動員。

同時王明在武漢有黨的工作要做。他是新成立的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和長江局書記，兩者都直接對中央委員會負責。此外，他至少還是中共駐國民參政會和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表團名義上的領導人，這兩個咨詢機構都是國民政府于1938年初組建的，作為象征多黨合作的大造輿論的機構。從這些不同的講壇上，王明越過政府首腦發表愛國主義言論，這些言論對繼續使城市輿論支持抗日有很大影響。王明的主調是愛國主義和全心全意致力抗戰，而不是毛澤東的主張“保持并擴大我們已贏得的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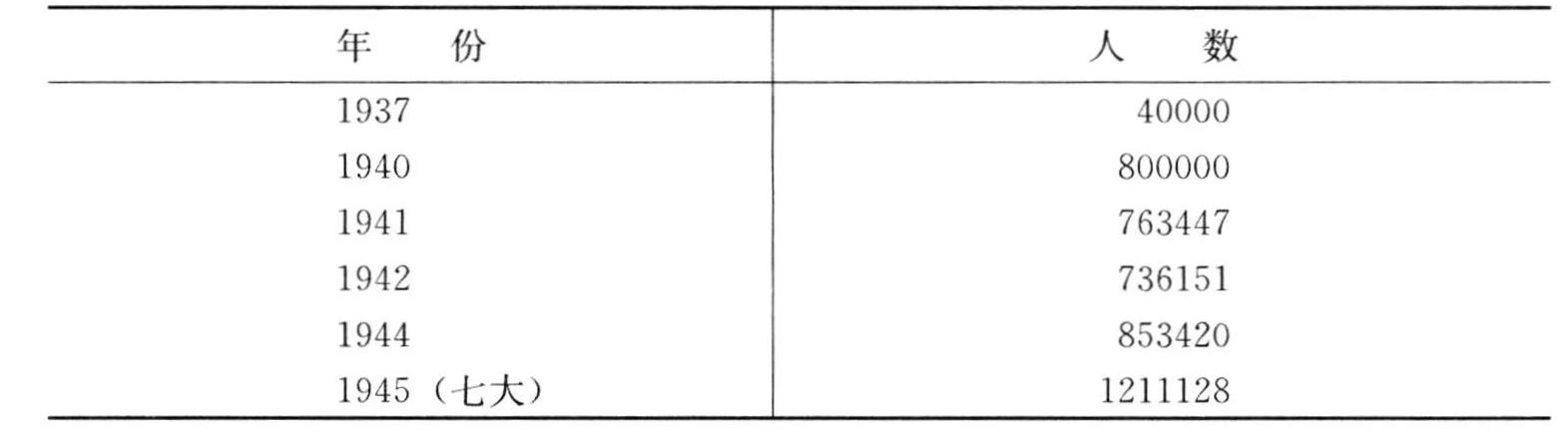
王明也從事獨立于國民黨的組織活動，特別在青年團體方面，而且他試圖將各種愛國組織結成“保衛武漢委員會”。但在1938年8月，這個委員會被解散了，與它聯系的群眾組織也遭到同樣命運，而中共在武漢的《新華日報》因提抗議而被停刊3天。由于蔣介石決定不以全力保衛武漢，也不允許進行獨立的民眾動員，王明企圖在城市中保持一個半合法的、有組織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滅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離開了黨中央，1938年王明的影響逐步下降。9月，共產國際表示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因此，10月到11月的六中全會標志著王聲望大降，而毛的領袖地位已顯著加強。然而，召開中央全會（擴大）而不是預期的七大——七大需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表明毛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或者還不完全能夠宣稱對全黨擁有最高權力。王明在一個時期內繼續領導統戰部和中國女子大學，并經常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文章。但他和他的觀點已不再是對毛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重大威脅，而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最終使“洋學生”喪失影響還沒有達到高潮。1940年后，很少再聽到王明的聲音。

## 組織機構與活動

中國共產黨和它的主要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在中日戰爭期間異乎尋常地擴大了。戰爭的頭3年，在1940年以前，發展是非常快的。軍隊擴大了5倍，黨員人數增長了20倍（見表16和17）。這些數字還不能說明全部事實，因為它們略去了正規軍的輔助部隊（民兵和自衛隊），以及在黨的影響下的成千上萬積極分子、基層政治組織和群眾團體。毋庸諱言，如此倉促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因為在快速發展中，素質、經驗和訓練常常被忽略了。

表16 戰時中國共產黨的擴張



資料來源：約翰·W.劉易斯：《共產黨中國的領導》，第110頁。

表17 戰時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擴大[[15]](#_15_Ha_Li_Sen____Tong_Wang_Quan)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事件前的數字。參見表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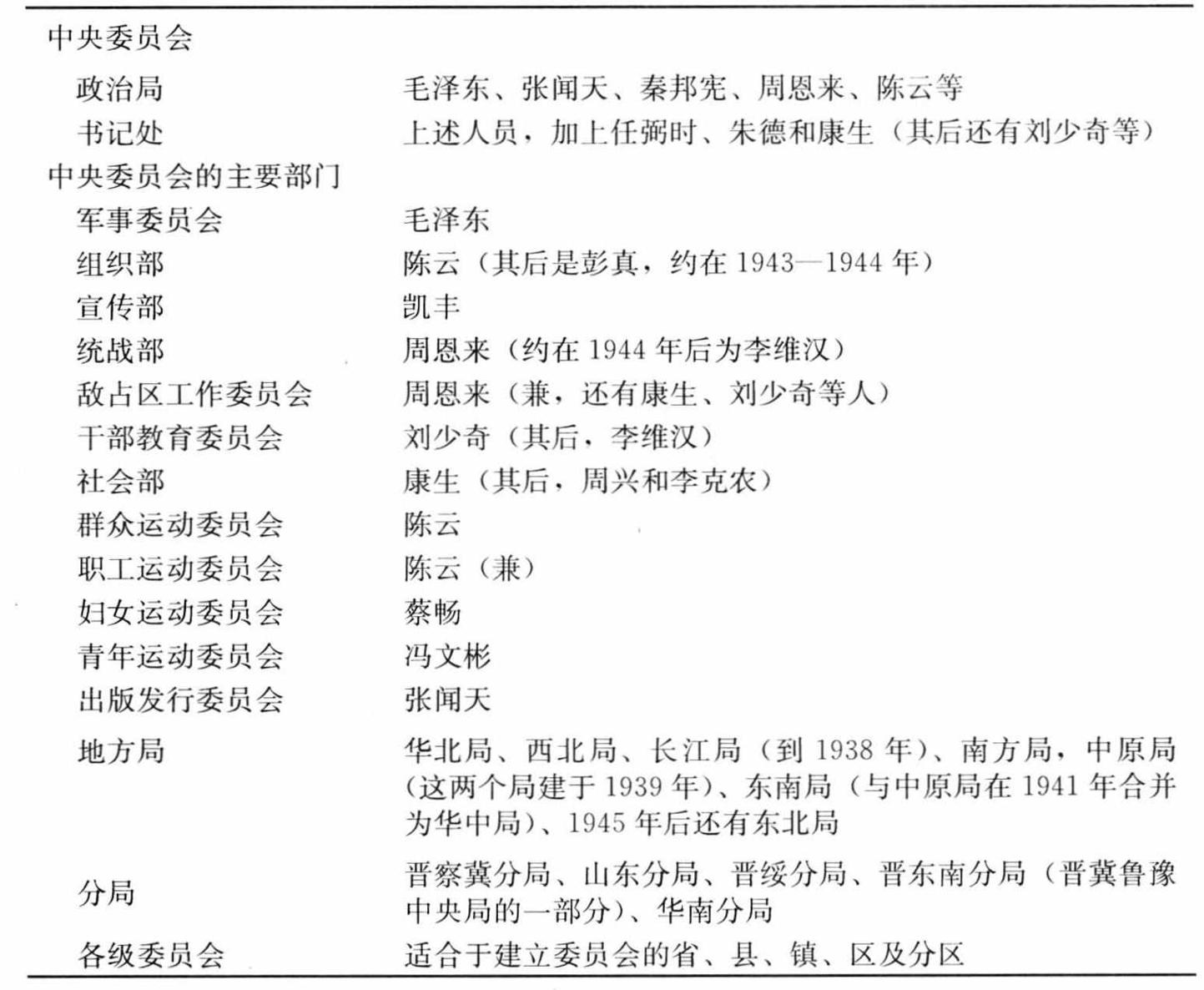
如表所示，黨和軍隊在40年代初期都收縮了，這主要是日本人和國民黨人都力圖限制或摧毀共產黨勢力的結果。他們造成必需品的極端匱乏，迫使中共不得不鞏固它的部隊，強調質量勝于數量，并更有效地進行組織和動員。收縮和鞏固時期一直持續到戰爭的最后一年。直到1944年中至1945年中的12個月，才是第二個發展時期。這三個時期（1937—1938年、1939—1943年和1944—1945年）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日戰爭期間的三個主要階段。

共產主義運動通過黨、軍、政的連鎖機構發揮作用。三個系統各有自己的組織，并與另外兩個系統緊密配合。而且，每個系統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個社會，試圖建立這一運動最終可以依賴的基層組織和群眾基礎。最后，由于地區上的巨大差異，而且這一運動分布于山區和平原，跨越華北和華中，處于日本戰線的后方和與國民黨爭奪的地區，行政管理變得更復雜了。戰爭期間中共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保持這個運動的凝聚力和推動力，在嚴格的中央集權——這無論如何難以做到——與退化為十足的地方主義——黨稱之為“山頭主義”——之間，左右為難地沿著不穩定的航向前進。掌握運動的中堅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來自延安黨中央的黨和軍隊的高層領導。

黨。概略而言，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一直是一個等級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居于頂點（見表18）。由這一層次作出的決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經過書記處，書記處大致確定目標，還決定哪一個機構或部門應負責執行所要求的任務。

下一級組織有兩種類型，負責處理黨的工作。第一種是有定向任務的職能部門，在最高層次上直接對書記處和政治局負責。它們的最重要的單位及其領導人參見表18。

表18 中日戰爭時期黨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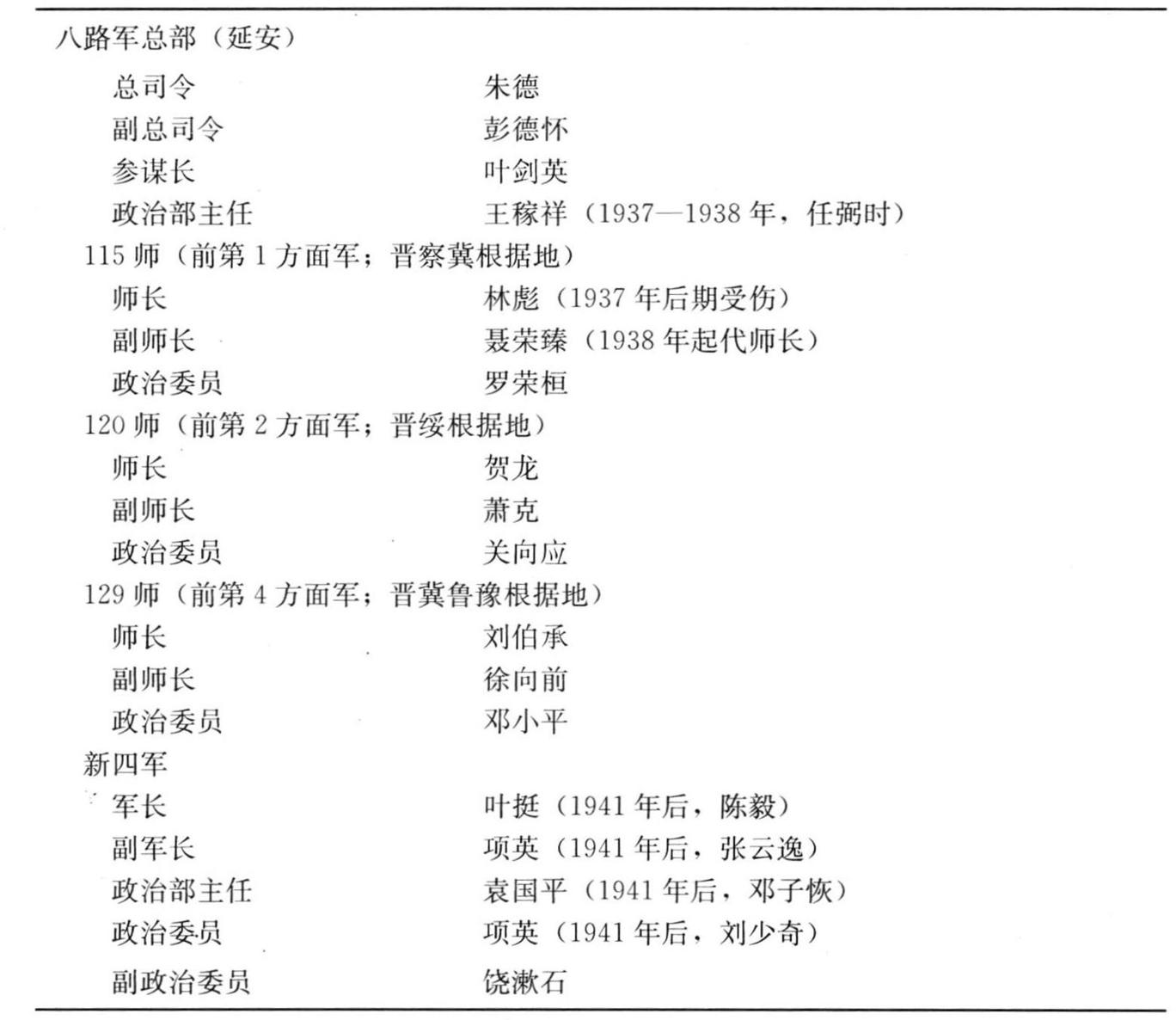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3頁，及引用資料。  
\*此處中共組織及負責人名單未必準確，請讀者用時加以鑒別。——譯者注

下一級組織的第二種類型是區域性的，與黨開展活動的地區相對應。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員會的各部門那樣，對延安的黨中央負責。它們通過指揮系統向下監督各分局（主要位于華北根據地）以及下級委員會和支部的工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樣設有職能部門，但形式上有所簡化。

最后，黨在各級政府和軍隊中，以及在群眾團體中，均設有支部。因此黨的作用猶如神經系統，連接這一運動的各個部分，傳送和處理信息，并發布指令。

軍隊。分別在華北和華中活動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正式結構見表19。作為正規的專職的野戰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是三級軍事結構的最高一級。這兩個軍是共產黨人可以投入戰斗的在訓練、領導和裝備上最好的部隊——雖然他們的裝備至少離要求還很遠。[[16]](#_16_Wan_Zhi_1944Nian__Ba_Lu_Jun)這兩個軍的部隊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區，但每個根據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隊。為了避免國民黨的反宣傳，共產黨人從不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最高指揮機構，但下層團、營和連卻在擴展。實際作戰由這些較小的分隊執行；師從不以完整的部隊參戰，而團也只是偶爾全體出動。

表19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組織



資料來源：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6頁。

在中共的根據地，存在著另外兩種類型的武裝力量：地方軍和民兵。大多數地方軍也負有專職的軍事責任，但與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同，他們長期留在自己的管轄地區以內。民兵理論上包括16—45歲之間全部身體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戰軍或地方軍，他們不“脫離生產”，而是在需要時執行零星任務。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從事自己的正常業務。當然，在人們說到這種軍事組織時，都感到訓練和裝備的不足日益明顯。大多數民兵是用大刀與農具武裝起來的，他們的老式鳥銃和土槍已被野戰軍或地方軍征用了。

雖然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創立這種軍事組織是一項復雜而困難的任務，但共產黨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聯系的軍事權力等級制，向下延伸到地方社會。當八路軍或新四軍的一支分隊進入一個不熟悉的地區時，他們可以期望與了解地形和敵人部署的輔助部隊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與提供后勤支援、情報、向導和住處的當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級都是上一級的征兵基礎，是人員培訓和兵力補充的源泉。實際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規模在戰爭最后一年的擴大（見上表17）大多來自地方武裝的集體改編。

中共每到一處都設法緩解農民對服兵役懷有的傳統怨恨與不信任，因為根據民間傳說和痛苦的經驗，服兵役通常意味著永遠失去心愛的兒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勞動力。但每個人都熟悉年輕人在田間勞動而于必要時保衛家園的觀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輕人被調到地方部隊或正規軍，震動也不會很大——特別是，如果他們的家庭得到某些減稅優待，莊稼有人幫助照料，并被給予對子弟兵做出貢獻的光榮。確實，送子參軍是富裕農戶尋求照顧和減稅的一種方法。

中共公開聲稱他們的軍隊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賣國賊的覺醒的中國公民。但是，在這一角色之外，中共領導的各級部隊還執行著許多其他任務，如與當地各種對手爭奪地區控制權，推行社會和經濟政策，維護治安。共產黨人也不得不計算每個地方可以負擔多少“脫產”的部隊，因為許多黨政干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勞動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產品因受戰爭的沖擊而進一步減少，經濟上的非生產人員容易成為沉重的負擔。

協調。人們當然不能只通過形式上的結構去估計一個組織的效率。清朝官僚制度的決策、執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體得到描繪，與此不同，中共體制的運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個經常使用的方法是把關鍵人物從一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或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從而使前者的經驗可以傳給后者。劉少奇提供了這種解決難題的突出例子，戰爭的頭6年他在延安和敵后根據地之間來回奔波，先在華北，后到華中，將他和毛建設根據地的理論成功地付諸實踐。還有許多其他較低級的干部也到處調動，如在1939年，有幾千名八路軍政治干部到達華中，以加強新四軍根據地的群眾動員工作。但這樣的人事調動經常是有選擇的，絕不是整體的，這樣就保證了領導班子的連續性，熟悉當地情況，并維持由對有聲望的領導人的忠誠而產生的士氣和紀律。

根據在江西時期的經驗，各個層次的黨校和軍校成為干部訓練和教育的另一條途徑。[[17]](#_17_Jian__L_Pu_Lai_Si____Gan_Bu)這類學校，如設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把它的畢業生分配到需要他們的地方去。此外，每個主要根據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學校、短期培訓班等教育網絡。各種類型的會議——公開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標記。出席和參加這些會議，對于黨員、士兵和積極分子來說，實際上是強制性的，向許多不識字的干部解釋黨的政策則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聯絡與指導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為普通讀者出版了兩種主要報紙：延安的《解放日報》與在國民黨首都的、常被刪改的《新華日報》。[[18]](#_18_1941Nian_Xia_Yi_Qian____Jie)這兩種報紙和其他公開的出版物刊登來自全國的、經過凈化的新聞報道，主要的國際事件，共產黨領導人的一般聲明，某些文件以及宣傳材料。同時，每個主要根據地也出版當地的報紙和期刊。較機密的材料用多種方式由信使傳遞：保密期刊、經過分類的匯編和報告、特殊指示。地方報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極為粗糙的紙張上的手寫膠版拷貝。某些情報可通過無線電傳送，但設備是湊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維修的人極少。用數碼傳送漢字常常出錯，當然也可能被截收。[[19]](#_19_Lin_Mai_Ke____Bu_Wei_Ren_Zhi)盡管困難很大，失敗也常有，這種通訊系統還是很有效地把許多地區不同層次的黨、軍和政的工作協調起來。

## 日本的入侵和中國的最初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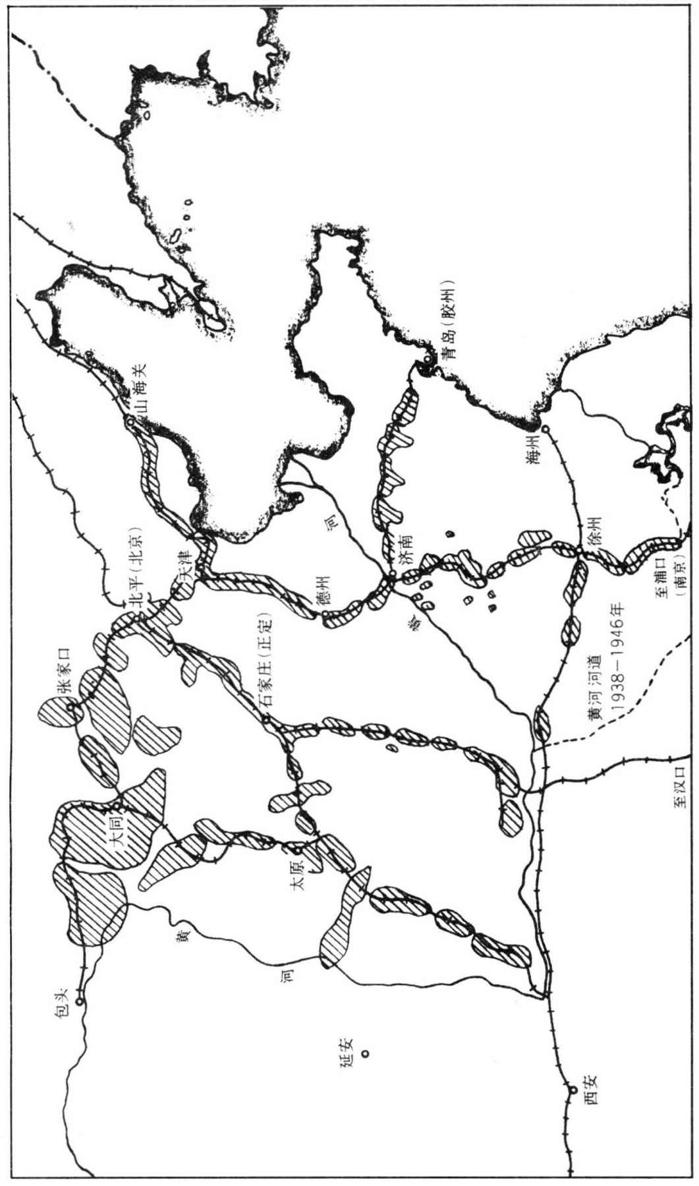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國的軍隊最強有力地由關東軍代表。它的總部設在滿洲城市長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日本在偽滿洲國的利益，但它也試圖在華北建立柔順的緩沖區，以排除國民黨的勢力。關東軍一時很成功，但在1935年末策劃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脫離與南京的聯系時卻遭到了難堪的失敗。這一笨拙的舉動激起了愛國怒火，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發了由學生領導的示威運動，并很快擴展到中國大多數主要城市。在華北地區本身，根據《辛丑條約》的條款，有一支規模小得多的日本駐軍，總部設在天津。它的指揮官們與關東軍爭奪在河北北部的權勢，但他們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們當時所能支配的力量。這支駐軍總數僅約6000人，正是他們的一支分遣隊于7月7日在盧溝橋同宋哲元的第29軍的中國巡邏隊發生了沖突，當時第29軍比他們強大得多。

日本在華北的行動既有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動機，也有經濟上的動機。為了把華北的經濟與滿洲國和本土島嶼的經濟聯系起來，在滿洲國當局（關東軍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派（天津駐屯軍及其經濟機構——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財團之間進行著無休止的協商。[[20]](#_20_Zhong_Cun_Long_Ying____Ri_Be)每一方的軍事指揮部為了自身利益都拉攏東京的決策者，但他們常常無視他們不贊同的指示。東京的決策者們也說不上較為一致，他們深知他們對戰地指揮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本人確實從未找到能使他們在中國的行動真正協調起來的途徑。

7月7日后不久，駐屯軍得到關東軍和本土島嶼的增援。它重編為華北方面軍，兵力不久達20萬人左右。同時在華中——頭16個月里戰斗最頻繁的場所——日本兵力達25萬人，由此最終成為華中派遣軍的部隊指揮。

在華北，駐屯軍很快占領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強的華北方面軍沿這一地區鐵路系統的輻射線出動，如地圖9所示。在多數地區，日本的推進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軍最初表現堅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將軍不戰而潰，打開了經過山東通向關鍵性的鐵路樞紐與華中門戶的蘇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韓即被蔣介石逮捕并處決。）

在西北和西邊，戰斗比較激烈。在詭詐的軍閥主席閻錫山的全盤指揮下，山西部隊一度勇敢地守衛娘子關。在大同以北，[[21]](#_21_Ping_Xing_Guan_Ying_Zai_Da_T)山西軍隊與林彪指揮的中共第115師的混合部隊于1937年9月末，在平型關贏得令人振奮的勝利，雖然在戰略上并不重要。（見下節《根據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繼續沿同蒲鐵路向西南方進軍，直指黃河大彎曲處。盧溝橋事變后一年，日本對華北的占領大致如（第627頁）地圖9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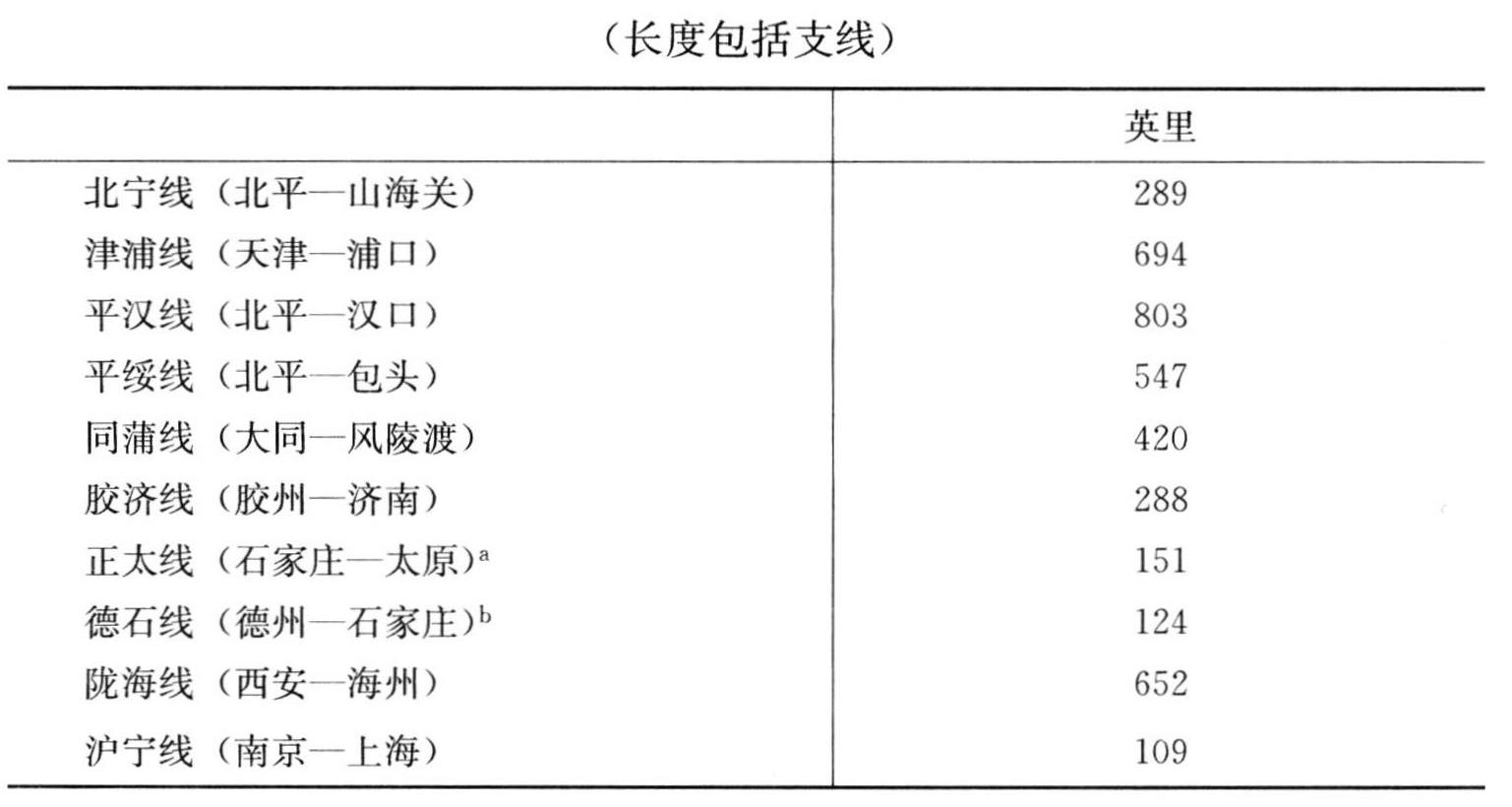


地圖9 40 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對華北的占領

資料來源：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7—1941 年》，第8頁。

當然，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領，而只是一些點和線的網絡。華北方面軍在進軍中有時離開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農村成扇形展開。有時他們襲擊經過的村莊，但并不想駐守鄉村，這是他們力所不及的事。僅僅在華北，主要的鐵路線長達3000英里左右；單單保護這些鐵路線和守衛沿線的城鎮就分散了他們大約20萬人的兵力。結果是，對遙遠鄉村的控制只能交給中國的合作者。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華北方面軍將任務交給鄉村警察和未加說明的地方民團。但是每個縣警察人數不得超過200人，配備手槍，而民團只能擁有現有的或從敵方奪取的武器。[[22]](#_22_Li_Ling_Qin____Ri_Ben_Jun_Du)最后，各種較正規的傀儡組織被賦予宣傳、鄉村行政、占領區的經濟開發和內部保安等項任務，但是華北方面軍從未信任過他們的中國合作者——戰時中國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這種特點。

表20 華北與華中的主要鐵路（1942年）



a.戰爭開始時同蒲與正太線是窄軌而不是標準軌。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標準軌改建。  
b.華北鐵路系統中的這條連接線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間建造的。  
資料來源：張嘉璈：《中國為鐵路發展而奮斗》，第86—87、203、205、322—325頁。

在正常時期，用輕武器裝備的警察和地方民團也許足以維持鐵路線外的秩序。但當時并不是正常時期。日本的入侵破壞了地方行政，而直到縣一級的大多數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職能人員都離開了他們的崗位。在縣級以下，鄉紳大量留在當地，沒有放棄他們的家園。像亂世常見的那樣，鄉紳們通過擴大或組建各種名目——民團、團練、聯莊會——的準軍事團體以及大刀會或紅槍會之類的秘密會社來尋求保護。普通農民經常與這樣的團體合作。匪幫也是混亂時期的一個特點，是一種對防護性社團的，以掠奪為目的的互補物，這些社團是為防范他們而設置的。[[23]](#_23_Pei_Yi_Li____Hua_Bei_De_Pan)然而現在，掠奪者與防護者一樣，都吞并潰軍的人和武器。當從鐵路沿線逃出來的散兵，為食宿而準備做幾乎任何事情時，槍械常被棄置不顧。

雖然這種自發的“動員”并不完全引起對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還是有抗日的人：學生和教師，特別是從大城市來的，還有一些國民黨組織和當地的共產黨人。學生和教師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鋒，在1935年12月發起了民族救亡運動。甚至在戰爭開始前，許多人已在暑假中離開北平回到家鄉，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尋找安全港。在戰爭開始的頭一年，僅河北一省中學以上在校學生和教師的人數就下降了70%，合計共5萬人。[[24]](#_24_Li_Ling_Qin____Ri_Ben_Jun_Du)這些人中一部分人輟學了，或者隨他們的大學流亡到國民黨控制的自由中國。但許多人留在了以后成為共產黨根據地的地區。

一個經常提到的事例是楊秀峰，他是一位法國留學生，1898年生于河北東部。他作為一個地下黨員，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學院任教時就已經是民族救亡運動的一位積極支持者。戰爭爆發時，楊和他的妻子以及幾位學生逃到冀南，與國民黨的某些組織和地方領袖聯合。但在一次爭吵后，楊與晉東南的共產黨分子發生接觸，他以前的一些學生在那里很活躍。楊的邀請使這些共產黨人直接滲透到冀南，以后楊在共產黨的事務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國民黨軍隊都撤退了。在華北的一些小部隊或者進行了獨立的抵抗，或者最終成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與共產黨聯合。出生于滿洲國的呂正操選擇了后一條道路。他是南撤時脫離國民黨第53軍的一位團長，他率領平漢鐵路以東的部下進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呂的部隊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損失后，他與當地的和新到的共產黨人發生接觸。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他建立了一個抗日根據地，而且和楊秀峰一樣，于1949年后在共產黨的等級制度中升任重要職位。

活躍在華北的共產黨人比人們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對共產黨人的鎮壓幾乎使這個黨失去活力，許多共產黨人和其他活動家被關在北平、濟南和太原的監獄中。1936年春，劉少奇掌管了中共華北局。日本的壓力、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和統一戰線政策導致了更多的寬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釋放了。發展黨員在加快。甚至在戰爭開始前，就有5000多名黨員在華北局管轄之下。[[25]](#_25_Bo_Yi_Bo____Liu_Shao_Qi_Tong)

幾個月后當戰爭爆發時，這些黨員大部分在自己的家鄉，準備組織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來自八路軍的同志。他們的行動，匪幫和散兵的搶劫，以及地方村社為提防這些掠奪者所做的努力——這些構成了“自發動員”的大部分，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動造成的。“有證據足以毋庸置疑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發形成的，而自發組織起來的力量也不是為了抗日。”[[26]](#_26_Kai_Si_Lin__Ha_Te_Fu_De____Y)支持這個結論的是，人們發現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區——城市和連接城市的鐵路沿線——幾乎找不到任何有組織的抗日活動。華北的絕大部分農民直到1939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當時華北方面軍將其綏靖活動擴大到鐵路地區以外。到這時，華北的主要根據地已經卓有成效地建立起來了。

## 根據地的建立

盡管領導權的斗爭、高層政策和意識形態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沒有根據地，中共將是一個沒有基礎的建筑物，這是真的。毛生動地說，這些根據地是“革命的屁股”，支持著它的全身。它們為黨和軍隊提供了庇護所，中共力量最終依賴的人力、物力和群眾支持的源泉也都來自根據地。

1.陜甘寧（陜西—甘肅—寧夏的簡稱，即總部所在地或“延安地區”）。從1935年10月長征結束毛到達時起，直到1947年3月其首府延安放棄給國民黨人時止，這里一直是中共的神經中樞。它作為中日戰爭前就存在的唯一的根據地，提供了有關中共的最豐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資料，也是外國觀察家最經常訪問的中共地區——從1936年埃德加·斯諾的訪問（從而誕生了《西行漫記》）到1944年末和1945年新聞記者、外國武官，和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迪克西使團”，見下《美國與中國共產黨人》一節）的訪問。

陜甘寧（第629頁見地圖10）是中國最貧瘠、長期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區之一。盡管它面積廣漠（大致相當于美國俄亥俄州），但只有大約140萬居民。大多數極端貧困，但估計地主和富農占人口的12%，卻擁有土地的46%。農業生產不穩定，生長期短，雨量稀少且難以預測，大暴雨會倏然而至，沖走莊稼，并把解凍的黃土坡沖刷成一條條溝壑。在1928年到1933年間，饑荒席卷了中國西北部，包括陜甘寧在內；千百萬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蕪。劇烈的地震會周期性地摧毀那些掘進黃土峭壁的窯洞。與嚴酷的自然環境一起，這一地區長期為動亂、騷動和暴力所困擾。它長期未能從19世紀70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動中完全恢復過來。土匪和軍閥是本地的特產。



地圖10 陜甘寧

基本資料：政區　　　人口和人員　　　　　 1937年15縣，到1941年擴大到29縣。  
  
　　　　　5分區　　 總人口：約1400000　　1941年266區，1549鄉  
  
　　　　　1941年武裝力量：八路軍18000；公安15000；自衛民兵224000；黨/政府：8000。  
  
資料來源：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02頁。基本資料取自謝爾登此書和安德魯·沃森：《毛澤東與邊區的政治經濟：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譯文》，第12—15頁。

有幾種情況使陜甘寧不同于其他的根據地。（1）作為中共總部所在地，該地區的絕大部分在實行較溫和的統戰土地政策前已經歷了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因此鄉紳的反抗比其他根據地弱。（2）陜甘寧是唯一遠離日本軍隊的根據地。雖然延安受到過幾次轟炸，但陜甘寧沒有其他根據地必須對待的安全和生存問題。（3）由于沒有中央政府和偽軍，陜甘寧軍事形勢比較簡單。（4）日本戰線后方的根據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種地區混合體，有鞏固區、半鞏固區和游擊區，而陜甘寧則幾乎全部是鞏固區。（5）由于陜甘寧地區人口稀少而且落后，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據地更為有效，也更明顯。八路軍的警備部隊也可以更自由地做出這方面的努力。（6）毛澤東和黨政軍中央機關在陜甘寧，意味著政策的執行可以得到最高層密切的和不斷的監督。

雖然陜甘寧邊區政府在1937年9月6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這以前很久就開始工作了。直到1937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蘇維埃那樣，許多職責下放給由黨監督的地方軍政委員會。1937年采取統一戰線政策后，沒收地主財產被終止了，而一個由更多人參與的“新民主”體制被建立起來——然而并不廢棄黨的最終控制。每一級都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從代表大會產生行政機構，處理政府的實際工作。雖然宣布了普選權，但黨可以不許某些人投票或當選：漢奸、罪犯、敵特、低能兒等等。國民黨黨員可以投票并為人代會工作，但只作為個人，不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政黨的代表。此外，每一級行政機構都必須由上一級的機構批準，并向其負責。共產黨員在各級人代會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機構中他們通常也占多數。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選舉程序很快就終止了，而邊區人代會直到1939年1月才召開，這意味著無論是名義上還是事實上，整個結構都是由黨中央任命的邊區政府指導。

從1937年直到戰爭結束后很久，邊區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擔任。林生于1886年，比毛澤東早出生7年，他曾經是孫逸仙的同盟會和國民黨的早期成員。在20年代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他同時為國共兩黨工作。1927年后，他去過莫斯科，然后回到江西蘇區，并參加了長征。到1938年，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除了這一行政機構外，還要求成立工人、婦女、青年等群眾團體，并逐漸開始在各級出現，但在這一時期這些團體似乎不很活躍。除民兵外，軍隊實際上是獨立于這些統戰結構之外的，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控制。在兩年左右的時間里，延安和整個陜甘寧出現了相當規模的官僚機構。同時，在1937年到1940年間，估計約有10萬人遷入，大多得到邊區當局的認可。[[27]](#_27_Bi_De__Shi_Lan____You_Ji_Jin)有些人是由外省遷來的農民，開墾荒地；有些是老兵、殘廢軍人和受贍養的人。但大約有一半來自中國東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學生、教師、新聞記者、作家、各類知識分子。1938年末，據說有2萬名學生等候批準進入陜甘寧。[[28]](#_28_Yue_Han__Yi_Si_Lei_Er_He_Tan)然而，盡管他們具有理想主義精神，延安和陜甘寧根據地的嚴酷生活也使許多人感到震驚。有些人不僅對如此嚴峻的物質條件難于適應，而且對政治環境也有同樣的問題。這里個人主義和批判性的獨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樣受到重視。

雖然無論用什么標準衡量，陜甘寧都是非常貧窮的，但邊區經濟在戰爭最初幾年還是相當穩定的。這是一種混合經濟，既有公營企業或壟斷企業，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監督和價格管理下運行的大量私人經濟。除了早先沒收的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種土地受到鼓勵。允許租佃與雇用勞力，規定有最高地租和最低工資，但常不能執行。這一時期農民的經濟負擔相當輕。大部分雜稅已經廢除，甚至土地稅也已普遍豁免，只向小部分農村人口征收。這一點之所以成為可能，部分是因為有來自捐獻與沒收的資源，部分是因為有重要的國民黨的補助，部分是因為與陜甘寧以外地區有廣泛的貿易。[[29]](#_29_Zhe_Zhong_Bu_Zhu_De_Zhong_Ya)所有這些條件到1940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毛澤東而言，從1936年中期到1939年中期是一段不尋常的安全期，從日復一日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當時他有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和思考。在毛的謀士陳伯達協助下，他在這幾年中寫下了許多最富有洞察力的重要文章。[[30]](#_30_Lei_Meng_De__F_Huai_Li____Ma)正是從這時起，人們開始越來越經常地聽到“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見施拉姆的著作第14章，第844頁以下各頁。）

2.山西。山西恰在陜甘寧東面的黃河對岸；它的西南角在黃河東大彎處伸向西安和陜西省的門戶潼關。到日本戰線后方去的中共部隊必須通過山西，延安和各華北根據地之間的交通往來也必須經過山西。除山東外，所有這些根據地的總部都設在山西東部山區。

中共的統一戰線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樣有效，而且在戰爭爆發前這種努力就已頗有成效。首先，這意味著要與該省的軍閥主席閻錫山打交道，而中共把他當作僅次于蔣介石的統戰目標。就本能和氣質而言，閻顯然是反共的。但他求生本能更強，而這使他能如愿地維持對山西的統治達20年以上。閻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領地，不論其政治色彩如何；到1937年初他害怕蔣介石和日本人，超過了共產黨。[[31]](#_31_Tang_Na_De__G_Ji_Lin____Jun)1936年春閻要求增援以抵抗共產黨對晉西南的入侵，蔣和中央政府開始進入山西，而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引起的部隊調動期間這一過程仍在繼續。從1935年末華北自治運動開始時（甚至更早）起，日本對山西的威脅已很明顯，而1936年11月恰位于山西北邊的綏遠發生了戰斗，這清楚地表明關東軍的意向是包圍山西并將它納入其政治和經濟圈。日本特務也在省內密謀。山西的資源，尤其是井陘煤礦，對日本擴張主義者有極大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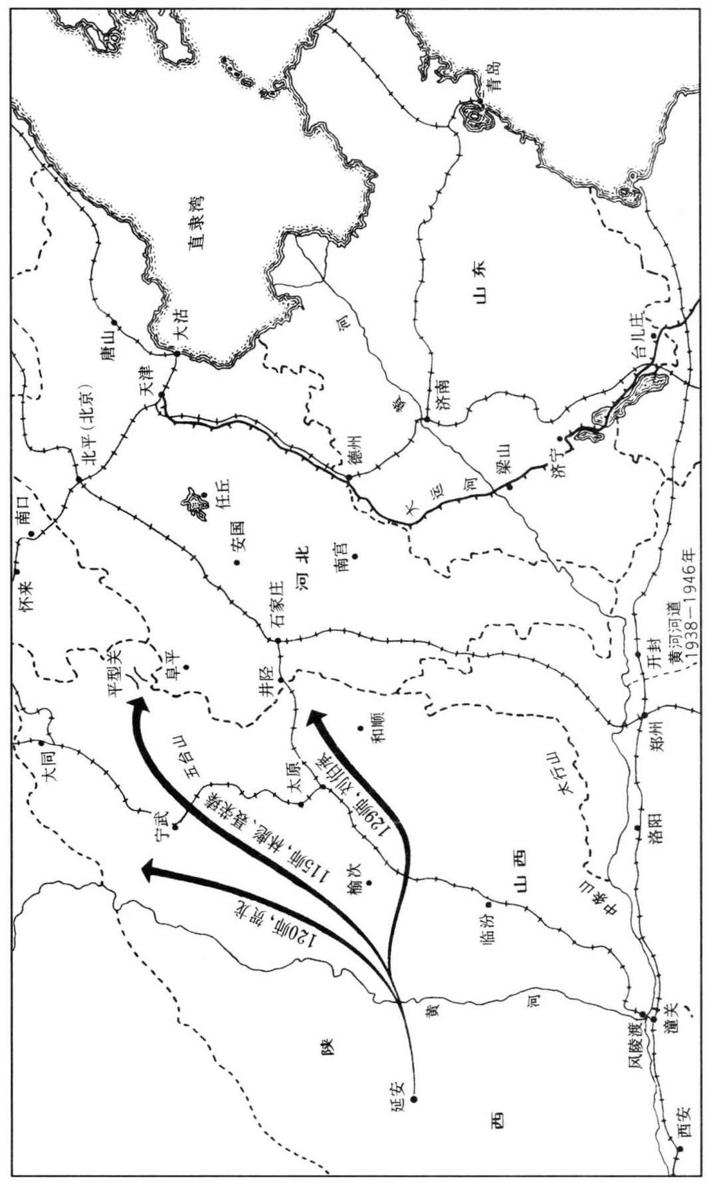
閻錫山敏銳地意識到他的山西家鄉并不太平。他的軍隊不很有效，而他的統治只是被容忍著，不是得到積極支持。1935年底，他要求成立“主張公道團”，這是為節制過分濫用權力的鄉紳以爭取民眾支持，并從這些鄉紳榨取更多錢財而設的一個群眾團體。到1936年夏末，閻準備更主動地與“左派”合作，甚至同共產黨人合作。閻的態度轉變符合中共的統一戰線路線，這條路線要求在抗日民族主義與對黨的活動的某種容忍的雙重基礎上尋求朋友與同盟者，或至少是順從的支持者。而中共則準備嚴格保證不讓他們的活動越出可能會疏遠潛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在這種氣氛下，公道團的活動分子說服了閻錫山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會因此在1936年9月18日沈陽事變五周年之際成立，并保證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大約在此時，閻錫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講話，“同共產黨搞統一戰線，這中間有風險。但是，不跟共產黨合作，又有什么辦法呢？現在我只有用共產黨的辦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蔣介石。我是用共產黨的辦法削弱共產黨”。[[32]](#_32_Bo_Yi_Bo____Liu_Shao_Qi_Tong)

許多個別的共產黨人[[33]](#_33___Ren_Min_Ri_Bao_____1980Nia)從一開始就活躍在犧盟會中，與愛國的教師和學生、自由主義者以及其他各種人一道工作。新近從北平和太原監獄釋放的共產黨人，如薄一波，以堅強的意志投入工作，這種意志可以從以后的一份機密的國民黨情報中看出，它不無夸張地承認：

他們的“忠誠”和“努力工作”遠遠超過常人。而且，他們常常放棄或不愿擔任有權力的職務，但非常愿意工作而不顧惜自己（特別謀求下層工作，因為這是他們政策的核心）。他們的忠誠就像一條狗；他們的馴服又像一頭羊。任何主人有這樣的奴隸都會歡欣之至。[[34]](#_34_Lai_Man__Fan_Si_Lai_Ke____Di)

犧盟會又制定出大量在軍隊、學校、政府官員中以及農村里的培訓與宣傳計劃，并在進行這些計劃時，傳播統一戰線的信息和補充黨的后備力量。

因此，當戰爭爆發時，八路軍三個主力師的指揮部通過山西并未遇到障礙。中共華北局總部幾乎立刻從北平遷到山西首府太原，劉少奇也同時到達以監督中共在該省的活動。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壓力增大，閻已經允許犧盟會建立軍事組織，并撥給他們一批輕型的步兵裝備。為區別于原有的省屬正規部隊“舊軍”，這支部隊被稱為“新軍”，它由4個“決死縱隊”組成，每個縱隊都由一名同時擔任政治教官的黨員指揮。不久，山西105個縣中大約有70個縣都由犧盟會的人擔任縣長，而省內7個較大行政區中有5個據共產黨人所說是在“我們手中”。所有這些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開端，但就到此為止。如薄一波以后告訴杰克·貝爾登的那樣，新軍的長處是與人民的緊密聯系；其弱點是缺乏統一性，缺乏中央領導和軍事經驗。這是一支由學生、教授和農民組成的軍隊，學生不懂如何打槍，教授不懂戰術，而農民既不懂戰術又不懂政治。這支軍隊由于缺乏指揮首腦與技術，處于分裂與被消滅的危險之中。[[35]](#_35_Jie_Ke__Bei_Er_Deng____Zhong)



地圖11 八路軍的部署，1937 年7—12 月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

但是由林彪、賀龍和劉伯承分別指揮的八路軍第115、120和129師所提供的幫助正在途中。由八路軍與分散在敵后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塊聯系，華北根據地于是在山西山區誕生了。只要有可能，共產黨人便進入鄰省：河北、河南、綏遠。第115師和129師的小分隊被派得更遠，進入山東。

3.建立根據地。八路軍三個師的行動得到蔣介石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兩人的批準。面對日本在山西的攻勢，這些部隊，尤其是第115師，與山西正規部隊配合，但保持組織上的獨立性。由于這種配合，迎來了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首次勝利，這就是1937年9月25日發生在晉東北的平型關大捷。在當地激烈而混亂的戰斗中，大部分任務由山西軍隊承擔，林彪則對精銳的板垣第5師團后方的一支補給輜重車隊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擊。日本人在一條狹窄的山溝里不意被分割成小股。然而，共產黨人只繳獲到大約100條槍，而沒有抓到俘虜；日本士兵頑抗到底，幸存者破壞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殺。[[36]](#_36_Peng_De_Huai____Guan_Yu_Hua)

平型關的經驗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觀點的一些人相信，與“友軍”配合對優勢的敵人作常規戰是不明智的。林彪在這場爭論中或許站在毛的一邊，他在戰斗報告中含蓄地確認以下結論：

（1）由友軍協同作戰實際上非常糟。他們決定進攻計劃，但他們自己并不能貫徹……（7）敵兵有很強的戰斗力。我們在北伐和蘇維埃時期從未遇到過這樣的強敵。他們的步兵在戰斗環境中能發揮個人主動性，他們即使受傷，也拒絕放下武器……（12）我們部隊的軍事技能和訓練仍有大加改進的必要。在過去半年中，我們的部隊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機會，紀律、士氣和正規化都大有進步；但在戰斗訓練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37]](#_37_Yin_Zi_Pian_Gang_Tie_Zai)

當日本對山西的入侵還在進行之際，第115師的幾支部隊（約2000人），在聶榮臻率領下，占據了山西東北部以及相鄰的河北西部山區的陣地（林彪在1938年1月負重傷并回到延安，然后赴蘇聯養傷）。聶榮臻在五臺/阜平地區的活動標志著以后成為晉察冀邊區的開端。

早在1937年11月，晉察冀根據地的大致輪廓開始形成。當地的“動員委員會”和其他早期組織活躍在晉東北和冀西的近30個縣、冀中（平漢鐵路以東）的20個縣和察南的4個縣。但抵抗組織還沒有完全控制這些縣，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并不互相鄰接。他們之間還很少合作。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冀西山區一個縣城阜平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根據地正式成立。來自39個縣的148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代表28個“組織”：從動員委員會、犧盟會和各種軍事組織到黃教喇嘛。這是一次非常明確的統戰會議，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導。會議通過了一系列贊成抗日、軍事動員、政治組織和溫和的經濟改革的決議。會議也批準了晉察冀根據地的組織結構；它指導根據地今后5年的工作，因為下一次根據地全體代表大會直到1943年1月才召開。阜平會議的代表批準成立一個9人行政委員會，由犧盟會的活動分子宋劭文領導，他同時還是五臺縣縣長。[[38]](#_38_Song_Shao_Wen_Shi_Bei_Jing_D)聶榮臻是軍區的司令員，軍區與民政體制是分開的，但雙方在所有層次上都互相影響。這一機構全面管轄11個專區，那里的抵抗運動的組織者最為活躍。1938年1月22日，蔣介石和閻錫山勉強批準了晉察冀邊區的成立。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敵后根據地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認的唯一的一個。與晉察冀的發展同時，賀龍的第120師活躍于晉西北，這是一個幾乎與陜甘寧同樣貧窮落后的地區，后來成為晉綏根據地。晉綏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條連接延安地區與更東邊的根據地的戰略通道，也是部分地護衛陜甘寧東北部的一面盾牌。

劉伯承把他的第129師推進到晉東南的太行山區，接近河北和河南邊界。這一地區，加上魯西部分地區，成為晉冀魯豫根據地。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它實際上是松散地結合的兩個根據地，一在平漢鐵路以西，一在路東。以后發展的是山東半島根據地，離八路軍主力更遠，那里共產黨人、日本人、偽軍、地方武裝以及與中央政府有聯系的部隊之間的斗爭非常復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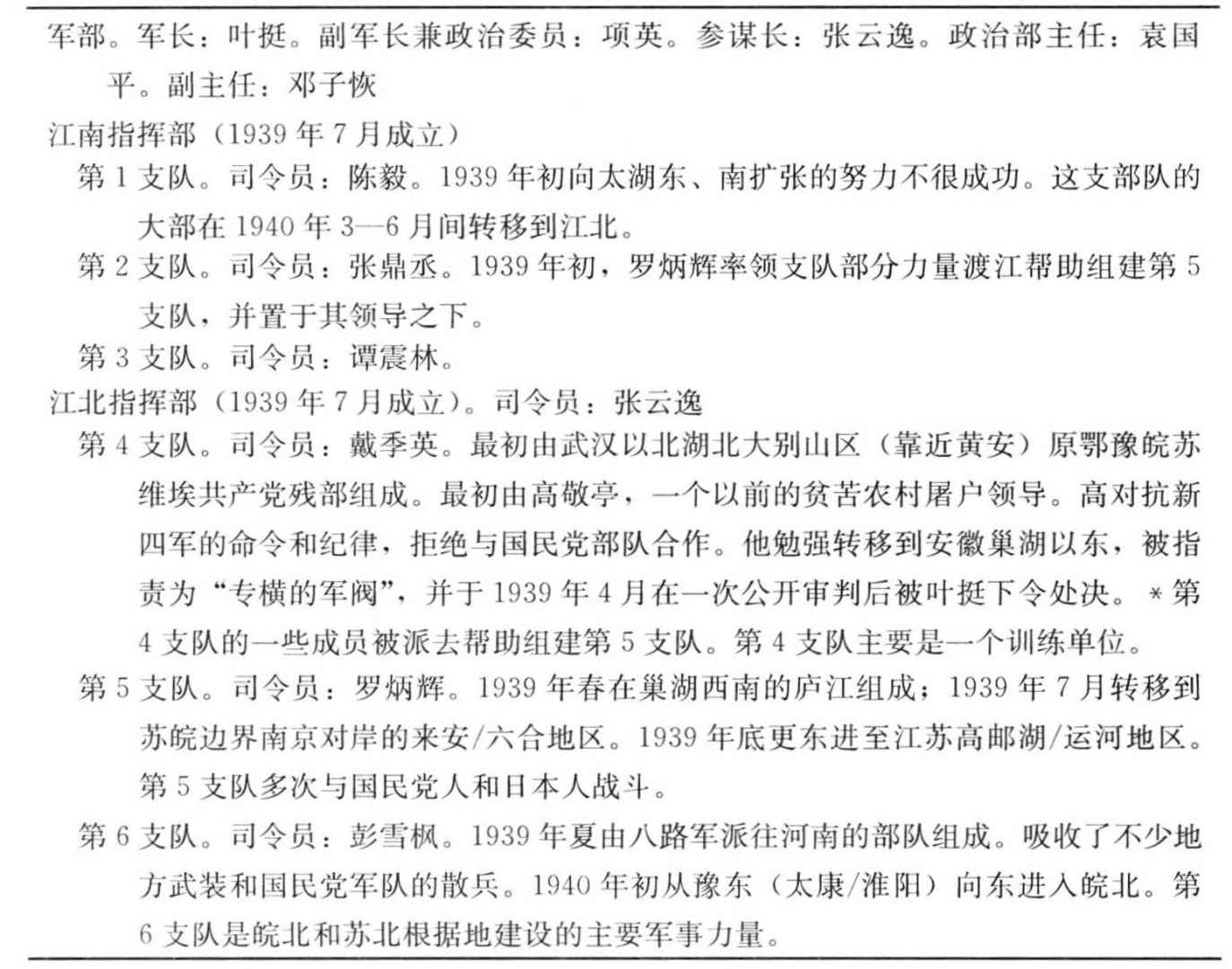
在華中，某些與華北不同的條件使得中共的勢力發展緩慢。在受日本人攻擊最厲害的地區，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滬寧干線，地方行政往往崩潰，秩序混亂，而各種類型的武裝團伙迅速涌現，恰與北方一樣。也是在這里，日本人起初對他們經過的地區不注意占領。但在別處，華中較少受到日本入侵的破壞。地方和省級行政機構繼續行使職能，經常與國民黨控制的自由中國接觸。長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蘇部分地區沒有直接受到日本的進攻，國民黨軍隊沒有撤走，留了下來。在長江南岸的江南地區，雖然起初大多數國民黨部隊撤走了，但有些部隊不久又被調來，更多部隊接踵而至。這些部隊中很多是中央軍或與蔣介石有密切聯系的部隊，不同于八路軍地區內的地方雜牌軍。畢竟這一地區曾經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地區，國民黨人對外來勢力的侵入十分敏感，同時他們也處于抵擋這樣的入侵的較有利的地位。

雖然新四軍規模較小，在幾年里戰斗力也不如八路軍，但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不久就要求他們在全區，尤其是在長江以北，從事進取性的根據地建設。國民黨正式劃給新四軍的活動地區見（第642頁圖12）。中央政府每月補助約13萬元以彌補經常費用。在長江北岸，他們的戰場是國民黨第5戰區的一部分，由令人敬畏的桂系領袖李宗仁指揮；長江以南是第3戰區，由蔣介石的心腹同僚顧祝同將軍指揮。直到1938年末六中全會時，新四軍的活動很少受到延安的直接控制。雖然項英的軍部中某些高級干部來自延安（葉挺并無多大權力），但新四軍的政治指揮系統卻是經過當時以王明為首的長江局。起初幾乎全部軍事活動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軍各小分隊，招募或吸收雜牌的武裝團伙來擴大自己，并從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動。有時他們邋遢的外貌使當地農民把他們與打家劫舍的匪幫混同起來；有一兩次他們被當作前來恢復秩序的日本軍隊而受到錯誤的歡迎。當地的老百姓，無論是普通農民還是地主，對他們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決于他們消滅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39]](#_39_Chen_Yong_Fa____Ge_Ming_De_X)在戰爭的頭一年左右，共產黨在華中各地并未試圖攫取政權和建立北方正在開始形成的那種根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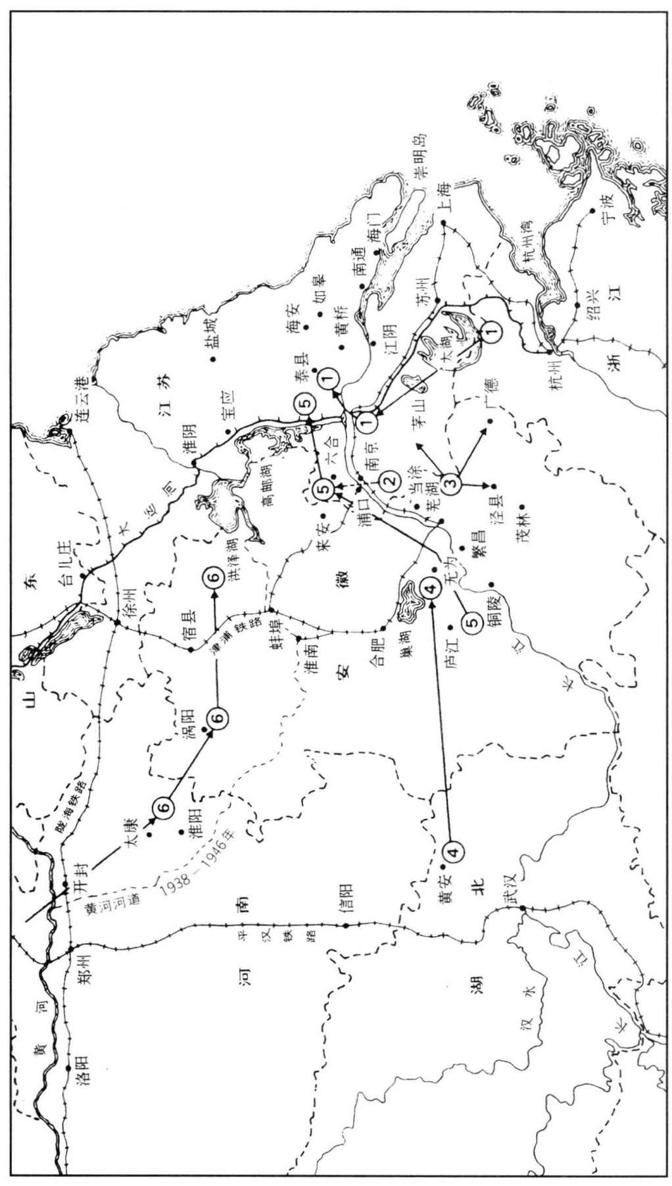
1938年末六中全會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1939年，新四軍大大地擴充了，江北的部隊日顯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江南部隊為代價的。這一軍事擴張也是以項英為一方和以黨中央為另一方（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尤其是劉少奇）之間日漸緊張的關系的一個部分。這種擴張和強調建立根據地，當然使華中的共產黨人與中央、省和地方各級的國民黨當局發生日益嚴重的沖突。

在六中全會上，劉少奇成為華中黨的最高領導人。這既反映了王明權力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華中獲得更嚴密的控制并在華中推行華北根據地建設政策的決心。[[40]](#_40_Zhong_Yuan_Ju_Zong_Bu_Zui_Ch)表21和圖12表示新四軍在戰爭頭兩年的部署，就總體而言，它向東北運動，進一步深人敵后，并遠離國民黨后方。加入新四軍的其他軍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長征老戰士李先念領導的豫鄂挺進縱隊，他們占據了原第4支隊占領地區附近的陣地，位于武漢以北，橫跨平漢鐵路。直到1941年，在新四軍事件后的改組中，李先念的縱隊才正式編入新四軍。更往東去，在長江以南，是兩支半游擊的地方武裝，即管文蔚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和江南挺進縱隊。管是丹陽出生的地方共產黨領導人，他在1937年前一直與黨失去聯系。他幫助開辟了一條通道，經過這條通道新四軍部隊可以穿越揚中島到達江北。這兩支部隊和第一支隊均與從屬于重慶的忠義救國軍發生爭奪。

表21 新四軍（1939年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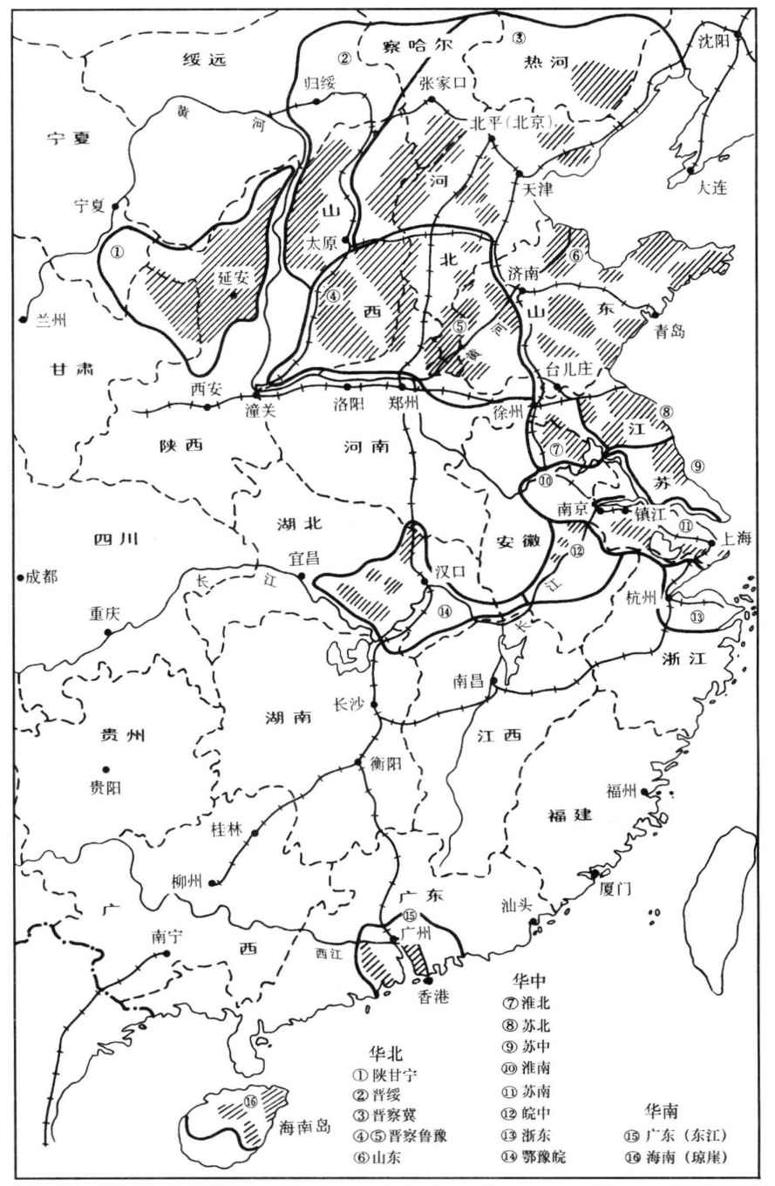


\*近年高敬亭已恢復名譽；據說1939年他是被誣陷而錯誤處決的。——譯者  
資料來源：陳永發前引書，第2章；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第124—132頁。



地圖12 1940 年晚期新四軍的部署與調動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



地圖13 所有宣稱的共產黨根據地（1944年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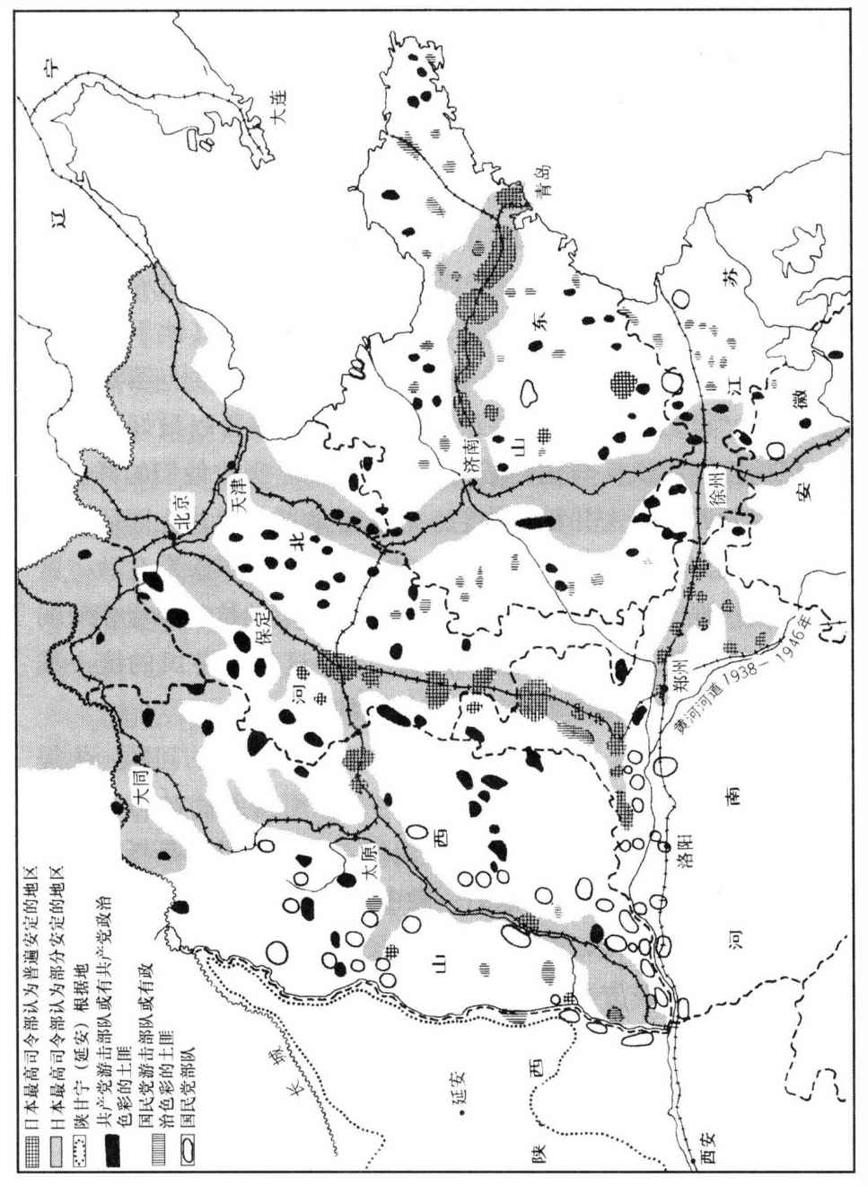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范斯萊克編：《中國共產黨運動》，第Ⅻ—ⅩⅢ頁。此圖根據中國共產黨1944年8月的資料編制。

圖13表示共產黨根據地的大致方位，但同中共戰爭末期向公眾提供的大多數簡圖一樣，這張地圖顯示出共產黨控制下的廣大鄰近地區。這很容易使人誤解。這些根據地，從北方的陜甘寧和晉察冀到離廣州不遠的兩個用陰影表示的不穩定的游擊區，處于極不相同的發展和鞏固階段。一種更實際但仍為簡化的圖，可以表示出三類地區，它們都是變動的。（1）中共已經創立了相當鞏固的行政機構的地區，可以公開行使職權并實行改革，老實說，這些改革還不是革命，然而卻有比較深遠的影響，并深深扎根于當地社會，超出了任何中國政府以前曾達到的程度。這些核心地區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圖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據地中的安全島。（2）比較不穩定的地區，在中共資料中常稱為“游擊區”，而在日本資料中稱為“中間地帶”。這里可能有多種力量：共產黨人、國民黨部隊、地方民團、土匪、偽軍。在這些游擊區，中共根據眼前的共同利益尋求盟友。他們只做初步的組織工作，而且只試圖進行有節制的改革。（3）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區。與中共核心地區相對應的，是日本人所占領的城市、大集鎮和主要的交通線，邊上有一些拉鋸的邊緣地帶，在這些地帶日軍和偽軍占上風。

特別在華北，鐵路線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據地。晉察冀位于同蒲路以東和正太路以北。這一根據地的核心地區被平漢、平綏和北寧鐵路隔開。這種模式在其他根據地也大同小異。顯示1938年10月華北部分地區極端混亂的圖14，生動地展現了戰爭頭幾年真實的復雜狀況。

### 根據地建設過程

縣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與對統一戰線內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認結合在一起，為黨的部隊創造了許多機會。八路軍成員和中共的文職干部自稱是合法的當局和抗日的領導者。軍事和政治控制齊頭并進，但軍事優先。八路軍的部隊每到達一處，最初的任務是與地方黨或“進步勢力”取得聯系，然后與形形色色的地方勢力和地方社區接觸，從他們中間找到自己的地位。與當地積極分子接觸可以得到人力、情報，并接近群眾。如薄一波所說，當地人缺乏領導、組織、紀律和經驗，這些都可由外來者提供，但如果沒有當地人，外來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許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國民黨部隊從來沒有完全掌握住這一套聯系方法。



地圖14 軍事形勢，華北，1938 年10 月

資料來源：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地圖頁。

在晉冀交界山區，宋劭文領導的犧盟會就是聶榮臻部隊最先取得聯系的組織之一。越過平漢鐵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們與呂正操接近。劉少奇估計1937年戰爭開始后大約有三萬余名成員的200個武裝團伙一下子冒了出來。[[41]](#_41_Liu_Shao_Qi____Jian_Chi_Hua)按照劉的說法，他們很容易被爭取過來，只要八路軍善待他們，幫助維持秩序，不要求他們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會他們的某些半土匪的習氣。地位牢固的土匪團伙和地方防護性幫會造成更困難的問題。成功地與他們打交道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隨著根據地的擴大或被迫轉移，這一過程可能必須重復。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脅，也是八路軍組織的民兵的兵源。盡管他們常常“魚肉”鄉民，不得人心，但許多游民仍被招募。彭真回憶說，“絕大部分則積極參加了抗日運動。當時一般群眾尚在觀望，而大部分游民則因無身家之累，對現社會又少留戀，于是首先奮起與少數積極革命分子一同作了開路先鋒”。[[42]](#_42_Peng_Zhen____Zhong_Gong_Jin)但是彭和黨的其他干部也知道，他們主要是為了填肚子，哪邊給的更多，他們就會倒向哪邊。他們的口頭禪是“有奶便是娘”。劉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對待有組織的土匪團伙：與他們結盟并爭取他們，吸收他們的群眾并孤立他們的首領，或攻擊并粉碎他們。在核心地區，要讓土匪團伙就范，否則就給他們機會離開。但是，如劉少奇所說，“如果在敵占區活動的土匪團伙強到足以破壞敵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對弱小，那么我們就應該勸說并團結這些土匪”。[[43]](#_43_Liu_Shao_Qi____Jian_Chi_Hua)這種與游民的統一戰線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減輕了根據地的混亂。

根據劉少奇的說法，地方幫會是一個比土匪更困難的問題，他提到這些幫會在中國的悠久歷史以及因戰時條件而得到的動力。紅槍會、天門會和聯莊會“都是純粹的自衛組織，共同的目的是抵制過高的賦稅和軍隊或土匪的騷擾”。他們一般由鄉紳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眾支持，因為他們對農民的“落后和狹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幫會在其他形式的影響外增加了迷信。他們準備與任何外來者作戰，包括抗日游擊隊。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隊駐扎在他們附近，盡管并不構成威脅，他們為了獲得武器也常加以襲擊。幫會沒有永久性的軍事組織，但只要戰斗在當地發生，他們就能召集“很大兵力”做出反應。

劉少奇總結了幾種最有效的方法。（1）不要輕率行動。（2）嚴格遵守紀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觸犯他們，但要非常警覺。（3）小心避免觸犯他們的宗教信仰和他們的領袖；要尊重他們。（4）當他們受到日本人或偽軍騷擾時，幫助他們趕跑敵人。（5）以模范行動贏得他們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種方式援助他們。（6）最重要的是對他們進行耐心的教育、宣傳和勸說，以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引導他們投身抗日斗爭，并自愿向游擊武裝提供物資。（7）努力分化為日本人服務的幫會。（8）不要幫助幫會成長，尤其在根據地或游擊區。（9）在敵占區，幫助推動幫會從自衛斗爭向抗日運動的方向發展。最后，劉指出迷信有時也能轉為好事。有些秘密幫會相信，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準是他們的保護神和明朝締造者朱元璋的后代。這些秘密幫會和當地八路軍之間的關系就特別好。簡言之，劉說，“在華北的許多地區，鄉村里的抗日統一戰線主要依賴于我們與幫會之間的關系和工作處理得如何”。[[44]](#_44_Liu_Shao_Qi____Jian_Chi_Hua)

因此，共產黨勢力進入敵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義、社會經濟計劃或意識形態。事實上，對擁有兵權的人來說，以不同的意識形態或根本沒有意識形態而以中國鄉村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對孫殿英的描述說得很清楚：

孫的一位副官對我說，“我們要有一支軍隊的原因是每個人都要吃飯”，意思是說，他們打不打仗無關緊要。從這場戰爭開始到結束，孫在共產黨人與中央政府之間周旋，甚至有一段時間還投向日本人……當戰爭爆發時，他招集舊部與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隊為新五軍，總部設在河南林縣……由于與秘密幫會有聯絡，他到處都有關系，因此經商辦事都不在話下。雖然林縣是個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來自上海的商品也能買來享用。[[45]](#_45_Qu_Zhi_Sheng____Kang_Zhan_Ji)

中共到處都把軍事和政治控制視為優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條件。鞏固區、半鞏固區與游擊區之間的差別標志著這種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勢可以描繪為“開放的”，這就是說社會中的個人與團體可以有多種選擇，中共無法阻止他們嘗試。在這種環境下，統一戰線認識到黨相對軟弱，于是主要依靠勸說、妥協、滲透和教育。

另一極端是“封閉的”形勢，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選擇，并使選擇的動機和代價向產生所要求的行為方向發展。對那些持反對態度的人，必要時黨可能施加強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當這種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時，某種政治革命就發生了，盡管在社會和經濟結構上還沒有任何變化。黨及其追隨者正從傳統的農村權力占有者手中奪取權力，但控制權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不平坦的過程，受地形、當地社會及存在競爭或敵對勢力的影響。即使在最成功的晉察冀根據地，進展也是困難的。群眾并不會自發地團結到共產黨一邊。彭真寫道：“在建立根據地時，中農、貧農和其他勞苦群眾的政治和組織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顯示出來……在這些農民確實經過一些斗爭（開始主要是自上而下發動的），逐漸真正覺悟起來之后，才膽敢反抗了。” 1941年末，他終于可以說：“關于這一地區的階級關系，我們在軍事上與政治上占有統治地位；基本群眾已經站過來了，并占了優勢。但在經濟上，地主資產階級仍然明顯地占有優勢。”[[46]](#_46_Peng_Zhen____Zhong_Gong_Jin)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多次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某些地區是否存在某種條件，使它們比其他地區更易接受共產黨人的滲透、組織和控制。尤其是，貧窮、剝削和社會混亂的環境是否比更富裕、社會更協調的地區更能為共產黨的活動創造有利條件？答案似乎是，“共產黨人在中國取得成功或權力并沒有一個單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區與任何時候，共產黨勢力的擴張，和其他社會現象相比，似乎更與共產黨在附近地區的[長期]存在有關”。[[47]](#_47_Xiao_Luo_Yi__Huo_Fu_Hai_Yin)事實上毛、劉和其他領導人從不接受下列觀點，即特定的社會與經濟條件使某些地區適合建立根據地，而其他地區則否。反之，毛相信，原則上根據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只要黨有機會在那里堅持活動。例如，1938年5月，他堅持根據地不僅可以在交通比較困難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48]](#_48_Mao_Ze_Dong____Kang_Ri_You_J)當這些領導人提到地方條件（租佃、高利貸等）時，他們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區靈活運用的具體例證，并不是表明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據地。雖然租佃率在華北許多地區相當低——因此減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產黨領導人爭辯說，還有其他的問題、其他的剝削形式可以代替。這就需要當地的干部分析他們所在地區的社會與經濟條件，根據一般的指示精神去著手工作。一個特定地區的條件是否使農民受更多剝削，生活更為悲慘，或者生活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這樣的問題并不使共產黨領導人或地方干部感興趣。他們深信，鄉村中每個地方都不乏悲慘與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變革。

但是，共產黨并沒有能在各處都成功地創立根據地，也不經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據地。最成功的根據地確實位于較為貧窮的地區：山區、沼澤地以及其他邊遠地區——總之，在傳統的匪區，像傳奇小說《水滸傳》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們所占的那些地區。原因也相同。這些周邊地區遠離居民點和國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機會可以不受干擾地工作。[[49]](#_49_Shi_Jian_Ya_Shuo_Zhong_Guo_Y)簡言之，要一個特定根據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說軍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會和經濟結構更重要。

共產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軍事—政治控制與人民支持的結合，兩者表現在互相連鎖的直到村一級的組織結構中（至少在鞏固的根據地是這樣）。首先是控制，但共產黨人在控制上的做法與他們的對手不一樣。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革隨控制的擴大和加深分階段進行，交互作用。從觀念上講，在黨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應進行改革。反之，每一次變革都應進一步加強黨和“基本群眾”的控制。因此，只要處理得當，每一次變革都既加強了黨的控制也加強了群眾的支持，并為下次變革鋪平道路。

當要求進行一項特定的改革（一次選舉、一次生產運動、一次斗爭會）時，人們通常知道這是指鞏固區，或許還有半鞏固區，但不涉及太“開放”的游擊區。而且，即便是在鞏固的根據地，許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執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準備的“示范區”推行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預備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當眾羞辱一個特別臭名昭著的地主并剝奪他的部分或全部財產的場面，對別處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選出來的地主則被“勸說”進行合作，尤其是保證他們的財產不會被沒收，而且他們可以繼續收取地租與利息（雖然要減租減息）。更為重要的是，讓農民大膽確定自己的階級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義、消極屈從以及社會調和——總之，要行動。每一次行動都使下一次行動更容易，并且斷絕了退路。一個佃戶由于害怕報復或者為了保持社會融洽，可能一時偷偷地付給地主原先未減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爭會上大聲訓斥了這個地主之后，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

有些農民生平第一次開始思考自身——經常是遲疑地或勉強地——為自己本身的權利做政治和社會的行動者，而不是受他人驅使的被動的行為對象。黨的目標是一種受指導的但也是自愿的參與，黨稱之為“民主”。阿歷克斯·德·托克威爾闡明了一個普遍的原則，他這樣寫道：“冤情只要看上去還無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著；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們的頭腦中出現，它便顯得無法忍受。”[[50]](#_50_Yin_Zi_A_Se__L_Si_Ting_Ku_Mu)彭真描述了那些過去謀劃交付全部地租的佃戶現在怎樣開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絕繳納任何地租或要求賠償。有的農民在街上故意沖撞地主。“總之，一切都翻過來了……這種情形在我們接到中央‘七七’三周年指示，頒布了‘雙十綱領’以后（1940年中期）便開始糾正，使雙方的斗爭約束在一定的范圍內”。[[51]](#_51_Peng_Zhen____Zhong_Gong_Jin)

在控制權正在建立時；有三種關系會發生爭論，可以著手組織和動員。（1）地主與佃戶的關系，集中在地租上；（2）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集中在利息上；（3）政府與被統治者的關系，集中在賦稅上。[[52]](#_52_Chen_Yong_Fa____Ge_Ming_De_X)這些爭論被用來加劇階級斗爭，反對“封建分子”。為了更深的滲透和更廣的組織，共產黨采取一步一步的措施打開當地社會之門，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組織起來的人們必須看到他們的實際利益，而不擔過分的風險，不然他們就不會響應。必須找到有立竿見影或近期收益的具體措施，并用農民習慣的、生動的鄉土語言表達出來，而把階級斗爭的話留待以后再說。

帶給當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將取決于環境，并必須與進入這一地區的中共軍政人員的后勤需求相協調。彭德懷這樣描述：

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給養自籌。建設了根據地，有了政權區，可征收救國公糧；沒有建設根據地政權以前，即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財物，不靠國民黨發餉、發給養。[[53]](#_53___Peng_De_Huai_Zi_Shu_____Di)

雖然減租減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對較先進根據地的鞏固地區已樹立控制權前，沒有一項能系統地實行。減租被說成是實現孫逸仙的二五減租的諾言（從平均50%的地租—收獲比降至37.5%），作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國民黨思想體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視的成分。這使包括地主在內的國民黨支持者很難對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評。從外界看來，中共的地租政策相當溫和。然而土地關系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使黨能隨當地形勢和干部情緒的需要而行動，或克制或嚴厲。地主的阻撓被指責為破壞抗戰事業以及實際上與敵人勾結。[[54]](#_54_Di_Zhu_Ji_Ji_Ji_Di_Kang_You)這可能導致嚴厲的懲罰，甚至沒收財產。總之，地主的選擇受到限制：“地主在鄉村的土地不可能帶進城市。”彭真繼續寫道：

總之，晉察冀邊區地主是在基本群眾已經起來，民主政治已經確立，封建專政已被打破之后，才開明起來的。事實證明，不經過農民對地主的必要的斗爭，地主階級的開明是不可能的，地主與農民關系的調整也是不可能的。[[55]](#_55_Peng_Zhen____Zhong_Gong_Jin)

減息是難以貫徹的，如果這涉及取消本金或陳債的自然增長的利息，那么減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這些損失加上新貸款的低利率常使潛在的借主把他們的錢束之高閣。農村信貸的收縮引起了苦難，因為許多貧苦農民需要貸款活命，特別在華北和華中北部的春荒季節，那時頭年的存谷已所剩無幾，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還有幾個星期要等。而且，并非所有的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貧農和中農或許有點現金，但由于數額太小，不足以投資于土地或商業，他們把這點錢借出去以謀取額外收入。缺乏勞力的家庭——寡婦或無兒女的夫婦——可能賣掉他們無力耕種的土地，換成錢出借。因此，只有根據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財力，使得按規定利率的信用貸款可以借到時，減息才能成功。

稅收也只能緩慢地改變。不像陜甘寧邊區，敵后根據地得不到外來的補助，如彭德懷指出的那樣，必須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戰爭的頭兩年，即使晉察冀也只能在稅收制度上進行有節制的結構調整，方法是廢除許多雜稅和附加稅，但不是全部——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它們在20世紀頭幾十年間已經激增，多于和超過基本土地稅——并對與敵占區的貿易征收關稅。其他改革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稅，方法是登記“黑田”（以前未征稅的土地，因為它們不在土地冊上），并制止貪污，使征到的稅款真正進入國庫。剩下的赤字由內部公債和其他特別措施彌補。

在1939年，行政控制已經進展到足以允許較為正規化的稅收制度，即“合理負擔”計劃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核心地區實行。在這一計劃下，每個縣分配個稅收定額，這個定額根據估計的總資產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鄉和村。村的定額按照過高累進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間分攤。此外，對非常富裕的家庭另行估產。[[56]](#_56_Lin_Mai_Ke____Jin_Cha_Ji_Bia)減租減息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和富農把他們的稅款轉嫁給佃戶和債戶，使稅收制度更為有效。顯然，除非這一制度的設計者們對那些將在縣和村級貫徹該制度的人滿懷信心，這項制度是不能執行的。彭真的報告提到，進入1939年后很久，晉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換村長，建立村代表會議；并創立統一的行政體系——即使在那時，也只在鞏固區才能做到。[[57]](#_57_Peng_Zhen____Zhong_Gong_Jin)

稍后，合理負擔稅收制度，作為第二種主要改革，以類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據地運用，這種改革是把財政計算的主要單位從貨幣轉為谷物。在晉察冀，政府的主要賬目是以小米或其他等同物為單位。于是薪金和稅額與幣值波動隔斷。干部和其他職能人員享受供給制，零用錢極為菲薄。對軍隊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發給糧票，他們可以在根據地轄區內的任何地方用糧票換到糧食。各村交納稅收定額的時候，既可以交糧食，也可以交糧票，或者兩者兼有。由于各村要負責將稅糧運到糧站，他們更喜歡方便的糧票。[[58]](#_58_Lin_Mai_Ke____Jin_Cha_Ji_Bia)

如果共產黨干部與村長認為合適，他們可以采取沒收、征稅、捐獻和合理負擔賦稅的辦法使當地居民中特定的個人或階層的經濟地位遭受明顯變化。這對佃戶、貧農和中農有利，而對富農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對地主不利。一位學者聲稱，“中共的減租減稅方案是革命性的。它相當于分期沒收”。[[59]](#_59_Pian_Gang_Tie_Zai____Zhong_G)

雖然這種估價可能對晉察冀核心地區的某些村莊是正確的，但對晉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據地就言過其實了。中共自己也承認，它缺乏在整個根據地執行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在某些地區這種激進的變革是他們力所能及的，共產黨人通常還是滿足于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們的控制并有助于動員農民支持就行。一則，地主和富農是農村最有活力，在經濟上最有成效的經營者，即使不是由于他們自己的直接勞動，那么也是由于他們擁有資本、役畜、農具、技能和熟悉市場情況。況且，中共用來作為便捷手段的階級劃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為復雜的現實，而農民是在這個現實中看到自己的。[[60]](#_60_Biao_Zhun_Jian_Hua_Fen_Lei_R)盡管有共產黨的階級斗爭的觀念，盡管農村中窮人對那些剝削他們的人的怨恨確實存在，但社區團結的牢固傳統、社會調和的習俗以及宿命論對現實的接受都阻礙著激進行動。對共產黨人定為“地主”、“富農”或干脆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嚇倒普通農民，他們或許害怕下次會輪到他們，盡管保證不會。識字的和受過教育的人也群集在這些下層農村精英中，如果黨想補充能夠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地方干部，許多就得來自這些人群。最后，共產黨人認識到，粗暴待遇的消息會傳播到其他地區，使他們的滲透以及與鄉紳的統一戰線更加困難。

到盧溝橋事變兩周年時，中國共產黨人處于前所未有的地位。這一運動以前曾兩次迅速發展，又兩次瀕臨絕境。這兩次是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血腥解體和1934—1935年長征的艱辛，幸存者們精心照料著革命的火種，并耐心地使它們恢復活力。現在，由于戰爭，共產黨人更強大了，分布更廣了，軍隊、地區和追隨者遍布華北和華中。領導層比過去更團結，不再只有一個像上海或江西蘇區那樣的統治中心，在那里共產黨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擊。

從1927年和1935年的情景觀察，中共力量的成長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與國民黨人及其追隨者的力量比或與日軍和偽軍比，也與這些新區的廣大空間和社會復雜性比，中共力量的這種成長顯得更為有限。它能經受住第三次大挑戰嗎？

## Ⅱ戰爭中期，1939—1943年

1939年初戰爭開始轉入第二階段，這是1938年末毛在六中全會上所預見的相持的結果。毛曾預言，在這個持久的“新階段”，抵抗力量（當然主要指共產黨領導的力量）將成長壯大。其實這筆賬并不那么單純。在山東和華中建立了新的根據地，但在華北許多地區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強化治安而喪失。根據地經濟面臨嚴重問題，農民所受的苦難比任何時候都重。

相持階段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擴張越來越惱怒，共產黨的擴張與他們自己的損失呈鮮明對比。當國民黨人正被趕出他們擁有最大財富和最高權力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并在這一過程中喪失了精銳部隊時，中國共產黨卻正在滲入日軍戰線后面的廣闊農村，在那片土地上擴張勢力并贏得民眾的支持。

第二個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鞏固他們名義上已征服的地區，并從中得到經濟利益。歸根到底，發動中國事變的理由是利用中國的勞力和資源來增強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國的廣闊領土上耗盡其財富。

一個日軍陸軍上校悲嘆道：“為什么，唉，為什么，在我們已經達到最初目的后，我們不迅速結束中國事變？我們被誘入內地，真是愚蠢……我們所得到的是不動產，而不是我們 ‘解放’的人民的普遍支持……我們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永無盡頭的消耗的泥潭中了。”[[61]](#_61_Yin_Zi_A_Er_Wen__D_Ku_Ke_Si)日本的當權者們仍意見分歧，并且互相競爭；他們多方設法以求改善其處境。他們對蔣介石展開新的和平攻勢，同時力求建立一個在汪精衛領導下的“改組的”國民黨政府，汪已于1938年12月逃離重慶。他們招攬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最后，日本人還采取強有力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措施來建立地區性控制并消滅反對力量。

## 與國民黨的“摩擦”

共產黨人用“摩擦”這個委婉的說法來描述戰爭中期他們與國民黨人的沖突。到1939年，許多觀察家認為（或許是錯誤地認為），出乎意料的真誠協商開始漸趨消退。1939年初，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國共產黨的措施。[[62]](#_62_Zhe_Xie_Shi_Zhi__a___Fang_Zh)軍事沖突始于夏季，持續到秋冬，越來越頻繁和激烈，這些沖突多數發生在華北根據地及其周圍。共產黨把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之間的這段時期稱為“第一次反共高潮”。當然，雙方相互指責對方是進攻者，而稱自己是對無理進攻的自衛。但從戰略上看，這次華北“高潮”是國民黨為制止中共擅自擴張到指定地區以外，并在已經丟給共產黨人和日本人的地區恢復權力所做的一次努力。蔣介石作為一個傳統主義者堅持要維護他的法權，而共產黨人則堅持他們有發展的權利，對政府法權的道德價值提出質疑。

1939年，國民黨人開始對陜甘寧南部和西部邊界實行全面封鎖。一年內，封鎖部隊幾達40萬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揮的中央軍。封鎖阻止了共產黨的進一步擴張，特別在甘肅和綏遠，并終止了陜甘寧與在鄰接蘇聯的新疆（中國土耳其斯坦）活動的共產黨人的直接接觸。新疆的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的弟弟，于1942年被害。在甘肅—陜西邊界和陜甘寧東北角長城沿線綏德附近，當封鎖軍刺探薄弱地點時，爆發了激烈的戰斗。賀龍第120師的一些部隊從黃河對岸的晉綏根據地調回，以加強陜甘寧的正規守備。

經濟上的封鎖甚至更為嚴重。中央政府給邊區預算的補助于1939年中斷了。邊區與中國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幾乎陷于停頓，這對一個許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給的地區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國民黨和地方勢力也謀求把他們的軍事和政治權力擠入共產黨視作他們根據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東地區。共產黨反對這些企圖，他們有預見地譴責他們的對手危害抗戰和損害人民利益。“摩擦專家”據說是為日本人及其傀儡效勞。共產黨注意到地方部隊與日本人的勾結日益增多，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蓄意的、不嚴肅的所謂“曲線救國”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軍隊以為將來反共之用。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仍力求避免與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在公開場合，中共一貫把這些軍事沖突描繪成地方指揮官超越上級命令挑起的，盡管他們明白事實并非如此。蔣介石當然不能否認這種提法，這使共產黨的強烈反應顯得正當有理。

毛澤東宣布對付這些攻擊的總政策是：“有理、有利、有節。”[[63]](#_63___Mu_Qian_Kang_Ri_Tong_Yi_Zh)換句話說，當共產黨能夠表明打是正當的，以及當他們能得到好處時，他們就應該打。但他們的進攻不應超過國民黨容忍的限度，不應損害他們在公眾中的無私愛國者的形象。中共的武裝應盡可能將主動權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決定何時交戰，是否交戰，何時休戰。

“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1939年12月與閻錫山的決裂。整個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緊張氣氛一直在增長，因為閻及其與舊軍有聯系的保守的追隨者看到犧盟會和新軍的決死縱隊與共產黨軍隊攪在一起了。當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據地和敵占區時，閻被迫流亡到黃河對岸的陜西秋林。11月，閻命令他的舊軍在胡宗南派來的中央軍協助下解除決死縱隊的武裝。經過接著發生的血戰，這些部隊一個個脫離了哪怕是名義上的省的控制，完成了與共軍的會合。3萬多人投向共產黨。一個國民黨情報員沮喪而頗有辯才地概括道：

這是共產黨人慣用的手段。起初他們滿口甜言蜜語，阿諛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開局面，為其行為作掩護……但是，一旦他們羽毛豐滿，一旦初步的基礎已經打好，他們立刻就翻臉咬人……我們心中曾料到結局可能是這樣，但不知道情況發展得有多快……也不相信這竟會在中共號召“統一戰線”和“團結抗戰”之聲響徹云霄之時發生。[[64]](#_64_Yin_Zi_Fan_Si_Lai_Ke____Di_Y)

約一個月以后，在1940年2月到3月，八路軍部隊打退了這次所謂的高潮。張蔭梧部在冀北平原被擊潰繳械。在冀南，朱懷冰和石友三同國民黨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鐘麟一樣被趕出根據地。雖然在這一地區仍留有少數非共產黨武裝，但晉察冀和晉冀魯豫根據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屬部隊的嚴重威脅。中共指控石友三與日本人勾結，經證實后，石友三于該年晚些時候被中央政府處決。

1939年末，中共中央當局聲稱，“而現實能夠發展武裝的地區，主要的只有山東與華中”。[[65]](#_65___Zhong_Yang_Guan_Yu_Zai_Sha)中共仍試圖在這兩個地區開辟他們能活動的根據地。

山東局勢混亂。日軍入侵后，國民黨所屬部隊多數留在省內，因而共產黨的武裝和根據地比西邊薄弱和分散。直到1938年后期，徐向前和羅榮桓指揮的八路軍第115師和第129師的大部隊才進入該省，與山東縱隊和地方游擊隊（包括近遭日軍殺傷的一支大部隊的殘部）會合。[[66]](#_66_Dai_Wei__Bao_Er_Sen____Hua_B)這些行動導致與日軍和各種從屬于國民黨的團伙沖突，當時他們都比共產黨人強大。直到1940年后期，中共與這些國民黨軍的沖突比與日軍的沖突還要殘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國對手互相嚴重猜疑，而且他們對中共的態度也大不一樣。主要的國民黨軍隊并未緊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蔣介石，他們歸獨立的、有時是桀驁的地區司令官指揮。共產黨的策略被概括為幾句口號：“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取悅上層，羅致中層，襲擊下層”；和“爭取于學忠，孤立沈鴻烈，消滅秦啟榮”。[[67]](#_67_Bao_Er_Sen____Hua_Bei_De_Kan)然而，不像其他華北根據地，共產黨人花了幾年時間都不能使山東的國民黨軍保持中立，若不是日軍掃蕩削弱了他們，共產黨人當時甚至可能沒有能力這樣做。

到1940年11月，徐向前聲稱已取得相當大的進展，但他承認山東還不是鞏固的根據地。中共的努力在沿山東—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區、魯中泰山周圍和半島最東端附近最為成功。他承認其他地方“進步力量尚弱”。八路軍正規部隊可能有7萬人，遠低于黨中央的要求——15萬正規軍和150萬到200萬自衛隊。[[68]](#_68_Tong_Shang_Shu__Di_107Ye)事實上一直沒有實行系統的經濟改革。大家熟悉的沒收、征收救國糧、捐獻和公債與傳統的稅收體制并存，只是對后者加以調整，以照顧較貧困的農民。

與在北邊相比，共產黨在華中的擴張更充滿與中央政府軍隊發生大規模沖突的危險。鑒于華北大部分“摩擦”是因共產黨迅速擴張到半真空地區引起的，中共在華中建設根據地的嘗試要求他們取代與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有密切聯系的現有的國民黨軍政人員。

發展華中根據地的任務最初由第六支隊（皖北和江蘇）和第五支隊承擔，并得到黃克誠率領的1.5萬到2萬八路軍強有力的支援。當陳毅的第1支隊通過管文蔚的地方武裝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達江北時，他們也積極地參與了。這一擴展是對毛澤東和劉少奇各項指示的響應，這些指示經過1939年后期進入1940年時變得愈來愈緊迫了。這使得江北的新四軍與安徽和江蘇國民黨當局，特別與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領導的軍隊之間的沖突變得更加頻繁和尖銳。

然而，江南的項英并沒有直接向重慶的指揮官們提出挑戰。或許如毛后來指責的那樣，他曾受王明影響，或許他別無選擇。他的部隊——三個支隊加上新四軍總部——在數量上遠不及顧祝同的國民黨軍隊，更不要說日軍和偽軍了。雖然毛堅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據地，但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帶是一個罕見的困難環境。項英和他的同伴們于1934年至1937年間在華南山區面對殘酷的圍剿——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取消——以巨大的韌性和勇氣幸存了下來。能夠經受如此艱辛的人突然成了“右傾投降主義者”，這似乎是不可能的。項英的“調和”和“妥協”或許更能反映這一地區真正的力量平衡。然而，到1940年春，毛對項英甚至逼得更緊了：

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展。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范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69]](#_69___Fang_Shou_Fa_Zhan_Kang_Ri)

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爭奪不僅僅是為控制敵后地區而進行的斗爭。它還涉及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和領導權。對中共來說，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是在整個1939年期間提高蔣介石威望和官方權力的運動，在他的黨、政、軍最高職位外增加了更多的頭銜。1939年初，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他為國民黨“總裁”，[[70]](#_70_Jiang_Jie_Shi_Ren_Guo_Min_Da)不禁使人想起孫逸仙以前擁有的頭銜。更有甚者，1939年夏、秋之際，出現了有關憲政的講話。11月，國民黨宣布了一年后召開制憲會議的計劃。如果蔣真能兌現人們期待已久的許諾，他和他的政府也許可以獲得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眾望。

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不能讓這些發展不受挑戰。如果國民黨要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和權威發言人，那么中國共產黨也應該有一個。毛的名著《新民主主義論》寫于1939年晚些時候，而發表于第二年元月，這不是偶然的。[[71]](#_7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這一著作的要旨在較早的聲明中已預先表達，但其發表時機和充分發揮則受國民黨憲政運動的影響。它體現了中共參與競爭，不但爭取得到（國民黨以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領導的各階層統一戰線大聯合的聲明。《新民主主義論》中表面溫和而有節制的語氣使許多中國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他們的革命目標，或者已把它推遲到遙遠的將來。但在這里，像在中共許多其他聲明中一樣，措詞往往一語雙關。對國民黨統治區的人來說，文本讓人們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解釋：民眾參與，多黨政府，依法保護公民權利。但在共產黨控制的邊區，同樣的話具有較多的權力主義的和以階級為基礎的含義。在保密的非公開傳播的黨內文件中，模棱兩可的詞句不見了，人們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黨不只是對于抗戰而且也是對于社會控制和社會改革的頑強、堅韌和靈活的承諾。

在同一時期，共產黨人聲稱對國民黨投降日本的危險深感憂慮，這種危險不僅發生在敵后的戰場上，而且也發生在最高層。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宣傳，但在宣傳的背后也有真正的擔憂。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一切有政治意識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與一年前逃離重慶的反復無常的汪精衛談判。1940年3月，一個“改組的國民政府”最終在南京成立，這是當時最可怕的勾結。

在同一時間，不那么廣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過香港的中間人尋求與蔣介石本人達成諒解。這一“為蔣設宴”的任務被稱為“桐工作”，它既有高層次密謀的成分，也有低級滑稽劇的成分。據傳蔣對和平感興趣可能是為了使汪精衛進一步丟臉而設下的一個騙局。他們讓汪在舞臺的側面等候，直到“桐工作”完全失敗。但是即使蔣無意與日本人達成協議，共產黨在這個多方位的和平攻勢失敗之前，也不可能確知它的后果。

中國從沒有像1940年中期那樣孤立過。在歐洲，“虛假的戰爭”因跨越低地國家的德國閃電戰而于春天結束。法國很快被擊敗，而英國似乎也將陷落。日本利用這種形勢要求切斷中國與外界脆弱的最后聯系：滇緬公路與中立的香港的貿易，以及河內到昆明的鐵路。與此同時，蘇聯陷入棘手而令人困擾的對芬蘭的戰爭，并削減對國民黨人的軍事援助。美國則剛從孤立主義中逐漸擺脫出來，而且明確地認為英國比中國更重要。在重慶和自由中國的其他地區，對戰爭感到疲憊、絕望和士氣低落的跡象是顯而易見的。

新四軍事變[[72]](#_72_Ben_Jie_Xu_Shu_Da_Ban_Gen_Ju)

在這種環境下，毛號召大力擴展，這或者是一次大膽的賭博，認為蔣不致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項緊急準備，盡可能爭取有利地位，以防國共發生分裂。在華中，從1939年最后幾個月羅炳輝的第五支隊與高郵湖附近韓德勤的江蘇軍隊發生沖突開始，戰斗的規模和發展速度不斷增長。在隨后的幾個月里，管文蔚的部隊全部沿長江左岸運動，并與更北的羅炳輝部保持經常接觸。羅也開始得到取道六支隊控制區南下的八路軍的一些增援。顯然，在蘇北和蘇中，一場重大的對抗正在激化。

這時江南指揮部的情況很糟。國民黨的司令官冷欣和顧祝同[[73]](#_73_Leng_Xin_Ren_Di_San_Zhan_Qu)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致使毛和劉逐漸放棄了在這一地區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打算。在春末夏初之際，陳毅將其第一和第二支隊大部轉移到江北。9月，第三支隊也尾隨渡江，到達第四支隊的駐地巢湖附近。只剩下葉挺和項英下面的軍部直屬部隊仍留在長江南岸，駐皖南涇縣。

當軍事形勢朝著攤牌的方向發展時，國民黨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年6月開始談判。爭論的是共產黨的作戰區域和中共領導的軍隊的核準的規模。建議與苛刻的反建議你來我往，未能達成協議。國民黨認為，除晉南仍留作閻錫山的轄區外，允許中共在1938年前的黃河故道以北自由統治是一個讓步。作為回報，八路軍和新四軍所有部隊應撤離華中。實質上，國民黨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區，以換取它放棄可能將用武力取得的地區。國民黨當局發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沒有明確指出違反這些規定會有什么后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辦了。陳毅和江南指揮部的行動可能看上去像是服從，盡管實際上他們是在執行自己上級的命令，而不是國民黨人的命令。1940年秋冬之際項英繼續拖延和推諉的行為至今仍有點令人不解。或許他已有相當理由感到毛對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達長江北岸，他將喪失他的指揮權。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時是模棱兩可的和矛盾的。或許他還想與國民黨的司令官達成關于撤離該地區的行軍路線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協議。

韓德勤一度在蘇北駐有大量部隊——估計有7萬人，遠超過新四軍的數量——阻擋著第六支隊的擴展和八路軍的進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認識到必須反對新四軍在蘇中集結，否則他就要冒把蘇中奉送給共產黨人的危險。隨后發生了一連串混戰，而以1940年10月初在蘇中黃橋鎮附近的一場決戰達到高潮。在4天里，韓的第89軍的幾支主力部隊被殲，其余部隊也被擊潰。這也給第六支隊一個信號，讓他們在蘇北更積極地活動。后果是韓的一位主要的司令官與中共建立合作關系，另一個投靠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雖然韓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蘇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實權已被粉碎。黃橋之戰在中國報紙上沒有作多少報道：國民黨不想公開其慘敗，而共產黨人對這段與其正式接受的統一戰線相矛盾的插曲也樂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韓德勤失敗之后的秋季，國共談判每況愈下。12月初，蔣介石本人下令，讓所有的新四軍部隊到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蘇南；到同一期限，全體八路軍應撤至黃河以北，一個月后與新四軍會合。在葉挺和顧祝同雙方代表之間接著展開一場有關行軍路線、安全措施以及——令人難以置信——向新四軍提供經費和給養以助轉移的討論。[[74]](#_74_Chen_Yong_Fa____Ge_Ming_De_X)12月25日，毛澤東命令項英立即撤離，但直到1941年1月4日，葉和項才真正開始轉移。顧祝同的部隊幾乎立即進行騷擾并擊潰了新四軍軍部部隊，包括后勤人員、傷兵和家屬以及一些作好戰斗準備的部隊。在一次變更部署中，他們向西南方向轉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國民黨軍隊包圍，并在隨后的幾天中被粉碎。

雙方損失都很大。中共方面傷亡約9000人。項英兩次試圖憑自己的力量沖出包圍，均未成功，并被葉挺斥責為擅離職守。葉挺完全接管了這支必敗無疑的隊伍的指揮權。項英最后成功脫險，但在兩個月后因攜有新四軍的黃金儲備而被他的一名衛兵殺害。項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絕前往劉少奇領導的江北地區尋求避難，葉挺不幸被捕并在監獄中度過了這場戰爭余下的歲月；最后他于1946年獲釋，但一個月后與其他幾個高級黨員一起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喪生。1月17日，蔣介石以違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軍。延安與重慶間的直接聯系實際上結束了，而且在許多國民黨統治的城市中的中共軍事聯絡處也被封閉。

這就是新四軍事變，也被稱為皖南事變。顯然，這是對韓德勤在蘇北和蘇中敗績的報復行動，它結束了在江南建立鞏固共產黨根據地的任何現實機會。然而，從戰略意義上講，這些損失因在更北邊取得更大的收獲而得到了補償——事實上，幾個月后，經過整編的新四軍開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隊進入這一地區，在這里他們進行游擊活動，沒有安全的根據地。

與圍繞黃橋之戰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新四軍事件成為一個激烈而持久的論戰主題。中共控訴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為嚴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們把自己說成是殉難的愛國者，而把他們的對手描繪成：

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75]](#_75___Wei_Wan_Nan_Shi_Bian_Fa_Bi)

當然，國民黨的回答是，挑釁已有多次并且是嚴重的，而違反軍紀的行為不能寬恕，但他們不愿公布自己敗于中共之手的細節，這使全貌含糊不清。中共智勝了這場宣傳戰，并贏得了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本。“如果被看作民族英雄具有政治價值，那么做個民族殉難者價值更大……在整個中日戰爭中，沒有一件事比新四軍軍部在 ‘忠實執行命令’時被消滅更能提高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威望了。”[[76]](#_76_Yue_Han_Xun____Nong_Min_Ai_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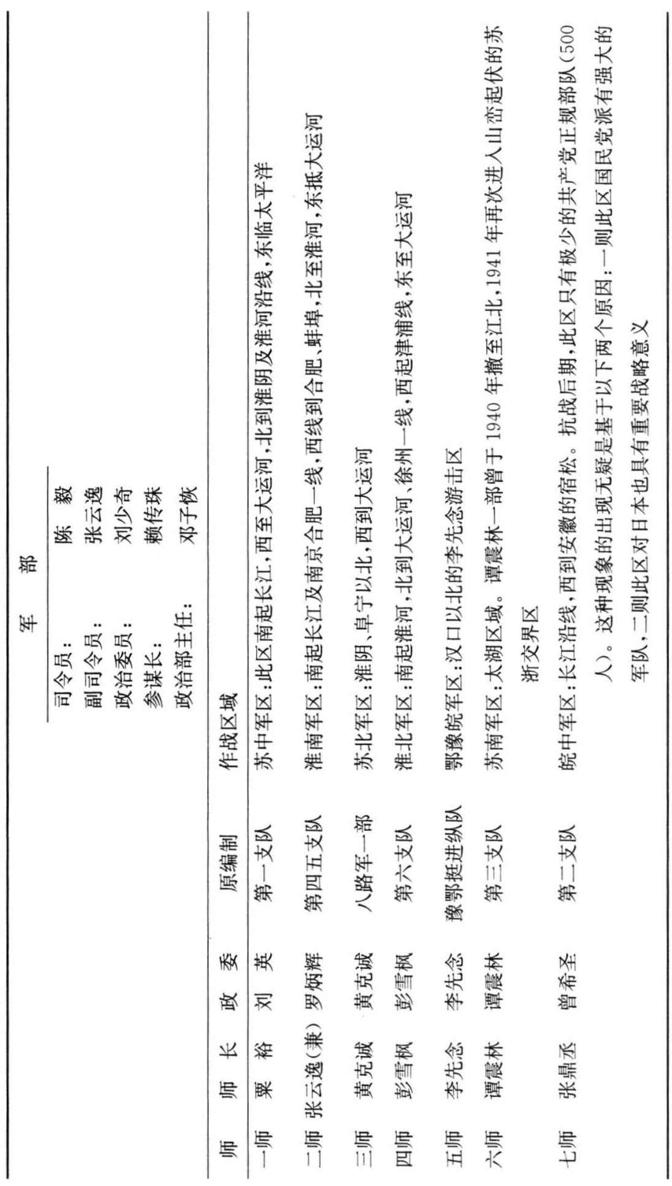
許多關心這次事件的中國人和其他觀察家確實感到“震驚”，擔心內戰重開。雖然內戰并未接踵而來，但是以新四軍事變為最高點的各次事件，只有極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統一戰線破裂的標志。這種觀點有兩個錯誤。首先，中共把統一戰線視為一種戰略，可以靈活運用于從中央政府的最高層到最小村落的中國各種政治、軍事和社會力量。與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的關系從整體上說是重要的，但絕不是統一戰線的全部。然而即使對蔣和國民政府，慣常的解釋也是錯誤的。整個戰爭期間，統一戰線的主要目標是阻止國民黨人與日本講和。因此，當中共軍隊和中央政府軍隊之間發生像黃橋和茂林那樣的大規模沖突而能不導致與日媾和及全面重開內戰時，這不是統一戰線的終結，而是它的根本的證明。[[77]](#_77_Pian_Gang_Tie_Zai____Zhong_G)如果蔣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規模的摩擦，那么對他將來會與日本人和解的擔心就能大為減輕。

新四軍事變之后，接踵而來的是中共重新組建華中的政治和軍事存在。中共中原局和東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為華中局，由劉少奇負責，反映了這一地區對黨中央的重要性。新四軍也完全改編，并做了重大的調整。陳毅成為新的代理軍長（因葉挺在押），指揮7個師，這些師是這支部隊現在分成的。每個師負責一個地區，中共要求在每個地區建立一個根據地（見圖15及表22）。實際上，根據地建設是在1940年的摩擦和新四軍事變后才開始認真進行的。在以后幾年中，第一至四師的作戰地區包括不斷擴大的被包圍的鞏固區，在這里，軍事統治與黨的公開活動、行政控制、群眾組織的發展、地方選舉以及社會經濟改革結合在一起。其他三個地區在半鞏固狀態和游擊狀態之間變動。



地圖15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部署

表22 1941 年2 月18 日以后的新四軍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第144—145頁，對照陳永發和片岡鐵哉的材料校核。地圖15 由此表而來。

國共沖突的最壞時期已經過去。當中共文件提到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時，它們指的是不加掩飾的政治活動。除相當強大的國民黨勢力持續時間較長的山東外，敵后中國各派武裝之間的均勢到1941年中期已變得有利于中共。在隨后的幾年里，這種優勢變得更大，直到1943年年底，共產黨人實際上沒有受到國內對手的挑戰。1943年9月當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講話時，在他的頭腦中或許已經有了這種思想：“我相信首先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問題純粹是個政治問題，并且應該用政治手段去解決……”[[78]](#_78_Mei_Guo_Guo_Wu_Yuan____Zhong)在敵后大部分地區，國民黨人再也沒有能力去試一試任何其他的解決辦法了。

## 日本的強化治安

在國民黨和中共間出現“摩擦”的同時，日本人正試圖控制并開發他們名義上已征服的地區。把摩擦和強化治安分別論述，對中共同時處理兩者所面臨的問題的真正復雜性和困難有所損害。有時，中共要兩面作戰。但是，如果說國共摩擦的最糟時期到1941年就結束了，那么日本強化治安的最危險和最痛苦的挑戰尚未到來。如果想恢復接近真實的歷史，這兩個年表必須疊加起來。

日本人明白強化治安是一項緊迫的任務，因為在日軍最遠的前線后面大部分地區多半不在他們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區用很直截了當的手段就能恢復秩序，如恢復當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權威，修復交通和通信線路，招募中國人（往往證明是不可信賴的）充當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隊員，登記當地人口并要求他們攜帶良民證。集體安全技術按照由來已久的中國方式被廣泛采用。其中之一是眾所周知的各種形式的保甲制度。“護路村”就是它的變體。一個村子被指定負責看護附近的一段鐵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護”好，他們就要集體承擔責任。但早期日本人對華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輕的外國人生動地作出說明。他們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況，他們帶著自行車搭乘南下的火車，在保定車站下車，然后騎車西行，直到碰上八路軍的小分隊。[[79]](#_79_Lin_Mai_Ke____Bu_Wei_Ren_Zhi)

在戰爭初期，指揮官們想采用運動戰，但毛堅持要降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規模，并把他們分散成小股部隊，作為戰斗、擴軍、政工和根據地建設的核心。采用這種戰略幾乎沒有什么戰斗可能是富有戲劇性或有重大意義的。每次小戰斗都須經過仔細籌劃，利用當地情報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隊能在有限的彈藥用完以前或敵人援軍到達以前打了就跑。為了殺傷敵人，也為了奪取武器和其他物資，小分隊可能伏擊小股日軍巡邏隊和偽軍。鐵桿漢奸或偽政府人員可能遭到暗殺。總之，共產黨人的目的是使運輸中斷：在路上埋設地雷，砍倒電話線桿并偷走電線，切斷鐵路線并破壞車輛。有時他們取走鋼軌，為他們原始的兵工廠提供原料，或試圖造成出軌。破壞橋梁或機車是一項主要成就。表23中表明共產黨人在華北利用這樣的機會是多么有效。

表23 對華北鐵路的破壞（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



資料來源：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第1卷，第407頁。

共產黨人和日本人都明白，這種戰術對戰略平衡幾乎不產生什么影響，但在其他層次上則是有效的。對日本人來說，這些行動像是許多小傷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農村幾乎沒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資料證明，當野戰部隊的司令官們試圖消滅抵抗力量，恢復行政管理，征稅，并準備更有效地從經濟上開發占領區時，他們越來越惱怒。抗日游擊戰不能按贏得多少戰役、造成多少傷亡、占領多少土地等傳統項目來評估。如毛反復強調的那樣，還必須從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評價。因為中共在戰爭時期的合法性有賴于其愛國主張，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夠的軍事行動以維護其信譽。此外，軍事上的勝利對贏得“基本群眾”的支持，說服動搖者認清形勢，以及使反對派保持中立，都是極為重要的。“并不是人們總是選擇勝利的一方，而是幾乎沒有人愿意加入他們認為正在走向失敗的一方。”如一位有經驗的干部所觀察到的那樣：

在游擊隊中……有一種說法“勝利決定一切”。那就是說，補充隊伍，提供給養，提高群眾抗日熱情或贏得群眾同情，這些不管曾經多么難辦，但在打了一場勝仗之后，群眾全都熱衷于給我們送面粉、饅頭、肉和蔬菜。群眾的悲觀和失敗心理煙消云散，許多新的游擊戰士蜂擁而至。[[80]](#_80_Kai_Si_Lin__Ha_Te_Fu_De____Z)

后來，當日本人開始要他們為每一次不論勝利與否的戰斗付出沉重的代價時，這種態度就改變了。

在華北和華中，日本最初的綏靖掃蕩對中共并不構成多大問題。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81]](#_81_Pian_Gang_Tie_Zai____Zhong_G)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

當1939年晚些時候和1940年日軍開始認真進行清剿時，華北日軍和華中日軍戰略上的差異變得明顯起來。華北的做法是強調猛烈的軍事打擊，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偽軍。華中當局對使用軍事力量并不遲疑，但他們試圖通過建立嚴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區”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經濟的解決辦法來補充軍事力量。雖然這兩種戰略最后都失敗了，但它們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于對美國的太平洋戰爭的負擔，才被迫放松。

當共產黨人經受住了日本的強化治安和鎮壓時，大部分觀察家將其歸功于群眾動員和民眾支持，并將這種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義或社會經濟改革和“群眾路線”。無疑這兩種因素都起了某種作用，但對黨內詳細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鎮壓也削弱了農民的支持，并使民眾受到恐嚇而變得冷漠、勉強默認或積極與日本人合作。而在由鞏固區降為游擊區的地帶，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實施系統的復雜的改革。在經受這樣的風暴時，消極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戰略至少與共產黨表現出來的在公眾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后的東西是同等重要的。

### 華北的強化治安

1939年末和1940年在華北的有計劃的清剿從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較牢固的地區向外擴展，推進到游擊區和爭奪區。最終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驟是首先在某一地區。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能夠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聯系的強大據點。接著是不斷擴大傀儡政府對民事管理和“維持治安”的責任，而日軍則到更遠的爭奪區去重復第一個步驟。有選擇地對被指控犯有抵抗行為的個人、團體或村莊施加暴行。這種有選擇的暴力行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積極參與共產黨領導的活動，使居民不愿掩護共產黨軍隊，并勸誘告密者站出來。至少戰略是這樣的。雖然遠遠沒有達到日本人的目標，但它足以使八路軍極感憂慮。

實際上，這一戰略的框架是主要運輸線。充分設防保護的鐵路和公路將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們失去靈活性這一最有效的武器。這些“囚籠”戰術有可能用“蠶食”的方法擴大治安區。此外，這一措施的目的還在于更有效地對華北進行經濟榨取。為達到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鐵路和公路網。在戰爭開始時，山西省境內的正太（石家莊—太原）[[82]](#_82_Zheng_Tai_Xian_Cong_Zheng_Di)線和同蒲（大同—潼關）[[83]](#_83_Tong_Pu_Xian_Cong_Da_Tong_Zh)線都是窄軌的，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標準軌不一致。這是閻錫山為防止對他的省的滲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見圖9和表14）。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強迫的勞工把這兩條鐵路改成標準軌。一個好處是高質量的無煙煤能更方便地從井陘煤礦（在正太鐵路上）運到華北和滿洲國的工業用戶。新建的公路和鐵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線（從山東東北部的德州到石家莊）；它始建于1940年6月，11月完工，連接津浦、平漢及正太線，從而便利了軍隊的調動和原棉的運輸。隨著德石線的建成，在黃河灣最前沿與華北及遠至滿洲國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間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聯系。共產黨的資料開始提到“運輸戰”，并擔心地注意到濠溝、炮樓以及經常性的護路巡邏。

這些措施在軍事和經濟兩方面沉重地壓在華北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別在冀中和冀東平原。它們的效果表現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華北鐵路的“破壞活動”急劇減少（見表23；但“運輸事故”幾乎必然包括隱蔽的破壞）。晉察冀的一個干部報告，在1940年中，“敵人采取像[江西蘇區]那樣的碉堡政策。這些碉堡星羅棋布。僅在冀中就約有500個，相隔一至三英里”。[[84]](#_84_Pian_Gang_Tie_Zai____Zhong_G)正常的貿易模式遭到破壞，因為日本人或傀儡占據了行政—商業中心，而農民們則被夾在共產黨人所加的規定和另一方強加的規定之間。最后，地主、高利貸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據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計劃試圖恢復失去的權勢，或者只是報仇。有些人變成了告密者。在八路軍和地方部隊被趕走后，他們可能殺害留下來的干部或積極分子，并向支持這些人的農民算賬。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擊退前，鄉紳和其他不滿分子也可能尋求國民黨的支持。一支武裝匪徒甚至可能在晉察冀根據地的鞏固區內活動幾個月，到處殺害干部。[[85]](#_85_Ha_Te_Fu_De____Zhen_Ya_Yu_Go)關于這段時期，彭德懷后來回憶道：

亦有少數地區的群眾，在敵人的嚴厲威逼下，甚至有動搖或投敵者，從1940年2月前后至7月，華北抗日根據地大片地迅速變為游擊區。大破襲戰（即百團大戰）之前，只剩下兩個縣城，即太行山的平順和晉西北的偏關。原來一面負擔的群眾變為兩面負擔（既對抗日政府負擔，又對偽政權負擔）。[[86]](#_86___Peng_De_Huai_Zi_Shu_____Di)

華北的形勢還沒有達到危機，但確實是嚴重的。需要采取行動以恢復主動。

### 百團大戰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對日本發起了最大規模的持久的攻擊戰。22個團的兵力（約40000人）在高稈作物形成的“青紗帳”的掩護下，盡量出其不意地襲擊了華北的運輸網，他們挑選了在防御上相當薄弱的正太線給予特別沉重的打擊。所有主要的鐵路和公路都處于攻擊之下，并被反復切斷。路基、橋梁、編組站和有關設施都遭到嚴重破壞。重要的井陘煤礦設備被破壞，停產近一年。大約持續了三個星期的戰役這個第一階段讓位給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中主要目標是碉堡和日軍推進到爭奪區的其他據點。這種轉移相當于更換易受攻擊的弱點：當日軍積極利用據點體系時，運輸網的防守較欠安全；相反，當派出的小分隊撤回來阻擋對鐵路和公路的襲擊時，碉堡成為更具誘惑力的目標。實際上，這次戰役的目的是迫使日軍放棄囚籠和蠶食戰略，退回防守鞏固的駐地，再次把農村讓給共產黨人。在戰役的第二階段，更多部隊參加了戰斗，總數達到104個團。幾年后，百團大戰直接指揮者彭德懷隱晦地說，他們是“自發”參戰的，沒有得到八路軍總部的命令。[[87]](#_87___Peng_De_Huai_Zi_Shu_____Di)到10月初，第二階段接近尾聲，而第三階段正在開始，這時得到增援的日軍縱隊尋求與八路軍交戰以消滅他們。幾次激烈的反攻斷斷續續地進行了兩個月，此后百團大戰被認為是結束了。

百團大戰的背景——誰批準并計劃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日本人對這次戰役的反應是如此殘酷，以致回顧時它像是一個錯誤，而有些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可能曾經希望否定這次戰役。在以后的歲月里，毛在他的著作中間接暗示他對這次戰役持批評觀點，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這不是他的那種軍事戰略。20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指責說毛甚至事先并不知道這個計劃，因為彭蓄意欺騙，這時彭正在被批斗。雖然這似乎不可信，但這或許有一點實質性的東西。彭在反對這種指控的辯護材料中寫道，在位于晉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軍總部擬定作戰計劃后，總部向每個地區指揮部下達了動員令，并通報毛領導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按原計劃，這次行動應于9月初開始。但彭寫道：

為防止敵人發覺，保障各地同時突然襲擊，以便給敵偽更大震動，大概比預定時間提早了10天，即在8月下旬開始的。故未等到軍委批準（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斗。[[88]](#_88___Peng_De_Huai_Zi_Shu_____Di)

此外還有個問題，那就是多個團自發行動，未經八路軍總部批準，更不說延安了。

如果彭德懷的敘述——寫于1970年他死前不久——是實情，那么毛和黨中央確實未參與百團大戰的構思或計劃，而進行這場大戰的“主要戰略”動機，除彭和他的同事們可能已經考慮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所提到的這些動機之一是反擊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方面的投降傾向：如果戰爭升級，中共投身斗爭之中，那么蔣和日本人之間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與這一解釋有關的是，外界指責共產黨避開日軍而把大多數真正的戰斗留給國民黨軍隊，他們只是利用戰爭擴大自己的勢力，共產黨領導人對這種指責很敏感。國民黨人大肆宣傳說，中共深思熟慮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于擴張，20%用來對付國民黨，只有10%用于抗日。[[89]](#_89_Zhe_Yi_Cheng_Wei_Guo_Min_Dan)所提到的第三個動機是把注意力從華中新四軍進攻國民黨軍這件事上引開，幾乎恰在此時這些進攻達到高峰。

彭德懷承認這次戰役“拖得太久”，但他為其重要性辯護說，百團大戰在緊隨反摩擦沖突后維護了中共抗日形象，證實了囚籠政策和蠶食政策的失敗，恢復了根據地對不少于26座縣城的控制，并使“動搖分子”就范。即使這些理由與進行這次戰役時地區和戰術上的考慮相比并不那么重要，但并不妨礙利用這些理由在事后進行宣傳。無論毛和黨中央可能擔心過什么，他們卻什么也沒有說。毛致電彭德懷，祝賀他取得巨大勝利，而在公開的敘述中百團大戰成了傳奇材料。

### 百團大戰后的掃蕩戰，1941—1943年

如果百團大戰旨在挫敗日本的清剿活動，那么它是極不成功的。華北方面軍被八路軍的行動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華北置于控制之下。在多田將軍及其繼任者岡村寧次將軍（1941年7月—1944年11月）任內，日軍對所有華北根據地施加野蠻而持久的暴行。在1941年至1944年間，約有15萬名日軍在大約10萬名七拼八湊的偽軍協助下，專門執行清剿任務。余下的華北方面軍（15萬到20萬人）負責執行其他任務，如守備主要城市和鉗制國民黨軍隊。估計共產黨在各根據地的正規部隊約為25萬人，在陜甘寧有4萬人。

日軍及其中國仆從們在建造壕溝、柵欄和碉堡方面的投資甚至比過去更多。日方的資料表明，到1942年，他們已建成封鎖線11860公里和據點7700個，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帶。沿平漢鐵路線西側一條大壕綿延500公里，每邊有一條無人帶，經常有人巡邏。1940年12月，在冀南建立的250個日軍哨所到1942年年中翻了兩番以上。這些是對平原地區控制的主要措施，到1941年底，這一地域的共產黨根據地全部降至游擊狀態。許多主力部隊（如呂正操和楊秀峰的部隊）被迫西移，進入山區以保存實力。

與早期的戰術不同，新的多田—岡村戰術是把規模大得多和時間長得多的清剿工作團派進山區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并用不加區別的、普遍的暴力代替百團大戰前采用的有選擇的鎮壓。這就是聲名狼藉的“三光”掃蕩戰：殺光、燒光、搶光。由于仍然未能將普通農民與共產黨員區別開而感到沮喪，日本人把戰爭推向各個方面。在勉力封鎖根據地的重要的鞏固區后，日軍派進很大的分遣隊，尋找共產黨軍隊、政府干部和積極分子。但是，他們另外還要破壞根據地的設施和戰爭物資儲備，燒毀莊稼或干擾播種及收獲以破壞農業，并運走存糧。整座村莊被夷為平地，在那里發現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全被殺死。“三光”掃蕩戰不像以前的掃蕩那樣清掃一個地區然后撤離，而是讓軍隊在目標區留相當長的時間來回“梳篦”，并在多山的根據地內比較容易到達的地區建立至少是臨時的據點。表24中的資料表明這些行動在晉察冀是多么廣泛；類似的戰役在華北根據地全面發動。

表24 日本對晉察冀邊區的封鎖和掃蕩



資料來源：凱思林·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產黨的成功》，第345、347頁。

這些三光戰役發生之處，農村人口損失慘重。毫無疑問，這種嚴酷的戰術以及與之俱來的如此頻繁的暴行，確實使許多農民，不論貧富，對日本人刻骨仇恨，并更徹底地倒向共產黨。但黨內資料也描述了許多事例，說明這種鎮壓比以前的做法——在黨與農民之間打進楔子——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們只強調隱蔽……我們必然脫離群眾。群眾的信心也不能長久維持。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只圖在草率的戰斗中求一時痛快，我們還可能招來敵人更殘酷的鎮壓。那也會脫離群眾。[[90]](#_90_Yang_Cheng_Wu__Yin_Yong_Yu_P)

共產黨發言人承認，在華北根據地，黨控制下的人口從4400萬下降到2500萬，八路軍從40萬減至30萬。[[91]](#_91_2500Wan_Ren_Zhong__You_Xu_Du)地方資料所描繪的景象甚至更為冷酷。到1942年，90%的平原根據地降為游擊狀態，或完全為敵人控制。在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岳山區，一個干部承認，“沒有一個縣能保持完整，全部12個縣的政府機構在清遠流亡”。[[92]](#_92_Guo_Hua_Lun____Zhong_Gong_Sh)隨百團大戰占領的26座縣城全部丟失。

盡管日軍清剿的目標主要是八路軍，但并非總是這樣。日本人未能與之達成“諒解”的國民黨軍隊也遭到攻擊，部分地是為了騰出更多兵力用于反共行動，部分地是為了保持對蔣介石的壓力，部分地也是為了有更多的戰果可資上報。其中最有影響的行動于1941年春季在晉南發生（中條山戰斗，或中原戰役），[[93]](#_93_Ri_Ben_Cheng_Zhong_Tiao_Shan)當時衛立煌將軍的20多個師被趕到黃河以南。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后來在山東對于學忠和沈鴻烈的行動。一旦日偽部隊撤出，這些行動開拓了更多的地區供共產黨滲入；在戰爭的最后階段，當日本人向共產黨人施加的壓力趨于緩和時，這種后果十分明顯。

### 日軍在華中的強化治安

中國派遣軍遵循了一種與華北方面軍不同的模式。雖然提供給派遣軍的總兵力比華北方面軍多（約30萬在華中，另外16.5萬在華南），但只有較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約5萬到7.5萬。其余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蘇，用來對付國民黨軍隊。另一方面，較大的和可能較強的偽軍能被用于長江下游地區，因為那里靠近汪精衛的南京政權。

日軍和偽軍集中在戰略上對他們最重要的地區：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區，以及恰在長江以北和大運河以東的地區。更西的武漢地區也經過嚴厲的清剿。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強大的國民黨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軍第五師直到戰爭末期仍無法在大別山建立完全鞏固的根據地。但江蘇、安徽和河南的其他地區，不論從軍事或經濟的觀點上看，都被認為不那么重要。日軍保持對華東—華中主要交通線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偶爾也派出清鄉隊通過較遠的地區。這對新四軍來說很容易躲避，但給依附于重慶的軍隊造成嚴重的損失。[[94]](#_94_Chen_Yong_Fa____Ge_Ming_De_X)

直到1941年下半年，隨著煙俊六大將采納建立“模范和平區”的計劃，日軍開始對長江三角洲進行認真的清剿。這是一個分階段的計劃，這個計劃將仔細劃分的地區置于更為嚴密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保護之下。當一個地區已達到某種發展水平時，鄰近地區將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強掃蕩，以驅除所有抵抗者并重新開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柵欄或其他防衛工事，實行嚴密的邊界控制。在地區內，地方警察進行嚴格的居民登記，行政人員被指派執行廣泛的“自治、自衛和自富”的計劃。在最發達的模范和平區，日軍的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1.3人，是華北的三倍半。必要時采取嚴厲的高壓手段。結果是長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區內的治安變得相當出色。南京政權代理人征得的稅款急劇增長，強制勞務也是如此。日本兵和當地著名的漢奸寬慰地說，他們來去不必擔心遭到伏擊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時，這些措施對中國的抗戰——不論是國民黨的還是共產黨的——問題，也不是普遍的解決辦法。模范和平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資源，范圍極其有限。到1943年，這樣的措施已不再擁有高度的優先權了，只有少數幾個地區被認為已經通過計劃的所有階段，其余的都停留在這樣或那樣的初級階段上。在長江以北較遠地區唯一的這類措施是成立較晚（1944年2月）而且幾乎完全無效的新省——淮海省，省會設在連云港。[[95]](#_95_Wang_Wei_Huai_Hai_Sheng_Shen)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區內，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都能維持連續的低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區成功有限而最終失敗的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許多任務遲早必須轉移給中國人自己去辦，他們或者是汪精衛任命的人，或者是從當地招募的人。兩者都不斷讓日本人絕望：前者是因為他們無能、腐敗和派系紛爭；后者是因為他們只做那些他們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對本身有利的事。最終，模范和平區證明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區還表明：在幅員遼闊和人口眾多的“被占領的中國”，這樣的解決辦法完全不是辦法。

## 中共的對策：生存與新政

摩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它在抗日戰爭中最嚴重和最持久的危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在戰爭早期共產黨經常強調以犧牲農村政權的鞏固和深入為代價謀取軍事和政治的迅速擴張，加劇了這些挑戰。與此同時，在三年豐收后，不利的天氣導致1940年和1941年的歉收，使原已困難的經濟問題更加嚴重。中共對這些挑戰的反應是多方面的——從零敲碎打開始——正如問題本身是多方面的。針對新的形勢，某些現行政策受到全面檢查并得到調整。有些新政策在暫時困難被克服后仍長期保持，而其他政策則是特殊的常識性的措施，以減少損失或贏得新的支持。回顧起來，新的模式早在1940年已能看到。到1942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義的領導層當時已把它看做一個整體。

與這一艱難時期的實際緊迫任務分不開的是把毛澤東的地位明確地提到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和理論指導中心人物的高度。1942年到1944年間，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澤東思想”，而反對他的最高地位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壓制。至遲從這時起，運動帶上了毛的政策和人格的不可磨滅的標志。這些年的經歷塑造了中國共產黨。像10年前的長征一樣，延安時代具有一種獨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歷史，部分是神化——足以影響未來的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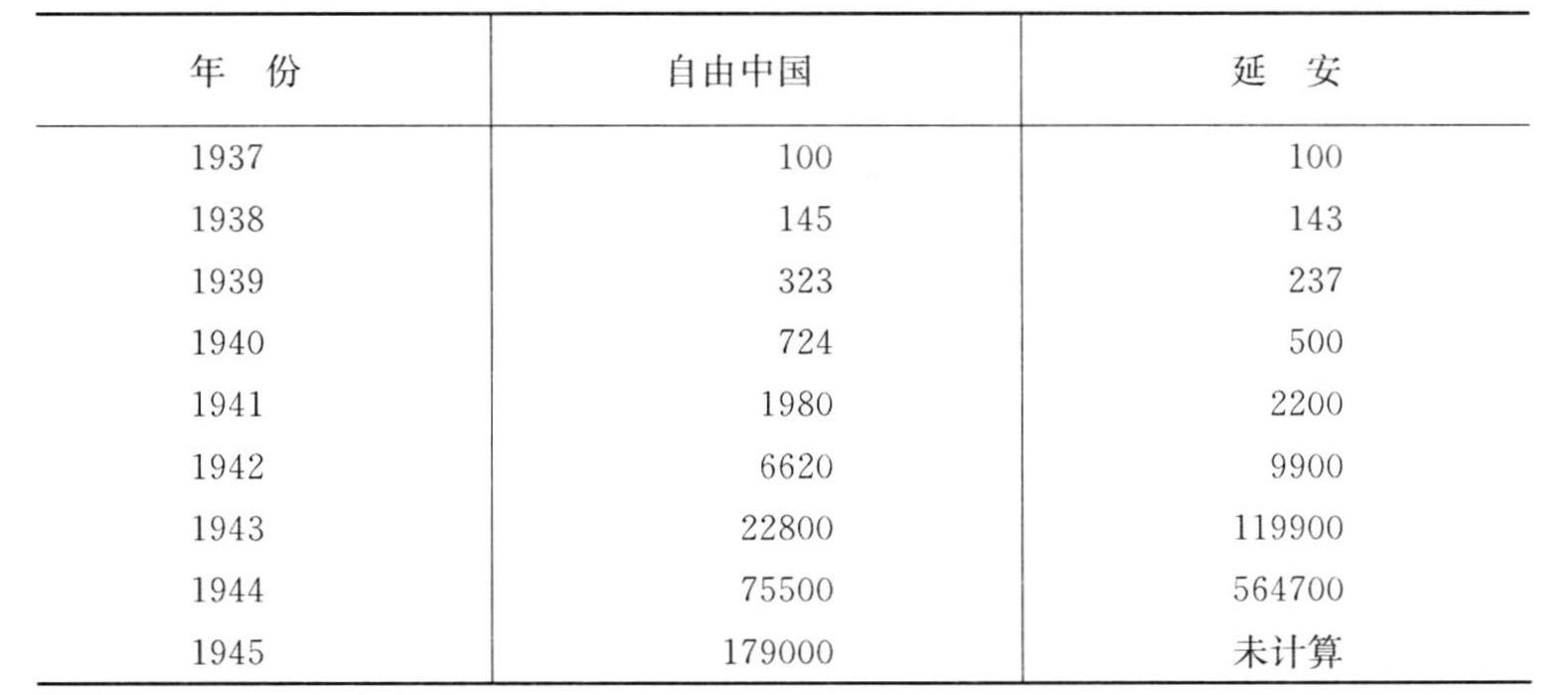
### 陜甘寧的新政策

經濟問題。在戰爭中間幾年陜甘寧的主要經濟變化已在前面提到：國民黨中斷財政撥款，封鎖，以及比前幾年差的收成。這些變化產生了深遠、廣泛和持久的影響。它們幾乎導致陜甘寧經濟的崩潰。回顧這段時期，毛在1945年寫道：“我們[在戰爭]開頭還有飯吃，有衣穿。隨后逐步困難起來，以至于大困難：糧食不足，油鹽不足，被服不足，經費不足。”[[96]](#_96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國民黨的經濟戰剝奪了陜甘寧的重要“硬通貨”來源，并且或者切斷了，或者極大地改變了它與中國其他非淪陷區的貿易。黨、政、軍干部及大量移民使平時就不富裕的邊區資源更加不足。因此，黨的目標是使這一地區盡可能在經濟上達到自給自足。盡管完全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其時，經濟狀況急速惡化。

所有資料都同意問題的嚴重性。陜甘寧喪失了國民黨通貨（元）的主要來源，但繼續依賴對外貿易以換取棉布和幾乎全部工業品，陜甘寧再次采用自己的邊區貨幣，使元的儲備能盡可能地繼續為必要的進口提供資金。1939年以后，這種形勢引發了通貨膨脹，其速度甚至比重慶所經歷的還要快（見表25）。在經濟的所有領域里，1941年是危機最為深重的一年。

表25 1937—1945年物價指數：“自由中國”與延安



資料來源：關于“自由中國”見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第152頁；關于延安，見施蘭：《游擊經濟》，第184頁。

歲入喪失、對外貿易條件迅速惡化以及通貨膨脹，迫使共產黨人尋找新的收入。沒收和“自愿”捐獻已不再有成效，因為在實施比較溫和的統一戰線土地政策前，大多數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經過土地革命。他們現在已拿不出更多的東西了。黨無可奈何地被迫向陜甘寧幾乎全部人口征稅。稅分為三種：（1）谷物稅，以實際產量而不以土地擁有量為基礎；（2）其他實物稅，特別是麥稈和羊毛；（3）貨幣稅。中農和下中農對這些稅感覺最強烈，在此以前他們極少交稅。1/5左右最貧困的農民（他們人均年收入不超過大約100磅谷物）仍豁免谷物稅和其他實物稅，但到1941年谷物稅已超過1938年的20倍——這一負擔使民眾極為抱怨。此后，在1945年或許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門支出減少導致大幅度下降以前，稅收水平有一點降低（見表26）。

在1941年，農民的這項負擔非常接近于20世紀30年代初省政府征稅的估計數，但由于它是在激進累進制的基礎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為減輕較貧窮農民的稅收負擔并盡可能緩和他們的抱怨，黨中央于1940年中開始發布更緊急的號召，要求實行減租減息，希望借此用一種索取部分地替代另一種索取。

表26 1937—1945年陜甘寧的谷物稅



資料來源：施蘭：《游擊經濟》，第128、188頁。

邊區政府較早廢除的麥稈和羊毛實物稅在1941年恢復了。民用部門和軍用部門急需麥稈作為役畜的飼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滿足對紡織原料的需要。

幾種現金稅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較高的水準。在廣泛的商品及服務的范圍內征收的營業稅類似經常受到譴責的前政權的“雜稅和附加稅”，但它是想要抑制進口產品及煙、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費。邊區政府也從仍存在于陜甘寧的許多小規模私營企業征收各種商業稅；1941年這些稅收入約800萬陜甘寧元（相當于30000擔小米）。

因為這些稅的收入不足，赤字財政和增加徭役等權宜之計也用上了。但毛警告說，欺騙性的財政和增加對陜甘寧人民的需索均非長久之計：

任何空話都沒有用，我們必須給老百姓看得見物質福利……我們工作的出發點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奉獻。我們給人民帶來什么呢？在陜甘寧目前的條件下，我們所能做到的是組織、領導和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財富，而且只有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才能一步一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97]](#_97_Wo_Sen_Bian____Mao_Ze_Dong_Y)

首先是在大生產運動中黨和邊區終于再次阻止了經濟惡化并得到了穩定——雖然是低水平的。這一時期沒有運動更受重視；1942 年12月，毛發表了他那內容廣泛但未完成的關于《經濟和財政問題》的文章。雖然有意識形態的背景，但幾乎他的所有建議都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許多是常識性的注重實效的措施，這些措施鄉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實現。受篇幅所限，這里只能提到產量顯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區。表26顯示，在1937年到1944年間，糧食產量幾乎增加了40%。棉花產量在戰爭開始時為零，1939年還微不足道，但到1944年已達300萬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家畜的增加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考慮到陜甘寧惡劣的自然條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術投入，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這成就是通過更好和更多樣化的組織，拓寬市場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1937年到1945年間，播種面積幾乎翻了一番（從860萬畝上升到1520萬畝）。[[98]](#_98_Shi_Lan____You_Ji_Jing_Ji)

紡織工業的產量與原棉的產量相對應。1938年僅7370匹（每匹25平方米），隨后兩年每年產量加一倍，1942年達到45000匹，而1943年迅速上升到105000匹。[[99]](#_99_Ni_Lan____You_Ji_Jing_Ji)自然資源的開發（鹽、煤，一些原始的油氣井）、灌溉、擴大的牧場以及造林都有積極的發展。到1944年，陜甘寧的領導和地方干部仍面臨許多問題，但至此戰爭中期的經濟危機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對的安全感，有了重新獲得并被加深了的民眾支持或認可，而且也有了適度的自信。

整風 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最顯著的成就是“整風運動”。[[100]](#_100__Zheng_Feng__Jiu_Shi__Zheng)它正式開始于1942年2月1日，當時1000多名黨的干部集合在延安聆聽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的致辭。如我們可在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樣，干部教育和對黨的意識形態上的成熟的關心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開展這場特殊運動的決定可能是在1941年9月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的。這次會議號召“開展全黨范圍的意識形態革命”和清除“在我黨歷史上曾經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動”。[[101]](#_101_Huai_Li____Mao_Ze_Dong_Zhu)遺憾的是，這次非常重要的會議的文件現在還看不到，而且關于這次會議也知之甚少。

整風運動從未正式宣告結束，但到1944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標顯然已經達到，而且它也不再作為主要任務要求黨員留出時間和精力了。整風運動自始至終是黨內活動，限于黨員，沒有一個黨員能無視毛在1942年春夏期間發表的演說與講話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威力。在陜甘寧，沒有一個黨員能躲避無休止的小組會，在小組會上，整風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為自己的思想。就全黨來說，這在紀律方面和建立一致意見方面是一次艱苦的鍛煉。

在戰爭最初幾年黨的迅速擴大使成員極為不純，其中大部分缺乏組織經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陌生，更不要說對發展中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了。知識分子、學生、目不識丁的農民、頑強的長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入了擴展中的黨的隊伍。來自上海和北平的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男女和農民們組織在一起。這些農民從未到過比離家最近的集鎮更遠的地方，而且他們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來人。很多不合格的黨員、機會主義分子和間諜混進黨內并不是什么秘密。毛的兩個最近的對手——張國燾和王明——在中級干部中還有同情者。從毛的立場來看，如果黨要成功地迎接面臨的挑戰并為前途的不確定性作好準備，這些人必須被凈化、融合和經受磨煉。

毛自己的學說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證明是正確的并得到它的支持，這種學說將指引前進的道路。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于中國的具體現實”。[[102]](#_102_Jian_Ben_Shu_Xuan_Dao_Hua_Z)得到陳伯達等理論家的指點，又得到劉少奇、周恩來和陳云等有經驗、有才能的同事的協助，毛澤東現在覺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識形態上，也可以要求在個人權力上支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了。

毛在1942年2月1日對黨校的演講中闡明了運動的主旨。在對黨的基本良好狀況做了例行的贊揚后，他指出黨存在的三個主要缺點，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他在報告的后面部分對此三點加以詳述。[[103]](#_103___Mao_Ze_Dong_Ji____Di_4Jua)毛賦予這幾個聽起來模糊的術語以生動的、現實的意義，這些絕不是容易概括的。主觀主義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本知識視為護身符或靈丹妙藥，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人。這些半瓶子醋的知識分子像研究烹飪配方卻從未做過一個菜的廚師，或者那些“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放出去”的人。反之：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么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你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處呢”？[[104]](#_104___Mao_Ze_Dong_Ji____Di_8Jua)

但是，如果說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評是針對行為像舊時達官貴人那樣的教條主義的知識分子，那么主觀主義還有一個對立面：經驗主義。這是一種孤立地按照事物自身的條件去觀察每一種情況，只相信他自己的經驗，不要思想指導的傾向。經驗主義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狹窄的農民干部身上見到。基于這兩種現象，毛號召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

宗派主義幾乎同樣嚴重。在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責宗派主義者（只點了已被開除出黨的張國燾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記了集中制——現在明顯地由毛及其追隨者掌握的黨中央的最高權威。宗派主義還有種種看來很無聊的圈子，影響著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老干部與新干部，黨員與黨外人士之間的關系。有時個別單位或地方組織把他們自身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別人要調他所屬的干部不給，或以壞的送人，‘以鄰為壑’，全不為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這樣的人就叫做本位主義者，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105]](#_10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雖然這些問題聽起來很平常，但都既嚴重而又棘手。它們的影響可能有所好轉，但是卻從未完全清除。

毛進而轉向“黨八股”這一主題，專門發表一次講話談論這個主題。[[106]](#_106___Fan_Dui_Dang_Ba_Gu_____19)八股喚起毛的聽眾對那種結構嚴密的八股文的回憶。這種文體曾經是舊王朝文官科舉制度的核心。雖然他最直接地根據許多黨員試圖與群眾交往的做法（表現于著作、宣傳、指示等之中）談論八股，但他明顯地指出這種成規包括教條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全部表現：“如果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予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毛再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農民的語言，描繪出——或許是有意譏諷——八股形式主義的八種表現方式。它是空話連篇，令人生厭，“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應該“趕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它又是裝腔作勢，無的放矢，語言無味，陳詞濫調；更壞的是，它造出一種權威的假象，借以嚇唬讀者和聽眾。它用了許多外國的詞語和結構，對普通人來說沒有什么意義，卻似乎很有知識。它經常陷于不負責任和悲觀主義，給人民、抗戰和革命造成損失。毛斷言，沒有人會理解和傾聽用八股形式講話的黨，更沒有人會追隨或參加這個黨。

作家、知識分子、以前的學生及受過教育的干部一般說來顯然是毛指責的主要對象。當然，在陜甘寧根據地他們人數比在其他根據地更多，其中許多人正變得難以控制和不滿。毛在黨校講演和中央關于干部教育的指示發表后才幾個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在《解放日報》[[107]](#_107_Mo_Er__Ge_De_Man____Gong_Ch)上接二連三地發表了抨擊時弊的文章。著名女作家丁玲較為一般地批評了黨在男女平等問題上以及崇高理想與卑鄙行為之間的差距上所采取的妥協態度。其他如艾青和蕭軍也參加進來。也許最辛辣的批評是一篇題名為《野百合花》的文章。作者王實味是一個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諷刺性的雜文，這種文體因魯迅而著稱。盡管這些批評者沒有一個對黨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問，但他們認為藝術有一個脫離政治的存在，此外他們還生動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陰暗面。他們通過暗示，堅持個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批評家的作用，恰如他們戰前在國民黨統治區曾經做過的那樣——這種做法當時曾得到黨的贊許。

然而，那些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經受到贊賞的做法，10年后在延安成為不可接受的了。這些知識分子肯定已感覺到他們是在冒險，但是他們幾乎不可能料到黨的反應有多么嚴厲。他們都受到嚴厲批判并被迫公開認錯，盡管大部分人最后又恢復名譽。與大多數人相比王實味不那么知名，但更具腐蝕性，在群眾大會上他被反復批斗，侮辱，監禁，并于1947年被秘密處決。

如果毛的二月講演和黨的其他指示未能恰當地教育知識分子，毛準備走得更遠。1942年5月，毛在長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采取了這些步驟。他在這一報告中明確細致地規定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知識分子的作用。這篇講話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權威性，而且在他死后還繼續產生影響。簡而言之，《講話》否定思想脫離社會階級的獨立和自主。人只能從階級觀點說話或寫作；知識分子認為他們能站在某種客觀中立的立場上是完全錯誤的。既然如此，藝術就是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于是問題就變成它將代表哪個階級。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因為否則他們就是為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階級服務，甚至他們否認他們在這樣做也不行。其結果是，文學和藝術的最終仲裁人和指導者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因為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集中意志的體現。

關于知識分子，毛就這樣改變了形勢：他們現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獨立的批判者。只要知識分子愿意扮演中共所規定的革命的勤務員的角色，他們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歡迎的。他們的創造力和他們的技能并沒有被否定，但這些才能只能在黨所設置的限度內加以估價。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文學和藝術的主要模式，被賦予自然主義的中國形式，這種形式能馬上為群眾所理解，并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表達，而不是用上海沙龍的語言。這意味著知識分子必須到農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們的語言，并體驗他們艱難的真實生活。總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號召黨的知識分子和黨員進行改造。

到1942年4月，中央委員會已經公布了22個文件，作為干部學習和考核的基礎。[[108]](#_108_Jian_Kang_Pu_Dun____Mao_Ze)用來教導他們的手段包括現在為大家所熟悉的小組學習和斗爭會，通常包括“批評與自我批評”。[[109]](#_109_Zheng_Feng_Wen_Xian_Zhong)與同輩的壓力相結合的直率的教誨、自我檢查以及強制性的勸說都企圖造成程度越來越高的精神緊張，直到思想得到凈化和皈依。毛將這個過程比喻為治病：“說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們治療。全部的目的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對付敵人是必要的，但不應用來對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當然不是在整風運動中突然出現的。他本人的愛好權力的天性、他在建立一個有影響的并起作用的聯合體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效，是他在長征后的幾年中逐漸上升到不受挑戰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見前《與國民黨的“摩擦”》），蔣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用。隨著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蔣頃刻間成為具有世界聲望的領袖和中國抗日的象征。到1943年晚些時候，蔣在開羅會議上被公認為四巨頭之一，而前幾個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的發表則是他試圖成為國內唯一領袖的大膽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了這種要求。[[110]](#_110_Mao_Ze_Dong_He_Ta_De_Zhi_Ch)露骨地說，如果有對蔣的崇拜，必然也有對毛的崇拜；一個無名的“黨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組織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共產黨控制地區的政權是通過各級黨、政、軍以及群眾組織的互相連鎖的機構行使的。這些機構在陜甘寧比在敵后根據地發展得更好，而且它們上面就是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機關。這些組織比舊王朝或民國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們征集——或要求——老百姓的眾多成分廣泛參與的特定意義而言，而不是就被統治者選舉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或決定政策而言，它們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眾支持的現實，與黨本身設置的標準以及它試圖表現的公眾形象有相當的差距。丁玲和王實味等知識分子敢于以黨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開暴露的正是這樣的一些缺點。然而，在黨的機密材料中，黨的各級領導人也坦白承認類似的障礙。

問題之一是不斷滋長的官僚主義和蔓延的墨守成規。這種迅速擴張的幾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不僅表現在管理陜甘寧邊區本身，而且還表現于指導遠離延安的各個根據地的越來越廣泛的戰爭活動。許多干部是“脫產的”，這對面臨經濟困難的落后地區老百姓說來，是一種沉重的負擔。[[111]](#_111_Zhi_Ke_Neng_Cu_Lue_Gu_Ji)

問題之二是政治結構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級，通常停留在上一級的鄉，鄉管轄不定數量的村。黨中央對縣與鄉之間的行政“距離”也很關注。[[112]](#_112_Cun_Ji_De_Gui_Bi_Xing_Wei_Z)此外每一級活動的協調也因強調等級制而受阻礙。盡管主要組織機構有相互連鎖的性質，但每個機構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揮系統，它主要對該系統負責。[[113]](#_113_Zhe_Wei_Xu_Gou_De_Zhu_Ren_G)同一級的不同部門相互之間在工作上經常產生困難。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黨與軍隊之間，八路軍干部經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干部。如果1942年4月發表的一份調查有典型意義的話，士氣低落也是個問題：在中央財政廳，被調查的黨員中有61%說他們自己對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114]](#_114___Jie_Fang_Ri_Bao_____1942N)

為克服這些困難，實施了兩項緊密相關的新政策，它們都明白無誤地帶有毛澤東的印記。這兩項新政策均于1941年12月整風運動前幾個月開始。第一項稱為“精兵簡政”，旨在減少政府和軍隊中的官僚主義。第二項是“下鄉”，即要干部更加深入農村，部分地是把許多從上層精簡下來的干部下放。這兩項政策結合在一起，把許多政治和經濟任務分散下去，從而為垂直的指揮機構與每一級的橫向協調之間提供較好的平衡。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政府和軍隊的干部被命令回到生產中去；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意味著從事農業、墾荒或原始工業。特別要下放到基層去的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既可在農民中經受艱苦條件的磨煉變得堅韌起來（一項矯正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措施），也可貢獻他們當地所急需的聰明才智以指導農村事務。

這些工作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冬被積極地推動，時間安排與農閑季節一致。軍隊被命令以中世紀“屯田”制的現代形式盡可能多地生產出自己的口糧和其他給養。位于延安東南約30英里處的南泥灣是實施這一計劃的模范。八路軍的第359旅被指派在這里專門從事農業和基本工業的生產達數年之久。到1943年，該旅聲稱所需之物的80%左右已能自給。甚至煙癮極大的毛澤東也在延安他住的窯洞外面象征性地開辟了一小塊土地種植煙葉。

雖然沒有過硬的證據，但這些政策無疑收到了某些實效，特別在組織和動員方面。“然而并未報導總的成績，而是強調像南泥灣計劃那樣的示范性成就，并且（反復）宣傳 ‘精兵簡政’政策……也暗示了進展或許并非那么顯著。” 1943年初，在第三輪“簡政”期間，一位高級領導人承認，專職干部的數量已由1941年的7900人增加到8200人。[[115]](#_115_Yin_Zi_Shi_Lan____You_Ji_Ji)

考慮到陜甘寧這些改革的總的基調以及強調“群眾路線”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令人驚訝的是群眾組織本身似乎并未起重要作用。我們手頭只有1938年陜甘寧這些組織的資料，據說當時人口的30%（140萬人中的421000人）參加了農民協會；與此同時，大約25%的婦女和32%的男子分別是婦女組織成員和兼職民兵。“人們懷疑這些組織大部分徒有虛名，他們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黨所接替……在活動頻繁時期（像1942年減租運動）之間，它們的成員和組織大量存在于紙面上。”[[116]](#_116_Xie_Er_Deng____Ge_Ming_Zhon)

統一戰線 與國民黨日趨惡化的關系及受日本強化治安的打擊，使黨更注意統一戰線的工作，而不是更少。自1940年中期起，中共首腦機關一再發布秘密指示，強調對待“友軍”、對待除最親日或最反共的組織以外的一切組織以及對待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統一戰線工作部是在1937年在中央委員會之下成立的，在下級組織中也同時成立。這項工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實看出：從1939年末（當時王明被調離）直到1945年或1946年，周恩來的主要職務是中央統戰部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敵占區工作部部長。他確認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領導下這被嚴重地忽略了，因此他反復號召要積極發展和恢復各級統戰部。[[117]](#_117_Jian_Fan_Si_Lai_Ke____Di_Yu)

由此可見，統一戰線并非只是一項戰術措施，而是處于弱小和危機時期的一種具有特殊價值的總戰略的一部分。從地方事務到國家政策的每一個具體問題都可以分析為有三個組成部分：黨及其堅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數的中間階層，以及“死硬”的敵人。目標是通過贏得盡可能多的中間分子的支持或保持中立來孤立“死硬”派。然后孤立之敵就可能被各個擊破。早在1939年10月，毛就斷言：“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118]](#_118_Mao_Ze_Dong_____Gong_Chan_D)然而這項戰略的運用則是戰術性的和極為靈活的，目標是經過仔細限定的團體或組織。正是因為統一戰線是為革命的長遠目標服務的，它避免了意識形態上的公式化，在各種情況下試圖發現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動黨的事業的人物、問題、誘因或壓力：

過去，通常的做法是進行政治性的交往；極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達到冷淡不愿意與人合作的程度。今后，我們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社會關系（家庭、同鄉、同學、同事等等）和社會習俗（送禮、過節、分擔困難、互助等），不僅與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關系，而且要與他們成為私人朋友，這樣，他們才能對我們完全坦誠相待，說心里話。[[119]](#_119_Yin_Zi_Zhong_Yang_Tong_Zhan)

按照這種精神，1940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據這個方案，政權的民眾機關——但不是黨或軍隊——如有可能，都應由1/3共產黨，1/3非黨的左翼進步人士和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組成。如毛所解釋的那樣：

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為他們聯系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我們這樣做，對于爭取小資產階級將有很大的影響。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120]](#_120___Kang_Ri_Gen_Ju_Di_De_Zhen)

因此，這項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據地政權更能被農村人口中的上層人士所接受，但它也表明共產黨并未放棄領導。在實踐中，這一代表制的變化是很大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員數目的分配是一種大體上的規定，各地須依當地實際情況施行，不要機械地湊足數目字”。

在陜甘寧，1941年后黨員在民眾機關中的比例一直相當好地遵守為中共黨員規定的1/3的指標。在少數情況下，當選的黨員從代表大會的席位上退出——加以公開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邊區領導覺得這項政策相當有助于減輕由于大量增稅受到沉重打擊的中上層農民的恐懼并贏得他們的支持——盡管較為貧苦的農民擔憂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紳會逐漸恢復他們的權勢。他們的政治命運的這種部分真實、部分象征性的改善與其產品增長的份額結合在一起，使這些社會階層規規矩矩——特別是因為他們幾乎別無選擇。

那時把1940年至1944年間陜甘寧在經濟上、意識形態上以及組織上/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還沒有完全達到中共試圖在群眾中樹立的形象，也沒有達到外界觀察家有時所做的評價。然而他們的效率卻是令人難忘的，特別在與同一時期國民黨政權的作為相比時，更是如此。

### 敵后根據地的新政策

在戰爭中期，華北和華中敵后根據地面臨的危機不僅更加嚴重，而且與陜甘寧有所不同。例如，陜甘寧不必應付軍事進攻，也沒有被迫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陜甘寧的行政機構比其他根據地更健全，并且戰前社會經濟的變化已經大有進展。因為中共控制的敵后地區很不相同，而有關資料又很零散，想在這有限的篇幅里，一個根據地一個根據地論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限于相當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個或幾個根據地的例子對它們加以說明。如果讓它們看起來比較一致而不是實際情況，那就會歪曲復雜的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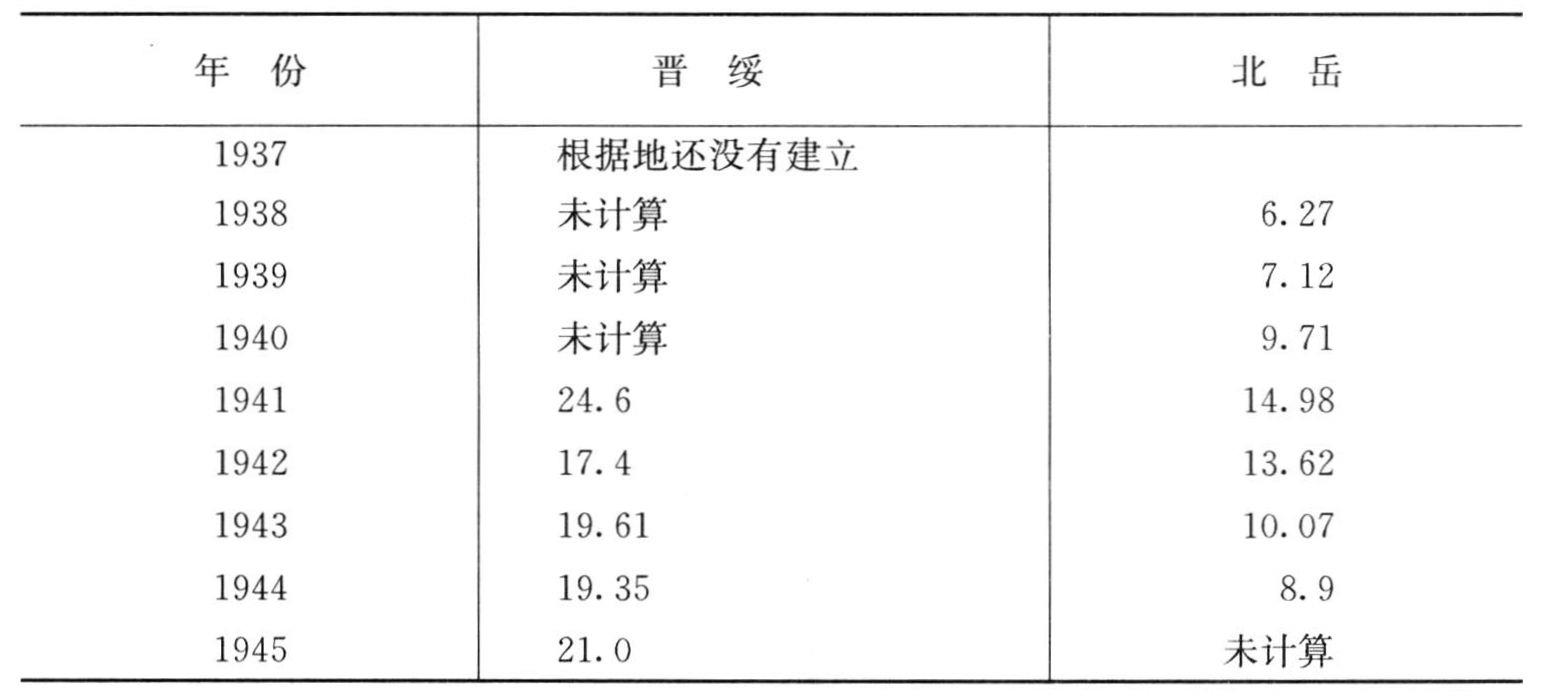
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所有根據地機關都采取廣泛的主動和被動的防御措施。村民、存糧、牲畜及其他財產撤到安全地區或隱蔽起來。有價值的東西被埋藏起來。軍隊在埋下簡易的地雷和設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與農民融為一體，盡管當日軍試圖殺害所有落入他們手中的人，或者當他們可能被漢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懷不滿的當地士紳認出時，這是缺乏保障的。

許多根據地，尤其是華北平原上的根據地，差不多都轉入地下工作，進入那令人驚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網絡，這種網絡通常有兩層或多層，把許多村莊連接在一起。它們有多個隱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擊點，使日軍追蹤者屢屢受挫。當日軍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氣來對付時，中國人用岔道和簡單的空氣閘來應付。

幸存下來所依靠的是黨和軍隊有組織的領導和農民的不屈不撓精神。但是在根據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動不得不降到游擊狀態的地方，能使他們受到掩護的其他根據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來的人，不論是干部還是普通農民，都受到鼓勵要做到“白皮紅心”，即在別無選擇時要默認。盡管中國農民用機智與勇敢去迎接這些挑戰，但大部分由黨領導的機關和主力部隊從特定地點撤離，有時使地方自衛力量的負擔過于沉重。間或當他們潰敗時，村子又恢復到由地方士紳控制，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與此同時，在比較安全的環境里，有組織的活動在繼續，因為逃亡者準備恢復他們的家鄉成為永久性基地。跨越華北和華中的根據地網絡，給共產黨領導的運動提供了中國其他力量所不具備的韌性和復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區能在這樣的條件下繼續追求他們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目標，實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們是很積極地去干的。盡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晉察冀和晉冀魯豫某些地區進行了十分廣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華中根據地進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區約兩年后進入持久戰。山東甚至更落后些。

表27 土地稅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李成瑞：《抗日戰爭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負擔》，《經濟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8—109頁。

從經濟上看，這些根據地從戰爭的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不像陜甘寧那樣突然，因為他們一直在困難的條件下工作，而且沒有任何外來的財政援助。但他們也有一段時期依靠捐獻——“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公債和某些征用。當政治控制和行政機器變得更有效時，轉為“合理負擔”，最后轉為統一的累進稅制。在晉察冀，合理負擔制是1939年采用的，1941年讓位給統一累進稅計劃。然而，事實上，幾種稅制齊頭并進，取決于該地區是鞏固的核心區，新建立的根據地，還是游擊區。其他敵后根據地沒有一個能采用統一的稅制。既然土地稅是歲入的主要來源，許多舊的附加稅不得不繼續作為一種補充，特別是在部分鞏固的地區或游擊區。在爭奪的地區，征稅不僅是困難的，而且受實際情況的限制，因為那里的農民承受雙重的負擔——日偽政權和共產黨人都向他們征稅。如果共產黨的資料是準確的，在晉綏根據地，土地稅負擔要比陜甘寧重得多；而在晉察冀的鞏固區北岳，則大體相同（1941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與陜甘寧一樣，稅在1941年達到高峰，此后緩慢下降。在鞏固地區每戶的負擔是其他地區的兩倍。

像陜甘寧一樣，敵后根據地通過發行自己的地區貨幣、建立銀行以及征收進出根據地的貿易稅以求達到經濟上自給。這些稅提高了一點歲入，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貿易：

如果沒有[來自陜甘寧的]相反的理由，區域自給是目標。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們得不到周圍農村出產的糧食和原料。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進貿易。根據地不得不盡量回到極端的生存經濟，以抵制敵人的意圖和積極干預。[[121]](#_121_Shi_Lan____You_Ji_Jing_Ji)

當然，這樣的政策在雙方爭奪的地區是難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陜甘寧那樣，合作社、簡單工業、手工業及其他生產活動都受到鼓勵，而且大部分免稅。

表28 晉察冀35個村的階級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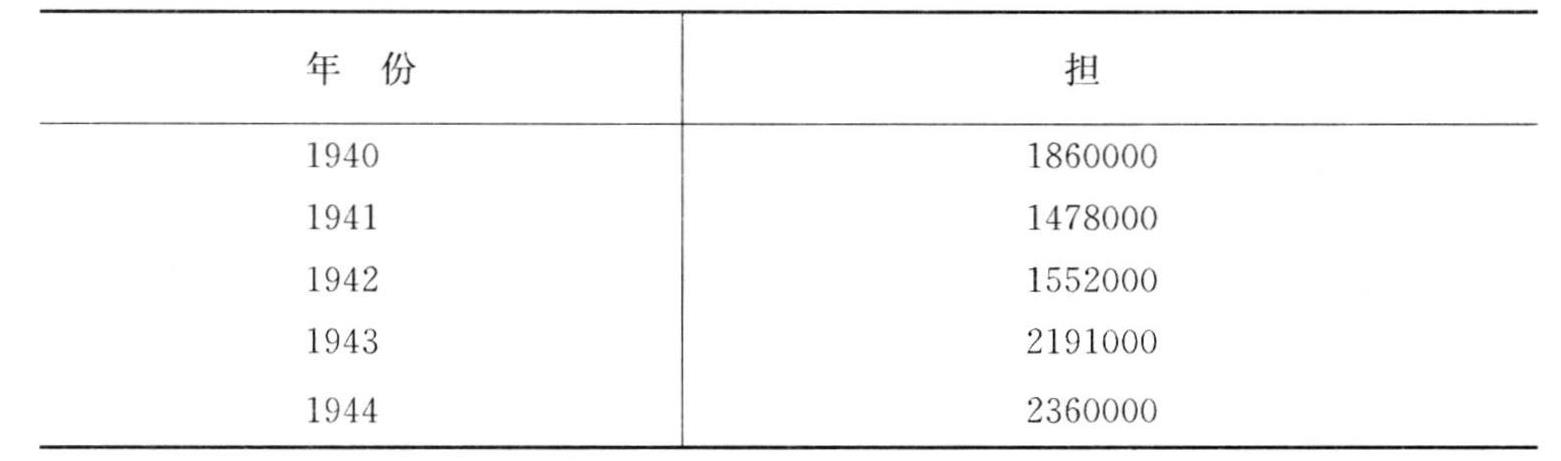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趙國俊：《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年》，第64頁。見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第169—228頁各處，據以計算晉察冀核心區域的不斷變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征稅還伴隨著減租減息。晉察冀再一次處于領先地位，但遲至1943年10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許多地區減租一直沒有實現”，并要求干部“組織農民實行地租不得超過主要收成的37.5%的規定”。[[122]](#_122_Zhao_Guo_Jun____Zhong_Guo_G)華中根據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據地（安徽北部），到1941年僅有9000佃戶受益。到1943年，運動加快了步伐，約有43000戶受到影響；次年因根據地擴大，這個數字可能翻了一番。[[123]](#_123_Chen_Yong_Fa____Ge_Ming_De)最后，在山東根據地，在1943—1944年間的冬天之前，認真的減租減息幾乎還沒有開始。因為租佃率不高，許多干部對這個政策的重要性產生了懷疑；有些人認為這是一件不討好的困難的工作，遠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擔心政治控制不穩定，害怕強硬路線會極大地疏遠仍有勢力的當地士紳。[[124]](#_124_Xue_Mu_Qiao____Kang_Ri_Zhan)

得到的證據證實了彭真的觀察。即根據地的財產關系在戰爭期間沒有結構性的變化。或許收入的不平等比財產所有權的不平等減少得更多。全部稅收制度沉重地壓在富人身上，而且實際執行時常超出規定，特別是合理負擔的稅收制度。如果這是先進根據地的情況，那么可能其他根據地變化更小，而不是更大。

大生產運動正像在陜甘寧那樣受到重視。雖然缺乏大量的資料，但在晉察冀的北岳地區，糧食生產從1940年的水平急劇下降。直到1943年和1944年才好轉（見表29）。[[125]](#_125_Cong_Li_Cheng_Rui____Kang_R)大生產運動也有政治動機。根據統一戰線和普通情理，不能全部沒收富人的財產，因而以犧牲富人為代價也不能無限期地給較貧苦的農民帶來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階級斗爭為基礎所達到的動員仍能通過由農民協會和換工隊經營的生產組織繼續下去。領導干部經常精確地使用這樣的言詞鼓勵生產運動，作為階級斗爭和民眾動員的高級形式。[[126]](#_126_Jian_Chen_Yong_Fa____Ge_Min)

表29 北岳地區的糧食產量



中共一方面努力擴大民眾的積極參與，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對新秩序的人。在公開聲明中，這些措施幾乎常被描繪成“民主的”，并且強調它們的溫和以及與“三民主義”一致。然而在秘密報告和指示中，這一詞匯經常被階級斗爭和結構變革的詞匯所取代。兩種水準的論述涉及同一現象。盡管前者在宣傳上有嚴重的混淆，但黨并不認為兩者是矛盾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民主”定義（如果別人曲解這一詞語，那是他們自己的事），還因為在這一時期他們政策的明確內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為目的。他們的目標是“優勢”，而不是“專政”。

透過不同地區和根據地在各種層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無數細節，某些模式可以識別出來；自上而下加以軍事和政治控制，對現有行政機關必需的人員進行調查和更換，黨的干部進一步滲入該機關并隨后進行機構和程序上的變革。隨著接管政治機器，配備了軍事組織（正規軍，地方部隊，自衛團或民兵）和群眾組織，尤其是農民協會，地主和大部分富農被排除在農協之外。

當這些發展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以后，而不是以前，對數量有限的縣以下的行政職位和代表大會代表進行直接選舉。上一級代表大會代表——在他們所在地——由下一級代表大會間接選舉。雖然代表大會名義上監督同級行政委員會，但后者明顯握有實權，代表大會很少開會，像個共鳴器，批準擬議中的或業已實行的事項。盡管偶爾有不正規的事情，但黨真正按程序進行選舉。不過候選人的名單事先經過仔細篩選，而且幾乎沒有什么席位可供競爭。作為替代，選舉運動被用來教育當地民眾，并讓他們投入這一政治過程：受指導的參與是根據地民主的特點。選舉運動于1939年在晉察冀開始，但全邊區代表大會直到1943年才召開——這也是戰爭期間唯一的一次。晉冀魯豫的分區選舉開始稍晚。在華中和山東的根據地，地方選舉開始得相當遲，到1942年才進行。除陜甘寧和晉察冀外，其他根據地都沒有選舉過全根據地范圍的代表大會。

像在陜甘寧那樣，盡管貧農心存疑慮，作為重新重視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在根據地都實行了“三三制”。像統一戰線作為一個整體那樣，三三制絕不意味著損害黨的控制和領導，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據地，執行三三制不如在陜甘寧那樣徹底。在五臺區（晉察冀的一部分）的13個縣中，1941年選舉結果，共產黨員得到席位在34%到75%之間。遲至1944年，江蘇一個區報稱黨員當選者占60%—80%，而沒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樣，三三制“不能成為成文的規定，因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語言固定下來是與真正平等的原則和普選權的原則直接相對立的”，但他也注意到“當我們提出并執行三三制，并且嚴格保證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權力時，最后地主也會出來支持并參加抗日政權”。一份國民黨情報機關的機密報告（1944年4月）證實了中共的統一戰線往往很有效，“過去對中共不滿的士紳……也滿天贊譽，覺得 [中共]政府畢竟并不太壞，它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且要求批評……中央政府與他們差得太遠了”。[[127]](#_127_Zhe_Duan_De_Shu_Ju_He_Yin_W)

雖然當地的一些積極分子是自發地站出來的，但從出身好的農村居民中補充優秀村級領導卻有困難。有些站出來的人不適合，或是后來發現不能勝任或品行不端。少數值得注意的人是國民黨特務、漢奸或受當地士紳操縱的人。農民的消極態度是根深蒂固的：狹隘的保守主義，屈從和宿命論，缺乏自信心，不愿與官員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擔心會招致鄰人的嫉妒或不滿。此外，貧苦農民通常是文盲，也沒有經歷過比家務更大的事，況且他們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討好的公務。使上級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黨員也表現出許多這樣的看法。地方干部經常用農民自己豐富而直率的語言匯報這些態度。因此，必須把這些形象與為保衛自己的村莊和國家而戰，為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會而工作的富有貢獻精神和戰斗精神的較為大眾熟悉的農民的形象放在一起。農村中國是個各種態度、利益及社會集團的萬花筒，對此簡單的描述是不會公正的。

“精兵簡政”和“到農村去”等組織性措施在某些根據地得到實施，但在另一些根據地卻幾乎沒有提到。毫不奇怪，晉察冀在1942 和1943年推行了這些政策，包括對邊區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簡。但在大部分根據地，延安意識到的官僚主義似乎沒有被看成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確實，經常抱怨缺少行政人員（命令主義、瞎指揮受到普遍的責難）。因為黨已經絕大部分在農村，“到農村去”并無多大意義。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對軍事任務應接不暇，很少有機會像陜甘寧衛戍部隊那樣參加生產，盡管他們一有可能就去幫助生產。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據地與陜甘寧很不一樣：在意識形態方面較為簡單，更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務，如舉行地方選舉，實行減租，組織生產或擴軍和軍訓。在這些根據地，黨的干部很少有時間或有教育背景去學習文件，或長時間討論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結果是，整風比陜甘寧提得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對普通黨員來說，整風主要是指增強支部的戰斗力，克服消極態度，工作正規化以及經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務。黨的基本學說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簡化的形式表達，有時像容易記住的對話或格言。直接的灌輸和斗爭會比“批評—自我批評”采用得更多。黨性表現好壞的典型被樹立起來，供仿效或譴責。一有機會就召開會議。訓練和其他運動安排得與季節活動一致：減租減息運動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獲季節，選舉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舉行，征兵在幾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時期最好辦。

對于受過教育較多的干部，標準要高一些。他們通常是在區級或地區級工作的“外來”干部。特別是劉少奇，他試圖通過華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風移植到他管轄的根據地去。為學習指定了同樣的全部文件，并召開批評—自我批評會。然而在1942年，劉少奇的整風措施“只是在地區黨的領導機關的嚴密監督下，在軍隊和其他組織的高級干部中產生了影響”。[[128]](#_128_Chen_Yong_Fa____Ge_Ming_De)

戰爭中期，中國共產黨經受了巨大的壓力。然而，在1927年和1934—1935年共產主義運動僅免于難的地方，戰爭中期的危機并沒有威脅到黨的生存。到1940年，在戰時條件下，共產主義運動已擁有充分的地域和民眾的支持以經受任何風暴。可是像國民黨的游擊戰的經歷所表明的那樣，這種結果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眾支持的基礎被有組織的控制和有步驟的改革所增強和提高，它既是真誠的，也是不完全的。黨的指令必須不斷地重申和擴充。黨不得不調動它的全部智謀和經驗，現實地面對困難，承認自己的缺點，而首要任務是堅持下去。

## Ⅲ戰爭的最后兩年，1944—1945年

在戰爭的第五周年（1942年9月7日）[原文如此]，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的社論中寫道：“抗戰形勢，實處于爭取勝利的最后階段。”盡管他描繪現階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預見到前面的“極端的困難”，但他認為可以在兩年內打敗日本。[[129]](#_129___Yi_Ge_Ji_Qi_Zhong_Yao_De)

毛的預言過于樂觀，但有跡象表明形勢正轉向不利于軸心國。在俄國人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這是德國東線進攻的頂點——之后，緊接著就是盟國侵襲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戰役（5月）和中途島戰役（7日）清楚地預示美國將掌握制海權。8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所羅門群島登陸，對日本發動進攻。

1942年晚些時候，在中國戰區，尤其是在共產黨控制的根據地，勝利的先兆還很渺茫。但過了一年，當1943年慢慢逝去后，風無疑變得更暖。甚至在東京的日本最高統帥部——雖然中共很難了解到這一點——也開始籌劃如何避免失敗，而不是如何取勝。但共產黨所能看到的是強化治安活動下降，以及日軍從偏遠鄉村撤退增多。像戰爭初期那樣的偶然的快速掃蕩取代了并延長了1941—1942年的清鄉戰。

## 一號作戰及其后果

事實上，從1937年至1938年起，日本人一直在為他們在中國的最大軍事進攻做準備。[[130]](#_130_Yi_Hao_Zuo_Zhan_De_Gai_Yao)自1941年以來，這一戰役即以某種狀態受阻于繪圖板上。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條起自朝鮮直達河內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條替代海上航道的陸上通路，因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運往本島的日本船只實際上已被掃清。第二個目的是摧毀中國東南部的美國空軍基地。

一號作戰計劃始于1944年4月的鄭州戰役和洛陽戰役，然后沿平漢鐵路穿過河南向南推進。因為日本人試圖掃清武漢至廣東間的鐵路線，夏季在長江以南的湖南爆發了最為激烈的戰斗。長沙于6月陷落，衡陽于8月陷落。到初冬，已實現南北連接，但日本先頭部隊轉而西進，攻占桂林、柳州和南寧的機場。西北方向是貴陽，有公路通往重慶。形勢如此嚴峻，美國和英國的文官于12月從戰時首都疏散，失敗或投降的災難性預言猖獗一時。然而事實上，日軍先頭部隊已消耗殆盡，無力繼續前進了。

與國民黨所遭受的破壞相比，日本的損失是微不足道的。重慶當局承認傷亡30萬人。日軍奉命首先消滅國民黨中央軍最精銳的部隊，他們知道地方部隊將隨之瓦解。后勤的損失也同樣嚴重：估計40個師的裝備以及新淪陷區特別是“魚米之鄉”湖南的資源。

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并向他們射擊，然后歡迎日軍。1944年春，河南有數萬人餓死。[[131]](#_131_Bai_Xiu_De_He_Jia_An_Nuo)雖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軍緬甸戰役的勝利高潮，并重新開通了進入中國西南的陸上通道，但這些在美國戰術指揮及美軍和英軍參與下取得的勝利不足以彌補國民黨在其他戰場上的損失，也不足以挽回他們受到損害的聲譽。

一號作戰的嚴峻局面及美國對中國政治的詳細考察為共產黨在大后方——在某種程度上由重慶國民黨政府控制的地區——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會。到1938年末漢口陷落時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圍的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自由。此后，國民黨的審查和鎮壓迫使中共除官方批準的聯絡小組和新聞記者外，再次轉入地下。當然，中共一直試圖滲入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和軍隊單位，雙方打的秘密戰都很成功。但境況一直極為危險，以至來自延安的指示是潛伏，保持或改進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環境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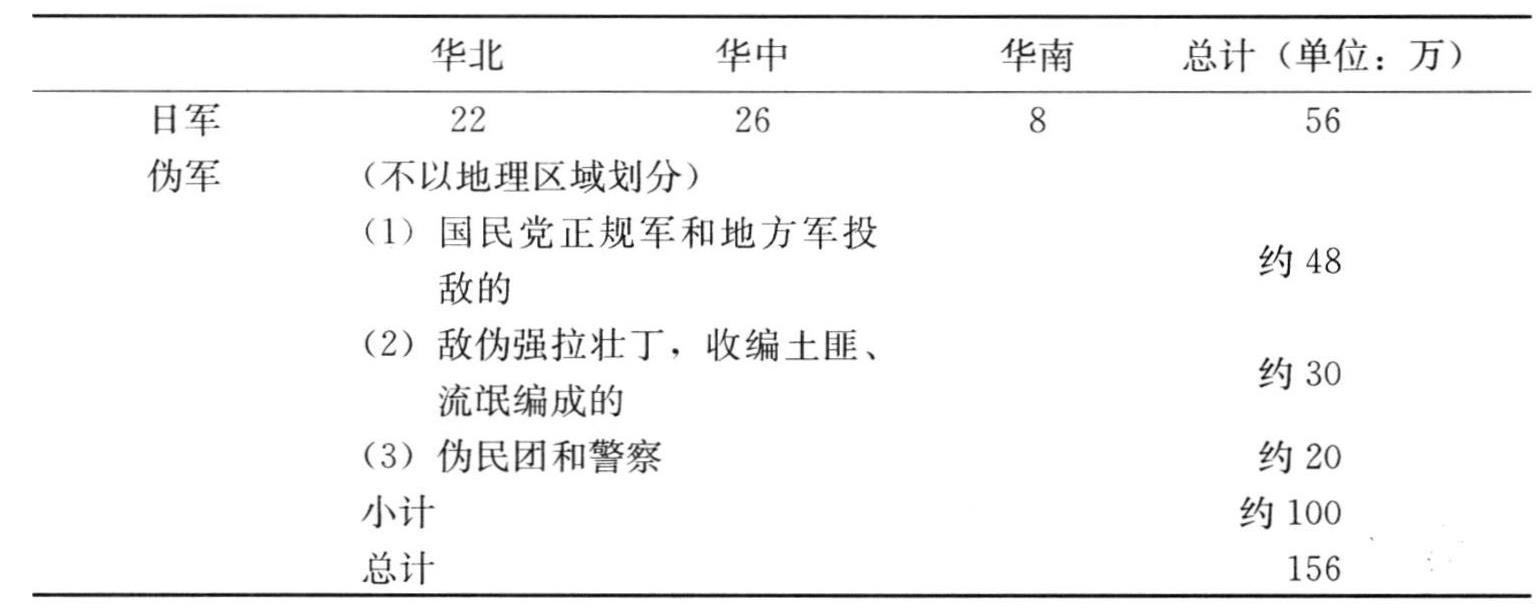
當一號作戰推進到南方和西南時，持異議的地方人士開始暗中議論除掉蔣介石的可能性。獨立的軍閥龍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周圍的自由知識分子和不滿的政治人物的避難所。昆明也是滇緬公路和從印度“飛越駝峰”的空中運輸線中國一方的終點。1944年9月，當一號作戰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機和反國民黨的不同政見匯集成一股旋流時，有幾個小黨和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小團體聯合組成了中國民主同盟[[132]](#_132_Ying_Wei_Min_Zhu_Zheng_Tuan)。[[133]](#_133_Guan_Yu_Chi_Bu_Tong_Zheng_J)隨著1941年初新四軍事變發生，這些人士試圖起緩和和調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仰自由的價值觀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革。雖然民主同盟缺乏群眾基礎，也不是統一的運動，但同盟的知識分子——其中許多人受過西方教育——對受過教育者的輿論和外國觀察家有影響，盡管他們的人數有限。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民主同盟的成員，他們似乎是為所有正義事業——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擴大參政范圍——發言，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相信這些事業。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樂于讓民盟以自己的聲音講話（雖然它在民盟中確有工作人員）。如果國民黨實行改革或做出讓步，真正的受益者將是中共，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國民黨人拒絕與民盟合作或對它進行反擊，他們就進一步為自己招致反動的惡名，并把更多的溫和派驅向中共一邊。無論是民主同盟作為“第三種力量”的想法，還是某種反蔣政變的密談，都沒有產生任何結果。但是二者都以蔣介石和國民黨受到損害，為中共改善形象提供了新的機會。

## 政治和軍事的發展

日軍對一號作戰河南階段投入了近15萬人，對湖南—廣西階段投入了近35萬人以上。盡管華北和華中日軍總數沒有顯著下降，但是應一號作戰第二階段的需要，從這些戰區抽調了許多有經驗的軍官和士兵，而用守備隊或來自本島的新兵頂替他們。日軍也增加了對偽軍的信賴，抓緊了某些軍事上松弛的環節。據延安的參謀長葉劍英提供的資料，1944年6月的情況如表30所示。

表30 在華日軍和偽軍，1944年6月



資料來源：葉劍英《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卷，第226—228、233頁。這是1944年6月22日向首批訪問延安的中外記者團介紹的情況。

表31（參見表18） 中國共產黨的兵力，1944—1945年



\* 假定和1944年6月的比例一樣。  
資料來源：這是一個合成的表。1944年6月的數字取自葉劍英：《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1944年10月和1945年3月的數字是《解放日報》（1945年3月17日）刊載的數字。1945年4月的數字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的數字。

在共產黨方面，黨和軍隊重新開始發展，但在戰爭最后階段，黨的發展形式不同于軍隊。大約從1943年中期到1945年中期戰爭結束，黨再次擴大，只是比戰爭頭幾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16），從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中共發展了約10萬人（約15%）。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時（1945年4月），毛宣布有黨員120萬，比一年前增加40%，比1942年的低數字高出60%以上。因此，到戰爭結束時，有近半數黨員黨齡不足兩年。

與黨的持續發展相比，軍隊的規模有好幾年幾乎保持不變，征兵數只稍多于足夠補充傷亡。1944年下半年情況突然發生變化。在不到一年里，共產黨當局宣布，他們的正規軍（野戰軍加地方部隊）實際增長了一倍。

這一迅速發展，部分地是對1944年和1945年地區有機會擴大所做出的反映，也是由于預感到日本的失敗以及屆時軍隊的重要，它既是執行政策的工具（接管日本占領區或與國民黨人爭奪）。也是討價還價的籌碼（因為任何談判解決的條件都將反映現有的實力）。這種發展主要來自迅速將地方部隊編入野戰部隊；因此所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大量增加較多來自改編，較少來自招募新兵。在這些正規部隊之下是兼職民兵——華北大約有150萬，華中有50萬。民兵在保衛村莊、輔助執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報、短距離傳遞急件、運輸給養和擔擔架等任務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們的訓練是初步的。事實上沒有武器能發給他們。民兵不指望像正規戰斗部隊那樣執行任務，他們也很少這樣做。

葉劍英報告，從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作戰次數比前幾年急劇增加；與此同時，作戰規模較小，其中大部分對偽軍，而且傷亡比率愈來愈對中共有利。1943年年中到1944年年中期間，共產黨傷亡數為29000人，不及1941年年中到1942年年中期間的64000人的一半。[[134]](#_134___Zhong_Gong_Kang_Zhan_Yi_B)

戰爭頭幾個月出現過的爭論有些又重新出現了，有些軍事領導人主張加速擴張，并從傳統的游擊戰向較正規的作戰轉變。有些高層領導人顯然想立即攻打中、小城市。1944年春一號作戰進行之際，八路軍在河北對戰略要點石家莊鐵路樞紐進行了試探性的進攻，甚至短暫地占領了重要城市保定。也是在這個時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據地都恢復了活動。毛原則上同意前進戰略，并使黨處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戰敗的地位。1944年春，他極力主張他的同志們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著主要交通線開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勸告要審慎、靈活，并對黨的能力作出現實的估價：

我黨的力量還不夠強大，黨內還不夠統一，還不夠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為巨大的責任。今后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為著將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135]](#_13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毛還擔心他的野戰軍司令員們會魯莽從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戰略全局。有好幾次他申斥的正是這種“山頭主義”。他一定回想起未經批準的百團大戰和未能控制項英。

然而，沒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據地的地區和國民黨已被清除的地區退縮不前。在這些地區，僅有的問題是戰術方面的——用手中的資源能完成多少任務，敵偽的對抗可能達到何種程度。敏感得多的問題是在國民黨仍聲稱擁有主權的地區或在一號作戰中新喪失的地區開拓大塊新根據地。朱德、葉劍英和陳毅都表明他們對這樣的發展想得很多；他們顯然發現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最終，中共雖然進入某些上述地區，但做得很謹慎，有選擇，并采取低姿態。

在戰爭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對以前形成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進行改造，他們這樣做既是由于因勝利而產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對黨的影響和力量的局限性的現實的評價。在新的“解放區”，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發展浪潮中做過的那樣，他們做了為得到初步立足點所必須做的任何事情，然后再擴大影響。在已建立的根據地，重點既放在生產運動上，也放在階級斗爭上。最為經常的是，階級斗爭意味著進一步擴大減租減息。

在許多根據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區——減租減息并沒有徹底實現，或者鄉紳們試圖取消已經執行的改革。名為“查租減租”之類的運動在各級和各地區都可看到。許多詳細而生動的文件報導了令人震驚的惡劣行為。干部因為對群眾工作缺乏理解和興趣經常受到批評。推諉和腐敗是常事。農民的卷入常常是不規則的和勉強的。

人們應當如何理解這些報告呢？一方面，它們似乎來自鞏固的根據地，在那里作系統的調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這樣的地區，人們才會期望改革進行得最徹底和最有效。這或許暗示，在半鞏固地區或游擊區減租減息幾乎從來沒有完成過。但另一方面，這些報告是用來刺激運動，表明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及揭露錯誤——簡言之，是用來作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們接受了這些文件的說教性的意圖并懷疑其夸張，對這些文件的緊迫需要也表明了全面完成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黨的能力。而且經驗表明，強制執行較為激進的經濟政策不僅會降低生產，而且經常會嚇走和疏遠許多中農，盡管這些政策不是針對他們的。

雖然對在中國農村進行革命變革的承諾沒有減弱，但黨的領袖們認識到，不成熟的、計劃不周的嘗試是注定不能完成這一變革的，而抽象的說教也沒有多少說服力。“民族主義”和“階級斗爭”在它們能被那些對這樣的模糊概念缺乏經驗的農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須在日常的基礎上被賦予明確的、具體的意義。毛的謹慎與其說是缺乏信心，不如說是對黨及其軍事力量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現實評價。而到1944年，在中國已經擁擠的舞臺上，一個新演員——美國——正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人

當日本人襲擊珍珠港時（1941年12月7日），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融為一體了。經過1942年的大部分時間，美國對日本處于退卻或防守狀態，而對中國的抗戰幾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歐洲優先于亞洲，而不久前跨太平洋的越島作戰戰略優先于在亞洲大陸上擊敗日軍的努力。由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指揮的中國—緬甸—印度（中緬印）戰區成為戰爭的一潭死水，其重要性主要在于牽制大量日軍，并作為盟軍空軍基地的所在地。與所有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承認以蔣介石為領袖和代表的國民黨政權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為了使蔣繼續作戰（他有時暗示——或威脅說——中國已經精疲力竭，可能無力堅持下去），并對對中國的微薄軍事援助在政治上給予補償，羅斯福總統力主中國應被承認為四大強國之一，并應廢除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不平等條約”。克服了英國的重重疑慮，這兩項工作于1943年完成。美國的長遠目標是幫助一個“團結、民主和友好”的中國成為戰后亞洲穩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動的逆流下面，是美國卷入的戰略輸入——即最終日本將主要敗于美國之手。蔣介石和毛澤東不久都看清了這一點。這兩位領袖誰都不想為純軍事的原因抗擊日軍，如果那樣做會削弱以后對付國內對手所需要的實力。盡管毛不可能以這樣的措辭來承認它，但他在1938年的論文《論新階段》中已經預言，“國際形勢有利于我們而不利于敵人”。

在戰爭初期和中期，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間的直接接觸極為有限。1937年至1942年初美國使館官員偶爾會晤武漢和重慶的中共聯絡組成員。美國參戰以后，這種會見較為經常，有時既有美國軍事官員，也有外交官員。雖然一再要求，國民黨人仍宣布外國人不得進入一切根據地。只有少數避難者如林邁可或克萊爾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對共產黨地區做過報道。最后，當亨利·華萊士副總統于1944年6月一號作戰期間訪華時，使館官員說服他迫使蔣介石同意他們訪問延安的要求。作為對顯已不耐煩的羅斯福總統的這位代表的讓步，蔣勉強批準組成美國觀察員小組赴延安。一個新聞代表團立即出發；8月官方小組到達并開始工作。至此，“迪克西使團”誕生了。[[136]](#_136_Di_Ke_Xi_Shi_Tuan_De_Zui_Zh)這個小組由富有色彩的“中國通”包瑞德陸軍上校率領，既包括軍事觀察員，也包括政治觀察員，如謝偉思和約翰·P.戴維斯等人。他們的報告和介紹后來在美國關于“丟失中國”的激烈辯論中引起極大爭議。實際上，所有搶發中國新聞的西方記者都撰寫有關“紅色中國”的電稿和專著。他們的經歷使人回想起1936年的埃德加·斯諾。現在，如那時一樣，共產黨似乎非常開放，樂于提供消息，并且關心把他們的情況擺在世界面前。

時機是重要的。在1944年和1945年，一號作戰以及蔣介石與史迪威將軍間的最后沖突——它導致史迪威被召回國——把國民黨的短處暴露無遺，而中共則恢復了活力。在較為困難的戰爭中期，當中共正在為生存而奮斗并進行整風時，執拗的國民黨曾阻止美國觀察家從共產黨人獲得第一手的情況。

對于毛和中共來說，美國是一張百搭牌。顯然，美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人承擔義務。但美國也對盡快戰勝日本及戰后建設一個統一、民主與和平的中國承擔義務。如果美國認為共產黨人是致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與國民黨在一號作戰中的表現形成可喜對比——他們或許能得到戰爭物資和財政援助。畢竟為了贏得對德國和日本的勝利，美國正在與最廣泛的盟國合作，不管他們聲稱的思想體系如何。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趁國民黨人1944年危難之際公開進攻他們，它不可能獲得美國的好感。

迪克西使團的成立是美國的有限承認，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抓住這個機會提供幫助（對被擊落的飛行員，對為盟軍在華北登陸作準備），并拓寬直接聯絡的渠道。完全承認和軍事援助是爭取的最高目標，但與美國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國與國民黨人之間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往的，只要不剝奪中共的自主和自治。不管這是不是主要動機，中共事實上在可能與國民黨人發生沖突地區采取了克制的態度，并在某些地區以謹慎的速度向前推進，這樣的軍事行動可以顯示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戰斗力。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國，這對中共是一個巨大的挫折，因為它表明蔣介石仍有力量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與此同時，人事的變化——魏德邁代替史迪威任戰區司令官，帕特里克·J.赫爾利任羅斯福的特別代表（后任大使）——似乎也不樂觀。[[137]](#_137_He_Er_Li_Xian_Ran_Zhi_Jie_S)共產黨很快對赫爾利作出評價，作為羅斯福的私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國說話的特別權威。赫爾利認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訴他，俄國人認為中共是假共產主義者，而且同意不干預中國國內政治。赫爾利確信，當中共認識到他們不能指望從蘇聯獲得幫助時，他們會愿意與國民黨和平相處。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蘇聯或美國的承認或支持，它將更不讓步。赫爾利還自信他能說服蔣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黨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作美國的共和黨——二者都是反對黨，都在尋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11月初，赫爾利對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訪問，這導致了共同起草五點建議。這項建議草案在語言上——部分靈感來自他對葛底斯堡演說的愛好——比中共過去接受過的任何東西都更概括。但是當赫爾利帶著他自己已簽字的這個文件回到重慶時，蔣介石拒絕考慮它。于是赫爾利實質上改變了他的立場，并且拒絕對他幫助起草的五點建議承擔責任。中共對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對赫爾利和美國的幻滅。

不管怎樣，中國兩黨的政治立場已經相當清楚了。簡言之，國民黨人堅持共產黨應將自己置于中國政府的行政和軍事權力之下，作為討論革新和改組的先決條件。既然國民黨就是中國政府，它不可能與中共進行比林肯與杰斐遜·戴維斯協商美國分治更進一步的平等協商。共產黨的立場是國民黨立場的鏡中映像：必須以令人滿意的政治和軍事改革作為參加重建的政府的先決條件。中共認為自己在政治上與國民黨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則優于國民黨，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區和武裝力量交給他人控制。號召建立“聯合政府”是1944 年9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后，直到抗戰結束后很久，聯合政府始終是中共的談判立場和宣傳運動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據地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時心里想著內戰一樣。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國和赫爾利前后矛盾的跡象，中共領導顯然放棄了被美國承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與國民黨相互平等的可能性。到1944年晚些時候，周恩來拒絕返回重慶——這清楚表明中共認為與國民黨談判是徒勞的。1945年1月，他對重慶的短暫訪問肯定了僵局已發展到比過去更嚴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個時候中共也沒有完全放棄從美國獲得軍事援助的希望。曾經反復討論美軍在華北登陸作為進攻九州（暫定于1945年10月）的一個步驟。共產黨人向魏德邁通報了山東半島南北沿海根據地的位置。從1944年10月到12月，關于美國和中共采取相當大規模的聯合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的零星討論接著發生——顯然赫爾利不知道。雙方用過分的語言交談。美國上校們暗示供應25000名以下游擊隊的全部裝備不成問題，毛曾一度表示訪問華盛頓的愿望，并愿讓美國軍官指揮其軍隊：“任何時候，不論是現在或將來，我們都樂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們的幫助。我們會在美國將軍的指揮下全力戰斗而不附帶任何限制條件……如果你們在中國沿海登陸，我們會在那里迎接你們，并置于你們的指揮之下。”[[138]](#_138_Yin_Yong_Yu_Zhan_Mu_Si__B_L)

當赫爾利聽到這些非正式會談后，他立即終止了這種會談，并要求全面調查。他覺得魏德邁的參謀部和他自己的使館人員破壞了他本人在政治解決方面所做的努力。到1945年2月，當赫爾利與魏德邁返回華盛頓參與與雅爾塔會議有關的磋商時，中共顯然已不再對美國的承認和支持抱任何希望。至少在當時，國共談判也停止了。

## 第七次代表大會

在組織方面，戰爭最后階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長期推遲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是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六大的黑暗年代以來首開這樣的盛會。如我們已注意到的那樣，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計劃早在1938年初即已就緒，但由于“戰時壓力”而無限期推遲，并以1938年晚些時候的六中全會代替。七中全會也是近六年后在七大前夕才召開的。在此期間，毛已建立他的聯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對手，而且發展了他那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指導核心的思想。最遲到1944年末，毛澤東已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而且是當前居絕對支配地位的中共領袖。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對這一頂峰存在疑慮，他們在公開場合也保持沉默。[[139]](#_139_Kan_Qi_Lai_Si_Hu_Shi__Yong)

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時機受國際和國內兩方面考慮的影響。從國際上說，歐洲和亞洲都迅速走向勝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確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戰略方針。就國內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會安排在與國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舉行，在每一點上都提出一種與國民黨不同的方案，并使重慶處于不利地位。一個競爭者的猛刺再度導致對手的回避和反擊。這次“團結和勝利的大會”——被稱頌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從1945年4月23日持續到6月11日，整整開了50天。大會的主要工作如下：

（1）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無可爭議的領袖，與此相應，確認“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分析和行動的指南。確實，這種精神籠罩著整個大會。這一點也明確地表現在幾天前的七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之中，雖然從這一決議放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1944年中期就已經起草了。這無異于是“毛主義的黨史新版本，它將成為官方的正統觀念……一個重要的過程——1935年前毛的正確路線的出現與斗爭，以及遵義會議以來它的最初勝利和逐步的輝煌的發展”。[[140]](#_140_Huai_Li____Mao_Ze_Dong_Zhu)這一歷史觀點還體現在新的黨章中，新黨章進一步宣稱：“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如果說這些肯定的說法還不夠的話，大會上還有許多留學生的自我批評，包括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和王明。

（2）分別由毛澤東和朱德作政治和軍事報告，權威性地確定黨的目前和未來的路線。毛的政治報告就是長而全面的《論聯合政府》（以后經大量校訂編入《毛澤東選集》）。這篇論文可以視為《新民主主義論》的繼續，因為它闡述了中共對中國目前形勢和未來前景的觀點，與國民黨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照。毛要求的聯合政府實質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政府。雖然基調是統一，但它是國民黨所不能接受的統一。確實，全國范圍的聯合政府的模式已經有了：“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毛還聲稱，履行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保證，“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141]](#_14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然而《論聯合政府》在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之間細心地劃了一條界限，并試圖保留盡可能多的選擇余地。在這一點上，毛為約一年來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辯護：承認與國民黨的競爭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軍事的，或者兩方面都有。然而，該報告貫穿始終的調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戰性的。毛并不排除談判和妥協，但這不是主調。

（3）在劉少奇的長篇報告后，通過新黨章。劉在報告中用過分的詞句頌揚毛——“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以致有人猜測他或許并非完全發自內心。這個黨章取代了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并沿用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會，意味深長的是，當時所有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都被刪去了）。必然會反映毛澤東的優先地位的1945年的黨章有好幾處不同于原先的黨章，[[142]](#_142_Zhe_Ge_Gai_Kuo_Yi_Ju_Kang_L)其中主要的是在全黨以及黨的頂層權力都更加集中。在頂層第一次設置了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中央委員會主席同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主席。新黨章還給農村地區更大的代表權，更強調黨內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蘇聯和國際革命運動。1945年的黨章與17年前的六大黨章有很大的區別，具有強烈的鄉土氣息。

（4）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44名正式委員和33名候補委員）和配備黨的高層工作人員。正因為極少出人意料之處，這幾處顯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15位，遠居周恩來之上（第23位）；毛的意識形態專家陳伯達在候補名單中未超過第三位。或許由于與毛的沖突，彭德懷名次低（第33位），遠低于他的軍職可能令人聯想到的名次；葉劍英（第31位）亦是如此。王明和博古是名單中的最后兩名。[[143]](#_143_Kang_La_De__Bu_Lan_Te_Deng)

## 中國共產黨與蘇聯

在中國戰爭的最后階段，蘇聯的作用主要是靜觀待變，而不是積極參與。只是到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日本投降前僅六天——它才突然并強有力地從隱蔽處出現在東亞的中心舞臺。然而，這并不意味在中國的其他力量可以忽視它。相反，不僅中共，美國和中國國民黨也都不得不把蘇聯放在他們的一切打算之內。在日本遭受兩次熱核打擊突然投降前，美國官方的政策是盡快讓蘇聯加入對日戰爭。這一態度構成了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上向斯大林靠攏的基礎，并在遲至七月的波茨坦會議上繼續影響杜魯門。但對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蝕同盟關系。

蔣介石的目標是阻止美國或蘇聯對中共的承認和支持。為了達到這一點，蔣的主要手段是向斯大林提供只有他才能給予的讓步，以換取蘇聯只承認他和他的政府。不言而喻，在斯大林方面這一目標必須極謹慎地追求，在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1944年6月訪華期間，這是蔣介石念念不忘的事。在三天會談中，蔣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聽調遣，并斷言中國共產黨受莫斯科的操縱。他極力主張“羅斯福出來擔任中蘇兩國之間的仲裁者或 ‘中間人’”。華萊士極力主張中蘇之間可能發生沖突之點應予解決，蔣回答是，允諾可以做“任何事只要無損中國政府主權”。羅斯福幾乎有把握相信他有很大的活動余地與斯大林探究中蘇關系。他在給蔣的信中寫道：“我歡迎你通過華萊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與蘇聯之間的關系的愿望。你建議讓我斡旋安排一次中蘇兩國代表之間的會談，我們正在認真考慮。”[[144]](#_144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這些想法是羅斯福與斯大林在雅爾塔的秘密會談中的重要部分。羅斯福實質上正在用中國的讓步誘導蘇聯加入對日戰爭。他覺得他這樣做也是對改善中蘇關系做貢獻，是正當的。蔣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蘇關系，并愿為此付出代價。作為回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爾利表示，他們完全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并沒有支持中共，而且他們準備根據他們對雅爾塔會談的理解，承認蔣介石并與他打交道。

6月中旬，赫爾利向蔣介石通報了雅爾塔會議，下月中蘇會談開始，并于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那天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證承認和不干涉，并許諾道義上的支持和軍事援助全部給予“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國民政府”。代價是高昂的——對雅爾塔條款的夸張理解，加上其他幾項不明確的目標——并隨后導致國民黨對美國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嚴厲譴責。俄國人則回到比日俄戰爭前沙皇統治下更高的地位。與此同時，俄國軍隊迅速侵入滿洲全境和朝鮮北部，大部分占領是在日本投降后幾天內完成的。8月19日，俄國和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在歷史上首次會合。

整個戰爭期間，中共或者稱頌和維護蘇聯，或者保持沉默。但顯然毛是獨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對俄國人的許多做法深為不滿：戰爭初期只援助國民黨，1939年德蘇條約，1941年對日中立條約，繼續并只是偶爾批評地承認蔣介石。他或許懷疑斯大林確實對他本人作為第一個未經克里姆林宮幫助和認可而獲得權力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對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對中共的勝利前景心懷疑慮。在無疑是毛精心作出的決定中，中共七大幾乎完全無視蘇聯和斯大林。[[145]](#_145_Zai___Lun_Lian_He_Zheng_Fu)

在延安和重慶的中共報紙對蘇聯8月8日參戰的慶祝幾乎還沒有結束之時，日本就投降了，中蘇條約也公布了。對條約的不滿必然沖淡了勝利的喜悅。盡管中共在公開場合試圖表現出最好的姿態，但黨的領袖們感到痛心、憤恨和迷惑不解。一個中層干部的講話肯定代表了許多人的想法：

為了維護和鞏固遠東的和平，蘇聯已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這有利于中國和世界人民而不利于日本及其他所有戰爭販子。然而，蘇聯同時要承擔條約中的義務，就不能對我們進行直接的援助，而這一做法當然對我們有某些限制……我們無法理解俄國人的實際政策。[[146]](#_146_Yin_Yong_Yu_Li_Er_Deng__An)

毛后來帶著痛苦的口吻回憶道：“他們不許中國革命：那時在1945年。斯大林想阻止中國革命，說我們不應打內戰，而應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將遭毀滅。”[[147]](#_147_Xuan_Dao_Hua____Mao_Zhu_Xi)

## 瞻望

日本投降對于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大地當然是一件偉大且令人欣喜的事件。它標志著外國入侵的結束，以及所有中國人的希望：在似乎無窮無盡的苦難和犧牲之后，真正的和平可能終于到來了。但是日本的投降并不意味戰爭在中國結束，因為日本入侵只是復雜、多邊的政治和軍事沖突的一部分，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甚至對日本人來說，射擊還在繼續，因為日本軍隊在執行國民黨人的堅守陣地、不得向共軍投降的命令。

這樣一來，毛和他的同事們幾乎沒有時間喘氣并慶賀一下他們自1937年以來所取得的進展。然而，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中，毛還是花時間做了一下回顧和展望。過去被描繪得黑白分明；沒有用濃淡不同的灰色來描繪抗戰前或抗戰中的國民黨和它的領導人。據毛看來，內戰的危險極大，因為蔣介石和他的外國支持者將極力奪取本應屬于人民的勝利。毛非常冷靜地看到，在中國，力量的平衡并非有利于中共：“勝利的果實應該屬于人民，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勝利果實究竟落到誰手……這是另一個問題。不要以為勝利的果實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有一些果實——所有主要城市和東部沿海——將肯定落到國民黨手里，另外一些果實是要爭奪的，還有其他的——根據地和敵占區的鄉村——會落在“人民”手里。唯一的問題是斗爭的規模將有多大：“公開的全面的內戰會不會爆發？……會不會因為國際國內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我們的奮斗；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范圍，或者使全面內戰拖延時間爆發呢？這種可能是有的。”正是基于這種認識，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和帕特里克·赫爾利將軍從延安飛抵重慶，與蔣介石討論和平、民主和團結問題。

最后，毛澤東強調要自力更生。他確認美國是一個敵對的帝國主義大國，并堅持不需要來自蘇聯的直接幫助：“（在世界上），我們并不孤立，（但）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然而，與此同時，“鐘不敲是不響的……掃帚到了，政治影響才能充分發生效力。……中國的地面很大，要靠我們一寸一寸地去掃……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絕不作空想。”

[[1]](#_1_11)到1940年為止，據說每月補助行政費10萬元及新給番號的八路軍的三個經核準的師的維持費50萬元。見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第279頁和引用的資料。

[[2]](#_2_11)《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后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竹內實等編：《毛澤東集》第5卷，第266—267頁。

[[3]](#_3_11)《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1938年1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8頁。

[[4]](#_4_11)《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82頁，《論新階段》（1938年10月）。

[[5]](#_5_11)毛澤東選用的詞是“陣地”，意思是為進行軍事行動或戰斗而集結軍隊的地區。

[[6]](#_6_11)《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95頁。

[[7]](#_7_11)中共派張國燾到陜西中部祭奠黃帝陵。——譯者

[[8]](#_8_11)格雷戈爾·本頓：《“第二次王明路線”（1935—1938年）》，《中國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77頁。

[[9]](#_9_11)同上。又見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

[[10]](#_10_11)《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72頁以下。

[[11]](#_11_11)張國燾回憶，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懊喪地嘆息道，“拿那么多軍火給蔣介石，為什么不可以少分給我們一點”。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418頁。

[[12]](#_12_11)《解放報》第36期（1938年4月29日），第1頁，聲明是在1938年3月11日寫的。

[[13]](#_13_11)《抗戰的現狀和任務》，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卷，第363頁。

[[14]](#_14_11)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75頁。

[[15]](#_15_11)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4頁。黨員人數和軍隊人數不得加在一起，因為許多軍人同時是黨員。軍人的1/3大概是黨的某一類成員（正式黨員、預備黨員或發展對象）。

[[16]](#_16_11)晚至1944年，八路軍的較佳單位步槍和卡賓槍數量只有戰斗人員總數之半，而機槍和迫擊炮缺口更大，火炮幾乎完全沒有。見萊曼·P.范斯萊克編：《中國共產黨運動：美國陸軍部報告，1945年7月》，第185頁。

[[17]](#_17_10)簡·L.普賴斯：《干部、指揮員和政治委員：中國共產黨領導干部的訓練，1920—1945年》，第8、9章。

[[18]](#_18_11)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雜志形式每隔約十日出版。然后該刊改為日報出版。

[[19]](#_19_11)林邁可：《不為人知的戰爭：華北，1937—1945年》。林邁可回憶，由于密碼錯誤，毛澤東的“從群眾中得到尊重”竟被譯成“從迷霧中得到珍寶”。大約經過一年，在1941—1942年，日本人破譯了中共密碼，始能解讀中共電文。

[[20]](#_20_11)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1938年：北支開發會社的成立》，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第220—253頁。

[[21]](#_21_11)平型關應在大同以南。——譯者

[[22]](#_22_11)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1—1941年：政治和經濟控制問題》，第203頁。

[[23]](#_23_11)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第1—9頁和第6章。

[[24]](#_24_11)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1—1941年》，第108頁。

[[25]](#_25_11)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歷史功績》，《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第2版。

[[26]](#_26_11)凱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晉察冀邊區的改革、抗戰和革命，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0年），第118—119頁。

[[27]](#_27_11)彼得·施蘭：《游擊經濟：陜甘寧邊區的發展，1937—1945年》，第99頁。另有8.6萬名移民在1941—1945年間到達。

[[28]](#_28_11)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W.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第179頁。

[[29]](#_29_11)這種補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補助的總額60萬元在1937年中期相當于18萬美元（近似匯率為3.35∶1），即每年215萬美元。“這筆補助在1938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開支有余。這表明國共合作解除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前兩年的全部財政困難。”見施蘭：《游擊經濟》，第183頁。

[[30]](#_30_11)雷蒙德·F，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年》，第2—4章。

[[31]](#_31_11)唐納德·G.吉林：《軍閥：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閻錫山》，特別是第9—12章。

[[32]](#_32_11)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歷史功績》。

[[33]](#_33_11)《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第3版。

[[34]](#_34_11)萊曼·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第142頁。

[[35]](#_35_11)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第52頁。

[[36]](#_36_11)彭德懷：《關于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載《共匪禍國史料匯編》第3卷，第351頁。

[[37]](#_37_11)引自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64—65頁。

[[38]](#_38_11)宋劭文是北京大學畢業生，1933—1934年曾因宣傳抗日入獄，見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第84—89頁。

[[39]](#_39_11)陳永發：《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華東和華中的共產黨運動》（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第38—48頁。

[[40]](#_40_11)中原局總部最初駐在平漢鐵路線上的確山，大約在鄭州和武漢的中點。這是在武漢失陷后不久，中共可能估計日軍將沿經過湖南和河北的鐵路線大規模推進，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原局將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導作戰。在弄清日軍置平漢線此段于不顧后，中原局東移。

[[41]](#_41_11)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載解放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5卷，第42頁。

[[42]](#_42_11)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6頁。

[[43]](#_43_11)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第45—46頁。

[[44]](#_44_11)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第48頁。

[[45]](#_45_11)曲直生：《抗戰紀歷》，第37頁。

[[46]](#_46_11)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1頁。

[[47]](#_47_11)小羅伊·霍夫海因茨：《中國共產主義勝利的社會生態學：農村影響模式，1923—1945年》，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第72、77頁。

[[48]](#_48_11)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1頁。

[[49]](#_49_11)史堅雅說中國由九個大區組成，每個大區通常有一個與流域和平原相結合的核心區。周邊比核心區窮得多——的確，核心區“剝削”周邊的廉價勞動力、木材、自然資源等等。省界往往（但不一定總是）沿周邊并包圍核心區。見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11—220頁。

[[50]](#_50_11)引自阿瑟·L.斯廷庫姆：《社會史的理論方法》，第34頁。還特別提到托洛茨基：“事實上，僅僅存在窮困不足以引起暴動；如果是暴動，群眾總是在造反。歷史確實表明，社會制度的崩潰將使窮困成為不可容忍，而新條件和新思想將打開革命出路的前景，這是必然的。那時，在完成群眾所構想的偉大目標的事業中，群眾將表明能夠忍受兩三倍的窮困。”同上書，第33—34頁。托洛茨基認為自發的暴動是一種沒有希望的“民眾反抗”。

[[51]](#_51_10)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4頁。

[[52]](#_52_10)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75頁。這些關系所提出的爭論不限于租、息、稅。這里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權、勞務、“常例”、領主權等）。

[[53]](#_53_10)《彭德懷自述》，第227頁。

[[54]](#_54_10)地主既積極抵抗又消極抵抗。如果地主沒有他們指揮的武裝人力，他們可能召集附近民團（見本書第6章）。地主有時向國民黨軍、偽軍或日本特務傳遞情報。他們結合使用威脅、誘惑和賄賂等手段使當地農民就范。比較消極的抵抗是表面上與新政權合作。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參加八路軍，或成為地方上的積極分子。

[[55]](#_55_10)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3頁。

[[56]](#_56_10)林邁可：《晉察冀邊區稅制，1938—1945年》，《中國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2—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124—132頁。無論什么階級，正當的商業、工業或手工業活動不納稅，新墾或還耕的土地免稅。

[[57]](#_57_10)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9頁。

[[58]](#_58_10)林邁可：《晉察冀邊區稅制》，第3頁。

[[59]](#_59_10)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129—132頁。

[[60]](#_60_10)標準簡化分類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為生，自己不勞動。富農：參加農業或其他勞動，有多余土地出租。中農：自給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經營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貧農：有一些土地，不足以養全家，租入土地彌補。佃農：沒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認的耕種（年度、長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權利，付所耕種的全部土地的地租。工人：雇工，或當長工，或當按日、周等訂約的短工。  
共產黨人很知道這個分類與五花八門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見本書第5章）。一些很貧窮的農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種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佃農有時也是地主，不擁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轉租土地地租為生。因此，在劃分農民成分時，地方干部也強調收入/消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與共產黨政策合作的程度。

[[61]](#_61_10)引自阿爾文·D.庫克斯和希拉里·康羅伊編：《中國與日本：尋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平衡》，第303頁。

[[62]](#_62_10)這些是指（a）《防制異黨活動辦法》，（b）《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和（c）《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97頁。

[[63]](#_63_9)《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44頁。

[[64]](#_64_8)引自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42頁。

[[65]](#_65_9)《中央關于在山東華中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4卷，第138頁。

[[66]](#_66_9)戴維·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山東根據地，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2年），第75—77頁。這是韓復榘部下范筑先率領的一支縱隊，范筑先率領一批不斷壯大的抗日戰士，直到1938年11月被圍失敗。范筑先受傷，為避免被俘而自殺。

[[67]](#_67_9)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第94頁。

[[68]](#_68_9)同上書，第107頁。

[[69]](#_69_9)《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49頁。

[[70]](#_70_9)蔣介石任國民黨總裁是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選的，不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譯者

[[71]](#_71_9)《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5—704頁。這個版本經過重要校訂。原文可在《毛澤東集》第7卷，第147—206頁找到。

[[72]](#_72_9)本節敘述大半根據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章所載的資料和格雷戈爾·本頓所提供的情況。

[[73]](#_73_9)冷欣任第三戰區第二游擊區總指揮，顧祝同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譯者

[[74]](#_74_9)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95—97頁。

[[75]](#_75_9)《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72頁。

[[76]](#_76_9)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第139—140頁。

[[77]](#_77_9)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26—228頁。

[[78]](#_78_9)美國國務院：《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尤其是關于1944—1949年時期》（即《中國問題白皮書》），第530頁。

[[79]](#_79_9)林邁可：《不為人知的戰爭》，未標頁數。

[[80]](#_80_9)凱思林·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產黨的成功：晉察冀個案，1938—1943年》（未刊文稿），第370—371頁。

[[81]](#_81_9)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00—206頁。

[[82]](#_82_9)正太線從正定至太原。——譯者

[[83]](#_83_9)同蒲線從大同至風陵渡（屬歸蒲州）。——譯者

[[84]](#_84_9)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06頁。意譯的譯文。

[[85]](#_85_9)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產黨的成功》，第432—434頁。

[[86]](#_86_9)《彭德懷自述》，第235頁。如果彭德懷是正確的，那么這個時候中共在晉察冀根據地沒有控制任何縣城。

[[87]](#_87_9)《彭德懷自述》，第237頁。

[[88]](#_88_9)《彭德懷自述》，第236—237頁。彭德懷還說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軍事行動只是根據他的命令計劃執行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準。如果是這樣，在延安的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一定因不能控制華北戰場和華中戰場的高級指揮員而感到大為失望。

[[89]](#_89_8)這已成為國民黨史的誠實問題。我曾較詳細地研究這個問題，并認為這種政策從未宣布過；在這種意義上此項指控是捏造。但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于這種力量劃分。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59頁。

[[90]](#_90_8)楊成武，引用于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80頁。

[[91]](#_91_8)2500萬人中，有許多居住在半鞏固區或游擊區，鞏固區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數字所表示的更快。八路軍損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戰斗傷亡。其他因素有調正規軍當游擊隊（以加強游擊隊，更緊密地與當地居民結合。減輕支援部隊的負擔）；淘汰素質低劣或失去戰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據推測是晉察冀）舉出逃兵率兩例：“一個主力部隊單位”，16.4%；“一個新建游擊隊單位”，20.8%。逃兵在一個單位調離本地時格外嚴重；地方部隊中的農民兵往往拒絕離鄉。這也是把若干專職士兵降為民兵的另一動機。

[[92]](#_92_8)郭華倫：《中共史論》第4卷，第75頁。

[[93]](#_93_8)日本稱中條山戰役為中原戰役。——譯者

[[94]](#_94_8)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10—111頁。

[[95]](#_95_8)汪偽淮海省省會設在徐州市。——譯者

[[96]](#_96_8)《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08頁。

[[97]](#_97_8)沃森編：《毛澤東與邊區的政治經濟》，第232頁。

[[98]](#_98_7)施蘭：《游擊經濟》，第120頁。

[[99]](#_99_7)旎蘭：《游擊經濟》，第146頁。紡織品生產數據分類統計（1943年的百分比）：家庭工業（44%），國有企業（31%），資本家企業（19%），中國工業合作社（6%）。

[[100]](#_100_7)“整風”就是“整頓作風”。

[[101]](#_101_7)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166頁。

[[102]](#_102_7)見本書宣道華著第14章。劃分“思想”和“理論”，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分析，可見于弗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第2版，第21頁以下。舒爾曼提出中國共產黨把純理論（置于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這些原理創造性地運用于具體情況）區別開來。關于毛澤東的思想/政治第一的歷史演變，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懷利對舒爾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103]](#_103_7)《毛澤東集》第4卷，第63頁。許多整風文獻可見博伊德·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整風文獻，1942—1944年》。

[[104]](#_104_7)《毛澤東集》第8卷，第75頁。這類不客氣的話已在《毛澤東選集》中刪去。

[[105]](#_105_7)《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5—826頁。

[[106]](#_106_7)《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載于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第33—53頁。下文簡短摘要取自同一來源（有時經過轉譯）。

[[107]](#_107_7)默爾·戈德曼：《共產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第21頁以下。當時《解放日報》主編是秦邦憲（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張聞天。兩人在30年代初同屬王明派，雖然他們后來更靠攏毛澤東主義陣營。然而沒有他們的同意，持不同意見者不可能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丁玲是該報的文化版編輯。

[[108]](#_108_7)見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第6—7頁。

[[109]](#_109_7)整風文獻中，有毛澤東文章6篇，中央委員會文件5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毛澤東執 筆），劉少奇、陳云和康生各1篇，宣傳指南1篇，軍隊報告1篇，斯大林3篇，列寧和斯大林1篇，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領袖）1篇和《聯共（布）黨史》的《結束 語》。四篇蘇聯文獻是后來加的，似乎是后來想起來的。

[[110]](#_110_7)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特別是陳伯達）很認真對待這一挑戰，或許想利用它在黨內提出不要做出危害毛澤東或損傷他的形象的行為。晚至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承認“國民黨仍然有頗大的影響和實力……我們一定要降低國民黨在民眾心目中的影響和地位，達到提高我們的影響和地位”。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18—225頁。

[[111]](#_111_7)只可能粗略估計。黨籍并不直接有價值，因為許多級別低的黨員參加生產。1941年末，有大約8000名官員支領谷物俸給（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52頁）。這個數字顯然不包括黨的高級干部。也不包括大約4萬名守備部隊，直到這個時候他們大部分也是非生產者。因此，總數可能達到5萬人。在140萬人口中，大概1/3弱為15歲至45歲的男子。這樣，陜甘寧壯丁可能有10%脫離生產。

[[112]](#_112_7)村級的規避行為在民間作家趙樹理的受到官方贊揚的短篇小說《李有才板話》中有生動的描寫。

[[113]](#_113_7)這位虛構的主人公是一個貧苦不識字的農工，擅長板話，他用尖銳的打油詩揭露村中要人多年來欺騙從區里來巡視的共產黨干部。

[[114]](#_114_7)《解放日報》（1942年4月3日）。這次調查也顯示87%黨員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入黨；39%是文盲。這是我所知的唯一的這類“民意調查”。

[[115]](#_115_7)引自施蘭：《游擊經濟》，第193頁。關于人員數據，見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215—216頁。這個領導人（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2.25萬人（不含軍人）享受供給制。

[[116]](#_116_7)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42—143頁。

[[117]](#_117_7)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16—121頁。

[[118]](#_118_7)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7頁。

[[119]](#_119_7)引自中央統戰部1940年11月2日指示。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269頁。

[[120]](#_120_7)《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36頁。

[[121]](#_121_7)施蘭：《游擊經濟》，第251頁。

[[122]](#_122_7)趙國俊：《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年》，第51頁。

[[123]](#_123_7)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234頁。

[[124]](#_124_7)薛暮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第52頁以下。

[[125]](#_125_7)從李成瑞：《抗日戰爭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負擔》第108—109頁上的數據導出。1941年和1942年某些減產大概是因為那兩年根據地規模的變動和日軍的掃蕩。

[[126]](#_126_7)見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338頁以下。

[[127]](#_127_7)這段的數據和引文取自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50—153頁。

[[128]](#_128_7)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532頁以下。

[[129]](#_129_7)《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81頁。

[[130]](#_130_7)一號作戰的概要主要采自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第73—82頁。

[[131]](#_131_7)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

[[132]](#_132_7)應為民主政團同盟。——譯者

[[133]](#_133_7)關于持不同政見者，見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第113—117頁；關于民主同盟及其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見范斯萊克：《敵與友》，第168—184頁。

[[134]](#_134_7)《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第238頁。

[[135]](#_135_6)《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50頁。

[[136]](#_136_6)迪克西使團的最著名成員謝偉思猜想，這個名字來自歌詞“他們所說的迪克西的一切是真的嗎？”迪克西當然是造反者一方。

[[137]](#_137_6)赫爾利顯然只接受羅斯福的口頭指示，而且從開始就不受他頗藐視的國務院的約束行事。他后來聲稱他的使命是防止國民黨崩潰，支持蔣介石，協調蔣介石和美軍司令官之間的關系，防止經濟崩潰，為打敗日本而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及促進中國內部團結。見以下第13章。

[[138]](#_138_6)引用于詹姆斯·B.里爾登-安德森：《延安與列強》，第56頁。

[[139]](#_139_5)看起來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懷在七中全會上表示過這樣一些疑慮。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62頁。

[[140]](#_140_5)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61頁。

[[141]](#_141_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45頁。

[[142]](#_142_5)這個概括依據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419—421頁。

[[143]](#_143_5)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第292頁。又見唐納德·W.克萊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1921—1965年》，附錄50，第1081—1089頁。

[[144]](#_144_5)《中國問題白皮書》，第549—560頁。

[[145]](#_145_5)在《論聯合政府》的專論國際形勢的幾小節中，毛只提到蘇聯是聯合打敗法西斯勢力的三（或五）大國之一。不提蘇聯的領導作用，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146]](#_146_5)引用于里爾登-安德森：《延安與列強》，第103頁（但是是轉譯的）。

[[147]](#_147_5)宣道華：《毛主席向人民講話》，第191頁。

#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國共沖突

## 談判與美國的卷入

到1944年，美國政府已越來越急于消除正在削弱中國抗戰努力的國共之間的不和，并想阻止一旦日本投降后蘇聯會站在中共一方的一場可能的內戰。1941年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后中斷的國共談判，于1943年重新恢復。隨著1944年9月羅斯福總統派往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J.赫爾利少將抵達中國，美國人的介入變得積極了。在赫爾利被任命為美國大使幾個月之后，他的主要使命是，“為了打敗日本，統一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

### 赫爾利使團，1944—1945年

赫爾利在促進中國“兩大軍事集團”領導人的和解上所做的努力，在第一年并未取得什么成果，盡管有一些相反的令人樂觀的插曲。毛澤東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宣布了共產黨的立場，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統治，成立包括中共參加的聯合政府。這一主張贏得了國民黨統治區內剛剛興起的和平運動[[1]](#_1_Ji_Min_Zhu_Yun_Dong_______Yi)的熱烈支持；在這些地區，當日本侵略者走下坡路時，人們對重新爆發內戰的恐懼與日俱增。但這并不是國民黨政府想要同意的那種主張。就在8月14日日本投降的一天以后，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討論雙方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毛最后接受了邀請，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他從延安來到政府的戰時首都。在其后的談判中，這位大使繼續擔任調解人的角色。

毛澤東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主要原則已達成一致，但實施的細節仍待制定。周恩來留在重慶做收尾工作。在蔣毛會談結束之際，雙方于10月10日簽署協定，宣布了主要原則，其中包括實行民主，統一軍隊以及承認中共和其他所有政治黨派的平等合法性。政府同意進一步保證人身、信仰、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同意釋放政治犯，同意只有公安與司法部門才有拘捕、審訊與處罰人民之權。

根據這個協定，應召集一次代表所有黨派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商討政府的重新改組，并通過一部新憲法。共產黨承諾，按政府軍裁減陸軍師的對等比例來削減其軍事力量。共產黨還同意從它所占領的最南端和最薄弱的八個根據地撤出。[[2]](#_2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u)政府對共產黨提出的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要求作了讓步，共產黨則放棄他們立即組成聯合政府的要求。在達成這些協議的過程中，雙方都表示要尊重飽受戰爭之苦的人民大眾要求和平的普遍愿望，政治上的優勢顯然要依從這一愿望才能獲得。

然而，在這次談判中有一個關鍵問題，甚至連表面上的一致都未達到，這就是留下來的10個共產黨根據地及其政府的合法性問題。蔣介石要求它們應統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之下，共產黨領導人吃驚地沒有提出反對。更為緊要的問題則是，當雙方的領導人因此而忙于談論和平之際，共產黨的軍隊和政府軍在長江以北的日占區展開了一場接收競賽。那一地區包括有戰略意義的東北三省（即當時所謂的滿洲國），共產黨正在那里匆匆忙忙地開辟一個新的根據地。

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發布“第一號通令”，授權中國政府在中國本土、臺灣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蘇聯軍隊應在滿洲接受日本投降。但是，戰時撤退到西南地區的中國政府在接收長江以北日占區的行動中，顯然處于不利地位，因為共產黨已經控制了華北農村的大片地區。

蔣介石預料到日本就要投降，在1945年8月11日，命令共產黨軍隊就地駐防待命。但是共產黨軍隊按照發自延安的與之相抵觸的命令，向日軍據守的戰略要點和交通線發動了全面的進攻，以迫使他們投降。毛澤東和共產黨軍隊總司令朱德，在5天以后發電拒絕蔣介石8月11日的命令。

于是，8月23日，政府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3]](#_3_He_Ying_Qin_Dang_Shi_Ren_Tong)命令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將軍，在政府軍到達之前，日軍在必要時要就地防御共產黨軍隊的進攻。日軍還接到命令，要他們收復新近丟失或被迫交給共產黨軍隊的地區，他們遵循這一命令展開了進攻行動。從8月末到9月底，以共產黨軍隊為一方，以代表國民黨政府而行動的日偽軍為另一方的沖突，有100多次見諸報道。作為這些軍事行動的結果，共產黨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蘇、山西、山東和綏遠丟失了大約20座城鎮。[[4]](#_4_Zhong_Qing___Xin_Hua_Ri_Bao)在他們所得到的城鎮中有張家口，當時這是一座有15萬—2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為察哈爾省的省會。張家口于1945年8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從日本人手中收復，這是一個長城南北貨物與車輛往來的重要貿易和交通中心。由于它的規模，還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遠的戰略位置，張家口成了共產黨人城市管理的一個樣板和他們的第二首府，直至一年后被國民黨軍隊占領為止。

美國為了國民黨政府的利益也插手進來，把近50萬政府軍運到華北、臺灣和滿洲。在政府軍抵達之前，一支53000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了北平、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授權進行這種援助的美國陸軍部的命令指示說，不要違反在國共沖突中不介入的原則。但是，既然沖突的雙方都把接收日占區的競賽視為相互對抗的一部分，這一命令就隱含了一種矛盾。就這樣，美國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放棄了“不介入”原則，它反映出整個這一時期內美國人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征。中國共產黨人立即提出抗議，認為美軍的駐防及其軍隊的調動，是美國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5]](#_5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__19)

俄國人的參加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國幾方面的利益沖突進一步復雜化了。1945年8月9日，蘇聯根據1945年2月11日的雅爾塔協定對日宣戰。就在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這一天，蘇聯軍隊開始進入滿洲。同一天，蘇中兩國政府宣布締結兩國友好同盟條約。在談判期間，斯大林向中國代表宋子文保證說，蘇聯軍隊將在日本投降三個月后從東北完成撤軍。[[6]](#_6_Tong_Shang_Shu__Di_612Ye)蘇聯撤軍的截止期限因此定在1945年11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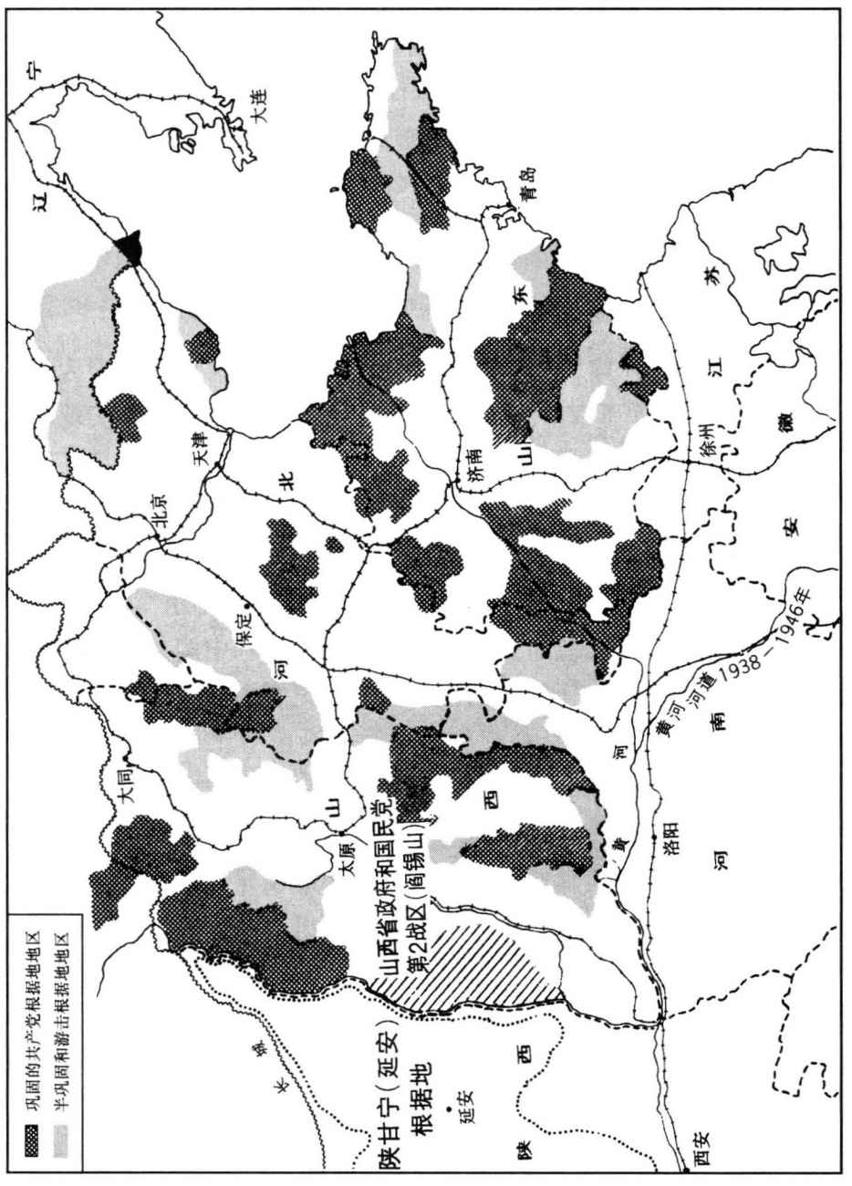
在俄國人占領東北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線而沒用一兵一卒去控制農村的這三個月時間里，中國共產黨能夠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在這一時期，共產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一些部隊，乘帆船從山東或徒步從北方若干省份進入滿洲，這時政府軍則坐著美國運輸機和運輸船，從他們頭上或從他們身旁超過他們。滿洲軍閥張作霖的兒子張學思率領的一支東北小部隊與共產黨軍隊匯合，這支部隊曾配合共產黨人在華北抗擊日本人的游擊活動。張作霖的另一個兒子是眾所周知的少帥張學良，他由于在1936年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作為國共統一戰線的人質而被軟禁在國民黨統治區內。

沒有多少跡象顯示，蘇聯軍隊在這一時期幫助過中國共產黨人。但是，東北70萬投降日軍的大量武器裝備，卻直接或間接地到了中共手中。[[7]](#_7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u)蘇聯人也在一些要地采取了拖延戰術，以阻止美國人幫助政府軍在東北的港口登陸。最后，從前穿過邊境逃到蘇聯的周保中及其東北抗日聯軍的殘余部隊，在1945年隨蘇聯軍隊回到東北。這支在1940年以前遭受日本人沉重打擊的軍隊的其他殘部，此時也從獄中和地下冒了出來，與來自華北的共產黨軍隊合作，很快開始重新組建。

到11月初，國民黨政府意識到，蘇聯按照計劃撤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對東北大片地區的迅速占領。政府盡管得到美國的幫助，但還是在組織對滿洲的軍事與民事接收工作的競賽中失利了。于是，中國政府與蘇聯人進行談判，后者正式同意延長其停留期限，并允許政府軍隊從方便的路線進入這一地區。蘇聯撤軍的新期限定在12月初，以后又改為1月初。這一期限又延長了兩次以上，后來蘇聯人呆得過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歡迎。實際上，直到1946年5月初以前，他們仍未完成從滿洲的撤離。

與此同時，11月15日，蔣介石從南方運來了一批精銳部隊，部署在長城一帶，并向山海關發起了進攻。山海關是通往滿洲的大門，長城就是在這里達于渤海。接著，蔣介石開始設法進入東北，憑借武力去奪取被日本人統治了14年的地區；在這之前它是由大帥張作霖的家族統治，卻從未被國民黨統治過。在這個地區的仍然羽翼未豐的中共軍隊，至此時為止尚無法與美式裝備的蔣軍相匹敵。蔣接管東北的戰略得到美國人的支持，蘇聯人也不再從中作梗，從而迅速得以實施。

蘇聯人利用推遲撤離增加了他們的戰利品，在撤軍的同時，拆除并帶走了成噸的滿洲最現代化的日本工業設備。[[8]](#_8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u)隨著活動日益向戰場轉移，對手們之間的繼續談判看來已毫無意義，周恩來于11月底返回延安。然而這些經濟與政治的代價，與戰略性的軍事錯誤相比，顯得黯然失色，蔣介石本人后來承認，錯誤在于他把部署在云南和緬甸地區最精銳的美械裝備部隊直接調往東北，而沒能首先鞏固對西南與東北之間這片地區的控制。這些軍隊若是在華北作戰，是否比在東北更有成就，肯定永遠是一個得不到解答的疑問。但是，蔣介石進入東北的幾個精銳師都是一去不回。他讓這些部隊投入接收這一地區的決定是一個大錯誤，這一錯誤像鬼魂一樣纏住這位最高統帥，因為正是在東北，隨著這些軍隊與那里的共產黨軍隊作戰的失利，導致了他事業的最終失敗。[[9]](#_9_Jiang_Jie_Shi____Su_E_Zai_Zho)



地圖16 共產黨牢固控制的區域，1945 年8 月

與此同時，還有其他幾幕戲尚需在外交舞臺上演完。也是在1945年11月底，赫爾利辭去駐中國大使職務，他大罵美國外交機構的某些官員，據說因站在中共一邊而暗中破壞他的調解努力。在麥卡錫時代的反共主張結束之前的若干年內，這些指責一直讓人苦惱。[[10]](#_10_He_Er_Li_Zui_Chu_Dui_Wai_Jia)但是，1945年12月，杜魯門總統直接任命喬治·馬歇爾將軍為他的特使，繼續執行為赫爾利棄置一旁的調解任務。總統布置給馬歇爾的任務，是實現共產黨人與政府軍之間的停火，同時通過召集一次毛和蔣在重慶的談判期間已同意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使中國達成和平統一。

### 馬歇爾使團，1946年

馬歇爾于1945年12月23日抵達中國。也就在這時，美國為政府軍39個師及其空軍8又1/3個大隊提供的裝備交付完畢，實現了日本投降前達成的協議。盡管美國的軍需供應行動明白無誤地顯示了要在中國推動內戰的意圖，馬歇爾的和平使團還是產生了直接的效果。

對召集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迅速達成一致意見，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討論停火。這就是所謂的“軍事三人小組”，由擔任主席的馬歇爾將軍、國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張群將軍和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組成。停戰協定于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的1946年1月10日發布。協定要求1月13日全面停戰生效，停止華北一切軍隊的調動。政府軍接收滿洲和長江以南日占區的權利，在停戰協定中得到確認。一個軍事調處執行部在北平成立，以監督停火并立即開始工作。它受代表國民政府、中共和美國的軍事三人小組領導。該執行部內設立停戰執行組，由人數相等的政府與中共人員組成，美國人只對其起協助作用。

政治協商會議于1月11日至31日召開，它公開宣布會議以尋求和平解決國共沖突為目的。對于這次會議，如果說不是兩大對立黨派，那么至少所有其他有關黨派都寄予厚望。有一段時間，會議成了公眾注意的焦點，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來要變成幻影以后，政府還援引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權威性來證明其隨后的若干政治行動的合法性。

政治協商會議的參加者，盡管并非民主選舉產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國政治舞臺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團體的人士的承認。參加者包括38位代表：國民黨8人，中共7人，青年黨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黨2人，救國會2人，職教社1人，村治派1人，第三黨1人，其他無黨派代表9人。

國共之間所有突出的政治與軍事問題實際上都達成了協議。議案涉及如下內容：國民政府的重新改組；一項有關結束國民黨訓政時期和制定立憲政治的施政綱領；對1936年憲法草案的修改；計劃召開國民立憲大會的代表人數問題；在這次大會上將正式通過修改的憲法；在統一軍令下對政府軍和中共軍隊進行整編。

政治協商會議規定組成一個軍事三人小組，制定出方案來貫徹協商會議要求全面裁軍和中共軍隊統編為國軍的決議。這個小組，即軍事三人小組會議，由代表政府的張治中將軍、代表中共的周恩來以及作為顧問的馬歇爾將軍組成。他們在2月25日宣布了雙方大規模裁減軍隊方案的協定。這一協定將在18個月內實施完畢，到該日期結束時，政府軍計有50個師，約84萬人；共產黨方面則為10個師，14萬人，后者將被統編為國軍。關于這些軍隊的部署也達成了協議。共產黨的大多數師應部署于華北，這反映出那是中共軍隊力量最強大和集中的地區。

不幸的是，并沒有上級權威來強制停戰，或強制作出軍事的和政治的和解。既然這些協議的貫徹只能依賴相互的信任和對手本身的誠意，因此，由馬歇爾將軍來華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所激起的勢頭一過，這些協議也就很快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也許兩大黨派對于制定這些協議都是真誠的。事后來看，這些協議頗像兩個對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撫中國輿論和美國伙伴，同時爭取時間，以盡可能有利地完成他們的軍隊部署。事實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這二者之間，因為隨后蔣介石和周恩來都指出，關于實現他們之間和解的得失，他們各自的黨內這時都存在真正的爭論。[[11]](#_11_Lai_Man__P_Fan_Si_Lai_Ke_Bia)今天來看，其言外之意，就是兩黨在1946年初可能都還未下決心；通過全面戰爭解決他們分歧的決心，只是隨著那時達成的協議被逐漸破壞后才表露出來。

國民黨內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右派，在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能夠在某些重要問題上修正黨的立場。兩項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規定繼續實行總統制，這后一項修正與政治協商會議批準的內閣制是相對立的。隨后，國民黨還拒絕承認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主同盟在有40名成員的行政院中行使聯合否決權，行政院在建立立憲政體之前，將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

這兩個政黨就此聲稱，國民黨既違反了最初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條文，也違背了其精神，并拒絕了承擔繼續履行決議的義務。國民黨政府沒有因此而躊躇不前，單方面按照政治協商會議決議進行活動。國民立憲大會于1946年11月召開，目的是要通過1936年憲法的修改草案。1947年1月1日，新憲法正式頒布；第一屆國大代表的選舉在這一年晚些時候舉行，選出的代表在1948年4月召開會議，選舉國家總統和副總統。[[12]](#_12_Guan_Yu_1946Nian_1Yue_10Ri_T)

與此同時，軍隊的裁減與統編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進展還要緩慢。在這方面，共產黨似乎更不讓步，甚至拒絕按照2月25日整軍方案的要求提供其軍隊的名單。然而雙方對停戰未能實現所進行的指責，似乎都同樣地在減弱。例如，馬歇爾將軍在1月底想尋求雙方同意，由執行部派停戰小組去滿洲的營口港，據報道那里發生了一些沖突。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加以拒絕，而后又游移不定。實際上，直到4月初以前，停戰小組都未能進入滿洲，而在此期間敵對狀態已經加深了。在馬歇爾看來，政府方面不僅要對拒絕在滿洲遵守停火和不讓停戰小組進入該地活動負責，而且要對華南和華北兩地其他大量違反停戰協定的事實負責。[[13]](#_13_Fan_Si_Lai_Ke_Bian____Ma_Xie)

就共產黨方面說，他們已在東北地區迅速加強了實力，足以反復向占優勢的政府軍挑戰。共產黨軍隊在滿洲的調動，從條文上說并未違反停戰協定，因為禁止軍隊調動的條款只適用于華北，而不適用于東北。敵對行動當時已在很多方面展開。當俄國人在3月中旬開始撤軍時，他們顯然與中共軍隊協調行動，在俄國人撤出滿洲的大多數大城市時，其中包括沈陽、長春、吉林、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中共軍隊已做好跟在他們身后進入的準備。

在沈陽，政府軍能夠在24小時之內將中共軍隊趕出去。而在長春，周保中率領的部隊向政府軍和地方部隊發動了三天的進攻，而后于4月18日進入該城。政府軍在5月19日占領四平街，但也經過了長達一個多月的戰斗。在這次失利以后，共產黨撤離了長春，而政府軍于5月23日占領了這座城市。在華北，共產黨人也公開違反停戰條款，沿著津浦鐵路在山東和蘇北調動進攻的軍隊。[[14]](#_14_Ke_Le_Bo____20Shi_Ji_De_Zhon)

鑒于停戰已名不副實，馬歇爾暫時不再擔任正式的調停人，但他仍繼續作為雙方的中間人進行活動。他以這種身份為滿洲成功地安排了自1946年6月7日起為期兩周的休戰。在此期間將舉行談判，討論如下問題：（1）終止東北地區的戰斗；（2）恢復華北地區的鐵路運輸，在該地區，共產黨軍隊不僅阻斷了濟南至青島的鐵路，而且也封鎖了其他幾條南北鐵路大動脈，從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軍事運輸活動，也阻止了把煤炭裝運到長江流域下游的工業基地；（3）貫徹實施2月25日整編軍隊的協定。蔣介石宣稱，這將是他與中共在談判桌上解決分歧的最后時機，國民黨的報紙上也出現了同樣的聲明。

馬歇爾恢復了正式調停人的身份，休戰延期到6月底，但是并未達成協議。使休戰歸于破滅的最主要障礙是，共產黨不想同意在中共軍隊按協議從蘇北撤軍后，讓政府對蘇北實行管理。共產黨方面堅決主張，在他們的軍隊撤離的華北一些地區，所有現存的地方政府都應繼續保留。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政府全面進攻共產黨統治區的計劃已經制定完畢，中共對此也已察覺，繼續談判已成毫無意義之舉。

### 馬歇爾使團的失敗和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牽連

馬歇爾使團直到1947年1月6日才正式停止活動。但是，由于休戰期限至1946年6月30日就告終結，在沒有必須的延期協議的情況下，這個美國和平使團的失敗看來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位新的美國大使J.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來填補赫爾利辭職以來一直空缺的職務。司徒雷登于7月份抵達之后，分擔了馬歇爾的越來越徒勞無益的調停任務，直到后者在1947年初被召回美國。但是，他們繼續努力的結局，已因政府對共產黨統治區的相互配合的全面進攻而確定，這一進攻在6月休戰告終后不幾天就開始了。

進攻開始后不久，美國人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仍試圖抓住最后的機會來挽救和談。他們提議在8月1日組成一個五人談判會議，包括兩名政府代表，兩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擔任主席。蔣介石要求以共產黨軍隊大范圍撤退——實際上是從所有他作為進攻目標的地區撤退——作為先決條件。共產黨拒絕同意，除非他們要撤離地區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滿意解決。在這期間，軍事行動繼續進行，而且在8月19日，即政府軍轟炸延安后不久，共產黨宣布在他們權力所控制的整個地區進行戰爭總動員。

當政府向共產黨所控制的城市張家口進攻還在繼續之際，馬歇爾于10月初勸華盛頓將他召回，他認為，和平談判現在很明顯正被利用來作為政府向共產黨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的偽裝。為了阻止馬歇爾以此為理由辭職，蔣介石宣布張家口實行短期停火，中共對此加以拒絕，認為它不能解決問題。在整個1946年，共產黨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要求政府撤回到1月13日關內停戰時和7月7日東北停戰時的位置。政府方面拒絕這一要求，它的軍隊于10月10日占領了張家口。

接著，政府單方面召開了國大。中共和民盟拒絕參加，理由是國民黨并沒有遵守政治協商會議關于改組政府議案的條款。周恩來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這一姿態標志著中共正式從調處活動中退出。12月初，共產黨表示，他們不愿意繼續受美國的調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復談判的先決條件，即解散國大，政府軍撤回到1月份的位置。這些條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雙方至此都已認定，他們在戰場上能比談判桌上更有所獲。

隨著1946年的發展，馬歇爾作為調停人的任務越來越困難了。盡管在這個時候還不能預見，但他的難題包含了所有將在未來幾年中使美國對華政策遭受損傷的因素。對于美國所起的作用，國共雙方都越來越感到憤慨，這種憤慨與1946年他們之間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態度是并行的。國民黨內的主戰派——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CC系領導——把美國的調解努力視為對他們鏟共計劃的阻撓，在他們心目中，只有鏟共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這種看法后來為美國的支持者所極力推行。

也許更具有影響的是國民黨政府內的普遍憤慨情緒，這種憤慨情緒是美國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在提到這一不必要的建議時指出，在過去，“一個政府告訴另一個政府它該做這些事情，這就意味著戰爭”。[[15]](#_15_Yue_Han__Lu_Bin_Xun__Bi_Er)但是，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都知道，后者無法勸誘前者實施那種挽救正在敗落的命運所必需的廣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此外，國民黨領導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不論美國人可能對他們如何失望，資本主義的美國都會在任何同共產黨人的生死較量中支持他們。[[16]](#_16_Guan_Yu_Zui_Jin_Chu_Ban_De_Z)

共產黨方面也明白國際政治生活中的這一基本事實。但他們的聲明強調馬歇爾立場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盡管——一點不假——甚至直到調解努力可能成功的托辭不再能保持的時候，共產黨人才選擇使這一點上的壓力逐步升級的辦法。不過，馬歇爾還是被置于一種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圖居間促成和平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卻又代表向爭端中的兩黨之一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主要國家。

根據對39個步兵師和空軍的供應計劃而答應向國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裝備，在日本投降時的交付量大約只有一半。其余的部分是在后來交付的，其時這些武器要用來對付的敵人已經很明顯了。在政府與中共為接收日占區領土而展開的競賽中，美國將政府軍運往這些地區，從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利用美國海軍陸戰隊去控制這些地區，以待政府軍的到來。1946年2月25日，也就是整編軍隊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國還批準在中國組成一個軍事顧問團，以幫助中國政府發展軍隊。這個顧問團于3月份成立。美國人還向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的援助中國計劃提供了5億美元，其絕大部分都交給了國民黨統治區。1946年6月14日締結租借“供應線”貸款協定，據此美國增加了給中國政府的追加貸款，用以購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已約定，但迄未根據戰時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裝備和物資。接著，在8月份，也就是在國民黨對共產黨地區的進攻已經開始之后，美國人還締結了另一項協定，批準以1.75億美元的總價格，向國民黨政府貸款出售價值為9億美元的戰爭剩余物資。這種“民用型”物資包括小型船只、車輛、建筑材料、空軍軍需物資和材料，以及通訊設備。與此同時，有關美國與中國政府間通商與航海的友好條約的談判正在進行中。[[17]](#_17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

就美國一個主要盟國的得到承認的政府而言，這樣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放在中國國內政治環境中來看，馬歇爾作為敵對兩黨之間不偏不倚調解人的立場，從一開始就由于他的國家對國民黨政府連續不斷的戰略性支持而受到損害。共產黨對1946年夏季期間這種關系的宣傳攻擊逐步升級，他們指責美國加強政府的軍事力量，因此是慫恿國民黨以軍事手段解決沖突。美國暗自承認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從1946年7月底禁止船只裝運武器彈藥到中國。這就是馬歇爾所聲稱的“影響中國政府的行動路線以及影響軍民兩方面政治反動派確定了的立場與計劃的努力”的一部分。[[18]](#_18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__1)

盡管如此，禁運還是在10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1947年5月完全取消，這就以實例證明了馬歇爾的使命是受其國家對華政策約束的。禁運來得太遲了，以致不能對政府的戰爭計劃或談判進程有任何抑制性影響。因此，它也不能使共產黨平靜下來。實際上，它在這方面所能產生的任何效用，幾乎全被向政府出售價值9億美元戰爭剩余物資的8月決定直接破壞了。而美國的反共批評家卻立即利用禁運作為他們攻擊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論點，斷言因此而引起的軍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軍戰敗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國的調停努力實際上沒能討好任何一方，就企圖介入中國內戰純屬無益之舉來說，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提供了直接經驗以外，并沒有達到什么目的。盡管美國沒有辦法勸誘國民黨應允它的隨便哪一項要求，但為了它自己的國內和國際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棄對與中共作斗爭的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這樣，1946年武器禁運的姿態既不能誘使政府方面對其戰爭計劃做出重要改變，也不能從共產黨方面贏得任何友好表示。相反，禁運唯一持續的后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國政府及其在美國的支持者的怨恨。與此同時，隨著全面戰爭行動的開始，其他形式的物資援助和外交支持仍在繼續。也許，馬歇爾使團的最大不足之處，并不是它對中國內戰進程的影響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國人本來就該想象到，他們調解努力的實際效果可能就只會如此。這種錯誤的假定就很多美國人來說是根深蒂固信念的一個部分，這種信念來源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充當亞洲命運主要仲裁人的角色，這使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有權力和責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決定中國的政治命運。

## 國民黨統治的衰落

國民政府在1945年8月能夠聲稱，它對這個國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業基地以及估計約為四億五千萬人口的3/4以上擁有領導權。國民政府不僅作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國的領導者而贏得了喝彩，還把中國帶進了世界政治舞臺，在那里終于被承認為大國之一。因此，抗日戰爭結束后，蔣介石及其領導的政府孤注一擲地冒險解決“共產主義難題”就不令人吃驚了。

1945年，政府軍總人數超過250萬，是共產黨軍隊人數的兩倍多，而且在武器、裝備和運輸能力上占有明顯的優勢。共產黨軍隊——除了游擊戰經驗外沒有什么其他作戰經驗，沒有空軍、海軍，也沒有政府那樣受過美式訓練和使用美式裝備的陸軍師——在大多數觀察家看來，它似乎無法與國民黨的軍隊相匹敵。蔣介石和他的將軍們，就像那些為他們的軍隊提供軍需和訓練的美國人一樣，對現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國取勝，如同剛剛在對日戰爭中所做的那樣。但是這種情形并沒有出現，這幾乎使所有的人，也許除了共產黨人之外，都感到吃驚。在追敘1946年到1949年的內戰過程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國民黨人統治的中國在同一時期的衰退過程。因為共產黨人的最終勝利，是建立在舊社會的衰弱及支配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的衰弱的基礎之上的。

當時的參與者和目擊者，不一定贊同中共關于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地主統治農村以及主要家族壟斷城市經濟等理論的解釋，并以此去理解國民黨存在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問題在40年代都是顯而易見的，對此外交家和外國記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國報刊都曾作過反復描述。“腐敗無能”這一引人注意的話，常被用來形容從指揮戰爭到學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領域的表現。40年代后期，國民黨中發行量最大的政治評論刊物《觀察》的創始人和主編儲安平教授，在1947年3月總結了一種廣泛持有的觀點：

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一批人，沒有對南京政權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抗戰結束以來對公教人員刻薄待遇，使他們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沉溺于貪污作弊，他們進行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士怨氣沖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19]](#_19_Chu_An_Ping____Zhong_Guo_De)

### 接管日占區

1927年以后，城市中國是國民黨的勢力范圍，其中心地帶是沿海以及沿長江流域的主要城市。這一地區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被日本人占領，那時國民黨政府撤到了西南。日本投降后，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對所占地域的權限時，城市居民對政府的普遍失望產生了。到1945年底，實際上這個國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種成分的居民已極度不滿，對此，政府的政策及其官員的行為是要負直接責任的。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接收過程本身。代表政府的文官和軍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機構的所有部門以及日本人和漢奸所有的公、私財產。所有財產，若屬于非法占有的，要么應發還原主，要么應依據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在這個過渡期間，工廠要停產；不論是被封在倉庫以內還是以外的貨物，都禁止移動；建筑物的占有人必須搬出去。

但是，隨著官員的復員和接收過程的發展，接收這個詞變成了通用的同形異義詞，其意義轉變為搶劫或掠奪。接收政策本身要么疏于計劃，要么實施失當，也沒有什么制度上的保證以禁止濫用職權。其結果是，隨著到來的官員競相對敵產提出所有權要求，各地的接收過程發展成了不成體統的你爭我奪。任何東西都成了攫取的對象：工業機械、公共建筑、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辦公設備——任何能最早對這些東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強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們征來使用或獲利。這些來自重慶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員，成了這一時期的象征。根據流行的說法，這種人所關心的是五子，即條子（指黃金）、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20]](#_20_Wang_Jian_Min____Zhong_Guo_G)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工人突然發現，由于工業生產的停工，他們自己失業了。其原因是雙重的，即沿海地區的接收過程以及內地戰時工業的關閉。自由中國的工廠主和商人們，由于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在戰時隨政府遷往西南而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因此期望從接受日偽的企業中得到補償。相反，政府并不理會這些政治上的責任，而是讓官員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國的工業財產。但是，收復區的經濟很快惡化，以致拆、賣工廠機器比讓它們運轉常常更為有利可圖，許多人都這樣干。日本投降后一年多，經濟部承認，從日偽手中接收的2411個工業企業，估計只有852個實際上恢復了生產。[[21]](#_21___He_Ping_Ri_Bao_____Shang_H)到1946年末，還有許多其他原因導致工業蕭條。但是，它是從分裂開始的，這種分裂是由政府官員對日本人留下的財產展開接收競賽的不同尋常的行為造成的。

政府官員對待前占領區居民的態度，與這些違法亂紀現象是交織在一起的。對日戰爭勝利之后，政府由于需要依賴日本軍隊及偽軍維持“法律和秩序”，也就是說，不得不依賴這些戰敗的敵軍阻止共產黨對華北城鎮的接收，起初曾作過一些讓步。日偽人員被允許在一個不確定的時期內作為中國政府的政治代表發揮作用。在公眾對這一問題的憤怒呼喊聲中，1946年9月底，發布了執行懲罰漢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只是有選擇地應用。盡管逮捕了一些為首的通敵分子，但是并沒有做出有計劃的努力，在某些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機構的面前解決所有的要求和指控。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權力機構里效力的人，被回來的政府委以同樣有權力的職務。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對通敵人員問題做出妥協的同時，其官員們由于曾在內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國的斗爭，披著自認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官員們這種以恩人自居的姿態在接收臺灣和滿洲時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兩個地區都曾長期受日本人統治，臺灣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臺灣人與來自大陸的接收人員間發展起來的相互敵意，在血腥鎮壓1947年2月的反叛中達到了頂點。[[22]](#_22_Qiao_Zhi__H_Ke_Er____Bei_Chu)在東北，都在傳說，除非所有想叛亂的人都干脆投到共產黨一邊，否則那里日后也要爆發一場叛亂。

這個問題，在政府給教師和學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許說得最為明確。符合國民黨思想體系的專門課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對于學生是強制性的。那些在占領期間已從學院、大學和中學畢業的學生，必須通過書面考試才能保留其畢業生資格。教師也要通過旨在測試其對國民黨的了解和忠誠的種種考試。人們對這些課程本身并無太多的不滿，因為其根本的目的還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試也并不特別嚴苛。這一問題倒不如說是官方給再教育過程貼上的一種恥辱記號。教育部在發出通告時，聲明所有在偽政府控制地區上學的學生都被認為受到了毒化，他們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凈化之前，不適于繼續學習。作為“偽學生”，應該幫助他們“洗掉思想上的污點”。[[23]](#_23___Zhong_Mei_Ri_Bao_____Shang)但是，隨著新近從西南來的官員貪污受賄而引起的公憤，起先采取守勢的當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問，為什么這種人物竟敢參與對任何人的評判。

然而，盡管國民黨政府這一時期有種種違法亂紀行為，它蒙受的不過是在威信和公眾信任方面的一點損失。通過對所犯錯誤的糾正以恢復公眾的信任，沒有什么呼聲比這更強烈了。對政府來說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后引起這些失望的種種問題，其絕大部分并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反而成了隨后所出現的失望的前奏曲。因此，那些被當作戰后一時失誤而可能已被忘記的事情，日后終于被公認為國民黨政府失去城市民眾支持的開端。

### 經濟上的無能：通貨膨脹的金融政策

在內戰年代里，與其他任何單一問題相比，通貨膨脹是促成城市民眾失去對國民黨統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通貨膨脹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戰爭時期，當時政府與支持其財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長江流域城市的聯系被切斷。到1945年，不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開支的1/3，財政上的虧空幾乎完全依靠印發紙幣來彌補。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結果是，平均價格在1937年到1945年8月間上漲了2000倍以上。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整個內戰時期一直存在，盡管也始終采取了一些彌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續過度膨脹的結果本身終于達到了其必然的結局。依靠印發紙幣的決定的最危險的后果，也許是它會使那些作出這決定的人相信，這是一種能輕而易舉地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的辦法。政府領導人并非出人意料地采取與反對日本人時的相同做法，為他們同中共的戰爭提供資金。結果它便成了一個只能眼看著國家城市經濟衰落，既無決心也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貨膨脹為勞動力提供了一些現成的爭論問題，他們在1945年8月突然擺脫了八年日本人統治和前此十年國民黨統治的約束。日本投降后，國民黨已沒有能力重建曾抑制1927年至1937年工人運動的組織上的控制網絡。工人們這時蔑視官方制定的那種解決勞資糾紛的傳統做法。由于原有破壞罷工的伎倆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動調整工資以適應生活費用上漲外，已沒有其他選擇。但是，1946年4月宣布的這一決定，不僅加速了工資—物價的螺旋式上升，還損害了政府與工商界的長期同盟關系，激起了企業家的怨恨情緒，他們認為對工人的讓步正在促使他們自己的生產費用增加。與此同時，官方的統計數字證明，國民黨在平息工人情緒方面是無能為力的。1936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國前不久，全國所記載的罷工及勞資爭議為278起。相比之下，在1946年，光上海一地所記載的罷工及勞資爭議的總數即達1716起。到1947年，該城市這方面的數字達到2538起。[[24]](#_24___Mi_Le_Shi_Ping_Lun_Bao__Me)

政府經常指責工人鬧事是共產黨職業鼓動家促使的。工人運動看來的確被徹底滲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25]](#_25_Shi_Li_Jian_Liu_Chang_Sheng)然而，這些爭論問題是現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隨著經濟因不能控制的通貨膨脹和隨之而來的工商業萎縮而陷入混亂，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業救濟金，因此，他們也像其他各界民眾在很多場合下以各種方式所做的那樣，拒絕遵照政府的合作請求行事。

支付高工資不過是窒息工業生產的諸多問題之一。這些問題包括能源和運輸費用不斷增加，各種貿易稅和生產稅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實際購買力萎縮而引起的需求下降。到1947年底，這些情況導致了工業產量的全面縮減。

但是，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卻聽任不合理的稅收體制繼續存在，這一體制曾向合法的商業活動大量地、過度地征稅，同時又讓投機者和奸商的個人收入分毫不受觸動。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也造成了傷害地方生產者的逆差。1946年11月的改革只是部分地糾正了這些狀況，那次改革旨在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

國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責是，它不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是鼓勵官僚資本主義，也就是利用公職為個人的企業和利益服務。政府官員和他們的合伙人正相互勾結以獲取外匯，進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處。有一個實例是1946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貸款的丟臉事件，這些米商顯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許，利用貸款去從事投機活動，從而導致米價進一步上漲。[[26]](#_26___Xin_Wen_Bao____1946Nian_6Y)另一方面，當政府在1947年上半年賣出公債時，資本家并不愿意買進。同樣，據說一些商人持有大筆金錢，他們拒不把這些錢投入他們自己的企業，因為與投機所得相比，投資所得的利潤更不可靠。投機的機會包括買進、賣出和囤積商品；在股票市場上進行投機；投資于黃金和外幣；以黑市利率貸款。其結果是生產進一步削減，企業倒閉，失業增加。

### 1947年到1948年的應急改革

政府發動了兩次頗有抱負的運動式的改革，據說，原來的目標是要達到經濟的全面穩定。第一次改革是于1947年2月16日宣布的，當時把所有工資都凍結在1月份的水平上，并規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價，其中最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私人買賣、囤積黃金和外幣被禁止。還采取了制止資金流入香港的措施。然而，這一價格控制體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這首先是因為其范圍有限，其次是因為它不能貫徹始終，它的嚴格實施只限于上海一南京地區的城市。就像價格普遍上漲那樣，生產成本也因此而繼續上漲，只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場價格依然凍結。稻米生產地的大米價格，很快超過了大米銷售地城市的水平。原棉價格的不斷上漲使紡織品無利可圖。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樣受到影響。大米短缺的狀況日益嚴重。到4月初有了美元黑市，價格控制單上所列的大多數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現。政府無法根據計劃的工廠配給制向工人提供這些商品的有保證的配給量，于是決定代之以發放津貼，以便與每個工人本該配給的商品的價格相適應。但是，這些津貼只適用于那些越來越難以按定價買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費用，而其他各種商品的價格還在不斷上漲。5月間，上海的整個物價指數上升了54%，相比之下，改革計劃開始前的那一個月上升率則為19%。在工人要求解凍工資、米市崩潰以及四五月間遍及十多個城市的搶米風潮的多方面壓力下，所有應急改革措施最終都被正式放棄了。[[27]](#_27_Zhang_Jia_Ao____E_Xing_Tong)

在這次經歷剛剛告終之后，1948年8月19日的緊急改革計劃，只不過是正陷于自己制造的經濟混亂而悲觀失望的人們所做出的最后姿態。從一開始就很明顯，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為它包含了導致1947年計劃失敗的同樣一些缺陷。但是，政府領導人在1948年8月宣稱，這是他們最后的機會；改革計劃只能成功，因為他們已沒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爭取穩定經濟和恢復公眾對他們的信任。當這一計劃在10月底被放棄時，不論在誰看來，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據所有金銀和外幣必須按新貨幣金圓券收兌的規定，從公眾手里強行收購了價值1.7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幣。在實施新計劃最為嚴厲的上海，最公開地表示憤怒的群體并不是長期受到損害的中間階層，而是工商界——這些人先前是國民黨的主要支柱。大約3000個商人，包括幾個上海最顯要的商人，在這一運動開始時就已被關押。后來，他們向那些把400萬上海人用作“試驗標本”的“江湖醫生”發出了聲討，并要求懲罰那些設計這種試驗的官員。在這些官員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他對在上海強行實施這一次改革措施負有責任。[[28]](#_28___Da_Gong_Bao_____Shang_Hai)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貨膨脹也損害了城市薪金中間階層對政府的支持。組成中等收入階層的少數人，其主要群體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作家和記者，以及政府雇員，盡管以通貨膨脹來解釋他們對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的日益不滿是過于簡單，但飛漲的物價和貶值的貨幣的確成了這些人的主要負擔。他們的貧困在抗日戰爭期間就開始了，那時的通貨膨脹使他們的實際收入僅及1937年以前的工資的6%—12%。到1946年，根據在昆明所作的一項估計，大學教授的實際收入減少了98%。[[29]](#_29___Da_Gong_Bao_____Shang_Hai)而且，盡管政府至少還能夠發布按生活費用指數調整工人工資的命令，但對它自己的雇員也不能做到這一點。這些雇員包括多數大學教師，他們作為國家提供資金的機構的雇員，其薪金等級與其他公務員的等級相類似。所有國家雇員的薪金一般說來每季上調一次。但這些調整斷難跟上生活費用的上漲。教師與公務員的實際收入不夠維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40年代后期人們常常說這是事實。

知識界中的這種新的貧困，還有助于激發學生的反戰運動。其實連教授本身顯然也參加了1947年春季范圍廣泛的反饑餓、反內戰示威運動，這一運動還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減軍費開支，增加教育經費預算。顯而易見，利用印發紙幣為戰爭行動籌措資金而引起的困苦，為這些人反對戰爭行動提供了一個主要的論點，因而有助于削弱對戰爭行動的支持。但是，即便如此，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也像公務員一樣，直到政府在軍事上被打敗以前，實際上一直沒有拋棄它。

### 政治上的無能：對和平運動處置失當

如果說貧困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經濟生活的主要事實，那么他們在政治上的當務之急就是反對內戰。政府拒絕承認這一抗議的合法性，相反，卻把它當作地下共產黨人的一種詭計。由于這種錯誤看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鎮壓，最終只得背上眾對軍事沖突的譴責這個更為沉重負擔的，正是政府而不是共產黨。

于是，學生的抗議活動不是完全成熟后才發生的，而是學生示威和政府反示威的過程中發展。有四次引起全國矚目的示威運動。一二·一運動（1945）是其中規模最小的一次。主要行動發生在昆明，1945年12月1日，那里的四名年青人被幾個企圖恐嚇反戰抗議者的匿名兇手所殺，還有幾人受重傷。作為這一暴力行動的結果，以西南聯合大學校園內反戰集會為開端的抗議活動，終于以這一時期第一次主要抗議運動而聞名。從1946年底到1947年1月初，為抗議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涉嫌強奸一名北大學生，出現了一系列反美游行示威活動。海軍陸戰隊官兵的行為僅僅是直接的導火線。除此以外，學生還質問為什么美國軍事人員要留在中國，他們是否真的沒有站在政府一邊參與中國的內戰。在這一問題上所引發的勢頭，發展成了一場反饑餓、反內戰運動，1947年5、6月間，這場運動席卷了全國大多數主要城市的大學和中學。最后一次大規模的所謂“學潮”，與1948年4月至6月間的抗議美國扶日運動匯合了。

盡管經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員，但全國范圍的學生抗議活動的基本動機都是一致的。學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結束內戰，結束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對國民黨的支持，把財政支出從以軍事為重點轉到以民用為重點上來。政府最初的反應是，試圖使這場運動轉入另外的渠道。當局除了在那些學生運動最積極的學校里安插密探和特務外，還讓那些同情政府的學生，如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作為國民黨的忠誠擁護者，組織并領導學生的活動。但人們公認，在全國最有名的學校中，名氣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學生領袖全都批評政府及其戰爭政策。

然而，政府的決策者們始終不夠明智，他們相信，只要學生內的極少數“真正的”共產黨鼓動分子能被清除，學生運動就能得到控制。[[30]](#_30_Guo_Min_Dang_CCXi_Tou_Ling_C)隨之而來的嚴厲手段進一步疏遠了學生。學生的領導人，尤其是大學自治會的領導，是遭到一幫執法人員毆打、逮捕和綁架的主要對象。根據密探告密，逮捕學生積極分子成了常見現象。積極分子和地下共產黨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單上。這些學生即使不在校園中被抓走，也會在夜間查抄學校宿舍時被拘捕。被捕和被綁架的學生常常干脆就“失蹤”了。對于真正的共產黨分子，一旦他們的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見的懲罰。嚴刑拷打也是一種常用的逼供手段。

開始時表明學生要求和平解決國共沖突的運動，就這樣很快發展成了一場向國民黨政府當局挑戰的運動。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并不是學生逃身到共產黨方面，因為逃過去的學生看來在數量上相對很少。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試圖鎮壓抗議活動所引起的廣泛憎恨。這可能不會使學生轉變成共產黨人或共產黨的同情者。但是，它確實加強了學生對政府的反對，使學生更加不愿支持政府對中共的戰爭。

老一代知識分子清楚地表達了他們支持學生要求的道理，他們持續不變地批評這場戰爭及其加于民族的災難。就像大多數外國觀察家一樣，他們以為這場戰爭很可能是遙遙無期地繼續下去，因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敗另一方——這是直到1948年年中以前的一種普遍看法。戰爭的代價包括通貨膨脹，它使城市經濟完全陷于混亂，使農村地區進一步陷于貧困。除了印發紙幣以外，政府財政還依賴一種土地稅，即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強制收購糧食和征借糧食。這些強征索取，連同維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征購征用，與征兵有關的種種弊端，以及當地紀律廢弛、軍餉不足的軍隊所造成的種種破壞，在很多地區都成了農民不堪忍受的重負。戰時的許多征派，都意味著增加地方官貪污受賄的機會，而通貨膨脹又加強了這種動機。在形容農村的狀況時，“吸血鬼”這個詞被用來指鄉、鎮、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的稱呼。鄉、鎮、保、甲構成了基層行政單位，評論家認為，戰爭實際上在基層正在制造最有利于中共不斷發展的條件。

政府在爭取公眾支持其反對中共的戰爭方面所遭到的失敗，還很明顯地表現在人們普遍傾向于譴責政府從事戰爭，而較少譴責中共。這一點在那時就為世所公認，而且有很多解釋的理由。首先，政府作為中國合法的統治者，唯有它有權改革自身和結束戰爭。因此，國統區的反戰請愿者們便把努力的目標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采取行動。其次，在1945—1946年的和談期間，共產黨人在贏得輿論的對比方面，已獲得成功。人們普遍相信，共產黨人是誠心誠意的，例如在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當時他們為了避免全面戰爭，同意作出幾項妥協。而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數星期后單方面撕毀了幾項政協協定時，政府便在這場較量中失去了信任。使這一印象增強的，是1946年2月10日對重慶校場口大會的破壞，這次大會是為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結束而召開的。在這一事件的幾天之后，重慶中共報紙的辦事處遭到襲擊。人們普遍認為，這兩次事件都是國民黨內反對政協協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為。[[31]](#_31_Guan_Yu_Xiao_Chang_Kou_Shi_J)

最后，人們把反戰情緒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種普遍的假設，即中共的力量由于國民黨的短處而正在擴大。政府應對在掌權的20年期間沒能克服自己的缺點負責。錢端升教授在分析國民黨的黷武主義與中共的武裝對抗之間的關系時，對于這一論點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他追溯了國民黨內支持孫逸仙與軍閥結盟的軍人勢力。當時那種基于利害關系的聯合，很快就發展成了一股國民黨內不易被清除的力量。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時，曾試圖切斷自己與軍閥的聯系，但它又在黃埔軍校繼續發展自己的軍人體制。北伐戰爭后的20年代末期，國民黨發展階段的軍政時期本該結束；但事實上由孫逸仙提出的訓政時期一點也沒有開始。蔣介石這個軍事首領還接管了政治領導權。蔣接著便開始與共產黨人作戰，這使軍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此后，中共不斷發展力量，蔣介石在國民黨政府內的權力不斷擴大，這兩者之間的一種相互加強的關系發展了。蔣的黃埔系軍人構成了國民黨內軍事集團的核心。他們由于接近蔣以及對軍隊的控制，成了國民黨內和政府內最重要的部分。錢端升斷定，一旦一個軍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權力，政治上的反對黨派除了求助于武器外，別無他途。因此，國民黨內和政府內軍人占統治地位，是造成這場內戰的終極原因。他提出要求，把軍人從政治中清除出去，將其置于一個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達了一種共同的看法。[[32]](#_32_Qian_Duan_Sheng____Jun_Ren_B)

經濟學家伍啟元教授甚至更強烈地斷言，政府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他的大多數同事傾向于把通貨膨脹視為戰爭的結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則不同，他把戰爭視為政府經濟政策的結果。這些政策導致了經濟的逐步惡化和財富分配的不均。中等收入的群體，“不包括貪官污吏之流”，都已看到他們的收入受到了通貨膨脹的侵蝕。與此同時，農民正在遭受種種壓迫，包括“由士兵、土匪、征糧、征兵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各種劫掠”。伍教授問道：“由于社會就是如此狀況，不管有沒有中國共產黨，能沒有一場內戰嗎？”[[33]](#_33_Wu_Qi_Yuan____Cong_Jing_Ji_G)但是《觀察》的社長儲安平則在評1947年美國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關于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報告時，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眾的看法：

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為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蒲立特先生有沒有想到，共產黨究竟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據本文作者個人的看法，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發展到今天這樣龐大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以致使人民覺得前途茫茫，轉而寄托其希望于共產黨？[[34]](#_34_Chu_An_Ping____Ping_Pu_Li_Te)

老一代人像學生那樣，看來并不歡迎一個由共產黨所控制的政府。例如儲安平期望1946年英國工黨取勝能證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和民主。對于中共，他所擔心的是那種看來要接受的政治生活。他對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對民主，以及共產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在這方面是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懷疑。關于中共在對付個人，對待審查制度，對待知識和政治自由以及對待文學藝術方面的態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意見。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認為，如果說國民黨的工作在所有這些方面缺點不少，那么毫無疑問中共就更差。[[35]](#_35_Chu_An_Ping____Zhong_Guo_De)沒有任何人愿意去爭辯，中國共產黨最終的目的絕不是實現共產主義。但是他們不認為中共能夠通過武力去實現它。

軍事上明顯的僵局因此被認為為雙方妥協，也為兩黨在其中能夠相互監督的聯合政府提供了基礎。這個目標，馬歇爾將軍在1946年感到無望時就已經放棄，而中國的那些既非共產黨又非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卻在其后兩年多的時間里仍希望它能以某種方式實現。對于國民黨政府來說，其最終的結果是，連它自己選區里的主要團體都拒絕支持它與中共的斗爭。在沒有使戰爭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況下，國民黨領導人已經無法逆轉公眾的結論，即他們正在犧牲整個國家的利益，以便他們自己繼續掌權。即使如此，絕大多數始終不渝地大聲疾呼贊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實際上并沒有拋棄政府，直到其命運在戰場上被決定時為止。

## 共產黨力量的壯大

城市中國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權因而意義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當地授予的，而是作為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來的。無論如何，見多識廣的城市公眾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長的權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農村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經常被引用來作為中共在農村的力量的基礎，它使中共能在那里“扎根”，而政府對于這種挑戰完全束手無策。

但是，與共產黨人自己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說法相反，他們對農民的吸引力并不只是以租佃收益為基礎。抗日戰爭期間，他們放棄了土地改革，明顯地贊成更有節制的減租減息政策，這種政策的目的是促進所有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階級的統一戰線。在直接受到敵人威脅的地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甚至連減租都暫緩進行。但是在較為安全的地區，這一政策仍在進展，盡管并沒有正式公開承認，在1945年以前，它包括對一份長長的清單上的不平事項的抨擊。這些不平事項包括惡霸、低工錢、貪污腐敗、不繳納稅款、特務、土匪、盜賊甚至蕩婦。黨重新明確雙減政策就是要消滅農村中“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剝削”，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在1937年以后共產黨擴展的主要地區華北，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因為那里的農民常常擁有他們耕種的土地，租佃并不總是一個關鍵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用來貫徹這一政策的方法。清算斗爭，或者說結清過去剝削賬的斗爭，1943年以后成了執行黨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后仍然如此，在農民要求的基礎上，無論何種緣故的過去的剝削總數都按現金、谷物或其他財物確定、結算。從剝削者那里收繳收入，再以各種變得更為直接的和平均主義的方式重新分配。這種做法不僅鼓勵農民回憶過去所受的各種傷害，讓他們從多種剝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還靠推動農民對村里有權勢者公開地、直接地陳述他們賠償損失的要求，把他們直接拉進這一斗爭中去。這種對窮人的實際的經濟吸引力，因而便帶有與之互補的破壞性力量。它們共同體現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義。它不僅要摧毀主要“斗爭對象”，即地主和富農在經濟上所占的優勢，而且要摧毀支持他們和他們所支持的政權組織。這就使得共產黨人有可能以一個忠實于他們并得到斗爭中調動起來的農民強大勢力支持的組織去取代以前的組織。

與這種斗爭方法緊密相關，并就破壞性潛力和為今后樹立先例來說都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是貫徹黨的土地政策的群眾運動方法。其指導原則，就是經常被引用的毛澤東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尤其是“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思想，運用這一原則，毛澤東在1945年11月寫道，減租必須是群眾斗爭的結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賜；斗爭中發生“過火現象”是難免的。但是“只要真正是廣大群眾的自覺斗爭，可以在過火現象發生后，再去改正”。[[36]](#_36_Mao_Ze_Dong____Jian_Zu_He_Sh)的確，這種過火現象不僅無害，而且對于削弱“封建主義勢力”有積極的意義。中共主持的山東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環境中，以“群眾運動規律”的說法，完全肯定這一過火思想或左派觀點。在運動的最初階段，過火現象可能是危險的，因為群眾還沒有被充分發動起來去對付敵人。只有在組織已基本建立，干部得到培訓，積極分子已被發現和農民受到鼓動之后，才能開始進入運動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斗爭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左派觀點和過火現象是難免的。干部應“幫助群眾斗爭地主，砸爛地主階級在農村的反動統治，建立群眾的優勢力量”。必須反復地擊退地主的反攻，直到他們明白除了順從外別無選擇。這導致第三階段，此時團結就成為指導原則。黎玉解釋說，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最大的錯誤既不在于過左，也不在于過右；而在于在發展群眾運動的條件下錯誤判斷一個階段已經完成而下一個階段將要開始的時刻。[[37]](#_37_Li_Yu____Lun_Qun_Zhong_Lu_Xi)黨不僅已經發現了喚醒農民的問題，而且也發現了如何利用農民自發暴力的破壞力問題，這種暴力的強弱是當地苦難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只有當某些軍事和政治的先決條件在整個地區落實之后，土地政策以及它所導致的階級沖突，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村莊的“一切工作之本”。對日戰爭期間所認定的成功地貫徹減租政策的基本先決條件，是有能力對付軍事和政治的敵人，保護這一政策。抗日戰爭動員了人力，而當1943年日本的力量開始削弱時，中共在整個華北地區提供了創造這些先決條件的必不可少的領導。這種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和軍事保障，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從未取得過的條件，它是直接由共產黨人開創抗日運動的成功努力形成的。

1945年以后，黨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夠成為中共與華北“基本群眾”的關系的關鍵，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窮人和無地者心愿的基礎之上。除了通過分配“斗爭果實”而提供的物質刺激外，共產黨人還能就所有農民顯然理解為他們最直接的苦難的問題——專斷地利用政治權力和在村社的社會地位——提出解決辦法。中共在利用這些問題——連同所有其他與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無酬勞動、負債等相關的問題——的過程中，找到了一種方案，可以利用它把發動來抵抗日本的軍事—政治運動轉變為一個能建立新的土生土長的政權組織的運動，一旦日本戰敗，這個政權組織通過公眾參與和支持將得到承認。[[38]](#_38_Su_Shan_Nuo__Pei_Po____Zhong)

1946年的“五四指示”，是正式從減租減息轉回到土地改革的標志。但它并沒有突出強調這兩種政策間的區別。這一指示事實上只是承認了幾年來共產黨解放區所著手進行的一項發展。與這項發展相一致，該指示認可了把財產從持有人手中轉移到無財產者手中的幾種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售和一種土地分配方案。但是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棄，因為它們是在對剝削者和掌權者毫無懲罰的情況下實行的。1946—1947年，緊隨而來的更典型的后果是清算斗爭，接著是對斗爭果實再分配的日益增多的平均主義行為。這一過程最后達到沒收地主的全部財產，包括他們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動產；所有農田和其他生產工具差不多都是重新平分的——如同1947年的土地法所闡述的那樣。

到1946年年底，即政府向共產黨解放區的軍事進攻開始后不久，毛澤東概括了土地改革在共產黨的防御戰略中的作用。他斷言，執行了五四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才堅定地和共產黨一道反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他聲稱，凡沒有執行這一指示，或借口戰爭忙而忽視土地改革的地方，農民即采取“觀望態度”。因此，他指示所有地區，不論那里的軍事形勢怎樣，都應該領導農民執行五四指示。[[39]](#_39_Mao_Ze_Dong____San_Ge_Yue_Zo)

黨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黨把土地改革看作贏得群眾真心實意地響應參軍運動的基本條件。據報道，1947年初，在山東、河南交界的12個縣中，5萬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后立即聚集在共產黨的軍旗之下。據稱，在土地改革前的1946年，同一地區的一次類似的征兵運動就沒有能發展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40]](#_40_Xu_Yun_Bei____Can_Jun_Yun_Do)

當然，征兵只是共產黨式戰爭必不可少的支軍工作中最直接、最即時而必需的因素。在“人民戰爭”式的作戰中，正規軍對廣泛的平民支援網的依靠，在抗日戰爭期間就已在發展，1945年以后還在繼續，盡管這時游擊戰的作用已經不那么重要了。這種平民支援網包括民兵、地方自衛隊、婦聯和農會。

民兵 被組織起來，比較理想的是每縣數千人，通過擔負站崗放哨、守衛新占領地區、進行牽制性活動等任務支援正規軍。民兵也負責保衛地方黨和政府的組織，看守犯人，鎮壓地方上的反共活動，揭露敵特以及保持交通線的暢通。

地方自衛隊 是在村級和區級組織起來的。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向前線運送補給品，向后方運送戰利品和傷員。他們在村里組織軍運隊和擔架隊來完成這一任務。所有年齡在16歲至55歲之間的強壯男性平民，當軍隊需要時都有義務參加。

婦聯 維持村莊的警衛組織，密切注意村里的外來者；她們還協助醫護工作和從事手工業生產，以支援軍事工作。

農會 負責軍隊的征兵運動，同樣，青年組織動員其成員參軍和從事后方勤務工作。

最后，所有戰區的平民都要服從部隊和地方政治當局的命令，修補防御工事，挖戰壕，救助傷員和主動報告敵特活動，以支援戰爭。[[41]](#_41_Zhe_Yi_Zhan_Shi_Zhi_Yuan_Gon)

不過這是理想的模式，其實現首先取決于貫徹土地改革的進程。它也并不像當時新華社發表的報道所慣于暗示的那樣容易。這些報道描繪了土地改革同農民由于物質刺激和害怕地主報復而加入中共一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42]](#_42_Li_Ru_Xin_Hua_She_Yan_An_194)但同一時期的黨內文件卻表明因果關系并非如此直截了當，成果也并非如此容易取得。相反，農民往往害怕參加這一斗爭，他們唯恐國民黨可能回來，讓斗爭對象對他們報復，而這種情況確實多次發生。這種擔心由于1946—1947年政府進入根據地時遭到慘重損失這一現實而增強了。此外，農民也往往不情愿離家到新攻下的地區參加戰爭。而且農民的這種不情愿，還從地方干部態度不堅決上反映出來。例如，某些軍隊干部并不懷有真正的階級仇恨。他們參軍主要是為了反抗日本人，保衛他們的家。他們中的很多人自己是地主或富農出身，從未想過要消滅封建主義，更沒有想過要把他們的家產轉交給農民。由于一些地主也參加了抗日斗爭，有些干部甚至還同情他們并設法保護他們。很多地方非軍職干部也不喜歡軍隊的征兵工作。他們不得不努力克服農民開始時由于擔心國民黨回來而不情愿對地主進行斗爭的想法，然后緊接著要求農民保衛他們的新土地，免受進攻的國民黨軍隊的威脅。[[43]](#_43___Song_Ren_Qiong_Tong_Zhi_6Y)

作為克服這些不足的手段，黨規定了群眾路線的征兵方法，并概括地提出了工作步驟。在村民大會上，積極分子要解釋征兵運動的重要性，鼓勵農民提出他們的條件。村里的所有群眾組織都要參與消除農民的疑慮以及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農會要討論并決定誰該不該志愿參軍；婦女團體接到要求，要動員其成員鼓勵家里的男人去參軍。在村民們的認識因此而提高后，各種競賽運動便可以發動起來，用先進村的事例去影響較落后的村子。各個村莊要命名志愿參軍的模范家庭和模范農民，以激勵其他家庭和個人。在這一階段，必要時一些中共黨員本人應站出來，帶頭參軍。

在土地改革還沒有徹底實行的村莊里，征兵運動可在分田分財的同時開展。不僅要把地主的財產分給農民，除此之外，那些被認為是惡霸的地主還可能被關押甚至被處死。一份報告宣稱：“必須摧毀他們的封建統治。……經驗證明，只要完全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糧食并把他降到中農的水平……他在村里就不可能繼續持原來的態度。”[[44]](#_44_Li_Zhen_Yang____Jia_Ji_Bian)很明顯，給農民以物質利益并不是土地改革的唯一目標。同樣重要的，是這場運動所產生的不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的破壞力。因此，對1946年某些邊區一度發起的獻田運動提出的一種批評是，它沒有經過斗爭就完成了經濟上的再分配任務，其結果是，這一運動既不能達到推翻地主，也不能達到農民政治上和心理上解放的目的。[[45]](#_45___Guan_Yu_Guan_Che_Geng_Zhe)1948年10月，毛澤東宣布，在前兩年，黨“已經動員了大約160萬左右分得了土地的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46]](#_46_Mao_Ze_Dong____Zhong_Gong_Zh)無論如何，提供的利益與獲得的支持之間的環節就是斗爭運動。因為它能使共產黨人把通過財產的再分配而激發起來的最初的階級覺悟，轉變成從事戰爭所必不可少的特種支持。至關重要的是，這場有眾多目標的斗爭運動摧毀了農村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支配地位。

隨后的新的鄉村政權機構的建設，是進行土地改革“這一切工作之本”的最后一步。那些最積極參加這場具有多種特點的控訴運動的農民，為中共提供了新黨員，也提供了新的地方領導干部。那些得到了土地財產的農民，成了農會和其他村組織的骨干。這是一種由農民自己進行管理的組織機構，共產黨因此對它擔負征收糧食稅、發展地方民兵、組織軍事運輸隊以及對不想志愿參軍者施加壓力的責任可以信賴。這些都是黨在農村立腳的基礎，的確可以保證堅持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軍事斗爭所必需的糧食和人力供應。[[47]](#_47_Nei_Zhan_Shi_Qi_Tu_Gai_Yun_D)這樣，中共就能利用日本入侵和中國農村財富、權力分配不均所激起的破壞能量來為自己服務。這一成就使國民黨政府沒能對日本人和國家主要農業基礎的惰性提出的挑戰做出同樣反應這一事實愈加顯得突出了。

## 1946—1949年的內戰

1946年11月初，蔣介石向馬歇爾吐露說，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在從前使它造成分裂的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武力是解決同中共沖突的唯一手段。[[48]](#_48_Fan_Si_Lai_Ke_Bian____Ma_Xie)這一決定不僅是以對共產黨的弱點，而且是以對他自己的長處作出持久的錯誤估計為基礎的。馬歇爾在其使華的第一年中，曾多次盡力警告蔣介石他所面臨的某些危險。馬歇爾甚至忠告說，政府的作為“可能會導致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因為“目前正在發展的混亂局面不僅會削弱國民黨，還會向共產黨提供一個削弱政府基礎的絕好機會”。[[49]](#_49_Tong_Shang_Shu__Di_196Ye)

1946年10月，馬歇爾評價共產黨的軍事戰略，向蔣指出，盡管他們在退卻，但是并沒有投降。當共產黨人放棄城市時，他們并未損失軍隊，既然他們拒絕固守和戰斗，那么顯然他們不想損失軍隊。由于他們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夠在軍事上給他制造無窮無盡的麻煩。[[50]](#_50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最后，當馬歇爾準備離開中國時，他再次勸告蔣介石說，共產黨人現在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已經很強大了，國民黨政府依靠軍事手段很可能摧毀不了他們。蔣對此的答復是，一旦中共的軍事力量被摧毀——這一點他確信在8個月到10個月之內就可完成——解決共產黨問題就不會有困難。[[51]](#_51_Fan_Si_Lai_Ke_Bian____Ma_Xie)

他的戰略是首先收復所有前線上的城鎮，控制長江以北的主要交通干線。然后政府軍可以從這些據點和鐵路走廊進入共產黨的解放區，重新建立對較次要據點的控制，并最終控制農村。根據這一戰略，政府軍在1946年7月發動了全面進攻，共產黨的歷史編纂學把這次全面進攻當作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的標志。

### 第一年，1946—1947年：退卻

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第一年里，政府軍實際上奪取了除哈爾濱以外的所有東北城鎮，收復了蘇北的縣城，占領了張家口和延安，控制了河北和熱河省的大部分，掃清了大部分隴海和膠濟鐵路線。此后，拉鋸戰在長江以北所有中國主要鐵路線上展開。這些鐵路，除了自蘇北海岸直通陜甘邊界附近的寶雞的隴海線和橫貫山東的膠濟線外，還包括津浦線和平漢線。在滿洲，戰斗主要焦點所在的鐵路，是唯一從華北通往東北幾省的北寧線，以及連接四大城市沈陽、四平街、長春和吉林的鐵路。隨著戰斗的發展，戰爭的兩個主戰場變成了滿洲和華東，后者包括江蘇和山東。

共產黨軍隊在1946年7月改名為人民解放軍。[[52]](#_52_1945Nian_8Yue__Yan_An___Jie)他們遵循從城鎮撤回農村的戰略方針，在政府的進攻面前主要保持防御態勢。9月，毛澤東提出了解放軍將要遵行的戰略戰術要點。毛解釋說，在抗日時期，共產黨軍隊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輔。隨著國內戰爭情況的改變，雙方的位置也將發生轉變。但是，政府軍還處于進攻地位，其人數和武器裝備都優于共產黨的軍隊。因此，在力量的對比發生轉變以前，后者必須堅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這一具有優良傳統的作戰原則。

全殲和速決是這種戰爭的特點。殲滅敵軍不但成了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兵員的重要來源，因為俘虜來的敵軍通常要編入共產黨軍隊。殲敵的目標應是消滅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奪取地方。力求速決的目的在于當最終不能殲滅敵人時，可以迅速避開敵人，把傷亡減到最小程度。毛澤東斷言：“實行這種方法，就會勝利。違背這種方法，就會失敗。”[[53]](#_53_Mao_Ze_Dong____Ji_Zhong_You)這里所論述的要點，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作戰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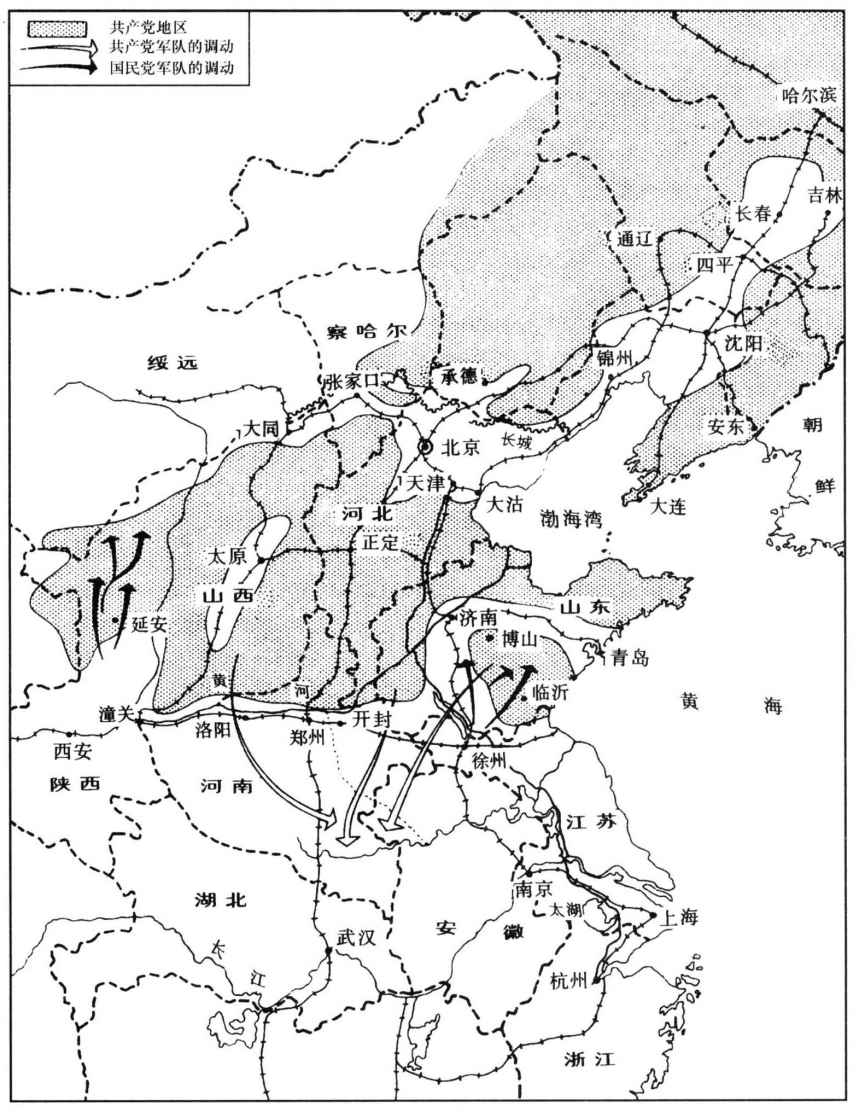
政府在1946年7月第一周的進攻中，包圍了漢口以北鄂豫邊界上的由李先念和王震率領的共產黨部隊。他們突破包圍圈，成功地回到了共產黨在陜西的根據地。政府雖然消除了共產黨軍隊對這一地區的威脅態勢，但后者的兵力卻保存下來，以圖他日再戰。政府宣稱，在山東，膠濟線上的共產黨軍隊已于7月17日被清除。但是，由于他們的不時騷擾，鐵路運輸到9月底仍沒有恢復。也是在7月，政府軍渡過黃河進入晉南。但是，在該省東部，共產黨軍隊仍能夠切斷從省會太原通往石家莊的鐵路。[[54]](#_54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__1)

在蘇北，7月的進攻是隨著政府軍從長江北進、從津浦路東進開始的。那時，共產黨控制著這一地區的29個縣。到第二年春季，政府軍奪回了該地區的所有縣城，并在國民黨的控制下重新建立起縣政府。在各地，共產黨人面對敵人優勢兵力的進攻，都實行了撤退原則。與正規軍一起撤退的還有大部分民兵、黨的干部及其家屬。這一生存戰略使他們保存了主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晉冀魯豫。政府軍進入共產黨的一個主要根據地晉冀魯豫解放區后，他們繳獲的文件透露了這一地區遭受損失的程度。政府在這一地區的收獲是大量的，也是沒有估計到的。例如，冀魯豫分區的64個縣，有49個被政府軍占領。1946年中國共產黨在該地區控制的35座縣城中，到1947年1月也有24座陷落，這是中共沒有料到的。他們不得不修改戰略，開始做長期游擊戰的準備。中共的文件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戰略，在逐漸殲滅敵軍的同時，共產黨的正規軍及其民兵要保持完整無損。蔣介石對他的80%一90%的進攻軍隊，沒有來源補充。其中一份文件指出，只要我們保持斗志，繼續殲滅來犯之蔣軍，我們就不僅能夠阻止敵人的進攻，也一定能夠變防御為進攻，收復所有失地。[[55]](#_55_Qu_Dang_Wei____Guan_Yu_Kai_Z)這一戰略是正確的，但是在1946—1947年的冬天，勸勉是不足以保持斗志的。



地圖17（a） 內戰（1946年）



地圖17（b） 內戰（1947年）

撤退原則作為一種游擊戰策略，不僅應包括撤退軍事和政治單位，而且還應包括疏散當地居民，其目的在于保存人口、村級組織和糧食貯備。然而，在1946年，有些村莊并沒有為恢復游擊戰的條件做準備。其結果是，干部和防御部隊逃走了，沒有武裝的農民在村的組織遭到破壞的同時，付出了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如在蘇北，國民黨主持的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來取代了這些組織。隨后便是還鄉團的到來。這是一些由地主和其他一心要恢復他們地位的人所率領的武裝部隊。他們開始清算自己的賬目，奪回已被共產黨分給農民的土地和糧食。有關反攻倒算的報道比比皆是。[[56]](#_56_Guan_Yu_Zhe_Xie_Shi_Jian_De)文件承認在這一地區有無數的農民被殺害。一個用了近10年時間才建立起來的共產黨老根據地，在短短幾個月里就被這些人毀掉了。殺回來的共產黨軍隊，在重新奪回的地區里遭到農民的咒罵，因為沒能保護他們。農民們不愿意恢復農會和組織新的民兵部隊，甚至不愿出席大會，他們對共產黨在這些地區堅持下去的能力幾乎沒有什么信心。[[57]](#_57___Ji_Lu_Yu_Wu_Ge_Yue_Lai_You)

但是，再次進行像對日作戰那樣的長期游擊戰的計劃并沒有完全實現，因為到了1947年5月，政府的進攻已經開始減弱。政府的兵力這時過于薄弱地分散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內，不能像日軍在其入侵同一地區的高峰時能做的那樣，占領次要的據點。與此同時，共產黨正規軍主力部隊大部分仍保持完整，已經停止退卻，并可以發動若干小規模的反攻。在山東，共產黨的軍隊正開始掌握主動權；在滿洲，他們已能夠發動有限的進攻。共產黨宣稱，在全國范圍內敵人已有90個旅被消滅，當這一數字達到100時，軍事力量的對比將有利于共產黨方面。[[58]](#_58_Zhang_Er____Jiu_Ge_Yue_You_J)

實際上，軍事力量的對比在1947年就已迅速轉變。美國軍事分析家在1946年9月曾預言，由于需要更多的軍隊守衛過長的交通線，政府的進攻將在幾個月內陷于停頓。然而，由于政府軍在訓練和裝備上所占的優勢，這些分析家預見到一種持久的僵持局面；外國觀察家“普遍認為，共產黨在與政府軍的旗鼓相當的抗衡中，無論是進攻還是防御都不會贏得最終勝利”。[[59]](#_59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__1)

沒人預見到共產黨的指揮員們能把他們抗日游擊戰的經驗轉移到運動戰的戰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共產黨人在保存和發展自己力量的同時，立即開始部署比他們用來與日軍作戰更大的部隊，零敲碎打地襲擾和殲滅敵人。通過將民兵和俘獲的敵軍士兵編入正規軍，以及通過伴隨1946—1947年共產黨地區土地改革的大規模征兵運動，人員的損失得以彌補。土地改革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共產黨政權在農村的發展，也使得在1946年政府進攻中不是首當其沖的地區的民眾有可能支持共產黨，這種支持對于加強該地區的軍事行動是必不可少的。

東北。在東北的總司令林彪的指揮下，這一戰略最早被成功地運用于滿洲。1946年底，他的部隊已推進到松花江以北，政府軍對其最后目標哈爾濱做好了春季進攻的準備。但其后，林彪卻向政府占領的地區開始進行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突襲，這種打法使他在仲夏掌握了滿洲的主動權，并在兩年以后的決定性勝利中達到頂點。他的時機選擇符合一種突擊和聲東擊西的戰略，在東北，嚴寒的冬天開始以后是一個不太可能進行軍事部署的季節。1946年11月，當林彪的部隊越過冰封的松花江，首次發起一次小規模的牽制性攻擊時，這一行動的重要性還不明顯。在這次短暫的南下后，他們迅速撤了回去。1947 年1月6日，一支估計為6萬人的部隊再次過江。這一次，政府軍至少在一次戰斗中傷亡慘重，他們在入侵者撤出前幾乎抓不到什么俘虜。政府軍的指揮官們因而很擔憂，因為他們預料到了第三次攻擊。這次攻擊發生在2月中旬，但直到2月底才結束。林彪的部隊迅速撤離，而沒有與集中的政府軍接戰，政府軍這次不肯像1月份作戰時那樣落入圈套。

共產黨第四次越過松花江作戰，從1947年3月7日持續到18日。這一次他們重創了政府軍一個師，在撤回前繳獲大批武器彈藥。這些短程軍事突襲的重要性，至此已顯而易見了：政府軍已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東北的戰略計劃已被打亂。對哈爾濱的威脅被延誤，共產黨的地位則鞏固了。1947年5月，林彪接著又發起他的第五次渡江行動，展開了一場密切協作的戰役，這一戰役標志著結束滿洲戰爭行動的開始。一支有40萬人的部隊，參加了5—6月進攻滿洲中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作戰行動。其主力部隊進攻的目標，是地處滿洲兩大城市長春與沈陽之間的四平街。在對四平街五個星期的圍城作戰期間，進攻的共產黨軍隊傷亡了約4萬人，而且未能阻擋住派來援救四平街守軍的政府增援部隊的到達。林彪在6月30日撤去對該城的包圍，并撤過松花江后，他本人承擔了這一決策錯誤的責任，這次錯誤導致了政府四平街防御戰的勝利。

然而，盡管林彪遭受了挫折，他的東北野戰軍仍然獲得了主動權，并且把主動權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最終勝利。政府軍已被迫放棄了松花江北岸與長春—吉林戰區之間的前哨基地，其前線從六個月前的位置南移了大約150英里。政府所據守的長春、吉林和沈陽這幾座城市，也因為連接它們的鐵路線遭到破壞而被孤立，其中的幾條鐵路直到戰爭結束后才恢復。政府軍在武器、物資、人員和士氣方面遭受的損失，一直未能恢復過來。[[60]](#_60_Guan_Yu_Song_Hua_Jiang_Gong)

隨著共產黨人在東北和其他地區不停地展開進攻，政府軍陷入一種固守防御的戰略。典型的情況是，他們要么從已經失去任何戰略價值的過于分散的據點撤退過晚，要么留在城墻和戰壕后的據點里，把主動權留給對手，任隨他包圍與否。據當時的美國軍事分析家指出，政府造成東北迅速潰敗的原因，是兵力最初過于分散和軍隊領導無能，最明顯的是保安司令杜聿明將軍的指揮失當。但是，司令的更換也未能挽救政府在東北搖搖欲墜的命運。1947年年中，即共產黨的第五次進攻之后，東北的指揮官換成陳誠將軍；而在1948年初的共產黨第三次進攻之后，他也被免職。政府軍在裝備和訓練方面仍然占有優勢。然而，共產黨在戰略戰術運用上和士氣、戰斗意志以及共同的目的意識上所占的優越性日益明顯可見。

士氣因素當然有多方面的根源。除了國民黨方面的腐敗、無能以及決策失誤產生的消極影響以外，尤其在東北，還存在地方主義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政府接收東北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張作霖大帥家族所支配的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重新在那里出現。政府把東北三省劃分成了九個行省，并在實際上任命外來人擔任所有最高職務。而政府在當地的幫手，則多是些地主以及其他與日本人有過勾結的人，因為只有這些人既不忠于共產黨，也不忠于少帥張學良，他是張作霖的兒子和明顯的繼承人。少帥因他在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時所起的作用，繼續遭到拘押，也許因為他仍享有眾望，盡管人們普遍預料他會被釋放，但他還是被流放到了難以逃身的臺灣。

根據當時的記述，日本投降后，東北對國民黨的最初支持看來是真心誠意的。但是不久“南方人”就讓人覺得討厭了。他們不公平的接收政策和官員貪污受賄所造成的怨恨導致地方主義迅速復興。如果政府在東北的行為不那么容易受到批評，那么，地方性忠誠的影響就不會如此強烈了。東北，像臺灣那樣，是一個被日本人統治很久的地區，經常聽到那里的人民評論說，日本給了他們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政府。尤其是政府在這一地區反對共產黨的努力，如果沒有當地領袖人物的參與，幾乎是不能成功的。然而國民黨對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卻有著如此強烈的戒心，甚至對他們愿意提供的幫助都一腳踢開。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把這一錯誤追溯到蔣介石本人，蔣依然“對當地的滿洲人抱有成見”。例如一個當地成立的“東北動員委員會”主動請求組織一支防御部隊與共產黨人作戰。但是這個提議遭到拒絕，盡管政府的司令官們根本沒有能力組織一支有效的地方游擊隊。一個曾在大帥和少帥麾下效力的騎兵軍官馬占山將軍，同意為政府工作，被任命為東北副總司令，[[61]](#_61_Ma_Zhan_Shan_1946Nian_9Yue_R)但他從沒有獲準做任何事，也沒有獲準指揮任何部隊。同時，政府在東北的司令官們不得不依靠一些“外來人”作為他們部隊補充兵員的主要來源。政府軍由于在東北的征兵運動失敗，因此只能從關內各地獲得喪失和受損的師的補充兵員，而關內各地幾乎經受不起失去這些兵員。[[62]](#_62___Li_Zong_Ren_Hui_Yi_Lu)

共產黨人從這些措施所激起的民眾怨恨中得到了充分的好處。他們避免采取中央政府對待東北人民的那種倨傲態度，處處都盡可能使用當地人才。大多數從張作霖和張學良的舊東北軍中幸存下來的部隊，就像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那樣，轉向了共產黨。共產黨將他們當作聯軍歡迎他們，并允許他們保留原貌，作為林彪全面指揮之下的一支非共產黨部隊。隨著共產黨掌管的地區的擴展，東北野戰軍已能靠當地征兵擴充正規部隊；它還組織了一支有戰斗力的第二線非正規部隊，并動員了一百多萬支前民工，在后勤部的指揮下執行任務。

當時的一位作者概述了共產黨的成就：

須知共產黨挖起鐵軌埋地雷、丟炸彈，并不是共產黨人在這么做，而是老百姓替他們這么做的。中國共產黨過去在東北沒有兵，現在他們有的是中央不要的兵。共產黨過去沒有槍；現在有的是中央政府保管不善送給他的，甚至還有偷賣給他的槍。中國共產黨沒有人才；現在他們任用的是中央不要的棄材。[[63]](#_63_Qian_Bang_Kai____Dong_Bei_Ya)

國民黨政府由于不顧民眾要求與感情的慣常做法而受到很壞的對待，幾乎不可能有比這更合適的例子了。

山東。共產黨人在江蘇—安徽—山東這一重要戰區內的退卻，與滿洲相比更難扭轉。在這一地區，政府軍兵力并非過于分散，而共產黨人也缺乏林彪在松花江以北所享有的退卻的安全庇護地。不過，華東共產黨軍隊的司令員陳毅卻采用了同樣有利的戰略戰術。在山東，許世友指揮的共產黨軍隊在一次爭奪膠濟鐵路控制權的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于1946年10月初在高密被擊敗。這條鐵路在政府的控制下重新開通，據報道，共產黨方面在北撤前傷亡了約3萬人。接著在1947年1月初，從蘇北撤下來的共產黨部隊與從魯中來的其他部隊合在一起，在魯南的棗莊向追趕他們的敵人發動反攻。政府軍被打敗，損失了約4萬人和26輛坦克，共產黨用這些坦克開始組建一支他們自己的裝甲縱隊。陳毅未能守住他新占領的陣地，但卻及時撤走了他在臨沂的指揮部，成功地伏擊了一部分被派來包圍他的敵軍。政府軍2月在萊蕪附近再次遭到失敗，又付出了3萬人的代價，并失去對膠濟鐵路的控制，這條鐵路的交通再次被封閉。

政府的報復是在1947年4月至5月期間向陳毅的沂蒙山根據地發動的一次重大戰役。政府動用了約20個師近40萬人，去對付估計為25萬人的共產黨軍隊。但是，在5月14—16日魯中南孟良崮那次史詩般的戰役中，政府方面又一次損失慘重，據稱傷亡了1.5萬人。政府的整編第74師，這支前一年在這一地區與共產黨軍隊打過多次遭遇戰的能征善戰的部隊，被徹底殲滅。該師師長張靈甫，隨著他的大半官兵死于戰場，同參謀人員一起自殺。[[64]](#_64_Zhang_Ling_Fu_Zhi_Si__Qi_Shu)不過，陳毅的部隊在數量上仍居劣勢，他終于在7月份被迫撤離戰場，任由政府軍宣稱其在魯中南麻戰役中取得了勝利。但是，陳毅部隊的主力卻在重新部署，并準備重新投入戰斗。

國民黨軍事史學家后來對1947年山東諸次戰役中共產黨的實力和政府的錯誤，提出了坦率的評價：政府的指揮官錯誤地判斷了陳毅的意圖，因而也沒能在他的部隊撤離蘇北時牽制住他們。后來，在棗莊附近，政府軍沿路停下來休息，擁塞道路，行動極為緩慢。他們最終為自己的點線防御戰略所陷，而共產黨的主力卻基本上保持完整無損。政府軍的前線擴展得太寬，機動能力不強，因此無法防止個別部隊遭到孤立、包圍和被各個擊破。他們缺少夜戰經驗。步兵、空軍和炮兵的協同作戰也很差。坦克部隊由于雨天道路泥濘而無法調動。

相比之下，對手則輕裝就道，能敏捷地進入戰區和在戰區移動。共產黨在棗莊“轉移”兵力的好處是有代表性的。他們通過部隊從一點到另一點的迅速運動，切斷政府的交通線，攻擊其增援部隊，機動地制勝對手。陳毅的主力撤出臨沂時，在夜間沿著大路一側的山間小道秘密行動。空中偵察沒有發現目標，政府軍因而遭到沿路所掘壕溝中的伏兵的襲擊。孟良崮的失敗也被指責為情報有誤和空中偵察不力。74師認為陳毅的主力部隊已經北去很遠，因此遭到出其不意的襲擊，被包圍在一個不可能堅守的地區。此外，魯中長期以來就是共產黨的地區，那里的人力、物力已充分動員起來。中共在那里有一個準確可靠的情報系統和組織良好的供應系統。相反，政府的信息一點也不可靠，其部隊的補充兵員總是遲到，供應也不充足。軍事史家的這類記述還指出，“與共產黨相比，我們在情報、宣傳、反情報和安全保衛所有這些方面都相形見絀”。[[65]](#_65___Zhong_Guo_Nei_Zhan_____Di)

### 第二年，1947—1948年：反攻

1947年夏末，毛澤東評估了戰爭第一年的戰果，詳細說明了第二年的作戰計劃。蔣介石動用了他總共248個正規旅中的218個，損失了其中97個旅以上，或者說被毛的部隊殲滅了近78萬人。毛公布中共的損失是30萬人，大片土地被進攻的政府軍占領。第二年的首要任務將是放棄撤退戰略，并立即反攻。第二項任務是收復第一年的失地，殲滅內線之敵。[[66]](#_66_Mao_Ze_Dong____Jie_Fang_Zhan)

華中和華北。1947年夏季，共產黨人以開展全國性的反攻發起了戰爭的第二階段戰役。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獨目將軍”劉伯承，于6月30日引人注目地率領5萬大軍在魯西南渡過黃河，把正在東面同陳毅作戰的政府軍吸引過來。當陳毅退入山東之際，劉的部隊越過隴海鐵路，向南猛插300英里，在鄂豫皖邊界的大別山區開辟出一塊新的根據地，那里是20年代建立的鄂豫皖蘇維埃的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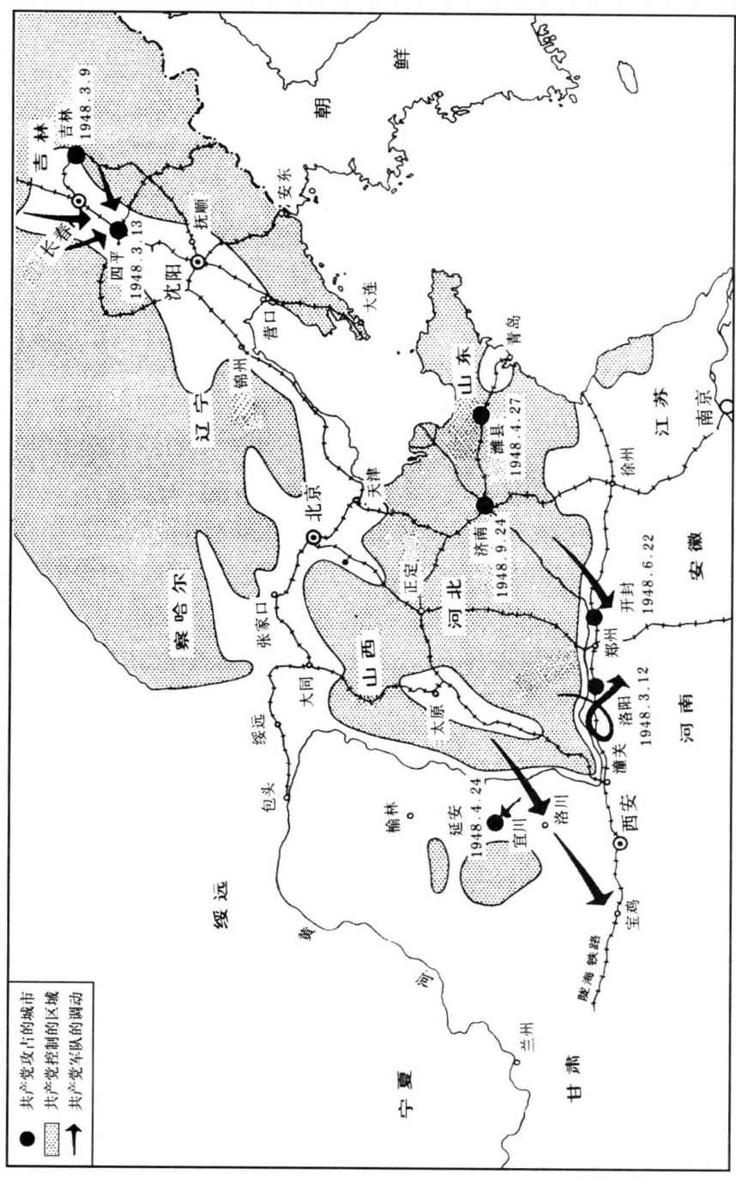
在8月底的一次與此相關的行動中，一支由陳賡率領的原屬劉伯承的2萬人的較小部隊，在晉南越過黃河，南進到豫陜鄂邊區，與劉的各縱隊取得呼應。一個月之后，陳毅率領部分華東野戰軍回師穿過魯西南，進入豫皖蘇邊區，填補了劉部移出的地區。共產黨因此將戰爭向南推進到華中的國民黨統治區，在黃河與長江間開辟了新的戰場。這些初步行動把陳毅、劉伯承和陳賡的部隊聯結在一起，使他們得以在適當的位置上協調某些戰略上最重要的作戰行動。其時他們就能攻擊華中的所有重要交通干線，阻斷長江流域與北方之間的鐵路運輸。[[67]](#_67_Mao_Ze_Dong____Ping_Xi_Bei_D)

與此同時，華東野戰軍在魯東和蘇北的其他部隊，打了一系列小戰役，到1948年年中，除了省會濟南和港口城市青島等少數幾個孤立的政府據點外，已經得到了山東全省。[[68]](#_68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1947年11月，聶榮臻率領的晉察冀野戰軍的部隊奪得石家莊，贏得了一次重大勝利。在得到這一重要的鐵路樞紐的同時，共產黨還獲得了大量物資；控制了平漢鐵路，并有了一個新的首都所在地，自1947年3月延安失陷以來，他們一直沒有首都。石家莊戰役還使得共產黨在華北的兩個主要根據地——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連成一片成為可能。此外，到1947年年底前，他們還控制了內蒙古地區的熱河和察哈爾兩省的大部分，以及除少數幾座主要城鎮外的山西和河北的全部。

攻占延安為國民黨人的戰爭努力提供了精神上的動力，盡管這證明是一個束縛部隊的軍事包袱，這些部隊在其他地方可能更有用。一位評論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離開晉南進攻延安，只不過是拿山西的30個較為富庶的縣去換陜西的45個窮困縣。[[69]](#_69_Li_Zi_Jing____Jin_Nan_Jie_Fa)1948年初春，彭德懷開始進攻。盡管政府從河南的開封—洛陽防區調了約2萬人去增援陜西的胡宗南，但他們并沒能守住延安，1948年4月延安再次易手。胡不得不放棄延安去追趕彭德懷，后者突然開始向四川行動。五月，彭在隴海線西端終點的寶雞附近的一次決定性失利中被阻截住，被迫返回陜北。但盡管遭遇了這次挫折，共產黨還是控制了這個省包括延安在內的大部分地區。

共產黨人立即利用政府調兵入陜而造成的河南防御上的弱點，向隴海線上的洛陽進攻。這座城市三次易手，最后以1948年4月初陳賡部隊的勝利而告結束。中共軍隊因而能夠奪取臨汾，這是政府在晉南的最后一個據點。5月中旬，共產黨的山西解放區與華中的劉伯承的根據地連成一片。到這個月月底，陳毅、劉伯承、陳賡諸路大軍在總司令陳毅的指揮下，經過數周協同行動，會聚于開封城下。6月中旬，他們奪取了這座城市，它是河南省會。盡管陳毅的部隊未能守住開封，并且隨后在附近的一次戰斗中實際上遭到失敗，但是洛陽—開封戰役成了這場戰爭的重要轉折點。共產黨軍隊展示了它們的能力，能夠在幾條戰線同時展開持續的進攻，并在寬廣的地域內進行大規模的陣地戰，這是從游擊戰轉向運動戰的最后一步。先前的主要戰斗是在山東和滿洲，石家莊和延安戰役之后不久，洛陽—開封的軍事行動已在華北開辟了一個新的主要戰區。這些勝利也使得一直被分割的共產黨各邊區的擴大和合并成為可能。晉察冀邊區和晉冀魯豫邊區在1948年5月合并為華北解放區。8月，統一的華北人民政府在石家莊成立。[[70]](#_70___Zhong_Guo_Nei_Zhan_____Di)



地圖18 中國共產黨的攻勢（1948 年春夏）

東北。到1948年年中，滿洲的力量對比出現逆轉，最終的轉折點到來了。1947年9月，林彪發起越過松花江的第六次進攻，這次行動的目標是完全孤立中滿和南滿的幾座大城市，并通過切斷北寧鐵路以斷絕與華北的陸上交通。這些目標在11月底基本上達到。[[71]](#_71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__1)作為第七次進攻先導的預備性攻擊，于12月中旬開始。東北國民黨軍隊的指揮權已由陳誠交到了衛立煌將軍手里。但是，林彪這時已強大到足以在三條戰線上同時展開攻擊。當第七次進攻開始時，共產黨軍隊從北、西、南三面包圍了沈陽。可是當國民黨增援部隊從長春和吉林空運進沈陽城時，林彪隨即將其主要作戰行動轉到這兩個城市的北面，包圍了與它們鄰近的四平街，這是兩年中的第三次包圍。這座城市在5月13日被攻占；國民黨人在前幾天已經放棄了吉林。從12月中旬至1948年3月中旬這三個月的作戰中，林彪的部隊總共攻占了19座城鎮。[[72]](#_72_Mao_Ze_Dong____Ping_Xi_Bei_D)

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拒絕了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大衛·巴爾少將提出的建議，即趁共產黨對沈陽周圍的壓力減輕之機，在還有可能時撤出東北。[[73]](#_73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于是，蔣介石就此失掉了挽救那些被派去接收東北的殘余軍隊的最后機會。到1948年年中，那里力量的對比發生了不利于蔣的不可逆轉的改變。共產黨此時宣稱，他們在這一地區擁有70萬正規軍，還有33萬地方部隊和第二線部隊，以及160萬支前民工。士氣日益低落的政府軍，人數只有約45萬，且沒有能投入作戰的第二線補充兵員。[[74]](#_74_Hui_Ce_En_He_Huang_Zhen_Xia)

根據政府的估計，到1948年6月，在全國范圍內，政府正規軍的實力與1945年年中相比已減少了1/3。政府軍現在的人數為218萬人，其中作戰部隊只有98萬人。共產黨方面有正規軍156萬，非正規軍70萬，據估計其中的作戰部隊為97萬人。重武器的數量，政府方面有2.1萬件，與之相比，共產黨有2.28萬件。[[75]](#_75_Cai_Xin____Gong_Chan_Dang_Zh)毛澤東在早些時候曾指出，政府方面的所失正在成為共產黨方面的所得，因為繳獲的敵人物資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投降的政府軍士兵則是新兵的重要來源。

### 第三年，1948—1949年：勝利

1948年3月，毛澤東已能通報：政府軍只在華中的兩個地區保持主動權，而在其他地方全是被動挨打。他預言，在取得一兩個最大城市，并將東北、華北、山東、蘇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區連成一片之后，就有可能在1949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估計可在三年之內打敗國民黨。[[76]](#_76_Mao_Ze_Dong____Guan_Yu_Qing)

共產黨現在有人有武器，又有進行大規模陣地戰所必需的體制和經驗。這些戰斗以1948年9月對山東省會濟南的成功包圍而揭開了序幕。共產黨的春季軍事行動使濟南完全成了一座孤城，9月出征河南的陳毅部隊已返回山東。還是早在滿洲時，美國顧問們就警告蔣介石說，他在濟南的部隊處境已經無望。但是蔣介石再一次拒絕撤走它們。對該城的攻擊于9月16日開始，10天之內解決戰斗。大多數士氣沮喪的守軍根本不肯戰斗，有些部隊實際上叛逃到了共產黨一邊，這是形勢正在轉變的一個無可置疑的信號。[[77]](#_77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

在濟南發生的由消極防御到叛逃和投降的變化，在戰爭的最后一年中多次出現，因為政府方面屢屢戰敗的心理影響很有支配力。這種情況無疑使政府軍毀滅的時間表大為提前，它反映在從1948 年9月中旬至1949年1月底的三次決定性戰役的過程中。按計劃對政府軍的三大集團發動協同總攻的戰役是：遼沈戰役，9月12日至11月2日，結果是滿洲的國民黨軍隊徹底失敗；平津戰役，11月21日至1月31日，它結束了政府在華北的抵抗；淮海戰役，11月6日至1月10日，它掃除了共產黨南下長江和渡江作戰的最后一個主要障礙。

遼沈戰役。這是林彪在滿洲發起的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進攻性戰役，更加鞏固了他在軍事史家和中國公眾中作為中國最偉大的軍事領袖之一的聲望。[[78]](#_78_Zhong_Xin_Ping_Jia_Lin_Biao)考慮到作戰的規模，東北的這次戰役的結束對政府來說，來得幾乎就像在濟南一樣快，雖然不像濟南那樣不光彩。林彪部隊發動最后一次滿洲攻勢的人數接近70萬人，而政府方面的部隊大概不足50萬人。三個主要攻擊目標是政府軍集結的幾個地方，即北寧鐵路上的重要補給中心錦州、沈陽本身和長春。最大的集團是兵力為23萬人的沈陽守軍。

對錦州的攻擊于9月12日開始，不過由于佯攻長春，出擊的目標并未立即暴露。錦州附近的政府軍在不到兩個星期之內，不是被包圍，就是被孤立。至9月底，飛機場遭到攻擊，彈藥已經耗盡，不得不靠空投供應守軍。盡管在附近一些地點尤其是在義縣，最初的戰斗很激烈，但錦州的守軍在共產黨軍隊不停頓的攻擊下還是抵擋不住，政府軍的兩個師戰敗，該城于10月15日被攻克。

10月初從沈陽派出的約10萬人的援軍，未能及時突破阻擊解救錦州。因而林彪接下來的第二個主要目標，就是將這股援軍在其未能撤回沈陽之前全部殲滅。他假裝向西南進軍，卻反而將其主力從錦州向東北方向移動。盡管再次激戰，援軍也沒能逃脫林彪極其迅速地布下的陷阱，在10月28日遭到覆滅。由于沈陽守軍已有半數兵力折損，該城只在極微弱的抵抗后，便于11月2日投降了。與此同時，長春軍民因共軍的包圍，已窘迫到幾近餓死的程度。以不可信任的云南人組成的第60軍，于10月17日叛逃到共產黨一方。該地的其余部隊也在不久后相繼投降，于是所有抵抗就此收場。

盡管杜聿明將軍早先已被證明無能，但在這次會戰期間，他又再次擔任了東北的指揮，而蔣介石則從他在北平的指揮部親自接手對軍事行動的指揮。共產黨的強大與政府的虛弱形成了對比，要想化解這一印象絕無可能。但是如美國駐沈陽總領事10月27日的電報所說：“如果政府不是落得如此悲劇性的下場的話，那么它上星期在東北的軍事策略就像是犯了喜劇性的錯誤。” 11月中旬，恰恰在林彪渡過松花江發動他的第一次進攻的兩年之后，政府在東北的最后一批守軍不是投降，就是南逃。在東北會戰的最后階段，政府至少損失了40萬人，包括它的某些最精銳的部隊，以及他們的所有武器和裝備。[[79]](#_79___Zhong_Guo_Nei_Zhan_____Di)

平津戰役。林彪的軍隊在取得滿洲的勝利之后，立即開始南下。隨后的平津戰役中，華北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的共產黨正規部隊會合在一起，總兵力達89萬人，由林彪全面指揮，而政府較為得力的司令官之一傅作義將軍率領的部隊大約有60萬人。林彪的主力部隊向長城以南疾進，進入平津地區，在西面得到已經威脅張家口的聶榮臻領導的華北野戰軍的支援。聶榮臻在張家口附近的任務，過去是阻止傅作義削弱北平的防御力量，派兵增援東北。現在隨著東北地區局勢趨于安定，聶的新任務是阻止傅作義向南增援蘇北的政府軍集團，這個集團是共產黨11月初發動的決定性的淮海戰役的進攻目標。因此，共產黨在平津地區的戰略意圖是，先將傅作義的部隊包圍在五個點上，而后依次各個解決，以便切斷他們的逃路，也防止增援部隊向他們靠攏。

在主力部隊于11月21日開始向關內進軍之后的兩個星期內，林彪的部隊抵達天津外圍至唐山西北的一個重要的新發展地區。在兩個多星期內，他們已經鞏固了自己的陣地。第一個主攻目標是傅作義最薄弱的一點，北平西北的新保安，那里的守軍在12月22日被聶榮臻的部隊擊敗。張家口也在兩天之后陷落。與此同時，共產黨對北平和天津的包圍也在不斷加強。天津的國民黨守軍司令決心抵抗，為阻止共產黨前進，放水淹了城外大片地區。其后他拒絕未經戰斗就放下武器，但共產黨軍隊在1月14—15日的天津會戰后獲得勝利。附近的塘沽港兩天之后陷落，5萬守軍從海上逃走。傅作義值此緊要關頭，逃路已被切斷，左近所有集結的部隊已經戰敗，他在北平的20萬部隊在人數上現已處于絕對劣勢，于是談判了一項解決辦法。他同意于1月22日將其部隊和平撤出城外，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共產黨軍隊于1月31日進入北平。在平津戰役中，政府又損失了近50萬軍隊，丟掉了中國兩個最重要的城市。[[80]](#_80___Zhong_Guo_Nei_Zhan_____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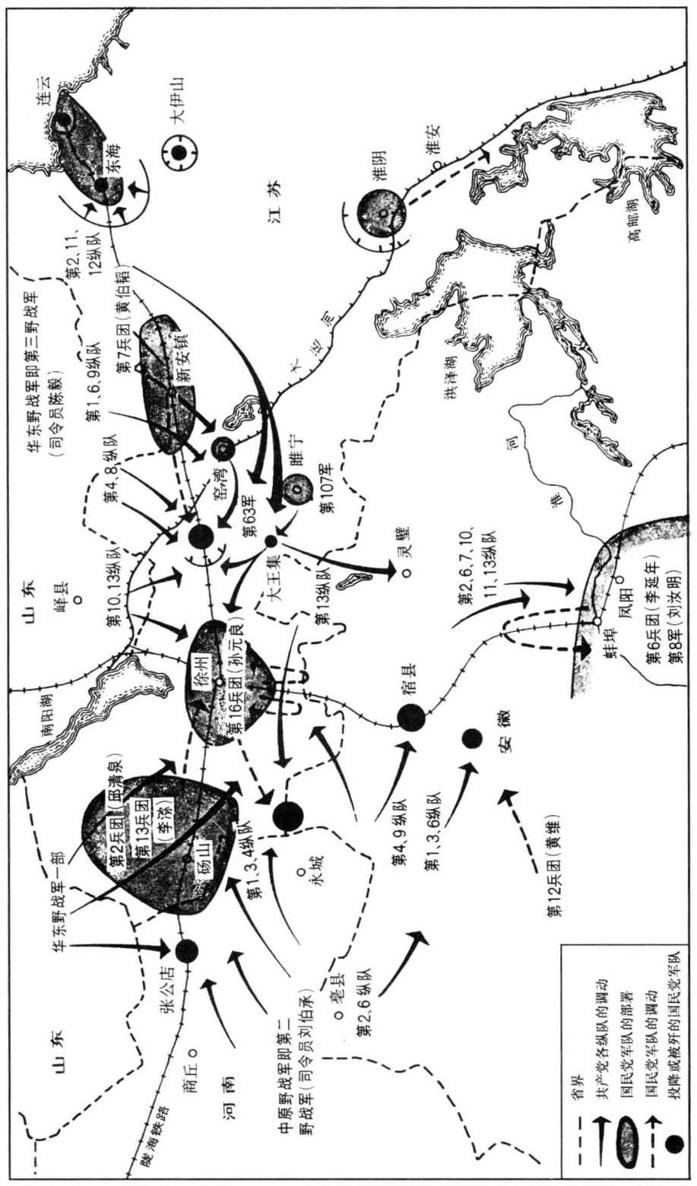
淮海戰役。內戰的第三個決定性戰役，與平津作戰同時展開。這一著名的65天的淮海會戰，從1948年11月6日進行到1949年1月10日。其主要作戰區域位于隴海線以南、淮河以北，故以淮海為名。戰斗集中于政府的“剿總”司令部所在地徐州市周圍，該市處于隴海與津浦鐵路交會的戰略位置上。這次會戰使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和中原野戰軍的司令員陳毅、劉伯承和陳賡的合作達到了頂點，他們在這一地區已共同作戰了一年多。

雙方正規部隊的兵力大致相當，每方都擁有50萬人以上。但是，共產黨已有很發達的民眾支前網絡，能夠另外動員200萬農民從事支持戰場作戰所必需的大量后勤工作。軍方和民眾的支前工作實際上擴展到江蘇、山東、安徽和河南四個省，由鄧小平領導的特設淮海總前委協調。政府軍的主要司令官是劉峙、杜聿明和黃維，劉峙任總指揮，蔣介石還像最后一次滿洲戰役那樣親自督戰。

淮海戰役大體上——雖然不是精確地——是按照1948年10月11日發出的、毛澤東起草的三階段“作戰方針”展開的。整個戰役如計劃指示的那樣，在兩個月之內完成。第一階段的目標是殲滅黃伯韜兵團。這一任務是陳毅的部隊在隴海線徐州和大運河之間的碾莊附近的會戰中完成的，這次會戰按計劃持續了兩個星期，從11月6日至22日。

第二階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位于徐州以南、靠近津浦路的雙堆集一帶的政府軍被殲。共產黨原估計政府的援軍將會來自隴海線的東端，即從青島海運來。然而蔣介石卻命令由黃維指揮的部隊從華中開來增援。縱然有這種變化，黃維兵團還是被迅速合圍。由安徽蚌埠附近淮河地區以北派來救援的縱隊，被共產黨的游擊部隊趕了回去，從徐州出動向南增援的大部隊也沒能靠近黃維，因為他們自己也被包圍，并在戰役的第三階段中被殲滅。

第三階段，也不是在共產黨原計劃所預料的作戰地點作戰，而是在徐州西南的一個地區——蘇皖邊界的陳官莊一帶展開。共軍把政府軍的三個兵團裝入口袋，并就地予以消滅。這支徐州地區的主力總計近30萬人，他們是按照蔣介石增援黃維的命令出城后被圍的。由孫元良率領的先遣兵團遭到包圍，實際上在12月初就已被殲。杜聿明指揮的是徐州的殘余守軍以及邱清泉和李彌。杜的軍隊最終被陳毅和劉伯承的聯合部隊團團圍困，靠空運不能得到充分供應，陷入幾近餓死的地步。在1月6日至10日的攻擊中，他們終于全軍覆沒。



地圖19 淮海戰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

在淮海戰役期間，政府又損失了50萬人的軍隊，其中30萬人被俘，其余非死即傷。司令黃伯韜和邱清泉陣亡，黃維和杜聿明被俘。孫元良和李彌將軍分別化裝成乞丐和商人逃離戰場。這一失敗消除了政府在長江以北的最后一道主要防線。[[81]](#_81_Hui_Ce_En_He_Huang_Zhen_Xia)

對于在淮海的失敗，蔣介石及其指揮官們只能指責他們自己。這一戰役不僅標志著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有效抵抗的結束，而且也標志著多年來已成為國民黨作戰特征的軍事失誤、管理失當和叛逃現象已達到頂峰。據信蔣介石本人做出了在徐州平原作戰的決定，而不是像所建議的那樣撤向淮河這一天然屏障，而且他把這個戰場的總指揮權交到并非他最得力的將軍劉峙和杜聿明的手中。最后，在戰斗進行期間，他還親自干預作戰計劃，發布作戰命令，這是他的一貫作風。由于權力如此集中于一個人手中，失敗的責任也只能由一個人來負。

盡管政府軍的很多部隊在戰場上也表現得很英勇，但他們發現自己再次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的戰略戰術所制服。共產黨照例攻擊薄弱之點，先是在碾莊，然后在雙堆集，而這時政府的主力部隊卻在徐州閑著沒事。當這些部隊終于出動時，他們也像往常那樣，動得太晚，太慢，他們的車輛擁塞在城外公路上。然后按照久享盛名的游擊戰傳統，他們被追趕，被包圍，在陳官莊被一點一點地吃掉——所不同的，只是這次交手的地方是一個總共有100萬人投入的廣闊的戰場。

政府的指揮官們從沒有學會有關速度和果斷的課程，而這是他們的對手早就精通的。但是政府的指揮官們對機械化部隊作戰和使用空中力量，又缺乏充分理解。因此，他們絕不可能從這兩個他們完全獨占的方面得到應得的好處。他們的防御之所以很糟，不僅是因為相互不團結和猶豫不決，還因為戰術計劃不當、情報和后勤支援不充分。結果，他們發現自己屢屢遭到襲擊、被圍困和難以調動。他們在這一戰役以及其他戰役中的表現，使一位最忠實地支持國民黨的美國人威廉·C.蒲立特的判斷更讓人信服，“面對200多萬人的共產黨軍隊的進攻，政府方面沒有任何一個將軍具有處理全面后勤問題的軍事素養和專門技能”。[[82]](#_82___Pu_Li_Te_Gei_Dui_Wai_Jing)

相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司令員能面對變化著的戰場形勢通權達變。在把戰地靈活性提高到防御戰最高技巧的戰略的運用中，他們合作多年，從而最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接著，他們又成功地將這些原則運用到規模日益擴大的進攻性作戰中。民眾的支前網尤其是他們取得成功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馬車、獨輪車和扁擔成了共產黨供應線上的主要運輸工具，它突出地應驗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原始的東西，只要用得上，就比用不上的現代化東西好。共產黨人在最近便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基礎上，精巧地制成了他們的戰爭機器。其結果是，他們的民眾人力網絡為維持他們的軍事行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后勤和情報支持，最終使政府軍原先所享有的人數、訓練和物質上的優勢化為烏有。

更一般地說，隨著共產黨人在1947年不停頓地展開進攻，政府的司令官們就陷入了消極防御的戰略，再也沒有擺脫。1946年曾被他們逼得全線退卻的敵人，一旦開始轉入全面反攻，他們便茫然不知所措。撤到城里的陳舊習慣一直支配政府軍的軍事思想，當共產黨在戰場上的行動已使這種作戰思想過時之后很久，也還是如此。而當政府軍終于出城時，他們又總是被對手戰術上的優勢所制服，這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自己的防御意識。

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期間與一個較強對手作戰積累下來的經驗，在1945年以后就這樣使他們受益匪淺。就政府軍而言，他們既沒有利用日本人入侵所提供的機會去發展一種有效的游擊戰，也沒有去掌握約瑟夫·史迪威等人曾試圖教給他們的現代化的作戰技術。當日本人撤出這個戰場而剩下兩支中國軍隊相互對抗時，政府的指揮官們已不能同他們敵人的行動較量。到1948年下半年，共產黨人的行動已經發展成為游擊戰術與運動戰和陣地戰有效結合的行動，使他們能夠協調地指揮遠遠超過百萬戰士的大軍在幾條戰線上同時進行的相互配合的攻擊戰。

1948年9月濟南失陷后不久，蔣介石表示，已對軍事戰略、戰術、訓練和戰地組織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檢查。尤其是不惜代價堅守據點的做法必須放棄。[[83]](#_83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蔣顯然終于領悟了他的軍事問題的實質，可是這種理解來得太遲了。

## 國民黨政府的倒臺和美國政策的失敗

1948—1949年冬季的幾個戰役結束后，隨后的一切急轉直下。由于主要力量被摧毀，蔣介石政府的倒臺已是不可避免的結局。1949 年1月14日，共產黨人公布了他們的和平條件，這是嚴厲的八點建議，完全不同于他們1945—1946年的談判姿態。現在，他們提出要求，其中主要有懲辦戰爭罪犯蔣介石，把蔣介石的殘余武裝部隊改編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散國民黨政府。蔣介石拒絕接受這些條件，但在1月21日辭去了總統職務。副總統李宗仁將軍作為代總統繼任，正式開始和談。由張治中率領的政府代表團于4月1日抵達北平，但除了1月14日的八項條件外，他們幾乎得不到任何東西，而且規定他們接受這些條件的截止日期為4月20日。國民政府拒絕了這些條件，截止日期一過，人民解放軍立即開始渡江作戰。

人民解放軍利用幾個月的間歇時間，進行休整、統一編制和整編。1949年初，野戰軍為離開他們原來的主要作戰地區進行活動作準備，改換了名稱。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改稱第一野戰軍；劉伯承的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改稱第三野戰軍；林彪的東北野戰軍改稱第四野戰軍。聶榮臻的華北野戰軍在這一年年底正式撤編。

4月21日，陳毅和劉伯承的部隊再次共同行動，沿300英里的防線渡過長江。他們遇到極微弱的抵抗，4月24日便占領了國民黨的首都南京；5月3日攻占浙江省省會杭州；5月22日占領江西省省會南昌；5月27日打下上海。5月中旬，林彪的部隊在武漢附近渡過長江，于5月16—17日奪取了這座城市。他的進展在湘南一度受阻，由白崇禧率領的一支大部隊從7月至10月在那里阻止了林彪部隊的南進。在白崇禧終于被迫在10月初撤離這一戰場之前，雙方都報道了眾多的傷亡。林彪此后的進展較為順利，分別于10月14日和11 月22日占領廣州和桂林。但是，直到1950年4月底，林的部隊才最后肅清了廣西和海南島的一切抵抗力量。

在華北和西北，山西軍閥閻錫山一直堅守省會太原，直至1949 年4月24日該城被聶榮臻攻陷。西安在一個月后落入彭德懷之手；當政府在西北的三個主要司令官拒絕共同防御甘肅之后，蘭州也在8月底同樣易手。

國民黨政府在共產黨軍隊進攻之前搶先一步撤退時，發生了分裂。4月23日，代總統李宗仁從南京逃往新首都廣州，政府各部年初以來就已遷往那里。可是，就連喪失了北部半壁河山的創傷，也不足以驚醒國民黨內各派系，從而合并成一股反共的抵抗力量。蔣介石先是從其退隱的浙江奉化老家，而后是從臺灣，繼續巧妙地操縱軍政事務；1949年7月，他在臺灣建立了一個個人的指揮部。大約與此同時，他恢復了對國民黨事務的積極控制。在這一年早些時候，他已成功地把國民黨的空軍和海軍、忠于他的若干個殘留下來的精銳陸軍師，以及政府價值三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匯儲備轉移到了臺灣。

蔣介石的計劃只是到1949年才漸漸變得明顯，即放棄全部中國大陸，撤退到臺灣的安全地帶，在那里他可以重建自己的力量。他將在那里等待美蘇之間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他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將使他能夠在美國的庇護下打開一條返回他失去的地盤的道路。在從公開職務退隱的半年中，他以很大的決心努力實施這一計劃。例如，他對李宗仁及桂系成員白崇禧將軍在長江以南組織可靠防御的企圖進行暗中破壞。當仲夏之際，白崇禧的部隊在湘南阻擊林彪前進時，白曾要求蔣介石向他調撥武器、彈藥和軍費，蔣擔心這是對他自己計劃的挑戰，他們可能繼承他的政權，因而加以拒絕。西北提出的類似要求也被拒絕，使那一地區本不統一的防御指揮更加無望。[[84]](#_84___Mei_Guo_Dui_Wai_Guan_Xi__1)

10月，當林彪的部隊占領廣州時，國民黨政府已遷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首都重慶。蔣介石于11月中旬重返那里的政府。隨著1949年秋季人民解放軍第一和第二野戰軍向西南挺進，蔣將政府殘余部分從重慶遷往成都，接著又在12月9日遷往臺灣。李宗仁在西南建立獨立的抵抗政府的計劃化為泡影。當蔣介石到達重慶時，李宗仁離開了那里，并拒絕返回。李去了香港，后于12月初離港治病，流亡到美國。臺灣成了國民黨約200萬支持者的避難所，其中包括50萬殘存的蔣軍部隊。

正當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殘余部分逃往一個個城市，尋求最后的停留地時，一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正在北平籌備。它于9月21日至28日召開，來自中共、民盟、其他民主黨派、工人、農民、工商界的662名代表出席了會議。這次大會正式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綱領等議案，并于9月27日確定北平為正式首都，將其名稱正式改回北京。四天后，10月1日，毛澤東莊嚴宣告人民共和國成立。

對于美國來說，它1944—1945年以來的對華政策的明顯窘況，現在已經消除。美國的國民黨盟友遭到失敗，而同新的共產黨政府的任何關系的基礎也幾乎被摧毀。美國官方與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和解的時期是1946年，當時，馬歇爾使團謀求使中共參加聯合政府而作了調解努力。中國共產黨人與美國人之間的距離隨著這一努力的失敗以及軍事對抗的逐步升級而擴大了。美國人繼續向國民黨提供外交和物質支持，拋棄了中共將參加的聯合政府的想法。

實際上，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中國很少有選擇的余地。當這些年中國的內戰與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擴張同時發展時，美國對華政策的全球背景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外交政策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假定是，歐洲是它首要的利益范圍。因此，美國的絕大部分援助和關心便被導入杜魯門主義、援助希臘、土耳其和復興西歐的馬歇爾計劃的方向。冷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在美國的政治壓力，阻止了向中共的任何實質上的傾斜。對赫爾利指責的越來越熱烈的贊揚，表明了防止選擇中共的種種強制力量。國民黨領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不管他們對美國來說是多么討厭，美國除了支持他們之外別無選擇。阻止向中共傾斜的同樣勢力，也阻止了完全放棄對國民黨的支持。

但是，國民黨政府的虛弱表明，給它撐腰需要巨大的努力。馬歇爾將軍在擔任國務卿之后曾經告誡說，中國政府顯然沒有能力消滅作為中國政治威脅的中國共產黨。因此，馬歇爾于1948年告誡國會，為了繼續進行任何此類努力，“美國必須大規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斷擴大的規模為中國政府的軍事努力承擔費用，這樣也為中國的經濟承擔費用。美國將不得不在實際上準備接管中國政府，管理它的經濟、軍事和政府事務”。這是極其巨大的工作，以致他感到不得不勸告不要這樣做。他根據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現實的可取辦法，即有限的經濟援助方案。[[85]](#_85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

最后的一種考慮，是從1946年前后開始占上風的估計，即國民黨政府不可能消滅作為中國一股政治勢力的共產黨人，但共產黨人也沒有力量在軍事上打敗政府。因此，美國的決策者們決定讓中國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共努力的主要矛頭指向歐洲。于是，1947年5月，馬歇爾使團在華期間開始實行的一個月的武器禁運被解除。但是，國民黨人在五六月間提出的大規模經濟援助的要求卻遭到拒絕。取而代之的是，杜魯門總統以調查團的名義，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美國駐華軍隊司令魏德邁將軍派回到中國。1947年七八月間，即魏德邁來華一個月后，他在包括蔣介石本人在內的國民黨高官顯貴們的一次會議上講了話。這位將軍對他們所領導的政府提出強硬批評，警告說，他們的生存取決于果斷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不過，返回華盛頓后，他還是提出了一個向國民黨政府提供巨大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方案，并提出對滿洲實行國際托管，以遏制共產黨在那里的影響。[[86]](#_86___Zhong_Guo_Wen_Ti_Bai_Pi_Sh)國民黨方面輕蔑地回絕了魏德邁的改革要求，而杜魯門政府出于對積極卷入中國內戰的擔心，否決了他的軍事援助建議所要求的派遣一萬名軍官到中國的意見。對國民黨政府實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現實的解決辦法，盡管它已被援華院外活動集團和國會中熱心經濟的成員這兩方面的種種要求弄得錯綜復雜。但是，既然有眼前的這些約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對擴大干預和同意有限援助的基本決定。

當然，這種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終并沒有使任何人滿足，也沒有任何收獲。它不能延緩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上的災難。它還受到那里非共產黨的反戰運動的譴責，說這是美國人不顧中國利益，想通過繼續支持不思改悔的蔣介石以牟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然而，過錯與其說是出于這一政策本身，不如說是出于作為這一政策基礎的對中國共產黨人的錯誤估價，以及導致這些估價的那些主要假定。因為這一政策是在錯誤地預測共產黨人獲勝機會的基礎上制定的。流行的看法是，如1948年馬歇爾告知國會的，政府不能打敗共產黨，而共產黨實際上也不可能打敗政府，美國公眾對后一種可能性從沒有思想準備。美國的決策者們好像也從未仔細考慮過中國可能被國民黨以外的任何黨派統治，或者國民黨由蔣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領導。在1948年晚期的三大戰役之后，甚至當蔣介石都承認其失敗的必然性時，美國的外交家們才轉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為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這個關于中國內戰的被期待的方案，因而是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國民黨政府的虛弱對所有觀察家來說都是十分顯而易見的；但共產黨的實力卻不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想對這種情況加以說明的美國外事處官員的代言人，在赫爾利事件后都保持沉默；在隨后的內戰年代，共產黨統治區內沒有美國的外交觀察家。與此同時，對可能的危險的反感，甚至似乎阻礙了對此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因為把這種思考歸入了顛覆活動的禁區。因此，美國人最根本的失敗，就是放棄自己根據與自己不同的任何條件去考慮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性質的能力。這樣，他們就不可能估計到共產黨可能占上風，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么。結果，他們也不真正了解國民黨政府在打敗其敵人之前所必需進行的變革；或不真正了解實現這些改革所必需的時間，即使有進行改革的愿望；同時也不了解當國民黨政府明顯缺少這種愿望時，美國如何才能激發起這一愿望。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美國外交急件，當它們對總是“迅速惡化的形勢”的權宜補救辦法進行評價時，其中不知不覺表現出來的悲觀絕望語調，表明了對以上所有考慮缺乏理解。這一失敗導致了多年對“失去中國”的痛苦而無濟于事的反責，讓個別美國人對此負責，似乎中國是他們失去的。

然而，在后來的幾年里，人們終于能更冷靜地思考這一事件了。由于中共領袖在20世紀40年代同美國建立官方聯系的各種嘗試變得更廣為人知，于是便出現了大量關于“會是怎樣”的推測。這些嘗試包括，毛澤東在1944年對迪克西使團的聲明；1949年夏邀請美國大使J.司徒雷登訪問北平；以及周恩來以澳大利亞記者邁克爾·科恩為居間人，在同一時間對美國人所表現出的格外接近。[[87]](#_87_Guan_Yu_Di_Ke_Xi_Shi_Tuan__J)美國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任何這類表示都沒做出積極反應。但是，在他們之間除了一種溝通渠道外，是否還能有任何其他舉動似乎是值得懷疑的，不管怎樣，存在這種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美國的決策者及其國內輿論，由于全神貫注于蘇聯不斷擴張的勢力和出于對共產主義不能緩解的擔心，在50年代初的麥卡錫時代，他們不想進行更靈活和經過選擇地接近中國新政府的嘗試。而中國共產黨人同樣也不想用過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于這一時期不斷加劇的冷戰的緊張狀態之外。左右著當時美國外交報告和輿論的不肯妥協的反共論調，與1949年8月司徒雷登離開中國后的中共官方聲明刺耳的反美主題，是不相上下的。中國和美國的這些姿態湊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要二十多年的時間才能消除。

[[1]](#_1_12)即民主運動。——譯者

[[2]](#_2_12)《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77—581頁。毛澤東：《關于重慶談判》，《毛澤東集》第4卷，第1155—1164頁。

[[3]](#_3_12)何應欽當時任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譯者

[[4]](#_4_12)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9月17、20日和10月5、6、22日。又《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7卷，第567—568頁。

[[5]](#_5_12)《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7卷，第576、577頁。

[[6]](#_6_12)同上書，第612頁。

[[7]](#_7_12)《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81頁。在中國別的地方投降的120萬日本軍的武器和裝備大部分歸于政府軍。

[[8]](#_8_12)《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96—604頁。

[[9]](#_9_12)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七十概述》，第232—233頁。李宗仁后來說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東北的意見未被重視（《李宗仁回憶錄》，第435頁）。

[[10]](#_10_12)赫爾利最初對外交官員的責備是在他的辭職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81—584頁；又《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7卷，第722—744頁。關于這一不光彩事件的現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樂博：《目擊者和我》；小約翰·佩頓·戴維斯：《落后的龍》；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小E.J.卡恩：《中國通》；加里·梅：《代人受過的中國通》；謝偉思：《亞美論集》；羅斯·Y.柯恩：《美國政治中的援華院外活動集團》；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萬委員會：“援華院外活動集團”政治，1953—1971年》。又見肯尼思·W.雷亞和約翰·C.布魯爾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報告，1946—1949年》。

[[11]](#_11_12)萊曼·P.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第1卷，第353—354頁；《美國對外關系，1949年》第8卷，第358頁。

[[12]](#_12_12)關于1946年1月10日停戰協定的談判，見《美國對外關系，1946年》第9卷，第1—130頁。關于政治協商會議及其產生的協議的破壞，同上書，第131—177、177—341頁；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8—68頁；張君勱：《中國第三勢力》，第142—222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317—345、375—381頁。國民大會通過的憲法的英譯文載《中國的政府與政治》附錄D。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46年3月全體會議的決議和新聞報道。載《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610—621、634—639頁。

[[13]](#_13_12)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49—63頁。

[[14]](#_14_12)柯樂博：《20世紀的中國》，第267—271頁；萊昂內爾·M.蔡辛：《共產黨征服中國，1945—1949年內戰史》，第77—82頁。

[[15]](#_15_12)約翰·魯賓遜·比爾：《馬歇爾在中國》，第330頁。

[[16]](#_16_12)關于最近出版的專著提到這種看法，見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國民黨中國的衰落及其對中美關系的影響，1949—1950年》，載多蘿西·博格等編：《不確定的年代》，第63頁；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17]](#_17_11)《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225—229、311—312頁；又《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7卷，第527—721頁各處；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第429—430頁。

[[18]](#_18_12)《美國對外關系，1946年》第10卷，第735頁。

[[19]](#_19_12)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3月8日，第3頁。

[[20]](#_20_12)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3卷，第544頁。

[[21]](#_21_12)《和平日報》，上海，1946年11月13日。

[[22]](#_22_12)喬治·H.克爾：《被出賣的臺灣》各處。

[[23]](#_23_12)《中美日報》，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時事新報》，重慶，1945年9月12日；《中央日報》，重慶，1945年9月12日；《大公報》，重慶，1945年9月11日。

[[24]](#_24_12)《密勒氏評論報：每月報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頁。

[[25]](#_25_12)事例見劉長勝等：《中國共產黨與上海工人：上海工人運動歷史研究資料之二》各處。

[[26]](#_26_12)《新聞報》1946年6月12日；《時事新報》1946年6月14日；《大公報》1946年6月19日；《文匯報》1946年7月9日。四報均在上海出版。

[[27]](#_27_12)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年》，第72—73、350—352頁。

[[28]](#_28_12)《大公報》，上海；《中華時報》，上海，1948年11月2日。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年》，第357—360頁；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172—202頁。

[[29]](#_29_12)《大公報》，上海；1946年8月30日；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第63—65頁；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年》，第244頁。

[[30]](#_30_12)國民黨CC系頭領陳立夫在同鮑大可談話時發表了這種看法（鮑大可：《共產黨接管前夕之中國》，第50頁）。

[[31]](#_31_12)關于校場口事件由誰負責的一般為人所接受的看法，見約翰F.梅爾比：《天命》，第88—89頁。關于國民黨右派對校場口事件的說法，見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4卷，第1585—1587頁。

[[32]](#_32_12)錢端升：《軍人跋扈的中國政府》，香港《時代批評》，1947年6月16日，第2—3頁。關于后來基于同樣假設的學術論述，見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

[[33]](#_33_12)伍啟元：《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觀察》1946年9月7日，第3—4頁。

[[34]](#_34_12)儲安平：《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觀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頁。

[[35]](#_35_12)儲安平：《中國的政局》，第6頁；張東蓀：《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觀察》1947年4月5日，第7頁；周鍾岐：《論革命》，《觀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頁；余才友：《論今天的學生》，《觀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頁。

[[36]](#_36_12)毛澤東：《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70頁。

[[37]](#_37_12)黎玉：《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

[[38]](#_38_12)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第229—277頁。

[[39]](#_39_12)毛澤東：《三個月總結》，《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08頁。《五四指示》直到80年代初才發表，并證實是劉少奇起草的。

[[40]](#_40_12)徐運北：《參軍運動簡報》，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69—74頁。

[[41]](#_41_12)這一戰時支援工作的要點根據日本投降后對山東解放區立即公布的三個布告：《山東省人民自衛隊戰時勤務動員辦法》（1945年8月17日），《戰時人民緊急動員告要》（1945 年8月18日）和《民兵縣大隊工作告要》，均載《山東省政府及山東軍區公布之各種條例綱要辦法匯編》，第18—26、40—42頁。

[[42]](#_42_12)例如新華社延安1946年11月9日電（譯文載《參考消息》1946年11月10日）和新華社發法新社記者西德尼·里頓伯格1946年12月5日電（譯文載《參考消息》1946 年12月6日）。

[[43]](#_43_12)《宋任窮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黨校關于政治工作的報告》，第1—2頁；以及編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69—70、55、63—64頁上的幾個報告。農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愿望也在周立波關于東北土改的小說《暴風驟雨》中得到著重描寫。

[[44]](#_44_12)李振陽：《嘉濟邊游擊區土改的幾點體會》，《工作通訊》第32期（游擊戰爭專號），第15頁。

[[45]](#_45_12)《關于貫徹耕者有其田幾個具體問題的指示》，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14頁。

[[46]](#_46_12)毛澤東：《中共中央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7頁。

[[47]](#_47_12)內戰時期土改運動目擊者的一流著作是韓丁：《翻身：一個中國村莊革命的記錄》。

[[48]](#_48_12)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353—354頁。

[[49]](#_49_12)同上書，第196頁。

[[50]](#_50_12)《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202頁。

[[51]](#_51_11)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407頁。

[[52]](#_52_11)1945年8月，延安《解放日報》的報道中曾使用“各路解放軍”的說法，但一般仍沿用八路軍、新四軍名稱。1946年9月，《解放日報》社論和同年10月中共中央負責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使用“人民解放軍”一詞。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用了“人民解放軍”這一名稱；同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名義簽署命令。——譯者

[[53]](#_53_11)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5—1198頁。

[[54]](#_54_11)《美國對外關系，1946年》第10卷，第231—233頁。

[[55]](#_55_11)區黨委：《關于開展敵后游擊戰與準備游擊戰的指示》，1946年11月20日，《工作通訊》第32期（游擊戰爭專號），第49—50頁；又，區黨委：《冀魯豫五個月來游擊戰爭的總結與目前任務》，1947年2月2日，《工作通訊》第32期，第37頁。

[[56]](#_56_11)關于這些事件的一個目擊者的報道，見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第213—274頁。

[[57]](#_57_11)《冀魯豫五個月來游擊戰爭的總結與目前任務》，第42頁；《關于開展敵后游擊戰與準備游擊戰的指示》，第48—52頁，《潘復生同志在地委組織部長聯席會上的總結發言》，1947年3月8日，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38頁。

[[58]](#_58_11)張爾：《九個月游擊戰爭總結與今后任務》，1947年5月，《工作通訊》第32期，第19頁。

[[59]](#_59_11)《美國對外關系，1946年》第10卷，第235—236頁。

[[60]](#_60_11)關于松花江攻擊初期的敘述根據以下記載：《中國內戰，1945—1950年》，美國陸軍部軍史局翻譯，第81—83頁；《中國的軍事戰役，1924—1950年》，W.W.惠策恩、帕特里克·楊和保羅·賴譯，第125—129頁；威廉·W.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年》，第306—309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26—27、36—37、49—50、88—89、130—131、134—137、157—159、166—168、171—173、178—181、192—193、195—196、198—199、203、208—212、214—217、240—241頁。

[[61]](#_61_11)馬占山1946年9月任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1947年8月改任松北綏靖公署主任，1948 年8月，任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譯者

[[62]](#_62_11)《李宗仁回憶錄》，第434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141—142、144—145、211—212、232—235頁。

[[63]](#_63_10)錢邦楷：《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青島時報》1948年2月19日，《觀察》1948年3月27日第16頁轉載。

[[64]](#_64_9)張靈甫之死，其說不一，一說自殺身亡，一說中彈身亡，一說為一貪得張手表之解放軍戰士擊斃。——譯者

[[65]](#_65_10)《中國內戰》，第86—99頁；又《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39—145頁；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230—239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27、58—59、68—69、72—73、171—172、244頁。

[[66]](#_66_10)毛澤東：《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29—1230頁。

[[67]](#_67_10)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一）；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174—176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269—270頁。

[[68]](#_68_10)《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三）。

[[69]](#_69_10)李子靜：《晉南解放區的斗爭情形》，《觀察》1948年3月6日，第15頁。

[[70]](#_70_10)《中國內戰》，第144—153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45—152頁；蔡辛：《共產黨征服中國》，第168—177頁；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01頁注（四）。

[[71]](#_71_10)《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257—258、270—271、287—288、290、298、302、306—308、315—320、356—358、362—363、373—380頁。

[[72]](#_72_10)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二）；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0—311頁；《中國內戰》，第121—124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403—404、411—415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1—4、8—9、22—24、26—27、36—37、58—59、65—66、86、93—95、97—99、103—106、115、121—122、127—128、143—145、152—153頁。

[[73]](#_73_10)《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25頁。

[[74]](#_74_10)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2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340—343頁。

[[75]](#_75_10)蔡辛：《共產黨征服中國》，第177頁。

[[76]](#_76_10)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5—1302頁。

[[77]](#_77_10)《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19—320、331—332頁；毛澤東：《關于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57頁注（二）。《中國內戰》，第156—157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58—160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464、467—471、478、480—486頁。

[[78]](#_78_10)重新評價林彪1949年以前的軍事經歷，發生在1974—1975年，是全國批林運動的一部分。這方面的批判，見《學習與批判》1974年第9期，第19—26頁和1975年第8期，第18—22頁；《紅旗》1975年第1期，第39—44頁；《歷史研究》1975年第1期，第24—30頁。

[[79]](#_79_10)《中國內戰》，第124—129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55—157頁；毛澤東：《關于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37—1342頁；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2—319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457—458、463、469—470、474、477—487、486—487、501—504、508—509、520、522—525、527—532、537—538、548—549頁。

[[80]](#_80_10)《中國內戰》，第142—144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65—167頁；毛澤東：《關于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7—1371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532—535、557、592、638—640、643—650、663—673、680—681、691—693、700—705、723—725頁；《美國對外關系，1949年》第8卷，第19、30—31、36、44、46—59、71—72、75—77、87—88、98頁。

[[81]](#_81_10)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178—186、240—243頁；西摩·托平：《在兩個中國之間的旅行》，第24—48頁；毛澤東：《關于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55—1357頁；《中國內戰》，第157—160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61—164頁。

[[82]](#_82_10)《蒲立特給對外經濟合作（中國）聯合委員會的報告》，第80屆國會，第二會期（1948 年12月24日），第12頁，引自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第491頁。

[[83]](#_83_10)《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32頁。

[[84]](#_84_10)《美國對外關系，1949年》第8卷，第280—288、290、293—294、327—328、476—477、489、493、552—553頁；《李宗仁回憶錄》，第517—528頁。

[[85]](#_85_10)《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82—383頁。美國對中國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見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第349—493頁。

[[86]](#_86_10)《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758—814頁。

[[87]](#_87_10)關于迪克西使團，見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關于北平方面的邀請，見托平：《兩個中國之間的旅行》，第81—90頁；邵玉銘：《司徒雷登與1949年美國—中共和解》，《中國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第74—96頁；《美國對外關系，1949年》第8卷，第766—770、779、784—785、791頁；關于周恩來同美國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國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360、372—373、388、389、397—399、496—498、779—780頁；埃德溫·W.馬丁：《周恩來外交新方針》，《外事雜志》1981年11月號，第13—16、32頁。

#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正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即已顯示的那樣，既是1949年以前他的經驗之綜合，也是以后他的許多政策之母。對毛澤東的思想在他前30年的積極政治生涯中的發展，本章力圖提供佐證，并且加以解釋；同時也試圖讓讀者更好地了解在取得政權以后所出現的一切。在強調早期毛澤東頭腦中最為關心的東西的同時，本章也要研究他的某些觀念，它們的含意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才得以充分理解。

由以前各章應已十分清楚，從1912年（當時毛澤東18歲半，在革命軍中當兵半年以后又繼續求學）到1949年（當時他成為統一的中國又有稱號又有實權的統治者）這一時期，是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諸方面影響深遠的不斷大變革時期。在毛澤東一生的前50年中，他事實上經歷了這個國家歷史上好幾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時代；形成他對中國諸多問題的觀念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想法的經驗，因此不僅每隔十年，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每年都有重大變化。使毛澤東思想與活動十分復雜的記載在一定程度上條理化和清晰明確的這一努力，采取部分地編年，部分地按題論述的方法。首先考察毛澤東從成年初期到1927年的政治思想發展，他1927年第一次投身于有獨有特征的農村革命斗爭。

## 從學生運動到農民運動，1917—1927年

不論就年齡還是就經歷而言，毛澤東都是“五四”運動那一代人中的一員。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起，毛澤東就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度過了他在政治組織和政治研究中的見習期。他作為革命者的經歷實際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開始的。

盡管毛澤東有許多非常鮮明的個人特點，從整體上看，他仍具有這一群體所共有的某些屬性。最重要的一點，它是過渡的一代。當然，每一代人都是“過渡的”一代，因為世界在不斷地變化，但是，毛澤東的一生以及他的同時代人的一生所跨越的，不僅是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且是不同的時代。適應西方沖擊的過程，從19世紀中期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期，甚至更久；但是，“五四”時期標志了一個偉大的轉折點，在此之后，或許再也沒有同樣偉大的時期了。一句話，老一輩人對中國方式的持久的優越性深信不疑，并以此自慰，“五四”這一代人對這一點是知道的，不過他們絕不可能懷有這種簡單的信仰了。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很快就信奉了西化的意識形態，并終生不渝；但是大多數人則始終既深深地帶著相信中國人內在能力的烙印，又深深地帶著他們曾經否定過的傳統的思想方式的烙印。于是這些人就注定了在經久不變的政治上和文化上模棱兩可的境況中過活。

毛澤東二十來歲以前的政治觀點，只能從當代零碎的資料、他自己的回憶錄，以及多年以后別人的回憶錄中看到。[[1]](#_1_Guan_Yu_Mao_Ze_Dong_Zao_Nian)他第一次清晰地出現于我們的視野，是大約23歲時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上。

雖然毛澤東的這第一篇文章，是在他受到任何顯著的馬克思主義影響之前很久寫的，但是，這篇文章展示許多后來可以見到的他的人性品質和思想線索。貫穿全篇文章的最大憂慮，也可以說是耿耿于懷的思想，就是憂慮中國會亡國。亡國，這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普遍為中國人談論的話題，在這篇文章的劈頭幾句被有力地提出來：

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育，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長是不改，弱且加甚。……體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遠[[2]](#_2_Er_Shi_Ba_Hua_Sheng__Mao_Ze_D)？

這樣，毛澤東一筆便說出了貫穿他后來整個生涯的思想和行動的兩大主旋律：愛國和尚武。但是，如果他顯然在這篇文章中心懷那種可以籠統叫做愛國目標的思想，那么這個時期他的愛國思想是保守的還是革命的呢？顯然，檢驗的標準，是他是否認為富強的目的以任何方式與國家富強的先決條件即社會文化的革命聯結在一起。其實，這篇文章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關心中國命運，但對改良，更不用說革命幾乎完全不感興趣的毛澤東。

這篇文章所包含的二十余處經典引文或明顯提及古典著作特定段落之處中，有12處屬于儒家經典；一處屬于儒家實在論者荀子，他是法家的先驅；兩處屬于宋代理學家、儒家經典集注家朱熹；一處屬于晚明批判朱熹的思想家顏元。也有三處屬于毛澤東喜愛的道家經典《莊子》。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知識范圍顯然很廣，因為他順便提到各代一些較小的著作家的不為人知的生平細節。（格外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儒家經典的12處中，竟有11處涉及《四書》的基本核心。）

然而，雖然沒有明顯地涉及社會變革，甚至也沒有任何必要的示意，但是，這篇文章包含許多源自中國和西方的近代非遵奉傳統者的思想痕跡。首先，如上引文章劈頭幾句所表達的，強調武風的價值，然后總結又說“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3]](#_3_Mao_Ze_Dong____Ti_Yu_Zhi_Yan)為證明這一見解是正確的，毛澤東舉出許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實例，并引用顏元的話，顏元曾指摘朱熹“重文輕武”，以致造成違反孔子教導的有害傳統。[[4]](#_4_Yan_Yuan____Si_Cun_Bian__Cun)大約在他為《新青年》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毛澤東在1919年寫的一封信，明顯地勾勒出了當時毛澤東思想從中發展出來的雙重來源：

古稱三達德、智、仁與勇并舉，今之教育學者，以為可配德智體之三者，誠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體也，非勇無以為用。[[5]](#_5___Gei_Li_Jin_Xi_De_Xin)

這樣，毛澤東一開始不僅強調體，即物質實體的極重要意義，而且贊揚古代的勇。當然，毛澤東主要不是從書本導出他思想中的這種傾向。和20世紀初期的其他許多中國人一樣，毛澤東發展他的思想是對當時與明末相似的環境做出的反應，那時由于軍事積弱，中華民族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受到了威脅。

如果尚武是毛澤東思想中保持不變的一個特點，那么，這篇1917年發表的文章還有一個基本主題，而且是更明確地顯示現代影響的主題，就是自覺和自動的重要性。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第一段有力地提出這一點：“堅實在于鍛煉，鍛煉在于自覺……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于體育之自覺不可。”[[6]](#_6_Mao_Ze_Dong____Ti_Yu_Zhi_Yan)

自然，這種有效行為的關鍵首先在于思想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儒家傳統。但是，像這些段落的主要啟示無疑來自折中主義的，然而卻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思想，這些思想是毛澤東從閱讀《新青年》和聽他的倫理學教師和未來岳父楊昌濟的課吸收來的。

楊昌濟不但是康德和塞繆爾·斯邁爾斯的信徒，而且是朱熹的信徒。他教倫理學，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7]](#_7_Si_Nuo____Xi_Xing_Man_Ji)為此，楊昌濟自編一部修身講義，書名為《論語類鈔》，從《論語》引出若干有意義的章句，借孔門的話來申述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該書第一篇就是“立志”，其中說，“有不可奪之志，則無不成矣”。[[8]](#_8_Li_Rui____Mao_Ze_Dong_De_Zao)

和楊昌濟一樣，毛澤東特別強調意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中寫道：“足以強意志，體育之大效，蓋尤在此矣……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9]](#_9_Mao_Ze_Dong____Ti_Yu_Zhi_Yan)這樣相信意志和主觀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澤東人生觀中的一個核心的和特有的要素。毛澤東在他1917年3月《給宮崎滔天的信》中，邀請宮崎在第一師范學校黃興紀念會上講話，他自稱“頗立志氣”。[[10]](#_10_Zhe_Feng_Xin_Zai_Yu___Mao_Ze)

但與此同時，毛澤東以真正中國人的方式，認為要得真志，非先領會哲學倫理學和得到啟發不可。毛澤東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寫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從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然而，這不只是主觀態度問題，需要行動和獻身：

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只可謂之有求善之傾向，或求真求美之傾向，不過一種沖動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11]](#_11_Zai__Wen_Hua_Da_Ge_Ming__Shi)

以下的事實提供了毛澤東當時總的政治立場的若干觀念：他說，今之有治天下之法的人，只有袁世凱、孫文、康有為三人。其中獨康有為似略有本源，而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他像在《新青年》發表的那篇文章那樣，用曾國藩謚號。[[12]](#_12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

盡管如此，1917年的毛澤東思想的模式絕不是純粹傳統的。毛澤東所要實現的目標，自然是中國的富強和振興。他在信中寫道，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復雜，民智淤塞。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是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便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要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毛澤東接著寫道：

今若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容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毛澤東認為，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根本上改變全國之思想。他寫道，中國的思想太舊，道德太壞。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必須加以變換。[[13]](#_13_Tong_Shang_Shu__Di_20Ye)

雖然毛澤東把中國古老僵硬的思想模式看作是阻止進步的障礙，但是，他不主張把全盤西化作為補救之道。針對楊懷中所說的“日本某君”認為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的說法，毛澤東認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14]](#_14_Tong_Shang_Shu__Di_20__21Ye)

然而，說過這一點之后，毛澤東開始進行顯非墨守傳統的論述，認為在觀念和道德基礎上統一思想的活動中，與君子相比，小人更具有重要性。君子確有高尚之智德，但君子只能在小人所確定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活動的基礎上生存，小人累君子。這樣，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但當教育和改造小人，以臻大同之鵠。當時，毛澤東已主張組織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的私塾，而且主張出洋求學。[[15]](#_15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

關于在毛澤東后來的思想中也起很大作用的實踐主題，毛澤東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古人言衛生之術者亦不少時說，“蓋此事不重言談，重在實行。”[[16]](#_16_Mao_Ze_Dong____Ti_Yu_Zhi_Yan)毛澤東之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往往被人歸因于王陽明，但這只是推測；在任何有名的毛澤東著作中，一點也沒有提到王陽明。總之，與“五四”時期毛澤東思想的發展更有關系的，是毛澤東在1917—1918年所吸收的西方化思想。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最后兩年，思想發展很快。在那個時候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要素，也許是明顯和強烈的個人主義。例如，毛澤東在對德國新康德派學者泡爾生所著的《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語中寫道：

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謂。……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與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17]](#_17_Jian_Li_Rui____Mao_Ze_Dong_D)

和當時年長的和較知名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或魯迅一樣，毛澤東已經利用個人有無上之價值，有百般之價值的觀念作為沖破古老的文化和社會的羅網的武器。他絕非不知道實現個人所必需的社會結構。他說，且團體者仍個人，乃大個人也。人一身乃集許多小個體而成，社會乃集許多個人而成，國家乃集許多社會而成。在個人和國家即國民的這種復雜關系中，毛澤東強調先有個人而后有國民。他說，泡爾生強調個人由國民而發生，是因泡爾生住于國家主義彌固之德國。[[18]](#_18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

的確，處理對立的關系的辯證法，從這個時候起是毛澤東思想的表征之一。毛澤東在某種意義上作為同一來對待的對偶中，有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高即卑，陽即陰，以及20年后被蘇聯哲學家批判的生即死和男即女。毛澤東把人看作是物質和精神的統一，把道德看作是由良心和欲望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毛澤東說，或人之說必以道德律為出于神之命令而以能實行而不唾棄，此奴之心理也）。而且，由于物質不滅，人和社會也不滅，雖然人和社會經常通過改良和革命而改變和振興。因此，正如他所說的，他不再憂慮中國將亡；中國將通過改建政體和變化民質而生存下去。人類之有進步，有革命，有改過之精神，則全為依靠新知之指導而活動者也。有一種之知識，而建為一種之信仰，即建為一種信仰，即發為一種之行為。他寫道：“知也，信也，行也，為吾人精神活動之三步驟。”活動之所憑借只能在于“國家社會種種之組織”。[[19]](#_19_Tong_Shang_Shu__Di_28__34__3)

于是，毛澤東強烈地重申他在1917年4月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強調實踐的觀點，而且著重提出組織起來進行改良的重要性。這兩點是毛澤東在1919年7月和8月發表的題為《民眾的大聯合》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的中心內容。

毛澤東這篇在1919年發表的文章[[20]](#_20_Wo_Yi_Zai___Zhong_Guo_Ji_Kan)的最令人驚異的，無疑是他把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作比較的段落：

聯合以后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按指貴族資本家）拼命的倒擔，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一派較馬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這派的首領為生于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21]](#_21___Zhong_Guo_Ji_Kan____Di_49Q)

李銳在逐字引用這段后評論說，毛澤東這時雖然還分不清楚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本質區別，不過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他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和其他文章已閃爍著階級分析的光芒，也是后來構成毛澤東思想大廈的最初基石之一。[[22]](#_22_Li_Rui____Mao_Ze_Dong_De_Zao)但是，雖然毛澤東無疑在1919年夏很快地知道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人們卻很難在這個時期他的著作中找到認真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成分。甚至連階級斗爭、辯證法或唯物史觀之類觀念也未被提到，而“階級”一詞只被用過一次，而且是在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用的（智者和愚者、富者和貧者、強者和弱者的“階級”）。[[23]](#_23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n)如果說這篇文章有看得清的哲學傾向，那么，這種傾向既不在于馬克思，也不在于克魯泡特金，而是在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某些中國作者傳播并改變了的西方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其中有嚴復、梁啟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譚嗣同以及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他們用種種方式發展一種思想，認為社會成員的自發行動，不受舊等級制的束縛，會使社會能量增加至極限。

在“五四”時期，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響是胡適的影響。已經指出，毛澤東1919年的幾篇文章發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評論》的熱情贊揚。一位評論家概括了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最初幾期的內容，說道：“《湘江評論》的長處在于探討。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24]](#_24___Mei_Zhou_Ping_Lun____Di_36)說這些話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胡適本人。

當我們注意到下述情況，就不至于對這一點過于驚奇了。毛澤東為《湘江評論》創刊號寫的社論，在列舉了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從貴族的死的古典文學到平民的現代的活的文學；從獨裁政治到代議制政治）以后，說道，在思想領域“我們向實驗主義前進了”。這里我特別提到這一點，并不想讓人以為毛澤東是胡適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在1919年對實用主義的好評的確反映了他幾乎直到生命的終結都保持的一種看法，內容是人們不應編造理論不聯系具體經驗的理論。[[25]](#_25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n)

毛澤東雖然在1919年的思想與當時年齡大些的更有學問的人的思想一樣，是多種影響的拼湊物，他的《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卻具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它體現了一個企圖，想在“五四”時期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具體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總綱領。確實，毛澤東世界觀中的社會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他把學生運動看得最為重要，相對地說，對農民就不認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說工人了。很獨特的是，他也相當注意婦女和學校教師。總的來看，他對他正努力創建的革命聯盟的想象，倒很像60年代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題是，中國的新生將首先來自青年人，特別是學生對舊秩序的叛逆。變革的手段和動力則在于自基層自發形成的民主組織。

由毛澤東看來（在這里他顯示出是嚴復的一個真正的信徒），整個過程的目標，不僅是個人從舊社會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而且是通過這一事實增強和復興整個中華民族。在一段極有鼓動性的結束語中，毛澤東對他的同胞這樣說：

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諸君！諸君！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拼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就在面前！[[26]](#_26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n)

這里不止一處有毛澤東1917年文章的回聲，強調不懈的努力和堅定的意志為民族復興的關鍵。在這中間的兩年，他既從書本上，也從經驗里，學到了許多關于發掘和動員他所察覺的蘊藏在中華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過，在哪怕只是開始設計一個完整的有效的戰略，以便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進行革命以前，他還有許多東西有待學習。

毛澤東這時盡管不甚懂得馬克思主義，他的想像力卻被俄國革命的勝利吸引住了。在他稱之為“紅旗軍”的世界范圍的成就中，他首先列舉的是工農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接著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國以及歐洲各國的罷工浪潮。[[27]](#_27_Tong_Shang_Shu__Di_65Ye)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的其他幾篇文章引出的主題，后來成為他的思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腦”，以及“和平民一同進工廠做工，到鄉下種田”，或者是這種思想：“人類真正解放”到來之日，即千萬美國人一道對托拉斯的不公正和專制高呼“不許”之時。但是毛澤東也表達了對德國人的熱烈的支持，他們被宣布為受壓迫的民族，全由協約國發號施令。[[28]](#_28_Guan_Yu_Dao_Gong_Chang_Qu__J)

中國作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應該與其他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的思想，當然被李大釗、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緊接“五四”時期之后那幾年里時常提起。毛澤東也自然被引向這一方向。

在毛澤東隨后的見習期中，對他1919年關于基層組織在社會改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啟發性的補足物的階段，是他在次年參加了湖南自治運動。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節，由于近來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來。[[29]](#_29_Zhe_Xie_Cai_Liao_____Mao_Ze)這一情節的記載不僅說明了毛澤東強烈的湖南人的愛國熱情，也說明了他對政治工作的一般態度。在1920年9月26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澤東寫道：

無論什么事，有一種“理論”，沒有一種“運動”繼起，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不能實現出來的。……我覺得實際的運動有兩種：一種是入于其中而為具體建設的運動，一種是立于外而為促進的運動。

他補充說，這兩種類型的運動都是，而且將繼續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時，他強調一個有效的運動必須源出于“民”。“如果現在的湖南自治運動能夠成功地建立起來，但是其源不在 ‘民’中，而在 ‘民’外，那么我敢說這樣的運動是不會長久的。”[[30]](#_30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

至于說這些話的廣闊背景，毛澤東及其他起草1920年10月7日召開立憲會議建議的執筆者，概括他們對全省和全國的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的觀點如下：

我們覺得湖南現在所要的自治法，即與美之州憲法，和德之邦憲法相當。中國現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時才有全國的憲法出現。在事實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憲法，然后才有全國總憲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條由分而合的路。[[31]](#_31_Tong_Shang_Shu__Di_242Ye)

毛澤東1920年在這個方面所寫的文章，反映了當時的情況，與他的長期觀點是絕不一致的；從1917年直到他生命的終結，他一直強調全國統一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種思想，對毛澤東后來作為革命者的整個生涯的政治態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參與具體建設——他的意思顯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應該深入到社會現實中去。但是，他同時也察覺需要在外部發動運動，以推動事業。換句話說，盡管政治活動家應該響應“民”的客觀要求，應該深入到民之中去，以便動員他們；而另一個處在民之外的組織也是需要的。可以說，毛澤東在次年加入的列寧式的共產黨，正是一個這樣的組織，它不允許把自己混同于群眾，而是要站在群眾之外。可是同時，毛澤東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從不猶豫地、大膽地深入到各種事件中去，并且參與具體的組織工作。

在湖南自治運動時期，毛澤東的文章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關系到為了“民”而進行這些活動；運動最初的推動力與激勵也來自“民”。毛澤東把這個詞放在引號內，強調了這個詞的意義不甚明確。這是他1919年文章中的“民眾”嗎？或者是從未遠離毛澤東關注的中心的“中國人民”或“中華民族”？或許這正是毛澤東的思想的一個特征，這兩個實體是不可分割地連在一起的。自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時期，他絕不僅僅是，或主要是個民族主義者，只關心中國的“富強”。可是他也不是像M.N.羅易那樣，不根據民族進行思考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在1920年這一年中，毛澤東對向西方學習如何改造中國社會的態度，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毛澤東在1920年3月14日寫信給周世釗，同年12月25日又寫另一信給向警予，表現了關于去國外學習這一比較狹窄的問題的看法的改變，這象征了這一重大變化。在前一封信中，他聲稱，盡管許多人迷信地重視去國外學習的好處，事實上成萬或成十萬曾到國外學習的人中，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學到了有用的東西。他寫道，總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兩大潮流各占半個世界，而東方文化“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盡管他在原則上不全反對去國外學習，他卻愿在去國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國文化。[[32]](#_32___Xin_Min_Xue_Hui_Zi_Liao)

相反，半年之后，他給在法國的向警予寫信，抱怨在湖南對婦女（或者說，對男子也一樣）沒有什么進步的教育，力勸她吸引盡可能多的女志同道合者去國外，并補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33]](#_33___Xin_Min_Xue_Hui_Zi_Liao)

毛澤東對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態度的轉變，并不像這里對比鮮明的兩段話所表現的那么惹人注目。在3月份，他寧愿留在國內的理由之一，根據他給周世釗的信，是人們通過閱讀譯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國的知識。可是，他的思想傾向還沒有確定，正如他本人所說，“坦白地說，在各種思想形態和學說中，我目前還沒有找到比較明了概念”。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從中國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文化本質中，整理出這樣一個“明了概念”。毛澤東大約要在三年的時間內在長沙創造“新生活”，他在計劃里說，個人是首要的，小組次之。他特意強調了他與胡適的聯系，甚至特別提到胡適已為他要在長沙創辦的一所學校新造了“自修大學”的校名。但是，毛澤東說“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又說“我覺得俄國是世界第一文明國”。[[34]](#_34___Xin_Min_Xue_Hui_Zi_Liao)

到1920年11月底，毛澤東在給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應該自立為國，以便與北方落后的省份脫離，而“直接與世界有覺悟之民族攜手”。可是，甚至湖南受過教育的士紳也缺乏理想，缺乏有遠見卓識的計劃，而政界人士又極腐敗，這都使改革完全成為虛幻，他大失所望。他說有必要“另辟道路”。[[35]](#_35___Xin_Min_Xue_Hui_Zi_Liao)

在毛澤東探尋道路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影響來自當時在法國學習的一群湖南學生，新民學會會員，而首先來自他的親密好友蔡和森（他也是向警予的情人）。順便說一下，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明確的政治領域，也出現在對傳統觀念的攻擊和對當時習俗的叛逆的態度中，這是“五四”時代和以后一段時期的一個很突出的特征。從蔡和森1920年5月的信中，毛澤東得知他和警予已建立了“一種戀愛上的結合”，熱情地回信，譴責所有那些在婚姻制度下生活的人為“強奸團”，并發誓他絕不做其中的一員。[[36]](#_36___Xin_Min_Xue_Hui_Zi_Liao)

前一年，長沙一個青年女子被父親逼迫出嫁而自殺，[[37]](#_37_Mao_Ze_Dong_Jiu_Zhe_Ge_Zhu_T)在一場隨著開展的反對包辦婚姻的運動的背景下，毛澤東呼吁改革婚姻制度，以愛情的婚配來替代“資本主義”的婚姻。在1919年他已經斷定在人類的食欲、性欲、娛樂欲、名聲欲、權力欲等不同的欲望中，饑餓和性欲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寫道，老一代人只關心食物，從而把他們的兒媳當作奴隸來剝削，他們不像青年人那樣關心愛情和性欲，可是愛情和性欲“不僅關系到滿足肉欲的生物沖動，也關系到滿足高層次的精神欲望和社交欲望”。因此，老一代人是反對滿足青年人欲望的資本主義的天然伙伴。[[38]](#_38_Te_Bie_Shi_Jian___Lian_Ai_We)他這時已認定像這樣的婚姻是“資本主義的基礎”，因為它引起“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戀愛”。[[39]](#_39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

正當有強烈愛國主義的李大釗在1920年經歷了國際主義的階段，宣稱人類都是同胞的時候，[[40]](#_40_Li_Da_Zhao____Ya_Xi_Ya_Qing)毛澤東在服膺蔡和森像俄國人那樣的革命觀點的同時，也接受了蔡和森的看法，認為：凡是社會主義，都是國際主義的，都不應該帶有“愛國的色彩”。生在中國地方的人應該主要（雖則并非僅僅地）在“中國這一塊地方”工作，因為那是他們能夠最有效地工作的地方，也因為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各地“更幼稚更腐敗”，最需要改變，但是這并不是說他們只應該愛中國，而不愛別的地方。不過在12月1日給蔡和森的同一信中，以及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長沙召開的新民學會的會議討論中，毛澤東卻堅持學會的宗旨應訂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有人分辯說，既然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沒有必要把它分開來提。但是對毛澤東來說，這卻是重要的。[[41]](#_41___Xin_Min_Xue_Hui_Zi_Liao)

至于政治變革的目的，和實現變革的方法，毛澤東在收到蔡和森、蕭旭東（蕭瑜）和其他人細談自己觀點的信件，收到學會會員間在法國辯論這些問題的情況的幾封來信之后，于12月1日回了信。蔡和森、蕭旭東，連同毛澤東，在湖南師范學校的幾年中組成三人小組，自稱“三個豪杰”。但是，隨著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已分道揚鑣了，蔡和森走向布爾什維主義，蕭旭東走向更溫和的有模糊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澤東則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觀點——中國的道路必須是俄國的道路。但是，在這一時期，在批駁蕭旭東和羅素——這時他正在長沙沿著類似的路線演講，贊成非暴力革命，不要專政——的論點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范疇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總人口15億，分成5億是“資本家”，和10億是“無產階級”。[[42]](#_42___Xin_Min_Xue_Hui_Zi_Liao)

很明白，毛澤東在這里使用的無產階級，反映他對這個詞的理解更接近“沒有財產的階級”的字面意思，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城市的和農村的無產階級的概念。在以后的幾年中，從理性上說，他開始理解得好一些，不過就本能的反應看，這一中文說法仍否對毛澤東意味著更像是“地球上的不幸者”，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然而，盡管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范疇的理解還有點不明確，他在1920—1921年冬這一時期，肯定是朝著與列寧對政治的解釋和諧一致的方向前進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條列寧主義的原則，即政權的決定性的重要性，這一點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點。在1921年1月21日回答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說中國“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43]](#_43___Xin_Min_Xue_Hui_Zi_Liao)的來信時，毛澤東寫道：

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我固無研究，但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

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產分配管理等），與一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只有大小不同，沒有性質不同。工團主義以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謂為另一回事而舉以屬之另一種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況乎尚有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這一封信見地[按：中國“要經俄國現在所用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個唯一無二的方法，舍此無方法”。]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44]](#_44_Tong_Shang_Shu__Di_162__163Y)

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的六年中，毛澤東的經驗很清楚地分成三個部分，前兩年他忙于組織湖南的工人運動，可以稱為他的工人時期。其后，在1923年和1924年，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廣州和上海工作，這一時期可以稱為他的“組織員”時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致力于組織農民運動，可以稱為他的農民時期。

關于這三個時期中的第一個時期，最令人驚奇的是，根據全部可得的主要的和次要的資料，與這一時期前后所出現的情況相比，它似乎在理性上是貧瘠的。不管怎么說，他的工人時期所留下的著作數量很少，并且很缺乏熱情和辯才，而在其他場合，他卻是很善于表現的。誠然，毛澤東同黨內其他人一樣，在這前兩年中都忙于組織工作。可是，主要的解釋在于，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真正過過工人生活，他曾過的是農民的生活和學生、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確實，他在長沙師范學校當學生的時候，曾為工人辦過夜校，還在許多情況下交過工人朋友。可是，他對工人的問題的本能的了解卻不完全一樣。所以，從長遠來看，盡管毛澤東在許多工廠組織罷工，無疑對他的智能和政治的發展有影響，可是在當時的收獲卻很微小。

頗有啟發的是，直到最近才能在中國之外找到的毛澤東唯一完整的寫于1921年中期到1923年中期的文字（由于偶然情況，一種銷路很廣的雜志在1923年轉載），事實上已是毛澤東在“五四”時期活動的尾聲了。它就是《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是毛澤東終于設立那所引人興趣的學校時，于1921年8月寫的。[[45]](#_45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

這篇文字，正如1917年以來毛澤東所表現的那樣，強調學習過程中的個人積極性和自我表現。它也是毛澤東在一年前寫的有關湖南人的使命的一些文章的回聲。不過，盡管毛澤東有力地譴責了這一現象，“學術為少數 ‘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愈遠，釀成一種知識階級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劇”，他對所說的“所謂無產階級”的理解，與前一年12月給蔡和森的信中一樣模糊。

毛澤東在“工人時期”特別與工人運動有關的文章很少，間隔也遠。李銳寫的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傳記，是這一時期資料的主要來源，他也只能找到一件值得全面引用的資料。這篇文章的時間是1922年12月，即毛澤東從事領導長沙印刷工人罷工的時候，是他對長沙《大公報》編輯攻擊工人卷入政治，供他人做試驗的回答。他寫了很有特點的幾句話：

我們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識，這是很不錯的；我們工人很愿意有知識的人們能挺身而出，做我們的真實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觀地位……我們只承認能犧牲自己的地位，忍饑吃苦，而為我們大多數工人謀利益的人，是我們的好朋友……請快快脫去長衣！[[46]](#_46_Li_Rui____Mao_Ze_Dong_De_Zao)

我們在此又一次發現一個經常出現的主題，即尋求改革社會的人（因為這位《大公報》編輯聲稱他也要這樣做）應“入于其中”而不是留在旁觀地位，或認為比普通人優越。可是這里卻沒有關于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任何東西，更不要說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了。可能《大公報》不是提出這種思想的地方，不過李銳不可能從毛澤東作為勞工組織者的時期引用有關這一主題的任何文字。

解釋很可能在于這時的中國共產黨路線上。1922年共產國際的特使馬林（斯內夫利特），把他的中國同志們推上了一種與國民黨人組成統一戰線的單一的組織形式，即所謂“黨內合作集團”，中國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在這一組織形式下參加國民黨。這一思想原先是馬林根據他在荷屬東印度的經驗，于1922年3月提出來的，在荷屬東印度左翼社會黨人曾以類似的方式與伊斯蘭教聯盟——一個具有顯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稱所含的意思）民族主義組織——合作過。由于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大多數其他領導人立即拒絕這一思想，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況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出，從而得到了共產國際認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訓令。持有這一訓令，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國，得以讓他的中國同志們勉強地接受了“黨內合作集團”的思想。[[47]](#_47_Yin_Ci__Ma_Lin_Zai_Dui_Yi_Lu)

這種合作模式，從一開始就是激烈爭論的對象。就所知而言，毛澤東既沒有在設計這種模式，也沒有在接受這種模式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可是，他是第一批積極參與執行這種模式的人中的一個。1922年夏，毛澤東參與組織湖南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并以長沙支部書記的資格給團中央寫報告。15個月以后，即1923年9月，他已在同一地區積極建立起國民黨組織，并寫信給國民黨本部總務部，要求委他以籌備員名義，以便與各方面接頭。[[48]](#_48_Jian_Mao_Ze_Dong_1922Nian_6Y)

從那時起，毛澤東即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一般說來，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旦接受了“黨內合作集團”，就他們而言便具有一種傾向，斷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國民黨的領導，至少暫時是這樣。這就是1923年陳獨秀的立場，而就毛澤東而言，他在他作為“組織員”的時期朝這個方向走得很遠。

這一點在題為《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在1923年4月，在正式采納“黨內合作集團”的關鍵性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夕發表的。他宣稱，在中國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動派。關于三派中的第一個派別，他寫道：“當然，革命派主體是國民黨；新興共產派與國民黨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適、黃炎培及其他“新興的知識階級派”；另一方面包括新興的商人派。反動派當然是三大軍閥派系。

把社會力量的總體一分為三，當時是，并且后來一直是毛澤東對待政治和革命的重大特點。這里十分明顯的另一特點，是可以稱之為混亂和壓迫的辯證法，毛澤東在1919年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中，對這一點曾十分強調過。由于軍閥的力量，由于中國在民國政府之下的統一違反帝國主義的利益，毛澤東論證說，再過八年或十年，也不會有和平與統一，但是，政治形勢愈反動，愈混亂，這就愈能激勵全國人民的革命情緒和組織能力，從而民主和國家獨立最終一定能戰勝軍閥。[[49]](#_49___Wai_Li___Jun_Fa_Yu_Ge_Ming)

1923年7月，一篇題為《北京政變與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談論到商人，他們將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勝利。這一直是個有相當大的爭論的題目。在文中毛澤東寫道：

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不是別的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量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是國民歷史的使命。這個革命是國民全體的任務，全國國民中商人、工人、農人、學生、教職員，都同樣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歷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實的指示，商人在國民革命中應該擔負的工作較之其他國民所應該擔負的工作，尤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導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50]](#_50___Xiang_Dao_Zhou_Bao____Di_3)

有人認為毛澤東1923年7月的文章，不是談商人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而是談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現階段，革命的任務之性質。[[51]](#_51_Lin_Da__Xie_Fu____Mao_Ze_Don)這種觀點不僅違反證據，并且完全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在1923年和1925—1926年之間觀點的劃時代的轉變，從面向城市的展望，轉向對農村的期待。在他的1923年7月的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澤東寫道：

我們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鉗制全國國民的二重壓迫政治，全國國民在這種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銳很迫切的感覺這種痛苦的還要以商人為最。

換句話說，毛澤東認為商人，或更廣義地說直接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城市居民，最能夠在民族革命中起領導作用，因為他們的苦難最深重。三年以后，毛澤東發現了農民的內在的革命潛力，這一社會學的分析就立刻整個倒轉過來。在我們考慮這些發展之前，毛澤東的1923年7月的文章還另有一個持續的特點值得注意。結尾是這樣寫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國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國家唯一的道路……我們的環境已經引導我們做歷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開展一個新時代，創造一個新國家。這就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使命，我們切不要忘記！

在這里，我們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見，政治意義的國民和生物意義的民族，在毛澤東的思想中是連在一起的。

在中國以外，幾乎找不到毛澤東在將近兩年半的時間內的有分量的文字；這個時期，是指這一篇和另兩篇簡短的文章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向導》上出現，直到毛澤東在1925年12月擔任國民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的編輯工作之間的時期。他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1924年2月，他起草了幾個決議提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他是該會的成員）[[52]](#_52_Mao_Ze_Dong_Wei_Guo_Min_Dang)。即使是在這樣正式的場合，毛澤東的某些言論，也足以說明他一貫的工作作風和政治戰略的特點，他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反對建立“調查科”[[53]](#_53_Guo_Min_Dang_Zhong_Yang_Zu_Z)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調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調查和應用分離——這正是我們這樣一個革命政黨所不能做的”。[[54]](#_54___Zhong_Guo_Guo_Min_Dang_Qua)

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時間，于1925年初回到湖南休養，并開始了他組織農民的實際見習期。他于1925年秋回到廣州，事實上負責國民黨宣傳部，主辦《政治周報》，開始為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他于1926年5月至10月領導該所），并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這時，他已具有中國革命的重心在農村的農民的觀點，并且以后從沒有動搖過。

毛澤東在1926年給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列舉了國民黨在宣傳方面的弱點，特別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55]](#_55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n)毛澤東觀點的這一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變：農民日益高漲的戰斗精神，彭湃和其他許多人以及毛澤東在動員農民方面的活動。毛澤東在結尾說，只有釋放出這種潛能，這個革命的政黨（或幾個政黨）才能建立起以反對帝國主義為目標所必需的力量——毛澤東在他1925—1927年的“農民時期”所有文章中，都不斷對此予以闡述。不過，盡管中國共產黨，或者它的一個實際派別，在20年代中期注意到了農民，毛澤東的情況也是獨特的；這樣說，并非僅僅著眼于他后來取得了由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領導地位，而是因為他是早在1926年就詳細地闡明了預示中國革命未來道路的理論主張。

毛澤東關于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思想的出現，很可能成了中國共產黨運動史中比其他任何一個題目討論得更多的主題。許多歷史的、理論性的問題在這一學術辯論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點由于缺乏合適的資料，直到最近依然模糊不清。毛澤東在1936年會見斯諾時聲稱，他只是在1925年五卅慘案以及隨之而來的愛國情緒在農村和在城市一樣高漲起來之后，才開始懂得革命潛力要在中國農民中去找。現有的證據有助于證實毛澤東的說法，并且確實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農村革命的問題，只是在1925年接近歲末之時。可是，盡管有這樣的重心轉移，為了表明毛澤東的思想總的連續性，在分析他在1926—1927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談一談他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對待農民的態度還是合適的。

在1919年的后半年，毛澤東曾經沿著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線，草擬過一份發展“新鄉村”的廣泛的計劃，其中一章于12月在長沙發表。除“新鄉村”的口號本身以外，文章號召中國青年以俄國青年為榜樣，深入鄉村去宣傳社會主義。[[56]](#_56_Mao_Ze_Dong____Xue_Sheng_Zhi)就這兩方面而言，毛澤東這時所倡導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釗的影響。[[57]](#_57_Mo_Li_Si__Mai_Si_Na____Li_Da)可是，其他組成部分，像關于美國“工讀”——“我們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已經加以利用”——概念的論述倒很像是來自杜威和胡適。

可是，比這些思想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本人的農民生活經驗，他就是靠這樣的經驗發展了他20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年12月，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中國農村的階級結構，毛澤東1922年9月在自修大學講課中，解釋了這篇文章的觀點。雖然非常可能毛澤東沒有寫這篇文章，可是他以這篇文章作為他的教材，無疑是贊同該文所作的分析的。毛澤東反駁有些人所說中國農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構成農民的階級”分成四類：

一、所有多數田地，自己不耕種，或雇人耕種，或租給人耕種，自己坐著收租，這種人本算不得純粹的農民，我鄉下叫做“土財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種，而以這個土地底出產，可以養活全家。他們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種的。這一種人就是中等農民了。

三、自己也有一點土地，然而只靠自己的土地底出產，絕不能養活全家。所以不得不靠著耕種人家底田，分得一點以自贍，這一種人已可謂下級農民了。

四、這乃是“窮光蛋”，自己連插針的地方都沒有，專靠耕人家底田謀生活的，這一種人就是最窮的農民了。

毛澤東說，第三種和第四種構成農民的絕大多數；此外，第三種中有些人由于總是欠債，不得不把土地賣給土財主或中等農民，而下降為第四種農民。[[58]](#_58___Gao_Zhong_Guo_De_Nong_Min)

雖然這種分析僅僅是較為初步的，人們仍然可以從我剛予摘要的文字，與毛澤東在1926年1月和2月的兩篇分析中國農村階級結構和整個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文章之間，發現一點相似之處。[[59]](#_59___Zhong_Guo_Nong_Min_Zhong_G)毛澤東在分析農村階級關系，討論過重的地租對佃農的剝削，和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傾向之后，進而得出政治結論，采取了絕對平均主義的立場。他聲稱：“我們人類，自娘肚里一生出來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樣地應該穿衣吃飯；各人都一樣地應該做工”。原先每個人都共同使用土地；讓少數人游手好閑，食肉衣綢的私有財產，是以掠奪本來為農民所有的東西為基礎；農民應該站起來收回自己的東西。一當他們站起來了，共產主義（它意味著大家有飯吃，有工做）將會來幫助他們。[[60]](#_60___Yi_Da_Qian_Hou_____Di_212)無疑，這種宣傳鼓動的言詞，是專為投合農民的心理，但是甚至在1922年，它也反映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整個中國共產黨，都沒有一貫的、現實的農村革命戰略。四年以后，毛澤東在制定這項戰略方面收效甚大。

在1925—1926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總的理解水平絕非很高，在他1926年2月寫的文章的開頭處，他聲稱：“無論那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61]](#_61_Mao_Ze_Dong____Zhong_Guo_She)在這個普遍的框架內，他把大地主列為大資產階級的一部分，把小地主列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并對各階級內的階層，不論城鄉，按他們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一律按貧富的程度來劃分。毛澤東所采用的框架，與陳獨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著重農民的家計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傭勞工的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標準，來確定中國農村社會的階層。[[62]](#_62_Wo_Yi_Zai_Wo_De_Lun_Wen___Ma)

因此，認為毛澤東的分類與陳獨秀基本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63]](#_63_Ru_Huang_Zong_Zhi_Zai_Ta_De)他們兩人間的主要不同，以及毛澤東實質上的獨創性，在于別處，這卻是正確的，也就是在于他決心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進行農村革命，和在于他傾向于解釋，乃至形成分析，以適應策略目標。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力量對待革命態度的分析，事實上在1925年末就已成形。毛澤東以“子任”的筆名在《政治周報》前五期中發表的五篇文章，其中一篇實質上勾畫出了他在1926年初要用的同一方案的輪廓，只缺少把農民業主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劃分為有剩余的、收支大體相抵的，和生活無以自足的。[[64]](#_64_Yue_Han__Fei_Ci_Jie_La_De_Za)這篇文章發表于1月，但是很可能與他在1925年10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廣東省代表大會上發言的主旨相一致，在這篇文章中，他基本上以他1926年2月的著名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用的同樣的說法，討論了關于政治行為，而且更特別是關于國民黨內派別活動的社會區分的含意。在這里顯然非正統地把社會劃分為“上”、“中”、“下”，并以此大行其道，因為在把上層的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牢牢地放在反革命營壘，下層的階級（小資產階級，城鄉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放在革命營壘之后，毛澤東進而考慮在“西山會議”派出現后，隨之發展的兩極分化中，如何分化“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地主），迫使他們做出選擇。正如他在1926年所做的，并且以后一直在做的那樣，他把中國人的絕大多數（4億人中的3.95億人）放在革命的一邊，僅留下100萬頑固的反動派，相當于“上層”一類，在中間搖擺的是向兩邊分化的400萬。[[65]](#_65___Guo_Min_Dang_You_Pai_Fen_L)

至于領導權問題，毛澤東1926年初，一方面強調了農民在數量上的重要性和遍布農村的貧困的程度——因而也是對革命的同情程度——同時也敘述了城市無產階級作為革命中的“主力”的特性。[[66]](#_66_Mao_Ze_Dong____Zhong_Guo_She)所以，雖然“無產階級領導”的概念只是在1951年才增加到這篇文章中去，他卻在1926年初就承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原理，工人在革命過程中起中心作用。1926年9月他竟為農村發出的對革命武裝的熱情所陶醉，以致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理明顯地翻轉過來。[[67]](#_67_Mao_Ze_Dong____Guo_Min_Ge_Mi)

毛澤東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是在這時發表的，這篇文章一開始就這樣說：“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這句話本身并不值得特別注意，因為自1925年中期開始，農村革命活動的高潮已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農民運動表示敬意，已成為共產黨和（或）國民黨的發言人幾乎每次談話中自動出現的套話，可是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表明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性的議論，又確實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寫道：“在一個經濟上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的敵人是鄉村的封建宗法勢力[地主階級]。”外國帝國主義者就是依靠這個“封建地主階級”來支持他們對農民的剝削；軍閥不過是這個階級的首領。所以，正如海豐的例子所顯示的，只有動員農民去摧毀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統治基礎，才能推翻他們的統治。他寫道：“中國的革命，只有這一種形式，沒有第二種形式。”[[68]](#_68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n)

毛澤東不只是斷言在舊社會農村反動的勢力的嚴重性，以及農村的革命勢力在推翻前者中的重要性，他還進而反對城市的重要性：

有人以為買辦階級之猖獗于城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階級之猖獗于鄉村，二者應相提而并論。這話說猖獗對，說完全相同不對。買辦階級集中的區域，全國不過香港廣州上海漢口天津大連等沿海沿江數處，不若地主階級之領域在整個的中國各省各縣各鄉。政治上全國大小軍閥都是地主階級（破產的小地主不在內）挑選出來的首領，這班封建地主首領封建軍閥利用城市買辦階級以拉攏帝國主義，名義上實際上都是軍閥做主體，而買辦階級為其從屬。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幾萬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括得來，買辦階級如銀行公會等對北京政府有條件的借債，究竟比較甚少。故我總覺得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并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盡管這里也儀式般地提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段話的含意很明顯，是舊社會權力的真正中心在農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擊也必然要打在農村。在文章的結束段，以令人吃驚地毫不掩飾的語言，明白無誤地道出：

中國的農民運動乃政治爭斗經濟爭斗這兩者匯合在一起的一種階級爭斗的運動，內中表現得最特別的尤在政治爭斗這一點，這一點與都市工人運動的性質頗有點不同。都市工人階級目前所爭政治上只是求得集會結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時破壞資產階級之政治地位；鄉村的農民，則一起來便碰著那土豪劣紳大地主幾千年來持以壓榨農民的政權（這個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非推翻這個壓榨的政權，便不能有農民的地位，這是現時中國農民運動的一個最大的特色。[[69]](#_69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n)

換句話說，工人（“當前”——但是有多久？）只不過是改良主義者，追求的是他們個人的有限的利益；不妨說他們是被“工會意識”激勵起來的。而農民則相反，不僅處于決定性的社會地位，不推翻舊秩序的整個大廈，就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而且他們注意形勢，并深思熟慮地開展廣泛的斗爭，不獨是經濟的，還有政治的。

此后，毛澤東在明顯地使農民代替工人作為自覺的革命先鋒方面，從沒有走得如此之遠。他1927年2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農村斗爭中的領導作用歸之于貧農；它確沒有以同樣生動的語言降低城市和以城市為基地的階級的重要性，雖然有跡象表明他并沒有放棄前一年9月的立場。把當時革命成就的70%歸之于農民的這一著名措詞[[70]](#_70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n)可以解釋為，指的是力量而不是領導作用，和只是描繪暫時的狀況。另有一段話，把9月的文章所做的分析概括為簡明的形式，內容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71]](#_71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_1)

農民盡管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須遵從不是工人的，就是資產階級的領導，而不能起自主的政治作用；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政治原理之一，追溯到了馬克思本人。在以后的半個世紀之中，毛澤東的理論貢獻并不在于以與這原理對立的理論來代替它，而是在于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原則，同他相信中國革命的命運最終有賴于農村發生的事情，這二者編織在一起。

毛澤東實際上在1926年9月說過，整個中國社會得不到解放，農民就不可能解放他們自己。他似乎賦予農民一種使命，這種使命頗像馬克思歸之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無產階級的。正如我們已經看到，他同時承認工人是“所有革命階級的領導階級”。這兩種說法，我們如果認為一種是關于最近將來的革命斗爭的形式，另一個是界定革命之事的長期模式，兩者就可以一致起來，雖然如此解釋的綜合說法，將使農民具有一種很難與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一致的主動性。不管怎么說，如果這就是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的話，那么他解決農民問題的后一半的方法，只有在取得政權之后，為社會的革命變革確定模式的過程中，才開始起作用。在那一時刻到來之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運動都將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 黨、軍人和群眾，1927—1937年

正如在本章前節談到的，毛澤東盡管沒有參與設計“黨內合作集團”這種單一的組織結構，他卻從1923年即開始大力執行這一安排。很明顯，他能在這種環境中有效地工作，是因為他對國家的統一和中國擺脫帝國主義控制的斗爭極為重視，他認為國民黨及其軍隊暫時還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最好工具。

因此，毛澤東竭力把國民黨內的絕大多數和它的支持者團結在一起，特別是在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這八個月他領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這一時期，不過其立場是激進的，而絕不是共產主義的或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上他把國民黨機關刊物《政治周報》的發刊社論的大部篇幅，都用來批駁廣東正在“共產化”的指責。他寫道：革命的真正目標是“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實現人民的統治，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72]](#_72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n)換句話說，目標是實行“三民主義”。

1926年1月，毛澤東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分辯說，出現新右派并不是國民黨左派圖謀的結果，而是革命發展和國民黨階級基礎之間相互作用的自然產物。他寫道：“革命的真正力量”是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聯盟。曾支持辛亥革命反清的地主、大資產階級分子，不可能接受“民權”和“民生”的要求。“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著革命的發展和國民黨的進步，如筍脫殼紛紛分裂。”[[73]](#_73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

正如我在上面討論毛澤東對農民革命的態度時所談到的，在1926年初，他仍相信中國的4億人口中有3.95億是站在革命的一邊的。因此他能夠接受斯大林的觀點：國民黨是影響廣大群眾尤其是在農村的群眾的唯一的工具。

隨著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調查，毛澤東對這個以及其他問題的觀點都有根本性的改變。他在1927年2月16日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單獨寫的一篇報告中，比他當時公開發表的廣為人知的文件更為直截了當地表達了他的新見解。他把農村運動的發展過程分為三個時期——組織農會時期、農村革命時期和建立統一戰線時期——并十分強調在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真正凈化革命是不可少的。統一戰線不會產生期望的結果，除非先有一個“推翻封建地主的權力與威望的殘酷斗爭”的時期。誠然，他說在農村興起的斗爭，應盡可能地通過國民黨的機構開展，而不是直接由共產黨在自己的旗幟下進行，但是毛澤東明確地把這看成是個暫時的策略。他說群眾正在向“左”的方向前進，并且渴望著另一場革命；共產黨切不要從引導群眾朝前進的方向中退下來。[[74]](#_74___Shi_Cha_Hu_Nan_Nong_Yun_Ge)總之，后來在1927年，毛澤東對蔣介石，乃至對所謂的“國民黨左派”會支持農民的行動，而堅決反對他們本階級利益，已喪失一切希望。毛澤東是最先要求與這些先前的同盟者決裂，并在農村打起紅旗的共產黨人之一。

從秋收起義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這22年，毛澤東幾乎都是在農村的環境中度過的，親眼看到“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的出現與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經驗標志了他早期關于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想的延續與完成。這還是不懈的軍事斗爭的20年，并達到了形成與過去徹底決裂的程度。當然，毛澤東曾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斷斷續續地打仗，并且在18歲時當過兵。1925—1927年間，他也曾洞察國民黨與北方軍閥內戰所提供的政治機會，可是，當時要共產黨人組織自己的獨立武裝力量，并以之作為革命斗爭的主要手段，卻全然是另一回事了。

自1927年開始，毛澤東在這一方面的經驗，對他在理論上的貢獻有著深刻的影響，并且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關于游擊戰的戰略戰術，他漸次發展了更為精細的概念，應該把它看成作為他的思想整體的一個主要部分。然而構成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江西和延安時代活動的游擊戰策源地，不僅激勵毛澤東去寫有關軍事的問題的著作，而且深深地影響了他對如何組織革命領導的想法，也影響了滲透他的觀點的精神。這后一點盡管很量要，但也不應夸大。毛澤東強調軍隊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并沒有像魏復古和別人所論說的那樣，使他成為一個暴徒或法西斯分子，為了軍事權力而喜愛赤裸裸的軍事力量。不過，它無疑也確實更加強調了勇氣、堅定和尚武精神，這從他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可看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終結都始終不渝。

更有持久意義的是共產黨人在當時采用的，并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以后當情況發生了變化時，還保持的組織和政治工作的模式。簡言之，游擊部隊動員農民群眾，是和共產黨動員城市工人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無論是革命精英與支持者之間的關系，還是界定與辨明整個事業的性質的思想方式，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

中國革命同俄國以及歐洲先前的革命之間的差別，當然不像前面一句話的歸納所道出的那樣明顯，如果撇開井岡山不談，即使在江西也有一些小型的工業，因而也有一些工人，在1927—1949年這一整個時期，都有紅軍在理論上所從屬的中國共產黨，因此，這不是一個軍隊領導農民的問題，而是黨和軍隊領導城鄉“群眾”的問題。貫串這22年的大部分時間，事實一直是黨以有效的辦法，作為靈魂或寄生物存在于軍隊的肌體內，甚至在中國共產黨本身公開出現于斗爭舞臺上時，它也是依靠紅軍作后盾才得以生存，而不是依賴它的工人階級基礎的團結一致。并且，即使黨和軍隊，沒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支持，也都堅持不下去，這樣一種共產主義運動與人民的關系，與過去所知道的都大不一樣。

正如以后若干年毛澤東本人所指出的，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模式的不同點，不僅在于中國共產黨人進行武裝斗爭，和在農村進行武裝斗爭。不同點還來自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遠在實際取得政權以前，即對各不相同的，但常常是相當大的地區和人口實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因為這個緣故，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參與了與人民的三重關系：革命軍隊的關系，設法從群眾“海洋”獲取軍隊作戰所必需的支持；“先鋒隊的黨”的關系，設法指導無產階級完成它的歷史使命；政府，即國中之國的關系，在政府的職能中與其控制下的全體居民在許多層次上建立一個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網絡。

毛澤東是最能與中國革命特有的現實協調的領袖之一，領袖與群眾關系的各個不同方面，都能在他的思想中表現出來。在原則上使所有的這些關系具有活力的中心概念，就是“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體現中國共產黨政治思想傳統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要素，它把中國的共產主義從蘇聯的共產主義分開。盡管毛澤東只是在40年代初才從理論上對它加以全面的研究，可是關鍵的概念和方法卻是在前15年中漸次出現的，這一時期僅僅為了要生存下去，中國共產黨人就必須與他們在其中工作的群眾建立最密切的關系。

可是與人民在一起工作，對毛澤東來說，并不意味著在他們之中迷失方向，放任群眾自發行事，也不應對延安傳統幻想化，或感情用事，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相信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擴大民主”的人。在1943年6月1日的有名的指示里，毛澤東第一次把他的群眾路線的思想系統化。它確實反映了他所關切的事，即政策制定者應該傾聽下級的意見，并向基層的經驗學習。他的“領導核心同廣大群眾密切地結合起來”和“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意見”的指示是非常嚴肅認真的。不過最終目的還是把“群眾的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然后，“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75]](#_75___Mao_Ze_Dong_Ji____Di_9Juan)

換句話說，要對群眾做工作，使群眾自己無法詳細闡述的意見化為群眾的意見。這樣的說法，與列寧的階級覺悟只能從外面注入無產階級的觀點之間，存在一種值得注意的對比。可是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與列寧的領導方法卻極為不同。他們各自所領導的革命也是如此。我們現在來看看從1927年開始毛澤東關于這些問題的思想發展，首先看軍隊的作用。

1927年8月，中央委員會批評他的秋收起義戰略，指責他過分重視軍事實力，對群眾力量缺乏信心，把這一行動變成了“軍事冒險”，這時他直率地回答說，中央委員會正在執行“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眾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76]](#_76_Guan_Yu_Ri_Qi_Wei_1927Nian_8)事實上，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的發言已回答了這樣的批評，他說道：

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群眾運動。……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這似乎是毛澤東第一次用了這個著名的警句。十天以后，在中共湖南省委員會的會議上，他又重復了這句話，并加上了在現在的情況下，黨的60 %的精力應該放在軍事運動上。[[77]](#_77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他深信，只有軍隊，或者說有組織紀律的游擊隊，才能與白軍打仗；群眾無法赤手空拳去打白軍。

1927年秋，在不斷革命的齊里亞主義[[78]](#_78_Yi_Zhong_Shen_Xue_Jiao_Yi__R)的幻想占有瞿秋白等領導人頭腦的情況下，中央委員會一時相信能夠實現；但是不久這些希望與幻覺都化為泡影。就毛澤東來說，在秋收起義以后他從沒有動搖過，深信要使革命延續下去，紅軍是不可少的。

直到1930年夏末李立三路線失敗為止，毛澤東認為軍隊的中心作用只是一個暫時現象；以后他才認為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國革命的長期模式。（我將隨后再談毛澤東思想的戰略方面。）但是，盡管他關于革命時間表的想法有這些變化，他的軍隊與群眾之間關系的觀點，只要斗爭的形式主要是軍事的，卻一直堅定不移。實質上，這樣的關系被概括為魚與水的隱喻，這是他在30年代提出來的。很清楚，這一提法并沒有低估人民群眾的重要性，因為沒有群眾同情與支持的“水”，革命軍隊的“魚”就會無助地死去。因此，共產黨人必須精心地培植人民支持的根源，使得維持他們的“水”不至于干涸。同時，毛澤東的隱喻也表現得很清楚，軍事斗爭將由紅軍代表群眾來進行，而不是靠群眾自己。

細致地分析從20年代到40年代毛澤東思想在各個方面的發展，將會在很大程度上與第3和第10兩章中的按序敘述重疊。毛澤東的關于革命的目的和策略想法的主要特點，將只按主要階段簡要地綜述如下。

早在20年代，在井岡山，毛澤東不僅發現了正規組建的游擊隊的重要性，而且發現了根據地的重要性。在根據地，紅軍可休整，可發展與居民的接觸。沒有這些，紅軍的作戰只會成為軍事冒險。然而，在那個階段，毛澤東在他在偏遠山區的作戰行動和不僅李立三而且毛澤東本人也在滿懷信心地期望的全國“革命高潮”之間的關系上，并沒有清楚的認識。在1928年11月25日，《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中，毛澤東斷言井岡山紅軍的活動，不算是暴動，這只是“打江山”，只要沒有全國的革命高潮出現，情況會繼續是這樣。但是，毛澤東很快萌生紅軍控制區域的迅速擴大，可大大地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思想。這樣，在中央來信要求毛澤東和朱德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時，毛澤東在1929 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回答說，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信中向中央建議，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中共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在此一年中，要在上海、無錫、杭州、福州、廈門等處建設無產階級斗爭的基礎，使能領導贛、浙、閩三省的農民斗爭。[[79]](#_79_Guan_Yu_1928Nian_11Yue_Bao_G)

至于共產國際，雖然它常常決定不了高潮到來有多么快，因而也不能決定是否應告訴中國共產黨人是推進還是鞏固他們的地位，它卻對這些事情有一個首尾一致的十分清楚的理論見解。在本質上，莫斯科的觀點是，紅軍的活動和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是重要的，不過，只有當這些活動與城市里的有效工作同時開展，使城市無產階級再次成為要認真對付的力量時，才有可能導致革命的勝利。于是，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個決議中宣稱：

黨指導著各省區之農民自發的游擊暴動，就應當注意到：這些農民暴動可以變成全國暴動勝利的出發點，只有在他們與無產階級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的條件之下。黨在這里也應當見著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在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準備幾個鄰近省區之間的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而且準備有組織的有預備的廣泛范圍之內的發動。[[80]](#_80_Zhong_Yang_Dang_An_Guan_Bian)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關于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1929年10月26日）指示中國共產黨，新的浪潮正在開始，所以，浪潮一上升到足夠高度就必須采取步驟建立工農獨裁制，這封信給李立三的立即行動計劃以決定性的推動。共產國際在信中進一步說明：“中國全國危機和革命高漲底另一個特點，就是農民戰爭。”但是，雖然鄉村的農民革命運動（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把毛澤東領導下的蘇維埃運動和紅槍會之類古老團體的活動混為一談）“是革命潮流中的一個支流，全國革命運動底雄偉高漲將順著這個支流而更加增長起來；然而，日益增長的革命高潮底最準確的最重大的特征，卻是工人運動的復興，工人運動，已經走出1927年嚴重失敗后的消沉狀態”。[[81]](#_81___Zhong_Gong_Zhong_Yang_Wen)

換句話說，在中國的條件下，在農村開展游擊戰是革命活動的一個合理的、有價值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城市里工人更平常的、較熟悉的活動，卻不僅是更為基本的，并且最終更有決定性。就李立三來說，他起先遠比共產國際對農村發生的一切的意義更持懷疑態度。可是在1930年初，當他開始制定夏季大進攻的計劃時，他驚奇地發現紅軍能夠提供十分有用的輔助力量，來分散國民黨對工人運動的注意力，最終通過城市和農村的鉗形攻勢使勝利成為可能。

關于中國革命中城市與農村的相對重要性的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各執一端，莫斯科則持溫和主義的立場。至于其他兩點，即革命的時間表和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問題，毛澤東與李立三在許多方面相互是很接近的，而與莫斯科對立。

李立三與莫斯科關于革命高潮固有性的分歧，由于當時中國和蘇聯之間的通訊很差，以致信件往往需數月之久才能到達，而被弄得有點模糊不清。結果是，兩方領導往往是針對早已放棄的立場做出反應的。只舉一個例子，共產國際1930年6月（在中國資料中，通常所記日期為7月23日，因為這是在上海收到這信的日期）的信，是5日在莫斯科根據中國共產黨2月份所通過的各項有關決議起草的。[[82]](#_82_Zhe_Xie_Shi_Qing_Yi_De_Dao_S)盡管相互辯論的先后順序是如此模糊難辨，卻并不妨礙我們抓住斯大林與李立三之間在觀點上的廣泛差異，雖然它也確實使歷史學家確定做出某些特定決定的責任，特別是30年代前半期付出慘重代價的錯誤的責任的工作復雜化（關于這些事情參看本書第3章）。

因此，1930年6月，共產國際雖則提到，因為工人運動的浪潮與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為一體，在全國還沒有真正的革命形勢，卻預言“最近將來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夠包括整個中國，但至少也要包括幾個有決定意義的省份”。[[83]](#_83___Gong_Zhong_Zhong_Yang_Wen)雖然共產國際期望中國決定性的戰斗不久的將來即將發生，他們仍然不同意李立三認為進攻的時刻已經到來。莫斯科因而明確地拒絕批準李立三命令對武漢、長沙等城市發動進攻，并在那些城市進行配合的暴動的決定，爭辯說紅軍與工人運動都首先需要進一步加強。[[84]](#_84_Ge_Li_Ge_Li_Ye_Fu_Wen__Di_36)

至于毛澤東，他開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隊伍投入進攻國民黨堅固的據點，從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實力基礎遭受危險。在這一限度內，他與莫斯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30年代初，事實上他對很快取得勝利的前景變得極為樂觀，在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中，他批評林彪對高潮的到來過于悲觀，并聲稱，雖然1929年4月他自己訂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時限是“機械的”，但是做到這一點已為期不遠。[[85]](#_85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n)

1930年毛澤東對李立三路線的態度，最近成為能接觸到有關資料的中國學者間廣泛辯論的主題。雖然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堅持1945年做出的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觀點，即毛澤東從沒有贊同過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計劃，只是執行了它，因為紀律要求服從命令，有些人卻分辯說，到1930年春，毛澤東已被這一戰略逐漸吸引過來，有些人甚至竟提出，從1930年初毛澤東即自發而熱情地追隨了這一戰略。不管怎么說，有明顯的證據，晚到1930年10月，毛澤東還在繼續信奉一條激進的路線。10月7日，毛澤東的隊伍占據吉安城時做出的一項決議，特別提到“全世界、全國、各省革命形勢”的存在，并斷定：“在革命高潮期間……蘇維埃政權無疑必在全國和全世界出現。”毛澤東1930年10月19日《給湘東特委的信》說，在目前“高潮”環境中，絕不容悲觀，要立即進攻南昌、九江，消滅敵人。[[86]](#_86_Guan_Yu_Shuo_Ming_Dui_Zhe_Ge)

即使上面的某些陳述，可以解釋為毛澤東告訴中央委員會，他認為該會想聽到的意見，因而1930年秋毛澤東對即將到來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這種齊里亞主義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種爭論的余地，關于毛澤東確信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的、決定性的因素，則完全不容爭辯。在這一方面，他是完全與李立三一致的，并與李立三一致反對莫斯科。[[87]](#_87_Guan_Yu_Li_Li_San_Jiu_Zhong)

特別在有一點上，毛澤東是完全同意李立三的觀點的，即他們兩人都認為外國人不懂，也不可能懂中國革命。1930—1931年冬，李立三被召到莫斯科受“審”，一位共產國際的審問人引用李立三的話說：“中國革命有許多特點，國際很難理解它，幾乎完全不理解它，因此事實上不能領導中國共產黨。”因此，他被曼努伊爾斯基斥責為一個“極端地方主義者”。至于毛澤東，他在30年以后聲稱：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于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志呢？[[88]](#_88___Zai_Kuo_Da_De_Zhong_Yang_G)

然而，在這個問題的另一關鍵方面，毛澤東并不與李立三采取同一路線。李立三十分明顯地想挑起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干涉，從而引起一場蘇聯不管是否愿意，也將被拖進來的“世界革命戰爭”。[[89]](#_89_Li_Li_San_Wei_Le_Zhong_Guo_G)對于這樣一個戰略幻想，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因為它意味著中國革命的命運基本上將在中國之外決定，而不是首先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他當然敏銳地意識到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存在的分量，以及在中國革命中國際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上面已作分析，1923年至1926年間，他的社會學觀點已有變化，這種變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既然舊反動秩序的主要基礎是地主在農村的統治，而不是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城市同盟者的勢力，那么中國革命的勝利也只能依靠在這片廣闊的土地上動員工人、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去推翻地主和他們政治代理人的“封建勢力”。

無論毛澤東在1930年夏的立場如何，無疑，同年9月長沙的撤退，標志了他思想上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轉向由農村包圍城市的相對長期的戰略。在這種情況下，他自上井岡山在1928年與朱德會師以來所形成的軍事戰術，變成了他政治思想的一個明確的、必要的部分。

根據毛澤東的自述，那是在1931年，在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失敗時，“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90]](#_90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毛澤東自己寫的闡述這些原則的最早文本，是1934年出的一本題為《游擊戰》的小冊子。[[91]](#_91_Guan_Yu_Zhe_Bu_Zhu_Zuo_De_Bu)這很可能就是他第一次系統的闡述將在遵義會議上提出辯論的戰略思想，這次會議標志了一個決定性的階段，無論是對一條新的軍事路線的出現，還是對打開毛澤東八年以后上升到黨內最高權力機構的道路來說，都是如此。[[92]](#_92_Zun_Yi_Hui_Yi_Zai_Ben_Shu_Di)1936年12月，毛澤東發表了一系列題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演，細致地回顧了五次反圍剿戰役的經驗教訓，并重申了他針對批評者的主張。最后，在1938年，他寫了兩部有關在抗日戰爭的特殊環境下運用游擊戰術的著作，《抗日游擊戰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第三本書《基礎戰術》，有些版本也署為毛澤東著。[[93]](#_93_Zhe_Ben_Shu_De_Ruo_Gan_Ban_B)

軍事戰術是一個專門領域，在這里不可能細加論述。因此下面試從戰爭與政治的共同問題加以觀察。毛澤東自己對這一整個問題已做了歸納，他寫道：“我們的戰略是 ‘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 ‘以十當一’，這個相反相成的道理，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94]](#_94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

當然，正如毛澤東在這段文章的剩余部分所詳加解釋的那樣，這一警句的意義是，紅軍從總體上看當時在數量和裝備上，大大不如國民黨和國內的其他白軍，甚至在每一個分隔的戰區也是如此，紅軍必須在戰場上取得絕對優勢時才進行戰爭。這種戰術優勢的獲得，要靠集中自己大部分部隊去對付孤立的白軍，從而“各個殲滅敵人”。因而，這一點固然部分地有賴于使用部隊的技巧，但絕大部分是由于與人民群眾的親密聯系，紅軍能獲得優等的情報的結果。

共產黨人動員農民，從而獲得的不僅是敵軍移動的情報，還有其他好處，例如群眾自愿擔任運輸隊或輔助隊的勤務員。動員的方法，與中國古代的軍事戰略家孫子所設想的完全不同，可是毛澤東的界定明確的戰術原則卻與孫子的原則驚人地相似，孫子寫道：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95]](#_95___Sun_Zi_Bing_Fa__Xu_Shi_Pia)

在毛澤東晚年，人們問他本人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學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往往是隨興之所至，不時還是矛盾的。1968年他在最經斟酌的一次談話中說，他在1927年開始打仗之前讀過《三國演義》，在1936—1938年寫有關軍事戰術的著作之前看過《孫子》。[[96]](#_96_1968Nian_7Yue_28Ri_Yu_Hong_W)總之，沒有疑問，他在那些著作中經常引用《孫子》和歷史著作，還引用《三國演義》和《水滸》這樣的小說。

毛澤東怎樣設法在理論上辯明下述見解，即組織變化不定的共產黨，主要借助軍隊在極為模糊不明的社會環境中活動，竟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這里關鍵的問題，在于主觀因素在解釋人的階級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通過轉變一個人的思想而更改他的客觀本質的可能性。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強調主觀立場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17年。在本節所研究的時期內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闡述，可以在1928年11月28日他的關于“井岡山斗爭”的報告中找到。在討論他的人數不多的紅軍大部分不是工人，乃至不是一般的農民，而是農村游民這一事實引起的問題時，毛澤東寫道：

此游民部分，亟須換以工農分子，只是沒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戰斗中，游民分子戰斗力卻特別好，同時傷亡數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現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來補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種情況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以改變其質量之一法。[[97]](#_97___Mao_Ze_Dong_Ji____Di_2Juan)

在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中，毛澤東批評林彪“把主觀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觀力量看得大一些”。[[98]](#_98_Tong_Shang_Shu__Di_130Ye)毛澤東所謂的“客觀力量”是特別指白軍而言，因為他們是在共產黨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觀力量”指的則是紅軍，共產黨人對他們可以從內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們的動向和戰略。但是，他說的顯然也是就廣義的客觀歷史境況而言的客觀因素，和就人類通過“自覺行動”以影響那些境況的能力這個意義而言的主觀因素。

毛澤東在軍事斗爭的環境中發展了他的思想，并從1927年起就開始在這樣的環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過，這樣的環境也加強了毛澤東思想中的上述要素。毛澤東把戰爭看成是“自覺行動”的最高表現，和人類精神的最高檢驗。他在一段話里說了這一點，對這段話他非常喜歡，以致在1926年和1938年他多次重復這段話，用的幾乎是同樣的詞匯。

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更是人類在戰爭中的特點。人類在任何的行動中表現的能動性，沒有比在戰爭中更加強烈的。戰爭的勝負，一方面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然而不僅如此，僅有這些，還只是包含著勝負的可能性，它本身沒有分勝負。要分勝負，還須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與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的自覺的能動性。

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臺，必須建筑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臺，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99]](#_99___Mao_Ze_Dong_Ji____Di_6Juan)

這段話雄辯地表達了我稱之為毛澤東的“軍事浪漫精神”的東西，它是為了生存，進行多年艱苦戰斗的經驗的產物。可是，僅僅用毛澤東的浪漫氣質或他的戰斗生活來解釋他相信人類，特別是中國人民的無限能量，那就過于簡單化了。他強調主觀因素，正如我已提出過，也符合在一個由許多不同的要素構成的過渡社會中進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國現實的這一方面，提供了毛澤東的思想和經驗的軍事性和政治性之間的聯結點。正因一場戰斗的結局常常不能確切地預言，而部分地有賴于主觀因素——像毛澤東在上述引文中所強調的——如士兵的勇氣和指揮員的戰術技巧，因而政治斗爭的條件在中國也不如在西歐，乃至在以前的俄羅斯帝國，顯得那么界限明確。雖然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別代表工人和資本家，可是農民在前者中的社會經濟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者中的社會經濟重要性，事實上都要大一些。此外，這個局面也因外國人出現的沖擊而大為改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波蘭問題，列寧關于20世紀的殖民地，已經建立了這樣的原理：在一定的社會中，各個階級的行動，可由對外國壓迫者的團結一致反應所改變。至于毛澤東，他不只是把它作為理論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從30年代開始他就深信，為了追求民族的目標，聯盟是能夠有效地實現的，它的建立，撇開工人和他們的最接近的同盟者農民不說，很大部分有賴于共產黨人成功地改變中國社會其他階層的主觀立場。

這種對于當作挽救民族危亡條件的國家團結的關心，雖然始終或多或少地表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絕不意味著他只不過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甚至在30年代末期，當他締結并執行與蔣介石的新聯盟的時候，他就說得一清二楚，中國共產黨無意放棄它的最高綱領。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會革命則是他的思想和行動的主要集中點，他也不是僅僅根據道德價值和心理改造來對待它的。雖然他相信客觀社會現實能由意識的變化加以改變，但他也認為參與革命的行動，是改變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誠然，深刻地認識主觀和客觀的相互作用，深思熟慮地運用這一辯證法，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特點，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訣之一。

把革命斗爭作為推動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澤東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提出了，他寫道：“家族主義、迷信觀念與片面的貞操觀念之破壞，乃是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勝利后自然而然的結果。……菩薩要農民自己丟……”[[100]](#_100___Mao_Ze_Dong_Ji____Di_1Jua)

以后整整20年，農村一直既是毛澤東的社會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實驗場。在這個領域里，他活動的中心當然是土地改革。這里不擬討論這個話題。因為土地政策已在第5章充分地討論過，有一個事件最能生動地說明毛澤東相信通過革命斗爭改變立場的方法，這就是1933—1934年的“查田運動”。查田運動可能不是毛澤東發起的，但是他在1933年使這個運動具有他的特征。這個運動的表面經濟目標，是確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當地實行，而事實上卻不過是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個框架。考慮到地主和富農的傳統聲望，以及他們有文化，善于講話這一事實，毛澤東深信，不管正式的財產結構有什么變化，這些過去的特權分子仍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慢慢地在農會里取得權力地位，阻止這樣隱蔽地回復到舊秩序的唯一辦法，就是在基層不斷地鼓動農民，鼓勵貧農進行反對過去剝削者的斗爭，以便建立他們的自信心，并讓今后他們是社會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來。

在伴隨內戰及40年代末取得政權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間，也追求完全同樣的目的。在群眾大會上，農民被鼓勵針對地主過去的壓迫“訴苦”，有時候隨之還要對罪大惡極者處以極刑，目的不僅在于壓倒士紳的威風，而且首先在于讓農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終像人一樣地站起來。這樣，毛澤東就在改變對權威態度的意義上著手進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爭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但是這一工作方法從20年代到40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線中很突出的時候，他采取這些措施的政治環境在這些年大大地改變了。

在江西蘇維埃共和國時期，戰術情況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軍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為了獲得人民群眾的最大的支持，毛澤東和朱德在早年曾實行“誘敵深入”到根據地中心的原則，那里進行過土地改革，因而對紅軍的同情也是最熱烈的，可是這樣的戰術意味著共產黨隊伍忠實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戰爭的危險和損失，同時這也破壞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的可靠性，因為它不能保衛自己的人民。從某種意義上說，“進攻戰略”為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這個回答在于把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聲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軍事可能性的現實估價之前。它的結局是個災難，但是這并不必然意味著毛澤東的早期戰術在1934年原本會起作用。總之，只是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國推進，和隨之而來的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受到威脅，才有效地使共產黨人能擺脫他們所處的困境。此外，毛澤東有好幾年幾乎沒有什么理論上的興趣講話，只是在1935—1937年形成的新的環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氣開始發言。無疑，他在黨內再次擁有強有力的地位，而在1933—1934年間他被貶低，成了只不過是掛名的首腦，這與他的新的雄辯有關。但是，毫無疑問，這一現象也是由于關于民族解放戰爭他確有許多話要說。甚至在30年代初，毛澤東的關于革命內外敵人之間的關系的言論，就使人聯想到將發生什么事情。

導致共產黨和國民黨以及夙敵毛澤東和蔣介石再次結成聯盟的有計劃的行動，與兩黨的本質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是怎么從理論上為第二次統一戰線辯解的呢？

1931年秋，當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最初把抵抗外國侵略問題提到顯著地位時，中國共產黨關于與資產階級合作的立場基本上和共產國際相似，概括在“階級對階級”的口號之中。然而，雖然它在原則上被理解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爭奪領導權，但毛澤東的關于具體斗爭的社會學看法，仍然與1926年他所持有的一樣。由毛澤東和其他人共同簽署的1931年9月25日給“白軍士兵兄弟”的信，在號召他們殺掉反動上級軍官，與工人、農民和勞苦大眾聯合起來，推翻“該死的國民黨政府”以后，接著說：

把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過來，分配給貧苦的農民；把有錢人的糧食、住房拿來充公，分給窮人住、窮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時的勞動；并且你們大家組織起來自己管理自己的事，這樣，你們就創造出了工農兵政府，即蘇維埃政府。[[101]](#_101___Mao_Ze_Dong_Ji____Di_3Jua)

很清楚，對毛澤東來說，農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地區。在這一封信中，“國民黨軍閥”被看作“帝國主義走狗”和地主階級奴才，正如毛澤東在20年代文章中所寫的，但是，國民黨對內“剝削與屠殺民眾”的反動作用仍然被給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澤東的攻擊集中在抗日問題上來說，毛澤東的立場是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論的影像。既然“只有紅軍”才能“打倒帝國主義，才能真正保國衛民”，因此必須首先對付國內敵人，才可能對外國入侵者采取有效的行動。

1932年4月，繼日本在同年1月進攻上海之后，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日本宣戰，從而使外事問題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戰略的中心。毛澤東與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觀點的改變，是以1933年1月17日的宣言為標志，它提出在某些條件下（停止對蘇區進攻，給予民主權利，武裝抗日群眾）與“任何武裝部隊”，也就是說，與任何準備與共產黨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見的指揮官締結協議。[[102]](#_102___Su_Wei_Ai_Zhong_Guo____Di)雖然這一立場仍然停留在共產國際路線里制定的“從下締結的統一戰線”的框架之內，就是說，與其他政治運動的支持者聯合，而不是與他們的領袖人物聯合，不過愿意與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打交道（雖然不是與蔣介石本人），卻標志了走向“從上締結的統一戰線”的重要的一步，這樣的統一戰線在1937年建立起來。

在與朱德1934年7月15日共同簽署的紅軍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澤東再次號召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并與那些愿意開展這樣戰爭的人聯合，同時打倒“賣國賊漢奸集團的國民黨”。[[103]](#_103___Mao_Ze_Dong_Ji____Di_4Jua_1)然而，盡管毛澤東把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對徑直走向第二次的統一戰線卻很明顯地比蘇聯領導者更加保留一些。1935 年8月1日要求建立這樣的統一戰線的宣言，事實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環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他們對再次與蔣介石擁抱遠比斯大林更覺得不快，他們認為蔣介石是屠殺他們朋友的劊子手，并且認定他是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當毛澤東的隊伍于12月在瓦窯堡再次集結時，他已準備不僅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而且與資產階級中同歐、美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而傾向于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們的支持，“工農共和國”將會變成一個“國防政府”。但是蔣介石，作為“漢奸賣國賊營壘”的“首領”和土豪劣紳、軍閥和買辦的代表，則特別被排除在所提出的統一戰線之外。[[104]](#_104___Lun_Fan_Dui_Ri_Ben_Di_Guo)

然而，到了1936年4月，張學良會見周恩來，力勸共產黨人停止與蔣介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應運用他同蔣介石的關系，勸蔣介石接受這樣的休戰。因此，1936年5月5日，中國共產黨直接打電報給南京軍事委員會，這封通電隨后被毛澤東描述為標志著“放棄‘反蔣’口號”。[[105]](#_105___Mao_Ze_Dong_Xuan_Ji____Di_1)此后，毛澤東經常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其他軍政領導人接觸，討論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06]](#_106_Jian_1936Nian_Xia_Ban_Nian)并且在1936年10月5日特地致函張學良，表示愿“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達成抗日救國的協議”。1936年12 月1日，毛澤東與其他18名共產黨高級軍政領導人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張，這樣子孫后代將不是把他當作對中國的毀滅應負責任的人，而是當作“救國救民之豪杰”來記憶。[[107]](#_107___Mao_Ze_Dong_Shu_Xin_Xuan)

所有這些建立在政治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姿態，并不意味著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惡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當蔣介石在12月12日被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時，共產黨的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有一種本能的反應，認為以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審判是十分適宜的，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說明這樣的政策也被毛澤東和其他高層成員認真地考慮過。相反，毛澤東在1936年12月22日寫信給閻錫山，讓他放心，說“絲毫不求報復南京”。[[108]](#_108_Tong_Shang_Shu__Di_95__97Ye)曾有一再的報道，毛澤東在收到莫斯科專橫地命令他不要殺害蔣介石的電報后很生氣，他的生氣可見并不是由于被剝奪了獵獲物時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于斯大林懷疑他的忠誠，或懷疑他的常識而引起的。[[109]](#_109_Guan_Yu_Zhe_Yi_Lian_Chuan_S)

無論如何，一旦開始執行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就表現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顯，原因是對于他們來說，拯救中華民族并非僅僅像對于列寧來說那樣，是策略計謀的基礎；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觀。

當然，按照中國革命新近已達到的階段，以及當時可以相應推行的工作，毛澤東不管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追隨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這樣重大的改變，而不證明這樣做是正當的。在剛剛提到的1935年12月27日的講話中，毛澤東開始粗略地敘述他有關這個主題的想法；他只是在1939—1940年才對它們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給以明確的表述。但是，在繼續探討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它在延安時期，在成熟和復雜性上，顯著地達到了更高的水平——以前，有必要談一談在他的整個思想中越來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學思想在1937年的出現。

## 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1937—1940年

盡管毛澤東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著作中就偶爾觸及哲學問題，他第一次認真地研究馬克思哲學卻是在1936—1937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諾曾記錄下毛澤東為了貪婪地讀那一摞剛剛到達共產黨首都保安的蘇聯哲學著作的中譯本，而中斷與他的會見；這些會見的談話將成為他的自傳的基礎。讀了這些書籍以后，毛澤東幾乎立即做了一系列關于辯證唯物論的講演，現在以《實踐論》和《矛盾論》而聞名的著作，原來就是這些講演的結束部分。[[110]](#_110___Bian_Zheng_Fa_Wei_Wu_Lun)

當然，在中國，1949年以來，只有《實踐論》和《矛盾論》正式出版，分別出版于1950年和1952年。可是，毛澤東確實在1937年講過一門有關辯證唯物論的課，當時的證據是確定的，無可辯駁的。[[111]](#_111_Zhi_Yao_Ti_San_Dian_Jiu_Gou)因此，有一定重要性的是，當斯諾在1965年向毛澤東問到這一事情時，毛澤東否認《論辯證唯物論》是他所作。[[112]](#_112_Fang_Wen_Tan_Hua_Yuan_Zai)誠然，他通常寧愿人們只讀經他自己審定、認可的版本，不過為了免去找麻煩，他經常不去直截了當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認為是合適的東西。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難找。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哲學家的聲望，從列寧活動的時期開始，在共產主義運動內就被看作領袖人物的一個必需的條件。沒有疑問，為了確立他在這一方面的憑證（正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試圖做的那樣），他本來做過這些講演。他在黨內的對手都在莫斯科受過教育——他在以后的五六年中要與他們進行連續的較量——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責，說他不過是個農民游擊隊的領袖，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沒有處理抽象范疇問題的能力。可是很快變得很明顯，毛澤東所作辯證唯物論的講演沒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講演的很大一部分（特別是前面幾節）等于抄襲蘇聯資料，而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表達的地方則常顯得很粗糙。[[113]](#_113_Guan_Yu_Mao_Ze_Dong_De_Chao)

毛澤東是人，也會犯錯誤；“毛澤東思想”不是他一個人的創造，在這樣的觀點（明顯地表述是在1981年，但自1978年或1979年就已開始含蓄地表達了）的條件下，不論是毛澤東在1937年確實做過有關辯證唯物論的講演，還是他有虧欠于其他作者，特別是艾思奇，現在都已正式在中國記錄在卷了。[[114]](#_114_Jian___Zhong_Guo_Zhe_Xue)

我在這里將不從總體上去分析毛澤東的講演，不過這一情節確實有助于估價實際上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個主要部分，而那兩篇文章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背景。首先要說的是，相當于《實踐論》和《矛盾論》那一部分講演，比那一著作的前一部分，顯然更有獨到之處，也更引人興趣。此外，盡管毛澤東在1936—1937年所看到的文章和蘇聯著作的譯文常常相當詳細地論述認識論，并且常常（像《實踐論》那樣）是在馬克思哲學通論中相對接近結束之處出現，而毛澤東給予矛盾的這個主題以顯著的地位，這在他可能得到的任何原始資料中都無類似情況。它們中的大多數都有一部分論及對立的統一與斗爭，否定之否定和有關題目，但是一般都很短，并且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像毛澤東的講演那樣放在最后，從而使得它成為整個課程的頂點和綜合。

毛澤東給予矛盾這樣突出的地位，無疑可以有多種原因。其中兩個很自然地來自本章已概略敘述過的對他的思想的解釋。一方面，他對辯證法的理解，有強烈的道家及中國傳統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記。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強調的，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社會（換句話說，社會內諸矛盾）的復雜性和不明確性，并試圖把這些見識結合進他的革命策略。這些特點的第一條，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他在理解辯證法方面的瑕疵；第二條則很可能被認作優點。接下去的對毛澤東的《矛盾論》的簡略討論，將首先論述的這兩點中的一點，然后再論述另一點。

大連版的《辯證唯物論》共計110頁，而他講演提綱的第三章（《唯物辯證法》）竟占53頁，從這一事實可以得到毛澤東重視矛盾的一點啟發。相當緊密地與《矛盾論》相符合的這一章的這個部分（從第64頁開始），大約有2.5萬字，而《毛澤東選集》內的文本約為2.2萬字。盡管兩種版本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其相符之處卻足夠接近，可以徹底地解決由阿瑟·科恩和別人提出的這種說法：毛澤東不可能在1937年寫出這樣充實的著作。[[115]](#_115_Dang_Ran__Zhe_Ge_Wen_Ben_De)可是還有一個問題，為什么講演的這一部分比以前各節好得多。從本質上說，我以為答案在于毛澤東所處理的不僅是對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還要把它們具體運用到中國革命的現實中去。另一方面，《辯證唯物論》的第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不過是蘇聯作者所理解的希臘和西方哲學史的概要。在這里毛澤東只能照抄資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東西。

至于《矛盾論》的內容，毛澤東的辯證法的非正統性質問題，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變得尖銳起來，部分是由于同蘇聯人論戰的結果，這樣它已超出我們這里的討論范圍。簡言之，一般認為蘇聯雜志（這些雜志在1950年贊揚過《實踐論》）在兩年之后沒有理會《矛盾論》，因為這些雜志反對這篇文章暗含的對斯大林的至高無上理論權威的挑戰。不容任何懷疑，這確實是個因素，但是，蘇聯人也完全可能覺得毛澤東對辯證法的理解是奇怪的、異端的。

在50年代，毛澤東多次抱怨《簡明哲學詞典》專門批評了他的有關矛盾的觀點，有一次他解釋說，他談的是這一著作的第四版（1953年在莫斯科出版），他說它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蘇聯的批評意見，是生轉化為死是“形而上學的”，戰爭轉化為和平是錯誤的。[[116]](#_116___Zai_Sheng_Shi_Zi_Zhi_Qu_D)關于毛澤東老年時的辯證法的超傳統的特點，有一點可以談一談，這時（在1964年）他拋棄了馬克思和黑格爾的辯證法的三條基本規律中的兩條，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117]](#_117_Wo_Yi_Zai_Wo_De_Lun_Wen___M)毛澤東在1937年的觀點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總的來看也更為正統，不過可以爭辯說，他已傾向于他25年后所遵循的方向。最明顯的線索可能應在“對立統一的法則”是“思維的根本法則”[[118]](#_118___Mao_Dun_Lun_______Mao_Ze)這一斷言中去找；這句話似乎把這一規律置于比其他兩條原則（否定的否定和量變到質變的轉化）更高的范疇，后來這兩條原則卻為他所拒絕。[[119]](#_119_Wang_Ruo_Shui_Yu_1982Nian_5)

毛澤東的講演提綱的最早版本，間接提到列寧把對立的統一看成是“辯證法的核心”，[[120]](#_120___Mao_Ze_Dong_Ji____Di_6Jua)在1957年毛澤東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關的片斷，“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確定為關于對立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展”。[[121]](#_121___Zai_Sheng_Shi_Zi_Zhi_Qu_D)列寧的這段話出現在關于黑格爾的《邏輯學》的閱讀札記里，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爾的思想的那段話，既講了否定的否定，也講了量變到質變的轉化。[[122]](#_122___Hei_Ge_Er__Luo_Ji_Xue___Y)

進一步探尋這一問題，不僅需要詳細地討論1949年后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還會把我們帶向考慮嚴格的哲學問題，而遠離本章主要對政治的關心。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和他從而得出的理論上的結論才是我們關注的中心，它能幫助我們從哲學到毛澤東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順利過渡。有人再三爭辯說，以下主張甚至為科恩所接受，毛澤東對于辯證法這一科學的最為突出的貢獻，在于他詳盡地闡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兩個概念。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澤東運用這些范疇可以直接與他對中國現實的細致的理解聯系起來。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家，在馬克思本人觀察過的，被理解為不斷向兩極分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那種類型的社會里，就哪些是階級間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間的基本矛盾來說，本不應該產生疑問。廣而言之，直到這一沖突為革命所解決時為止，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變。另一方面，中國不論是內部形勢，還是與外國列強的關系都不穩定，或者說難以逆料；要決定在一定的時期內，哪個因素，或哪個矛盾是關鍵性的，或支配性的，這不僅僅是個讓人感興趣的理性問題，而且是緊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國翻譯，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蘇聯著作，它有一節專門談矛盾的“主導”方面，可是，它說這一般總是同樣的，例如，在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中，基礎總是主要的。[[123]](#_123_Xi_Luo_Ke_Fu_Deng_Zhu__Li_D)這是科恩認為毛澤東的論文中最有意義之點之一；他讓人注意這一段話：

有人覺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導；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導。如此等等，他們并不互相轉化。……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表現主導的決定的作用……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有時亦表現其主導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應該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之時，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導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時，對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為主導的決定東西了……[[124]](#_124___Bian_Zheng_Wei_Wu_Lun)

科恩把這段話作為他論證毛澤東在1937年沒有寫《矛盾論》的一個主要環節；他說，直到斯大林以他的1938年和1950年的文章給毛澤東引路之前，毛澤東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事實表明正好相反。看來毛澤東的“唯意志論”是直接來自對列寧的研究（畢竟這一術語首先用于列寧），同時也來自他本人的個性，和中國革命的經驗。誠然，可以爭辯說《矛盾論》最初的版本甚至更強調主觀因素。

這里最重要的異文是“有時”被“在一定條件之下”所替換。寫進《毛澤東選集》中的這后一片語的含意，有可能看來是這樣的情況，或必須的先決條件的總體，只可能在有限的時期內，在危機或革命的時候才會出現。而另一方面，較廣泛的“有時”，可能被理解為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這種作用逆轉，可能會延續很長一個時期。這推論由緊隨該段引文后的一句話得到加強（無論是原版本，還是改寫本），“當著如同列寧所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之時，革命理論的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125]](#_125___Mao_Ze_Dong_Ji_Bu_Juan)既然列寧認為這個原理在計劃、組織和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整個歷史時期都適用，那么毛澤東在這里引用它，完全可以解釋成意思是，上層建筑在歷史變革中不起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但它起作用的那些“時”之一，事實上將會在20世紀的很大一部分時期在中國出現。

有關毛澤東作為一個哲學家的最后一點，與他受惠于斯大林有關。《矛盾論》的通行本，有一段很長的過分贊揚斯大林分析俄國革命的特殊性的話，說它是“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范”。[[126]](#_126___Mao_Dun_Lun_______Mao_Ze)這段話是最早的版本所完全沒有的，在最早的版本中，毛澤東以對蘇東坡的詩的評注來說明他的觀點，據認為蘇東坡是徹底懂得普遍性與相對性之間關系的人。[[127]](#_127___Bian_Zheng_Wei_Wu_Lun)

《辯證唯物論》的第二章有這樣的話，因為“中國今日發展著的辯證唯物論哲學思潮，不是從繼承和改造自己哲學的遺產而來的。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而來的”，我們必須“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這種哲學遺產反映了“中國社會進化的落后”。[[128]](#_128___Mao_Ze_Dong_Ji____Di_6Jua)很明顯，這樣的語言是毛澤東初次受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影響而暫時產生的驚駭的產物。它完全為他1938年10月號召“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所取代，它并不體現他一貫的，甚至在1937年的立場。

如果我們現在具體地看一看毛澤東在30年代末期對戰略和策略問題的分析，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與在莫斯科的“世界無產階級總參謀部”之間的關系。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觀點是十分清楚的。他在1936年對它做了概括。在回答斯諾的問題，如果共產黨取得了勝利，是否在蘇維埃中國和蘇維埃俄國之間會有“某種形式的兩國政府之實際合并”時，他聲稱：“我們為一個解放的中國而戰斗，當然不是要把這個國家移交給莫斯科！”他接著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反駁的根據：

中國共產黨只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爭取勝利中，黨應為全民族說話。黨不能為俄國人或第三國際的統治說話，只能為中國民眾說話。只是中國民眾的利益與俄國民眾的利益一致，能說是服從莫斯科的意志嗎？但是，當然，一旦中國民眾和他們在俄國的兄弟一樣，有了民主權力和獲得社會上政治上的解放，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將會大大地擴大起來。[[129]](#_129_Yuan_Zai_Yu_1936Nian_2Yue_3)

這段話表明，毛澤東在1936年感覺到了全世界共產黨聯合起來的團結的束縛。但是它也表明，對于毛澤東來說，團結并不意味著從屬。如果其他情況都一樣，一個“解放了的中國”——就是說，由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與蘇聯將比與其他國家有更密切的聯系。但是，如果情況不一樣——如果莫斯科不尊重毛澤東認為是正常的、適當的中國的利益——中國的政策在他的指導下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向。

在30年代，中國共產黨內有一些人，他們并不采取同樣的獨立態度，正如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一些人在與莫斯科打交道時，準備比毛澤東更靈活一些。從1935年到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與所謂“國際主義的”（就是親蘇的）派別之間的斗爭的歷史，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歷程，本書已另有記述。在這里我們不擬談論莫斯科與中國共產黨，或其不同派別之間的權力關系，而是要談毛澤東堅持獨立于蘇聯監護之外的理論的性質與意義。在毛澤東于30年代末期提出的概念當中，在他相信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和中國人必須以自己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方面，最大膽、最不含糊的標記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這一口號事實上只被中國共產黨人使用了相對短的一段時期，開始于1938年毛澤東第一次自己提出這一說法，而達到它的頂點，則在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歡呼毛澤東在創建理論方面的偉大成就，說這些理論“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但是，如果這一說法本身是比較短暫的，那么它所表達的關注的事情卻在1938年以前就出現了，并且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它不僅依然存在，并且變得更為重要。

毛澤東提出這一想法的原因不難理解。中國化的概念，象征面對共產國際傲慢、專橫的態度，對中國民族尊嚴的肯定；因此，這個概念的價值不僅在于是黨內斗爭的武器，而且也是一個民族危機時期對非共產黨人的輿論具有吸引力的口號。但是它也反映了毛澤東真正深信：歸根結底，來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國的環境里不適用，除非讓這種思想適應中國民眾的心理和條件。

對于毛澤東來說，中國化在1938年的確切含意是什么，是一個更為復雜的問題。要求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如劉少奇在1945年所說），[[130]](#_130___Liu_Shao_Qi_Xuan_Ji_____R)不僅在中國，也在其他非歐洲國家，都含有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適應許多不同水平的國家的現實——從大量前資本主義農業社會的語言和文化，到經濟和社會的結構——的意思。此外，關于哪樣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什么要素要在中國具體化的問題也會出現。

使這個問題的不同方面混合在一起的，是毛澤東1938年10月關于中國化的不朽陳述，其中一部分是這樣說的：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運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的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131]](#_131___Mao_Ze_Dong_Ji____Di_6Jua)

毛澤東的中國化的概念，最簡單、最易為大家所接受的方面，就是這段引文中最后的那句話。很顯然，要想使馬克思主義在非歐洲國家起作用，所用的語言就必須不僅是那個國家的人民可理解的，而且，按照他們的心理和條件來看，也是生動、有意義的；而不是從另一種語言和文化逐字翻譯過來的莫名其妙的語句。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形式在中國這樣的具體化，盡管在毛澤東看來是不可少的，也只是在于使馬克思主義的實質適應中國條件的更基本的事業的外在表現。

為了確切說明這里談到的問題，讓我們首先看一看毛澤東說的“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有的只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這句話的意思。按照他在延安時期寫的其他文章，以及他以后多年的言行，這一斷言隱含的意思可以大致清楚地說明如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最早是由馬克思闡述的。馬克思的著作的某些方面——例如，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分析，和辯證法的基本規律——都是普遍正確的，但是這個理論從總體上來說，反映的既是它的19世紀的理論來源，也是馬克思的具有歐洲特性的心理和經驗。因此，當我們談到（像斯大林和列寧以后的其他任何人一樣）運用普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于中國的條件時，我們力圖抓住并使之適合于我們的需要的，正是這些理論的永恒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那永恒的核心呢？毛澤東本人在剛引用的1938年10月的那篇報告中說：“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132]](#_132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1942年2月他號召他的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于中國，并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133]](#_133___Mao_Ze_Dong_Ji____Di_8Jua)

這些系統性的闡述引出了兩個問題。毛澤東所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指的是什么？什么是這樣的態度或原則（這是由馬克思主義導出的）與“方法”（他說，這種“方法”能夠從吸收中國過去的珍貴遺產得到）之間的關系？

關于第一點，當前中國的解釋是，毛澤東說的是采取無產階級的立場，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法的方法。但是，如果毛澤東真的是說像這些那樣廣泛界定的馬克思主義的諸方面，是不是能夠這樣說。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馬克思本人的理論實際上構成的是“德國的馬克思主義”，正如列寧的思想在20世紀初期被批評他的人說成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換句話說，毛澤東所說的“抽象的馬克思主義”指的是“絕對的馬克思主義”，或在一切國家一切時代都絕對正確的馬克思原理。而當毛澤東說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過的”，他的意思是，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也不具有高級水平的一般理論的地位，只不過是他所想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具體體現，完全不比斯大林或毛澤東本人對這同樣的原則的運用高超一些。

可是對于毛澤東來說，這并非僅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的問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還建議用從中國的經驗里抽出來的要素來豐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建議以之豐富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特殊性”，也并非僅是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共有的經濟特點。這些特殊性也是如毛澤東在1938年所說，“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所表現出來的，和已由歷史經驗和中國人的特質所形成的“許多珍品”。[[134]](#_134___Mao_Ze_Dong_Ji____Di_6Jua)

這種觀點，認為今日的中國帶有過去的印記，并不值得注意。馬克思主義者，至少持有列寧主義信仰的人，很早就同意，社會習俗和政治組織的形式，雖然它們隨著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和作為這些變化所引起的階級斗爭的結果，它們本身也是歷史方程式中的一個變量。但是，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即從毛澤東的觀點看，文化現實是否基本上是由技術水平和“生產方式”所決定，或者他所強調的“民族特點”是否為他構成一個獨立的，或半獨立的變量。

依我來看，沒有什么懷疑，對于毛澤東來說，不論是狹義的還是廣義的文化，都構成了人類經驗的部分自主的一面。人們可能稱贊他的這種態度，或者對它感到惋惜，也還有既稱贊又惋惜的人，并且時常還表現得很激烈。可是，我們不能忽視他思想的這一方面，而不歪曲我們對這個人和他的思想的認識。

確切地說，這個主題在毛澤東的中國革命的整個想象中處于多么重要的地位，已由前面引自1938年10月的報告中的非同尋常的陳述指出來了，即繼承中國的遺產“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前面要求對過去的經驗“給以批判地總結”的訓令，并不含有同樣的含意，因為其中積極的指導作用似乎取決于馬克思和列寧的“觀點和方法”，要在中國歷史的文獻中用它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但是，認為對過去有較深刻的理解，將不僅拓寬革命者對他們自己的社會的理解，還會真正為領導革命提供手段，這樣的認識卻是另一回事，它在直到1938年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中開辟出一個沒有先例的前景。

毛澤東說的能從“歷史的中國”的經驗中提取的這種方法的實質是什么呢？在產生它的過程中，又得從過去的什么成分中去提取呢？他沒有明確地詳細說明，但是在他的延安時期的著作中有些線索，他所想的是能夠泛泛地限定為治國術的那一領域，[[135]](#_135_Guan_Yu_Zhe_Ge_Chuan_Tong)因此，在他1938年10月第一次提出中國化的思想報告的另一部分中，毛澤東涉及了正確使用干部的問題——他說這在過去稱為“用人行政”。他進而討論了現在與過去之間的連續性，說了下面的話：

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的歷史中歷來有兩個表現邪正兩派互相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一個是“任人唯親”。前者是明君賢臣用人的方針，后者是昏君奸臣用人的方針。我們今天來說使用干部問題，是站在革命立場上的，根本與古代有區別，但也離不開“任人唯賢”這個標準。以喜怒為愛憎，阿諛逢迎者獎，骨鯁正直者罰，在古時要不得，在我們也要不得。[[136]](#_136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

在這里毛澤東清楚地指出，由他看來盡管有些政治行為的標準是在前資本主義的、官僚政治的社會環境內逐漸形成的，它們對于當前的共產黨革命者來說，仍然是正確的。

更加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在孔子的哲學里也找到了積極的因素。1939年毛澤東在評論陳伯達有關這一主題的文章時表示，他基本上同意陳伯達的看法，但是在批評孔子的正名學說是“唯心論的”時候，陳伯達未能指明，由認識論的觀點看，它含有真理的重要成分，因為它強調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聯系。他也認為朱熹解釋孔子的中庸之道，與共產黨人的進行反對“左”、右傾的兩條戰線的斗爭的原則是并行不悖的。他說“不及”是右的東西，“過”是“左”的東西。[[137]](#_137___Zhi_Zhang_Wen_Tian_____19)

當然，這一類的求助于民族的過去，只是當毛澤東為了推動建立新的統一戰線，對盡可能廣大的輿論范圍講話時，才特別合適。可是，它們也應認真地被理解為他的思想實質的一種表現。在轉向專門分析毛澤東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思想之前，讓我們進一步探討一下他對中華民族的歷史的解釋，特別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因為正是這個環境確定了毛澤東所認識的中國革命當時的舞臺，也從而確定了這一時期合適的策略。

一般來說起自延安時期的毛澤東關于中國歷史的觀點，最系統的陳述，可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中找到（嚴格地說，全文并非毛澤東本人起草，他只寫了第二章，但是他愿意把它收入《毛澤東選集》，因此他對內容負責）。這一廣泛論述的細節大部分超越本章的范圍，但是有幾點還是應該予以注意。

首先，毛澤東在這里把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的過渡放在西周初，也就是大致在公元前11世紀。有關段落如下：

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

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如果說周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么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138]](#_138___Zhong_Guo_Ge_Ming_He_Zhon)

于是秦朝被看成僅僅是由于政權形式的改變，而不是由于從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而有其特色。[[139]](#_139_Sui_Ran_Zai_Zhe_Yi_Dian_Sha)

“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這個概念，可能在西方讀者看來，是個詞語矛盾的說法；可是它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為了同時說明中國社會“封建”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性質及其獨特性，在20年代和30年代對中國社會性質辯論之后取得的結論。同時，在這篇文章的1939年最早的版本中仍留有中國是個“亞細亞”社會的概念的痕跡，而這在原則上已經被拋棄了。于是，毛澤東斷言中國社會在鴉片戰爭以前若干世紀以來一直是完全停滯的，只是由于西方的沖擊才被推動起來。[[140]](#_140_1952Nian__Mao_Ze_Dong_Da_Ga)

毛澤東概括中國歷史，其中有兩點值得特別強調。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在1919年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文章中，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 20年以后，他對他的同胞的異常才能的同樣的信賴，在像下面這樣的段落中可以看到：

在中華民族的數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與革命領袖，產生了很多的革命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與思想家。所以，中華民族又是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歷史遺產的民族。[[141]](#_141___Zhong_Guo_Ge_Ming_He_Zhon)

其次，像他從1926年就做過的那樣，他繼續特別重視農民的作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幾百次的農民暴動”不僅被描繪成是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決定性因素，并且這些“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被說成唯一的“中國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可是，他同時也強調了在“封建”社會里，就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的能量，或就改變生產方式的能量而言，僅由農民采取的這樣的行動的局限性。關于這個問題他寫道：

每次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產關系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方式，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戰爭與農民暴動得不到先進階級與先進政黨的領導，如同現在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能夠正確領導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與革命后被地主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次農民斗爭停息之后，雖然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去。[[142]](#_142___Zhong_Guo_Ge_Ming_He_Zhon)

從毛澤東的觀點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夠對中國革命實行“正確領導”的形勢，在什么時候和如何出現呢？如他所見，這一過程的發生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在19世紀以前存在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已部分地解體，舊統治階級的地位，受到西方和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和初生的資產階級的發展的沖擊而遭到破壞。在這個階段，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地主階級仍然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統治階段，但是資產階級分子是對現存秩序革命挑戰的當然領導人。然后，在第二階段，無產階級要求取得革命的領導權的條件變得成熟。

按照毛澤東的解釋，這一過渡大致出現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分別把資產階級領導時期和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稱為“民主主義”或“ 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討論他對中國現代史的分期之前，讓我們先考慮一下，他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究竟何所指，因為這一概念不僅在它所特指的時期很重要，并且與中國以后的問題有持續不斷的關系。

既然“新民主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的一個范疇，我們有必要簡要地回顧一下這一學說的背景。馬克思曾經考慮，在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很自然的應以資產階級的統治為特征，就像封建階段以貴族統治為標記一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是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決定性的階段，同樣應是資產階級的任務。至于無產階級，它會在民主主義革命中支持資產階級，同時還要推動它前進，盡可能地滿足工人們的切身要求；到時機成熟時，再以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結束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前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尤其是那些受過西方殖民主義沖擊的社會革命的著作，是很有吸引力和啟發性的，可是它們同時也是支離破碎的和自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說，不可能（不管如何努力）從他們的著作中抽出對亞洲革命者有指導作用的清楚的策略路線。在1905年革命時，首先是托洛茨基，以后是列寧提出，在這樣落后的國家里，可以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也就是說，在共產黨控制的政治環境中，進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思想隨后又經斯大林、毛澤東和其他許多人發揮，正如他們的追隨者和蘇聯人所解釋的那樣，遂成為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原理。

于是，一定歷史階段的階級性實際上就脫離了這一階段的登臺者的階級性。無產階級專政，或是它的前驅或變體，被接受已有3/4世紀，它能夠指揮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這場革命將構成西方社會發展中的資本主義階段的功能上的等同物。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關于這一階段的想法的性質和意義。他把這一階段定名為“新民主主義階段”。有趣之處不僅在于他怎么界定它的內容，而且在于他認定這一階段已經開始的時間。因為正是在這一情況下，根據力量對比的發展和當時革命的目的，毛澤東開始認定與國民黨結成新的聯盟是合宜的。

在一些文章的段落中，毛澤東把“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過渡的時期明確地定在1919年，并且為了方便起見，自延安時代開始，就把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當代”史的分界線定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可是毛澤東自然知道，決定性的變化不是一朝發生的，所以他大都把“新民主主義”的出現，粗略地置于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期（亦即通常廣泛界定的“五四時期”）。毛澤東于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寫道：“……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自從一九一四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以來，起了一個變化。”[[143]](#_143___Xin_Min_Zhu_Zhu_Yi_Lun)

這里提出，或者暗示的中國革命性質轉變的各種理由，包括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減弱和喪失信譽，新的蘇維埃共和國所體現的另一模式出現，以及蘇聯人提供物質和道義援助的可能性。正是部分地由于這后一條理由，毛澤東隨著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又是隨著列寧）宣稱，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組成部分。關于這一主題，毛澤東寫道：

在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已在地球的一角（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實行崩潰，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經充分顯露其腐朽性的時代，在這些尚存的資本主義部分非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過活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屬于新的范疇了……

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還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參加領導或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144]](#_144___Mao_Ze_Dong_Ji____Di_7Jua)

這一段話說到了“聯合專政”，并且有著重點的字（毛澤東在1952年把它們抹去了）含有無產階級在各個專政的階級中甚至不享有首位的意思。的確，在《新民主主義論》的原來的版本中，毛澤東甚至明白無誤地表明，如果中國的資產階級能證明它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行民主政治”，他們（即國民黨）會繼續獲得人民的信任。[[145]](#_145___Mao_Ze_Dong_Ji____Di_7Jua)可是，很明顯，這不過是在修辭上做出的給蔣介石看的姿態，毛澤東完全打算讓他自己的黨在“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中代表無產階級實行領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直接面向黨員，而不是面向非黨的知識分子聽眾的教材（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在這一課本中，毛澤東直率地說：“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參加和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146]](#_146___Zhong_Guo_Ge_Ming_He_Zhon)而在1949年6月，在勝利的前夕，他把這同一觀點表達得還更為絕對，“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147]](#_147___Lun_Ren_Min_Min_Zhu_Zhuan)

簡而言之，盡管毛澤東表達的坦率程度時有不同，自1939年他第一次使用“新民主主義”這一名詞開始，他的觀點就是在1919年或其前后的一段時間以后，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就恰當地屬于無產階級了。毛澤東怎么可能要求在20世紀第二個十年剛剛開始發展的一個階級和直到與國民黨在1923—1927年間結盟以前只有少數成員的一個政黨，去承擔如此重任呢？除去已經指出過共產黨人享有來自蘇聯的外部支持和同情以外，毛澤東還分辯說：

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作為兩個特殊的社會階級來看，它們是新產生的，它們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階級……它們是兩個互相關聯又互相對立的階級，它們是中國舊社會（封建社會）產出的雙生子。但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148]](#_148___Zhong_Guo_Ge_Ming_He_Zhon)

這是一段很有獨創性的論證，并非沒有內容。然而，毛澤東所斷言的自1917—1921年以后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切不可解釋為關于對立的政治勢力力量大小的實際情況的敘述，而應解釋為斷言從此以后，共產黨人爭取領導民族革命是適當的，并非全然不切實際。

如果毛澤東確實對此深信不疑，盡管他并不經常公開地講，那么他談論“統一戰線”，是否完全毫無意義或虛偽呢？或者，換一種講法，這樣的聯盟難道不會必然具有“從下面建立起統一戰線”的特點，也就是企圖動員國民黨的普通黨員反對他們的領導的特點？并非必然，特別是如果我們像我在上面做過那樣，在這樣的意義上去理解毛澤東的分期觀：在30年代末期，共產黨人尋求維護他們的領導權早就合情合理了。因為合情合理的東西并非在任何特定的時候都是得計的，或者說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如果來自日本的外來侵略，變得如此嚴重，甚至威脅中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從而使得中國內部的政治改革成為不可能，以致共產黨人的首要政策目標不是反蔣而是抗日；如果國民黨不僅在軍事上和政治上比共產黨強大，而且愿意抗日，那么暫時承認國民黨在這一斗爭中的支配地位就是合宜的。

上面已經談到，毛澤東到1935年12月已認為有建立新的統一戰線的必要，并且在1936年末同意蔣介石應為這一聯盟的名義上的領袖。在1938年10月，在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里，毛澤東甚至承認國民黨不僅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領導作用，而且在戰后的建國階段的領導作用。在題為《國民黨有光明前途》的一段話里，他表明：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后兩個偉大的領袖。……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

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于領導與基干的地位。……只要在堅持抗戰與堅持統一戰線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149]](#_149___Lun_Xin_Jie_Duan_______Ma)

雖然這個報告表達的是毛澤東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曾經采取的最溫和的路線，它卻絕不像乍看去那樣，是一張空頭支票。上述引語中的最后一句話所說的“只要”一詞，嚴格地限制了毛澤東向蔣介石讓步的范圍。毛澤東認定，從長遠來看，蔣介石和國民黨天生地就不可能堅定地支持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他期待著接受蔣介石的領導必將有終止的一天的到來。此外，雖然這一報告最早的1938年的版本沒有像《毛澤東選集》中重寫的摘錄那樣，說到共產黨的人領導；但是它確實說到“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算在民族戰爭中盡了自己最大責任”。他簡潔地把這些責任解釋為共產黨員“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與模范的作用”。[[150]](#_150___Zhong_Guo_Gong_Chan_Dang)很明顯，如果國民黨在領導中搖擺不定，它的領導地位將由那些已成為“先鋒和模范”的人所取代。

最后，毛澤東在他的1938年10月的報告中建議應該恢復“黨內合作集團”，共產黨人應該再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一建議有雙重意義，但也模糊不清。因為他雖然預先表示向蔣介石提交全部具有雙重黨籍的共產黨員的名單，從而滿足蔣介石在1926年5月“改組”之后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他還試圖說服蔣介石把國民黨改變為“民族聯盟”。這第二建議的目的是過于明顯地要削弱1926—1927年曾使共產黨無法從內部操縱國民黨的列寧式束縛。因此，蔣介石把它視為“特洛伊木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絕，就不足為奇了。[[151]](#_151_Guan_Yu_Zhe_Duan_Qing_Jie)

一年多以后，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毛澤東的立場有了發展，從承認國民黨必須在統一戰線內占有“首位”，變成聲稱共產黨的領導已是既成事實。在《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中，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產生修辭效果的詞匯遮蓋著的；而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中，它卻是十分明顯的。[[152]](#_152___Zhong_Guo_Ge_Ming_He_Zhon)《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雖然主要是為黨員讀者寫的，但它公開發售。在《〈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中，他甚至沒有提出誰應該領導的問題；他僅僅假定領導權屬于共產黨人，進而討論他們應該怎樣實行領導。

除去領導權的問題以外，還有兩個直接相關的觀點也值得在這里討論，毛澤東關于各個階級在革命中作用的觀點，和關于體現革命力量的政治運動或體制的性質觀點。

從實質上看，毛澤東關于在抗日戰爭時期支持革命的階級力量的觀點是簡明的、一貫的。他認為這些階級力量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提出的四個階級的集團組成，外加一部分“買辦資產階級”，后者依賴于某些利益與日本的利益相沖突的[[153]](#_153____Gong_Chan_Dang_Ren___Fa)列強。可以理解，這一圈人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是劃得最緊的；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則劃得最松。在前者中，農民被描繪成無產階級的最“堅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資產階級是“可靠的”同盟者。至于民族資產階級，它能夠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斗爭，因為它受到外國的壓迫；但是“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它也會有時“動搖變節”。資產階級或大資產階級，即使在它參加抗日統一戰線的時候，“仍然是很反動的”，它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并最終計劃投降敵人和分裂統一戰線。

《新民主主義論》的原始文本提出一種頗為異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三個階級的聯盟而不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兩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質的不同，但并不是沒有影響。這樣的提法是由于把農民（馬克思主義者一直認為農民在性質上是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歸在一類，合稱小資產階級，而不是把農民算作單獨的階級。例如，我們看到這樣的說法：在1927—1936年，由于“中國資產階級轉到了……反革命營壘，革命營壘中原有的三個階級，這時剩下了兩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革命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154]](#_154___Mao_Ze_Dong_Ji____Di_7Jua)

毛澤東繼續寫道，隨著抗日戰爭的到來，中國革命“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再次達到了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但是這一次他補充道：

范圍更大了，上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統治者，中層階級包括了一切小資產階級，下層階級包括了一切無產者，全國各階層都成了盟員，堅決反抗了日本帝國主義。[[155]](#_155___Mao_Ze_Dong_Ji____Di_7Jua)

十分明顯，把農民納入小資產階級這個能容納一切的范疇，能減輕強調中國革命的獨特性，尤其是它早先特征之一的農村里的游擊戰。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把中國經驗的這些方面作為分析的主要論題之一：

由于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半封建經濟占優勢而又土地廣大的國家，這就不但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革命的動力基本的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而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民族資產階級等等這樣許多的東西；而且規定了：中國革命斗爭的主要形式是武裝斗爭。

不太清楚的是，怎么能由毛澤東在這個句子里列舉的事實得出最后的結論，不過，顯然，這個結論是正確的。毛澤東繼續寫道：“我們黨十八年的歷史，可以說就是武裝斗爭的歷史。斯大林同志說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這是說得非常之對的。”這引自斯大林的話，是脫離上下文引證的一個顯著冷嘲熱諷的例子；當斯大林在1926年12月講這話時，他所講的“武裝的人民”是由蔣介石代表的，斯大林仍然充分相信蔣介石對事業的忠誠，而毛澤東對這一點了解得很清楚。可是，這一點被他很好地再一次抓住了：“在中國，只要一提到武裝斗爭”，他補充說，“實質上即是農民戰爭，黨同農民戰爭的密切關系即是黨同農民的關系”。[[156]](#_156____Gong_Chan_Dang_Ren___Fa)

在本文中，毛澤東把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描繪成中國共產黨的三個“法寶”。我們在這一章里已談過武裝斗爭在毛澤東的戰略中所處的地位。至于統一戰線，《〈共產黨人〉發刊詞》里的主要信息就是它應該是既聯合又斗爭。這樣聯合的確切形式并未討論，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在這同一時期，毛澤東在另外兩處寫道：合作的方式應該是“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他也把它說成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帝國主義者及漢奸反動派的革命民主專政”。[[157]](#_157___Mao_Ze_Dong_Ji____Di_7Jua)“革命民主專政”這一術語顯然是仿效列寧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一口號，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時創造出來的，以后又反復講過。當然，毛澤東的專政者要比列寧的多；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解釋說，差別是由于外國支配下的國家的特殊條件。

毛澤東的第三個“法寶”是黨的建設，事實上要比第一眼看上去含意遠為廣泛，意義遠為重大。它包含要確定一個正確的學說，在這個學說的基礎上團結和整頓黨。在《毛澤東選集》中稍有變動的一段話提到，如果過去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鞏固和“布爾什維克化”過程中不成功，那是因為它的成員沒有恰當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對于中國歷史和社會沒有正確的了解。[[158]](#_158____Gong_Chan_Dang_Ren___Fa)

十分明白，這意味著他們還不懂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好處，那是毛澤東當時精心闡述的問題，確切地說，在我們剛剛討論的那些著作中精心闡述的問題。換句話說，毛澤東在1939年10月所要求的“黨的建設”，注定了要采取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的形式，從而在1942—1943年最后地確立了他在黨內思想上的主宰地位。

## 毛澤東思想的勝利，1941—1949年

當毛澤東第一次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情況的時候，正如我已談過的，他主要關心的是使中國共產黨的措施適應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環境。毛澤東關于這一主題的思想發展的第二個主要方面，在1941—1943年與他同黨內對手的斗爭更加直接地聯系在一起，他所宣傳的觀點明顯的是要服務于他在這一斗爭中的利益。

毛澤東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說他的思想的哲學核心，早在1937年就以矛盾論形成了，那么在范圍廣大的一系列其他領域，從經濟工作到文學，從行政原則到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解釋，毛澤東1949年以前的各種意見的明確闡述，均出現在40年代初期。而在所有這些領域，思想方式與政治的暗中斗爭之間的聯系，都是顯而易見的、直接的。

當然，本章的討論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歷史事實。不過，下面的簡明的年表可讓我們看清楚某些理論表述的具體意義。

1941年5月5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大會上作報告，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他們“只會背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紀律和各級干部絕對服從上級領導的重要性。

1941年7月13日。孫冶方（用筆名宋亮）寫信給劉少奇，談到輕視理論研究和強調經院式研究的兩種對立傾向，并希望舉出幾個把理論與實踐正確結合起來的“中國例子”。同一天劉少奇給了答復，強調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困難，并部分地把這方面進展如此不大的原因歸咎于很少黨員能讀馬列原著。

1942年1月23日。毛澤東指示軍隊干部學習他的1929年12月寫的《古田決議》，要求熟讀。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澤東發表兩次關于整風的基調演說。在第二次演說中，他抱怨他1938年號召“中國化”的問題沒有引起注意。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兩次講話，但是將近一年半以后才發表。

1942年12月。毛澤東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

1943年3月20日。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書記處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1943年4月。審干運動在延安極力進行——實際上，審干運動是在康生的控制下對黨內持異議的或反毛澤東的分子進行嚴厲清洗。

1943年5月26日。毛澤東評論共產國際的解散，宣稱雖然莫斯科自1935年8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已不干預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問題，但中國共產黨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1943年6月1日。毛澤東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對“群眾路線”作出最好的說明。

1943年7月6日。劉少奇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贊揚毛澤東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并譴責“國際派別”為隱蔽的孟什維克。

1943年10月19日。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終于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1945年4月。頂峰——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同時劉少奇為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民族化”事業中做出的重大貢獻，向毛澤東歡呼。[[159]](#_159_Zhe_Xie_Da_Shi_Da_Duo_Shu_S)

當然，選擇這些事實，并把它們排列起來，是為了好讓人們看出，毛澤東在黨內絕對支配地位的建立，從一開始就是1942—1943年整風運動的主要目標。雖然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會使這一陳述顯得尖刻和過于簡單化，但是我認為并沒有歪曲它的大致輪廓。

誠然，在1943年4月，當整風運動基本上達到了目標時，毛澤東不知是出于真誠的謙虛還是虛假的謙虛，寫道，他的思想——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種形式——自覺還沒有完全成熟和想透，還沒有形成體系。他說，他的思想，或許除了包括在運動時期學習文件中的一些片斷，還不是鼓吹的時候。[[160]](#_160___Zhi_He_Kai_Feng_____1943N)可是，事實仍然是，從1943年以后，特別是從1945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馬克思列寧主義適應中國情況的最權威的范例，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文化的總結和頂峰。[[161]](#_161_Guan_Yu_Zhe_Yi_Dian__Ju_Wo)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觀點，即認為毛澤東在1932—1934年受辱于“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從1935年到1943年經歷長期艱苦的斗爭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權威之后，終于在整風運動的過程中達到了這個目標，那么他當時在延安根據地建立起了什么樣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呢？這個體系又是建立在什么原則上的呢？曾有人一再爭辯說，延安傳統的實質在于黨與群眾之間的親密關系，這并非瞎話，但是事情不能看得過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2節里，我提到過1943年6月1日有關“群眾路線”的著名指示，并爭辯說這個模糊的概念指向兩個方向，即列寧主義的杰出人物統治論和群眾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務。

認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確政策的思想源泉，他們又能進而理解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執行，這樣的想法與傳統中國思想的一個主題是背道而馳的。根據《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62]](#_162___Lun_Yu__Tai_Bo_Pian_Di_Ba)這是毛澤東半個世紀以來力圖破除的一個孔子的偏見。可是，正如曾強調過的，他這樣做時并不懷疑列寧的原理，階級覺悟只能從外面輸入工人階級，更明白地說，共產黨必須給整個社會提供思想指導。

毛澤東既要求下面的參與和一定的主動性，又要求上面的堅定的集中領導，在這樣寬廣的范圍內，著重點的確切表達和細微差別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從延安時代開始，毛澤東在這些主題上就時有變化。不過，至少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貫地認為集中領導歸根結底甚至比民主更為重要。

毛澤東的關于工作方法和組織形式的思想，是從秋收起義到整風運動，在農村15年的軍事和政治斗爭中，逐步成形的。到40年代初，這一經驗教訓已經系統地加以總結，并且不僅用于游擊戰術，而且用于經濟工作。

這一時期的主要口號是“集中領導，分散經營”。這樣一種方法特別適合的環境，相對來說只是共產黨控制的整個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據地，而經濟技術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嚴格計劃投入和產出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強調的也絕不是職責和工作的連續的、完全的分散。毛澤東在他1942年12月作的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63]](#_163_Zhe_Yi_Pian_Hen_Chang_De_Zh)中，對這一點說得毫不含糊。毛澤東在反問邊區的自給工業為什么要分散經營以后，回答道：

這主要地是因為勞動力分散在黨政軍各部門，如若集中起來，則將破壞其積極性的原故。例如，我們獎勵三五九旅開辦大光紡織廠，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紡織廠，就是因為大光廠的數百職工大部分是從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勞動，積極性很大，如若集中起來，則反而破壞了這種積極性……采取“分散經營”的方針是正確的，企圖什么也集中的意見是錯誤的。但在同一地域內的同一性質的企業，應該盡可能的集中起來，無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這種集中，我們也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這種先分散后集中的過程，也許是不可免的……[[164]](#_164_Zhe_Yi_Duan_De_Ying_Yi_Wen)

稍后在同一節里，毛澤東在列舉1943年應該實行的經濟措施時，把“建立全部自給工業的統一領導，克服嚴重存在著的無政府狀態”[[165]](#_165___Mao_Ze_Dong_Ji____Di_8Jua)列在第二項（緊接在增加資本之后）。為了取得這一結果，毛澤東要求1943年應由財經辦事處建立“統一的領導”，有一個“統一的計劃”；但是，他又規定：在應該集中領導的那些農工商業里，也不是“全邊區都集中一個唯一的機關手里”；而是作出的統一計劃，應“交由黨政軍各系統去分別地經營”。盡管如此，毛澤東的最后結論是，統一領導問題，為“一九四三年改進公營工業的中心問題”。[[166]](#_166_Tong_Shang_Shu__Di_265__273)

剛剛摘引的那句話明白無誤地提出了黨、政、軍關系問題，1949年以后，這一直是個常常引起爭論的中心問題。在延安提出來的一個關鍵性的概念，表達了當時所想到的黨的統一的指導作用的實質，用語是“一元化”——字面意思是“to make one”，“to make monolithic”。它有時被譯為“to coordinate”，這樣的翻譯只怕是太無力了；也有人用“to unify”，也難如人意，因為似乎最好還是保留這一英文用語作為“統一”的對應詞，正如最好把“centralized”留來翻譯“集中”。我建議用的英語對應詞是“integrate”，不過，這個翻譯問題，不像40年代初接受這一中文用語時所關切的事那么重要。由于這個概念至今遠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眾路線受人重視，我愿在總結我對它的意義的理解之前，對它的用法作一些說明。

“一元化”這一用語的出處似乎是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167]](#_167_Zhe_Shi_Zheng_Feng_Xue_Xi_W)

這個決定明顯地、大力地維護的，一方面是黨政關系和黨軍關系之間的聯系，另一方面則是每一單個組織的等級結構。決定的第八段是這樣開始的：

黨的領導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民各組織的相互關系上，又一方面則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在這里，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于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168]](#_168___Mao_Ze_Dong_Ji____Di_8Jua)

這難于捉摸的用語“一元化”的意義的比較清楚的定義和解釋，見之于毛澤東起草的1943年6月1日的決定，我在前面曾從其中引過一段關于“群眾路線”的很著名的話。在這一決定的緊接著的一段話（第七段）里，毛澤東聲稱：

對于任何工作任務（革命戰爭、生產、教育，或整風學習、檢查工作、審查干部，或宣傳工作、組織工作、鋤奸工作等等）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別部門都應當通過有關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一元化）。不應當只是由上級的個別部門去找下級的個別部門（例如上級組織部只找下級的組織部，上級宣傳部只找下級的宣傳部，上級鋤奸部只找下級的鋤奸部），而使下級機關的總負責人（例如書記、主席、主任、校長等）不知道，或不負責。應當使總負責人和分負責人都知道，都負責。這樣分工而又統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經過總負責人推動很多干部，有時甚至是全體人員去做，可以克服各單個部門干部不足的缺點，而使許多人都變為積極參加該項工作的干部。這也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一種形式……[[169]](#_169___Zhong_Gong_Zhong_Yang_Gua)

可能已經看出（在英譯文中也能同樣看出）“一元化”兩次用作“分工而又統一”的同位語。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個體制有以黨的形式出現的統一力量滲透進去，并由它來控制，各個機關間必要的分工不會危及活動的統一性。要傳達這種功能，英語的對應詞“to integrate”似乎是最合適不過的。

“一元化”有很強的動詞的力量，這一用語的使用，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言，反映了對40年代初期根據地普遍存在的形勢的認識，當時根據地是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敵人的攻擊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行政和控制機構幾乎不能有效地統一起來。因此，他們強調使那些機構成為一體（一元化）的必要性，因為事實上普遍存在極為分散的情況。

人們可能以為，一旦中國共產黨人在全國樹立了他們的權威，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分散主義就不再是一種威脅。事實上由于復雜的歷史的和實際的原因，在1949年，分割和各自為政的問題絕沒有煙消云散，因此，即使隨著奪取政權整個情況當然已有了巨大的變化，“一元化領導”的概念也不是毫不相干的。

## 結論：走向人民民主的現代化的獨裁國家？

本章第3節已指出，毛澤東在1939—1940年就說過，戰后建立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性質，并且說得相當清楚，這專政將是在無產階級，或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年，毛澤東曾設想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政府”，作為一個策略上有用的權宜之計，當1946年這一前景最終消失，并為公開的內戰所代替的時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對黨當前的政治目標稍稍含糊其詞了。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毛澤東闡明了他建議在三個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確切的性質。

至于新國家的階級性質，毛澤東以常常稱之為同心圓的比喻說法來解釋權力的所在。施行專政的“人民”由工人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構成。在這四個階級中，工人是領導，農民是他們的最可靠的同盟軍。小資產階級大多是追隨者，而民族資產階級有雙重性，他們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同時又是剝削者。因此，其中表現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劃在“人民”之外，而發現自己處于接受專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對象，而不是主體。

毛澤東絲毫沒有把代表這四個階級的國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產黨人“獨裁”的批評者時，他宣稱：

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么？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在指導中國“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的發展任務方面，毛澤東說“教育農民”是“嚴重的問題”。他進而說，因為“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170]](#_170___Lun_Ren_Min_Min_Zhu_Zhuan)

這些簡短的引語，說明了1949年以后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革命這一問題的幾個極為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是列寧“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斯大林“四個階級聯盟”的正統派生物，毛澤東自己也直率地承認這一思想上的借鑒，并且特意強調與蘇聯經驗的關系。確實，不管他取得政權的道路，多么不正統，一旦勝利顯然在握，他就宣稱他此后要按正統方式行事了。1949 年3月，他聲稱：“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171]](#_171___Zai_Zhong_Guo_Gong_Chan_D)由此才有毛澤東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換句話說，把現代知識和現代工業部門的物力從城市帶往農村。由此，才在1949年強調“人民專政”的工人階級的領導。由此，才在50年代初期做出努力，大量吸收真正血肉之軀的工人參加中國共產黨，以“改進”黨的階級成分。

然而，盡管有這一切，盡管毛澤東在1962年明白地說過在早期的這么多年只有“照抄蘇聯”，[[172]](#_172_Mao_Ze_Dong____Zai_Kuo_Da_D)可他的1949年6月30日的文章本身，如已經提出來的，就包含了指向非常不同的方向的成分。于是老式的用語“獨裁”被用來作為專政的同義語，“大同”被用來作為共產主義的同義詞，中國革命經驗的獨特性質被一再強調。

中國革命在1949年以后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否走的是可以稱之為“正統”的道路以及它在什么時候，為什么和怎樣地與蘇聯模式分歧，不是這兒討論的合適題目，因為它將在另兩卷《劍橋中國史》去談。在總結毛澤東作為一位革命的理論家到1949年為止這段時期的發展的經歷時，所宜做的似乎是考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初30年中將要出現的那些動向，在他取得政權之前的思想中已見端倪了——只要人們有這種智力，看得出當時的跡象。

由我看來，情況并非如此的一個領域是政治經濟的發展。是的，有一些人爭辯說“毛主義的經濟學若非更早的話，也是在延安產生的”。的確，在延安根據地的經驗中，也能找到毛澤東對未來經濟的考慮的很有意義的暗示（如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所總結的），但是這些起點都太片面，不足以辯明其中在任何意義上含有1958年大躍進思想這一結論。它們只包含了農民自助的，而不是復雜的多面的表示公社特征的組織；只強調了土辦法，而不是大規模的投入或現代技術。總之，在延安沒有把大與小、現代和傳統結合起來的“兩條腿走路”，在那一時期的毛澤東的著作中也沒有“兩條腿走路”的思想。如已經指出的，毛澤東在1949年建議通過現代化和發展經濟的過程，使中國“由農業國進到為工業國”。而農村居民，雖然會積極參加這一過程，就終極目標而論卻沒有發言權，它必須接受“再教育”，和接受造成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變化。

所以，即使人們能夠在延安的自給自足經濟和15年后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采取的新政策之間，認識到某種連續性，可是在細致地闡述政策方面，卻沒有任何思想上的連續性，在毛澤東自己的思想中無疑也沒有關于發展的連續不斷的環鏈，因為他在1949年曾明確地否定過他在40年代初期提出的許多不成熟的想法。誠然，如已指出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哲學核心里，至少從1937年到60年代初期，有著實質上的連續性。不過，如果說毛澤東關于矛盾的理論與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邏輯極不相容，那么他自己在大躍進年代之前并沒有發現這一點。

在毛澤東從30年代到70年代的看法中，幾乎全面延續下來的唯一的領域，是行使政治權力的方式方法，而且，假若如此，我認為從1949年以前毛澤東的講話和文章里，看出許多將要發生的事情的跡象，應該是可能的。

毛澤東在1949年說，他要建立的新政權正如可以稱之為“人民民主專政”一樣，也可以稱之為“人民民主獨裁”。對于這一用語上的差異不必過于重視，因為“獨裁”在過去的年代里，當馬克思主義的措詞在中國還不是都有標準的對應詞的時候，有時是被用作“專政”的譯文。雖然如此，它還是帶有過時的中國式的專制制度的味道，以致它事實上能較好地概括毛澤東對政治領導的看法的實質。

一方面他提倡基層參與的民主，其規模為現代任何革命領袖所不及。在這方面，他為中國人民服務得很好，幫助他們準備進入政治發展的第二階段。但是他同時又把發揚民主看成只有在一個“強國”的框架之內才是可行的。依我之見，他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不幸的是，他的強國的看法很像是一種專制的東西，而他作為中國革命歷史上著名的領袖，在這樣的國家里，歸根結底就裁決什么樣的政治傾向是合法的，哪些政治傾向是不合法的而論，依然是主宰者。

本章第3節已強調指出，在1939年以后的那段時間內，毛澤東尋求在中國推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它在功能上大致相當于歐洲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階段。當然，這一方面意味著現代化和工業化，以便建設社會主義得以最終建立于其上的經濟基礎。但是他也想通過把“五四”運動時期發起的對舊儒家價值觀的抨擊繼續下去，以在另一意義上完成中國的未形成的資本主義階段的事業。事實上他在1944 年8月確實寫過一封信，提倡從舊的家庭制度下解放出來：“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173]](#_173___Zhi_Qin_Bang_Xian_____194)人們必定仍然要問，這一目標是否與毛澤東的總的觀點一致。

在這個問題以及我剛剛提出的其他問題的背后，潛伏著交叉文化的仿效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根本性的爭論點，這一過程從本世紀初就在中國開始了，并且還沒有輪廓清晰的結果。“五四”時期的特點，總的來說，就是粗暴地拒絕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而贊同源于西方的思想；其后在30年代，在抗日戰爭的環境中，又再次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尊嚴。就蔣介石和國民黨來說，鐘擺的這一擺動，事實上導致否定整個“五四”精神，并斷言儒家思想對全世界的問題都提供了答案。毛澤東作為西方化的最激進的哲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擁護者，不可能走到這樣極端的地步，但是在國民黨的思想體系的趨向——它導致寫出《中國之命運》——與毛澤東所提倡的“在中國具體化”之間，卻依然有某種相似。

在40年代末期，接近全國性的勝利之時，如上面已特別提到的，毛澤東開始更加大力地、明確地強調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事項，如需要城市和工人階級的領導，以及工業化在改造中國社會和文化這兩方面的中心作用。但是“封建”文化真的能夠廢除嗎？一個政黨真的能在“獨裁者”——雖然是仁慈的——的指導下進行改革，并獲得更為民主的工作作風嗎？如果現代化也包含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刻變化，那么像毛澤東在1949年建立起的那種“人民民主獨裁”的政府真的能夠實現現代化嗎？或者這樣一種政權的形式最終要敗壞或歪曲它的內容？在毛澤東于1949年取得勝利之時，這就是很清楚地看到的、懸在他的政治信條之上的問題。

[[1]](#_1_13)關于毛澤東早年的生活和思想的全面敘述，可見于李銳撰寫的毛澤東早年的傳記，最初發表于1957年，書名《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這部著已由安東尼·S.薩里蒂翻譯成英文，由熊玠編輯，宣道華作導言。而今，李銳已推出這部著作經過大量修改和擴充的第二版，書名改為《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這個版本收入大量新資料，包括一整章敘述“五四”前后毛澤東思想的資料，這一章原載于《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33—51頁。今后第二版版本應被視為標準本。在一些情況下，為便于非漢學家讀者閱讀，我也引用英譯本。

[[2]](#_2_13)二十八畫生（毛澤東）：《體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每篇文章分別編頁）第1頁，這篇文章的英譯文載于宣道華：《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153頁。這部著作收入毛澤東1917年寫的這篇文章的摘錄。我也已在我的專著《毛澤東：體育之研究》中刊載這篇文章的全譯文。1975年，M.亨利·戴把這篇文章全文翻譯成英文，載于他在斯德哥爾摩發表的學位論文《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第21—31頁。這部很有價值的著作收入在東京出版的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1卷所收全部中文毛澤東著作的英譯文，附有引人興趣和有創見的、但往往不足以令人相信的評論，對增進我們在青年毛澤東及其思想方面的知識，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3]](#_3_13)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5頁。

[[4]](#_4_13)顏元：《四存編·存學》，第63頁。

[[5]](#_5_13)《給黎錦熙的信》，《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7—18頁。黎錦熙曾在長沙的師范學校任教師，后旅居北京。（關于黎錦熙的簡歷，見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28頁。）史華慈指出，毛澤東在信中提到的講德智體的今之教育學者，包括赫伯特·斯賓塞，毛澤東一定讀過嚴復翻譯的斯賓塞著作。

[[6]](#_6_13)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1頁。

[[7]](#_7_13)斯諾：《西行漫記》（中文版，董樂山譯，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1—122頁。

[[8]](#_8_13)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30頁。

[[9]](#_9_13)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5—6頁。

[[10]](#_10_13)這封信載于《毛澤東集》第1卷，第33頁。關于毛澤東寫這封信時的環境，見戴：《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第18—20頁。

[[11]](#_11_13)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部毛澤東著作匯編（《資料選編》第10—11頁）中，這封信被判定是寫給楊懷中（楊昌濟）本人的，而其實是寫給黎錦熙的。關于這封信的全文，見《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23頁；這里引用的一段在第20—21頁。

[[12]](#_12_13)《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20頁。

[[13]](#_13_13)同上書，第20頁。

[[14]](#_14_13)同上書，第20—21頁。按照毛澤東所抱的中國也應對世界有所貢獻的觀點，他是遵循他的老師楊昌濟的基本方向，楊昌濟在海外長期留學時改名懷中，以表達他的愛國感情。關于這點，見李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時代的報告》第12期（1983年12月），另見轉載這篇文章的《新華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8頁。

[[15]](#_15_13)《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2—23頁。

[[16]](#_16_13)毛澤東：《體育之研究》，第7頁。

[[17]](#_17_12)見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110頁引文。毛澤東對泡爾生著《倫理學原理》的批語，在《毛澤東集補卷》第9卷第19—47頁全文轉載。

[[18]](#_18_13)《毛澤東集補卷》第9卷，第21、40—41頁。

[[19]](#_19_13)同上書，第28—34、37—39、42、45—46頁。這些引文大多數而不是全部被收入李銳的《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114—116頁。

[[20]](#_20_13)我已在《中國季刊》發表這篇文章的英譯全文，并附有分析。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合》，附于宣道華《從“民眾的大聯合”到“大聯盟”》，《中國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第76—105頁。又見戴：《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第85—100頁。這篇文章的中文全文可在《毛澤東集》第1卷第57—69頁見到。

[[21]](#_21_13)《中國季刊》第49期，第78—79頁。可以理解的是，這段文字沒有被李銳收入在他的1957年版《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所載的這篇文章的摘錄中，因為這段文字不大支持李銳在這部著作中提出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是毛澤東“開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觀點（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106頁）。正如下面所指出的那樣，李銳在這部著作的1980年修訂版《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中對這個觀點的處理完全不同。

[[22]](#_22_13)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213頁。

[[23]](#_23_13)《毛澤東集》第1卷，第59—60頁。

[[24]](#_24_13)《每周評論》第36期（1919年8月24日），第4頁。

[[25]](#_25_13)《毛澤東集》第1卷，第53—54頁。當然，這個時期胡適對毛澤東的影響（毛澤東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諾講過的個人經歷中承認這一點），在中國直到最近才能提到。（關于一位西方學者在這個課題上的一些簡要而精辟的意見，見戴：《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第47—48頁。）1978年以后中國理論探討環境中發生顯著革命的一個反映，就是中國學者在1980年發表的文章不僅指出胡適稱贊毛澤東和毛澤東當時把實驗主義看作“指導思想”，而且明確地說明在1919年兩人之間尚未出現原則分歧。見汪澍白和張慎恒：《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83頁。

[[26]](#_26_13)《毛澤東集》第1卷，第69頁。

[[27]](#_27_13)同上書，第65頁。

[[28]](#_28_13)關于到工廠去，見 [毛]澤東：《炸彈暴舉》，《湘江評論》第1期（1919年7月14日），第3頁。關于呼吁團結，見澤東：《不許實業專制》，《湘江評論》第1期，第3頁。關于德國的壓迫，見澤東：《畏德如虎的法蘭》，《湘江評論》第3期（1919年7月28日），第2頁。喬治·曼蒂奇以《湘江思潮》為書名發表了《湘江評論》現有各期全部文章的意大利譯文。以上幾篇文章可見于《湘江思潮》第76—78頁和第164—165頁。我要感謝曼蒂奇先生，他送給我這幾篇文章的中文復印材料一份。這幾篇文章現已全部編入《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

[[29]](#_29_13)這些材料——毛澤東寫的四篇文章，及毛澤東和其他人聯名提出的召集憲法會議的建議——已由安格斯·麥克唐納在準備撰寫博士學位論文《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過程中發現，這篇學位論文也以同樣的標題以書籍的形式出版。麥克唐納把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發表在《法學研究》第46卷第2期（1972年），第99—107頁，附有用日文寫的評論；又用英文在《浪人》（東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頁和《中國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頁論述這些文章。

[[30]](#_30_13)《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29—230頁。

[[31]](#_31_13)同上書，第242頁。

[[32]](#_32_13)《新民學會資料》，第62—65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1—194頁。

[[33]](#_33_13)《新民學會資料》，第75—76頁。《毛澤東集補卷》，第261—262頁。

[[34]](#_34_13)《新民學會資料》，第63—65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92—194頁。

[[35]](#_35_13)《新民學會資料》，第75—76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61頁。

[[36]](#_36_13)《新民學會資料》，第127頁（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頁（毛澤東1920年11月25日給羅學瓚的信）。后一信也見于《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75—277頁。

[[37]](#_37_13)毛澤東就這個主題共寫了九篇文章。關于這些文章的簡短摘要，見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110—111頁。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載在1919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間的長沙《大公報》，見《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43—172頁。

[[38]](#_38_13)特別是見《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61—163頁。又《改革婚制問題》，《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49頁。

[[39]](#_39_13)《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76頁。

[[40]](#_40_13)李大釗：《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李大釗選集》，第327—329頁。

[[41]](#_41_13)《新民學會資料》，第146頁和第15—41頁，特別是第20—23頁。

[[42]](#_42_13)《新民學會資料》，第144—152頁；《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289—296頁。關于蔡和森和蕭旭東1920年8月的信，見《新民學會資料》，第128—143頁。羅伯特·斯卡拉皮諾論述了這個時期蔡和森對毛澤東的影響，見《一個青年革命者的發展：毛澤東在1919—1921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29—61頁。

[[43]](#_43_13)《新民學會資料》，第153—162頁。

[[44]](#_44_13)同上書，第162—163頁。這封信和毛澤東1920年12月1日給蔡和森和蕭旭東的信，編在《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頁。毛澤東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蔡和森的信，編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16頁。

[[45]](#_45_13)《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81—84頁。這篇宣言刊載在《東方雜志》第20卷第6期（1923年3月1日）。

[[46]](#_46_13)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428—430頁。《毛澤東集補卷》的編者收羅毛澤東的著作范圍很廣，收羅到的關于工人運動的著作，除這一篇外，也只有很短的文章兩三篇。見《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89—107頁。

[[47]](#_47_13)因此，馬林在對伊羅生說他只憑個人威信，“手頭沒有莫斯科文件”支持而說服了中國共產黨人接受這個建議時說了謊。[伊羅生：《與斯內夫利特談話記錄：關于1920—1923年的中國問題》（《中國季刊》第45期（1971年1—3月）），第106頁。]這點的主要事實已由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頁合適地概述，又見道夫·賓發表在《中國季刊》第54期上的對刊載在《中國季刊》第53期上評論他的文章的意見的答復。我已在本章概述道夫·賓的見解，他的見解也得到蘇聯學者和中國學者的贊同。一方面，見V.I.格盧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1920—1927年）》，收入R.A.烏里揚諾夫斯基編：《共產國際與東方》，第280—344頁，特別是第289—293頁。關于中國史學界最近在這方面的論述，見蕭甡和姜華宣：《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形成》，《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51—68頁，特別是第58頁。

[[48]](#_48_13)見毛澤東1922年6月20日《致施復亮并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1—24頁。

[[49]](#_49_13)《外力、軍閥與革命》，《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09—111頁。

[[50]](#_50_13)《向導周報》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第233—234頁。

[[51]](#_51_12)林達·謝弗：《毛澤東與1922年10月長沙建筑工人的罷工》，《現代中國》第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471頁。同樣的論點也重見于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1923年》，第1—2、222—223頁。

[[52]](#_52_12)毛澤東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譯者

[[53]](#_53_12)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黨務調查科；后擴大為黨務調查處。——譯者

[[54]](#_54_12)《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47頁。

[[55]](#_55_12)《毛澤東集》第1卷，第151頁。

[[56]](#_56_12)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見于汪澍白和張慎恒：《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60頁。

[[57]](#_57_12)莫里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特別是第55—56、80—89頁。

[[58]](#_58_12)《告中國的農民》，原載于《共產黨》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后》第207—214頁轉載。毛澤東用這篇文章講課的事實見于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第455頁。《資料選編》第24頁說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澤東，這個說法顯然錯誤。

[[59]](#_59_12)《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1926年1月）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2月），《毛澤東集》第1卷，第153—173頁。

[[60]](#_60_12)《一大前后》，第212—214頁。

[[61]](#_61_12)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1卷，第161—174頁。

[[62]](#_62_12)我已在我的論文《毛澤東與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中比較毛澤東和陳獨秀對農村關系的分析，該文載于《中國之政治與經濟：故村松祜次教授追悼論文集》，第227—239頁。

[[63]](#_63_11)如黃宗智在他的論文《毛澤東與中農，1925—1928年》中的論述，見《現代中國》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280頁。

[[64]](#_64_10)約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論文《便裝的毛澤東：新近識別的毛澤東著作》中，最先認為這些文章是毛澤東所寫的 [見《澳洲中國學報》第9期（1983年1月），第1—16頁]。菲茨杰拉德的論點本身都是有說服力的，但是，這些文章是毛澤東所寫的事實也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主任胡華在1982年9月10日同我的一次談話中證實。毛澤東的文章《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原載《政治周報》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12頁，英譯全文見菲茨杰拉德文第9—15頁。事實上，毛澤東早在1910年在東山小學讀書時就用“子任”作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對梁啟超的仰慕，毛澤東當時受梁啟超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梁啟超號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見李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新華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頁。

[[65]](#_65_11)《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48頁。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類人口數字，與1926年2月寫的文章中采用的數字相同。

[[66]](#_66_11)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1卷，第170頁。

[[67]](#_67_11)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179頁。關于這個問題的更詳細的論述，見我的論文《毛澤東與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附有這篇文章的英譯文摘錄。

[[68]](#_68_11)《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176頁。

[[69]](#_69_11)《毛澤東集》第1卷，第176—177頁。

[[70]](#_70_11)《毛澤東集》第1卷，第211—212頁。

[[71]](#_71_1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頁。

[[72]](#_72_11)《毛澤東集》第1卷，第109—111頁。

[[73]](#_73_11)《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43—149頁。

[[74]](#_74_11)《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255—257頁。

[[75]](#_75_11)《毛澤東集》第9卷，第27—28頁。

[[76]](#_76_11)關于日期為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兩封信的全文，和認為這兩封信是毛澤東所寫，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11—24頁。這兩封信的英譯文摘錄及對其意義的分析，見我的文章《論1927年毛澤東“異端”的性質》，《中國季刊》第27期（1964年4—6月），第55—66頁。

[[77]](#_77_11)《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297—298、299—300頁。

[[78]](#_78_11)一種神學教義，認為基督將以有形的方式復臨大地，在全世界建起一個神權王國，從而引進基督教的千年國度。——譯者

[[79]](#_79_11)關于1928年11月報告的有關節段，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59頁。毛澤東1929年4月5日的信，見《毛澤東集補卷》第3卷，第37—45頁。

[[80]](#_80_11)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冊，第45—46頁。（著重點是俄文本加的。）

[[81]](#_81_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第426頁。

[[82]](#_82_11)這些事情已得到蘇聯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這些著作雖在解釋上有強烈的傾向性，但是關于引用共產國際檔案而得出的事實的詳情，多半是準確的。這類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A.M 格里戈里耶夫《共產國際與中國在蘇維埃口號下的革命運動（1927—1931年）》，收入烏里揚諾夫斯基編《共產國際與東方》，第345—388頁。30年代蘇聯的出版物已給出1930年6月指示的正確日期，現在沒有任何理由繼續把這個指示當作《7月23日指示》。

[[83]](#_83_11)《共中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118—119頁。

[[84]](#_84_11)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9—373頁。

[[85]](#_85_11)《毛澤東集》第2卷，第139頁。

[[86]](#_86_11)關于說明對這個問題的各種看法的文章，見林蘊暉：《略論毛澤東同志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抵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第51—59頁；田園：《再論毛澤東同志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抵制》，《黨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65—71頁；和凌宇：《毛澤東同志和立三路線的關系討論綜述》，《黨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78—80頁。1930 年10月7日決議被瞿秋白在上海《實話》第2期（1930年12月9日），第3—4頁發表的一篇文章引述。關于毛澤東10月19日的信，見《給湘東特委的信》，《毛澤東集補卷》第3卷，第157—158頁。

[[87]](#_87_11)關于李立三就中國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發表的言論的簡短綜述，見施拉姆：《毛澤東》（中文版，紅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1頁。

[[88]](#_88_10)《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冊，第826頁。

[[89]](#_89_9)李立三為了中國革命想把蘇聯拖入一場戰爭的“陰謀”，自然激起蘇聯學者方面的很大憤慨，例如，見格里戈里耶夫文，第365—367頁。

[[90]](#_90_9)《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99頁。

[[91]](#_91_9)關于這部著作的部分綜述，見陳伯鈞：《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術——襲擊》。《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第14—19頁。

[[92]](#_92_9)遵義會議在本書第4章有論述。關于最新出版的最有權威的資料集，見《遵義會議文獻》。

[[93]](#_93_9)這本書的若干版本在書名頁上印有毛澤東之名，其他版本卻沒有，毛澤東是不是對這本書的著者存疑。雖然這本書在人民解放軍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書目（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訓練部圖書資料館：《毛澤東著作言論文電目錄》[北京]，1961年2月28日）中出現，但是現有的證據偏重于證明這本書的著者不是毛澤東。在我翻譯的《基礎戰術》英譯本的導言中，我已概括地說明毛澤東軍事戰術發展的諸階段。

[[94]](#_94_9)《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0頁；《毛澤東集》第5卷，第152頁。

[[95]](#_95_9)《孫子兵法·虛實篇》，第13段。今譯為“示形于敵，使敵人暴露而我軍不露痕跡，這樣我軍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敵人兵力就不得不分散。我軍兵力集中在一處，敵人兵力分散在十處，這就能用十倍于敵的兵力去攻擊敵人，這樣就造成了我眾敵寡的有利態勢。能做到以眾擊寡，那么同我軍當面作戰的敵人就有限了”。（吳九龍主編：《孫子校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頁）。——譯者

[[96]](#_96_9)1968年7月28日與紅衛兵的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94頁。

[[97]](#_97_9)《毛澤東集》第2卷，第36—37頁。

[[98]](#_98_8)同上書，第130頁。

[[99]](#_99_8)《毛澤東集》第6卷，第98—99、284—285頁。

[[100]](#_100_8)《毛澤東集》第1卷，第237—238頁。

[[101]](#_101_8)《毛澤東集》第3卷，第14頁。

[[102]](#_102_8)《蘇維埃中國》第91—94頁；《毛澤東集》第3卷，第183—185頁。

[[103]](#_103_8)《毛澤東集》第4卷，第363—367頁。

[[104]](#_104_8)《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7—162頁。在《毛澤東選集》上用的詞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我認為，和兩天前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毛澤東集》第5卷，第26—28頁）一樣，毛澤東在1935年原來是講國防政府。

[[105]](#_105_8)《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45、257—258頁。

[[106]](#_106_8)見1936年下半年的許多信，《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0—97頁。

[[107]](#_107_8)《毛澤東書信選集》，第78—79、87—90頁。

[[108]](#_108_8)同上書，第95—97頁。

[[109]](#_109_8)關于這一連串事件的詳細情況和進一步的論述，見本書第12章（萊曼·范斯萊克著）。這個說法根據我1982年9月10日和23日先后分別與胡華和李新的談話。

[[110]](#_110_8)《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抗戰大學》第6期至第8期（1938年4月至6月）。這部分教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節。不知道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是否也在《抗戰大學》連載。第二章第七至十節被編入“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版的《毛主席文獻》，前兩章 [缺第二章第十一節（相當于“實踐論”）]被編入《毛澤東集》第6卷，第265—305頁。后來出現的這部著作的兩種版本，收入了《實踐論》原文，其中之一還收入相當于《矛盾論》的第三章。全文轉載在《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187—280頁。關于《矛盾論》原版本選段的英譯文和原版本的形式和內容的詳細分析，見尼克·奈特：《毛澤東著〈矛盾論〉和〈實踐論〉：解放前文本》，《中國季刊》第84期（1980 年12月），第641—668頁。奈特也出版了他翻譯的《矛盾論》英譯全文：《毛澤東著〈矛盾論〉：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譯文》。

[[111]](#_111_8)只要提三點就夠，每一點都理由充分。第一，這部著作的頗大部分當時刊載在《抗戰大學》。第二，當時（同陳伯達一起）十分積極地把毛澤東樹為理論家的張如心，在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提到這部著作，在這篇文章中，張如心把這部著作說成是毛澤東的方法論和辯證法的最主要根源。第三，這部著作的全文幾乎都被按主題分為部分轉載于一部具有權威性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匯編，即北京大學哲學系：《毛澤東哲學思想（摘錄）》，第11—14、19—21、49—51、53—55、64—69、97—99頁和各處。

[[112]](#_112_8)訪問談話原在《新共和》雜志發表的時候，這個否認是強烈的，但是，毛澤東謹慎地并不直截了當地說從未做過這類講課。當訪問談話被作為附錄收入《漫長的革命》時，文字被“改進”為明確地否認他寫過這部著作。斯諾的談論（《漫長的革命》，第194—195頁）暗示這也許是按照中國當局或毛澤東本人的要求做出的。

[[113]](#_113_8)關于毛澤東的抄襲，見我的文章《毛澤東與不斷革命的理論，1958—1969年》中的注釋[《中國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第223—224頁]；又見魏復古：《關于毛澤東處理辯證法的概念和問題的幾點意見》，《蘇聯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第251—277頁。

[[114]](#_114_8)見《中國哲學》第1期第1—44頁刊載的資料，有毛澤東在1937年9月讀艾思奇著《哲學與生活》的讀書筆記，毛澤東在1938年初給艾思奇談論這部著作某一點的信，以及一篇討論《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原文本和《毛澤東選集》內兩論文本的變異的文章（郭化若：《毛主席抗戰初期光輝的哲學活動》）。毛澤東一定讀過的艾思奇的其他著作，有艾思奇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的米定著作的一篇文章《新哲學大綱》（讀書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毛澤東從中抄襲許多節段；和《大眾哲學》，一讀者在《抗戰大學》（第8期，第187頁）表示出一種把它與毛澤東的講課混為一談的傾向。

[[115]](#_115_8)當然，這個文本的確是在大約十年后出版。另一方面，在1946—1947年出版的文本一般未顯出經過徹底的改寫。而且，這個文本在蘇軍控制的大連出版發行，蘇聯方面當然不會愿意出力讓人們產生可提高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理論成熟的聲望的誤解。也就是說，假若如科恩所認為這個文本是在考慮1930年后期斯大林著作的基礎上經過改寫出版的，蘇聯專家一定會把這一點指出來。關于科恩的論點（現已是無力的），見阿瑟·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第14—28頁。  
關于毛澤東是《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著者和這部著作的1946年大連版只不過是據1937年延安油印本，未作任何編輯改動出版的事實。最近已從極可相信的方面得到證實。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龔育之：《〈實踐論〉三題》（《論毛澤東哲學思想》，第66—86頁。特別是第66—72頁）。

[[116]](#_116_8)《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7頁。

[[117]](#_117_8)我已在我的論文《馬克思主義者》中探討這個問題，這篇論文收在迪克·威爾遜編：《毛澤東在歷史天平上》，第60—64頁。又見魏菲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之哲學觀點》，第297—299、310、323—326等頁。

[[118]](#_118_8)《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4頁。

[[119]](#_119_8)王若水于1982年5月7日在北京同我的談話中提到這點，雖然王若水不同意毛澤東強調對立的統一和斗爭反映傳統影響的說法。金思愷已把毛澤東的強調對立統一理解為超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個新的理論發展。（金思愷：《毛澤東思想》，第60—64頁。）《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1946年大連版的前言指出其他兩個法則的提綱“散失”。《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79頁。又請注意毛澤東不同意艾思奇所持僅僅差別不一定形成矛盾的見解：《中國哲學》第1期，第29頁。

[[120]](#_120_8)《毛澤東集》第6卷，第300頁。

[[121]](#_121_8)《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5頁。

[[122]](#_122_8)《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9頁。

[[123]](#_123_8)西洛可夫等著，李達等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295頁。

[[124]](#_124_8)《辯證唯物論》，第93頁；《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64頁。在這一段中，有若干變異，但是，除以“主要”代替“主導”外，1952年毛澤東并未在我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過根本性的改變。毛澤東的批評可能是針對前注提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雖然他在1941年曾建議以西洛可夫的這部著作供干部學習之用（《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89頁）。

[[125]](#_125_8)《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64頁。

[[126]](#_126_8)《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7頁。

[[127]](#_127_8)《辯證唯物論》，第86頁；《毛澤東集補卷》第5卷，第258頁。這里討論的這段話出自蘇東坡的名著《前赤壁賦》，原文是這樣的：“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

[[128]](#_128_8)《毛澤東集》第6卷，第275頁。

[[129]](#_129_8)原載于1936年2月3日至5日上海《大美晚報》；據收入《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419頁上的斯諾手稿。

[[130]](#_130_8)《劉少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332—337頁。

[[131]](#_131_8)《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261頁。

[[132]](#_132_8)《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澤東集》第6卷，第259頁。

[[133]](#_133_8)《毛澤東集》第8卷，第75頁。

[[134]](#_134_8)《毛澤東集》第6卷，第260頁。雷蒙德·懷利從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觀點論述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問題，他更強調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這一哲學問題及其對“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的意義。雷蒙德·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年》，第55—58、88—95頁和各處。

[[135]](#_135_7)關于這個傳統，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2章。

[[136]](#_136_7)《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15頁；《毛澤東集》第6卷，第250—251頁有增補。

[[137]](#_137_7)《致張聞天》（1939年2月20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4—148頁。

[[138]](#_138_7)《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0—101頁。

[[139]](#_139_6)雖然在這一點上一直有學術上的爭論，但是，直到1973—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才成為一個議論紛紛的政治問題。當時提出的那些觀點，是與毛澤東在1939年采取的觀點絕對矛盾的。

[[140]](#_140_6)1952年，毛澤東大概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澤東選集》中加入這樣的論點，即使沒有外國資本主義在侵入，已起作用的變化也會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產生（《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62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0—103頁）。

[[141]](#_141_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7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99頁。

[[142]](#_142_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9—62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2頁。在《毛澤東選集》此處和他處，毛澤東在文字中用“起義”代替“暴動”。當然，這個細微變異在于“暴動”意味著更為偶然的事件，而較少作為一種先兆和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直接聯系起來。

[[143]](#_143_6)《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0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53頁。

[[144]](#_144_6)《毛澤東集》第7卷，第153—154頁（加著重點的文字，已在《毛澤東選集》中被除去）。

[[145]](#_145_6)《毛澤東集》第7卷，第162頁。

[[146]](#_146_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39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26頁。

[[147]](#_147_6)《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4頁；《毛澤東集》第10卷，第305頁。

[[148]](#_148_5)《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1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104—105頁。

[[149]](#_149_5)《論新階段》，《毛澤東集》第6卷，第198頁。

[[150]](#_150_5)《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集》第6卷，第243—244頁。

[[151]](#_151_5)關于這段情節，見本書第12章（萊曼·范新萊克著）和宣道華：《毛澤東》，第170—171頁。關于毛澤東的建議，見《毛澤東集》第6卷，第228—229頁。

[[152]](#_152_5)《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集》第7卷，第129頁。

[[153]](#_153_3)《〈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7—598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4—75頁。第三段對買辦資產階級持稍微更樂觀的見解，是在《毛澤東選集》加上的，不見于1939年文本。

[[154]](#_154_3)《毛澤東集》第7卷，第196頁。在毛澤東1925年11月填寫的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中，有這種三個階級分析的令人感興趣的原型（《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第127頁）。在調查表上的“對于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一欄中，毛澤東填寫：“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

[[155]](#_155_3)《毛澤東集》第7卷，第197—198頁。

[[156]](#_156_3)《〈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5—596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2頁。

[[157]](#_157_3)《毛澤東集》第7卷，第129頁。

[[158]](#_158_3)《〈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2頁；《毛澤東集》第7卷，第79—80頁。

[[159]](#_159_3)這些大事大多數是眾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內容是思想而不是實情，我不一一詳細地作腳注。劉少奇的文章《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90—301頁。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698—700頁。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和毛澤東的講話都可見于《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集》。劉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為人所知是存在的，見我在《中國共產黨思想方式的政黨》一文對這封信的探討，此文載于約翰·威爾遜·劉易斯編：《中國的黨的領導和革命力量》，第177頁。  
現在劉少奇的這封信已被重新刊載，宋亮已被判明是孫冶方（《紅旗》1980年第7期，第2—4頁），但是，宋亮的原信沒有被刊載。關于宋亮的信，見劉少奇：《論黨》，第345—346頁。關于1945年4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的主要節段，見《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6—337頁。關于從1943 年3月起毛澤東在黨內的正式職位，見《黨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77—78頁。

[[160]](#_160_2)《致何凱豐》（1943年4月22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12—213頁。

[[161]](#_161_2)關于這一點，據我的看法，雷·懷利的《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73—274頁）所作關于劉少奇在七大的報告和在七大通過的黨章的解釋是正確的，而弗朗茲·舒爾曼的《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中的解釋是錯誤的。不管怎樣，在50年代初，中國人在“純粹的”思想意識和“實際的”思想意識之間劃出界線，這完全是另一個問題，我在本章不論述。

[[162]](#_162_2)《論語·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163]](#_163_2)這一篇很長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澤東選集》載出。下面的節段引自第七部分，《關于發展自給工業》，見《毛澤東集》第8卷，第263—264頁。

[[164]](#_164_2)這一段的英譯文，見安德魯·沃森編《毛澤東與邊區政治經濟》（英文），第149—150頁。

[[165]](#_165_2)《毛澤東集》第8卷，第273頁。

[[166]](#_166_2)同上書，第265、273頁。

[[167]](#_167_2)這是整風學習文件之一。這個決定沒有被正式證實是毛澤東起草的，但中文本已被收入在東京出版的《毛澤東集》第8卷，第155—163頁。

[[168]](#_168_2)《毛澤東集》第8卷，第161頁。

[[169]](#_169_2)《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2—903頁。考慮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較起來有（不太廣泛的）改變，據《毛澤東集》第9卷，第29頁修正。

[[170]](#_170_2)《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1481頁。

[[171]](#_171_2)《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8頁。

[[172]](#_172_2)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173]](#_173_2)《致秦邦憲》（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39頁。

# 參考文獻介紹[[1]](#_1_Wo_Men_Gan_Ji_Mi_Zhi_An_Da_Xu)

## 第一章 導論

在不斷增加的大量中國近代史出版物（特別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物）中，研究工具書和文獻資料似乎增加得比利用這些工具書和資料寫成的歷史研究專著還要快。除《劍橋中國史》第10、11 和12卷列出的書目外，下列書目相當詳細地敘述檔案和出版物，特別是在臺灣的檔案和出版物。

### 研究工具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七十六年史學書目（1900—1975）》，按論題列出中國作者論著目錄9000條以上，附作者索引。復旦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1949—1979》，按約80個主題列出論文目錄10000條，書籍目錄1200條以上。中國史學會編《中國歷史學年鑒》概述每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中國歷史學年鑒，1979》在1981年出版；《中國歷史學年鑒，1981》概述1980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在1982年出版；《中國歷史學年鑒，1982》概述1981年的出版物及其他活動。到現在，我們已見到1984年10月出版的《中國歷史學年鑒，1984》。中國史學會又出版《史學情報》季刊，該刊在1982年開始用這種公開形式出版。這兩種出版物所載的書目、史學研究綜述和論點選登最有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季刊上定期發表的近代史研究書目也最有用。

由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明清檔案）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時代檔案）合編的《歷史檔案》季刊在1981年創刊，載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家歷史檔案館和其他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的學術研究成果、文獻和論著。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文獻叢書《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叢書從1857年期刊編起，最后將包羅迄1918年的495種期刊約11000期的詳細篇目。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8卷——現在我們終于得到——包含清代行省地圖，甚為精細，標明縣境和縣治。上海史學者陳旭麓等編《中國近代史詞典》對研究1840—1919年中國近代史有用。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是著者1950年在南京大學的講稿，介紹史料的主要種類，并由此而為讀者了解許多當代中國史學家的觀點提供便利。張德澤著《清代國家機關考略》詳細敘述清代政府結構。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四卷逐年列出兩個半世紀都市和行省主要職位的在職官員。

### 經濟社會史

經濟社會史長期以來是日本學者喜歡研究的主題。重田德著《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主要研究湖南省的紳權和地主，而奧崎裕司著《中國鄉紳地主之研究》詳細地研究浙江一個地主家族。小島晉治著《太平天國革命的歷史和思想》是著者的研究論集。小野川秀美和島田虔次共編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評論辛亥革命，收日本有學術成就的京都學派新一代學者的論文13篇。中村義著《辛亥革命史研究》收著者多年來研究這個主題的論文。也要特別提及《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東京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研究中華民國經濟趨向與外國經濟利益的著作有島一郎著《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和高村直助著《近代日本棉紡織工業與中國》。京都大學的一個研究組（狹間直樹、片岡一忠和藤本博生）出版了《五四運動之研究》論集。關于日本史學界研究近代中國的全面成果，除本書上卷《書目介紹》第1節提到的綜述直到1969年出版的書目外，要特別提及《清史問題》所載的田喬舒亞·A.福格爾翻譯成英文的日本《史學雜志》上的書目綜述。

社會經濟史論文也刊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文化革命以后的新辦或復刊的學術期刊上。要特別提及設在北京的歷史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史研究》和廈門大學出版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方面的學術成果，也見費維愷編《從宋代至1900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

四部收有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主要論文的結集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收論文33篇；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續編》，收論文20篇；南京大學歷史系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收論文25篇和1949—1979年發表的218篇論文的目錄；南京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收論文18篇和論文目錄。黃逸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選集》是一部高質量的選集，收入1949—1966年發表的研究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經濟的論文，并附有文化革命以前研究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1000篇以上論文的長達110頁的目錄。

最近出版的明清時期社會經濟史料的出版物有：上海博物館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收碑文245篇；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收碑文90篇；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和南京大學歷史系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收碑文258篇——主要是南京大學洪煥椿教授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清代地租剝削形態》，收乾隆朝刑部檔案399宗。

新出版的廈門大學傅衣凌教授著《明朝社會經濟史論文集》，收著者40年代起30年來發表的論文29篇。最近出版的研究明清農村社會的著作有何齡修等著《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和葉顯恩著《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研究1860—1916年中國現代化的頗具雄心的計劃，至今已出版研究專著四種。每個行省研究專集掛有叢書名《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每卷書名給出省名：蘇云峰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張玉法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李國祁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以及張朋園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最近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研究晚清民國時期近代工業及其他企業的出版物有：張國輝著《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史料》、《劉鴻生企業史料》；以及至今已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藏未發表過的盛宣懷檔案四卷：陳旭麓、顧廷龍、汪熙編《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

50年代后期，周恩來總理力勸非共產黨人士撰寫1949年以前他們親身經歷的回憶錄。成果是前軍閥、國民黨官員、國民黨軍將領、教育家及其他人士的回憶錄大量涌現。這類史料的第一卷以《文史資料選輯》的書名在1960年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出版。其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各省、各大城市乃至在若干縣的委員會也開始出版各個地方的《文史資料》。關于1960—1981年出版的各種《文史資料》的篇目索引，見《五十二種文史資料篇目分類索引》。

### 最近的社會史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出版的勞工運動文獻資料有：廣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新的研究成果大大補充了讓·謝諾著《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的內容。陳明銶《勞工與帝國：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勞工運動，1895—1927年》；蓋爾·赫沙特：《飛錘走鑿：三條石工人》；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紗廠女工，1912—1949年》和《包身工制度與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紗廠》；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1923年》；戴維·斯特蘭德和理查德·韋納：《20世紀20年代北京社會運動與政治言論：1929年10月22日電車風潮分析》，這些論著增加了我們關于中國無產階級的知識。小安格斯·麥克唐納著《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也有關于湖南勞工運動的資料。陳明銶編著《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編纂學，1895—1949年》是一部書目指南。

兩部經濟思想——意義非常概括——史著作內容相當廣泛：趙靖和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侯厚吉和吳其敬：《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第一卷（1840—1864年）。同時，美國史學者關于西方對中國影響的理論和論述，在柯文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得到批判的評介。

社會史研究大大得到史堅雅等人編著《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1973年）三大卷的幫助。研究中國農村史的美國史學者也已吸收了在其他農民社會的研究中發展起來的理論框架。史堅雅著《中國農民與封閉社會：開放和關閉的個案》提出村民與村外社會接觸程度的循環變異。其他學者已利用埃里克·沃爾夫著《20世紀的農民戰爭》、詹姆斯·斯科特著《農民的道德經濟》、塞繆爾·波普金著《有理性的農民：越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及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原始的造反者》等著作。關于使沃爾夫-斯科特“道德經濟”概念適應中國情況的若干問題，見于詹姆斯·M.波拉切克著《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和《亞洲社會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志》第5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753—868頁]所收其他文章。

上個十年的許多出版物分屬于下述四類之一：可與文化人類學或人口理論結合的連鎖區域分析和空間研究；上層階級研究；農村社會和農民造反研究；以及關于城市無產者的論著。在這個正在迅速發展的領域，上面提到的論文可望不久以書籍的形式出版。

區域分析以不同的方式由吉爾伯特·羅茲曼著《中國清代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與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中的史堅雅及其他人的論文表現出來。源出于史堅雅的市場體系理論的分析法也由臺北史學者在錯綜復雜的研究中使用，例如，李國祁和朱鴻著《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史堅雅著《中華帝國晚期的流動戰略》把區域分析和家族研究結合起來。城市化問題在蘇珊·曼著《中國的城市化與歷史變遷》中有進一步的探討。地方研究著作不斷增加，今舉三例：寇爾：《紹興：清代社會史研究》；威廉·羅：《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876—1889年》；以及蘭德爾·斯特羅斯：《困難的工作：中國江蘇西部農業的政治經濟，1911—1937年》。劉耀著《太平天國失敗后江南農村經濟變化的再探討》，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商業化的作用。

社會史學者也已轉向文化人類學以求深入研究。詹姆斯·沃森著《中國親屬關系再探討；歷史研究的人類學觀點》是有關親屬關系，特別是宗族的人類學文獻的一個內容廣泛的指南。基本人類學分析法由莫里斯·弗里曼編《中國社會的家庭與親屬關系》和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上的論文表現出來。根據社會經濟環境運用文化人類學原理的新努力，可以斯特萬·哈勒爾著《犁頭農村：臺灣文化與環境》作為范例。魯比·S.沃森著《華南的階級差別與姻親關系》把親戚關系與階級結構結合起來研究。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著《中華帝國晚期的親屬組織》首先采用歷史人類學的有組織分析法。

人口研究的新階段以何炳棣著《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年》作為起點，但是該專著使用歐洲人口史研究中發展起來的方法論。詹姆斯·李著《中國西南部的糧食供應與人口增長》及詹姆斯·李和羅伯特·恩格著《18世紀滿洲的人口及家史：島夷人，1774—1798年》說明這種趨向。王樹槐著《清末民初江蘇省的人口發展》是一篇詳細研究該省人口發展的論文。傅筑夫著《人口因素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及周源和著《清代人口研究》，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口研究上的成果。皮埃爾-艾蒂安·維爾著《18世紀的中國官吏與饑荒》； 《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所載《糧食、饑荒與中國國家——專題論叢》中的全部論文；以及詹姆斯·李、皮埃爾-艾蒂安·維爾和王國斌編《清代的國家倉廩與糧食供應，1650—1850年》，在糧食供應、政府政策及人口的研究上開拓出新領域。

在美國，上等階級研究大多集中在名流而不在中國傳統的商紳劃分或民國時期更不完全的上層階級劃分上。代表作有：肖邦齊著《四川地方名流的構成和作用》和瑪麗·巴克斯·蘭金著《城鄉連續性：浙江兩個集鎮的望族》。肖邦齊著《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分析核心和周邊地帶內浙江省名流的組織發展。名流制度的研究除親屬方面外尚落后，但是，理查德·J.史密斯著《中國文化遺產》分析了禮的普遍效用和秩序感。研究行會的基本著作仍然是何炳棣著《中國會館史論》和根岸佶著《上海之行會》。加里·G.漢密爾頓著《區域性的行會與中國城市：比較觀點》把中國這類行會同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發展中社會的行會比較。汪士信著《我國手工業行會的產生、性質及其作用》是一篇研究清代行會的增長知識的論文。

更為人熟悉的中國階級劃分也已得到了學者的注意。關于資產階級，見本書上卷12章白吉爾的書目注釋。特別是，日本的歷史學者繼續研究以等級地位和土地所有來界定的士紳社會。載在《史學雜志》每年五月號上的書目提要《日本的明清研究》和《日本的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研究》是這方面研究及日本在社會史其他方面研究的良好指南。正如上面提到的，《史學雜志》1978—1982年書目提要已由喬舒亞·福格爾翻譯成英文，刊載在《清史問題》第4卷第3期、第4卷第6—10期和第5卷第1期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學者所進行的社會階級之歷史研究，按照密切結合歷史發展諸階段社會經濟史的馬克思主義模式進行。清代社會史大多聯系到上面提到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經君健著《論清代社會的等級結構》是一篇極好的理論綜述。在美國史學者所作對上等階級的詳細研究中，弗蘭克·洛耶夫斯基著《蘇州租棧：晚清的佃租管理》對村松祜次的仍然具有權威的地主租棧研究專著提出一些新觀點，村松祜次的專著已以英文摘要為《晚清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證研究》。詹姆斯·波拉切克著《士紳霸權：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考察江南上層士紳社會。張仲禮的著名著作《中國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與何炳棣著《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仍然是研究士紳的主要起點。一篇令人發生興趣的更近發表的論文是王思治著《宗族制度淺論》。為深入了解學者階級中個人關系的錯綜復雜，見詹姆斯·波拉切克著的等待出版的書稿《內部的鴉片戰爭》和鄺兆江著《百日維新的拼花圖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尚有更多研究已指向農村社會和農民造反，對這方面研究來說，蕭公權著《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仍然是重要的基礎。日本學者研究土地關系的大量論著在琳達·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者關于中國農村社會變化的學術成果》中得到介紹。黃宗智著《華北農民經濟與社會變遷》是一部研究華北農村社會的大作。魏菲德著《造反與革命：中國歷史中的民眾運動研究》和劉廣京著《世界觀與農民造反：對毛澤東以后的編史學的看法》，是兩部關于農民造反論著的內容廣泛的指南。后者集中介紹1978年以后中國學者的歷史論著，而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重寫中國歷史的研究》仍然是介紹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編史學的一部標準著作。載于《現代中國》季刊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的周錫瑞著《農民造反專題論集：若干介紹性評論》提出更多的觀點。周錫瑞著《論義和拳運動的社會成因》重新解釋義和團叛亂。裴宜理著《社會盜匪活動再探：中國土匪白朗個案》對民國初期白朗起義提出新觀點。

讓·謝諾編《中國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所收的論文是研究農村非法組織這一重要方面的指南。中國的史學者看來似乎對造反比對秘密會社本身更注意一些，但是秘密會社也已得到應有的注意。蔡少卿著《哥老會與1891年長江流域的反洋教斗爭》和胡珠生著《青幫史初探》就是實例。

民間教派已吸引學者更多的注意。歐大年著《民間佛教、傳統中國晚期的反政府教派》、歐大年著《抉擇：中國社會中的民間教派》及斯特萬·哈勒爾和裴宜理著《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導論》，提供了總框架。韓書瑞著《中國的太平盛世叛亂：1813年的八卦教起義》是19世紀初一次重要的起義的個案研究。其他教派研究成果的論文發表于《現代中國》季刊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專題論集。孔斐力著《太平天國幻想的淵源》，把太平天國的太平盛世觀放在中西理論框架內。魯道夫·G.瓦格納著《重新制定天國的美景：宗教在太平軍造反中的作用》是對洪秀全宗教的內容及影響之傾向的革命的分析。

近來的論著已把農村社會模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突出起來；許多論著已把研究集中于其社會關系未必與更穩定、繁榮的農業核心內的社會關系一致的動蕩不安地區上。裴宜理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運用社會生學態原理和社會戰略的人類學概念來分析華北平原的極貧困部分100年來的動亂；而哈里·J.拉姆利著《械斗：中國東南部的暴力病態》研究廣東省地方性不穩狀態。艾愷著《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研究民國時期農村分離派、軍閥領袖人物的上層社會。R.G.蒂德曼著《盜匪活動的持續：華北平原邊緣地區的事件》和菲利普·比林斯利著《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華民國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層下》，提供關于民國時期華北社會動蕩不安的更多情況。

戴維·富爾著《中國江蘇省的地方政治動亂，1870—1911年》研究城市化了的長江下游非常不同環境中的社會動蕩不安的原因。羅克珊·普拉茲尼阿克著《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議：辛亥革命前夕的抗稅與縣鄉政治》研究清代最后十年出現的新社會緊張狀態。阿瑟·羅森鮑姆著《士紳權力與1910年長沙米風潮》是一篇詳細研究大城市風潮的論文，周錫瑞著《中國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也用不同的方法分析這次風潮。

當然，有許多別的不屬于上述分類的論著。喬舒亞·A.福格爾和威廉·A.羅編《關于變化中的中國的若干看法：韋慕庭教授紀念論文集》編入各種各樣研究民國的論著。婦女史也已受到注意。這方面的優秀入門書是馬杰里·沃爾夫和羅克珊·威特克編：《中國社會的婦女》。謝爾曼·科克倫和安德魯·謝譯《中國一日，1936年5月21日》，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那一天的五花八門的（確有進步傾向的）個人生活自述文集的刪節本。該書豐富多彩的內容是這類1870年以來報刊上尚待研究資料的初步發掘。

### 蘇聯關于晚清及中華民國的研究

在一個尚告完整的世界，所有國家研究中國的史學者都會出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來了解中國近代史，即使看法紛紜。在這樣一個思想世界市場，全面一致大概會小于全面爭論，但是，撰寫出來的歷史要堅持做到更充分地掌握可核實的史實和理論解釋。近來，研究中國的史學者的接觸和交流已在中國、日本及大西洋共同體三大中國學區域之間迅速增加，但是，與第四大區域蘇聯的接觸和交流增加不太迅速。這是由于若干原因。蘇聯境外研究中國的專家，能閱讀俄文者不多，蘇聯研究中國的專家派往國外不多，蘇聯出版物不易獲得。研究主題，和研究者一樣，在蘇聯受到政治標準的鑒定和限制。盡管如此，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學術成果自1960年以來已經在蘇聯出現，其中很多涉及一些對研究中國的非蘇聯史學者來說有興趣的題目。正如普林斯頓大學吉爾伯特·羅茲曼教授在《蘇聯對前近代中國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評估》所說，“蘇聯作者的中國史及文學研究項目非常眾多、范圍很廣，而且往往在主題的選擇上具有特色或在解釋上具有創見”。羅茲曼教授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賈士杰教授在上述著作中論述了蘇聯學者的種種晚清民初研究論著。研究主題包括早期廣州人的愛國精神，太平天國、捻軍和義和團運動，帝國主義與19世紀90年代的維新，孫逸仙，立憲運動與革命思想，以及辛亥革命。關于社會經濟變革，有很多論著論及城市、手工藝行會、早期資本主義與土地關系；也論及農民造反、1925—1927年革命、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對農民政策，以及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目前研究興趣的廣度由討論中國社會與國家問題年會出版的報告百余種表現出來，這些報告印數有限，一般編成三卷，由莫斯科東方研究所中國研究部L.P.杰柳辛編。總之，蘇聯的中國學家，即使與外國隔絕接觸，還是和在其他國家的研究中國史學者一樣，利用同樣的史料，研究許多相同的課題。

## 第二章和第十章 中國的對外關系，1911—1949年

近代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和侵略由馬里烏斯·詹森著《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年》提供最好的介紹。關于日本在民國初期卷入中國內政，見同作者所著《日本人與孫逸仙》。更多的情況，主要根據中國史料，可從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所收歐內斯特·P.揚和馬德琳·池的論文得到。在用日文撰寫的研究論著中，最有用的是栗原健《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日俄戰后起至大正期止》；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角田順《滿洲問題與國防方針——明治后期國防環境的變化》；以及崛川武夫：《遠東國際政治史概論：二十一條要求研究》。

民國初期也已是研究西方外交的史學者的一個研究課題。例如，可見到彼得·洛：《英國與日本，1911—1915年》；和詹姆斯·里德：《傳道精神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年》。后一部著作把美國政策放在差會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增大的格局中研究。差會在美國國內和在中國的影響是一種吸引人注意的歷史現象，一些寫得極好的專題著作已探討這個問題，其中有瓦倫丁·拉伯：《美國在華差會的國內基地，1880—1920年》和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轉換時的中國》。

從二十一條到凡爾賽和會的喧嚷時期已由許多作者論述，但是，幾乎全部在于中國政治和知識分子運動方面。論述中國對外關系的最佳著作仍是馬德琳·池著《中國外交，1914—1918年》。關于激起“五四”運動的山東問題，見拉塞爾·法菲爾德：《威爾遜與遠東》；諾埃爾·H.普加奇：《芮恩施》；以及伊恩·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關系研究》。

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對外事務研究得最好的時期之一。人們可以從多蘿西·博格著《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1928年》著手，該著作的開拓性貢獻已為其他一些著作擴充，這些著作有：保羅·瓦格：《傳教士、中國人及外交官》；沃倫·I.科恩：《中國派：顧臨、拉門德、索克思與美國—東亞關系》；以及羅伯特·奧爾伯特·戴耶：《在華的銀行家和外交官，1917—1925年》。華盛頓會議以后亞洲國際關系仍是一個生動的討論課題。研究華盛頓會議的最佳著作是羅杰·丁曼著《太平洋的軍事力量》。至于主要概念的介紹，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后：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年》。20世紀2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在一些專論中得到很好的研究，這些專論有馬場伸也著《進退維谷的日本外交》，威廉·莫頓著《田中義一與日本對華政策》，細谷千博和齋藤真著《華盛頓會議體制與日美關系》中的幾篇論文；以及入江昭和有賀貞編著《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日本外交》所收麻田貞雄、宇野重昭和大煙篤四郎的論文。

世界經濟危機時期“華盛頓會議體制”的崩潰，在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國際聯盟和1931—1933年遠東危機》中得到很好的研究。遠東危機本身也有學者研究，專著有緒方貞子著《在滿洲的挑戰》；臼井勝美著《滿洲事變》；詹姆斯·B.克勞利著《日本探求自主》，以及島田俊彥著《滿洲事變》。至于對美國幫助中國的努力提供受挫的背景的動亂所作的極好論述，也見小詹姆斯·C.湯姆森著《中國面向西方之時：美國改革者在國民黨中國，1928—1937年》。

1931—1945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也由家永三郎著《太平洋戰爭》予以生動的論述。在這部著作中，這位著名的日本歷史學家以自我批判、悔恨的心情撰寫種種事件。許多與這位學者同時代的人，以及年輕的作者，合作出版了角田順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后一部著作是1962—1963年出版的若干日本大史學家的七卷論文集，仍然保持檔案史料的發掘和勇于形成的概念所產生的新鮮感。這部論文集已有若干卷譯成英文，最近出版的有詹姆斯·W.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1941年》和《日本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日本突然爆發。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和滿洲事變，1928—1932年》。用英文撰寫的研究20世紀30年代日本擴張主義思想的最佳專著，有馬克·皮蒂著《石原莞爾》和邁爾斯·弗萊徹著《對新秩序的追求：戰前日本的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

史學界有研究西方列強對中日沖突的反應的權威著作。關于美國的反應見多蘿西·博格著《美國與1933—1938年的遠東危機》；關于德國的反應，見約翰·P.福克斯著《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1938年》；關于英國的反應，見安妮·特羅特著《英國與東亞，1933—1937年》，斯蒂芬·萊昂·恩迪科特著《外交與企業：英國對華政策，1933—1937年》和威廉·羅杰·路易斯著《英國的遠東戰略，1919—1939年》。珍珠港事變前夕亞洲的英美外交已是一代學者熱烈討論的課題。主要問題是中國在造成日美之間的危機和最后終于爆發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最近出版的專著，如彼得·洛著《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和戴維·雷諾茲著《英美同盟的建立》，提供了詳細的分析。在這方面也值得提到的專著，有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的兩卷多國合作的論文集《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所收的多篇論文，和伊恩·尼什編《英日疏遠，1919—1952年》。

可惜，論及20世紀3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的專著不多。這種狀況部分地反映文獻資料的缺乏，而且也反映學者的主要興趣在于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特別是國共關系。幾乎全部通過日本及西方史料來研究中國對外事務的反常狀態，有朝一日將會得到矯正。同時，學者應利用這方面的已出版的為數不多的專著，如吳天威著《西安事變》，以及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所收蘇珊·漢·馬什、易勞逸和入江昭的論文。關于近年研究中國對日本侵略的反應的日本學者論文編目，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戰后日本之國際政治學》。

戰時中國外交事務已再度傾向于由學者通過大國對外政策來加以研究。最近出版的書中有克里斯托弗·索恩著《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國、英國與對日本的戰爭，1941—1945年》，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和入江昭著《實力與文化：日美戰爭，1941—1945年》。

由于美國在中國政治和經濟中的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又由于中國問題在戰后美國政治中引起的爭論，戰時和戰后的美中關系成為一個特殊范疇。鄒讜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是這個課題的開拓性研究專著，現在已由其他學者利用鄒讜當時不能獲得的檔案文獻加以增補，雖然并未完全取代。例如，見拉塞爾·D.布海特著《赫爾利與美國對外政策》，肯尼思·徹恩著《在中國的困境：美國政策辯論，1945年》，保羅·A.瓦格著《門戶的關閉：中美關系，1936—1946年》，威爾馬·費爾班克著《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實驗》，和加里·梅著《代人受過的中國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驗》。美國戰后對華戰略已由學者充分研究，有多蘿西·博格和沃爾多·海因里希斯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系》所收的論文，羅伯特·布盧姆著《限制：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由來》，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關系和承認問題的爭論，1949—1950年》，和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著《通往對抗的道路：美國對中國和朝鮮的政策，1947—1950年》，所有這些研究專著都需要在戰后亞洲國際事務的更大格局中敘述。這方面有用的專著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唐納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韋爾萊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東亞國際政治》，入江昭著《亞洲的冷戰》，和中img嶺雄著《中蘇對立與現代：戰后亞洲之再考察》。

## 第三章 南京十年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27—1937年

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為止，史學界很少研究南京十年的歷史。然而，從那時以后，南京十年已成為歷史探究的最熱門和最引起興趣的時期之一，部分原因是對這個時期的解釋爭論激烈。1970年，薛光前編《緊張的十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1932年》出版，該書是一部專題論集，所收論文大部分是具有親國民黨的同情情緒的學者撰寫的。那些論文研究南京十年的政治經濟和教育諸方面，總的意思是國民黨建立了國力的穩固基礎。薛光前及那些論文著者認為，如果中日戰爭不在1937年爆發，中國就會成為現代繁榮的國家。于爾根·多梅斯在他1969年出版的巨著《推遲的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1923—1937年》中，也有和薛光前的解釋一樣的樂觀情緒。然而，多梅斯也坦率地提到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后迅速地失去革命勢頭，不能博得民眾擁護，而且缺乏實行土地改革的能力。撇開這似乎自相矛盾的解釋，多梅斯的專著是現有的一部研究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制度和政策的最博學的著作。

薛光前和多梅斯對國民黨的有利評估，不久以后受到兩部強調國民黨制度及綱領的缺點的專著挑戰。第一部是田弘茂著《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田弘茂研究國民黨制度及行政結構之后，斷定至少到1937年的時候，這些結構在組織上太弱，不能建立強大統一的國家。易勞逸著《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特別強調國民黨在1927年掌權之后失去革命推動力；易勞逸依靠研究以后十年一連串的政治及經濟現象，試圖為那個論點提供論據。

其他專著更狹窄地集中注意力于南京十年的一些個別的方面。錢端升研究這個時期的政治制度作為他的兩部權威專著的部分內容，這兩部專著是《民國政制史》和《中國的政府與政治》。最詳細地研究這個時期國民黨史的專著是張其昀著《黨史概要》五卷，不過必須考慮到著者的親國民黨偏向。涉及這個時期的蔣介石傳記尚無可以無條件推薦的著作，不過下列著作可能顯得有趣：董顯光著《蔣介石》和布賴恩·克羅澤著《失去中國的人：第一部蔣介石全傳》。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版的研究南京十年專著中的第一部，是約翰·伊斯雷爾著《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該專著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學生對日本侵略的愛國反應。日本侵華問題本身在畢恩來所著依然有用的《日本在中國》，在周開慶著《抗戰以前之中日關系》和在秦郁彥著《日中戰爭史》中得到論述。通過日本政治過程理解日本對華政策，是詹姆斯·B.克勞利著《日本探求自主：國家安全對外政策，1930—1938年》和詹姆斯·威廉·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1941年》研究的課題。后一部專著收有日文八卷研究專著《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開戰外交史》的譯文。西安事變在逐漸導致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諸事件中是重要的事件，最近已由吳天威著《西安事變：現在中國史的支點》重新研究。

這個時期的軍事方面，在劉馥著《現代中國軍事史》中被卓越地勾畫出來。國民黨在努力實行軍隊現代化的過程中非常依賴德國，威廉·C.柯爾比在他所著的《德國與中華民國》中分析了這種重要的聯系。

由于中國經濟史研究一般發展落后，令人意想不到，南京十年的經濟竟比這個時期大多數方面受到更多的注意。兩部在20世紀30年代寫成的優秀著作提供全面的背景：卜凱著《中國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著《中國的土地與勞動》。具有有價值的統計分析的專著，是劉大中著《中國國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和劉大中、葉孔嘉合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1933—1959年》。楊格在1929—1947年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顧問，集中研究貨幣問題，但也在他所著《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中廣泛地提供了對經濟的清楚見識。銀行和貨幣市場在弗蘭克·M.塔馬格納著《中國銀行業和財政》中得到研究。關于現代部門的發展的有用研究專著，有程玉桂著《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和約翰·K.張著《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

這個時期的研究越來越精深，這在數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發表）集中研究國民黨統治下中國地方及區域諸方面的專著中得到證明。這類專著的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爾著《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該書強調上海國民黨和企業家階層關系緊張。科布爾的解釋在理查德·克拉倫斯·布什著《國民黨中國的棉織品政治》中受到挑戰。國民黨與地方士紳的關系在兩篇博士學位論文中得到研究：諾埃爾·雷·邁納著《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和布拉德利·肯特·蓋澤特著《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27年》。林振華以一省為焦點進行類似的研究，在所著博士學位論文《國民黨在江西：圍剿共產黨根據地，1930—1934年》中評估國民黨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所作的努力。若干類似的南京十年時期研究目前在準備階段中。

有關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處，散布很廣。讀者可在多梅斯、田弘茂、易勞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著作中以及在本書其他文章的書目中找到參考信息。

## 第四章 共產主義運動

由于研究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專著已在本書上卷《書目介紹》第10節中提到，我們不擬在此重復。關于中國共產黨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檔案史料來源是陳誠檔案縮微膠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研究這個領域的學者可以容易得到。檔案不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黨的決議，而且有許多期刊，如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紅軍機關報《紅星》、共產黨和青年團刊物《紅旗》、《斗爭》、《布爾塞維克》和《實話》——全是研究者必須閱讀的史料。1925—1935年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時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時序，這個時期從1927年夏至1928年夏瞿秋白領導中國共產黨開始。論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實施的唯一英文專著是蕭作梁著《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城市與鄉村的對抗》，而在中文著作中，這段歷史要復雜得多，觸及共產黨史的所有問題。在1945年4月20日通過的關于黨的歷史的著名決議中，雖然瞿秋白的領導未被說成“路線”，但是被說成“左傾主義”、“冒險主義”、“命令主義”和“宗派主義”，同時又被說成“極端民主”。這種混淆不清的評價在文化革命時期發展成毫不含糊的譴責，終于在1980年發展成了進一步的含糊不清。直到現在，尚沒有學者作出認真的嘗試來撰寫一部關于瞿秋白領導的專著。李立三時期在R.C.桑頓的力作《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中有論述。李立三也在1945年決議中受到嚴厲批評，然而關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學術專著尚告闕如。

關于土地革命和蘇維埃的建立，蕭作梁的兩部早一些時候出版的編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1930—1934年》和《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仍是最好的專著。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學者興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問題，終于產生三部深入研究的專著——約翰·E.魯著《居于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1935年》，金一平（音）著《中國共產主義政治》和T.勒特菲特著《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對于江西蘇維埃的更全面研究，見于曹伯一著《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蘇聯在這些年及以后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爾斯·B.麥克萊恩著《蘇聯政策與中國共產黨，1931—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而對毛澤東持嚴厲批評態度的別的觀點，由在中國服務的最后一位共產國際顧問奧托·布勞恩（李德）著《中國紀事，1932—1939年》提出。關于這個時期的文獻資料集，有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共匪重要資料匯編》兩卷和劉培善編《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資料》。

長征緊接在中央蘇維埃毀滅之后。關于長征的研究專著，有迪克·威爾遜著《長征，1935年》及喬治·瓦爾特和胡繼喜（音）著《他們有十萬人（長征，1935年）》。關于長征的中文著作，數量太多以致不能在此提到，可惜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憶錄，不是嚴肅的歷史。全世界對這個史詩般的事件的戰略和戰術決定、組織和后勤補給所知甚少。而且，全世界對紅軍的組織訓練、后勤補給、獎懲及其他許多方面也所知甚少。約翰·吉廷斯著《中國紅軍的任務》和塞繆爾·B.格里菲思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兩書應同兩部中文書一起閱讀，這兩部中文書是臺北國防部戰史局編《剿匪戰史》六卷和薛岳著《剿匪紀實》，內容都詳盡得多。塞繆爾·B.格里菲思的《毛澤東論游擊戰》可以同瓦爾特·拉克爾著《游擊戰：歷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別是第6章）一起閱讀。

毛澤東的著作及傳記在本提要最后一節加以介紹。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傳記資料浩如煙海，但分散在中文資料中，而英文傳記著作尚失于膚淺。史沫特萊著《偉大的道路》敘述朱德的生平，韋爾斯在所著《紅色塵土》中概略地講述了其他若干中國共產黨領袖。

近年，西方學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社會經濟根源。讓·謝諾著《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開拓性專著，接著有彼得·施蘭著《游擊經濟》和安格斯·麥克唐納著《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最近出版的專著是黃宗智等人的《中國共產黨與農村社會，1927—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兩書表現出中國社會動蕩不安問題研究中的一種新趨向。1933年、1934年和1935年《國聞周報》刊載了分別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實撰寫的三組文章，全涉及共產黨運動的社會經濟方面。

王凡西著《雙山回憶錄》概括地闡明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托派分子）的政治社會化和黨的生活。這部回憶錄與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個人經歷》成為姊妹篇。

1977年以后，中國歷史學者對黨史的修正著重史實的核實，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編纂和敘述。像唐寶林著《試論陳獨秀與托派的關系》（《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那樣的解釋性論文罕見。一個新趨向是把土地革命時期的注意力從江西中央蘇區轉移到其他蘇區，如華中師范學院黨史學者編的《鄂豫皖蘇區革命史資料選編》第一卷和《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兩卷。中國也出版一批關于周恩來、賀龍及其他人，甚至包括向來不聞名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包惠僧的書籍。這些趨向有助于矯正黨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狀態——除了毛澤東、江西蘇區、第一方面軍外，別的人也對共產黨運動做出了貢獻。胡華主編的多卷集《中共黨史人物傳》已于1981年在西安開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胡華已修訂他所著《中國革命史講義》（兩卷），尚無別的新民主革命時期的通史出現，取而代之。這個問題在阿里夫·德里克著《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編史學的淵源，1919—1937年》中得到評述。

## 第五章 土地制度

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許多著作論述中國日益惡化的土地狀況。馬若孟著《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第2章對若干這類著作作了評介，并試圖把大多數這類著作分為各種類型。這部研究專著也含有關于20世紀華北農業的內容廣泛的書目。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之諸問題》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國土地狀況研究專著的包羅最豐富的書目。這個時期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亞洲經濟》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41—51頁上作了最好的評介。1953年以后日本學者的研究狀況，可見于蒲地典子、費正清和市古宙三編《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第368—393頁。當然，還可參考史堅雅等編《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三卷。

民國時期可靠的農作物收獲統計資料的兩大來源，是卜凱著《中國土地的利用》和張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農作物收獲統計調查。前者是根據22個省168個縣16786塊農田的樣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統計月報》若干期上的報道，請格外注意該刊1932年1—2月號的匯總報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調查由1934年8月2日設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員會實施。該委員會使用來自各政府部門和大學的人員3000名在22個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這次調查在每個省抽選至少20%的縣，然后從每個縣抽選20%的農戶作為對象，按農戶土地、收入、支出等項進行調查。這次調查的完整詳細數據，除普遍調查結果的匯總表外，因中日戰爭爆發而未發表出來。1937年在南京發表的初步報告是《全國調查報告》。

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部在中國各城市設有分部，分部職員展開數百次鄉村調查和旅行調查，收集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社會及政治狀況的情報。這類報告有許多可見于約翰·揚著《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1945年》。南滿洲鐵道會社從1919年直至1944年末印行《滿鐵調查月報》，該月報載有那數十年數量相當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莊及鄉村地方狀況調查，是關于民國時代農業社會的最好史料來源之一。《調查月報》是另一種日文期刊，1939年創刊，繼續出版到1944年末。

關于學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戰時期（1937—1945年），可參考成都金陵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經濟事實》（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第1—53期）發表的有價值的原始資料。《經濟事實》是重慶戰時政府印行的經濟統計月刊，該刊提供了研究戰時條件下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的學者幾乎尚未觸及的豐富資料。該刊載有諸如谷物銷售、作物生產費用、按農田大小的勞力和資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運輸費用和各社會階級的生活水平之類主題的調查以及卜凱的許多在別處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國農村社會的契約方面，已由陳張富美和馬若孟在《清史問題》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和第3卷第10期（1978年11月）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加以探討。由這兩位作者譯成英文的約50宗契約，展示了農戶之間在其生活周期的過程中種類繁多的資源交換。羅伯特·阿什著《中國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蘇省》是關于20世紀30年代土地租佃和農村收入變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著作。這部研究專著描述了世界經濟蕭條和國內通貨緊縮嚴重打擊農村經濟結構時江蘇省不斷惡化的農村狀況。

通過對全國土地委員會1937年調查報告進行的有創造性的分析，小查爾斯·羅伯特·羅爾估計出16個省170萬農戶收入的分配（《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較》）。羅爾也估計出1952年收入分配，并且發現由于實行共產黨土地分配綱領的結果，收入結構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屬羅爾所認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與耕作和其他獲取收入副業間勞力配置的彈性。然而，在農戶可把更多勞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動的地區，收入分配比較均衡。

按區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農業，是日本研究中國農業的主要學者在最近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國農業之區域發展》。關于滿洲農村，參考中兼勝義著《舊滿洲農村社會經濟結構之分析》。根據1944年進行的調查，今崛誠二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其歷史與革命前夕的現實》非常詳細地描述了華北農村。

一批新獲得的關于中國土地狀況的原始資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學校的200卷論文（包括實地調查筆記），這些論文是在20世紀30年代由就各種各樣農村行政和鄉村問題進行實地調查的碩士學位生撰寫的。這些論文由蕭錚主編，1977年由成文書局以《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叢書形式在臺灣出版。也可查閱臺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據剪報編成的有價值的索引：《民國二○三○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

## 第六章 農民運動

雖然鄧嗣禹著《抗議和犯罪在中國：秘密結社、民眾起義、農民造反的書目》包括中國歷史所有時期，但是，所有近4000條書目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涉及20世紀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除本書第6章腳注（《自發的抗租抗稅》節）涉及的檔案外，僅藏與地方農民斗爭有關的少量檔案。主要見檔1/2/999：《江蘇安徽湖南等省農民抗租斗爭》（1929—1941年）和檔1/2/1000：《蘇皖湘等省農民抗租斗爭》（1929年11月至1930年1月）。雖然比檔1/2/ 1000多得多，但檔1/2/999幾乎不含關于風潮或其他集體暴力行動的資料。然而，該檔提供很多關于爭端、控訴或請求的資料（如佃農請求官員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訴軍隊把出租給他們的土地收回）。美國檔案館提供不太詳細的報告，但頗多提到特別是在美國領事館駐地附近的農民騷亂。特別有用的資料是領事館每月報告（國務院檔：893.00PR），以及檔893.43（秘密會社），893.48（災難、饑荒狀況），893.108（犯罪，匪患）。珍貴的資料也零星分散在檔893.00（政治事務）和893.00B（布爾什維主義）的大量資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國報刊報道的摘要可見于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1927—1937》（見第1012—1033頁）和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以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更詳細一些的農民風潮的報道有時出現在和以上三部資料集一樣具有“左”傾觀點的上海刊物《中國農村》，以及《東方雜志》上。兩種有用的調查是：蔡樹邦著《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和自鳴編《一九三四年中國農村中的各種騷動風潮一覽表》。這些資料大多具有報紙報道的性質。它們一般提供關于每次事件參加人數的概約數字，幾乎沒有提到領導人的社會地位和職務，或參加者的社會成分。學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報告或司法案卷在內的省級或縣級檔案將會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2/2/1130的資料記錄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訟案，但這些案件無一明顯地涉及風潮乃至小騷亂。

在西方，與在中國不同（關于毛澤東時期及毛澤東以后的中國編史學，見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和劉廣京著《世界觀與農民造反》），研究自發的地方農民運動是最近發展起來的。但是，這個領域在迅速發展中，這點由《現代中國》季刊許多期的內容加以證實，該刊是各種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載這個課題的論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一種研究分析法強調農民的社會覺悟和自發斗爭的革命潛力：諸家論著合集《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的許多撰稿者和編者（讓·謝諾）也采用這種研究分析法。拉爾夫·撒克斯頓最近的一部研究論著《中國揭示正確面：農民社會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斷定中國農民在受到共產黨動員之前就獨立自主地轉向革命。與上述觀點不同的見解，由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和呂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奧貝爾等《在中國問題上的冷靜考慮》以及在本書第6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達出來。關于推動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德經濟》）和塞繆爾·I.波普金（《有理性的農民》）所展開的討論的專題論集，見《亞洲社會中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4期）。最后，三部專著研究民國初期在華北活動的一個著名的土匪首領（白朗）和一個也頗著名的會社，進展頗大；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年的中國盜匪活動，特別論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紅槍會》和羅曼·斯拉文斯基著《紅槍會與1926—1927年中國的農民運動》。

研究海陸豐蘇維埃的開拓性專著是衛藤沈吉著《海陸豐：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更多的詳情可見于羅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深入研究彭湃革命經歷和海陸豐蘇維埃的權威專著，是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著《中國第一個蘇維埃領袖彭湃（1896—1929）：中國廣東海陸豐》。這部不朽的三卷論著將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以節略本形式出版。彭湃本人的報告（《海豐農民運動》）生動易懂。他對組織農民的問題和方法的許多見識，可在唐納德·霍洛奇《農民革命的種子》的譯文中得到。關于以后發展（1928—1949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見于本書第4、12和13章的書目提要。讓我們在這里只提兩部有獨到見解的著作：查默斯·約翰遜著《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和韓丁著《翻身：一個中國村莊革命的記錄》。像《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那樣最近20年來受到那么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內）那么多討論和批評的“中國問題著作”不多，但是，引起無限的討論是真正有創見的著作的特權。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著重指出，在共產黨動員農民中經濟因素高于愛國因素。動員農民是并不容易的工作，這點為韓丁著《翻身》所動人地說明，《翻身》是一部敘述中國北方村莊革命的材料豐富的第一手寫實作品。盡管著者持明顯的同情態度，這部著作仍然展示了一部優秀著作的極度又愛又憎的矛盾心理。

##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發展

20世紀地方政府研究的檔案基礎尚未建立起來。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日將通過順天府（直隸）檔案加以研究。順天府檔案逾12000卷，涉及職官制度、民政、立憲維新、司法制度、金融貨幣及其他10個主題，時期從18世紀20年代到1911年。這批由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豐富史料等待編目和保管，如何利用這批資料尚不明。關于四川巴縣檔案，總類目尚得不到，可是研究者已開始利用這批資料。關于國立臺灣大學所藏清代淡水廳和新竹縣檔案，戴維·C.巴克斯鮑姆著《1789—1895年淡水和新竹審判層次上的民事訴訟程序和實務的若干方面》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0卷第2期（1971年2月）第255—279頁有所涉及。近代地方行政的發展可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開始研究，該館藏有1911—1949年的資料，但利用那類館藏資料尚有限。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都已開始按某些主題大批出版館藏資料。例如，晚清立憲制度的地方自治部分可以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的《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進行研究。

晚清以來地方政府研究的規范性基礎，可在如《大清光緒新法令》之類匯編和在費正清和劉廣京著《近代中國》書目3.2下所列的類似書籍找到。問題是發現這些法令應用于實際到什么程度。就這一用途來說，政府機關的公報特別是地方行政機關的公報，表明政府如何反映地方具體情況。《江蘇省政府公報》之類出版物，在余秉權等編《關于20世紀中國的研究資料：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物注釋目錄》第71頁以下各頁中述及。政府年鑒往往可用于相同用途。

擴大的地方社會調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運作的豐富資料。日文的地方實地調查成果在約翰·揚著《南滿洲鐵道會社調查活動，1907—1945年》中有介紹。最好的第一手資料大概是從20世紀40年代初在河北和山東某些地方進行的逐村調查，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習慣調查》。除訪問記錄外，編入晚清以后關于地方政府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的政治方面，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著《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華北農村，1900—1940年》加以研究。這個主題的日文研究著作，也在杜阿拉的著作中被廣泛研究。30年代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所編實地調查報告簡編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資料：《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計劃項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許多地方行政發展的環境。也可查閱刊載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張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東地方自治》和王樹槐著《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

地方士紳政治化研究應從張朋園著《立憲派與辛亥革命》和肖邦齊著《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20世紀初期的浙江省》著手。關于地方自治運動，孔斐力著《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與動員問題》整體地對它進行研究，該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近代時期地方名流如何與政府相互影響，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和第4集（1978—1979年）中有所論述。特別是見之于艾愷、蘇珊·曼·瓊斯和孔斐力的論文（如在書目所列）。有影響的帝國背景研究專著是和田清著《中國地方自治發展史》，該書1939年初版，1975年再版時附山根幸夫所編的重要新書目。蕭公權著《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和瞿同祖著《中國清代地方政府》是仍然有價值的清代背景入門書。

關于地方區域政權制度，留有許多卷大多是綱領性的、自吹自擂的資料。不過可以看出這類集子的很多言外之意，如山西村政處編《山西村政匯編》，該匯編編集1916—1927年山西省從省發至縣的文件。關于廣西，見李友華著《地方和國家：1925—1937年中國政治斗爭中的桂系》。

國民黨地方行政及其背景，在陳伯心著《中國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和錢端升等著《民國政制史》中得到介紹。關于縣政，程方著《中國縣政概論》引用和綜合很多現有的直到1939年的文獻；施養成在1946年就省政寫成的綜合性著作《中國省行政制度》也是這樣做的。民國初期背景研究，有馬場鍬太郎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1927年第12期，第81—317頁）。展示性的制度研究，有吳應銧著《民國初年地方知事的職業：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現代亞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第217—245頁]。董修甲在他所著的《中國地方自治問題》中概述國民黨認為的地方自治制度。著名的國民黨綱領制定者李宗黃著《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論述被竭力推薦的“新縣制”。

關于鄉村建設運動的地方政治，基本著作是艾愷著《最后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于現代性的困境》。這方面豐富的中文文獻，可涉獵這部著作所附書目和上面引述的余秉權著《關于20世紀中國的研究資料》。查爾斯·M.海福德在他所著的《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中研究定縣個案。

## 第八章 學術界的成長，1912—1949年

學術界包含個人和機構，其歷史記載在各種各樣涉及思潮、政治傾向和社會文化環境其他方面的綜合文獻中。我們在這里只能為本章專就高等教育列出基本資料。

北京、南京和臺北以及東京、倫敦、巴黎和華盛頓的政府檔案，在這個領域比較而言仍然未被發掘。設在紐約州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館提供美國援助，特別是在醫學及其他科學方面的資料。

已出版的文獻很多。舒新城早年編集的《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四卷收羅從1898年到1928年國民教育創始期間的史料。舒新城去世后出版的舒新城編三卷《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是一部與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羅1852—1922年的史料。1976年出版的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四卷轉載清末至1948年史料數千頁，使該書成為一部包羅最廣的資料集。丁致聘著《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提供直到1933年的每周記事。王云五著《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提供1897—1972年（1949年以后關于臺灣）的資料和文獻。林子勛著《中國留學教育史》也編入大量資料。

在雜志類中，有商務印書館1909年在上海創刊的《教育雜志》和中華書局1912年創刊的《中華教育界》。江蘇省教育共進社主辦，最初由蔣夢麟編的《新教育》，1919年創刊。

關于直到1930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簡明概括的綜合評述，是王鳳喈著《中國教育史大綱》。關于1930年以后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贊助下出版的調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抗戰前十年之中國》有若干關于高等教育機構發展的章節；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寫的章節。莊澤宣編《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是《中華教育界》雜志新1卷第1期（1947年）特輯。教育設施的官方統計數字收在教育部統計科刊行的《二十一（二、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內。有兩部教育年鑒出版：《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六卷在1934年出版，有教育部長王世杰的前言；《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在1948年出版，有朱家驊的前言。

自1981年以來，臺灣陸續出版《學府紀聞》叢書，由一流大學的單卷校史組成。第一批出版的，有《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私立燕京大學》。內容包括各種各樣資料，從正式大事記、同時代人的文章、報告和演講直到紀念文章和個人回憶，回憶大多是軼事趣聞。臺北《傳記文學》月刊和傳記文學社出版《傳記文學》叢書，收民國時期人物傳記，包括許多教育界人物傳記：王文田著《張伯苓與南開》（叢書第26種，1968年）；梁實秋著《談聞一多》（叢書第3種，1967年）；羅家倫著《逝者如斯集》（叢書第14種，1967年）；《蔡元培自述》（叢書第22種，1978年）；胡適等著《丁文江這個人》（叢書第21種，1979年）；楊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叢書第98種，1980年）。

關于蔡元培對近代中國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貢獻，見陶英惠著《蔡元培年譜》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和第7集（1978年）刊載的兩篇詳細文章。除廣為人知的《蔡元培全集》外，還有1980年出版的集中蔡氏有關教育論述的專集，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文選》。若干校友會刊物如《清華校友通訊》載有有用的校史資料。英文的教育界人物的第一手記述有蔣夢麟著《來自西方的潮流》。

在華教會大學的歷史及其與中國環境的相互影響，在杰西·G.盧茲著《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有論述，也見于安東尼·C.李：《中華民國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各教會大學校史，已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刊行，雖然在質量上參差不齊，但這類出版物有兩種用途，一是提供主要根據差會檔案和私人文件撰寫而成的19世紀以來在華教會教育事業概要，二是展示教會大學教育家和他們的年譜編寫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態度分歧。這類出版物有：查爾斯·霍奇·科貝特著《齊魯大學》（1955年），克拉倫斯·戴著《之江大學》（1955年），艾德敷著《燕京大學》（1959年），瑪麗·蘭伯頓著《上海圣約翰大學，1879—1951年》（1955年），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著《金陵女子文理學院》（1955年），L.埃塞爾·華萊士著《華南女子文理學院》（1956年）和劉易斯·C.沃姆斯利著《華西協合大學》（1974年）。也參見魯本·霍爾登著《1901—1951年中國大陸的雅禮和湘雅》。關于最近出版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影響的分析專著，有彼得·巴克著《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和菲利普·韋斯特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1952年》。

日本對中國文化教育的影響的全領域，已由日本大學者實藤惠秀全面開拓，他的1939—1945年早期著作（見費正清等著《日本的近代中國研究》條目6.8.1—6.8.5）在他1960年出版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達到其巔峰。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實藤惠秀在東京的藏書仍然是這個研究領域的主要資料來源，在任何其他國家無類似的富源。汪一駒著《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是一部導引研究的專著，而中國留學生的回憶錄仍然是一個未被發掘的富源。薩利·博思威克著《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在第200—201頁列出這類回憶錄約50種的書目。

在近來的出版物中，這個研究領域最有用的起始著作，除菲利普·韋斯特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1952年》外，還有北京1965年編成，1981年出版的詳細清華校史《清華大學校史稿》（約翰·伊斯雷爾選刊了其中一部分）和賈祖麟在1981年出版的研究專著《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敘事史》。

## 第九章 文學趨勢：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般狀況已在本書上卷《文學的趨勢Ⅰ：對現代性的追求》的書目介紹中加以討論，本書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寫時未獲得的更多資料信息。

自1976年“四人幫”垮臺以來，學術活動的復蘇導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的豐收。（按照中國史學界年代分期，“現代”指1917—1949年，“當代”指1949年至現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種是現代文學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學史料》，重點登載了茅盾的回憶錄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和《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此外還有若干專門的魯迅研究刊物（1981年為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大部頭《中國文學家詞典》正由北京語言學院刊行：現代篇第一卷在1978年以初稿形式出版，載有405位文學家的傳記；第二卷在1982年出版，載有582人的傳記。本章提到的公認為優秀的文學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瑤和劉綬松所著的文學史著作，已經再版印行，一批新專著也已出版。

一個新的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服務的全國檔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來的檔案中心將設在北京附近16世紀建成的一個古廟內。據《中國文學》（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館藏“將包羅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現代作家、理論家、翻譯家和文學活動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參考影片、錄音帶和錄像帶，以及他們各種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資料”（第137頁）。現在已經開始實施的也許是最具雄心的計劃，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乙種）叢書，該叢書將收有關于文學運動、社團、爭論以及關于作家及其作品的資料，附刊載在報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這個大項目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下十余所名牌大學的學者的一項共同研究計劃。這套叢書完成時（計劃在1985年完成），數量可達數百卷，將成為從事這個領域研究的中國及西方學者和研究者的最有價值的資料寶庫。

然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釋質量不一定配得上極大的數量，雖然1976年以后的著作表現毛澤東思想意識少些，但是沒有放棄過去30年連續不斷的思想運動形成的基本馬列主義框架。近來出版的大多數專著仍然往往會著重研究30年代文學論爭和黨領導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在延安文學界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學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別是在戰時重慶和淪陷區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廣泛的研究。在現代時期的作家中，魯迅仍然是占據政治上奉為神圣的地位的杰出偉人，雖然少數研究專著（如劉再復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愛讀的傳記《魯迅傳》）試圖從人的角度更客觀地描繪魯迅。

近來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魯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在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受到高度評價的作家——張天翼、吳組湘、沈從文、錢鍾書和張愛玲——似乎在中國文學史中默默無聞。30年代初一度發展起來的詩的現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幾乎沒有受到什么注意，如今才開始在中國吸引學者興趣，部分地是近來集中在“朦朧詩”的年輕實踐者的爭論的結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達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詩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學更大的遺產的一部分，這部分文學遺產在臺灣準許閱讀，而其他大多數作家，包括魯迅，被目為“共產黨”，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頗為大膽的學術叢書，周錦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為數約30卷，是機智地避過官方禁令的初次嘗試，雖然各卷的學術質量參差不齊。

因此，在推進作為社會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學，而不是主要作為政治意識和政策反映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數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正在迎接這種挑戰，他們近年已能同他們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觸。從這類接觸中得到好處的近年（出版或準備出版）的研究專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儀慈著《丁玲的小說——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意識和敘事》；葛浩文著《蕭紅評傳》（據作者英文專著《蕭紅》擴充和修訂）；杰弗里·金克利即將出版的一部關于沈從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學的學位論文《沈從文對中華民國的幻想》的修訂稿）和胡志德著《錢鍾書》。這些學者不是訪問過研究對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對象生活所在地點進行研究，或兩者兼而有之。繼這些學者之后，一些美國大學研究生，已就吳組湘、老舍、蕭軍、艾蕪和丁玲這樣一些人物和就自傳文學和象征派詩這類一般論題，在中國進行研究或訪問。

然而，在西方學者中，集中的一般領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學。這是可以理解的，這是由于盡管社會政治環境令人窒息，這個時期的作家卻多產，并且藝術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聯盟的文學論戰和活動已不為西方學者廣泛研究，保羅·皮茨科維奇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瞿秋白的影響》和安東尼·凱恩最近發表的博士學位論文《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的文學政策》是顯著例外。40年代時期，當時中國現代文學卷入戰爭和革命中，在西方學術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戰時作品有待進一步研究和翻譯。茅盾的小說，如《蝕》和《腐蝕》，尚未翻譯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說《寒夜》最近才由內森·毛翻譯成英文。重慶戰時戲劇尚是一個有待研究的極重要課題。淪陷區上海文學界在愛德華·岡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歡迎的繆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中，在學術上初次得到論述。延安文藝界成為戴維·霍爾姆的研究課題，此人曾就延安秧歌運動和魯迅遺產寫過論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邦尼·麥克杜格爾根據較早的1943年文本的審慎的新譯本。本章概括地探討的戰后電影業，已由保羅·皮茨科維奇、保羅·克拉克和其他人作為社會史的一種資料加以研究，電影藝術價值和文學價值仍然有待評估。（杰伊·萊達著《電影》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電影的著作，有嚴重缺點。）總之，這整個時期為繼續進行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內容豐富的領域。

一個新領域的發展也可由研討會和會議之類集體學術活動判斷。自1974年在哈佛大學舉行開拓領域的研討會和會議——成果為《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默爾·戈德曼編）——以來，已舉行過六次國際會議，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時期有關。這些會議的第一次是1980年6月在巴黎舉行的研討會，由羅伯特·魯爾曼組織。1982年以《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為題出版的會議論文集，專門題獻給丁玲和艾青（后者親自參加了會議），載有歐洲、美國及中國學者寫的論文29篇。第二次國際會議專門討論“魯迅及其遺產”，198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亞州阿西洛馬爾舉行。由李歐梵編集的會議論文集目前在準備中，收論文12篇，評價魯迅對中國現代文學、政治和思想的范圍廣闊的影響及其在世界文學中受接納的程度。最近的學術會議是1982年12月在檀香山舉行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批判探討”研討會。約20位學者討論運用西方批判理論分析“五四”時代早期至現在的有特色的中國短篇小說的可行性。研討會標志了首次把精選小說的內在結構作為文學文本而不是作為歷史文件或作者的傳記資料來進行持續的探討。

學者也可利用載于溫斯頓·L.Y.楊和內森·K.毛編的《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和欣賞指南》的書目提要；唐納德·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翻譯書目，1918—1942年》。

包羅最豐富的現代中國小說的英譯樣本是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年》，現代中國詩的樣本是許芥昱譯編《20世紀中國詩集》，現代中國戲劇的樣本是愛德華·岡恩編《20世紀中國戲劇選集》。

第10章書目提要，見前書目提要2和10。

## 第十一章 中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盡管緊張并明顯重要，抗日戰爭時期仍然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未開發的部分。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最佳的全面寫照，大概仍然是當時在中國采訪的兩個美國記者寫的著作：白修德和賈安娜著《中國雷鳴》。這部著作批評國民黨，但作出的總評價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學術研究著作證實。關于這一時期的包羅最豐富的著作是，現代中國著作最豐富的史學家吳相湘撰寫的《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兩卷。雖然披露的資料有用，但是吳著在批判解釋或分析上顯著不足。分析較充分并有有關國民黨戰時勢力的有價值史料、特別研究軍隊派系傾軋和政治敗壞的影響的一部著作是，齊錫生著《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易勞逸在他所著《失敗的根源：國民黨中國在戰爭和革命中，1917—1949年》中也持批判態度看待國民黨。質量上和對國民黨評價上各異的論文專題集，有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在當地曾對國民黨作過一些最銳利的分析，他的戰時文電稿已由周錫瑞編成《在中國的失機》一書出版。另一個美國人，格雷厄姆·佩克，從普通人的有利地位評價戰時中國；他的著作《兩種局勢》是一部罕見和令人愛讀的作品，充滿諷刺幽默和與中國老百姓的同感。

關于抗日戰爭的軍事方面，劉馥著《現代中國軍事史》提供良好的概括研究。迪克·威爾遜著《兩虎相斗之時：中日戰爭史實，1937—1945年》是一部普通讀者愛讀的著作。敘述各次戰役頗詳細的一部國民黨官方著作是許朗軒和張明凱編《中日戰爭史，1937—1945年》；這部作品是胡璞玉（音）主編的國民黨國防部出版的多達101卷的中文《抗日戰史》的要略。若干較短的中文軍事史可以利用，其中有何應欽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和國防部戰史局編《中日戰爭史略》。

美國在華的軍事作用，已在美國陸軍部戰史處主持下由查爾斯· 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執筆寫成的三卷史給予接近定論的論述。這部充分研究英文文件后寫成三卷史的書名是：《史迪威赴華使命》、《史迪威指揮問題》和《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史迪威將軍是戰時在中國的主要美軍將領，是巴巴拉·W.塔奇曼榮獲普利策獎的傳記著作《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年》的傳主。在廣闊的政治格局中研究美國在華作用的著作，有鄒讜著《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和更近出版的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關于中日戰爭日本一方的著作在本書第1章和第10章書目提要中提到。

抗日時期國民黨中國國內政治史甚少受到學者注意。政治制度有三部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蔣介石的中國：政治研究》，錢端升著《中國的政府與政治》和勞倫斯·K.羅辛格著《中國的危機》，后者是一部面寬而不太詳細的著作。

抗日戰爭的經濟方面，特別是通貨膨脹，在三部研究專著中得到熟練的處理。張嘉璈著《惡性通貨膨脹，1937—1945年中國的經驗》，周舜莘著《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年》，和楊格《中國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楊格曾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顧問，也寫過一部有關美國與戰時國民黨中國的經濟牽連的極佳歷史著作，《中國與援助者，1937—1945年》，廣泛地提供很多關于中國經濟的資料。程玉桂著《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948年的歷史綜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現代經濟部門的簡明而資料充實的著作。

日本在控制區域的經濟政策及其激起的反應，是淺田喬二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之中國——中國被占地區經濟之研究》的研究課題。我們對抗戰時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例如，文化和社會方面，幾乎沒有被觸及，而大有希望用來闡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詳細研究，40年代尚未在國民黨區域開始。

## 第十二章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37—1945年

本章書目提要不擬重復在本書第4章書目提要或在上卷書目提要中已經提過的書目。也擬避而不提在本書第14章書目提要中論述的毛澤東著作和傳記研究專著。

涉及1921—1949年整個時期的大規模文獻匯集尚告闕如。康拉德·布蘭特、史華慈和費正清著《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是一部最早的探索性著作（1952年），但仍然是一部有用的入門著作。對于趙國俊著《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年》，這種評價也大致同樣正確。到60年代，薛君度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第一卷，1921—1937年；第二卷，1937—1949年）根據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豐富的收藏，提供了利用中文資料的指南。也有用的編著是路康樂等編《中國紅軍，1927—1963年：有注釋的書目》。

黨史文獻及其他資料在中國已以逐漸加快的速度出版。然而，由于這個主題有許多敏感性，出版物落后于大多數傳統學術領域，而且有些書籍限“內部發行”。一部專門的黨史定期刊物是《黨史研究》。兩套不定期出版的叢書是《革命回憶錄》和《黨史研究資料》。此間在研究中使用的一部跨越30年的八卷文獻集是《中共黨史參考資料》。類似的資料集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三卷。

第二次統一戰線的發展是萊曼·P.范斯萊克著《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研究的課題。第二次統一戰線發展中最有戲劇性和決定性的事件——西安事變——當時由貝特蘭《中國的第一幕：西安兵變真相》加以報道，最詳盡的著作是吳天威著《西安事變：現代中國史的支點》[也見吳天威載在《現代中國》季刊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上的西安事變新史料綜述]。

為系統地提出有關20世紀這第一次大農民革命的理論，查默斯·約翰遜著《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革命中國的出現，1937—1945年》作了開拓性工作。反對約翰遜所持的中國共產黨勝利主要基于戰爭引起的愛國動員而不是基于中國近代社會內的革命需要的論點的，有謝爾登著《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這部著作從研究陜甘寧邊區得出一般結論。闡明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第三部著作是，片岡鐵哉著《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片岡鐵哉認為中國共產黨給中國農村長期存在的基層組織和非政治性的組織網周圍加上了“鋼框”；而在中國城市，民族主義的責任使蔣介石既不能采取有力的反共行動，也不能與日本媾和。這些早期論述可被認為充其量也不過是部分正確，因而作為全面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一些研究共產黨根據地的著作提供歷史觀點：斯蒂芬·艾夫里爾著《棚民與長江多山地帶的開拓》和《多山地帶的革命：江西省共產黨運動的興起》，羅伯特·馬克斯著《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海豐縣社會變遷，1630—1930年》，和琳達·格羅夫著《革命中的農村社會：高陽地區，1910—1947年》。研究各敵后根據地的博士學位論文有：凱思林·哈特福德和卡爾·多里斯研究晉察冀邊區，陳永發和格里戈爾·本頓研究華中根據地，和戴維·保爾森研究山東根據地。補充謝爾登的陜甘寧根據地研究的，有彼得·施蘭著《游擊經濟：陜甘寧邊區的發展，1937—1945年》和由安德魯·沃森譯為英文的毛澤東著《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抗戰時期在共產黨根據地內及周圍的許多觀察家的報告，集中在戰爭頭幾年，然后集中在最后兩年。戰爭中期最困難的幾年，西方人士幾乎沒有觀察敵后根據地，林邁可的著作，特別是《不為人知的戰爭：華北，1937—1945年》除外。從在中國出版的關于這個時期的大量出版物中，我們在這里只能列舉如《彭德懷自述》和薛暮橋著《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之類的樣本。1984年8月召開的抗日根據地研究國際會議將出版更多的著作。

關于在臺灣的調查局檔案資料的種類和使用指南，見多諾萬、多里斯及沙利文著《臺灣調查局檔案中的中國共產黨資料》。官方日本軍事史《華北治安戰》兩卷充滿有價值的資料。每年出版一卷的《美國對外關系》載有關于中國共產黨的資料很多，特別是中共與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關系的資料。詹姆斯·B.里爾登-安德森著《延安與列強：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的淵源，1944—1946年》中的看法，被多蘿西·博格和瓦爾多·海因里希斯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系》的幾篇論文所沿襲，直寫到1949年。

##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國共沖突

前兩章分別關于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運動的書目提要已記述到現在為止可利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和內戰時期研究的主要中文資料。學者可有把握地期望更多的文獻和研究著作從南京、臺北和其他各地的檔案中出現。

1949年以前軍事史諸方面的研究著作選已在美國陸軍部戰史處主辦下翻譯成英文。這些研究著作原來是在臺灣根據當地可利用的軍事檔案資料寫成的。這些著作選可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縮微膠卷得到，標題為“英譯中文軍事研究著作和資料”。

也可從國會圖書館縮微膠卷得到的資料是1945—1949年時期美國領事館的報刊譯文系列資料。這個系列包含若干國民黨城市的報刊和共產黨控制區的電臺廣播，但包含這個時期共產黨的新聞出版物的材料不多。最重要的共產黨新聞出版物是《解放日報》和《群眾》雜志。這個系列也沒適當地包含新聞雜志。這個時期的最佳英文期刊是《密勒氏評論報》。主要的中文時事評論期刊是上海出版的《觀察》周刊，由于該刊的可靠的軍事聯系，也被認為是這個時期有關戰爭發展的少數可利用的資料來源之一。上述資料來源，連同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對外關系》，反映在國民黨城市獲取的有關共產黨和戰爭本身的資料不多，這是當代歷史的一個事實，后來的歷史學家，當他們查完現在可獲得的有關這兩個題目的大量檔案資料時，可能疏忽。

關于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對華政策，正如本書目提要2/10指出的，已有大量著作。關于“喪失中國”的歷史研究問題，最近的一部發人深思的研究專著是韓德著《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該專著把來華基督教差會、中國人反差會事件、美國排華運動及中美外交關系置于共同的框架之內。關于40年代美國在華戰爭活動的基本敘述，有查爾斯·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的官方中緬印戰區史三卷。關于這個時期的最一般的背景讀物，有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年》。一部附有長達60頁的關于美國手稿、政府檔案、發表文書、情報報告、學位論文、口述歷史、文章及著作的書目的著作，是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著《屈辱的模式：中美關系和承認的爭論，1949—1950年》。

##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在這個專門主題下，我們擬避免重復本書書目提要4和12提到過的著作。關于這個變化不定的主題，特別是毛澤東著作的全文，可以獲得的文獻資料，70年代初以來，數量上至少增加了兩倍。新歷史資料的大量出現，使我們關于毛澤東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看法。雖然他在1949年以后的政策最受人懷疑，但是，若干更早期的問題也已出現。例如，毛澤東改信馬克思主義的年月，他在1930年對李立三路線和在1933年對福建反叛者的態度，在中國學者中，特別是在《黨史研究》之類內部刊物中，是極其熱烈的討論的對象。然而，關于毛澤東直到1949年的思想發展的研究，主要變化在于新資料的獲得。

在70年代初以前，可利用的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毛澤東思想的資料，主要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各種文字的）《毛澤東選集》四卷，加上可在中國以外的圖書館找到的從20年代到40年代發表在書籍和期刊上的毛澤東著作。雖然屬于第二類的頗大一部分毛澤東著作可在什么地方得到，但是，那些資料分散在各個中心，系統地利用那些資料費時費錢太多，簡直不可能利用。第一個大突破是在1970—1971年，10卷版1917—1949年的毛澤東著作在東京出版：《毛澤東集》。可惜，《毛澤東集》印數很少，因而在大的中國學圖書館外不能為學者廣泛利用。然而，竹內實教授及與他聯合從事這項事業者不僅能照新的版本說明勘正少數錯誤再次印行原十卷《毛澤東集》，而且開始出版包含全新資料的若干補卷（《毛澤東集補卷》）。截至1984年10月，已出版六卷，以后每隔兩個月出版一卷。最后，共出版補卷八卷，不是原來宣布的五卷，另加年表卷，全書將達19卷。[[2]](#_2_Quan_Bu_Chu_Qi_Gong_20Juan)

同時，中國方面已經開始出版一些毛澤東著作，特別是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時期的著作，而且也包括1921—1949年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些可在內部發行的如《一大前后》和《新民學會資料》之類編集中找到。然而，在負責編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和陳云等領導人著作的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主持下，為紀念毛澤東90誕辰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及其他以專題編輯的已出版或將出版的書信選集內，有許多極使人感興趣的以前不為人知的書信。

這些情況至少部分地使全部原有的毛澤東研究著作（甚至包括最近出版的著作）陳舊過時。然而，盡管文獻應用上出現空白，但是，許多作者已經以使人思考的方式理出基本問題，并且勾畫出對指導今后研究有很大的價值的假說。下面是一小批精選的具有某些重要貢獻的著作。

在以一貫方式研究這個直到1949年時期的全部或頗大部分的著作中，最近出版的思想最豐富的和最不偏不倚的著作是，布蘭特利·沃馬克著《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年》。雖然這部著作寫到1935年，而且未能利用1917—1921年的一些主要的資料，但是它是現有的介紹毛澤東在思想形成年代的思想的最佳著作。約翰·布賴恩·斯塔爾著《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受到著者把從20年代到70年代毛澤東寫的每部著作作為一個單體處理的傾向影響，大為減色，從這些單體，著者可隨意引用文句來說明著者基本上以不顧史實的方式想象出來的各個方面。然而，這部著作包含有創見的注釋和有用的編輯而成的資料。另一部研究整個毛澤東1949年以前思想發展及1949年以后思想的著作，是熊玠著《意識形態與實踐：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這是一部使人感興趣和有創見的解說著作，即使這部著作把思想（如在毛澤東思想中）作為一種與西方通常的主義（如馬克思主義）種類不同的思想活動樣式以與中國傳統模式相一致的見解，是引起爭論的。（就中國人來說，他們堅決認為毛澤東的思想的確構成體系。）熊玠這部研究專著無疑是這方面的最佳著作之一。宣道華著《毛澤東的政治思想》和《毛澤東：初步再評價》在頗大程度上均研究1949年以前的毛澤東的思想，但是，在文獻應用上略陳舊過時。

關于毛澤東早期思想的唯一最佳著作，是李銳著《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書中有幾章專門敘述1915—1927年的毛澤東的思想。其他著作有：魏菲德著《歷史與意志：毛澤東的思想的哲學觀點》，主要研究毛澤東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時期的思想，雖也兼及文化革命；和喬治·曼蒂奇著《湘江思潮》，這是一部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雜志的意大利文全譯本。史華慈著《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也提供深刻而敏銳的見識，盡管有文獻基礎過時30年所造成的種種缺陷。最后，雷·懷利著《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是現有的研究毛澤東延安時期思想的最佳著作。這部著作思想豐富，并且充分利用文獻，集中研究毛澤東的思想發展和毛澤東的思想在其中形成的政治斗爭基質之間的關系問題。

[[1]](#_1_14)我們感激密執安大學蒲地典子教授在參考文獻中日文圖書的書目方面的協助，感激普林斯頓大學吉爾伯特·羅茲曼教授在蘇聯研究著作方面的意見。

[[2]](#_2_14)全部出齊共20卷。——譯者

# 參考書目

中國和日本的出版社

Cheng-chung正中（臺北）

Chuan-chi wen-hsueh傳記文學（臺北）

Chung-hua（CH）中華（各主要城市）

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

Commercial Press（CP）商務印書館（各主要城市）

Jen-min人民（上海及其他城市）

San-lien（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上海）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東京大學出版會

Wen-hai文海（臺北）

大量文獻的匯編一般是由委員會、部門或其他機關編成的，因此，按匯集者或編者排列這類匯編會使讀者遇到單詞量多而信息量不多的詞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寧愿按匯編名排列，然后在條內把匯集者和編者列出。

本書引用著作

[1] Abe Yoshinori，trans.‘Anki tochi chōsa nikki’安徽土地調查日記（A diary of land investigation in Anhwei），part 2，in SMR：Mantetsu chōsageppō，19.1（Jan.1939）118—36

阿部良忠譯：《安徽土地調查日記》，第2部分，《滿鐵調查月報》，第13卷第1期（1939年1月）

[2] Abend，Hallett et al.Can China survive？New York：Ives Washburn，1936

亞朋德等：《中國能生存下去嗎？》

[3] 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 yuan

中央研究院

[4] Acadmy of Social Sciences.See Chung-kuo she-hui k’o-hsueh yuan

中國社會科學院

[5] Ai Ssu-ch’i.Ta-chung che-hsueh（philosophy for the masses）.Shanghai Tushu sheng-huo，1936

艾思奇：《大眾哲學》

[6] Ai Ssu-ch’i，Che-hsueh yü sheng-huo（Philosophy and life）.Shanghai：Tushu sheng-huo，1937

艾思奇：《哲學與生活》

[7] Alitto，Guy S.‘Rural elites in transition：China’s cultural crisis and the problem of legitimacy’，in Susan Mann Jones，ed.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3（1978—9）218—75

艾愷：《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收入《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

[8] Alitto，Guy S.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艾愷：《最后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于現代性的困境》

[9] Altman，Albert A.and Schiffrin，Harold Z.‘Sun Yat-sen and the Japanese：1914—16’.Modern Asian Studies，6.4（Oct.1972）385—400

艾伯特·A.奧爾特曼和史扶鄰：《孫逸仙與日本人：1914—1916年》，《現代亞洲研究》，第6卷第4期（1972年10月）

[10] Amano Motonosuke.Shina nōgyō keizai ron支那農業經濟論（On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Tokyo：Kaizōsha改造社，vol.1，1940 and vol.2，1942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經濟 論》，2卷

[11] Amano Motonosuke.Shina nōson zakki支那農村雜 （記 Miscellaneous notes on Chinese villages）.Tokyo：Seikatsusha生活社，1942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村雜記》

[12] Amano Motonosuke.Chūgoku nōgyōno shomm ondai中國農業の諸問題（Problems of Chinese agriculture）.2 vols.Tokyo：Gihōdo技報堂，1952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之諸問題》，2卷

[13] Amano Motonosuke.Chūgoku nōgyō shi kenkyū中國農業史研究（A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griculture）.Tokyo：Ochanomizu，御茶の水，1962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

[14] Amano Motonosuke.Chūgoku nōgyō no chiiki teki tenkai中國農業の地域的展開（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Ryūkei shosha 龍溪書舍，1979

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之區域發展》

[15] Amerasia：a monthly analysis of America and Asia.New York：Amerasia，Inc.11 vols.March 1937—July 1947.Superseded China Today（subtitlevaries）.Ed.by P.Jaffe and others

《亞美雜志》，紐約，11卷，1937年3月至1947年7月，替代《今日中國》，P.賈菲等編

[16] The Amerasia papers：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2 vols.Prepared by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U-nited States Senate.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

《亞美雜志論文集：中國災難的線索》，2卷，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調查國內安全法及其他國內安全法律施行小組委員會編

[17] Amoy University.See Hsia-men ta-hsueh

廈門大學

[18] Arkush，R.，David.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1

R.戴維·阿庫什：《費孝通與革命的中國的社會學》

[19] Asada Kyōji.Nihon Teikokushugika no Chūgoku-Chūgoku senryō chiiki keizai no kenkyū日本帝國主羲下の中國—中國占領地域經濟の研究（China under Japanese imperialism：studies of the economy of occupied China）.Tokyo：Rakuyū shobō 樂游書房，1981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之中國：中國被占地區經濟之研究》

[20] Ash，Robert.Land tenure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Kiangsu province in the 1920s and 1930s.London：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1976

羅伯特·阿什：《中國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蘇省》

[21] Atwell，William.‘Notes on silver，foreign trade，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CSWT 3.8（Dec.1977）1—33

威廉.阿特韋爾：《關于銀兩、對外貿易及晚明經濟的筆記》，《清史問題》，第3卷第8期（1977年12月）

[22] Aubert，Claude，Bianco，Lucien，Cadart，Claude，and Domenach，Jean-Luc.Regards froids sur la Chine.Paris：Editions du Seuil，1976

克洛德·奧貝爾、呂西安·比昂科、克洛德·卡達爾和讓-呂克·多梅納克：《在中國問題上的冷靜考慮》

[23]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Semi-annual.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Contemporary China Center.1979

《澳洲中國學報》，半年刊，堪培拉，1979年

[24] Averill，Stephen C.‘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Jiangxi province’.Cornell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2

斯蒂芬·艾夫里爾：《多山地帶的革命：江西省共產黨運動的興起》，康奈爾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

[25] Averill，Stephen C.‘The shed peop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Yangzi highlands’.Modern China，9.1（Jan.1983）84—126

斯蒂芬·艾夫里爾：《棚民與長江多山地帶的開拓》，《現代中國》，第9卷第1期（1983年1月）

[26] Baba Kuwatarō.‘Shina chihō gyōsei seido no kenkyū支那地方行政制度の研究（The local government system of China）.Shian kenkyū支那研究（Research on China），1927.12，81—317

馬場鍬太郎：《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1927年第12期

[27] Bachrack，Stanley D.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China Lobby’politics，1953—197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萬委員會：“援華院外活動集團”政治，1953—1971年》

[28] Baker，John Earl.‘Fighting China’s famines’.Unpublished manuscript，1943

貝克：《與中國的饑荒斗爭》，未刊文稿

[29] Balazs，Etienne.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variations on a theme，trans.by H.M.Wrigh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白樂日：《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個主題的種種變奏》，H.M賴特譯

[30] Bamba，Nobuya.Japanese diplomacy in a dilemma：newl ight on Japan’s China policy，1924—1929.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Kyoto：Minerva Press，1972

馬場伸也：《進退維谷的日本外交：關于日本對華政策的新見解，1924—1929年》

[31] Barnett，A.Doak.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New York：Praeger，1963

鮑大可：《共產黨接管前夕之中國》

[32] Barnett，A.Doak，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

[33] Barrett，David D.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

包瑞德：《迪克西使團：美軍觀察組在延安，1944年》

[34] Bartlett，Beatrice S.‘The vermillion brush：the Grand Council communications system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in mid-Ch’ing China’.Yale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0

白彬菊：《朱筆：中國清代中葉的軍機處上奏制度與中央政府決策》，耶魯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

[35] Bastid，Marianne.‘La diplomatic francaise et la revolution chinoise de 1911’.Revue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16（April-June 1960）221—45

馬里安娜·巴斯蒂：《法國外交與中國辛亥革命》，《現代史和近代史雜志》，第16期（1969年4—6月）

[36] Bastid-Bruguière，Marianne.‘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CHOC 11.535—602

馬里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社會變化的潮流》，《劍橋中國史》，第11卷

[37] BDRC.See 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中華民國傳記詞典》

[38] Beal，John Robinson.Marshall in China.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70

約翰·魯賓遜·比爾：《馬歇爾在中國》

[39] Beattie，Hilary J.‘The alternative to resistance：the case of T’ung-ch’eng，An-hwei’，in Jonathan D.Spence and John E.Wills，Jr.，eds.From Ming to Ch’ing，239—76

希拉里·J.貝蒂：《代替反抗的抉擇：安徽桐城個案》，收入史景遷和小約翰·E.威爾斯編：《從明到清》

[40] Becker，C.H.，Falski，M.，Langevin，P.and Tawney，R.H.The reorganis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Paris：League of Nations，1932

C.H.貝克爾，M.法爾斯基，P.郎之萬和R.H.托尼：《中國的教育改革》

[41] Bedeski，Robert E.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羅伯特·E.貝德斯基：《現代中國的建國：戰前時期的國民黨》

[42] Belden，Jack.China shakes the world.New York：Harper，1949

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

[43] Benton，Gregor.‘The“ second Wang Ming line”（1935—38）’.CQ 61（March 1975）61—94

格雷戈爾·本頓：《“第二次王明路線”（1935—1938）》，《中國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

[44] Benton，Gregor.‘The origins and early growth of the New Fourth Army’.Unpublished manuscript

格雷戈爾·本頓：《新四軍的起源和初期發展》，未刊文稿

[45] Bercé，Yves-Mrie.Croquants et nu-pieds.Paris：Gallimard/Julliard，1974

伊夫-瑪麗·貝爾塞：《起義農民與赤腳農民》

[46] Bercé，Yves-Mrie.Histoire des Croquants：étude des soulè vements populaires au ⅩⅦ eme siècle dans le sud-ou estde la France.2 vols.Geneva：Droz，1974

伊夫-瑪麗·貝爾塞：《起義農民史：17世紀法國西南部民眾起義研究》，2 卷

[47] Bergère，Marie-Claire.‘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37’.CHOC 12，721—825，856—8

白吉爾：《中國的資產階級，1911—1937年》，《劍橋中國史》，第12卷

[48] Bergère，Marie-Claire.‘“The other China”：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in Christopher Howe，ed.Shanghai，1—34

白吉爾：《“另一個中國”：1919至1949年的上海》，收入克里斯托弗·豪編：《上海：一個亞洲大城市的革命和發展》

[49] Bergson，Abram.The economics of Soviet plann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艾布拉姆·伯格森：《蘇聯計劃經濟》

[50] Berkley，Gerald W.‘Peasant mobilisation in China，1924—26’.Unpublished paper，Washington and Southeast Regional Seminar on China，March 1979

杰拉爾德·W.伯克利：《中國的農民動員，1924—1926年》，未刊論文

[51] Berlin，Isaiah.Washington despatches，1941—45：weekly political reports from the British Embassy，ed.by H.G.Nichola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艾賽亞·伯林：《華盛頓通信，1941—1945年：英國大使館每周政治報告》，H.G.尼古拉斯編

[52] Bernard，Léon.‘French society and popular uprisings under Louis ⅩⅣ’.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3.4（1964）454—74.New York：Kraus Reprint Corporation，1966

萊昂·貝爾納：《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社會和民眾起義》，《法國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64年）

[53] Berninghausen，John.‘The central contradiction in Mao Dun’s earliest fiction’，in Merle Goldman，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233—60

約翰·伯寧豪森：《茅盾早期小說中的主要矛盾》，收入默爾·戈德曼編：《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

[54] Berninghausen，John and Huters，Ted，eds.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n anthology.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7.First published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8.1—2（1976）

約翰·伯寧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編：《中國革命文學：選集》，最初發表在《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公報》，第8卷第1—2期（1976年）

[55] Berton，Robert A.See Chang Kuo-t’ao

羅伯特·A.伯頓，見張國燾

[56] Bertram，Janes M.First act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New York：Viking，1938.Also published as Crisis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London：Macmillan，1937

貝特蘭：《中國的第一幕：西安兵變真相》，又以《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為書名出版

[57] Bianco，Lucien.‘Les paysans et la révolution：Chine 1919—49’.Politique étrangère（Paris），2（1968）117—41

呂西安·比昂科：《農民與革命：中國，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

[58] Bianco，Lucien.‘La mauvaise administration provinciale en Chine（Anhui，1931）’.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Paris），16（April-June 1969）300—18

呂西安·比昂科：《中國省政的敗壞（安徽，1931年）》，《現代史和近代史雜志》，第16期（1969年4—6月）

[59] Bianco，Lucien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呂西安·比昂科：《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年》

[60] Bianco，Lucien.‘Secret societies and peasant self-defense，1921—1933’，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213—24

呂西安·比昂科：《秘密會社與農民自衛，1921—1933年》，收入讓·謝諾編：《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結社，1840—1950年》

[61] Bianco，Lucien.‘Peasants and revolution：the case of China’.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3（April 1975）313—35

呂西安·比昂科：《農民與革命：中國個案》，《農民研究雜志》，第2卷第3期（1975年4月）

[62] Biggerstaff，Knight.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

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

[63] Billingsley，Philip Richard.‘Banditry in China，1911 to 1928，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Henan province’.University of Leeds，Ph.D.dissertation，1974

菲利普·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至1928年中國的盜匪活動，特別論及河南省》，利茲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

[64] Billingsley，Philip R.‘Bandits，bosses，and bare sticks：beneath the surface of local control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Modern China，7.3（July 1981）235—88

菲利普·R.比林斯利：《土匪、大亨和光棍：在中華民國初期地方控制的表層下》，《現代中國》，第7卷第3期（1981年7月）

[65] Bing，Dov.‘ Sneevliet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CP’.CQ 48（Oct. D—ec.1971）677—97

道夫·賓：《斯內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季刊》，第48期（1971 年10—12月）

[66] Biographical literature.See Chuan-chi wen-hsueh

《傳記文學》

[67] Birch，Cyril.‘English and Chinese meters in Hsu Chih-mo’.Asia Major，NS8.2（1961）258—93

西里爾·伯奇：《徐志摩詩的英中韻律》，《大亞西亞》，新第8卷第2期（1962年）

[68] Birch，Cyril.‘ Lao She：the humourist in his humour’.CQ 8（Oct.—Dec.1961）

西里爾·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國季刊》，第8期（1961 年10—12月）

[69] Birch，Cyril.‘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modem Chinese fiction’，in Merle Goldman，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385—406

西里爾·伯奇：《中國現代小說的變遷和連續性》，收入默爾·戈德曼編：《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

[70] Bisson，Thomas Arthur.Japan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38

畢恩來：《日本在中國》

[71] Blok，Anton，‘The peasant and brigand：social banditry reconsidered’.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4.4（Sept.1972）495—504

安東·布洛克：《農民與土匪：社會盜匪活動再研究》，《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第14卷第4期（1972年9月）

[72] Blum，Robert M.Drawing the line：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New York：Norton，1982

羅伯特·M.布盧姆：《限制：美國東亞遏制政策的由來》

[73] Bōeicho bōei kensujo senshi shitsu Hokushi no chiansen北支の治安戰（Pacification war in North China）.2 vols.，map folios.Tokyo：Asagumo shimbunsha朝云新聞社，1968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

[74] Boorman，Howard L.and Howard，Richard C.，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4 vols.1967—71 and index volume（vol.5）1979

包華德和理查德·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詞典》，5卷

[75] Borg，Dorothy.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Macmillan，1947

多蘿西·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1928年》

[76] Borg，Doroth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多蘿西·博格：《美國與1933—1938年的遠東危機》

[77] Borg，Dorothy and Heinrichs，Waldo，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多蘿西·博格和沃爾多·海因里希斯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系》

[78] Borg，Dorothy and Okamoto，Shumpei，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relations 1931—194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1931—1941年的日美關系》

[79] Borg，Dorothy.See Cohen，Warren I.

多蘿西·博格，見沃倫·I.科恩

[80] Borthwick，Sally.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the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era.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3

薩利·博思威克：《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現代時期的開端》

[81] Bowers，John Z.，M.D.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1917—1951.New York：Josiah Macy，J r.Foundation，1972

約翰·Z.鮑爾斯醫學博士：《中國一座殿堂里的西方醫學：北京協和醫學院，1917—1951年》

[82] Boyle，John Hunter.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1945年：通敵政治》

[83] Brandt，Conrad.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康拉德·布蘭特：《斯大林在中國的失敗，1924—1927年》

[84] Brandt，Conrad，Schwartz，Benjamin and Fairbank，John 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Allen&Unwin，1952

康拉德·布蘭特、史華慈和費正清：《中國共產主義文獻史》

[85] Brandt，Vincent S.R.‘Landlord-tenant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China’.Paperson China，17（1963）192—234

文森特·S.R.布蘭特：《中華民國的地主和佃農的關系》，《中國論文集》，第17期（1963年）

[86] Braun，Otto.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trans.by Jeanne Moore.Intro.by Dick Wils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75 as Chinesische Aufzeichnungen（1932—1939）.Berlin：Deitz Verlag（GDR）

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年》，珍妮·穆爾譯，迪克·威爾遜序

[87] Braun，Otto.See Heinzig，D.

奧托·布勞恩，見D.海因齊格

[88] Brown，Edward J.Russian literature since the revolution.New York：Collier，1963；rev.edn.，1969

愛德華·J.布朗：《革命后的俄羅斯文學》

[89] Brown，William A.See Shirendev，B.

威廉·A.布朗，見B.希倫德夫

[90] Brunnert，H.S.，and Hagelstrom，V.V.，rev.by N.T.Kolessoff，trans.from Russian by A.Beltchenko and E.E.Moran.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Shanghai：Kelly&Walsh，1912

H.S.布倫納特和V.V.哈格爾斯特羅姆：《今日中國的政治組織》，N.T.科列索夫修訂，A.別利琴科和E.E.莫蘭從俄文譯為英文

[91] Buck，David D.‘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Tsinan，1899—1937’，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71—212

戴維·D.巴克：《濟南教育的現代化，1899—1937年》，收入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

[92] Buck，David D.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

戴維·D.巴克：《中國城市的變化：山東濟南的政治與發展，1890—1949年》

[93] Buck，John Lossing.Chinese farm economy.Nanking：University of Nanking，1930

卜凱：《中國農家經濟》

[94] Buck，John Lossing.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a study of 16，786 farms in 168 localities，and 38，256 farm families in twenty-two provinces in China，1929—1933.3vols.Nanking：University of Nanki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2nd printing，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964

卜凱：《中國土地的利用：關于中國168個地區的16786個農場和22個省的38256個農戶的研究，1929—1933年》，3卷

[95] Buck，John Lossing，et al.There is another China.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1948.（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卜凱等：《有另一個中國》

[96] Buck，Peter.American science and modern China 1876—193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1936年》

[97] Buckley，Thomas H.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70

托馬斯·H.巴克利：《美國與華盛頓會議，1921—1922年》

[98] Buhite，Russell D.Patrick J.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

拉塞爾·布海特：《赫爾利與美國對外政策》

[99]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New York City and other Places.May 1968—

《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公報》，紐約市及其他城市，1968年5月—

[100]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See 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01]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40—

《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學報》，倫敦，1940年—

[102] Bullock，Mary Brown.An American transplant：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瑪麗·布朗·布洛克：《美國移植：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

[103] Bunker，Gerald E.The peace conspiracy：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War，1937—194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杰拉爾德·E.邦克：《和平陰謀：汪精衛與中國戰爭，1937—1941年》

[104] Burgess，John S.See Gamble，Sidney D.

步濟時，見甘博

[105] Bush，Richard Clarence，Ⅲ.‘Industry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Lower Yangtze Chinese cotton mill owners，1927—1937’.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8

理查德·克拉倫斯·布什第三：《國民黨中國的工業與政治：國民黨政權與長江下游的中國紡織廠主，1927—1937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78年

[106] Bush，Richard C.The politics of cotton textile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New York：Garland Publishers，1982

理查德·C.布什：《國民黨中國的棉織品政治，1927—1937年》

[107] Butow，Robert J.C.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

羅伯特·J.C.布托：《東條英機與戰爭的來臨》

[108] Buxbaum，David C.‘Some aspects of civil procedure and practice at the trial level in Tanshui and Hsinchu from 1789 to 1895’.JAS 30.2（Feb.1971）255—79

戴維·C.巴克斯鮑姆：《1789—1895年淡水和新竹審判層次上的民事訴訟和程序的若干方面》，《亞洲研究雜志》，第30卷第2期（1971年2月）

[109] Caillard，Duval and Guillet，Gricourt.A travers la Normandie des ⅩⅦème et ⅩⅧ ème siècles.Caen：Cahier des Annales de Normandie no.3，1963

迪瓦爾·卡亞爾和格里庫爾·吉耶：《17世紀和18世紀諾曼底研究》

[110]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3，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part 1，ed.by Denis Twitchett，1979；vol.10，Late Ch’ing 1800—1911，part 1，ed.by John K.Fairbank，1978；vol.11，Late Ch’ing 1800—1911，part 2，ed.by 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1980；vol.12，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part 1，ed.by John K.Fairbank，1983

《劍橋中國史》，第3卷，《隋唐史》，第1部，崔瑞德編；第10卷，《晚清史》，第1部，費正清編；第11卷，《晚清史》，第2部，費正清和劉廣京編；第12卷，《中華民國史》，第1部，費正清編

[111] Carlson，Evans Fordyce.The Chinese army：its organization and military efficiency.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

卡爾遜：《中國的陸軍：其編制和軍事能力》

[112] Carrère d’Encausse，H.and Schram，S.Marxism and Asia.London：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1969

H.卡雷爾·當科斯和宣道華：《馬克思主義與亞洲》

[113] CAS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國社會科學院

[114] Cavendish，Patrick，‘The“New China”of the Kuomintang’，in Jack Gray，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a political form，138—86

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國民黨的“新中國”》，收入杰克·格雷編：《現代中國對政治形式的探求》

[115] CCP.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中國共產黨

[116] CEC.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中央執行委員會

[117] Chan，Adrian.‘Development and n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m to 1925’.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Ph.D.thesis，1974

艾德里安·陳：《1925年以前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和特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

[118] Chan，F.Gilbert，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0

陳福霖編：《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1927—1949年》

[119] Chan，Gilbert.‘Sheng Shih-ts’ai’s reform programs in Sinkiang：idealism or opportunism？’Bulletin of the IMH，12.365—84

陳福霖：《盛世才在新疆的改革計劃：理想主義還是機會主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集

[120] Chan，F.Gilbert and Etzold，Thomas H.，eds.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 York and London：New Viewpoints，1976

陳福霖和托馬斯·H.埃特佐爾德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革命》

[121] Chan，Lau Kit-ching.‘The Linch’eng incident—a case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betwee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22）and the first Nationalist revolution（1925—28）’.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10.2（July 1972）172—86

陳劉潔清（音）：《臨城事件：華盛頓會議（1921—1922年）和國民革命（1925—1928年）期間英國在華政策個案研究》，《東方研究雜志》，第10卷第2期（1972年7月）

[122] Chan，Ming K.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895—1949：a critical survey an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source materials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1

陳明銶：《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編纂學，1895—1949年：胡佛研究所精選中國原始資料評述和書目》

[123] Chan，Ming-kou.‘Labor and empire：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1895—1927’.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5

陳明銶：《勞工與帝國：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勞工運動，1895—1927年》，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

[124] ‘Chan-shih hou-fang kung-yeh shih ju-ho chien-li-ti’（How the wartime in dustry in the rear was established）.Hsin-shih-chieh yueh-k’an，15 March 1944，10—15

《戰時后方工業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界月刊》，1944年3月15日

[125] Chan，Wellington K.K.‘Government，merchants and industry to 1911’.CHOC11.416—62

陳錦江：《1911年以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劍橋中國史》，第11卷

[126] Chang，Carsun（Chang Chün-mai）The third force in China.New York：Bookman，1952

張君勱：《中國的第三勢力》

[127] Chang，Ch’i-chün.‘Hsi-nanl-ien-ta chi-yao’（Essential facts concerning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in Kuo-li Hsi-nan lien-ho ta-hsueh（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 volume in the Hsueh-fu chiwen series.Taipei：Nan-ching南京，1981

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收入《學府紀聞》叢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卷

[128] Chang Ch’i-yun.Tang-shih kai-yao（Survey of party history）.5 vols.Taipei：Chung-yang wen-wu中央文物，1951

張其昀：《黨史概要》，5卷

[129] Chang Chih-i.See Fei Hsiao-t’ung

張之毅，見費孝通

[130] Chang Ch’ih-chang Chi-luan wen-ts’un（collected essays of Chi-luan[Chang Ch’ih-chang]）.Taipei：Wen-hsing shu-tien文星書店，1962

張熾章：《季鸞文存》

[131] Chang Ching-lu，ed.Chung-kuo hsien-tai ch’u-pan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ations）.Chia-pien（Part Ⅰ），1954；I pien（part Ⅱ），1955；Ping-pien（part Ⅲ），1956；Ting-pien（part Ⅳ），2 vols.1959.Peking：Chung-hua

張靜廬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1954年；乙編，1955年；丙編，1956年；丁編，2卷，1959年

[132] Chang Ching-lu，ed.Chung-kuo chin-tai ch’u-pan shih-liao（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publication in modern China）.2 vols.Chünlien群聯，1953—4

張靜廬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2卷

[133] 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

張仲禮：《中國紳士》

[134] Chang Chung-li.The income of the Chinese gentry.Seattle：Universtiy of Washington Press，1962

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

[135] Chang，Hao.‘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0-8’.CHOC11.274—338

張灝：《思想變化與維新運動，1890—1898年》，《劍橋中國史》，第11卷

[136] Chang Hisini-.Chung-kuo liang-shih wen-t’i（China’s foddgrain problem）.Shanghai：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IPR of China，1932

張心一：《中國糧食問題》

[137] Chang Jo-ku，ed.Ma Hsiang-po hsien-sheng nien-p’u（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Ma Hsiang-po[Ma Liang]）.Changsha：CP，1939

張若谷編：《馬相伯先生年譜》

[138] Chang，John K.‘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China，1912—1949’.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7.1（March 1967）56—81

約翰·K.張：《大陸中國的工業發展，1912—1949年》，《經濟史雜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3月）

[139] Chang，John K.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a quantitative analysis.Chicago：Aldine，1969

約翰·K.張：《共產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

[140] Chang Jyh-er Kinzelbach.‘La condition paysannee d’après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mtemporaine，1919—1942’.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aris，unpublished dissertation，1976

張秋兒（音）：《中國當代文學中的農民生活狀況，1919—1942年》，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校，未刊論文

[141] Chang Kia-ngau.China’s struggle for railway development，New York：John Day，1943

張嘉璈：《中國為鐵路發展而奮斗》

[142] Chang Kia-ngau.The inflationary spiral：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8

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1950年》

[143] Chang Kuoh-ui.Yang-w uy unt-ung yü Chung-kuo chin-tai ch’i-yeh（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China’s modem industry）.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1979

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

[144] Chang Kuo-p’ing.Pai Ch’ung-hsi chiang-chün chuan（A biography of Gen-eral Pai Ch’ung-hsi）.Canton，1938

張國平：《白崇禧將軍傳》

[145] Chang Kuo-t’ao.Wo-ti hui-i（My recollections）.Ming-pao yueh-k ’an（Mingpao monthly），Hong Kong，1.3—6.2（March 1966—Feb.1971）.Reissued in three volumes，Hong Kong，1973.Trans.under the title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R.A.Berton

張國燾；《我的回憶》，《明報月刊》，第1卷第3期—第6卷第2期（1966 年3月—1971年2月），1973年在香港分三卷出版單行本。由R.A.伯頓譯為英文，以書名《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出版

[146] Chang K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8—1938.Volume two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trans.by R.A.Berton.Lawrence，Kansas：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72

張國燾：《中國共產黨的崛起，1928—1938年：張國燾自傳》，第2卷，R.A.伯頓譯

[147] Chang Kuo-t’ao，Liu Ning et al.I-ko kung-den ti kung-chuang chich’i-tk（a’A working man’s confession and other essays），n.p.，n.d.

張國燾、柳寧等：《一個工人的供狀及其他》

[148] Chang，Kwang-chih.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3rd e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

[149] Chang Man-i ed al.Hsien-tai Chung-kuo shih-hsuan，1917—1949（Modern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1917—1949）.2 vol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ublications Office，1974

張曼儀等：《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2卷

[150] Chang P’ei-kang.‘Min-kuo erh-shih-san nien ti Chung-kuo nung-yeh chingchi’（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1934）.Tung-fang tsa-chih 32.13（1 July 1935）133—45

張培剛：《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農業經濟》，《東方雜志》，第32卷第13期（1935年7月1日）

[151] Chang P’eng-yuan.Liang Ch’i-ch’ao yü Ch’ing-chi ko-ming（Liang Ch’ich’ao and the late Ch’ing revolution）.Taipei：Chung-yang yen-chiu yuan chintai-shih yen chin-so，1964

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152] Chang P’eng-yuan.Li-hsien p’ai yü Hsin-hai ko-ming（The Constitutionalis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Taipei：Chung-kuo hsu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uan hui，1969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153] Chang P’eng-yuan.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parliament of 1913—1914’.JAS 37.2（Feb.1978）293—313

張朋園：《民國初期的政治參與及政界名流：1913—1914年國會》，《亞洲研究雜志》，第37卷第2期（1978年2月）

[154] Chang P’eng-yuan.‘Provincial assemblies：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artici pation 1909—1914’.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12（June 1983）273—99

張朋園：《省咨議局：1909—1914年政治參與的出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集（1983年6月）

[155] Chang P’eng-yuan.Chung-kuo hsien-tai-hua ti ch’ü-yü yen-chiu：Hu-nam sheng，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Hunan province）.Taipei：Institute of Modem History，1983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156] Chang pi-lai.‘I-chiu-erh-san nien“Chung-kuo ch’ing-nien”chi-ko tso-che ti wen-hsueh chu-chang’（The literary views of some authors from Chinese Youth in 1923），in Li Ho-lin et al.，Chung-kuo hsin wen-hsueh…，36—49

張畢來：《一九二三年〈中國青年〉幾個作者的文學主張》，收入李何林等：《中國新文學史研究》

[157] Chang Po-ling.‘Ssu-shih-nien Nan-k’ai hsueh-hsiao chih hui-ku’（Retrospect of Nankai after forty years 1944），in Wang Wen-t’ien et al.，Chang Po-ling yü Nan-k’ai（Chang Po-ling and Nankai），81—1107.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68

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收入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

[158] Chang Sheng-hsuan.‘San-shih-erh-nien Ssu-ch’uan kung-yeh chih hui-ku yü ch’ien-chan’（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zechwan’s economy In 1943）.Ssu-ch’uan ching-chi chi-k’an，1.2（15 March 1944）258—70

張圣軒：《三十二年四川工業之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

[159] Chang Ta-ch’en.‘ San-shih-san-nien ti Ch’ung-ch’ing t’u-pu-yeh ’（Chungking’s handicraft textile industry in 1944）.Ssu-ch’uan ching-chi chi-k’an，2.2（1 April 1945）202—4

張大琛：《三十三年的重慶土布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

[160] Chang Te-tse.Ch’ing-tai kuo-chia chi-kuan k’ao-lueh（A study of Ch’ing government organs）.Peking：Chung-kuo J enm-in Ta-hsueh ch’u-pan-she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

張德澤：《清代國家機關考略》

[161] Chang T’ien-i.‘Ch’ou-hen（Hatred），in Chang T’ien-i hsuanc-hi（Chang T’ien-i’s selected work），40—69.Peking：K’ai-ming shu-tien開明書店，1951

張天翼：《仇恨》，收入《張天翼選集》

[162] Chang Tung-sun.‘Chui-shuw om-en nu-li chien-li“ lien-ho cheng-fu”ti yungi’（Reflections on our intention to strive to establish a ‘coalition government’）.Kuan-ch’a，5 April 1947，pp.5—7

張東蓀：《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觀察》，1947年4月5 日

[163] Chang Wen-shih.Yun-nan nei-mu（The inside story in Yunnan）.Kunming：K’un-ming kuan-ch’a，1949

張文實：《云南內幕》

[164] Chang Yu-i，comp.Chung-kuo chin-tai nung-yeh shih tzu-liao，ti-san chi，1927—1937（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a’s agriculture，third collection，1927—1937）.Peking：San-lien，1957.See also Li Wen-chih

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1927—1937》，也見李文治

[165] Chang yüf-a.Ch’ing-chi ti li-hsien t’uan-t’i（Constitutionalist groups of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Academia Sinica，1971

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

[166] Chang Yü-fa.‘Ch’ing-mo min-ch’u ti Shah-tung ti-fang tzu-chih’（Local self-government of Shantung in th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chi-k’an 6（June 1977）159—84

張玉法：《清末民初的山東地方自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集（1977年6月）

[167] Chang Yü-fa Chung-kuo hsien-tai-hua ti ch’ü-yü yen-chiu：Shan-tung sheng，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Shantung province）.Vol.Ⅰ.Taipei：IMH，1982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

[168] Chao Ching and I Meng-hung.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su-hsiang shih（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2 vols.Rev.ed.Peking：Chung-hua，1980

趙靖和易夢虹：《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2卷

[169] Chao Ju-heng.Ti-fang tzu-chih chih li-lun yü shih-chi（Theory and practice of local self-government）.Shanghai：Hua-t’ung shu-chü華通書局，1933

趙如珩：《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實際》

[170] Chao，Kang.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in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7

趙岡：《中國棉織品生產的發展》

[171] Chao，Kang.‘New data on land ownership patterns in Ming-Ch’ing China—a research note’.JAS40.4（Aug.1981）719—34

趙岡：《中國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資料：研究筆記》，《亞洲研究雜志》，第40卷第4期（1981年8月）

[172] Chao Kuo-chün.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59.New Delhi：Asia Publishing House，1960

趙國俊：《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1921—1959年》

[173] Chao shu-li.Li-chia-chuang ti pien-ch’ien（Changes in the Li village）.Shansi：Hua-pei hsin-hua shu-tien華北新華書店，1946

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

[174] Chapman，H.Owen.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6—1927.London：Constable，1928

H.歐文·查普曼：《中國革命，1926—1927年》

[175] Chassin，Lionel M.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a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1945—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萊昂內爾·M.蔡辛：《共產黨征服中國：1945—1949年內戰史》

[176] CHB.See China handbook

《中華志》

[177] ‘Che-chiang erh-wan nung-min pao-tung’（The uprising of twenty thousand peasants in Chekiang）.1933.Manuscript of three pages.Hoover Institution，no.4398.29/3314

《浙江二萬農民暴動》，胡佛研究所資料4398.29/3314

[178] ‘Che-chiang ko-hsien ch’en-ch’ing ch’ü-hsiao shih-hsing erh-wu chien-tsu imien chiu-fen’（Petitions from various hsiens of Chekiang requesting that the 25 per cent rent reduction be no longer applied in order to avoid conflicts.）（Nov.1931—June 1934.）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king，no.2/2/1129

《浙江各縣呈請取消施行二五減租以免糾紛》，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2/2/2119

[179] ‘Che-chiang ko-ti nung-min k’ang-tsu tou-cheng’（Peasant resistance to rents in various localities in Chekiang）（1927—1930）.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king，no.1/2/1001 and 1/2/1002

《浙江各地農民抗租斗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1/2/1001和1/2/ 1002

[180] Chen，Fu-mei Chang and Myers，Ramon H.‘Customary law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g period’.CSWT 3.5（Nov.1976）1—32；3.10（Dec.1978）4—27

陳張富美和馬若孟：《習慣法與中國清代的經濟增長》，《清史問題》，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3卷第10期（1978年12月）

[181] Chen-hai hsien-chih（Chen-hai county gazetteer），1931

《鎮海縣志》

[182] Chen-p’ing hsien tzuc-hih kai-k’uang（Local self-government in Chen-p’ing county）.Chen-p’ing，1933

《鎮平縣自治概況》

[183] Ch’en Chen and Yao Lo.Chumg-kuo chin-tai kung-yeh shih tzu-liao（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industry in China）.4 collections（chi）totailing 6 vols.Peking：San-lien，1957—61

陳真和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4輯共6卷

[184] Ch’en Chen-han.‘Cheng-fu yin-hang hsuch-shu chi-kuan yü fuhsing nungts’un’（Government，banks，academic institutions，and revival of the villages）.Kuo-wen chou-pao，10.46（20 Nov.1933），articles pp.1—8

陳振漢：《政府銀行學術機關與復興農村》，《國聞周報》，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20日）

[185] Ch’en Ch’eng.Pa-nien k’ang-chan ching-kuo kai-yao（Summary of experiences during the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n.p.：Kuo-fang-pu shih-liaochü國防部史料局，nd..

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

[186] Ch’en Cheng-mo.Ko-sheng nung-kung ku-yung hsi-kuan chi hsu-kung chuang-k’uang（Hiring practices i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the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labour in various provinces）.Nanking：Chung-shan wenshan chiao-yü kuan中山文化教育館，1935

陳正謨：《各省農工雇傭習慣及需供狀況》

[187] Ch’en Ch’i-t’ien.Wo-ti hui-i（My memoirs）

陳啟天：《我的回憶》

[188] Ch’en Chih-mai.Chung-kuo cheng-fu（The Chinese government）.3 vols.2nd edn.Shanghai：CP，1946

陳之邁：《中國政府》，3卷

[189] Ch’en Chih-mai.‘Chan- shih li-fa wen-t’i’（Problems of wartime legislation）.Hsin-ching-chi，2.3（16 July 1949）76—70

陳之邁：《戰時立法問題》，《新經濟》，第2卷第3期（1949年7月16日）

[190] Ch’en Chih-mai.‘Ch’iü-hsueh yü chih-hsueh[of Tsiang T’ing-fu]’（Study and research [of Tsiang T’ing-fu]），in Chiang T’ing-fu ti chih-shih yü sheng-p’ing（The life and deeds of Tsiang T’ign-fu）.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67

陳之邁：《求學與治學》，收入《蔣廷黻的治事與生平》

[191] Ch’en Hans-eng.‘Kantō nōson no seisan kankei to seisanryoku’廣東農村の生產關係と生產力（Production relationships and production power in Kwangtung villages）.Mantetsu chōsa geppō 滿 鐵 調查月報，15.6（June 1935）167—86

陳翰笙：《廣東農村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滿鐵調查月報》，第15卷第6期（1935年6月）

[192] Ch’en Hsueh-chao.Man-tsou chieh-fang-ch’ü（Wanderigns in the liberated areas）.Shanghai：Shang-hai ch’u-pan kung-ssu上海出版公司，1950

陳學昭：《漫走解放區》

[193] Ch’en，Jerome.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

[194] Ch’en，Jerome.‘Resolutions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CQ 40（Oct.—Dec.1969）1—38

陳志讓：《遵義會議決議》，《中國季刊》，第40期（1969年10—12月）

[195] Ch’en，Jerome.Mao pape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陳志讓：《毛澤東論文集》

[196] Ch’en，Jerome.‘Ideology and history’.Report on the visit of the North A-merican delegation on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une-July 1980，xeroxed for circulation，1980

陳志讓：《意識形態與歷史》，關于北美研究社會主義和革命代表團1980 年6—7月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告

[197] Ch’en，Jerom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1927’.CHOC 12.505—26

陳志讓：《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劍橋中國史》，第12卷

[198] Ch’en Kung-lu.Chung-kuo chin-tai shih tzu-liao kai-shu（An outline of sources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Peking：Chung-hua，1982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

[199] Ch’en Kung-po.Han-feng chi（Cold wind）.Shanghai：Ti-fang hsing-chengshe地方行政社，1944

陳公博：《寒風集》

[200] Ch’en Kung-po.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essay written in 1924.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Martin Wilbu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

陳公博：《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1924年寫的一篇文章》，韋慕庭編并序

[201] Ch’en Kung-po.K’u-shiao lu：Ch’en Kung-po hui-i（Record of tears and laughter：the memoirs of Ch’en Kung-po），ed.Li O et al.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Centre of Asian Studies，1979

陳公博：《苦笑錄：陳公博回憶》，李鍔等編

[202] Ch’en Kuo-fu.Su-cheng hui-i（Memories of governing Kiangsu）.Taipei：Cheng-chung，1951

陳果夫：《蘇政回憶》

[203] Ch’en Li-fu.Four years of Chinese education（1937—1941）Chungking：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1941.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年）》

[204] Ch’en Neng-chih.‘Chan-ch’ien shih-nien Chung-kuo ta-hsueh chiao-yü ching-fei wen-t’（iProblems of financing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ecade before the war，1927—1937）.Li-shih hsueh-pao（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11（June 1983）.Taipei：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11期（1983 年6月）

[205] Ch’en-pao（The morning post）.Peking，15Aug，1916—

《晨報》，北京，1916年8月15日—

[206] Ch’en Po-chün.‘Lun k’ang-Jih yu-chi ehan-cheng ti chi-pen chanshu：hsichi’（On the basic tactic of 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war：the surprise attack）.Chieh-fang，28（11 Jan.1938）14—19

陳伯鈞：《論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戰——襲擊》，《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

[207] Ch’en Po-hsin.Chung kuo ti ti-fang chih-tu chi chi’i kai-ko（China’s local system and its reform）.Changsha：CP，1939

陳伯心：《中國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

[208] Ch’en Po-ta.Chung-kuo ssu-ta-chia-tsu（China’s four great families）.Hong Kong：Chung-kuo，1947

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

[209] Ch’en Po-ta.Kuan-yü shih-nien nei-chan（On the 10 years of civil war）.Peking：Jen- min，1953

陳伯達：《關于十年內戰》

[210] Ch’en Shao-hsiao.Hei-wang-lu（Record of the black net）.Hong Kong：Chihch’eng致誠，1966

陳少校：《黑網錄》

[211] Ch’en Shao-yü.Chen-Shao-yü（Wang Ming）chiu-kuo yen-lun hsuan-chi（Selected statements of Ch’en Shao-yü（Wang Ming）on national salvation）.Hankow：Chung-kuo ch’u-pan-she中國出版社，1938

陳紹禹：《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

[212] Ch’en Shao-yü.See Wang Ming

陳紹禹，見王明

[213] Ch’en，Ta.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6

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

[214] Ch’en Ta.‘Chung-kuo laok-ung chieh-chi yü tang-ch’ien ching-chi wei-chi’（China’s working class and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She-hui-chien-she，1.4（1 Aug.1948）17—19

陳達：《中國勞工階級與當前經濟危機》，《社會建設》，第1卷第4期（1948 年8月1日）

[215] Ch’en Teng-yuanC.hung-kuo t’ien-fu shih（A history of land tax in China）.Shanghai：CP，1936；Repr.Taipei：CP，1966

陳登原：《中國田賦史》

[216] Ch’en Tuh-siu.Wen-ts’un（Collected essays）.4 vols.Shanghai：Ya-tung亞東，1922

陳獨秀：《文存》，4卷

[217] Ch’en Tuh-siu.‘Kao ch’üan-tang t’ung-chih-shu’（Letter to all the comrades of the party）.10.12.1929.Mimeographed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0月12日，油印

[218] Ch’en Tu-hsiu.Pien-shu-chuang（My defence），n.p.20 Feb.1933.Mimeographed

陳獨秀：《辯述狀》，1933年2月20日，油印

[219] Ch’en Tunc-heng.Tung-luan ti hui-i（Memoirs of upheaval）.Taipei：Yuanhsia元霞，1979

陳敦正：《動亂的回憶》

[220] Ch’en Yu-shih.“ Mao Dun and the use of political allegory in fiction：a case study of his ‘Autumn in Kuling ’”，in Merle Goldman，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261—80

陳雨石（單）：《茅盾與在小說中使用政治諷喻：他的〈牯嶺之秋〉個案研究》，收入默爾·戈德曼編：《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

[221] Ch’en Yung-fa.‘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 ’.2 vols.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0

陳永發：《革命的形成：1937—1945年華東和華中的共產黨運動》，2卷，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

[222] Cheng Yu-Kwei.Foreign trad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an historical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through 1948.Washington，DC：University Press of Washington，1956

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948年的歷史綜合分析》

[223] Cheng-chih chou-pao（Political weekly）.Canton，1925—

《政治周報》，廣州，1925年—

[224] Ch’eng Chi-hua et al.Chung-kuo tien-ying fa-chan-shih（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nema）.2 vols.Peking：Chung-kuo tien-ying中國電影，1963

程季華等：《中國電影發展史》，2卷

[225] Ch’eng Fang.Chung-kuo hsien-cheng kai-lun（An introduction to county government in China）.2 vols.Changsha：CP，1939

程方：《中國縣政概論》，2卷

[226] Ch’eng Mao-hsing.Chiao-fei ti-fang hsing-cheng chih-tu（Govem mental system of the bandit-suppression areas）.Shanghai：CH，1936

程懋型：《剿匪地方行政制度》

[227] Ch’eng Yuan-chen.‘Ko-hsin yun-tung chih-hsu ch’eng-kung puh-su shihpai’（The renovation movement can only succeed and must not fail）.Ko-hsin chou-k’an（Renovation weekly），1.5（24 Aug，1946）3—5

程元斟：《革新運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24日）

[228] Chennault，Claire Lee.Way of a fighter.New York：G.P.Putnam Sons，1949

陳納德：《戰士風格》

[229] Chern，Kenneth S.Dilemma in China：Anierica’s policy debate，1945.Hamden，Conn.：Archon Books，1980

肯尼思·S.徹恩：《在中國的困境：美國政策辯論，1945年》

[230] Chesneaux，Jean.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trans.by H.M.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讓·謝諾：《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年》，H.M.賴特從法文譯為英文

[231] Chesneaux，Jean，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讓·謝諾編：《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1950年》

[232] Chi，Madeleine.China diplomacy，1914—1918.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0

馬德琳·池：《中國外交，1914—1918年》

[233] Chi，Madeleine.‘Ts’ao Ju-lin（1876—1966）：his Japanese connections’，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140—60

馬德琳·池：《曹汝霖（1876—1966年）：他的日本關系》，收入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

[234] Ch’i Hsi-sheng.Nationalist China at wa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1945.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

齊錫生：《戰爭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1945年》

[235] Ch’i-shih-liu nien shih-hsueh shu-mu 1900—1975（Bibliography of books on history publishedduring the 76 years 1900—1975），comp.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Li-shih yen-chiu so tzu-liao-shih，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1981

《七十六年史學書目，1900—1975》，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

[236] Ch’i Shu-fen.Ching-chi ch’in-lueh hsia chih Chung-kuo（China under eco-nomic aggression）.Shanghai：Ku-chün tsa-chih孤軍雜志，1925

漆樹芬：《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237] Ch’i-wu lao-jen.‘Chung-kuo Kung-ch’an-tang ch’eng-li ch’ien-hou ti chienwen’（My impress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Hsin kuan-ch’a（New observer），Peking，13（1 July 1957）16—18

棲梧老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的見聞》，《新觀察》，1957年第13期（7 月1日）

[238] Chia-ting hsien hsu-chih（Chia-ting county gazetteer），rev.edn，1920

《嘉定縣續志》

[239] Chiang Chieh-shih.See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240] Chiang Chung-cheng（Chiang Kai-shek）.Soviet Russia in China：a summingup at seventy.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Cudahy，1957

蔣中正（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七十概述》

[241] Chinag Kai-shek.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messages during China’s six years of war，1937—1943.New York：Harper，1943

蔣介石：《抗戰建國：1937—1943年六年抗戰文電集》

[242] Chiang Kai-shek.Chiang tsung-t’ung yen-lun hui-pien（President Chiang’s collected speeches）.24 vols.Taipei：Cheng-chung，1956

蔣介石：《蔣總統言論匯編》，24卷

[243] Chiang Kai-shek.‘Tzu-shu yen-chiu ko-ming che-hsueh ching-kuo ti chiehtuan’（Stages traversed in studying revolutionary philosophy），in Chiang Kai-shek，Chiang-tsung-t’ung yen-lun hui-pien，10.48—60

蔣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收入蔣介石：《蔣總統言論匯編》第10卷

[244] Chiang Kai-shek.Chiang-tsung-t’ung ssu-hsiang yen-lun chi（Collection of President Chiang’s thoughts and speeches）.30 vols.Taipei：Chung-yang wen-wu中央文物，1966

蔣介石：《蔣總統思想言論集》，30卷

[245]（Chiang Kai-shek）.Chiang tsung-t’ung mi-lu（Secret records of President Chiang）.15 voids.Taipei：Chung-yang jih-pao中央日報，1974—8

（蔣介石）：《蔣總統秘錄》，15卷

[246] Chiang Monlin（Meng-lin）.Tides from the Wes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Taipei reprint：China Academy，1974

蔣夢麟：《來自西方的潮流》

[247] Chiang Mu-Jiang.‘Chi-ch’eng-ssu-kung’ Wen-chi yueh-k’an，2.1（1 Dec.1936）44—54

蔣牧良：《集成四公》，《文季月刊》，第2卷第1期（1936年12月1日）

[248] Chiang Shang-ch’ing.Cheng-hai mi-w （enSecrets of the political world）.Hong Kong：Chih-ch’eng致誠，1966

江上清：《政海秘聞》

[249] ‘Chiang-su An-hui Hu-nan teng-sheng nung-min k’ang-tsu tou-cheng’（Peasant resistance to rents in Kiangsu，Anhwei and Hunan provinces，1929—1941）.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king，no.1/2/999

《江蘇安徽湖南等省農民抗租斗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1/2/999

[250] ‘Chiang-su Chiang-tu hsien nung-min fan-tui ch’ing-ch’a t’ien-fu yun-tung’（The movement of opposition to fiscal inquiry by the peasants of Chiang-tu hsien，Kiangsu）.Second Historica1 Archives，Nanking，no.2/2/973

《江蘇江都縣農民反對清查田賦運動》，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2/2/ 973

[251] Chiang Yung-chen.‘The Yenching Sociology Department：From social service to social engineering，1919—1945’.Unpublished paper，1984

江勇振：《燕京大學社會系：從社會服務到社會工程，1919—1945年》，未刊論文，1984年

[252] Chiang Yung-ching.Pao-lo-t’ing yü Wu-han cheng-ch’üan（Borodin and the Wuhan regime）.Taipei：Chung-kuo hsu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uanhui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3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

[253] Chiao-fei chan-shih（History of the war to suppress the bandits），ed.by History Bureau，Ministry of Defence，Republic of China，Taipei.6 vols.，1962

《剿匪戰史》，6卷

[254] Chiao-yü kung-pao（Educational gazette）.Peking，May 1916—

《教育公報》，北京，1916年5月—

[255] Chiao-yü pu（Ministry of Education）.Ta-hsueh ling（Ordinance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Ministry of Education，1912

教育部：《大學令》

[256] Chiao-yü-pu kao-teng chiao-yü-ssu，comp.Ch’üan-kuo kao-teng chiao-yü t’ung-chi（Statistics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August 1928 to July 1931）.Nanking，1931—3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全國高等教育統計》

[257] Chiao-yü tsa-chih（Chinese educational review）.Shanghai：CP，January 1909—

《教育雜志》，上海，1909年1月—

[258] Chiao-yü tsa-chih（The journal of education）.Special issue.K’ang-chan ilai ti kao-teng chiao-yü（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31.1（10 Jan.1941）.Hong Kong：CP

《教育雜志》特輯：《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

[259] Ch’iao Ch’i-ming.Chiang-su K’un-shan Nan-t’ung An-hui Su-hsien mungtien chih-tu chih pi-chiao i-chi kai-liang nung-tien wen-t’i chih chien-i（A comparison of the farm tenancy system of K’un-shan and Nan-t’ung in Kangsu and Su-hsien in Anhwei，and a proposal on the question of the reform of farm tenancy）.Nanking：Chin ling ta-hsueh nung-lin ts’ung-k’an（Nanking University，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eries，1926

喬啟明：《江蘇昆山南通安徽宿縣農佃制度之比較以及改良農佃問題之建議》，《金陵大學農林叢刊》

[260] Chieh-fang jih-pao（Liberation daily news）.Yenan，1941—；Shanghai，1949—

《解放日報》，延安，1941年—；上海，1949年—

[261] Chieh-fang pao（Liberation）.Published at approximately weekly intervals in Yenan by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from May 1937 to July 1941；thereafter became Liberation Daily

《解放報》，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從1937年5月至1941年7月以大約七天的間隔出版；此后，更名為《解放日報》

[262] Chieh-fang she，comp.K’ang-Jih min-tsu t’ung-i chan-hsien chih-nan（Guide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解放社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

[263] Ch’ien Chung-shu.Fortress besieged，trans.by Jeanne Kelly and Nathan K.Mao.Bloo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錢鍾書：《圍城》，珍妮·凱利和內森·K.毛譯

[264] Ch’ien Chung-shu.See Hutres，Theodore

錢鍾書，見胡志德

[265] Ch’ien I-shih.Chung-kuo wai-chiao shih（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Shanghai：Sheng-hou shu-tien，194 7

錢亦石：《中國外交史》

[266] Ch’ien Pang-k’ai.‘ Tung-pei yen-chung-hsing tsen-yang ts’u-ch’eng-ti？’（What has precipitated the grave situation in the Northeast？）.Ch’ing-tao shih-pao（Tsingtao times），19 Feb.1948，reprinted in Kuan-ch’a，27 March 1948，pp.16，14

錢邦楷：《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青島時報》，1948年2月19日 《觀察》，1948年3月27日轉載

[267] Chien Shih-fu.Ch’ing-tai chih-kuan nien-piao（Tables of Ch’ing officials）.4 vols.Peking：CH，1980

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4卷

[268] Ch’ien T’ang.Ko-ming ti nü-hsing（Revolutionary women）.Shanghai：Kuang-wen she廣文社，1949

錢塘：《革命的女性》

[269] Ch’ien Tuan-sheng.Min-kuo cheng-chih shih（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under the republic）.2 vols.in one.Shanghai：CP，1939

錢端升：《民國政制史》

[270] Ch’ien Tuan-sheng.‘Chün-jen pa-hu ti Chung-kuo cheng-fu’（China’s government usurped by military men）.Shih-tai p’i-p’ing，（Modern critic）.Hong Kong，16 June 1947，2—3

錢端升：《軍人跋扈的中國政府》，《時代批評》，香港，1947年6月16日

[271]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reprinted 1961

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

[272] Chin Fan.Tsai Hung-chün ch’ang-cheng ti tao-lu shang（On the route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she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

金帆：《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

[273] Chin，Rockwood Q.P.‘The Chinese cotton industry under wartime inflation’.Pacific Affairs，16.1（March 1943）33—46

秦國平：《戰時通貨膨脹下的中國紡織業》，《太平洋事務》，第16卷第1期（1943年3月）

[274] Chin，Steve S.K.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Center of Asian Studies，1979

金思愷：《毛澤東思想》

[275] Chin-tai-shih tzu-liao（Source materials of modern history），ed.by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Academy of Sciences，Peking，1954—

《近代史資料》，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北京，1954年—

[276] Chin-tai-shih yen-chiu（‘J in dai shi yah jiu’）（Studies in modern history），ed.by 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Modern history institute of CASS）.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1979—

《近代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北京，1979年—

[277] China.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Shanghai，1865—S.tatistical returns and trade reports published together from 1882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奉海關總稅務司命令發表之貿易報表和貿易報告》

[278] China.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navigation，industries，etc.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and Korea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compiled for the end decades 1881—1891，1892—1901，1902—1911，1912—1921，1922—1931（subtitles vary）：published by the Inspeetorate General，Shanghai，usually two years after the of the end decade in question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中國和朝鮮對外開放口岸之貿易、航運、工業等及通商口岸省之狀況和發展十年報告》，先后編成1881—1891年，1892—1901年，1902—1911年，1912—1921年，1922—1931年五冊（副書名各異）

[279] China.The Maritime Customs.Treaties，conventions，etc.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2 vols.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1917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中國與外國之間的條約、協約》，2卷

[280] China handbook 1937—1943：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jor 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six years of war，comp.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New York：Macmillan，1943.China handbook，1937—1944：… in seven years… Chungking：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1944.China handbook，1937—1945（Chan-shih Chung-hua chih），new edition with 1946 supplement.New York：Macmillan，1947.China handbook，1950，comp.China Handbook Editorial Board.New York：Rockport Press，Inc.，1950

《中華志，1937—1943年：六年抗戰中國重大發展綜述》，中國宣傳部編：《戰時中華志，1937—1945年》，新版增1946年附錄，《中華志，1950年》，《中華志》編輯部編

[281] China Quarterly.Quarterly.London，1960— 1.960 to Dec.1976 Published by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from Dec.1976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中國季刊》，倫敦，1960年—

[282] China Weekly Review.Shanghai，1917—

《密勒氏評論報》，上海，1917年—

[283] China white paper.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中國問題白皮書》，見美國國務院：《美國和中國的關系》

[284] The China year book，ed.by H.G.W.Woodhead.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12—21；Tientsin：The Tientsin Press，1921—30；Shanghai：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Herald，Ltd.，1931—9

《中華年鑒》，伍德海編

[285] China’s spiritual mobilization：outline of the plan.Chungking：The China Information Committee，1939

《中國的精神動員：計劃綱要》

[286]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ung-kuo she-hui k’o-hsueh yuan

中國社會科學院

[287]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Peking.Monthly，Jan.1927—

《中國經濟雜志》，北京，月刊，1927年1月—

[288]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Peking.Incorporated in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from Jan.1927

《中國經濟月刊》，北京，1927年1月起并入《中國經濟雜志》

[289] Chinese Literature.Monthly.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Autumn 1951—

《中國文學》，月刊，北京，1951年秋—

[290] Chinese Press Review，comp.by United States Consulates.Chungking，1942—5；Shanghai，1946—9

《中國新聞評論》，美國領事館編，重慶，1942—1945年；上海，1946—1949 年

[291] Chinese Recorder.Shanghai，1867—1941《教務雜志》，上海，1867—1941年

[292] 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Semia-nnual 1975—83.From 9.2（Feb.1984）became Republican China

《中華民國史研究通訊》，半年刊，1975—1983年，從第9卷第2期（1984 年2月）更名為《中華民國史》

[293] Ching-chi chou-pao（Economic weekly）.Shanghai，Nov.1945—

《經濟周報》，上海，1945年11月—

[294] Ching-chi yen-chiu（Economic research）.Peking，April 1955—

《經濟研究》，北京，1955年4月—

[295] Ching Chun-chien.‘Lun Ch’ing-tai she-hui ti teng-chi chieh-kou’（O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g dynasty society）.Ching-chi yen-chiu so chi-k’a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3（19811）—65

經君健：《論清代社會的等級結構》，《經濟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

[296] Ching Su and Lo Lun.Ch’ing-tai Shant-ung ching-ying ti-chu ti she-hui h sing-chih（Landlord and labour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se studies from Shantung）.Chinan：Jen-min，1959

景甦和羅侖：《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

[297] Ching Yuan-shan.Chü-i ch’u-chi（A first collection of Chü-i）.3 vols.Shanghai，1902

經元善：《居易初集》

[298] Ch’ing-hua ta-hsueh hsiao-shih pienh-sieh-tsu，comp.Ching-hua ta-hsueh hsiao-shih-kao（Draft history of Tsinghua University）.Peking Chung-hua，1981

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

[299] Ch’ing-mo ch’ou-pei li-hsien tang-an shih-liao（Archiv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preparation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the late Ch’ing），comp.Ku-kung po-wu-yuan，Ming-Ch’ing tang-an pu，Peking：CH，1979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

[300] Ch’ing-shih lun-ts’ung（Essays on Ch’ing history），Peking：CH，1979—

《清史論叢》，北京，1979—

[301] Ch’ings-hih wen-t’i（Ch’ing history problems）.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Ch’ing Studies founded by Mary C.Wright and Jonathan Spence；irregular，then semi-annual，April 1965

《清史問題》，芮瑪麗和史景遷創立的清史研究會的會刊，不定期，后來改為半年刊，1965年4月—

[302] Ch’ing-tai chih-kuan nien piao.See Ch’ien Shih-fu

《清代職官年表》，見錢實甫

[303] Ch’ing-tai tang-an shih-liao ts’ung-pien（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Ch’ing archives），issued by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Chung-kuo ti-i l ishih tang-an-kuan）.Peking：CH，1978—

《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表

[304] Ch’ing-tai ti-tsu po-hsueh hsing-t’ai（Forms of land rent exploitation in the Ch’ing period）.2 vols.comp.Chung-kuo ti-i li-shih tang-an-kuan and 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 li-shih yen-chiu-so（Institute of history，CASS）Peking：CH，1982

《清代地租剝削形態》，2卷，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305] Ch’ing-tao shih-pao（Tsingtao times）.Tsingtao，May 1932—

《青島時報》，青島，1932年5月—

[306] Ch’iu Ch’ang-wei.Kuang-hsi hsien-cheng（County government in Kwangsi）.Kweilin：Kuei-lin wen-hua kung-ying she桂林文化供應社，1941

邱昌渭：《廣西縣政》

[307] Ch’iu Yü-lin.‘Ching-shih tah-sueh-t’ang yen-ko lueh’（A brief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in Ch’iu Yü-lin，comp.Ch’ing-tai i-wen（Informal records of the Ch’ing period），chüan 5.1—7.n.p.Reprint，Taipei：Hua-wen shu-chü華文書局，1969

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收入邱玉麟（音）編：《清代軼聞》

[308] CHOC.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劍橋中國史》

[309] Chou Ch’eng.Shan-hsi ti-fang tzu-chih kang-yao（An outline of Shansi local self-government），in Chou Ch’eng，comp.Ti-fang tzu-chih chiang-i（Leet-ures on local self-government）.Shanghai：T’ai-tung shu-chü泰東書局，1925

周成：《山西地方自治綱要》，收入周成編：《地方自治講義》

[310] Chou Chin，ed.Chung-kuo hsien-taiw en-hsueh yen-chiu ts’ung-k ’an（Series of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30 vols.Taipei：Ch’eng-wen成文，1980

周錦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30卷

[311] Chou Chung-ch’i.‘Lun ko-ming’（On revolution）.Kuan-ch’a，25 Jan.1947，pp.6—10

周鍾岐：《論革命》，《觀察》，1947年1月25日

[312] Chou En-lai.‘Mu-ch’ien tang ti tsu-chih wen-t’i’（Current problem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arty）.n.p.May，1929.Mimeographed

周恩來：《目前黨的組織問題》，1929年5月，油印

[313] Chou En-lai.‘Shao-shan pao-kao’（Report by Shao-shan）.n.p.：1931.Mimeographed

周恩來：《少山報告》，1931年，油印

[314] Chou，Eric.See Crozier，Brian

埃里克·周，見布賴恩·克羅澤

[315] Chou K’ai-ch’ing.K’ang-chan i-ch’ien chih Chung-Jih kuan-hsi（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Taipei：Tzu-yu自由，1962

周開慶：《抗戰以前之中日關系》

[316] Chou Li-Po.The hurricane（Pau-feng tsou-yü）.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5

周立波：《暴風驟雨》

[317] Chou Pang-tao.Chin-tai chiao-yü hsien-chin chuan-lueh（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early leaders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Taipei：Publications Division，University of Chinese Culture，1981

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傳略》

[318] Chou Shun-hsin.The Chinese inflation，1937—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reprinted 1969

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1949年》

[319] Chou Yang.‘ Kuan-yü kuo-fang wen-hsueh’（Concerning national defence literature），in Lin Ts’ung，ed.Hsien chieh-tuan ti wen-hsueh lun-chan，31—8

周揚：《關于國防文學》，收入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

[320] Chou Yuan-ho.‘Ch’ing-tai jan-k’ou yen-chiu’（Research on Ch’ing dynasty population）.Chung-kuo she-hui k’o-hsueh（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1982）161—88

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321] Chow，Yung-teh.Social mobility in China；status careers among the gentry in a Chinese community.New York：Atherton Press，1966

周榮德：《中國的社會流動：中國社會士紳中的地位經歷》

[322] Christie，Clive.‘Great Britain，China and the status of Tibet，1914—21’.Modern Asian Studies，10.4（Oct.1976）481—508

克萊夫·克里斯蒂：《英國、中國與西藏的地位，1914—1921年》，《現代亞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年10月）

[323] Chu Chia-hua.‘K’ang-chan ti-pa-nien chih chiao-yü’（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eighth year of the war），in Wang Yü-chün and Sun pin，Chu Chia-hua hsien-sheng yen-lun chi（Dissertations of Dr.Chu Chia-hua），171—3.Taipei：IMH，1977

朱家驊：《抗戰第八年之教育》，收入王聿均和孫斌：《朱家驊先生言論集》

[324] Chu Pao-chin.V.K.Wellington Koo：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1912—1966.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1

朱葆瑨：《顧維鈞：中國外交官與民族主義外交個案研究，1912—1966年》

[325] Chu，Samuel C.Reformer in modern China：Chang Chien，1853—192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5

朱昌峻：《近代中國的維新人物：張謇，1853—1926年》

[326] Chu Tzuc-hia Chin Hsiung-Pai.Wang cheng-ch’üan ti k’ai-ch’ang yü shouch’ang（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of the drama of the Wang regime）.6 vols.Hong Kong：Wu Hsing-chi shu-pao-she吳興記書報社，1974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6卷

[327] Ch’u An-P’ing.‘Chung-kuo ti cheng-chü’（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Kuan-ch’a，8 March.1947，pp.3—8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3月8日

[328] Ch’u An-P’ing.‘P’ing P’u-li-t’e ti p’ien-ssu ti pu-chien-k’ang ti fang Hua pao-kao’（A critique of Bullitt’s biased unhealthy report on his visit to China）.Kuan-ch’a，25 Oct.1947，pp.3—5

儲安平：《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觀察》，1947年10月25日

[329] Ch’ü Chih-sheng.K’ang-chan chi-li（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Taipei，Chung-hua，1965

曲直生：《抗戰紀歷》

[330] Ch’ü Ch‘iuP-ai.‘Chi-an ti ch’ü-te he sang-shih’（The conquest and loss of Chi-an）.Shih hua（True words）（Shanghai），2（9 Dec.1930）3—4

瞿秋白：《吉安的取得和喪失》，《實話》，第2期（1930年12月9日）

[331] Ch’ü’ Ch’iu-Pai，‘Chung-kuo hsicn-chuang yü Kung-ch’an-tang ti jen-wu’（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tasks of the CCP），report at the November conferenee，in Hu Hua，Chung-kuo hsin-min-chu chu-i …tzu-liao，220—2

瞿秋白：《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收入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

[332] Ch’ü T’ung-tsu.Local gove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瞿同祖：《中國清代地方政府》

[333] Chuan-chiw 　en-hsueh（Biographical literature）.Monthly.Taipei，1962—

《傳記文學》，月刊，臺北，1962—

[334] Chuan，Han-sheng and Kraus，Richard A.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5

全漢昇和理查德·A.克勞斯：《清代中葉的米市場和貿易：物價史論》

[335] Ch’uan Shan ka-ming ken-chü-ti li-shihw 　en-hsien hsuan-pien（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Szechwan-Shensi revolutionary base area）.2 vols.Chengtu：Ssu-ch’uan Jen-min，1979

《川陜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獻選編》，2卷

[336] Ch’üan-kuo tiao-ch’a pao-kao（Draft report of the land survey of China）.Nanking：1937

《全國調查報告》

[337] Chuang Tse-Hsuan.‘K’ang-chan shih-nien-lai Chung-kuo hsueh-hsiao chiaoyü tsung-chien-t’ao’（General assessment of Chinese formal education in the ten yea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Chung-hua chiaoyü-chieh（Chinese education），NS，1.1（15 Jan.1947）

莊澤宣：《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討》，《中華教育界》，新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

[338] Chuang Yü and Ho Sheng-nai，eds.Tsui-chin san-shih-w un-ien chih Chungkuo chiao-yü（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last thirty-five years）.Shanghai：CP，1931

莊俞和賀圣鼐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

[339] Ch’uang shih-chi.（The epoch poetry quartely）.Taipei.October 1954—

《創世紀》，季刊，臺北，1954年10月—

[340] Chūgoku no seiji to keizai：ko MuramatsuYūji kyoju tsuitō ronbunshū中國の政治と經濟：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論文集（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ūji Muramatsu commemorative volume）.Tokyo：Tōyō Keizai Shinpō sha東洋經濟新報社，1975

《中國之政治與經濟：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論文集》

[341] Chūgoku nōson kankō chōsa kankōkai comp.Chūjoku.nōson kankō chōsa（A survey of traditional customs in Chinese villages）.6 vols.Tokyo：Iwanami shoten巖波書店，1952

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習慣調查》，6卷

[342] Ch’un-ch’iu（Spring and autumn）.Taipei.July 1964—

《春秋》臺北，1964年7月—

[343] Ch’ün-chung（The masses）.Chungking：1938（vol.2）—

《群眾》，重慶，1938年（第2卷）—

[344] Ch’ün-yun chih-shih hui-pien（A compilation of mass movement directives）.n.p.：Chung-kung Chi-Lu-Yü pien-ch’ü tang wei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委，Sept.1945

《群眾指示匯編》

[345] Chung，An-min.‘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1928—1949’.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D.dissertation，1953

鐘安民（音）：《中國現代制造業的發展，1928—1949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53年

[346] Chung-hua chiao-yü chieh（Chung Hua educational review）.Special issues.‘Chanhou liang-nien lai Chung-kuo chiao-yü ch’üan-mao’（The state of Chinese education two years after the war）.NS 2.1，2（15 Jan.1948；15 Feb.1948）.Shanghai：CH

《中華教育界》特輯，《戰后兩年來中國教育全貌》，新第2卷第1、2期（1948年1月15日，1948年2月15日）

[347] 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men wen-hsien pien-tsuan wei-yuanhu（iEditorial committee for the fiftieth year of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ed.Kung-f ei huo-kuo shih-liao hui-pien（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nation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Communist bandits）.3 vols.Taipei：Cheng-chung，1964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共匪禍國史料匯編》，3卷

[348] Chung-hua min-kuo shih tang-an tzu-liao hui-pien（Archival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issued by Chung-kuo ti-erh li-shih tang-an-kuan（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Kiangsu：Jen-min，1979—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表

[349] Chung-hua min-kuo t’ung-chi t’i-yao.See Kuo-min Cheng-fu chu-chi-ch’u

《中華民國統計提要》，見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

[350] Chung-Jih chan-cheng shih-lueh（Sketch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Taipei：Cheng-chung，1968

《中日戰爭史略》

[351] Chung-kung k’ang-chan i-pan ch’ing-k’uang ti chieh-shao（A briefing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war activities）.Photocopy with English title.Chiehfang-she，comp.n.p.，1944

《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影印本有英文書名，解放社編

[352] Chung-kung tang-shih ts’an-k’ao tzu-liao（Referen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CP）.Chung-kung chung-yang tang-hsiao tang-shih chiao-yen-shih（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CP central party school），ed.Nei-pu fa-hsing（internal use only）.8 vols.Peking：Jen-min，1979

《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編，內部發行，8卷

[353] Chung-kung ti cheng-chih kung-tso（The political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Kiangsu Provincial Committee，n.d.

《中共的政治工作》，江蘇省委編，無日期

[354] Chung-kuo che-hsueh（Chinese Philosophy）.Peking，August 1979—

《中國哲學》，北京，1979年8月—

[355] Chung-kuo chin-tai ch’i-k’an p’ien-mu hui-lu（Collected tables of contents of modern Chinese periodicals），ed.by Shang-hai t’u-shu-kuan.Shanghai：Jenmin，1965—

《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上海圖書館編

[356] 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hih yen-chiu chi-k’an（Studies i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Quarterly.Peking，1932—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季刊，北京，1932年—

[357] Chung-kuo chin-tai shih lun-chu mu-lu，1949—1979，（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during 1949—1979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comp.by Fu-tan tahsueh li-shih-hsi tzu-liao-shih.Shanghai：Jen-min，1980

《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1949—1979》，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

[358] Chung-kuo chin-tai shih tzu-tien（A dictiona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comp.by Ch’en Hsu-lu et al.Shanghai：Shang-hai tz’u-shu ch’u-pan-she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

《中國近代史詞典》，陳旭麓等編

[359] Chung-kuo chin-tai ssu-hsiang-shih tzu-liao（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See also Shih Chün.Tokyo：Daian，1968

《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也見石峻

[360] Chung-kuo ching-chi（Chinese economy）.Nanking，April 1933—

《中國經濟》，南京，1933年4月—

[361] Chung-kuo ch’ing-nien（Chinese youth），ed.by Yun Tai-ying et al.Shanghai，20 Oct.1923—1927

《中國青年》，惲代英編，上海，1923年10月20日—1927年

[362] Chung-kuo hsien-taiw 　en-hsueh shih ts’an-k’ao tzu-liao（Research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ed.by Pei-ching shih-fan tahsueh Chung-wen hsi hsien-tai wen-hsueh chiao-hsueh kai-ko hsiao-tsu（Peking Normal University，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eaching reform group）.3 vols.Peking：Kao-teng chiaoy-ü高等教育，1959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學改革小組編，3卷

[363] Chung-kuo hsien-tai wen-hsuch shih tzu-liao hui-pien（Collected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n overall title for several hundred volumes of source materials on individual writers and general literary history published by several publishers since about 1981，subdivided into at least two sub-series each under an editorial committee，under the overall super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Peking

《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大約從1982年起由幾家出版社出版的各個作家和文學通史的資料集幾百卷的總書名，這類資料至少分為兩個子系列，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全面指導下，各由一個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

[364] Chung-kuo hsien-tai wen-hsueh yen-chiu ts’ung-k’an（Col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Peking：Pei-ching ch’u-Pan-she北京出版社，1979—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365] Chung-kuo hsien-taiw 　en-i tzu-liao ts’ung-k’an（Collected materials on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hanghai：Shang-hai wen-i上海文藝，1979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

[366] Chung-kuo hsien-taiw 　eni- tzu-liao ts’ung-k’an ti-i chi（Sourc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irst series），ed.by   
Shang-hai wen-i ch’u-pan-she pien-chi pu（Editorial department of Shanghai literature）.Shanghai：Shang-hai wen-i，1962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一輯》，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部編

[367] Chung-kuo jen-min chieh-fang chün cheng-chih hsueh-yuan hsun-lien pu t’ushu tzu-liao kuan，Mao Tse-tung chu-tso，yen-lun，wen-tien mu-lu（A list of Mao Tse-tung’s works，utterances，and telegrams）.Peking，February 1961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訓練部圖書資料館：《毛澤東著作言論文電目錄》

[368] Chung-kuo jen-min ta-hsueh Chung-kuo li-shih chiao-yen-shih Chung-kuo tzu-pen chu-i meng-ya wen-t’i t’ao-lun chi（Collected articles on the question of capitalist sprouts in China）.2 vols.Peking：San-lien，1957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集》，2卷

[369] Chung-kuo jih-pao（China daily）.Nanking，1934—

《中國日報》，南京，1934年—

[370] Chung-kuo ko hsiao-tang-p’ai hsien-k’uang（Present state of the minority parties in China）.n.p.，1946

《中國各小黨派現況》

[371] Chung-kuo ko-ming po-wu-kuan（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mp.Pei-fang ti-ch’ü kung-jen yun-tung tzu-liao hsuan-pien 1921—1923（Selected materials on the local workers’rnovement in North China 1921—1923）.Peking：Pei-ching ch’u-pan-she北京出版社，1981

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

[372] Chung-kuo ko-ming po-wu-kuan tang-shih yen-chiu-shih（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Chinese revolutionary museum），ed.Tang-shih yen-chiu tzuliao（Research materials on party history）.Ch’eng-tu：Jen-min，1980

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

[373] Chung-kuo k’o-hsueh yuan Shang-hai ching-chi yen-chiu so，comp.Shang-hai chieh-fang ch’ien-hou wu-chia tzu-liao hui-pien（1921—1957）（Collected materials on pri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1921—57）.Shanghai：Jen-min，1958

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解放前后物價資料匯編（1921—1957年）》

[374] Chung-kuo Kung-ch’an-tang tsai Chiang-hsi ti-ch’ü ling-tao ko-ming toucheng ti li-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revolutionary stuggles led by the CCP in Kiangsi）.ed.by Kiangsi jen-min ch’u-pan-she，Kiangsi，1958.See Liu P’ei-shan

《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資料》，江西人民出版社編，見劉培善

[375] Chung-kuo kung-yeh（Chinese industry）.Nanking，Nov.1932—；

《中國工業》，南京，1932年11月—；桂林，1942年1月—

[376] Chung-kuo kuo-min cheng-fu Chün-shih wei-yuan-hui wei-yuan-chang Nanch’ang hsing-ying（Headquarters of th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ilitary Commission），comp.Ko-sheng kao-chi hsing-cheng jenyuan feng-chao Nan-ch’ang chi-hui chi-lu（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high provincial administrators held at Nanchang）.Nanchang，1934

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編：《各省高級行政人員奉召南昌集會紀錄》

[377] Chung-kuo Kuo-min-tang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hui-i-lu（Minutes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of China）.Reprinted，Washington，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71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

[378] Chung-kuo lao-kung yun-tung shih pien-tsuan wei-yuan-hui，ed.Chung-kuo lao-kung yun-tung shi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ur movement）.5vols.Taipei：Chung-kuo lao-kung fu-11 ch’u-pan-she中國勞工福利出版社，1959

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5卷

[379] Chung-kuo li-shih-hsueh nien-chien 1979（1979 year book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comp.by Chung-kuo li-shih-hsueh nien-chien pien-chi-tsu.Peking：Jen-min，1981； …1981.Peking：Jen-min，1981； …1982，comp.by Chung-kuo shih-hsueh-hui Chung-kuo li-shih-hsueh nienc-hien pienchi-pu.Peking：Jen-min，1982

《中國歷史學年鑒，1979》，中國歷史學年鑒編輯組編；《中國歷史學年鑒，1982》，中國史學會《中國歷史學年鑒》編輯部編

[380] Chung-kuo li-shih ti-t’u chi，ti-pa-ts’e（Coll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maps，vol.8），ed.by Chung-kuo li-shih ti-t’u chi pien-chi-tsu.Shanghai：Chunghua ti-t’u hsueh-she中華地圖學社，1975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編

[381] Chungk-uo nung-min（The Chinese farmer）.Canton：Farmers’Bureau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Kuomintang of China，Jan.1926—；also Chungking.Feb.1942—P.hotolithographic reprint edn.of Canton pub.，Tokyo：Daian，1964.

《中國農民》，廣州，1926年1月—；重慶，1942年2月—

[382] Chungk-uo nung-ts’un（The Chinese village）.Shanghai，Oct.1934—

《中國農村》，上海，1934年10月—

[383] 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Beijing（Peking），many institutes and branches

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設有許多研究所和分院

[384] Chung-kuo she-hui k’o-hsueh-yuan Li-shih yen-chiu so，ed.Chung-kuo shih yenchiu（‘Zhongguoshi yanjiu’）（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Peking，197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史研究》，北京，1979—

[385] Chungk-uo tzu-pen chu-i meng-ya wen-t’i lun-wen-chi（Essays on capitalist sprouts in China），comp.by Ming-Ch’ing History Study Section，Department of History，Nanking University.Nanking：Chiang-su Jen-min，1983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教研室編

[386] Chungk-uo tzu-pen chu-i meng-yaw 　en-t’i t’ao-lun chi（Collected debate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sprouts of capitalism’ in China），comp.Chung-kuo jenmin ta-hsueh Chung-kuo li-shih chiao-yen shih（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Chinese History Department）.2 vols.Peking：San-lien，1957…Hsüpien續編（…Comtinuation[of the preceding item]）.Peking：San-lien，1960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集》，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歷史教研室編，2卷《；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集續編》

[387] Chungk-uow en-hsueh chia tz’u-tien（Dictionary of Chinese writers），ed.by Pei-ching yü-yen hsueh-yuan Chung-kuo wen-hsueh chia tz’u-tien pienwei hui.Hsien-tai period，vol.1.Peking：Pei-ching yü-yen hsueh-yuan，1978；vol.2.Ch’engtu：Szechwan Jen-min，1982

《中國文學家辭典》，北京語言學院中國文學家辭典編委會編，現代

[388] Chung-yang jih-pao（Central daily news）.Nanking，1928—

《中央日報》，南京，1928年—

[389] Chung-yang kao ch’üan-tang t’ung-chih shu（Letter from the centre to all comrades）.n.p.：11 Nov.1928.Mimeographed

《中央告全黨同志書》，1928年11月11日，油印

[390] Chugn-yang kuan-yü tsai Shan-tung Hua-chung fa-chan wu-chuang chien-li ken-chü-ti ti chih-shih’（Central directive concerning development of armed forces and establishment of base areas in Shantung and Central China），28 January 1940.

《中央關于在山東華中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

[391] Chung-yang nung-yeh-pu chi-hua ssu comp.Liang-nien-lai ti Chung-kuo nung-ts’un ching-chi tiao-ch’a hui-pien（A collection of surveys on the Chinese farm economy in the past two years）.Shanghai：CH，1952

中央農業部計劃司編：《兩年來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匯編》

[392] Chung-yang pan-yueh-k ’an（Central semi-monthly）.Nanking，1928—

《中央半月刊》，南京，1928年—

[393] Chung-yang t’ung-hsin（Central newsletter）.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Aug.1927—

《中央通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1927年8月—

[394] Chung-yang yen-chiu yuan：Academia Sinica，Nanking，Taipei，several institutes

中央研究院，南京，臺北，設有若干研究所

[395] Chung-yang yen-chin-yuan Chin-tai-shih yen-chin-so chi-k ’a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Taipei，Aug.196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1969年8月—

[396] CI.Communist International，Comintern

共產國際

[397] Civilw ar in China，1945—50.Taiwan：translated and prepared at the field level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US）Dept.of the Army；Library of Congress microfilm 51461

《中國內戰，1945—1950年》，由美國陸軍部軍史局主持在臺灣編譯

[398] CJCC：see Wu Hsiang-hsiang，Ti-erh-tz’u Chung-J ih chan-cheng shih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399] CKNT：see Chung-kuo nung-ts ’un

《中國農村》

[400] Clopton，Robert W.and Ou Tsuin-chen，trans.and ed.John Dewey，lectures in China，1919—1920.Honolulu：East-West Center，1973

羅伯特·W.克洛普頓和歐俊臣（音）編譯：《杜威在華講演集，1919—1920年》

[401] Clubb，O.Edmund.Twentieth centu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3rd edn.1978

柯樂博：《20世紀的中國》

[402] Clubb，O.Edmund.The witness and 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

柯樂博：《目擊者和我》

[403] Coble，Parks M.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0

帕克斯·M.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年》

[404] Cochran，Sherman.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ss，1980

謝爾曼·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卷煙工業中的中外競爭，1890—1930年》

[405] Cochran，Sherman and Hsieh，Andrew，trans.One day in China，May 21，1936.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謝爾曼·科克倫和安德魯·謝譯：《中國一日，1936年5月21日》

[406] Cohen，A.The communism of Mao Tse-tun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阿瑟·科恩：《毛澤東的共產主義》

[407] Cohen，Paul A.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柯文：《傳統與近代之間：王韜及晚清中國的改革》

[408] Cohen，Paul A.‘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ir impact to 1900’.CHOC 10.543—90

柯文：《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劍橋中國史》，第10 卷

[409] Cohen，Paul A.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美國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歷史著作》

[410] Cohen，Paul A.and Sehrecker，John E.，eds.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6

柯文和石約翰編：《19世紀中國之改革》

[411] Cohen，Warren I.Who fought the Japanese in Hunan？Some views of China’s war effort’.JAS 27.1（Nov.1967），111—15

沃倫·I.科恩：《誰在湖南與日軍作戰？關于中國作戰成就的若干看法》，《亞洲研究雜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

[412] Cohen，Warren I.The Chinese connection：Roger S.Greene，Thomas W.Lamont，George E.Sokolsky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

沃倫·I.科恩：《中國派：顧臨、拉門德、索克思與美國—東亞關系》

[413] Cohen，Warren I.，ed.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沃倫·I.科恩編：《美國—東亞關系的新領域：獻給多蘿西·博格的論文集》

[414] Cole，James.‘Shaohsing：studies in Ch’ing social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5

寇爾：《紹興：清代社會史研究》，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

[415] Cole，James.‘The Shaoxing connection：a vertical administrative clique in late Qing China’.ModernC hina，6.3（July 1980）317—26

寇爾：《紹興派系：清代末葉的一個垂直行政派系》，《現代中國》，第6卷第3期（1980年7月）

[416] Cole，James.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 pings：Bao Lisheng’s ‘Righteous Army of Dongan’.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寇爾：《民眾對太平軍：包立生的東安義軍》

[417] Comintern and the East，The.Moscow，1979.English edn.of Komintern i vostok.See Ulyanovsky，R.A.

《共產國際與東方》，見R.A.烏里揚諾夫斯基

[418] Committee on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comp.A surve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New York，1954

美國高等院校中國學生調查委員會編：《過去一百年美國高等院校中國學生調查》

[419]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Quarterly.Cambridge，England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季刊，1959—

[420] Compton，Boyd.Mao’s China：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4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2

博伊德·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整風文獻，1942—1944年》

[421]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ⅩⅢème.Enquête sur les mouv ements paysans dans le monde contemporain，rapport général.Moscow：E-ditions‘Nauka’.1970

第十三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當代世界農民運動調查，總報告》

[422] Coox，Alvin D.‘Recourse to arms：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1937—1945’，in Alvin D.Coox and Hilary Conroy，eds.China and Japan.

阿爾文·D.庫克斯：《訴諸戰爭；中日沖突，1937—1945年》，收入阿爾文·D.庫克斯和希拉里·康羅伊編：《中國與日本》

[423] Coox.Alvin D.and Conroy，Hilary，eds.China and Japan：a search for balance since World War I.Santa Barbara：Clio Press，1978

阿爾文·D.庫克斯和希拉里·康羅伊編：《中國與日本：尋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平衡》

[424] Cobett，Charles Hodge.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

查爾斯·霍奇·科貝特：《齊魯大學》

[425] CP.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

[426] CPR.See Chinese Press Review

《中國新聞評論》

[427] CQ.See The China Quarterly

《中國季刊》

[428] Creel，Herrlee G.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1，The Western Chou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顧立雅：《中國國家管理的起源，第一卷，西周》

[429] Croly，Herbert.Willard Straight.New York：Macmillan，1924

赫伯特·克羅利：《司戴德》

[430] Crowley，James Buckley.Japan’s China policy，1931—1938：a study of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foreign policy.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1960

詹姆斯·巴克利·克勞利：《日本的對華政策，1931—1938年：軍方在決定對外政策中的作用研究》

[431] Crowley，James B.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1930—193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詹姆斯·B.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1930—1938年》

[432] Crowley，James B.，vol.ed.Modern East Asia：essays in interpretation（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ohn Morton Blum）.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1970

詹姆斯·B.克勞利編：《現代東亞：解說文集》

[433] Crozier，Brian.The man who lost China：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Eric Chou.New York：Scribner，1976

布賴恩·克羅澤：《失去中國的人：第一部蔣介石全傳》，與埃里克·周合作

[434] CSWT.See Ch’ing-shih wen-t’i

《清史問題》

[435] CWR.See China Weekly Review

《密勒氏評論報》

[436] CYB.See China year book，The

《中華年鑒》

[437] Dallek，Robert.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年》

[438] Davies，John Paton，Jr.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London：Robson，1974

小約翰·佩頓·戴維斯：《落后的龍：美、英、日、俄與中國以及彼此間的沖突》

[439] Day.Clarence Burton.Hangchow University：a brief histor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

克拉倫斯·伯頓·戴：《之江大學：簡史》

[440] Day，M.Henri.Máo Zédōng 1917—1927：documents.Skriftserien för Orientaliska Studier no.14.Stockholm，1975

M.亨利.戴：《毛澤東，1917—1927年：文獻》

[441] Dayer，Robert Allbert.Bankers and diplomants in China，1919—1925：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London，Totowa，NJ：F.Cass，1981

羅伯特·奧爾伯特·戴耶：《在華的銀行家和外交官，1919—1925年：英美關系》

[442] Deane，Hugh.‘Political reaction in Kuonintang China’.Amerasia，5.5（July 1941）209—14

休·迪恩：《國民黨中國的政治反動》，《亞美雜志》，第5卷第5期（1941 年7月）

[443] DeBary，W.Theodore.‘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a seventeenth century view’，in John K.Fairb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63—203

狄百瑞：《中國專制政治與儒家理想：17世紀考察》，收入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

[444] Degras，Jane.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documents.3 vol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6，1960，1965

簡·德格拉斯：《共產國際，1919—1943年：文獻選編》，3卷

[445] Deliusin，L.P.ed.Obshchestvo gosudarstvo v Kitae（Society and state in China）.Moscow：Nauka，annual，1970—

L.P.杰柳辛編：《中國社會與國家》，年刊，1970年—

[446] Deliusin，L.P.See Grigoriev，A.M.

L.P.杰柳辛，見A.M.格里戈里耶夫

[447] Dernberger，Robert F.‘The role of the foreigner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1840—1949’，in 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47

羅伯特·F.德恩伯格：《外國人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收入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

[448] Deyon，Pierre and jacquart，Jean，eds.Les he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30，vol.2 of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u mond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ierre Leon.Paris：Armand Colin，1978

皮埃爾·戴翁和讓·雅卡爾編：《發展的停頓，1580—1730年》，《世界經濟社會史》第2卷

[449] Dingman，Roger.Power in the Pacific：the origins of naval arms limitation，1914—192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

羅杰·丁曼：《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海軍軍備限制的由來，1914—1922年》

[450] Dirlik，Arif.‘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Modern China，1.1（Jan.1975）46—74

阿里夫·德里克：《群眾運動與國民黨左派》，《現代中國》，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

[451] Dirlik，Arif.‘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JAS34，4（Aug.1975）945—80

阿里夫·德里克：《新生活運動的思想意識基礎：反革命研究》，《亞洲研究雜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

[452] Dirlik，Arif.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編史學的淵源》

[453] Dirlik，Arif.‘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marxist concept of capitalism：a critical examination’.Modern China，8.1（Jan.1982）105—32

阿里夫·德里克：《中國歷史學家與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觀念：批判研究》，《現代中國》，第8卷第1期（1982年1月）

[454] Domes，J ürgen.Vertagte Revolution：die Politik der Kuomintang in China，1923—1937.Berlin：Walter de Gruyter&Co.，1969

于爾根·多梅斯：《推遲的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1923—1937年》

[455] Donovan，Peter，Dorris，Carl E.and Sullivan，Lawrence R.Chinese communist materials at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rchives，Taiwan.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76

彼得·多諾曼、卡爾·E.多里斯和勞倫斯·R.沙利文：《臺灣調查局檔案中的中國共產黨資料》

[456] Dorn，Frank.The Sino-Japanese War，1937—41：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New York：Maemillan，1974

弗蘭克·多恩：《中日戰爭，1937—1941年：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變》

[457] Dorris，Carl E.‘People’s war in north China：resistance in the Shansi-Chahar-Hopeh border region，1938—1945’.University of Kansas，Ph.D.dissertation，1975

卡爾·E.多里斯：《華北的人民戰爭：晉察冀邊區的抗戰，1938—1945年》，堪薩斯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

[458] Dorris，Carl E.‘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CQ68（Dec.1976）697—719

卡爾·E.多里斯：《華北的農民動員與延安共產主義的起源》，《中國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

[459] Duara，Prasenjit.‘ Power in rural society：North China villages，1900—1940’.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ation，1983

普拉森吉特·杜阿拉：《鄉村社會中的權力：華北農村，1900—1940年》，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83年

[460] Duiker，William J.Ts’ai Yuan-P’ei，educator of modern China.University Park：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

威廉·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國的教育家》

[461] Eastman，Lloyd E.‘Ch’ing-i and Chines policy form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AS 24.4（Aug.1965）595—611

易勞逸：《清議與19世紀中國政策的形成》，《亞洲研究雜志》，第24卷第4期（1965年8月）

[462] Eastman，Lloyd E.‘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the Blue Shirts’.CQ49（Jan.—March 1972）1—31

易勞逸：《國民黨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藍衣社》，《中國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

[463] Eastman，Lloyd E.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年》

[464] Eastman，Lloyd E.‘Regional politic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Yunnan and Chungking’，in Paul K.T.Sib，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329—62

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云南與重慶》，收入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465] Eastman，Lloyd E.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smuggling，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1937—1945’，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275—303

易勞逸：《矛盾關系面面觀：戰爭期間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1945年》，收入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

[466] Eastman，Lloyd E.‘Peasants，taxes，and Nationalist rule，1937—1945’.Unpublished paper，Conference on Republican China，Taipei，1981

易勞逸：《農民、捐稅和國民黨統治，1937—1945年》，未刊論文

[467] Eastman，Lloyd E.Seeds of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易勞逸：《失敗的根源：國民黨中國在戰爭和革命中，1937—1949年》

[468] Ebrey，Patricia and Watson，James.‘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forthcoming

帕特里夏·埃布雷和詹姆斯·沃森：《中華帝國晚期的親屬組織》

[469] Edwards，Dwight W.Yenching Universit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with a section by Y.P.Mei on Yenching in Chengtu，1959

艾德敷：《燕京大學》

[470] Eihara Masao，trans.Shina ryokō nikki支那旅行日記（Diary of travel in China）.（Translation of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Tagebücher aus China.）2 vols.Tokyo：Keiō shuppansha慶應出版社，1944

老原正雄譯：《中國旅行日記（》費迪南德·馮·列區荷芬：《中國旅行日記》的日文譯本），2卷

[471] Elman，Benjamin.‘The unravelling of Neo-Confucianism：the Lower Yangtze，academic commu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h.D.dissertation，1980

本杰明·埃爾曼：《新儒學的闡釋：中華帝國晚期長江下游的學術界》，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

[472] Elman，Benjamin.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本杰明·埃爾曼：《從哲學到語言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和社會方面的變化》

[473] Elvin，Mark.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伊懋可：《中國昔日的模式》

[474] Elvin，Mark.‘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239—69

伊懋可：《上海的行政，1905—1914年》，收入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

[475] Elvin，Mark.‘Market towns and waterways：the county of Shang-hai from 1480 to 1910’，in 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441—73

伊懋可：《集鎮與水道：1480年至1910年的上海縣》，收入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476] Elvin，Mark and Skinner，G.William，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two world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

[477] d’Encausse，Helene and Schram，Stuart R.，eds.Marxism and Asia.Lon-don：Allen Lane，Penguin Press，1969

埃萊娜·當科斯和宣道華編：《馬克思主義與亞洲》

[478] Endicott，Stephen Lyon.Diplomacy and enterprise：British China policy，1933—1937.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75

斯蒂芬·萊昂·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英國對華政策，1933—1937年》

[479] Eng，Robert.‘Imp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economy：the Canton and Shanghai silk industry，1861—193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h.D.dissertation，1978

羅伯特·恩格：《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廣州和上海的絲綢業，1861—1932年》，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78年

[480] Epstein，Israel.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Boston：Little，Brown，1947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

[481] Epstein，Israel.Notes on labor problems in Nationalist China.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9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國民黨中國勞工問題札記》

[482] ‘Erh-shih-pa hua sheng’[Mao Tse-tung].‘T’i-yü chih yen-chiu’（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Hsin ch’ing-nien，3.2（April 1917）1—11（sep.pag.）

二十八畫生[毛澤東]：《體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1917年4月）

[483] Esherick，Joseph W.，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New York：Random House，1974

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

[484] Esherick，Joseph W.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周錫瑞：《中國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485] Esherick，Joseph W.‘Number games：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Modern China，7.4（Oct.1981）387—411

周錫瑞：《數字游戲：革命前中國土地分配的一篇筆記》，《現代中國》，第7卷第4期（1981年10月）

[486] Esherick，Joseph（Chou Hsi-jui）.‘Lun I-ho-ch’üan yun-tung ti she-hui ch’eng-yin’（On the social causes of the Boxer movement）.Wen shih che（Literature，history，and philosophy），1（19812）2—31

周錫瑞：《論義和拳運動的社會成因》，《文史哲》1981年第1期

[487] Esherick，Joseph W.‘Symposium on peasant rebellions：some introductory comments’.ModernC hina，9.3（July 1983）275—84

周錫瑞：《農民造反專題論集：若干介紹性評論》，《現代中國》，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

[488] Esherick，Joseph W.See Grove，Linda

周錫瑞，見琳達·格羅夫

[489] Esthus，Raymond A.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

雷蒙德·A.埃斯瑟斯：《西奧多·羅斯福與日本》

[490] Etō，Shinkichi.‘Hal-lu-feng-the first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pt Ⅰ.CQ8（Oct.D—ec.1961）161—83；ptⅡ，CQ 9（Jan.M—ar.1962）149—81

衛藤沈吉：《海陸豐：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第1部分，《中國季刊》，第8期（1961年10—12月）；第2部分，《中國季刊》，第9期（1962年1—3月）

[491] Etō，Shinkichi.Higashi-Ajia seijishi kenkyū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A study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history）.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68

衛藤沈吉：《東亞政治史研究》

[492] Etō，Shinkichi.See Miyazaki Tōten

衛藤沈吉，見宮崎滔天

[493] Eudin，Xenia Joukoff and Notrh，Robert C.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a documentary surve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色尼亞·茹科夫·尤丁和羅伯特·C.諾思：《蘇俄與東方，1920—1927年：文獻概覽》

[494] Ewing，Thomas E.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Chinese and Russian policies in Outer Mongolia 1911—1921.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vol.138，1980

托馬斯·尤因：《處于夾縫之中？中國和俄國在外蒙古的政策，1911—1921年》

[495] Fairbank，John 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費正清：《中國沿海通商與外交：開放通商口岸，1842—1854年》

[496] Fairbank，John 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

[497] Fairbank，John King，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的中國對外關系》

[498] Fairbank，John King.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New York：Harper&Row，1982

費正清：《專心研究中國：50年回憶錄》

[499] Fairbank，John K.，ed.Se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費正清編，見《劍橋中國史》

[500] Fairbank，John King and Liu，Kwang-Ching.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7.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corrected reprint，1961

費正清和劉廣京：《近代中國：中文著作書目指南，1898—1937年》

[501] Fairbank，John K.and Teng，Ssu-yü.Ch’ing administration：three，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費正清和鄧嗣禹：《清代行政：三項研究》

[502] Fairbank，John King，Banno Masataka and Yamamoto Sumiko，eds.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Harvard-Yenching Institiute Studies，26.Tuttle，1955；reissued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費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編：《日本的近代中國研究：19世紀和20世紀歷史和社會科學研究書目指南》

[503] Fairbank，John King，Bruner，Katherine Frost and Matheson，Elizabeth Mac-Leod，eds.The I.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with an intro.by L.K.Little.2 vols 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費正清、凱瑟琳·弗羅斯特·布魯納和伊麗莎白·麥克勞德·馬西森編：《總稅務司在北京：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致金登干書簡1868—1907年》，L.K.利特爾序，2卷

[504] Fairbank，Wilma.‘Chinese educational needs and programs of US-located agencies to meet them：a report to UNESCO’.Unpublished Manuscript，1948

威爾馬·費爾班克：《中國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國的機構滿足這些需求的計劃：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未刊文稿，1948年

[505]Fairbank，Wilma C.America’s cultrual experiment in China，1942—1949.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1976.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8839

威爾馬·C.費爾班克：《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實驗，1942—1949年》

[506] Fairbank，Wilma C.See Liang Ssu-ch ’eng

威爾馬·C.費爾班克，見梁思成

[507] Fan Ch’ang-chiang.‘Chi-o-hsien shang ti jan’（People on the line of hunger）.Han-hsueh yueh-k’an（Sweat and blood monthly），9.4（July 1937）116—36

范長江：《饑餓線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

[508] Fan-Chiang yun-tung shih（History of the anti-Chiang movement），ed.by Chung-kuo ch’ing-nien chün-jen she.Canton：1934

《反蔣運動史》，中國青年軍人社編

[509] Fang Chih.‘Min-tsu wen-hua yü min-tsu ssuh-siang’（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thought）.Wem-hua chien-she（Cultural reconstruction），1.2（10 Nov.1934）15—20

方治：《民族文化與民族思想》，《文化建設》，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日）

[510] Fang Chih-ch’un.Kan tung-pei Su-wei-ai ch’uang-li ti li-shih（A history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Northeast Kiangsi Soviet）.Peking：Jen-min，1980

方志純：《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

[511] Fang Chih-P’ing et al.Lunkuan-liao tzu-pen（On bureaucratic capital）.Canton：Tsung-ho綜合，1946

方志平等：《論官僚資本》

[512] Fang Hsien-t’ing，ed.Chung-kuo ching-chi yen-chiu（Stud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2 vols.Changsha：CP，1938.See also Fong，H.D.

方顯廷：《中國經濟研究》，2卷

[513] Farmer，Rhodes.Shanghai harvest：a diary of three years in the China War.London：Museum Press，1945

羅茲·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國戰爭中的三年日記》

[514] Faure，David.‘Local political disturbances in Kiangsu province，China，1870—1911’.Princeton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6

戴維·富爾：《中國江蘇省的地方政治動亂，1870—1911年》，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論文，1976年

[515] Faure，David.‘The rural economy of Kiangsu province，1870—1911’.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9.2（1978）365—472

戴維·富爾：《江蘇省的農村經濟，1870—1911年》，《中國研究所雜志》，第9卷第2期（1978年）

[516] Fei Hsial-t’ung.Peasant t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Preface by Bronislaw Malinowski.New York：Dutton，1939；London：G.Routledge，1939；kegan Paul，194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2；New York：AMS Press，1976

費孝通：《中國農民生活：長江流域農村生活實地研究》，布羅尼斯瓦夫·馬利諾夫斯基序

[517] Fei Hsiao-t’ung and Chang Chih-i.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5；London：Routledge，1949.Revised English edn prepa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Paul Cooper and Margaret Park Redfield

費孝通和張之毅：《鄉土中國：云南農村經濟研究》，與保羅·庫伯和瑪格麗特·帕克·雷德菲爾德合作撰寫英文修訂版本

[518] Fei H siao- t’ung.Chinas gentry：essays inrural-urban rel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Revised by Margaret Park Redfield with six life histories of Chinese gentry families collected by Yung-teh Chow：intro.by Robert Redfiel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費孝通：《中國士紳：城鄉關系論集》（瑪格麗特·帕克·雷德菲爾德用周榮德所收集的六個中國士紳家族的生活史修訂，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序）

[519] Fei Hsiao-tung.See Arkush，David.

費孝通，見戴維·阿庫什

[520] Feigon，Lee.Chen Duxiu：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李·菲貢：《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521] 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

赫伯特·菲斯：《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命的美國在中國的努力》

[522] Feng Ho-fa，ed.Chung-kuo nung-ts’un ching-chi tzu-liao（Materials on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y）.2 vols.Shanghai：Li-ming shu-chü黎明書局，1933 and 1935

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2卷

[523] Feng Hsueh-feng.Hui-i Lu Hsun（Reminiscence of Lu Hsun）.Peking：Jenmin wen-hsueh人民文學，1952

馮雪峰：《回憶魯迅》

[524] Feng Yü-hsiang.Wo so-jen-shih-ti Chiang Chieh-shih（The Chiang kai-shek I know）.Hong Kong：Wen-hua kung-ying-she文化供應社，1949

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525] Fenn，William P.The effec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Kowloon：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0

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

[526] Fenn，William Purviance.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Grand Rapids Michigan：Wm.B.Eerdmans，1976

威廉·珀維安斯·芬恩：《變化中的中國的教會高等教育，1880—1950年》

[527] Ferguson，Mary E.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1914—1951，New York：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1970

瑪麗·E.弗格森：《中國醫學理事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富有成果的合作

紀事，1914—1951年》

[528] Feuerwerker，Albert.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 1844—1916 and mandarin enterpri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

費維愷：《中國早期的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與官辦企業》

[529] Feuerwerker，Albert（Fei Wei-k’ai）.‘Lun erh-shih shih-chi ch’u-nien Chungkuo she-hui wei-chi’（On the social crisi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in Ts’ai Shang-ssu，ed.，Lun Ch’ing-mo Min-ch’u Chung-kuo shehui（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10 1—35

費維愷：《論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社會危機》，收入蔡尚思編：《論清末民初中國社會》

[530] Feuerwerker，Albert，ed.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report of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to a Sino-American symposium，Beijing，26 October-1 November 1980.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2

費維愷編：《從宋代至1900年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美國代表團在中美學術報告會上的報告，北京，1980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

[531] Feuerwerker，Albert.‘Economic trends.1912—49’.CHOC 12.28—127

費維愷：《經濟趨向，1912—1949年》，《劍橋中國史》，第12卷

[532] Feuerwerker，Albert.‘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CHOC 12.128—207

費維愷：《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存在》，《劍橋中國史》，第12卷

[533] Feuerwerker，Yi-tsi Mei.Ding Ling’s fiction—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梅儀慈：《丁玲的小說——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思想意識和敘事》

[534] Fewsmith，josep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4

約瑟夫·富史密斯：《中華民國的政黨、國家和地方名流：上海的商人團體與政治，1890—1930年》

[535] Fifield，Russell H.Woodrow Wilson and the Far East：the diplomacy of the Shantung question.New York：Crowell，1952；Hamden，Conn.：Archon Books，1965

拉塞爾·H.法菲爾德：《威爾遜與遠東：山東問題的外交》

[536] Fincher，John H.Chinese democracy：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1905—1914.London：Croom Helm，1981；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3

約翰·H.芬徹：《中國的民主：地方、省和國家政治中的自治運動，1905—1914年》

[537]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Peking.Chung-kuo ti-i li-shih tang-an-kuan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538] Fitzgerald，John.‘Mao in mufti：newly identified works by Mao Zedong’.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9（Jan.1983）1—16

約翰·菲茨杰拉德：《便裝的毛澤東：新近識別的毛澤東著作》，《澳洲中國學報》，第9期（1983年1月）

[539] Fletcher，Joseph.‘Ch’ing Inner Asia c.1800’.CHOC 10.35—106

約瑟夫·弗萊徹：《1800年前后清代的亞洲腹地》，《劍橋中國史》，第10 卷

[540] Fletcher，Joseph.‘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 in Mongolia，Sinkiang and Tibet’.CHOC 10.351—408

約瑟夫·弗萊徹：《清代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劍橋中國史》，第10卷

[541] Fletcher，William Miles.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in prewar Japa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2

威廉·邁爾斯·弗萊徹：《對新秩序的追求：戰前日本的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

[542] Fogel，Joshua A.and Rowe，William T.，eds.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essays in honor ofProfessor C.Martin Wilbur.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9

喬舒亞·A.福格爾和威廉·T.羅編：《關于變化中的中國的若干看法：韋慕庭教授紀念文集》

[543] Fogel，Joshua A.English translations Published in Ch’ing-shihw 　en-t’i（CSWT）of Japanese bibliographical surveys of 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published in Shigaku zasshi（SZ）in two series as follows：（1）‘Ming-Ch’ing studies in Japan：1979’，from SZ 89.5（May 1980）205—11 in CSWT 4.6（Dec.1981）111—29；ibid.‘ …1980’ from SZ 90.5（May 1981）203—10 in CSWT 4.9（June 1983）77—102；ibid.‘ …　1981’ from SZ91.5（May 1982）212—19 in CSWT 4.9（June 1983）77—102（2）‘Japanese studies of post-Opium War China：1979’，from SZ 89.5（May 1980）212—19 in CSWT 4.7（June 1982）91—113；ibid.‘ …　1980’ from SZ90.5（May 19812）10—19in CSWT4.9（June 1983）47—76；ibid.‘…1981’from SZ 91.5（May 1982）219—26 in CSWT 4.10（Dec.1983）111—39

喬舒亞·A.福格爾：在《清史問題》上發表的《史學雜志》所刊載的兩組日本關于近代中國研究的日文書目概覽的英文譯文：（1）《日本的明清研究：1979年》，譯自《史學雜志》第89卷第5期（1980 年5月），載《清史問題》第4卷第6期（1981年12月）；《日本的明清研究：1980年》，譯自《史學雜志》第90卷第5期（1981年5月），載《清史問題》第4卷第9期（1983年6月）；《日本的明清研究：1981年》，譯自《史學雜志》第91卷第5期（1982年5月），載《清史問題》第4卷第9期（1983年6月）

（2）《日本的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研究：1979年》，譯自《史學雜志》第89卷第5期（1980年5月），載《清史問題》第4卷第7期（1982年6月）；《日本的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研究：1980年》，譯自《史學雜志》第90卷第5期（1981年5月），載《清史問題》第4卷第9期（1983年6月）；《日本的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研究：1981年》，譯自《史學雜志》第91卷第5期（1982年5月），載《清史問題》第4卷第10期（1983年12月）

[544] Fogel，Joshua A.Politics and sinology：the case of Naitō Konan（1866—1934）.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喬舒亞·A.福格爾：《政治與漢學：內藤湖南（1866—1934年）個案》

[545] Folsom，Kenneth.Friends，guests and colleagues：the Mu-fu system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肯尼思·福爾松《；幕友、幕賓和幕僚：晚清時期的幕府制度》

[546] Fong，H.D.（Fang Hsien-t’ing）.Reminisc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st at 70.South Seas Society Monographs，no.17.Singapore：South Seas press，1975

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

[547] ‘Food，famine and the Chinese state—a symposium’.JAS 41.4（Aug.1982）685—801

《糧食、饑荒與中國國家——專題討論》，《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5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美國對外關系》，見美國國務院

[549] Foreign Service Journal.11 issues per year.1924—（from 1924—1951 was called 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and American Consular Bulletin）.Washington，DC：American Foreign Service Association

《外事雜志》，每年11期，1924年—（從1924年至1951年，刊名先后為

《美國外事雜志》和《美國領事公報》）

[550] Fox，John P.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1931—1938：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約翰.P.福克斯：《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1938年：外交與意識形態研究》

[551] Freedman，Maurice，ed.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莫里斯·弗里曼編：《中國社會的家庭與親屬關系》

[552] Freedman，Maurice.‘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in Arthur P.Wolf，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19—42

莫里斯·弗里曼：《關于中國宗教的社會學研究》，收入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

[553] Freedman，Maurice.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essays，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莫里斯·弗里曼：《中國社會研究論文集》，史堅雅選并序

[554] Freyn，Hubert.Prelude to war：the Chinses student rebellion of 1935—1936.Shanghai：China Journal Publishing Co.，1939：Westport，Conn：Hyperion Reprint Service，1977

休伯特·弗雷恩：《戰爭序幕：1935—1936年中國學生的反抗》

[555] Freyn.Hubert.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war.Shanghai：Kelly&Walsh，1940

休伯特·弗雷恩：《戰時中國教育》

[556] Freyn Hubert.Free China’s New Deal.New York：Macmillan，1943

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

[557] Friedman，Edward.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愛德華·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華革命黨》

[558] FRUS.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見《美國對外關系》

[559] Fu Chu-fu.‘Jen-k’ou yin-su tui Chung-kuo she-hui ching-chi chieh-kou ti hsing-ch’eng ho fa-chan so ch’an-sheng ti chung-ta ying-hsiang’（The great effects of population factor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Chung-kuo she-hui ching-chi shih yenchiu（Research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3（1982）1—14

傅筑夫：《人口因素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形成和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3期

[560] Fu-hsing Chung-kuo Kuo-min-tang chien-i：Hsin-sheng tsa-ch ih-she chih liutz’u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tai-piao i-chien shu（A proposal to revive the Kuomintang：a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New Life Magazine to representatives in the Sixth Party Congress）.n.p.：[1945]

《復興中國國民黨建議：新生雜志社致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意見書》，[1945年]

[561] Fu I-ling.Ming Ch’ing she-hui ching-chi shih lun-wen chi（Collected essays on Ming and Ch’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n.p.：Jenm-in，1982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

[562] Fujiwara，Akira.‘The role of the Japanese Army’，trans.by Shumpei Okamoto in Dorothy Borg and Shumpei Okamoto，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31—1941，189—95

藤原彰：《日本陸軍的作用》，岡本俊平譯，收入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作為歷史的珍珠港事變：1931—1941年的日美關系》

[563] Fung，Edmund S.K.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Army and its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Vancouver，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80

埃德蒙·S.K.馮：《中國革命的軍事方面：新軍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564] Furth，Charlotte.Ting Wen-chiang：science and China ’s new cul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

[565] Furth，Charlotte.‘Intellectual change：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1895—1920’.CHOC 12.322—405

費俠莉：《思想的轉變：從改良運動到五四運動》，《劍橋中國史》，第12卷[566] Furushima Kazuo.‘Kyū Chūgoku ni okeru tochi shoyū to sono seikaku’舊中國における土地所有とその性格（Land ownership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in Yamamoto Hideo and Nomo kiyoshi，comps.Chūgoku nōson kakumei no tenkai

古島和雄：《舊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及其特點》，收入山本秀夫和野間清編：《中國農村革命的發展》

[567] Gaillard，Duval，and Guillot，Orincourt.A travers la Nor mandie desⅩⅦ ème et ⅩⅧ ème siècles.Caen：Cahiers des Annales de Normandie，no.3，1963

迪瓦爾·加亞爾和奧蘭庫爾·吉約：《17和18世紀諾曼底研究》

[568] Galbiati，Fernando.‘P’eng P’ai，the leader of the first soviet：Hai-lu-feng，kwangtung，China（1896—1929）’.3 vols…University of Oxford，Ph.D.dissertation，1981

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中國第一個蘇維埃領袖彭湃（1896—1929年）：中國廣東海陸豐》，3卷

[569] Gamble，Sidney D.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Foreword by Y.C.James Yen.Field work directed by Franklin Ching-han Lee.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4；reprinted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甘博：《定縣：一個華北農村社區》，晏陽初序，李景漢指導實地工作

[570] Gamble，Sidney D.and Burgess，J.S.peking：asocial survey.New York：Do-ran，1921

甘博和步濟時：《北京社會調查》

[571] Garrett，Shirley S.‘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he TMCA’，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213—38

雪利·S.加勒特：《商會與基督教青年會》，收入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

[572] Gasster，Michael.‘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CHOC.11.463—534

邁克爾·加斯特：《共和革命運動》，《劍橋中國史》，第11卷

[573] Geisert，Bradley Kent.‘power and society：the Kuomintang and loc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China，1924—1937’.University of Virginia，Ph.D.dissertation，1979

布雷德利·肯特·蓋澤特：《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弗吉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79年

[574] Geisert，Bradley.‘Toward a pluralistic model of KMT rule’.Chinese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7.2（Feb.1982）1—10

布雷德利·蓋澤特：《走向國民黨統治的多元模式》，《中華民國史研究通訊》，第7卷第2期（1982年2月）

[575] Gendaishi shiryō：Nit-Chū sensō現代史資料：日中戦爭（Documents on contemporary history：the Sino-Japanese War）.5 vols.Tokyo：Misuzu shobōみすず 書房，1964—6

《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5卷

[576] Gewurtz，Margo S.‘Social reality and educational reform：the case of the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1917—1927’.Modern China，4.2（April 1978）157—80

馬戈·S.格武爾茨：《社會現實與教育革新：中華職業教育社個案，1917—1927年》，《現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

[577] Gibbs，Donald A.and Li，Yunc-hen eds.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f moder nC hinese literature，1918—1942.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5

唐納德·A.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翻譯書目，1918—1942年》

[578] Giles，Herbert A.，ed.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eprint，New York：Frederick Ungar，19 67；1 st edn，1901

翟理思編：《中國文學史》

[579] Gillin，Donald G.Warlord：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唐納德·G.吉林：《軍閥：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閻錫山》

[580] Gillin，Donald G.‘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the kuomintang’.JAS 29.4（Aug.1970）835—50

唐納德·G.吉林：《中華民國的中央集權問題：陳誠與國民黨個案》，《亞洲研究雜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

[581] Gittings，John.The role of the Chinese Red Army.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約翰·吉廷斯：《中國紅軍的任務》

[582] Glunin，V.I.‘The Comintern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7）’，in R.A.Ulyanovsky，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280—344

V.I.格盧寧：《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1920—1927年）》，收入R.A.烏里揚諾夫斯基編：《共產國際與東方》

[583] Goldblatt，Howard.Hsiao Hung.New York and Boston：Twayne，1976

葛浩文：《蕭紅》

[584] Goldblatt，Howard.See Ko Hao-wen

葛浩文

[585] Goldman，Merle.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默爾·戈德曼：《共產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

[586] Goldman，Merle，e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G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默爾·戈德曼編：《五四時代的中國現代文學》

[587] Gray，Jack，ed.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杰克·格雷編：《現代中國對政治形式的探求》

[588] Grieder，Jerome B.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賈祖麟：《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

[589] Grieder，Jerome B.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a narrative history.New York：Free Press；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81

賈祖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敘事史》

[590] Griffith，Samuel B.，trans.Mao Tse-tung on guerrilla warfare.New York：praeger，196 1.Published also as Mao Tse-tung and Che Guevarra，Guerrilla warfare.London：Cassell，1964

塞繆爾·B.格里菲思譯：《毛澤東論游擊戰》，又以毛澤東和切·格瓦拉：《游擊戰》的形式出版

[591] Griffith，Samuel B.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New York：Mc-Graw-Hill，1967

塞繆爾·B.格里菲思：《中國人民解放軍》

[592] Grigoriev.A.M.‘The Comintern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the slogan of the soviets（1927—1931）’，in R.A.Ulyanovsky，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345—88.Evidently a translation of L.P.Deliusin，ed.komintern i vostok

A.M .格里戈里耶夫：《共產國際與中國在蘇維埃口號下的革命運動（1927—1931年）》，收入R.A.烏里揚諾夫斯基編：《共產國際與東方》；后一書顯然是L.P.杰柳辛：《共產國際與東方》的英文譯本

[593] Grimm，Tilemann.‘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s in kwangtung’，in 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475—98

蒂爾曼·格林：《廣東的書院與城市制度》，收入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594] Grove，Linda.‘Rural society in revolution：the Gaoyang district，1910—194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75

琳達·格羅夫：《革命中的農村社會：高陽地區，1910—1947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論文，1975年

[595] Grove，Linda.‘Greating a northern soviet’.ModernC hina，1.3（July 1975）

琳達·格羅夫：《創建北方蘇維埃》，《現代中國》，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

[596] Grove，Linda and Esherick，Joseph.‘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Japanese scholarship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Modern China，6.4（0ct.1980）397—438

琳達·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日本學者關于中國農村社會變化的學術成果》，《現代中國》，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

[597] The guide weekly.See Hsiang-tao chou-pao

《向導周報》

[598] Guillermaz，Jacques.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49.London：Methuen；New York：Random House，1972.Trans.by Anne Destenay of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1921—49.Paris：Payot，1968

雅克·吉耶爾馬：《中國共產黨史，1921—1949年》，安娜·德特內譯，原著為法文

[599] Gunn，Edward Mansfield，Jr.‘Chinese writer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1937—45）’.Report on research in progress，Columbia University，Sept：1976

小愛德華·曼斯菲爾德·岡恩：《日本占領時期的中國作家（1937—1945年）》，研究進展報告，哥倫比亞大學，1976年9月

[600] Gunn，Edward Mansfield，Jr.‘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Columbj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8

小愛德華·曼斯菲爾德·岡恩：《上海和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78年

[601] Gunn，Edward M.，Jr.Unwelcome muse：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小愛德華·曼斯菲爾德·岡恩：《不受歡迎的繆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

[602] Gunn，Edward M.，Jr.，e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drama：an anth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

小愛德華·曼斯菲爾德·岡恩：《20世紀中國戲劇選集》

[603] Hall，J.C.S.The Yunnan provincial faction，1927—1937.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76

J.C.S.霍爾：《云南地方派，1927—1937年》

[604] Hamilton，Gary G.‘Regional associations and the Chinese city：a compara-tiveperspectiv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21.3（July 1979）346—61

加里·G.漢密爾頓：《區域性的行會與中國城市：比較觀點》，《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第21卷第3期（1979年7月）

[605] Hao，Yen-p’ing and Wang，Erh-min.‘Changing Chinese views of Western relations，1840—95’.CHOC 11.142—201

郝延平和王爾敏：《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劍橋中國史》，第11卷

[606] Harrell，Stevan.Ploughshare village：culture and context in Taiwa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

斯特萬·哈勒爾：《犁頭農村：臺灣文化與環境》

[607] Harrell，Stevan and Perry，Elizabeth J.‘Syncretic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an introduction’.Modern China，8.3（July 1982）283—303

斯特萬·哈勒爾和裴宜理：《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導論》，《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

[608] Harrison，James P.‘The Li Li-san line and the CCP in 1930’.CQ part 1，14（Apr.J—une 1963），178—94；Part Ⅱ，15（July—Sept.1963）140—59

詹姆斯·P.哈里森：《李立三路線與1930年的中國共產黨》，第1部分，《中國季刊》第14期（1963年4—6月）；第2部分，《中國季刊》，第15期（1963年7—9月）

[609] Harrison，James P.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New York：Atheneum，1969

詹姆斯·P.哈里森：《共產黨與中國農民造反：重寫中國歷史的研究》

[610] Harrison，James Pinckney.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72.New York：Praeger，1972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產黨史，1921—1972年》

[611] Hartford，Kathleen.‘Repression and Communist success：the case of Jin-Cha-Ji，1938—1943’.Unpublished manuscript

凱思林·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產黨的成功：晉察冀個案，1938—1943年》，未刊文稿

[612] Hartford，Kathleen.‘Step-by-step：reform，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0

凱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晉察冀邊區的改革、抗戰和革命，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

[613]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Cambridge，Mass.：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1936—

《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36年—

[614] Haslam，Nathan.‘Soviet aid to China and Japan’s place in Moscow’s foreign policy，1937—1939’，in Ian Nish，ed.Some aspects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30s.

內森·哈斯拉姆：《蘇聯援助中國和日本在莫斯科對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1939年》，收入伊恩·N.尼什編：《20世紀30年代蘇日關系的一些方面》

[615] Hata Ikuhiko.Nitchū sensō shi日中戰爭史（History of the Japanese-Chinese war）.Rev.edn，Tokyo：Kawade shobō shinsha河出書房新社，1971

秦郁彥：《日本戰爭史》，修訂版

[616] Hatano Ken’ichi，comp.Gendai Shina no kiroku現代支那之記 録（Records of contemporary China）.Monthly.Peking：1924—1932.23 reels.

波多野乾一編：《現代中國之記錄》，月刊，北京，1924—1932年，23卷

[617] Hatano Yoshihiro.KoK-Kyō gassaku國共合作（The Kuomintang-Communist alliance）.Tokyo：Chūō Kōronsha中央公論社，1973

波多野善大：《國共合作》

[618] Hay，Stephen N.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China，and Indi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斯蒂芬·N.海：《亞洲東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爾與他在日本、中國和印度的批評者》

[619] Hayes，James W.‘Old ways of life in Kowloon：the Cheng Sha Wan villages’.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8.1（Jan.1970）154—88

詹姆斯·W.海斯：《九龍的古老生活方式：鄭沙灣村》，《東方研究雜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月）

[620] Hayford Charles.‘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Y.C.James Yen and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3

查爾斯·海福：《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

[621] Hazama Naoki，Kataoka Kazutada and Fujimoto Hiroo.Go-shi undō no kenkyū五四運 動の研究（Studie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okyo：Dōhōsha Shuppan同朋舍出版，1982

狹間直樹、片岡一忠和藤本博生：《五四運動之研究》

[622] HC.See Mao Tse-tung，Hsuan-chi

《毛澤東選集》中文版

[623] HCPP.See Hung-ch’i p’iao-P’iao

《紅旗飄飄》

[624] Heinlein，Joseph H.Jr.‘Political warfare：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American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4

小約瑟夫·H.海因萊因：《政治戰：中國國民黨模式》，美國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

[625] Heinzig，D.‘Fhe Otto Braun memoirs and mao’s rise to power’.CQ 46（A-pril-June，1971）274—88

D.海因齊格：《李德回憶錄與毛澤東崛起掌權》，《中國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

[626] Heliot，P.‘La guerre dite de Lustucru et les privilèges du Boulonnais’.Revue duNord（Lille），21（1935）265—318

P.埃利約：《呂斯蒂克律的戰爭與布洛內地方的特權》，《北方雜志》（里爾），第21期（1935年）

[627] Hershatter，Gail.‘Flying hammers，walking chisels：the workers of Santiaoshi’.Modern China，9.4（Oct.1983）387—420

蓋爾·赫沙特：《飛錘走鑿：三條石工人》，《現代中國》第9卷第4期（1983 年10月）

[628] HHLY.See Hsing-huo liao-yuan，also Liu Po-ch’eng for HHLY Hong Kong

《星火燎原》，又劉伯承等：《星火燎原》

[629] Higashi Norimasa，comp.Chūbu Shina keizai chōsa中部支那經濟調查（Research on the economy of Central China）.Tokyo：Fuzambō富山房，vol.1，1915

東則正編：《華中經濟調查》

[630] Hildebrand，Klaus，trans.by Anthony Fothergill.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Third Rei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克勞斯·希爾德布蘭特著（安東尼·福瑟吉爾譯）：《第三帝國的對外政策》，原著為德文

[631] Hinton，William.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New York：Random House，1968

韓丁：《翻身：一個中國村莊革命的記錄》

[632] HJAS.Se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亞洲研究雜志》

[633] HMHHTL.See Hsin-min hsueh-hui tzu-liao

《新民學會資料》

[634] Ho Ch’ang-kung.Ch’in-kung chien-hsueh sheng-huo hui-i（Memoirs of the work-study programme）.Peking：Kung-jen ch’u-pan-she工人出版社，1958

何長工：《勤工儉學生活回憶》

[635] Ho Ch’i-fang.See McDougall，Bonnie S.

何其芳，見邦妮·S.麥克道格爾

[636] Ho，Franklin L.‘The reminiscences of Ho Lien（Franklin L.Ho）’，as told to Crystal Lorch，postscript dated July 1966.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Butler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See also Ho Lien

何廉：《何廉回憶錄》，向克里斯特爾·洛奇講述；回憶錄跋的日期為1966 年7月，未刊文稿，收藏在哥倫比亞大學巴特勒圖書館特藏館

[637] Ho，Franklin L.‘First attempts to transform Chinese agriculture，1927—1937：comments’，in Paul K.T.Sih，ed.The strenuous decade：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1927—1937，233—36

何廉：《改造中國農業的最初嘗試，1927—1937年：評論》，收入薛光前編：《緊張的十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1937年》

[638] Ho Kan-chih.Chung-kuo hsien-tai ko-ming shih（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Peking：Pei-ching kao-teng chiao-yü ch’u-pan-she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2vols；Hong Kong：San-lien，1958.English edn，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0

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2卷

[639] Ho Lien.‘The reminiscences of Ho Lien（Franklin L.Ho）’.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Columbia University，1975.（Microfilm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

何廉：《何廉回憶錄》

[640] Ho Ling-hsiu et al.，comps.Feng-chien kuei-tsu ta-ti-chu ti tien-hsing-K’ung- fu yen-chiu（A model feudal noble great landlord-studies of the Confucian family estates）.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1981

何齡修等編：《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

[641] Ho Meng-hsiung.‘Ho Meng-hsiung i-chien-shu’（Ho Meng-hsiung’s letters），1，1930（mimeographed）

何孟雄：《何孟雄意見書》，1930年（油印）

[642] Ho Ping-sung.‘San-shih-wh-nien lai Chung-kuo chih tah-sueh chiao-yü’（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ast 35 years），in Ts’ai Yuan-P’ei et al.Wan-Ch’ing san-shih-wu-nien lai chih Chung-kuo chiao-yü，1897—1931

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收入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

[643] Ho 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何炳棣：《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年》

[644] Ho ping-ti.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

何炳棣：《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社會流動面面觀，1368—1911年》

[645] Ho Ping-ti.Chungk-uo hui-kuan shih-lun（A historical survey of Landsmannshaften in China）.Taipei：Hsueh-sheng學生，1966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

[646] Ho ping-ti and Tsou Tang，eds.China in crisis.3 vol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

何炳棣和鄒讜編：《危機中的中國》，3卷

[647] Ho Ping-ti.‘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eds.China’s heritage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vol.1 of China in crisis

何炳棣：《中國遺產的顯著方面》，收入何炳棣和鄒讜編：《危機中的中國》第1卷，《中國的遺產和共產黨的政治制度》

[648] Ho Ying-ch’in.‘Chin-hou chih Chung-kuo Kuo-min-tang’（The Chinese kuomintang from now on）.Chung-yang pan-yueh-k’an，2（Oct.1927）99—103

何應欽：《今后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

[649] Ho Ying-ch’in.‘Chi-nien ch’i-ch’i k’ang-chan tsai po Chung-kung ti hsu-wei hsuan-ch’uan’（Commemorat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again refuting the Communists’false propaganda）.Part Ⅱ.Tzu-yu chung，3.3（20 Sept.1972），26—30

何應欽：《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的虛偽宣傳》，第2部分，《自由鐘》，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

[650] Ho Ying-ch’in.pa-nien k’ang-chan chih ching-kuo（Experiences in the eightyear war of resistance）.Taipei：Wen-hai，1972

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

[651] Hobsbawm，Eric.Primitive rebels.New York：Norton，1965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原始的造反者》

[652] Hofheinz，Roy，Jr.‘Peasant movement and rural revolu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countryside，1923—1927’.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66

小羅伊·霍夫海因茨：《農民運動和農村革命：在農村的中國共產黨人，1923—1927年》，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66年

[653] Hofheinz，Roy.‘The Autumn Harvest uprising’.CQ 32（Oct.D—ec.1967）

羅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中國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月）

[654] Hofheinz，Roy，Jr.‘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rural influence patterns.1923—1945’，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3—77

小羅伊·霍夫海因茨：《中國共產主義勝利的社會生態學：農村影響模式，1923—1945年》，收入鮑大可編：《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治》

[655] Hofheinz，Roy，Jr.The broken wave：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小羅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國共產主義農民運動，1922—1928年》

[656] Hōgaku kenkyū.See McDonald，A.

《法學研究》，見安格斯·麥克唐納

[657] Hogan，Michael J.Infor mal entente：the private structure of cooperation in Anglo-American economic diplomacy，1918—1928.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7

邁克爾·J.霍根：《非正式協約：英美經濟外交的民間合作組織，1918—1928年》

[658] Hokushi on chiansen.See Bōeicho senshishitsu

《華北治安戰》，見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

[659] Holden，Reuben Andrus.Yale in China：the mainland，1901—1951.New Haven：The 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1964

魯本·安德勒斯·霍爾登：《1901—1951年中國大陸的雅禮和湘雅》

[660] Holland，W.L.and Mitchell，Kate L.，eds.，assisted by Harriet Moore and Richard Pyke.Problems of the Pacific，1936.Aim and resul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Pacific countries：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Yosemite National Park，California，15—29 August 1936.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7

W.L.霍蘭德和凱特·L米徹爾編：《太平洋諸問題，1936年，太平洋國家社會經濟政策的目的和成果：太平洋學會第六次會議記錄，加利福尼亞州約賽米蒂國家公園，1936年8月15—29日》

[661] Holoch，Donald，trans.Seeds of peasant revolution：report on the Hai feng peasant mov ement by P’eng P’ai.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China-Japan Program，1973

唐納德·霍洛奇譯：《農民革命的種子：彭湃關于海豐農民運動的報告》

[662] Honig，Emily.‘Women cotton mill workers in Shanghai，1912—1949’.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2

埃米莉·霍尼格：《上海紗廠女工：1912—1949年》，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

[663] Honig，Emily.‘The contract labor system and women workers：preliberation cotton mills of Shanghai’.Modern China，9.4（Oct.1983）421—54

埃米莉·霍尼格：《包身工制度與女工：解放前上海的紗廠》，《現代中國》，第9卷第4期（1983年10月）

[664] Horikawa Takeo.Kyokutōkokusai seijishi josetu—21 kajō yōkyū no kenkyū極東國際政治史序説——二十一箇條要求の研究（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polities：a study of the Twenty-One Demands）.Tokyo：Yūhikaku有斐閣，1958

崛川武夫：《遠東國際政治史概論——二十一條要求研究》

[665] Hosoya Chihiro and Saitō Makoto.Washington taisei to Nichi-Bei kankeiワシン卜ン體制と日米関 係（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system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8

細谷千博和齋藤真：《華盛頓會議體制與日美關系》

[666] Hou，Chi-ming.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侯繼明：《1840—1937年中國的外國投資與經濟發展》

[667] Hou，Chi-ming and Yu，Tzong-shien，eds.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f ModernC hinese Economic History，Academia Sinica，Taipei，Taiwan，Republic of China，August 26—29，1977.Taipei：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Seattle：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9

侯繼明和于宗先編：《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記錄，臺灣中央研究院，1977年8月26—29日》

[668] Hou Chien.Ts’ung wen-hsueh ko-ming tao ko-ming wen-hsueh（From literary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Taipei：Chung-wai wen-hsueh中外文學，1974

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

[669] Hou Hou-chi and Wu Ch’i-ching，eds.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suhsiang shih-kao（Draf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Harbin：Jen-min，1982

侯厚吉和吳其敬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

[670] Howe，Christopher，ed.Shanghai：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克里斯托弗·豪編：《上海：一個亞洲大城市的革命和發展》

[671] Hsi-lo-k’e-fu[Shirokov]et al.，trans.by Li Ta et al.Pien-cheng-fa wei-wulun chiao-ch’eng（Course of instruction i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Shanghai：Pi-keng-t’ang shu-tien筆耕堂書店，15 May 1933

西洛可夫等著，李達等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

[672] Hsia.C.T.‘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 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533—54

夏志清：《擺脫不了的中國情：中國現代文學道義上的責任》，收入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673] Hsia，C.T.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nd edn，1971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674] Hsia，C.T.，e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

夏志清：《20世紀中國小說》

[675] Hsia，C.T.‘The fiction of Tuan-mu Hung-liang’.Paper delivered at the Dedham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ug.1974）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說》，在德達姆中國現代文學會議上發表的論文（1974年8月）

[676] Hsia-men tah-sueh li-shih-hsi，ed.Chung-kuo she-hui ching-chi shih yenchiu（‘Zhongguo shehui jingjishi yanjiu’）（Studies i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Amoy，1982—

廈門大學歷史系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677] Hsia，Tsi-an.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

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678] Hsiang-chiang P’ing-lun（Hsiang River review）.Changsha，14 July 1919—

《湘江評論》，長沙，1919年7月14日—

[679] Hsiang-ning hsien-chih（Hsiang-ning county gazetteer），1917

《鄉寧縣志》，1917年

[680] Hsiang-pao lei-tsuan（Classified compilation of articles from the Hsiangpao）.Shanghai：Chung-hua pien-i yin-shu kuan中華編譯印書館，1902；Taipei reprint：Ta-t’ung大通，1968

《湘報類纂》

[681] Hsiang River review.See Hsiang-chiang P’ing-lun

《湘江評論》

[682] Hsiang-tao（The guide）also Hsiang-tao chou-pao（The guide weekly），official 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CCP，ed.Ch’en Tu-hsiu el al.13 Sept.1922—18 July 1927

《向導》，又《向導周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陳獨秀等編，1922年9月13日至1927年7月18日

[683] Hsiao Ch’ao-jan et al.Pei-ching ta-hsueh-hsiao-shih，1898—1949，（A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1898—1949）.Shanghai：Shang-hal chiao-yü ch’upan-she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年》

[684] Hsiao Cheng，ed.Min-kuo erh-shih nien-tai Chung-kuo ta-lu t’u-ti wen-t’i tzu liao（Materials on land problems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1930s）.200 vols.Taipei：Ch’eng-wen成文，1977

蕭錚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

[685] Hsiao Cheng.T’u-ti kai-ko wu-shih-nien：Hsiao Cheng hui-i-lu（Fifty years of land reform：the memoirs of Hsiao Cheng）.Taipei：Chung-kuo t’u-ti kaiko yen-chin-so中國土地改革研究所，1980

蕭錚：《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錚回憶錄》

[686] Hsiao Hsin-i.‘ Eeonomie et société rurale du Sichuan（Szeehwan）de 1927 à 1945’.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Paris.Ph.D.dissertation，1927

蕭信誼（音）：《從1927年到1945年的四川經濟和社會》，巴黎高級研究實驗學校，博士論文，1972年

[687] Hsiao Hung.Two novels of northeastern China：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 and Tales of Hulan River，trans.by Howard Goldblatt and Ellen Yeung.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9

蕭紅：《中國東北的兩部小說：〈生死場〉和〈呼蘭河傳〉》，葛浩文和埃倫·楊譯

[688] 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蕭公權：《農業中國：19世紀的帝國控制》

[689] Hsiao Liang-lin，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1864—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蕭亮林（音）：《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1864—1949年》

[690] Hsiao Sheng and Chiang Hua-hsua n.‘Ti-i-tz’u Kuo-Kung ho-tso t’ung-i chan-hsien ti hsing-ch’eng’（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Kuomintang-Communist united front）Li-shih yen-chiu，2（1981）51—68

蕭甡和姜華宣：《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形成》，《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

[691] Hisao Tso-liang.Power relations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30—1934.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1

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系，1930—1934年》

[692] Hsiao Tso-liang.The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1930—1934：a study of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獻研究》

[693] Hsiao Tso-liang.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city vs.countryside.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0

蕭作梁：《1927年的中國共產主義：城市與鄉村的對抗》

[694] Hsieh Chen-minC.hung-hua min-kuo li-fa-shih（History of legisl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king：Cheng-chung，1948

謝振民：《中華民國立法史》

[695] Hsieh，Winston.‘Peasant insurrection and the marketing hierarchy in the Canton delta，1911’ 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119—41.

謝文孫：《1911年珠江三角洲的農民暴動和市場等級制度》，收入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

[696] Hsieh，Winston.‘Guild capitalism in village China；the legacy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anton delta，1875—1925’.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Seminar on Modern China，November 1982

謝文孫：《中國農村的行會資本主義：珠江三角洲鄉村企業家創業的傳統，1875—192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討論會上提出的論文，1982年11月

[697] Hsien-tai（Contemporary）.Shanghai：Hsien-tai shu-chü，1932—35

《現代》，上海，1932—1935年

[698] Hsin che-hsueh ta-kang.See Mi-ring

《新哲學大綱》，見米定

[699] Hsin chiao-yü（The new education）.Shanghai：Feb.1919—Oct.1925

《新教育》，上海，1919年2月至1925年10月

[700] Hsin-ching-chi（New economics）.Chungking，1938—

《新經濟》，重慶，1938年—

[701] Hsin-ch’ing-nien（The new youth），ed.Ch’en Tu-hsiu et al.Original name，Ch’ing-nien tsa-chih（Youth magazine），Shanghai，15 Sept.1915—15 Feb.1916；La J eunesse，New Youth，Peking，1 Sept.1916—1 May 1920；Shanghai，1 Sept.1920—1 April 1921；Canton，1 May 1921—1 July 1922.New Youth Quarterly（official organ of the CCP），Canton，15 June 1923—25 July 1926）

《新青年》，陳獨秀等編，原刊名，《青年雜志》，上海，1915年9月15日至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北京，1916年9月1日至1920年5月1日；上海，1920年9月1日至1921年4月1日；廣州，1921年5月1日至1922年7月1日《；新青年季刊（》中國共產黨機關刊），廣州，1923年6月15日至1926年7月25日

[702] Hsin-ch’uang-tsao（New creation）.Shanghai，1932—

《新創造》，上海，1932年—

[703] Hsin-hai ko-ming hui-i lu（Reminiscenc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Comp.by the Research Committee on Historical Sources，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Peking：CH，1961—（five volumes seen）

《辛亥革命回憶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全8卷

[704] Hsin Hu-nan Pao.Hu-nan nung-ts’un ch’ing-k’uang tiao-ch’a（A survey of village conditions in Hunan）.Hankow：Hsin-hua shu-tien新華書店，1950

《新湖南報》：《湖南農村情況調查》

[705] Hsin hua jih-pao（New China daily news）.Hankow，1938—；Chungking，1938

《新華日報》，漢口，1938年—；重慶，1938年10月15日—

[706] Hsin kuan-ch’ang hsien-hsing chi（A new ‘ current situation in official-dom’）.n.p.：1946

《新官場現形記》

[707] Hsin-min hsueh-hui tzu-liao（Materials on the New People’s Study Society），ed.by Chung-kuo ko-ming po-wu kuan，Hu-nan sheng po-wu kuan（Chung-kuo hsien-tai ko-ming shih tzu-liao ts’ung-k’an）Peking：Jen-min，1980

《新民學會資料》，中國革命博物館和湖南省博物館編（《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

[708] Hsin-shih-chieh yueh-k’an（New world monthly）.Chungking，July 1932—《新世界月刊》，重慶，1932年7月—

[709] Hsin wen-hsueh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new literature）.Peking：Jen-min wen-hsueh ch’u-pan-she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新文學史料》，北京，1978年—

[710] Hsin-wen t’ien-ti（News world）.Hong Kong.Jan1.945—

《新聞天地》，香港，1945年1月—

[711] Hsing-cheng-yuan nung-ts’un fu-hsing wei-yuan-hui，comp.Chung-kuo nungts’un tiao-ch’a tzu-liao wu-chung：Chiang-su sheng nung-ts’un tiaoch’a（Five examples of Chinese village survey materials：Kiangsu province village surveys）.Taipei：vol.1—4，1971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五種：江蘇省農村調查》

[712] Hsing-cheng-yuan nung-ts’un fu-hsing wei-yuan-hui，comp.Shah-hsi sheng nung-ts’un tiao-ch’a（A survey of villages in Shensi province）.Taipei：Hsueh-hai ch’u-pan-she學海出版社，1971

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編：《陜西省農村調查》

[713] Hsing-huo liao-yuan（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ed.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10 vols.Peking：Jen-min wen-hsueh ch’u-pan-she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63

《星火燎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編，10卷

[714] Hsiung，James Chieh.Ideology and practice.The eve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Praeger，1970

熊玠：《意識形態與實踐：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

[715] Hsu，Francis L.K.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2nd ed.with subtitle 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67；3rd edn，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許烺光：《在祖宗蔭庇下：中國的文化與人格》，第2版的副題為《中國農村的親屬關系、人格和社會流動》，第3版的副題為《中國的親屬關系、人格和社會流動》

[716] Hsu Fu-kuan.‘Shih shui chi k’uei-le Chung-kuo she-hui fan-kung ti 1i-liang？’（Who is it that destroys the anti-Communist power of Chinese society？）Min-chu p’ing-lun，1.7（16 Sept.1949）5—7

徐復觀：《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民主評論》，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

[717] Hsu，Kai-yu，trans.and e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3；Nwe York：Anchor，1964；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許芥昱譯編：《20世紀中國詩集》

[718] Hsu，Kai-yu.Wen I-to.Boston：Twayne，1981

許芥昱：《聞一多》

[719] Hsu，Chieh-yu（Hsu Kai-yu），Hsin-shih ti k’ai-lu jen—Wen I-to（A trail blazer of the new poetry-Wen I-to）.Hong Kong，1982

許芥昱：《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

[720] Hsu，King-i.‘ Agrarian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1931—1934’.Indian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1

許經義（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土地政策，1931—1934年》，印第安納大學，博士論文，1971年

[721]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comps.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trans.by Wen Ha-hsiung.Taipei：Chung wu Publishing Co.，1971

許朗軒和張明凱編：《中日戰爭史，1937—1945年》，文俠雄（音）譯

[722] Hsu Ti-hsin.‘K’ang-chan i-lai liang-ko chieh-tuan ti Chung-kuo ching-chi’（China’s economy during the two stages of the war）.Li-lun yü hsien-shih，1.4（15 Feb.1940）33—46

許滌新：《抗戰以來兩個階段底中國經濟》，《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

[723] Hsu Ti-hsin.Kuan-liao tzu-pen lun（On bureaucratic capital）.Hong Kong：Nan-yang南洋，1947

許滌新：《官僚資本論》

[724] Hsu Ying-lien et al.Ch’üan-kuo hsiang-ts’un chien-she yun-tung kai-k’uang（General account of the nation-wid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2 vols.Tsou-P’ing：Shan-tung hsiang-ts’un chien-she yen-chiu-yuan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1935

許瑩連等：《全國鄉村建設運動概況》，2卷

[725] Hsu Yun-pei.‘Ts’an chün yun-tung chien-pao’（A brief report on the army recruiting movement），in I-chiu-ssu-ch’i-nien shang-pan-nien lai ch’ü tang wei kuan-yü t’u kai yun-tung ti chung-yao wen-chien（Regional party commission’s important documents concerning land reform movement since the first half of 1947），69—77.Chi-Lu-Yü ch’ü-tang-wei冀魯豫區黨委，June 1947

徐運北：《參軍運動簡報》，收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

[726] Hsueh Chün-tu，comp.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vol.Ⅰ.1921—1937；vol.2.1937—1949.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1960，1962

薛君度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第1卷，1921—1937年；第2卷，1937—1949年

[727] Hsueh，Chün-tu.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

[728] Hsueh-fy chi-wen（Records and reminiscences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21 vols.Taipei：Nan-ching南京，1981

《學府紀聞》，21卷

[729] Hsueh-hsi yü p’i-p’an（Study and criticism）.Shanghai，Sept.1973—

《學習與批判》，上海，1973年9月—

[730] Hsueh Mu-ch’iao.K’ang-Jih chan-cheng shih-ch’i ho chieh-fang chancheng shih—ch’i Shan-tung chieh-fang-ch’ü ti ching-chi kung-tso（Econom-ic work in the Shantung liberated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and civil wars）Peking：Jen-min jih-pao she人民日報社，1979

薛暮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

[731] Hsueh Yueh.Chiao-fei chi-shih（A factual account of the campaigns against the bandits）.Taipei，1962

薛岳：《剿匪紀實》

[732] Hu，Chi-hsi.‘Hua Fu，the 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and the Tsunyi conference’.CQ43（July-Sept.1970）31—46

胡繼喜（音）：《華夫，第五次圍剿和遵義會議》，《中國季刊》，第43期（1970 年7—9月）

[733] Hu，Chi-hsi.L’Armée rouge et l’ascension de Mao.Paris：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82

胡繼喜（音）：《紅軍與毛澤東的崛起》

[734] Hu Chin-ch’üanL.ao She ho t’a-ti tso p’in（Lao She and his works）.Hong Kong：Wen-hua ·Sheng-huo ch’u-pan-she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

胡金銓：《老舍和他的作品》

[735] Hu Chu-sheng.‘Ch’ing-pang shih ch’ut-’an’（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Green Gang）.Li-shih hsueh（Historical studies），3（1979）102—20

胡珠生：《青幫史初探》，《歷史學》，1979年第3期

[736] Hu Feng.Min-tsu chan-cheng yü wen-i hsing-ko（The national war and the character of literature）.Chungking：Hsi-wang she希望社，1946

胡風：《民族戰爭與文藝性格》

[737] Hu Hua.Chung-kuo hsin-min-chu chu-i ko-ming-shih ts’an-k’ao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Chines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Peking；Shanghai：CP，1951

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

[738] Hu Hua.Chung-kuo ko-ming-shih chiang-i（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Revised edn.2 vols.Peking：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1979

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修訂版，2卷

[739] Hu Hua.Chung-kung tang-shih jen-wu-chuan（Biographies of eminent menbers of the CCP）.Sian：Jen-min，1981（six volumes published up to 1982）

胡華：《中共黨史人物傳》

[740] Hu，John Y.H.Ts’ao Yü.New York：Twayne，1972

胡耀恒：《曹禺》

[741] Hu-pei-sheng-cheng-fu pao-kao，1942/4—10（Report of the Hupei provincial government，April-October，1942）.n.p：n.d.

《湖北省政府報告，1942年4月—10月》

[742] Hu-pei-sheng-cheng-fu pao-kao，1943/10—1944/9（Report of the Hupei provincial government，October 1943 to september 1944）.n.p.：n.d.

《湖北省政府報告，1943年10月—1944年9月》

[743] Hu shang-chiang Tsung-nan nien-p’u（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General Hu Tsung-nan）.Taipei：Wen-hal文海，n.d.

《胡上將宗南年譜》

[744] Hu Sheng.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1840—1925.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55（first published in Chinese，1948）；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5

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1840—1925年》

[745] Hu Shih.China，too，is fighting to defend a way of life.Address，Washington，DC，March 1942.（Ann Arbor：University Mierof ilms International，1980）

胡適：《中國也在為保衛生活方式而戰斗》

[746] Hu Shih，et al.Ting Wen-chiang che-ko jen（Ting Wen-chiang as a person）.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67

胡適等：《丁文江這個人》

[747] Hu Shih.‘Chang Po-ling，educator’，in J.L.Buck et al.There is another China.4—14

胡適：《教育家張伯苓》：收入卜凱等：《有另一個中國》

[748] Hu Shih.‘Chin-jih chiao-hui chiao-yü ti nan-kuan’（Difficulties facing Christian education today），in Hu Shih，Hu Shih wen-ts’un，3.728—36

胡適：《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收入《胡適文存》，第3卷

[749] Hu Shih.Hu Shih wen-ts’un（Collected writings of Hu Shih），first to fourth series.Taipei：Yuan-tung t’u-shu kung-ssu遠東圖書公司，1953

胡適：《胡適文存》

[750] Hu Shih.Hu Shih liu-hsueh jih-chi（Diaries of Hu Shih as a student abroad）.Taipei：CP，1959

胡適：《胡適留學日記》

[751] Hua kang.Chung-kuo min-tsu chieh-fang yun-tung-shih（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iberation movement）.2 vols.Shanghai：Tu-shu，1947

華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2卷

[752] Hua-tzu jih-pao（The Chinese mail）.Hong Kong，1864—

《華字日報》，香港，1864年—

[753] Huang，Chen-hsia.See Whitson，William

黃震遐，見威廉·惠策恩

[754] Huang，Chien-chung.‘Shih-nien-lai ti Chung-kuo kao-teng chiao-yü（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in K’ang-chan ch’ien shih-nien chih Chung-kuo，503—30

黃建中：《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收入《抗戰前十年之中國》

[755] Huang Fu-ch’ing.Ch’ing-mo liu-Jih hsueh-sheng（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late Ch’ing period）.Taipei：IMH，1975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

[756] Huang Fu-ch’ing.Chin-tai Jih-pen tsai Hua wen-hua chi she-hui shih-yeh chih yen-chiu（Japa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enterprises in China 1898—1945）.Taipei：IMH，1982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

[757] Huang I-p’ing，comp.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 shih lun-wen hsuan-chi（A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Chines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5 vols.Shanghai：Shang-hai shih-fan tah-sueh Li-shih-hsi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1979

黃逸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選集》，5卷

[758] Huang，Philip C.C.‘Mao Tse-tung and the middle peasants，1925—1928’.Modern China，1.3（July 1975）271—96

黃宗智：《毛澤東與中農，1925—1928年》，《現代中國》，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

[759] Huang，Philip C.C.‘Intellectuals，Lumpenproletarians，workers，and peasants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thd case of Xingguo county，1927—1934’，in Philip C.C.Huang el al.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

黃宗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知識分子、流氓無產者、工人和農民：興國個案，1927—1934年》，收入黃宗智等：《中國共產黨與農村社會，1927—1934年》

[760] Huang，Philip C.C.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黃宗智：《華北農民經濟與社會變遷》

[761] Huang，Philip C.C.Bell，Lynda Schaefer and Walker，Kathy lemons.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8

黃宗智，林達·謝弗·貝爾和凱西·萊蒙斯·沃克：《中國共產黨與農村社會，1927—1934年》

[762] Huang Tsun-hsien.‘Speech to the Southern Study Society’in Hsiang pao leitsuan，307—11

黃遵憲：《在南學會上的講話》，收入《湘報類纂》

[763] Huang Yen-p’ei and Pang Sung，comps.Chung-kuo shang-chan shih-pai shih（The history of China’s commercial struggles and failures）.Hong Kong，1966.Republished in 1966 by Lung Men Press as Chung-kuo ssush ih-nien hai-kuan shang-wu t’ung-chi t’u-piao：（1876—1915）1876—1915（Statistical tables of China’s 40 years of Maritime Customs and commercial aftairs）

黃炎培和龐淞編：《中國商戰失敗史》，1966年由龍門書局以《中國四十年海關商務統計圖表，1876—1915》為書名再版

[764] Hueneman，Ralph William.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s in China 1876—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拉爾夫·威廉·許內曼：《龍和鐵馬：1876—1937年的中國鐵路經濟》

[765] Hummel，Arthur W.，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2 vols.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Taipei：Ch’eng wen，1967

恒慕義編：《清代名人傳略，1644—1912年》，2卷

[766] Hummel，Arthur W.，trans.and ed.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being the preface to a symposium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Ku Shih Pien）[by Ku Chieh-kang].Leiden：E.J.Brill，1931；Taipei：Ch’engwen reprint，1966

恒慕義譯編：《顧頡剛自傳：（古史辨）序》

[767] Hu-nan li-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Hunan），ed.by Hunan Historical Materials Editorial Commission.Changsha，1959

《湖南歷史資料》，湖南歷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768] Hung-ch’i（The red flag）.Official organ of the centre of the CCP，Nov.1928—1933

《紅旗》，中共中央機關刊，1928年11月至1933年

[769] Hung-ch’i（The red flag）.peking，1958—

《紅旗》，北京，1958年—

[770] Hung-ch’i p’iao（Red flag flying）.16 vols.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she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61

《紅旗飄飄》，16卷

[771] Hung-hsing（The red star），ed.by the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Red Army，1932—4

《紅星》，紅軍總政治部編，1932—1934年

[772] Hung-Ju（iShui）-chien.‘Su-chou k’ang-tsu feng-ch’ao ti ch’ien-yin hou-kuo’（Causes and results of the tenant riots in Soochow）.Ti-cheng yueh-k’an（Land administration monthly），4.10（Oct.1936）1547—62

洪瑞堅：《蘇州抗租風潮的前因后果》，《地政月刊》，第4卷第10期（1936 年10月）

[773]（Hung Shui-chien？）.‘Su-chou ti nung-ch’ao’（The peasant riots in Soochow）.Chung-kuo nung-ts’un2.9（June 1936）6—8

（洪瑞堅？）：《蘇州的農潮》，《中國農村》，第2卷第9期（1936年6月）

[774] Hung se Chung-hua（Red China）.Official organ of the Soviet Republic of China，11 Dec.1931—12 Dec.1936

《紅色中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機關報，1931年12月11日至1936年12 月12日

[775] Hung-se feng-pao（The red tempest）.13 vols.Naneh’ang：Jen-min，1958—62

《紅色風暴》，13卷

[776] Hung-sew 　enh-sien（Red documents）Yenan，1938

《紅色文獻》，延安，1938年

[777] Hunt，Michael.‘The American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y：a reappraisal’，JAS 31.3（May 1972）539—59

韓德：《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再評價》，《亞洲研究雜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

[778] Hunt，Michael.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Manchuria in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1895—1911.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韓德：《邊防與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

[779] Hunt，Michael.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and China to 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韓德：《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

[780] Hunter，Jane.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w 　omenm 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簡·亨特：《上流階層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轉換時的中國》

[781] Huntington，Samuel P.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中的各種社會的政治秩序》

[782] Huters，Theodore.Qian Zhongshu.New York：Twayne，1982

胡志德：《錢鍾書》

[783] I-chiu-ssu-ch’i nien shang-pan-nien lai ch’ü-tang-weik uan-yü t’u-kai yuntung ti chung-yao wen-chien（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1947 from the regional party committee）.n.p.：Chi-Lu-Yü ch’ü tang wei冀魯豫區黨委，June 1947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

[784] I-erh-chiu hui-i-lu（Memoirs of December 9th）.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she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

《一二·九回憶錄》

[785] I-ho t’uan（The Boxers）.Chung-kuo shih-hsueh hu（i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ed.4 vols.Shanghai：Jen-min，1957

《義和團》，中國史學會編，4卷

[786] I Songgyu.‘Shantung in the Shun-chih reign：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control and the gentry response’，trans.Joshua A.Fogel.CSWT 4.4（Dec.1980）1—34，4.5（June 1981）1—31

李成珪：《順治朝的山東：地方控制的建立與士紳的反應》，喬舒亞·A.福格爾譯，原著為朝鮮文《清史問題》，第4卷第4期（1980年12月），第4卷第5期（1981年6月）

[787] I-ta ch’ien-hou（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Congress），ed.Chung-kuo shehuik’o—hsueh yuan hsien-tai shih yen-chiu-shih and Chung-kuo ko-ming powu-kuan tang-shih yen-chiu-shih（Chung-kuo hsien-tai ko-ming shih tzuliao ts’ung-k’an）Peking：Jen-min，1980

《一大前后》，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和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

[788] Ichiko，Chūzō.‘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in Mary Clabaugh 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90—1913，297—313

市古宙三：《士紳的作用：一種假說》，收入芮瑪麗編：《革命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

[789] Ichiko，Chūzō.‘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1901—11’.CHOC 11.375—415

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劍橋中國史》，第11卷

[790] Ienaga.Saburō.The Pacific War：World War Ⅱ and the Japanese，1931—1945，trans.of Taiheiyō sensō太平洋戰爭.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8

家永三郎：《太平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日本，1931—1945年》，H文《太平洋戰爭》的英文譯本

[791] Ikei Masaru.‘Japan’s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JAS 25.2（Feb.1966）213—27

池井優：《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亞洲研究雜志》，第25卷第2期（1966年2月）

[792] Imahori Seiji.Pepin Shimin no jichi kōsei北平市民の自治構成（The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of Peiping burghers）.Tokyo：Bunkyūdō文求堂，1947

今崛誠二：《北平市民的自治機構》

[793] Imahori Seiji.Chūgokuhōken shakai no kōzō—sono rekishi to kakumei zenya no genjitsu中國封建社會の構造：その歷史と革命前夜の現甡（The structure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its history and condition on the eve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Tokyo：Nihon Gakujutsu Shinkōkai日本學術振興會，1978

今崛誠二：《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其歷史與革命前夕的現實》

[794] IMH：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Nankang，Taipei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795] Imprecor.See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國際時事通信》

[796] Inaba Iwakichi.Tai-Shi ikkagon 対支一家言（A personal account of China）.Tokyo：Nihon Hyōron sha日本評論社，1921

稻葉巖吉：《對華一家言》

[797] Ingalls，Jeremy.See Yao Hsin-nung

杰里米·英戈爾斯，見姚莘農

[798]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Peking.See Chung-kuo she-hui k’o-hsueh yuan Li-shih yen-ehiu so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799]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Academia Sinica，Taipei（IMH）.See Chungyang yen-chiu-yuan chin-tai-shih yen-chiu-so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800]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comp.Agrarian China.Intro.by R.H.Tawney.Chica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9

太平洋學會編：《農業中國》，RH.托尼序

[801]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United States Senate，82nd Congress.14 vols.1951—2

《太平洋學會，司法委員會調查“內部安全法”及其他內部安全法律施行小組委員會聽證會記錄》，美國第82屆國會參議院，14卷，1951—1952年

[802]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Quarterly.1922—

《國際事務》，季刊，1922年—

[803]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Organ of the Executive Com 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English edn，1925—35

《國際時事通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機關刊，英文版，1925—1935年

[804] Irie Keishirō.Shina henkyō to Ei-Ro no kakuchiku支那邊疆そ英露の角逐（Chinese frontiers and the Anglo-Russian power struggle）.Japan：Naukashaナウカ社，1935

入江啟四郎：《中國邊疆與英俄角逐》

[805] Iriye，Akira.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 wo 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后：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1931年》

[806] Iriye，Akira.Pacific estrangement：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1897—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遠：日本和美國的擴張，1897—1911年》

[807] Iriye，Akira.The coldw ar in Asia：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4

入江昭：《亞洲的冷戰：歷史介紹》

[808] Iriye，Akira.‘Toward a new cultural order：the Hsin-min Hui’，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254—74

入江昭：《走向新文化秩序：新民會》，收入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

[809] Irive，Akira，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

[810] Iriye，Akira.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入江昭：《實力與文化：日美戰爭，1941—1945年》

[811] Isaacs，Harold R.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2nd rev.ed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ss，1961

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

[812] Israel.John.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Published for the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約翰·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1937年》

[813] Israel，John.‘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survival as an ultimate value’，in Paul K.T.Sih，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131—54

約翰·伊斯雷爾：《西南聯合大學；作為首要價值的遺風》，收入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814] Israel，John，trans.Draft history of Qinghua University，a volume in the series Chinese education：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ed.by M E.Sharpe，Autumn-winter 1982—3

約翰·伊斯雷爾譯：《清華大學史稿》，《中國教育：譯文雜志》，1982年秋冬號

[815] Israel，John and Klein，Donald.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6

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

[816] [Iwai Eiichi].Ranisha ni kansuru chōsa藍衣社二関，スル調查（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lue Shirts）.Issued by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oreign Ministry，Tokyo，1937

[巖井英一]：《藍衣社調查》

[817] Iwase Suteichi.‘Hoku-Man nōson ni okeru daikazoku bunke no ichi jirei’北滿農村に於にる大家族分家の一事例（An example of equal division of property in a large family farm of a north Manchuria village）.Mantetsu chōsa geppō滿鐵調查月報20.12（Dec.1940）66—95

巖佐舍一：《北滿農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滿鐵調查月報》，第20卷第12期（1940年12月）

[818] Jacobson，Jon.‘Is there a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1920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8.3（June 1983）617—45

喬恩·雅各布森：《有20世紀20年代的新國際史嗎？》，《美國歷史評論》，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

[819] Jacquart，Jean.‘Les paysanneries à lépreuve’，in Pierre Deyon and Jean Jacquart，eds.Les Hésitations de la croissance 1580—1730，345—494

讓·雅卡爾：《經受苦難的農民》，收入皮埃爾·戴翁和讓·雅卡爾編：

《發展的停頓：1580—1730年》

[820] Jansen，Marius B.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馬里烏斯·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

[821] Jansen，Marius B.Japan and China：from war to peace，1894—1972.Chicago：Rand McNally，1975

馬里烏斯·詹森：《日本與中國：從戰爭到和平，1894—1972年》

[822] Jansen，Marius B.‘Japa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CHOC 11.339—74

馬里烏斯·詹森：《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劍橋中國史》，第11卷

[823] Jansen，Marius B.See Miyazaki Tōten

馬里烏斯·詹森，見宮崎滔天

[824] Japan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Gaimushō）.Nihon gaikō bunsho日本外交文書（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relations）.Tokyo：Nihon Kokusai Rengō Kyōkai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36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

[825] Japan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Gaimushō）.Nihon gaikō nempyō narabini shuyō bunsko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Important documents and chronological tables of Japanese diplomacy）.2 vols.Nihon Kokusai Rengō Kyōkai，1955；Tokyo：Haia Shobō，1965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書》，2卷

[826] JAS.Se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亞洲研究雜志》

[827] Jen，Hung-chün.‘Wu-shih tzu-shu’（Autobiography at fifty）.Unpublished manuscript，1938

任鴻雋：《五十自述》，未刊文稿

[828] Jen，Hung-chün.‘Wu-shih-nien lai ti k’o-hsueh’（Science in the past 50 years），in P’an Kung-chan.ed.Wu-shih-nien lai ti Chung-kuo（China in the past 50 years）.Chungking：Sheng-li勝利，1945

任鴻雋：《五十年來的科學》，收入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

[829] Jen Hung-chün（H.C.Zen）.A summary report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1925—1945.n.p.，Dec.1 946

任鴻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總結報告（1925—1945年）》

[830] Jen-min jih-pao（People’s daily）.Peking，1949—

《人民日報》，北京，1949年—

[831] Jen pi-shih.Changsha：Jenm-in，1979

《任弼時》

[832] Jitsugyōbu.Rinji sangyō chōsakyoku，comp.Nōgyō keiei zokuhen 農 業經營續篇（A supplementary study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Ch’ang-ch’un：Manshū tosho kabushiki kaisha 滿洲圖 書株式會社，1936

實業部臨時產業調查局編：《農業經營續篇》

[833] JMJP.See.Jen-min jih-pao

《人民日報》

[834] Johnson，Chalmers A.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2nd rev.edn 1966

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革命中國的出現，1937—1945年》

[835] Johnson，Chalmers.Revolutionary change.1st edn，Little，Brown，1966；2nd ed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查默斯·約翰遜：《革命的變革》

[836] Jones，Susan Mann.‘Finance in Ningpo：the“ ch’ien-chuang”，1750—1880’，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47—78

蘇珊·曼·瓊斯：《寧波的金融：“錢莊”，1750—1880年》，收入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837] Jones，Susan Mann.‘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73—96

蘇珊·曼·瓊斯：《上海的寧波幫與金融勢力》，收入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

[838] Jones，Susan Mann and Kuhn，Philip A.‘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CHOC 10.107—62

蘇珊·曼·瓊斯和孔斐力：《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劍橋中國史》，第10卷

[839] Jones，Susan Mann.‘The organization of trade at the county level：brokerage and tax farming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3（1978—9）70—99

蘇珊·曼·瓊斯：《縣級的貿易組織：民國時期的經紀和包稅》，《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

[840] Jones，Susan Man n.‘Mis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economy—a review article’ JAS 40.3（May 1981）539—58

蘇珊·曼·瓊斯：《誤解中國經濟——一篇評論》，《亞洲研究雜志》，第40卷第3期（1981年5月）

[841] Jones，Susan Mann.See also Mann，Susan

蘇珊·曼·瓊斯，也見蘇珊·曼

[842] Jordan，Donald A.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r 　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vaii，1976

周丹：《北伐：1926—1928年的中國國民革命》

[84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56—Q.uarterly.（Far Eastern Quarterly 1941—56）

《亞洲研究雜志》，1956年—，季刊.（《遠東季刊》，1941—1956年）

[844]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Hong Kong Jan.1954—（.Pub.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東方研究雜志》，香港，1954年1月—

[845] JPRS：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Pub.by US Government

《出版物聯合研究中心叢刊》

[846] Juan Yu-ch’iu.‘Chin-jih hou-fang min-ying kung-yeh ti wei-chi’（The current crisis of private industry in the rear area）.Chung-kuo nung-min3，.1/2（June 1943）33—5

阮有秋：《今日后方民營工業的危機》，《中國農民》，第3卷第1/2期（1943 年6月）

[847] J ung-ch ia ch’i-yeh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Jung family enterprises），ed.by Shang-hai she-hui k’o-hsueh-yuan ching-chi yen-chiu-so.2 vols.Shanghai：Jen-min，1980

《榮家企業史料》，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2卷

[848] Kahn，E.J.，Jr.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New York：Viking Press，1975

小EJ..卡恩：《中國通：美國使館官員及其遭遇》

[849] Kaiser，David E.Economic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Germany，Britain，France，and Eastern Europe，1930—193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戴維·E.凱澤：《經濟外交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德國、英國、法國和東歐，1930—1939年》

[850] Kajima Morinosuke.The diplomacy of Japan 1894—1922，vol.2，AngloJapanese alliance and Russo-Japanese War，trans.from Nihon Gaiko shi.3 vols.Tokyo：Kajim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eace，Kajima Publishing Co.，1976—80

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日文《日本外交史》的英文譯本，3卷

[851] Kamachi，Noriko，Fairbank，John K.and Ichiko Chūzō，eds.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supplementary volume for 1953—1969，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5

蒲地典子、費正清和市古宙三編：《1953年以來日本對近代中國的研究：19、20世紀歷史和社會科學研究書目指南，1953—1969年補卷》

[852] Kan K’o-ch’ao.‘Chan-shih Ssu-ch’uan kung-yeh kai-kuan’（Survey of Szechwan’s wartime economy）.Ssu-ch’uan ching-chi chi-k’an，1.2（15 March 1944）64—72

淦克超：《戰時四川工業概觀》，《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

[853] Kane，Anthony James.‘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and Chinese literary policy’.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82

安東尼·詹姆斯·凱恩：《左翼作家聯盟與中國的文學政策》，密執安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

[854] K’ang-chan ch’ien shih-nien chih Chung-kuo（China in the decade before the

war），comp.by Chung-kuo wen-hua chien-she hsieh-hui，1937.Hong Kong：Lung-men reprint，1965

《抗戰前十年之中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編

[855] K’ang-chan ta-hsueh.Organ of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Political University，Yenan，1937—

《抗戰大學》，抗日軍政大學校刊，延安，1937年—

[856] K’ang-Jih chan-cheng shih-ch’i chieh-fang-ch’ü kai-k’uang（The liberated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Peking：Jen-min，1953

《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概況》

[857] K’ang-Jih min—tsu t’ung-i chan-hsien chih-nan（Guide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10 vols.Yenan，1937—40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10卷

[858] Kao P’ing-shu，ed.Tsai Yuan-p’ei chiao-yü wen-hsuan（Selected papers of Ts’ai Yuan-p’ei on education）.Peking：Jen-min chiao-yü ch’u-pan-she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文選》

[859] Kao T’ing-tzu.Chung-kuo ching-chi chien-she（Chines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Shanghai：CP，19 3 7

高廷梓：《中國經濟建設》

[860] Kapp，Robert A.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羅伯特·A.卡普：《四川與中華民國：地方軍閥主義與中央政權，1911—1938年》

[861] Kataoka Tetsuy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

[862] Kawachi Jūzō.‘Chūgoku no jinushi keizai”中國の地主經濟（The landlord economy of China）.Keizai nempō經濟年報，18（1965）48—124

河地重造：《中國地主經濟》，《經濟年報》，第18期（1965年）

[863] Keenan，Barry.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7

巴里·基南：《中國的杜威實驗：民國初期的教育改革與政治權力》

[864] Kelley，Allen C.‘Demand patterns，demographic change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3.1（Feb.1969）110—26

艾倫·C.凱利：《需求模式、人口變化和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2月）

[865] Kelley，David E.‘Temples and tribute fleets：the Luo sect and boatmen’s associatio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dern China，8.3（July 1982）361—91

戴維·E.凱利：《寺廟和貢舶：18世紀羅漢教派與疍民結社》，《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

[866] Kennedy，Melville T.，Jr.‘The Chinese Democratic League’.Harvard papers on China，7（1953）136—75

小梅爾維爾·T.肯尼迪：《中國民主同盟》，《哈佛中國研究論文集》，第7集（1953年）

[867] Kennedy，Thomas.Arms of Kiangnan：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95.Boulder：Westview Press，1978

托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年中國軍火工業的現代化》

[868] Kerr.George H.Formosa betrayed.London：Evre & Spottiswoode，1966

喬治·H.克爾：《被出賣的臺灣》

[869] Kikuchi Saburō.Chūgoku gendai bungaku shi中國現代文學史（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2 vots.Tokyo：Aoki青木，1953

菊地三郎：《中國現代文學史》，2卷

[870] Kim，Ilpyong J.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Kiangsi under Soviet rul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金一平（音）：《中國共產主義政治：蘇維埃統治下的江西》

[871] Kindai Chūgoku kenkyū近代中國研究（Studies on modern China），ed.by Kindai Chūgoku Kenkyū Iinkai（The Seminar on Modem China）series.Tokyo：Tōyō Bunko東洋文庫，1958—

《近代中國研究》，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

[872] King，Evan.See Lao She

埃文·金，見老舍

[873] King，E.H.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Madison，Wis.：Mrs F.H.King，1911；2nd edn，Lon-don：Cape，1927；edition ed.by J.P.Bruce，N.Y.：Harcourt，Brace，1927

F.H.金：《四千年的農人：中國、朝鮮和日本的不變的農業》

[874] King，Wunsz.China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1922.New York：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1963

文茨·金：《中國在華盛頓會議上，192—1922年》

[875] Kinkley，Jeffrey C.‘Shen Ts’ung-wen’s vision of Republica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7

杰弗里·C.金克利：《沈從文對中華民國的幻想》，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77年

[876] Kirby，William Corbin.‘Foreign models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1921—1937.Harva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1

威廉·科爾賓·柯爾比：《外國榜樣與中國的現代化：德國與中華民國，1921—1937年》，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81年

[877] Kirby，William Corbin.Ger 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威廉·科爾賓·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

[878] Kitaoka Shiniehi.Nihon rikugun to tairiku seisaku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The Japanese army and the continental policy）.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78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與大陸政策》

[879] Klein，Donald W.and Chark，Anne B.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1921—1965.2 vol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唐納德·W.克萊因和安妮·B.克拉克：《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1921—1965年》，2卷

[880] KMT.Kuomintang

國民黨

[881] KMWH.See Ko-ming wen-hsien

《革命文獻》

[882] Knight，Nick.‘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pre-liberation texts’.CQ84（Dec.1980）641—68

尼克·奈特：《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解放前文本》，《中國季刊》，第84期（1980年12月）

[883] Knight，Nick.Mao Zedong’s On Contradiction.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preliberation text.Nathan，Queensland：Griffith University，1981

尼克·奈特：《毛澤東的〈矛盾論〉：解放前文本的加注譯文》

[884] Ko Ching-chung.“Wu-shih-nien lai Chung-kuo nung-yeh shih”（The last fifty years of Chinese agriculture），in Wan-ch’ing wu-shih-nien lai chih Chung-kuo（The last fifty years of China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Shanghai：Shang-hai shen-pao kuan上海申報館，1922

葛敬中：《五十年來中國農業史》，收入《晚清五十年來之中國》

[885] Ko Hao-wen（Howard Goldblatt）.Hsiao Hung p’ing-chuan（A critical biography of Hsiao Hung），trans.by Cheng Chi-tsung.Taipei：Shih-pao ch’upan kung-ssu時報出版公司，1980

葛浩文：《蕭紅評傳》，鄭繼宗譯

[886] Ko-ming hui-i lu（The revolution remembered）.Peking，1980—

《革命回憶錄》，北京，1980年—

[887] Ko-ming wen-hsien（Documents of the revolution），comp.by Lo Chia-lun et al.Taipei：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hung-kuo Kuomintang，many volumes，1953—

《革命文獻》，羅家倫等編

[888] Ko-ming yü chan-cheng（Revolution and war）n.p.，Aug ·1932—

《革命與戰爭》，1932年8月—

[889] Ko-sheng kao-chi hsing-cheng jen-yuan feng-chao Nan-ch’ang chi-hui chilu.See Chung-kuo kuo-min cheng-fu Chüm-shih

《各省高級行政人員奉召南昌集會紀錄》，見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

[890] K’o Shu-p’ing.‘Wang Hsueh-t’ing hsien-sheng tsai chiao-chang jen-nei chih chiao-yü ts’o-shih’（Educational measures taken by Wang Hsueh-t’ing [Shih-chieh]as Minister of Education）.Chuan-chi wen-hsueh（Biographical literature），239（April 1982）125—31

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傳記文學》，第239期（1982年4月）

[891] Koen，Ross Y.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Harper &Row，1974

羅斯·Y.柯恩：《美國政治中的援華院外活動集團》

[892] Kojima shinji.Taihei Tengoku kakumei no rekishi to shisō太平天國革命の歷史と思想（History and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volution）.Tokyo：Kembun Shuppan研文出版，1978

小島晉治：《太平天國革命的歷史和思想》

[893] Kokuryukai，ed.Tōa senkaku shishi kiden東亞先覚志士記伝（Biograph ical sketches of pioneer patriots in East Asia）.3 vols：Tokyo：Kokuryūkai Shuppanbu黑龍會出版部，1933—6.Reprinted in Meiji hyakunenshi sōsho明治百年史叢書（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century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vols.22—24.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1966

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傳略》，3卷

[894] Korostovetz，Ivan J.Von Cinggis Khan zur Sowjetrepublik.Berlin Walter deGruyter，1926

伊萬·J.科羅托韋茲：《從成吉思汗到蘇維埃共和國》

[895] Kozawa Shigeichi.See under SMR

小澤茂一，見滿鐵

[896] Kraus，Richard A.See Chuan Han-sheng

理查德·A.克勞斯，見全漢昇

[897] Ku Chieh-kang.See Hummel，Arthur W.

顧頡剛，見恒慕義

[898] Kuan-ch’（a The observer）.Shanghai，1947—

《觀察》，上海，1947年—

[899] Kuan-ch’a chi-che.（The observer’s correspondent）.‘Ts’ung chan-chü k’an cheng-chü’（Looking at political conditions from the military situation）.Kuan-ch’a.Shanghai，28 Feb.1948，pp.14—16

觀察記者：《從戰局看政局》，《觀察》，1948年2月28日

[900] Kuan-ch’a chi-che.（The observer’s correspondent）.‘ T’u-ti kai-ko，ti-tao chan’（Land reform，tunnel warfare）.Kuan-ch’a，3 April 1948，p.14

觀察記者：《土地改革，地道戰》，《觀察》，1948年4月3日

[901] Kuan Meng-chueh.‘Shan-hsi-sheng fang-chih-yeh chih wei chi chi ch’i ch’ulu’（The crisis of Shensi’s textile industry and its solution）.Chung-kuo kung-yeh，19（1 Sept.1943）

關夢覺：《陜西省紡織業之危機及其出路》，《中國工業》，第19期（1943年9月1日）

[902] Kuang-hsi min-t’uan kai-yao（A general view of the Kwangsi militia）.Issued by the militia office of the Fourth Army Hesdquarters，n.p.，n.p.，probably 1935

《廣西民團概要》，第四集團軍司令部民團處編

[903] Kuhn，Philip.Rebellion and，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孔斐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

[904] Kuhn，Philip A.‘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the Republic：problems of control，autonomy，and mobiliz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257—98

孔斐力：《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與動員問題》，收入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905] Kuhn，Philip A.‘Origins of the Taiping vision：cross-cultural dimensions of a Chinese rebellio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3（July 1977）350—66

孔斐力：《太平天國幻想的淵源：中國人造反的跨文化方面》，《社會和經濟比較研究》，第19卷第3期（1977年7月）

[906] Kuhn.Philip A.‘The Taiping Rebellion’.CHOC 10.264—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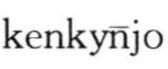
孔斐力：《太平軍叛亂》，《劍橋中國史》，第10卷

[907] Kuhn，Philip A.‘Local taxation and finance in Republican China’.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3（1978—9）100—36

孔斐力：《中華民國的地方稅收與財政》，《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

[908] Kuhn，Philip A.‘Late Ch’ing views of the polity’.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S 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4（1979—80）1—18

孔斐力：《晚清關于政體的種種見解》，《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4集（1979—1980年）

[909] Kumashiro Yukio.‘Kahoku ni okeru nōka no bunke to tochi no ugoki’華北に於ける農家の分家と土地の動 き（Peasant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nd and land transfer in North China），in Nōken hōkoku chōhen 農研報告長編（Extended reports of rural investigation），167—266.Peking：Kokuritsu Pekin daigaku fusetsu nōson keizai國立北京大學附設農村經濟研究所，1943

熊代幸雄：《華北農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轉移》，收入《農研報告長編》

[910] Kung-ch’an kuo-chi chih-hsing-wei-yuan-hui chih Chung-kung chung-yang wei-yuan-hui hsin（ECCI to CCP）.n.p.，8 Feb.1929，Mimeographed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共中央委員會信》，1929年2月8日，油印

[911] Kung-ch’an-tang（The Communist Party）.Shanghai，Nov.1920—

《共產黨》，上海，1920年11月—

[912] Kung-ch’an tang-jen（The Communist）.No data

《共產黨人》

[913] Kung Ch’u.Wo yü Hung-chün（The Red Army amd I）.Hong Kong：Nanfeng ch’u-pan-she南風出版社，1954

龔楚：《我與紅軍》

[914] Kung-fei chung-yao tzu-liao hui-pien（Essenti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communist bandits）.10 vols.（ts’e）；also a two-volume edition，Taipei：Chung-yang wen-wu中央文物，1952

《共匪重要資料匯編》，10冊

[915] Kung-fei huo-kuo shih-liao hui pien（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nation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communist bandits）.Chi-chi-m（itop secret）.3 vols.Taipei：Chung-hua min-kuo k’ai-kuo wu-shih-nien wen-hsien pientsuan wei-yuan-hui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4

《共匪禍國史料匯編》，極機密，3卷

[916] Kung-tso t’ung-hsun，32：yuc-hi chan-cheng chuanh-ao，32：（Work correspondence，number 32：special issue on guerrilla warfare）.n.p.：Chi-Lu-Yü ch’ü tang wei min-yun pu冀魯豫區黨委民運部，June 1947

《工作通訊》，第32期，《游擊戰爭專號》，1947年6月

[917] Kung Yü-chih.“ ‘ Shih-chien lun’ san t’i”（Three points regarding‘ On practice’），in Lun 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 Pek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3，pp.66—86

龔育之：《〈實踐論〉三題》，收入《論毛澤東哲學思想》

[918] K’ung Hsuch-hsiung.Chung-kuo chin-iih chih hung-ts’un yun-tung（The rural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Nanking：Chung-shan Wen-hua chiao-yü Kuan中山文化教育館，1935

孔雪雄：《中國今日之農村運動》

[919] K’ung Ling-ching.Wu-sa Wai-chiao-shih（Diplomatic relations of 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Shanghai：Yung-hsiang yin-shu-Kuan永祥印書館，1948

孔另境：《五卅外交史》

[920] Kuo-chia tsung-tung-yuan（National mobilization）.n.p.：Hsing-cheng-yuan hsin-wen-chü行政院新聞局，1947年

《國家總動員》

[921] Kuo-fang nien-chien（National defence year book）.Hsu Kao-yang.ed.Hong Kong：Chung-kuo shih-hsueh yen-chiu hui中國史學研究會，1969

《國防年鑒》，許高陽編

[922] Kuo，Heng-yü.Die Kominternu 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die Einheitsfront zwischen der K P Chinas and der Kuomintang 1924—1927.Paderborn：Ferdinand Schöningh，1979

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1924—1927年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

[923] Kuo Hua-jo.‘Mao chu-hsi k’ang-chan ch’u-ch’i kuang-hui ti che-hsueh huotung’（Chairman Mao’s brilliant philosophical activity earl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Chung-kuo che-hsueh，1（1979）31—7

郭化若：《毛主席抗戰初期光輝的哲學活動》，《中國哲學》，1979年第1期

[924] Kuo Hua-lun（Warren Kuo）.Chung-kung shih-lun（An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CP）.4 vols.Taipei：Kuo-chi kuan-hsi yen-chiu-so國際關系研究所，1969

郭華倫：《中共史論》，4卷，1969年

[925] Kuol-i Hsi-nan lien-ho ta-hsueh（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a volume in the Hsueh-fu chi-wen series.Taipei：Nan-ching南京，1981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學府紀聞》叢書的一卷

[926] Kuom-in cheng-fu chu-chi-ch’u t’ung-chi-chü，comp.Chung-hua min-kuo t’ung-chi t’i-yao（Statistic abstrac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Nanking，1947；reprint，Taipei：Hsueh-hai學海，1971

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南京，1947年

[927] Kuo-min cheng-fu chün-shih wei-yuan-hui wei-yuan-chang hsing-ying.Hupei ti-fang cheng-wu yen-chiu-hui tiao-ch’a-t’uan，comp.Tiao-ch’a hsiangts’un chien-she chi-yao（Reeord of rural reconstruction investigations）.Wuchang，1935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湖北地方政務研究會調查團編：《調查鄉村建設紀要》，武昌，1935年

[928] Kuom-in ching-shen tsung-tung-yuan yun-tung（National spiritual mobilization movement），comp.by San-min-chu-i ch’ing-nien-t’uan chung-yang t’uanpu.n.p.1944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

[929] Kuo，Thomas C.Ch’en Tu-hsiu（1879—1942）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South Orange，NJ：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1975

托馬斯·C.郭：《陳獨秀（1879—1942年）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930] Kuo，Warren（Kuo Hua-lun）.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4 vols.Taipei：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66—71

郭華倫：《中共史論》，4卷，1966—1971年

[931] Kuo-wen chou-pao（Kuowen weekly，illustrated）.Tientsin Kuowen Weakly Association，1924—37

《國聞周報》，1924—1937年

[932] Kurihara Ken，ed.and comp.Tai Man-Mōseisakushi no ichimen，Nichi-Ro sengo yori Taishōki ni itaru対滿蒙政策史の一面一日露戦後ょり大正期にいた る（An aspect of Japanese policies toward Manchuria and Mongolia，from the end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to the Taishō period）.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Meiji Hyakunenshi sōsho明治百年史叢書，1966

栗原健編：《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日俄戰后起至大正期止》

[933] Kwok，D.W.Y.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

郭穎頤：《1900—1950年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934] Kwong，Luke S.K.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personalities，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

鄺兆江：《百日維新的拼花圖案：人物、政治及思想》

[935] Lach，Donald F.and Wehrle，Edmund S.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East Asia since World War Ⅱ.New York：Praeger，1975

唐納德·F.拉奇和埃德蒙·S.韋爾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東亞國際政治》

[936] Lamb，Alastair.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阿拉斯泰爾·拉姆：《中印邊界：邊界爭端的起源》

[937] Lamberton，Mary.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1879—1951.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

瑪麗·蘭伯頓：《上海圣約翰大學，1879—1951年》

[938] Lamley，Harry J.‘ Hsieh-tou：the pathology of violence in southeastern China’.CSWT 3.7（Nov.1977）1—39

哈里·J.拉姆利：《械斗：中國東南部的暴力病態》，《清史問題》，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

[939] Lan Hai.Chung-kuo k’ang-chan wen-i shih（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Shanghai：Hsien-tai現代，1947

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

[940] Lang，Olga.Pa Chin and his writings：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奧爾加·蘭：《巴金和他的作品：兩次革命之間的中國青年》

[941] Langer，William L.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1890—1902.2 vols.New York：A.A.Knopf，1935；2nd edn.，1951

威廉·L.蘭格：《帝國主義外交，1890—1902年》，2卷

[942] Lao She（Shu Ch’ing-ch’un，She Yu）.Rickshaw boy，by Lau Shaw，trans.from the Chinese by Evan King（Robert Ward）.New York：Reynal and Hitchcock，1945

老舍（舒慶春、舍予）：《駱駝祥子》，埃文·金（羅伯特·沃德）譯

[943] Lao She.Rickshaw：the novel Lo-to Hsiang-tzu，trans.by Jean M.Jam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1979

老舍：《駱駝祥子》，瓊·M.詹姆斯譯

[944] Lao She.Camel Xiangzi，trans.Shi Xiaoqing.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eking：Foreign Laguages Press，1981

老舍：《駱駝祥子》，石小青（音）譯

[945] Lao She.See Hu Chin-ch’üan

老舍，見胡金銓

[946] Laqueur，Walter.Guerrilla，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Boston：Little，Brown，1976

瓦爾特·拉克爾：《游擊戰：歷史的、批判的研究》

[947] Lary，Diana.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李友華：《地區和國家：1925—1937年中國政治斗爭中的桂系》

[948] Lary，Diana.‘Warlord studies’.Modern China，6.4（Oct.1980）439—70

李友華：《軍閥研究》，《現代中國》，第6卷第4期（1980年10月）

[949] Lattimore，Owen.Inner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40；2nd edn，1951

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

[950] Lattimore，Owen.Nomads and commissars：Mongolia revisit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拉鐵摩爾：《游牧民和人民委員：重訪蒙古》

[951] Lau，Joseph S.M.Ts’ao Yü：the reluctant disciple of Chekhov and O’Neill，a study in literary influence.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0

劉紹銘：《曹禺：契訶夫和奧尼爾的不情愿的追隨者，文學影響研究》

[952] Lau，Joseph S.M.，Hsia，C.T.and Lee，Leo Ou-fan，eds，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9.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劉紹銘、夏志清、李歐梵編：《現代中國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1919—1949年》

[953] League of Nations，Counci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China.Report of the technical agent of the council on his mission in China from the date of his appointment until April 1st，1934

國際聯盟理事會國際聯盟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理事會技術人員從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為止的在華使命的報告》

[954]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See Becker，C.H.et al.

國際聯盟報告，《中國的教育改革》，見C.H.貝克爾等

[955] Lee，James.‘Food suppl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Southwest China，1250—1850’.JAS 41.4（Aug.1982）711—46

詹姆斯·李：《中國西南部的糧食供應與人口增長，1250—1850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956] Lee，James and Eng，Robert.‘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Daoyi，1774—1798’.CSWT 5.1（June 1984）1—55

詹姆斯·李和羅伯特·恩格：《18世紀滿洲的人口及家史：島夷人，1774—1798年》，《清史研究》，第5卷第1期（1984年6月）

[957] Lee，James，Will，Pierre-Etienne and Wong，R.Bin，eds.State granaries and food supply in Ch’ing China，1650—1850.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Forthcoming

詹姆斯·李、皮埃爾-艾蒂安·維爾和王國斌編：《清代的國家倉廩與糧食供應，1650—1850年》

[958] Lee，Leo Ou-fan.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959] Lee，Leo Ou-fan.‘Literature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Lu Xun’s leftist years，1927—1936’.Modern China，2.3（July 1976）277—91

李歐梵：《革命前夕的文學：對魯迅左翼時期的看法，1927—1936年》，《現代中國》，第2卷第3期（1976年7月）

[960] Lee，Leo Ou-fan.‘Literary trends I：the quest for modernity，1895—1927 CHOC 12.451—504

李歐梵：《文學傾向Ⅰ：追求現代性，1895—1927年》，《劍橋中國史》，第12卷

[961] Lee，Leo Ou-fan，ed.Lu Hsun and his leg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李歐梵編：《魯迅和他的遺產》

[962] Lee，Robert H.G.The Manchurian frontier in Ch’ing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羅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滿洲邊疆》

[963] Leffler，Melvyn P.The elusive quest：America’s pursuit of European stability and French security，1919—1933.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9

梅爾文·P.萊弗勒：《難以捉摸的追求：美國謀求歐洲穩定和法國安全，1919—1933年》

[964] 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5 vols.Reprinted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理雅各譯：《中國經典》，5卷

[965] Le Gros Clark，Cyril Drummond.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Shanghai：Kelly&Walsh，1935

西里爾·德拉蒙德·勒格羅·克拉克：《蘇東坡詩文》

[966] Lei Hsiao-ts’en.San-shih-nien tung-luan Chung-kuo（Thirty years of China in turmoil）.Hong Kong：Ya-chou亞洲，1955

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

[967] Lenin，N.et al.Lieh-ning Ssu-ta-lin lun Chung-kuo（Lenin and Stalin on China）.Peking：Jen-min，1963

列寧等：《列寧斯大林論中國》

[968] Lenin，V.I.‘Conspectus of Hegel’s Science of Logicz’.Collected works，38.85—238.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61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

[969] Leong，Sow-theng.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6.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

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1917—1926年》

[970] Levenson，Joseph.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s 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李文森：《革命與世界主義：西方階段和中國階段》

[971] Lewis，Charlton M.‘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Ch’ing China’，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1840—1950，97—112

查爾頓·M .劉易斯：《關于晚清哥老會的筆記》，收入讓·謝諾：《中國的民眾運動與秘密社會，1840—1950年》

[972] Lewis，John Wilson，ed.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3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共產黨中國的領導》

[973] Lewis，John Wilson，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約翰·威爾遜·劉易斯：《中國的黨的領導和革命力量》

[974] Leyda，Jay.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2

杰伊·萊達：《電影：中國電影和電影觀眾記事》

[975] Li Ang（Chu P’ei-wo，Chu Hsin-fan）Hung-se wu-t’ai（The red stage）.Chungking，1942；Peking，1946

李昂（朱佩我，朱新繁）：《紅色舞臺》

[976] Li，Anthony C.The history of privately controlle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Washington，D 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54；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reprint，1977

安東尼·C.李：《中華民國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

[977] Li Ch’ang.‘Hui-i min-hsien tui’（Reminiscences of the National Salvation Vanguard），in Li Ch’ang et al.I-erh-chiu hui-i-lu（Memoirs of December 9），3—34.Peking：Chung-kuo ch’ing-nien ch’u-pan-she中國青年出版社，1961

李昌：《回憶民先隊》，收入李昌等：《一二九回憶錄》

[978] Li Ch’eng-jui.‘K’ang-jih chan-cheng shih-ch’i chi-ko jen-min ken-chü-ti ti nung-yeh shui-show chih-tu yü nung-min fu-tan’（Agricultural tax systems and peasant burdens in people’s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Ching-chi yen-chiu（Economic research），2（1956）100—115

李成瑞：《抗日戰爭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負擔》，《經濟研究》，1956年第2期

[979] Li Chi李濟.Anya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7

李濟：《安陽》

[980] Li Chin-fa.Interview with Li Chin-fa by Ya Hsien.Ch’uang-shih-chi（The epoch poetry quarterly），39（Jan.1975）5

李金發：《痖弦訪問李金發》，《創世紀》，第39期（1975年1月）

[981] Li Chung-hsiang.‘Kuo-li Hsi-nan lien-ho ta-hsueh shih-mo-chi’（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part 1，in Chuan-chiwenhsueh（Biographical litrature），231（August 19817）2—7

李鍾湘：《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始末記》，第1部分，《傳記文學》，第231期（1981年8月）

[982] Li Ho-lin.Chin erh-shih-nien Chung-kuow 　en-i ssu-ch’ao lun（Chinese literary trends in the recent twenty years）.Shanghai：Sheng-huo，1947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983] Li Ho-lin et al.C.hung-kuo hsin wen-hsueh shih yen-chiu（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Peking：Hsin chien-she tsa-chih she新建

設雜志社，1951李何林等：《中國新文學史研究》

[984] Li Ho-lin，ed.Chung-kuo wren-i lun-chan（Literary debates in China）.Hong Kong：Huah-sia華夏，1957

李何林編：《中國文藝論戰》

[985] Li Hua，comp.Ming Ch’ing i-lai Pei-ching kung-shang hui-kuan pei-k’e hsuan-pien（A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f Peking gilds since the Ming and the Ch’ing periods）.Peking：Wenw-u文物，1980

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

[986] Li I-yeh.Chung-kuo jen-min tsen-yang ta-pai Jih-pen ti-kuo-chu-i（How the Chinese People defeated Japanese imperialism）.Peking：K’ai-ming，開明，1951

李一葉：《中國人民怎樣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987] Li Jui.Mao Tse-tung t’ung-chih ti ch’u-ch’i ko-ming huo-tung（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Peking：Chung-kuo-ch’ing-nien Ch’u-pan-she，1957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

[988] Li Jui.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trans.by Anthony W.Sariti，ed.by James C.Hsiung，intro.by Strart R Schram.White Plains，NY：M.E.Sharpe，1977.（Trans.of Li J ui，1957）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安東尼·W.薩里蒂譯，熊玠編，宣道華序

[989] Li Jui.Mao Tse-tung ti tsao-ch’i ko-ming Huo-tung Changsha：Hu-nan jenmin，1980；rev.edn of Li Jui，1957

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

[990] Li Jui.Mao Tse-tung ti ch’u-ch’i ko-ming huot-ung（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Mao Tse-tung）.rev.edn，Peking：Jen-min，1980

李銳：《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增訂版

[991] Li Jui.‘Hsueh-sheng shih-tai ti Mao Tse-tung’（Mao Tse-tung during his student period）.Hsin-hua wen-chai 1（1984）175—181

李銳：《學生時代的毛澤東》，《新華文摘》，1984年第1期

[992] Li Kuo-ch’i.Chung-kuo hsien-tai-hua tich’ü-yü yen-chiu：Min-Che-T’ai tich’ü，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Fekien，Chekiang and Taiwan）.Taipei：IMH，1982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

[993] Li Kuo-ch’i and Chu Hung.‘Ch’ing-tai Chin-hua-fu ti shih-chen chieh-kou chi ch’i yen-pien’（The structure and progressive changes in markets and towns in Chin-hua prefecture during the Ch’ing）.Li-shih hsueh-Pao（Bul 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7（May 1979）113—87

李國祁和朱鴻：《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歷史學報》，第7期（1979年5月）

[994] Li Li-san.Fan-t’o（anti-Trotsky）.n.p.，n.d.Mimeographed

李立三：《反托》，油印

[995] Li，Lillian M.China’s silk trade：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1842—1937.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1

莉蓮·M.李：《中國絲綢貿易：現代世界中的傳統工業，1842—1937年》

[996] Li，Lillian M.‘Introduction’to‘ Food，famine，and the Chinese statea- symposium’.JAS 41.4（Aug.1982）687—708

莉蓮·M .李：《糧食、饑荒與中國政府— —專題論集》的《導言》，《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997] Li，Lincoln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1937—1941：problem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ol.Tokyo：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7—1941年：政治和經濟控制問題》

[998] Lil-un yü hsien-shih（Theory and reality）Shanghai，1939—

《理論與現實》，上海，1939年—

[999] Li Mu.San-shih nien-tai wen-i lun（On the literature and arts of the 1930s）.Taipei：Li-ming黎明，1973

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

[1000] Li pao.Hong Kong

《立報》，香港

[1001] Li-shih hsueh-pao（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Taipei：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Jan.1973—

《歷史學報》，臺北，1973年—

[1002] Li-shih tang-an（‘ Lishi dang’an ’）（Historical archives quarterly），ed.by First and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Chung-kuo ti-i li-shih tang-an-kuan，Chung-kuo ti-erh li-shih tang-an-kuan.Peking，1981—

《歷史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京，1981年—

[1003] Li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Monthly.Peking，1954—66，1975—

《歷史研究》，月刊，北京，1954—1966年，1975年—

[1004] Li Ta.‘Ko-hsin yun-tung ti ta ching-shen’（The great spirit of the renovation movement）.Ko-hsin chou-k’an，1.6（31 Aug.1946）5

李達（音）：《革新運動的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 月31日）

[1005] Li Ta-chao.Shou-ch’ang wem-chi（Collected essays of Li Ta-chao）.Shanghai：Jen-min，1952

李大釗：《守常文集》

[1006] Li Ta-chao.Li Ta-chao hsuan-chi（Selected works of Li Ta-chao）.Peking：Jen-min，1962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

[1007] Li Ta-chao.‘Ya-hsi-ya ch’ing-nien ti kuang-ming yun-tung’（The luminous Asiatic youth movement），in Li Ta-chao，Li Ta-chao hsuan-chi，327—9

李大釗：《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收入《李大釗選集》

[1008] Li Tsung-huang.Hsin-hsien-chih chih li-lun yü shih-chi（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county system）.Chungking：CH，1944

李宗黃：《新縣制之理論與實際》

[1009] Li Tsung-jen and Tong Te-kong.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9

李宗仁和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

[1010] Li Tzuc-hing.‘Chin-nan chieh-fang ch’ü ti tou-cheng ch’ing-hsing’（The struggle situation in the liberated districts of south Shansi）.Kuan-ch’a 6 March 1948，p.15

李子靜：《晉南解放區的斗爭情形》，《觀察》，1948年3月6日

[1011] Li Tzu-hsiang.‘Kang-chan i-lai Ssu-ch’uan chih kung-yeh’（Szechwan’s industry during the war）.Ssu-ch’uan ching-chi chi-k’an，1.1（15 Dec.1943）17—43

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1期（1943 年12月15日）

[1012] Li Tzu-hsiang.‘ Wo-kuo chan-shih kung-yeh sheng-ch’an ti hui-ku yü ch’ienchan’（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a’s wartime industrial production）.SCCC 2.3（1 July 1945）26—41

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產的回顧和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

[1013] Li WeN-chih，comp.Chung-kuo chin-tai nung-yeh-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a’s agriculture），vol.1.Peking：San-lien，1957.See also Chang Yu-i

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也見章有義

[1014] Li Yü.Lun ch’ün-chung lu-hsien yü Shan-tung ch’ün-chung yun-tung（On the mass line and the mass movement in Shantung）.n.p.：Chung-kung Chiaotung-ch’ü tang wei中共膠東區黨委，February 1946

黎玉：《論群眾路線與山東群眾運動》

[10 15] Li Yun-han.Ts’ung j ung-Kung tao ch’ing-tang（From the admission of the Communists to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Kuomintang）.2 vols.Taipei：Chungkuo hsueh-shu chu-tso chiang-chu wei-yuanh-ui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李云漢：《從容共到清黨》，2卷

[1016] Li Yunh-an.Sung Che-yuan yü ch’i-ch’i k’ang-chan（Sung Che-yuan and the 7 July war of resistance）.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73

李云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

[1017] Li Yun-han.‘The origins of the war：background of the Lukouchiao Incident，July 7.1937’，in Paul K.T.Sih，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3—32

李云漢：《戰爭的起源：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背景》，收入薛光前編：《中國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1018] Liang Ch’i-ch’ao et al.Wanc-h’ingw us-hih-nien lai chih Chung-kuo，1872—1921（China during the last fifty years，1872—1921）.Shanghai：Shun-pao kuan申報館，1923；Hong Kong reprint：Lung-men龍門，1968

梁啟超等：《晚清五十年來之中國，1872—1921》

[1019] Liang Shih—ch’iu.Ta’n Wen I-to（About Wen I-to）.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3：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67

梁實秋：《談聞一多》，《傳記文學》叢書第3種

[1020] Liang Shih-ch’iu.‘Ch’ing-hua ch’i-shih’（Tsinghua University at Seventy），in Chuan-chiw 　eih-sueh（Biographical literature），No.231（August 1981），82—8

梁實秋：《清華七十》，《傳記文學》，第231期（1981年8月）

[1021] Liang Shu-ming.‘Pei yu so-chien chi-lueh’（An account of what I observed on my northward journey），in Chung-kuo min-tsu tzu-chiu yun-tung chihtsui-hou chueh-wu（The final realization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s selfhelp movement），257—88

梁漱溟：《北游所見紀略》，收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

[1022] Liang Ssu-ch’eng，ed.and introd.by Wilma C.Fairbank.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tructural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types.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4

梁思成著，威爾馬·C.費爾班克編并序：《中國建筑畫史：其結構方式的發展和其形式的演變之研究》

[1023] Lieberthal，Kenneth G.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1949—195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肯尼思·G.利伯索爾：《天津的革命和傳統，1949—1952年》

[1024] Lilley，Charles Ronald.‘Tsiang T’ing-fu：between two worlds，1895—1935’.University of Maryland，Ph.D.dissertation，1979.（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查爾斯·羅納德·利利：《蔣廷黻：在兩個世界之間，1895—1935年》，馬里蘭大學，博士論文，1979年

[1025] Lin Chen.Chung-kuo nei-mu（China’s inside story）.Shanggai：Hsin-wen tsachih新聞雜志，1948

林真：《中國內幕》

[1026] Lin Chi-yung.‘K’ang-chan ch’i-chung min-ying ch’ang-k ’uang ch’ien-Ch’uan chien-shu’（Summary account of the move of privately-owned factories and mines to Szechwan during the war）.Ssu-ch’uan wen-hsien，62（1 Oct.1967）3—9

林繼庸：《抗戰期中民營廠礦遷川簡述》，《四川文獻》，第62期（1967年10月1日）

[1027] Lin，Julia C.Modern Chinese poetry：an introduc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2

朱莉婭·C.林：《中國現代詩歌：概論》

[1028] Lin Sung-ho.‘T’ung-chi shu-tzu hsia ti Pei-p’ing’（Peking：a statistical survey）.She-hui k’o-hsueh tsa-chih，2.3（Sept.1931）376—419

林頌河：《統計數字下的北平》，《社會科學雜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

[1029] Lin Ts’ung，ed.Hsien chieh-tuan tiw 　enh-sueh lun-chan（Current literary debates）.Shanghai：Kuang-ming光明，1936

林淙編：《現階段的文學論戰》

[1030] Lin Tzu-hsun（Tze-Hsiun Lin）Chung-kuo liu-hsueh chiao-yü shih（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Taipei：Hua-kang華岡，1976

林子勛：《中國留學教育史》

[1031] Lin Wen-ch’ing po-shih tan-sheng pai-nien chi-nien Ka’n，Lin Wen-ch’ing chuan（Life of Lim Boon Keng）.n.p.，n.d.

林文慶博士誕生百年紀念刊，《林文慶傳》

[1032] Lin Yueh-hwa（Yao-hua）.The golden wi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1948

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主義的社會學研究》

[1033] Lin Yun-hui.‘Lueh lun Mao Tse-tung t’ung-chih tui Li-san lu-hsien ti jenshih ho ti-chih’（A brief account of Mao Tse-tung’s understanding of，and resistance to，the Li-san line）.TSYC 4（1980）51—9

林蘊暉：《略論毛澤東同志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抵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34] Linden，Allen B.‘Politics and educa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case of the University Council，1927—1928’.JAS 27.4（Aug.1968）763—776

艾倫·B.林登：《國民黨中國的政治和教育：大學院個案，1927—1928年》，《亞洲研究雜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

[1035] Lindsay，Michael.‘The taxation system of the Shansi-Chahar- Hopei Border Region，1938—1945’.CQ 42（April-June 1970）1—15

林邁可：《晉察冀邊區稅制，1938—1945年》，《中國季刊》，第42期（1970 年4—6月）

[1036] Lindsay，Michael.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1937—1945.London：Bergstrom&Boyle，1975

林邁可：《不為人知的戰爭：華北，1937—1945年》

[1037] Linebarger，Paul M.A.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a political study.Boston：World Peace Foundation，1941；repr.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73

林百克：《蔣介石的中國：政治研究》

[1038] Ling Yü.“ Mao Tse-tung t’ung-chih ho li-san lu-hsien ti kuan-hsi t’ao lun tsung-shu”（A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Comrade Mao Tsetung’s relationship to the Li-san line）.TSYC，3（1982）78—80

凌宇：《毛澤東同志和立三路線的關系討論綜述》，《黨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039] Link，Arthur S.Wilson.vol.3.The struggle for neutrality，1914—191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Wilson.5 vol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7—65）

阿瑟·S.林克：《威爾遜》第3卷，《為中立而斗爭，1914—1915年》（《威爾遜》，全5卷）

[1040] Link，Perry.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林培瑞：《鴛鴦與蝴蝶：20世紀初期的中國城市通俗小說》

[1041] Lippit，victor D.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in Victor Lippit et al.‘Symposium o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Modern China，4.3（Julr 1978）；see pp.251—328

維克托·D.利皮特：《中國不發達狀態的發展》，收入維克托·D.利皮特等：《中國經濟史專題論集》，《現代中國》，第4卷第3期（1978年7月）

[1042] Liu Ch’ang-sheng et al.Chung-kuo kung-ch’an-tang yü Shang-hai kungjen：Shang-hai kung-jen yun-tung li-shih yen-chiu tzu-liao chih erh（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hanghai workers：Shanghai labour movement historical research materials number two）.Shanghai：Lao-tung ch’upan-she勞動出版社，August 1951

劉長勝等：《中國共產黨與上海工人：上海工人運動歷史研究資料之二》

[1043] Lin Chen-tung.‘Chung-kuo ch’u-lu wen-t’i’（The question of China’s way out）.Kuo-wen chou-pao，10.24（19 June 1933）1—6（sep.pag.）

劉振東：《中國出路問題》，《國聞周報》，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

[1044] Liu Chi-ping.‘San-shih-san-nien Ssu-ch’uan chih shang-yeh’（The commercial economy of Szechwan in 1944）.Ssu-ch’uan ching-chi chi-k’an，2.2（1 April 1945）75—81

劉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 年4月1日）

[1045] Liu.F.F.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nina，1924—194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1924—1949年》

[1046] Liu Hsin-huang.Hsien-tai Chung-kuow 　en-hsueh shih-hua（Dis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Taipei：Cheng-chung，1971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

[1047] Liu Hung-sheng ch’i-yeh shih-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enterprises of Liu Hung-sheng），ed.by Shang-hai she-hui k’e-hsueh-yuan Ching-chi yenchiu so.3 vols.Shanghai：Jenmin，1981

《劉鴻生企業史料》，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3卷

[1048] Liu I-ch’ang.‘Ts’ung k’ang-chan shih-ch’i tso-chia sheng-huo chih k’un-k’u k’an she-hui tui tso-chia ti tse-jen’（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ety toward writers；a view based on the writers’impoverished lives during the war years）.Ming-Pao yueh-k’an（Ming-pao monthly），13.6（June 1978）58—61

劉以鬯：《從抗戰時期作家生活之困苦看社會對作家的責任》，《明報月刊》，第13卷第6期（1978年6月）

[1049] Liu，James T.C.‘ An early Sung reformer：Fan Chung-yen’，in John K.Fairdank，ed.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105—131

劉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收入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

[1050] Liu，Kwang-Ching.‘World v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reflections on post-Mao historiography’.JAS 40.2（Feb.19812）95—326

劉廣京：《世界觀與農民造反：對毛澤東以后的編史學的看法》，《亞洲研究雜志》，第40卷第2期（1981年2月）

[1051] Lin Min.‘San shih-san-nien Ssu-ch’uan chih kung-yeh’（Szechwan’s industry in 1944）.SCCC 2.2（1 April 1945）27—43

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 1日）

[1052] Liu Ning.See Chang Kuo-t’ao

柳寧，見張國燾

[1053] Liu P’ei-shan.‘Hui-i Hsiang-Kan pien-ch’ü ti san-nien yu-chi chan-cheng’（Recollections of three years’guerrilla warfare in the Hunan-Kiangsi border region），in Chung-kuo Kung-ch’an-tang tsai Chiang-hsi ti-ch’ü lingtao koming tou-cheng ti li-shih tzu-liao（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led by the CCP in Kiangsi）.Chiang-hsi jenmin，1958

劉培善：《回憶湘贛邊區的三年游擊戰爭》，收入《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資料》

[1054] Liu Po-ch’eng，et al.Hsing-huo liao-yuan星火燎原（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Hong Kong：San-lien，1960.See also Hsing-huo liaiyuan

劉伯承等：《星火燎原》

[1055] Liu Shan-shu.Tziuc-hih ts’ai-cheng lun（On local self-government finance）.Shanghai：Cheng-chung shu-chü正中書局，1947

劉善述：《自治財政論》

[1056] Liu Shao-ch’i.‘Lun kung-k’ai kung-tso yü mi-mi kung-tso’（On open work and secret work）.Kung-ch’an tang-jen（The Communist）.Yenan，1939.Manuscript.Copy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劉少奇：《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共產黨人》

[1057] Liu Shao-ch’i.‘Chien-ch’ih Hua-pei k’ang-chan chung ti wu-chuang pu-tui’（Firmly support armed groups taking part in the north China war of resistance），in K’ang-J ih min-tsu t’ung-i chan-hsien chih-nan（Guide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5.39—54

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收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

[1058] Liu Shao-ch’i.Lun tang（On the party）.Dairen：Tac-hung shu-tien大眾書店，1947

劉少奇：《論黨》

[1059] Liu Shih-shun.‘I-chiu-erh-ling chi tsai-hsiao shih-tai chih Ch’ing-hua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he days of the class of 1920）.Ch’ing-hua hsiao-yu t’ung-hsun（Tsing-hua Alumni/ae Gazette）.NS 71，special anniversary issue.Hsinchu：1981

劉師舜：《一九二○級在校時代之清華》，《清華校友通訊》，新第71期，校慶專號

[1060] Liu Shou-sung.Chung-kuo hsin wen-hsueh shih ch’u-kao（A preliminary draf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 vols.Peking；Tso-chia ch’upan-she作家出版社，1956

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2卷

[1061] Liu Ta-chung.China’s national income，1931—1936：an exploratory stud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46

劉大中：《中國國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

[1062] Liu Ta-chung and Yeh Kung-chia.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1933—1959.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劉大中和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1933—1959年》

[1063] Liu Tsai-fu and Lin Fei.Lu Hsun chuan（Biography of Lu Hsun）.Peking：Chung-kuo she-hui k’o-hsueh ch’u-pan-she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劉再復和林非：《魯迅傳》

[1064] Liu Ts’ui-jung.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1800—1911.Taipei：Academia Sinica，Institute of Economics，1980

劉翠溶：《韓江沿岸貿易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1800—1911年》

[1065] Liu Wu-chi.‘The modern period’，in Herbert A.Giles，ed.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445—500

柳無忌：《現代》，收入翟理思編：《中國文學史》

[1066] Liu Yai.‘T’ai-P’ing T’ien-kuo shih-pai hou Chiang-nan nung-ts’un chingchi pien-hua ti tsai t’an-t’ao’（Another inquiry into economic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villages of Kiangnan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Taipings）.Li-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3（1982）105—20

劉耀：《太平天國失敗后江南農村經濟變化的再探討》，《歷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067] Lo Chial-un.‘Chiang Meng-lin hsien-sheng chuan-lueh’（Brief biography of Chiang Meng-lin）in his Shih-che jus-suc-hi，89—102

羅家倫：《蔣夢麟先生傳略》，收入他的《逝者如斯集》

[1068] Lo Chia-lun.Shih-che ju-ssu-chi（Recollections of those who are gone）.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14.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 67

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傳記文學》叢書第14種

[1069] Lo Chia-lun.‘Hsueh-shu tu-li yü hsin Ch’ing-hua’（The independence of scholarship and the new Tsing-hua），in his Shih-che ju-ssu-chi，7—15

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收入他的《逝者如斯集》

[1070] Lo Chia-lun.‘Ts’ai Yuan-p’ei hsien-sheng yü Pei-ching ta-hsueh’（Mr Ts’ai Yuan-p’ei and Peking University），in his Shih-che ju-ssu-chi，52—67

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收入他的《逝者如斯集》

[1071] Lo Chia-lun.‘Wo so jen-shih ti Tai Chi-t’ao hsien-sheng’（The Tai Ch’it’ao I knew），in his Shih-che ju-ssu-chi，144—50

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收入他的《逝者如斯集》

[1072] Lo Chia-lunS.ee Ko-ming wen-hsien

羅家倫，見《革命文獻》

[1073] Lo-fu（Chang Wen-t’ien）et al.Ch’ing-nien hsueh-hsi wen-t’i（Problems of young people’s study）.Shanghai：Hua-hsia shu-tien華夏書店，1949

洛甫（張聞天）等：《青年學習問題》

[1074] Lojewski，Frank A.‘The Soochow bursaries：rent manage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CSWT 4.3（June 1980）43—65

弗蘭克·A.洛耶夫斯基：《蘇州租棧：晚清的佃租管理》，《清史問題》，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

[1075] The Long March，eyewitness account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3

《長征親歷》

[1076] Lötveit.Trygve.Chinese communism，1931—1934：experience in civil government.Lund，Sweden：Studentlitteratur，1973；Copenhagen：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No.16，1973

特呂格弗·勒特菲特：《中國共產主義，1931—1934年：民政經驗》

[1077] Louis，William Roger.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

威廉·羅杰·路易斯：《英國的遠東戰略，1919—1939年》

[1078] Lowe，Peter.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1915：a study of British Far Eastern policy.London：Macmilla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69

彼得·洛：《英國與日本，1911—1915年：英國遠東政策研究》

[1079] Lowe，Peter.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1937—1941.Oxford：Clarendon Press，1977

彼得·洛：《英國與太平洋戰爭的原因：英國遠東政策研究，1937—1941年》

[1080] LSYC.See Li-shih yen-chiu

《歷史研究》

[1081] Lu-ch’eng hsien-chih（Lu—ch’eng county gazetteer），1885

《潞城縣志》

[1082] Lu Hsun Lu Hsun ch’üan-chi（Complete works of Lu Hsun）.20 vols.Peking：Jenm-in wen-hsueh ch’u-pen-she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魯迅：《魯迅全集》，20卷

[1083] Lu Hsun.See feng Hsueh-feng；Hsia，Tsi-an；Lee，Leo Ou-fan；Lyell，W.A.，J r.；Mills，Harriet C.；Pollard，David E.；Yang，Gladys，among others

魯迅，見馮雪峰，夏濟安，李歐梵，小威廉·A.萊爾，哈里特·C.米爾斯，戴維·E.波拉德，戴乃迭

[1084] Lubot，Eugene.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Westport，Conn.and London：Greenwood Press，1982

尤金·盧博特：《不自由時代的自由主義：中華民國的新文化自由主義者，1919—1937年》

[1085] Lutz，Jessie Gregory.China and the Chrisitan colleges，1850—1950.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

杰西·格雷戈里·盧茲：《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

[1086] Lutz，Jessie G.‘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Modern Asian Studies，10.3（July 1976）395—416

杰西·G.盧茲：《中國民族主義和20世紀20年代的反基督教運動》，《現代亞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

[1087] Lutz，Jessie Gregory.‘Nationalism，Chinese politics，and Christian missions’.Unpublished manuscript，1984

杰西·格雷戈里·盧茲：《民族主義、中國政治和差會》，未刊文稿

[1088] Lyell，William A.，Jr.Lu Hsun’s vision of real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小威廉·A.萊爾：《魯迅對現實的觀察力》

[1089] Ma，Amy Fei-man.‘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populace in Ch’uansha，1911’，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1（1975—6）74—84

馬飛文：《川沙的地方自治與當地民眾，1911年》，《東亞研究中心論文選》，第1集（1975—1976年）

[1090] Ma Li-yuan.‘Chan-shih Hua-pei nung-tso-wu sheng-ch’an chi ti-wei tui liang-shih chih lueh-to’（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illaging of foodstuffs by the Japanese and their puppet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She-hui k’o-hsueh tsa-chih，10.1（J une 1948）62—81

馬黎元：《戰時華北農作物生產及敵偽對糧食之掠奪》，《社會科學雜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

[1091] MacKinnon，Stephen.‘The Peiyang Army，Yuan Shih-k’ai，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JAS 32（May 1972）405—23

斯蒂芬·麥金農：《北洋軍、袁世凱和中國現代軍閥政治的起源》，《亞洲研究雜志》，第32期（1972年5月）

[1092] MacKinnon，Stephen R.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Yuan Shih-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1901—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斯蒂芬·R.麥金農：《清帝國末年的權力與政治：袁世凱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

[1093] MacMurray，John von Antwerp，cornp.and ed.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private agreements，and other documents，in reference to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relation to foreign powers，and in reference to the interrelation of those powers in respect to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Sino-Japanese war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world war of 1914—1919.2 vo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

約翰·馮·安特韋普·麥克默里編：《1894—1919年與中國締結或涉及中國的條約和協定》，2卷

[1094] MacNair，Harley F.，ed.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哈利·F.麥克奈爾編：《中國未淪陷區的呼聲》

[1095] Maier，Charles.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stabilization in France，Ger-nany，and Italy in the decade after World War I.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查爾斯·梅爾：《改造資產階級的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十年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穩定》

[1096] Makino Tatsumi.Shina kazlku kenkyū支那家族研究（Studies of the Chinese family）.Tokyo：Seikatsusha生活社，1944

牧野巽：《中國家族研究》

[1097] Mallory，Walter H.，with a foreword by Dr John H.Finley.China：land of famine.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26

沃特·H.馬洛里：《中國：饑荒的國家》，約翰·H.芬利博士序

[1098] Malraux，A.Anti-memoirs，trans.by T.Kilmartin.New York：Holt，Rinehart &Winxton，1968

A.馬爾羅：《反回憶錄》，T.基爾馬丁譯，原著為法文

[1099] Mancall，Mark.Russia and China：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馬克·曼考爾：《俄國與中國：1728年以前的兩國關系》

[1100] Mann，Susan.Review of G.Rozman，ed.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JAS 42.1（Nov.1982）146—53

蘇珊·曼：《評G.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

[1101] Mann，Susan.‘Urbaniz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a’.Modern China，10.1（Jan.1984）79—115

蘇珊·曼：《中國的城市化與歷史變遷》，《現代中國》，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

[1102] Mann，Susan.See also Jones，Susan Mann

蘇珊·曼，也見蘇珊·曼·瓊斯

[1103] Manshikai，ed.Manshū kaihatsu yonjūnenshi 滿州開img四十年史（History of forty years of Manchurian development）.3 vots.Tokyo：Manshū kaihatsu yonjūnenshi kankōkai滿州開img四十年史刊行會，1964—5

滿史會編：《滿洲開發四十年史》，3卷

[1104] Mantetsu.See SMR

滿鐵

[1105] Mantici，Giorgio.Pensieri de fiume Xiang.Roma：Editori Riuniti，1981喬治·曼蒂奇：《湘江思潮》

[1106] Mao Tse-tung.Selected works.4 vol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1—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英文版，4卷

[1107] Mao Tse-tung.Hsuan-chi選集（Selected works）.Chinese ed.Peking，1966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中文版

[1108] Mao Tse-tung.Mao Tse-tung chi毛澤東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ed.by Takeuchi Minoru.10 vols.Tolyo：Hokubōsha北望社，1970—2

毛澤東：《毛澤東集》，竹內實編，10卷

[1109] [Mao Tse-tung.] Mao Tse-tung chi，pu chüan，1毛澤東集補卷（...supplementary volumes，1）.Tokyo：Sōsōsha蒼社，26 Dec.1983.Six volumes out of nine projected were issued up to October 1984

[毛澤東]：《毛澤東集補卷》，全10卷

[1110] [Mao Tse-tung.]Mao Tse-tung shu-hsin hsuan-chi（Selected letters of Mao Tse-tung）.Peking：Jen-min，1983

[毛澤東]：《毛澤東書信選集》

[1111] [Mao]Tse-tung.‘Pu-hsu shih-yeh chuan-chih’（No to the despotism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Hsiang River Review，1.（14 July 1919）3

[毛]澤東：《不許實業專制》，《湘江評論》，第1期（1919年7月14日）

[1112] [Mao]Tse-tung.‘Cha-tan pao-chü’（A brutal bomb attack）.Hsiang River Review，1（14 July 1919）3

[毛]澤東：《炸彈暴舉》，《湘江評論》，第1期（1919年7月14日）

[1113] [Mao]Tse-tung.‘Wei Te ju hu ti Fa-lan’（France fears Germany as if it were a tiger）.Hsiang RiverReview，3（28 July 1919）2

[毛]澤東：《畏德如虎的法蘭》，《湘江評論》

[1114] Mao Tse-tung.‘Min-chung ti ta lien-ho’（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Hsiang River Review，2—4（July—Aug.1919）.Trans.by S.Schram in CQ 49（Jan.—Mar.1972）76—87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湘江評論》，第2—4期（1919年7—8月），宣道華譯，載《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

[1115] Mao Tse-tung.‘Hsueh-sheng chih kung-tso’（The work of the students）.Hun-an chiao-yü（Hunan education）.1.2（Dec.1919）

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

[1116] [Mao] Tse-tung.‘Pei-ching cheng-pien yü shang-jen’（The Peking coup d’état and the merchants）.The guide weekly，31/32（11 July 1923）233—4

[毛]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向導周報》，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1117] Mao Tse-tung.‘Pien-cheng-fa wei-wu-lun（chiang-shou t’i-kang）’（Dialectical materialism—lecture notes）.K’ang-chan ta-hsueh（organ of the AntiJapanese Military-Political University），6 to 8（April to June，1938）123—5，147—50，184—7

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抗戰大學》，第6—8期（1938年4—6月）

[1118] Mao Tse-tung.Chi-ch’u chan-shu（Basic tactics）.Hankow：Tzu-ch’iang ch’upan she自強出版社，1938

毛澤東：《基礎戰術》

[1119] Mao Tse-tung.Pien-cheng wei-wu-lun（Dialectical materialism）.Dairen：Tachung shu-tien大眾書店，n.d.[c.1946]

毛澤東：《辯證唯物論》

[1120] Mao Tse-tung.Ching-chiw ent-’i yü ts’ai-chengw 　en-t’i（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Hong Kong：Hsin-min-chu ch’u-pan-she新民主出版社，1949

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1121] Mao Tse-tung.Basic tactics，ed.and trans.by Stuart R.Schram.New York：Praeger，1966.Trans.of Ch -ch’u chan-shu

毛澤東：《基礎戰術》，宣道華編譯

[1122] Mao Tse-tung.‘Chung-kuo nung-min ko chieh-chi ti fen-hsi chi ch’i tui koming ti t’ai-tu’（Analysis of all the classes of the Chinese peasantry，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revolution）.Mao Tse-tung chi，1.153—159

毛澤東：《中國農民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毛澤東集》，第1 卷

[1123] Mao Tse-tung.‘Chung-kuo she-hui ko chieh-chi ti fenh-si’（Analysis of all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Mao Tse-tung chi，1.161—74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集》，第1卷

[1124] Mao Tse-tung.‘Kuo-min ko-ming yü nung-min yun-tung’（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peasant movement）.Mao Tse-tung chi，1.175—9

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毛澤東集》，第1卷

[1125] Mao Tse-tung.‘Kao chung-kuo ti nung-min’（Address to the Chinese peasants）.Tzu-liao hsuan-pien，24

毛澤東：《告中國的農民》，《資料選編》

[1126] Mao Tse-tung.Mao 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7

毛澤東：《毛澤東論文學與藝術》

[1127] Mao Tse-tung.‘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in Mao Tse-tung，Mao Tse-tung on literature and art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入毛澤東：《毛澤東論文學與藝術》

[1128] Mao Tse-tung.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Long live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Red Guard Publication.2 vols.1967，1969

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萬歲》，2卷

[1129] Mao Tse-tung（？）.Dialogue with Red Guards，28 July 1968.JPRS 61269，476（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Washington，D.C.）

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與紅衛兵的談話》，《出版物聯合研究中心叢刊》，第61269期

[1130] Mao Tse-tung（？）.Dialogue with Red Guards，28 July 1968.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 1969，p.694

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與紅衛兵的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

[1131] Mao Tse-tung.‘Kai-ko hun-chih wen-t’i’（Problem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marriage customs）.MTTC，pu chüan，1.149

毛澤東：《改革婚制問題》，《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

[1132] Mao Tse-tung.‘Lien-ai wen t’i—shao-nien-jen yü lao-nien-jen’（Problems of being in love-the youth and the elderly）.MTTC，pu-chün，1.161—163

毛澤東：《戀愛問題— —少年人與老年人》，《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

[1133] Mao Tse-tung.‘Wai li，chün-fa yü ko-ming’（The foreign powers，the mili-tarists，and the revolution）.MTTC，piuc-hüan，2.109—11

毛澤東：《外力、軍閥與革命》，《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

[1134] Mao Tse-tung.‘Shih-ch’a Hun-an nung-yün kei Chung-yang ti pao-kao’（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an Inspec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MTTC，pu-chüan，2.255—7

毛澤東：《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補卷》，第2卷

[1135] Mao Tse-tung.‘Kei Hsiang-tung T’e-wei ti hsin’（Letter to the East Hunan Special Committee）.MTTC，pu-chüan，3.157—8

毛澤東：《給湘東特委的信》，《毛澤東集補卷》，第3卷

[1136] Mao Tse-tung.See Tzu Jen.

毛澤東，見子任

[1137] Mao Chu-hsi wen-hsuan（Selected essays by Chairman Mao）.n.p.

《毛主席文選》

[1138] Mao Tse-tung and Guevara，Che，Guerrilla warfare.Section by Mao trans.by Samuel B.Griffith.London：Cassell，1964

毛澤東和切·格瓦拉：《游擊戰》，塞繆爾·B.格里菲思譯毛澤東部分

[1139] Mao Zedong.Une étud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ed.and trans.by Stuart R.Schram.Paris：Mouton，1962

毛澤東：《體育之研究》，宣道華編譯

[1140] Marks，Robert B.‘Peasant society and peasant uprisings in South China：social change in Haifeng County，1630—1930’.University of Wisconsin，Ph.D.dissertation，1978

羅伯特.B·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海豐縣的社會變遷，1630—1930年》，威斯康星大學，博士論文，1978年

[1141] Marks，Robert B.‘Social change in Haifeng county on the eve of the Haifeng Peasant movement，1870—1920’.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Chinese Communist Rural Bases，Harvard University，1978

羅伯特·B.馬克斯：《海豐縣在海豐農民運動前夕的社會變遷，1870—1920年》，為中國共產黨農村根據地研究室撰寫的論文

[1142] Márquez，Gabriel Garcia.Cent ans de solitude（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Paris：Editions du Seuil，1968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寂》

[1143] Marsh，Susan Han.‘Chou Fo-hal：the making of a collaborator’，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 panese，304—27

蘇珊·漢·馬什：《周佛海：一個附敵者的發展過程》，收入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

[1144] Martin，Edwin W.‘The Chou demarche’.Foreign Service Journal，Nov.1981，13—16，32

埃德溫·W.馬丁：《周恩來外交新方針》，《外事雜志》，1981年11月

[1145] Marx，Karl.Le Cixh-uit Br 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Paris：Editions Sociates，1976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1146] Masuko Teisuke.Chūbu shina中部支那（Central China）.Taipei：Taiwan Nichi Nichi Shimpōsha臺灣日日新報社，1912

益子逞輔：《中國中部》

[1147] Matsumoto Shigeharu.Shanghai jidai上海時代（The Shanghai years）.3 vols.Tokyo：Chūō Kōronsha中央公論社，1974—5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3卷

[1148] May，Gary，with intro.by John K.Fairbank.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

加里·梅：《代人受過的中國通：范宣德的外交考驗》，費正清序

[1149] McCord，Edward A.‘Recent progress in warlord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an China，9.2（Fed.1984）40—7

愛德華·A.麥科德：《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閥研究的最近進展》，《中華民國史》，第9卷第2期（1984年2月）

[1150] McCormack，Gavan.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China，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加萬·麥考密克：《中國東北的張作霖，1911—1928年：中國、日本和滿洲的打算》

[1151] McDonald，Angus.Hōgaku kenk yū法學研究46.2（1972）99—107

安格斯·麥克唐納：《法學研究》第46卷第2期的一篇文章

[1152] McDonald，Angus.Rōnin浪人（Tokyo），14（Dec.1973）37—47

安格斯·麥克唐納：《浪人》第14期（1973年12月）的一篇文章

[1153] McDonald，Angus W.Jr.‘Mao Tse-tung and the hunan self-government movement，1920：an introduction and five translations’.CQ 68（Dec.1976）751—77

小安格斯·W.麥克唐納：《毛澤東和湖南自治運動，1920年：介紹和五篇譯文》，《中國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

[1154] McDonald，Angus W.，J r.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elites and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China，1911—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小安格斯·W.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1911—1927年中國的湖南省的精英和民眾》

[1155] McDonald，Angus W.，Jr.‘Wallerstein’s world economy：how seriously should we take it？’JAS 38.3（May 1979）535—40

小安格斯·W.麥克唐納：《沃勒斯坦的世界經濟：我們應如何認真看待它？》，《亞洲研究雜志》，第38卷第3期（1979年5月）

[1156] McDougall，Bonnie S.，trans.and ed.Paths in dream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Queensland，Austral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1976

邦妮·S.麥克杜格爾編譯《夢中的路：何其芳詩文選》

[1157] McDougall，Bonnie S.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

邦妮·S.麥克杜格爾：《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3年文本的附注釋的譯文》

[1158] McElderry，Andrea Lee.Shanghai old-style banks（ch’ien-chuang），1800—1935：a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

安德烈亞·李·麥克爾德里：《上海老式銀行（錢莊），1800—1935年：轉變中社會的傳統機構》

[1159] McLane，Charles B.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查爾斯·B.麥克萊恩：《蘇聯政策與中國共產黨，1931—1946年》

[1160] Meic-hou p’ing-lun（Weekly review），ed.Li Ta-chao et al.Peking，22 Dec.1918—31 Aug.1919

《每周評論》，李大釗等編，北京，1918年12月22日—1919年8月31日

[1161] Mei Yi-pao.Ta-hsueh chiao-yü wu-shih-nien—pa-shih tzu-chuan（University education over fifty years-an autobiography at 80）.Taipei：Lien-ching聯經，1982

梅貽寶：《大學教育五十年— —八十自傳》

[1162] Meisner，Maurice.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莫里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1163] Melby，John F.The mandate of Heave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

約翰·F.梅爾比：《天命》

[1164] Meliksetov，A.V.Sotsial’no-ekonomicheskaia politika Gomin’dana v Kitae，1927—1949（Kuomintang social-economic policy in China，1927—1949）.Moscow：Glavnaia redaktsiia vostochmoi literatury，Nauka，1977

A.V.梅利克謝托夫：《中國國民黨的社會經濟政策，1927—1949年》

[1165] Meng Kuang-yu and Kuo Han-ming.Szu-ch’uan tsu-tien wen-t’i（The tenant problem in Szechwan）.Chungking：CP，1944

孟光宇和郭漢鳴：《四川租佃問題》

[1166] Meserve，Walter，and Meserve，Ruth，eds.Modern drama from Communist China.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0

沃爾特·梅澤夫和魯思·梅澤夫編：《共產主義中國的現代戲劇》

[1167] Metzger，Thomas.，‘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g state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the Liang-Huai salt monopoly，1740—1840’，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9—46

墨子刻：《清政府在商業方面的組織能力：兩淮鹽專賣，1740—1840年》，收入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1168] Metzger，Thomas.‘O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na：the increasing differentiation of the economy from the polity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times’，in Chi-ming Hou and Tzong-shien Yu.eds.，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3—14

墨子刻：《論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歷史根源：明末清初經濟與行政日益分化》，收入侯繼明和于宗先編：《中國近代經濟史》

[1169] Mi Ti-kang.‘Yü chih Chung-kuo she-hui kai-liang chu-i’（My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Chinese society），in Chai-ch’eng ts’un-chih，Appendices，25—91

米迪剛：《余之中國社會改良主義》，收入《翟城村志》

[1170] Mi-ting（M.Mitin）and others，trans.by Ai Ssu-ch’i and others.Hsin-chehsueh ta-kang（Outline of the new philosophy）.Shanghai：Tu-shu shenghuo ch’u-pan-she，1936

米定等著，艾思奇等譯：《新哲學大綱》

[1171] Miao Ch’u-huang.‘Chung-kuo kung-nung hung-chün ch’ang-cheng kai-shu（A brief account of the Long March of the Workers’and Peasants’Rad Army of China）.Li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2（1954）85—96

繆楚黃：《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

[1172] Miao Ch’u-huang.Chung-kuo Kung-ch’an-tang chien-yao li-shih（A brief history of the CCP）.Peking：Hsueh-hsi tsa-chih-she學習雜志社，1957

繆楚黃：《中國共產黨簡要歷史》

[1173] Michael，Franz.‘Region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intro.to 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

梅谷：《19世紀中國的地方主義》，為斯坦利·斯佩克特著《李鴻章和淮軍》撰寫的序言

[1174] Migdal，Joel S.Peasants，politics and revolution：pressures toward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喬爾·S.米格代爾：《農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對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壓力》

[1175] Miles，Milton E.A different kind of war：the little-known story of the combined guerrilla forces created in China by the US Navy and the Chinese during World War Ⅱ.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7

米爾頓·E.邁爾斯：《另一種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海軍和中國人在中國創建聯合游擊隊的鮮為人知的史實》

[1176] Military campaigns in China，1924—1950.Se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中國的軍事戰役，1924—1950年》，見國防部戰史局

[1177] Mills，Harriet C.‘Lu Hsun：1927—1936，the years on the left’.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63

哈里特·C.米爾斯：《魯迅：1927—1936年，在左翼的年代》，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63年

[1178] Min-chu P’ing-lun（Democratic review）Hong Kong，July 1949—

《民主評論》，香港，1949年7月—

[1179] Min-kuo 20—30 nien-tai Chung-kuo Ching-chi nung-yeh t’u-ti shui-li went’i tzu-liao（Materials on China’s economic，agrarian，land and water control problems in the 1930s and 1940s）.An index compiled by the L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in Taipei

《民國二○、三○年代中國經濟農業土地水利問題資料》

[1180] Min Tu-ki.‘Ch’ǒngdae ponggǒllon ǔi kǔndaejǒk pyǒnmo’清代封建論の近代的變貌（The moder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feudalism in the Ch’ing period），Chungguk kǔndaesa yǒn’gu中國近代史研究（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Seoul：Ⅱ Cho kak一潮閣，1973

閔斗基：《清代封建論之近代變形》，收入《中國近代史研究》

[1181] Miner，Noel Ray.‘Chekiang：the Nationalists’ef fort in agrarian reform and construction，1927—1937’.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3

諾埃爾·雷·邁因納：《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

[1182] Miner，Noel Ray.‘Agrarian reform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case of rent reduction in Chekiang，1927—1937’，in F.Gilbert Chan，ed.China at the crossroads：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1927—1949，69—89

諾埃爾·雷·邁因納：《國民黨中國的農村改革：浙江減租個案，1927—1937年》，收入陳福霖編：《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1927—1949年》

[1183] Ming Ch’ing Su-chou kung-shang-yeh pei-k’e chi（A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f Soochow guilds in the Ming and Ch’ing periods），comp.by Su-chou li-shih po-wu-kuan，Ching-su shih-fan hsueh-yuan li-shih-hsi，Nan-ching tahsueh Ming Ch’ing shih yen-chiu shih.Kiangsu：Jen-min，1981

《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蘇州歷史博物館、江蘇師范學院歷史系、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室編

[1184] Ming Ch’ing tzu-pen-chu-i meng-ya yen-chiu lun-w enc hi（Collected research essays on capitalist sprouts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ed.by Nan-ching ta-hsueh li-shih.hsi Shanghai：Jen-min，1981

《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南京大學歷史系編

[1185] Mingp-ao yueh-k’an（Ming-pao monthly）.Hong Kong.1966—

《明報月刊》，香港，1966年—

[1186] Ministry of Education，Ofice of Statistics.comp.Erh-shih-san nien-tu ch’üan-kuo kao-teng chiao-jü t’ung-chi（Stat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34—5）.Shanghai：CP

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

[1187]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War History Bureau.Military campaigns in China，1924—1950，trans.by W.W.Whitson，Patrick Yang and Paul Lai.Taipei，1966

國防部戰史局編：《中國的軍事戰役，1924—1950年》，W.W.惠策恩、帕特里克·楊和保羅·賴譯

[1188] Mitin，See Mi-ting

米定

[1189] Miyazaki Tōten.My thirty three years dream：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ōten，trans.and introd.by S.Etō and M.B.Janse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

宮崎滔天：《我三十三年的愿望：宮崎滔天自傳》，衛藤沈吉和馬里烏斯·詹森譯并序

[1190] Moderm Asian Studies.Quarterly.Cambridge，England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

《現代亞洲研究》，季刊，1967年—

[1191] Modern Chin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Beverly Hill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75—

《現代中國》，季刊，1975年—

[1192] Monroe，Paul.China：a nation in evolution.New York：Macmillan，1928

孟祿：《中國：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1193] Moore，Barrington，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an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

小巴林頓·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根源：現代世界發展因素中的土地和農民》

[1194] Morita Akira.Shindai suirishi kenkyū清代水利史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during the Ch’ing period）.Tokyo：Akisho bō 亞紀 書房，1974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

[1195] Morley，James WilliamT.he Japanese thrust into Siberia，191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7

詹姆斯·威廉·莫利：《日本向西伯利亞推進，1918年》

[1196] Morley，James William，ed.The fateful choice：Japan’s advance into Southeast，Asia，1939—1941：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kaisen gaikō sh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詹姆斯·威廉·莫利編：《重大的選擇：日本向東南亞前進，1939—1941年：從〈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 —開戰外交史〉選譯》

[1197] Morley，James William，ed.The China quagmire：Japan’s expan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1933—194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詹姆斯·威廉·莫利編：《中國的困境：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1933—1941年》

[1198] Morley，James W.，ed.Japan’sr oad to the Pacific War：Japan erupts.The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and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1928—1932：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kaisen gaikō shi.Fourth vol.in a 5-vol.se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詹姆斯·W.莫利編：《日本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日本突然爆發。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和滿洲事變，1928—1932年：從〈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開戰外交史〉選譯》

[1199] Morse，Hosea Ballou.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3rd rev.edn.Shanghai：Kelly&Walsh，1921

馬士：《中國制度考》

[1200] Morton，William F.Tanaka Giichi and Japan’s China policy.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0

威廉·F.莫頓：《田中義一與日本對華政策》

[1201] Mote，F.W.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Knopf，1971

牟復禮：《中國的思想基礎》

[1202] Moulder，Frances.Japan，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弗朗西絲·莫爾德：《日本、中國和現代世界經濟》

[1203] Mousnier，Roland.Fureurs paysannes；les paysans dans les révoltes duⅩⅦème siècle（Fance，Russie，Chine）.Paris：Calmann-Lévy，1967

羅蘭·穆尼耶：《農民的暴烈行動：17世紀造反中的農民（法國、俄國和中國）》

[1204] MTTC.See Mao Tse-tung chi

《毛澤東集》

[1205] MTTC，pu chüan，See Mao Tse-tung chi，pu chüan

《毛澤東集補卷》

[1206] Muhse，Albert C.‘Trade organization and trade control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2（June 1916）309—23

艾伯特·C.馬謝：《中國的貿易組織和貿易管理》，《美國經濟評論》，第6卷第2期（1916年6月）

[1207] Menro，Donald J.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唐納德·J.芒羅：《中國古代的人的概念》

[1208] Munro，Donald J.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唐納德·J.芒羅：《中國現代的人的概念》

[1209] Muramatsu Yūji.See Chūgoku no seiji to keizai

村松祐次，見《中國之政治與經濟》

[1210] Muramatsu Yūji.‘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9.3（Oct.1966）566—99

村松祐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證研究》，《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學報》，第29卷第3期（1966年10月）

[1211] Muramatsu Yūji.Kindai Kōnan no sosan近代江南の租棧（Bursaries in the Lower Yangtze area in modern times）.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0

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棧》

[1212] Murphey，Rhoads.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city and country in China’s development.New York，London，Toronto：Methuen，1980

墨菲：《毛澤東主義憧憬的消退：中國發展中的城市和鄉村》

[1213] Murphy，George G.S.Soviet Mongolia：a study of the oldest political satellit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喬治·G.S.墨菲：《蘇維埃蒙古：年代最久的衛星國研究》

[1214] Murray.Dian.‘Mid-Ch’ing piracy：an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s’.CSWT4.8（Dec.1982）1—29

迪安·默里：《清代中葉的海上搶劫：組織特點的分析》，《清史問題》，第4卷第8期（1982年12月）

[1215]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ee Chung-kuo ko-ming po-wu-kuan

中國革命博物館

[1216] Myers，Ramon H.‘Cotton textile handicraf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Economic History Review，18.3（1965）614—32

馬若孟：《棉紡織手工業與中國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經濟史評論》，第18卷第3期（1965年）

[1217] Myers，Ramon H.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馬若孟：《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年》

[1218] Myers，Ramon H.‘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modern China’，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173—191

馬若孟：《近代中國農業的商業化》，收入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1219] Myers，Ramon H.‘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JAS33.2（Feb.1974）265—77

馬若孟：《中國經濟和社會史中的變革與連續性》，《亞洲研究雜志》，第33卷第2期（1974年2月）

[1220] Myers，Ramon H.‘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eam farm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261—78

馬若孟：《傳統農業中的合作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力耕作中的含意》，收入珀金斯：《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

[1221] Myers，Ramon.‘Socioeconomic change in villages of Manchuria during the Ch’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modern Asian Studies，10.4（1976）591—620

馬若孟：《清代和民國時期滿洲農村的社會經濟變化：若干初步結論》，《現代亞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

[1222] Myers，Ramon.The Chinese economy：past and present.Belmont，Calif.：Wadsworth，1980

馬若孟：《中國經濟：過去和現在》

[1223] Myers，Ramon H.‘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modern China：irrigation management in Hsing-t’ai county，Hopei province’.in Chūgoku no seiji to keizai（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ūji Muramatsu commemoration volume），189—212

馬若孟：《近代中國的經濟組織和合作：河北邢臺縣的水利管理》，收入《中國之政治與經濟：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論文集》

[1224] Nagai，Yōnosuke and lriye，Akira，e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1225] Nakagane Katsugi.Kyū Manshū nōson shakai keizai kōzo no bunseki舊滿洲農村社會經濟構造の分析（Analysis of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villages in traditional Manchuria）.No data.

中兼勝義：《舊滿洲農村社會經濟結構之分析》

[1226] Nakajima Masao，ed.Taishi kaiko roku 対支回顧録（Memoirs concerning China）.2 vols.Tokyo：Dai Nihon Kyōka Tosho，1936

中島正郎編：《對華回顧錄》，2卷

[1227] Nakajima Masao，ed.Zoku Taishi kaikoro ku續対支回顧 録（Memoirs concerning China，supplement）.2 vols.Tokyo：Dai Nihon Kyōka Tosho，1941

中島正郎編：《續對華回顧錄》，2卷

[1228] Nakajima，Mineo.‘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Yō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iye，eds.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203—23

中img嶺雄：《歷史透視中的中蘇對立》，收入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1229] Nakajima Mineo.chū-So tairitsu to gendai：sengo Ajia no sai kōsatsu中ソ対立と現代：戦后ァジァの再考察（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and the present day：a reexamination of postwar Asia）.Tokyo：Chūō Kōronsha中央公論社，1978

中img嶺雄：《中蘇對立與現代：戰后亞洲之再考察》

[1230] Nakami Tatsuo.‘1913 nen no Ro-Chū sengen：Chūkaminkoku no seiritsu to Mongoru mondai’ 1913年の露中宣言—中華民國の成立とモンゴル問題（Russo Chinese Declaration of 1913：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Mongol problem），Kokusai seiji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66（Nov.1980）

中見立夫：《1913年的俄中宣言— —中華民國的建立與蒙古問題》，《國際政治》，第16期（1980年11月）

[1231] Nakamura Tadashi.Shingai kakumei shi kenkyū辛亥革命史研究（Studi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Tokyo：Miraisha未來社，1979

中村義：《辛亥革命史研究》

[1232] Nakamura Takafusa.‘Go-sanju jiken to zaikabō’五·三十事件と在華紡（The May 30 incident and the Japanese cotton industry in China），Kindai chūgoku kenkyū近代中國研究（Studies on modern China），6（1964）99—169

中村隆英：《五卅事件與日本在華的棉紡工業》，《近代中國研究》，第6期（1964年）

[1233] Nakamura Takafusa.‘Japan’s economic thrust into North China，1933—1938：form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220—53

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1938年：北支開發會社的成立》，收入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

[1234] ‘Nan-ch’ang ta-shih chi’（Important events at Nanchang）.Chin-tai-shih tzu-liao，4（1957）130

《南昌大事記》，《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4期

[1235] Nan-hsun chih（Gazetteer of Nan-hsun）.Chou Ch’ing-yun，comp.1922

《南潯志》，周慶云編

[1236] Nan-k’ai ta-hsueh ching-chi yen-chiu so（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ed.1913—1952nien Nan-k’ai chih-shu tzu-liao hui-pien（Nankai price indexes 1913—1952）Peking：T’ung-chi ch’u-pan-she統計出版社，1958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1913—1952年南開指數資料匯編》

[1237] Nance，W.B.Soocho wU niversit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6

文乃史：《東吳大學》

[1238]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Tientsin，1928—（vol.5—9，1932—7；suspended 1937—9；resumed 1940）

《南開社會經濟季刊》，天津，1928—（第5—9卷，1932—1937年；1937—1939年停刊；1940年復刊）

[1239] Naquin，Susa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韓書瑞：《中國的太平盛世叛亂：1813年的八卦教起義》

[1240] Naquin，Susan.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韓書瑞：《山東叛亂：1774年的王倫起義》

[1241] Naquin，Susan.‘Connections between rebellions：sect family networks in Qing China’.Modern China，8.3（July 1982）337—60

韓書瑞：《叛亂之間的關系：清代的教派家族網》，《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

[1242] Nathan，Andrew J.‘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CQ.53（Jan.—March 1973）34—66

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義模式》，《中國季刊》，第53期（1973年1—3月）

[1243] Negishi Benji.Minami Shina nōgyō keizai ron南支那農業經濟論（Essays on South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y）.Taipei：Noda shobō野田書房，1940

根岸勉治：《華南農業經濟論》

[1244] Negishi Tadashi.Shanhai no girudo上海の ギ ル ド（The guilds of Shanghai）.Tokyo：Nihon Hyōronsha日本評論社，1951

根岸佶：《上海之行會》

[1245] Nei-cheng nien-chien pien-tsuan wei-yuan-hui.comp.Nei-Cheng nien-chien（Ministry of Interior year book）.Shanghai：CP，1936

內政年鑒編纂委員會編：《內政年鑒》

[1246] Neu，Charles E.An uncertain friend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1906—1909.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查爾斯·E.諾伊：《不可靠的友誼：西奧多·羅斯福與日本，1906—1909年》

[1247] Nihon kokusai seiji gakkai，ed.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太平洋戦爭ヘの道（The road to the Pacific war）.8 vols.Tokyo：Asahi shimbunsha朝日新聞社，1962—3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8卷

[1248] Niida Noboru.Chūgoku no nōson kazoku中國の農村家族（The Chinese rural family）.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 54

仁井田陞：《中國之農村家族》

[1249] Nish，Ian H.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the diplomacy of two island empires，1894—1907.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66

伊恩·H.尼什：《英日同盟：兩個島嶼帝國的外交，1894—1907年》

[1250] Nish，Ian H.Alliance in decline：a study in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908—1923.London：Athlone Press，1972

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關系研究》

[1251] Nish，Ian，ed.Anglo-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papers of the Anglojapanes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伊恩·H.尼什編：《英日疏遠，1919—1952年：英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會議論文集》

[1252] Nish，Ian，ed.Some aspects of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30s

伊恩·H.尼什編：《20世紀30年代蘇日關系的一些方面》

[1253] North China Herald.Weekly.Shanghai，1850—

《北華捷報》，周刊，上海，1850年—

[1254] North，Robert C.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2nd edn，1963

羅伯特·C.諾思：《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員》

[1255] North，Robert C.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Stanford：Sta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羅伯特·C.諾思：《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精英》

[1256] North，Robert C.See Eudin，Xenia

羅伯特·C.諾思，見色尼亞·茹科夫·尤丁

[1257] NTCC.See Feng Ho-fa，ed.Chung-kuo nung-ts’un ching-chi tzu-liao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1258] NYTL.See Chang Yu-i，comp.Chung-kuo chin-tai nung-yeh shih tzu-liao，t -san chi，1927—1937

《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1927—1937》

[1259] OYü-Wan su-ch’ü ko-ming-shih tzu-liao hsuan-pien（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O-Yü-Wan soviet）.Vol.1，compiled by the party historians of the Central China Teachers’ College

《鄂豫皖蘇區革命史資料選編》，第1卷，華中師范學院黨史教研室編

[1260] Ocko，Jonathan K.Bureaucratic reform in provincial China：Ting，Jihch’ang in Restoration Kiangsu，1867—1870.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3

喬納森·K.奧科：《中國地方官僚政治的改革：丁日昌在同治中興時期的江蘇，1867—1870年》

[1261] Offner，Arnold A.American appeasement：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Germany，1933—1938.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1969

阿諾德·A.奧夫納：《美國的姑息政策：美國的對外政策與德國，1933—1938年》

[1262] Ogata，Sadako N.Defiance in Manchuria：the making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1931—193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4.

緒方貞子：《在滿洲的挑戰：日本對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年》

[1263] Okamoto，Shumpei.The Japanese oligarchy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See also Borg，Dorothy

岡本俊平：《日本的寡頭政治集團與日俄戰爭》

[1264] Okuzaki Hiroshi.Chūgoku kyōshin jinushi no kenkyū中國鄉紳地主の研究（Studies of gentry-landlords in China）.Tokyo：kyūko Shoin汲古書院，1978

奧崎裕司：《中國鄉紳地主之研究》

[1265] Oliver，Frank.Special undeclared war.London：Jonathan Cape，1939

歐里渥：《特殊的不宣而戰的戰爭》

[1266] Onogawa Hidemi and Shimada Kenji.Shingai kakumei no kenkyū辛亥革命の研究（Studi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Tokyo：Chikuma Shobō筑摩書房，1978

小野川秀美和島田虔次：《辛亥革命之研究》

[1267] Orb，Richard A.‘Chihli academies and other schools in the late Ch’ing：an institutional survery ’，in Paul A.Cohen and John E.Schrecker，eds.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31—40

理查德·A.奧布：《晚清的直隸書院及其他學堂：制度調查》，收入柯文和石約翰編：《19世紀中國之改革》

[1268] Osaka Tokushi.Chūgoku shin bungaku undō shi，中國新文學運-動史（History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of China）.2 vols.Tokyo：Hosei daigaku法政大學，1965

尾坂德司：《中國新文學運動史》，2卷

[1269] Ostrower，Gary B.Collective insecurity：the Uniled States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during the early thirties.Lewisburg，Pa.：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

加里·B.奧斯特羅爾：《集體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國與國際聯盟》

[1270] Otte，Friederich.‘Correlation of harvests with importation of cereals in Chin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15.4（Oct.1934）338—414

弗里德里希·奧特：《中國谷物產量與進口的相互關系》，《中國經濟雜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

[1271] Ou Tsuin-chen.‘Education in wartime China’，in Paul K.T.Sib.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89—123

歐俊臣（音）：《戰時中國的教育》，收入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

黨中國，1937—1945年》

[1272] Ou Tsuin-chen.See Clopton，Robert W.

歐俊臣（音），見羅伯特·W.克洛普頓

[1273] Ou Yuan-huai.‘K’ang-chan shih-nien lai ti Chung-kuo ta-hsueh chiao-yü’（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decade since the[beginning of the]war）.Chung-hua chiao-yü chieh（Chinese education），NS.1.1（15 Jan.1947）7—15

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中華教育界》，新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

[1274] Overmyer，Daniel L.Folk Buddhist religion：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歐大年：《民間佛教：傳統中國晚期的反政府教派》

[1275] Overmyer，Daniel L.‘Alternatives：popular religious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Modern China，7.2（April 1981）153—90

歐大年：《抉擇：中國社會中的民間教派》，《現代中國》，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

[1276] Paauw，Douglas S.‘The Kuomintang and economic stagnation，1928—1937’.JAS 16.2（Feb.1957）213—220

道格拉斯·S.帕烏夫：《國民黨與經濟停滯，1928—1937年》，《亞洲研究雜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

[1277] Pa Chin.Cold nights：a novel.trans.by Nathan K.Mao and Liu Ts’unyan.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8.Trans.of Han-yeh

巴金：《寒夜》，內森·K.毛和劉村彥（音）譯

[1278] P’an Kung-chan，de.Wu-shih-nien lai ti Chung-kuo（China in the past 50 years）.Chungking：Sheng-li，1945；Taipei reprint，1976

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

[1279] P’an Tsu-yung.‘Hou-fang pan-ch’ang ti k’un-nan ho ch’i-wang’（Difficulties and hopes of factory management in the rear area）.Hsin-ching-chi，6.11（1 Mar.1942）

潘祖永：《后方辦廠的困難和期望》，《新經濟》，第6卷第1期（1942年3 月1日）

[1280] P’ang Sung.See Huang Yen-p’ei

龐淞，見黃炎培

[1281] Papers on China.Annual.vols.1—24（1947—71）.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中國論文集》，年刊，第1—24卷（1947—1971年）

[1282] Paulson，David.‘Leadership and spontaneity：recent approaches to communist base area studies’.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7.1（Oct.1981）13—18

戴維·保爾森：《領導和自發：最近的研究共產黨根據地的方法》，《中華民國史研究通訊》，第7卷第1期（1981年10日）

[1283] Paulson，David.‘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the Shandong base area，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2

戴維·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山東根據地，1937—1945年》，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

[1284] ‘Peasant rebellions in China，symposium’.ModernC hina，9.3（July 1983），entire volume；articles by Joseph W.Esherick，Jack L.Dull，William G.Growell，and Elizabeth J.Perry

《中國的農民起義專題論集》，《現代中國》，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收周錫瑞、杰克·L.達爾、威廉·G.克羅韋爾、裴宜理等人的文章

[1285] ‘Peasant strategies in Asian societies：moral and rational economic approaches—a symposium’.JAS42.4（Aug.1983）753—868

《亞洲社會中的農民戰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經濟途徑— —專題論集》，《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

[1286] Peattie，Mark R.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馬克·R.皮蒂：《石原莞爾與日本同西方的對抗》

[1287] Peck，Graham.Two kinds of time：a personal story of China’s crash into revolu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0；first half reprinted 1968

格雷厄姆·佩克：《兩種局勢：關于中國投入革命的親身經歷》

[1288] Pei-ching ta-hsueh che-hsueh hsi.Mao Tse-tung che-hsueh ssuhsiang（chailu）（Mao Tse-tu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abstract）.[Peking]：1960

北京大學哲學系：《毛澤東哲學思想（摘錄）》

[1289] Peic-hing ta-hsueh yueh-k’an（Peking University monthly）.Peking，1919—

《北京大學月刊》，北京，1919年—

[1290] Pei-fang ti-ch’ü kung-jen yun-tung tzu-liao hsuan-pien，1921—1923（Selected materials on the local workers’ movement in North China 1921—1923）.Chung-kuo ko-ming po-wu-kuan（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mp.Peking：Pei-ching ch’u-pan-she北京出版社，1981

《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921—1923》，中國革命博物館編

[1291] Pei-p’ing she-hui tiaoc-h’a so.See T -erh-tz’u“Chung-kuo…”

北平社會調查所，見《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鑒》

[1292] Peking Review.Peking.Weekly.March 4，1958—

《北京周報》，北京，周刊，1958年3月4日—

[1293] Pelz，Stephen E.Race to Pearl Harbor：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London Naval Confernce and the onset of World War.Ⅱ.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斯蒂芬·E.佩爾茲：《奔向珍珠港事變：倫敦海軍裁軍會議的失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1294] P’eng Chen.Chung-kung ‘ Chin-Ch’a-Chi pien-ch’ü ’ chzh ko-chung chengts’e（Various policies in the CCP’s‘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n.p.：T’ung-i ch’u-pan-she統一出版社，28 Jan.1938.Manuscript in 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

[1295] P’eng P’ai.‘Hai-feng nung-min yun-tung’（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aifeng），in Ti-i-tz’u kuo-nei ko-ming chan-cheng shih-ch’i ti nung-min yun-tung（The peasant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40—138.Peking：Jen-min，1953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收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

[1296] P’eng Shu-chih.‘fang li-shih ti wen-chien tso-cheng’（Let historical documents be my witness）.Ming-pao yueh-k’an，30（June 1968）13—22

彭述之：《讓歷史的文件作證》，《明報月刊》，第30期（1968年6月）

[1297] P’eng Te-huai.P’eng Te-huai tzu-shu（The autobiography of P’eng Tehuai）.Shantung：Jen-min，1981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

[1298] P’eng Te-huai.‘Kuan-yü hua-pei kenc-hü-ti kung-tso ti pao-kao’（Report on work in the base areas of North China），in Kung-fei huok-uo shih-liao hui-pien（Col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national disaster caused by the Communist bandits），3.346—406

彭德懷：《關于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收入《共匪禍國史料匯編》，第3 卷

[1299] P’eng Tse-i ed.Chung-kuo chin-tai shou-kung-yeh shih tzu-liao.1840—1949（Sour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1840—1949）.4 vols.Peking：San-lien，1957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4卷

[1300] People’s University.See Chung-kuo jen-min ta-hsueh

中國人民大學

[1301] Pepper，Suzanne.Civil war in China：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斗爭》

[1302] Perdue，Peter.‘ Offical goals and local interests：water control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JAS 41.4（Aug.1982）747—66

彼得·珀杜：《官方目標與地方利益：明清時期洞庭湖區域的治水》，《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1303] Pekings，Dwight，H.，with the assistance of Yeh-chien Wang，Kuo-ying Wang Hsiao [and] Young-ming Su.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1969

珀金斯（王業鍵、蕭王國英（音）、蘇永明（音）協助）：《1368—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

[1304] Perkins，Dwight H.，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

[1305] Perry，Elizabeth J.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年》

[1306] Perry，Elizabeth J.and Harrell，Stevan，eds.‘Symposium：syncretic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Part I’.Modern China，8.3（July 1982），entire；articles by Stevan Harrell，Elizabeth J.Perry，Richard Shek，Susan Naquin and David E.Kelley；Part Ⅱ，8.4（Oct.1982）435—83：articles by David K.Jordan and Robert P.Weller

裴宜理和斯特萬·哈勒爾編：《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專題論集》，第1部分，《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收斯特萬·哈勒爾、裴宜理、理查德·石、韓書瑞和戴維·E.凱利的文章；第2部分，《現代中國》，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收戴維·K.喬丹和羅伯特·P.韋勒的文章

[1307] Perry，Elizabeth.‘Social banditry revisited：the case of Bai Lang，a Chinese brigand’.Modern China.9.3（July 1983）355—82

裴宜理：《社會盜匪活動再探：中國土匪白朗個案》，《現代中國》，第9卷第3期（1983年7月）

[1308] Pickowicz，Paul G.‘Ch’ü Ch’u-pai and the Chinese Marxist conception of revolutionary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CQ 70（June 1977）296—314

保羅·G.皮茨科維奇：《瞿秋白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大眾文學藝術觀》，《中國季刊》，第70期（1977年6月）

[1309] Pickowcz，Paul G.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the influence of Ch’ü Ch’iu-pai.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保羅·G.皮茨科維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瞿秋白的影響》

[1310] PLA.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人民解放軍

[1311] PLA unit history，Taiwan.Translated and prepared at the field level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US）Department of the Army

《人民解放軍部隊史》，美國陸軍部軍史局主持在臺灣編譯

[1312] Po I-po.‘Liu Shao-ch’i t’ung-chih ti i-ko li-shih kung-chi’（An historic achievement of Comrade Liu Shao-ch’i）.JMJP 5 May 1980

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歷史功績》，《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

[1313] Polachek，James.‘Gentry hegemony：Soochow in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211—56

詹姆斯·波拉切克：《士紳霸權：同治中興時期的蘇州》，收入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和控制》

[1314] Polachek，James M.‘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1928—1934）’.JAS 42.4（Aug.1983）805—29

詹姆斯·M.波拉切克：《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1934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

[1315] Polachek，James.The inner opium war.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Forthcoming

詹姆斯·波拉切克：《內部鴉片戰爭》

[1316] Pollard，David E.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the literaryv alues of Chou Tsojen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戴維·E.波拉德：《一種中國文學風格：與傳統有關的周作人的文學價值觀》

[1317] Pollard，David E.‘Lu Xun’s Zawen’，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Lu Xun and His Legacy，Asilomar，California，22—28 Aug.1981

戴維·E.波拉德：《魯迅的雜文》，為1981年8月22—28日在加利福尼亞州阿西洛馬爾舉行的魯迅及其遺產會議準備的論文

[1318] Popkin，Samuel I.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塞繆爾·I.波普金：《有理性的農民：越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

[1319] Potter，Jack.‘Land and lineage in traditional China’，in Maurice Freedman，ed.Family and kinshp in Chinese society，121—38

杰克·波特：《傳統中國的土地和宗族》，收入莫里斯·弗里曼編：《中國社會的家庭與親屬關系》

[1320] Powell，Lyle Stephenson.A surgeon in wartime China.Lawrence，Kansas：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46

萊爾·斯蒂芬森·鮑威爾：《戰時中國的一個軍醫》

[1321] Prazniak，Roxanne.‘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rural China：tax resistance and county-villag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Ph.D，dissertation，1981

羅克珊·普拉茲尼阿克：《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議：辛亥革命前夕的抗

稅與縣鄉政治》，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論文，1981年

[1322] Prévert，Jacques.Paroles.Paris：Editions Gallimard，1949

雅克·普雷韋爾：《談話集》

[1323] Price，Don.C.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6—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賈士杰：《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

[1324] Price Frank W.Preface to Wartime China as seen by Westerners.Chungking：The China Publishing Co.Preface dated 1942

畢范宇：《西方人士所見的戰時中國》序

[1325] Price，Jane L.Cadres，commanders，and commissars：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1920—1945.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6

簡·L.普賴斯：《干部、指揮員和政治委員：中國共產黨領導干部的訓練，1920—1945年》

[1326] PTMT.See Schram，Stuart，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毛澤東的政治思想》

[1327] Pu-erh-sai-wei-k’e（The bolshevik）.Official organ of the CCP center.Shanghai，Oct.1927—

《布爾塞維克》，中國共產黨機關刊，上海，1927年10月

[1328] Pugach，Noel H.Paul S.Reinsch，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Millwood，NY：KTO Press，1979

諾埃爾·H.普加奇：《芮恩施：推動門戶開放的外交官》

[1329] Pusey，James Reeve.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3

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國與達爾文》

[1330] Pye，Lucian W.The dynamics of factions and consensus in Chinese politics：a model and some propositions.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nied States Air Force.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July 1980

盧西恩·W.派伊：《中國政治中的黨系糾紛和共同一致的動力：一種模式和若干主張》，為美國空軍撰寫的報告

[1331] Qian Zhongshu.See Ch’ien Chung-shu

錢鍾書

[1332] Rabe，Valentin H.The home base of American China missions，1880—1920.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8

瓦倫丁·H.拉伯：《美國在華差會的國內基地，1880—1920年》

[1333] ‘Ranisha no soshiki to hanman kōnichi katsudō no jitsurei’藍衣社の 組 織と反滿抗日活動の實例（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lue Shirts and examples of anti-Manchukuo，anti-Japanese activities），in Ranisha ni kansuru shirō藍衣社め關す為資料（Materials on the Blue Shirts）.n.p.：[1935？]

《藍衣社之組織及反滿抗日活動之實例》，收入《藍衣社資料》

[1334] Rankin，Mary.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瑪麗·蘭金：《早期的中國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1902—1911年》

[1335] Rankin，Mary Baekus.‘Rural-urban continuities：leading families of two Chekiang market towns’.CSWT 3.7（Nov.1977）67—104

瑪麗·巴克斯·蘭金：《城鄉連續性：浙江兩個集鎮的望族》，《清史問題》，第3卷第7期（1977年11月）

[1336] Rankin，Mary Backu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ower：qingyi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JAS 51.3（May 1982）453—84

瑪麗·巴克斯·蘭金：《“輿論”和政治力：19世紀末葉中國的清議》，《亞洲研究雜志》，第51卷第3期（1982年5月）

[1337] Rankin，Mary.‘Elite.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Forthcoming

瑪麗·蘭金：《中國名流的積極精神和政治變革：浙江省，1865—1911年》

[1338] Rawski，Evelyn Sakakida.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9

伊夫林·薩卡基達·羅斯基：《清代的教育和民眾識字》

[1339] Rawski，Thomas.China’s republican economy：an introduc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re on Modern East Asia，1978

托馬斯·羅斯基：《中華民國經濟概論》

[1340] 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eds.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1946—1949，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7

肯尼思·W.雷亞和約翰·C.布魯爾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報告，1946—1949年》

[1341] Reardon-Anderson，James B.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1944—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詹姆斯·B.里爾登-安德森：《延安與列強：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的淵源，1944—1946年》

[1342] Red China.See Hung-se Chung-hua

《紅色中華》

[1343] Red Flag.See Hung-ch’i

《紅旗》

[1344] Red Star.See Hung-hsing

《紅星》

[1345] Reed，James.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1911—1915.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3

詹姆斯·里德：《傳道精神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年》

[1346] Reinsch，Paul S.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Garden City，NY and Toronto：Doubleday，Page，1922

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

[1347] Reinsch，Paul S.See Pugach，Noel H.

芮恩施，見諾埃爾·普加奇

[1348] Reischauer，Edwin O.and Fairbank，John K.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0

賴紹華和費正清：《東亞：偉大的傳統》

[1349] Republican China.vol.1.1 to 9.1（1975—83）was Chinese Republican Studies Newsletter.New title began with vol.9，part 2，Feb，1984

《中華民國史》，第1卷第1期—第9卷第1期刊名為《中華民國史研究

通訊》，1984年2月出版的第9卷第2期起用新刊名

[1350] Reynolds，Bruce.‘Weft：the technological sanctuary of Chinese handspunyarn’.CSWT 3.2（Dec.1974）1—19

布魯斯·雷諾茲：《緯紗：中國手紡紗的技術禁區》，《清史問題》，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

[1351] Reynolds，David.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1937—41：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London：Europa Publications，1981

戴維·雷諾茲：《英美同盟的建立，1937—1941年：競爭性合作的研究》

[1352] Reynolds，Douglas Robertson.‘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f wartime China，1938—1945’.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5

道格拉斯·羅伯遜·雷諾茲：《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和戰時中國政治上的兩極分化，1938—1945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75年

[1353] Reynolds，Virginia.‘Social movements：an analysis of leadership in China 1895—1927’.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83

弗吉尼亞·雷諾茲：《社會運動：中國領導階層分析，1895—1927年》，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博士論文，1983年

[1354] Rhoads，Edward J.M.et al.，eds.The Chinese Red Army，1927—1963：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4

路康樂等編：《中國紅軍，1927—1963年：有注釋的書目》

[1355] Rhoads，Edward J.M.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路康樂：《中國的共和革命：廣東個案，1895—1913年》

[1356] Richardson，H.E.A short history of Tibet.New York：Dutton，1962

H.E.理查森：《西藏簡史》

[1357] Riskin，Carl.‘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m China’，in Dwight H.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49—84

卡爾·里斯金：《現代中國的剩余和停滯》，收入珀金斯編：《從歷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

[1358] Riskin，Carl.‘Discussion and comments’，in Victor Lippit et al.，‘Symposium on China’s economic history’.

卡爾·里斯金：《討論與評論》，收入維克托·D.利皮特等：《中國經濟史專題論集》

[1359] Roll，Charles Robert，Jr.The distribution of rural incomes in China：a comparison of the 1930s and 1950s.New York：Garland，1980

小查爾斯·羅伯特·羅爾：《中國農村收入的分配：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較》

[1360] Romanus，Charles F.and Sunderland，Riley.vol.1.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t.of the Army，1953；vol.2.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same pub.，1956；vol.3.Time runs out in CBI，same pub.，1959

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第1卷，《史迪威赴華使命》；第2卷，《史迪威指揮問題》；第3卷，《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

[1361] Rōnin浪人（English-language periodical：title in characters and romanization）.Tokyo，founded c.1970

《浪人（》英文期刊），東京，1970年前后創刊

[1362] Rosenbaum，Arthur L.‘Gentry power and the Changsha rice riot of 1910’.JAS 34.3（May 1975）689—715

阿瑟·L.羅森鮑姆：《士紳勢力與1910年的長沙米風潮》，《亞洲研究雜志》，第34卷第3期（1975年5月）

[1363] Rosinger，Lawrence K.China’s crisis.New York：Alfred A.Knopf，1945

勞倫斯·K.羅辛格：《中國的危機》

[1364] Rossabi，Morris.China and Inner Asia：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New York：Pica Press，1975

莫里斯·羅薩比：《1368年迄今的中國與亞洲腹地》

[1365] Rossabi，Morris，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莫里斯·羅薩比編：《中國在對手之中：中央王國及其鄰國，10—14世紀》

[1366] Rowe，William T.‘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a late Ch’ing city：the Hankow plot of 1883’.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4（1949）71—111

威廉·T.羅：《晚清— —城市的叛亂及其敵人：1883年漢口密謀》，《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4集（1979年）

[1367] Rowe，William T.‘Review article：recent wri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n early Ch’ing economic history’.CSWT 4.7（June 1982）73—90

威廉·T.羅：《述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關于清初經濟史的著作》，《清史問題》，第4卷第7期（1982年6月）

[1368] Rowe，William T.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威廉·T.羅：《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年》

[1369] Rozman，Gilbert.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清代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

[1370] Rozman，Gilbert，ed.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82

吉爾伯特·羅茲曼編：《中國的現代化》

[1371] Rozman，Gilbert.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a：assessmentsof recent scholarship.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

吉爾伯特·羅茲曼：《蘇聯對前近代中國的研究：最近研究成果評估》

[1372] Rue，John E，with the assistance of S.R.Rue.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Stanford：Published for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約翰·E.魯（S.R.魯協助）：《居于反對派地位的毛澤東，1927—1935年》

[1373] Ruhlmann，Robert.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resistance contre le Japan（de 1937à 1945）.Paris：Editions de 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1982

羅伯特·魯爾曼：《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1937—1945年）》

[1374] Sa K’ung-liao.Liang-nien ti cheng-chih-fan sheng-huo（Two years in the life of a political prisoner）.Hong Kong：Ch’unf-eng春風，1947

薩空了：《兩年的政治犯生活》

[1375] Sanetō Keishū.Chūgokujin Nihon ryūgaku shi中國人日本留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Tokyo：Kuroshio shuppan く ろ し お出版，1960；revised edition，Chūka gakkai，1970

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1376] Satō Kenryō.Daitōa sensō kaikoroku大東亞 戦爭回顧録（Memoirs of the Pacific War）.Tokyo：Tokuma Shoten德間書店，1966

佐藤賢了：《大東亞戰爭回顧錄》

[1377] Scalapino，Robert A.‘The evolution of a young revoltionary—Mao Zedong in 1919—1921’，JAS 42.1（Nov.1982）29—61

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一個青年革命者的發展：毛澤東在1919—1921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

[1378] Scalapino，Robert A.and Yu，George.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vol.Ⅰ：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1850—192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羅伯特·A.斯卡拉皮諾和喬治·于：《近代中國及其革命過程》，第1卷：《對傳統秩序的反復挑戰，1850—1920年》

[1379] SCCC.See Ssu-ch’uan ching-chi chi-k’an

《四川經濟季刊》

[1380] Schaller，Michael.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年》

[1381] Schiffrin，Harold Z.Sun Yat-sen：reluctant revolutionary.Toronto：Little，Brown，1980

史扶鄰：《孫逸仙：頑強的革命家》

[1382] Schneider，Laurence A.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live trad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勞倫斯·A.施奈德：《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和對可供選擇的傳統之探求》

[1383] Schoppa，R.Keith.‘The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local elite in Szechuan.1851—1874’.CSWT2.10（Nov.1973）7—23

肖邦齊：《四川地方名流的構成和作用，1851—1874年》，《清史問題》，第2卷第10期（1973年11月）

[1384] Schoppa.R.Keith.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肖邦齊：《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20世紀初期的浙江省》

[1385] Schram，Stuart R.‘On the nature of Mao Tse-tung’s“deviation” in 1927’.CQ27（April—June 1964）55—66

宣道華：《論1927年毛澤東“異端”的性質》，《中國季刊》，第27期（1964 年4—6月）

[1386] Schram，Stuart.Mao Tse-tung.Harmondaworth，Eng.，Baltimore，Md.：Penguin Books，1967，1974

宣道華：《毛澤東》

[1387] Schram，Stuart R.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Rev.edn，New York：Praeger，1969

宣道華：《毛澤東的政治思想》

[1388] Schram，Stuart R.‘The party in Chinese Communist ideology’，in J.W.Lewis，ed.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170—202

宣道華：《中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政黨》，收入約翰·威爾遜·劉易斯：《中國的黨的領導和革命力量》

[1389] Schram，Stuart R.‘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t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1958—1969’.CQ46（April—June 1971）221—44

宣道華：《毛澤東與不斷革命的理論，1958—1969年》，《中國季刊》，第46期（1971年4—6月）

[1390] Schram，Stuart.‘ From the“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 to the “Great Alliance”’.CQ 49（Jan.M—arch 1972）76—105

宣道華：《從“民眾的大聯合”到“大聯盟”》，《中國季刊》，第49期（1972 年1—3月）

[1391] Schram，Stuart R.，ed.Authority，participation，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essays by a European study group.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宣道華編：《中國的權威、參與和文化變革：一個歐洲研究團體的論文集》

[1392] Schram.Stuart R.，ed.Mao Yse-tung unrehearsed：talks and letters，1956—71，trans.John Chinnery and Tieyun.Harmondsworth：Penguin，1974；American edn，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4

宣道華編：《毛澤東的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約翰·欽尼和鐵云（音）譯，美國版書名為《毛主席向人民講話：講話和信件，1956—1971年》

[1393] Schram，Stuart.R.‘Mao Zedo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7’，in Chūgoku no seiji to keizai（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ūji Muramatsu commemoration volume），227—39

宣道華：《毛澤東與各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收入《中國之政治與經濟：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論文集》

[1394] Schram，Stuart R.Mao Zedong：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

宣道華：《毛澤東：初步再評價》

[1395] Schran，Peter.Guerrilla economy：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1937—1945.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1976

彼得·施蘭：《游擊經濟：陜甘寧邊區的發展，1937—1945年》

[1396] Schreeker，John E.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Ger many in Shantu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石約翰：《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德國在山東》

[1397] Schreeker，John E.See Cohen，Paul A.

石約翰，見柯文

[1398] Schulzinger，Robert D.The making of the diplomatic mind：the training，outlook，and style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1908—1931.Middletown，con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5

羅伯特·D.舒爾青格爾：《外交頭腦的形成：美國外事官員的訓練、觀點和作風，1908—1931年》

[1399] Schurmann，Franz.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2nd ed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弗朗茲·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

[1400] Schwartz，Benjamin I.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

[1401] Schwartz，Benjamin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 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史華慈：《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

[1402] Schwartz，Benjamin I.‘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May Fourth and after’.CHOC12.406—51

史華慈：《五四及五四之后的思想史主題》，《劍橋中國史》，第12卷

[1403] Scott，James C.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詹姆斯·C.斯科特：《農民的道德經濟：東南亞的造反和生存》

[1404] Scott，Roderiek.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a historical sketch.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4

羅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協和大學：簡史》

[1405]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Chung-kuo ti-erh li-shih tang-an kuan），Nanking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1406] Selden，Mark.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

[1407]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vol.1（1975—6）；vol.2（1977—8）；vol.3（1978—9）；vol.4（1979—80）

《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芝加哥大學

[1408] Sengo Nihon no kokusai seijigaku 戦後日本の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ostwar Japan），ed.by Jap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Tokyo：Nihon kokusai seiji gakkai日本國際政治學會，1979

《戰后日本之國際政治學》，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

[1409] Service，John S.The Amerasia papers：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謝偉思：《亞美論集：中美關系史中的若干問題》

[1410] Service，John S.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ed.by Joseph W.Esherick.New York：Random House，1974

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周錫瑞編

[1411] Shaffer，Lynda.‘Mao Ze-dong and the October 1922 Changsha construction worders’strike’.Modern China，4（Oct.1978）379—418

林達·謝弗：《毛澤東與1922年10月長沙建筑工人的罷工》，《現代中國》，第4期（1978年4月）

[1412] Shaffer，Lynda.Mao and 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Armonk，NY：M.E.Sharpe，1982

林達·謝弗：《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人運動，1920—1923年》

[1413] Shan-hsi ts’un-cheng hui-pien（Collected materials on Shansi village government）.4 vols.comp.by Shan-hsi ts’un-cheng ch’u，n.p.，1928.Taipei reprint：Wen-hai，1973

《山西村政匯編》，4卷，山西村政處編

[1414] Shan-tung sheng cheng-fu chi Shan-tung chün-ch’ü kung-pu chih kochung t’iao-li kang-yao pan-fa hui-pien（A compilation of various regulations，programmes，and methods issued by the Shantu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Shantung military region）.n.p.：Chiao-tung ch’ü hsing-cheng kung-shu膠東區行政公署，1945

《山東省政府及山東軍區公布之各種條例綱要辦法匯編》

[1415] Shand，R.T.‘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specialization in a primitive economy’.The Economic Record，41（June 1965）193—206

R.T.香德：《原始經濟中的買賣和專門化的發展》，《經濟紀錄》，第41期（1965年6月）

[1416] Shang-hai ch’ien-chuang shih-liao（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the ch ’ienchuang banks of Shanghai），comp.by Chung-kuo jen-min yin-hang Shang-hai-shih fen-hang（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Chinese People’s Bank）Shanghai：Jen—min，1960

《上海錢莊史料》，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

[1417] Shanghai MuseumS.ee Shang-hai po-wu kuan

上海博物館

[1418] Shang-hai po-wu kuan t’u-shu tzu-liao shih.Shang-hai pei-k’e tzu-liao hsuan-chi（A collection of Shanghai inscriptions）.Shanghai：Jen—min，1980

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上海碑刻資料選輯》

[1419] Shang-jao chi-chung-ying（The Shang-jao concentration camp）.Rev.edn.Shanghai：Hua-tung jen—min，1952

《上饒集中營》

[1420] Shang-yü hsien-chih chiao hsu（Revised gazetteer of Shang-yü district），comp.by Hsu Chih-ching，1898

《上虞縣志校續》，徐志靖編

[1421] Shaw Yu-ming.‘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US-Chinese Communist rapprochement in 1949：was there another“ lost chance in China”？’ CQ 89（March 1982）74—96

邵玉銘：《司徒雷登與1949年美國—中共和解：有另一次“在中國的失機”嗎？》，《中國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

[1422] She-hui chien-she（Social reconstruction）.Nanking，1948—

《社會建設》，南京，1948年—

[1423] She-hui hsin-wen（The social mercury）.Shanghai，Oct.1932—July 1937

《社會新聞》，上海，1932年10月—1937年7月

[1424] She-hui k’o-hsueh tsa-chih（Quarterly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社會科學雜志》，季刊，北京，1930年—

[1425] Shek，Richard.‘Millenarianism without rebellion：the Huangtian Dao in North China’.Modern China，8.3（July 1982）305—37

理查德·石：《沒有造反的太平盛世說：華北的黃天道》，《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

[1426] Shen-pao（‘Shun Pao’）.Daily，Shanghai，1872—1949

《申報》，日報，上海，1872—1949年

[1427] Shen，T.H.Agricultural resources of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 Press，1951

沈宗瀚：《中國農業資源》

[1428] Shen Tsung-han.Shen Tsung-han tzu-shu Shen Tsung-han’s memoirs 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 7 5

沈宗瀚：《沈宗瀚自述》

[1429] Sheng Hsuan-huai tang-an tzu-liao hsuan-chi（Select papers from the Sheng Hsuan-huai archives），ed.by Ch’en Hsu-1u，Ku Ting-lung and Wang Hsi.4 vols.to date.Shanghai：Jen-min，1979—

《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陳旭麓、顧廷龍和汪熙編

[1430] Sheng-Kang ta pa-kung tzu-liao（Materials on the great Canton-Hong Kong strike）.Kuang-tung che-hsueh she-hui k’o-hsueh yen-chiu so li-shih yenchiu shih.Kuang-tung jen—min，1980

《省港大罷工資料》，廣東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

[1431] Sheng Li-yü.Chung-kuo jen-min chieh-fang-chün san-shih-nien shih-hua（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30 yea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Tientsin：Jen-min，1959

盛里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史話》

[1432] Sheng，Yueh.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ersonal account.Lawrence，Kan.：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Kansas，1971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個人經歷》

[1433] Sheridan，James.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詹姆斯·謝里登：《分裂的中國：中國史的民國時代，1912—1949年》

[1434] Shiba Yoshinobu.‘Ningpo and its hinterland’，in 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391—440

斯波義信：《寧波與其腹地》，收入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1435] Shigaku zasshi史學雜誌（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Dec.1888—U.ntil 1893 published as Shigakkai zasshi史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史學雜志》，1888—，1893年以前用《史學會雜志》刊名出版

[1436] Shigaku zasshi.Bibliographic essay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May issues 1978—81.See Fogel，Joshua A.

《史學雜志》1978—1981年每年五月號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書目提要，見喬舒亞·A.福格爾

[1437] Shigemitsu，Mamoru.Japan and her destiny，trans.by O.White.London：Hutchinson，1958

重光葵：《日本及其命運》，O.懷特譯

[1438] Shigeta Atsushi.Shindai shakai keizaishi kenkyū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Studies of the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g period）.Tokyo：Iwanami shoten巖波書店，1975

重田德：《清代社會經濟史研究》

[1439] Shih Ching-han.‘Huang-fan-ch’ü ti tsai-ch’ing ho hsin-sheng’（The disaster and rebirth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 area）.Kuan-ch’a，3.3（13 Sept.1947），pp.22—3

史鏡涵：《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觀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

[1440] Shih Chün.Chung-kuo chin-tai ssu-hsiang-shih tzu-liao-wu-ssu shih-ch ’i chu-yao lun-wen-hsuan（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selected important essay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Tokyo：Daian大安，1968

石峻：《中國近代思想史資料— —五四時期主要論文選》

[1441] Shih Hsi-min.‘K’ang-chan i-lai ti Chung-kuo kung-yeh’（Chinese industry during the war）.Li-lun yü hsien-shih，1.4（15 Feb.1940）48—55

石西民：《抗戰以來的中國工業》，《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

[1442] Shih-hsueh ch’ing-pao（History newsletter），comp.by Chung-kuo shihhsueh-hui Chung-kuo li-shih-hsueh nien-chien pien-chi-pu Peking：Jenmin，1982—

《史學情報》，中國史學會中國歷史學年鑒編輯部編，北京，1982年—

[1443] Shih-hua（Honest words）.Official organ of the centr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Soviet，30 Oct.1930—7 Feb.1931

《實話》，中央蘇區中央局機關報，1930年10月30日—1931年2月7日

[1444] Shih Kuo-heng.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a 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ed.and trans.by Hsiao-tung Fei and Francis L.K.Hsu.Cam 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4

史國衡：《中國進入機器時代：中國軍事工業勞工研究》，費孝通、許烺光

編譯

[1445] Shih-pao（The eastern times）.Shanghai，1904—

《時報》，上海，1904年—

[1446] Shih-shih hsin-pao（The China times）.Shanghai，1924—

《時事新報》，上海，1924年—

[1447] Shih-tai p’i-P’ing（Modern critic）.Hong Kong，Jan.1939—

《時代批評》，香港，1939年1月—

[1448] Shih Yang-ch’eng.Chung-kuo sheng hsing-cheng chih-tu（Chines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hanghai：CP，1947

施養成：《中國省行政制度》

[1449] Shima Ichirō.Chūgoku minzoku kōgyō no tenkai中國民族工業の展開（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industries）.Tokyo：Mineruva Shobō ミ ネ ルヴァ 書房，1978

島一郎：《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1450] Shimada Toshihiko，ed，Manshū jihen 滿州事變（The Manchurian incident）.Tokyo：Misuzu Shobōみすず書房，1964

島田俊彥編：《滿洲事變》

[1451] Shina keizai zensho支那經濟全書（China economic series），vols.1—4.Osaka：Maruzen丸善，1907；vols.5—12，Tokyo：Tōa Dōbundai柬亞同文會，1908；each volume c.700—1000 pp.，illus.

《中國經濟全書》

[1452] ‘Shingai kakumei nanajushūnen kinen Tōkyō kokusai gakujutsu kaigi’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東京國際學術會議（Paper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1911 Revolution held in Tokyo to commemorate its 70th anniversary）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東京國際學術會議》

[1453] Shirendev，B.and Sanjdorj，M.History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Vol.3.The contemporary period.Ulan Bator，1969；trans.by William A.Brown and Urgunge On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B.希倫德夫和M .桑吉道爾吉：《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第3卷，《現代時期》，威廉·A.布朗和烏爾貢格·奧農譯

[1454] Shhu Ch’ing-ch’un.See Lao She

舒慶春，見老舍

[1455] Shu Hsin-ch’eng.ed.Chin-tai Chung-kuo chiao-yü shih-liao（Source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4 vols.Shanghai：Chung-hua，1928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4卷

[1456] Shu Hsin-ch’eng，ed.Chung-kuo chin-tai chiao-yü-shih tzu-liao（Source materials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3 vols.Peking：Jen-min chiao-yü ch’u-pan-she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3卷

[1457] Shu-wen.‘Ch’en Li-fu t’an CC’（Ch’en Li-fu chats about the CC）.Hsinwen t’ien-ti，20（1 Feb.1937）13

淑文：《陳立夫談CC《》，新聞天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

[1458] Shue，Vivienn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維維安娜·須：《轉變中的農民中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年）》

[1459] Shyu，Lawrence Nae-lih.‘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and China’s wartime problems，1937—1945’.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2

徐乃力：《國民參政會與中國戰時問題，1937—1945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72年

[1460] Shyu，Lawrence N.‘China’s“ wartime parliament”：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1938—1945’，in Paul K.T.Sih，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273—313

徐乃力：《中國的“戰時議會”：國民參政會，1938—1945年》，收入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1461] Sih，paul K.T.ed.The strenuous decade：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Jamaica，NY：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1970

薛光前編：《緊張的十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1937年》

[1462] Sih，Paul K.T.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Hicksville，NY：Exposition Press，1977

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1463] Skinner，G.William.‘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I，JAS26.1（Nov.1964）3—44.（part Ⅱ and Ⅲ in subsequent issues）

史堅雅：《農業中國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第1部分，《亞洲研究雜志》，第26卷第1期（1964年11月），（第2部分和第3部分，載第26卷第2期和第3期）

[1464] Skinner，G.William.‘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3.3（July 1971）270—81

史堅雅：《中國農民與封閉社會：開放和關閉的個案》，《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第13卷第3期（1971年7月）

[1465] Skinner，G.William.‘Mobility strateg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Carol-Smith，ed.Regional analysis，vol.1，Economic systems，327—61.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6

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流動戰略》，收入卡羅爾·史密斯編：《區域分析》，第1卷，《經濟制度》

[1466] Skinner，G.William，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1467] Skinner，G.William，et al.eds.Modern Chinese society：an analytical bibliography.3 vol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史堅雅等編：《現代中國社會：有分析的書目》，3卷

[1468] Skinner，G.William.See Elvin，Mark

史堅雅，見伊懋可

[1469] Slawinski，Roman.La Société des Piques Rouges et le mouvement paysan en Chein en 1926—1927.Varsovie：Wydawnictwa Universytetu Warszawskiego，1975

羅曼·斯拉文斯基：《紅槍會與1926—1927年中國的農民運動》

[1470] Slupski，Zbigniew.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an analyses of Lao She’s fiction with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appendices.Prague：Oriental Institute，1966

茲比格涅夫·斯盧普斯基：《一個中國現代作家的發展：老舍小說分析，

附老舍生平和書目》

[1471] Smedley，Agnes.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56；London，1958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

[1472] Smith，Arthur H.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London：Oliphant，Anderson and Ferrer，1899

明恩溥：《中國農村生活：社會學研究》

[1473] Smith，Richard J.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y century China.New York：KTO Press，1978

理查德·J.史密斯：《雇傭兵與官吏：常勝軍在19世紀的中國》

[1474] Smith，Richard J.China’s cultural heritage：the Ch’ing dynasty，1644—1912.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3

理查德·J.史密斯：《中國文化遺產：清代，1644—1912年》

[1475] Smith，Robert Gillen.‘History of the attempt of the United States Medical Departmen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hinese Army Medical Service，1941—1945’.Columbia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50

羅伯特·吉倫·史密斯：《美國衛生部設法改進中國陸軍衛生署效能的史實，1941—1945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1950年

[1476] SMR.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

滿鐵

[1477] SMR：Hoku-shi keizai chōsajo，chōsabu，comp.Hoku-shi nōson gaikyō chōsa hōkoku北支農村概況調查報告（Research report on village conditions in North China）.Dairen：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vol.2，1939

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調查部編：《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

[1478] SMR：Hoku-shi keizai chōsajo，comp.Nōka keizai chōsa hōkoku，Shōwa jūninendo，Hojunken Sensochin Beishoson 農家經濟調查報告，昭和12年度，豐潤 縣宣莊 鎮米廠村（A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farm economy for 1937：Mi-ch’ang village，Hsuan-chuang chen，Feng-un county）.Dairen：1939

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編：《農家經濟調查報告，昭和12年度，豐潤縣宣莊鎮米廠村》

[1479] SMR：Kozawa Shigeichi.Shina no dōran to Santō nōson支那の擾亂と山東農村（Shantung villages and the upheaval in China）.Dairen：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1930

滿鐵：小澤茂一：《中國的動亂與山東農村》

[1480] SMR：Mantetsu chōsa geppō 滿 鐵調查月報（SMR research monthly）.Dairen，1919—44

滿鐵：《滿鐵調查月報》，大連，1919—1944年

[1481] SMR：Mantetsu Shanhai jimusho chōsashitsu，Kōsōshō Shōkōken nōson jittai chōsa hōkokusho江蘇省江松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Research report of village conditions in Sung-chiang county，Kiangsu）.Shanghai：1941

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江蘇省松江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

[1482] SMR：Mantetsu taiheiyō mondai chōsa jumbikai comp.Nōka no keiei narabini keizai jōtai yori mitaru Manshū，nōka to Chūbu Shina nōka no taishō農家の經營并に經濟狀態ょり見たゐ滿洲農家と中部支那農家の對照（A comparison of Manchurian and central China farms as seen from the economic and managerial aspects of the family farm）.Dairen：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1931

滿鐵太平洋問題調查準備會編：《從農家之經營和經濟狀態所見滿洲農家和華中農家的比較》

[1483] SMR：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kaisha，Hokushi nōson gaikyō chōsa hōkoku北支農村概況調查報告（Research report on village conditions in North China）.Tokyo：Nihon Hyōronsha日本評 論社，1940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

[1484] SMR，Hsinking Branch office：Research Division.Minami Manshū tetsudō Kabushiki Kaisha，chōsashitsu，Toshi no bōchō ni tomonau ichi nōson nougoki都市ノ膨脹二卜モナゥ一農村ノ動キ（Change in a vill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rban growth）.Ch’ang-ch’un：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1940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室：《都市發展影響下的一個農村的變化》

[1485] SMR，Shanghai Research Section：Mantetsu Shanhai jimusho chōsashitsu Chu-shi ni okeru nōson no shakai jijō中支ニ於クん農村ノ社會事情（Social conditions in villages of central China）.Shanghai：1939

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華中農村的社會狀況》

[1486] SMR：Shanhai jimusho.Shina shōhin sōsho：goma支那商品業 書：胡麻（Chinese commercial product series：sesame）.Shanghai：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1938

滿鐵上海事務所：《中國商品叢書：胡麻》

[1487] Snow，Edgar.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3—5 Feb.1936

斯諾：《毛澤東訪問記》，《大美晚報》，1936年2月3—5日

[1488] Snow，Edgar.Red star over China.London：Gollancz，1937；New York Random House，1938；1 st rev.and enlgd.edn，Grove Press，1968

斯諾：《西行漫記》

[1489] Snow，Edgar.The battle for Asia.New York：Random House，1941

斯諾：《爭奪亞洲的戰爭》

[1490] Snow，Edgar.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57

斯諾：《紅色中國雜記，1936—1945年》

[1491] Snow，Edgar.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Hutchinson，1973

斯諾：《漫長的革命》

[1492] Spector，Stanley.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 arm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

斯坦利·斯佩克特：《李鴻章和淮軍》

[1493] Spence，Jonathan.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0

史景遷：《曹寅與康熙皇帝：奴才與主子》

[1494] Spence，Jonathan.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New York：Viking Press，1981

史景遷：《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1495] Spence，Jonathan D.and Wills，John E.，Jr.，eds.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ty Chin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史景遷和小約翰·E.威爾斯編：《從明到清：17世紀中國的征服、區域和延續性》

[1496] Ssu-ch’uan ching-chi chi-k’an（Szechwan economic quarterly）.Chungking，1943—

《四川經濟季刊》，重慶，1943年—

[1497] Ssu-ch’uanw 　en-hsien（Records of Szechwan）.Taipei，1962—

《四川文獻》，臺北，1962年—

[1498] Ssu-i lu：Yuan Shou-ho hsien-sheng chi-nien ts’e（Memorial volume on Mr Yuan Shou-ho [T.L.Yuan]）.Taipei：CP，1968.The English-language portion of this bilingual volume was entitled T.L.Yuan：a tribute

《思憶錄：袁守和先生紀念冊》

[1499] Ssu-ma Hsien-tao.Pei-fa hou chih ko-p’ai Ssu-ch’ao（The doctrines of the various cliques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Peiping：Ying-shan-she鷹山社，1930

司馬仙島：《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1500] Starr，John Bryan.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約翰·布賴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澤東的政治思想》

[1501] Stilwell，Joseph.See Romanus，Charles A.；Tuchman，Barbara

史迪威，見查爾斯·F.羅曼努斯；巴巴拉·W.塔奇曼

[1502] Stilwell Papers，The.Arr.and ed.by Theodore H.White.New York：Schocken Books，1948

《史迪威文件》，白修德整理編輯

[1503] Stinchcombe，Arthur L.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阿瑟·L.斯廷庫姆：《社會史的理論方法》

[1504] Storry，Richard（George Richard）.Jap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in A-sia，1894—1943.London：Macmillan，1979

理查德·斯托里：《日本與西方在亞洲的衰落，1894—1943年》

[1505] Strand，David and Weiner，Richard.‘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1920s Peking：analysis of the tramway riot of October 22，1929’.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S 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3（1978—9）137—80

戴維·斯特蘭德和理查德·韋納：《20世紀20年代北京的社會運動與政治言論：1929年10月22日電車風潮的分析》，《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3集（1978—1979年）

[1506] Stross，Randall.‘A hard row to ho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agri culture in Western Jiangsu，1911—1937’.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 sertation，1982

蘭德爾·斯特羅斯：《困難的工作：中國江蘇西部農業的政治經濟，1911—1937年》，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82年

[1507] Sturat，John Leighton.See Rea，Kenneth W.

司徒雷登，見肯尼思·W.雷亞

[1508] Stueck，William Whitney，Jr.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

小威廉·惠特尼·施蒂克：《通往對抗的道路：美國對中國和朝鮮的政策，1947—1950年》

[1509] Su-chou ti nung-ch’ao（The Peasant riots in Soochow）.Chung-kuo nungts’un，2.6（June 1936）6—8

《蘇州的農潮》，《中國農村》，第2卷第6期（1936年6月）

[1510] Su Wan Hsiang teng-sheng nung-min k’ang-tsu tou-cheng（Peasant resistance to rents in Kiangsu，Anhwei and Hunan provinces，Nov.1929—Jan.1930）.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Nanking，No.1/2/1000

《蘇皖湘等省農民抗租斗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1/2/1000

[1511] Su-wei-ai Chung-kuo（Soviet China）.Moscow：Izdatep stvo Inostrannyky Rabochikh（Foreign Workers’Publishing House），19 34

《蘇維埃中國》

[1512] Su Wen，ed.Wen-jt zu-yu lun-pien chi（Debates on the freedom of literature and art）.Shanghai：Hsien-tai現代，1933

蘇汶編：《文藝自由論辯集》

[1513] Su Yun-feng.Chung-kuo hsien-tai-hua ti ch’ü-yü yen-chiu：Hu-Pei sheng，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Hupeh province）.Taipei：IMH.1981

蘇云峰：《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

[1514] Sun，E-tu Zen.‘Sericulture and silk production in Ch’ing China’，in W.E.Willmott，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79—108

孫任以都：《清代的養蠶業和絲綢生產》，收入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1515] Sun Fo（Sun K’o）et al.T’ao Chiang yen-lun-chi（Anti-Chiang Messages）.Canton，1931

孫科等：《討蔣言論集》

[1516] Sun Yat-sen.Fundamentals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Chien-kuo takang）（With Chinese text）.Taipei：China Cultural Service，1953

孫逸仙：《建國大綱（》附中文文本）

[1517] Sung Jen-ch’iung t’ung-chih liu-yueh shih-w’u-jih tsai chung-yang-chü tang-hsiao kuan-yü cheng-chih kung-tso ti pao-kao（Comrade Sung Jench’iung’s report on political work at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No.15 June）.n.p.：chin-chi-lu-yü chün-ch’ü cheng-chih pu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December 1947

《宋任窮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黨校關于政治工作的報告》

[1518] Suzuki，Takeo，ed.Nishihara shakkan shiryō kenkyū西原借款資料研究（Studies of materials on teh Nishihara Loans）.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2

鈴木武雄編：《西原借款資料研究》[1519] SW.See Mao Tse-tung，Selected works

《毛澤東選集》英文版

[1520] Swen，W.Y.‘Types of farming，costs of production，and annual labor distribution in Weihsien County，Shantung，China’.Chinese Economic Journal，3.2（Aug.1928）653

W.Y.申：《中國山東濰縣的農業類型、生產費用和年勞動分配》[1521] ‘Syncretic sects in Chinese society’，symposium in ModernC hina，8.3（July 1982）entire and 8.4（Oct.1982）435—84

《中國社會中的融合教派》，專題論集，載《現代中國》，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和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

[1522] Sze，Szeming.China’s health problems.Washington，DC：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1944

斯思明（音）：《中國的衛生問題》

[1523] Ta-Ch’ing Kuang-hsu hsin fa-ling（New laws of the Kuang-hsu period）.Shanghai：CP，1910

《大清光緒新法令》

[1524] Ta-kung-pao（‘ L’Impartial’）.Tientsin，1929—；Hankow，1938—；Chungking，1938—；Hong Kong，1938—

《大公報》，天津，1929年—；漢口，1938年—；重慶，1938年—；香港，1938年—

[1525] Taeuber，Irene.‘Migrants and cities in Japan，Taiwan，and Northeast China’，in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eds，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359—84

艾琳·托伊伯：《日本、臺灣和中國東北的移民和城市》，收入伊懋可和史堅雅編：《兩種社會之間的中國城市》

[1526] Taga Akigorō.Kindai Chūgoku kyōikushi shiryō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Source material o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5 vols.Tokyo：Nihon gakujutsu shinkōkai日本學術振興會，1976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5卷

[1527] Tagore，Amitendranath.Literary debates in modern China，1918—1937.Tokyo：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1967

阿米滕德拉納特·塔戈雷：《現代中國的文學論戰，1918—1937年》

[1528] Tai Hsuan-chih.Hung-ch’iang-hui（The Red Spear Society）.Taipei：Shihhuo ch’u-pan-she食貨出版社，1973

戴玄之：《紅槍會》

[1529] Tai Li.See Tai Yü-nung

戴笠，見戴雨農

[1530] Tai-Shi Kōrōsha denki hensankai（Commission for the compilation of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those who rendered services regarding China），comp.Tai-Shi Kaikoroku 対支回顧録（A record looking back on China）.2 vols.Tokyo：Tai-Shi kōrōsha denki hensankai，1936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華回顧錄》，2卷

[1531] Tai Wen.Chiang-chou huo an（The case of the Chiang-chou fire）.Nanking：Chiang-su jen-min，1957.（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no.4393.8/4574）

戴聞：《江洲火案》

[1532] Tai Yih-jian.‘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ater and Soviet influenc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74

戴意堅（音）：《當代中國戲劇和蘇聯的影響》，南伊利諾斯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

[1533] Tai Yii-nung hsien-sheng nien-Pu’（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Tai Li），comp.by Intelligence Section，Defence Ministry.Taipei，1966

《戴雨農先生年譜》，國防部情報局編

[1534] 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See Nihon kokusai…

《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

[1535] T’ai-ku hsine-chih.（T’ai-ku county gazetteer），1931

《太谷縣志》

[1536] Takada Yasuma.Tōa minzoku-ron柬亞民族論（On East Asian nationalism）.Tokyo：Iwanami巖波，1939

高田保馬：《東亞民族論》

[1537] Takamura Naosuke.Kindai Nihon mengyō to Chūgoku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國（The modern Japanese cotton industry and China）.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82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紡工業與中國》

[1538] Takeuchi Minoru，ed.Mao Tse-tung chi毛澤東集（Collected writings of Mao Tse-tung）.10 vols.Tokyo：Hokubōsha北望社，1970—72.See also Mao Tse-tung chi

竹內實編：《毛澤東集》，10卷，也見《毛澤東集》

[1539] Tamagna，Frank M.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2

弗蘭克·M.塔馬格納：《中國的銀行與財政》

[1540] Tamura Kōsaku.Saikin Shina gaikō shi最近支那外交史（History of China’s recent foreign relations）.2 vols.Tokyo：Gaikō Jihōsha外交時報社，1938—9

田村幸策：《最近中國外交史》，2卷

[1541] Tamura Kōsaku.Daitōa gaikōshi kenkyū大東亞外交史研究（Study of diplomatic history of Greater East Asia）.2 vols.Tokyo：Dainippon Shuppan大日本出版，1942

田村幸策：《大東亞外交史研究》，2卷

[1542] Tanaka Masatoshi.‘Chūgoku-keizai shi’中國—經濟史（Chinae-conomic history）Ajia Keizai ア ジ ア經濟（Asian economices），19.1—2（Jan-Feb.1978），41—51

田中正俊：《中國— —經濟史》，《亞洲經濟》，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

[1543] Tang，Peter S.H.Russian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ier Mongolia 1911—1931.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59

彼得·S.H.唐：《俄國和蘇聯在滿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1931年》

[1544] Tang-shih ts’an-k’ao tzu-liao（Referenc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ed.by Mongolia-Suiyuan Bureau，department of propaganda.Suiyuan，n.d.

《黨史參考資料》，蒙綏局宣傳部

[1545] Tang-shih yen-chin.（Reserch on party history）.Pek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for the central party party school），1980—

《黨史研究》，北京，1980年—

[1546] Tang-shih yen-chiu tzu-liao（Research materials on party history）.Periodical.‘Internal use only’this item is composed of primery documents，while Tang-shin yen-chiu（Research on party history）contains secondary scholarship，essays，reminiscences，etc.Both are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CCP

《黨史研究資料》，期刊，內部發行，刊載一次文獻；《黨史研究》刊載二次文獻、論文和回憶錄

[1547] Tang ti kai-tsao（Re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n.d.

《黨的改造》

[1548] T’ang Chih-chün.Wu-hse pien-fa shih lun-ts’ung（Collected essays on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Hankow：Jen- min，1957

湯志鈞：《戊戌變法史論叢》

[1549]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Loodon：Routledge，1930

湯良禮：《中國革命內史》

[1550] Tang Leang-li.Suppressing communist bandits in China.Shanghai，1934

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

[1551] Tani Hisao.Kimtsu Nichi Ro sensh 機密日露戦史（Secret histor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1961

谷壽夫：《機密日俄戰史》

[1552] T’ao Chiang yen-lun-chi.See Sun Fo

《討蔣言論集》，見孫科

[1553] T’ao Hsing-chih.T’ao Hsing-chih chiao-yü wen-hsuan（Selected essays on education by T’ao Hsing-chih）.Peking：Chiao-yü k’o-hsueh ch’u-pan-she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

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文選》

[1554] T’ao Hsing-chih.Hsing-chih shu-hsin chi（Collected litters of [T’ao] Hsingchih）.Anhwei：Jen-min，1981

陶行知：《行知書信集》

[1555] T’ao Ta-yung.‘Lun tang-ch’ien ti kung-yeh chin-chi’（Current means of rescuing industry）.Chung-kuo kung-yeh，25（Mar.1944）10—12

陶大鏞：《論當前的工業救濟》，《中國工業》，第25期（1944年3月）

[1556] T’ao Ying-hui.Ts’ai Yuan-p’ei nien-p’u（shang）（A biographical chronolgy of Ts’ai Yuan-P’ei），Part I，Taipei：IMH monograph no.36，Academia Sinica，1976

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上）

[1557] T’ao Ying-hui.‘Ts’ai Yuan-p’ei yü Pei-ching ta-hsueh，1917—1923’（Ts’ai Yuan-P’ei and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1917—1923）.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5（1976）263—312

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

[1558] T’ao Ying-hui.‘Ts’ai Yuan-P’ei yü Chung-yang yen-chiu yuan 1927—1940’（Ts’ai Yuan-P’ei and Academia Sinica 1927—1940）.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7（1978）1—50

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

[1559] Tawney，R.H.Land and labour in China.New York：Harcourt Brace，1932

R.H.托尼：《中國的土地與勞動》

[1560] Tawney，R.H.See Becker，C.H.

R.H.托尼，見C.H.貝克爾

[1561] Teng，Ssu-yü.Protest and crime in China：a bibliography of secret associations，popular uprisings，peasant rebellions，New York and London：Carland，

鄧嗣禹：《抗議和犯罪在中國：秘密結社、民眾起義、農民造反的書目》

[1562] Teradaira Tadasuke.Rokōkyō jiken 盧溝 橋事件（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Tokyo：Yomiuri shimbunsha 讀殼新聞社，1970

寺平忠輔：《盧溝橋事變》

[1563] TFTC，See Tung- fang tsa-chih

《東方雜志》

[1564] Thaxton，Ralph.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拉爾夫·撒克斯頓：《中國揭示正確面：農民社會中的革命合法性》

[1565] There is another China.Essays by J.L.Buck，Roger Greene，Hu Shih et al.New York：King’s Crown Press，1948

《有另一個中國》，卜凱、顧臨、胡適等人的論文集

[1566] Thompson，E.P.‘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ty’.Past and Present，50（Feb.1971）76—136

E.P.湯普森：《18世紀英國民眾的道德經濟》，《過去與現在》，第50期（1971年2月）

[1567] Thomson，James C.，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小詹姆斯·C.湯姆森：《中國面向西方之時：美國改革者在國民黨中國，1928—1937年》

[1568] Thorne，Christopher.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London：Hamilton，1972

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國際聯盟和1931—1933年遠東危機》

[1569] Thorne，Christopher.Allies of a kind：the United States，Britain，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克里斯托弗·索恩：《徒有其名的同盟：美國、英國與對日本的戰爭，1941—1945年》

[1570] Thornton，Richard C.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28—1931.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理查德·C.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1928—1931年》

[1571] Thurston，Mrs Lawrence Chester，Ruth M.Ginling College.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5

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1572] Ti-cheng yueh-k’an（Land administration monthly）.Nanking，Jan.1933—

《地政月刊》南京，1933年1月—

[1573] Ti-erh-tz’u Chung-kuo chiao-yü nien-chien（The second China education year book）.Shanghai：CP，1948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

[1574] Ti-erh-tz’u Chung-kuo lao-tung men-chien（Second year book of Chinese labour），ed.by Pei-p’ing she-hui tiao-ch’a so（Peiping Social Survey Institute），1930

《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鑒》，北平社會調查所編

[1575] Ti-erh-tz’u kuo-nei ko-ming chan-cheng shih-ch’i shih-shih lun-ts’ung（Discours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ed.by Shihhsueh shuang-chou-k’an she，Peking：San-lien，1956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史事論叢》，史學雙周刊社編

[1576] Tii--tz’u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hsuan-yen（Manifesto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KMT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n.p.，1927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國民黨組織部

[1577] Ti-i-tz’u Chung-kuo chiao yü nien-chien（The first China education year book），comp.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hanghai：K’ai-ming shutien開明書店，1934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教育部編

[1578] Ti-i-tz’u kuo-nei ko-ming chan-cheng shih-ch’i ti kung-jen yun-tung（The labour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ed ·by Chung-kuo hsien-tai-dhih tzu-liao ts’ung-k’an Peking：Jen-min，1954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編

[1579] Ti-i-tz’u kuo-nei ko-ming chan-cheng shih-ch’i ti nung-min yun-tung（The peasant movement during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Peking：Jen-min，1953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

[1580] Tiao-ch’a Che-chiang ching-chi so t’ung-chi-k’o.Che-chiang Chien-te hsien ching-chi tiao-ch’a（survey of the economy of Chien-te county，Chekiang）.Hangchow：Chien-she wei-yuan-hui建設委員會，1931

調查浙江經濟所統計課：《浙江建德縣經濟調查》

[1581] Tiedemann，R.G.‘The persistence of banditry：incidents in border district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Modern China，8.4（Oct.1982）395—433

R.G.蒂德曼：《盜匪活動的持續：華北平原邊緣地區的事件》，《現代中國》，第8卷第4期（1982年10月）

[1582] 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1927—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田弘茂：《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

[1583] T’ien Chun（Hsiao Chün）.Village in August，trans.by Evan King，intr.by Edgar Snow.New York：Smith&Durrell，1942

田軍（蕭軍）：《八月的鄉村》，埃文·金譯，斯諾序

[1584] T’ien Han，Ou-yang Yü-ch’ien et al.Chung-kuo hua-chü yun-tung wu-shihnien shih-liao chi，1907—1957（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modern Chinese drama movement of the last fifty years，1907—1957）.Peking：Chung-kuo hsi-chü中國戲劇，1957

田漢、歐陽予倩等：《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

[1585] T’ien Yuan.‘Tsai lun Mao Tse-tung t’ung-chih tui Li-san lu-hsien ti jenshih ho ti-chih’（More on Comrade Mao Tse-tung’s understanding of and resistance to thd Li-san line）.TSYC 1（1981）65—71

田園：《再論毛澤東對立三路線的認識和抵制》，《黨史研究》，1981年第1 期

[1586] Ting Chih-p’in.Chung-kuo chin ch’i-shih-nien lai chiao-yü chi-shih（Events in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the past seventy years）.National Bureau of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35.Taipei：CP reprint，1961

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

[1587] Ting I.‘Chung-kuo tso-i tso-chia lien-meng ti ch’eng-li chi ch’i ho fan-tung cheng-chih ti tou-cheng’（The founding of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and its struggle against reactionary political forces），in Chang Chinglu，ed.Chung-kuo hsien-tai ch’u-pan-shih-liao.I-pien，35—49

丁易：《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動政治的斗爭》，收入張靜廬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588] Ting，Lee-hsia Hsu.Government control of the press in modern China，1900—1949.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4

丁徐麗霞（音）：《現代中國的政府對于新聞的控制，1900—1949年》

[1589] Ting Ling et al.Chieh-fang ch’ü tuan-p’ien ch’uang-tso hsuan（Selected short works from the liberated areas）.2 vols.n.p.，1947

丁玲等：《解放區短篇創作選》，2卷

[1590] Ting Miao.P’ing Chung-kung wen-i tai-piao tso（On reprsesntative works of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Hong Kong：Hsin-shih-chi ch’u-pan-she新世紀出版社，1953

丁淼：《評中共文藝代表作》

[1591] Tipton，Laurence.Chinese escapade.London：Macmillan，1949

勞倫斯·蒂普頓：《中國的惡作劇》

[1592] Tōa dōbun kai hensan kyoku.Shina keizai zensho支那經濟全書（A compendium on the Chinese economy）.Tokyo：Tōa dōbun kai，vol.7.1910

東亞同文會編纂局：《中國經濟全書》

[1593] Tōa kenkyùjo.Shina seishi no sekai teki chii支那制絲の世界的地位（The world status of Chinese silk-reeling）.Tokyo：Tōa kenkyūjo，1942

東亞研究所：《中國繅絲的世界地位》

[1594] Tōa kenkyūjo.Keizai ni kansuru Shina kankō chōsa hōkokusho：toku ni Hoku Shi ni okeru kosaku seido經濟に関すゐ支那慣行調查報告書—特に北支に於ける小作制度（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f old customs in China concerning the economy：the tenant system in North China），Tokyo，1943

東亞研究所：《有關經濟的中國習慣調查報告書：華北的租佃制度》

[1595] Tong，Hollington K.（Tung Hsien-kuang），ed，China after seven years of war.New York：Macmillan，1945

董顯光編：《抗戰七年以后的中國》

[1596] Tong，Hollington K.China and the world press.Nanking，Feb.1948

董顯光：《中國與世界新聞界》

[1597] Tong，Hollington K.Chiang Kai-shek.soldier and statesman：authorized biography.2 vols.Shanghai：The China Publishing Co.1st edn.Nov.1937.chiang kai-shek.Rev.edn，Taipei：Ching Pub.Co.，1953

董顯光：《蔣介石，軍人和政治家：審定的傳記》，2卷，修訂版更名《蔣介石》

[1598] Tong，Hollington.Chiang Tsung-t’ung chuan（A biography of President Chiang）.3 vols Taipei：Chung-hua wen-hua中華文化，1954

董顯光：《蔣總統傳》，3卷

[1599] Tong Te-kong.See Li Tsung-jen

唐德剛，見李宗仁

[1600] Topping，Seymour.Journey between two Chinas，New York：Harper & Row，1972

西摩·托平：《兩個中國之間的旅行》

[1601] Torbert，preston M.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1662—1769.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77

普雷斯頓·M.托伯特：《清宮內務府：其組織及主要職能研究，1662—1796年》

[1602] Tou-cheng（The struggle）.Official 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C.1928？—1934？

《斗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1928？—1934？年

[1603] Trotter，Ann，Britain and East Asia，1923—1937.Lond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安妮·特羅特：《英國與東亞，1923—1937年》

[1604] Tsai，David.‘ Party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Kiangsu province，1927—1932’.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cago，I（1975—6）85—118

蔡武雄：《江蘇省的黨政關系，1927—1932年》，《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1集（1975—1976年）

[1605]Tsai，Jung-fang.‘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mpradore ideologists：He Qi（HoKai，1859—1914）and Hu Liyuan（1847—1916）’.Modern China，7.2（April 1981）191—225

蔡榮芳（音）：《買辦思想家的處境：何啟（1859—1914年）和胡禮垣（1847—1916年）》，《現代中國》，第7卷第2期（1981年4月）

[1606] Ts’ai-cheng p’ing-lun（Financial review）Hong Kong，1939—

《財政評論》，香港，1939年—

[1607] Ts’ai-cheng-pu cheng-li ti-fang chüan-shui wei-yuan-hui（Committee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local taxes of the Ministry of Finance）.T’u-ti ch’enpao tiao-ch’a pao-kao chih i：An-hui sheng Tang-t’u hsien t’u-ti ch’en-pao ka -lueh（First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land-registration：summary of the registration of land in Tang-t’u hsien.Anhwei）.Nanking，1935（？）

財政部整理地方捐稅委員會：《土地陳報調查報告之一：安徽省當涂縣土地陳報概略》

[1608] Ts’ai-cheng-pu cheng-li ti-fang chüan-shui wei-yuan-hui.T’u-ti ch’en-pao tiao-ch’a pao-kao chih erh：Chiang-su sheng Hsiao-hsien t’u-ti ch’en-pao kai-lueh（Second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land-registration：summary of the registration of land in Hsiao hsien，Kiangsu）.Nanking，1935（？）

財政部整理地方捐稅委員會：《土地陳報調查報告之二：江蘇省蕭縣土地陳報略》

[1609] Ts’ai-cheng-pu cheng-li ti-fang chüan-shui wei-yuan-hui.T’u-ti ch’en-pao tiao-ch’a pao-kao chih san：Chiang-su sheng Chiang-tu hsien t’u-ti ch’enpao kai-lueh（Third report on the inquiry into land-registration：summary of the registration of land in Chiang-tu hsien，Kiangsu）.Nanking，1935（？）

財政部整理地方捐稅委員會：《土地陳報調查報告之三：江蘇省江都縣土地陳報概略》

[1610] Ts’aic-heng shuo-ming shu（Explanatory accounts of fiscal administration），published by province.Ching-chi hsueh-hui，comp.Peking：Ts’ai-cheng pu財政部，1915

《財政說明書》，經濟學會編

[1611] Ts’ai Ho-sen，wen-chi（Collected writings of Ts’ai Ho-sen）.Peking：Jenmin，1980

《蔡和森文集》

[1612] Ts’ai Shang-ssu，ed.Lun Ch’ing-mo Min-ch’u Chung-kuo she-hui（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Shanghai：Fu-tan ta-hsueh復旦大學，1982

蔡尚思編：《論清末民初中國社會》

[1613] Ts’ai Shao-ch’ing.‘Ko-lao hui yü 1891 nien Ch’ang-chiang liu-yü ti fanyang-chiao tou-cheng’（The Ko-lao hui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the Yangtze basin during 1891）.She-hui k’o-hsueh yen-chiu（Social science research），5（1982）

蔡少卿：《哥老會與1891年長江流域反洋教斗爭》，《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5期

[1614] Ts’ai Shu-pang.‘Chin shih-nien lai Chung-kuo tien-nung feng-ch’ao ti yenchiu’（Research on tenant riots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Tungfang tsa-chih，30.10（16 May 1933）26—38

蔡樹邦：《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東方雜志》，第30卷第10期（1933年5月16日）

[1615] Ts’ai T’ing-k’ai.Ts’ai T’ing-k’ai tzu-chuan（Ts’ai T’ing-k’ai’s autobiography）.2 vols.Hong Kong：Tzu-yu hsun-k’an-she自由旬刊社，1946

蔡廷鍇：《蔡廷鍇自傳》，2卷

[1616] Ts’ai Wu-chi.‘Min-yuan lai wo-kuo chih nung-yeh’（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since the outset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in Chu Ssu-huang，ed，Minkuo ching-chi shih（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2vols.Shanghai：Yin-hang hsueh-hui銀行學會，1948

蔡無忌：《民元來我國之農業》，收入朱斯煌編：《民國經濟史》

[1617] Ts’ai Yuan-p’ei et al.Wan-Ch’ing san-shih-w’u-nien lai chih Chung-kuo chiao-yü，1897—1931.（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35 years since late Ch’ing 1897—1931）.Shanghai：Commercial Press，1931；Hong Kong：Lung-men reprint，1969.See also Chuang Yü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也見莊俞

[1618] Ts’ai Yuan-p’ei.‘San-Shih-wu-nien lai Chung-kuo chih hsin-wen-hua’（New Cul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thirty-five years），in Ts’ai Yuanp’ei et al.，Wan-Ch’ing…

蔡元培：《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收入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

[1619] Ts’ai Yuan-p’ei.Ts’ai Yuanp-’ei ch’üan-chi（Collected works of Ts’ai Yuanp’ei）.Taipei：CP，1968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

[1620] Ts’ai Yuan-p’ei.Ts’ai Yuan-p’ei tzu-shu（Autobiography of Ts’ai Yuanp’ei）.Taipei：Chuan-chi wen-hsueh，1978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

[1621] Ts’an-k’ao tzu-liao.See Chung-kuo hsien-tai wen-hsueh shih ts’an-k’ao tzuliao

《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

[1622] Tsang K’o-chia.Hsien-tai Chung-kuo shih-hsuan（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no data

臧克家：《現代中國詩選》

[1623] Tsang K’o-chia，Lo-yin（Branded imprint）.Shanghai：K’ai-ming shu-chü開明書局，1948（1934）

臧克家：《烙印》

[1624] Ts’ao Chü-jen.Wen-t’an wu-shih nien hsu-chi（Sequel to fifty years on the literary scene）.Hong Kong：Hsin wen-hua新文化，1969

曹聚仁：《文壇五十年續集》

[1625] Ts’ao Po-i.Chiangh-si Su-wei-ai chih chien-li chi ch’i peng-k’uei（The establishment and collapse of the Kiangsi soviet）.Taipei：Cheng-chih tahsueh政治大學，1969

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

[1626] Ts’ao Yü.Jih-ch’u（Sunrise）.Shanghai：Wen-hua sheng-huo文化生活，1936

曹禺：《日出》

[1627] Ts’ao Yü.Thunderstorm，trans.by A.C.Barnes.Peking，1958

曹禺：《雷雨》，A.C.巴恩斯譯

[1628] Ts’ao Yü.Sunrise，trans.by A.C.Barnes.Pek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60

曹禺：《日出》，A.C.巴恩斯譯

[1629] Ts’ao Yü.The wilderness，trans.by Christopher C.Rand and Joseph S.M.Lau.Hong Kong and Bloomington：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0

曹禺：《原野》，克里斯托弗·C.蘭德和劉紹銘譯

[1630] Tsiang，T.F.‘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International Affairs（14 July 1935）

蔣廷黻：《中國之現狀》，《國際事務》，1935年7月14日

[1631] Tsiang，T.F.See Chiang T’ing-fu

蔣廷黻

[1632] Tsiang，T’ing-fu.See Lilley，Charles Ronald

蔣廷黻，見查爾斯·羅納德·利利

[1633] Tso-lien shih-ch’iwu-ch’an chieh-chi ko-ming wen-hsueh（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the period of the Left-wing League），ed.by Nanching ta-hsueh Chung-wen hsi（Department of Chinese，Nanking University）.Nanding：Chiang-su wen-i江蘇文藝，1960

《左聯時期無階級革命文學》，南京大學中文系編

[1634] Tsou Lu.Hu -ku-lu（Reminiscences）.2 vols.Shanghai，1943；Taipei：Wenhai，1971

鄒魯：《回顧錄》，2卷

[1635] Tsou 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50.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63

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年》

[1636] Tsun-yi hui-i wen-hsien（Documents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Peking：Jenmin，1958

《遵義會議文獻》

[1637] Tsung Yuan-han.I-ch’ing kuan wen-kuo chi（Illustrious collection from the I-ch’ing Hall）.1877

宗源翰：《頤情館聞過錄》

[1638] Tsunoda Jun.Manshū mondai to kokubō hōshin：Meiji kōki ni okeru kokubōkankyō no hendō 滿州問 題 と國防方針—明治後期におけゐ國防環境の變動（The Manchurian problem and defence policies-change of defence conditions in the late Meiji era）.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1967

角田順：《滿洲問題與國防方針，明治后期國防環境的變化》

[1639] Tsunoda J un，ed.，Taiheiyō Sensō e no michi（The road to the Pacific war）.See：Nihon kokusai seiji gakkai，ed.，Taiheiyōs nesō

角田順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見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通向太平洋戰爭之路》

[1640] Tsurumi Yūsuke.Taiheiyo jidai太平洋時代（The Pacific Era）.Tokyo：Shinjiyūshugi kyōkai新自由主義協會，1929

鶴見祐輔：《太平洋時代》

[1641] Tsurumi Yūsuke.Gotō Shimpei後藤新平（A biography of Gotō Shimpei）.4 vols.Tokyo：Gotō Shimpei Haku denki hensankai後藤新平伯傅記編纂會，1937—38

鶴見祐輔：《后藤新平》，4卷

[1642] TSYC.See Tang-ship Yen-chiu

《黨史研究》

[1643] Tu-li p’ing-lun（Independent critic）.Peking，May，1932—

《獨立評論》，北京，1932年5月—

[1644] T’u-ti cheng-ts’e chung-yao wen-chien hui-pien（A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n land policy）.n.p.：Chung-kung Chin-Ch’a-Chi chungyangchü hsuan-ch’uan pu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1946

《土地政策重要文件匯編》

[1645] Tuchman，Barbara W.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New York：Macmillan，1970

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1945年》

[1646] Tucker，Nancy Bernkopf.‘Nationalist China’s decline and its impact 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0’，in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eds.Uncertain years：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47—1950，131—71

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國民黨中國的衰落及其對中美關系的影響，1949—1950年》，收入多蘿西·博格和沃爾多·海因里希斯編：《不確定的年代：1947—1950年的中美關系》

[1647] Tucker，Nancy Bernkopf.Patterns in the dust：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1949—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屈辱的模式：中美關系和承認的爭論，1949—1950年》

[1648] Tung- fang tsa-chih（Eastern miscellany）.Shanghai，1904—48

《東方雜志》，上海，1904—1948年

[1649] Tung Hsiu-chia.Chung-kuo ti-fang tzu-chih wen-t’i（The problem of China’s local self-government）.Shanghai：CP，1937

董修甲：《中國地方自治問題》

[1650] Tung Shih-chin.‘K’ang-chan i-lai Ssu-ch’uan chih nung-yeh’（Agriculture in Szechwa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in Ssu-ch ’uan ch -ing-chi chi-k’an，1.1（15 Feb.1943）48—52

董時進：《抗戰以來四川之農業》，《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1期（1943 年2月15日）

[1651] T’ung-chi yueh-pao（Statistical monthly）.Nanking，1929—

《統計月報》，南京，1929—

[1652] T’ung-hisang hsien-chih（Gazetteer of T’ung-hsiang county），comp.by Yen Ch’en，1881

《桐鄉縣志》，嚴辰編

[1653] Tzu Ien[Mao Tse-tung].‘Kuo-min-tang yu-p’ai fen-li ti yuan-yin chi ch’i tui-yü ko-ming ch’ien-t’u ti ying-hsiang’（The reasons underlying the secession of the KMT rightist fac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revolution）.Cheng-chih chou-pao，4（10 Jan.1926）10—13

子任[毛澤東]：《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政治周報》，第4期（1926年1月10日）

[1654] Tzu-liao hsuan-pien [Peking]：January 1967

《資料選編》

[1655] Tzu-ming（pseud.）‘I-chiu-san-ssu nien Chung-kuo nung-ts’un chung ti kochung sao-tung feng-ch’ao i-lan-piao’（List of the various disturbances stirred up in Chinese villages in 1934）.Chungh-ua jih-pao（China daily），27 Feb.；6，13，20，27 March；18，25 April，1935

自鳴（筆名）：《一九三四年中國農村中的各種騷動風潮一覽表》，《中華日報》，1935年2月27日；3月6、13、20、27日；4月18、25日

[1656] Tzu-yu chung（Freedom’s bell）.Berkeley，March 1965—

《自由鐘》，伯克利，1965年3月—

[1657] Uchida Tomoo.Chūgoku nōson no bunke seido中國 農村の分家制度（The system of family division in rural China）.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56

內田智雄：《中國農村之分家制度》

[1658] Ulyanovsky，R.A.，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9

R.A.烏里揚諾夫斯基編《；共產國際與東方》

[1659]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DC，1949.Reissued with intro.and index by Lyman Van Slyke as China white paper.2 vol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美國國務院：《美國和中國的關系：尤其是關于1944—1949年時期》，改版更名為《中國問題白皮書》，附萊曼·P.范斯萊克寫的序和編的索引，2卷

[166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Conference on the Limitation of Ar mament，Washington，November 12，1921—February 6，1922.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2

美國國務院：《限制軍備會議，華盛頓，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 月6日》

[166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1939—1945

美國國務院：《戰后對外政策的制訂，1939—1945年》

[166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arious subtitles：1945，the Far East，China，vol.7，pub.8442（1969）；1946，the Far East，China，vol.9，pub.8561（1972）；1946，the Far East，China，vol 10，pub.8562（1972）；1947，the Far East，China，vol.7，pub.8613（1972）；1948，the Far East，China，vol.7，pub.8678（1973）；1948，the Far East，China，vol.8，pub.8583（1973）；1949，the Far East，China，vol.8，pub.8886（1978）；1949，the Far East，China，vol.9，pub.8774（1974）.All published 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美國國務院：《美國對外關系》，副題各異：《1945年，遠東，中國》，第7卷；《1946年，遠東，中國》，第9卷；《1946年，遠東，中國》，第10卷；《1947年，遠東，中國》，第7卷；《1948年，遠東，中國》，第7卷，第8卷；《1949年，遠東，中國》，第8卷，第9卷

[1663]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See Van Slyke，Lyman

美國陸軍部，見萊曼·范斯萊克

[1664] Unitded States War Department，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45，i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United States Senate，82nd Congress，1951—2

美國陸軍部軍事情報處：《中國共產黨運動》，收入《太平洋學會，司法委員會調查“內部安全法”及其他內部安全法律施行小組委員會聽證會記錄》

[1665] USDS.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State Archives

美國國務院檔案館

[1666] Usui Katsumi.Nihon to Chūgoku-Taishō jidai日本と中國—大正時代（Japan and China—the Taishō era）.Tokyo：Hara shobō原書房，1972

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

[1667] Usui Katsumi.Manshūjthen.滿洲事變（The Manchurian incident）.Tokyo：Chūō Kōronsha中央公論社，1974

臼井勝美：《滿洲事變》

[1668] Van Slyke，Lyman P.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ro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萊曼·P.范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產黨歷史中的統一戰線》

[1669] Van Slyke，Lyman P.，ed.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July 1945.Report prepared by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2…as an appendix to offcial transcript of the 1951 Senate hearings o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萊曼·P.范斯萊克編：《中國共產黨運動：美國陸軍部報告，1945年7月》

[1670] Van Slyke，Lyman P.，ed.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2 vols.Arlign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

萊曼·P.范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1945年12月—1947年1月：報告及附錄文件》

[1671] Varg，Paul A.Missionaries，Chinese，and diplomats：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90—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

保羅·A.瓦格：《傳教士、中國人及外交官：美國新教徒在中國的傳教運動，1890—1952年》

[1672] Varg，Paul A.The closing of the door：Sino-American relations，1936—1946.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

保羅·A.瓦格：《門戶的關閉：中美關系，1936—1946年》

[1673] Vilar，Pier reL.a Catalogne dans l’Espagne moderne：recherches sur les fondements économiques des structures nationales.3 vols.Paris：SEVPEN，1962

皮埃爾·維拉爾：《近代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方：民族結構的經濟基礎研究》，3卷

[1674] Vilar，Pierre.‘Mouvements paysans en Amérique latine’，in ⅩⅢ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Enquête sur les mouvements paysans dans le monde contemporain，rapport général，76—96.Moscow：Editions‘ Nauka’，1970

皮埃爾·維拉爾：《拉丁美洲的農民運動》，收入第十三次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當代世界農民運動調查，總報告》

[1675] Vincent John Carter.See May，Gary

范宣德，見加里·梅

[1676] Vogel，Ezra.‘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CQ 21（Jan.—Mar.1965）46—60

埃茲拉·沃格爾：《從朋友關系到同志關系》，《中國季刊》，第21期（1965 年1—3月）

[1677] Vohra，Ranbir.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Cambridge，Mass.：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4

蘭比爾·沃赫拉：《老舍與中國革命》

[1678] Von Richthofen，Ferdinand Paul Wilhelm.Tagebücheraus China.See Eihara Masao，trans.，Shina ryokō nikki.

費迪南德·保羅·威廉·馮·列區荷芬：《中國旅行日記》，見老原正雄譯：《中國旅行日記》

[1679] Wada Sei.Chūgoku chihō jichi hattatsu shi中國地方自治發達史（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China）.Tokyo：Kyūko shoin汲古書院，1975 a reprint of 1939 edn with new bibliography by Yamane Yukio

和田清：《中國地方自治發展史》，1939年的再版本，附山根幸夫編的新書目

[1680] Waaner，Rudolph G.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4

魯道夫·G.瓦格納：《重新制定天國的美景：宗教在太平軍造反中的作用》

[1681] Wakeman，Frederic，Jr.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魏菲德：《歷史與意志：毛澤東的思想的哲學觀點》

[1682] Wakeman，Frederic，Jr.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

魏菲德：《中華帝國的衰落》

[1683] Wakeman，Frederic，Jr.‘Rebellion and revolution：thd study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y’.JAS 36.2（Feb.1977）201—37

魏菲德：《造反與革命：中國歷史中的民眾運動研究》，《亞洲研究雜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

[1684] Wakeman，Frederic，Jr.and Grant，Carolyn，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

[1685] Wales，Nym（Snow，Helen Foster）.Red du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韋爾斯（海倫·福斯特·斯諾）：《紅色塵土》

[1686] Wallace，L.Ethel.Hwa Nan Collge：the wome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1956

L.埃塞爾·華萊士：《華南女子文理學院》

[1687] Wallerstein，Immanuel.The modern world-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Academie Press，1974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農業與16世紀歐洲世界經濟的根源》

[1688] Walmsley，Lewis C.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1974

劉易斯·C.沃姆斯利：《華西協合大學》

[1689] Walter，Georges and Hu Chi-Hsi.Ils étaient cent mille：la Longue Marche，1934—1935.Paris：J.C.Lattes，1982

喬治·瓦爾特和胡繼喜（音）：《他們有十萬人：長征，1934—1935年》

[1690] Wan-hsien hsin-chih（Wan county gazetteer）new edn，1934

《完縣新志》

[1691] Wang Cheng.‘The Kuominta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demoralization’.Stanford University，Ph.D.dissertation，1953

王成（音）：《國民黨：道德墮落的社會學研究》，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53年

[1692] Wang Chi-chen，ed.Stories of China at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7

王際真編：《中國戰時小說集》

[1693] Wang Chien-min.Chung-kuo kung-ch’an-tang shih-kao（A draf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3 vols.Taipei：Wang Chien-min，1965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3卷

[1694] Wang，Erh-min.See Hao，Yen-P’ing

王爾敏，見郝延平

[1695] Wang Erh-min.Chung-kuo chin-tai ssu-hsiang shih-lun（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Taipei：Hua-shih ch’u-pan-she華世出版社，1977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1696] Wang Fan-hsi.Chinese revolutionary：memoirs，1919—1949，trans.and with an intro.by Gregor Benton.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格雷戈爾·本頓譯并序

[1697] Wang Feng-chieh.Chung-kuo chiao-yü-shih ta-kang（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2nd ed.Shanghai：CP，1930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大綱》

[1698] Wang Gungwu.‘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a back-ground essay’，in John K.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34—62

王賡武：《初明與東南亞的關系：背景論述》，收入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699] Wagn Hsi‘Lun wan-Ch’ing ti kuan-tu shang-pan’（On the system of official supervision and merchant management during the late Ch’ing）.Lishih hsueh（Historical study），I（1979）95—124

汪熙：《論晚清的官督商辦》，《歷史學》，1979年第1期

[1700] Wang Ichün，Chung-Su wai-chiao ti hsu-mu—ts’ung Yu-lin tao Yueh-fei（Prelude to Sino-Soviet foreign relations-from Yourin to Joffe）.Taipei：IMH，1963

王聿鈞：《中蘇外交的序幕— —從優林到越飛》

[1701] Wang I-chün and Sun Pin，eds.Chu Chia-hua hsien-sheng yen-lun chi（Dissertations of Dr Chu Chia-hua）.Shih-liao ts’ung-k’an（Historical materials collection）No.3.IMH，1977

王聿鈞和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史料叢刊》第3種

[1702] Wang Ming（Ch’en Shao-yü）.‘Chung-kuo hsien-chuang yü Chung-kung jen-wu’（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 and the tasks of the CCP）.Speeches at the 13th plenum of the ECCI，Moscow，1934

王明（陳紹禹）：《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1703] Wang Ming（Ch’en Shao-yü）.Wang Ming hsuan-chi王明選集（Selected works）.4 vols.Tokyo：Kyūko shoin汲古書院，1973

王明（陳紹禹）：《王明選集》，4卷

[1704] Wang Ming.Mao’s betrayal，trans.by Vic Schneierson.Moscow：Progress Pubilshers，1979

王明：《毛澤東的出賣》，維克·施奈爾森譯

[1705] Wang Shih-chieh.See K’o Shu-p’ing

王世杰，見柯樹屏

[1706] Wang Shih-chieh.Education in China.Shanghai：China United Press，1935（Ann Arbor：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1980）

王世杰：《中國的教育》

[1707] Wang Shih-hsin.‘Wo kuo shou-kung-yeh hang-hui ti ch’an-sheng，hsingchih chi ch’i tso-yung’（The origin，nature and functions of handicraft guilds in China）.Ching-chi yen-chiu-so chi-k’an（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2（1981）213—47

汪士信：《中國手工業行會的產生性質及其作用》，《經濟研究所集刊》，第2期（1981年）

[1708] Wagn Shu-huai.‘Ch’ing-mo Chiang-su ti-fang tzu-chih feng-ch’ao’（Riots against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Kiangsu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Chung-yung yen-chiu-yuan Chin-ta i-shih yen-chiu-so ch i-k’an，6（June 1977）313—27

王樹槐：《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期（1977年6月）

[1709] Wang Shu-huai.‘Ch’ing-mo Min-ch’u Chiang-su sheng ti ien-k’ou fachan’（Population growth in Kiangsu province in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Li-shih hsueh-pao（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7（May 1979）.327—62

王樹槐：《清末民初江蘇省的人口發展》，《歷史學報》，第7期（1979年5月）

[1710] Wang Shu-huai.Chung-kuo hsien-tai-hua ti ch’ü-yü yen-chiu：Chiang-su sheng，1860—1916（Modernization in China，1860—1916：a regional study of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Kiangsu province）.Taipei：IMH，1984

王樹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

[1711] Wagn Shu-pal and Chang Shen-heng.‘Ch’ing-nien Mao Tse-tung shihchieh-kuan ti chuan-pien’（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view of the young Mao Tse-tung）.LSYC 5（1980）47—64

汪澍白和張慎恒：《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712] Wang Ssu-chih.‘Tsung-tsu chih-tu ch’ien-lun’（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lineage system）.Ch’ing-shih lun-ts’ung 4（1982）152—78

王思治：《宗族制度淺論》，《清史論叢》，第4集（1982年）

[1713] Wang Tseng-ping and Yü Kang.Chen Chia-keng hsing-hsueh chi（Tan Kah Kee’s promotion of learning）.Fu-chien chiao-yü ch’u-pan-she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

王增炳和余綱：《陳嘉庚興學記》

[1714] Wang Wen-t’ien and others.Chang Po-ling yü Nan-k’ai（Chang po-ling and Nankai）.Taipei：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26，1968

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傳記文學》叢書第26種

[1715] Wang Yao，Chung-kuo hsin wen-hueh shih-kao（A draft history of medern Chinese literature）.2 vols.Shanghai：Hsin-wen-i-ch’u-pan-she新文藝出版社，1953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2卷

[1716] Wang Yeh-chien.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王業鍵：《中華帝國的田賦，1750—1911年》

[1717] Wang，Y.C.（Yi Chu）.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

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

[1718] Wang Yin-yuan‘ Ssu-ch’uan chan-shih nung-kung wen-t’i’（The problem of farm labour during wartime in Szechwan）.Ssu-ch’uan ching-chi chik’an，2.3（June 1944）

王銀元：《四川戰時農工問題》，《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月）

[1719] Wang Yin-yuan.‘Ssu-ch’uan chan-shih wu-chia yü ko-chi jen-min chih koumai-li’（Prices and purchasing power in wartime Szechwan）.SCCC 1.3（15 June 1944）262—5

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

[1720] Wang Yun-wu.Tan wang-shih（Reminiscences）.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I，Taipei，1970

王云五：《談往事》，《傳記文學》叢書第1種

[1721] Wang Yun-wu.Shang-wuy in-shu-kuan yü hsin chiao-yü nien-p’u（A chronology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New Education）.Taipei：Taiwan CP.1973

王云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

[1722] Wartime China as seen by Westeners.See Price，Frank W.

《西方人士所見的戰時中國》，見畢范宇

[1723] Watson，Andrew，ed.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a translation of Mao’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安德魯·沃森編：《毛澤東與邊區的政治經濟：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譯文》

[1724] Watson，James.‘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research’.CQ 92（Dec.1982）589—627

詹姆斯·沃森：《中國親屬關系再探討：歷史研究的人類學觀點》，《中國季刊》，第92期（1982年12月）

[1725] Watson，Rubie S.‘Class diffefences and affinal relations in South China’.Man，16.4（Dec.19815）93—615

魯比·S.沃森：《華南的階級差別與姻親關系》，《人》，第16卷第4期（1981年12月）

[1726] Wedemeyer，Albert C.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

魏德邁：《魏德邁報告！》

[1727] Wei Ch’ing-yuan and Wu Ch’i-yen，‘Ch’ing-tai chu-ming huang-shang Fanshih ti hsing-shuai’（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n：a famous Ch’ing imperial merchant family）.L -shih yen-chiu（Historical research），3，（1981）127—44

韋慶遠和吳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興衰》，《歷史研究》，1981年第3 期

[1728] Wei，William，‘The Kuomintang in Kiangsi：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bases，1930—1934’.University of Michigan，Ph.D.dissertation，1978

林振華：《國民黨在江西：圍剿共產黨根據地，1930—1934年》，密執安大學，博士論文，1978年

[1729] Weiss，Robert N.‘ Flexility in provincial government on the eve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CSWT 4.3（June 1980）I—43

羅伯特·N.韋斯：《太平軍造反前夕地方政府的靈活性》，《清史問題》，第4卷第3期（1980年6月）

[1730] Wen-chi yueh-k’an（Wen-chi monthly）.Shanghai，June 1936—

《文季月刊》，上海，1936年6月—

[1731] Wen-hua chien-she（Cultural reconstruction）.Shanghai，Oct.1934—

《文化建設》，上海，1934年10月—

[1732] Wen hui pao.Shanghai，1946—

《文匯報》，上海，1946年—

[1733] Wen shih che（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y）.Tsingtao，1952—

《文史哲》，青島，1952年—

[1734] Wen-shih tzu-liao hsuan-chi（Selected iiterary-historical materials），published by the Chung-kuo jen-min cheng-chih hsieh-shang hui-i，Chinese peop-i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Peking：1960

《文史資料選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1960年—

[1735] West，philip.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1916—195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菲利普·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1952年》

[1736] White，John Albert.The diplomacy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

約翰·艾伯特·懷特：《日俄戰爭的外交》

[1736] White，Theodore H.In search of histor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9

白修德：《尋找歷史》

[1737] White，Theodore H.See Stilwell Papers，The

白修德，見《史迪威文件》

[1738] White，Theodore H.and Jacoby，Annalee.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1946

自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

[1739] Whiting，Allen S.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4

艾倫·S.惠廷：《蘇聯在中國的政策，1917—1924年》

[1740] Whitson，William W.with Hung Chen hsia.The Chinese high command：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1927—1971.New York：Macmillan，1973

威廉·W.惠策恩（黃震遐協助）：《中國統帥部：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年》

[1741] Wiens，Mi Chu.‘Lord and peasant：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Modern China，6.1（Jna.1980）3—40

居蜜：《地主與農民：16世紀至18世紀》，《現代中國》，第6卷第1期（1980年1月）

[1742] Wilber，C.K.，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Random House，1973

C.K.威爾伯編：《發達和不發達政治經濟學》

[1743] Wilbur，C.Martin，and How，Julie Lien-ying，eds.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London：Octagon Books，1972

韋慕庭和夏連蔭編：《有關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在北京搜捕中查獲的文件》

[1744] Wilbur，C.Martin.‘The ashes of defeat’.CQ 18（Aprtil—June 1964）3—54

韋慕庭：《戰敗的廢墟》，《中國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

[1745] Wilbur，C.Martin.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韋慕庭：《孫逸仙：壯志未酬的愛國者》

[1746] Wilbur，C.Martin.‘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from Canton to Nanking，1923—28’.CHOC12.527—720

韋慕庭：《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1928年》，《劍橋中國史》，第12卷

[1747] Wilbur，C.Martin.See Fogel，Joshua A.

韋慕庭，見喬舒亞·A.福格爾

[1748] Will，Pierre-Étienne.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au 18e siècle.Paris：Mouton，1980

皮埃爾-艾蒂安·維爾：《18世紀的中國官吏與饑荒》

[1749] Willmott，W.E.，ed.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

[1750] Willmott.W.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JAS 41.1（Nov.1981）113—15

W.E.威爾莫特：《評〈中國不發達狀態的發展〉》，《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1期（1981年11月）

[1751] Wilson，Dick.The Long March，1935：thd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New York：Viking Press；London：Hamilton，1971

迪克·威爾遜：《長征，1935年：中國共產主義幸存的史詩》

[1752] Wilson，Dick，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迪克·威爾遜編：《毛澤東在歷史天平上》

[1753] Wilson，Dick.When tigers fight：the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New York：Viking Press，1982

迪克·威爾遜：《在兩虎相斗之時：中日戰爭史實，1937—1945年》

[1754] Witke，Roxane.‘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of moder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70

羅克珊·威特克：《現代中國五四時期對婦女態度的轉變》，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論文，1970年

[1755] Wittfogel，Karl A.‘The legend o“fMaoism”’.CQ 1（Jan.—March 1960）72—86；2（April—June 1960）16—34

魏復古：《“毛澤東主義”的傳說》，《中國季刊》，第1期（1960年1—3月）和第2期（1960年4—6月）

[1756] Wittfogel，K.A.‘Some remarks on Mao’s handling of concepts and problems of dialectics’.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3.4（Dec.1963）251—77

魏復古：《關于毛澤東處理辯證法的概念和問題的幾點意見》，《蘇聯思想研究》，第3卷第4期（1963年12月）

[1757] Wo I ‘Lin-shih chiaoy-ü-hui jih-chi’（Diary of the Provis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in Shu Hsin-ch’eng，Chung-kuo chin-tai chiao-yü-shih tzuliao，1.296—310.

我一：《臨時教育會日記》，收入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卷

[1758] Wolf，Arthur.‘Gods，ghosts and ancestors’，in Arthur Wolf，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131—82

阿瑟·沃爾夫：《神、鬼和祖先》，收入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

[1759] Wolf，Arthur，ed.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

阿瑟·沃爾夫編：《中國社會的宗教和儀式》

[1760] Wolf，Eric R.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 Row，1969

埃里克·R.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

[1761] Wolf，Margery.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馬杰里·沃爾夫：《臺灣鄉村的婦女和家庭》

[1762] Wolf，Margery and Witke，Roxane，eds.Women in Chinese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馬杰里·沃爾夫和羅克珊·威特克編：《中國社會的婦女》

[1763] Womack.Brantly.The foundations of Mao Tse-tung’s poitical thought，1917—1935.Hon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

布蘭持利·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年》

[1764] Wong，R.Bin.‘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JAS 41.4（Aug.1982）767—88

王國斌：《清代糧食風潮》，《亞洲研究雜志》，第41卷第4期（1982年8月）

[1765] Wong，R.Bin and Perdue，Peter C.‘Famine’s foes in Ch’ing China’.HJAS43.1（J une 1983）291—332

王國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國的饑荒大敵》，《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43卷第1期（1983年6月）

[1766] Woodhead，H.G.W.See China year book

伍德海，見《中華年鑒》

[1767] Wou，Odoric Y.K.‘The district magistrate profess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occupational recruitment，training and mobility’.Modern Asian Studies.8.2（April 1974）217—45

吳應銧：《民國初年地方知事的職業：職業的招聘、訓練和流動》，《現代亞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

[1768] Wright，Arthur.‘Introduction’ in 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variations on a theme

芮沃壽：《白樂日著〈中國的文明和官僚政治：一個主題的種種變奏〉序》

[1769] Wright，Mary Clabaugh，ed.and intro.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Note ‘Introduction’，1—63

芮瑪麗編并序：《革命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

[1770] Wu Ch’i-yuan.Yu chan-shih ching-chi tao p’ing-shih ching-chi（From a war economy to a peace economy）.Shanghai：Tat-ung大東，1946

伍啟元：《由戰時經濟到平時經濟》

[1771] Wu Ch’i-yuan.‘Ts’ung ching-chi kuan-tien lun nei-chan wen-t’i’（Talking about civil war problems from an economic viewpoint）.Kuan-ch’a，7 Sept.1946，pp.3—4

伍啟元：《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觀察》，1946年9月7日

[1772] Wu-Ch’ing chen-chih（Gazetteer of Wu and Ch’ing towns）.1936

《烏青鎮志》

[1773] Wu Hsiang-hsiang.T’i-erh-tz’u Chung-Jih chan-cheng shih（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2 vols.Taipei：Tsung-ho yueh-k’an綜合月刊，1973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1774] Wu Hsiang-hsiang.‘Total strategy used by China and some major engagement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5—1945’，in Paul K.T.Sib，ed.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37—80

吳相湘：《1935—1945年中日戰爭中中國采用的總戰略及若干大戰役》，收入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年》

[1775] Wu Hsiang-hsiang.Yen Yang-ch’u chuan（Biography of Yen Yang-ch’u）.Taipei：Shih-pao Publishing Co.，1981

吳相湘：《晏陽初傳》

[1776] Wu Hwa-pao.‘Agricultural economy of Yung-loh Tien in Shensi province’.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9.1（April 1936）164—76

吳華寶：《陜西省永樂店的農業經濟》，《南開社會經濟季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

[1777] Wu-shih-erh chung wen-shih tzu-liao P’ien-mu fen-lei so-yin（A topical index to 52 series of Wen-shih tzu-liao），comp.by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Futan University，Shanghai，1982

《五十二種文史資料篇目分類索引》，復旦大學歷史系編

[1778] Wu-sh ih-nien lai ti Cung-kuo.See P’an Kung-chan

《五十年來的中國》，見潘公展

[1779] Wu，Silas H.L.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1693—173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吳秀良：《中國的下情上達和朝廷控制：上奏制度的演進，1693—1735年》

[1780] Wu-ssu shih-ch’i ch’i-k’an chieh-shao（An introduction to the periodical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ed.by the CCP Centre.3 vols.Peking：Jenmin.1958—9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3卷

[1781] Wu Ta-k’un.‘Tsui-chin Su-chou ti nung-min nao-huang feng-ch’ao’（The recent disturbances among Soochow peasants due to poor harvests）.TFTC 32.2（16 Jan.1935）83—4

吳大琨：《最近蘇州的農民鬧荒風潮》，《東方雜志》第32卷第2期（1935 年1月16日）

[1782] Wu Tay-eh.‘Shih-chieh ching-chi shuai-lo chung chih Chung-kuo’（China during world economic collapse），in Fang Hsien-t’ing，ed.Chung-kuo ching-chi yen-chiu（Studi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See 1.45—56

吳大業：《世界經濟衰落中之中國》，收入方顯廷編：《中國經濟研究》

[1783] Wu，Tien-war.The Sian I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

吳天威：《西安事變：現代中國史的支點》

[1784] Wu Tien-wei.‘New materials on the Sian incident：a bibliographic review’.Modern China，10.1（Jan.1984）115—41

吳天威：《關于西安事變的新史料：書目評論》，《現代中國》，第10卷第1期（1984年1月）

[1785] Wu Ting-ch’ang.Huah-si hsien-pi cheng-hsu-chi（Random notes at Huahsi）.2 vols.Taipei：Wen-hai文海，nd..

吳鼎昌：《花溪閑筆正續集》，2卷

[1786] Wylie，Raymond F.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Chinese theory，1935—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雷蒙德·F.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年》

[1787] Ya Hsien.ed.Tai Wang-shu chüan（Collected works of Tai Wang-shu）.Taipei：Hung-fan洪范，1970

痖弦編：《戴望舒卷》

[1788] Yamamoto Hideo and Noma Kiyoshi，comps.Chūgoku nōson kakumei no tenkai中國農村革命の展開（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grarian revolution）.Tokyo：Aj is keizai shuppankaiア ジ ア，經濟出版會，1972

山本秀夫和野間清編：《中國農村革命的發展》

[1789] Yamamoto Sumiko.Chūgoku Kirisuto kyōshi kenkyū中國キリス卜教史研究（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Tokyo：Tokyo Daigaku shuppankai，1972

山本澄子：《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1790] Yang.C.K.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9

楊慶堃：《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家庭》

[1791] Yang，C.K.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9

楊慶堃：《一個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農村》

[1792] Yang，C.K.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

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

[1793] Yang.C.K.‘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 Jr.and Carolyn Grant，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174—210

楊慶堃：《關于19世紀中國民眾活動的若干初步統計模式》，收入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編：《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和控制》

[1794] Yang，Gladys，ed.and trans.Silent China：selected writings of Lu Xu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戴乃迭編譯：《無聲的中國：魯迅著作選》

[1795] Yang Liang-kung.Tsao-ch’i san-shih-nien ti chiao-hsueh sheng-huo（My life as an educator：the first 30 years）.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eries No.98.Taipe：Chuan-chi wen-hsueh，1980

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

[1796] Yang，Martin M.C.Chinese social structure：a historical study.Taipei：The National Book Co.，1969

楊懋春：《中國的社會結構：歷史研究》

[1797] Yang，Winston L.Y.and Mao，Nathan K.，eds.Modern Chinese fiction：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Boston：G.K.Hall，1981

溫斯頓·L.Y.楊和內森·K.毛編：《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和欣賞指南》

[1798] Ya Hsin-nung，Themaice of empire，trans.Ch’ing kung yüan and intro.by Jeremy Ingal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姚莘農：《清宮怨》，杰里米·英戈爾斯譯

[1799] Yeh Hsien-en.Ming Ch’ing Hui-chou nung-ts’un she-hui yü tien-p’u chih（Hui-chou rural society in the Ming and Ch’ing and the system of semifree field servants）.Anh-ui：Jen-min，1983

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

[1800] Yeh Wen-hsin，‘The alienated academy academy：higher educ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84

葉文心：《異化了的高等學府：中華民國的高等教育》，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論文，1984年

[1801] Yen Chung-p’ing et al.，comps.Chung-kuo chin-tai ching-chi-shih t’ungchi tzu-liao hsuan-chi（Selecte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Pkeing：K’oh-sueh ch’u-pan-she科學出版社，1955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1802] Yen Hsi-ta.‘Ching-chi wei-chi yü kuan-liao tzu-pen’（The economic crisis and bureaucratic capital）.Ching chi chou-pao 4.6（6 Feb.1947）9—11

彥悉達：《經濟危機與官僚資本》，《經濟周報》第4卷第6期（1947年2 月6日）

[1803] Yen Yuan.‘Ts’un hsueh’，pp.40—106 in Yen Yuan，Ssu ts’un pien.Peking：Ku-chi ch’u-pan-she，古籍出版社，1957

顏元：《存學》，收入《四存編》

[1804] Yin Chung-ts’ai，ed.Chai-ch’eng ts’un chih（Gazetteer of Chai-ch’eng village）.1925.Taipei reprint，1968

尹仲材編：《翟城村志》

[1805] Yip，Kac-he.‘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student activism in the 1920s’，in F.Gilbert Chan and Thomas H.Etzold，eds.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94—107

葉家哲（音）：《愛國心與革命：20世紀20年代學生積極行動的性質和原因》，收入陳福霖和托馬斯·H.埃特佐爾德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革命》

[1806] Yip，Ka-che.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Bellingham：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80

葉家哲（音）：《宗教、愛國心與中國學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運動》

[1807] Young，Arthur N.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楊格：《中國與援助者，1937—1945年》

[1808] Young，Arthur N.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年》

[1809] Young，Arthur N.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1927—1937：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1

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1937年：財政和經濟記錄》

[1810] Young，Ernest P.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7

歐內斯特·P.揚：《袁世凱的統治：中華民國初期的自由主義和獨裁政治》

[1811] Young，Ernest P.‘Chinese leaders and Japanese aid in the early Republic’，in Akira Iriye，ed.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124—39

歐內斯特·P.揚：《民國初期的中國領導人與日本援助》，收入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

[1812] Young，Ernest P.‘Politics in the aftermath of revolution：the era of Yuan Shih-k’ai，1912—16’.CHOC 12.208—55

歐內斯特·P.揚：《革命后的政治風云：袁世凱時期，1912—1916年》，《劍橋中國史》，第12卷

[1813] Young，John.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1907—1945：a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New York：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66

約翰·揚：《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1945年：歷史和書目》

[1814] Yu，George T.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the Kuomintang，1912—19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6

喬治·T.于：《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國民黨，1912—1924年》

[1815] Yü Ch’ang-lin.‘Ching-shih ta-hsueh-t’ang yen-ko luen’（Brief history of Peking University），in Shu Hsin-ch’eng，Chung-kuo chin-tai chiao-yü-shih tzu-liao，159—62

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略》，收入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卷

[1816] Yü Chi-nan.Chang Kuo-t’ao ho ‘Wo-ti hui-i’（Chang Kuo-t’ao and My Recollections）.Chengtu：Jen-min，1982

于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

[1817] Yü-O Wan-Kan ssu-sheng chih tsu-tien chih-tu（The tenant system in the four provinces of Honan，Hupei，Anhwei and Kiangsi）.Nanking：Chinling ta-hsueh金陵大學，1936

《豫鄂皖贛四省之租佃制度》

[1818] Yü，P.K.，in collaboration with Knezevic，Ingeborg，Cheng，James and Chi，Ping-feng，eds.Research materials on twentieth-century China：an annotated list of CCRM publications.Washington，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1975

余秉權等編：《關于20世紀中國的研究資料：中國研究資料中心出版物注釋目錄》

[1819] Yü Ts’ai-yu.‘T’an chin-t’ien ti hsueh-sheng’（Discussing today ’s students）.Kuan-ch’a，24 April 1984，pp.17—18

余才友：《談今天的學生》，《觀察》，1948年4月24日

[1820] Yuan，Cheng.T.L.Yuan：a tribute.See Ssu-i lu

袁成（音）：《袁同禮：贊頌》，見《思憶錄》

[1821] Yuan T’ung-li.See Ssu-i lu：Yuan Shou-ho hsien-cheng chi nien ts’e（Memorial volume on Mr Yuan Shou-ho [T.L.Yuan]）.Taipei：CP，1968

袁同禮，見《思憶錄：袁守和先生紀念冊》

[1822] Yung Lung-kuei.‘Chiu-chi chan-shih kung-yeh ti chi-pen t’u-ching’（Fundamental means of rescuing the wartime industry）.Chung-kuo kung-yeh，25（Mar.1944）8—9

勇龍桂：《救濟戰時工業的基本途徑》，《中國工業》，第25期（1944年3月）

[1823] Zelin，Madeline.‘Huo-hao kuei-kung：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and its limit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dissertation，1979

馬德琳·澤林：《豁耗歸公：18世紀中國實行財政改革合理化及其限制》，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士論文，1979年

[1824] Zen，H.C.See Jen，Hung-chün

任鴻雋